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战史资料选编
(二)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说 明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是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的印证和补充，是为从事党史军史研究人员提供参考而编辑出版的。

红二方面军的历史文献、资料比较丰富，本书只是有选择地进行了编辑。所选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属首次公开发表。全书按照红二方面军的战斗历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红二军团暨湘鄂西和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红六军团坚持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向黔东转移，以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红二方面军长征。每个历史阶段的资料选编包括历史文献、回忆史料、调查材料及其他参考资料。另外还附有一些有关书目、文章的目录索引，以备查阅。

本书辑收的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编排。文件标题，凡由编者加拟的，用*号标明；对错别字，将正字加于其后，用[]号表示；对漏字、加字，用<>号表示；对衍字，用 号框起；对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者，用×号代替；对缺损字，用 号代替。需加以说明的，尽可能作了注释。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辑、考证方面难免有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历史文献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一) 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与地主军阀的封建剥削，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国民经济的崩溃在全国范围内及一切经济部门内进行着。工业的危机迅速地开展着，丝纱面粉等主要的轻工业部门，都处于恐慌与衰落的状态中(上海丝厂开工的仅十分之二，其他各地亦一样，丝厂工人失业者在十万人以上，纱厂方面厚生三新等厂倒闭，日本厂的纱锤织机迅速增加，面粉业开全工者仅五月)，重工业更加非民族化而处于帝国主义的垄断的状况之中。农村经济的崩溃更是急剧而猛烈；在地主与高利贷者的奴役与剥削，军阀的搜刮与不断的内战，帝国主义的掠夺之外，更加上了空前的水灾，几十万的农民群众被大水淹死，几十万栋房屋为洪水所毁灭，几千万的农民在寒冷的冬天，冻饿、死亡。十四万万亩以上的土地被水冲荡而失去任何收成。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的奴役与剥削农民造成了空前的水患，但是他们对于这些被灾的饥寒交迫生死不得的农民不曾有任何的救济。他们利用赈灾的名义，发了八千万公债，加了几十种捐税，向美国帝国主义借了高利贷式的美麦借款，而一点都没有用到灾民身上，相反的更加用工赈急赈名义奴役农民，在灾区中更增加了许多新的苛捐杂税；资本家更利用广大的失业失地的劳动后备军，来扣减工厂工人不得一饱的工资，来增加他们工作时间；地主与高利贷者更利用时机来剥削他们。国民经济的浩劫，使无数千万的劳苦工农受到骇人听闻的惨痛、贫困、饥饿、瘟疫与死亡。千百万群众的痛苦已经到了极点。

(二) 经济危机的深入直到国民经济总崩溃，无数万工农群众的灾难痛苦及他们革命斗争的剧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运动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国民党不但不能消灭甚至不能暂时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三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阀受到悲惨的失败，红军击溃了十五师以上的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结果，仅仅在赣南，红军就获得了一万枝以上的步枪，五百万发的子弹，一百五十枝以上的机关枪，俘虏了二万余人。从第三次“围剿”冲破后，红军更得了许多新的胜利，闽粤赣区恢复了杭武永苏区，占领了永定、汀州、连城，发展和扩大到宁化、清流。赣东北区不但与闽北崇安、铅山一带苏区联系一起，并且向着浙皖边发展，占领了常山、婺源等县城。鄂豫皖区扑灭了反革命派破坏红军的阴谋，大大地巩固了红军与苏区根据地，并且占领了英山、霍邱与黄安的县城。湘鄂西区贺龙同志所领导的第三军与九师会合后，更巩固了洪湖根据地，正在与敌人艰苦的战斗中创立襄河北岸的新的根据地。湘鄂赣与湘赣边都一样的扩大原有的根据地，向着蒲圻、嘉鱼及上犹、崇义发展着。中央苏区不但恢复了第一次“围剿”前的区域，并占领了赣南会昌、寻邬、安远、信丰各县，并且正在围攻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由于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的全部投入红军(约二万余人)，宁都、广昌都重新入于红军之手，并且有占领抚州消息。吉安已如孤城，反动统治在江西所保持只有南浔路上的八九县。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红军坚强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夺取了敌人的武装武装了自己，向着红色铁军的道路上前进。红军已经成了伟大的坚固的革命的铁拳。由于苏区内部反革命组织的破获，及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毒害坚决的肃清，没收来的土地的重新分配给苦力雇农和基本的农民群众，苏维埃机关的改造与阶级异己分子的肃清，大大地

提高了工农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及苏维埃政权在他们中间的威信。全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建立给苏区与非苏区的革命运动以总的领导，更能顺利地实行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领导权。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三）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伟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日渐崩溃，促使帝国主义从隐藏的武力干涉（供给反革命军队以军火军费与军事顾问等等）转变到直接的公开的武力干涉，这便产生了日本的武力占领满洲的事变，同时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企图将满洲变为自己的完全殖民地，变成为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它并且企图经过自己的走狗韩复榘、阎锡山、冯玉祥伸手到中国北部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帝国主义完全同意与援助日本的行动，企图实现反苏联的军事冒险与占领云、贵。英帝国主义部分的赞助日本的行动，只要日帝国主义者不侵入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帝国主义者，它的企图是将全中国放置在自己的金元势力之下，在事变开始的最初时期取了等待与观望的态度，实际上同样的帮着日本帝国主义来掠夺中国民众及造成反苏联的场地。事变的开展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与日、英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目前的形势显然是：在反对苏联的战争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国际联盟及美国都一样是掠夺和压迫中国的强盗）；它们在瓜分中国分配中国的富源上孕育着开展着帝国主义企图间的冲突与矛盾。反苏联战争的准备，瓜分中国，直接的公开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的策略之中心。对于中国劳苦群众的掠夺与瓜分中国是在急剧的进行，红军苏维埃的发展将促使帝国主义更公开的用武力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的武力广大武装的冲突的整个历史的阶段是在前面。因之党的任务是：组织、准备、领导、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护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来争取中国的统一。

（四）经济危机的加深，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与瓜分中国的急进，这是决定中国目前情势的三个因子，是生长中国革命危机的三支柱石。经济危机深入到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地步，使得千百万的工农生活极端恶化，失业失地，饥饿寒冻，使得他们的斗争极端紧张，因为他们只能在反抗与死亡中选择自己的出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苏维埃与红军，成了新的革命高涨的柱石，成了全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红军的光荣的胜利，给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劳苦群众指出了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道路。满洲的事变惊醒了最广大的劳苦群众及城市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的觉醒，激动了他们的仇恨、愤懑与反帝国主义的热忱，国民党统治的必然的投降帝国主义，更促进反帝运动转变成为直接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斗争。

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在高涨着，在工厂中，在矿山中，在铁路上，在船上，在苦力与黄包车夫中，罢工斗争不断的发展着，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接二连三的禁止罢工的命令。罢工斗争大部分是经济的斗争，但是经济口号与政治口号的密切的联系，及罢工的顽强性与坚持性，是目前罢工斗争的必然的特点。个别的反帝国主义的罢工，已经不是偶然的现象，已经在个别的城市发展到了总同盟罢工的形势（如太原一天的总罢工），许多产业部门爆

发着酝酿着一业的同盟罢工（如招商局，上海的纱厂、印刷、市政等）。对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资本家与黄色工会的一致的进攻，工人阶级正以自己的英勇的反攻与进攻来回答。在国民党统治总崩溃的基础上，黄色工会的反革命的面目，反工人阶级的面目亦逐渐被工人阶级所认识。开展着的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正在蓬勃起来。黄色工会的新的欺骗，亦层出不穷的积极进行，常常用假的领导来消灭工人斗争。一部分群众还对他们有多少幻想。必须深刻的估计到罢工斗争极大部分是自发的，党和工会对于罢工斗争的领导，还是非常薄弱。党和工会还缺乏有耐心的艰苦的准备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罢工战术与策略上的许多错误，使得个别的在赤色工会领导下的斗争不曾能够得到胜利结束。罢工经验的研究是非常的不够，争取黄色工会中会员群众的问题还没有郑重的提出。赤色工会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还是非常的不充分，它与工人群众的联系，还是非常薄弱。

反帝斗争吸收了新的千百万的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从和平的请愿转变到剧烈的示威，与军警肉搏，捣毁国民党部与政府机关。广大的群众在几月来斗争的经验上认识国民党统治的卑鄙无耻与投降帝国主义，感觉到非推翻国民党统治与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不能够求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要求政权、建立民众政权的企图，在广大的群众中成熟着，并有了初步的尝试（如民众法庭等）。但是这个运动主要的还建筑在学生群众身上，工人群众还没有能够成为反帝运动的主力，因之运动还缺乏坚持性、顽强性与清晰的口号。党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不能够抓住一切群众斗争的领导，对于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还是不充分，有些党部落在群众的后面，有时有些党部又害怕与学生群众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斗争，有些党部采用了不可允许的关门主义的政策，放弃反帝运动的领导（如陕西），一般的还不能够将反帝运动与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亲密的联系起来。

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广大的农民与灾民斗争日益开展，抗租抗税、抢米分粮、捣毁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及游击战争，是这些斗争的形式，甚至发展到地方暴动，占领县城（如长乐）。

士兵的斗争哗变是同样发展着，二十六路军全部（二万余人）投入红军，各地零碎部队的投入红军与哗变，都证明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影响着反革命的军队崩溃与瓦解。同时党在农民群众及士兵群众中的工作，还是非常的缺乏，甚至还剩留着机会主义的消极。

（五）红军与苏维埃的胜利的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域中高涨着的工农革命斗争，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冲突与互相间的把戏花样，将四年来统治中国、出卖中国、压迫劳苦群众、屠杀劳苦群众的军事独裁者——蒋介石的政府推翻了。继起的新政府，国民党各派的联合政府（这里面，蒋介石派依然占有重大的影响），依然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在阶级的实质上，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当然不会有任何的变更。新政府中亲日势力的优势，将使它更迅速地完全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屈膝匍匐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面前。同时这一政府只是不稳固的暂时过渡的政府，各派军阀及其幕后的帝国主义者正在积极的准备着新的军阀战争——这个战争是被全国的反日的怒潮与红军的胜利所阻止着。

在目前形势之下，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广大的群众认识了国民党的统治卑鄙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武断宣传与欺骗已经不能使广大的群众相信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都积

极起来，改组派的“国民救国会议”，江苏青老的“困难救济会”，第三党的“和平政府”，托陈取消派的“召集国民会议实现民众政权”，所有这些主张，他们一致的作用，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而向国民党去“官民合作”。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六）估计着目前形势，必须指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这个变动是有利于工农的，有利于红军苏维埃的。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为着实现这个总任务，党必须更进一步的巩固工农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及其临时中央政府，执行正确的以工农革命利益出发的土地、劳动、经济政策，用一切力量开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工农革命斗争，加紧反帝运动的领导，加紧对工人自发的罢工斗争的领导，将工人组织到赤色工会中去，争取黄色工会的会员群众，发动领导农民与灾民的斗争，瓦解反动军队与争取士兵群众。

（七）在苏区方面：（1）工农红军的行动必须更加积极起来，更加互相呼应的行动，依据现在的成功开展着胜利的进攻。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在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胜利的进行革命的进攻，要求我们要来巩固红军，加紧红军战士的政治训练，改善红军的成份，动员城市的无产阶级到红军中去，提高红军战士的积极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消灭一切反革命派的破坏红军的阴谋。（2）土地问题的正确的解决，在提高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上，在保证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上有决定的意义。绝对不允许以强力及苏维埃的命令，强迫进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必须用发展农民自己的组织创造力与毅力来进行。保护雇农、贫农的利益，反对富农，顾及到中农群众的利益，是党在平分土地中领导的原则。不得中农的同意，不能够更动他的土地。党必须坚决地进行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与中农。富农（大多数是封建的剥削者）的土地亦在没收之列，但是在他自己耕作的条件之下，他可分得一部分坏的“劳动分地”。（3）一切经济政策、租税政策上的过早或妨害基本农民群众利益的办法（如鄂豫皖、赣东北的高税率与不坚决执行免除贫农一切捐税，赣东北的组织苏维埃农庄的企图等），应该立即纠正。（4）坚决的改造下层苏维埃机关，坚决进行肃反工作，肃清阶级异己的分子，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进行苏维埃的建设。建设苏维埃机关的一切日常的工作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方法。（5）一切忽视改善工人生活，对于执行劳动保护法的忽视，将给阶级敌人以很大的帮助，而妨碍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对于创立苏区中的群众的

赤色工会工作之迟缓是一刻也不能忍耐的了，必须立即派选得力的干部来进行组织工人阶级自己的阶级工会的工作。

(八) 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党的责任是开展一切群众的斗争，领导一切群众的部分的日常的经济的斗争，领导反帝斗争走向总的向国民党统治进攻的道路中去，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来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里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只有工人阶级罢工斗争能够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与失业工人斗争以坚定的信念，不折不挠性与革命顽强性。因之，党在工厂中间的工作，在黄色工会会员中间的工作，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急切。小心的准备一切工人阶级部分斗争，领导一切工人自发的斗争，组织与准备工人群众的年关斗争，发展赤色工会，争取黄色工会的会员群众，组织工人选举的罢工委员会并转变为工厂委员会，组织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共同的斗争委员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吸收失业工人参加，这是目前的主要的任务。自然必须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善于引导与联系到反帝的斗争，拥护红军与苏维埃的斗争。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的工作的中心，应该集中到工厂去，到工会工作上去，到领导罢工斗争上去。

党必须抓紧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暴行，法国及其他各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行动(法国的侵入云南，英国的占领西康等)，及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如不抵抗、订立中日密约，三井借款等)来开展群众的反帝斗争的新的阶段。各级党部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坚决地勇敢地去实现国际最近加紧领导反帝运动的指示。在一切宣传鼓动之中，加紧去揭破一切国民党的出卖民族污辱民族，加紧去揭破一切反革命派的实际上帮助国民党维持它的反革命的统治。广大的宣传民众革命的民众政权的口号，使广大的群众了解只有苏维埃政权是真正民众政权。党和苏维埃政权应该号召民众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并再告诉群众，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是求得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更进一步的开展反帝斗争，到处在工厂中，学校中，兵营中，街道上组织群众的反帝组织，并创立每一个城市的反帝代表会，组织反帝的示威，争取反帝示威自由。加紧的反对一切在野的派别，在组织上巩固党的政治影响的开展，这是党在反帝运动中的中心任务。

对于一切灾民的抗捐抗税的斗争，士兵的斗争，党应该加以坚决的领导，一切对于这些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消极应加以最严厉的打击。党应该站在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斗争的领导地位，应该发展这些斗争来破坏国民党政权，来拥护和援助红军的行动，组织这些斗争成为响应红军的胜利的进攻的浪潮。

在组织上巩固党的组织，准备党的组织与党员去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的阶级决战，是十分重要的。这里必须加强党员的政治教育，提拔新的工人干部，考查教育旧的干部，特别应该注意到敌人的破坏党混入党的阴谋，而严密党的组织，同时应该广大的征收工人农民及一部分贫苦的革命学生到党内来，改善一切党的组织的领导的方式，一切问题集中到支部去，改善支部的生活，建立在工厂作坊中的党的堡垒。

(九) 为着执行党面前的战斗的任务，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无情的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革命的危险，这种倾向在现在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危机紧张的估计不足；对于红军行

动的消极、悲观失望的胡说红军涣散，不愿意利用顺利的形势开展进攻的斗争，以昨天的正确的策略，当做永远不变的教条；对于工会工作的消极，忽视工人的经济斗争，认为工人斗争在经济恐慌之下是不可能的：在反帝运动中作国民党各派及其他各派的俘虏等。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左”的倾向危险，由于革命危机迅速成熟，亦逐渐的增长起来，和立三路线复活的企图（如主张号召上海的一天的总罢工，放弃在黄色工会中艰苦的争取它的会员群众工作，而主张小部分工人自动退出黄色工会等），对于这种倾向的斗争一分钟亦不能放松。应该反对一切口头上承认决议案的正确而实际抵抗或不想一切的方法去执行决议案的两面派的态度。艰苦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发展自我批评与深入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央坚信各级党部的同志，必定能够完全实现这个决议，而确立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中央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

(一) 在立三路线的统治之下，在各苏区内的党实际上执行了十足的富农的机会主义路线。地主的土地，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没收；所有土地革命的果实，也完全落到了富农的手里；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等的机关，也很多为地主富农分子把持着，执行着他们的意志。因此，那时在苏区的阶级斗争没有能够扩大与深入，甚至有人以为在苏维埃区域内根本用不到阶级斗争，而主张和平的转变到社会主义。

(二) 自从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传达到了苏区，并且在苏区开始执行以来，苏区的阶级斗争，是一天一天紧张起来了。地主与富农分子看到自己地位的根本动摇，便团结他们的力量，利用一切方法与一切机会，在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等内部进行各种反革命工作，企图推倒苏维埃政权，恢复旧有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其次“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围剿”，更其帮助他们加紧了这种斗争。所以在最近各苏区内发现了 AB 团(中央区)、社会民主党(闽西)与改组派(湘鄂边、鄂豫皖)的反革命团体的活动及阴谋，实是不足奇怪的。

(三) 这些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活动的方法，主要的是在利用这些组织的分子所把持的机关，对于党与苏维埃的政策执行怠工，或是有意曲解这些政策，造成民众对党与苏维埃的不满意，而反对这些政策。他们更常常利用党与苏维埃所犯的错误，扩大与夸张这些错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此外，他们更直接破坏苏维埃的建设，暗杀党与苏维埃的负责人，散布扰乱民众视听的谣言，串通外部敌人，以至直接举行反革命的暴动。一切民众对于党与苏维埃的不满意；他们都要拿来当作反对党与苏维埃的资料。

(四) 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对于这些反革命的团体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要从最坚决的阶级立场上，把一切阶级的异己分子从党内苏维埃内与职工会内洗刷出去。要最无情的对付一切反革命团体的领导分子。必须最广大的在民众前面，宣布这些团体的政纲与他们的罪状，在革命法庭前面公开审判他们，把他们依照苏维埃法令治罪。必须用很大的决心，成立政治保卫处，有计划的与有组织的同这种反革命团体做斗争。对于一切推翻苏维埃的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必须最坚决的用武力镇压下去，绝对不容有丝毫的犹豫。

(五) 然而，在同这些反革命团体斗争中，我们绝对要防止夸大这些反革命团体的力量，或是把他们看做神秘不可思议的东西，而表示出慌张失措的情绪。对于他们内部的领袖与群众，应该从阶级的立场去处罚他们，应该把主动与被动者严格的分别开来。必须坚决反对把一切反对党与苏维埃政策的分子，把一切对党与苏维埃取反对或不满情绪的分子，或对党与苏维埃的指示消极怠工的分子，都看做是同一团体的分子的倾向(如象在中央区、在闽西)，对他们采取同一的办法。这种倾向只会夸张反革命团体所有力量，或是使他们的团体变为神秘不可思议的东西。

(六) 应该很明确的了解在苏区内所有复杂的阶级关系。除了豪绅地主残余、资本家、富农与无产阶级之外，在苏区内还有中农、贫农、苦力等人数很多的许多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因为中国革命中红军所有的特别作用(创造出苏区的作用)，所以不一定在每一个苏维埃区域，一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阶层立刻了解或完全了解苏维埃的政纲与法令，会立刻接受共产党的领

导。同时党内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国际与四中全会路线的曲解与怠工，更会造成这种障碍。无疑的，这种不了解，这种不信任，会给反革命所利用。但对于这种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党只有加紧对于他们的教育工作，发展他们反地主反富农等斗争，使他们在实际经验中知道党的路线的正确，把他们夺取过来。对于他们的任何强制与压迫，只能帮助敌人，反对革命。

（七、）不要梦想以党的与苏维埃的一些军事的、刑事的、法律的、组织的方法，会消灭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到达到这一目的，最主要的还是发动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把雇农工会、贫农团、职工会等组织起来，彻底实行苏维埃的一切法令，提起广大劳苦群众的积极性，吸收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加入党、青年团，参加苏维埃等的领导工作，来代替那些昏庸腐化的，以至一切地主富农的分子。只有这样，才是根本消灭反革命分子的最基本的办法。

（八）反革命分子混进党内（苏维埃内以至红军内），这是不成问题的事情，但不能把党内的一切消极怠工的分子，在政治上犯有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分子，都看做是反革命团体的分子。党决不能因为反对反革命团体的分子，而取消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取消党内的一切教育工作；却正相反，正是为得要消灭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党内的影响，所以必须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党内的教育工作。一切机会主义者，消极怠工的分子，客观上必须是反革命分子的帮助者，但不一定每一个机会主义分子都是反革命团体的一分子（在一切其他组织内都是如此）。只有这种斗争，才能把无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洗刷出去，教育一部分尚能改正错误的分子，肃清反革命分子在党内的影响，来巩固党。

（九）最后苏区内的党与苏维埃，以至其他组织，必须最严厉的检阅自己的工作，发展自我批评。只有使自己的工作真能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改正一切所有错误与缺点，才能把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吸引到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揭破一切反革命的欺骗宣传。把同反革命团体的斗争，同检阅自己的工作与自我批评的发展对立起来，或甚至借这种斗争为口实，禁止检阅自己的工作与压制自我批评的发展，实际上都是在帮助反革命与反对革命；而且这种方法，也正是党内与苏维埃内反革命分子所利用来造成民众的不满意，以反对党与苏维埃的。

中央给湘鄂西党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关于湘鄂西党目前组织务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中央分局和省委：

四中全会后，湘鄂西党的组织状况和对于组织任务的执行，中央虽然还没有接到你们比较完备具体的文件，但根据你们派来几个同志的谈话中和你们其他一般文件中所零碎叙述的材料中所看得出来的，中央认为有写这封信给你们有必要，希望能引起你们严重的注意与热烈的讨论，探取有××办法，来×××××××××及全部组织工作最严重的较变。

(一) 中央认为国际和四中全会的确(此字是照原样抄下的——抄者)给予湘鄂西党全部工作较变有力的基础，中央分局在这个基础上所领导的组织上的较变，已经获得相当的成绩，这主要的表现在：

(1) 相当的巩固和改造了各地党部的组织，提高了各级党的积极性和党内纪律，改善了党的成分，改善了与下级党部的联系，减少了党及各种机关中官僚腐化的现象。

(2) 克服了立三路线及其执行者中夏同志的逃跑主义，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巩固了苏区与红军，兴奋了广大劳苦群众的革命热情与坚决为巩固和发展苏区而斗争的积极性。

(3) 恢复与重新建立了群众组织和他的工作××××路线×取消的工会青年团组织已恢复了，立三路线时代根本忽视的贫农团已建立起来了，这样使党与群众的联系密切了，使党动员群众的力量增强了(如各种纪念节运动周中)。

(4) 加强了党内党外的宣传教育工作(如建立党报、读报小组……)，消灭了立三路线时代所造成的党内党外“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使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增高了一些，在群众中不再发现过去所谓“共产党比国民党稍好”一点观念。

(5) 在<反>富农路线的斗争中与肃反工作中，初步的改善了党的基础，可说现在湘鄂西党员的成分，贫雇农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但真正工人与雇农成分还不知道)，洗刷了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出党，从各种机关中驱逐了一些反革命的派别，开始了提拔与训练干部的企图。

(6) 注意了发展组织的工作，能够利用各种紧急事件纪念运动等举行征收党员的运动，号召加入红军的运动，并且获得一些成绩。

(7) 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相当的改变了过去那种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通×式的空文而代以比较切实的领导(建立巡视制度等)。

(8) 开始了白区工作的建设(如建立与加强宜昌、洞庭等处工作)，注意了党的队伍随着环境而改编的准备工作(如有些苏区做了些准备在严重条件下转入秘密状态的工作)。

(9) 一般的开始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发展了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执行了红军中集中的军事纪律，以及注意了党员要做群众模范者的教育。

(二) 转变中的这些成绩与进步，当然不能过分的估计，这只是初步的开始，还是非常的不充分，还极端的不能令人满意，在这些初步的成绩中，还包括许多弱点，在整个组织任务的执行上，还表现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最主要的是：没有把湘鄂西党前面许多严重的组织任务放在全部工作的重要地位，没有建立真正的集体指导，团结党的积极干部，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来

从组织上进行最严重的转变，许多组织任务的提出，常常只是原则性的空谈，而没有了解他的真实内容，没有估计各地具体环境与根据个别具体经验，探讨出最明确最实际的办法来给各地党部以指示，没有利用苏区公开的环境，组织大规模各种群众的运动，不会艰苦的教育各级党部真正能自动地独立地进行工作，采取强有力的方针来保证党的一切决定不要停留在白纸上，而是在实际中彻底的真实的执行，随时检阅执行的程度，吸取工作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与教训。

这些错误与缺点主要表现在。

(1) 严格的说，湘鄂西党还没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集体领导，一个时期中，中央分局与省委工作混淆不清，因省委的薄弱，而实际上代替了省委的工作，省委组织不健全，省委委员甚至常委又多是变成了巡视员，或兼设要职而放弃了省委本身工作，如一个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又兼政府主席，再兼军委主席团之一，这样省委在事实不成其为一个名符其实的领导机关，更谈不到省委各部工作健全的建立。

(2) 各级领导机关中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还保留许多旧的官僚主义的残余，没有彻底采用新的方式与方法，没有实行科学的分工与个别负责制，不会有工作计划工作日程的进行工作，常表现事务主义的手工业式的现象，没有设法加紧工作的速率，没有经常定期的检阅工作，不会进行革命的竞赛与突击队及各种组织动员的方法，来兴奋推动工作，对下级不是领导与帮助工作，而是代替与包办工作。

(3) 党与群众、群众组织还没有建立正确的关系，党与群众组织及其工作，没有正确的划分，混淆不分与包办主义的现象，依然存在，没有建立健全的党团组织和工作，经过党团去领导与帮助工作，党对群众组织很少经常的指导和帮助，随便调动他们的干部来做别的工作，妨碍群众组织独立性。

(4) 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还没有深入到下级党部与支部中去，许多重要问题的讨论，常常停留在上级机关中，没有把斗争政治内容与实质作深刻解释与教育工作，对于同志中的错误没有公开的自我批评，利用每一事实广泛的教育群众而常常是秘密的采取个人谈话方式来解决，所以反倾向的斗争有时被同志误解为个人的问题（如有些同志曾认为是反对中夏同志个人的问题），而模糊了斗争的政治性与原则性。

(5) 没有扩大与巩固党的积极干部，从组织上去巩固党的全部工作，对于提拔新的干部还非常不勇敢，就是提拔了一些干部，也多是形式上的，没有必须程度的教育工作，使他真正能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与独立性的工作，没有“面向下层”从支部中在日常斗争与工作中去发现新的干部，有些地方干部的提拔不是根据于阶级的觉悟性与政治上组织上的坚定性，而简单的以“有办法”和“才能”为标准，甚至个人感情与地方观念的关系，没有利用公开党的便利经常的大规模的举办各种人材训练班与党校，以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干部的困难，特别不会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抓住一切事件如各种群众的行动及三军回根据地等机会，很好的团结所有积极干部在党的路线的周围，使一切机会主义者派别分子孤立起来，有力的给那些反中央分局正确领导的活动与企图以严重的打击！不使一切好的干部受机会主义的影响来与中央对立和进行反中央分局的斗争。

(6) 还没有在党内进行最重要的教育工作，采取有力的办法来提高党员水平，个别谈话，讨论会，读报小组，识字班等方法××普遍不断的去进行，

使每个党员都能懂得现实党的政治路线和行动纲领及党和许多最基本问题，党内生活与支部生活异常缺乏。

(7) 对于党的刊物的扩充，加强党报的政治领导，使党报成为党的组织者的作用，这个工作你们简直没有注意，现在刊物的内容如何，中央现在还没有根据来批评，从你们发行党报的分数（据说是 400—600）已可看到他在一万二千多党员中的作用是何等微弱，更无从估计他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了，任何借口，都不能掩饰这种严重的错误。

(8) 巩固与改造各级党的工作，虽然党员基础上与领导成分上有相当改变，但还没有使他的全部工作转变，没有充分发展下层创造性与积极性，没有从支部工作的基础上，从领导群众组织与领导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去改变党的全部工作，使各级党部成为名符其实的指导机关。

(9) 党的组织的发展，还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没有注意经常个别的征收党员，征收党员运动中还有许多缺点，没有讨论具体办法，没有注意吸收工会与群众组织的会员，没有把征收工作在成分上数量上所做到结果看成一种战斗任务，中心支部与模范支部工作的建立还很少成绩，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的薄弱，依然是湘鄂西党严重的弱点。

(10) 巡视制度还没有正确的普遍的建立起来，或者党部的委员离开党部变成巡视员而妨害集体指导与经常工作，或者是些官僚式的走马观花的巡视员，不能给下级党部以任何帮助，或只执行了交通的任务，事实上巡视员造成了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中间组织，使下级党部与上级党部更加隔离起来。

(11) 党在红军中没有足够的党员作红军中的骨干，很少政治工作，特别是在新回的三军中，没有充分注意苏维埃建设工作，在苏维埃中很久没有最主要的部门—劳工委，或者设一些毫无工作的空机关，下级苏维埃更多是不做事的“打路条”的机关，工会工作仍不健全，贫农团的组织没有普遍的健全的建立，有些贫农团代替了苏维埃的工作，或者让中农甚至富农都放在贫农团里面，有些忽视青年妇女工作，对团的取消观念仍未肃清，反帝大同盟与互济会的组织完全没有去建立起来，对白色中心城市与苏区周围主要农村中工作不了解，工作很少成绩，白区中的工作，没有计划的建立，对农民的组织没有成绩，甚至与他们失却联系，不正确的运用所谓“反水群众”的名词来掩饰自己对白区工作的消极，加深了“赤白区域群众”对立的现象。

(12) 在所谓更进一步的反富农斗争的口号下，有些地方不正确的采取消灭富农的手段，实际上妨害了与中农巩固的联盟，同时在这一斗争中还有进行有系统的肃反工作，政治保卫×形同虚设，没有建立他的独立工作系统，在苏区内还隐藏不少的反革命派别——国民党、改组派、北极会、硬肚会等，还未开始有系统的大的破坏[获]，他们正在积极地进行反革命的工作。

(13) 党的组织的实际工作中没有很好的有系统的去研究工农革命的经验，把一年运动、作战、游击及行动等作为分析的对象，迅速的了解研究总结来给各级党部以指示。

(二) 中央认为这些缺点和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需要严格的自我批评来揭发，中央赞许同志们用真正自我批评的精神来了解与指责这些错误与缺点，并采取有力的方法来纠正，但同时要估计到湘鄂西党困难的环境与工作条件，如党在立三路线创伤以后，中夏同志领导三军脱离苏区的逃跑，敌人严重的“围剿”，空前的水灾、粮食的恐慌与党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省委及各级党部的不健全，干部的恐慌和不会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以及党内机会

主义者派别分子与反革命的活动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困难，因此，我们决不能>够以这些缺点与错误来掩盖转变中的成绩与进步，又坚决的反对那些右倾失败情绪，不估计到具体环境与工作条件的困难，根本看不到转变中的成绩与进步，找不到工作的前途，将一切罪恶解释为个人的与领导的不好，甚至怀疑中央分局所执行的国际路线的正确，进行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斗争。

估计到这种情形，湘鄂西党目前的中心组织任务是要使整个党的组织系统适合于向前开展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健全的建立党的集体领导，巩固和教育各级党部的工作，团结巩固扩大党的积极干部，保证对政府、红军、群众组织的真正领导（不是包办与代替他们的工作）整个组织动员去进行改造与扩大红军，保证红军给养，分配土地、反帝、修堤、春耕、肃反等运动和巩固洪湖苏区发展苏区，创造襄河北岸新根据地的斗争，有[在]两条战线上反对目前主要危险——右倾或“左”的机会主义，反对悲观主义失败情绪，反对空谈“路线”和个人的无原则的争论，而放弃或妨碍目前迫切的任务的执行，客观上帮助敌人的行为，反对机会主义者派别分子利用目前的困难和党的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进行反党的任何细小的企图，最高限度的发展自我批评，使自我批评成为为中央正确路线而斗争的工具，这样来考验、兴奋、推动党的组织的各种部门的工作。

下面的这些组织任务，应放在湘鄂西党全部工作最主要的地位，迫切的需要你们采取有力的方法去实现他。

（1）为着适合于目前革命战争向前开展的需要，万分迫切的要求党的整个组织建立在布尔什维克的集体指导，首先要求中央分局有这样的集体指导，中央分局的组织，是中央在四中全会后加强对苏区的领导的一种方式，现在许多光荣的胜利已经证明这种领导方式的伟大成功，同样在湘鄂西亦已表现他显著的成绩，中央分局是中央的代表机关，他代表中央直接指导苏区工作，他在苏区有最高权力，他应当有经常集体的会议与工作，也应一切决定经过当地最高党部——省委去执行他的指导当地党部的工作，不是代替当地党部的工作，在不妨碍分局集体指导的条件下，中央的个别委员可以兼任当地党、政府、红军中的工作，中央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只有中央分局才能保证湘鄂西党真正去执行国际中央路线，他无条件是应当而且必须存在，怀疑中央分局的路线与组织的正确性甚至提议取消中央分局是极端严重的错误，省委与各级党部应当与这种错误作严格的斗争，应当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过去中央分局的某些个别错误与缺点，并在他的正确领导下，亲密的互相帮助的进行工作。

（2）省委的组织必须健全起来，应当坚决的勇敢的提拔下级党部的能够执行正确的阶级工农干部到省委来，省委委员必须扩充，省委要有健全的常委能够经常的工作，要有科学的集体分工，建立各部各委的工作，尽量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参加，各部各委的工作，要有固定的经常的巡视员，省委常委不能随便离开省委工作去作巡视员，要改善党部的关系，教育下级党部的工作，要能迅速的反映群众的意识，能供给下级党部以正确的指示，并设法将这些指示切实执行，只有这样政治上组织上健全的省委，才能在中央分局正确领导之下、保证湘鄂西党的组织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最近代表大会所选举的省委委员名单履历即报告中央审查。

（3）为要适合领导工人、雇农、贫农、各种群众行动的任务，必须从支部工作的基础上来改造地方党部，不只是形式上个别领导部分的政策，而是

要从全面工作与工作方式去改造地方党部，省要能组织中心企业农村的支部，要使主要的支部能够独立活动，有自动性的进行工作，整个党应该把支部工作放在党的全部组织工作最重要的地位，使每个支部能够为党在企业中农村中的[起]主要柱石作用，运用各种群众组织的形式，工会、贫农团等团结广大群众于支部的周围，使他成为主要的组织上的推动机，省委应该给下级党部以具体指示，责成地方党部在一定时期内完成我们模范的中心支部，要把这一工作执行的程度与检阅地方党部工作成绩的反映，省委应根据具体情形去改编特委、县委的组织，加紧特委、县委的工作领导，运用中心县委指挥附近较弱的县委的方式来减少省委下面许多复杂的单位，应当建立南华安中心县委指导附近岳、临、石首、洞庭等处工作，洞庭直属支部交给南华安中心县委去领导，湘鄂边特委要派得力干部去改编，现在那里实际上没有真正共产党的领导，应城、云梦、孝感等处暂时可由一个较强的中心县委去领导，如必要时亦可成立鄂中特委，房县应当去建立健全县委。

区委的工作应尽量吸收支部中在业的积极分子参加，较大的区域可以运用较强的中心支部去帮助与领导附近较弱的支部的工作，必要时可以调动支部中的有力的分子充当巡<视>员，经常举行各种会议（积极分子会议、支书联席会议、组织会议、宣传会议）来教育支部工作，一般的不需要那种官僚式的巡视员。

（4）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必须肃清旧的官僚主义的残余，彻底的采用新的方法，一切指示与决议要具体明确实际化，不仅提出原则，而且尽可能规定具体办法，并采取有力的办法保证他的实行，坚决的反对过去那一纸空文了事的通告式公文式的领导，运用科学的集体分工，实行个别负责制，消灭工作的疏忽、敷衍、不认真的现象，要有计划的有日程<的>去进行工作，反对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为着加紧工作的速率，要广泛的切实的提倡在各种运动各种部门中采用各种竞赛，突击队、轻骑队各种组织动员的方法，来推动工作有经常的定期的检阅工作，检阅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指示的执行程度和党的各部门的、群众组织中的党团的工作，在检阅工作<时>要特别发扬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发动下层的建议，使检查工作成为推动工作之一方法。（5）党的各级组织与政府、群众组织等应当明确的划分，建立党与群众组织的正确关系，消灭党和群众组织混淆不分，或者党包办或代替政府与群众组织的现象，党的任务是组织与健全群众团体中的党团，党团的领袖一定要慎重的选举有威信的能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的同志去充当，肃清一切官僚主义者以及阶级异己分子，党经过党团的领导去帮助与指导群众组织的工作；这是经常的惯例，你们应该即刻帮助群众组织建立工作，充实他的工作内容，保障群众组织<的>独立性，不准许轻易调他的干部做旁的工作，同时要预防党团不执行党的指示的任何企图。

（6）你们对干部的问题的忽视，再也不能容许，首先要坚决反对专门依赖中央，害怕提拔新干部，不依靠自己力量采取积极办法解决干部问题的错误观念，你们必须立即根据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讨论更具体的办法，指示各级党部去进行，应该在工作中斗争中团结所有积极干部在中央分局及各级党部的周围，不让一个好的积极干部被机会主义者派别分子利用来作反党的斗争，应该大胆的提拔下级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雇农到领导机关来，提拔干部首先要根据政治上组织上的坚定，反对单纯的以有办法和“才干”为标准，反对个人朋友关系的提拔，加紧教育工作，改善党内生活，特

别是对支部的教育，使支部成为党的干部的泉源，认清只有支部才是干部正确的来源，将“面向上级”改变的“面向下级”的口号，实现到实际中去，应用各种训练教育的方法，如训练班、讨论会、列宁读书班、个别教育等去加强训练干部，中央责成你们在二月内由中央分局直接举办比较长时（三月至半年）比较大规模的（四十至六十个学生）的学校，责成（省）委及地方党部逐渐举办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如工会工作的、农动的、军事的、苏维埃的、白军士兵运动的、妇女的、党务政治的……等短期训练班，在半年后，不但要达到“干部自给”，而且要能准备一部分干部供给中央调到其他区域去发展工作，你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去达到这个目的。

（7）巡视制度从中央分局到区委应该普遍的建立起来，要选择政治上组织上强健的同志做专门的巡视员，党的各级常委不要兼做巡视员（当然不是设[说]个别的委员，在不妨碍委员会本身工作的条件下不能当巡视员），巡视员不是“交通”、不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中间组织”，他的工作不是官僚式的走马看花了事，他的任务是加强上级党对下级党的灵活的指示，正确的传达党的一切决议和指示，保证他的切实执行，帮助和检阅下级党部与群众组织政府等工作，及时纠正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他不只是听报告见[看]文件，而是要亲自到下级党部与支部中去，要广泛发挥群众积极性与创造性，巡视过程中及巡视后应向派出他的党部作详细的报告，提出具体意见，党的委员会必须迅速的讨论他的报告，给下级以指示，只有这样的巡视制度，才有意义，你们过去对这方面的错误必须立即纠正，你们应该立即根据过去中央巡视条例与具体环境及经验将巡视员的职权任务、工作方法与方式重新更具体的规定出来，并制定各种检查工作大纲（如地方党部工作检查大纲、支部工作检查大纲）作巡视员检查工作的根据。

（8）湘鄂西党的组织的薄弱依然成为严重的现象，党应当大开其门把征收党员的运动做到最高限度，当然不是要让[把]一切志愿者都吸收进来，应该保持无产阶级斗争的特性，注意党员质量上的改造，特别要防止富农及一切反革命的派别分子混入党的队伍来，要利用每一群众的斗争行动、纪念运动等大规模的征收党员，吸收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新的革命分子入党，造成工人、雇农、贫农的先进分子成为新党员的潮流，加紧个别征收党员的工作，把征收工作当作目前经常的任务之一，怎样做征收工作和什么是我们的对象？怎样与新的革命分子发生联系，怎样对他们作宣传鼓动工作（散宣传品、党报、召集会议、个别谈话等方法），什么是征收的标准与条件，怎样举行入党式……必须规定具体的指示，在征收工作中间要注意吸收青年团团支、工会会员等去发动群众，要把征收党员在成分上数量上所得到的结果，当成一种战斗任务，按时的定期去检阅下级党部执行的程度，把征收新党员建立新支部，巩固已有的组织的成绩，作为地方党部工作成绩的标准，中央责成你们在“五一”时举行征收工作的检阅，将检阅经过报告中央。

（9）应该在党内进行最严重的教育工作，加紧去建设和改善党的工作生活和支部生活，有系统的建立各种小组学习会议，读报组、识字班等，广泛的进行教育工作，特别要加紧对新党员的教育，吸收他们工作，实际的规定一个×党员，应该帮助几个不识字的党员会识字，党的实际工作在刊物上要重大的注意去研究工农革命斗争的经验，每一战斗，游击[行]示威及行动等，应该成立[为]党的组织和每一个同志分析的对象，讨论出具体的教训，来教育全党，要使每个党员都懂得现实党的政治路线和行动纲领，以及许多最基

本的常识，要特别注意去解释党的纪律以及党员应作群众的模范，消灭党员“特殊地位”，官僚腐化等不容许现象。

(10) 党的及各种群众组织的刊物，必须尽量地扩充改善他的内容，加强党报的领导，使党报成为党的组织者的作用，党报的文章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具体、明确、通俗，给下级党部以实际的经验和建设，党报上要揭发一切不正确倾向与工作中的缺点，要使党报成为推动兴奋、检阅党的工作的一种方式，要努力去建立各级的党报，工厂农村的小报、墙报，发起党报的通讯员，加紧训练通讯员，组织广大的发行机关，使党报不仅是每个党员都能经常的看到，而且要散布到群众中去，你们过去几百份的党报在湘鄂西这样广大的区域其影响不要说在广大的群众中，就是在一万二千的[多]党员二万多的团员与二万多的工会会员中，亦是微乎其微了，这样情形，是一天也不许继续下去了。

(11) 你们现在红军中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足够的党员作骨干，缺乏政治工作，党员在红军中的数量非常少，党员在红军中不能起领导作用，你们现在要用最大的力量消灭过去弱点，使现在的红军改变了[为]真正的工农红军的铁军，目前应该首先改编新回来的三军，改变红军成分，加强军事政治的领导，在里面进行最深刻的政治教育工作，解释过去领导者[的]错误，运用联欢会等去兴奋他们，消灭失败灰心的情绪，健全红军中党的组织，使每个红军成为群众的模范，改善与居民的关系，与居民联欢，帮助分配土地、春耕、修堤等运动，使红军的行动积极化。应该努力去扩大红军，动员党团、工会子贫农团，去做扩大红军的工作，规定具体的办法，在一定时间内，扩展红军到一定的数量，在红军中应当执行严格的集中军事纪律，<对>任何执行上级指示的怠×与反抗，都要无情的予以制裁，消灭过去在红军中所发现的弱点，绝对不准许这种红军××等的行动多一天的存在。

(12) 加紧注意苏维埃的建设和苏维埃的改选，使苏维埃成为真正的群众政权机关，首先要在加紧反富农、肃反的斗争中去改造下级苏维埃，改造苏维埃的成分，充实他的工作内容，不许把苏维埃变成为简单的“打路条的”的机关，要组织健全的贫农团体，明确的解释贫农团的作用与意义，贫农团不让富农参加，不是代替苏维埃的工作，贫农团应该团结广大的中农于自己的周围来作为苏维埃的基础，在苏维埃中起领导作用，党应当经过党团的领导去帮助苏维埃的工作，规定苏维埃组织及部门工作及工作方法，不让苏维埃存在一个空架不做事的官僚机关，不让苏维埃中存在一个官僚主义的阶级异己的<反>革命分子，省苏维埃的工作，应当马上建立起来，各部门都要有经常的工作，吸收下层积极分子来参加，尽可能不要一个<人>兼几个人的工作，消灭只参加会议不参加工作的现象，现在的经济与财政两委员会应当合并，社会保险不要单纯<独>设部门，可以归并在劳工委员会之下设一社会保险局，行政委员会改为内务委员会，这些组织及工作，你们应该学习鄂豫皖苏区的经验，使每一部门都有明确具体的工作，建立苏维埃自上而下的独立组织系统与工作系统，不要与党混淆起来。

(13) 发展群众组织、健全群众组织的工作，首先要根据中央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的决议建立阶级的赤色工会的工作，加紧实行苏维埃区域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赤色工会应该领导工人斗争去求得劳动法的实现与生活的改良，加紧巩固扩大苏维埃与红军的工作，反对轻视工会工作，不准苏维埃政府要工会负责人服役，不准轻易调动工会的领导干部，保障工会组织的独立

性，要尽量发展贫雇农团的组织，使贫雇农团成为苏维埃的核心。在加紧反帝运动中，一刻也不能容[迟]缓的去建立反帝同盟分盟“苏联之友社”等反帝组织，反对认为苏维埃区域反帝运动是次要任务的观念，要在加强反白色恐怖与救济革命战士，援助被难家属的工作中去建立互济会的组织，同样要加紧对青年团的领导，消灭同志们对团的工作的取消观念，加紧去发展青年妇女工作，组织劳动妇女、青工等代表会议，举办妇女、青工的训练班。

(14) 加紧建立白区城市与农村组织，首先要尽一切努力去建立武汉、宜沙、新堤、仙桃、岳口及铁路上的组织，加强宜昌道委的领导，党同时要动员团、工会去建立这些地方工作，同时要加紧去建立白军中的组织。在川军中，中央与四川省委已经派了干部打进去，宜昌道委应设有健全的兵委来加强这个工作，其他敌人主要部队中你们必须设法利用个别关系，组织人民当兵，动员群众组织的会员打进去，运用前线上与敌军兵士的联欢，优待与鼓动俘虏，使他们回去散布我们的影响，在苏区周围边境的工作亦须加紧去建立，放弃那些不正确的“反水群众”之类的呼声，实际上去消灭“赤白对立”的现象。

(15) 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去进行肃反工作，首先要健全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和工工作，要选举最有阶级觉悟、最坚定勇敢、对党绝对忠实的同志去领导这个工作，要多多的吸收下层积极分子来参加，使政治保卫局成为一个网一样来肃清反革命分子，中央区，鄂豫皖，闽西等苏区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敌人是如何的巧妙的企图从苏区内部来破坏与消灭我们，你们苏区中同隐藏着许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AB团、北极会、硬社会等样之类反革命的组织，你们应当唤起苏区群众的警戒心，要发动群众先发制人的迅速消灭这些组织，要很好利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来进行这个工作。

(16) 党的及各种组织的大会与代表大的举行，必须有很充分的准备工作，规定大会之前应该做些什么具体工作，如改造党×苏维埃……准备详细的报告和对大会的提议，代表的选举及其任务，使每一大会得到一定的收获。最近你们在苏大会、党扩大会开过不久，没有充分的准备，便又急促的召集代表大会是不好的，现在大会已经举行，你们应该很好的利用大会后热烈×环境与群众积极性，规定大会后的具体工作，规定每个代表会后的任务，并须将大会及会后的情况报告中央，要经常的有系统去做调查统计的工作，把他看成为组织任务之一。

(17) 要执行上述任务，便要加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反××的“左”的机会主义的倾向，目前右倾依然成为党最主要的危险，这是（在）湘鄂西党内的具体表现，是不去执行目前迫切的紧急任务，不积极的去克服目前的困难，来巩固的发展苏区，认为向外发展与创造新根据地是逃跑主义，看不到全国革命危机或[的]成熟，革命运动的高潮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伟大前途，在困难面前表现张惶失措、失败灰心的情绪，怀疑中央分局路线的正确，提议取消中央分局与进行反中央分局正确领导的斗争。很显然的在这一斗争中包括各种不同的成分，首先是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积极进行破坏党与革命工作，以响应敌人的“围战[剿]”，再是机会主义派别、立三主义坚决执行者、两面派等，企图利用目前的困难，进行反党斗争，来证明自己机会主义的正确，他们首先要反对中央分局，是[因]为中央分局的存在，是他们一切企图的最大障碍，中央分局正确路线的执行将使这些分子失却活动的余地，另一部分是党内不坚定的分子在目前困难中的失败情绪，找不到

政治出路，于是便以中央分局的领导不好来求得解释，最后是党内少数积极干部因党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不会团结干部，使他们受到不良分子的影响，为不良分子利用来作反党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在党内斗争中团结党的积极干部，严密党的组织，加紧肃反工作，肃清党和各种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在群众中揭发他们的面目，加紧反对党内机会主义，特别是注意那些口头上“同意”党的路线而实际进行反党工作的<两>面派，反革命分子常常利用党内机会主义做媒介，利用困难的条件与工作中的缺点，来作进行破坏党与革命的工作，要加紧教育说服那些好的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来揭发工作中的弱点，使反革命的反党分子孤立起来，给以强有力的打击，动员全党来讨论与执行目前具体任务，不要去空谈路线与无原则的个人争论，绝对不许放弃工作来讨论中央分局路线正确与否的问题，要的[把]注意与力量放在工作上，不要放在个人的无原则的实际内容的争论上，因为这样做，正是反革命与机会主义企图，这只对于国民党有利益，对于革命是极大的罪恶。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布尔什维克的团结一致的去进行工作，这是你们胜利的先决条件。

中央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组织任务决议案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湘鄂西的党，一年以来，在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中间所获得的成绩有：1、党的成分有初步的改善，工人成分由百分之十二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三，富农成分的百分之三十，减少到了百分之九（这百分之九最大的部分是经过长期斗争和脱离富农经济的）。2、吸引了许多最积极的工人、贫农干部参加各级指导机关，工人干部占百分之三十五，贫农干部占百分之三十。3、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反立三路线后，党内开始进行着，打破了过去“和平”和“互相掩饰”的现象。4、党员的政治水平线，一般的比较增高，各级党部已开始注意到教育训练工作。5、苏区内普遍组织了工会、贫农团、互济会等革命组织，苏维埃逐渐建立起单独的工作。6、白色区域内，工会、农民委员会，有了局部的发展。7、在苏区内领导平分土地，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更加深入和扩大了。8、红军部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各地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组织，也相当的增加。然而这些进步还是异常迟缓与不够，许多的还远远的落在这日益加速的群众的革命斗争之后。现时最严重的现象是：1、党的下层基础薄弱，领导机关不健全，因此，就不能表现出党的充分力量，往往成为群众的尾巴，党的一切决议也就不能很迅速的在实际工作中实现出来。2、水灾所及的地方，组织特别混乱，工作多呈停顿的态度。3、白区党的组织，一般的非常散漫，还没有形成真正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尤其是成分的坏。4、党内教育训练工作的缺乏，提拔干部的不够，不能适应目前革命发展的需要。5、对青年团和妇女工作的忽视和取消倾向，党内还很严重。6、苏维埃以及各种群众组织，多是党的包办，或则是空挂招牌，或则是忙干事务的应付。7、组织工作多留在苏区以内，单纯凭借军事力量，借向外推进的口号来掩盖对白区工作的消极，没有担负起对非苏区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责任。8、在反帝运动和灾民斗争中，党还没有组织上尽到他领导的作用。形成以上这些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是：1、没有在党内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和党的政治教育。2、没有能广大的发展革命竞赛，加紧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动员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检查工作执行程度，加紧清洗党内苏维埃内的腐化分子。3、党的下层领导薄弱，上层也没有形成集体的领导，家长制度命令主义非常浓厚。这三个是主要的原因。

革命运动更加向前开展的新的形势下面，更加重了党要整饬自己的队伍，组织广大群众来进行革命与反革命决定胜负战斗的任务，因此，党的全部组织工作，必须迅速执行坚决的转变，建立正确的组织工作方式，推动组织发展的速度，扩大组织工作的范围，以充实加强党的主观力量。为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四次大会对目前湘鄂西党的组织工作，提出以下的斗争任务：

（一）整顿党的队伍，是目前组织工作上的基本任务之一，党必须大量的把群众中最积极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把党员中最积极的分子吸收到各级指导机关中来，特别要在成分上保证本年内工人党员能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五，工人干部能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党的组织要特别严密起来，凡党员脱离支部，不愿参加党的工作的，应毫不留恋的洗刷出去，绝对消灭挂名党员的现象，目前阶级斗争形势的尖锐，党要防止改组派、托陈取消派等一切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来破坏革命。在苏区内要严格拒绝富农、小商人及一切异己

分子入党，同时要在工作中和斗争中一点不放松的驱逐一切消极腐化怠工的分子以及非阶级分子出党外。党要注意建立支部的工作，团结积极分子在支部的周围，吸引他们参加各种实际工作，举行工作的竞赛，以提高党员群众的工作积极性，要做到党的一切决议能经过支部的作用完全实现出来。苏区内最低级的行政区域（乡）的范围再缩小，以便支部能灵活的动作。各级指导机关，一定要多吸收当地最积极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参加。各县县委要注意加强区委的工作，使区委能把党的一切决议更具体的帮助和推动支部去执行。省委和县委要建立巡视制度，经常派出巡视员到下面去推动和检查工作，并消灭巡视员中一切不实际的坏的现象，区巡视员应取消，而吸引各支部的积极分子参加区委工作，并且经常召集支书的联席会议，以便区委能实际去领导支部工作。

（二）目前党内的工作方式，机关主义很厉害，文字上会议上的决定，不切实际，也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完全实现出来。工作做得非常迟缓，应该立刻发起革命竞赛，加紧工作的速度，检阅工作的执行程度，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与一切敷衍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肃清那些怠工腐化的分子，提拔新的积极分子。为得要执行这个任务，必须提高党内民主化，和大胆的提拔干部，只有动员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扫除一切阻碍群众前进的障碍物，这是目前的紧急任务。

（三）加强党内教育与培养干部，是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主要任务之一。每个支部除了注意个别教育并加紧各种学习性质的小组会议外，在苏区内要利用公开的环境，建立墙报工作，发起读报小组等工作，党的一切决议均应配合当地实际情形发动热烈的讨论，并须把每一工作每一斗争的经验充分的研究出来。在加强教育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到积极分子的训练，训练积极分子主要办法，在于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各级委员会的工作和各种会议，培养成为党的骨干。省委要经常开办较完善的党校培养县委和区委工作人员，各县县委亦应开办短期训练班，培养支部工作人员。区委和支部必要时可开办流动训练班。青年团、工会、苏维埃各种群众组织亦应开办各种训练班，并要培养专门化的工作人员，各县的干部，最低限度要做到能够自给，并要准备一批人随时派到别地去发动工作。

（四）在党内、群众组织内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发展自我批评，提高纪律，是巩固国际和中央路线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主要武器。在目前党内立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反党的斗争情况之下，党的工作还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之下，应站在两条战线斗争的立场上，以自上而下，特别是

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的锐利锋芒来打击右倾、“左倾”机会主义以及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以保障党的一切决议顺利的执行。但要反对借口自我批评来进行反党的企图，相反的，企图掩护自己的错误而压抑自我批评，亦须加以严重的打击。同时在国内战争条件之下提高纪律，更有他特殊的意义，每个党员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的执行以及各方面的工作，一定要绝对负责，要成为一般群众的模范，要反对放弃纪律和惩办主义两种极端，以求得铁的纪律的巩固。

（五）秘密工作，不但在白区重要，苏区也要严格执行。苏区内党的支部绝不应完全公开，反对认为苏区内用不着秘密工作的错误倾向，赤白毗连地以及政权不十分稳定的地带，要保持着由公开转入秘密，由秘密转入公开的弹性，以适应于任何环境都能保持党的战斗力量与群众的联系。失败区域

和白色区域内，党一定要从各方面运用秘密工作，但是必须指出在

失败区域和秘密状态之下的党的组织的存在与发展，不单是秘密的技术工作问题，主要的是依靠着党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和政治上坚定的积极分子，要善于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绝对反对借口怕“闹红”的躲避倾向，放弃一切争取群众的实际工作。

（六）为要使各个苏区打成一片，必须加强苏区周围白区的工作，苏区的党，应该担负起对白区的组织作用，以各种可能去建立四周的白区工作，造成苏区的外环。目前主要的是要以很大力量去发展和加强武汉近郊，襄河北岸，天、京、应、云、孝各县，以及嘉、临各县的工作，以与鄂豫皖、湘鄂赣两苏区在组织上取得联系，紧紧的包围武汉。同时，省委要与宜昌特委共同加强公、松滋、宜、荆、当、远各县的工作，要与鄂北特委共同加强钟祥、京山的工作，责成宜昌与湘鄂边两特委共同加强长阳的工作，责成鄂北与鄂西北两特委共同建立和发展宜、南、保各县的工作，责成江南县委加强滨湖各县工作，以便全省组织互相联系和配合起来。党要特别注意去建立和加强宜昌、沙市、武汉、岳州、新堤、仙桃各城中的工作，为要发展白区以及白军的工作，必须苏区的党大大的动员大批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去建立工作，坚决反对那些冒牌的党员不愿到白区去作工的表现。

现在非苏区党的工作不能开展的原因是因为领导者还保持着许多取消主义机会的分子，他所阻碍着路线的转变，占在机关里不去接近革命的群众，大会委托省委对于白区党的领导机关要进行坚决的改造。

（七）苏区内灾民占百分之七十，苏区周围各白区的灾民也有很大的数量，因此，灾民工作成为主要的群众工作之一。党要把苏区内的灾民组织起来，派得力干部领导到白区去，配合当地群众作没收豪绅地主粮食、财产及反富农的斗争，以至发动游击战争，发展新的苏区，要反对认为灾民群众中不能进行组织，主张分发逃荒的右倾观点，特别要号召失业工人来领导灾民斗争的工作。在白区内要发动群众分粮的斗争，以至武装夺取谷米，进行游击战争，来创立农民委员会的组织，准备苏维埃的基础。

（八）为要提高民族解放运动开展群众斗争的新阶段，应抓紧日本占领满洲，法军侵入云南的事实，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煽动，在苏区内建立反帝同盟的单独工作，严格打击认为苏区没有反帝工作的错误倾向；在白区内应利用各种公开的可能，创立群众的反帝组织，创立各种武装组织和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等反帝的情绪，联系到反国民党，使这一民族解放独立运动与苏维埃运动汇合起来。

（九）党对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看成是自己很重要的工作部分，省委应号召各级党部起来对青年团工作的注意，帮助团在工作上的转变，使团成为广大的青年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绝对纠正过去不过问以至取消的倾向，党应在团内吸收政治认识较高的团员兼党，今年内要发展到全党百分之十，以便党能经过这些兼党团员去加强对团的政治领导。

（十）群众工作，在苏区内要把苏维埃看成是组织群众的主要方式，现要坚决广泛进行改造苏维埃，特别是新苏区的苏维埃，纠正党包办苏维埃的错误，坚强工会组织和工人，特别是武汉、宜沙、铁路工会的建立，并巩固与发展贫农团。吸收广大群众参加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苏联之友社等各种组织，经过俱乐部的动员，对群众进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在这水灾后的特殊环境中，要特别注意基本群众的各种互相[助]组织（各种生产合作社、消费

合作社等），白区内目前主要的是发展工会、农民委员会、各种斗争委员会、反帝同盟、游击队等以及其他各种附属组织，去争取广大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党要派得力干部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并不要轻易调动各种群众组织的干部，党要加强对各群众团体中党团的领导，消灭党包办与不管群众工作的现象。

（十一）动员党团员，动员干部和群众参加红军及游击队须当作经常的工作，有计划的进行，特别征取广大的工人群众到红军中去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红军中的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要健全，党员要扩充，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影响，组织和煽动白军士兵兵暴的不容丝毫忽视，须使之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委托军委政治部订出精密的计划。

（十二）宣传工作，一直没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分局时代，完全是个游击式的宣传工作，水灾之后，宣传工作更取消了，省委扩大会议之后虽有相当的转变，但又走到了机关主义的工作方式，今后应该从组织上来克服这些错误，首先要反对对宣传工作的取消主义。

今后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1）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培养干部。（2）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及[反对]一切不正确倾向。（3）抓紧着党的中心政治任务联系到某一时期的中心工作，联系到群众生活的实际材料，做成广大的群众运动。（4）建立城市白区白军中的宣传工作，以及对苏区群众的文化教育运动。为百分之百的执行这些任务，必须健全支部生活，建立各种训练小组训练班，省委及地方党部加强宣传部的工作，建立与改善党报委员会的工作，建立党校的工作，宣传工作与鼓动工作密切的联系，宣传鼓动教育工作改变一切机关主义官僚方式转变到下层去，群众中去。

（十三）今后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1）[同]只站在性的立场上单纯做妇女解放运动的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在整个阶级斗争中，注意争取妇女特殊利益。（2）从斗争中扩大党员数量中的劳动妇（女）的数量与积极吸引妇女中的积极分子，加入各种指导机关，特别要加强各级妇委的工作。（3）普遍的经过农妇代表会议、组织员去加强妇女的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妇女的斗争。（4）加紧女工工作，要马上去进行宜昌、沙市、武汉各工厂的工作，领导他们参加罢工斗争。（5）动员妇女群众积极去做白军工作、城市工作、拥护工作及经常召集红军家属会议、修堤、春耕等工作。加紧放足、识字运动。（6）积极领导各群众团体及少共的妇女运动。

（十四）发行工作是使党的一切决议深入到群众中的主要部门，在一切文件的数量与分配上，应起政治的领导作用。过去党内一切文件半途而废，没有建立发行工作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各级党部应将发行工作迅速健全起来，发行部长应参加常委会议，使他了解一切工作的重心，根据政治任务去定发行工作计划，建立灵活的发行网。发行工作不但要在党内使每一张都能深入到下层，而且要对党外文件能保证每一分都能深入群众，不但在苏区内进行了发行工作，特别要在非苏区使党的文件能迅速的传达。在有组织的地方×用组织线索去进行发行工作，在没有组织的地方同样建立发行机关，顶好是利用学校、报馆、邮政、工厂及各种公共机关去进行发行工作，使党的文件能更进一步的散布到无组织的地方去，××××某些事变发生，不问有无组织的地方都应很快的得到党的政策和主张，使到党的政治××的领导作用，这是更能×××党的工作发展的伟大力量之一，今后发行工作×特别注意检查发行的发展很×的××××发行工作，以帮助党一切工作×

注释

原文约缺六个字以上。

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经济及财政问题决议案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湘鄂西苏区目前的土地经济问题

(一) 湘鄂西土地的平均分配，还没有完成，据不十分精密的统计，没有平均分配土地的，监利有百分之三十，江陵有百分之六十，汉阳有百分之五十，汉川有百分之四十，天门只分了三乡，两阳、潜江、江南不详。在这种情形之下，或者是还保存在原佃农手里，或者还保持以前富农路线时代的状况，富农的土地只是没收了出租的一部分，其他部分还没有动，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固然，水灾给了分配土地的障碍，但在水灾后还没有严重的提出这个问题，这依旧是富农路线的残余，应该动员广大群众立刻在苏区完完全全实行土地法。

(二) 在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后，特别是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以后，已经大大地摧毁了地主对于农民的封建剥削，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大大的解放，工人阶级亦在分得土地中得到了相当的利益，农民已经可以在分得土地的上增加生产，发展他们自己的经济，所以党和苏维埃此时的中心任务是在帮助贫农中农提高生产，来使他们感觉自己分得的土地是自己的土地，爱护自己的土地增加生产。只有这样才可巩固工农联盟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坚决的斗争。

(三) 在土地平分以后，资本主义的剥削，依然存在的富农经济，还有发展之可能，此时并不能消灭富农阶级，假若在目前以为可以消灭阶级，这是空想，党和苏维埃应采取抑止[制]富农的政策，帮助贫农、中农经济之发展。同时要广大的发展合作社运动，以与富农经济商业资本的剥削作斗争。

(四) 在水灾以后，苏区经济受了严重打击，水灾的结果：(1) 堤防溃毁；(2) 粮食无着，灾民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3) 耕牛、耕具、种子更加困难；(4) 政府财政和红军给养困难，因此目前除了修堤、春耕播种两大工作外，必须领导灾民群众联合非苏区群众到白区去作没收地主粮食的斗争，在这种斗争发展中去创造游击区域和新苏区。

(五) 湘鄂西苏区目前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还是全国经济的总崩溃的影响与反革命的经济封锁，要克服我们灾荒和国内战争的困难和顺利发展农民经济，大部分还要依靠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和苏区的扩大与巩固，只有去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才可保障土地革命的利益。

二、目前对于国民经济的五大任务

(一) 完全实行土地法

1. 在老苏区要动员群众自己动手完成平分土地，水没有退出和群众大部分外出的，可按已退出的土地和在家群众的数量，进行暂时的耕种的分配。

2. 在新苏区要立刻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富农土地亦在没收之列)，平均分配给贫农、中农(工人自愿亦分给之)，同时党须领导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在基本农民群众拥护之下即实行之。

3. 红色战士中没有分得土地的，即刻须分给土地，在新苏区内特别要注意留一部分红军公田。

4. 在已经平分一切土地的地方，土地不再分配，如有分配不正确的地方，则须经过工农监察委员会之调查，用补分的方法解决之。

5. 为了执行以上的任务，党须要经过工会、贫农团、苏维埃发动广大的

群众并与富农的阻挠破坏作坚决的斗争。

6. 党要在群众中作土地国有的广大宣传。

(二) 扩大生产

1. 修堤是目前第一等任务，党须动员广大群众，以自己的劳力伙食来做自愿的劳动来修堤，党苏机关人员和红军均须以礼拜六的方式参加修堤；在敌人区域之堤，要号召广大的群众要求修堤，反对反革命政府侵吞堤工经费，如在赤白交界之地，须召白军士兵来帮助群众修堤，反对官长压迫修堤之暴行。堤工经费要尽可能的保障，要发起堤工广大的种树运动，要坚决反对各县委中对修堤怠工之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要发起修堤的革命竞赛，同时须注意开河凿沟的水利工作，省委要有专门计划。

2. 春耕播种运动。现在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春耕播种，主要问题就是种子的准备（用没收、购买，苏维埃借贷等方法准备），并须组织犁牛站，农具制造厂，组织代耕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种，发展生产竞赛，苏维埃务须用种种方法不使有一块荒田。3. 提倡其他农业，如渔业、蛋、莲藕、芦林，这是湖中和湖边出产，应积极提倡奖励。又须发动植树、挖药、打油、畜牧、造船及其他手工业，由省苏土地经济两委员会专门计划之。

(三) 发展合作社首先须使合作社成为群众组织，成为党的经济财政执行到群众中的主要桥梁。在最近须召集合作社代表大会，党部要讨论合作社的工作经验，对于生产合作社（如渔业等）须设法扩大，苏维埃政府应该动员合作社注意最必需品的供给（如盐、糖、布、洋油、药等），在目前须发展购买粮食的合作社，以防止商人高抬米价。

(四) 领导灾民斗争 1. 广大群众没有饭吃，这是湘鄂西第一等严重问题，只有领导他们到非苏区去，同当地贫苦群众没收地主阶级的粮食，才是唯一的出路，党省委要有专门决议指示灾民斗争的方向和方式。2. 现时已经在外的灾民和还要出去的群众必须派得力干部去领导他们，在灾民中进行适当的组织和教育工作，与反革命在灾民中的影响作斗争。3. 党要尽力去纠正灾民在新苏区和苏区附近及白区这些地方没收贫农中农的粮食，因为这是帮助反革命的行为。4. 省县区苏维埃，要成立专门的灾民委员会进行这一工作。

(五) 实行阶级的财政政策 1. 实行土地税、营业税、关税，在租税政策中须执行累进税的原则，须将纳税责任压在资产阶级的身体上，免除贫农、工人及城市贫民的租税，免除合作社的关税、营业税，对于执行税务之工作人员，须严加检查，以防贪污。2. 在水灾区域，免除一属土地税。3. 财政须绝对统一，各县预算须经省府批准，各县要解交省府所规定之款。4. 节省开支，各种开支须经济化。5. 纸币须由省苏设法限期有代价的收回，在有充分基金准备才发行纸币。6. 目前用款，须用在修堤、购买种子和红军给养方面。7. 红军给养要尽量从夺取粮食和到白区没收解决，须规定条例。8. 为了供给军用品和国家机关之用品，苏维埃须设立小规模之企业（如印刷文具及军用企业等）。

三、对待富农与商人的政策湘鄂西苏区对商人政策已经执行了经济政策，在反富农斗争中，确有消灭富农的倾向，必须立即纠正。第一，实行抑制富农而不是消灭富农。苏维埃目前对富农的政策是采用下列的原则。1. 富农的土地没收，另给以坏的劳动分地，不准出租和变卖。2. 富农分得土地后，将地质改善后不没收。3. 富农的多的生产工具，耕牛没收，但以后如果增买了，不再没收，只可强迫其替贫农耕田。4. 富农私有之现金不应该没收，富农经营商业之资本及鸭子、鸳鸯等不没收。5. 新苏区富农之粮食可以没[收]

其囤积剩余的，老苏区应停止没收。6. 非有罪犯行为，不准逮捕和吊打富农。7. 苏维埃加重征取富农的累进土地税。第二，保障商人营业自由。1. 商人如果遵守苏维埃法律，苏维埃、红军保障商人营业自由。2. 征取营业税和关税。3. 商人须遵守劳动法。4. 如地主豪绅反革命分子之商店没收。5. 如对苏维埃怠工的没收。6. 在保障军事的胜利和反对商人投机高抬物价时，可临时的限制物价，但在临时条件消灭后就须停止。7. 剥削小商人的经纪，应绝对禁止。

中共湘鄂西省委会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职工运动决议案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职工运动中的国际路线的转变与转变中的错误 (一) 过去湘鄂西的党，因为在军事投机富农路线领导之下，不但没有开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反而取消工会，反对罢工，即有工会机关亦是异己分子把持。(二) 自中央分局成立后，在平分土地反富农斗争中，兴奋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起了领导作用，创立了二万余人的阶级工会，提拔了工人干部加入苏维埃，动员工人参加红军，这就是开展阶级斗争结果，反立三路线所获的成绩。(三) 可是在转变中仍有不少的错误和缺点，这表现在：1. 在苏区发展群众的经济斗争不够。2. 没有建立苏维埃的劳动委员会和完全实现劳动保护法。3. 没有加强工会中的共产主义教育和政治上的动员，以加强工人阶级在苏维埃与红军的领导。4. 对工会的取消观念还没有肃清，或者包办，或者不管，甚至在水灾时期中，有的无形解散了，重复了立三路线时代的错误。5. 工会的组织，还没有建立很好的下层基础，广大的发展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6. 对于青工、女工的工作还被忽视。7. 工人在反富农斗争中有破坏与中农联盟的事情。8. 非苏区的职工运动，还是犯着取消主义与关门主义的错误。9. 还没有在职工运动中，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的关门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二、苏区目前的职工运动 (四) 苏维埃运动的向前发展，必须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此，必须加紧职工运动，依照湘鄂西目前的情况，工人群众最大部分是因为水灾而失业了，所以现时工会工作最中心问题，便是领导农民向外斗争。各级工会必须派遣自己的积极分子，去领导广大的灾民到白区去，为了夺取地主资产阶级的粮食而斗争，发动白区工人罢工，游击战争，一直引导到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争。

(五) 在苏区在业的雇工、店员及手工业者，必须发动他们的经济斗争，提出斗争纲领，进行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运动，使不致因为灾荒而减低他们的生活，要建立劳工委员会监督劳动法的实行，同时要反对只用苏维埃命令进行工会工作，不去发动群众斗争的命令主义的错误。

(六) 动员工人群众修堤恢复生产，扩大春耕而斗争，对于雇农分得土地的，必须在苏维埃领导之下，以群众的力量建立犁牛站，购买种子和利用富农耕牛、耕具，帮他们耕田。

(七) 在新苏区动员工人群众领导广大农民执行土地法令，发动反富农的斗争。

(八) 动员工人群众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抗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号召他们积极参加红军，组织工人赤卫队，或参加工农赤卫军，参加苏维埃工作，参加肃反工作，到白区中去，到白军中去。雇农小组要在贫农团中起领导作用，经过贫农团去团结中农，以表现党在苏维埃中的阶级路线。

(九) 苏维埃军事企业，必须实现劳动保护法，同时发展革命竞赛，来达到军事上必须的程度。

(十) 为了执行以上的任务，必须加紧对于工会工作的注意，健全组织，尽可能的依照产业建立工会，加强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教育，发展工会中的民主化与自我批评，多吸收非党干部，建立工会的下层基础，特别要注意青工、女工与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中间工作，与对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作

无情的斗争。

（十一）对于失败的苏区，必须耐心的去建立秘密工会工作并争取公开的活动。

三、非苏区的职工运动

（十二）现时在国民党经济总崩溃的形势之下，经济危机日益深入，资本家加紧向工人进攻，关厂、失业、减少工资，武装监视，层出不穷的压迫剥削。因此，党在非苏区的工人运动成为党的工作的唯一中心，党必须把一切职工运动的工作，集中到企业中去，罢工斗争中去，工会工作中去，党必须组织罢工，抓紧对于自发罢工的领导，善于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组织阶级的统一战线，反对黄色工会，发展在黄色工会的革命反对派的工作，与改良主义的欺骗作坚决的斗争。

（十三）为了湘鄂西的苏区发展，省总党团必须以最大努力去建立武汉、宜昌、沙市、岳州、长沙、平汉路、武长路，应城盐矿，长阳煤矿，汉长、汉宜、汉常轮船工人，襄河船工中赤色职工运动，这是湘鄂西苏区工会之最巨大的任务，必须动员苏区的工人群众去建立这些白区之工人运动，要经常举行苏区与非苏区工人的代表联欢会，组织白区工人到苏区的参观团和红军之友社，发动白区工人广大的拥护红军苏维埃的运动。

（十四）在现时反帝运动日益开展的局势之下，必须去加紧组织反帝的罢工，首先是日本企业中之工人，党必须将工人经济斗争善于与反帝联系。

（十五）为了执行这个任务，省委必须用力去改正宜沙同志对于职工运动的种种错误，发展那里的赤色工会，要立刻训练一批干部，建立其他地方的工作（如武汉）。

（十六）应该努力在白区的农村中建立雇农工会，领导雇农斗争，以发展广大的农民运动。

（十七）应该完全执行中央十一月十五日最近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党必须认定加强白区职工运动，是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主要任务。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目录：一、中国革命发展的新形势与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1. 中国国民经济总崩溃与帝国主义者加紧进攻中国革命 2. 国民党的破产和工农革命运动发展的日益配合 3. 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是党的中心任务二、湘鄂西苏区的发展与怎样征服发展中的困难 4. 湘鄂西苏区在执行国际路线转变中得到巩固与扩大 5. 反革命的第四次“围剿”是目前的主要危险 6. 扩大生产，完成堤工，扩大灾民斗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来克服水灾的困难 7. 绝不抛弃原有根据地扩大红军与苏区是党的中心策略三、湘鄂西党目前的三大任务 8. 巩固和扩大红军是目前第一等任务，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一 9. 实行苏维埃法令、巩固苏维埃是主要任务之二 10. 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农兵的斗争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三四、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群众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11. 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联合中农，反对富农 12. 党须由机关中搬到群众中去 13. 改造党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党五、彻底执行国际的转变，与机会主义路线作无情的斗争 14. 国际路线的转变与转变中的错误 15. 右倾的逃跑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 16. 反国际路线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应受到严重的打击 17. 在中央指示基础之上巩固湘鄂西党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大会听了中央分局书记和省委代表报告之后，以一致的精神，成立下列之决议：

一、中国革命发展的新形势与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一) 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崩溃与帝国主义者加紧进攻中国革命

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比以前不同了。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与地主军阀的封建剥削，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工业的危机迅速地开展着，深远普遍的农业危机，更加上了空前的水灾。国民经济的浩劫，使无数千百万元的劳苦工农，受到骇人听闻的饥饿、寒冻、失业、病疾与死亡。因此，爆发了伟大的土地革命，红军苏维埃正得着惊人的空前胜利，因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入和中国革命的高涨，帝国主义者更在加紧向中国进攻，反苏联战争的准备与瓜分中国，直接的公开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策略之中心，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具体的极危险的步骤，法国的占领龙州，英国的进兵西康，这种形势更明显了。红军苏维埃的发展，将使帝国主义者更公开的用武力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工农苏维埃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武力作广大武装冲突的整个历史阶段，摆在我们前面了。

(二) 国民党的破产和工农革命运动发展的日益配合

在帝国主义者加紧压迫中国和经济总危机形势之下，苏维埃和红军得着伟大的胜利，城市和平的反帝运动转变到反对国民党的直接行动，企图建立民众政权来代替国民党的卖国政府，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在高涨着，国民党区域的广大农民斗争与灾民斗争日益开展，士兵的斗争同样发展着，国民党在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宣告破产了。他正在进行第四次“围剿”苏区作最后的挣扎（同时准备着新的军阀战争），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弱点依然存在着，但是已经大大的向好的方面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转变到有利于工农方面了。现在革命形势的特征，是反帝潮流与土地革命的汇合，是农民运动与城市反帝斗争日益开展与配合，工人运动的向前发展，将更推动这种发展的形势，而走到武装暴动的道路。而且各个苏维埃区域走向汇合的形

势，已经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主要和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造成了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优越条件，因而过去不占领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

（三）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是党的中心任务

扩大苏区，将零碎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争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放在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了。为着实现这个任务，党必须更进一步的巩固工农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与其临时的中央政府，用一切力量开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农士兵的革命斗争，加紧反帝斗争的领导与拥护苏联运动的扩大。与一切反革命派（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罗章龙派、新月派、人权派、社会与教育派）在群众中的影响作坚决的斗争，加紧反帝运动的领导，在目前有特殊的重大意义，无论苏区与非苏区，必须完成[全]执行国际最近关于反帝运动的指示，号召武装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引导反帝运动为推翻国民党的斗争，与拥护红军、苏维埃密切联系，这是领导反帝运动的基本原则。

二、湘鄂西苏区的发展与怎样征服发展中的困难

（四）湘鄂西苏区在执行国际路线转变中得到巩固与扩大

湘鄂西苏区经过五年长期斗争，有三百余万广大的工农群众基础，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发展的主要根据地之一。自一九三一年四月开始国际路线的转变，直到现在的十个月中，巩固了原有根据地，将汉沔苏区打成一片，扩大苏区至襄河北岸，击破了敌人第二次、三次的严围剿”，在击破敌人三次“围剿”中，创造了红军九师与地方武装，红三军执行了国际路线的转变，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兴奋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建立了工会、贫农团，改造了苏维埃。在水灾以后，红军扩大了苏区，占领潜江和天门东部，因为灾民斗争的开展，更扩大了沔阳、汉阳、汉川的苏区，这些事实指明湘鄂西苏区一般的说来是在巩固的基础之上向外发展。这些所获得的成绩，是土地革命的深入和红军英勇战斗的结果，是执行国际路线发动广大群众的结果。这就在事实上证明立三路线的破产，给了不相信群众力量放弃洪湖根据地的邓中夏同志的逃跑退却路线以致命的打奇。

（五）反革命第四次“围剿”是目前主要危险

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日益巩固与发展的苏维埃和红军正在进行新的进攻。敌人的政治的舆论的经济的军事的进攻苏区的准备与行动，正在加倍的积极的进行。敌人现在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湘赣边苏区，对我们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湘鄂西苏区的巩固与扩大特别是三军回到苏区必然要遭受着国民党帝国主义新的进攻。我江右赤区受着敌人的严重摧残，屠杀了我数千的工农劳苦群众和劫掠了我们的秋收。反革命之川军、湘军、鄂军正据长江、襄河造成包围我们的形势。川军以沙市监城为根据地，随时可向赤区进攻。沔阳之敌横梗我赤区中心。这种形势，很显然的川军与徐源泉部及三十四师正在企图配合向我赤区中心进攻。因此，敌人的“围剿”，正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党的目前第一等任务，就是要从政治上舆论上组织上军事上全体动员一切群众的力量，集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反革命“围剿”苏区的中心任务之下，向敌人开展胜利的进攻，消灭敌人的部队，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只有如此，方可实现巩固向前发展的任务。

反革命内部的冲突与指挥不一致，士兵的动摇，财政的困难，使得他相

当的减弱战斗力。红军的英勇作战，全国红军的相互配合和苏维埃与红军得着广大群众的拥护，国民党统治区域工农斗争、反帝斗争的发展，这些都是优越的条件。只要我们能动员群众，能向敌人作坚决的进攻，反革命的进攻苏区，敌人必然要遭残酷的失败。

（六）扩大生产，完成堤工，扩大灾民斗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才能克服水灾的困难

因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与挖堤，造成了全中国的水灾。湘鄂西苏区几乎全部都被大水淹没过，水灾的结果，使得我们的堤防溃毁，粮食恐慌，百分之七十的群众出外逃荒，增加了我们发展中的困难，反革命企图利用我们的灾荒来扑灭湘鄂西的苏维埃运动。党内亦在灾荒困难之下，发生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机会主义者的动摇，正帮助反革命的希望，然而这半年以来（从八月到今年一月）在加紧反富农斗争中，在加紧向白区地主、富农斗争中，在红军的胜利中，在没收工作中，在节省财政、统一财政的政策中，在发展广大的群众积极性与创造性去从事修堤和恢复生产中，党不但解决了红军的给养，而且修复了一部分堤防和恢复大部分的生产，证明了省委在中央分局领导之下所成立关于水灾问题决议、关于九师行动决议一般的正确（自然有许多个别的错误），证明着党能够以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征服许多困难和动摇。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地方水未退出，有些水已退出的地方还未下种，堤工还未完成，堤工经费、红军给养和广大群众的冬荒春荒，还是我们主要的困难，因此，灾荒的严重性并没有消除，在春荒中还要厉害起来，只有争取军事上的胜利与苏区的扩大，加紧没收工作和积极的领导灾民向外斗争，加倍努力的完成修堤和发展内部的生产及渔业与其他副业，加紧组织在苏区的群众，肃清苏区内部敌人和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才能克服水灾所给予的困难，使苏区更加巩固。

（七）绝不抛弃原有根据地的扩大红军与苏区是党的中心策略

无论苏区有任何困难，党已经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巩固与发展的胜利，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总必须反对抛弃洪湖根据地的取消观念。湘鄂西苏区的党及其周围白区的党，必须为了巩固湘鄂西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必须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肃清苏区内部敌人；时时刻刻来准备消灭苏区的白点，这是我们主要的任务，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工农群众已经得到的胜利，和依靠这个根据地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这与庸俗的保守主义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在湘鄂西目前状况之下，必须向外发展，才能巩固苏区原有的根据地，必须坚决的打击那些把向外发展看成为逃跑的错误的倾向，打击困守洪湖的保守主义，现在苏区水灾的困难，敌人的“围剿”，只有动员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向反革命作坚决的进攻，争取继续不断的新的胜利，才能征服一切的困难，才能使苏区真正得到巩固。湘鄂西苏区是中央区、鄂豫皖苏区中间的主要的一环，是进攻武汉、长岳、宜沙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是五鹤峰、房均、襄枣宜苏区之中心，是农民运动与城市工人运动之主要枢纽，因此湘鄂西苏区发展的方向：

1. 必须向着汉水流域发展，首先与鄂豫皖及鄂北苏区打成一片，以汇合成为长江北岸苏维埃运动的中心；

2. 与湘鄂赣打成一片，以造成包围武汉、长岳的形势；

3. 恢复江右政权是实行此任务之主要部分，绝不能因为向北发展而减弱恢复江右政权的迫切任务；

4.发展荆当远、松枝宜、归兴巴、公安、石藕这些区域之农民战争，“以包围宜沙，以与五鹤峰及房均苏区联成一片；

5.加紧武汉、长岳、宜沙之工人运动及武长路、京汉路、长江、襄河之交通工人中的工作；应城、长阳矿工中之工作，发展这些区域之士兵运动，以与红军胜利相配合。

在执行以上五个任务时，必须时时刻刻去为了消灭苏区内部白点而斗争，以与我们的向外发展相适应。

为了执行这个巩固和发展的任务，首先须反对军事投机的观点，靠红军打天下的观念，以及有钱有粮有枪的胡说，必须彻底的执行国际路线，更进一步的执行国际所指出的三大任务。

三、目前湘鄂西党的三大任务

（八）巩固和扩大红军是目前第一等任务

巩固红军第三军，对于湘鄂西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有决定胜负的主要作用，首先须指出巩固红军决不单是军委、军部的任务，而是湘鄂西苏区的党和周围白区的党以及工会、贫农团、青年团、苏维埃、女工农妇的共同责任，巩固和扩大红三军，必须进行下列的工作：

1.扩大红军

在湘鄂西巨大的任务之下，红三军必须扩大，才够军事的分配，要在击破敌人第四次“围剿”中，红三军及独立团、警卫营等要扩充一倍，要坚决反对缩小红军，将红军化为地方武装，化为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提议。

2.参加红军优待红军

广大的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特别是加强红军中的工人成分，这不是发通告规定人数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众运动，一个经常的斗争的任务。首先须以保障土地革命的利益，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抗反革命进攻苏区的必要，来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红军，号召群众参加红军来夺取反动武装，来扩大灾民斗争，来保护修堤和恢复生产，来改造红军中的成分。同时只有动员群众加强拥护红军的工作，如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同红军通讯、洗衣、慰劳等来实行种种优待条例，改善医院的工作，解决残废战士的生活，方可使参加红军的更加踊跃。拿各处红军胜利的消息去鼓动群众参加红军，只有继续不断的以政治上动员群众（特别号召青年工农群众），方可扩大红军的补充，要坚决的打击党团员不去参加红军的观念及强迫群众参加红军的错误，要坚决反对那些轻视优待红军家属工作的种种观念和行。要办补充团及少年模范团来训练参加红军之群众。

3.从政治上健强红军

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以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必须把政治工作的重心放在巩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上面，放在红军的政治坚决和提高战斗情绪上面，而不是把重心放在列宁室的识字运动。同时反对以为政治工作只是教育战士而不去教育红军的干部，反对把红军的改造任务看成为和平的改造。现时红军的政治工作，首先，必须传达党中央和大会关于目前任务的一切决议，动员红军积极化〔起〕来反抗敌人的“围剿”，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在执行党的任务中，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彻底的揭发中夏时代红三军的一切错误，而且实际的改正过来。必须反对把一切军事的进攻都看成为立三路线的冒险攻坚；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拿九师不顾军委决定，而任意离开苏区的冒险行动的错误的教训，去教育红军中的同志；必须在反对保守等待，犹豫

动摇及冒险行动的军事错误中间，确定正确的有精密军事计划的进攻路线，使红军行动更加积极化。要经常不断的提拔工人干部和反机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参加红军的领导工作，利用我们一切的胜利去鼓动战士发展群众与红军亲密的关系，加强一切拥红工作，分配没有分得土地的战士以土地，提高部队中的反帝情绪。这是提高战士们情绪的主要工作。

加紧红军的肃反工作，清洗红军中的异己分子，应该马上执行，要坚决反对破坏红军与群众关系的行为（如私自没收，打骂苏维埃负责人），要肃清一切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方式和军阀军队中的许多恶习惯（如打人、罚跪），要纠正极端民主化的农民意识。在进行这些主要工作，自然丝毫不能忽视政治教育的工作，特别要加强从国民党军队中来的士兵中的工作，为了要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必须征调一批干部到红军中去。

4. 巩固红军领导和干部

建立军事的强固的领导，必须丝毫不容情的纠正民主化的习惯，要建立参谋部的工作，要有军事上确定的方向和精密的计划，扩张彭杨军事学校以训练干部。

5. 保证红军给养

要尽可能的保证红军生活的改善，要使各级地方党部知道，集中财力，保证红军给养，是我们的迫切任务，在现时水灾必须估计到由于红军物质的困难而引起某些动摇，必须进行广大的宣传鼓动，必须使红军参加灾民斗争的领导，首先须反对地方党部，苏维埃机关的腐化分子，生活比较红军优裕；使红色战士感觉不满。红军给养解决的主要方法，必须由红军自己在继续不断的胜利中注意解决大部分。

6. 扩大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更加积极化

必须建立红军补充军、工农赤卫队、守备队、少先队的地方武装，建立广泛的群众武装组织。反对现时只把地方武装中心放在游击队工作方面的错误，同时游击队的行动要更加积极化；反对把游击队变成驻防保守的性质和地方观念（如受调不受编），要在军委会计划之下互相配合行动。每县的武装要由夺取敌人的武装中扩充至等于一团以上，要加强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和改造游击队，提拔新的干部。

（九）实行苏维埃法令巩固苏维埃是主要任务之二

湘鄂西的党还没有用尽所有的力量去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威信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这里主要的错误是以党代替苏维埃的工作，把苏维埃的工作当做比党次要的工作，因此，苏维埃政府还只注意到成分的改造，没有建立日常的工作。省苏的工作还大部分是筹钱筹米的事务工作，现在省委和各县党部必须用尽十二万分的力量把苏维埃工作建立起来，只有苏维埃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解决群众的问题，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为了巩固苏维埃，须立刻进行下列的工作：

1. 在新苏区立刻实行土地法

在新苏区要立刻实行土地法，要坚决纠正那些阻碍土地革命的富农路线（如天门），同时要反对侵害中农利益的事情。在老苏区要完成平分土地。

2. 完成修堤和扩大生产保障春收

但在老苏区现在工作的重心已经不是一次二次再来重新平分土地，也不是以实行租佃政策为中心问题，土地委员会的中心工作是在想出种种具体办法帮助农民从他们分得的土地上得到利益，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在完成修堤和

恢复生产，开始春耕运动和保障春收，在恢复生产中，特别要帮助贫雇农解决耕牛、种子、耕具等问题，决不能拿租佃政策来代替这些主要任务的解决，来迫使贫雇农把土地出租，受到富农的卡勒剥削。

3. 领导灾民斗争

苏维埃政府对于百分之七十的灾民，决不能坐视不理。忽视广大贫苦灾民不去领导他们的斗争，这是苏维埃的罪过。苏维埃政府不但是只是送灾民出境，而是要领导他们，使得他们在没收地主阶级及富农的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以及引导他们去作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的斗争。

4. 坚决执行经济政策

湘鄂西对于苏维埃的法令，坚决执行了土地法，但对于经济政策的法令的执行是不够的。苏维埃政府应该想出种种办法，使苏区的农产品（渔业亦在内）能广泛的输出和增加生产，提倡手工业的发展，沟通日常货物的输入，抑制投机和高抬物价，特别是粮食问题。对于这些办法，我们还没有有系统的进行。对于财政问题，过去滥发纸币以致纸币破产是异常严重的错误，应该积极设法有代价的收回。现在对财政的统一制度还没有建立，应该完全实行苏大会的经济政策决议，特别是发展群众的合作社运动。

5. 坚决执行劳动法

苏维埃对于劳动法的执行，简直忘掉了，没有建立劳工委员会，现在还是一块招牌，这将使工人阶级丧失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依然是富农路线的残余。无论对于苏维埃企业或私人企业应该立刻实现劳动法的规定，对于苏维埃的企业中必须动员工人阶级，为了拥护苏维埃而达到必须的生产限度。

6. 开展对于苏维埃的自我批评

工农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还没有建立，苏维埃的改造没有检查工作，是和平式的改造。还没有开展工农群众对于苏维埃的自我批评，与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没有揭露苏维埃工作的错误，这就是不能兴奋群众来参加苏维埃工作，来肃清异己分子，而将帮助反革命改组派来借苏维埃的错误来反对苏维埃。以后必须在发展自我批评与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中来改造苏维埃。

7. 与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非常浓厚，没有采用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使群众害怕苏维埃或依赖苏维埃，应该去发动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参加苏维埃的工作。

8. 吸收中农与非党员群众参加苏维埃

苏维埃机关虽然吸收了一些工人、贫农，肃清了富农的领导，但是走到另一个“左”倾的错误，吸收中农不够，而且吸收非党群众很少，苏维埃有党员包办的现象。

9. 帮助附近苏区

对于附近的几个苏区（如五鹤峰，房县、鄂北），必须用尽一切力量运用湘鄂西苏区经验去转变他们的工作。

10. 反对对于新苏区工作的敷衍主义

对于新苏区的工作，必须非常注意，反对那些把受过处罚没有工作能力甚至暗藏的改组派分子，派往新苏区的敷衍主义。

11. 开展群众的肃反工作

苏维埃政府对于肃反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湘鄂西苏区改组派活动非

常厉害，这是反革命来消灭苏维埃红军的主要阴谋，还须动员广大的群众来肃清这些反革命。肃反工作，决不仅是要加强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依赖政治保卫局的破获。真正的肃反工作，必须揭露改组派及一切反革命派在群众中的欺骗，开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及广大的发展对于苏维埃工作缺点的无情的自我批评。一切对于阶级敌人和平共居状态，及对于苏维埃工作的缺点的容忍，是无异帮助阶级敌人。

12. 加强文化革命与改善妇女生活

苏维埃应该利用一切可能去开展文化革命和设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保障关于妇女生活之改善。

13. 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主要路线

根据以上的十二项苏维埃工作的重心，应该是坚决执行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文化工作来建立日常工作，来完成修堤与扩大春耕运动，保障春收来领导灾民斗争。在这些工作中去发展群众对苏维埃的自我批评，发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来参加苏维埃工作，密切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之上，动员广大群众来肃清反革命在苏区的阴谋，这是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主要路线。

（十）开展国民党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士兵斗争，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二<一>。

大会认为只有加紧在反动区域和反动军队中革命工作，才能扩大苏区，才能击破敌人“围剿”。

1. 首先在加强城市中的职工运动和反帝斗争

党必须在武汉、长沙、岳州、宜昌、沙市、津市、澧州、常德、岳口、仙桃、沙洋、新堤、各大小市镇去建立工人运动和争取反帝斗争的领导。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工作的中心，应该集中到工厂中去，到工会工作上去，到罢工斗争上去。同时必须抓紧各个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暴行和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来开展群众的反帝斗争的新的阶段。党必须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善于引导和联系到反帝斗争，将罢工斗争、反帝斗争，善于联系到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的斗争。

2. 党必须开展非苏区之农民运动

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加紧在几个苏区之间的白区工作，如荆门、当阳、远安、南漳、保康、随州、枣阳、襄阳、宜城、京山、钟祥、应城、云梦、孝感、松滋、枝江、宜都、公安、石门、慈利、南县、安乡、沅江、益阳、湘阴、岳阳、临湘这些县份之农民斗争，在发动他们抗租抗税分粮的斗争，去发动他们的游击战争，来实现各个苏区打成一片的任务，来实现以农民战争包围城市的任务。同样的对于苏区内部之白点，如监城、沔城、普、郝等地应该加紧这些市镇之工农群众工作，以与我们的军事行动相配合。

3. 瓦解白军工作是党的主要工作之一

现时自军士兵的动摇与投向红军，是苏维埃运动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孙连仲的二万人的兵士暴动参加红军，更是表明红军胜利与白军暴动之不可分离。湘鄂西对于白军工作，完全缺乏有系统地有耐心地去做艰苦的组织工作，以至许多自发的兵暴都不能领导，应该立刻纠正，在党内和革命群众中去造成进行瓦解白区[军]的广大的群众工作。

4. 领导灾民斗争与发展白区白军工作，成为不可分离的任务

湘鄂西百分之七十的逃荒群众，这固然增加苏区的困难，然而却是湘鄂

西苏维埃运动向外发展的主要力量。党和苏维埃应该加紧对于灾民斗争的领导，号召他们去联合白区的灾民、工人、贫农、中农，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粮食，和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向国民党的统治作斗争，号召兵士帮助灾民斗争，党要派人到武汉、金口、蔡甸，广大的灾民群众中去做工作。同时必须以党的领导力量，去纠正这些灾民团破坏白区贫农中农利益的行为。

5. 反对忽视白区白军灾民工作的机会主义

发展白区的工作、白军的工作和灾民的工作，过去都被忽视了，而且苏区有些冒牌的党员，不愿到白区去做艰苦的工作。大会认为这是保守观念的恶果，这是在得到政权混入到党的投机分子的表现，必须坚决的纠正过来。苏区的党必须成为周围白区革命的组织和领导者，忽视白军白区工作，这便是对于革命发展的机会主义的消极，应给以无情的打击。

6. 改正白区党的组织的政治路线

大会认为白区的党的组织（如宜昌道委）还没有执行国际路线的坚决的转变，在农村中还保存一些豪绅地主富农的分子在党内来障碍党的路线的转变（如以前的荆门县委），在城市中放弃工人运动的领导，特别是宜昌道委对反帝运动的估计（认为宜昌文化落后，不能做反帝斗争），比国民党的口号还不如的取消观念，应当遭到严重的谴责。宜昌、沙市的工作还没有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放弃许多自发斗争的领导，这些现象一刻也不能延迟下去了！大会委托新省委应该坚决的去从思想上组织上改正白区党的组织，才可保证加强白区工作的任务的执行。

四、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群众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十一）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联合中农，反对富农

党在苏维埃运动中，必须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党和工人阶级依靠贫农，联合中农，与富农作坚决的斗争，这是党的阶级路线。过去立三路线时代，党拥护了富农的利益是执行阶级敌人的路线。在国际路线的转变中，党开始以工人、贫农、中农的利益为出发，来解决土地问题。可是对于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还非常不够，仅仅是提拔了几个工人干部，没有广大开展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对于劳动法实行的忽视、劳动委员会的虚设，对于职工运动的忽视，这些具体的事实，证明还没有把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当成斗争的任务。因此，在国家企业中，还不能充分动员群众为了苏维埃和军事的必要来提高生产的必须限度。另一方面，对于联合中农的原则，有时是放松了；没有吸收广大中农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在反对富农斗争中，有妨害中农利益的错误。大会认为忽视工人运动和破坏中农联盟，仍是富农路线的变相，应受严重的打击。

在平分土地反富农斗争问题上，党要反对以一次、两次的平分土地为反富农斗争唯一的办法，把向富农斗争为解决贫困的唯一办法的错误倾向，以及消灭富农动摇中农的错误。现在在湘鄂西，的确有一很大的危险，就是把反对富农完全走到消灭富农，在向富农斗争以后，又侵害到富裕中农和中农利益。更危险的有许多灾民跑到附近白区，连工人贫农的利益都侵犯了，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均贫主义，这将会破坏贫农、雇农与广大中农的联盟，破坏赤区与白区的工农群众的联合，实际上是帮助反革命及富农反对工人阶级，使广大农民群众有离开我们的危机，党必须用很大的教育工作，同这种均贫主义作斗争。

（十二）党须由机关中搬到群众中去

现时湘鄂西的党的工作，就是常常以机关主义工作方式，替代党在群众中宣传鼓动和为群众日常利益斗争的艰苦工作。主要的错误，就在于以党包办苏维埃群众组织，以党的决议去命令群众，自上而下公文式的命令群众怎样去做，很少去吸收群众的意见，发展群众的创造性，须立刻发展广大的革命竞赛来动员群众的积极性，打击消沉失望的现象。

党对于工会工作、青年团工作、妇女工作、苏维埃工作、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的工作的领导，非常不够，对于合作社运动的领导把他当力商业机关而被忽视了，对于这些工作的取消观念是主要的危险，省委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向命令主义、机关主义作无情的斗争。

（十三）改造党是保障胜利的唯一条件

党的旧的陈腐的组织形势工作方式已经不适用了。过去对于党的组织的改造，还远远不够，只是提拔了几个干部。现时党的改造，首先在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加强党的列宁主义的教育；2、吸收工人党员和工人干部；3、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洗刷党内的腐化分子；4、改变家长制度的领导方式，因为家长制度的领导方式阻碍着自我批评的发展，阻碍着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对于培养干部和团结积极分子的工作，还执行得非常不够，造成手工业式的工作方式。没有计划，没有集体领导，没有经常的工作的检阅，以致发生敷衍主义、清谈、消极怠工的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与党的下层基础非常薄弱，没有能建立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的支部，使党的机关与党员脱离，党员群众与非党群众脱离，形成了机关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只有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提高党的民主化，才能粉碎这个积习已深的家长制度和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目前党的组织中心任务，在于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成分和干部，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广泛的发展自我批评，与理论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

五、彻底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与机会主义路线作无情的斗争。

（十四）国际路线的转变与转变中的错误

1. 立三路线的破产大会审查自三代会至四代会一年半以来的工作，认为在特委时代党的红军的领导，完完全全执行了立三路线，以前的三有主义（有钱就有枪，有了枪就会有群众）亦正是立三路线的实质。因为党和红军执行立三路线的结果以致二军团脱离了苏区的根据地，在敌人第一次“围剿”中遭受着严重的失败，而二军团在立三主义者邓中夏领导之下，由立三路线更引导到消极失望过着逃跑的生活，曲解国际路线为上山守卡的保守主义。

2. 国际路线转变的成绩至中央分局成立后，才开始真正的国际路线的转变，在实际工作中与立三路线作了坚决的斗争，使湘鄂西红军与苏维埃获得巩固与扩大。中央分局及中央分局领导的省委，曾经纠正了党和红军的立三路线，曾经纠正了企图以命令方式去平分土地和消灭富农与动摇中农利益的种种倾向，纠正了进一步组织国家农庄实际掩盖富农路线的企图，纠正对于军阀混战投机而主力红军冒险轻进的军事投机，打击了在水灾发生以后的悲观失望的情绪和消极怠工的分子。将党的全部工作转变到组织国内战争，克月民灾荒、修堤、恢复生产等中心工作。三军回来以后，击破了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襄北以及荆南的苏区。所有这些成绩，是执行国际路线，纠正立三路线的结果，党因反立三路线而日益巩固了，成为湘鄂西苏维埃和红军的领导者与组织者。

3. 转变中的不够与错误

可是在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中，有不少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这有下列的表现：

(1) 没有确定的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建立军事上坚固的领导和精密的计划，在军事上发生个别的犹豫动摇，没有用很大力量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因此，在军事上犯着许多错误，以致受着潜江和江右的失败。

(2) 还没有用尽所有力量去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威信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特别是财政的紊乱，以致钞票破产，劳动委员会没有建立，劳动法没有坚决的执行。

(3) 没有能建立坚固的党的领导机关，游击式、手工业式的领导方式，没有能形成党的集体的领导，没有能积极的发展自我批评和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来巩固党的组织，未在国际路线的周围团结干部。

(4) 对于白区白军的工作，非常忽视，对于灾民斗争没有加紧领导。

发展自我批评与改正自我批评中的错误：

大会认为估计一年以来的工作，必须指出在国际路线的转变中所获得的成绩。如果把这些工作的不够和个别错误看成为党的领导破产，党的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取消主义，那“只有立三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这只是立三路线向国际路线进攻的企图。因此必须实行中央十二月十四日来信的指示：

1. 对于领导机关的错误，应该进行无情的自我批评。

正如中央来信[信]所说：“地方干部能够占[站]在正确的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与中央分局书记一些严重错误做斗争，这是湘鄂西党的进步的表现，而且也是湘鄂西每一个同志应有的责任”，因此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必须继续发展。

2. 忍耐的进行解释工作，改正自我批评中的错误

可是在发展自我批评中，表示着有一些同志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还没有正确的了解，因而与那些利用分局部分错误来做复仇的斗争

的立三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分开，没有把这一自我批评用来发展党和红军、苏维埃的工作，而只是拿来攻击中央分局负责同志，这当然是不对的，有些同志正因为遭受着部分的失败，就到党内去找寻失败的负责人，甚至对于整个领导的正确发生怀疑，这实际上正是失败情绪的表现，是在决死的斗争中间最大危险，对于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忍耐的进行解释工作。

3. 严厉的打击反党分子

但在苏区阶级斗争更形尖锐的形势之下，一部分阶级敌人，以至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利用中央分局部分的错误来做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这样来攻击国际与中央，对于这些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斗争。

(十五) 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大会认为在湘鄂西党内，立三路线与立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还远远没有肃清。在目前国内战争紧张与湘鄂西困难情况之下，悲观失望的情绪增长起来，右倾机会主义成为主要的危险。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在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去征服困难和敌人斗争。在于军事投机的观点，过

分估计敌人的力量，和不去发动群众和红军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实行阶级进攻的路线，因而发生抛弃洪湖根据地逃跑观念，和把向外发展看成为逃跑的错误倾向，把巩固苏区曲解成为困守洪湖的庸俗的保守主义。在保守主义之下，把向敌人的军事进攻都看成为立三路线的冒险攻坚，因为对红军行动的消极失望，主张把红军分散游击，把发展新苏区的任务看成为抛弃旧苏区，而不去发动新苏区的土地革命，掩盖着新苏区的富农路线，加紧自区白军的工作，都成为一纸空谈。把一切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加强红军的纪律、巩固红军的领导，都看为无关重要，而把有钱有粮看成为革命发展的先决条件的胡说。在现在全国革命发展，革命与反革命都在积极准备决定胜负的进攻的重要时机，右倾机会主义（保守逃跑等待一切，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的不足，在苏区四周兜圈子的波浪式的推进，不去发动群众的军事投机）是阻碍革命向前发展的主要阻碍，应受到严厉的无情的打击。

反对“左”倾

对于一切机会主义“左”倾的表现，如不估计到敌我力量的军事冒险，如掩盖困难的乐观情绪，特别是损害与中农联盟的各种行动，反对这些倾向，一分钟也不能放松，只有坚决的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执行当前的任务。

反对调和派、两面派

在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必须毫不容情的反对两面派的手段，两面派口头上承认党的路线的正确，而实际上作反党的斗争，同时必须反对机会主义的调和派，调和派企图替机会主义作辨[辩]护的工具或是抱着党内和平的心理，不愿得罪人的敷衍主义，对于仇视批评或怠工抵抗党的批评的分子，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

（十六）反国际路线的斗争，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应受到严重的打击

潜江谈话会问题的结论

在潜江失败以后，在潜城的谈话会中，发生了红军主力移到另外一个苏区的主张，这是绝对错误的，这是完全在困难面前发抖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与没有征服困难的坚决性的表示。当时前方同志（特别是夏曦同志）没有能在原则上揭露这种抛弃洪湖根据地的右倾的提议而给以严厉的无情的打击，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在客观上帮助这种右倾提议的影响。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分局与省委联席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巩固与发展的争论的结论，”

可是当时中央分局巩固和发展襄河北岸苏区之主张是正确的，这与向北逃跑的主张、在原则上是不同的、因为在湘鄂西苏区目前形势之下，必须向外发展，才能巩固原有根据地。当时一部分同志以为只有把红军主力放在洪湖，才是巩固根据地；曲解巩固苏区为保守主义、把向外发展看成为逃跑，这同样是右倾的错误。

万涛同志的保守主义与反中央分局的斗争

当时过分估计襄北敌情而主张军事冒险的行动（如紧急会议改变中央分局和省委的决定），继而把向外发展看成为逃跑右倾，不去提议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和用尽一切力量去争取新的军事胜利，加强新苏区工作，加强灾民工作，以求苏维埃运动之发展，这完全是把巩固苏区看成为庸俗的保守主义、而且万涛同志不去在党内揭露自己领导九师脱离苏区的错误，不去在党的扩大会反对中夏路线，而反以为中央分局的领导者的右倾逃跑，将党的巩固苏区反对右倾的正确口号用为攻击中央分局的旗帜、万涛同志以领导者的

地位在自己影响之下，团结了一部分同志在扩大会议开始向中央分局作复仇的斗争，采用两面派的手段来反对中央分局，企图将省委与中央分局对立，团结了反党的分子（如潘家询），用种种谰言去动摇党和红军领导，把军事秘密当成街谈巷议，间接的可以帮助反革命的活动。大会认为反中央分局的斗争与对中央分局错误的批评，完全是两件事。万涛同志根据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去反对中央分局正确的领导，去作复仇的斗争，完全是反党的斗争，只有帮助反革命的意义。大会要求万涛、潘家询等同志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与右倾、“左”倾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可是万涛同志在大会的表示是不够的，万涛同志没有承认他这些错误是重复了立三路线、中夏路线的错误，是右倾的；没有揭露他用两面派的手段向中央分局作复仇的小组织活动的斗争，是帮助阶级敌人的行动；没有能反对潘家询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与有系统的反中央分局的斗争。

特别是潘家询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大会认为只有要求他们彻底的承认错误，继续不断的开展反机会主义斗争，才可保障国际的一致与巩固。

省委扩大会和省委的错误

省委扩大会议及省委，反对逃跑主义，当然是对的；但是有没有能够揭露党内的保守主义，忽视新苏区和灾民的工作，没有把领导红军积极行动，提到党的工作上面，没有能够同万涛同志的反党错误作坚决的斗争，反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严重的错误。

（十六）在中央指示基础之上团结得一个人一样大会完全接受中央对湘鄂西之指示（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决议，十二月十六日来讯，十二月十四日来讯），这些指示，是本决议案的基础。大会号召全湘鄂西的同志在中央指示基础之上，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为了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大会认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乎执行国际路线和反立三路线没有深入，在于没有坚决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从今以后，必须无情的来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保证国际路线的彻底执行，不[才]能完成当前的任务。组织群众胜利的进攻，反对逃跑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大会的中心口号。

中共湘鄂西省委组织工作报告 (一九三二年二月)

中央并转组织局：

(一) 省委成立到四次代表大会：

去年七月省委成立到今年一月代表大会的时候，在这半年中间，正当着敌人三次“围剿”及水灾到临的严重时期，党的主要的政治任务，是冲破敌人三次“围剿”及克服水灾困难，在这时期的组织情形和工作是：

1. 去年八月省委组织部部长是杨光华同志兼任的，有两个干事，常委对组织部工作约一月余检查与讨论一次，那个时候，常委指出组织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为改造党的组织而斗争，组部依据这一中心任务，定下了关于今后改造党的组织计划，并依据这一计划，制定组织部五天工作日程，每五天一次召集组织会议讨论分工执行。这时的工作，还停留省委以内，没有把下层转变。

2. 洪水到来，这一改造计划已成具文，因为他没有估计到水灾的到来，没有具定适合于冲破水灾难关的中心任务，此时组织部即依据省委所定下的为冲破水灾困难而斗争的任务，确定了动员灾民更进一步的反富农斗争，领导与组织广大的灾民到白区与新苏区去，巩固苏区，建立白区工作，保障红军给养的种种动员，曾为水灾问题给了各地党部信，主要内容是：组织苏区灾民为灾民团及建立其中心支部，派干部领导出白区，动员白区，如宜沙、天门、江南等地党部组织自区灾民、饥民汇合苏区的灾民斗争，动员群众武装到赤白边界处征发粮食等。

3. 因为认为要向白区发展，因为（此）如监沔苏区出外逃荒者达百分之六七十，党员随众外出者亦当百分之七八十，省委干部及群众工作干部（如工会、省济等等）放在机关中的作用很少，只有派到下层及新苏区白区工作，如是省委各部组织部部长没有了经常工作，干事也派出去一个，事实上组织形成取消，省府省总等军事工作，通通没有单独工作，由省委少数人去包办了，省委对于各地党的领导已大大的减弱，地方党部的许多工作报告，也不讨论给以指示。至于许多地方县委、区委干部大部派到别地去，区委并甚至只有一两个干部，很多支部党员也不得到党的允许，脱党而逃荒去了，支部形成瓦解。群众组织的工会、贫农团，苏维埃有许多的亦形瓦解。党的工作，群众机关工作，都是应付事务，军事，替群众写逃荒的介绍信是主要的工作，没有去管支部的工作，没有去管理群众组织，组织上已混乱到极点。

4. 在更进一步反富农斗争中，在领导群众到新苏区斗争中，参加区委工作的同志以及许多党员发生极严重的贪污行为。如监利黄穴人〔口〕八区委部分同志纠集几个党员借反富农斗争名义，侵吞几十块至百余块钱，许多党员借所谓领导群众反富农斗争从中取得优越的利益为生活，如开米行、鱼行，作投机事业，引起群众极大的不满，苏区许多干部不愿脱离家庭到白区、新苏区去，苏区在要更进一步反富农斗争中，组织上没有尽到他防止侵害中农的利益的任务，没有从这些斗争中去改造党及苏维埃、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因而有部分的中农发生恐慌与不满，我们曾洗刷了大批的不可教育的旧干部党员，在群众中要各级党部对群众做解释工作，教育工作，但执行得不够，仍然发生这些错误。

5. 灾民对白区去的约七十万，只十余万有组织的，每个灾民团中组织了

支部，工会制有工作条例及斗争纲领，派了一两个干部（灾民团委员会是由群众选举的）领导这些灾民，大都在鄂南、岳阳、京荆、武汉及其近郊，×岳、沙市，××等白区。他们到白区之后，我们所知道只有到鄂西、沙市、岳阳的灾民团支部稍有作用，如岳阳的××地×发展了党的支部，以及传报白区消息等，其他的简直与原地没有关系，有些已经瓦解了或是形势（式）的保存组织，很多的已回到苏区，因为国民党曾大批屠杀封锁，因为他们要生产以及畏惧白色恐怖，不愿再出[去]白区，红军行动时，很多灾民聚集到占领区域去搬粮食，许多灾民已经在红军的帮助下得到粮食和种子，但是在潜江、荆南方面，侵犯了基本群众的利益，把中农一个小猪也牵来，把缝工一把尺也拿来，贫农的一升米要拿走，专找政府要饭吃。党曾组织了灾民斗争委员会，派了大批干部到灾民中去纠正，但这一错误仍然继续发生，并且在潜江莲花寺的灾民中发现了荷花会的组织（改派领导的）向当地群众抢米，<但>没有好久，我们把这一现象消灭了。失业工人运动，那我们简直没有谈及，白区灾民运动，只是纸上的决议，没有执行。

6. 创造并发展了潜江、汉阳、天门、汉川、云孝应各县的组织及沔阳之一部分的组织，发展党员约三千之谱，培养下层干部约三百以上，十五个以上区苏，各县共有十五个游击区，在这地方的苏区有十分之五平分了土地，普遍发动反豪绅地主富农斗争，但只有新苏区组织了工会。

7. 开办了三次训练班，训练了县区委干部（这些干部是洪湖苏区的，仍分配到原地工作），只有四个县委各办了训练班两次。派到城市工作的武汉四名，宜沙十名，岳州四名，到白区游击区域如云孝应、京公、岳阳等地共十六名，新苏区如天潜、汉川、汉阳、荆南等地一百一十九名，供给到红军中做政治工作干部约四十名（只限于省委派去的）。这些干部只有半数是比较好的（新吸引到指导机关的干部没有执行）。

8. 动员了党团员和群众参加了红军到白军中去的没有统计，党对这一工作在水灾以前比较注意；总之，没有积极去进行组织工作，只稍注意于宣传鼓动方面，甚至只×给以赏金去影响。

9. 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很弱，苏维埃的改造运动没有积极进行，参加苏维埃工作的党员，要占百分之八十，没有注意吸引非党员参加，改造运动只是形势[式]的，没有充分准备动员群众。苏维埃机关中的腐化贪污分子没有肃清，下层苏维埃的工人雇农很少，贫农占多数，中农亦很少，对青年团工作还有许多取消倾向，如江陵县委借口团县委没有独立工作，不派主要负责同志去参加会议，没有在政治上积极领导只上诉到省委要省委解决，团的主要负责同志没有吸收兼党，团省委及县委除书记外，常委都没有兼党。

苏区各地工会的组织，有相当的转变、能够动员进行他的工作，计有县总七个，会员二万零二百四十四，区县总干部培养了一大批新的分子，党对工会工作还有取消的倾向，如潜江县党代会没有讨论职工问题，江陵之县总委员长一身兼三职，没有对工会作工等。轻易调动做工会工作的干部，不去发展城市白区特别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武汉、长沙、岳州、虽然派了几个人去了，简直没有回信，京汉、武长两铁路工作没有实际去进行，没有组织，宜沙虽然有二个赤色工会，会员一百三十名，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没有做好，没有发动很多日常经济斗争，没有吸收广大的会员。

合作社的组织虽然有××个，但不是完全组织群众参加的，而是多半以“社员买货较廉，非社员买货不着”等方法去把群众逼进来。省委组织部从

来没有检查其工作。俱乐部没有去组织，形势[式]上有几十个，只是机关里组织的，并只认为团的工作。反帝大同盟只有块招牌，多半是党员，都是兼职的，多只有一个秘书守机关，省反帝大同盟虽成立了，也是兼职的、没有专门工作，互济会只有监、酒的较好，省互会也和省反帝大同盟一样空洞，这两种组织，白区城市完全没有。

10. 各县党的组织情形，以监利为最好，监泻除县城外，全县有普遍的组织，江陵除沙南外（仅十分之一）各地都有组织，他是失败区域工作最好者。郝穴、普市等处敌人占领的区域、在发动反富农斗争有各种群众组织，送菜蔬米鱼给红军，参加红军中工作等，潜江经过敌人几次占领，以前的组织完全塌台了的，现在有比较巩固的基础，建立政权后敌人占领了一次，他〈们〉能保障乡村政权的存在与发展，培养有大批新干部。汉川是中心县委，指挥天门、应云孝等县向襄北发展很迅速，帮助了云孝工作的发展。但襄河沿岸的组织不坚固，有些敌人占领之小市镇及其附近尚没有组织，天门之东区如芦家口、甘[于]驿镇等处，是建立了政权的地方，西北是游击区域，组织虽普遍，但没有巩固，一被敌人占领，即失掉作用。岳口一线，没有组织、，他们还是富农路线，没有发动广大的斗争，尚未进行平分土地。汉阳的组织很弱，他们尚有迫令群众加入党的笑话。应、云、孝等县是新发展的区域，成立了云孝县委及应城特区，约一百个党员，没有广大的群众组织，群众发动分粮运动，党领导不够，没有把他造成游击区域。京山仅南部有一个特支的组织，农民委员会、饥民斗争委员会共约二百多人，是和平发展的，没有进行广大的分粮、抗捐税、加资各种小的斗争，它是由天门县委指挥的。华容石首两县政权失败后，组织百分之八十塌台，把两县合组为江南县委，他们空喊着恢复政权，由于失败情绪所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军事投机，认为没有红军打过江南，工作没有办法，忽视群众运动。没有去争取广大饥民失业工人发动斗争，没有分化豪绅所领导的义勇队的组织，而且许多干部因失败情绪，利用个人错误攻击负责人，没有真正自我批评。宜昌特委还是右倾工作中的事务主义，他们说组织反帝斗争没有材料，职工运动没有扩大，企图以乡村去包围城市（如他们给沙市市委信，要把工作重心移到近郊），特委书记没有做真正领导工作，忙于找经济、与房县五鹤组织没有联系起来。荆当远组织没有建立与扩大，湘鄂边的党还是立三路线，富农路线，没有真正转变国际路线，平分土地，富农从中得利，县委都不强健，组织很易被敌人打碎，他没有向松枝宜公联系，没有向南安发展，房县等地苏区的组织，比一般的要坏些，成分富农很多，没有当地坚强的干部，群众组织混入很多富农甚至豪绅。没有执行平分土地，没有白区工作。鄂北的情形，他们还没有具体的报告来，最近来信只写到他们于列李卢纪念日举行代表大会，改造特委，请求省委派干部，据我们和交通的谈话，他们准备把红军整理一个时期再打仗，由此可见他们还没有转变。对湘北工作我们很少帮助，原来岳、临两县已有普遍的组织，后因自首分子的破坏，干部牺牲殆尽，党员自首殆尽，他的主要错误是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没有洗刷原有自首分子，党的组织基础建筑在小资产阶级学生富农身上，没有执行改造，现岳州已成立一支部，临湘有两支部，但没有斗争。鄂南的组织经过沔阳的发展，已与污县的组织联系了，我们派了一个干部去参加工作，并经常帮助湘鄂赣省委领导。

11. 省委巡视工作没有建立起来，只有两个巡视员，省委常委如必要时才

到各县去，对各县工作指导，主要的是靠书面报告，各县来人接头，审查文件而指导的。宜昌只派一次人去巡视了，湘鄂边、房县、鄂北等地，没有派去过。

12. 全省党员数量和成分，各县委区委之比较，团的组织列下：

(1) 党员总数有二万二千七百四十人，计湘鄂边一千零八十四，江南一千一百九十六，鄂西北六百一十，汉川一千四百四十九，宜昌道三百三十四，天门一千二百四十八，江陵二千九百二十九，汉阳四百之谱，监利四千九百九十二，红军二千五百三十六，沔阳四千零三十六，云孝应一百二十，潜江八百五十二，军事企业七百一十，荆南七十二，各直支一百七十四。

(2) 党员成分：贫农占百分之五十，中农占百分之十六，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二，富农占百分之六，小商占百分之三，学生占百分之二。

(3) 县委成分：贫农百分之二十九，工人百分之三十六，中农百分之三十六，富农百分之十二，学生百分之十，小商百分之三。

(4) 区委成分：贫农百分之三十七，工人百分之二十八，中农百分之二十五，小商百分之四，富农百分之六。

(5) 团员数量共一万五千九百六十一人。

(6) 团员成分：贫农百分之六十八，中农百分之十七，工人百分之十八，小商百分之二，富农百分之三。

13. 在这个[时]期的组织工作，我们可作出以下的结论：

(1) 在水灾中没有巩固组织的领导作用，最危险的是受到客观的压迫，表现软弱与流动性。

(2) 组织工作没有建立到灰色区域和白区去，缩在苏区以内，徒凭苏区去推动以及军事投机的发展。(3) 没有发展武汉、宜沙、岳州、长沙，长江沿岸，襄河沿岸，京汉、武长两路的组织，没有与湘鄂边、鄂北、鄂豫皖、湘鄂赣省联系。(4) 自上而下，没有真正的组织工作，没有充分在政治任务下灵活动员，是事务主义的方式，命令主义代替了组织工作。(5) 没有运用自我批评以及政治运动去深入反倾向斗争，改变干部党员的观念。(6) 忽视了加强区委领导，没有真正的支部工作。(7) 对群众工作，特别是工会、青年团、反帝、组织失业灾民工作，有取消的倾向，命令的方式。(8) 党的改造是和平的，只形式的偏向于成分，没有充分的把积极分子提拔起来，及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积极去加强党的质量。(9) 党的领导机关，群众机关，没有集体领导，官僚主义的错误，没有去了解下层的群众生活的实际情形、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10) 对平分土地和建立新苏区工作，修堤运动保障红军给养，扩大红军与扩大地方武装，是尽了相当的责任。(二) 四代会到现在：(1) 四代会定下了组织的中心任务，加强了党内无产阶级的成分和干部，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广泛的发展自我批评精神，与理论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以加强党的质量，在今后一年中的具体任务，成立了党的组织任务决议案。(2) 组织部根据大会决议定出即时以及在二月到四月执行的具体任务。在现时组织工作，是围绕着反帝运动，失业灾民运动，拥护红军胜利，冲破反革命的四次“围剿”，开展国民党统治下的工农兵的斗争，巩固与扩大苏区，争取一省或几省胜利的这些任务去布置与进行。1. 组织委员会吸引地方一批积极分子加入，增加干事，经常有四人工作，增加六个视察员。2. 为加强襄河北岸工作，地方组织从新设立天汉县委管理应城云孝工作，川阳县委、天潜县委（潜北、天西、京南）、荆南县

委，把原来组织的鄂东特委取消，干部分散到这些县委里去加强工作。3. 武汉、宜沙等城市工作，组织专门委员会管理。4. 领导县区委支部讨论四代会一切决议，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特别深入反倾向斗争；要使一切工作开始转变。

5. 苏区城市白区的党，红军游击队中的党，进行党员检查运动（但不是如苏联的清党一样）以紧张党的改造运动，以坚固党的组织，苏维埃机关工会贫农团等组织，特别是乡级和区级要执行真正的群众的改造。在洪湖苏区及其附近白区的党和群众组织，要做得相当的完善。宜昌、湘鄂边、鄂北各特区，要开始进行（关于改造运动另有具体方针）。

6. 发展六千个新党员，成分工人雇农百分之四十，贫农贫民百分之三十，其他成份百分之三十。分配：监利四百，江陵四百，沔阳六百，潜江三百，江南四百，汉阳三百，鄂中特区一千，宜昌特区四百，红三军及其军事企业二千，其他二百，各特县委特别注意到城市白区新苏区游击队的发展，要特别注意吸收团员入党及兼党（特别注意在红军中执行）以及劳动妇女入党，地方党部要做到劳动妇女占发展数中至少百分之七十。

7. 为建立武汉及近邻工作，失业灾民中的工作，汉阳、沔阳、鄂中特委须各派出十个至二十个干部去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会、反帝大同盟的组织，派出得力干部两个以上到京汉路武汉[长]路去建立与转变工作，京汉路发展支部及工会组织须与云孝取联系，武长路须建立新的支部、工会等组织，须与蒲圻取联系，天、川、云、应，须在盐井中发展几个支部的组织及工会、反帝大同盟，加强沙市、宜昌、新堤工作，要进行在工人中建立几个新的支部、工会纠察队，组织反帝大同盟，建立沿长江沿襄河城市商埠及其江面轮船、民船上的工作，最低限度要建立起基础，责成沿长江沿襄河的各党部负责：监利县委要帮助岳临建立三个以上支部组织，江南县委要帮助南安建立三个以上区的工作，并派干部到滨湖各县进行工作，鄂中、鄂北特委须建立起应、京、钟的组织，最低限度要做到鄂北苏区到天、汉，沿途有组织。其他各地特区必须开始按四大会组织决议，进行各地组织联成一片的任务。

8. 各地有许多失业灾民到城市白区去了的，为组织失业灾民斗争，省委各地党部各派出一批得力干部到失业灾民群众所向之地去，整顿灾民团中的支部，在失业灾民中组织支部及失业灾民斗争，要开始使这些支部及失业灾民进行当地的工作，特别是鄂中特委，沔阳、汉阳之于武汉及其近邻，江陵、潜江、监利之于沙市、公安、万马、荆门、京山等地，监利之于岳临，沔阳之于鄂甫，失业灾民最多的地方，要派一大批参加过区委或中心支部工作的干部去工作。

9. 要完成动员八千个党团员和群众参加红军。白区的党动员六百人来参加红军，要保障工人雇农成分占百分之四十，贫民百分之四十，以坚强红军中阶级基础。征求六十<个>积极干部到红军中做政治工作，各种拥红工作，要做到真正的群众运动，白区的党必须动员起来。

10. 动员一百个党员及二十个干部到自军中去，组织白军士兵。每县要有一次兵变或相当的组织基础特别是鄂中、沔阳、潜江、江陵、宜沙等地。

11. 合作社、俱乐部、青年团、农妇代表会议、互济会的工作，必须自下而上检查一次，定出适当的改造与发展的计划。生产运动须成为群众的斗争，每个支部具体布置与定出计划，竞赛进行。党团员一定要参加与领导，各级反帝大同盟，派得力干部与吸引群众参加，自上而下的整理其组织。

12. 政治保卫工作，一定要选出一批得力可靠干部担任，组织群众参加这一工作。

13. 城市白区的发行线，必须从组织上动员去建到三道以上，做到每个支部及在群众组织中建立发行机关，进行发行工作到城市白区去。

14. 工农赤卫军，特别是挺进队的组织，要一律于三八以前组织起来，已经组织了的要继续组织一批积极勇敢分子进去，支部动员广大群众把各地工事做起来，已经做了的要更加坚强。

15. 为创造一批干部，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各地党部须送六十个，曾经做过县委或中心区委工作的干部到省委受训练（另有通知），各县至少须开办一个培养区委人才的训练班及两次至三次流通训练班，培养支部书记及下层群众工作的干部，新培养三个至五个县委人才，二十个至四十个区委人才，五十个至八十个支书人才，县区级群众工作干部（特别苏维埃、工会的）共八十到一百五十个，特别要做到工人雇农成分占百分之四十。监沔两县要继续抽出十个能参加区委工作的干部送到省委来。

16. 为执行政治的组织的战斗任务，各特委、县委、区委组织部要加强来吸引积极分子及群众组织中党团各一员成立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一定要讨论各种群众工作中的组织问题，加强兵委妇女及发行工作，县委要做到巡视帮助中心支部工作，并固定一批视察员和宣传鼓动员，灵活的运用到某地某些组织工作中去。

17. 区委应实际领导所有支部，要把省委县委一切决议灵活的深切的经过区委运用到支部反映下层一切情形。所以区委组织应特别加强，各县委应即特别注意健全区委、支部，按最×行政区域缩小，使支部能紧紧的抓住一切工作。白区的支部亦须缩小，并在各地建立支部。区委和支部的工作要经过积极分子去进行，积极分子会议应经常召集。

18. 上面这些工作要围绕着“二五”、“三一八”纪念，以及在各种大小斗争中特别在反帝、失业灾民斗争中，灵活的具体布置，建立到支部上去，下层群众组织中去，并执行严格的检查，无情打击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省委组织部号召各特委、县委举行竞赛，于四月底作总的检查。

这些任务，我们正在进行，执行程度，详下次报告中。

（三）没有作过一次有系统具体的报告，以致中央不便指示，我们承认这一错误，从实际工作中去纠正。

（四）望中央接到此报告后，有详细的指示。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此处百分比有误。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为拥护红军胜利继续击破敌人第四次“围剿”发起广大的群众运动通告
(一九三二年二月)

各级党部

红军各级政治部

自一月二十六日起，潜江之敌刘培绪部进攻我潜江赤区，占据周家矶、莲花寺、直路河，焚烧总口一带；川军郭勋、张邦本等向我们江陵赤区进攻，占据我新口；沔阳府场之三十四师，亦同时出击，有进扰我周老咀、新沟咀一带之势；同时敌人四十一师与第四师之十二旅进攻我襄北之九师。这种形势，显示敌人各方配合向我进攻，是反革命第四次“围剿”我湘鄂西苏区与红军之具体计划。武汉反革命的报纸早就宣传川军要进攻湘鄂西苏区直抵周老咀。这次敌人的进攻，亦即是实现此种计划之开始。

正是敌人向我进攻的时候，也即是红军向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三军九师在应城消灭敌人第四师之十二旅和蒋老七之一营，我七师在黄陵矶消灭敌驻军二营，我三军军部直属部队及独立团击退府场出击之敌，巩固我新沟咀一带。九师在胜利后，即回师进攻张截港，反攻潜江节节胜利，于二月四日即占领潜城，消灭敌人两营以上，我七师亦同时回师进驻老新口，川军退至龙湾一带，敌人这次进攻我湘鄂西苏区和红军，所得到就是惨酷的失败，送了三千枪支给我们。我们的胜利，巩固了襄河北岸的苏区，恢复了潜江县城，扩大了红军，增加了新式武装，实现了“消灭了敌人武装，扩大红军，扩大苏区”的口号，从向敌人进攻中扩大了我们的力量，巩固了我们的苏区与红军。

潜城之恢复与张截港之占领，对于我们有极重大的意义，我们可从潜江更便于向襄河北岸发展，可将天门苏区与潜江苏区打成一片，扩大苏区至京山、钟祥南部一带，更加重了我们向襄河北岸发展，扩大新苏区之任务。我们这次伟大胜利，证明了中央对湘鄂西指示之正确，四代大会决议之正确，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情绪和保守观念以致命打击。

敌人的“围剿”并不因此就击破了，敌人因为受着我们的打击，必然要加紧准备来作第二次进攻。现在沔阳之三十四师占据我×地，川军大部仍在龙湾、普济观、郝穴一带，川军的进攻部队现在还不是退却形势，还是与我相持待机反攻的形势，因为川军之三十四师都没有遭受我们的严重打击。所以敌人的“围剿”苏区，依然是目前最主要危险，因胜利而忘记了这种危险，这将会重复立三路线的错误。击破敌人“围剿”，一方面要动员红军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必须作广大的群众运动，必须加紧地方游击队的活动，健全工农赤卫军、少先队的组织，加紧建筑工事，加紧守备工作，加紧内部肃反工作，防止侦探入境。现在这种工作都消弱了，应该立即纠正过来，在击破敌人第四次“围剿”口号之下去加紧这些工作。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动员红军和群众一切力量去乘胜向敌人进攻，巩固已得的胜利，争取新的胜利。首先，要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一个广大的动员，在此要特别指出：现在党内有很深的保守及和平的情绪，对于敌人“围剿”的危险忽视，没有一切准备工作，还没有在群众中造成坚决进攻敌人、扩大苏区、扩大红军的决心，还没有能抓紧新的胜利来作巩固这个胜利和乘胜进攻敌人的群众工作的准备。因此，决定在最近要举行一个广大的拥护红军胜

利，继续击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群众运动周，时间以二月十三日至二月二十日（各地可以自接到通告之日起顺推）。这个群众运动之具体工作如下：一、各级党部、红军政治部要用各种方式（传单、标语、画报、新剧）来进行广大的反抗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宣传鼓动，县、区召集各组织的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以乡为单位举行群众大会。二、在党内、青年团内、工会内，现在要动员八千人参加红军（以二月至三月三十日为期）：监利一千四，沔阳一千四，江陵一千四，江南八百，潜江一千，天门八百，汉阳四百。少共即须组织一个少年模范团，组织部要征调一批干部去加紧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三、各县各区各团体均须以快邮代电慰劳三军将士和庆贺他们的胜利。四、各乡举行群众大会，通过拥护红军胜利的短的电报，征求报名参加红军，组织挺进队，通过健全赤卫军、加紧建筑工事和守备工作、严密哨线的决议，并由乡苏维埃政府执行。五、广大的发起赠送红军草鞋和菜（主要的是鱼）的运动。六、在红军驻扎区域内部的党，须动员群众去做慰劳的工作，开联欢大会，在红军作战取得胜利即举行庆祝大会，组织洗衣队替红军洗衣，送柴火、菜给他们。七、广大的作优待红军家属运动，替红军家属种田，如果红军家属没有饭吃的，则动员他们到京山一带去参加广大的没收工作。替红军家属写信给红军（可由军委会政治部转），组织红军家属会议应成为目前妇女运动中主要工作。八、在红军和游击队中均须召集各种会议和战士大会来（根据中央分局为击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训令）鼓动他们继续不断的击破敌人第四次“围剿”，拿过去的胜利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九、在红军中即须开始调查没有分得土地的红色军人，分配他们以土地，号召他们为了保障土地革命而斗争，由省苏土委会与红军政治部订出具体办法执行。十、要向敌人士兵来作广大的宣传鼓动。要以“白军士兵和红军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出卖东三省”、“参加红军分得土地”为中心口号去煽动；要利用孙连仲部的兵变作广大的宣传工作；要在每个组织中都要来讨论怎样进行士兵工作，并派人实际去做。军委政治部要对此有专门的计划和指示。十一、军委会要立刻去进行建筑各要隘的工事，并指导各县进行。十二、政治保卫局要加紧肃反工作，要防止敌人侦探混入。十三、现在党要为加紧动员群众、为了巩固潜城和巩固潜北苏区而斗争，为了潜天沔苏区打成一片和发动京山、钟祥、南漳游击战争而斗争。潜江县委的工作，应以潜北（潜矢交界区域）、潜西（潜江、荆南交界区域）、潜东（潜、沔交界区域）为中心。应将潜江广大的群众中动员他们来以自己力量巩固潜江政权，加紧肃清潜江内部的反革命。天门县委、沔阳县委、钟祥县委、京山特支均须为了此任务而奋斗。省委组织一工作委员会去指导潜、天、京、钟新苏区的工作，现在即须从各县调二百个干部来，去发展新苏区的工作，这些干部以做过乡、区工作为适宜。十四、在敌人占领区域（特别是江陵），要加紧秘密活动和骚动工作。十五、《工农日报》要根据此通告做许多论文，并注意消息的登载，进行广大的宣传鼓动。十六、红军及省苏及各县苏维埃、游击队要加紧没收工作，保证红军给养三个月以上。十六、这个通告执行的程度要报告省委及中央分局。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注释 原文无时间，此系编者判定。

湘鄂西省总工会关于反帝问题的通告（总字第十号、宣字第六号）
（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

各级工会：

在目前，国民党、[国]际帝国主义已经是在积极进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时候了。由于日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各帝国主义共管天津后，接着法帝国主义侵入云南，占据了龙洲，现在英帝国主义又开始进攻西藏的西康，这种行动完全是在国民党同情和帮助之下而进行的。在中国的领土快要被国民党卖尽，中国民族的利益也将要被国民党断送完结。现在中国的

民众已经觉悟了，在各大城市内，尤其在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汉口等地，每天都有成千成万的群众到街上去游行示威。他们的要求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建立真正的能够代表广大的劳苦群众利益的政府。这一运动已经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在目前，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胜利不断的发展，苏区内群众革命的斗争情绪一天一天的高涨，正与白区反帝运动的浪潮成为汇合的形势。这一形势摆在工人阶级前面任务非常重大。可是湘鄂西苏区内对于反帝运动

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充分的，有些地方完全是形式的。一般的认为帝国主义在苏区内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每次对反帝工作仅仅是宣传一下了事。省总为要加强各级工会的反帝工作，特着重指示以下的具体的任务：

1、各级工会所在地有反帝同盟组织的，工会应即以整个工会组织加入到反帝同盟中去，实现工人在反帝运动的领导作用。在没有组织的地方，应发起筹备组织工作。

2、各级工会在接此通告之日起，应在各种会议中派人去作报告，用宣传鼓动的方式，使每一个工人群众都能深刻了解帝国主义屠杀中国群众、瓜分中国等等罪恶。并要在二月二十五以前，各级各会应制定各种反帝标语、传单、画报等散发。特别要努力将这些东西散发到非苏区、赤白交界白军中及失败区域去。

3、在这一宣传鼓动之下，要兴奋群众反帝热情，使群众能自告奋勇到非苏区、白军中去工作，促进非苏区反帝运动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派送由各工会负责，如果是区工会以上的主要干部可派到省总来）。

4、在宣传鼓动中，一定要指出国民党“围剿”苏区与红军，完全是在国际帝国主义指使之下进行的，帝国主义以数十斤重的炸弹、飞机以及各种新式武器给国民党来惨杀苏区劳苦群众。目前敌人新的“围剿”中（第四次），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在冲破新的“围剿”总政治任务之下，在进攻黄陵矶、应城的时候，而国民党即拼命的应用他老爷子所给予他的各种武器，尤其是残酷的飞机炸弹，企图将所有的劳苦群众完全变成焦灰。

5、帝国主义、国民党在目前已经是走上垂死的道路，他们不得不回光返照来向革命势力作更猛烈的新的进攻。可是苏维埃和红军在广大群众拥护之下，已经得到新的伟大的胜利，七、九两师进攻黄陵矶、应城、张截港、潜江等地缴得枪枝不下三千余枝，其他各种武器无数。这三千余枝枪须要人背，各级工会应有一个紧急动员广大劳苦群众去参加红军，加强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新的第四次“围剿”的力量。

6、要实现冲破敌人新的“围剿”，巩固的发展苏区。在目前，各级工会领导群众春耕运动应以百分之百的力量去帮助群众解决春耕种子、耕牛、耕

具等任务，并要组织饥民到白区去逃荒，发动且领导饥民的斗争，使这些斗争与白区反帝运动配合起来，进行制造新的苏区。

7、各级工会应在一月之内设法派得力的工人干部（反对你们以前的敷衍了事的派人，不问其是否有作用，只要他愿意即介绍去）到非苏区去领导广大反帝运动，抓紧目前的中心口号。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且组织广大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实现中国民族独立，统一中国，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代表中国劳苦群众利益的苏维埃政府，才能真正实现解放民族。

8、各级工会接此通告后，即应召集会议，讨论执行办法，坚决的反对过去的忽视反帝工作的严重错误。在一月内必须将执行的程途[度]作一报告来省。如果再不切实执行通告所指示的任务，一定要执行工会铁的纪律。

**湘鄂西省反帝大同盟给上海反帝大同盟的报告——湘鄂西反帝大同盟的
成立及组织情形、工作概况等
(一九三二年二月九日)**

上海反帝大同盟：

在举国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的怒潮之下，我们已于一月十日由全省反帝代表大会中成立了湘鄂西省反帝大同盟，现在各县各区乃至各乡村，也正在建立这一组织。

在反动势力包围之中，我们在工作方面感受着极大的困难，同时为了加强与白区工作联系起见，我们特向你们作这个报告，并且希望你们站在兄弟的关系上，予以指示和帮助，并解答一切困难的问题。

我们的报告分三部分：

(一) 组织情形及成立的经过。现在湘鄂西苏区政权所到之地，除少数失败区和新苏区之外，各县差不多已经普遍的建立了这一组织，但是因为工作方法的不好，各地的组织仍然是非常空虚，并且有些地方只有上层机关，没有群众基础和工作内容。

反帝代表大会是由湘鄂西省各团体(如中共省委、少共省委、省总工会、省苏维埃、省军委会、省互济会等)发起组织筹备会，再[由]筹备会召集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选举执委十六人；正式成立省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同样的，各县组织的建立也都采用的这个方式。另外有几县是新苏区，汉川、天门等还未有开始，省同盟正在准备派人建立。

(二) 工作情形及困难问题。在日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又共管了东三省和天津，锦州已被日本占领，法帝国主义占领龙州，英帝国主义进攻东藏，并且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和帮助之下，国民党军阀又开始了对于苏区的新的第四次“围剿”的当中，我们对于工作的布置是广泛的建立组织，同时是向非苏区发展组织，召集各种群众大会，报告各帝国主义在华的兽行。在列、李、卢纪念中，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在“二七”纪念中，在红军七师、九师及四方面军迭次的攻下麻城，攻下应城，攻下汉阳、黄陵矶的胜利中，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每一行动中，我们都相当的做了一点宣传和推动的工作，但是不够得很，没有能够将这些工作做成群众的运动，没有使广大的群众了解帝国主义的罪恶。我们自己的观察，工作所以不能得到很好的结果，主要的原因是：物质上的困难，如画报人材、编剧演戏、化装宣传等非常缺乏。写文艺、出报纸、编小册子这一类文化工作人材太少。没有专门反帝工作的干部，工作的方法不好。

除了这些物质方面和人才方面的困难外，当然我们的工作不实际，没有深入到下层，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三) 对你们的要求。因为以上的困难，我们要求你们接到此报告后：

马上派几个技术工作人才，特别是画师和研究文艺的人。马上在工作上给我们一个指示，并望随时的指示我们，并供给我们关于反帝的材料。立刻派两个对于反帝工作有经验的同志来指示工作。

湘鄂西省总工会通告（“总字第十一号”）——关于纪念二月二十五日国际失业工人运动日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一日）

各级工会：

二月二十五号这一天，是全世界的失业工人为了反抗失业、饥饿、死亡，每年在这一天举行向国际资本主义总的示威日子。正当着世界经济危机日益深入的时候，资产阶级为了更进一步的剥削工人，采取生产合理化的手段，不断的开除工人，失业工人大批的增加，他们的生活遭受到饥饿、死亡不堪的惨痛。同时中国的经济危机，也同样随着世界经济危机而进到总的崩溃时候，千百万的工农失业、失地，生活无着，死亡率不断的增加。全世界的失业工人为了反抗失业、饥饿、死亡，在今年二月二十五日的失业运动中，必将爆发更剧烈的示威斗争。

中国工人失业的增加，是中国经济总崩溃的形势的结果。主要的表现于国民党军阀不断的内战，苛捐杂税的剥削，数万万公债的发行，空前的水灾，使中国经济陷于破产的地步，因此大批的工厂倒闭，将广大工人由工厂中赶到街上去。资产阶级为了要挽救这一剧烈的经济危机，用更残酷的剥削，实行生产合理化，增加在业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工人每天还不得不（到）一饱的工资状况之下来整日整夜为他们增加生产。藉此，一方面可以减少一部分工人，另一方面利用失业后备军来防止在业工人的斗争。如果在业工人一有反抗即行开除，调换失业工人来代替，企图将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利益对立起来。又由于国民党制造的全国性水灾，形成普遍的农民群众日处于啼饥号寒的境地，更是增加了无数量失业后备军。在业工人的生活日益恶劣，而失业工人不断的增加，都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为挽救经济危机而拼命向劳苦群众进攻的结果。这一严重失业工人的问题，是我们赤色工会前面的主要工作之一。

湘鄂西苏区在敌人的残酷的经济封锁之下，同时又遭受严重的水灾，使广大工人失业，农民普遍的灾荒，而又遇着敌人新的第四次“围剿”。湘鄂西的工人阶级要集中一切力量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总政治任务之下来组织失业工人、领导灾民斗争。在二十五日这一天举行失业运动群众大会，要明白的告诉失业工人与灾民，我们的一切失业和灾荒的痛苦都是国民党所给予的，只有冲破敌人的“围剿”，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才是解放的唯一出路。各级工会在这一失业运动中，应完成以下的中心任务：

（一）关于苏区内应提出的行动口号是：1、组织失业工人、领导灾民到白区去斗争！2、动员失业工人参加红军！3、分配失业工人的土地！4、帮助失业工人解决耕牛、耕具、种子问题，计划春耕运动！5、领导失业工人作复工斗争，反对雇主、老板开除工人！

（二）我们必须把这些行动口号切实的深入到失业工人与灾民中去，组织失业工人、领导灾民到白区去斗争，没收豪绅地主一切财产、粮食，并与当地失业工人的斗争及反[帝]运动的群众斗争取得密切的联系，去扩大苏维埃和红军的影响，组织游击战争，一直到创造新苏区。

（三）在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任务之下，我们英勇的工农红军七、九两师得到伟大的胜利，占领了应城、黄陵矶、张截港、潜江等地，获得枪

支三千多支。但是我们要告诉失业工人与灾民群众，虽然得到这许多胜利，而敌人第四次“围剿”还没有被我们完全击破，我们目前主要的危险还是被敌人第四次“围剿”，我们要失业工人与灾民参加红军，加强红军中的阶级力量，继续冲破敌人“围剿”。

（四）分配失业工人土地之后，各级工会应切力帮助失业工人解决春耕种子、耕牛、耕具问题，领导春耕运动，才能保障失业工人下季得到收获。

（五）在二十五号这一天，各级工会应在各乡以乡为单位举行失业与灾民群众大会，并要派人到大会上去作报告，解释国际失业工人运动日的意义，加紧这一宣传鼓动工作，提高失业工人与灾民群众的斗争情绪，使他们更坚决的来参加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六）在这一运动中，各级工会必须准备各种标语、传单、宣言、口号，并要发出告白区失业工人书，必须利用灾民带到白区去散发，同时各级工会应派得力干部到应城盐井、武汉、宜沙等地去领导白区失业工人的示威运动。

（一）关于非苏区的中心口号：1、失业工人要求失业救济费！2、要求退职金！3、要求做工要饭吃，要房子住！4、反对关厂，反对开除，要求复工！5、反对国民党镇压失业工人的斗争！6、要求失业工人集会、结社、出版的完全自由，取消压迫失业工人的任何法令。根据这些中心口号，在每一个要求上提出具体的斗争纲领。

（二）省总特别责成汉川、汉阳、泻阳的工会，至少各县派三个主要得力的干部到应城、盐井、武汉等地去领导这些地方的失业工人运动，要号召在业工人在二十五号这一天举行罢工来援助失业工人的示威运动，责成江陵的工会也必须派三个得力的干部到宜沙这一带去同样完成以上的任务。

（三）要加强组织的动员，深入到失业工人群众中去，召集各工会支部、小组会议，特别是工厂支部会议、失业工人活动分子会议来讨论，使每一个失业工人了解我们为什么失业，怎样发动失业工人的斗争才能得到结果，并要指出赤色工会过去没有注意领导失业工人斗争的错误。以后，我们必须把失业工人问题放在赤色工会工作日程上，主要的一项，动员工会会员深入到失业工人中去，利用一切新的工[作]方式领导失业工人运动，是团结失业工人斗争的先决条件。

（四）要发动在业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罢工。建立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的统一战线，召集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的联系会议，在组织上取得密切联系。失业工人要帮助在业工人向资本家、国民党、黄色工人[会]工贼走狗进攻，反对资本家收买和利用失业工人来破坏罢工。在业工人要为失业工人的利益而斗争。

（五）加紧失业工人反帝运动，扩大反帝宣传。抓紧日厂的失业工人斗争，广泛的组织失业工人反日会，夺取反日会的组织，提出把全部救国基金、日货给失业工人作救济费。争取公开的活动，组织宣传队、排货队、募捐队到各群众团体中去。武装失业工人，使失业工人的斗争与反帝革命斗争取得密切联系。

（六）扩大反黄色工会的斗争。反对黄色工会禁止失业工人参加会议，揭露黄色工会的武断宣传，在业与失业工人一起来捣毁黄色工会的机关，在斗争中去找[争]取黄色工会的下层群众。在失业运动日这一天，如黄色工会召集会议，我们要组织勇敢的失业工人干部到会场上去宣布黄色工会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事实。

(七) 在领导失业工人的斗争和示威中，要加紧领导且发展灾民的饥荒斗争，向豪绅地主要饭吃、要衣穿、要房子住、要救济会[费]等等的斗争。动员失业工人到灾民中去领导灾民群众积极的参加国际失业运动日的示威游行，要使失业工人运动与灾民斗争密切的联合起来，并要动员失业工人去领导灾民斗争。

(八) 要加紧失业工人的宣传鼓动工作。印各种标语、口号、宣言、传单、画报，很艺术的散发到群众中去。组织宣传队，动员各反日团体的宣传队到失业工人中去进行宣传煽动工作。在二十五号这一天，尽量召集失业工人及灾民群众组织飞行集会、示威游行等，以扩大失业工人运动。

(九) 在这一运动中，要宣传苏联工人生活物质的、文化的改善，全世界只有苏联没有一个失业工人，使失业工人、灾民群众实际的了解拥[护]苏联的意义。同时要宣传苏区内对工人劳动保护的实施、苏维埃对失业工人的救济等，使失业工人坚决的拥护苏维埃和武装拥护苏联而斗争。

(十) 在这些任务中要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放弃失业工作的机会主义。只有不犹豫的坚决执行赤色职工国际的正确路线，才能取得失业工人的最后胜利。

各级工会，尤其是应城、武汉、宜沙等的工会接此通告后，应即马上召集各种会议来布置失业工人运动的具体工作。不仅如此，并要将失业工人运动成为今后工会经常的主要工作之一。

湘鄂西省总工会紧急动员通告——关于武装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瓜分
上海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

各级工会：

1、根据中央苏区的电报，在这两天日军确实在上海口岸开始武装夺取上海了。各帝国主义瓜分上海行动已经很明显表示出来了。国民党可耻的投降又要出卖上海了。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正在激愤自动的与义勇军开始与日军血战。上海的工人阶级已举行罢工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上海，实行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中央苏区决定在“二·一八”举行总的武装示威，来回答帝国主义瓜分上海的行动。2、湘鄂西的工人阶级应火速的动员一切群众力量，在省附近区域（分盐、沙口、沔阳县、府场、瞿市及各企业工会）举行武装示威游行，与中央苏区取得一致的行动。全省在二月二十五号失业工人运动日举行全省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省总要动员各级工会抓住当前紧急的政治任务，立即组织募捐队、宣传队，发起广大群众积极的募捐运动来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那怕每一个群众只要能出一个铜元，现如能捐到一百元，就可得到数百工人群众的援助，并且可使数万群众就能够了解帝国主义这次瓜分上海的事实。

3、各级工会应在失业运动日中，以乡为单位举行群众大会。在这一个大会上要抓住上海事变的宣传鼓动工作，来动员且组织广大失业工人领导灾民到白区去斗争，并要选派得力干部去加强这一斗争的领导，使这些斗争与白区反帝运动汇合成为一致的行动。组织群众自卫的武装，到街上去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及国民党无耻的投降，援助上海反帝运动。

4、能够彻底驱逐帝国主义与消灭国民党统治的力量，只有苏维埃和红军。只有加强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广大劳苦群众集中一切力量来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因此，我们要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到红军中去扩大红军。

5、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群众武装冲突，已经是直接冲突的开始了，各级工会应号召全体工人武装起来，加强工农赤卫队与地方武装力量。湘鄂西的工人阶级武装自己，锻炼军事，是当前的紧急任务之一。

6、在武装游行示威运动中，准备标语、传单、画报发到群众中去。

各级工会接此紧急通告后，应马上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具体执行办法。省总希望各级工会在执行当前紧急任务之下，有圆满的工作报告来省总。

注释

原文无时间，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宣传部关于湘鄂西八个月来的宣传工作报告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七日)

中央宣传部：

湘鄂西的宣传工作，从未向中央作报告，因之就没有得到中央单独指示，这都是要我们自己单独负责的。我们现在作这个报告，就有点困难，就是宣传工作同志没有专门化，调动大多，致全盘宣传工作情形很难写出，我们现在所报告的，不过是几个时期的宣传工作的大概。且分四个时期说来：

一、中央分局时期的宣传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至七月）

1. 宣传的中心：此时期正是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所以此时期宣传工作的中心，党内是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的解释与斗争，党外是平分一切土地，反富农斗争与改造苏维埃。

2. 宣传部的本身：此时期宣传部长是夏曦同志兼任，但夏同志没有多大做宣传工作，实际做的是庄东晓同志，宣传部本身的机关工作都没有建立起来，除节期式的发几张传单外，其余都没有。

3. 工作的方式：大半是靠派宣传鼓动员到各地去报告，到处召集群众大会，经过红五月的各种群众大会，平分土地，反富农斗争的宣传便扩大了。

4. 干部的培养：此时期办了一期的训练班，期限只一星期，学生三十多人，所教的问题，也只是平分土地，反富农斗争，改造苏维埃等主要问题。受训练后，比较好的同志派充中央分局的巡视员（那时叫做小巡视员）指定在某一重要的区委或支部巡视，一方面在当地上级党部决议之下做工作，一方面直接向中央分局作报告，结果，在好的方面，确反映了许多地方情形到中央分局，在坏的方面就是了解不够，以中央分局巡视员资格乱指示下级的工作（下级信仰上级的关系，当然无论何事都要问），致发生许多指示上的矛盾，使下级有无所适从之慨。

5. 刊物：此时期党没有党报，只与苏维埃合出了一份《红旗报》（如各县也同样），不过在《红旗报》上有一“党的生活”专栏，那时所披露的都是各县分土地、反富农斗争的情形和批评，却引起了各地党，部及全体同志的很大注意。

6. 党内教育的方式：大半是举行会议，连讨论大纲都是很少的，但因与平分土地反富农斗争亲密联系的结果，发动了党内的很大斗争，党的生活比较活泼而有力。

7. 此期宣传工作的成绩，最主要的是平分土地反富农斗争的宣传扩大了，深入了，到处群众所谈的都是平分土地反富农斗争的情形，真热烈极了！其他如文化工作，士兵宣传，拥护红军的宣传……都是异常不够的。

二、中央分局扩大会议至省委扩大会议时期的宣传工作（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十一月）

1. 此时期全部在水灾困难中，党内悲观失望的情绪非常利害，虽然党提出了领导灾民的斗争，组织水上游击队为当时党的中心工作，但宣传部没有为这些党的中心工作而扩大宣传——此时期的宣传工作，是没有中心的，消极悲观失望的。

2. 宣传部的变迁：省委第一次会议，决定以庄东晓同志为部长，王南英同志为干事。但水灾后，南英同志因病赴沪了，东晓同志亦因病请求另调工作，省委只好以彭之玉同志兼任部长（彭是省苏主席、省委常委）不好久，

中央派谢觉哉同志来，谢即任宣传部干事，又不好久，谢调军委政治部工作，只好调东晓来做宣传部长，一直到十一月。

3. 此时期的宣传工作，大部分是形式的，没有派大批宣传鼓动员去宣传鼓动灾民群众到白区去，没有加紧党的教育工作来纠正同志及干部的悲观失望情绪，使同志找不着出路，纷纷的自动离开组织，党的会议，群众的会议，均大部分停止了。虽然党单独出了《红旗》党报，编辑了一些宣传材料（均偏于万宝山案及国民党经济财政等困难的消息），所以还是可以说是形式的，而且若有若无，并没有经常做。

4. 对灾民群众不但没有派人去实际宣传鼓动，而且那时对灾民群众的文字宣传，都是又少又不对的，就是某地被红军占领后，就贴标语散传单要灾民群众到某地去，如潜江打开后，到处都是贴的“灾民到潜江去”的标语，至于灾民到别的地方去斗争，更是大部分斗得一塌糊涂。

5. 三军回来后，没有一个广泛的宣传，没有动员广大群众来拥护红军，参加红军，党内的同志或者以为三军回来了什么都不成问题了，或者很担心三军回来了更会没有饭吃，因此群众对三军没有表示什么热忱，三军战士也没有一点兴奋。

6. 此期宣传工作的成绩：最主要的是建立了党报和各地党与苏维埃的机关报，定期式的供给了各地党部的宣传材料和反帝小册子，办了两期训练班，但缺点和弱点就很多，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之存在和发展。

三、省委扩大会至省四大大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二年二月）

省委扩大会议，确实打击了悲观失望、右倾机会主义的情绪，党的全部工作，相当的都推动了，宣传工作也就随着转变过来，此时期的宣传工作是：

（1）出版刊物：除《红旗旬刊》每期二千份外，还编有《俄国国内战争缩影》，《党内教育训练》，《湘鄂西土地农民问题》汇刊等小册子（都是东晓编的），涪阳也单独出了党报。

（2）省委扩大会议之后，各县也接连举行了较大的会议，各区各支部也动员了，此时期宣传工作的中心，就是修堤、秋种、保证红军给养等，但些中心问题的宣传、除监利较好外，其余各地都没有扩大和深入，修堤、生产、保证红军给养，还没有做成广大的群众运动，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派大批宣传鼓动员到下面去宣传鼓动，多偏于文字方面的宣传。

（3）此时期办了一期高级训练班，期限两星期，课程是：政治经济、列宁主义、土地农民、组织宣传等，并编了教授大纲，还办了一期白区训练班（学生是白区来的和派往白区去的），课程除一般的外，还添教了秘密工作，游击战争等，但因没有专人负责，教员多拉翠的来教课，所以没有充分准备，特别是没有帮助不识字和程度低的学生（以前几期都同一毛病）。各县也办了训练班，区委支部在监利、涪阳有部分办了流动训练班。

（4）支部在水灾后，完全涣散了，在此期渐渐的恢复起来，过去支部会议，同志多不愿意到会，就是到会也不多发言，参加人作一报告，同志轰一声“同意”就完了，在此时期已较改善，除大部分有日常工作外，经常有讨论大纲，同志读报看文件也比前多些了，党内纪律过去闹得非常糟，在此时期各地都算同志错误的总帐，开除处罚比较多，同志们的政治理论水平比较稍为提高了，党内现在不识字的同志还要占百分之三十。

（5）群众方面的宣传鼓动工作，多忙于应付纪念节，纪念节来了就忙一

下，去了就了事（从来都是这样），十月革命纪念和广暴纪念却动员了广大群众，因省苏三代会在广暴纪念节举行，拥护苏维埃的宣传，却有相当的扩大，但还没有使群众为拥护苏维埃而加紧修堤、生产和保证红军给养等，因为各大纪念节布置得热闹，特别是广暴举行省苏三代会有新剧，有皮影子及各种灯彩，使群众很踊跃的来到会，但在会后，群众就发生一种感想，以为“我们没有饭吃，他们还快活”，特别是广暴纪念要把渔船集合拢来开庆祝大会，要使群众讨厌，因为妨害了他们的打渔[鱼]。

（6）文化工作在广暴后也相当的建立起来了，省文委现在在进行驱盲放足等运动，编初级、高级列宁小学和成年人的读本，建立识字处、诵读小组和工农夜校、俱乐部、通俗演讲所等，据监利的材料，识字处现在很普遍，群众很踊跃来识字，工农夜校俱乐部、通俗演讲所，大半是茶馆兼用，省文委会并开了一逸群书店。

（7）反帝大同盟和苏联之友社，各地是在进行，反帝大同盟各地均已成立，不过都感觉没有事做，我们对于苏联之友社，是以乡为单位，无纵的系统，如贫农团组织法来组织的，俱乐部或通俗讲演所设苏联一隅和反帝一隅，陈列各种苏联和反帝的画片与刊物，除监利、沔阳外，其余各县均未做到。

（8）共产主义礼拜六，举行了几次，所做的大半是扫街修堤，少有群众参加，壁报虽有些地方已建立，但方式大半很不合壁报的用意，不是写篇大文章贴在墙上，就是写几篇贴在门口，象告示一样，至于农村小报简直还[没]有做。

（9）宣传鼓动的方式，最主要的是开会，宣传单，传单标语，其余如化装演讲，新剧，皮影子，也经常举行，特别是改良皮影子得到广大群众的喝采，剧情是文委会编的（朱毛击破第二次“围剿”，捉张辉瓒已演了几次）现准备还用宣传车、宣传船来宣传。

（10）此时期的宣传工作却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已如上述）。缺点方面，主要的是对灾民、修堤、生产等重要问题宣传不够，而且大部分是机关主义的工作方式。

四、省四代大会之后（一九三二年二月之后）

1. 四代大会没有详细讨论宣传工作，只由东晓同志作了一个宣传工作的报告，新省委成立后，万涛同志任宣传部长，宣传部分设宣传和鼓动两科，庄东晓同志任宣传科长，专管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并组织了一宣传委员会（是各机关的同志兼任的），已开了两次会议。2. 我们目前的宣传工作中心，是反帝和击破第四次“围剿”，以联系到拥护红军、春耕、修堤、士兵宣传、灾民斗争，以及一切党的重要工作，特别是注意反帝宣传，已准备在“二·二五”失业工人运动日来做一反帝瓜分中国的武装示威运动。3. 我们的整个工作的计划，已拟出了一个二月工作计划大纲。

总结

1. 中央分局时期的宣传工作，确是广大的群众运动，扩大了，深入了平反土地，反富农斗争的宣传鼓动，提高了同志的积极性，兴奋了群众，但没有建立宣传的领导机关，是一游击式的宣传工作。2. 中央分局扩大会议至省委扩大会议，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除水灾前二十多天外，都没有中心的，若有若无的，悲观失望的，最主要原因是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作怪。

3. 省委扩大会议至党四代大会，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确有很大的建立，但没有抓紧党的中心任务，做成广大的群众运动，大部分是机关主义工作的

方式，在四代大会中，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必要开展四代大会后的宣传工作新的形势。

4.我们感觉湘鄂西的宣传工作，一般的说是没有做好，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右倾取消主义和机关主义的作怪。5.我们要求中央宣传部，经常指示我们的宣传工作。我们今后决心向中央经常作报告，要求中央设法供给我们以各种出版物。

湘鄂西省委宣传部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七日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加紧反帝工作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

关于反帝斗争的意义与策略，在中央去年十二月二日的关于反帝斗争中，我们工作的错误与缺点，决议案上均有明确的回答。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在检阅省反帝工作之后，通过下列的决议：

一、因世界经济的危机，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苏联五年建设计划伟大成功，使国际帝国主义不得不来实行瓜分中国，直接压迫中国的革命，积极准备进攻苏联，现在除东三省、西藏、西康、云南、广西等地已被帝国主义瓜分外，上海、武汉、南京近来亦在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各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冲突，近亦有马上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国民党已完全投降帝国主义，把南京送给帝国主义，迁都洛阳，公开下令解散反日团体，屠杀反帝群众。中国广大工农群众，都在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武装冲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自己武装起来赶走帝国主义，已成了广大群众的行动口号。在此革命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形之下，国民党只有更公开的与帝国主义站在一边，来压迫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帝国主义作广大的武装冲突的整个历史阶段，摆在我们面前了。

可是“省反”，几月来实在没有工作成绩，全省反帝工作，确实没有建立起来，其原因：

(一) 认为苏区内没有帝国主义，没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对象，群众只要求平分土地，不要反帝国主义，这是一种右倾取消主义，他在湘鄂西目前反帝工作中占主要危险。其实土地革命与打倒帝国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阶段的两大任务，是不能分离的。在中国苏维埃运动日益胜利的情势之下，帝国主义必然要自己出马，直接的来压迫中国的革命运动（现在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就是为要来直接压迫中国的革命×积极×），目前帝国主义，正在从军事上、政治[上]来积极指挥与帮助国民党来“围剿”红军和苏区，是帝国主义已成了我们直接的敌人了。苏区内没有帝国主义的说法，不但是取消主义的谰言，而且是帝国主义在苏区内的汉奸，我们应该首先向这种取消主义作斗争。

(二) 认为反帝工作没有建立起来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干部，这种认识也是不正确的。固然反帝工作干部目前非常缺乏，但这种恐慌，正是机关主义的恶果，我们如能深入到群众中去教育和领导群众，从各种实际工作中来做反帝斗争，是可以从群众中提拔干部来领导反帝的工作的，我们现在正要反对党的委派制度，更要反对机关主义的工作方式。

(三) 认为群众文化落后，反帝工作做不起来（宜昌特委），更是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实中国的广大群众，受帝国主义长期残酷的剥削，特别是帝国主义之实行瓜分中国，反帝斗争的要求非常迫切，实际上如武汉、沙市、宜昌、新堤及各较大城市，均有群众反帝的游行与排货的斗争，我们应该深入到反帝群众中去活动，把反帝的群众抓到我党的手里来，不能以为群众没有一起初便请我党指挥，就说是群众的文化落后，反帝工作做不起来，其实只要我们加紧去领导群众的反帝斗争，群众是欢迎我党来领导的，因为国民党及各个派别，根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正在压迫群众的反帝斗争。

其他如说反帝大同盟没有实际工作做，反帝工作仅是打洋船，反帝工作方式仅是宣传等，都是机关主义的结果，都是不正确的倾向。省委号召全省

党员，起来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来击破反帝工作中的一切不正确倾向和认识，特别要打击取消主义和机关主义，并要立刻执行下列反帝斗争的具体任务：

（一）反帝工作要与一切实际工作联系起来，要扩大（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宣传，要普遍的建立俱乐部、苏联之友社来加紧群众反帝的教育，使广大群众都了解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要打倒帝国主义才能保障我们已得的利益，以致来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打破群众的保守心理，使广大群众自动的到红军中去，到白军中去，到白区去，加紧修堤、春耕等，只要我们把反帝斗争做成群众运动，是能来推动全盘工作的。

（二）特别要到失业灾民群众中去，作广大的反帝宣传鼓动工作，要使失业灾民群众都知道，我们的灾荒痛苦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中国的结果。我们要武装到白区去领导反帝斗争，要组织纠察队，到城市中去发动工人，直接检查日货，没收日货来分配，同时要派干部到白区城市（如武汉、宜沙、岳州、京汉路、武长路等），去做失业灾民运动，要发动失业灾民群众要穿衣、饭吃、屋住，反抗屠杀的斗争，一直使他们都知道，只有苏维埃红军，才能解决灾荒痛苦，要暴动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使苏区和白区的灾民斗争联系起来。

（三）在红军中要召集战士开会，报告和讨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要准备军事技术，加紧政治工作，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以提高战士的斗争情绪，红三军要利用各种方法，发传单到白军士兵中去，到白军中去，使白区群众和白军士兵都知道红军是反帝国主义的军队。省委要指示和督促军政治部的反帝工作。

（四）省苏维埃政府，要派人发传单到武汉、长岳及各大城市中去，号召群众站在苏维埃旗帜之下来作反帝斗争，要与反苛捐杂税、分土地的斗争联系起来，要到处召集农妇代表会议，报告妇女的解放，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并组织他们去作白军工作及拥红等工作。

（五）白区的党，特别宜昌特委、沙市市委，要马上派人到反日救国会、义勇军中去工作，领导群众打帝国主义的堆栈、商店，没收和分配日货，要组织工人的纠察队来直接检查日货，要在反帝群众中揭穿国民党“对日宣战”、“革命外交”等欺骗宣传，领导群众起来打倒国民党、改组派，组织民众法庭，审判国民党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要派人到工人、贫民、士兵、学生群众中去宣传，只有苏维埃红军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号召学生群众到农村中去做农民运动。

（六）“省反”要随时抓取[住]帝国主义、国民党各种事件，灵活的提出反帝宣传鼓动口号，以领导反帝运动，马上出反帝机关报纸，要严厉批评反帝工作中的一切不正确倾向，和反映群众反帝斗争的情绪，要编辑各种反帝小册子，以供给下级的材料。

（七）各地的反帝大同盟，要马上做[通]过广大的群众运动建立起来，要纠正秘书包办的现象，干部原则上要从群众中来提拔，不能尽是党员，并要吸引中农参加，“省反”党团要经常开会，要纠正党包办和不管的错误。

（八）省委党报要经常登载关于反帝的文章，要严格纠正各种反帝工作的不正确倾向认识，要个别给白区党（特别是宜昌、武汉）关于反帝斗争的指示。

（九）要督促少共加紧动员青年群众来做反帝工作，反帝青年部要实际

动员起来，委托省委组织部，要经常检阅“省反”党团的工作。“省反”党团要马上开会讨论本决议，并立刻纠正过去机关主义的工作方式。

湘鄂西省委

注释

“省反”，即省反帝大同盟，下同。

原文约缺六个字。

湘鄂西省总工会关于“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问题的通告（总字第十二号）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

各级工会：

“三八”是全世界劳动妇女为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争面包与和平，争自由与平等，在五十九年前于丹麦××城举行国际劳动妇女代表大会的第一天。这次大会惊醒了全世界被压迫妇女革命的决心，给了国际资本主义极大的进攻，因此，他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于是在这一会议上决定了全世界劳动妇女节，每年于“三八”举行广大游行示威运动，每年要在这一天来检阅各国妇女运动的状况及其发展的程度。

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恐慌日益深入的时候，资本家要挽救这一危机，采取生产合理化的手段，将壮的男工大批的开除，利用女工的弱点吸收到工厂中去，所以近年来各国的女工数量大大的增加了，占工人阶级中一大部分，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但是女工反抗剥削的斗争是不断的发展，在斗争中表现了女工参加的积极性，在五十九年以来，国际劳动妇女运动中检阅起来，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我们今年纪念“三八”的时候，正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到崩溃的时候，中国经济危机同样是进到总的崩溃，全世界工人生活日甚日益恶化，失业工人不断的增加，对于女工的压迫也更残酷了。同时，湘鄂西的苏区在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中，又遇着帝国主义如疯狂式的来瓜分中国，在此严重的时局之下，我们来纪念“三八”，更是加紧了我们的任务。

我们必须坚决的指出：各级工会（从省总到支部）都是完全忽视妇女工作，认为女工落后，不懂得革命，是男子一个附属品而已。不注意女工特殊利益，不去站在一个阶级立场上来帮助女工，提高女工政治教育水平线，到现在来，省总本身女工部没有建立起来，更不知道女工现在的生活怎样。同时，有些地方我们看到女工失业的现象比一般男工要多，这一切都证明了取消女工工作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原因。因此，我们要纠正这一错误，必须执行以下的任务：

1、在“三八”前后，各级工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统计失业女工数量，在十八号以前作报告来省，在可能范围中要设法帮助女工。

2、在“三八”前，各级工会从区到县必须建立女工支部，成立女工委员会。要切实整理女工工作，吸收广大女工到工会中工作。

3、要加紧提高女工文化教育水平。各地工家[会]夜校、读书班、识字班，必须号召女工参加。要在红五月以前使在百个女工中有五十个能识字，彻底战胜女工的驱盲运动。

4、在湘鄂西，革命历史六、七年了，关于妇女缠足现象（尤其是小女孩）到现在来还甚行于社会，这都证明了妇女文化落后，封建恶习还未铲除干净。你们必须马上进行广泛的放足运动，完全禁止十五岁以下的女子包足。如果已包了，我们在努力的工作中，要在红五月以前完全消灭，并要宣传成年妇女放足。

5、在目前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以及准备与帝国主义战争的任务之下，各级工会要经常动员广大劳动妇女参加拥红队、洗衣队、做鞋队。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到广大劳动妇女自动的来经常作拥红工作，并要动员广大妇女群众

自动的去帮助红军家属的工作。

6、应分配劳动妇女的土地，要帮助劳动妇女耕种，使劳妇能把分得的土地当作自己生活主要的来源，领导春耕，发动春收斗争。

7、在“三八”节这一天，各级工会应以乡为单位举行群众大会，号召广大劳苦妇女参加，要把我们的宣传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劳<苦>妇女群众，要准备标语、传单散发到群众中去。

8、各级工会接到此通告后，应在工作上执行很大的转变，坚决的反对过去忽视女工的斗争，切实整理女工工作。省总希望你们在红五月前将女工工作的成绩，作一很完满的报告来省。

注释

原文无时间，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目前时局估计及湘鄂西党与红军的紧急任务决
议案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一) 全国革命形势的新的开展 1、根据最近材料，中央区红军围攻赣州；鄂豫皖第四军在一月份进攻黄陂两次，武汉震动，湘鄂赣之十六军在通城获得大的胜利。在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中，正是我三军在黄陵矶、应城获得很大的胜利，与中央军攻赣州、四军攻黄陂、十六军在鄂南活动，客观上取得联系。红军这种惊人的胜利，是由红军的英勇善战，苏区与非苏区广大群众斗争的开展，特别是白区反帝运动的高涨与白军士兵的动摇。但是同时要指出：红军能够利用这些客观的顺利条件，是由于共产党国际路线的正确领导，是由于红军执行了中央的军事训令，红军行动能够积极化，采取进攻的策略，及将红军的相互配合、互相呼应，所以能够击破敌人第四次“围剿”之第一步计划，造成包围南昌，威胁武汉的形势。这就证明了中央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决议和军事训令的绝对正确，把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将红军分散游击、保守防御的策略打得粉碎了。

2、正因为中国红军、苏维埃的发展，帝国主义者更经加紧的进攻中国，以便利于直接干涉中国革命。日本一月二十八日之进攻上海和哈尔滨，不过是瓜分中国和反苏联的进一步的积极的表现。英、法、美各国帝国主义对于上海事件之中心策略，就是在瓜分中国、怎样分赃的问题。现时摆在中国工农群众面前的问题就是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问题，只有动员更广大的工农群众，特别是城市中（决定革命胜负的主要城市，如上海、武汉、广州、天津）的工人阶级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进攻，才可保障中国民族革命战争与胜利。一切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消极，客观上是反革命的行为。

3、国民党在帝国主义加紧进攻中国和革命日益发展的条件之下，投降帝国主义，加紧“围剿”苏区是他的中心策略。国民党广东、南京两派冲突虽然无法讲和，陈友仁、孙科高呼对日绝交，实际主张是将所有的军队调到江西打共产党。蒋介石高唱准备作战，实际集中兵力到信阳一带向鄂豫皖进攻。所以日本进攻上海，蒋介石就逃到洛阳。反革命的国民党正在全国对日口号之下，掩盖一切积极进攻苏区的军事行动与准备。第四次“围剿”正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国民党这些无耻的行为，使群众愈加认识，只有民众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才能反抗帝国主义。但是正因为国民党的高叫对日，欺骗群众，所以共产党应该更加号召群众来反抗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与一切反革命派别、改良主义欺骗的××作斗争。

(二) 湘鄂西苏区一般状况的估计

4、一月二十六至三十日敌人向我们进攻，是川匪八团、徐源泉匪部六团及二十四师联合向我们进攻，是敌人第四次“围剿”之开始。可是三军在应城、汉阳取得了胜利和恢复潜江，击退川匪，这些军事上的胜利有极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一胜利击破了敌人第四次“围剿”之第一步进攻，把反革命武汉行营联合川军会攻老新口之计划打破了，使湘鄂西苏区得到了巩固。同时因为三军的胜利，动摇了四十一师、八十师、五十一师及川军罗启疆旅向鄂北苏区的进攻，同时恢复潜城，开始了向北发展之主要门户，相当阻碍敌人之联合。而且应城，黄陵矶的胜利与四军取得客观的配合，巩固了皂市一带的苏区，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情绪。这些胜利，一方面是由于红三军的革

命热情与作战的英勇，九军二十五师从远安、荆门东下，威胁川军后方，亦有相当的作用；一方面却是由于中央对湘鄂西军事指示之正确与中央分局在敌人第四次“围剿”中军事上指导之正确。在这些胜利中更证明红军行动互相呼应和各个苏区之打成一片，是取得胜利之主要条件。

5、虽然在军事上得着一伟大的胜利，但是敌人新的“围剿”又开始了。徐源泉部队第二次围攻张港，我们没有能够取得这个胜利，这是由于在占据潜城后，没有即刻去夺取沙洋以及以后兵力没有集中的原故，是由于红军行动还没有充分积极化和轻敌的结果。现时的形势，徐源泉必然集中兵力与我们争取襄河来进一步的“围剿”我们，川军还没有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三十四师还顽梗我们苏区内部，各方敌人的进攻苏区红军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而且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决定胜负的形势，只有很清楚的估计到敌我的形势，采取进攻的策略，争取继续不断的新的胜利，才可完全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得到巩固的向外发展。

6、水灾严重，我们还没有冲破，现在修堤、春耕、春种，是最中心的任务。可是广大群众没有饭吃，有百分之七十群众在外，粮食种子的缺乏，红军给养的困难，我们还很少征服。红军不注意采办给养，党、苏维埃对灾民工作的消极，是我们实际工作中最大现象。我们反富农的工作还很少成绩，相反的在苏区内部以反富农为名向中农、贫农乱斗，掩盖完成平分土地，提高生产，解决贫农、雇农耕牛种子的工作的消极怠工。在苏区附近红军采办给养时，群众就将白区贫农、中农的粮食、财产一概没收，党和苏维埃没有以当地基本群众作柱石去发展新苏区，而只号召灾民到新苏区、白区去，好象殖民地一样，这是现在非常严重的错误，客观上是帮助了阶级敌人反对革命的行动。反革命利用我们的灾荒来欺骗群众，发买良民证，在战线上向红色战士宣传，企图拿物质的困难动摇我们的部队。但是我们能够有组织的领导灾民联合当地工农群众与红军配合，扩大苏区，没收地主阶级的大批粮食，必然可征服这些困难。

7、现时工作发展和严重困难的下面，充分表现党和苏维埃、红军的许多弱点，特别是群众工作落在军事胜利之后。在敌人进攻潜江和老新口时，当时最大的弱点是不能发动群众抵抗，广泛的发动游击战争与红军相配合，相反的还有部分的反水群众跟着敌人进攻我们。现时最大的问题，是党和苏维埃的机关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阻碍着一切工作的进行，一切将工作停滞的现状的保守主义，依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忽视灾民工作、白区工作、白军工作、新苏区工作、帮助其他苏区的工作，红军行动还没有充分积极化，战略战术的转变还是不够，等待防御，以主力作牵制的部队等错误，还没完全纠正过来。只有严防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主义和脱离群众的立三路线的残余，才可实行工作上的转变。在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省委与中央分局还没有能及时的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工作速度的迟缓，这是严重的缺点。

（三）目前党和红军的战斗任务

1、乘着胜利开展的开展对于敌人的进攻，争取新的军事上的胜利，以巩固和扩大湘鄂西苏区，援应鄂北和鄂豫皖，是目前第一等紧急任务。为了达到这个任务，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加强拥红工作，尽量采办红军给养，转变红军中的政治情绪，改善红军的战略与战术，是目前最主要的工作。要在斗争中，在“五一”以前扩大红军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要加紧一切战争任务

工作。

2、加紧襄河北岸的群众工作，将天门、汉川、襄北苏区立刻开始平均分配土地，将应城南、京山南、天门西、潜江北造成广泛的游击区域，特别要加紧云梦、孝感的工作，以与鄂豫皖苏区取得联系。荆南特区的工作，亦须同样加强。

3、立刻派人加强鄂北苏区的工作，并经过鄂北的党去加强钟祥的工作，很快的与鄂北苏区取得联系。

4、苏区的党和苏维埃及工会、青年团，须以全力达到灾民工作的转变，特别要严厉纠正灾民到白区不分贫富的乱斗，因为这在客观上是反革命行为。在襄河北岸，要武装灾民与红军行动相配合。

5、立即开始春耕播种运动，实际帮助贫雇农解决耕牛、耕具、种子问题，完成堤工，完成平分土地，与一切藉口租佃政策对帮助贫雇农的消极怠工的倾向作斗争。

6、加强地方武装的整理，特别要使天门、汉川、云梦、潜江、荆南游击队积极化。

7、立即发展士兵运动，派人到附近几个主要部队中工作，转变训练俘虏兵的方式，要以广大的群众的欢迎红军与白军士兵联欢的方式以及分配土地，动员白军士兵参加红军或到苏区种田来瓦解白军。

8、立即改善宜昌道委的成分，转变他们的政治路线，加紧沙市工作，并开始建立武汉工作。

9、立即开办党校，训练白区工作、新苏区工作、工人运动、红军政治工作的干部。

10、立即筹办中央分局和省委的机关报。

11、改善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加紧关于反帝的领导，与忽视反帝的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12、要彻底检查党的工作，完完全全执行中央关于湘鄂西组织的决议。

13、要开始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与党、苏的官僚腐化作坚决的斗争。同时要动员群众来改造、建设苏维埃的工作。

14、加强肃反工作，建立政治保卫局的系统。

15、为了执行以上任务，必须在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基础之上规定一切具体工作计划，加紧检查工作执行程度，加快工作速度，广泛的发展自我批评，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右倾的保守主义的脱离根据地的逃跑主义。同时要与妨害中农利益的左倾作坚决的斗争，机械的以为反右倾是主要危险而放松反左倾的斗争，只是动摇中农帮助富农××反对党和苏维埃。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第一号）——关于苏区灾荒、军事及党内斗争问题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中央：

少共省委书记温×涛同志来沪，曾委托他将代表大会经过及此间情况报告中央。本应详细作书面报告，因为工作堆积，须俟数日方可着手，已要省委准备一详细报告。现在简单报告数事于下：

（一）现时苏区内部的中心问题是灾荒问题。群众有百分之七十逃荒在外，还有一部分群众在苏区没有饭吃，自然以反富农为名乱开<除>中农的有之。当红军在附近办给养时，这批灾民就成群成队去，无管贫<农>、中农一概没收。更因为苏区一部分党务工作人员腐化脱离群众，反革命以修堤工为名，在监利发良民证，买的有千数人以上，苏维埃才发觉。现时我们的工作修堤和春耕播种与领导灾民出境斗争。堤工因注意早，尚有相当成绩。种子非常欠缺。在这些实际工作中，与官僚腐化及命令主义作坚决斗争。

（二）军事方面。自三军回来以后，敌人是经常不断的“围剿”。一月二十六日，敌人向我赤区中心进攻，川军×××军二团，此时仅三军独立团迎敌与之支持；同时七师攻围汉阳之黄陵矶，缴钱大钩部，得两营之枪支；九师攻应城，消灭敌第四师徐庭瑶之十二旅全部。九师复攻下张截港。潜城击溃刘培绪旅。七师亦回师要击川军（川军无损失），此为敌人第四次“围剿”中我军之大胜利。前后获枪二千五百支，新式自动轻机关（枪）三十架（每架值洋一千六百元，法国造），消灭敌军一旅，击溃×旅以上。现时徐源泉复集合五团以上与我九师战，因七、八两师在南岸，七师掩护办给养，八师围南岸，未能击破敌人。九师退出张港，×在××××一带。最近我们已决定在北岸须争取一新的胜利，将徐源泉部击溃。

目前三军已编三师，九师三团，七师二团，八师二团。八师之一团即房县九军二十五师改编。所获枪支除成立九师二十七团外，各团均有补充，还有千多支枪没有人背。还决定成立警卫团。八师师长为侯玉林，政委屈建高。警卫团团团长周荣光。汉川独立团已充实将近一团。此时，湘鄂西兵力计有九团，较前增加了三分之一。已执行中央由于击破敌人三次“围剿”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案所规定。最近我们提出扩大一倍的口号。

军事领导必须加强，杨霖同志须立刻来任军事参谋长。

（三）一般的组织问题。中央分局自夏曦及盘铭回后，已恢复集体的领导，可是向应、贺龙现在不能不在军部。锡根还没有来，分局组织还不健全，请中央即派锡根来。省委已比四次大会前较健全，只是主办党报的人还找不出，务请中央即派前已允许之人来主持宣传部及党报。军委主席团原为万涛、贺龙、夏曦、崔琪、段德昌五人，后来中央指定关、贺、夏三人。我们意见决定还是五人，即夏、关、贺、段、万五人，现已公布，请中央批准。现关、贺、段三人均在前方，只夏、万二人在军委负责，因此军委集体领导还没有建立好。现正在调干部并转变省苏的工作，现鄂北派尉士均去，房县派陈沈（汉川县委书记）去，湘鄂赣派刘××去帮助他们，只是五<峰>、鹤峰还没有派人去，宜昌道委加派张××去。在襄河北岸，就天门、汉川之苏区成立一天汉县委。就天门、潜江之游击区域成立一天潜县委。云梦、孝感成立一县委。襄沔南岸，就荆门南部之苏区成立一荆南县委。在组织上已注意新苏

区与白区工作，并特别注意应城、云梦、孝感三县，因为是与鄂豫皖打通区域。城市工作以武汉、沙市两处为中心。张国诚还在上海否？此人是湘西人，适宜派到五鹤峰苏区去，请中央派来。

（四）党内斗争问题。在现时形势之下，湘鄂西党内右倾是主要的危险。具体的表现是：对灾荒斗争投降；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军事上不积极化，把巩固苏区看成为保守；不注意发展新苏区的工作、白区、白军的工作。四次代表大会在中央指示讯的基础之上，已严厉的纠正此种倾向。同时，妨害中农的左倾倾向，现在亦是很大的危险，正在与这种倾向作斗争。

中央分局过去的错误，正如中央决议和指示讯所说。不过有两点须声明的：政治工作并不是完全没有建立，九师自独立团开始时，即建立政治工作。三军下来后，亦重新成立政治机关，比中夏时代是有进步。在中央致分局和省委信上说：已指出夏曦同志关于根据地及九师问题的错误，关于解决九师问题的错误以及离开中央分局的错误，曦完全承认。在中央讯未来以前，曦曾经同省委商量另派代理政治委员，自己回到后方工作。只是关于根据地一点，中央在决议案上并未指出夏曦的错误。一般反对夏曦的就说，夏曦主张退却路线，抛弃洪湖根据地，事实上并不如此。在军事上，夏曦在某一问题上有些犹豫和过分估量敌人的错误，但是没有抛弃洪湖根据地的观念。在潜城失败以后，在潜城谈话会中，段德昌同志发表红军主力××鄂北苏区，再打下来，×湖大部一团人的右倾的主张。当时××反对德昌到鄂北之主张可是夏曦当时没有在原则上指出德昌此种主张是抛弃洪湖根据地的右倾的提议，给以严重的批评，这是夏曦的错误。中央指示讯如是指这一点，当无问题；如果说夏曦有抛弃根据地的观念，那就不合事实。盘铭在沪时曾问过中央，说在万不得已时，红军主力是否可到鄂豫皖去？这是盘铭记得同志们有此意见，故向中央询问。夏曦并无此意。盘铭亦是指出在军事万分失败时，红军可否向那方面去？听小关说，中央给国际报告说，夏曦自己跑到红军中去当政委。自然，夏曦的去红三军是绝对错误的，但是中央以前曾指定夏兼三军政委，并说过在必要时可到前方去，当时曦觉得前方军事吃紧，所以跑到前方去了，此点亦必须向中央声明的。

至于万涛同志及中央分局的斗争是如此的。九师的错误，夏曦解决不当是对的。但是九师的错误依然是错误，万涛却总掩饰自己的错误，说与江右失败无关，说原来决议（省委关于九师行动决议）有脱离苏区之危险，在扩大会中不揭露自己的错误。在潜江失败以后，万涛反对到襄河北岸发展，说现在襄北敌情严重，去襄北不能回来即脱离苏区，因此主张去打藕池、石首的冒险政策（当时如果去打了，如不得放手，就有到五鹤峰上山的危险）。此计划当时只有夏曦一人反对，直至回到后方开会方阻止。万涛同志就以为到襄北是逃跑，所以对襄北新苏区的工作，对三军争取新的胜利的计划，万涛是没有理会的。万涛当时的错误是把巩固苏区看成为保守，扩大会万涛同志的报告和决议案就可看见。夏曦在前方曾有数讯纠正此点，万涛就在后方影响一部分同志说，夏曦要抛弃洪湖根据地，是退却路线，以致在扩大会议中所谓反对右倾，实际是反对夏曦。他们把潜江德昌的意见说是夏曦的主张，夏要负主要责任。潘家询本来以前在此进行反中央的斗争（省委有决议），现在万涛掩护之下大活动，提议派人去监视夏曦或代替夏曦工作；提议将红三军留一中心部队，而其余的化为地方武装；提议派尉士均到中央去，反对光华、之玉到上海去，因尉士均说夏曦是一贯的取消主义。所以扩大会议前

后反对中央分局的斗争，是万涛、潘家询所领导，与对中央分局自我批评未能并为一谈。此种把戏，在尉士均、关向应同志回来以后。因尉的转变，将各种事实都揭露出来了。代表大会开始两天，反对夏曦空气非常浓厚，直至尉、关回来，事实揭穿，大会有一伟大的转变，夏曦同志的政治结论完全通过。现在监利、江陵两县均开过扩大会，都要求万涛彻底承认错误。这一斗争要深入下层去，要拿此来发动红军、苏维埃的工作，发动思想上的斗争。

潘家询在代表大会的谈话说：我们现在要波浪式的挺进。但要发展，须有钱，有粮，有人。我们须将红军拿到各地去帮助党的工作。当时，大会即指出：这是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对洪湖的悲观失望（因为正无钱、无粮、少人），与他提议将红军分散游击的主张暗相吻合，是右倾的路线。

潘家询在大会完全没有承认错误；万涛承认亦不彻底。在省委还要讨论他俩的问题。万涛现在专在军委工作。潘家询在省苏经济委员会工作。

党内问题，中央分局与省委联席会议接受中央指示决议。大会政治决议可以参考，其余材料陆续寄来。

湘鄂赣省委有文件来，我们已就近答复。现将他们的文件和我们的去信寄上，请中央再加以详细指示。中央可经过武长路与他们建立直接的交通关系较为方便。

湘鄂西中央分局

夏曦盘铭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中共湘鄂西省委报告——关于苏维埃工作*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土地问题

1. 苏区内平分土地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据不精确统计：汉阳有十分之六，监利有十分之二，江陵有十分之四，沔阳有十分之四，汉川有十分之五，潜江有十分之二，江南有十分之五没有平分，天门还只平分了两三乡，荆南还没开始。这一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水灾的影响，土地被水完全淹没，群众出外逃荒，确有不便平分之处，同时富农路线为之障碍，如天门群众迫切需要土地，而政府不去积极领导群众进行平分，汉川、汉阳仍然有隐藏富农土地的事，有些负责人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把土地调查清楚，不好平分，或者说现在群众不在家，把土地分给谁，群众没饭吃还要土地吗？特别是江陵、潜江已经做了两个月的统计调查工作，还不来领导群众平分。同时有些地方土地业已经过平分了，而得土地的群众还不知道土地的位置（如汉川），以及在水退出以后，党和苏维埃都未着重提出土地问题等错误。

2. 党和苏维埃已经认识了这一严重性，现已积极开始完成与发动平分土地的斗争，依据各地实际情形所决定的办法是：（1）在水灾区域按已退出土地和在家群众数量平分。（2）新苏区如群众组织力量还不能平时当先将豪绅地主土地没收分给红军和基本群众，富农土地亦在没收之列，尽可能没收富农土地，另分给富农坏的劳动份地，加紧彻底平分土地的宣传。（3）平分土地必须动员群众，使群众自<己>动手的起来干。（4）中农土地必须得到他的同意始能变更其土地。现在省苏已派了一批人到各地发动去了，有些地方已经在进行。

二、堤工问题

3. 水灾发生，各地的堤埝，无论江堤、襄堤、垸堤，都打坏得乱七八糟，小溃口不计其数，而主要溃口有江南之陕家垸堤和新厂江堤，有江陵之麻布拐江堤，有潜江之莲花寺江堤，有沔阳之东荆河襄堤和新堤到青[新]淮[滩]口的江堤，有监利之周码头蒋家塔和新堤到螺山的江堤，有汉川之同兴垸江堤，总计这些沿长江、沿襄河堤工修筑费共要二百五十万元。苏维埃曾经动员组织领导群众起来修筑这些堤工（只新堤到螺山，新堤到黄蓬山敌人在修），现在已修好十分之三的工程，在堤工经费上苏维埃发行三十多万水利借券（推销主要对象是白区商人富农），分缴县乡推作经费，同时在各级政府每月全部收入抽取十分之三×份，红×，并组织特务队到白区绑票筹经费，现时又特别着重鼓动群众自带伙食来修堤。在修堤的步骤与方法上，是首先集中力量完成江堤襄堤，垸堤采用大挽和×挽的办法，对于敌人占领区域的和赤白交界点的堤工，苏维埃则加紧动员群众特别是白区群众反抗国民党官厅鲸吞堤款，加紧白军士兵工作，为实行修堤而斗争。党及苏维埃各机关人员，采用礼拜六的方式实际参加修堤，对于敌人已在开工的堤工运动，则组织群众打入修堤，征[争]取与巩固苏维埃在修堤群众中的领导影响，有堤工运动中曾表现出一种不正确倾向，如悲<观>失望、依靠、推倭，等待，官僚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等，党和苏维埃还在与这些倾向作斗争。我们估计全部江堤、襄堤要到六月底才能完成。在堤工运动中苏维埃的影响确在群众中更巩固了，群众大都认识水灾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制成的，反革命之言修堤是欺骗的，只有苏维埃才真正领导群众修堤，为完成堤工而奋斗。

三、恢复生产与加紧春耕问题

4. 在生产方面，党和苏维埃曾用大的力量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实际解决了群众一部分困难，如在种子上，各地党和苏维埃能够部分的发给群众，有的县发百余石的，有的区发数十石的，有的乡发十余石的不等。在耕牛、耕具上，县和中心区苏都组织有农具制造厂，专门制造锄头犁〔犁〕耙等补救群众之不及（如监利、沔阳、江陵），在新发展区域内没收很多的牛交给群众了，如省苏发给各县的牛就有四百多条，同时发展了群众志愿的犁〔犁〕牛站的组织，在监利和沔阳较普遍，有些区域每一乡、每一村都有这种组织，其他各县部分也有这种组织。在群众生活方面，有部分的群众边湖一带的组织有渔业合作社，打菱果等，自然更进一步的反富农斗争中解决一部分群众饥荒，此外则随红军在发展区域进行没收工作，就渡过了去年各种饥荒时节，现在约计全湘鄂西种下的春收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估计这百分之六十的春收，如果能够保证，可够群众三个月吃，现在又还在加紧春耕运动，因为饥荒的延长，在种子、耕牛、耕具和资本方面，总感很大困难，而牛又因×症死得很多，更形<成>牛的缺乏，总计现在全苏区所差的牛还欠十分之六，还欠种子十分之七，还欠耕具十分之四。目前救济的办法是：（1）鼓动群众集股买种子，组织粮食合作社。（2）宣传灾民到白区从斗争中带回种子春耕。（3）多建立与扩大农具制造的组织与广泛的发展群众的犁牛站。（4）群众间举行友谊的借贷耕牛、耕具和种子。（5）爱护与保养耕牛，修理耕具。（6）广泛的组织群众的春耕互助队、代耕队和竞赛队，并成立生产委员会专门计划与领导春耕工作。（7）政府购买种子借贷或低价出售给群众。（8）没收富农多余的耕牛、耕具和种子。（9）鼓动群众学习乐于耕种工作。（10）责成红军的游击队要帮助群众解决耕牛、耕具、种子的困难而斗争。现在苏维埃还在从宣传上、理论上、组织上、斗争上动员群众。

四、反富斗争问题

5. 水灾发生后，党和苏维埃为了基本群众利益，曾决定了更进一步的反富斗争（其详已见过去报告），执行的结果，确解决了部分群众的生活，红军的给养，但因为党和苏维埃领导力的不够，有些区域形成不分阶级的乱闹，破坏中农联盟，走到消灭富农捆绑吊打逼死富农的事到处发现，因而影响中农的动摇，有的中农自动逃跑到外面去。有的中农逼得反水，因而在党内发生了不正确倾向，谓进一步反富农斗争策略的决定是不正确的，根本怀疑这一决定，而不了解这些错误的发生，决不是这一策略的不正确，而是因为党和苏维埃领导的不够之所致，党已经纠正了这种倾向，有些地方的反富斗争，失掉土地的中心内容，专门用现金和粮食（这自然是群众当时的需要），不没收富农土地，有的拿绑票的方式，代替了反富农斗争（如汉川、天门），过去苏维埃对这些错误倾向没有抓紧，没有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在领导责任上没严格的纠正过来，现在仍不免有这些现象，现在党和苏维埃关于阶级路线问题已有具体决议，详见党四代大会的决议，兹不另赘。

五、红军公田与租佃政策问题

6. 过去苏区每一乡都有二十至三十亩的红军公田，只是在决议上需要建立红军公田，以便分给非苏区的红色战士（包括拖枪的、俘虏和别地很远不能回家的战士），对于收获量的处置未详及讨论，现在苏维埃的决定是：（1）新苏区要建立红军公田。（2）调查非苏区红色战士有多少，红军公田有多少，实际平分每个战士。（3）收获量以十分之七发给战士寄回家用，十分之三交

苏维埃，系作战士退伍耕种土地时之耕种基金。（4）每块红军公田，均须插标书明这些公田是交给那几个非苏区的红色战士。现在已开始进行，并分配参加白军的士兵的土地（就是他人是苏区内的在参加白军），把他应分得的份地交给他家属。此外，关于租佃问题，党的扩大会和省苏土委会均有详细讨论，仿佛在当时把那租佃当着了解决群众的种作困难的主要办法，减低了群众和苏维埃对于筹办种作的积极性，现在我们已经纠正了这错误，指出租佃政策，决不是解决群众种作困难的中心问题。兹将省苏决议案寄来，请审查。

六、经济财政问题

7. 现在一般说来，苏维埃大部认定了经济财政工作的重要，都在统一财政节省开支这一策略上想实际办法，并有相当成绩。如省苏在两个月前，每月正确收入只一千五百元的海关税，现在积极的成立了十三个海关，每月增到一万五千元的收入，省县苏维埃都按月做工作计划与预算决算，但因水灾奇重，土地税不能征收，仍使财政陷入无法的境地。苏维埃财政开支唯一的靠柱，还是红军游击队军事胜利的没收与绑票打船等。汉川红军游击队过去每月每人是发十五元的生活费，现减低到七元，江、监、沔、潜各县和红三军以及伤病、残废战士都只按每月六元生活费标准吃饭，机关工作人员每月只有饭吃，再不另发零用，剃头、洗衣由公家请人共用。而各县每月还能解交一切现金到省府作用，但这统一财政节省开支的转变，还未深入到下层苏维埃中去，现在仍有些区乡苏维埃乱浮开支，各自为政的现象，如天门、汉川等县。

8. 合作社问题，在水灾前，全区有消费合作社约一百三十个以上，在水灾后，即减少到现在只九十多个了。其原因是水灾奇重和纸币塌台，这九十多个合作社的社员和社金数量还无统计。苏维埃在合作社工作上起了相当的领导作用，如将没收的货物部分交给群众合作社作基金，纠正专门上册，强迫摊收社金和政府工作人员把持等怪现象（当然不能肃清了这些现象），并发展了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如渔业、柴林、霖子等）共有四十多个，提高了群众对合作社的认识与信仰，解决了群众部分的生活，调剂了群众部分的物质痛苦（对于群众人社的基金的规定是中农五角，贫农三角，富农不准入社，入社以个人为单位），但这还不够，没有一致观念上认定合作社是组织群众的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抑制奸商，调剂群众物质痛苦的最主要的方式，没有用很大力量来领导与兴奋这一运动，还没有成为真正最广大群众的合作社运动。最近省苏召集一次全湘鄂西合作社社员大会，考究合作社的经验，讨论兴奋与发展的具体办法。

9. 苏区因为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清乡掳抢，水灾的影响，纸票的塌台，商业必然要形成现在凋零的现象，现在各大小市镇，没有大的商店（如布铺、杂货铺……），只是摆小摊子的，开茶馆的、卖灰面的、卖小菜的比较还普遍，还比较的多。群众和政府均形甚感受主要物质的恐慌，如盐、洋油、布匹，特别是粮食，因而苏区内的物价昂贵（米卖一串到一串二百钱一升，盐卖一串三、四百钱一斤），商人并且随时可以提高物价，苏维埃未曾设法来抑制，同时各地物价高低不一致，政府未注意统计工作。考究这些原因，对于保证中小商人自由营业的政策上未坚守，群众把商人货物斗争了，所谓向“富农斗争”，政府不仅[未]与这些“左”的倾向作斗争，甚至有些政府还领导群众来做侵犯商人营业自由的行为，特别是乱折商船，使白区商人怕拢赤区边，就更引起苏区不敢营业，有的停业，有的跑到白区去营业，更减

少了商人的中间作用，更形成了赤区的物质的恐慌，苏维埃组织有国家商店（省及各县政府都有这种商店），然而货物的主要来源都靠着没收，未加注意怎样从外面购买好多日常品进来调剂群众，因而很少起得抑制商人投机事业的效力。

10. 苏维埃所规定的税共有三种：土地税、营业税、海关税。土地税是按田亩的收获量与农民的阶层收税，以全年计算，分春秋两季缴纳。营业税分行商、坐商两种，坐商以货物与流通资本为标准，征收累进税；行商以流通资本与采办货物的总价征收统一的关税，出口入口均以三十元起码，征收百分之一，如只经过赤境的白区商人，而资本上五千元者，关税须根据累进税的营业税比例征收。为了使白区粮食源源运进赤区，免收粮食船的税，因为群众生活的饥荒，现已决定今年春季凡属是去年的水灾区域免收一届土地税，兹将三种税收比例表列下：

(一) 土地税

(二) 营业税

资本	税额比
50 — 200	2 %
205 — 300	2.5 %
300 — 400	3 %
400 — 500	3.5 %
500 — 600	4 %
600 — 800	4.5 %
800 — 1000	5 %
1000 — 2000	6.0 %
2000 — 4000	6.5 %
4000 — 5000	7 %
5000 — 8000	8 %
8000 — 10000	10 %

(三) 海关税

1、赤白区域输出税率：

种类	征收标准	税率
普通货物	价格在三十元以上	1 %
奢侈品	不论价格	50 %
粮食入		免税
油盐		减半

2、白区运到白区经过赤区的税率

(附注) 粮食油盐包括在普通货物之内

种类	征收标准	税率
普通货物	价格在三十元以上	1 %
同上	价格在五千元以上	累进营业税
奢侈品	不论价格	5 %

11. 关于银行问题，过去因省苏财政无源（各县同样）而开支又浩繁（红军给养、军事设备、救济被迫群众及各种开支），以致纸票的发行超过市面的需要，充满市场，农产品缺乏，群众拿着纸票买不出东西，所以在市面不能行使。现在省苏曾用很大力量收回了六十多万，准备在春收后逐渐设法完全收回，但银行曾在群众中已发生一些不好影响了，手里有纸票的群众说：苏维埃发了纸票又不收回，害了我们群众。对于工业，苏维埃还在提倡手工业的发展，如制盐、打榨、打芦席、打草鞋、烧窑、烧木炭、纺线、织布、修船、造农具等，有的县份已成立了小规模织袜、芦席、农具厂等工厂，省苏本身建立了一个实业工厂，专门打草鞋、芦席。

七、文化工作

12. 现在各地对文化工作比较注意，省、县苏维埃都建立有文化本身独立工作，并有工作计划，经常举行会议，讨论实际问题，俱乐部、识字班、读报班、演讲所、新剧团、工农夜校，以及列宁小校，各乡及中小区苏的地方，都有这种组织，但形成空洞机关，因水灾关系，实际来参加这些组织识字读书的群众较少。对于放足运动，确因群众要出门逃荒便于灰色，各地仍有缠足的现象，还有个别地方秘密烧钱纸，敬神接元帅公公烧香。各县均不定时的办有教师训练班，训练文化人才，省县编有工农读本一类的书籍，过去因无教本，势逼文化私塾采用三民主义的教本，甚至读孔孟诗书（这主要的是我们在群众中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好），文化工作固有相当的建立，但最大缺点是文化工作失掉了中心，对于群众中的政治鼓动做得很少，真正广大群众的识字运动，俱乐部的工作也没做到什么。

八、劳工委员会工作

13. 从过去到现在，苏维埃是取消劳工委员会的工作，把改善工人待遇、减时、加资等等工作，当着是工会的专有任务，未真正去实现劳动保护法。现在虽说省和县成立劳委组织，还是一块空招牌，没有工作。固然工人生活是比前改良了些，大半是苏维埃的命令，强制资产阶级执行，拿命令来代替工人的斗争，现在苏区工人每天工资一般的还只一串八百到二串四百钱，仍然个别发生雇主开除，辞退工人的事，苏维埃很少对于此事的过问，就是在苏维埃各种企业内的工人，如省苏之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实业工厂等也还没大部分的执行劳动保护法，企业的负责人还是站到简单裁汰冗员上面时常辞退工人。因水灾关系，政府经费困难，企业中的工资每月六元到十五元的数目，不过星期日休假完全执行了。工农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各县还没建立，省苏只是有这样几个兼差的委员，根本没有工作。

九、灾民工作

14. 湘鄂西的灾民计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数量，各地苏维埃未曾注意这一广大的群众工作，没有了解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灾民群众确是推动白区工作发展苏区的伟大力量，不去实际组织与领导并武装灾民出外，只坐到机关里面空叫些计划和不肯派忍苦耐劳的得力干部领导灾民，有些被派的干部，反而起反的作用，并有反革命组织从中进行反革命宣传，专门阴谋捣鬼（此事还未查觉），因而灾民群众在各地发生不分阶级的乱闹，损及基本群众利益，阻碍革命的发展，打骂捆送政府负责人，包围政府，与红军游击队冲突，到白区与当地群众对立仇视，互相厮杀，苏维埃对于这些错误现象，未曾力加纠正，作无情的斗争，大半是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虽省委省苏指出灾民工作的重要性，力求克服这些错误，各地转变仍然不够，仍然发生这些错误

现象，现在的办法详见省委对于灾民问题的决议。

十、苏维埃的改造

15. 各级苏维埃从开始平分土地起直到现在，均经过几次的改造，虽说驱逐了不少的富农、腐化官僚分子，吸引了很多的工农来参加政权，得到了成分上的改造，但是富农、腐化官僚分子仍然没有彻底肃清。参加苏维埃的中农成分很少，虽说工作方式上逐渐走向有计划集体指导的道路，但事务主义的精神仍然是一个总的现象，虽说工作是接近群众了些，但是脱离群众、命令群众的毛病仍然时常发现，一切转变还只停留在上层苏维埃，没有深入到乡苏维埃，并且一般的说来，苏维埃的改造不是斗争中的改造，而是一种和平主义的改造，现在要继续加紧改造运动，抓住平分土地、春耕、堤工这几个中心斗争任务来进行苏维埃的改造。

十一、党对苏维埃的领导

16. 党虽在苏维埃中成立有党团，可是党团好久不开一次会，如省苏过去三、四月不开党团会，甚至有不在苏维埃中成立党团的（如潜江县政府），党团好久不向党作工作报告，党也不检查党团工作，有什么事也不经过党团便直接命令苏维埃机关照办，同时苏维埃自己不建立独立工作，有事就找党解决，党也就替苏维埃包办下去，这种党包办命令与代替苏维埃工作的现象，确很普遍，苏维埃的委员大都是党员，非党群众很少，不派得力干部到苏维埃做工作，不注意苏维埃工作的指导，也是普遍的现象。

十二、苏维埃组织系统

17. 省苏维埃是经济、土地、财政、行政、劳动、文化、社会保养、工农监察、军事、裁判十个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推举十一人组织主席团，领导苏维埃的一切经常工作，此外成立政治保卫局，由主席团指定专人负责，专于惩办反革命，成立秘书处管理各委员会文件兼管统计工作，县苏则成立赤卫总队部（不成立军委），把劳动与工农监察合并为劳动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由七人至九人组织，其组织与省苏同。区苏则有行政、土地、经济财政、文化、人民法庭、赤卫大队部等组织，政治保卫工作则设一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乡苏则有行政、人民法庭、财政经济、土地、文化、赤卫中队部的组织，乡苏执委推选三人为主席团。自三次大会后，各级苏维埃都是根据这一组织系统组织的，现在省、县、区、乡又增加了一个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这样的组织系统是否适宜，请指示。

18. 省委最近对省苏党团工作讨论的总结

（1）省苏自三代大会后，在工作上确有相当进步：

第一，对堤工生产工作，尽了领导作用，能够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

第二，统一财政节省开支，引起了下层的重视，本身增加了财政正确来源，各县还能供给省府财政，在则政上确有转变。

第三，文化工作，在社会教育与国民教育上均有相当建立。

第四，工作日益接近实际，日益接近群众，在工作方式上走向有计划与集体指导的道路。

（2）在工作上的主要缺点：

第一，对生产工作做得不够，现在苏区内已有很多土地没有耕种。

第二，在水退出后，未严重提出平分土地的问题，未加紧领导新旧苏区实际进行平分土地的工作。第三，没有把合作社的工作当作苏维埃组织群众，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调剂群众物质痛苦的最主要方式，对合作社运动领导不

够。第四，各级苏维埃中，仍有阶级异己分子潜伏着，在工作上表现官僚命令主义的存在，没有继续加紧苏维埃改造运动。第五，对劳工委员会的工作取消观念。第六，苏维埃与群众的联系还不十分密切，仍未能成为群众中真正政权的中心。第七，在斗争中许多不分阶级的错误，违害了中农利益，苏维埃未与之作坚决斗争。第八，没有发展自我批评的精神，尤其没有发展群众对苏维埃的批评。第九，对灾民工作是忽视的，没有实际加强灾民中的领导，发动灾民到白区去参加斗争。第十，在省府本身的工作方式，还是陷于事务主义，未真正完全建立各部门的工作，所定的工作不能按时检查有些工作陷于敷衍状态。（3）省苏今后的工作任务：继续努力对堤工的领导，广泛的领导群众自带伙食来修堤。要努力去实际布置灾民工作，成立灾民斗争委员会和计划指导灾民工作。继续扩大生产运动，要切实想法来帮助群众，解决耕牛、耕具、种子等困难，加紧春耕工作。赶快领导群众起来分配新苏区的土地，完成老苏区的平分土地的任务，并派员到各地帮助与检查平分土地的土地[任务]。立即建立劳工委员会工作，切实实现劳动保护法。

建立工农监察院，真正发动群众对苏维埃的批评，举行工作上的严格检查，首先从省再加各县。加紧合作社运动的领导，沟通输入与输出，在最近要召集一次湘鄂西合作社代表大会。要实际加强对土地、文化、经济财政各部委员会工作领导，要建立统计工作。以最大力量转变机关主义、事务主义的工作方式，建立群众运动的方式，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脱离苏维埃的领导。培养与提拔下层积极的非党群众的工农干部，来省苏参加实际工作。（11）抓住现时政治任务来继续加紧改造苏维埃的运动。（12）加紧巡视工作，要了解下层实际情形，建立与下级工作亲密的关系，工作要深入到乡苏和群众中去。（13）加强工农日报的领导，建立各地工农通讯员和读报小组。（14）特别在工作中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肃清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吸引中农和非党群众来参加政权机关。

湘鄂西省委

二月二十五日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中央：

关于湘鄂西省工会的工作简单报告于下：

从立三路线转变到国际路线的当中，在去年七月举行了第二次全省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了一切重要决议，到现在来，全省工会的组织一般的都差不多前后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建立了监利、沔阳、江陵、潜江、汉川、汉阳、荆南、江南等中心县的工会组织（江南现在政权失守，工会组织差不多没有大的成绩）。这些地方工作，确实有了很大的转变。会员发展的数量，大概有以下的统计，共有两万零二百四十四名，其中干部有九百六十九个，青工占百分之二十，其中雇工要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个数目，还不是完全精确的，因为目前发展的苏区，未有报告来。现在正开始计划，以产业为原则组织工会。

工会在平分土地与反富农斗争中，确实取[起]了相当的领导作用，在贫农团中一般的建立了工人小组，平分土地的工作，在湘鄂西差不多大部分的都是完成了。提高了工人斗争的积极性，在斗争中提拔了不少的工人干部，同时也洗刷了不少的非工人以及异己分子。工人的生活，可说是相当的改善了，实行了工作八小时，星期休假，物质上从斗争中得到了部分的解决。然而在水灾中，十分之九的工人生活困难到了极点，可是工会在执行更进一步的反富农斗争，以及组织和领导灾民到新苏区和非苏区斗争的过程中，部分的解决了灾民生活的困难，同时领导灾民到白区斗争的当中，扩大了苏维埃的政治影响（我们也派了些工人干部到灾民中工作）。

关于白区城市工作，我们也派了工人干部到宜沙、武汉、岳州建立了工会的秘密组织（在宜昌建立了工会的组织，沙市成立了市工会），确实在工作上发生了亲密的联系，给了他们工作上的帮助，也培养了白区工作的少数干部，经过白区与鄂南苏区取得亲密的联系。也派了少数工人到白军中去工作，在改造苏维埃的运动中，工会派了好的工人干部参加政府工作（如省苏大会的改选，工人要占五分之三）。在改造红军中的阶级成分上，在最近三军发展的时期中，工会动员了二千三百七十二名到红军中去了（其中也有一部分较好的干部），确实在红军中取[起]了相当的领导作用，建立了反邓中夏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拥护红军工作上，工会领导广大工人群众经常不断的作了许多工作（如组织了拥红委员会、洗衣队、担架队、慰劳队、送鞋队，经常不断的送食品鞋袜钱给红军用），帮助政府实施了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分给了好的土地，存留有红军公田，并帮助耕种。关于保障红军给养的问题，工会鼓动工人斗争来的粮食现金以三分之二的保障红军的给养，同时动员了工人运输前方所没收的粮食物品到后方来，加强地方的武装工作，动员了广大工人群众加入工人赤卫队，尤其在目前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紧急任务之下，挑选了积极勇敢的工人组织挺进队。这一个组织，在湘鄂西说来，是有他特殊斗争历史的作用，发展了游击战争，特别是汉川、汉阳、沔阳在长江一带经常骚扰敌人。在恢复和扩大生产的问题上，动员了广大工人群众修筑堤工，帮助政府推销水利借券，组织生产竞赛队、代耕队，在水退了的地方已经部分的播种下去了，特别是目前开始动员了春耕运动与发动春收斗争，帮助消费合作社的工作，组织劳动生产协作社的章程草案。在苏维埃的

企业中，工会组织了革命竞赛与生产竞赛，订立了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在执行八小时工作中，提高了工人生产力与减低成本费。关于文化教育工作，出版了工会机关报，开办了工人训练班，相当的提高了一般工人政治水平。关于反帝工作，在许多地方都以工会的组织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尤其在目前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动员了广大群众的武装示威，一般的是提高了群众反帝的决心，党领导工会对于某一问题的发生，确实是很快的抓住了他的工作中心。

以上的这些工作，都是在执行国际与中央正确路线所得到不可否认的成绩。可是执行这些工作的当中，还表现了极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我何必须要指出，在工会组织的发展当中，有些地方还存在着登门造册编制的办法，委派式的命令主义，还没有建立真正民主生活，全省工人至今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尤其是对于失业工人的统计到现在还没有。富农路线的残余没有完全肃清，譬如平分土地与反富农斗争当中，侵犯中农，消灭富农，“左”右倾的表现，特别是在水灾当中，把中农当富农斗争。有些地方的斗争，工会没有取[起]到必须的领导作用，土地委员会没有工人参加，有明分暗不分的现象。有些地方工人虽得了土地还找不着他的土地的地方，同时有工人得到了土地没有注意解决耕牛、耕具、种子。在反富农老板的斗争当中有许多是自发的，工会没有去领导他。有些地方有了党和苏维埃的组织，没有工会的组织。在提拔干部的问题上还没做到必须程度，有些地方是形式的提拔干部，现在苏区蓬勃的发展当中，我们感受了干部绝大的恐慌。在上面所谈的实施，有些地方还没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星期休息（特别是军医院）的工作成绩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青工女工工作的忽视，特别是对女工，省总到现在还没有建立女工部的工作，全省女工有多少、我们还不能完全知道。同时表现青工与成工对立的现象，成工赶不上青工斗争积极性，没有注意到女工青工的劳动保护的实现。在水灾中虽然用了全部的力量来注意灾民与失业工人，同时关于保障红军给养与拥护工作，到现在来还没有做到必须的程度，有些地方惧怕失业工人，不去设法解决失业的问题，这都表现了对困难投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的观念。在水灾时期，差不多又重复了立三路线，尤其是下级党部在个别县分解散了县总工会，省总工会至县区工会范围缩小，差不多等于一个空谈机关。党没有动员全党来加强工会组织工作和工人政治教育的工作，没有保障工会独立组织的作用，保障苏维埃劳动保护法的实施，未有注意吸收非党的工人群众参加工会机关的工作，表现寒热症的作用，有时包办工会，有时不管，没有正确的建立工人与中农巩固的联系，没有加紧发展白区赤色工会的组织，我们对于工会的党团领导还不够，没有加紧督促党团工作，没有加紧对职工运动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在职工运动中反立三路线的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的斗争还作得非常不充分。各级党部（从省委到支部）对工会的各种组织还是弄不清楚，同时不了解工会是阶级的组织，把各种群众组织与工会组织一律看待。工会与政府的关系没有正确的建立起来。

总结以上的这些错误，在目前革命与反帝剧烈战争的时期，是绝对不容许的错误，我们必须根据以上的这些错误坚决的执行工作上的转变，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去肃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特别是打击目前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

这一报告当然免不了有许多不充分和缺点，因为党团书记不在家，同时是时间非常仓卒，希望中央接到这一报告，详细检阅并给以指示！

中共湘鄂西省委会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湘鄂西省总工会通告（总字第十五号）——关于召集省总第三次全体执
委会议问题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各级工会：

从省总二次全执会议以来，已得三个多月了。这个期间又经过了许多新的事变，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一、二、三次“围剿”的失败，又进行残酷的第四次“围剿”计划，不幸又遭受我英勇的工农红军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之下已部分的冲破了，苏维埃运动得到更巩固的向前发展。同时，目前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行动也日益紧张，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摆在湘鄂西工人阶级前面的责任是非常大的，因此决定在三月二十号召集第三次全执会议，要抓紧目前紧急中心政治任务给各种事变一个具体的回答。

三次全执会议主要的任务是很×目前政治形势决定今后更具体的方针，同时要检阅各级工会关于执行二次全执会议一切决议。各级工会要在大会以前，必须准备以下的具体任务工作。

1、各级工会关于省总所发下的失业工人运动《通告》上指示的具体任务，现在执行到了什么程度，把你们所准备的工作及今后工作的布置，同时关于省总以下所发下的关于各县工人组织状况调查表、工人生活状况调查表、干部调查表，希望你们努力的统计清楚，在三月十五号以前并寄来省总，以充实大会的内容，绝对不允许有再迟延的现象。

2、各级工会关于省总所发下的拥护红军胜利、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通告上所规定的各县动员工人群众参加红军的数目执行了多少？最好你们在大会前能动员一批工人群众去参加红军。同时各县要将参加红军的总数作一报告前来。

3、二次全执会议关于保障红军给养的决议，各县工会执行了些什么具体的工作？拥红工作、加强地方武装的工作怎样？执行省总紧急动员通告关于组织挺进队的工作有些什么成绩？游击队的领导、肃反工作做了些什么？希望你们在大会前[前]更加紧执行这些任务，这是目前执行巩固的向前发展的主要条件。4、各级工会关于建立为加强白区与瓦解白军的工作执行了些什么具体的工作？省总以前对各县指示要派人到白区中心城市建立赤色职工会的问题，现在是否完全执行了？如果没有，各县在大会以前必须完成，特别是汉川、汉阳、沔阳、江陵等处。并要经常的注意这一工作，是执行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主要工作。

5、已经完成平分土地的地方，工会应动员广大群众播种下去，要尽可能的帮助群众解决耕牛、耕具、种子问题，并要以极大决心去领导群众的春耕运动，且发动春收斗争。关于新苏区及现在恢复的苏区，如潜江、荆南、汉川、汉阳、天门等地，应<在>大会前努力完成平分土地的工作，同时各地堤工也必须努力完成。

6、关于各级青工部、女工部的工作，在二十号以前应切实整理与加强起来。要坚决与过去忽视青工、女工工作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加紧青工、女工的阶级教育，实现青工、女工的特殊劳动保护。

7、军械厂、军服厂、军医院等企业工会的工作，应切实整理与加强起来。关于提高生产率，减低成本费，提高劳动纪律，组织生产竞赛等工作得到什么成绩？实现劳动保护执行得怎样，在三次全执会以前，你们必须更加紧执

行这一工作，同时要作一详细报告前来。

8、各级工会对于反帝大同盟的领导怎样？是否都以工会组织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如果没有加入<的>地方，必须在大会前一律加入。

9、为了执行以上的工作，各级工会应首先发展无产阶级的自我批评，揭破自己的错误与缺点，彻底肃清机关中一切官僚腐化分子与委派式的命令主义。同时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如富农路线的残余，在目前困难中表现悲观失望的消极怠工），同时反对左倾，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不实际执行上级决议，只是敷衍了事，特别指出沔阳与江陵）。只有坚决的执行赤色职工国际与全总唯一正确的路线，才能使湘鄂西的工会成为思想一致的有战斗力的阶级组织，以完成目前的政治紧急任务。

注释

原文无时间，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鄂北（襄、枣、宜、钟）苏区及九军二十六师
工作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鄂北苏区在敌人第四次“围剿”当中受到部分的挫折，其主要原因不是阶级力量对比问题，不是鄂北苏区没有群众基础，而是由于党的领导经过长期的机会主义的统治，省委在敌人“围剿”中又犯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因而一次、二次的企图抛弃苏区根据地。

二、鄂北苏区的工农群众，用了很大的牺牲来为了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枣阳被屠杀就有千余人。二十六师的战士非常英勇，可是党的巩固，红军<的>巩固，苏维埃平分土地，组织群众的任务，没有达到实际的转变。举例来说，地主残余、富农分得了土地，二十六师以前没有几个党员，现在不过十分之一，是就一例。自去年十月中央指示讯到了以后，特委虽然开始国际路线转变，可是在这个时候，国际路线必然受着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如豪绅残余、富农）以及机会主义者的阻碍，而且在党内腐化怠工现象之下，掩盖着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党的领导却没有真正的去发动内部阶级斗争（工人的经济斗争，贫农、中农反富农的斗争）和党内的反机会主义斗争，这是一切决议变成纸上空谈的主要原因。

三、当敌人第四次“围剿”开始以后，省委用尽一切力量去对付，这是百分之百对的。可是在当时没有坚持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而走到孤注一掷的拼命的情绪。实际上就是不相信自己的群众力量以及用尽一切力量去发展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是认为没有群众基础，阶级力量对比，敌人过强，因此就发生抛弃根据地的观念。当时将一杆枪都集中向非苏区，游击队的可耻的逃跑，并不单是过分估计敌人，而是由于不相信群众力量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而且就是敌情真有那样严重，绝对不应该将武器集中起来。省委二月紧急会议，没有能彻底了解自己的错误，实际还是有悲观失望的情绪，因此最近又有重复逃跑主义的企图。中央分局坚决反对曲解保存实力实际解除鄂北群众的武装，客观上向反革命投降的抛弃群众抛弃根据地的办法，即是把二十六师分散游击的处置，亦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这样，就没有集中力量的突击部队，没有法子可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而有将红军瓦解的危险。

四、现在敌人对鄂北苏区是采取积极进攻的形势，鄂北苏区的党和每一个党员以及红二十六师目前的责任，就是要用尽一切力量发动广大群众击破敌人的“围剿”，以巩固鄂北苏区，这完全是可能的。首先须在党内、红军内揭露过去的错误，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反对机会主义的逃跑和分散，肃清自己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以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与敌人作艰苦长期斗争。

五、目前一切策略的中心，就是要以发动群众的原则组织群众的各种斗争，切实执行苏维埃的土地、经济及一切政纲，深入土地革命，真正的在斗争之中去建立工会、贫农团、青年团，改造苏维埃，改造党，揭发过去的一切错误，组织群众广泛的游击战争。除原有的游击队应充分积极化外，应组织××夜袭队、挺进队、少年突击队等等去反抗敌人的进攻。在这一斗争中，大大的吸收工人、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入党。

六、二十六师应该集中自己的部队去领导广泛的游击战争，选择敌人的弱点，去争取××及小的军事胜利，绝对不容许脱离根据地和分散游击，以

及倚赖三、四军。因为十六师的任务，目前是巩固苏区，打击敌人，而不是向前发展。现在在部队中的政治工作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应该积极[活跃]部队政治情绪和大量的吸收党团员。

七、为了执行这些紧急的任务，党内必须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很坚决的反对悲观失望、逃跑主义以及冒险拼命的左倾空谈。省委应该积极纠正自己的错误，领导这一斗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不仅在理论上，必须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纠正一切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来推动实际工作。要把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绝对反对将党内斗争恶化为上层的个人中的争论，以及天天争论以×的问题，而妨碍今天、明天的紧急任务。因为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失败情绪的反映。

八、兹派 同志代表中央分局传达这个决议以及关于军事上的指示、并指定 同志以后为省委常委之一。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给中央的信*——许光达同志简历及医病介绍信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中央：

许光达同志，曾任三军八师师长，在中夏上山逃跑时，他带八师攻藕池回苏区，未下，又回五鹤转鄂西北，三军回洪湖，又任九师二十五团团长，他曾做过反中夏路线的斗争，应城之役受伤甚重，弹未出，特来诊治，希接洽。伤愈，并望给以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随派回三军工作。

湘鄂西省委

二月二十九日兹派刘鳌同志送许光达同志前来诊伤，希接洽。如有文件和人员可交伊带转。

湘鄂西省委

二月二十九日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给荆南县委信
(一九三二年三月)

省委听了戈夫同志报告以后，在目前党的一般的任务下面对荆南工作有以下的指示：

1.荆南苏区内各以全力执行平分土地的任务，以此为中心来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提高群众的积极性，改造党和苏维埃。然而这一严重任务，过去是被你们忽视了，所以一直到现在苏区土地平分完荆河口一乡，大部分的地方还未积极动手，现在应毫不迟缓的进行这一工作，立即发动群众以乡为单位，组织平分土地代表会，很快的来完全[成]平分土地的工作，这种一定要反对藉口调查登记或等待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来延缓平分土地的执行。同时在平分土地的时候，一定要估计到中农利益，不得中农同意不能随便变更他们的土地。同时应积极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土地（给与他坏的土地）分给基本群众，继续进行平分土地（可用补分办法）。

修筑堤防[防]与春耕运动是目前主要工作之一，你们对于这些工作，同样也是忽视的，各处的溃口须动员群众去修筑起来。种手[子]、耕牛、耕具等主要的要动员群众准备，同时苏维埃也要准备一部<分>种子，供给群众的借贷。

2.荆南苏区发展的方向主要的是向北发展，……潜江之蚌辟[湖]区及江陵之几区九乡则归荆南指挥，荆南各特全部苏区划分为么口、蚌湖、蝴蝶、新城、脉旺五区，荆南的重心，应放心[在]脉旺咀，县委所在地应设此，以便更灵活的指导各地工作。

3.荆南的群众工作是做得非常不够的，必须把雇农工会、贫农团完全组织起来，同时要在政治上举行大的动员，号召群众加入反帝大同盟、苏联之友社、互济会、农民代表会等各种革命组织。特别是工会工作，要加紧去作，要领导工人，要领导群众日常的斗争联得[系]生活状况的改善，使工人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下与以前完全不同，保障劳动法的实现，是苏区党绝不应忽视的任务，反帝运动的工作要成为目前主要工作之一

4.荆南的武装组织，当然应当加强。省委已委托革命军事委员会解决，但是你们不应专特[持]此一部分新式武装，必须把广大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建立赤卫军、守备队、少先队等工作，要以此为主要力量，来保苏区的巩固和发展。这绝不是说游击队不重要了，相反的，游击队的工作要很好的去整理，加强其政治教育工作，使其行动积极化，以与广大群众中的旧式武装的力量配合起来。关于这一问题，军委将有新的决定和指示。

5.灾民工作，荆南同样也很重要。你们对此是消极的。没有很好的把他们领导到白区去，而还是采用在内部反富农斗争来解决，当然在新苏区内反富农斗争，没收甚[其]多余的粮食是对的，但执行的结果，往往侵犯于中农和走到消灭富农的倾向，形成赤白区群众对立的严重现象，惟其如此也就忽视了组织他们到白区去发动斗争的主要工作。现时后方灾民停留在荆南的，须设法把他们领导出去的方法，应以当地实际情形来决定，不能大批武装出去，分为零星的小组织出去，在某地再集合起来斗争，也是对的。荆南的灾民，同样要动员一批继续出去。

6.对于土匪的问题，你们是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土匪营长军中山之逃走不是偶然的，而是你们不以土地革命的影响去夺取土匪群众，幻想以土匪

首领去号召土匪群众的机会主义的结果。你们这种对土匪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只有帮助土匪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及永远的存在，只有模糊群众对苏维埃的认识，只有减少群众争斗的勇气。荆南的群众是非常痛恨土匪的，你们要<把>群众恨土匪的情绪转变到集中恨土匪首领上去，减少他们恨土匪群众的情绪，你们现在除要以土地革命的影响去影响土匪外，更应领导群众坚决的向有组织的土匪进攻，打日本土匪的组织，解决土匪的武装，在长江一带的土匪要很快用宣传工作和军事力量，很快于[予]以消灭。在荆南一定要严重注意反改组派的工作，寿家市、浩口等地向来是改组派活动的区域，他们事实上是土匪的组织者，应当在群众面前提出改组派的罪恶，造成群众反改组派运动。

7. 你们对于群众，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的迫切任务，是不相信群众会革命的具体表现，自然仿[防]止土匪混入红军中是应注意的，但省委决不相信荆南群众都是“土匪”完全没有好的群众，你们必须马上纠正这一不正确的观念，在反抗敌人新的“围剿”，保障土地革命利益下，动员他们（真正劳苦群众）到红军中去。

8. 对于沙洋、桥后、县城、荆沙等地驻防的白军，须派人打入进去工作。这是敌人“围剿”苏区主要的方面，白军工作进行成绩怎样有决定胜负的直接作用，但我们要纠正过去普遍的错误，就是偏于经济收买，如拖枪来的洋若干，忽略了在政治上去夺取白军士兵。你们并把省委最近散发对白军的口号，具体去运用。在白军中的工作，不要专注意零星的拖枪，要建立党的反革命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发动他们的日常斗争，引导大规模的兵变兵暴，以现时各个部队士兵的动摇，这一工作是比较积极的。

9. 经济财政的建立，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现时还是靠拉票的办法，这一办法是绝对不能解决目前苏维埃经济困难及群众生活问题的，当然省委并不是反对到白区去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但一定要建立正确的经济政策，实行财政统一，如开支的各[节]省、沟通赤区商业的流通、发展群众的合作社运动，主要的是普遍的建立种种消费合作社的组织。

10. 为要执行这些严重任务，使着荆南苏区能得到巩固向外发展，加强党的领导是非常必要的。省委认为荆南县委应该马上建立起来，决定……九人为临时县委，并决定派应彩同志<任>书记，梅继尧同志为宣传，谭戈夫同志为组织，即以三同志组织常委会，团书记还有一人是谁？忘记了。你们应即召集扩大会议，讨论四大会决议，传达四代会精神，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成立临时县委，同时加紧县代表会的准备工作，建立健全县苏维埃，以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你们应注意当地干部的培养，勇敢提拔积极分子，参加各种工作，在工作中来培养他们，不要把干部长期停留在外面去的干部身上，更不应专靠省委派干部去工作。

省委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此处似有误，应力“白军中的士兵委员会”。

中共湘鄂西省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关于全省四次代表大会情形、省委名单及分工、几个中心工作
(一九三二年三月)

中央：我们最近工作紧张，不及作详细报告，兹将最近工作简单报告如下：省委工作一、代表大会的情形：（一）到会代表一百二十七人，各种比例列下：成份：工人、雇农五十八——千分之四十七，贫农四十九——千分之三十七，中农十四——千分之十一，小商二——千分之二，富农一——千分之一，小地主二——千分之二。党龄：四年以上者十三——百分之十一，二年以上者二十四——百分之二十，六月至二年者六十八——百分之五十六（六月至二年者多新干部）。不满六月者十六——百分之十二（多新苏区的）。程度：县市委二十——百分之十四，区委、团委六十——百分之五十，支部三十一——百分之十，其他十二——百分之十（组长及未领导负责者）。地方：苏区百分之五十六，军事企业百分之五，白区百分之七，失败区百分之十七，红军百分之十五。主席团：杨光华（工），杨成林（工），万涛（地主），崔奇（贫农），方国生（工），朱明英（中农），贺龙（红军），夏曦（地主），温荣亲（中农）。（二）大会中共有四个决议：1. 政治问题，附由三代会到四代会的报告。2. 组织问题，附少共工作，妇女工作，宣传工作。3. 职工运动。4. 国民经济问题（内容，各种决议正在修改付印，先将政治决议寄来，其余印出陆续送来，兹不赘）。大会于二十二日开幕典礼，下午由夏曦同志作政治报告（共六小时）。在讨论时因同志中有反夏曦情绪，加以派别分子潘克鲁从中活动，将政治问题的中心完全集中于夏曦同志的退却路线上，要夏同志完全承认退却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闹了二天没有闹清楚。关于正确的政治问题及目前中心工作发言者很少。讨论了三天，休息了一天，第五天才做结论。国民经济问题报告讨论一天。组织问题、职工问题及选举闭幕共二天。共开了九天，代表中发言程度较低。

（三）关于执行两条战线斗争的经过内容及结论，大会开幕在夏曦同志作政治报告后，讨论时因部分同志反夏曦同志的情绪，加之潘家洵派别分子的从中活动，将政治问题中心完全集中到夏曦同志是主张“退却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点上，要夏西同志承认这一错误。在认为关于“退却路线”只是有过同志的提议要将红军拖到以鄂北为后方，夏西同志反对了这一意见，另有以原有苏区为根据地，向京山皂市一带发展的正确主张，夏西同志的错误在于未能当面指出这种提议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以当面抓紧这一问题给同志的实际教育，并教育全党，这是夏西同志的主要的政治错误。夏同志被他们诬蔑为调和派，受到严重的攻击，政治问题讨论的三天中完全在闹这些问题。全场空气，代表中受他们影响很大，因此闹得不清场，但夏曦同志又被诬蔑为调和派的同志仍坚持原来意见。第四天上午准备做结论，恰好关同志及魏[尉]士筠同志已到会场，当由魏士筠同志对主席团将到中央经过情形做一简单通知，并向大会作通知，及关同志作一补充政治报告，即宣布停止会议。当晚由夏、关二同志召集万涛、光华、崔奇分头个别谈话，指出反中央分局及派别分子潘家洵企图从中活动，提醒了光华、崔奇二同志，并指出了一些材料，万涛同志完全未表示态度。次日上午，由中央分局关、夏、宋、贺四同志召集主席团及旧常委光华、崔奇、马武、杨成林、温荣亲、彭之玉各同志开会，揭发了万涛及潘家洵的错误，省委部分

同志的错误及扩大会内容的个别错误，万涛同志首先不肯承认，经许多同志执行自我批评的精神揭发后，他才部分承认并用许多支吾遮掩的方法，对自己的错误未能完全承认。这次开了一天，次晨召集全体旧省委及全体主席团及各地总代表开一会议，关于同志中进行反中央分局斗争问题及同志中的错误，由夏西同志在会议中作一通知，到会同志大部分了解这一内容，而万涛同志在这次会议中的报告，承认错误的程度很不够，在这次会议中又重新指出万涛同志的态度的错误，继续进行大会，先由光华、崔奇、之玉、士箱等同志说话，向大会报告这一斗争内容及揭发反中央分局的错误，万涛同志在大会报告他自己的错误，在他报告的内容中并未提及潘家询错误的一字，当时有一部分同志声明自己的错误，而潘家询同志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企图在大会上反攻，谩骂这般自动承认错误的同志是卑鄙、诬害，用些方法来企图掩饰他的错误，表面上承认中央分局的路线的正确的，同时底下又说：“平分土地”及许多工作成绩，夏喷同志是犹豫不决的，某些工作是潘家询及地方干部斗争的结果。就是说：“这些成绩不是夏西所领导的成绩，是潘家询及个别同志的成绩”。“潘家询及个别同志是执行国际路线的，夏西是对国际路线动摇。”这种变象的侧面攻击的反党的办法，潘家询在大会上采用了。恰恰他在后面向大会提出了“波浪势〔式〕的推进”的机会主义的纲领，此时在大会中完全揭破了潘家询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与反党的阴谋。而冬筱同志不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揭出潘家询的具体错误，却对潘家询一字不提，用更巧妙的方法替他遮掩，说自动承认错误的同志是“不坚定，动摇，非布尔什维克”，“昨天东说，今天西说，自己没有主脑，”拿这些话来企图模糊代表的脑筋，取得代表对她发言的同情，一方面说她自己承认中央分局的路线是一般的正确，她是“反对说夏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用两面派的手段来掩饰潘家询一贯的反党的错误。这种企图，两面派的手段，遭受了大会的严重打击和揭露。这一斗争，使同志们更加了解，这是开展了湘鄂西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机会主义的破产，是国际路线的巩固。（四）结论：看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及中央分局 在大会产生了新省委，名单是首先由主席团与中央分局预定了的，提在大会通过，新省委名单，列表如下：正式委员：黄友楷雇农县委书记三年以上

李家芬雇农省总委员长一年多

杨成林雇农原任省委委员三年半

方国生雇农江南县委书记三年

许少卿工人省总组织科长

杨光华工人原任省委组织部长五年

周美同工人团省委组织部长团籍三年党籍一

月

朱学卿店员省府委员（现团省常委）团龄一年多

党龄半年

杨炎工人湘鄂边

刘腊喜贫农江南县委组织科长四年

崔琪贫农省府主席四年多

周小康湘鄂边特书八年段德昌九师师长八年彭之玉富农省府主席团〔成员〕之一六年万涛地主原任省委委员九年孙子侑小商江南县委组织科长五年多夏西十二年贺龙三军军长九年冯纯贫农沔委两年多候补委员：胡景堂苦力

工人沙市市委书记一年多张家华苦力工人酒委书记一年多童昌中酒团县委书记张宗理宜昌特委书记六年蓝育材中农江南县委之一四年张孝桂贫农监利县委之一三年监委：刘革非地主九年马武贫农省府主席之一四年鲁易九年陈培荫六年侯蔚文富农县委书记六年赵治东红军六年黄秋松六年王国祥雇农县苏维埃主席三年蔡玉昆六年二、一月二十九号省委举行第一次全体执委会议分工：以杨光华、杨成林、万涛、崔琪、少共书记王同志组织常委，并决定光华同志为书记，万涛为宣传部长，成林为组织部长，革非、马武、鲁易、培荫、蔚文、治东、秋松、国祥、玉昆九同志为监委，马武为政治保卫局局长，孝桂为妇委书记。其余同志仍担任红军中及分配地方工作。三、一省全会到现在几个中心工作：（一）大会开幕后正当着沙市之敌从郝普、荆南夹出[击]，进占我江陵潜江之苏区襄河南北岸，岳口、潜江、汉川等处之敌同时向监利江陵边进占我老新口（距省委所在地仅三十里），监城之敌亦跃跃欲动与江陵之敌取连系，那时郭勋及 汉部已动员约共六团兵力向我苏区进攻。在举行大会时，我们曾估计到这一形势，已令九师往潜江出天门攻应城皂市之敌胜利了。七师攻汉阳之黄林[陵]矶、侏儒山等处，已各个击破了两面的敌人。迫敌人占领老新口之时，九师回师攻下张截港并占领潜江，九师回师天门，敌人因受到我九师在后方之扰乱，敌人大部分兵力已向岳口及沙市方面撤退。九师占领张截港时，七师已回师到江陵，将进占江陵苏区之敌驱逐向沙市溃退。这一个时期的战争，计获步枪在三千以上，机关枪数十架，此时战士和群众非常兴奋，这一战争才结束。二十五师（房县的许光达部）回到荆潜，我三军又与敌相持于张截港与岳口之中间，又消灭敌部两营之兵力。因到襄枣宜接防不着之 部后三日中途折回驰援，故我方暂放弃张截港，九师仍绕到天门行动，现潜江仍在我们手中。这次战争的结束，可谓击破了敌人四次“围剿”的第一步计划。在这次战争中，我们认为加强了红军的武装，已经编成了第八师，提高了指挥员和战士的勇气，巩固了江监苏区，恢复了荆南、潜江苏区，创造了天门、应云孝部分的苏区，解决了一部分灾民粮食及种子，这完全是在中央新的指示下，中央分局指示，四大会精神，反右倾机会主义、保守主义，集中红军力量打击敌人，纠正对军事行动犹豫错误所得的胜利。

但我们在全党在干部中在红军中已指出，这仅是击破了敌人第一步计划，四次“围剿”的危险正在增长，反对因部分胜利而抱乐观的倾向。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深刻的承认：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动员，还做得非常不够，如汉阳发出乐观情绪，认为这样的环境没有问题，他们忽视灾民斗争，汉川县委于九师进攻应城之敌胜利经过许久才知道，并没有动员广大群众，潜江敌人退却，群众随着敌人跑了许多，省委关于冲破国民党四次“围剿”，做成广大群众运动，对地方党部的指导迟缓。二十五师这次回来，在荆南休息整理了几天，致没有增长九师第二次攻克张截港之敌，亦足重复了过去三军回来时候的错误，我们正在与这些错误作斗争。

（二）在敌人进行四次“围剿”的第一步计划时，省委为拥护红军胜利，继续击破第四次“围剿”发启[起]广大的群众运动，作了如下的决议：

1. 各级党部、红军政治部进行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发宣传品、画报、演剧等），县区召集积极分子会议，以户为单位召集群众大会。

2. 党内外动员征求八千人参加红军（二月到三月三十日），少共组织一个少年模范团，组织征调一批干部到红军中工作。

3. 各县各团体以快邮代电及动员群众与红军开联欢大会及以物质去慰劳红军将士。

4. 广大的作优待红军家属运动，替红军种田，红军家属没有饭吃，动员到占领区域征发粮食，替红军（家属）写信给三军，组织红军家属会议。

5. 红军各游击队，召集战士大会宣传鼓动（根据中央分局等冲破四次“围剿”的训令）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6. 在红军中调查没有分得土地的红色军人，分配他们的土地，由省苏土委与红军政治部定出具体办法。

7. 向敌部士兵中作广大宣传煽动（以白军士兵和红军联合反对国民党出卖东三省，“参加红军分得土地”等各中心口号），利用孙连仲部兵变作宣传鼓动，在每个组织中讨论实际进行白军士兵中工作，由军委政治部有专门计划。

8. 加进群众中的挺进队的组织，配合红军作战，加紧完成各要隘的守备工作，防止敌人混入，强健保卫局工作。

9. 加紧肃清潜江、天门等县内部反革命，巩固潜江、荆南政权、天门一部分政权，调二百个干部去进行这些新苏区的工作。

10. 在敌人占领区域，要加紧秘密活动和骚动的工作。

11. 红军、省苏及各地游击队要加紧没收工作，保证红军三个月以上的给养。

（这个决议是中央分局与省委共同发出的）

我们尚未详细检阅这一决议，大致已执行了一部分，动员了约一千人参加红军，少年模范团正在成立，约有一月的给养，征调三十个干部，军委办一政治工作干部速成班，各地以[已]召集了群众大会及以快邮代电慰劳三军，散发了一大批宣传品，军委政治部训练了俘虏兵四百多名，打回了一大部分，各地要隘已建筑工作[事]，但尚不坚强，动员了一百多个下层干部到潜江、荆南、天门云孝应工作，并且组织了一省委代表团临时指挥潜江、荆南等地工作，襄河两岸组织已重新划定等（详组织报告），我们正努力继续完成这一决议。

（三）关于反帝斗争。反帝工作省委二十一日讨论了中央的决议，其结论是，过去对反帝工作：

1. 认为苏区没有反帝的必要，白区同样取消了这一工作（如宜昌特委认为群众落后，反帝运动无法发启[起]等），把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和他不拉起来，这是在反帝运动中党的严重右倾。

2. 虽然苏区有组织，犯了机关主义的错误，没有群众中间下层的工作。我们决定并实际的执行：健全省反帝大同盟党团，建立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出反帝旬刊各种小册子），健全下层组织，建立白区城市（如宜沙。武汉等地的组织），教育红军战士，并要与各种斗争联系，我们已经动员苏区各地党部于二月十八号到二十五号举行武装示威运动，并与拥护红军胜利冲破四次“围剿”联系，这一工作，尚有决议及检查反帝工作的总结，下次寄来。

（四）失业灾民斗争。过去对这一工作是忽视的，特别是失业斗争未曾提及过。对灾民斗争没有到白区去发动，苏区所组织出过[去]的灾民亦没有得力干部，或者只站在解决吃饭问题去领导，或者只要灾民到白区去，没有号召灾民为要吃饭要建立白区工作到白区去，特别是灾民在新苏区内侵犯基本群众利益的错误更严重，引起当地群众极端不满。现分出几个方面组织灾

民到白区去，武装灾民到京山、天门、荆门等地去，派出几十个干部去进行这一工作，发动分粮反屠杀的斗争等，苏区失业运动的中心，联系到解决灾民问题。对工人提出的口号是要失业工人领导灾民斗争，号召他们去参加红军，失业问题目前靠苏维埃解决不是主要办法，自然苏维埃要保障劳动法之实行，在土地未分完的地方要尽可能分给失业工人，要把“二五”的事件传到白军中去，使失业斗争与士兵斗争联系，我们已去布置。在“二五”以前要发许多传单到武汉去，派出一批干部到武汉、沙市、应城盐井中去组织失业灾民斗争，组织失业灾民斗争委员会，于各级苏维埃之下去领导这一工作，在“二五”那一天各地举行武装示威运动，并与冲破四次“围剿”的任务联系。

（五）中央关于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省委会议上讨论了，完全同意于中央的分析与指出的目前的任务。根据湘鄂西情形成立接受决议，另参看决议内容。

（六）关于省苏“三八”工作，最近均有专门讨论，望参看专门报告，兹不详。

（七）省委认为湘鄂边、宜昌等特区工作还是很少转变，房县鄂北工作特别没有转变，最近对这些地方的工作已有一次讨论，除指示外，并派魏士筠同志到鄂北工作，陈沉同志（原系汉川县委书记）到房边苏区工作，派张坤弟同志到宜昌特委担任书记，并确定胡灿同志在宜昌特委工作（原系省总派去的巡视），要派宗理同志到省委谈话，但派到湘鄂边苏区的人尚未决定，鄂南工作正要下层干部，我们亦准备派一百个去帮助。（八）省委为培养干部，已准备开办三个月较完善的党校，到县委区委中征调六十个干部，苏维埃工作干部六十个，团的七十个受训练，健全宣传部和党报委员会，《红旗旬刊》改为周刊并改善其内容。（九）各县召集了扩大会议，部分的吸引了积极干部加入县委工作，并讨论大会决议，省委已分别派人去传达大会精神，在本月内各县扩大会可举行完毕。关于省苏工作、宣传、组织、妇运工作均有讨论，内容可参考这些报告，省总、少共省委工作，可参看省总、少共报告。望中央审查指示！

鄂湘西省委注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原文如此。 崔奇即崔琪，下同。 夏牺、夏西即夏曦，下同。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加紧春耕修堤与完成平分土地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三月)

省委审查了省府党团关于春耕修堤与平分土地的决议以后，有以下的决议：

(一) 我们过去的修堤的方式与经费，除江、潜、沔能动员以数百群众自备伙食修堤外，由苏维埃筹款与委任堤工委员会雇佣群众修筑这是错误的。必须切实领导苏维埃、少共、工会派选大批得力干部深入下层作广大的动员，利用群众修堤情绪的高涨，鼓动他们更积极化的为保障春收秋收而自备伙食做堤，但是苏维埃绝不能因此而对于堤工经费的寻找与修堤的领导有丝毫的放松与消极，相反的，更须加紧这些工作，为迅速完成堤工而奋斗。×××××的生活困难，不能长期自备伙食做堤，如运用轮流换班的方法执行之。这里必须坚决反对不深入群众的官僚主义与向困难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

(二) 敌人占领区域及赤白交界的堤工，党和苏维埃必须从政治上组织上动员一切力量，以“反对国民党水利局侵吞堤款”、“反对国民党延误堤工”等等行动口号，把某堤工周围的群众组织起来，(向)国民党的水利局及行政机关来进行有组织力量的示威运动，要挟他们即日开工，提出各种条件(如从某处到某处的堤工限定日期完成，反对勒逼群众买良民证做堤等)，这里要反对过去以外交方式，不动员群众的组织与领导，在修堤过程中要领导他们继续不断的作各种斗争(如增加人数，反对各种虐待……)，并须充分准备敌人退却后的我们接替修筑与鼓动群众自备伙食自动修堤的工作。

(三) 要立即加紧春耕的宣传与动员，各级党部要运用白区党的组织路线，各级苏维埃要积极的领导与帮助群众从各方面来解决种子问题，广泛的组织代耕队及犁牛站，从各方面来保养耕牛，与群众解决或减少耕牛的困难，经党召集基本农民群众讨论春耕问题的具体办法。

(四) 在击破敌人新的“围剿”的任务，扩大红军与加紧春耕、修堤与完成平分土地，是同等的异常紧迫的任务，而迅速的完成平分土地，是春耕修堤的先决条件，因为延缓土地的平分，可以减低群众对于春耕与修堤的积极性，要坚决反对过去藉口群众不在家，与等候调查工作的完成，以延缓土地平分的各种不同方式的富农路线的残余，以及不动员群众专靠党和苏维埃去做调查工作的官僚主义。

(五) 巩固与中农的联盟，是党对农民问题的永远坚守的政策，各级苏维埃必须切实加紧对于贫农团的领导，以团结中农，在平分土地对不得中农同意，不得变更中农的土地，各级苏维埃必须吸收中农参加，并须从积极的方面来帮助中农发展，省府要立即督促个别经济，各级苏维埃进行对于中农参加各级苏维埃人数的调查统计工作。

(六) 红军公田是瓦解白军，提高红色战士积极性的有力武器，省委要批评省军委政治部对于这一工作的忽视。

现在要立即在红军游击队中进行对于外籍来的、拖枪来的、俘虏来的、红色战士的数量，并把省苏维埃对于红军公田的通令，拿到红军中、游击队中去讨论与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同时省府要督促各级苏维埃迅速调查红军公田的数量与动员群众耕种红军公田。

(七) 在执行这些的紧迫任务中，必须彻底肃清过去的官僚主义、命令

主义的工作方式，要派大批的得力干部深入到下层去有计划的有准备的，如召集党内党外的各种会议，召集广大的群众选举堤工代表会议，由他们选举其平日所爱戴的工农领袖，来担任堤工委员会的工作。要积极推选与训练大批宣传鼓动员，在口头上对于春耕、修堤与平分土地有力的宣传，要改变以前一切依旧的命令式的宣传鼓动方式，一刻也不放松来领导群众与帮助群众解决耕牛、种子的困难，苏维埃必须从困难中来集中大批的现金到各方去采办种子。要有较短期间的具体工作计划，要按期的严格的执行工作的检阅，要切实的组织革命竞赛。《工农日报》及各县苏维埃机关报及壁报等应随时登载关于修堤、春耕及平分土地的过程的速度与成绩，无情揭发在执行这些工作中的许多错误与缺点。要加紧开展反两条战线的斗争，并把这种斗争围绕在实际工作中，来反对一切悲观失望，对目前革命形势估计不足，不信任群众力量以及均贫主义，不切实了解与执行巩固与中农的联盟的政策，消灭富农与各种乐观情绪的右倾、“左”倾机会主义，同时必须反对各种不同方式的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中共湘鄂西省委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对土匪策略问题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

一、中国土匪非常之多，因此土匪问题，是土地革命中所常××到的问题。

二、土匪的来源，是因为失业的广大的工农流为土匪。军阀豪（绅）又去利用土匪压迫剥削劳苦群众。

三、反动阶级对于土匪的观点，是利用他们来压迫民众，利用他们来进攻苏维埃。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用站在阶级的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帮助土匪中的失业工农群众在土地革命中谋解放，积极号召他们来参加土地革命，分配以土地。因此，共产党绝对反对屠杀土匪群众的办法以及与土匪对立的办法。同时认为土匪中之领袖，大部分是地主豪绅小资产阶级，一般的说，这部分人是反对革命的，应该以反革命看待。但是如果他解散其部队，完全缴枪（但这种事实是很少很少的），则苏维埃并不杀他，可以任其另外谋生，但在苏区无公民权。

四、党应该看到，反动统治利用土匪进攻革命之事实，因之党必须做瓦解土匪的工作。这种工作主要方针是分配土地给土匪群众，解除他们的武装，号召他们缴枪，杀死反动的领袖，可以同做士兵运动一样去在土匪群众中工作。在红军行动区域，必须坚决肃清土匪，解除他们的武装，绝对反对收编土匪，保存其武装组织，上层拉拢等等军阀式的办法。×××反对名为收编，实则准备来战他们的阴谋方法，那对上匪首领亦不可以如此，因为共产党素来是反对阴谋的。

五、土匪在红军胜利之下，每每要求收编为地方××队，这×××是土匪企图保存其武装、地盘；×红军失利的情况之下，他仍复变为土匪，而且地方工农群众必然反对此种改编，这可以丧失苏维埃在群众中的信仰。

六、土匪群众一个也不能让他参加游击队和红军，只能分给以土地，让其回到生产，因为这些分子脱离生产很久，很容易被人收买。

七、只有特殊情况下，红军可与土匪订立临时的军事上的协定，要他们去打击正在与我们作战之敌军，骚扰其后方，但是绝对不要依靠他们。

八、党须绝对反对以为土匪是革命主力以及依靠土匪运动的军事投机的观点，要把进行土匪运动缩小到最小限度。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湘鄂西省总工会通告（总字第十七号组字第四号）——关于按产业为原则组织各级工会的问题*
（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

各级工会：

详细的讨论了全总关于湘鄂西省总工会组织问题的指示信，及根据着此地的实际情形，湘鄂西省的工会组织应进行下面的转变和具体的工作：

1、按产业为原则来组织工会，是使得更加紧其组织上的领导作用与实际去了解各种工人在工作上、生活上、文化上以及要求之不同点，去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发动广大工人群众的斗争，实际改善工人的生活。在国家企业里应保障工人得到最低劳动保护之实现，提高工人群众生活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因此，各级工会应按照各地实际情形，从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改造工会的组织。

2、各县总立刻设立雇农部（省总亦然，整个工会之一部，不必另设机关），以三人至五人组织委员会，一人为部长，直接指导各区、支雇农委员会，但绝对不许有名无实，而一定要建立和健全真正的领导，与省总雇农部发生工作上的直接联系，尤其要专门讨论关于雇农工会的一切工作和斗争的方式，及实际改善工人生活的具体办法与实现。

3、凡有三个雇农支工会之区域，应另成立区雇农工会（人数不一定），直受县雇农部之指挥，但同区应有横的关系，有时可直接受指挥。区以下十人以上者即组织雇农支工会（与其他工会关系同上），雇农工会会员的成分不仅只雇农，而且是包括着雇农、苦力、森林、渔业（指被人雇佣的）、畜牧以及与农村经济有关系的工艺工人，但这些工人应依据集中与否来组织各种小组。4、在国家企业内，如军服厂、兵工厂、盐厂、实业厂、袜厂、军医院以及商店、合作社……组织某厂工会。在人数多的地方，工会以下应组织支工会。如果商店、合作社的人不够，可属当地其他工会指挥，但须保存其小组。这些企业的医生、知识分子及所雇佣的职员，都应组织他们到工会内来，但须自愿，其指导如前。5、邮政、报馆、电话、印刷、学校（军校在外）以及政府机关所雇佣的职员、工人，组织职员工会。以下在十人以上者可组织支部，如果人少只组织小组，受另一支部的管辖。这些工会直接受当地工会的指挥，同时受该产业上级工会的指挥。6、码头、船夫、车夫、港务工人……组织运输工会；泥、瓦、木及修堤、道路工人等组织建筑工会；米、糖、面、果坊店工人，茶、酒、饭馆，渔场，油、盐坊，肉店工人等，可按照当地实际情形组织食品工会。以下在十人以上者应组织支部和小组，这些工会在城市上就组织一市工会以集中领导。7、以上这些工会，都应组织青工委员会和小组，有女工的地方亦然，但应由下而上的建立健全的群众基础，从上而下的健全其领导。无论县、区、支工会的产生，都应用各种形式的会议去选举，绝对反对不进行工会民主的指派。8、所谓独立劳动者，是自己有生产工具而并不被人所剥削，但他也不剥削别人，其生活仅能自给，甚至有余。这类的人都是独立劳动者，工会应当去组织他们，但只能为某某劳动联合会，受工会的指导，而不是工会和工会的会员。以上希各级工会详加讨论执行，并报告省总组织部。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扩大襄北及荆南新苏区的决议案 (一九三二年三月五日)

一、半年以来，襄河北岸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有极大的成绩。天门苏区占全县三分之二，汉川襄北部份已全成苏区，潜江襄北部份群众均已起来。特别是京山的群众成千成万的完成自动的起来挂起红旗组织苏维埃，没收地主阶级的粮食财产，而且与豪绅地主作武装的斗争。这种群众的革命的斗争，已发展到离京山城只有十里。在荆门南部，群众也自动成立苏维埃，直至李家市一带。”毫无疑问的，工人、农民的广大群众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剥削压迫之下，必然要爆发土地革命。在湘鄂西土地革命深入和红三军英勇斗争之影响之下，更加推动了非苏区群众斗争走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这种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就证明去年中央分局与湘鄂西省委关于九师行动决议的正确，证明去年十一月中央分局红三军主力向襄河北岸活动之主张之正确，证明右倾机会主义、保守主义的观点完全破产。如说红军在襄北只能游击，甚至说只是逃跑，不能创造新苏区，红军在北岸只是战略上的牵制敌人，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意见，完全没有看到襄河北岸土地革命发展的客观条件，同邓中夏同志一样忘记了红军帮助发动土地革命的任务。

二、同时必须指出，这几月以来，我们在北岸的工作还是偏重于军事行动，还没有用很大的力量推进和加深襄北苏区的土地革命，党的领导远远落在群众之后。其所形成这种错误，省委扩大会忘记了发展襄河北岸苏区之任务是一主要的原因。在这种保守主义之下，掩盖着天门的富农路线和对于发展苏区的取消……（如天门土地只分了三乡，县委的工作者是躲在天东一部份而放弃西部）。

三、襄河北岸与荆门一带苏维埃运动之发展，对于巩固江陵、监利、沔阳、潜江、汉川的苏区和击破敌人第四次“围剿”，有决定胜负的主要作用。因为将京山、钟祥、应城、云梦、孝感、德安、荆门这些县份造成苏区，我们可与鄂北苏区（襄阳、枣阳、宜城、钟祥之一乡）及鄂豫皖联成一片，可以从襄阳起至汉阳止夺取襄河的交通在苏维埃掌握之下，荆门的苏区与江陵可以造成包围沙市的形势。这样一来，我们将给湖北的反动统治以严重打击。在革命战争的观点上说，造成更为有利于我们的条件。因此江陵、监利、沔阳、汉川、潜江、江南均须立即动员广大的干部和革命工农群众到京山、天门、荆门去帮助发展新苏区的工作。

四、新苏区的发展，完全要倚靠着当地工农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中央分局坚决反对以新苏区为殖民地的办法，跑到新苏区将贫农、中农的粮食通通没收，这在客观上完全是反革命的行为。

五、目前在新苏区的工作，是立即实行土地法、劳动保护法，发动游击战争。要实行这些任务，必须组织赤色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革命委员会、青年团和工农赤卫军，在斗争之中去吸收积极分子，扩大和创造党的组织。

六、应城盐矿工人，襄河、×河、×汉湖船工工人对于襄北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有极重要的作用，应以最大的努力去组织和发动他们的斗争。

七、中央分局向湘鄂西省委提议动员五百户党团员，省苏维埃动员五百户群众，在“五卅”以前派到天门、京山及荆门工作。

八、京山即组织县委、县革委会。省委组织鄂中特委，代表省委指导应

城、云孝、天汉、京山、天潜、钟祥各县工作，钟祥从鄂北划归鄂中特委指导。

九、责成三军挑选非苏区籍贯（如鄂北、鄂西、鄂中各×）之红色战士一百名去帮助地方工作。

十、为了执行这个紧迫任务，中央分局号召各级党部坚决与保守主义作斗争，要动员湘鄂西三分之一的力量去加强襄北和荆南新苏区的工作。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湘鄂西省总工会关于湘鄂西苏区生产合作社组织章程草案

(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

生产合作社主要的作用，是要团结广大零星生产的工人及广大独立劳动者成为集体生产的一个组织，在这里面要经常不断的改造旧的生产方法及改善工人的生活。同时也就是由个别的生产过到社会主义的生产最初步的经济基础。

在湘鄂西苏区内，一般的零散的工人及独立劳动者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尤其在敌人残酷的经济封锁之下，又遭了严重的水灾，使广大工人群众无法生产，以致于失业。因此，我们要马上开始进行组织合作社的工作，是湘鄂西工会目前最迫切的工作之一。

特规定以下的章程草案：

1、生产合作社必须是按照产业组织为原则而组织的，如善于某种职业的工人即加入某种职业的生产合作社(如制农具、渔具、榨业、窑业、裁缝等)，完全由个人自愿为原则而加入。

2、加入合作社的手续，是加入者本人以他一家股本加入，股本的形式及本人的现钱、工具或替合作社作工的工资(以一年或两年的工资不定，但必须按照入股的多少而规定)，集中所有的股本作为生产基金。

3、合作社是带有阶级性的组织，凡是雇主、富农不能加入。

4、加入合作社之后，本人一定要在社内做工作，由全体社员公举一个管理委员会。他的主要任务是管理社内一切生产事宜，分配与指挥社员的工作。

5、在管理委员[会]应推举一个主席来督[促]管理员的工作。管理委员会至少一星期召集一次，在会议中来讨论日常生产工作计划、社内原料及出集[售]产品，讨论社员的生活问题，并要规定出每日工作时间及休息时间。

6、管理委员会必须定出每月的生活计划。这个计划须经过全体社员大会讨论通过来执行，在每月底必须检阅一月生产计划执行的程度，全体社员大会必须每月召集一次。7、社内的开支可分为四种办法来分配：除一切公共开支外，按各社员劳动来分配产品，不给工资。产品由合作社发卖，除公共开支外，按各社员的劳动分钱。按各社员的劳动规定工资，除公共开支外，发给工资，再分配余利。由合作社供给社员及其家属的劳动与消费来分配余利。以上四种形式可由该社的实际情形及社员的自愿，决定采取那一种办法均可。8、规定每天工作八小时，星期休息，在苏维埃政府法令节假日(如一月一日、一月二十一日、三八、三·一八、五一、五卅、八一、十一月十七日、十二月十一日等纪念)照例休假。9、社员有病不能工作时，社内应担负医药费，病人应照例开支。10、社内如果缺乏劳动时，可雇用少数的补充(辅)助劳动工人(如记账、小工等)，但不能雇用从事生产的工人。按照社内需要可以设立×理、记账等处。11、凡社员应[绝]对遵守社内章程，应接受管理会的分配与指挥，每天的工作一定要执行，不能破坏社内的纪律。12、社员对于社内有意见、提议，应随时提到管理委员会去，管理员应仔细的来采纳社员的提议，进行社内的工作。13、管理委员会应在自己工作的责任上来执行一切职权，督促全社社员的工作。对于不守社内章程的社员，管理委员会与之谈话与批评。如不能解决时，应提到管理委员会来讨论，或交社员大会来讨论该社员的纪律问题，如该社员完全不接受的时候，可由社员大会讨论开除入社，退还其股本，不分红利。14、全社的社员有督促管理委(员)工作的责任，如管理委(员)有表现消极怠工或贪污行为者，

可由社员大会讨论撤职或处理。15、生产合作社讨论生产计划及其他重要会议，须通知当地政府与工会派人来参加，使生产合作社的一切工作能得到政府与工会实际的帮助和指导。16、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得到苏维埃帮助，如果合作社关于生产工具缺乏，政府可将没收来的工具交合作社，或者生产基金不够的时候，可向政府借贷，规定时间归还政府，按照获得的余利，纳政府很少的借贷息金。17、生产合作社须与苏维埃各机关订立定货合同（如红军需用品衣、鞋、袜等），定期交货拿钱。18、本章程是一般的临时规定，各合作社可根据此章程按照各社的实际情形，定出各社的具体章程执行。注释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湘鄂西省总工会关于紧急动员工人群众参加红军的通告（总字第十八号
组字第五号）
（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

省委十六次常委会检阅了各级工会对省总总字十二号通告与紧急动员通告关于动员工人群众到红军中去参加红军的工作，以省军委召集各团体联席会议重新检阅和讨论了动员工人群众参加红军的问题，觉得我们在这一工作中做得非常不够，而且还表现着不少的错误和缺点。主要是：1、没有深刻了解目前的政治的任务，没有政治上组织上经常动员，没有加紧宣传鼓动工作，以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使工人自动的参加红军。2、寒热病的工作方式。各级工会不坚决的执行省委的通告，表现右倾消极怠工等倾向。3、工会没有起阶级领导作用，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还多是命令的、强迫的。4、对拥红工作的忽视。动员群众力量帮助红军家属来尽量解决、减少他们的生活痛苦，如宣传红军家属到新苏区去，红军家属做小生意的要合作社转运所代替采办等等。尤其是对女工工作、农妇代表会议的工作充分表现着机会主义，没有了解这些工作与动员工会群众参加红军是有绝大的关系的问题。

因有以上的这[些]错误，就不能把省总所规定的各县参加红军的人数百分之百的实现（经省军委最近统计只有八百四十八人），有枪无人背的现象还未丝毫减少。在执行巩固发展的苏区、击破敌人四次“围剿”的总的政治任务之下，确发生很大的困难。动员工人群众参加红军仍然是工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因此，省军委召[开]各团体联席会与省总十六次常会，除检阅和指示过去的错误缺点外，另有以下的具体办法：

1、组织工人群众参加突击队。各县总组织一个，是有绝大政治作用的，就是说组织工人群众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与敌人直接冲突，各团（体）订立竞赛合同，分工派人去动员，如动员来的先到县府集中，五天十大后到省军委一次，至少须有五十、一百人数方可送来，各团体动员的要有精确的统计，绝不要把参加游击队的人数目包括在内，这一办法是临时的动员方式，经常的是做补充团、挺进队、赤卫队等工作。

2、我们具体的动员的方式，一定要做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把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和红军的毒辣手段以及红军在击破敌人“围剿”中所获的胜利与我们应做的紧急任务联系起来，普遍的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兴奋群众，为保障土地革命利益，冲破敌人“围剿”而自愿的去参加红军。

3、要在政治上组织上广大的动员，在各种会议中提出扩大红军、参加红军的问题来讨论，尤其是采取竞赛的方式在各方面加紧拥红工作，解决红军物质上的困难，帮助红军家属耕种土地，组织慰劳队、洗衣队经常到军医院、残废所去慰劳伤兵、残废战士，以奋勇红色战士的战斗力的，影响广大的工人群众，××××参加红军，就有光荣的历史。

4、欢送工人群众参加红军，一定要召集群众大会欢送他们，使他自动的到大会上作自愿参加红军的报告，尤其是工人同志一定要讲到为保障土地革命胜利、为改造红军中的成份、为扩大红军、使红军成为铁的红军。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而自愿参加红军。并且要做到鼓动群众自愿的送参加红军的路费及各种赠品。

5、在农妇代表会议时，特别要提出拥红和参加红军的问题讨论，使一般劳动妇女很热烈的来举行这些工作，做到使每个妇女能够鼓动自家丈夫去参

加红军。

6、号召灾民群众、失败[业]工人参加红军。各级工会一定要派人到新苏区、非苏区及灾民集中的地方去动员。各县要有一定方向的确定，如监利要到湖南方面，沔阳要向鄂南新堤、仙桃，江陵到×山、万城，天汉到应城盐井、云孝、京汉路、武汉附近一带去动员。反对只在苏区里叫困难，不向白区进行工作的保守观念。

7、在“三·一八”纪念节，各级工会一定要完成省总十二号通告上规定总的人数（三千人）以及各县具体分配的人数，同时要继续不断的长此作下去，反对寒热病方式。

8、各级工会接此通告后，与各级团体开联席会，县、区、支订立竞赛合同，加紧紧急动员工作，以阶级领导的力量在五、七天内成排结队的介绍来省军委。

附注：潜江、江陵、江南、荆南四县动员参加红军的人，送到老新口第二补充营接洽；监利、沔阳直送省军委接洽；天汉、天潜、云孝、川阳送到襄河北岸横堤第二兵站。注意！

注释

原文无时间，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湘鄂西省总工会关于春耕与修堤运动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

我们在集中一切力量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目前，正是春耕时节的到来，桃花 襄河快要陡涨的时期。关于加紧春耕与修堤斗争，是工会当前最主要的中心工作，各级工会应尽最大的努力，马上动员且领导工人群众起来，坚决的执行以下的决议。

(一) 关于春耕种子与耕牛、耕具问题

1. 工会要积极的去领导群众的春耕运动，动员群众的一切力量来准备春耕种子，主要的是领导群众自己来采取种子，撒谷早谷[播]种。广泛的组织粮食合作社，帮助政府关于春耕决议的马上实现。

2. 领导群众向地主、富农斗争。所没收来的谷麦等，必须告诉群众要蓄藏一部分来作春耕种子，如政府有蓄藏的种子，工会应帮助政府分配给没有种子的基本群众。

3. 领导灾民到白区去斗争。所没收地主、豪绅、富农的种子，必须向灾民详细解释种子的重要，鼓励他们自动的储一部份粮食和种子带回春耕。

4. 要组织工人群众的武装，配合红军、游击队的行动，去没收耕牛、耕具、种子来解决春耕困难。

5. 关于耕牛问题。工会除了领导灾民到白区斗争种子外，必须要告诉灾民要没收耕牛回来(如在汉川已实现在白区没收三十匹耕牛回来)。在有些政府有耕牛的地方，工会要帮助政府来适当分配给群众使用，组织犁牛站。如富农已被斗争过，现在还有耕牛一匹，可向富农借用，有时可以强迫借用，如中农在自愿的条件之下，可以用友谊的借贷，但要禁止用强迫手段。

6. 工会应动员群众起来建立和扩大耕具制造场。

7. 红军家属的田地及红军公田，工会应动员工人群众起来组织代耕队、互助队帮助耕种。

8. 要发起春耕的互助运动，有群众少的地方或逃出去灾民的土地，工会应动员邻乡的代耕队、互助队帮种，并要鼓动工人群众自愿的来补借耕牛、耕具、种子。在收获后，除交还成本外，由耕者与原有主适当分配。

9. 工会应帮助政府将没收来的耕牛以乡为单位组织犁牛站(要以群众自愿为原则)，轮流使用耕牛、耕具，并要注意修理和爱惜耕具，实现政府所提出的保养牛的口号。

10. 工会要领导贫农、中农组织生产委员会，以切实来计划春耕工作，不使苏区有一片荒土。

11. 工会应以一切的组织动员，有各种鼓励的方式，特别要每个工人在春耕运动中，作出很好的模范，以革命竞赛的方式，订立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竞赛合同。

12. 在发动春耕斗争当中，必须指出目前的两种危险的倾向：最主要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表现于对目前革命形势估计的不够，对新苏区巩固发展的怀疑，因此对春耕总工的表现，下去积极进行春耕的工作，特别表现于赤白交界苏区的群众中间。同时另一个左倾的现象，特别是在老苏区，一般的群众专靠斗争过生活，如反富农斗争，一次、二次、三次的去斗争，富农分得了的坏土地，种好了的又去斗争过来。妨碍中农的利益，使中农不能安心耕种，有些贫农团不去鼓动和帮助中农自动的来耕种，而说等中农耕种到收获的时候我们去斗争过来。这是极有害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同时证明

了工会对于贫农团领导的薄弱。这“左”右两种倾向的发展，都是妨碍扩大生产与巩固发展苏区极有害的危险倾向。工会应坚决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予以坚决的无情的打击，以保障当前中心任务的执行，发动春耕斗争。

（二）关于修堤工作的问题

1. 要使春耕运动得到完全的保障，必须加紧修堤斗争的工作。首先要集中一切力量来修筑堤口与完成长江、襄河沿岸的主要堤工：江陵之麻布拐，潜江之莲花寺，监利之蒋家搭脑、沔阳之东荆河，川阳之西屏院。工会应以广大的动员工人群众来领导修堤运动，不应靠政府来解决，应兴奋群众、鼓动群众在斗争中所得来的粮食能吃几天就应去修堤，并要鼓动群众自备伙食去修堤，以解决堤工经费的困难，发展群众对堤工的积极性。

2. 各地的溃口垸堤，工会应努力动员工人群众，领导各地群众，自动的带伙食，自己来完成。

3. 工会应努力帮助政府推销水利借券。主要的推销的对象应是往来商人（特别在海关上）、富农，并要努力宣传鼓动[群]众来推销，但绝对禁止用强迫手段。

4. 在赤白交界的堤工（如新堤到螺山、新堤到黄蓬山，监利之蒋家搭脑，江陵之麻布拐），工会要艰苦的从宣传与组织上采取各种方式领导与兴奋群众，特别是白区群众，激励他们起来为修堤而奋斗。要把修堤工作完全在我们领导之下来进行，反对国民党官厅鲸吞堤工费，反抗敌人屠杀苏区修堤的群众。特别是监利应立即揭露敌人卖良民证欺骗群众去修堤（应马上来一个关于敌人卖良民证欺骗群众告群众书）。工会要以组织的动员群众到敌人修堤的地方去修堤，同时要有计划的进行向修堤的地方驻军士兵的工作，宣传鼓动白军士兵同情修堤，更进一步的组织白军士兵起来反抗国民党和他们的长官，阻止修堤的残酷行为，反对专门靠敌人修堤。否则，是帮助敌人征[争]取苏区的群众。总而言之，工会应尽他一切可能来为争取领导修堤而斗争，在修堤斗争中来扩大苏区的影响。

5. 要帮助政府所决定的在六月底完成全部堤工。春收与秋收之后，工会应动员群众进行堤工的游修和加修，以巩固堤膛，预防水灾的重演。工会动员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各企业工作人员及工人群众，在星期日进行共产主义礼拜六帮助修堤，并要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以兴奋群众修堤的热情。

6. 工会应在修堤群众集中的地方应组织工人俱乐部，在群众休息的时候到俱乐部来，借此机会用各种化装新剧和一切娱乐的方式来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7. 从三月十八到四月十二为春耕修堤运动。在这一个期间，应以一切的力量来推动这一工作，抓取这一工作的中心来联系到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援助上海日纱厂工人罢工，组织募捐队、宣传队等等工作。在“三·一八”大会上应来一个紧急的号召，到“四·一二”群众大会来检阅春耕修堤的工作。

要执行以上的一切工作，工会必须坚决的不动摇的执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目前主要危险的倾向，同时不能丝毫与放弃左倾危险的斗争。加紧工人阶级对春耕与修堤斗争的领导，才能保障春耕与修堤斗争的胜利，才能保障苏区得到更巩固的发展，实行湘鄂赣数省的首先胜利。

注释

原文如此。

中共湘鄂西省委扩大会议的政治错误夏曦 (一九三二年三月八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万涛同志领导之下举行的，因为他是政治报告的报告人和政治决议案的起草人，他的草案在扩大会议完全通过了。

当时省委扩大会议应该回答什么问题呢？第一，他应回答湘鄂西苏维埃运动巩固的发展方向及怎样来争取这个发展。第二，他应该指出广大工农群众斗争开展的方向。第三，他应该回答在苏维埃运动总的任务之下红三军任务应该怎样？第四，他应该回答百分之七十的赤色灾民群众的问题。第五，他应该回答党内的政治路线的争论及党的领导机关问题。

当时的客观形势是如此，扩大会议自己也指出“潜城虽然失守（还保持有部分苏区，及建立了农村群众基础），而沔阳沿长江一带均已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汉阳境内新的苏区也得到相当的巩固”。然而，这只是机会主义者的近视眼所看见的，事实还不只如此，天门西部有广大的游击区域，荆南一带群众都倾向苏维埃，京山、应城、云孝一带的工农群众，因为受到帝国主义、地主、豪绅严重的剥削和红军、苏维埃的影响，正在要求爆发土地革命。所以当时的任务，不仅是巩固苏区，而且要发展苏区，不是空谈发展，而是要以党的力量与红三军的力量去开展襄北苏区，这是湘鄂西党的中心任务。当时万涛同志过分估计襄河北岸敌情，而反对红三军主力北渡，继则认为三军主力北渡只是战略上的牵制敌人进攻苏区，而不能在北岸创立新苏区以为军事上的根据地。这就完全只看见敌军，没有看到正在发展中的襄北工农群众的斗争，只是当时看到军事上、经济上的困难，而没有从斗争中、从发动群众的工作中去征服这种困难的决心（当时我在周家矶出发时，曾写信批评军委给三军的训令主要之一点，就是说训令没有准备在襄北创造苏区）。我提议要派一百个干部到襄北去，当时自然没有人理会。认为这是中夏路线（？），只是估计到敌人，不估计到群众的军事投机的观点，即是邓中夏的思想。万涛这种思想就是把巩固苏区的正确的口号变成为庸俗的保守主义，因此十一月扩大会议提出的党的紧急任务丝毫没有扩大天门、汉川、京山、应城一带苏维埃运动的任务，对于正在发展中之天门苏区，以及三军将要在那里积极行动的天汉苏区的工作完全忘记了。党的工作的布置，没有以配合三军在北岸的行动为中心，把三军发动土地革命的任务也忘记了！扩大会议和万涛同志的保守主义正在这里。

因为万涛同志站在军事投机的观点，忽视新苏区的发展，所以反对红三军到襄河北岸之主要任务是发动土地革命，创造新苏区；所以就掩盖着天门县委十足的富农路线，没有去发动新苏区贫农、雇农、中农的没收地主土地与平分土地的斗争。所以，天门苏区发展七个月，土地只分了三乡，省委扩大会议就没有能站在领导天门、汉川、京山的工农群众斗争的立场来指出当时的任务，这就是保守主义的结果。

因为万涛同志的保守主义，所以省委扩大会议对于各个苏区的联系与非苏区的工作完全没有新的指示，只是组织群众发动游击战争及宜昌各县向下发展等老生常谈，完全没有估计到因为天汉苏区之发展与三军在北岸之行动，加强鄂北苏区与鄂豫皖的联系，加强云孝、应城、京山、钟祥的工作有了特殊的重大意义。因为万涛同志对于红三军去北岸之前途是牵制，而且是

逃跑的前途，所以扩大会议丝毫没有指出红三军当时的战争任务，红三军的战士与指挥员得到了省委扩大会议决议，不知怎样的好？当时军事上的状况是怎样呢？潜城的失败，部队中失败情绪增长起来，敌人在占领潜城以后。有乘胜进攻苏区之计划。

所以，当时的唯一任务是在从政治上提高部队战斗情绪，争取新的军事上的胜利，以击破敌人对于苏区的进攻。扩大会议和万涛同志在此刻讲些什么呢？“军事上没有新的胜利，给养是有方法解决的，苏区不发展还是能够巩固的。”万涛同志用一种乐观的左倾空谈及冒险政策来掩盖他对于白区的新苏区工作之消极，“小孩子不要着急罢！新沟咀、周老咀还有米买，我们还没有达到如俄国国内战争时期以及海陆丰和井冈山那样更困难更危险的境地。”万涛同志和省委扩大会好象要等到红军吃树皮了才想办法。万涛同志曾经说过：“现在还不能退却”，假使某种计划不能实现时再“退却”（万涛同志把军事上的从北方退却转到另一方进攻看成为政治上军事上的退却路线）。这就是中央所指出的困守洪湖的观念，这就是万涛同志的保守主义。

因为万涛同志当时在战略上是以一部分困守赤区，以主力牵制敌人，所以在军事上就是一种没有一定的发展方向，万涛同志不懂得当时是在选择敌人的弱点去取得新的胜利来恢复部队中的情绪，不懂得襄河北岸是我们发展的主要方向，所以军事上的主张不是要冒险就是防御。扩大会议决议各项充分表现了这种防御的精神，这就是万涛同志的保守主义。万涛同志这种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实际就是帮助部队中的逃跑主义的发展。因为党不去指出怎样取得胜利的任务，所以逃跑主义就有滋长的危险，当时这种情形在部队中是相当反映出来了。当时扩大会没有在政治上给江南和潜江的失败以极明了的回答，却把许多军事上的经过在扩大会中报告讨论，这在军事的秘密原则上是不可容许的。

万涛同志既然没有真正的巩固和发展苏区的路线，也没有站在广大的工农群众面前，所以对于百分之七十的灾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一言不发，去放过这个棘手的问题。百分之七十的灾民群众得了共产党省委这个决议案，找不出他自己的出路，这是何等严重的脱离群众。万涛同志却用乐观的情绪来掩盖这种灾荒的严重性，“水灾逐渐减轻，水退出的地方都已（？）播下种子”来避开这个棘手的问题，这就是对克服灾荒困难的消极怠工，这就是帮助悲观失望情绪发展！所以当时彭之玉同志土地经济报告虽然提到灾民问题，但并没有引起会场中的注意！

十一月扩大会议对于江南问题应该给以明确的回答，应该指出适合当时环境斗争的方式，以及走到恢复政权的方向。但是扩大会议却忘记了江南政权，只是简单指出建立江南失败区域的工作几个字，又是轻轻的避开这个棘手的问题，只是让江南同志在失败情绪之下去找寻失败的主要的负责者。

扩大会议正因为没有以领导群众斗争为自己的任务，没有具体的给新苏区以具体指示，而拿一些次要的任务来代替政治上的主要任务。首先须指出的就是忘记了红军中的政治工作，而却以解决给养为目前第一等任务，这正是潘家询同志有粮有钱的市侩主义的观点。给养的重要是谁也知道的，但是红军中没有共产党的强固领导，那就有了给养也是枉然，而且没有党和苏维埃、红军的政治上的改造，也就不能解决给养问题。

扩大会议正因为没有注意到怎样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斗争，所以丝毫没有估计到党的组织和教育宣传工作与党内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所以在扩

大会议以后，虽然经过了省苏三次代表大会，只是表面文章多，却还没有大大的推动群众运动实际的进步。没有指出修堤和恢复生产之群众运动的方式，却只是以堤工公债解决塞责，以租田政策解决荒田，这完全是国民党式的解决问题，却以公债成为摊派强卖，而租田政策掩盖着一切帮助贫雇中农发展生产之积极性办法之消极怠工。

扩大会议既然对于发展苏区忘记了，而对于巩固苏区、恢复生产种种就还有许多严重的错误与缺点，所以就不能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而被右倾机会主义者利用来作反党的斗争。当时大部分真正反对逃跑主义的同志，也被万涛同志一些捕风捉影的说法和乐观的词句所阻住了。

扩大会议真正反对右倾逃跑主义吗？脱离洪湖根据地的邓中夏同志坐在扩大会议中，没有提出中夏路线讨论，虽然下层的同志要求着。万涛同志带领九师违背军委决定脱离苏区的错误，没有人提出反对。这些使得湘鄂西苏区受到严重失败的机会主义错误，却被万涛同志的遮眼木掩盖了。

“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央分局，你们去反罢！”邓中夏、万涛、潘家询这些同志们所独犯的错误一溜烟跑了，反中央的反党分子竟一变而为扩大会议和三次代表大会领导者，实际在那里进行推翻中央分局领导的各种工作。在万涛同志自己影响之下，团结了一部分同志（如尉士均、彭国才、李良耀、栩栩等同志），大呼特呼中央分局是一贯的取消主义的领导，省委书记是调和派。万涛、潘家询同志反又用两面派的手段来掩盖是反中央分局斗争的领导者，说中央分局路线是正确的，我们是反对尉士均同志的说法。事实上尉士均等同志当时的观点就是在万涛、潘家询影响之下。这种两面派的手段，只是政客式的小行径，扩大会议没有进行反对邓中夏、万涛、潘家询的斗争，反在他们影响之下反对中央分局向外发展的正确路线，这就是万涛同志保守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省苏三次代表大会、少共扩大会议均受到相当的影响。

扩大会议对省委工作的决议，一般说来是正确的，指出了工作中的成绩，同时就揭露了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发展了自我批评。当时一部分同志批评省委和中央分局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这是绝对必须，而且是党的进步。可是当时扩大会议的同志没有将自我批评与反党活动分开，特别是没有认识万涛同志的两面派手段，这是我们严重的教训。在这个决议上没有指出中央分局在省委工作中的领导作用，以致机会主义者说省委路线是对的，中央分局路线不对，企图把省委与中央分局对立。

扩大会议的政治错误中央分局也要负相当的责任，特别是我。因为当时中央分局的同志都离开了所在地，以致扩大会议中失掉中心的领导，最重要的就是在当时没有开展这个两条战线的斗争，使得反党分子正利用这些弱点，而且主要的是使扩大会议没有能完成他应有责任，使工作上受到相当损失！省四次代表大会在中央指示之下，揭露了万涛同志的保守主义，才纠正了扩大会议的错误。然而实际工作中的保守主义却阻碍一切工作的转变，万涛同志还不肯承认自己承认的错误。在理论上在实际工作中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党员群众中去，这是我们今天紧急的任务！！！！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如此。

**团湘鄂西省委通告（第十四号）——关于召集团湘鄂西三代大会题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日）**

（一）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着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加紧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运动，积极准备进攻苏联。国民党迁到洛阳后，更加积极的来计划进攻苏区和红军，进行以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为中心的四次“围剿”。因此，目前湘鄂西团的中心任务是领导非苏区的反帝运动，开展青年群众斗争，动员一切力量去击破敌人四次“围剿”，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要完成当前这些紧急任务，只有全部执行湘鄂西党四代大会的一切决议。省委认为在目前举行少共湘鄂西三代大会，是有非常伟大的政治意义。因此，省委完全同意中央代表的提议，定于四月十二日举行少共湘鄂西三代大会。

（二）省委认为，三代大会前的战斗任务应当是抓紧击破敌人四次“围剿”，去进行一切紧急的工作，主要的是迅速完成模范团和少年突击队的工作，加紧领导青年灾民往白区去斗争，积极进行修堤、平分土地与春耕运动的动员工作，加强与健全襄河北岸区域的工作，加紧建立各主要白区市镇工作，特别是武汉、沙市、孝感、应城、盐井。省委相信只有转变团内阶级基础，改造团，开展团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完成以上的紧要工作，才能使我们的三代大会得美满结果。

（三）关于三代大会的问题，省委具体规定以下办法：

1. 原来决定“二七”举行的三代大会，各地已选出代表仍旧有资格参加大会，但必须是真正由支部大会或区代表会选举产生的，由上级命令指定的概不生效，必须重新进行选举。

2. 代表人数及资格仍旧依据“二七”三代大会的规定为标准。天汉、川阳县委可依过去未划分前——汉川、汉阳、天门的已选出代表为大会代表，如过去未选出，仍旧以每区一人为标准，红军八师每团选派代表一人至二人。天潜县每区一人，县委一人。

3. 各特委县区委特支，红军中团的青年工作委员会，必须向大会提出提案及对省委过去的批评意见书，并要各将详细报告交代表带来。

4. 省委全体委员必须于四月九日赶来省委开第三次执委会议，作省委工作总结，及基本讨论（三）代会工作并参加大会。

5. 大会允许旁听，但须经过上级团部的介绍和预先报告省委。大会对旁听者食、住宿概不招待。

注释

原文无时间，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团湘鄂西省委通告（第十五号）——关于“三·一八”巴黎公社和北京
惨案纪念问题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日）

各级团部：

“三·一八”是法国巴黎工人和女工推翻资产阶级的梯也尔政府的一天，建立了工农兵及劳苦贫民的政权——巴黎公社，宣布和实行了对工人阶级的一切劳动保护法。可是，因为没有以极大力量去彻底消灭敌人，因此仅仅只存在没有很久的日子，不幸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

同时，在一九二五年的“三·一八”又是北京学生及工农群众反对日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向政府请愿而遭受卖国贼段祺瑞的屠杀，因此造成“三·一八”的北京惨案。

巴黎公社在第一国际领导之下，掀起了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红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的成立，这是巴黎公社的红旗照耀和巴黎公社失败所流的鲜血灌溉而滋生的。全世界无产阶级正在继续着巴黎公社的精神奋斗。

今年的“三·一八”对于我们是有特别的重大意义，中国工农红军击破了敌人四次“围剿”的初步计划，得着空前的胜利。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危机日益深入和扩大，帝国主义为要挽救其垂死的狗命，便实行瓜分中国和进攻苏联的战争，而反革命的国民党已垂手将上海、南京送给他们的主子爷了！因此遂激起了全国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我们纪念“三·一八”，就应该执行下列的具体任务：

1. 党中央在对我们的指示信上说得很明显的，扩大红军，改造红军的成份，造成在政治上有坚定性的铁的红军。因此，我们应以极大的努力动员劳动青年到红军中去，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虽然我们打击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正因为如此，敌人更是努力来“围剿”我们，因此目前的危险还是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危险。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我们纪念“三·一八”，一定要抓紧这一任务。

2. 我们纪念“三·一八”，就是注意肃反工作，动员少先队、[儿]童团做守备工作，以防止反动分子在苏区内的活动，特别是消灭改组派在苏区内的活动。

3. 为要保障红军给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应号召青年群众积极参加修堤和春耕播种的运动，各级团应有计划的去领导广大的群众将水退出的土地一律耕种。

4. 要加紧灾民中的工作，派得力的干部去领导灾民到白区去斗争，特别要组织和领导红军家属到白区去作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发动白区农民起来抗租抗税与白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汇合起来，以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

5. 在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下面，必须要加紧白区工作。要派人到白区去，打入生产部门中去发动工人斗争，领导他们由斗争而暴动而推翻反动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权。

6. 帝国主义杀人的利器已纷纷开到中国，美国太平洋大会操，很明显的是向日帝国主义示威。虽然他们在瓜分中国的利益有很多矛盾，可是他们在反苏联战争中都是一致的。因此，世界大战的危险是一天天的紧迫了。我们

应以百倍的努力建立反帝青年部和苏联之友社，号召广大的青年武装起来，保护我们的祖国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上这些具体的任务，希各级团部接此通告后，马上讨论和执行，并要在“三·一八”将检阅的成绩报告来省委。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湘鄂西省委给荆南县委信（二）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

三八报告已收到，关于沙洋、马良、城北等区工作布置，有以下的指示：省委认为你们有些决定比较太空，只是说一些原则的问题，对各区还没有很具体很实际的指示，仅仅如此，对他们工作上的帮助还很少效果，你们应更具体讨论一次。

1. 关于城北的问题，该地过去党全豪绅主持的党（不成其为共产党），当然所做的是完全代表豪绅利益的，所以就不会发动群众的斗争任务，这些地方工作应该从基础上去转变……但是这些地方的斗争情形怎样，却一字未提，这些健全恐怕靠不住，建立政权，也不知用什么去建立政权，恐怕基础亦不一定好。你们须注意地主富农分子的假套头，当然我们不是仅仅去怀疑，而是要抓紧基本群众，发动广泛的斗争，在党内要特别注意基础的问题，基础不好应用斗争的力量去转变，党内的豪绅富农要用斗争的力量来驱逐。你们应该很具体的讨论，到那些地方进行反捐税、反豪绅、反团防的斗争；那些地方受过水灾；在水灾地方应该号召饥民起来做分粮的斗争，特别要注意抗祖债的斗争，用这些斗争的工作来发动革命运动。党内不好的分子（你们的报告上说成分不详恐怕就是成分不好）要[在]这些斗争中洗刷出去，如果有地主富农分子太多而不能执行这些斗争及上级决议的地方的党，你们就应进行登记的办法，要他们里面的好干部，雇贫农工人及再好的中农，其余富农以上的坏分子都完全不要，那怕只救得一个贫雇农或工人成分的同志，都必须丝毫不顾虑的以这一个同志去找些工人贫雇农的分子加入党，很好的告诉他们工作与一切斗争的具体方法，来执行党的策略，发动群众的斗争，争取革命的胜利。在工人贫农成分多一点的地方党，可以有办法执行党的决议的，就不必用登记的办法，直接抓紧这些好的干部发动群众的斗争，从斗争中来洗刷（你们报告上所说的为钟祥很健全的赤色组织，实际上就是豪绅地主富农集团的党，在他们地位掩护之下，自然可以安全无事，横冲直闯，实际上有过群众什么斗争呢？就可以知道了）。请注意，这些地方不是简单的指示能主持好的，还须以大的力量与具体办法去转变党的基础，这是最基本最实际的任务。马良比城北稍好一点，但还是难以完全执行党的路线的，你们不仅去恢复，而且同时要注意到基础问题与怎样实际去发动斗争，对两处的工作，你们须有很详细很具体的讨论。

2. 沙洋街道支的工作，你们有一句话是不对的，“洗刷一切不堪教育的分子”究竟是什么分子，为什么不堪教育？如果是工人或贫农成分，你们告诉他发动斗争，并且具体的告诉他们的方法，这些斗争都与他们自己阶级有利用[益]的事，什么不堪教育呢？假如是非工人贫农分子，是商人或其他经济优裕、地位高大的豪绅资产阶级，自然是没有什么斗争的要求，而且要反对斗争，这就不是“不堪教育”的问题事哪。同时对沙洋街上的工作。你们只说到了建立组织，至于怎样发动斗争，却没有说到，虽然是从日常斗争中去吸收积极工人贫农入党，但这还是空的，实际上不能帮助工作的转变。同志们拿着这种日常斗争仅仅是“日常斗争”四个字，省委认为依然是找不着好大的出路，你们应具体研究沙洋街上工人的生活情形怎样？反革命的剥削怎样？群众有什么迫切要求，根据些具体的材料，讨论出很实际的斗争内容（如增工资，反对开除，要求复工，饥民抢粮斗争等），不仅如此，而要根据具体事实，定出某些工人情绪怎样？应该怎样去发动他们的斗争？当地是否有

反帝团体？我们怎样去打入反帝团体？提[那]些纲领去夺取群众？饥民斗争怎样去发动？要有这样具体的指示，才能帮助他们工作的实际收获，你们亦需详细讨论给于具体的指示。

3.关于各地工作，均须有具体的实际的布置，而不是原则的问题，这还要按干部的程度来决定指示的方法，其余无多意见，因为省委未得到实际的具体材料。一般省委已有具体指示。

省委

三月十二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湘鄂西省总工会关于中央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和红三军胜利后湘鄂西工
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五日)

一、因为苏维埃和红军的猛烈发展，国民经济总崩溃，国民党的破产，促使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直接镇压中国革命运动之积极化。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州、上海，法帝国主义进攻云、贵，英帝国主义进攻西藏、西康，美帝国主义集中主力舰队于太平洋，各帝国增运大批军队、枪械到中国来，这就表现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直接镇压中国革命运动、进攻苏联之步骤之开始，也就是表现帝国主义战争之开始爆发。中国苏维埃、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战争，也就是与帝国主义间接的战争。上海的战争也就表现了帝国主义开始在殖民地相互间的战争，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冲突。这是何等严重的时代。湘鄂西工会应即组织广大工人群众领导广大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之下，拥护对日作战的主张，扩大苏维埃革命运动与反帝的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密切的联合起来。只有在苏维埃旗帜之下，武装民众，开展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才能驱逐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中央苏维埃政府这一宣传对日作战的主张，把湘鄂西工会过去对反帝运动消极怠工，以反帝仅是宣传工作而不是实际行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锤碎了。

二、国民党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运动的进程中，完全暴露了他卑鄙无耻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污辱民族的卖国走狗行为，解散反日会义勇队，屠杀反帝的革命群众，制止士兵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将满洲、上海、南京送给帝国主义者，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是在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面前破产了，利用爱国主义的武断宣传是谁也不会相信了。国民党现在的作用只有走狗的作用，在帝国主义指使和帮助之下，集中一切反革命力量，加紧向苏维埃、红军和苏联进攻，以尽其投降帝国主义的孝道。中央苏维埃政府之对日作战就揭露了国民党这一黑幕，只有共产党和苏维埃才是真正反抗帝国主义的领导者，才能真正组织民族革命战争。

三、正因为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的工人阶级要坚决反对国民党，领导发展土地革命与领导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完全是不可分离的实际任务。只有这样，才能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封建剥削与奴役。所以工人阶级要加强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坚决组织与领导千百万的广大劳苦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实行反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苏维埃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和保护苏联，这是工会的中心任务。湘鄂西苏区虽然在敌人四次“围剿”中获得了几次的伟大胜利，可是正因为我们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国民党更加紧“围剿”我们。敌人的“围剿”仍然是主要的危险，所以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去继续击破敌人的“围剿”，扩大红军，发展襄北苏区与鄂北苏区及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这是对于击破敌人“围剿”，巩固原有苏区有决定胜负的作用。因此，湘鄂西工会的中心任务是扩大反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为要击破敌人“围剿”，争取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特提出以下的具体任务。

(一) 工会要动员二分之一的力量去建立和发展襄北赤色工会的组织，并扩大和领导襄北七县的土地革命(京山、钟祥、云梦、孝感、应城、德安、荆门)，发展和巩固襄北新苏区，以与鄂北及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

(二) 为了执行扩大革命战争，首先要动员工人群众组织突击队到红军中去，以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这是工会的第一等任务。在“五卅”前要号召六千工人参加红军，要加紧挺进队、工农赤卫队、少先队的组织，以配合红军力量消灭苏区内部的白点和苏区周围的反革命军队。同时要以组织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来号召和瓦解白军士兵参加红军，加紧进行组织白军兵变、兵暴的必需工作。

(三) 要加紧武汉、宜昌、沙市、京汉路南段、武长路、应城盐矿以及长江、襄河的海员和航船船夫工人的工作。坚决的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城市和产业中去，发展工人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建立和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准备和组织这些产业的同盟罢工斗争，尤其是准备和领导应城盐井工人的同盟罢工。

(四) 要加紧宣传中化苏维埃的外交政策，要坚决领导基本农民群众和监督各级苏维埃执行湘鄂西苏维埃第一次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并要领导贫农团联络中农，用群众力量驱逐苏维埃机关内官僚、腐化、富农、异己分子，改造苏维埃成为真正代表工农劳苦群众的苏维埃。

(五) 扩大“三·一八”群众运动的内容，拥护中华苏维埃对日作战的主张，使“三·一八”成为对日宣战、组织反帝国主义战争、组织革命战争、动员工人群众参加红军的大会。并组织“四·一二”全湘鄂西的对日宣战，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维埃、进攻苏联的总示威运动。工会要充分动员来加紧这一工作，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六) 要加紧组织失业工人领导灾民到白区斗争和春耕修堤运动。

(七) 要加紧组织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与一切国民党的爱国主义的武断宣传作斗争，同时要加紧国际无产阶级一致的宣传。

为了要执行实现以上的任务，首先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要坚决反对过去忽视反帝运动，认为反帝运动是节期式的宣传鼓动，而不是实际行动的；与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以为国民党真正在与日帝国主义作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无情斗争。同时，反对只清谈不做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者，才能彻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反帝斗争的转变，领导和组织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争取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的胜利。

湘鄂西省总工会关于襄北代表团目前工作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日)

省总为了加强襄北工会工作的领导，发动襄北工人群众的斗争，建立和巩固赤色工会的组织，成为发展和巩固襄北苏区的基本柱石，以巩固的发展襄北苏区根据地起见，特设立襄北代表团，管辖天汉、天潜、京山、应城、云梦、孝感、德安、钟祥八县。其具体任务规定如下：

1. 整理和建立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实现苏维埃劳动法令，实际去了解调查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开展工人阶级的剧烈的斗争，巩固工人阶级的阶级团结力量，以彻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权。

2. 组织工人群众实行对于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工会要以发动土地革命力其最主要的中心任务，组织和加强对于贫农团的领导，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和土地及富农（另给以坏的土地）的土地，平均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这一土地问题，工会必须去发动基本农民群众自动的用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没收和平均分配，坚决反对命令式的强迫式的来进行这一工作。要发动反富农斗争，但要坚决反对妨害中农利益的左倾行为。要把农村阶层作一广大的详细的解释工作，工会要了解只有正确的执行苏维埃的土地法令，才能发动和领导广大的基本农民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襄北苏区的根据地。

3. 加紧反帝运动的工作，要普遍的深入的去加紧反帝的宣传鼓动工作，要进行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工作，中华苏维埃对日宣战的主张，要在群众中作广大的解释与宣传工作。要解释只有苏维埃和红军及一切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抗帝国主义的；只有共产党和苏维埃，才能领导组织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只有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的领导，才能争取革命的民族解放的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已经完全投降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只在帝国主义指使和帮助之下，进攻苏区。因此，要发动襄北土地革命，击破敌人的“围剿”，与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密切的联系，要根据省总关于反帝的一切通告和决议，切实进行这一工作。

4. 在击破敌人“围剿”，扩大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紧急任务中，扩大红军，坚强红军，是襄北工会的第一等任务。同时襄北是新苏区，所以工会要运用种种竞赛的方式，如组织突击队等，以达到扩大红军的任务，这需要在组织上宣传上的充分动员，兴奋广大工人群众自愿的参加红军，工会要紧紧抓住这一中心工作啊！

5. 襄北苏区是保障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工会必须了解这一工作的重要，要在动员工人群众及一切劳苦群众配合红军力量去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等，及反富农斗争中来充分为保障红军给养而斗争。工会必须取得领导作用，并具体讨论没收来的粮食和反富农斗争来的粮食等以几分之几来保障红军给养之用。

6. 工会要用二分之一的力量来为组织失业工人、领导灾民到白区去斗争。要了解领导灾民去斗争，不仅是解决灾民生活问题，而同时是要扩（大）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发展新苏区的重要意义。在领导灾民斗争中，必须与当地基本农民群众联系在一块共同去斗争；斗争来的东西，必须与当地群众平均分配，坚决反对过去乱斗的行为破坏苏维埃帮助了敌人的反革命行为。因此，工会不仅是组织失业工人、领导灾民斗争，必须派得力干部去领导灾民，

要执行省总、省苏关于灾民斗争的决议。

7. 要特别注意应城盐矿和襄河沿岸市镇及襄河船夫、京汉铁路工人的工作。要开展这些产业和市镇工人的罢工斗争，并须具体的讨论和准备应城盐矿工人的同盟罢工，定出应城盐矿工人同盟罢工的步骤和计划，一切工作要反对只看到苏区而不看到白区工作的保守主义。

8. 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加重建立京山工会工作，要派人到钟祥去建立工作（可派芝逊去）。要加紧应城盐矿及应城南部、云孝的工作，工会要从发动工人群众的斗争去扩大游击区域，去发动和领导游击战争，去与鄂北苏区及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并须经过工会的组织去与鄂豫皖苏区及鄂北苏区工会取得联系，在可能范围内去帮助省总对鄂北苏区工会的指导，要切实整理和健全天汉、天潜工会的组织。

9. 工会要领导与发动群众去改造各级苏维埃，要把豪绅地主、富农、官僚、腐化、异己份子从苏维埃机关中滚出去，要加紧肃反工作。

10. 要切实培养当地工人干部到工会指导机关中来做指导工作，要把襄北工会建立在本地工人群众基础之上，大胆提拔当地新的干部，反对只依靠几个派去的干部的保守观念。

11. 关于领导春耕修堤运动及建立工会民主化、建立工会下层等工作，当然一点也不能放松。

12. 要执行以上的任务，必须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富农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必须集中力量向右倾开火；同时要反对妨害中农利益，灾民乱斗行为，妨害基本农民群众，形成赤白群众对立，甚至在甚么反“经济富农”的妨害苏维埃经济策略的行为上，连一个做了半生雇工储蓄了八百多串钱的雇工，都把他斗争了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并要坚决的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13. 代表团以辅仁、芝逊、尚德、胡龙、天汉县总工会委员长五人组织之，以辅仁为主任，胡龙为天济[潜]县总工会委员长，芝逊应立即到京山去建立和巡视工作一次，尚德到应城盐矿及云孝去巡视一次。

注释

原文文末时间为“三月十九日”，当为本决议写发时间。

鄂豫边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白区和苏区党的工作、反“围剿”
情况和特委二月两次会议情况等*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

中央：

鄂豫边苏区现处于万分危急之际，请中央立刻用非常办法来解决！

鄂豫边区全盘党的工作因为过去受立三路线的打击太深，一切党与苏维埃组织没有基础，一切群众组织如贫农团、雇农工会等几乎完全等于一些空架子，尤其是未正确执行苏区经济政策，使经济来源完全依赖于打豪拉票，因此虽是在去年冬天，正在改组的鄂豫边特委曾用布尔什维克的最大坚决性和突击精神来接受中央指示和执行国际与四中全会路线的转变，来突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但事实上仍然得着这样坏的结果。

兹为报告具体起见，分以下几点来说：

(一) 白区党的工作

环绕苏区周围的白区党的组织共有泌阳唐县、卿(邓)县、南阳、新野、镇平、襄阳、宜城、钟祥、南漳等十县，在过去如南台(台)、来(内)乡桐柏等三县也有过组织，因受立三路线的打击而失败之后，现在尚未恢复，关于现有组织的各县呢？

第一，由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走入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发展和不动主义与失败情绪滥网中，最明显的事实就是泌阳、唐县与邓县的党专门做拉拢民团团总或队长企图在其中夺取枪杆暴动起来。

第二、在白区所有的十一县县委中没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县委，区委和支部的组织更薄弱得万分。

第三、不注意而且就不能发展群众斗争，从去年春天至冬天不仅未发动过抗捐、抗租、分粮、抢粮斗争，就是连普遍全国的灾民运动和反帝运动都未发动一次。

第四、不仅在白区中未发动过一次拥护苏区和红军运动，环绕苏区最近的县，如唐县、新野、襄西、宜西、南漳、钟祥等县的游击战争则更从未发动起来。

第五、襄河一带的船员和码头工人根本就未组织起来，赤色工会就未建立一个，尤其在镇平县有将近五千以上的失业工人(丝业)，连一次罢工也没有发动过，至于赤色农协的组织，农民运动也就同样的等于没有。

第六、干部缺乏，尤其工农干部缺乏到万分，这也就是一刻[个]不使鄂豫边区全盘党的工作得到一个较快转变的基本问题！兹举两件最简单的事实来说：1.在整个白区除襄西县委书记外其他的各县中找不出一个比较健全的县委书记。2.找一个交通来中央竟找了一个月，结果因为没有才找了一个干部，但这位“干部”竟不拿报告空着手来到中央。

第七、党员数量太少，成份又坏，政治的水平线又非常低，党的教育更说不上，党的文件尤其中央的文件不能传达到党员群众中去，最主要(的)如中央给鄂豫边区特委的四中全会决议及与四中全会有关系的一切文件不仅是一般下级干部和一般党员群众没有见过，就是连特委本身的执委就有一部分未见过，在这样情形之下(这在去年十月以前是如此)怎能一般党员群众去认识和了解国际和四中全会路线，怎样能在党的全盘工作中去执行国际和四中全会路线。

第八、对党的指导机关的指示和决议执行的程度太慢，简直是再蠢笨没有的速度，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一般党的下级干部对党的路线了解的不够，执行的程度薄弱，但另一方面确实表示一种两面派所谓阳奉阴违，这是从特委去年十一月川临时执委会与县书联席会议后到今年一月里白区党的全部工作转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的，更具体的说，在去年旧历十月内新的特委书记到了鄂豫边以后曾召集了一次特委十月临时执委会议和县书联席会议，在特委十月临时执委会上曾经通过了三个正确的决议：1.接受中央指示信决议，2.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决议，3.鄂豫边赤区工作现状及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在这三个正确的决议中将国际和四中全会路线具体和通俗化，更特别在县书联席会议上作出了每一县的工作的具体指示信，并改组了南阳中心县委，在南阳中心县委直接监督和指导之下未改组白区党的全盘工作，可是到今年一月二十一日鄂豫边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证明出白区党的工作等的成绩几乎完全没有，即是未能执行特委十月临时执委会的决议和县书联席会议的工作指示信，甚么转变也没有看见，虽然时间只有两个月。

（二）苏区党的全盘工作

1.均房苏区方面

根据旧的特委派到均房去的巡视员李子宾十月份的报告，最主要的可分为以下几点：

（1）关于党的组织，在均房苏区与三军会师后，均房苏区内部建立了党的最高指导机关鄂西临时分特，以柳克明为书记，朱勉之、汤慕禹、张琪等为执委，并在临时分特指导之下，在房县举行了一次县委扩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党的组织任务，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等决议，在这些决议案中曾反映一部分国际和四中全会路线的影子。

（2）关于苏维埃的组织，据李子宾的报告，在均房的苏维埃机关已有很大的改组，从乡苏维埃到县苏维埃已参加进了大批雇工、贫农成份，并在苏维埃领导之下重新分配了一次土地和建立了许多群众组织，如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代表会、少先队、儿童团等。

（3）关于土地问题，据李子宾报告，在均房整个苏区纵横差不多有五百多里，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已经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分给了贫雇农和红军。

（4）关于苏区经济政策，在李子宾的报告中未看出有关于经济政策的具体决议，并且在他的关于赤区戒严的报告中还看出禁止白区商人入赤区的错误，关于这，特委十月临时执委会议以后曾给均房鄂西分特以具体的指示信和给了他们一份国际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

（5）红军问题，在李子宾的报告中说，是均房苏区于十月初已将三军留下的教导团，政治保卫队，特务营和均房的地方武装编为第九军二十五师约一千支的枪和红色战士。

（6）群众组织，在李子宾的报告中看出，在均房苏区内已开始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代表会、少先队和儿童团等组织，但是关于贫农团与苏维埃的关系问题则弄错了，在均房是贫农团领导苏维埃政府，关于这，特委十月临时执委会决议后亦曾有具体指示给均房鄂西分特。

（7）地方武装问题，关于地方武装如游击队和红色自卫军，在李子宾的报告中未见有，但曾看出有军区管理委员会的组织，来担任苏区治安和武装防卫问题。

(8) 干部训练问题，同样在李子宾的报告中看出有关于党与军事训练班的建立，以训练党，苏维埃及军事工作人员。

以上是均房苏区去年自与三军会师后到去年十月内的党的全盘工作现状的主要形势，但根据今年二月初旬鄂豫(边)临时省委所得来的间接消息，均房苏区因为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结果现在已遭受失败，整个均房苏区已失掉三分之二，在去年冬月底退出房县城，现在汤慕禹已经领第一路游击队，人与武器均在一千以上，由荆山退到洪湖回三军去了，因为这部分武装和党与军事工作人员都是三军从前留在均房的，据报告人说：第一路游击队由房县退出来往何处去，谁也不知道，一直到了荆门地界，师长、师政治委员才说回洪湖，同时临时省委于二月初接着湘鄂西省委交通带来的文件上又有关于提议要调龙容、汤慕禹与三军留在均房的各部分武装一齐调回洪湖，在这里临时省委根本就未同意，并且立刻写信给湘鄂西省委要他们无论如何暂不要调动这部分武装和工作人员，但湘鄂西省委交通刚出鄂豫边苏区时，龙容、汤慕禹等已将这部分武装由荆山跑回洪湖去了，同时不过龙容、汤慕禹等走时曾将均房县游击队改编为第九军二十五师留在均房，现距房县城约八十里地(地名大约是上坑)，枪支约在一手上下。关于均房苏区失败的原则，临时省委未接着均房分特的正式报告，同时今年一月之鄂豫边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均房又派一人出席，因此便无从详细知道，同时对均房的失败还发生了怀疑。因为第一、在党的工作人员、苏维埃与军事上的领导者都比较襄枣宜钟苏区健强，土地革命也比较襄枣宜钟要彻底(据“报告”上看来)，武装力量也比较襄枣宜钟苏区雄厚(多一倍以上)，群众也比较多，斗争情绪也比较的高，地势也比较险要，同时在反动统治进攻均房苏区的力量也比较的薄弱，据临时省委所知道的此次围攻均房的仅仅是范石生的五十一师之三百四团，一团，大刀会和均房河口之反动民团；其武装力量至多也不过与均房苏区的武装力量相等，同时三百四团的战斗力还非常薄弱。

2、关于襄枣宜钟苏区方面

根据特委十月临时执委会上旧的特委常委负责同志(并且是刚从襄枣宜钟苏区回到南阳参加特委十月临时执委会的特委巡视员)宋良友(由)的报告，襄枣宜钟苏区党的全盘工作的转变，也不亚于李子宾描写对于均房苏区的报告，在特委十月临时执委会上宋良友的报告主要是：

第一、土地革命也比较的彻底了，因为完全是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分个[了]两三次。

第二、苏维埃的改造也是比较的彻底，广大的雇贫农已经提拔到各级苏维埃中去了，大部地主、富农也是从各级苏维埃中洗刷了出去。

第三、苏区经济政策已开始执行，协作社已组织起来，土地税、累进税已实际的征收起来，并举出具体的土地税的数目字，说是在今年春天开始单是土地税都要收到十五万以上。第四、关于地方武装和群众组织，在襄枣宜钟苏区共有五个大的游击队，每队枪约一百支，所有红色补充军都改为赤卫军，人数在七八万左右，关于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代表会、少先队、儿童团差不多都组织起来了。

第五、红军二十六师的武装力量在五百支(枪)以上，士兵官长成份有很大的改良，战斗力量也比较以前强些。

第六、党的工作，在襄枣宜钟苏区内部自与三军会师后也成立了鄂北临时分特，在此分特领导之下改组了苏区各级党的组织。

但是待整个鄂豫（边）特委为了彻底改造鄂豫边整个苏区工作，为了召集鄂豫边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为了准备冲破第四次“围剿”，尤其是为了立刻使襄枣宜钟苏区党的全盘工作得到一个较好的转变，将特委迁移到襄枣宜钟苏区以后所见着的差不多完全是两样，即是在实际观察证明，特委常委未良友同志在特委十月临时执委会议上报告的许多不正确，同时由这一报告，尤其是拿均房苏区失败的迅速来证明特委的执委李子宾同志对于均房苏区的报告是“描写”，同时在与襄枣宜钟苏区一部分参加实际工作的（同志）谈话和考查他们工作的结果，更知道特委负责同志爱作空虚夸大的报告，兹举以下的事实来证明：

（1）关于土地革命根本就说不上什么彻底，很多土地就没有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分配，尤其是在襄河以北（枣阳之法家湾以北）土地根本有多少就未分过，尤其是在边区革命委员会下的土地委员会就未正式建立起来，边区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就不知道全苏区有好多人口，有若千的土地，分得土地的人口有好些，未分得土地的人口有好些，然而在特委十月临时执委会上宋良友同志还具体举出在襄枣宜钟苏区共有若干万人口，分得土地的有若干万人口，得着解放（在苏区附近免去苛捐杂税脱离豪绅地主压迫的群众）的群众又有好多万，这些数目字在特委十月临时执委会议的决议案上还可以找出，因此在特委一迁移到襄枣宜钟苏区便开始重新调查土地的分配和人口的统计，并立刻加紧反富农斗争。

（2）关于苏维埃机关内仍然还有很大一部分地主富农把持着政权，压迫贫雇农，因此特委一迁移到苏区便重新调查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成分并随时洗刷了一部分地主富农成份。

（3）关于苏区经济政策方面除收了极少数一部分土地税收外，其他的累进税、合作社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主要的每月将近两万的开支几乎全靠拉票打来过日子（据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报告，在襄枣宜钟苏区不仅一百块及以上的商人没有一个，就是连五十块及以上的行商也找不出一个），边区革命委员会内根本就没有经济或则政治委员会组织，因此在特委刚迁移到苏区便由边区革命委员会召集了第一次苏区经济工作人员会议，决定开始执行经济政策，制定出累进税的征收税则，起草出新的合作社组织法并特别指出这种完全依靠拉票打豪来过日子的错误和危险，更在这次会上通过了节省浪费集中经济和集中粮食的具体决议和方法，此外还派了旧的特委书记郝欠亭同志兼任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经济委员会主席。

（4）关于红军二十（六）师的士兵官长成份的改良仍然不够的很，党的组织（从师委会以至连支部和小组）和政治工作，虽是在三军会师后开始建立，但实际工作仍未切实的做起来，武装仅三百七十支（长枪），尤其是战斗力未提高起来，特别是未采用游击战术，往往爱与敌人打正面，因此在特委初到苏区的时候便给了二十六师师委会一封具体的指示信（关于这，可参看待委去年十一月由陈国中带来中央那张不完全的报告），特别是严重的指出关于彻底改造二十六师的士兵、官长成份，提高战斗力，加强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以及采用游击战术的重要和迫切，并随时监督二十六师师委执行这一指示。

（5）一切群众组织如贫农团、雇农工会等差不多完全等于空架子，特委除曾监督苏区各级党的组织经过县苏府党团来健强这一工作外，并派从鄂豫皖来的一个专门作贫农团、雇农工会的同志来巡视和领导这一工作，其次关

于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的组织也是非常薄弱，因此在特委刚到苏区时曾派定专人调查和检阅并随时改造青年团、少先队和儿童团的工作，再其次关于妇女运动则更作的坏，妇女代表会的组织既未普遍看护队、慰劳队、缝纫和洗衣队等组织又未切实组织起来，劳动妇女之参加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和反富农斗争则更少，虽然由中央派了一个女同志周惠莲去工作，但因她自己工作能力缺乏同时在作不上一个月的工作就因为“肚子大”的原故而坐在机关里，最后关于地方武装是这样：1.游击纵队在特委十月临时执委会以前共有三个（一、二、三各游击纵队）共有枪二百六十支，赤卫军能够动员的全苏区不到三千人，其武装均系矛杆土炮，到特委到了苏区以后，曾开始重新将枣阳县游击队改编为第四游击（纵）队，将第一游击纵队分出一部分武装改编游击第五纵队，并进行改组赤卫军，总共一、二、三、四、五各游击纵队共有枪三百九十支，其中第一队九十支，第二、三两队各八十支，第四队七十七支，第五队五十支。赤卫军的武装未有统计。

（三）对于鄂豫边区党的全盘工作的彻底改造

为要彻底改造鄂豫边区党的全盘工作，曾于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在襄枣宜钟苏区正式开始举行鄂豫边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白区出席大会由南阳、邓县、泌阳、新野、镇平、桐柏、襄西、宜西、南漳等九县代表和参加人，唐县未有人出席，均房苏区亦有人到会，总共白区的、襄枣宜钟苏区[的]共有代表七十人、参加人三十五人、旁听人（系刚开办的训练班学生）三十七人，总括一起出席大会共一百四十二人（数字说不上十分准确）。在这次大会更 要 决定讨论以下的问题：

1.接受中央指示信的报告。

报告事项 2.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

3.鄂豫边区一年来党的工作的总结报告。

4.对以上报告之讨论。

5.苏维埃问题：（1）苏维埃本身机关工作问题；（2）苏区土地革命问题；（3）苏区经济政策问题；（4）群众组织与地方武装问题。

6.红军问题：（1）红军中的士兵官长成分问题；（2）红军中党的组织问题；（3）红军中党的政治教育工作问题；（4）红军中党的组织问题。

7.党的问题：（1）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2）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3）苏区内各级党的组织。

8.改组旧的特委问题。

9.其他事项。

（这个开会日程也是大致是这样，详细可参考陈国中带给中央那个不完整的报告。）

（四）对 反 四次“围剿”的准备

1.对敌人的初步“围剿”的打破。敌人对襄枣宜钟苏区举行第四次“围剿”的开始便采用新的策略，即是首先占领苏区边上一块地方，大肆杀戮焚烧扒抢粮食拉尽牲畜接着便再进一步，更由此逐渐逼近苏区中心，因此在特委刚到苏区就遇着敌军独立三十四旅罗启疆部队向枣西南苏区举行初步“围剿”，特委曾动员群众配合武装力量给这种初步“围剿”一个大的打击，将罗启疆由璩家湾（苏区）打回枣阳，这是十二月初的事。

2.在边区革命委员会之下建立了临时军事委员会，该会组织共七人，为李政、沈宗源、吴芹青、谭中余、常克锋、陈雪恒（怀）、郝久亭等，其中

李政为正主席，沈宗源为副主席，并于十二月中旬召集了第一次全苏区军事工作人员会议，将襄枣宜钟苏区按行政区划为五个大军区（每个大军区下还有从五个至十个以上的小军区，每个小军区下还有一个军区中心点），一个军区总后方即总参谋部。在每大军区上设军事委员长一人，小军区委员长若干人，并在建立与健强每个大军区的工作下决定集中粮食，集中经济，建立防御工事、侦探网、交通队等工作（关于军区的详细组织系统以及二十六师及各游击纵队和军事有关系的问题将另向中央军委作比较更详细的报告），并特别进行改造赤卫军和采用游击战术，特别是以扩大向外游击（赤区附近之白区内）来准备冲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3. 通知均房二十五师更迅速努力向西[东]发展与二十六师取得直接联系。

4. 派专人和交通到湘鄂西与鄂豫皖，并要求他们在最短期间之内能与二十六师在军事上有一次会合，尤其是与鄂豫皖，因为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给特委的信中曾特别提这一问题。

5. 正式建立了白军士兵运动，在一个月的期间曾引起了敌人军队中有很小的哗变投向红军中来，并在鄂北游击军内建立了组织，在五十一师和独立三十四旅已找得有相当的线索。

6. 在十一月中旬曾召集了第一次紧急会议，出席的人数是特委的常委，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二十六师的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第一次提出了集中粮食和集中经济问题，并决定出具体的办法（在第一次军事工作人员会议上第二次提出集中粮食和经济问题）

7. 曾在苏区的两执委临时会议上尤其是在第二次执委临时会议上通过了更具体的准备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赤区戒严，肃反工作和反改派斗争，扩大反帝运动，加紧反富农斗争，改组赤卫军，加强游击队和红军的力量等决议，但执行这些决议的速度真蠢笨到万分（第二次执委临时会议约是在十二月底举行的）。

8. 在文字宣传鼓动工作方面，曾发展[表]反对匪军罗启疆的对枣西南苏区的初步“围剿”和动员群众打破这种初步“围剿”立刻准备冲破敌人第四次总“围剿”的宣言，曾发出告国民（党）军队士兵宣言，曾发出冲破第四次“围剿”宣言，曾发出为冲破第四次“围剿”而给鄂豫边区各级党部的紧急通告，并特别在这次紧急通告中具体规定出赤白区党的组织为冲破第四次“围剿”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曾发出三种以上的煽动白军士兵的小册子，曾专门制定一些为冲破第四次“围剿”的新口号和标语。

（五）鄂豫边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停止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总的开始

鄂豫边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是在襄枣宜钟苏区中心里举行的，但因敌军五十一师三 一团突然来到苏区中心之耿集，代表大会便开到第三天而停止，同时在苏区中心黄龙岗之西北十里土桥沟到了五十一师三 二团之一营，其余的驻在黄龙岗之正西十五里路之峪山，在苏区的西南王集来到了五十一师之三 三团，并开始与枣阳之罗启疆匪军独立三十四旅遥遥取得联系，不断向苏区进攻。在当时鄂豫边区广大分局所得来的可靠消息，知道反动统治对襄枣宜苏区的进攻是分两大路：第一路是从襄河以北进攻，是罗启疆匪军之三十四旅；第二路是匪军五十一师整个的三团从襄河以南进攻，同时在苏区周围的边界上利用豪绅地主勾结苏区富农和地主残余组织铲共党对

苏区作经常的骚扰和在苏区内部秘密破坏，改组派亦同时大加活动。

(六) 消灭耿集敌人(三 一团)之失败与总退却之错误自一月二十四日代表大会停止退到苏区后方以后，便发出与耿集敌人作决死战的紧急通告，集中了苏区所有的一切武装力量与耿集和土桥沟之敌人作了三战，结果不仅未消灭耿集的敌人，我们自己还遭受大的损失，当时除掉在苏区北部驻有匪军独立(三)十四旅，西南部驻有匪军之三 二团外，在宣城还新到四十八师之两团，同时还传说在苏区之正南流水沟附近之曼张集新到匪军两团，据当时敌情看来，耿集敌人(三 一团)的确有一直打到苏区后方的可能，因为耿集隔苏区后方仅二十里，中间仅隔一架不大不小的山，我们全部武装已退到山上，其他如三 二团、三 三团、独立三十四旅仍继续向苏区进攻，枣阳北乡之狗团防也正在乘机准备向苏区进攻，这是关于当时环绕苏区的敌情，当时环绕苏区的敌人力量。在我们自己的力量呢？第一、经过了一个昼夜将所有武装都集中起来，在三天以内动员了七百群众——赤卫军，结果不仅不能达到消灭耿集敌人之目的，反而遭了大的失败。第二、粮食没有集中，并且三分之粮食已经匪军扒去了。第三、群众不能动员，据“报告”上称单是苏区中心黄龙垴与耿集就有五六千赤卫军，其还有大部党团员在里面，结果动员了三天仅动员了七百人，在这七百人中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可是在与敌人作白刃战时，他们都公开的向红军说：“先生们！老实告诉你们，我们真的怕死啊！”同时这还是整个苏区党与苏维埃的工作最有基础为一般旧的特委负责同志所经常认为满意工作最在成绩的地方。第四、在这时候更充分的证明了苏区各级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没有基础，一切群众组织如贫农团、雇农工会差不多都是空架子。第五、当时不仅士兵战斗情绪不高，并且最危险的如果再与敌人(进行)一次比较激烈的战争，就会完全将空枪送给敌人，因为子弹快要完了。第六、在后方还有一百多个伤兵，其中有不少的军事干部，如果后方失守则根本就会将这一部分伤兵丢掉，将要损失一批军事干部。

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特委便决定了这次的总退却，决定向北游击，造成唐、桐、泌的新赤区和与鄂豫皖直接取得联系。(七)从特委二月二日的紧急会议到二月二十三日的紧急会议

1. 特委二月二日的紧急会议

这次总退却是从一月二十七日至一月二十九三日，接着因为耿集敌人三 一团突然离开耿集向东北开至熊梁二集(距耿集有三十里)与苏区周围之敌人没有大的动作的原故，仍然立刻回到后方，因为这次退却尚未出苏区的范围以外，同时回到后方后，特委立刻召集二月紧急会议(从二月二日晚上到三日上午)在这次会议上严格的指出了此次退却的错误，重要的原因就是特委对敌情没有详细了解，对政治情形估计不正确，发生这次的总退却，在客观上重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的错误，并要特委将这种错误公布于鄂豫边区全党和向鄂豫边苏区内群众承认。第二、重新动员群众配合武装力量来继续冲破第四次“围剿”。第三、健强军区的过程中，限十日内将粮食集中，将防御工事建立起来。第四、立刻加紧向外游击(赤区附近)。第五、彻底执行平均分配土地和加紧反富农斗争。第六、加紧肃反与苏区戒严工作。第七、彻底改造各级苏维埃政府。第八、改组旧的鄂豫边特委建立新的临时省委，改组旧的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新的临时省苏维埃政府。关于这次会议上决议有三十多项，药[兹]单举其最主要此[者]报告。

新的临时省委是由这次紧急会议选定了沈宗源、宋良友[由]、陈雪怀、柳克明、郝久亭、王君恩、谭中余、周惠莲、马三光、张木千、胡清成、张新江、李子宾、邓明清、×××、×××十七人，以沈宗源为书记，宋良友为组织部主任，陈雪怀为代理宣传教育部主任，周惠莲为妇女部主任，新的临时省苏维埃政府选定了王明鹤、郝久亭、李政、程祖武、余一安[益奄]、陈宗莹、×××、×××、×××、十九人，以王明鹤为正主席兼任社会保养委员会主席，以李政担任行政委员会主席兼任文化委员会主席，以吴芹青担任裁判委员会主席，以郝久亭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任经济财政委员会主席，以程祖武为土地委员会主席兼劳动委员会主席，沈宗源担任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谭中余担任政治保卫局主席，陈宗莹担任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委员……

2、二月二十三日的紧急会议

虽是这次总退却增加了党内和党外群众的失败情绪，但因为执行特委二月紧急会议的结果，从二月五日到二月二十号这十五天之内，群众斗争情绪已逐渐恢复后，这只限于襄一区，枣南三区，宜东区襄南二区和钟一区，一切党与苏维埃的工作也逐渐恢复后到总退却以前的形势，并在这几个区域内按照特委二月紧急会议的记议，集中了一部分粮食，组织了党员敢死队和小队的别动队（别动队是专门担任夜间袭击和扰乱敌的后方或侧方，使敌人初则感觉扰乱不堪，继而感觉见惯不惊，便乘此机会给敌人的突然大的袭击以消灭敌人一部分或全部），各大小军区也开始健强起来（从形式上看来），尤其是在各级苏府与党的工作开始表示出紧张现状。但在这个时候的襄三区工作完全失败了，枣阳的一、三、五区的工作始终难恢复起来，二、四、六区的虽是在总退却以前就几乎完全失败，但在执行特委二月紧急会议的结果，在六区还能动员到三百群众，在一、三、五区仅组织了几个敢死队和别动队，广大群众是动员不起来的（这里所谓广大是指成百的群众），同时更因为罗启疆匪军每日到一、三、五区进攻，杀人拉人烧房子扒粮食的原故，群众只是天天跑反，不过在这个时期，在向来党与苏维埃工作落后的地方，改组派的根据地，工作的转变竟超过全苏区以上，在襄南二区仅仅八天之内改组了赤卫军，组织了敢死队别动队，动员了四十个贫雇农参加红军，建立了相当的防御工事，军区比较退却前还要健强些，赤卫军开始领导群众向白区扒粮食打土豪，同时，在别动队袭击的结果还将被敌抢去的许多东西夺回并捉拿了不少的铲共队领袖，并加紧了反富农斗争的工作，临时省委除督促鼓励外并推动襄南二区党的组织举行了紧急号召，号召全苏区党的组织与他们进行革命的比赛；可是结果回答这个号召的则可邻[怜]万分。虽是这样，但客观形势一天一天的越加重了。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东北西三方面的敌人都一齐进攻到苏区中心来了（三十四旅之一营由土桥铺出发，三 一整团由熊梁集复经过耿集到黄龙挡，三 二 团 之一营亦同时到黄龙挡）。二十六师与二十二日在古城与三十四旅一战，得了一个大败仗，同时在当天三 三 又一直王集进攻到杏山东（隔苏区后方只七八里），领导挡共队包围宜东区苏维埃政府的事件。二十三日二十六师又在杏山被三 三 团 击败；同时三 二 团 又在黄龙挡附近扰乱，三十四旅亦于当日在王家湾大肆烧杀，当天夜里宜东发现支部书记叛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临时省委便于二十二日（从二十二到二十三）又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上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是：

第一、决定放弃襄枣宜钟苏区的后方，完全采用游击战术来冲破敌人的

包剿以外，将苏区所有的一、二、三、四、五，五个游击纵队改编成第三路游击队，经常在枣阳西北、东北，襄东游击，将二十六师全部改编为第一路游击队，经常在宜东、钟北及枣南三区一带游击。按照这样继续下去是能够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如果万一将遭受大的失败时，则一、三两路游击队突然很迅速的合并一路立刻向北游击，造成唐、桐、泌边界上的苏区并特别设法与鄂豫皖苏区取得联系。

第二、临时省委暂时迁移到白区，在苏区内组织临时省委代表团，选定了汪六一、王君思、王明鹤、谭中余、马三光、夏天达、邓明清、张木千、阮荣汉为临时省委代表团代表，以汪六一为代表团书记，代表临时省委直接指挥一、三两路游击队及苏区各级党的组织。

第三、苏区各级党与苏维埃的组织今后的工作方式，应当随着军事的变动而变动，即是经常准备机关的移动。

(八) 结论

根据以上的报告，可作以下的结论：

第一、从去年特委十月临时执委会以后到鄂豫边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党的指导力量的确比过去健强数倍，一般党干部开始了解和什么是国际和四中全会路线，并且开始知道怎样在一切党与苏维埃工作中去执行国际和四中全会路线。虽是这样一切党与苏维埃的工作的转变速度却这样的慢，所谓是一种再蠢笨没有的速度，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客观环境的影响，敌人的围攻来的太快，但最主要的还是主观的力量太薄弱——干部的缺乏：对党的一切主要决议和指示的了解和执行得太不够！

第二、土地革命不彻底，未正确的执行苏区经济政策，使贫农、雇农未真正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

第三、未彻底改造苏维埃，未将广大的贫农、雇农和工人成份吸收到苏维埃政府中来。

第四、群众组织如贫农团、雇农工会等未真正建立起来，未获得广大雇工、贫农来参加。

第五、因为受立三路线的影响太深，各级党与苏维埃的领导工作人员都“喜欢”作虚伪的好听的不切实的报告，以致工作的检阅非常困难。

第六、红军武装力与战斗力都非常薄弱，群众的失败情绪又高，在地势上又非常坏，敌人一出门就可到苏区中心，一天就可以跑遍苏区（这单指襄枣宜苏区而言）

第七、干部人才缺乏，尤其襄枣宜钟苏区方面更可怜万分（第三军派来在二十六师担任政治委员的马三光同志曾这样说：“在湘鄂西调个支部书记来都可以担任襄枣宜钟苏区的县委书记），尤其是现在的临时省委只有两个人工作，事实上尽[只]等于一个人在于。

第八、与中央不能建立密切的交通关系，因此，便很困难经常得到中央的指示。

(九) 对中央的要求

1. 要派十个以上的干部给我们！其中师政治委员、师长、省苏维埃主席、经济财政委员会主席、党的宣传教育部部长和组织部部长各一人，青年团省委书记一人，厂大 Y 工作人员、女同志医生各二人。

2. 要督促三军经常沿着襄河北岸游击造成荆门、京山、应城、天门、钟祥数县的游击区域直接先造成钟祥的苏区与鄂豫边苏区很迅速打成一片，第

四军也同样要执行他们向我们的提议，要使四军在很短期间内与我们有次军事上的会合。

3.要通知湖北与河南省委要与鄂豫边临时省委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尤其是要多给以实际帮助。

鄂豫边临时省委

沈宗源（签）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写于中央

鄂豫边临时省委关于军事问题给中央军委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

中央军委：

鄂豫边苏区此次之所以遭受这样大的打击，在军事上亦有大的关系，因此有在此地单独在军事上向中央军委作报告的必要，不过这一报告的内容只限于鄂豫边整个苏区中之一部分——襄枣宜钟的材料，都是只限于二十六师的材料。

襄枣宜钟苏区此次遭受了这样大的打击，完全放弃苏区后方，采用“分头游击”来保持这一小块苏区，自然在军事力量上，敌人比襄枣宜钟所有的武装力量超过四倍以上，但在主观上襄枣宜钟苏区内所现有的武装力量二十六师和各游击纵队的战斗力太薄弱。

第一、关于红军二十六师方面：

1. 武装力量， 现 在红军二十六师全师所有的长枪仅三百七十支，机关枪与手提枪各一架，杂色手枪约四十支，长枪子弹每个红色战士经常只有两排，手枪子弹则比较多点。

2. 红色战士的成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贫雇农成分。

3. 红色指挥员的成分有百分之六十的工农成分。

4. 二十六师中党的组织，训练和党员的数量和质量，在整个二十六师中的党的组织在“分头游击”以前曾经正式建立起来，在党的小组会议上也经常讨论党的重要决议，党员的数目约两百多人，其成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雇农和中农。

5. 二十六师的政治工作，在二十六师的五个纵队，教导队，骑兵连和手枪队里面均派有固定的政治指导员，无论在野外作战与平时休息时都在加紧政治工作，其主要的教材都是将红军的阶级性，革命的任务，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苏联建设及国际形势等材料通俗化起来编成多种政治问答，来教育一般红色战士。

第二、关于各游击纵队方面：

1. 武装力量，在一、二、三、四、五各游击纵队总共有长枪三百九十支、手枪约二十余支。

2. 红色战士与指挥员的成分，在游击纵队方面的成分较坏，一般战士约有百分之五十的贫雇农，指挥员的成分差不多都是中农、贫农或富农。

3. 党的组织，训练党员数量和质量，在各游击纵队中党的组织在去年十二月初才正式开始建立起来，一般党的教育工作则非常的落后几乎等于没有，党员的数量约在七八十人左右，每个纵队的党员具体人数这里不能报告出来（因为记不清楚），其成分则大半都是贫雇农和中农。

4. 政治工作，政治指导员虽然每个游击纵队都有一个，但都是从去年十二月初才开始派去的，政治工作则除第三游击纵队外，其余的各游击纵队都说不上有什么政治工作，因为一切都是才开始。

以上是关于襄枣宜钟苏区所有武装力量——二十六师和各游击纵队的武装，政治和军事的准备，关于他们的实际战斗力呢？1. 一般的说来，如果是分开作战的话（二十六师与各游击纵队的单独作战），二十六师还赶不上各游击纵队。因为一、二两游击纵队联合起来曾打败罗启疆旅之六百人，而二十六师的全师还不能战罗部之一营人。

2.以整个二十六师和一、二、三、四、五各游击纵队联合起来不能战胜敌人正式军队一团人。

3.二十六师从去年十月底至现在从没有打过胜仗，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分头游击为上所打的败仗在二十次以上，在这二十多次败仗内，曾经攻打过四个寨子，而且没有攻下任何一个，并且遭受了大的损失。

关于襄枣宜钟苏区遭受打击时，在军事力量就是这样，然而在遭受打击前的军事准备又怎样呢？

第一、军委会的建立：为要冲破第四次“围剿”中在军事上有统一和健强的指挥，于去年十一月的苏区第一次军事工作人员会议上建立了一临时军委会，名义附属于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在鄂豫边党的最高指导机关特委指导之下。该委员会组成有以下的几个同志：李政（军委正主席），沈宗源（副主席兼教育征调科科长），郝久亭（参谋部主任），吴守[首]青（经理部主任），谭中余（谍报科科长），韦克铎（军工科科长）和陈雪怀等七人。

第二、军区的划分和布置：1.关于军区的划分：将襄枣宜钟的整个苏区划分五大军区，一个军区总后方——总指挥部，在每个大军区下又设若干的小军区，每个小军区均以直接管理和指挥他的大军区中之军区中心点为他的后方，同时在每个小军区内又有一个军区中心点为每个小军区的后方，与敌人作战失败时无论如何只能退至每个大军区的军区中心点，即是以每个小军区之边界上为第一道防线，以每个小军区之军区中心点为第二道防线，以每个大军区之军区中心点为第三道防线，退至第三道时绝对死守。

2.关于军区的布置：（一）实行动员计划，在十天以内，在全苏区内要动员五万以上的武装战斗员。（二）分战斗员为先锋队与预备军，以青年壮丁担任先锋与敌人作战，以老人妇女担任后方的防御。（三）在平时人民仍散住各乡村，到敌人来时则有秩序的分头集合作战，老人妇女则集中于小军区之军区中心点。（四）将粮食集中和理藏于大军区的军区中心点。（五）组织侦察网。（六）组织交通队。（七）宣布特别戒严。（八）加紧赤色清乡和肃反工作。（九）集中和向外发展经济。（十）加紧向苏区附近之白区内游击，袭击敌人和抗敌人的后方。（十一）建筑防御工事。（十二）为了军事指挥统一和便利起见，在每大军区与每小军区均设有军区委员长一人，在每大军区下面设参谋、作战、谍报、粮食、经理等各科，每科均有科长一人指挥之。

虽是这样，虽是在军事上有以上的布置（当然这种布置并未完全实现）但结果因为战斗力的薄弱、遭了以下的失败。

第一、从去年十一月中旬一直到鄂豫边区代表大会停止的一天（见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在枣西南方面曾以二十六师全部配合一、四两游击纵队和赤卫军，结果未曾有过一次以上对于罗启疆部队以大的打击，始终不能恢复被罗启疆匪军摧残殆尽之二、四、六三大区，而且更引起剩下的枣一、三、五三大区的全部动摇。

第二、从今年一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在苏（区）中心的襄东，曾经集中全苏区武装力量配合群众而不能消灭驻在赤区中心之一团匪军（五十一师之三 一团），结果还遭大的损失，更因为这次的失败，引起了一次总退却，虽然这次总退却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见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第三、在二月二十六日二十六师用全师力量去截获罗启疆匪军三营而遭

受大的失败。

第四、在二月二十二日以二十六师全师配合三、五两游击纵队和赤卫军在苏区后方去截击五十一师之三三团之一营，结果被敌人追至距后方只七八里路，使后方根本动摇，更因这次的失败，在襄枣宜钟苏区才决定采用放弃后方进行分头游击，即是以二十六师全部改编，将[为]第一路游击队，在枣西南枣东北和襄东一带游击，以一、二、三、四、五各游击纵队改编为第三路游击队，在宜东、钟北和枣南三区一带游击，到万不得已时，一、三两路游击队联合起来，向唐县、桐柏和泌阳三县交界处游击，一面造成新苏区，一面与鄂豫皖取得联系。综观以上各段关于襄枣宜钟苏区在军事上遭受这样大的打击，其主要原因是：1.敌人的武装力量超过苏区的武装力量过大。2.苏区原有武装力量的战斗力太薄弱。3.军区未真正健强起来。4.粮食未集中。5.经济没有办法。6.群众与二十六师及各游击纵队的失败情绪太深。7.群众既少而又不能动员，甚至连党部难动员起来。8.一切党与苏维埃的工作没有基础，群众组织如贫农团、雇农工会都是一些空架子。9.苏区各种干部人才缺乏到极点。10.敌人除利用蚕食的策略进攻苏区外，更采用欺骗政策，如领良民证，不烧非党群众的房子，尤其是五十一师见群众逃难不迫。

沈宗源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写于中央

中共湘鄂西省委给襄北特委的指示信（省字第 12 号、襄字第 1 号）——
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领导灾民和失业工人斗争问题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九日）

襄北特委：

省委讨论了你们三月八号对天潜京特区的决议以后，认为这决议是丝毫不能推进天潜京的工作的，而且犯着极严重的政治错误，省委有立即给你们指示的必要，要你们在省委给襄北特委的决议及这一指示信的基础上，另给天潜及京山党以后的指示，确定他们具体的任务和工作，完全代替这个决议。

这个决议主要的错误完全是用国民党的方式去指导工作。没有正确估计当地的具体的环境，没有依照群众斗争的发展实际来布置工作，而是很空洞的照例写一些不关痛痒的话，据省委从各方面所得的材料，天潜以及京山的群众成千成万的起来，打出红旗帜，自动组织苏维埃，天天的[与]豪绅地主和富农斗争，并与保卫团，黄旗会等反革命武装[斗争]，组织广大群众斗争热烈，这样的发展，而你们却还在做梦说：马上有爆发游击战争的可能，这是多么的笑话呵！

这个决议错误的重要性是把建立政权和土地革命的任务根本忘掉了，天潜以及京山党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站在群众的前面，领导广大雇农、贫农、中农分粮斗争，以至实行土地革命，组织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建立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扩大游击战争，发展农民委员会的组织，与游击运动汇合起来，当然你们在决议上已曾部份的提到一些问题，但这种提法是没有用的，特别是对于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实行，连影子都找不着，这样执行国际路线，简直成了一句漂亮的空话。

对于灾民斗争的严重也估计得不够，天潜一带差不多完全水灾区域，当然灾民斗争成为群众斗争的中心问题，同时外县群众大部分集[中]到襄北，京山成为灾民斗争的中心地点，你们不但要指示天潜以及京山的党要用很大力量去组织当地实际群众的斗争，并要加强外县灾民群众中的组织和工作，要把灾民好的领导，到白区去成为发展苏区的一支伟大力量。不应有丝毫忽视，听其无阶级性的乱斗，侵犯基本群众利益，反增加自己在工作上上百倍的困难。

你们把堤工工作看做是一种宣传性质，取消了自己实际动员群众去修筑的迫切任务。四港的溃口，马上号召群众去修筑，主要的当然是靠群众力量解决，经费方面，苏维埃就不吃饭，也要保障堤工的进行，这正是我们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主要工作，更能使群众认识苏维埃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不同。

其次如对工会工作没有着重提出，对失业工人斗争没有提出具体方向（只是发动在业工人以罢工方法去援助失业工人的复工斗争一句话），以及把游击运动看成单纯的军事行动，也是非常错误的，省委希望你们接到这一指示后，能够实际去领导天潜和京山的工作，站在群众的前面，运用国际路线进攻的策略，发动千百万群众的斗争去巩固和开展襄北苏维埃运动的胜利。

省委

三月十九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团湘鄂西省委关于对日宣战问题告全体同志书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日)

亲爱的全体同志们：

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更加积极了，最近大批的海陆空军增防于中国务要隘，占领吴淞、江湾了，决定沿黄浦江的×基罗米×（约二十五华里）以内不准驻扎华军，永远解除中国吴淞与×山炮台的武装，沿长江的五大口岸不准驻扎华军。同时日军又进兵中东路线，组织白俄及指使×赵的自卫军已开始向苏联进攻。这些严重的事变是说明什么，这是说明了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开始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在瓜分中国的利益冲突上，急剧的开展着内部的矛盾，最近美国海军下令集中舰队于太平洋，同日本作争××××××，十九路军中有美国派来的德国顾问，这些事实又说明了什么，这是说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已经部分的开始了武装冲突。

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显示了无力抵抗，迁都洛阳，决定西安为陪都，是国民党进一步出卖民族的利益的无耻投降帝国主义，是××在帝国主义的指示下来作进攻苏联的先锋队。在一切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国民党不惟不会去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并且他更要去作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镇压中国革命的先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决议对日宣战的意义，是用民族的革命战争来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用革命民族战争去反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反革命战争。为着实现这个任务，必须领导全国的劳动青年群众首先推翻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国民党统治。因此，打倒国民党和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是组织革命民族战争所不可分离的两个共同任务。

亲爱的同志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战争更加紧迫了。国民党无耻投降××、镇压反×群众、出卖民族利益的事实是异常明显了。省委要号召湘鄂西的团员同志来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日宣战的决议。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千百万的劳动青年去反对帝国主义反革命的战争，反对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去参加革命的民族战争，用革命的民族战争去消灭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

为了要实现这个任务，省委要求全团同志百倍努力去实现以下的具体任务：

（一）共产青年团的初步任务是与军国主义作不断的斗争。反革命的统治将会用军国主义去麻醉与欺骗广大的青年群众，驱使他们到战场上去作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殖民地革命的工具，他将要欺骗广大的劳动青年去作为帝国主义自身利益的冲突战争的炮灰。因此，反对军国主义是我们对战争的主要工作。湘鄂西的团应当马上起来检阅我们过去对这工作执行成绩，在主力军、义勇军及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来加紧反战争的宣传，来加紧在这些军国主义的军事组织中夺取青年群众的工作。

（二）立刻实现对日宣战的决议。我们要动员广大的劳动青年用武力制止日本商船和兵舰在苏维埃区域长江内的航行，在长江沿岸各要隘布置炮台与工事，动员广大的少先队员轰击日本商船与兵舰，同时要制出各种对日宣传的口号。

（三）我们集中一切力量去巩固襄河北岸的苏区，要争取与实现中央分

局所提出襄河北岸扩大七县新苏区。在“五卅”节完成动员群众一万人参加红军的提议。我们更要加紧宣传组织民族革命战争对日宣战的问题，深入到一切青年群众中去，动员群众极热烈的参加少年突击队、少年模范团去慰劳我们的红军，要动员全县二分之一的力量去建立襄北的工作。

（四）马上去检查各反帝同盟青年部的工作，转变目前反帝青年部机关主义工作方式，召集反帝青年群众大会、团代表大会来改造青年部，发展会员，使他真正成为群众的组织，使他能够真正的去领导广大劳动青年来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战争。

（五）决定于“四·一二”举行全湘鄂西对日宣战总示威。省委要求全团同志的努力，来积极在少先队、儿童团、青工部、红军中来进行准备工作。因为“四·一二”又是我们三代会举行的日期，所以他的意义更加伟大，我们要使“四·一二”对日宣战的总示威和拥护少共二代大会的工作联系起来。

省委要重复的告诉全体同志，虽然我们在敌人四次“围剿”中获得了一次、二次的胜利，虽然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剧烈化的开展着，然而他们在进攻苏维埃和红军问题上是完全一致，帝国主义，国民党决不会放松了对革命运动的进攻。最近日本派兵舰两支经海丰苏区，在九江驻有大批的兵舰和陆战队，国民党在一、二次进攻××失败，近日又调来了大批的军队。这是说明了什么？这些事实是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正在拼命的来进攻中国的苏维埃和红军。因此，击破敌人的四次“围剿”，是我们对日宣战、组织革命民族战争的首前提。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使湘鄂西的青年团员负起这样大的任务，因此省委要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来揭发隐伏在湘鄂西团内对反帝运动几个不正确的倾向：认为苏维埃区域内没有帝国主义；认为只有到武汉、南昌才会与帝国主义冲突，所以目前反帝工作不是重要工作。因为帝国主义内部矛盾××××了，这样会减轻敌人对苏维埃和红军的“围剿”，甚至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团员还没有去讨论省委“关于反对二次世界大战的决议”。这些严重的××××动取消的机会主义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更有妨害了我们动员青年群众组织革命民族战争的工作。

亲爱的同志们！中央代表和省委会坚决相信，我们湘鄂西的全体同志一定能够运用和学习在过去斗争所得来的经验和教训，去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在中央和省委会正确领导之下去揭发一切对反帝运动的不正确倾向，很迅速的去实际执行我们的中心任务——组织革命的民族战争，消灭反革命的战争，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努力吧！全体亲爱的同志们，环境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犹豫，是不许我们有一分钟的迟延了。

鄂豫边临时省委沈宗源给中央的报告——回答中央提出的问题*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

昨天×同志代表中央给了我几个带批评式的问题，并要我立刻作个口头的回答，谁知我还未答复完的时候，×同志便说道：“你后面说的都不十分重要，我还有别的事，你就在旅馆住着，我三天后来找你……”，因此我认为在有向中央写第二次申明书的必要同时这还可以作为中央和中央审查我这次来的经过的材料之一。×同志代表中央向我发了以下的问题：1.你为什么写信给韶玉？难道韶玉可以代表党吗？2.你的报告太空洞。简直象个第三者作的，决不象在那里实际负责的人作的。3.你去了五个月，光是在那里吃饭，工作成绩毫无。4.工作既是倒了台何必还成立什么临时省委呢？！5.情形既这样严重，你为什么跑来中央呢？！兹分别答复如下：是否正确请中央去审查。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我的俄文是很不好，写信是半通不通，但在我给韶玉的信中决看不出我是“不找组织”，而找韶玉个人，决看不出以韶玉来代表党，在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因为我经过互济会中央给了中央两封信并在旅馆内等了将近十天还未见中央派人来找我接头，因此便写信给韶玉请他催催中央快些来与我接头”。同时因为我所知道在中央工作的又只韶玉和其他一两个同志。所以便写了封信给他，事实便是这样，并请中央去重新检查我给韶玉那封半通不通的俄文信，至于说到我不应该经过互济会来找中央接头的错误，在给中央的第一次申明书上已承认过的兹不赘。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的我给中央的报告是太空洞，但据个人现在所感觉的，同时也是×同志代表中央所指出而批评我的就鄂豫边苏区共有若干土地？分了与未分的有若干？鄂豫边苏区共有若干人口，分得土地与未分得土地的人口各有若干？这些具体数目字一个也没有？这是因为过去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下面没有土地委员会的组织，直到去年十二月初鄂豫边特委迁移到襄枣宜钟苏区以后，才开始调查统计，可是因为工作速度慢得再蠢笨没有的慢，一直到分头游击以前尚未调查统计清楚，因此在报告里面便举不出来，在这里更足以证明鄂豫边苏区过去给中央关于土地分配的数目字都是报告人虚造的！

关于第三个问题的答复：当然呵！如果拿这次因为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使鄂豫边苏区遭受了打击和一些失败的事实来说，我当然成了“饭桶”了，工作成绩一点也没有了，因为中央是根据如果我不是光吃饭，工作成绩毫无，鄂豫边苏区怎能因为第四次“围剿”而遭受这样大的打击和失败的理由来批评和问我的，而同时这次重大的打击和失败都是我指导之下（当然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还有鄂豫边整个的党——特委在内）发生的，关于这，我当然是承认，尤其是关于此次总退却的错误我更应当特别承认（在报告中已指出），我并且决定在等中央将鄂豫边整个苏区问题解决后，对于总退却问题的错误，要请中央给我以严重的处罚，虽然这次错误的本身我曾经向鄂豫边苏区分局提出来追究和审查过，如果要是以追求此次鄂豫边苏区遭受打击和失败的全部材料来说，尤其是将来从鄂豫边旧的特委书记郝久亭同志带来或直接由中央往湘鄂西省委要来关于鄂豫边整个的党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的一切重要文件中可以证明出来，证明出来他们对于鄂豫边区党的全盘工作是怎样按照中央的指示去改造的。是怎样去准备和进行冲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们并且遭受打击和失败，他们又怎样来继续冲破敌人的第四

次“围剿”和保持现存的一部分苏区，同时在这些材料和事实里面便附带可以证明我是不是在“光吃饭”

关于第四个问题的答复：临时省委是根据以下的理由建立起来的。

1. 根据中央要改组鄂豫边特委的指示。

2. 因为第四次“围剿”的影响，鄂豫边区第一次党的代表会未开完毕，旧的待委也未改组。

3. 因为总退却的错误，旧的特委须得立刻改组。

4. 在湘鄂西省委与鄂豫皖中央分局都曾向鄂豫边苏区建议，在鄂豫边苏区有组织鄂豫边省委与省苏维埃的必要。

同时鄂豫边临时省委是在二月二号的紧急会议上建立的，他在建立的时候并未希望着他的工作将来要会“倒台”反之，他更希望着他的工作将从此更进展，而且临时省委本身的建立就根本与后来“分头游击”没有什么冲突的，如果以现在的“分头游击”就认为是鄂豫边苏区工作的“倒台”这问题还要请求中央将来讨论鄂豫边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时再来讨论，因为“分头游击”是因为苏区本身的力量太不够，不能冲破敌人的“围剿”（即是用死守的办法来与敌人力量超过红军四倍以上的情形之下来保存鄂豫边苏区是绝对不可能，同时何况一切党与苏维埃及群众组织都没有基础……），因此便采用实际的游击战术，以襄枣宜钟苏区内所有的武装改编为两路游击队，每路又各分成三个纵队并以襄枣宜钟苏区中之大山为界限，第一路游击队担任山南游击其范围为宜东，枣南三区，钟北区以及襄南二区等地带游击，以第三路游击队担任山北游击，其范围是枣东北，枣西南及襄东等地带游击，将苏区后方放弃，各级党与苏维埃组织的机关亦经常移动，即是敌人力量小则与作战并乘机消灭之，敌人力量大则退让冲出敌人的“围剿”以外，在当时的鄂豫边临时省委认为这是继续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保存鄂豫（边）苏区唯一的办法和出路，这并不是很简单称之为工作的“倒台”。

关于第五个问题的答复：我代表鄂豫边临时省委来向中央作报告，如果真的错了这并不是我简单个人的问题，即是我来中央是有使命是得着临时省委的同意而来的，至于关于中央要审查鄂豫边临时省委的一切主要文件问题，最好是直接向湘鄂西省委要去（今年二月初湘鄂西省委交通由鄂豫边临时省委转去时曾带有临时省委一些文件，因为恐怕鄂豫边旧的特委书记因出苏区的困难而延长来中央的时间）。

关于介绍信问题在第一次给中央的申明书内以[已]专门说及并承认了这种错误兹不赘。

最后我根据×同志昨天代表中央给我谈话的情形看来中央对我此次来上海，的确对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怀疑和不相信，而且正因为这样对我要发的批评和问题一定会还有的（这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或者“做贼”心虚吧），因此我对中央便有以下的诚恳的请求：

第一、请中央暂时一定要将鄂豫边整个苏区问题和我个人问题应当分开来解决，一方面因为从我离开苏区到现在已将近一月，照事实上说来我现在已应当得着中央对鄂豫边整个苏区问题解决的结果而开始动身返鄂豫边去了，另一方面因为整天在旅馆住着又不可以，数马路吗，地方又不熟，要求中央给地方我暂住吗，又怕×同志代表中央骂我“官僚化”，将我自己看得好大好粗！

第二、关于我个人问题，待将鄂豫边整个苏区问题具体解决以后（同时

在解决此问题的时候，还可以得出我个人错误的材料），再对我的错误作一次详细的查明，中央根据错误给以任何的处罚我都接受，或者甚至于一直到断绝我的政治生命——开除党籍为止！如果真的应该受那样处罚的时候。

第三、根据以上的两个请求，再请求中央在最短期内开会讨论鄂豫边临时省委的报告，如果中央对我个人参加讨论而有不放心的地方，请于开会地点秘密布置两个带手枪的 Y 就够了。

此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沈宗德[源]

三月二十一日

中共湘鄂西省委给沔阳县委信（省委第十三号、沔委第一号）——指出
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的缺点*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省委审查了你们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有以下的指示。

（一）这一决议的主要缺点，是不实际”在这决议中很少新的内容，多半是把实用的原则抄一遍，列如春耕、修堤、灾民等工作，都不是比省委所规定的办法更具体化些，其他大致同，这样决议，就不会产生实际的工作。

（二）没有着重白区城市、白军的工作，指出这是目前扩大苏区，发展革命战争中的几个重要工作，没有细心讨论过去做这些工作的经验，定出、具体的工作计划。

（三）在整个决议中，没有反官僚主义的精神，仿佛证明没有官僚主义的现象，事实上沔阳官僚主义正笼罩着整个工作，工作上停留在机关里面，不深入下层，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军[家]长制度还非常浓厚，党内党外的自我批评没有发动，以致下层群众未能反映上来，党和苏维埃成了脱离群众的现象（如沙口区把国民党十大罪状一句句的拆开写成标语，以致发生严重的政治错误，你们不知道），因此你们找不出新的材料来充实这一决议的内容，只好敷衍地写上一些空洞文章，同时因为官僚主义的原故，发展了沔阳的腐化贪污现象，机关布置的辉煌，工作人员的讲漂亮，扯公款（把合作社资金有的扯一百余串）等，这些现象被掩盖在官僚主义之下，没有揭发出来受到群众的公开批评与苏维埃议会的制裁。

（四）没有提及者苏区完成平分土地问题，实际上沔阳老苏区的土地，尚有许多没有平分，继续着富[农]路线，至说苏维埃尽量经营荒田，是不正确的，要扩大生产，主要的是要尽量帮助农民经营，假如苏维埃有力经营荒地时，便应当用那力量去帮助贫农、中农。

（五）经济财政是苏维埃建设的主要部门之一，现在沔阳的经济财政一般的混乱状态，是决议案没有谈到，还是你们未了解苏维埃建设的重要。

（六）工会是整个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组织，他的重要不能与其他组织相提并论，你们把工会工作轻轻的带在一报[般]群众内写于[了]一点，这还是忽视职工运动。在贫困他完成[全]是苏维埃工作的一部分，直接受苏维埃的指示，不能与苏维埃工作分开。在党对群众组织领导上，你们还没有提到要经过党团，亦会使同志们忽视党团工作，助长党代办群众组织的现象。

（七）在地方武装方面，没有提及赤卫军、少先队，这是你们地方武装，只认为只有枪枝的游击队，而未与地方武装[结合]，应是广泛的赤卫队少先队等地方群众的武装组织。

（八）在当时湘鄂西要坚决反对破坏与中农联盟的任何企图，这是紧迫的任务，可是“党永远保持中农联盟”的话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应改为党必须保持与中农联盟，此问题容再[在]党报上解释。

（九）党对团的领导是政治上的公开领导，并非定要经过兼党团员不能领导的，我们只可说党在团内应有许多兼党团员，藉以加强对团的领导和训练，各级团部的书记，参加党的委员会一定要是兼党团员，并经过党的选举，无所谓当然会员至团员兼党，并不是所有团员兼党。

（十）拥护红军，苏维埃只应领导和动员群众公做，而不是苏维埃命令

群众拥护，群众的拥护物品，要集中政府送给红军，苏维埃应动员群众去自动做。

以上几点望即提出会议讨论，提出污阳实际情形，具体的补成决议，总之以后工作应切实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一切决议，须非常切合地方情形，一切工作深入下层去。

省委

三月二十四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报告——关于少共工作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关于湘鄂西少共工作的详细情形，中央可参看少共省委对团中央的工作报告，这里只着重说到团目前工作的一般现象与党对团工作领导方面的问题：

(一) 省委认为少共工作自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少共三特扩大会举行后是更加深入了，在实际工作中国际路线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1) 平分土地反富农斗争中团的领导与动员了广大劳动青年群众热烈的参加，在斗争中实现了十四岁以上劳动青年分得全分土地的口号，并显示了青年在斗争中的积极性，执行了革命竞赛的方法，动员了大部青年参加生产运动，如生产竞赛、建立水利，借券的推销，修堤竞赛的举行。(2) 团的组织发展，由八千六百一十九名(三特扩大会时)增到一万八千四百二十九名(十二月份)，相当的提拔了工农新的干部，参加了各级领导机关，开展了团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在新苏区与白区(如宜昌特委等)都建立了团的组织。(3) 少先队青工部儿童团已经由过去登门造册的方式转变到自愿的组织，少先队里广泛的有了“列宁驳壳”(土枪)并且能够配合游击队，红军作战，开始了模范队的建立，青工“十月红”和年关斗争的发动，特别表现着热烈和积极。(4) 领导青年拥护红军的工作获得了相当的成绩，洗衣队、慰劳队、担架队、鞋袜队的广泛建立，特别是在红三军回到洪湖后各地青年送鱼、送菜、送鞋，热烈参加红军的踊跃，最近正在开始模范团的开办。(5) 白区白军灾民工作，最近已开始注意，派去了很少的干部，打入到主要白区市镇和白军部队中去了，灾民中青年工作在沔阳、监利两县是获得了相当成绩(如领导灾民往白区斗争等)。(6) 文化工作在最近已经开始恢复和建立，如驱盲运动的开始，群众俱乐部的建立，列宁学校的恢复等。虽然在这些主要工作上获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也决不能掩盖了目前湘鄂西少共工作严重的缺点，团的组织还落在党组织发展之后，还没有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群众组织。在各种实际工作动员上免不了命令主义的残余，忽视了动员积极劳动青年参加苏维埃工作，白区、良军、青妇、反帝工作直到现在还不能表现出很大的成绩。团内悲观失望，对目前革命发展新形势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还没有遭受到应有的打击。团内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和两条战线的斗争，还没有真正的深入支部，当然在最近工作布置上是完全接受了党四代会的精神。

(二) 湘鄂西党对少共工作的领导在立三路线的时代是一贯的取消观念，由中央分局扩大会后，已开始了转变，省委开始注意对少共工作检查，并且决定各级团部主要负责人参加各级党部委员会，然而这种关系改善，事实上仅仅在省委本身是相当执行了，在各下级党部间仍充满着对团工作倾向(如不派人参加会议，乱杀团员，不许青年参加反富农斗争，不检查与领导少共工作，不经过团组织直接调动团负主要责的干部等)，这样就更加帮助与增长团内先锋主义脱离党领导的现象，这是说明了湘鄂西党还没有能够真实了解少共工作，是党主要工作的一部，还没有了解加强对少共工作的领导是党必须的任务。四次大会很严重的指出这些决不容许的现象是一分钟也不能使他们继续下去，必需在团内吸引二十岁以上政治工坚定的积极团员大批入党(仍在团内做工)，这样在组织上去加强对少共工作的领导，同时各级

党部必须经常的听少共代表工作报告，来检阅与指导他们的工作，建立起湘鄂西党团正确的关系。

省委

三月二十六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对宜昌特区农民运动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宜昌特区农民运动目前发展的阶段

(一) 宜昌各县农民斗争历史与经验。宜昌农民在历来受到豪绅地主的严重剥削及连年灾荒的痛苦生活之下，曾经在松滋爆发过两次广大的饥民斗争，及瓦厂暴动，这些斗争是表示了群众的伟大力量，可是在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之下，没有扩大这一斗争，没有武装农民，没有提出土地革命，使斗争从扩大党走入更高阶段，结果遭受到敌人的压迫和残酷屠杀而完全失败，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教训。

(二) 目前农民斗争的阶段及其发展的前途。正因为敌人的更加压迫与剥削，与连年不断的灾荒，特别是去年灾荒，使群众的生活更加痛苦，而继续不断的爆发松滋、宜昌、当阳、公安等县的广大的饥民斗争，这一斗争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继续发展着，而且有游击队的帮助，同时游击队在广大群众斗争配合之下，已得到几次的胜利，而夺取了敌人的武装，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在松滋、当阳两县建立了群众基础，很明显这一形势已经走到游击战争，开始了南岸已[以]松滋为中心发展到公安的联系，北岸以当阳为中心发展到荆西的联系，开始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新根据地，更广泛开展松滋、公、当、五县境内普遍的游击战争的阶段。

二、目前宜昌农民运动表现的主要弱点及其前途

(一) 现在的饥民斗争，还是停留在几百人的斗争范围以内，没有很普遍的发动饥民斗争，没有发动广泛的抗租税的斗争的配合行动，来扩大这一斗争到更广泛的区域，没有从斗争中加紧武装群众，这一斗争还是孤立而且狭小。

(二) 没有从斗争中广泛的组织群众，没有农民代表会议形式的农区[协]组织，没有各种斗争委员会的组织，围绕到农协的周围，没有把贫农整个吸收到农协组织中，在农协里组织 贫 农小组，使他成为农协中的坚强骨干，因此组织力量还很狭小而且薄弱。

(三) 没有普遍的发动雇工的经济斗争，没有雇农工会的强大组织，来有组织的加入农民协会，因此，没有建立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这是最主要的弱点。

(四) 如果将组织仍然缩小在现在范围内，不能迅速补救这些弱点，很容易在敌人压迫之下，遭受到失败，现在积极要求补救这些弱点，将斗争发展到更扩大更高的阶段，才有继续不断战胜敌人的可能。

三、宜昌特区农民运动目前的中心任务

在实际各个苏区已打成一片的总的任务之下，宜昌农运的中心任务。加紧扩大现在的正在发展的饥民斗争，提高到土地革命的更高阶段，建立松滋、当阳的根据地，开始苏维埃在松滋、当阳的首先胜利，经过公安、荆门与江湖苏区取得联系。更进一步的普遍的向上开展宜昌、宜都等县农民斗争，扩大游击运动，将这两县的农民斗争扩大，造成广泛的游击区域，以至由没收土地、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来包围宜昌，以配合宜昌的工人斗争。这些斗争要更进一步向上发展，由宜昌、长阳及秭归、兴山与五鹤峰巴房苏维埃取得联系，实现各个苏区打成一片的任务。在这一总的任务下，要注意执行以下的具体的任务：

(一) 立即在当阳开始没收土地、分配土地，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政权，以当阳为中心向下发展与荆门取得联系，造成一片苏区经营长湖包围荆沙……。

(二)……略。

(三) 广泛的发展这两区域周围群众的游击战争，造成根据地的外围，加紧游击区周围(宜昌、宜都、长阳)的秘密组织，更普遍的开展这些区域抗租、抗税等斗争，以消灭在发展中的赤白对立的危险，从斗争中将游击战争更进一步发展到这些区域，更广泛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

(四) 在斗争中须注意组织群众，立即把现有加入斗争的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在农民协会中，除富农不许加入外，应将雇、贫、中农完全组织到里面，组织农民代表会议，使成为苏维埃的雏形。在农协中将贫农组织贫农小组，成为农协的有力中心，是转变政权时之贫农团的初步。更应普遍发动雇工的经济斗争，组织雇农工会，同时注意店工、纸工的斗争与组织，以建立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特别是土地革命的领导。

在农民运动中，须注意建立反帝组织与日常工作，将斗争的群众大量组织到反帝大同盟里面，要注意土地革命与反帝是不可分离的任务，从这些斗争党团都要大胆向雇、贫农、工人大开门，以转变党团的阶级基础，这些组织都要注意吸收青年和妇女参加。

(五)……略。

(六) 对大刀会、汉流都以很大力量去打入他们的组织，吸收他们的群众和群众的家属，参加抗租税、抢粮、分粮等斗争，主要是以土地革命去影响群众，分化其阶级，夺取群众，反对其首领，以群众的力量去瓦解其组织，这一策略宜昌党必须具体的讨论有计划的执行。对汉流一部分已成土匪的群众：正应适用中央分局对土匪的策略，还未加入土匪的汉流群众，应照一般群众看待。发动群众反编练队斗争，主要是反保甲、团董，对编练队群众，则可用抗租税斗争夺取之，以瓦解其组织到更进一步反豪绅地主，没收土地财产分给群众，直到建立革命政权。

(七) 在农民运动中，特别要注意传布[播]红军、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在开始有组织的地方，应组织群众拥护红军，经常传达红军胜利的消息，来兴奋群众，动员贫雇农、工人参加红军，最好的中农亦可吸收。在群众中要建立拥红会的组织，时常组织拥红代表团慰劳红三军，使红三军与宜昌群众关系密切联系起来。

(八) 在农民运动中要注意川军与团防士兵运动，以反帝和土地革命去影响他们，对团防士兵的家属，应注意吸收他们参加各种斗争，及分给斗争中的所得利益，去影响团防士兵，更应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凡拖枪与兵变来参加革命的士兵，都应分给土地。

(九) 此决议完全是根据中央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与四代大会决议的精神，配[结]合宜昌农运的实际情形所定，这一决议与四代大会的决议是不可丝毫分离的。因此，宜昌党要执行决议，必须坚决接受和传达大会精神，反对保守观念及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丝毫也不能放松“左”的危险，只有正确运用真正组织群众的策略，才能达到这一决议的全部实现。

省委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如此。

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 (一九三二年四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全体军事政治指挥员和全体红色战士：

(一) 目前革命形势的急剧开展与红三军的战斗任务

一九三二年正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第一次五年经济计划成功又开始第二次五年经济计划的时候，也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扩大革命战争，对日宣战，为了推翻国民党统治，将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而领导千百万劳苦群众进行极残酷战争的时候，因此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军阀和一切反动势力正在疯狂似的想进攻苏联和用血来消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蒋介石、陈济棠、徐源泉这些反动将军，正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来进行对于苏区和红军的进攻。我红三军的任务就是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湘鄂西省苏维埃指挥之下，开展襄北土地革命，彻底消灭四十八师、四十四师、四十一师等反动军队，消灭这些阻碍我们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之反动军队，与鄂豫皖打成一片，造成威胁武汉的局面。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我们将开始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是我们最光荣的战斗任务，我们这里将给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而阻止帝国主义对于苏联的进攻。

(二) 红三军的优点和弱点

正因为斗争更紧张了，我们的任务更重大了，巩固我们红三军，造成政治上坚定富有战斗力的铁军，造成为共产党领导之下，不仅为目前的土地革命，而且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但为中华苏维埃，而是为全世界的苏维埃的国际队伍，只有真正是“共产主义的铁军”，我们才能担当这样巨大的任务，因此，军委会首先向你们提出改造红三军的任务。我们首先来清醒的估计我们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红三军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的，在共产党的周围，团结广大的英勇的工农出身的红色战士，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支主力军。同时，有许多战士和指挥员是在中国军阀军队里受着军阀严重的压迫，在土地革命影响之下，他们暴动起来，杀死自己的长官来参加红军（如三十四师新七旅来的一部分），有的是拖枪过来，有的是被俘以后志愿参加红军，这些觉悟的从前是反革命军队的士兵，现在变成了苏维埃革命的有力战斗员，他们为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作了英勇的斗争，他们本身就是工农。因为我们是武装的工人、农民的集团，所以我们能给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特别是共产党，是我们红三军的唯一领导者，当邓中夏同志脱离了共产党中央继续执行立三路线的时候，我红三军就削弱了。自从共产党中央的指示到了三军，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而且经常在湘鄂西共产党中央分局领导之下，我三军就获得了伟大的发展，扩大了两倍，湘鄂西苏区扩大了一倍，特别是三个月来三次大的胜利和最近七天七晚的持久战，表现了我红三军空前未有的英勇，这是我们光荣的胜利！这是我们的优点！

可是我们同时估计到我们严重的弱点，这便是一方面我们三军内还有一小部份不好、工作又不积极之阶级异己的分子，如保董、富农……等；另一方面我们从白军来的一些战士，还缺乏给他们很好的政治教育以及立即分给以土地，他们亦从军阀军队中带来一些坏习惯。除此以外，我们部队中产业工人还太少，从工人斗争、土地革命产生之工农干部也大

少。

我们游击队遗留下来的坏习惯还没有完全除掉，因此我们在部队里政治表现就有两种倾向，第一是军阀制度的残余，第二是游击主义。

（三）红军中的军阀制度残余与游击主义具体表现

红军中军阀制度残余的具体表现在于：

第一，有些指挥员和战士没有了解到红军的行动应该与广大的工农群众斗争相联系，他们只认为打仗是自己的责任，最多认为地方工作是政治部的事，没有了解到红军应成为土地革命的组织者，同时没有把群众斗争的开展尽量反映到红军中去，这里最大的错误，就是一部分战士没有分得土地，因之使每个红色战士成为土地革命的组织者与保卫者的程度，现在还差得远。

第二，红军中还缺乏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团结与教育，甚至反对政治工作和忽视政治工作，不去健强共产党在红军的领导作用，相反的还流行一种旧式带兵的方法，“感情联络”或随自己的喜怒来赏罚的事，这是国民党军队团结的方式。

第三，不去随着国内战争的剧烈与加紧军事的政治的训练，有的人每天只是过着清谈、喝酒、跑马的生活。

第四，用单纯军事投机观点来决定军事计划，以致每每过分估计敌人力量而发生政治上的动摇。

第五，与军阀制度不可分离的官僚制度同样反映在红军里面，如使用肉刑、虐待打骂战士、罚跪，负责人过着特殊生活，用军阀官僚的态度对待苏维埃和居民，捆绑苏维埃政府主席。

第六，私人、私钱、私抢、私马的部落观念，这些军阀残余的表现完全阻碍红军政治和军事的向上发展。

游击主义的具体表现在于：

1.不要后方，不要根据地。2.不讲求军事的政治的教育训育训练，不转变到大规模作战的各种准备，如城市战、堡垒战，大规模的平地战，射击飞机等。3.极端民主化。4.不爱惜兵器服物。这些坏的习惯，完全从农民游击队遗留下来。

（四）红三军中政治工作的弱点

红三军中政治委员制度和工作的还没有完全达到必须的程度，使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影响还非常薄弱，阻碍了完全肃清红军中军阀制度的残余与游击主义倾向，政治委员大部分代替了参谋长的工作，因为许多政治委员不能履行政治工作条例中所规定的工作，反而把共产党在部队中的力量和威信减低了。

另一方面，红军还没有真正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而且立三路线、中夏路线的余毒未清，甚至阻碍着国际路线的转变。此外，党的领导和党员中之工人成分大弱，过去太不注意提拔新的工农干部。对于青年团工作的忽视，对于从白军来的特别是暴动过来的战士没有加以特殊的训练，没有立刻分配他们的土地。因为有上述这些弱点，所以还不能在红军中彻底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完全肃清军阀制度残余与游击主义倾向。

（五）严厉与反革命活动作斗争

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红四军肃反的教训，很严重的教训了我们，各种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托洛斯基派、罗章龙派，他们总是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他们破坏红军的方法是组织拖枪到白军去，泄漏军事秘密供给白军，在火线上打死自己的人，故意造谣动摇军心，

故意打败仗来牺牲战士，违抗上级的命令。最后则组织反革命暴动，推翻苏维埃，杀共产党。他们有时挂着共产党、红军的招牌，藉口拥护那个打倒那个，主张分裂红军，我们从前在二军团时代曾经破获过一批改组派，同时我们三军内拖枪到白军去的也间或发觉，并发生有连长拖枪的事。我们也发觉有个别反革命分子利用我们经济的困难来煽惑我们的战士，想来瓦解我们红三军，帮助着徐源泉的进攻，因此就不能说红三军中没有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大家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部队中的捣乱，也是我们一个弱点。

（六）改造红三军的具体任务

要使红三军能够完成当前的伟大任务，必须彻底改造，必须实行下列的具体任务：

1. 在红军中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立三路线的残余，彻底揭露和纠正中夏时代三军中的一切错误，发展自我批评（不许批评命令），集中火力反对军阀制度、官僚制度残余与游击主义倾向。在这个基础之上提高部队中的积极性，提高自觉的遵守纪律，任何一点小的消极怠工和反抗命令的企图，都应给以无情的打击。

2. 要绝对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和执行中央及中央分局的决议。要使每一战士都有彻底明了自己阶级意识，知道共产党中央及中央分局是我们唯一的领导者。要改造政治委员的制度和党的全部工作。要根本改造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方式，完全实施中央规定的政治工作条例，只有加强党的工作，加强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教育，然后工作才有骨干。要发展地方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真正土地革命的组织者和保卫者。

3. 要积极提拔政治上坚定与反机会主义积极的工农干部，要注意自己培养干部，除加紧平时政治训练外，军、师都要设立军事政治教导队，由军部规定教导队具体的实施办法。

4. 加紧部队的政治训练，使红军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同时每个军事指挥员应当是积极的从政治上武装起来，使自己成为完全的红色指挥员，成为在政治上与军事上能够有同等程度或政治的能力超过军事知识的“单一制”的指挥员，这是有利于红军的，这是对于指挥员一般的要求。同样，政治指挥员除了加紧自己政治上的锻炼外，还努力军事的学习，转变成为健全的“单一制”的指挥员。

5. 加紧军事上的训练，特别是新的战术的采用、新式武器的使用，准备到攻打大城市及可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必要限度（射击飞机、破坏敌人工事等技术训练）。为了讲求战术战略的进步，必须研究每次作战的教训，要打破那些消沉腐化的现象，要提高指挥员和战士的学习的积极性。军参谋处，要对于红军的教育训练须加以最大的注意。6. 在三军中要举行相当的清洗，将那些来历不明的而成份又不好的，工作又不积极的分子清洗出去，具体实施办法，由军部规定。同时要注意肃反工作，关于富田事变和鄂豫皖肃反的教训，由军政治委员向部队作详细报告，以唤起红军全体人员对于肃反工作的注意。7. 关于未分得土地的红色战士和指挥员，由军、师政治部立刻调查完毕，以便分得土地。8. 军政治部要以最大的努力来转变红军中青年团的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的规定和少共中央关于红军中青年团的决议，要使红军中的团员在“五卅”前赶上和超过党员的数目。9. 军政治部要纠正不注意真正瓦解白军工作现象，特别是对于战壕宣传要注意平时训练和练习，对于宣传品要有适当的分配方法。10. 军部接到这个训令之后，应由军部准备实

施计划，并普遍召集会议及各连战士大会，在部队中作详细报告，并在上政治课中教授这个训令。我们相信英勇作战的红三军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一定能够在最短期间，加紧政治军事的改造，使红三军成为真正“共产主义的铁军”，完成本军委所给予你们的任务，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要胜利。此令

军委主席团贺龙

关向应

段德昌

夏曦

万涛

四月 日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团湘鄂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决议案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日)

(一) 湘鄂西团在一年来的斗争中，组织上是获得了相当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

(1) 团内阶级基础相当加强，团内工人、贫农新干部相当的提拔(占全团干部百分之四十二)。在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中，洗刷了团内隐藏着的阶级异己分子，改选了各级领导机关，给予不坚决执行正确路线、不深入群众工作的官僚主义领导机关以严重的打击(如江陵县委的解散)，使团的组织得了相当的发展和巩固(团员有一万七千)。

(2) 一九三一年六月，继续着党中央分局扩大会议而召集的三特扩大会议是给予了湘鄂西团内立三路线以致命的打击，深入了国际路线的转变，严重打击了团内命令主义、家长制度，提高了一般团员群众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团能够在敌人一、二、三次“围剿”中动员广大青年群众为苏维埃而斗争。

(3) 团动员群众的工作方式有相当的改善，能够抓紧着广大劳苦青年群众的特殊要求来动员群众(如平分土地、文化教育、生产竞赛队)，部分的运用了青年的作风(如革命竞赛、礼拜六)来动员群众。

(4) 开始注意了团内教育训练工作，继续不断的开办了训练班和建立了识字班、区委流动训练班等。省委本身团报能够经常出版，内容相当的改善，在各主要的县委也建立了团报(如监利、沔阳、潜江、天汉、川阳、江陵等)。

(5) 团对各种附属群众组织的领导比以前是加强了，能够经常个别来讨论检阅他们的工作。

(6) 建立了襄河北岸新苏区团和群众组织，动员了八十四名干部到北岸去工作和建立了特委，更加在最近三个月来(党四代大会后)全省动员了四千八百九十一名团员和群众参加了红军，动员了二十三名团员群众打入白军中工作。

(7) 对宜昌特委和武汉白区市镇的工作有相当的注意，在各县所属的白区市镇，已开始部分的建立了团的组织。

(8) 江南政权虽然失败，然而经过了长期的残酷的斗争，团还保留着部分的秘密基础和群众组织。

(9) 相当的组织了苏区内部的青年灾民，领导他们往白区斗争，并且在有些灾民中建立了团的组织与工作(如鄂南)。

(10) 满洲事件发生后，团对于反帝工作有些注意，在苏区内有很多地方(如川阳、天汉、沔阳、监利等)都建立了反帝同盟青年部的组织。

(11) 在党的四代会后，团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有部分的开展，给了团内水灾后的悲观失望右倾机会主义以及漂亮词句掩盖着的庸俗保守观念(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继续党扩大会议而召集的省委一次扩大会议)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不分阶层的乱斗争、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情绪，同样遭受了打击，使湘鄂西团更加走向了布尔塞维克化，在敌人开始四次“围剿”中，团能够动员很广大的青年群众来拥护红军，来慰劳红军，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在目前这种困难的环境下，动员部分的青年群众参加春耕、修堤运动，这都是三特扩大会议后执行国际路线转变组织上所获得的成绩。

(二) 虽然湘鄂西团在艰苦的斗争中获得了不少的进步，然而目前团组织上还有很多严重的缺点与错误。这些严重的错误与缺点，我们同样不能丝

毫忽视。这主要的是：

(1) 团的组织经过水灾后表现着严重的流动性，支部与小组不能按期开会，团员不能积极的自动的为团工作，成为团目前的普遍现象，特别是襄河北岸和荆南新苏区青年群众自发的斗争，团都不能领导。团落后于群众的斗争，作了群众的尾巴。

(2) 团的支部在广大青年群众中不能取核心的领导作用，不能实际的反映广大青年群众的生活及迫切要求。团内清谈、原则决议、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更加滋长了。机关主义官僚化脱离群众的危险现象，直到现在还不能够充分运用青年坚持与青年工作作风来加强在广大青年群众中的活动。团内命令主义、家长制度的残余还没有肃清。

(3) 团内教育训练的缺乏，团员政治水平的低落，成为一般的现象，特别是关于工人干部的培养工作还没有执行到应有的程度。

(4) 团还没有真正建立与群众组织的正确关系，在有些地方团代替了群众组织的工作，甚至于还发现取消青工工作的严重现象（如江陵），在各级苏维埃中，很少青年团员和青年群众参加工作。关于改造苏维埃工作，团还没有用很大的力量进行。

(5) 直到现在对于瓦解白军工作，青妇工作，发行工作，还没有用最大的力量来转变。红军中的青年工作还表现得非常薄弱，红军中的团还不能在红色青年战士中进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工作，没有最高限度的提高红色青年战士的政治情绪。

(6) 团在新苏区的组织力量非常薄弱，在领导机关里大半是外来的干部，没有积极进行大胆提拔当地干部参加工作，团内官僚腐化的现象还没有给以应有的打击。

(7) 关于武汉、宜沙、应城、盐井及各县主要白区市镇的工作，团不仅是派遣干部去建立，还不能够领导广大青工群众的斗争，在这些地方建立起团的组织和群众组织。

(8) 团的秘密组织只是形式上的建立，还没有充分的具备着在任何环境任何时期中都能很灵活的转变工作的条件。

(9) 团手工业式的领导方式还没有彻底的改正，各级委员会的组织不健全，没有建立各级团部各个部门的工作，上下级的关系建筑在文字指示与文字报告上，没有建立良好的巡视制度和活的领导。

(10) 对于反帝与灾民的领导仍旧没有引起团内最大的注意，并且对反帝运动的机会主义的了解的错误倾向还没有彻底的肃清。

(11) 团的无产阶级基础还是异常的薄弱，工人成份还是很差。

以上这些缺点构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团内两条战线斗争的不深入和缺乏党的经常领导。在湘鄂西团内最严重的现象还是团的关门主义与清谈主义，团还不能保障在广大青年群众斗争中的绝对领导力量。虽然如此，我们必须明确的回答湘鄂西团自接受四中全会国际路线的转变后，是开展了团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央加强了对我们的领导，派了自己的代表到湘鄂西来指导团的工作，最近更加发展和巩固了团的组织。

(三) 目前湘鄂西团组织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依据着目前全国的青年运动开展的新形势，来加强改造团、发展团的工作。用团组织的力量来动员全湘鄂西的广大劳动青年，为组织民族革命战争，完成击破敌人的“围剿”，争取革命在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以至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湘鄂西的

团必须依据着这些中心任务，环绕在党的四代大会组织决议的精神来执行以下的具体任务：

(1) 改造湘鄂西的团转变团的阶级基础(主要的是工人)，使团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的青年群众组织，成为党的后备军，是团目前组织工作的基本任务。坚决肃清团内不积极为团工作甚至不愿为团工作的坏现象，这首先就须建立与健全支部的生活，吸收支部中最积极分子参加干事会的工作，要使每一个支部都能按期开会，实际的分配每一个同志的工作，并有计划的来检查他们的工作，坚决洗刷团内阶级异己分子、官僚腐化的分子，要大胆的吸收在斗争中积极勇敢的分子入团，要在这一年保障能够超过党的组织数量，并且使团的成分改善，使工人在团内占百分之五十的数量，要保障工人干部占百分之七十数目，要注意到提拔干部，目前不仅去注意工人干部的提拔，更要注意到加紧对这些干部的教育训练。

(2) 彻底肃清团内的家长制度、命令主义的残余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工作方式，要以科学的集体领导代替手工业式的领导方式。从省委直至区委必须建立巡视制度，要使巡视员不仅去传达决议，而要能去帮助下级实现这些决议，能够实际反映下层的工作，要使整个团的工作从机关中搬到青年群众中去，使团的一切决议能够传达到支部。支部应当讨论上级的决议，要把这些决议传达到一切青年群众中去。团要在各种附属青年群众组织中建立起团组(区以上为标准)，反对团内第二党的工作方式。团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这些群众组织中团组去实现，加紧开展团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发展团的自我批评，定期检阅各种工作。这不是检阅决议，而是检阅实际工作的执行程度，只有无情的揭发团内一切工作的弱点，去细心研究这些弱点产生的来源，动员我们的支部深入群众中去工作，青年们广泛的运用革命竞赛的方式和青年的作风，才能使团的工作得到转变。因此，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无产阶级化、要看作是团目前第一个中心任务。

(3) 加紧团内教育训练工作，大胆的提拔新的积极工作的干部，运用各种训练班、读报班、流动训练班、识字处、俱乐部的方式去加紧团内教育训练工作。要抓紧团内与目前革命运动发展中的每一个事变去详细解释团和全体团员，要将支部、小组造成团内教育训练的基本单位。关于新的积极干部的提拔，特别是工人干部成了目前湘鄂西团组织上的严重任务。团内干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团内提拔和培养工作的机会主义消极所致，我们要与保守主义和留恋旧干部的观点作斗争，把一部分较好的干部同志介绍到党内去。

(4) 加紧白区工作的建立，主要是武汉、沙市、应城、盐井、京汉路与武长路沿线，除继续派遣得力干部打入这些部门中去进行活动外，为了执行这一任务，要在三个月内派一百干部到白区去做工作，主要的是派往沙市、汉日，农村是当阳、公安、襄北各县。目前主要的是去艰苦的建立在这些地方团的支部和群众组织(首先就是青年部)。要使这些派去的干部和组织能够抓紧目前反帝与青年群众的迫切要求，组织失业青年工人，发动他们的日常斗争以至大的罢工运动。要注意到对灾民饥民中青年工作的领导，建立起团的灾民饥民中的青年群众组织，在宜昌道委所属的各县农村中(如荆门、公安、松枝宜、长阳、当阳等)进行改造团，建立真正的列宁主义青年团的支部工作，动员青年群众参加各种斗争，参加游击战争。关于江南失败区域工作，目前主要的是建立团的秘密工作和群众组织，开展失败区域群众的斗

争，积极的去做恢复江南政权的准备。

(5) 造成襄河北岸七县新苏区的动员工作，做得仍然异常不够，团应当动员一切群众组织，用二分之一的力量来加速完成这一任务。目前最主要的是继续派遣团和群众干部往该地去作领导群众的斗争的工作，使全襄河北岸特委的组织，广泛的建立少先队、青工部、儿童团、反帝青年部的青年群众组织。在农村中（苏区）要普遍的召集非党青年群众的代表会，把团的政纲向广大青年群众宣布。襄河团的组织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改造，大胆的吸收当地积极干部来参加领导机关工作，猛烈的发展团的组织，特别是钟祥、应城、云孝的组织应当以最大的力量加强起来。

(6) 建立中心支部与模范支部的工作非常重要，这首先在各县政治经济比较中心的地方要建立起来，然而这不是形式上名义上的中心和模范支部，而是要做到中心支部真正帮助其他支部进行工作，我们要实际的进行支部工作的检阅。

(7) 抓紧目前的政治形势，组织民族革命战争和击破敌人四次“围剿”的任务，以及动员广大的青年群众为春耕和保障春收、秋收斗争中来恢复和改善各种青年群众组织：关于青工部最主要是改变目前机关主义的官僚现象，实行向青工开门，建立与健全下层青工小组的组织，在白区建立青工代表会的组织。关于少先队，主要是健全小队的基本组织，加强对少先队军事与政治训练，要把少先队改造成为真正的半军事力量，要使少先队成为广大青年群众斗争的保护者和苏维埃的一个自卫力量，保障在“五卅”后须完全恢复，并举行一次全省总检阅。关于共产主义儿童团的组织，要立刻消灭目前涣散一盘散沙的现象，要以工厂、企业、作坊、学校、村庄为单位的整理起来，在红五月间召集一次全省儿童团代表大会来检阅儿童团的组织与工作，与取消儿童工作的机会主义观点作斗争，要广泛的以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儿童。关于苏区青妇工作，目前主要的是首先彻底肃清团内忽视青妇工作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动员这些广大的青妇参加各种群众组织，把积极的分子吸收到团内来，在团内要多吸引青妇干部参加各种领导工作。反帝同盟青年部的组织必须广泛的建立起来，经常的来召集青年反帝群众大会、代表大会，要使反帝同盟青年部的整个工作能够成为动员广大青年群众参加民族革命战争的号召者与领导者，同时，要动员广大青年群众加入苏联之友社，把苏联的青年生活的材料经常的向他们介绍，我们要实际的去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积极的动员广大青年劳苦群众加入合作社，同时要帮助苏维埃来进行各种群众化的经济实业的建设，动员少先队、儿童团员加入合作社。

(8) 动员苏区的全部劳动青年来迅速的完成平分土地的工作和积极的参加春耕运动，广泛的建立生产竞赛队的组织与工作，帮助红军家属耕种。为着保障全年的春收、秋收，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动员青年来完成堤工，组织修堤突击队，加紧群众的武装组织，修筑各要隘的工事，来反抗敌人抢春收的斗争。在襄北与宜昌特委所属的白区，团部必须领导广大的青年群众来参加春收秋收的斗争。

(9) 在国内阶级战争日益剧烈的开展，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日益尖锐的时候，进行瓦解敌军工作，夺取敌人的武装，是目前最紧要的任务。苏区与白区的团要以最大的力量有计划的派遣积极团员和群众打入白军和义勇军中，要加紧在敌人军队的工作，经常的将我们的宣传品输送到敌人军队中，组织广大的白军士兵群众，组织士兵委员会，发动士兵群众的暴动、哗变，

参加红军，这是团的中心任务。团还要利用战壕联欢，俘虏的训练等方式作有力的活动。红军中的团同样要以最大的力量来进行这工作。

(10) 红军中团的组织最重要的是健全列宁青年组织的工作，大量的吸收积极青年战士入团。团要加紧列宁室的工作，要运用革命竞赛的方式组织决战队，列宁奖章去提高战士的战斗情绪。

(11) 团过去忽视动员青年群众参加苏维埃的工作，这是最不容许的错误。现在从苏维埃起要保障有相当青年参加工作，特别是目前动员青年群众起来进行改造苏维埃的工作，把这一工作要造成群众运动，特别是要注意到与官僚腐化的现象、浪费经济的分子作无情的斗争。在各地要建立轻骑队，要能订出他们的工作计划与执行他的任务，在轻骑队组织中要建立团组，经常加强对他们的领导。

(12) 关于宣传工作，目前的中心任务是要抓紧目前政治中心任务在广大劳动青年群众中进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反抗帝国主义战争，反抗敌人“围剿”，争取苏维埃的胜利的宣传鼓动工作。特别是要加紧揭露一切反革命在政治上进攻苏维埃红军的欺骗宣传。关于各种纪念节的宣传鼓动。必须要注意密切的联系到当前的政治中心口号和实际任务，使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要使我们的宣传工作能够达到组织群众的任务，要彻底改善团报的内容，使它适合于青年群众，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思想上的第二个领导者，扩大团报的发行数量，普遍建立读报组，用我们的团报来教育群众，建立青年群众的报纸，同时必须从省委直到区委建立宣传委员会的工作。

(13) 发行工作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团内的注意，甚至于许多团的重要文件都不能传达到各支部中去。今后团应当健全发行工作，要保障团的许多文件能够很敏捷的到支部中，到群众中去。

这些组织的工作的具体任务执行，必须环绕着目前政治中心任务，动员广大青年群众为组织民族的革命战争，击破敌人“围剿”，保障春收秋收的斗争。要实现这些具体任务，必须将团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严重的打击表现目前在团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的空谈的关门主义。当然目前在团内表现最危险是尾巴主义的右倾，然而团内清谈、第二党残余、关门主义以及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一切左倾企图，我们是一点也不能放松了无情斗争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来转变湘鄂西团的工作，巩固团的组织。同时在目前敌人加紧进攻苏维埃红军中，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必然运用各种阴毒办法来企图混入团的组织来破坏团。因此，严密团的组织同样是国内阶级战争时代必要的工作。

注释

原文无时间，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团湘鄂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宣传文化工作的决议案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日)

一、在目前政治形势之下宣传文化工作的意义：

1. 在政治任务决议上已经很明显的指出了目前中国革命危机在全国范围内正在以极大的速度生长成熟着。苏维埃运动不断的扩大，工农红军配合着广大的青年群众冲破了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后，更其是振动了全国资本家豪绅地主军阀们的统治，尤其是红军最近的胜利，更是直接打击了湖北的统治阶级。因此，他们就把所有的力量团结一致来作最后的挣扎，在政治上加紧破坏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广大劳苦群众中的信仰，组织改组派到苏区内部活动，企图拿“二五”减租的口号代替共产党土地革命的中心策略，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同时，现在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派别，他们都想来维持将要死亡的统治，因此就尽力传播一些改良主义的欺骗。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更加重了我们宣传工作的意义，我们要在广大劳苦青年群众中，揭破资产阶级的武断宣传和一切的欺骗，把党目前打倒帝国主义，彻底完成土地革命的策略，使广大的劳动青年了解。只有经过我们的宣传工作，同时团的宣传工作，是争取广大青年群众最主要的工具。可以经过团的宣传工作，把青年团的政治影响扩大到广大青年群众中去。宣传工作是组织广大的劳动青年群众，团结群众有力的工具。大会特别指出目前宣传工作的重要，是全团丝毫不能忽视的工作。尤其是在苏维埃区域内文化工作的进行，提高无产阶级及广大的青年工农群众的文化程度，反对革命前一切老的封建恶习，进行文化革命也成了团的中心任务了。

二、对过去宣传文化工作的错误，大会严格的检阅了团对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和工作中的成绩以后，有以下的估计：

大会认为，自湘鄂西团执行国际路线转变以来，在宣传文化工作中有相当的转变，消灭了过去立三路线时代那种方式，建立了各县团报（如监、沔、江陵、潜江、天汉、川阳等）。在省委也建立了《红色青年》报和《列宁青年》及其它的儿童刊物。宣传品的内容上也有些转变。经过宣传工作，部分的把团的影响扩大到白区去了。在各县相当的建立了宣传部单独生活，对内的教育工作也有些转变。在政治上对反革命的武断的宣传，有部分的揭露，部分的提拔了苏区广大青年群众的文化程度，如列宁小学校的建立，俱乐部的发展，在主要的大小市镇上俱乐部的建立。在消灭封建迷信上也做了些成绩，如废除旧礼教，反对敬菩萨，反对缠足，反对吃鸦片、吃酒、吃纸烟等等都做有相当的成绩。这以上都是团在执行国际路线转变中宣传工作方面所获得的的成绩。

三、宣传文化工作的错误和缺点：虽然在国际路线转变中获得了以上的成绩，然而大会不能不站在自我批评的精神上来指出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1. 团的宣传工作没有真正的深入到群众中去，虽然建立了各县的团报，然而内容始终还是不能令人满意。

2. 宣传部没有建立起单独工作，对各县宣传工作的领导没有加强起来，《红青》、《列宁青年》的内容，还是很少反映下级的实际情形。对团内教育工作，宣传部还是没有注意，一般的工作还是忙于节期式的应付，甚至于有些节期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经常的来抓着较大的政治事变来作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没有按时制发宣传大纲等。

3. 宣传部对各种群众团体没有建立起很好的工作关系，往往不能经过群众的路线，把团的政治影响扩大出去。对白区白军的宣传工作完全是寒热症的表现。

4. 没有与党的宣传部建立起很好的关系，同时，也没有得到党的经常帮助和指导，没有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

5. 宣传工作的方式完全不青年化，不了解去活泼的运用适合与广大青年群众的方式来做宣传工作。

6. 没有建立起下层的宣传工作，支部、区委宣传单独工作几乎没有做，我们现有的宣传工作不过是上层的而已。

7. 文化工作同样没有能够引起全团同志们的注意，没有把文化工作放在团的工作议事日程上来。全团还没有了解在苏维埃政权进行文化革命是团的主要任务。同时过去团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有些过早的“左”倾的现象，没有去进行广大的宣传教育，而去用强迫式的方法来废除封建迷信，一致走到乱打菩萨引起群众不满的错误，没有向广大劳苦群众解释放足的意义而强迫放足等。

8. 对建立学校、俱乐部的工作，同样过去是没有注意的，有部分的建立也是没有什么工作内容。没有利用俱乐部和学校来进行宣传文化工作，同省苏文化部没有建立起工作的关系。

9. 对吃烟、吃酒、吃鸦片等及乱打榨火，团同样的没有什么注意，没有从宣传教育方面来消灭这种危害广大劳苦青年群众的现象。

10. 体育运动完全被忽视了。

以上这些是团在宣传文化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四、今后文化宣传工作中的中心任务：

大会详细的检查了过去一年多来的宣传文化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后，必须指出今后宣传文化工作转变的中心。

1. 要深入我们的宣传工作到广大劳苦青年中去，必须利用适合广大劳苦青年情绪的方法来进行团的宣传工作，在宣传工作的方式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变，消灭宣传工作的第二党的工作方式。

2. 要从节期式的宣传工作转变到建立团的经常的宣传工作，要利用每一个大的事变来进行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把目前党团的中心任务传达到广大劳苦青年群众中去，不断的在思想上来与反革命改组派等的欺骗宣传作斗争。在思想上去克服团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左”右倾机会主义，把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对革命、对党团的危险迅速的向全团同志解释，同时要坚决揭发团内立三主义的残余。

3. 加紧建立群众团体（如反帝同盟青年部等）的宣传工作，利用宣传教育工作普遍的在农村中建立青年群众的俱乐部，要使俱乐部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娱乐场。4. 抓紧每一个时期的中心问题来作出具体的宣传大纲，关于个别问题，要编适合群众的小册子，组织宣传队，召集青年群众大会和露天大会。可利用俱乐部开晚会等报告各种大的事变，把青工斗争和红军每次的胜利来做广大的宣传工作。

5. 加紧对团内教育工作，各级团的宣传部应与组织部经常共同来讨论团内教育的转变。省委宣传部要制定出关于团内教育训练的材料，利用各种方式来进行这一工作。普遍的来建立读书班、认字×的组织，在中心支部中最近要建立起来。

6.广泛的来进行反对封建迷信、反对缠足，要用宣传的方式消灭这种敬神、缠足、吃鸦片、吃纸烟等坏现象。首先在团内要消灭吃酒、吃烟，有危害青年健康的现象作斗争。要用教育的方法消灭那种乱打杵火、吃酒、吃烟的恶习惯。同时要反对过去那种“左”的乱干的办法。

7.普遍的发展学校，在最近(八一止)要建立起六个较高一点学校(朱河、峰口、天汉、乾驴、新沟咀、潜江、江陵各一个等)，完全采用新的教育方式，消灭过去那种老的孔孟教育，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对青年群众的教育，拿我们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青年群众。我们要以阶级斗争的立场去教育青年。

8.加强对共产主义儿童团的教育训练工作，要把共产主义的思想传播到广大的儿童的脑海中去，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的教育。

9.要把文化革命的任务负担起来，同时省委宣传部要与省苏文化部发生很密切的工作上的联系。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不可免的道路，在思想上来改造我们社会中的青年们。同时，青年团也须特别注意到提倡无产阶级的体育运动。

10.以上所指出的任务是我们刻不容缓，要马上执行转变中的心然途径。我们要坚决的开展在宣传文化教育工作中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不注意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的机会主义的分子，同时要坚决反对宣传工作脱离群众的坏现象，着重的指出宣传工作是团争取广大群众最有力的工具。

注释

原文无时间，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团湘鄂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任务的决议案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日)

(一) 大会宗全同意少共中央代表的报告和党四代大会的全部决议

党的四代大会坚决的在两条战线斗争上打击了目前湘鄂西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揭露了潘家询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纲（如有人、有粮、有钱、波浪式的推进等错误）和一贯反对中央正确领导的阴谋，同时指出万涛同志企图用两面派的手段和括弧内左的伺句来掩盖他右倾的实质，反对中央分局正确领导的错误。四代大会以大无畏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来揭发了党过去工作中的一切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指出了党和群众的现状，并指出了目前湘鄂西党对于巩固发展苏区更具体的任务，和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条件。最近两三个月来的事变和襄北苏区巩固和扩大，工农红军在冲破敌人“围剿”中惊人的伟大胜利和苏维埃工作的转变，红军的政治认识的提高，这完全是证明了四代大会的决议的正确。在实际工作中，在革命运动发展中，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理论的破产。

(二) 中国革命发展的新形势与目前青年群众斗争的特点

现在中国革命危机正在以极大的速度生长和成熟着，全国的经济危机已深入到国民经济总崩溃的程度，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工农红军在冲破敌人“围剿”、巩固苏区而斗争上获得了惊人的伟大的胜利。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瓜分中国，进攻苏联和准备爆发世界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急进，决定了目前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土地革命强有力的高涨，工人罢工斗争的澎湃汹涌，反帝斗争浪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着。在湘鄂西及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地开展士兵哗变，灾民饥民群众的斗争及长江上游和襄北等地的农民斗争和骚动风起云涌的发展着。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等苏区快要打成一片，红军及苏维埃的发展呼应着。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占领东三省、上海及海口、长江各重要口岸，帝国主义的掠夺，直接的打击着中国无产阶级及广大劳苦青年群众，革命的风暴逼临着中国，把全国劳苦青年群众都卷入到革命斗争的旋涡中来了。

当然，经济危机的深入，资本合理化的加紧，帝国主义直接武装侵略，国民党卖国和辱国，反革命危机的生长，不能不影响到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最下层。自日帝国主义进占东三省和上海及其它等地后，使许多的工厂倒闭、停顿，使广大的工农劳苦青年群众，十几万的青年工人彷徨于街头。残酷的打击着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劳苦青年群众。地主资产阶级把一切的重担压在劳苦青年群众的身上，用合理化的方法加紧对他们的剥削。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够痛苦了，现在更加紧减低他们那一日不够一日吃饭的工资，增加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延长到十五、六个钟头，在工厂中作坊中打骂便成了家常便饭，罚资便成了普遍的常事，不允许青年有任何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使用种种的方法来奴役广大青年群众，<进行>非人类的剥削，加紧向劳苦青年群众的生活进攻，使他们都处于饥饿死亡的旋涡中。去年全国性的水灾、兵灾和农村经济的破产（尤其是湘鄂西），使几百万青年群众失去了土地上的一切收获，生活都处于饥饿的状态中。资本家、地主和高利贷者利用时机来加资对他们的剥削和奴役。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加在青年群众的肩上，将几千万的农村青年和儿童失业，流离失所，使他们的生活都是陷于奴役的生活，他们的痛苦已到了极点。另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伟大

胜利和中国苏维埃运动日行千里的向前发展着，和湘鄂西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大大的改良了青年群众的生活。青工六小时、童工四小时的实现，同工同酬的文化程度的提高，取消了高利贷封建的束缚。苏区青年群众们英勇的斗争，指出了非苏区青年群众脱离饥饿、灾荒、经济浩劫与地主高利贷、资产阶级的压迫，指出了要从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之下解放的道路，给了他们的斗争以很大的刺激。最近青工单独斗争数量的增多，青工参加总的罢工斗争更加积极。在长江上游（荆当远、松滋宜、公安）、襄北（应、云、孝、天、京、钟）等地农民及灾民饥民的斗争中，充分的表现了他们的积极性，湘鄂西苏区青年群众在巩固、发展苏区，冲破敌人“围剿”中，表现了他们的英勇；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很积极的拥护及执行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的策略；在开展民族的革命战争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这一个总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青年群众在一切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与意义提高了，这是目前青年运动发展的特点。资产阶级的走狗、各种反动派别想来用种种的方法来夺取青年群众，以假的似乎反帝、反国民党的口号（国家主义派的打倒一党专政，对日宣战；社会与教育派召集国民大会，对日宣战；改组派打倒个人独裁，建立民主政治；取消派的召集国民会议，实行民主政治）来夺取青年群众。在苏区改组派更利用苏维埃工作的弱点来夺取青年群众，一切反革命派对群众的欺骗，大部分青年群众在斗争中间已经认识了。

（三）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是湘鄂西团主要任务

然而，我们还不能以为有了以上有利于青年运动发展的条件而忽视我们的实际任务。现在一切豪绅地主国民党军阀们，他们看到了工农红军几次冲破敌人“围剿”和苏维埃惊人的胜利，因此，他们就集中力量向苏区红军进攻，企图来作最后的挣扎。虽然湘鄂西苏区在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中获得了几次的胜利，消灭了敌军两旅以上，然而，我们还没有把敌人的“围剿”完全击破。现在敌人还在用很大的力量（几十团兵力）来“围剿”我们襄北根据地，想破坏我们的春收。在目前环境下，团应动员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继续不断的冲破敌人“围剿”，保障春收，扩大春耕，完成堤工，这确实成了团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了。现在一般的客观条件是有利于革命运动发展的，虽然反动统治阶级来用尽一切力量向革命进攻，然而他们内部的矛盾还是存在及增长着的。这一切的情形，我们不能不估计，我们应动员广大青年群众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完成湘鄂西、鄂豫皖打成一片，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武装保护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

（四）过去工作错误的估计

假若在目前客观条件之下来检阅我们湘鄂西团的工作，自二次代表大会到现在一年多来的斗争中获得了一些的成绩，执行了团四中全会的转变，恢复了被立三路线取消了的青年团的组织及广大青年群众辅助组织（如少队、童团），部分的领导了青工斗争及建立了工会青工部的组织。在冲破敌人“围剿”中，动员了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在解决水灾困难中，团动员了广大青年群众积极的参加了反富农斗争及部分的动员青年群众到白区逃荒。在改造苏维埃运动中，团做了些工作；反官僚腐化的斗争中，组织了轻骑队的组织，积极动员了广大青年群众参加没收及分配土地的工作。青年群众在平分土地的过程中，部分的十四岁以上的青年群众分得了土地。在苏维埃政权下都得到解放和自由（六小时工作制的实行及青年生活的改良）。青年群众的文化程度，相当的提高了。团在健全红军的任务上，输送了广大青年群众到红军

中去参加红军。虽然江南苏区失败，团的组织受了很大损失，然而在不断的艰苦斗争中团还保存得部分的秘密基础，完全恢复及发展了潜江团的组织及青年群众工作，发展了襄北团的组织。在长江上游（当阳、松滋、公安、宜沙、荆门）的青年运动，部分的开展了团的青年群众工作，团的组织也有相当的建立。白区城市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如武汉建立了四个支部，沙市建立了三个团的支部）。在团内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和反富农斗争中左的情绪，团员的成分比以前较好了，团员的政治水平也有些提高，建立了团报（《列宁青年》和《红色青年》及各县团的报纸）。虽然水灾时期有许多同志出去，但是一般说来团员的实际数量是增加了。团在提高生产、扩大春耕运动中做了些工作（组织了生产竞赛队的组织，帮助红军家属耕种等），在为保障春收、修堤斗争中团动员及领导了广大青年群众积极参加，（如动员青年自备伙食修堤及推销水利借券），青年群众在一般的革命斗争中积极性是大大地提高了，这都是团四中全会后不可否认的进步。虽然有这些进步，然而我们还不能否认团在执行国际路线转变中的错误和缺点。大会以大无畏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检阅我们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1）团还没有能够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团还表现着落后于客观条件，对青工的自发的斗争还不能领导，青工部的组织还没有加强。

（2）团的工作方式还是一些老的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不青年化。

（3）团还表现出关门主义的错误，组织上还存在着流动的现象，第二党的工作方式（主要的是不青年化）。

（4）没有建立起很健全的下层基础，团的成分不良，动员群众不迅速，没有真正的去建立青年群众工作。小队、童团虽然有组织，但直到现在单独工作是没有建立起来的，小队、儿团还不健全得很。团对白区武汉、沙市、岳州、平汉、武长两条路工作，白军中的工作还是注意得不够，没有具体的、灵活的去领导和检查工作，就在全团充分的表现出机关主义的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浮泛不能深入群众，多于空谈而忘记了实际工作的检查和布置，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深入。干部的成分，工人成分还是很少，与群众的联系薄弱得很。对于领导青工经济斗争还是忽视的，对于襄北团的工作注意力不够。对领导灾民到白区去斗争，团虽然做了部分灾民中的工作，然而，在灾民中还没有很坚强的团的组织，对灾民中的青年没法去组织他们。对红军中青年工作也是忽视的。对于平分土地、保障春收、扩大春耕、修堤等工作，团做的非常之不够，没有切实去动员广大青年群众积极的参加。团对党所决定的一些重要任务，团没有很迅速的执行。这些错误缺点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团内机会主义分子阻碍了团的转变；另一方面是因为党内立三路线取消团的观念尚未能完全肃清，党对团还存留着取消主义的残余；同时没有得到党的经常帮助和指示。这是团不能很迅速的转变的主要原因。

（五）目前湘鄂西团的任务

全会号召全团积极的起来，为克服这些缺点错误而斗争。为了冲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巩固和发展湘鄂西苏区而斗争，为了把团的工作深入到广大青年群众中去而斗争，为着工作青年化和工作速度而斗争，为着团的工作方式方法转变而斗争，为着争取数百万青年群众在党的口号之下去开展革命的进攻而斗争，因此，三次代表大会着重指出目前团的重心任务：

1. 团应当抓紧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公开占领满州、上海及其它等地，各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瓜分中国，进攻苏联，准备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

大战，去开展反帝工作。组织广大的青年群众团结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旗帜之下，来围绕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策略的周围去开展群众的反帝斗争，武装青年群众，把少先队全体武装起来，号召

白区（武汉、宜沙等）的青年群众向政府要求武装，自己在斗争中来夺取武装，来以革命民族战争把一切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把广大的青年群众组织到反帝同盟青年部内来（特别是白区）。在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逼近的当儿，资本主义加紧的来以军国主义来奴役青年群众，从思想上来麻痹青年群众，想把他们推往战场上去挡炮灰。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告诉了我

们，劳苦青年受了很大的牺牲。现在国民党也来用军国主义欺骗青年，吸

引了大批的青年群众到军队中去，在学校内、在一切群众组织内加紧资

产阶级的军国主义的教育，思想上武装他们，加紧军事上的训练，把他们与整个无产阶级对立起来，强迫着要他们来镇压革命运动，进攻苏区和红军。在这种情形下，更加重了团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务。我们要动员广大青年群众来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消灭帝国

主义的强盗战争，加紧在帝国主义在华的海陆空军中的工作（宣传品要用

外语发出去），加紧瓦解反动军队中的工作，派人（二百）打入白军中

去（武汉、岳口、仙桃、岳州、沔城、新堤、宜沙及其次要的市镇驻扎白军的地方）。

在团内要组织兵运冲锋队，打入白军中去工作，要发动士兵群众的日常

斗争，组织士兵委员会，组织士兵哗变和暴动，拖枪到红军中来。瓦解白军是反军国主义最切身的任务，组织广大青年群众冲破敌人“围剿”，这是对日宣战、反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必然要经过的步骤。

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要使广大的青年群众了解，在一切斗争中要联系到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

2.大会着重指出，目前领导青工的经济斗争是团最迫切的任务。湘鄂西苏区日益扩大和红军胜利的影响，豪绅地主封建极残酷的剥削，在苏区周围，尤其是襄北自发的青工斗争蓬勃开展的开展着，团很少起领导作用，甚至大多数的斗争不是我们发动及领导的。在苏区内部，自水灾后没有去做发动青工经济斗争的工作，有时命令青工斗争，青工的实际利益和迫切要求被他们忽视了，这一点是我们工作中最弱的一点，应立即在各地团部内很实际的来进行这一工作。从省委到区委建立经济斗争部的组织，去切实的去领导青工自发的斗争，制定青工斗争纲领，彻底的实行下层的统一战线（主要的是在白区），把广大的青工群众吸引到青工部和团的周围来，健全青工部的经常领导。在武汉、宜沙，这一工作特别重要，团必须要加紧武汉、宜沙，武长、平汉两路的工作。同时要加紧的去领导及开展长江上游的青年运动，要把青年群众自发的斗争使其在我们领导之下。同时要把青年单独的斗争去汇合到劳苦群众的总的斗争，在斗争中发展团及健全团的辅助组织。

虽然湘鄂西苏区内的青年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下得到了大部分的解放，脱离了豪绅地主的压迫和高利贷的奴役，青工的生活改良了，然而去年的水灾

更增加了青年群众生活上的困苦，还没有设法去克服。我们对苏维埃政府的劳动法还没有完全实行，青年群众的文化程度还没有大量的提高。我们必须号召广大的青年群众为彻底的实行苏维埃的劳动法、青工六小时、重工四小时的工作制，要同工同酬，改善青年群众的生活状况。

3. 提高青年群众的文化程度，广泛的来发展学校、俱乐部、读报小组、识字班，建立运动场、体育团等其它的文化教育工作，大量的来提高苏区青年群众的文化程度。反对吃鸦片、吃烟、吃酒等坏现象，发展团的报纸，要改善团报的内容，要注意到青年化的转变，使团报和别的青年刊物能够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报纸。同时，要出版儿童刊物，在《工农日报》上应当有一栏少先队问题及发展其他的青年群众的刊物。

4. 目前湘鄂西团应当领导着广大青年群众为冲破敌人的“围剿”积极的动员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平分土地的斗争，参加没收及平分工作，要争取十四岁以上的青年分得全份土地。加紧反富农斗争，要防止在反富农斗争中的“左”的过早的侵犯中农的错误，防止乱斗的现象，为保障春收、扩大春耕而斗争。在作战区域，团应当领导少先队配合红军去骚扰敌人，来牵制敌人的兵力，扰乱敌人的后防，来健全少年模范团的组织。代表大会后，每县要建立少年模范营，把少先队全都武装起来，加强对儿童工作的领导。在少先队中要组织为保障春秋[收]而斗争的少年突击队。为了保障春收，解决苏区内群众生活的困难，因此，就一定要加紧修堤的工作，生产竞赛队的组织要健全起来，大量的来帮助红军家属耕种及扩大苏区的生产，团应当广泛的动员青年群众为着完成这些任务而斗争。同时，不要忘记苏区团在肃反中的任务，过去已有了些经验，应当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开展肃反工作。对坚强红军和扩大红军，团要输送一大批青年群众参加红军，完成党所提出的改造红三军的任务。为了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就一定要加紧在红三军中的青年工作及团的工作，要派得力的干部去担任军部的青年干事，各师的青年干事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定，要使团员能够做一般青年群众的模范，特别是动员一部分团员会参加红军。

5. 要派得力的干部到武[五]峰、鹤峰、鄂北等地去做团的工作，健强宜昌、襄北两特委的组织，派两百个干部去建立襄北那七县（云、孝、应、安、钟……）的工作。团省委对各级团部的领导要加强，尽可能的去恢复江南失败的团的工作，不仅仅是只靠书面上的指导，而且应当有强有力的巡视员经常去巡视及检查下级团部的实际工作。

6. 开展非苏区的农民运动，是湘鄂西的团很重要的任务，现在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领导非苏区（公安、当阳、京山、应城）的灾民及饥民的斗争。在饥民和灾民斗争中，团必须注意提出青年群众的特殊要求及建立起团的单独组织及青年群众的附属组织，吸引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入团。为了要使这些任务迅速的执行，干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革命一天天的发展，干部的恐慌也日益严重了，必须经常来进行培养及训练干部的工作。除了派团员到党校训练班、团校受训练外，还应当办团的流动训练班及团的速成班，以及从工作中来培养干部，特别是女干部。在“五卅”前要吸收一批女同志参加区的领导工作。派到白区白军中去工作的同志，一定要经过一个短期的训练。

7. 应当根据大会的全部决议和精神来在全团作一个很大的转变，改造团的组织，建立团的下层组织工作，把大批新的工人干部来参加领导工作。洗刷团内一切不良的成分，大批吸收工农青年到团内来，发展团内的自我批评，

加紧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家长制度，无情的打击团内清谈现象，加紧团内的教育工作，提高团员的政治水平线。必须转变团的工作方式，团的工作方式要青年化，要反对第二党的工作方式（如一切工作仿效于党）。

（六）彻底的把团的工作深入到广大青年群众中去

加紧团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右倾还是团内最主要的危险。在团内右倾表现在：不深入群众，不去艰苦耐劳的去做下层群众工作，不去设法克服工作上的困难，而看到困难和敌人的“围剿”而发生逃跑。有一部派到新苏区去做工作的干部，不断的发生这样的事实。同时，团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不去领导青工的经济斗争，在平分土地斗争往往还发生代表富农利益。这种右倾分子在团内还是非常的农厚，要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必须加紧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同时，还应当反对团内的“左”倾空谈。为了执行代表大会的全部任务，一定要把团的工作搬到广大青年群众中去，要转变过去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目前团内的清谈主义现象还是非常的严重，只谈实际工作，不做实际工作，这种空谈主义是阻碍了团的转变。我们必须号召全团与这种阻碍团转变的空谈主义作斗争，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加紧对小队、儿童团一切群众团体的领导，消灭过去那种关门主义。团现在要实行向广大劳苦青年群众开门，吸引大批的青年入团，工作要青年化，在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上就一定要有一个转变。在有青年群众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去做工作。在白区内，我们要打入到国民党所组织的义勇军和其他青年群众组织中去，深入到青年工人群众中去，发动他们的斗争。特别是要注意到活泼的来应用下层的统一战线，加紧检阅实际工作，打击“左”的空谈主义。同时，不要忘记了阳奉阴违两面派的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左”的空谈是一样的可耻，一样不做实际工作，同样是青年团的敌人，是工作中的障碍。

在团内两条战线斗争的基础上去转变团的工作，虽然自四中全会后到现在团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然而不能很快的去了解“左”、右倾的错误。在水灾时期中团内还有部分同志有“左”、右倾情绪的表现，那时充分的表现在省委代表直接领导的江南两县团的扩大会议决议上。在水灾时期中，在全团内高涨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有些团部内特别浓厚，如江陵团。这些现象那时都是没有很快的克服，以后在右倾分子反中央分局的斗争中，团内部分的负责同志受了右倾机会主义影响，大会不能不指出团的扩大会议上的错误，没有反对党内的右倾危险，这是很严重的政治错误。大会认为，那时中央代表对扩大会议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大会自党的四代会后到现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始终没有深入到下层团部中去，有些团部是一贯的和平政策，怕斗争，这种现象成了钢一般的形式。有些问题，某部分同志还表现出和平主义现象。大会号召全团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加紧开展团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团内怕转变、怕深入群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团内所谓括弧内的“左”倾。目前团内最主要的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必须把两条战线斗争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在两条战线斗争的基础上，加紧团的实际工作的转变，发展团内自下而上的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来与团内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我们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来坚决的执行党和中央一切正确的指示，反对团内的先锋主义及第二党的倾向

（主要是工作不青年化的一切方式所造成）。同时，要反对党内取消团的工作的取消观点，建立正确的党团关系。

注释

原文无时间，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困湘鄂西省委关于红色五月工作的决议案

(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

1. 今年的红色五月斗争纪念日，正当着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国民党的总崩溃的加深，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实行，更造成了青工、成年工人的失业，对青工的生活更加困苦。资本家用尽各种方法来剥削青工，最近在中心城市内罢工斗争不断的爆发（尤其是上海），这完全证明工人阶级的觉悟性。

同时今年红色五月运动正是当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红军的扩大，及各苏区在冲破敌人“围剿”中都得到了巩固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

者更加紧来瓜分中国，进攻苏联，镇压中国革命，积极的准备太平洋的战争。最近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增兵中国，向中国长城内地进攻，全国群众反帝斗争的高涨，及国民党无耻投降帝国主义的策略，一天天在群众面前破产，最近更完全暴露了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事实，不但不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反而联合一切帝国主义者积极的来进行对苏维埃和红军极残酷的“围剿”。

2. 在今年红五月的斗争中，湘鄂西团应当抓紧的去领导青工的斗争，把襄北及其它等地青工自发的斗争要设法去领导，使青工斗争与成年工人的斗争联合起来。在红五月中，要在武汉、宜沙等地组织青工的罢工的斗争。在今年的红五月的工作中更积极的去动员广大青年群众来围绕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总的策略，来加紧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进攻，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广泛的来动员广大的青年群众在共产青年团的领导之下来配合红军的力量，来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为争取革命在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而斗争。实行中央分局发展襄北七县新苏区的决议，来完成湘鄂西、鄂豫皖打成一片的任务。

3. 在红五月运动中，湘鄂西团的任务，就是要去开展长江上游的青年运动。加紧的去领导公安、当阳及襄北正在发展着的饥民斗争，把饥民中的青年群众组织起来。建立白区（武汉、沙市、宜昌等）城市的工作，发展团的组织（宜昌建立起三个支部，沙市同样），建立武汉工厂中的工作，组织青工及领导青工的罢工斗争。执行省总对青工问题的决议，发动青年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要把这些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执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这些任务联系起来。在苏区内，红色五月运动的中心要与保障春收、扩大春耕这些任务联系起来，积极的来组织广大的青年群众为保障春收而斗争，普遍的去发展生产竞赛队的组织。生产竞赛队要在湘鄂西省各县普遍的建立起来，每县要建立五队模范队的组织，切实的帮助红军家属代耕。红五月的工作要联系到为保障春收而斗争的任务，组织及领导广大的青年群众到白区去抢豪绅地主的春收。

4. 切实的去执行团三代会的全部决议，把三代会的精神传达到广大的青年群众中去。加紧团内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把团的工作转变到广大青年群众中去。为了要执行红五月的任务，在四、五两月中要执行下列的工作：

(1) 要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团的改造工作，要做到支部生活能够健

全起来，要使团的支部能够讨论问题，能够领导青工斗争。切实来统计团的组织，把一切不执行团三代大会决议的阶级异己分子洗刷出去，吸收大批工人分子入团，组织的发展要赶上或超过党员的数量，并要发展一万五千个团员，工人要占多数。

(2) 领导广大的青年群众积极的进行平分土地、修堤工作，四、五两月中完成堤工。在江、监、沔等老苏区内要完成百分之六十，没有分配的土地，把它分完。

(3) 在红五月运动中，要切实的去执行党所提出改造苏维埃的工作，发动广大的青年群众来参加这一改造运动，完成苏维埃的改造。推选一部分好的青年参加苏维埃领导工作，发展轻骑队的组织，反对苏维埃机关内官僚腐化的分子，轻骑队的组织在四、五两月中要发展到二百——五百队（全省各县都在内，队员不定）。

(4) 对红军的改造，团要根据省委改造红军的决议，积极的领导广大青年群众来执行这一工作，加强对红军中青年工作的领导，动员五百个青年工人及贫农到红军中去，动员四百个青年去住军校（工人要占百分之六十）。把少队模范团在四、五两月中要单独的建立起来，加强对红军中团员的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

(5) 少队的组织在红五月要做一个详细的整理，加紧对少队军事政治训练，详细的统计过去老的少队员，建立起一百队模范队的组织，发展两万新的队员。

(6) 儿童团要在红五月准备召集全省儿童代表大会，建立起下级儿童团的工作，详细检阅儿童团的组织，要发展团员一倍以上，加强团对儿童工作的领导，从支部起直到省都要普遍建立起儿童工作单独的系统。

(7) 青工工作要根据省总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决>议，在襄北要做到青年部组织的建立，并要领导青工自发的斗争，把老苏区青工部作一个详细的清理。在四、五两月中，要吸收三千个好的青工加入青工部，切实去领导青年工人的经济的斗争，普遍加紧团对青工工作的领导。

(8) 在红五月中，要做到大批的提拔新的干部来参加领导工作与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各委员会的工作，并要开两期训练班（一班做白区工作，一班做苏区工作），各县领导工作的关于干部提拔的数量，组织部具体的规定。

5. 在红五月中，团应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组织三个大的游行示威（“五一”、“五九”、“五卅”）。事前要做很好的准备工作，在每一次群众示威运动中，要提出几个中心斗争任务：

(1) 在“五一”运动中，我们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并发动青工的罢工斗争，加紧宣传工作。还要指出“五一”的历史意义，制发各种宣传品，同时要联系冲破敌人的“围剿”。

(2) “五九”运动中心任务是加紧反帝的宣传，把中央政府对日宣战的政治意义向群众解释。加紧反对国民党对群众的欺骗，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对青年群众的压迫，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要普遍建立反帝同盟青年部的组织。

(3) 在“五卅”运动中的任务是检查一切实际工作执行的程度，并且要实行少队、童团的总检阅，动员广大青年群众来做保障春收的运动，广泛的来做××工作。这几个运动并要与目前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

6.在白区的团部一定要在红五月中领导青年群众参加罢工斗争，罢工××来纪念“五一”和“五卅”。在不能罢工条件下要做到××集会和一厂一部门的罢工来纪念“五一”和“五卅”都是有很大的意义，在武汉××一定要做到这一工作。

7.领导饥民和灾民群众的斗争，在公安、当阳等地要做到举行群众大会来纪念“五一”、“五卅”，尽量发展团的组织及团的群众组织（少队、童团、青工部及其他等）。派人到襄北七县（云<梦>、孝<感>、京山、应城、钟祥、安陆、应山）建立团的组织工作，至少要派二百同志到那里去工作。

8.白军工作，团要尽量派人去瓦解白军工作，至少要派五十人去参加白军，派×十人去建立白区工作，发展赤区周围等地白区团的组织及群众工作，同时要加强失败区域江南团工作的建立，并希望江南团切实的去执行省委的决定和指示。

9.省委各部应根据这一决议来定出各部的具体决议及各种计划。

10.此决议所规定的具体任务，是限定四、五两月执行。各级团部在执行中应如期向省委作报告。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对少共工作决议

(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

一、中央分局听了少共书记羌同同志报告和少共中央代表朱般[宋盘]铭同志报告以后，认为湘鄂西团的工作在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中，获得了不少的成绩，主要的表现在。

(一)恢复了在立三路线时代取消了的青年团的组织，恢复了广大青年群众的补助组织(如少队、童团)。

(二)部分的领导了斗争，建立了一<工>会青工部的组织。

(三)在党的动员之下如击破敌人围剿，平分土地，反富农斗争，克服水灾，恢复生产的秋种春耕，改造苏维埃，反官僚腐化，巩固红军这些主要任务中动员了青年群众，获得了相当成绩。

(四)新苏区、白区的城市及乡村中的工作，有相当的转变和成绩。

(五)在国内开始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对于党内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反国际路线反中央分局的斗争给了严重的打击，建立了团报，提高了团员的政治水平。

可是不能过分估计这些工作的成绩，这只是初步的成绩，团还有许多严重错误与缺点没有克服，他们转变还是不能令人满意，他的工作的主要错误和缺点表现在：

(一)青年团省委把团领导青工斗争的任务没有当成为主要的日常的任务，团没有(经)常的讨论青工经济斗争问题，在《列宁青年》的机关报，同样的如此。没有研究自发的和那些个别青工斗争经验，没有给省总工会青工部以经常的指示和提全[出]各级青工部与建立青年全权代表运动(全权代表运动没有提起过)。

(二)青年团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亦很少成绩，团对平分土地、修堤、春耕、灾民等工作还没有造成广大青年群众运动，对于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如合作社问题，团几乎没有发生联系。

(三)对红军中团的工作只是派遣了几个干部，没有能经常给军政治部青年工作的领导，以帮助和采用更有效的方法转变红军中的青年工作。

(四)对于少先队没有系统的进行政治教育和加紧军事训练，对于童团的工作还没有造成广大的群众组织。

(五)团员的数量落后于党，没有使团成为广泛的工农群众的青年组织。

(六)团内的教育工作还异常薄弱，没有健全的支部，团的机关报如《列宁青年》广泛不切实，没有反映青年斗争，很少讨论修堤、春耕、土地问题，反映支部生活(仅是叙述，如讨论峰口支部的问题)没有多多地给团的组织以各种问题的具体的办法。

(七)对于白区城市工作还是落后，宜沙的团一年以来没有发展(仅仅(宜)昌增加一个团员)，而且受着破坏。破坏的原因，还是本身没有秘密工作的经验和干部的叛变。

二、中央分局详细研究造成团的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团内主观上根本的错误，这种错误：

1.以清谈转变来代替实际群众工作，甚至有官僚主义。

2.团内的第二党倾向，一味模仿党工作，不青年化。

3.省委的指导偏于是文字的抽象的机关主义的工作方式，没有以群众斗争为中心，研究具体的工作经验、各级下层组织以具体办法。

4. 左的关门主义，不知道真正组织群众的工作，不知道团应该是群众的组织，而不是先锋队组织。团的错误一半应该落在党的身上，因为党的立三主义的取消观念没有肃清，党对团是交际式的联合，而不是政治上组织上日常具体的领导。同时有些党的组（织）不要团参加，平分土地的工作，不顾少共工作，甚至不与少共协商而调动少共的干部，这均是严重的错误。中央分局应公开指出自己没有以集体的领导来帮助少共中央代表的工作，同时公开指出党的省委以前没有把少共工作看成是自己的主要部分，重复着立三路线取消团的错误，直到现在开始改正。至于各具党的组织，都是多半是不管和忽视团的工作。然而中央分局必须唤起全省少共的注意，团内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完全存在，而且没有在实际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发展团内自我批评，坚决反对清谈主义、第二党倾向、左倾关门主义，反对党内对青年工作的立三路线是你们成功的先决条件。

三、中央分局认为今后青年团的工作中心任务是应该为着实现少共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而斗争。为要着下列口号而斗争，把机关主义的第二党方式，偏于宣传工作的青年团组织，变为青年工农群众斗争的组织。

1. 应该把少共国际关于青<年>团在工会中的任务，青工部、青工全权代表运动完全实现；应该在湘鄂西苏区完全实现劳动保护法和青年的特殊条件；应该实现集体合同、劳动合同；应该领导青工的复工斗争。

2. 应该立刻在春耕和平分土地、修堤的运动中，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在与改组派及一切反革命作斗争中（要肃清党内和青年组织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使团成为发起人、组织者和领导者。

3. 应该立刻依照团中央关于少队的决议完全实现。

4. 应该立刻建立童子团的工作。

5. 立刻组织一、三军少年模范团，派五十个少共干部在模范团工作。

6. 要派遣三十人到五十人（党二）去做白军工作，在“五卅”以前。

7. 要立刻把反帝大同盟青年部群众化。

8. 立刻改造团的组织，首先须保证团县委能够真正去执行省委的路线，由省委和直接帮助县委在五月中建设十个模范支部。省委依靠这十个支部的经验去改善其他支部生活。

9. 团员数目要在“八一”前赶上党的组织，在“十月革命”前超过党的组织。

10. 要在宜昌、沙市建立二个或三个工厂支部，建立青工部和青工全权代表运动，建立少先队及其他辅助组织二个或三个，在红五月完成。发动宜、沙的反帝斗争和青工经济斗争。

11. 要立刻派这一批干部一百人到二百人到长江上游九县（宜昌、宜都、松[滋]、枝江、公安、荆门、当阳）及襄北（钟祥、京山、德安、应城、云孝）白区去进行农民运动，实现少共国际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来讯。

12. 要立刻改善《列宁青年》、《红色青年》的内容，要照着少共国际关于书报问题的来讯执行。要注意与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青年思想欺骗的阴影作斗争，要出周报的儿童画报、少先队周报，在《红旗》上、《工农日报》上，要开辟青年栏、少年队栏。

13. 要加紧进行俱乐部的工作，以此为团在群众中的文化工作中心。在“八一”前团要建立十个好的俱乐部工作，在五月中要先成<立>瞿市、团市、朱市、峰口四个。

14. 党的省委要经常检阅和帮助少共工作,不能够以为有少共中央代表就能够独<立>工作。少共中央代表的责任不在于去代理省委日常工作,而在于有系统的检查和指导各部门的工作、各县和中心支部的具体内容、群众工作的具体内容而给省委以实际的改善。这些工作的提议,中央分局在“五卅”前后再来检查少共工作,要考查此决议及少共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执行程度。

15. 中央分局号召党的各县委马上起来改变对于少共工作的取消主义和友谊式的态度。预先指出绝对不需要各县来一个接受中央分局关于少共工作决议的决议,以及那些重复中央和少共代表会已经决定的原则,而是具体的去帮助少共县委想出种种实际办法来实现代表大会的决议,限定在六月一日以前要给省委以一个关于执行此决议的报告。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对宜昌特委反帝运动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四月五日)

宜昌党认为“文化落后”不能进行反帝运动的工作，这完全是不看着事实，不做反帝运动的工作，反而来遮掩着自己的消极怠工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要知道目前反帝运动的高潮，是我们党争取独立领导的中心任务，谁个放弃这一任务，准就是实际工作中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为要纠正以前的错误观念，指出以下的办法，要求你们讨论在实际工作中去执行。

一、宜沙党要深入到广大群众以日本占领满洲，继续占领上海，在中国所发现的一切条件来鼓动群众，主要是联系到群众实际生活上的斗争。发动群众起来，组织反日运动；凡有我们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地方，要马上在群众中积极活动，就是没[有]党和群众组织地方也要运用很多方法去接近群众和鼓动群众。

二、要尽量利用公开名义（抗日救国会，民众反日会），来号召群众，学生、商人都可加入这一反日运动，建立下层统一战线，要鼓动群众去加入国民党所组织的反日会，若国民党要人会费，要抓紧这一事实来反对国民党，组织自己的反日会，随时指出打倒国民党，只有群众自己组织反日，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在这种斗争情绪之下，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兵士罢操的游行示威运动，才能扩大这一反帝斗争。

三、你们总觉得宜沙一般反帝浪潮不高涨，就好象无法活动的样子，完全是右倾观念的思想。没有深入到广大群众，站在门外看着群众斗争情绪，没有想出方法去接近群众，就这你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也做得非常少，当然不能发动群众。一定要组织群众去检查日货、没收日货、分配日货等战[斗]争。

四、目前反帝斗争情绪，已经不是抗日货经济接交的问题，而是要武装组织直接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因此要抓紧这一斗争情绪，鼓动群众去参加义勇军，反[发]五元钱，要求发枪，由群众自己举行训练，实行组织自己武装。

五、要发动士兵警察来参加反日运动，抓着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镇静”，国民政府下令十九路军退出上海，一切事件证实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发动士兵警察反对官长。不受官长唆使去压迫反日群众。只有这种反日运日[动]配合起来，才能走到更高阶段，但丝毫不能忽视工人群众，以工人作主要基础，以罢工工作<为>主要中心的反帝的真正力<量>的行动。反对反帝中消极怠工，认为文化落后的“右倾”和不注意小的斗争的“左倾”。

六、对于反日运动。你们根本没做过，省委固[故]得不着你们实际材料，不能具体的决定，希望你们详细讨论，建立工作。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对宜昌特委职工运动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四月五日)

宜昌党自开始向国际路线转变获得不少成绩，如组织了锯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斗争，领导工人反国民党征服党捐斗争，建立了当阳的雇农工会及宜昌的锯业，木业等工会组织，创立了工农周报（工联生活）提出各种及“三八”的斗争纲领。可是这一转变还落在客观发展的后面，执行国际路线还非常不充分，在实际工作中还暴露出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其主要的表现是：

(一) 不注意领导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甚至连工人自发的斗争（最近沙市的车夫罢工）都不知道，完全做了群众的尾巴。

(二) 在每次斗争没有注意发展工会的组织，没有利用斗争情绪高涨来吸收在罢工中积极的工人分子加入赤色工会，赤色工会会员还比党员数量少几倍，这充分表现宜昌党对职工运动的关门主义。

(三) 对反帝国主义运动表现不容许的消极怠工，不善于利用工人的经济要求与反帝运动联系起来，将日本企业辞退工人的斗争完全放弃，仅说宜昌的文化落后不能发动反帝运动，充分暴露了对反帝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四) 赤色工会的组织，在各企业中表现非常薄弱，特别是宜昌、沙市的海员×××××最重要产业部门没打进去。

(五) 忽视雇农工会在现在革命阶段中群众的领导作用，没有普遍发展雇农工会的组织。

(六) 没有研究工人罢工及各种斗争的经验，目前宜昌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群众的部分的日常经济斗争，紧×着组织反帝反国民党的罢工成为目前反帝反国民党的中坚力量，响应和配合松滋、当阳、公安等地农民游击战争和红三军的行动，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巩固的发展湘鄂西苏区，争取湘鄂赣首先胜利，为达到这一任务，必须执行下列工作。

1. 要集中一切力量去组织工人反抗日本工厂关门轮船停航，要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在关厂时要退职金留日，使这种斗争扩大到一切日本资本家的工厂、洋行、商店中去，要将检查日货权拿到工人手中，检查出的日货拿来救济灾民与失业工人，同时要防范为国民党藉口“救国”来禁“劳资纠纷”，只有竭力来拥护工人阶级的本身利益，才能使工人经济斗争与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要向群众揭破国民党可耻的一贯的不抵抗的投降政策与派付群众加入救国义勇军捐，要耐心的向人工、贫农、士兵及学生宣传，只有自己武装起来，士兵掉转枪头推翻国民党，在苏维埃领导之下，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坚决的打击以宜昌的文化落后不能发动反帝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

2. 要时时刻刻了解工人的情绪，将他们的微小不满意度为简单而明了的要求，这是夺取工人群众到党和工会周围的必要途径。要按照工人实际生活状况，指出各业工人斗争的纲领去组织失业工人罢工。在澡塘工人中要指出与雇主同餐，蔑工增加工资，锯工要求复工去向户主借钱，车夫减少车捐来发动他们的斗争，更要把通俗小的口号转向更大更高的口号，注意斗争直接联系，使他扩大深入到更高阶段，在斗争中要组织工人纠察队，防止国民党雇主收买流氓工贼捣乱，党要动员他们领导的工人群众的代表慰问及捐款等，以去鼓动与援助工人，如此才能使工人在实际经验中证明党、赤色工会和国

民党黄色工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完全不同。

3. 要坚决克服一切困难，打入海员等重要产业部门中去，派遣忠实的党员和会员用种种有效方法同他们接近，坚决的执行，而“白企业”（？）的口号，反对认为建立工会组织仅是：（？）（疑问号是我写的，恐原抄者有错误，因此句颇不通。——抄者注）。

4. 扩大工会的组织是党目前重要工作之一，要利用各种适合于群众需要的公开的或半公开的辅助组织等。经过这些组织来扩大党和赤色工会的宣传和影响，来吸收会员，宜昌的贫妇及工人家属须组织起来，利用这些组织来帮助工人斗争。

5. 在沙市木工中进行解释工作，反对过去的帮兵制度，在荆帮木工中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向他们揭破老板企图减低工资利用荆帮木工来代替汉帮工人，使汉帮工人与荆帮工人对立起来的欺骗行为。

6. 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必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吸引多派工人参加斗争，下层统一战线立基于下层群众的共同要求，在罢工开始时应组织斗争委员会或罢工委员会，在斗争结束时经群众的通过，将斗争委员会或罢工委员会转为工厂委员会赤色工会，应依靠自己的小组来领导斗争或罢工，委员会绝对不能丝毫脱离群众。

7. 雇农是土地革命的领导者，要在乡村中普遍的发展雇农工会的组织，发展雇农的经济斗争，要使雇农委员会在农民协会中取得核心作用。尤其是一分钟也不容许再忽视长阳。当阳的煤矿工人及各县的造纸工人……。

8. 加紧反黄色工会的斗争，将黄色工会强迫车夫出党捐，和黄色工会领袖欺骗作用和出卖工人利益等行为，不断的在工人群众中揭露出来，要采用各种方法把赤色工会的纲领与黄色工会的纲领比较，要将反黄色工会的斗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打成一片（如反对党捐），要艰苦地长期的与黄色工会的首领斗争，才能夺取其群众。

9. 要坚决的提拔工人干部参加各极指导机关，经常的派工人到苏区来受训练，在最近必须健全木业，蔑业，锯业等工会组织，改善《工农生活》周刊的内容，提高工人的政治水平线。

10. 在组织上去扩大和深入苏维埃和红军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首先须在工人群众中广泛的建立“红军之友社”，发起帮助红军的募捐运动，组织工人参观团到苏区参观，征调工人来参加红军，经常有计划的动员工人群众扰乱敌人的后防，破坏敌人的军事交通来援助苏区和红军。

11. 注意组织失业工人运动，要组织失业工人们向政府雇主要津贴，要工做，要饭吃，要房子住来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要动员在业工人起来援助失业工人，应向失业工人解释失业的原因和出路，将失业工人运动与灾民斗争联系起来。

12. 注意青工女工的工作，必须马上调遣妇女干部打入工厂中去 × 。

13. 要发动失业工人、贫民的女灾民抢粮斗争，夺取大资本家的粮食，分配来解决失业工人与饥民的生活，在这些斗争中更容易把他们组织起来。

14. 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对职工运动的右倾的取消主义、尾巴主义和“左”倾的关门主义，及忽视黄色工会在工人中的作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完成目前的中心任务。

中共湘鄂西省委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如此。

原文如此，约缺九个字。

中共湘鄂西省委对宜昌特委组织工作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

(一) 省委听了宜昌特委同志报告，认为宜昌的党在最近几月来，在省委正确领导之下，开始向国际路线转变，如建立了宜昌工人的组织（还不是中心工业部门），开展了当阳、松滋的游击战争，发动了灾民分粮吃大户的斗争（当阳、松滋）。这些成绩是宜昌的党转变到国际的路线所取得的胜利。

(二) 但宜昌党的进步还是不能令人满意，一些缺点表现在：

1. 有组织群众的数量，反不及党员的数量，证明没有深入群众，建立真正的群众工作。

2. 城市的赤色工会与农村中的雇农工会，没有切实的建立（雇农工会在当阳一个），忽视了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

3. 组织群众的方式，仍然停滞在机械的“办党”的方式中，各省用各种斗争委员会，或其他灰色团体附属组织来组织群众，运用群众工作方式巩固和扩大群众组织。

4. 党的领导内面仍然隐藏着一部分豪绅地主的残余（如公安党内）及富农分子，因此有时阻碍党正确路线的执行，抑制了工农干部的积极性。

5. 党在灾民运动中，虽然组织灾民代表会议，已成苏维埃的雏形，但没有加强群众的武装组织，组织农民自卫队，以致灾民运动受到反动团防的摧残。

6. 游击队的行动，还只是纯粹的军事观点（如二大队深入公安境内专门打团防，不注意配合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要转变游击运动成为发动群众分粮，灾民吃大户的斗争的力量，吸收更广大群众参加游击战争，引导到更高的阶段，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的斗争。

7. 省委没有具体领导与巡视制度，指导县委，帮助下级党部建立单独工作，以致在工作上形成一贯的上级包办下级工作。

8. 没有建立党的教育训练工作，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容易动摇政治观念（如文端叛变）和破获组织，就是同志不坚定，党内没有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主要原因，对于提拔干部更是机械的，没有注意到培养从斗争中锻炼

(三) 对宜昌的党指出以下的具体组织任务：

1.略。

2. 开展宜昌、沙市赤色工会组织，以码头、劳苦车夫、海员为赤色工会发展的中心，特别是要以各种附属广泛的组织群众，发展工人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各样斗争，在斗争中才能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

3. 在普遍的分粮斗争中，发展农民协会的组织，在农民协会中严格洗刷豪绅地主、富农分子，建立雇农支部或雇农小组，在农民中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同时应建立贫农小组。

4. 利用反帝群众情绪，扩大反帝的影晌，组织反帝大同盟，特别建立宜昌反帝的组织。

5. 建立道委的兵委组织，有计划的建立在川军中兵运工作，派一部分党员和非党员到白军中去，发展党和士兵委员会的组织，领导士兵的斗争。同时要动员全体党员及一切群众团体的会员。用种种方法接近士兵进行工作。

6. 道委马上将一二两大队战士成分清查一次，严格洗刷在游击队中的富

农分子，大批的吸收勇敢的工人、贫农参加游击队。同时建立游击队的党的工作，加紧战士政治教育工作，使每一战士成为宣传和组织员，帮助群众作分粮斗争，发展更大的游<击>战争，绝对不允许单独军事投机或发动，就忘却小的日常斗争。

7.为适于宜昌特区革命的开展的需要。道委在三个月里选派一百精极勇敢、成分最好的党员到省委（可分三期送来）到党校受训练。

8.道委创办的《支部生活》、《工农生活》要改善内容。白区工农生活状况，斗争消息及介绍苏区工农生活及红军胜利等，要保证每周出版一次。

9.适应宜昌党活动，秘密工作非常重要，一切机关要建立到群众中去，特别是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在斗争中改编党的队伍，洗开消极怠工阶级异己的分子出党，吸收工人、贫农入党。

10.省委决定特委在 月 日（日期与 同志面订，决议上不必公开）召集宜昌区代表大会。大会主要任务是改造党的组织，建立群众工作。在红五月内，即收集各县的实际材料，在未开会前半月，组织小委员会专门研究各种问题，起草政治任务、职工运动、组织问题、苏维埃四个决议，首先印发交下级讨论，并要下级预先准备，由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提出具体中心问题，好在大会中讨论，一定要充分的准备有好的结果，报告材料及草案要预先半月送来省委审查。11.为要实现以上的任务，特委要经常保持工[二]人以上的集体领导，精确的 。另一面加强巡视制度，要以四人以上的巡视员帮助各县工作。

省委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如此。

鄂豫边临时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 (一九三二年四月八日)

大会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鄂北(襄枣宜钟)苏区及九军甘六师工作的决议和湘鄂西中央分局代表的报告,以一致的精神成立以下的决议,号召全党同志以最大的决心,立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一) 帝国主义豪绅地主军阀的极端压榨与革命危机日益成熟

1. 帝国主义豪绅地主军阀的加重搜刮,群众生活走近绝境: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与豪绅地主军阀的封建剥削,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这在鄂豫边省表现得非常明显。帝国主义的收买原料与出卖工业品,豪绅地主成为他们的买办,去年的水灾,豫南十余县的收获不到十分之二,鄂北各县仅有十分之四五的收获,然而豪绅地主军阀的搜刮,却大大的加重了。全省反动武装有三十余万,其给养完全担在群众肩上,钱粮纳到民国十四年,而新来的军阀又<要>重新缴纳。匪区钱粮加到非匪区,每两地丁加重到百八十元,每亩烟捐四十几元,地主粮租加到十分之六至八,除此还有苛捐杂税的日益加多。市镇工商业的倒闭有十分之五六,小贩更是难以营生,加之大小股土匪天天加多与普遍骚扰,使群众生活越发痛苦,连卖男鬻女和出售土地杂物都不能挽救危机。有很多地方,每村每天饿死和自杀的人两三个,于此而见群众生活是一般的走近绝境了。

2. 反动统治的压迫与群众的革命反抗成比例的增加:因为帝国主义豪绅地主军阀的极端压榨,当然他们要防制[止]群众的革命反抗,何况全国革命的新形势已给一般群众以相当的革命认识,所以反动统治阶级更积极的扩大反动武装,企图镇压群众的革命反抗(这里我们不能否认反动统治内部的矛盾日益厉害,但不能超过阶级的矛盾<。)>实际上只有更加重对群众的负担,反动统治阶级在“反共”的口号之下随便屠杀群众,焚烧群众的房屋器具,以数十条的清户条例,束缚群众不能行走,断绝群众的生活。可是因此而更加激起一般群众的革命反抗和千万群众的吃大户分粮打捐税局包围县城杀县长等类的自发的革命斗争已成为平常事件了。

3. 苏维埃红军的发展给一般群众以革命影响:鄂豫边的党经受右倾机会主义的长期统治,国际路线尚未达到实际的转变,在敌人的四次“围剿”当中,苏区受到部分的挫折,红军的扩大不迅速,一切工作中尚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但是红军是扩大了,比较以前是坚强了,襄枣宜钟苏区的群众,以阶级斗争的日益深入,是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了。这里不能否认的是苏维埃红军的发展给一般群众以革命影响,指出唯一的出路是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成为全省的革命根据地。同时我们要指出过去对于非赤区工作的极其忽视,非苏区的党组织薄弱,没有发动群众的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没有创立新的苏区,使苏维埃红军不能充分得到非苏区革命斗争的配合,这是党的严重损失。以后只要我们能够彻底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一定可以冲破敌人的四次“围剿”,巩固的发展苏区,争取当湘鄂西、鄂豫皖和均房苏区打成一片的胜利,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二) 积极转变苏区工作,为巩固的发展苏区而奋斗

4. 检阅平分土地,使土地利益完全落在贫雇中农的身上:党和苏维埃部分的暗藏豪绅地主的残余、富农以及改组派分子,他们在平分土地中以感情作用或反革命作用,把持了平分土地的利益,所以我们要立即进行检阅平分

土地，从他们的手中将土地夺回来给贫雇中农和红军，没收富农好的土地，分给坏的劳动土地。山林、竹林、果园、鱼池、藕池等，须即按照平分土地的原则分配，使土地利益完全落在贫雇中农的身上。对于平分土地多的剩余土地，按照平分土地的原则，分给受反革命威迫或欺骗而逃跑的贫雇中农，同时积极的号召他们回家耕种。平分土地的工作，虽在敌人骚扰地方也要设法进行，要将平分土地看作争取群众的武器。

5. 向隐藏的富农斗争，坚决的反对，妨碍中农利益：同样的过去以感情作用或反革命作用在反富农斗争过程中，有些地方，如宜东区滚二区等隐藏了不少的富农未被斗争，同时一般的妨碍中农利益，破坏中农联盟而客观上帮助反革命。

6. 解决基本群众的耕具种子的困难，积极进行春耕活动：过去是没有没收豪绅地主和富农多余的耕牛耕具分给基本群众，以致基本群众不要坏的或好的土地，最近以敌人的骚扰，在此春耕紧迫当中，基本群众的耕具种子困难，的确是严重问题，所以党和苏维埃要领导群众没收豪绅地主和富农多余的耕牛耕具种子，分给基本群众和红军家属，同时以调剂来买以及没收等类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非苏区战士的土地，要动员就近群众耕种，红军家属的耕地也要动员就近群众帮助耕种，苏维埃要负切实的责任。

7. 健全贫农团、雇农工会的组织，建立其工作任务：现在贫农团、雇农工会的组织是不健全的是零碎的，是没有生活的，是不了解自己工作任务的，而且包含有坏分子。我们要将贫农团、雇农工会的组织健全起来，洗刷坏分子，使之能够开会，讨论自己的工作任务。贫农团、雇农工会的工作任务，不仅是平分土地的反富农斗争，必须能够领导群众切实进行当前的政治任务，譬如现在就要参加红军，配合红军作战，执行肃反工作等等。

8. 建立工会组织，发动工人斗争：到现在还没有工会的组织，没有将苏区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自然谈不上工人斗争了。这是我们的严重损失。必须将工会组织有系统的建立起来，颁布劳动法，发动工人的经济斗争，如此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加强工人阶级对苏维埃红军的领导，肃清富农路线。

9. 纠正军事上的错误观念，坚强和扩大红军、游击队的行动积极化，整顿群众武装组织，统一军事指挥：在军事上我们的确犯了不少的错误，主要的是右倾的逃跑主义，保守主义，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执行以下几点：（1）首先是要纠正军事上的不正确的观念，要认清阶级斗争的尖锐，敌人“围剿”是我们的主要危险，红军要集中力量去领导广泛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武装斗争，击破敌人的弱点，争取大小的连续不断的胜利，一直到冲破敌人的“围剿”，那些消极等待、军事投机，分散游击，赶跑敌人，躲避敌人，军事犹豫，拼命情绪，甚至脱离苏区等不正确的观念，都是客观上给敌人以顺利的条件，忘掉了冲破敌人的“围剿”，巩固的发展苏区的任务。（2）游击队的行动必须积极化配合群众力量在敌人的四周骚扰打击敌人，争取胜利以扩大武装，在党员中群众中挑选忠勇的分子组织挺进队，上前与敌作战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要加紧群众赤色戒严守备侦探的工作。现在群众武装组织中的不良分子即行洗刷出去，以后组织群众武装，应在宣传鼓动中，相当地征求其自愿。反对登门上册的编制办法，这里要指出有些将赤卫军无条件的集中起来，经常的把守敌人来路，而不找其他办法来代替，而妨碍春耕是不对的。

（3）党委要以极高限度的力量从政治上去健强红军游击队，要分配战士及其

家属与非苏区战士以好的土地，要从斗争中发展红军和游击队中的党员到半数以上，要健全红军和游击队中党的生活，同时建立少共工作，要战士同志和指挥员同志经常讨论党的一切决议文件，要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要以会议方式研究每次的作战的经验，使红军能够执行民×工作，成为群众的组织者宣传者，培养红军干部人材，尤其要加紧红军和游击队中的肃反工作，洗清红军和游击队中阶级异己分子。自然党和苏维埃以及各团体都要特别加紧这一工作，要特别责成红军和游击队战士执行瓦解白军工作。（4）积极动员群众进行拥护红军工作。在加紧宣传鼓动中，广大的动员党员和坚决勇敢的工人、雇农、中农参加红军，有计划的保证红军给养，动员群众送粮食给红军吃，送鞋子给红军穿，担架伤病战士，组织慰劳队去慰劳红军，党和苏维埃要设种种办法改善红军生活。（5）过去军委会不健全没有本身的工作，然而却代替了总指挥部的工作，放弃了群众工作，客观上都是妨害军事行动，而是军事投机与失败情绪的表现，现在须将军委会的必要部门建立起来，加强对红军游击队群众武装的×的军事的政治的领导，统一整个的军事指挥，以一致的精神执行当前的任务。

10. 加紧肃反工作，健全政治保卫局的工作：苏区的改组派的反动活动确是积极而且夺取了一部分的落伍群众。我们现在必须加紧苏区内的阶级斗争，以各种事实揭穿改组派的罪恶，激起群众加紧肃反工作的积极性，同时须立即将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健全起来。

11. 改造苏维埃健全苏维埃工作：虽然过去三五次的改造苏维埃仅是及于省县区苏维埃的改造，而且是和平的形式，我们要在执行以上的工作任务中动员群众力量，洗刷各级苏维埃中的豪绅地主的残余和富农以及官僚腐化消极怠工与反革命分子，当然党要同样的改造，使工农群众自己起来管理政权，看清苏维埃是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必须经常的在群众中报告自己的工作，开展工农群众对苏维埃的自我批评与苏维埃的工作错误作斗争，这是提高工农群众管理政权保卫政权的创造性与积极性的极好办法，同时党要用十二万分的力量健全苏区的工作；建立省县苏维埃中的党团，吸引半数以上的非党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坚决反对党包办苏维埃的工作，现在省苏党团须讨论各种工作，将经济政策、文化工作等，由省苏党团讨论比较具体的决议。当然以上工作亦须经过讨论与执行。

12. 建立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工作，加紧妇女工作：反帝浪潮的高涨，在苏区内应将反帝大同盟组织起来，互济会亦应建立，对于妇女工作现在注意非常不够，以后要将妇女工作看做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妇女同志的工作。要以妇女代表会去领导妇女群众的革命行动。劳动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应是苏维埃的一部门工作。

（三）发动非苏区的政治的经济的群众斗争，创立新的苏区

13. 发动群众的斗争，争取斗争的胜利：主要危险<是>和平发展不敢领导斗争，或者以盲动杀敌遮盖一切工作的进行，这就是非苏区工作范围缩小的主要原因。根据我们以上的政治分析，非苏区的党必须按照一般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斗争纲领和斗争的中心口号，在群众中宣传鼓动，以发动和领导政治的经济的日常斗争。但斗争口号须特别注意，按照一般斗争的情绪而转变，务须争取斗争的胜利，以提高群众的革命情绪，同时要反对领导斗争走上合法。

14. 以斗争去组织群众，争取广大群众到党的周围来：以斗争去运[发]

动组织群众，群众一定是容易接受的，才能巩固群众的组织，争取广大的群众到党的周围。现在非苏区大多是光杆的党，就是因为没有发动斗争。因此对于群众的组织应当按照斗争的中心，以组织灾民团，分粮团，抗捐会等等。斗争发动了，要以苏维埃形式的组织去领导斗争，以统一战线，及灾民委员会，抗捐委员会等。同时要注意组织武装，自卫的组织，如组织农民自卫军，对于宗教集团我们只有以日常斗争去分化夺取群众到革命方面，反对勾结其领袖，而不去艰苦进行群众的观念。

15. 加紧白军运动，争取士兵群众：过去对白军运动是一般的忽视，即或做了一点，亦是勾结领袖，实行军事投机。过去对白军士兵的重视也没有强一点，这就是在全省内没有形成兵暴和兵变的主要原因。现在各级党应建立兵运委员会的组织，艰苦的提出各种办法去进行士兵运动的工作，发动士兵的日常斗争，扩大红军苏维埃的政治影响，以各种不同的组织去组织士兵的群众（在士兵中可以组织红军之友社、苏维埃之友社），我们兵运的目的是要他们同情革命到大的兵变兵暴到革命方面来。

16. 争取土匪群众，瓦解土匪组织：勾结土匪领袖使之不骚扰和摧残革命组织成为对这一工作的方针，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动员全党抓住没有脱离生产的土匪和新脱离生产的土匪和被迫当匪的土匪，作为我们工作的对象，向他们解释当匪不是出路，创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当红军是唯一的出路，发动土匪群众反领袖的斗争、争取土匪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以瓦解土匪的组织，同时我们仍须号召群众反对土匪尤其惯匪不分阶级的乱闹，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

17. 加紧反帝、反国民党运动，扩大苏维埃红军，党的政治影响，非苏区党的工作，时刻要注意宣传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对立的问题，在群众面前宣传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罪恶，尤其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苏区红军的残酷事实，组织反帝大同盟，互济会，苏维埃之友社，红军之友社进行红军募捐运动（一二个铜元都可以），征求群众参加红军，组织参观团到苏区参观。为了具体执行以上的工作，可以进行拥护红军苏维埃反帝反国民党的运动周，反对不注意秘密技术，以保卫组织而放弃宣传工作的错误观念。

18. 抓住中心工作，创立新苏区：在非苏区除了有工人群众的大的市镇作为我们的中心工作区域外，<老>河口之电灯，面粉，车夫，镇平之丝绸玉石漆匠，襄花车路之车夫，汉江之划船的工人，我们一定要打入进去发动其斗争，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同时责成南阳特委襄阳特委各择定中心区域，加紧中心区域的工作，创立新的苏区，均房特委要恢复均房苏区。这些中心工作省委当然也须负责去进行，派得力干部和巡视员去转变各地工作，这是巩固和发展襄枣宜钟苏区的主要条件。

（四）创立布尔什维克的党，加强对群众的领导

19. 只改造党的组织，纠正组织上的错误：全省党内的豪绅地主富农以及官僚腐化的分子，尚占不少的数量，这是党最严重问题，我们一定要以极大的决心，从斗争中去洗刷这些分子；大批吸收好的工人雇工贫农中农入党；同时这些阶级异己分子保留在党内正是组织上一切错误发生的基础，主要的是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机会主义，尾巴主义，崇拜偶像，包办苏维埃（如在苏维埃工会，反帝大同盟，互济会中，马上将党团建立起来，同时要建立他的工作）以及党员摆资格等等，我们对于这些组织上的错误，要与他作坚决的斗争，使党深入到群众中去，研究群众的生活和要求，党的支部就要成

为群众的中心，一切工作建立在支部上，支部生活的健全可以使党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党，可以涌现出大批干部来。非苏区的党员要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斗争，苏区的党要加强对苏维埃，工会，贫农团，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的领导，同时苏区的各级党，要经常派人到非苏区工作，以加强对非苏区工作的领导。

20. 实行集体指导，大胆提拔干部：过去一般的认识，干部缺乏，工作没有办法，或者希望上级派干部来，而不设法去培养干部，总是面向上级，而不面向下层，所以始终将工作推[堆]在几个[人]头上，不能使党迎合客观革命形势的需要，同时也就是不能集体指导的主要原因，以后从省委至支部，要一致的大胆提拔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只要某个同志阶级成分很好，政治上坚定，能够接受训练，就可提拔起来担任某种工作，在工作中来耐心的给以实际训练，这样来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以会议形式解决问题，那里家长制度，秘书专政，必须给予严重打击。

21. 健[建]立中心工作和巡视制度：不能抓住中心工作，没有计划的进行工作，表现出脚痛医脚，手痛医手的临时应付，而且是少数人的临时应付，已成全党的一般现状，实际上是妨碍整个工作的推进，我们须要坚决的纠正，各级党均要抓住中心工作，经常的建立工作计划，决定豫南十三县成立南阳特委，襄阳、宜城、南漳、随县成立襄阳特委，均州、房县、保康、光化、谷城、郧阳、郧西、竹山成立均房特委，苏区和枣阳、钟祥由省委直接管理，各级党应当按照工作的重要建立中心县委，中心区委，中心支部的工作，特别是要省委和枣委要立即恢复失败区域的工作。在目前工作范围是一天一天的扩大，自省委至县委均要建立巡视制度，区委的巡视员由执委去担任。

22. 加紧教育训练工作，森严党的纪律：全党同志的政治水平线低落，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提倡礼教式的教育训练方法，必须着重以实际工作来教育训练，对于同志的错误要一点不放松的指出，并酌量用以教育全党，对于那些不可教育的同志，无疑的要受党的铁的纪律的裁判。最近省委要以很大的力量来作教育训练工作，并应开办一个党校。

23. 加强对少共工作的领导，普遍建立少共工作：全省少共工作非常薄弱，党忘掉了争取青年的大多数，这是党的损失。以后党要将少共工作看作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必须加强对少共的领导，有党无团的地方，要在党内划分部分青年作少共的基础，并建立有独立系统的少共组织，反对借口干部缺乏，而下层划分上级合并的错误观念。

24. 发展自我批评实行工作检阅 过去对于自我批评是一般的没有切实了解甚至部分恶化成为个人攻击。现在我们要看清楚发展自我批评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因为这是彻底执行国际路线的有力保障，同时也是教育训练一般同志的极好办法。我们还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实行工作检阅，以肃清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以革命竞赛的方法，来增加工作进行的速度。

(五) 彻底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与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

25. 右倾机会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我们认为鄂豫边的党，经过长期的机会主义的统治，自从去年十月中央指示到后，的确受了党内阶级异己分子豪绅地主的残余和富农以及机会主义者阻碍，因之转变得非常不均。就是现在党内异己分子依然还占不少数，这的确多要我们以极广大的力量去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因为如此，所以在指出“左”倾的立三主义以后，而右倾的

机会主义成为目前的主要危险，例如省委几次的企图抛弃苏区根据地，希望土匪解围，以致军事上的“避免”、“分散”、“保守”、“等待”、袒护富农利益，非苏区党的和平发展的倾向，非常浓厚，这一切一切都须要我们与之作长期坚决的斗争。

26.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本来“左”倾就是右倾的实质，都是没有正确估量政治形势不相信群众力量，不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最严重的“左”倾事实是过去特委在反对党右倾的逃跑主义以后，而走到孤注一掷的拼命情绪，非苏区的党以盲动杀敌遮盖了一切工作的进行，其实这还是右倾的失败情绪的反映，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出发点。所以右倾机会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对于过去妨碍中农利益，消灭富农是“左倾”行动，是对于革命有极大妨碍的。

27.反对党内和平，反对派别行动：党内和平共居不愿得罪人的心理非常浓厚，或者互相攻击，联甲攻乙，秘密向上级告状，客观上是形成派别行动，这都是党不能丝毫容许的，要予以严重的打击。

28.对于领导机关的错误，应该进行无情的自我批评：沈宗溢[源]同志来领导鄂豫边的党是要彻底执行国际路线，但是在两月之久并未将国际路线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到了敌人开始布置“围剿”的时候，敌情并不严重，即决定逃跑（当然不是说敌情严重就应该逃跑），[说]当时的条件是群众无基础，无钱，无粮，红军不强，并认为延长日期，红军就不能脱离苏区了。此种决定，并未经任何同志的坚决反对，所以决定实行了。现在看来，逃跑主义的条件，完全不是事实，就是事实我们也要积极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才是正确的。后来纠正逃跑主义的时候，特委曾经以家长式的制止同志，对这一问题的自我批评，于此可以证明对逃跑主义的错误的接受程度，非常不够，所以纠正逃跑主义的工作决议，偏重于军事方面，没有国际路线的实际工作的布置，以致发生军事上的孤注一掷的拼命情绪，这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念，因之后来再而三而四的右倾逃跑主义，大大的减少了一般同志对于巩固苏区的信念和决心，右倾机会主义成为目前的主要危险，这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国际路线到现在还没有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这就是全党的大大损失，这一错误沈宗溢[源]同志要负主要的责任，特委尤其是参加当时会议的特委委员也要负责。后来沈宗溢[源]同志的机会主义观念向前发展，始终对于鄂豫边的苏维埃运动发生失望，于是自己的手续不交代，卷款潜逃了。我们提出要求中央开除他的党籍，要特委委员，尤其是参加当时会议的特委委员，<要>在参加各种会议时报告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在以后工作中注意考查他们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29.接受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决议，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的执行当前的任务：我们认为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鄂北（襄枣宜）苏区及九军二十六师工作的决议，完全正确，是成立本决议的基础。我们号召全省同志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坚决的积极的将国际路线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冲破敌人的四次“围剿”，巩固的发展苏区，争取与湘鄂西、鄂豫皖、均房苏区打成一片的胜利，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坚决的反对逃跑主义和保守主义。

鄂豫边省临时省委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发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西苏区红五月工作决议
(一九三二年四月九日)

省委认为在红五月运动中，应该抓紧“五一”、“五九”、“五卅”三个群众运动，我们目前即须加紧这三个群众大会的准备工作：

“五一”是全世界工人阶级检阅自己的力量，一致向资产阶级总示威的日子，因此“五一”运动的中心工作是加强对工人运动，实行劳动保护法，实际改善工人生活。

一、“五一”群众大会，由工会发起筹备，要组织广大群众游行，在赤白交界处，要号召白区群众参加，推动白区群众的游击战争，鼓动灾民到白区去，消灭赤白对立的现象。

二、在苏区内认为工人没有了经济斗争，是绝对的右倾。这一右倾危险，已经影响到工人在土地革命中表示不积极，特别是新苏区的工人还有替雇主看守家屋的事实。党要注意从工人日常生活中，领导工会去发展工人的经常斗争，苏维埃要保证完全实现劳动保护法，提高工人在平分土地中的领导作用。

三、春收是农民群众唯一希望，党要在“五一”运动中发动群众起来为保护春收，加紧平分土地、修堤、春耕，与击破“围剿”、反帝亲[紧]密联系起来，同时要严重打击因春收而侵害中农的“左”倾行为，即分给富农所种的春收也绝对不能在反富口号之下去抢夺。

四、襄北特委要注意组织应城盐工的罢工，以响应红军在襄北的行动，天汉、云孝、川阳、泻阳各县均要派人到武汉、新堤、岳州、岳口、仙桃、沙洋、沙市去实际建立和帮助白区红五月的工作。

五、党要帮总[助]把省总三次执委扩大会议的决议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把以地域来组织工会的系统改为以产业来组织工会的系统，工会支部生活要加强起来，要教育工人去在春耕修堤、灾民运动等工作中起领导作用，切实的去洗刷工会中非工人分子，反对过去各级党部对职工运动的忽视观念。

六、加紧群众的国际教育，省委宣传部要收集许多国际消息，经常供给国际宣传材料，特别是要收集苏联的工人生活情形去宣传。

“五九”是一九一五年日帝国主义乘二[一]次世界大战机会提出奴役中国群众二十一条，袁世凯签字的日子，今年的情形更比那时严重了，所以“五九”群众运动的工作中心是扩大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这一群众大会要由反帝大同盟发起筹备。

一、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日宣战的决议，做成广大的群众运动，要使党员及群众都了解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不会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我们要联合日本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要与党内忽视反帝工作的倾向作斗争。

二、在已建立了反帝大同盟组织的地方，要立刻督促举行反帝大同盟的较大会议，来布置“五九”工作，党要健全反帝大同盟的党团；在没有建立的地方，要在“五一”群众运动中普遍建立起来。

三、国民党在“五九”运动中，必须[然]做出许多“国耻”“爱国”的欺骗宣传，党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解释国耻是国民党造成的，现在的中国除苏区外是豪绅地主、军阀的世界，“爱国”就是认贼作父，我们要武装起来，

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拥护苏维埃政府。只有苏维埃才是工农自己的国家。

四、反帝必须亲[紧]密与击破“围剿”联系，在保障春收口号之下，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到红军中去，要号召群众起来，完成动员一万人到红军中去的任务。

五、要告诉群众打倒帝国主义必须自己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守备队，绝对要反对命令主义。

六、要在群众中去宣传改组派、国民党同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是来抢夺春收的，要号召群众起来肃反，自动的放哨、侦探和赤色戒严。

“五卅”是中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广大反帝运动，我们今年在苏区这一运动的中心工作是完成改造乡苏维埃的日子，这一群众大会要由工会和反帝大同盟共同发起筹备，在这一运动中，全省乡要举行乡民大会，发动群众起来检阅苏维埃的工作，苏维埃要向群众做具体报告，发动群众对苏维埃的批评，各苏维埃的代表制要完全建立起来，总结红五月的工作，检阅修堤、春耕、平分土地、参加红军执行的程度，检阅赤卫队、少先队、游击队等群众武装，在未执行完毕者要发动群众起来指问和批评苏维埃的负责人，用群众的火力将苏维埃中一切官僚、腐化、消极怠工的阶级异己分子驱逐出领导机关。这一天是完成改造乡苏维埃实行代表制的一日，在未执行改造成为代表制的地方，这天群众大会就要一律举行改造完毕。修堤、分配土地还未完成者，在这天群众大会上要发起一个运动，规定完成日期，一致动员完成之。在这天要举行全苏区总赤色清乡，将豪绅地主反动领袖的家属驱逐出境，只有在完全遵守苏维埃法令与该反动领袖完全脱离关系，在广大群众担保无事的条件之下的豪绅地主反动家属才可以在不被驱逐之列，红五月运动中党的工作是建立支部工作和模范中心支部。

省委认为红五（月）工作的准备要放到支部中去，先由支部讨论，再动员群众来发起这一运动，要严格检查各县的工作与实际布置红五月运动，县委区委均须举行积极分子会议、组织会议、宣传会议，组织各种革命竞赛，特别要在红五月运动的实际工作中，提拔吃苦耐劳积极勇敢的工人、贫农干部来代替不好的旧的干部，全省要提拔出上、中、下级的干部三百人至五百人，要做广大的征收新党员运动，在支部工作基础上来发展新党员到六千人至一万人，俱乐部、通俗讲演社、识字处、诵读小组、工农夜校、列宁小组等要普遍建立起来。红五月的宣传口号、标语、传单、宣传队，要由党统一审查、指挥。同时要准备省委六月十五号的第一次扩大会议，扩大会议之前，省委要有一工作计划，号召全党同志为完成计划来准备这一扩大会议。

其他如“五四”（学生运动），“五五”（马克思生日），均只须由俱乐部召集游艺晚会。少共、党要派人出席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演讲，开会方式，要纠正过去事先毫无准备，只由几个机关筹备而不发动群众，只由机关代表长篇大论讲些官样不关痛痒的话，而不发动群众讲话的国民党式的十足的官僚主义方式，转变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这一转变的方式应将每一个纪念节的宣传大纲，老早发下去，各种小的会议讨论，要是支部、工会等下层组织，在大会前就将传单发到群众里面去，并普遍组织讲演队，告诉他们演讲的方法与内容到处去演讲大会的意义，使群众首先了解。筹备委员会，要发起群众来组织，要从贫农团、雇农工会支部或小组、营团支部，各种群众下层组织的群众会议，在讨论这一纪念内容时，举出自己的代表共同组织筹

备会，在大会时之主席团也是从各下层组织之群众选举的自己的代表共同组织的，领导机关可加一、二人领导之，特别在大会举行时要免除过去的领导机关代表包办演讲的官僚方式，要多吸引群众起来讲演，在红五月运动之纪念日均要执行这种真正的群众运动方式，并成为今后永远的群众运动方式。

湘鄂西省委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非苏区红五月运动具体工作决议 (一九三二年四月九日)

在红五月的中心任务是抓紧“五一”、“五七”或“五九”、“五卅”四个节日，以全力来布置这四个节日的工作，从这一具体工作中来广泛的开展工人罢工斗争，组织工人开展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更要抓紧饥民抢米分粮斗争，使他更广泛的扩大起来，建立城市工人组织的坚固基础，加紧农民的抗租税斗争，特别是雇农的经济斗争，扩大农民组织，发动游击战争，提出和实际执行土地革命的口号与行动，使这些斗争都能走入更高阶段，与红军苏维埃发展汇全起来，成为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总任务下的具体工作是：

一、“五一”：“五一”在事先就要加紧在工人中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提出斗争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工人切身的要求，主要的是以经济的口号来发动工人的斗争，组织工人的罢工，使这些罢工和斗争的工人群众成为“五一”示威的基本队伍，在另外一种情形之下，因为“五一”纪念组织了总工和示威，就应该转变为经济的罢工或政治的罢工。“五一”示威的筹备应由赤色工会发起，组织工人选举出代表（或是在业工人中之热心分子，由赤色工会征求而来）会议性质之委员会来筹备，没有赤色工会的地方，则由工人代表或积极分子来发起筹备。总之，须经过群众而不是由党或赤色工会之机关指定。“五一”筹备会应在各工厂中建立。“五一”过了以后，这种“五一”的委员会即可转变为斗争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以为工人组织之基础。

（一）在宜昌，应利用原有组织之木工，锯工，码头（工）、蔑工等及工作有相当组织之贫妇，将这些组织扩大，更用很大力量深入到机器厂、海员等工人中，准备“五一”之更大力量的游行示威，提出各业的斗争纲领，坚决的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在运动后，将筹委会经过群众的代表会议变为宜昌工人代表会议，以作为宜昌总工会之基础。在“五一”中要注意建立各个工业的工会及工厂委员会、俱乐部、读书班等附属组织。

（二）在沙市，应提出各种工人斗争纲领，加紧各种工人经济斗争，最低限度要做到工人中在“五一”的总工，要将传单口号实际散发到工人群众手里去，要尽量进行上工或散工时的飞行集会。

（三）在武汉，应根据现有的力量尽量做散发传单到工厂里面去，举行上工下工时的飞行集会，按照各厂、业提出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改良待遇等之最简单最具体的口号来发动罢工。

（四）应城盐井要组织罢工示威运动，提出具体的斗争纲领，使这一斗争扩大成为总罢工的开始。

（五）新堤应散发传单到工人群众中去，在码头工人中举行涨价的罢工。提出反对工头剥削的口号，在作坊中举行总工，提出经济斗争的具体口号，事先发起群众的筹备会，计划这一运动的进行。

（六）农村中要举行抗租税的斗争，游击区域要举行示威运动，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的行动口号，捕来豪绅地主，没收财产分给群众，在这一行动中实际组织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组织群众平分土地代表会议，主持平分土地的执行，并要发动雇工的罢工的经济斗争，普遍建立雇农工会。

(七)在这些地方都要组织失业工人的复工斗争，特别在宜昌、沙市、新堤要进行工人、贫农、灾民们抢米斗争。

二、“五七”至“五九”：“五七”至“五九”是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积极进攻中国，逼迫袁世凯卖国政府承认二十一条的日子，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中国革命之今年，这个“五七”和“五九”是更可以激发广大的群众反帝国主义的积极行动。我们应该按照具体环境，选定“五七”或“五九”的一天为示威的日子，号召罢工、罢课、罢操、罢岗，举行群众示威。这一天大家要罢工一天，工资照给，加入群众大会，提出没收日货救济失业工人、灾民，拿救国基金来救济失业工人、灾民等行动口号，提出国耻是国民党造成的，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造成国耻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工人要组织反日义勇军或加入义勇军，组织没收日货队开始检查日货，特别是号召日本工厂、商店、公司的罢工，反对开除，要增加工资，广泛的发展群众的反帝组织，提出以民众政权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揭破国民党改组派及一切反动派别的欺骗。宜昌、沙市、新堤、应城盐矿要在这一运动中，将群众的反帝组织建立起来，在国民党组织的纪念会或示威，我们应领导群众参加在内面，号召群众驱逐那些欺骗群众的国民党领袖。

三、“五卅”：要根据红五月工作进行程度，估计过去两次的经验，转变群众斗争到更高度、更扩大的实际行动，由各地党的领导机关自行规定，省委亦当再有指示。

四、在几个示威运动中，要注意组织工人自卫队保护工人的行动，准备与军警冲突，保护工人领袖，特别注意秘密党的组织（重要负责人不准参加行动），要注意抓紧斗争的转变、扩大与深入，要注意扩大和坚强工会组织。要以支部为活动中心，注意训练党员的活动方法，注意吸收积极工人入党，注意组织工人参加红军，注意组织苏联之友社工人保护苏联，组织红军之友社动员拥护红军。在各种斗争中及每个运动中要注意组织士兵联合士兵，使士兵在同情工人行动之下更能得到胜利与成功，更组织兵变、兵暴来配合这一运动的胜利与成功。但要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企图。在四月二十号前党、团、工会、反帝大同盟要实际派一批人去宜沙，武汉，新堤，去实际建立这些工作。

这些行动要与苏区红军发展相配合，要联系反抗敌人“围剿”湘鄂西苏区的任务。

湘鄂西省委

鄂豫边省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二号）——关于成立山南、山
北游击队问题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日）

1. 过去我们的军事工作，在右倾机会主义影响下发生了许多错误，如行动不积极化、保守等待赶跑敌人、躲避敌人、军事犹豫等，尤其是指挥上不统一，游击队形成保卫机关的武装，所以在军事上不能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弱点，以至敌人深入赤区、骚扰赤区使苏区不能得到巩固的发展。

2. 因此本会决定在山南山北各成立赤区游击总指挥部，在山南为“鄂北山南赤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指挥枣山三区、宜东、钟北、襄二区等地的地方武装，在山北为“鄂北山北赤区游击总指挥部”，指挥襄一、三四区及枣阳等地的地方武装，指挥部的任务，是在统一指挥所属范围内的游击队、赤卫军、挺进队等。各机关的警卫队，应即编到游击队，但必要时集中地方武装力量或者单独地打击敌人弱点，或者配合红军的行动时，仍在统一指挥下分散游击，游击队应尊重该级苏维埃军事机关的意见，赤卫军、挺进队应受该级苏维埃军事机关的指挥，这样争取继续不断的大胜利，扩大地方武装为巩固与发展苏区。

3. 委任刘明如同志为鄂北山南赤色游击队总指挥，邱一民同志为参谋，政治委员未委以前由刘明如同志兼任。委任赵英同志为鄂北山北赤色游击总指挥，赵大×同志为政治委员，鲍大山为参谋，希以上各同志立即进行工作。

4. 在这一军事布置之下，各大小军官，立即取消，各级苏维埃同志恢复，各级赤卫军队部的组织仍照大小军区未成立以前进行工作，特别要将赤卫军，挺进队××少先队加以整理，加紧其政治的军事的教育训练，切实进行其工作任务。

附：游击队的组织必须整齐精干，山北游击队为鄂北山北赤色游击第一二三四……大队，大队以下为中队，中队以下为支队。山南同样的编制以便统一指挥。

右令

鄂北山北赤色游击队总指挥部

鄂北山南赤色游击队总指挥部

各大小军官、军事委员会

各级苏维埃政府

主席团郝久亭魏世钧[尉士均]

吴首青马三光

余一安[余益菴]

中共湘鄂西省委给钟祥县委信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日) 钟祥县委：

省委接到你们三月二十四号的报告及与××同志谈话，对你们的工作有以下的指示：

1. 钟祥的党由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向国际路线走近了一步，由豪绅富农路线及盲乱杀人的纯粹武装行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开始转变到发动群众经济斗争（如南区拖延枪款、租债等），发动了上千的群众，同时在整个钟祥受到豪绅地主团防及反动政府残酷榨压之下的群众生活已经感受极端痛苦，加之去年占全县十分之六地域的大水灾，更使群众生活饥寒流离，尤其是在南北苏维埃运动与红军发展夹中影响之下，更造成了钟祥顺利的革命条件，这一条件将有造成钟祥苏维埃政权而打通湘鄂西、鄂北苏区成为一片的中心作用，你们的中心任务应是为着实现这一中心任务而斗争。

2. 南区拖延租债枪款的斗争，按现在来讲已经落到群众要求的后面

了，事实上群众现在的斗争情绪不仅如此，你们一刻都不能停留在原有范围以内的把它扩大起来，大胆的公开的提出抗租抗债抗一切捐税，实际上

已是抗，而不是拖延了，这一斗争的要求还不仅如此，你们应更进一步的提出没收豪绅地主全部粮食及财产及富农多余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直接发动抢粮的斗争，这一斗争的发动就是武装成千成万农民的游击战争，应开始建立区革命委员会，组织贫农团，雇农工会，宣布并实际执行土地革命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建立起乡至区的苏维埃，猛烈向东南发展与京

山西南部苏区取得联系。你们现在的工农自卫军应改为工农赤卫军，工人

多的地方可单独成立工人赤卫军，受工农赤卫军之区级指挥部的指挥。

你

们的特务队只有准备找经济，单独肃反是不对的，应改为工农赤卫军之游击队，准备作负担新式武装的基础（由省军委发给相当<的>新式武器），这种武装完全是与群众打成一片，绝不许有脱离群众的单独行动。肃反是整个群众的共同任务，不能说是特务队的单独工作，如果[单]作找经济的任

务，更是脱离群众单独的军事行动企图，尤其应制止，要将地方的军事武装看成是群众的武装，他的任务是配合广大群众作游击战争的，这里须迅速改正。

3. 钟祥的抢粮的斗争，不仅在南区可以发动，而且更不应该仅仅只游击南区，在西南区、北区、东区，这些灾区都应该普遍的发动这一斗争，从这一斗争中来争取广大群众。在灾民中可组织灾民斗争委员会，灾民自卫队。抢粮斗争按钟祥环境来说是发动群众的第一个中心策略，你们应注意去争取实现，并从这一斗争中普遍的建立农民委员会，里面成立贫农小组、雇农小组，雇农较多的地方就应成立雇农工会的支部，各种工会的组织都有直的系统。西区的石头工人应把他组织起来，你们应特别注意工人的经济斗争，钟祥工人工资比较别县更低，上工只六百钱一天吃两餐饭，而米更卖一元多钱一斗，你们应根据这种实际情形具体的提出工人的斗争纲领，如要吃三餐饭，要增加工资到若干等口号，发动他们的斗争，将他们组织到工会里面来。十分之三的失业工人你们应注意组织他们领导他们作复工斗争，除此以外就是

抗租税，钟祥的租税特别繁重，这一繁重的租税，是对劳苦农民无人道的残酷剥削，因此反租税是争取群众的第二个中心策略。这一斗争亦不仅只偏于南部或西南部，在东部、北部、西北部同样应普遍的发动，可以组织抗租抗债委员会，反捐税委员会或联合会等等附属组织，都是围绕着农民委员会的周围，使农民委员会在广大的群众的各种斗争组织中巩固起来。

4. 在这些斗争中要注意斗争的转变与扩大，特别注意在斗争急剧时的武装群众，一个斗争都必然要遭受到敌人的残酷压迫，只有将斗争深入扩大。这些斗争发动起来得到了胜利应马上转入土地革命的更高阶段，由这些斗争转变到游击战争以致夺取政权，只有斗争在继续不断的深入和扩大之下才能战胜敌人，在游击战争开始发动就应注意夺取敌人的武装，武装自己，这是争取胜利的主要条件。

5. 你们发展的中心是南北两个，但应以南区为主要中心，同时不要忘记向北发展的次要中心。

6. 你们在发动这些斗争中，一定要吸收团防士兵的家属参加，并分得斗争的胜利品，特别是在宣布和执行平分土地时，团防及白军士兵是本地人者，他的成分如果是中农以下者其本人与家属照一般群众分配土地，你们要<用>反对剥削与土地革命及反帝反国民党的中心口号，去做士兵运动，更应打入进去，在里面组织士兵委员会，提出斗争纲领，要发饷，要鞋子，要袜子，要零用，反对压迫反对打骂等，发动他们的日常斗争，在这些小的口号之下，组织罢操罢岗，不去×的斗争中，来组织兵变兵暴，县委马上要建立兵委专门负责这工作。

你们现在在团防中四十多支枪的就有我们同志二十余人，你们不要受队长的投机的影响和恐怕连系乡保的机会主义，应马上发动士兵同志的兵变，以大半力量来克服小半力量，如队长在这一行动中同意了，可允许他加入，如靠不住，应采取不客气的手段，将这一兵变的武器作为群众游击战争的基础，绝对反对机会主义的企图。

7. 你们在发动农民斗争中，同时要注意城市工作，特别是钟城、石牌、旧口、唐港市、冷水埠、洋梓镇、丰乐、落河、转斗湾，尤其是钟城，以免形成我们占乡村，敌人占城市的对立现象，以免除夺取城市之困难。

8. 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极端恐慌及革命斗争更剧烈的当中，帝国主义直接进攻中国革命、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行动已经在积极开始了，国民党一贯出卖民族利益，压迫群众的反帝运动，你们应注意加紧反帝工作，根据中央及省委最近关于反帝的文件具体讨论执行，要从群众斗争中将反帝组织建立起来，而且同时要拿反帝的斗争去组织群众，要注意反帝与土地革命是不可分离的任务，要打破在农村忽视反帝的机会主义，反帝与反国民党是不可分离的一件事，尤其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宣战，你们应到群众中做广大宣传工作，使群众了解只有苏维埃才是真正反帝的，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首先打倒出卖民族利益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这一工作你们须具体讨论执行。

9. 据你们报告上，县委只书记在县，其余都分散在各区，这种方式是要不得的，这是妨碍集体领导者，一定会形成个人包办的家长制度，× 三人在家，不能走很远去巡视工作，应马上××个专门的巡视员代替常委的巡视工作，更要督促各区每月做详细工作报告，以便具体检查和指导各区工作。

10. 龚家集特支有一百里的范围，你们应该成立区委，将各处的小地方划

成几个支部，每一个群众组织的地方应发展成为一乡农民委员会（用群众的代表会议）共同成一区农民委员会，成为发展之形势，西北区的两个特支应发展准备合并成为一区，黄庄等特支应注意向城里发展。

11. 你们应注意反改组派斗争，防止改组派的欺骗作用，要注意他在群众中提出什么欺骗口号，我们就马上提出斗争纲领来发动群众揭破他的欺骗。

12. 汉流在钟祥亦非常普遍，你们亦须拿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去瓦解他们，你们要注意设法打入他们的组织，组织下层群众，反对领袖的压迫欺骗。

13. 你们现在应抓紧在水灾后的修堤、春耕，发动群众起来要反对政府，反对收堤捐，要用群众的力量来威胁敌人修堤，要提出群众对修堤的意见，要怎样修法，几时完成。在水灾后缺乏种子、耕牛，你们应发动群众没收豪绅地主全部及富农多余的种子、耕牛、耕具由群众分配，这一斗争同样是钟祥党发动群众的最中心策略，不可丝毫忽视，

此外，你们应在这些斗争中来发展党的组织，大胆的向雇贫农工人开门，中农入党要看成例外，富农以上绝对不收，但群众组织必须多吸收中农参加，以建立与巩固与中农联盟的策略，党要特别注意从斗争中提拔新的积极[的]雇、贫农、工人干部，不执行党的决议的旧分子应毫不留恋的撤销其工作，使党如铁一般的坚强起来，如机器一样的灵活起来。执行以上一切任务，以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成为一切任务的中心。

现在青年团还只有一个支部，党内还有许多青年团员，你们应马上把他清出来编入团的组织，党要负责把团的组织建立起来，并要帮助建立团的组织系统及单独工作，以致到建立少共县委，领导他们讨论青年工作的建立，如少队、儿童、青工等工作，没有团员的地方，党要负责发展，党要把这一工作认为主要工作之一。关于团的具体工作，特给你们许多文件，须详细讨论执行。

湘鄂西省委

四月十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此处约缺十五个字。

鄂豫边临时省委关于改组情况及军事问题：

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湘鄂西中央分局：

我们现在依然不能向你们作详细报告，因为天天要跑兵，又堆下许多事情未进行，其实有些地方已在决议上大致的写了，只将急须报告的写下，希接到后给一指示：

1. 二次扩大会议到会共 41 人，开了 24 小时，会议的内容是估计目前的政治形势，彻底揭发[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与怎样巩固的发展苏区，发言颇热烈，特别是揭发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扩大会议中推选王君恩（中农，十七年入党）、郝久亭（富农，十一年入党）、王以祥（雇农，十九年入党）、陶汉三（工人，十七年入党）、魏世筠[尉士均]、陈雪怀（地主，十五年入党）、夏天选（中农，十七年入党）、宋良由（地主，十五年入党）、马三光（小商）、张木千（地主，十五年入党）、秦玉葵（贫农，十八年入党，现在南阳）、陈常云（雇农，十九年入党）、蒋永祥（贫农，十九年入党）、李民匠（独立劳动者，十九年入党，现在康县工作）、刘高南（工人，十六

年入党)、杨士元(贫农,现任少共工作)、柳克明、李子宾等19人为执委。

2.在一次执委会议中,推定王君恩、郝久亭、王以祥、魏世筠、陶汉三五人为常委,王君恩代理书记,候中央分局批准。郝久亭为组织部长,陈雪怀为宣传部长,李政办党校,指定五人为经常巡视员。对于传达大会的精神是将决议迅速发出去,省委做一告全党同志书、告群众书,苏维埃做一告群众书,军委做一训令,都是主要的根据大会精神,特别指出过去机会主义错误。五个巡视员马上出发工作,省委也加派得力同志,会同当地参加扩大会议的同志分途召集各种会议讨论大会精神,和提出具体的工作计划。南阳特委立即由省委讨论该地工作,要出席大会的南阳特委代表参加,并决<定>该代表为省委巡视员,出发到该地巡视,于二十天内召集各属地方的积极分子会议、负责传达大会精神和转变其工作。襄阳特委方面派巡视员出发到该地巡视,于二十天内召集所属地方的积极分子会议到苏区来举行,省委派人参加。均房,特委方面,派巡视员前往巡视,将决议写去。钟祥方面早有新的布置。临时省苏维埃的组织不合组织原则,是在逃跑主义之后,为了转变群众的仇视复而组织的。决定于五一召集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鄂豫边省革命委员会,现在加紧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军委的组织以九人组织之,地方武装也重新的布置。

3.省委在最近一个月内须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南阳问题,红五月工作,通过各种文件和划分区域,土地问题,通过组织宣传工作计划,枣阳问题,肃反工作,白军运动,襄特问题,省革问题,检阅工作,少共工作,工作[运]工作,妇女工作,改造苏维埃,红军问题,钟祥问题.....等,其他问题省苏、军委均有工作计划和议事日程,对于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局长已得人,候他过去所担任的工作结束后,即开始组织和进行工作。对于工人运动简直是放弃了,也没有发动工人斗争,所以无产阶级基础薄弱达于极点,此次党的扩大会议没有多的工人同志参加即是证明。工会工作的确比较困难进行,请快派得力同志前来做工运工作。少共工作只是去年十二月由鄂豫皖派来的一个杨同志在此巡视工作,无有大的成绩,没有省委的组织。互济会不过只是少数组织其其空洞的名义而已。妇女工作才开始注意。各级苏维埃简直不象个政权形式,脱离了群众,其他各个工作的毛病,真是应有尽有。

4.在反机会主义的精神之下,红军战士的斗争情绪是更加提高了,但是负责人都赶不上一般战士斗争情绪的增高,右倾机会主义仍是严重的危险(红军游击队的不正确倾向,大致详于决议和军委通令、训令中),所以南拖北拖,三月内很少胜利的成绩,只是要苏维埃办粮食买子弹,这真令人气愤。其实一般战士的英勇,能够与敌一团作战,在敌人的机关枪、迫击炮之下,支持半天之久,结果敌人损失超我数倍,这在两三次作战的经过都是如此。前日夜攻×山,敌人哨兵一见我军即行开跑,并未报告营部,但因我军行动不迅速,胆怯,未将营门打开(许多武器在敌营内)就退却了,只缴敌人共枪四支,诸如此类战争和失掉许多机会,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毒人脑太深,实在可惜。昨晚决定红九军总指挥张木干调任鄂北山南赤色游击总指挥部政委,以三路军司令官曹明文同志充任总指挥,以曹的观念较正确,失败情绪较不浓厚,红九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韦克铎同志是中央派来的,曾在苏联学习军事多时,但是他的毛病是缺乏游击经验军事犹豫受了失败情绪的影响。我们的意见,希你们派一个比较健全的参谋长来。韦克铎调办军校。

5.以过去一切工作的错误(详见决议等文件)敌人以五六团兵力深入苏

区，横冲直闯，以三团兵力尾迫红军除了领反动符号和反水的群众以外，其余群众差不多天天都要跑兵，敌人所到之处，第一是抢粮食，第二是用欺骗办法要群众组织铲共队，第三就是屠杀。所以在整个苏区以内可以说没有一寸静土，襄枣宜被敌人抓去将行殆尽，于是群众生活日益痛苦了，红军给养也发生困难了。但是一般群众尚称坚决，颇不易受反革命的影响，这是我们巩固苏区的主要特点之一，枣二区群众在罗盛江的欺骗和屠杀之下都领了反动符号，但无极其反动的行动，而我们也没有打入进去做工作。枣南三区和宜东区改组派的活动颇凶，在敌人的积极进攻当中，帮助范师组织铲共队，清乡和暗杀负责人。苏区周围的反动团防和铲共队也很凶，经常来赤区骚扰抓[抢]粮食，但不敢与红军作战，在此情况下，党的作用更大大减少了。党的负责人的军事投机非常浓厚，放弃了党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过问红军和游击队，不过此项错误也在积极的纠正，就是一般工作也在开始的急剧转变中。

6.我们在此地工作，对于上级文件和兄弟党的文件简直看不到，即或看到已成古文了，外面的政治消息更得不到一点，真象坐鼓一般。希你们尽可能的派干部来此地工作，并将各种文件多多的寄来，均由钟委护送来此地。做军事工作的，做少共工作的，做工运工作的，希你们一定派来。

鄂豫边临时省委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

鄂豫边省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第一号）——目前形势与红军任务、改造红军、加强赤卫军工作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

一、目前中国革命新的开展，就是在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崩溃的形势，工业、农业的危机，迅速的开展，又加上空前的水灾，使成千成万的劳苦工农受到骇人听闻的饥饿寒冻，失业疾病与死亡，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东三省上海，充分表现各国帝国主义直接镇压中国革命，瓜分中国与武装进攻苏联的积极政策，然而国民党政府却非常明显的表示其极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怀里，因而激起全国民众反帝反国民党的高涨。国民党也就在全国民众面前宣告破产了。全国各个苏维埃及红军在此顺利条件之下，均有猛烈的伟大的发展，红军有光荣的胜利，而且与反帝的民众运动汇合着向前发展。但是鄂北苏区及红军的发展是不迅速的，苏区已是普遍的遭受敌人的摧残。这并不是鄂北苏区和红军脱离了全国革命顺利的条件，也不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够，更不是群众没有基础与红军战斗员不英勇，恰恰相反，鄂豫边的反动统治阶级更加重了对工农民众的压榨，百户的村庄，每天饿死到二人以上，一般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建立苏维埃的要求甚是迫切，反动统治阶级是日益崩溃的形势，苏区以内是有广大群众的基础，红军是由长期的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具有极大巩固与发展苏区与保障土地革命利益的决心和勇气，这些都是事实，谁也不能否认。

二、我们的苏区受到部分的挫折，唯一的原因是在长期的右倾机会主义统治之下，国际路线始终没有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逃跑主义实现以后，大大的减少一般同志对于巩固苏区的信念，没有估计到广大群众的力量，没有估计到一般战斗员为巩固发展苏区和保障土地革命利益的决心和勇气，而只是看到敌人的五六团兵力，就表现出悲观消极，对敌恐惧，企图敌人内部冲突，和红三（军）、四方面军前来解围，以及敌人自动撤退，而放弃红军游击队的积极性，以“怕牺牲”，“要休息”，“找饭吃”，“找衣穿”的借口，而再三再四的布置逃跑避免与敌作战而放弃了胜利的进攻，以“分散游击”，“赶跑敌人”代替了消灭敌人，并且以失败的情绪笼罩，影响到作战的犹豫，使敌人从容布置进攻苏区，深入苏区，一直到敌人在苏区内横冲直闯，大肆烧杀掳掠，以欺骗压迫的方法，组织铲共队。仍然坚持那些不正确的倾向，这在客观上是领导我们英勇的战斗员、放弃了巩固发展苏区与保障土地革命利益的任务，使群众感觉到红军、游击队不能坚决消灭阶级敌人而作战，影响到红军、游击队的锐气，影响到群众斗争的情绪。这很显明的是广大劳苦群众的罪人，是革命战线上所不容许的罪恶，本会对于这种现象要号召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和我英勇的战斗员与之作坚决的斗争，与[予]以无情的打击。

三、因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已经使苏区受到部分的挫折，而且此时敌人正在使用一切极其残酷的手段，来极端的摧残和屠杀工农劳苦群众、在襄枣前后遭受屠杀的群众，已有千余人，敌人所到之处，粮食扒光了，耕牛赶完了，家家户户一扫而空，特别是工农群众去跑兵，春耕紧迫不能耕种，我们断定这是我们英勇的战斗员所最不能忍受的。因此红军、游击队的当前任务，是在利用客观革命顺利的条件在本会的统一指挥下选择敌人弱点，集中力量，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以争取继续不断的大小

中共湘鄂西省委给襄北特委的指示信（二）（省字第16号襄字第2号）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

省委在听到落霞同志关于襄北工作的报告之后，认为有立刻给你们写一封的必要。

（一）省委对襄北工作的决议写得非常具体明白，并指出特委工作的中心是在京山，要特委立刻去建立京山的临时革命政权，但特委在接到省委的决议，忙的是开会讨论写漂亮决议，没有集中精力来执行省委的决议。现在天、汉、云、孝党的工作还没有大的转变，应城工作也与去年差不多，与天潜、京山还没关系，还要绕通洪湖的天潜、京山去（省委不相信，偌大的部队，在襄北连交通路线都会无法解决的），省委派来襄北五百多干部，特委没有去运用，这些都是说明特委不但还没有充分执行省委的决议，而且还没有了解省委决议的精神，更没有懂得建立临时革命政权的重要，对襄北革命发展的形势，还是估计不够，在实际工作中，还是表示出保守主义。这一问题，特委必须运用自我批评的精神，采取有效方法，来立即纠正的。

（二）特委要具体帮助襄北党建立起支部工作，各县委区县[委]均须建立起组织、宣传的单独工作，要动员下级干部切实到支部中去，要在支部工作基础上来推动一切工作，才能消灭目前党的命令主义。现在省总、省反、省苏、少共均派有代表团[团]在襄北，特委目前的工作方式就要指导与推动他们去各自团结积极分子，加紧平分土地，发展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实现劳动保护法，切实领导灾民到白区去斗争。只有这样有计划的去工作，才能发动襄北广大群众的斗争，才能巩固和扩大襄北的苏区，这才是执行特委的任务。但特委没有这样做，子俦同志忙于给天汉县委审官司，这真把特委的任务忘掉了。

（三）现在国民党正在沿襄一带籍[借]修堤来组织群众，群众大部分已被其欺骗了，特委现在要切实帮助天汉县委派干部到修堤群众中去，发动修堤群众的斗争。灾民在襄北闹得非常之糟，特委要切实动员各县来做灾民运动，灾民中的捣乱分子，要应用当地群众的力量驱逐走。在党员和群众中，要进行广大反均平主义的教育宣传工作。云孝是敌人“围剿”襄北的运兵要道，应加紧发展云孝的游击战争，牵制敌人的兵力。应城要切实组织各部门的工人，发展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建立赤色工会，绝不要空喊总同盟罢工（现在是否有总同盟[罢]工的条件省委不知道），特委与各县的秘密交通要立刻起来保证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能指导各县的工作。

（四）天潜、京山的工作你的[们]要特别注意，最近天潜、京山的党在（反）“围剿”中犯了严重逃跑退却进行卖良民证（如监利、川阳、江陵），卖了几千，而党和苏维埃还不知道，这表示党、苏维埃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到了如何程度，表示党领导力量微弱到了如何程度。现在涨水的日期一天一天紧迫了，群众的呼声一天天紧迫了，这就是在猛烈的加重党的责任，老实说，这样重大的责任需要党以百分之百的积极性、才能担负这种任务，这需要刻不容缓的从领导机关到党员有一个总的动员，用一个全党动员的力量到群众中间去。不但做艰苦耐劳的宣传鼓动，而且要实际去组织，不但如此，而且还要做群众的模范。才能完成这个重大的紧急任务。

现在要求一个为加紧××堤工而斗争的总动员，具体办法是，

1. 苏区内部的堤工，要动员所有支部全体党员在群众中间去活动，自己

就带着伙食去组织群众，一二三天都可以；不拘日期，能做堤工半天的都可以，在各种会议工会贫农团人民会议都提出这个堤工问题来讨论，使群众了解苏维埃的经济困难，党员应发言提出，只有不拘日期凭我人力自备伙食去修，才有完成的可能，在这个会议中大家报告[名]（我能够带几天伙食去修）党团员要发动首先报名，这样来引起群众的积极性，在×××的×××成立修堤代表会议（讨论修堤的方法），以代表会×××建立的委员会，×××竞赛的办法，县与县竞赛，区与区竞赛，乡与乡竞赛，一乡又组织多少队，队与队竞赛，每个同志组织好多群众自备伙食修堤，同志与同志竞赛，一个人一天能挑多少土，一个人与一个人竞赛，用这些竞赛的方法来增加修堤的速度，今天动员一二三乡，一二三乡中互相竞赛，明天动员四五六乡，四五六乡中互相竞赛，各方互相订立竞赛合同，群众的生活困难，力量的不够，可以一天为基础，同时不要完全是靠男子，老少男女都可动员，虽然他只担得一寸土，我们要看成是一寸土的力量，没有力量挑的可以担负挖土。把这些力量集中到襄江两堤，比如需要一百万的堤工，在苏区假如三十万群众，每人只做一天，这一总动员之下，一次（一次不一定是一天）就可完成十分之三，再来一次就可以完成十分之六，这种群众的×××忽视吗？如果在总动员之下，×××时打起了底子，极[积]得几尺深的水，能够保持得春收，春收虽然很少，但亦总可以增加我们的粮食。这一总动员的工作要马上开始执行，自然苏维埃要从各方面尽量设法来帮助修堤的粮，绝不应在总动员之下而对办修堤粮食总工和丝毫忽视，但我们总动员的主观亦不要依赖苏维埃。我们主观的要求。要在希望总动员中来解决这个问题，来完成这个堤工任务，县区级要以一半的力量，就是要派出一半负责人来加紧进行这一工作，这一口号是到堤上去，乡的下级负责人在这一总动员的工作中，应完全深入群众，全体到群众中间去，到堤上去，不但只领导活动，而且要自己同群众一样的动作，对这一工作表示总工的党员，应严格处罚以至开除党籍。

在这一总动员中，党报、群众报及各种宣传品的中心应转到这一工作上，传达竞赛消息来鼓励群众，苏维埃应办奖赏品（如面包、红旗）以奖赏竞赛胜利的群众，报上要鼓吹使这些消息普遍到全省范围，以此地的胜利影响其他地方，更要将这些消息传达到白区修堤的群众中间去。

2.在白区境地的堤工，敌人现在已进行各种欺骗，有些同志以为一到敌人那里去修堤的群众就是被敌人领导了，我们要去争取修堤的领导权，要使群众不去在白区修堤，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这会忽视了我们直接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任务。虽然我们赤区不能丝毫忽视敌人的欺骗，敌人确实是利用修堤来欺骗群众组织群众，成为他进攻苏区的策略之一，那一个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忽视×××敌人欺骗×××斗争的任务，×××是帮助敌人，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敌人那边修堤的群众就×××是被敌人领导了，我们只能说是被敌人×××，因此我们×××一到敌人×××修堤的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加紧完成堤工，×××与敌人的压迫剥削××××，这是我们的中心策略，这里问题的方法是：

- （1）要动员党团群众×××××，一方组织很多人加入群众；
- （2）在群众的×××的×××的斗争纲领，是要扩大堤工工程，要限期完成堤工，×××人数到多少要求达到了或将要达到时，又×××增多继续不断的×××，要使堤工赶快完成。
- （3）反对压迫，反对打骂，反对限制一天担好多，要休息自由。

(4) 要增加口粮，要改良饭食，下雨不筑堤，口粮照发。

(5) 不买良民证，反对压迫群众买良民证的剥削压迫 × ×

(6) 从这斗争的扩大中，敌人和有 × × × × 应组织群众 × × 敌人，在群众中要提出具体条件，非达到所提出之 × 件不上，如能达到斗争就得了胜利，要能揭破敌人的欺骗。在这些斗争发动到激烈时，一 × 受到了敌人的更残酷的压迫（如逮捕等），我们必须以群众组织的力量去战胜敌人的压迫，我们要组织 × 公开的修堤代表会议，× 选举出来的斗争委员会为斗争领导机关，以群众示威罢工来争取条件的实现，从这些斗争中来揭破敌人的欺骗，加速堤工的完成，各领导机关都要派负责人进去领导这一工作。在赤白交界更便于公开活动，斗争到最高度，敌人直接用武力压迫，应动员群众起来夺取武装，这些斗争策略应当无 × × 的执行，要 × 反对不注意发动群众小的斗争，而一味的提出武装威胁的“左”的方式，反怕将斗争提高深入扩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有采取正确的进攻的策略，才能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

3. 在堤工中组织及具体工作与方法的：

在这修堤的地方就应建立党的支部，人数过多者不必成立几个支部，如有二千以上的人可在支部下成立支分部（如麻布拐、莲花寺、东荆河——现由三千人减至二百 × 恢复原来数目 × 须更加扩大，沔阳、江岸、细港），在敌人修堤之麻布拐、观音州等亦同样进行，但支部组织应绝对秘密，支部负责人不仅只做党的工作或指挥，而自己都是同群众一样挑土，应在这些堤工地方建立俱乐部，每一地方要建立一个，在休息时候大家到俱乐部去玩，内面要设阅报室、演讲室、新剧及陈设各种宣传品，每天应规定几时至几时是休息时间，在休息时间就进[行]会议及宣传工作，不要在群众修堤的时候，支部同志不做工只去演讲，这种方式群众不愿接受的。在做工时间可利用革命歌曲，顶好是关于修堤的歌曲，引起大家来唱，一方面是兴奋群众，一方面也进行了自然的宣传工作。

各县负责人在几个大的堤工的地方应实际去领导，监利县委派一人去领导蒋家 的堤工，沔阳县委应派出二个负责人去领导江岸及东荆河堤工，江陵县委要派出一人去领导麻布拐的堤工，派出一人去领导莲花寺堤工，潜江县委要派一人去领导莲花寺堤工及泗港的堤工，天潜要派人去领导泗港堤工，川阳要派人去领导南平院堤工，其余各区应派人到鄂北地方去领导堤工，由各县委具体决定。

敌人修堤的地方，监之观音州由一万减至三千，监利县委要领导依据以前的人数，下车湾要扩大人数至三千以上，在这两处要建立党的支部，底下建立支分部，江陵之麻布拐上段现只二千人，要扩大人数至五千以上，在这里面要建立支部与支分部 × 委要负责领导，沔阳之螺山下现只有八百人，没有一个苏区群众，监沔两县委除设法打入内部外，并需组织苏区去修筑，在这一地方要扩大人数到三千以上，监沔两县委负责督促两附近区负责领导，沔之三口先是我们苏区群众有五百人被敌人打散了，现只有白区群众二百人，现府场敌人退了，沔委要加紧动员群众去修筑，这一地方要扩大人数到一千以上，这几处大的堤工向各县按照堤工工程已修之 × × 及能动员之力量，详细估计具体规定完成日期，在这一规定之日期内加紧动员以期达到目的。

堤工代表会是由修堤群众自己选举的，由二十人至三十人选举一个代表，首先由二十人的分途的群众大会提出对修堤的许多意见，选举代表，由

代表到代表会上提出，综合各代表的意见，作出结论，成为修堤的一致决议。

在代表会上选举堤工委员会，该决议由堤工委员会负责领导执行，堤工委员会在白区就是斗争的组织，为了迅速完成堤工改善群众生活而斗争，堤工委员会对堤工×取得代表全体堤工之权。至于赤区的堤工委员会则是动员群众和管理堤工及群众经济文化的公共机关。大会后，代表职权仍然存在，群众有临时的××的代表提出，由代表负责与堤工委员会交涉办理，堤工委员会只能执行由代表会议决定过的事情，发生新的事情堤工委员会无法处理，应召集代表会议解决之（如计划的变更、方法的改良等），在挑堤的时间，堤工委员与代表均同群众一样做堤工，不得成为官僚主义的机关，经常进行批评会议，批评谁不努力×，党要在这里面负责领导各种会议的进行，修堤委员会成立后，苏维埃委派之堤工局即不要了。修堤委员会及代表会议仍在苏维埃领导帮助之下。

不拘在苏维埃修堤的地方或敌人修堤的地方，都要成立修堤的自卫队，苏区的可用公开方式，利用旧式武器、刀矛等，自卫队的成立方法组织由代表会议决定，并须由各县委供给一部分新式武装以保护修堤安全。在敌人地方可甲秘密方式，利用挑土扁担及挖土锄头作自卫队的武器，交战的办法，土块也是我们的自然武器，<要>很好组织与统一指挥，以便在行动时能取一致的行动，以保护斗争的××，如遇敌人压迫逮捕时，自卫队要负保护与救护的责任。要保证一个人都不被他逮捕去，在捕人时应与之武装冲突，夺取敌人武装，武装自己，广大群众都要拥护自卫队，自卫队的组织是征取自愿的加入，不许强迫，在苏区修堤地方防止敌人摧残，须在自卫队中建立联络哨线及守望队×××，建筑工事等防御，除派出××××外，××工时间不许有一个闲人。以上两种方法，×××部要迅速讨论具体执行，肃清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不做群众工作的命令主义，为迅速完成堤工而斗争，是党在被水灾苏区今天最中心任务。

中共湘鄂西省委

四月二十一日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此处缺八个字。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党在湘鄂西苏区同反革命团体斗争决议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六日)

一、最近在沔阳、天汉、天潜、川阳、荆门、荆江、监利、江陵各县，均破获有反革命组织。监利之赤八口，江陵之徐李市、熊口等处，潜江且发生黑夜抢劫、拦路杀人等现象。徐李市的当地苏维埃不独没有动员群众肃反，而且连晚上睡觉都不要，就这些破获的反革命口供，则反革命的活动大概于下：1.由武汉、岳州、新堤、沙市派人来组织。2.他们的组织同我们一样也是有省委、特委、县委、区委等。3.他们宣传二五减租，反对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主张劳资妥协，反对劳动法。4.他们混入苏维埃、党、青年团、工会、互济会进行许多破坏工作，故意不执行党和苏维埃的决议，消极怠工，强制和压迫群众，表现十足的官僚主义，使工农群众反共反苏。5.他们诬蔑党，欺骗群众，对江南失败不负责任，诬蔑苏维埃买了水利债券不做堤。6.他们领导向贫农、中农、工人乱斗，领导灾民乱杀放火。7.他们同敌人通消息，帮助敌人进攻苏区。8.他们混入红军组织拖枪出去，帮助敌人通消息。这种反革命的活动，是因为湘鄂西苏区在执行国际路线以来，开展了苏区阶级斗争，而且一天天紧张了！地主与富农分子看到自己地位的根本动摇，便团结他们的力量，利用一切方法与一切机会在党与苏维埃、红军、职工会进行各种反革命工作，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旧有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二、湘鄂西党对于肃反工作还没有明确的工作路线，表现着许多错误和弱点。这表现在于：1.把肃反工作只是看成是政治保卫局的工作，而没有把这一工作看成为党、苏、红军、工会的主要任务，一般的是放弃忽视，对于反革命没有

警戒心。

2.把这一工作只是看成是偶然事件，而没有有系统的从思想上舆论上同反革命团体作斗争。

3.梦想以政治保卫局的军事的刑事的和苏维埃的法律来消灭反革命，还是国民党的警察制度。对付反革命斗争的方法，没有思想的斗争，没有有系统的检查，只是逮捕和拷打、枪决，而且没有根据的乱捕、乱打·乱杀。对于怀疑党、苏维埃策略的，甚至对于批评党、苏维埃的，就以反革命对待，造成群众中的恐怖心理。

4.有时夸大了反革命团体的力量，把一切消极怠工的分子、犯错误的分子都怀疑是改组派，造成一种恐怖状态。

5.根本没有了解到一部分群众被反革命之利用是因为对党的政策不了解、不信任，因为党内苏维埃内之官僚主义与××反富农斗争中农使得农民不满，因此没有把肃反工作与加紧对于群众的教育工作，发动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对党和苏维埃自我批评，严厉的××自己的工作的任务联系起来。

三、中央分局认为现在必须号召党、苏维埃、红军、工会、青年团来对于这些反革命团体进行最坚决的斗争，目前必须采用下列的办法：

1.对于各县的黑夜抢劫、拦路杀人，应动员群众无情的武装镇压。

2.在党内、红军内、团内、工会内、苏维埃内进行广大的教育工作，揭露反革命的罪恶，对于红军中的反革命分子予以严厉的裁制。各村组织部要讨论肃反问题，镇委宣传部即须准备下列材料：鄂豫皖肃反×报告大纲、

讨论大纲： 富田事变报告大纲、讨论大纲，再出版下列的小册子：（1）湘鄂西反革命之活动；（2）什么是改组派；（3）什么是第三党；（4）共产党的叛徒。

3. 《红旗》、《工农》两报要经常的揭露改组派及一切反革命团体的活动和罪过及与他们的思想作斗争。

4. 将现在已破获之案件，等到证据齐备，秘密审讯完毕，在各地和红军中举行广大的群众审判。审判以后再在省政府所在地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审判，×××群众审判的办法由政治保卫局规定。

5. 立刻颁布自首条例及苏维埃的被欺骗加入反革命团体自首的传单，号召自首，并由各自首者到群众大会上讲演。

6. 内务部即须颁布全苏区户口登记条例，清查全苏区户口，在“五卅”以前完毕。7. 政治保卫局要规定赤白区域往来的特别通行证及改良路证方式，路证上要注明本人成份、职业。8. 在红五月中要发动驱逐反革命及地主家属出赤区，只有在当地工农群众担保者是例外，这种人要领取特别居留证。9. 要在党内工会内挑选最好分子去建设政治保卫处的工作，在各种组织中建立政治保卫的系统。政治保卫局不兼×司法部案件，要使之建立健全的侦查组织，各县政治保卫处不准处死刑，最好不要用刑审。10. 由党的监察委员规定清洗那些必须清洗的党部，并规定清洗具体办法，并立即讨论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具体办法。11. 由工农监察委员会规定必须清洗之国家机关予以清洗。12. 最后党和苏维埃必须真正去开展阶级斗争，实现土地法、劳动保护法、经济政策，立刻无情的纠正“左”倾的均贫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开展自我批评与工作检查，是保证肃反的先决条件。13. 对于被反革命欺骗，或是对党不了解不信任 影响和巩固党。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缺十个字左右。 原文缺二百余字。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关于两个苏区打成一片
等问题*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八日)

鄂豫皖中央分局：

四月六日来函收到，我们亦派有交通去你处，到了孝感被敌人捕获释回，文件损失。关于我处情形，将寄中央讯抄写一份送上，请阅，不另外写了。现在专门来同你们讨论湘鄂西、鄂豫皖两个苏区联成一片和军事的战略问题。从温裕成同志给盘铭同志信上看，他完成[全]没有了解到我们两个苏区打成一片之任务，他把中央去年十二月四日的军事训令为立三路线的曲解！他以为我们三、四两军的配合就是夺取武汉，他完全不了解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夺取武汉。我们认为在今天提出夺取武汉是过早的口号，不仅是武汉的工人运动问题，而且红军、苏维埃的开展，也还没有这个形势。如以为三、四军配合是夺取武汉，结果就会迟疑，就会在加紧准备夺取武汉的冒险的企图之下，放松了中央指示在大江以北造成一个大的整片苏区的任务。同样，温同志对于国民党的崩溃还是有过分的估量，左倾的情绪，以为国民党军队只是尽牵制的作用，即你们前所谓偏师的作用，这也是不正确的。然而这个意见是温同志的意见，决不是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意见。但是从来信上，我们认为我们彼此的错误，在于对两个苏区之间的白区和京汉路工作的忽视。你们来函，只说在鄂中一带已发展有相当组织，详情一点未说，使我们捉摸不到。在我们这里，云孝苏区已发展到九个区，离铁路四十里；应城西部盐矿有同志八十余人，赤色工会会员三、四百人；德安派有人去工作，因此对此方工作亦异常做得不够，今后当加紧。现在我们来谈军事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全国局势的焦点，是帝国主义军阀加紧一致的（在对苏维埃运动上的一致）向苏维埃、红军进攻。蒋介石的计划是以粤桂军进攻我中央区（已经不是对中央区暂取守势了），以川军（调刘湘部五师出川）及鄂军进攻湘鄂西，蒋自己则集中全力进攻鄂豫皖，敌人的计划是全国配合的形势，帝国主义者更是他们的组织者指导者。因此，今天我们的战略必须实行中央指示“红军的行动应该更加积极化，更加互相策应，互相牵制敌人，才能打破敌人现在所取的各个击破的策略，才能够真实的帮助现在敌人进攻的中心——鄂豫皖”。我们从三个月的革命战争中，从血的教训中，更领略了这一真理，比如湘鄂西从一月以来至现在之三次胜利，就是与鄂豫皖取得了客观上的配合。当四军攻黄陂时，我们就在攻黄陵矶，我九师就在应城消灭徐庭瑶之一旅。自此以后，徐庭瑶已消灭其一旅，四十八师全部开来。在我们第二次胜利消灭四十八师之一旅，活捉了韩昌竣以后，四十四师也全部开来了。第四师、四十八师、四十四师，敌人用以为对付鄂豫皖者都被牵动而来对付湘鄂西，就证明三军的胜利，在击破敌人进攻鄂豫皖上，是有很大的帮助。可是在第三次作战，敌人以四十四、四十八，四十一三师及飞机六架与我激战七昼夜，我们只将敌人奇退，击落敌飞机一架，没有能消灭敌人一部，没有获得枪枝子弹（只获九十枝枪），而损伤达一千三、四百人。我们在这一激烈战争教训中，固然一方面表现了我们许多弱点，另一方面我们深深觉得鄂豫皖红军和游击队没有能取得互相牵制、互相策应的作用，假使此时你们只要有一个独立团在京汉西德安、孝感一带进扰四十四师之后方，则必致牵动敌之全部战线。现在四十八师还不是进攻我们之主力，主力是四十四师。四十四师的任

务本来是武胜关至花园一线，所以我们近来更觉得我们两个苏区之打成一片，是十分万万十二万分的必要了。现在已经不是取得联系问题，而是在大江以北造成整片苏区的问题，军事上不是友军的联系，而是要在“打通后归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管辖”，不在打通后，而在打通前，就应尽可能的取得一致的行动。可惜这一点，以前我们也是忽视了（没有与你们建立经常的交通）。目前敌人既是分工合作来向我们进攻，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的军事计划，应该首先使三军与四方面军会合，造成整片苏区，造成长江与京汉路活动自如的形势，然后与长江南岸之湘鄂赣打成一片（你们从蕲水、黄冈、圻[蕲]春、广济接近于阳新、大冶，我们从沔阳、汉阳接近于嘉鱼、蒲圻、咸宁），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这样必然更有利于中央区之夺取赣川、吉安、南昌，这样就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而开始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个方针自然不是夺取武汉，红旗插遍扬子江的立三路线所能代替的，你们以为如何。

还有一点想贡献你们，就是关于巩固与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湘鄂西党内曾因此发生激烈的争论，有一种庸俗的意见，以为苏区内部不肃清就不能向外发展，我们这里许多小城市小市镇被敌人占领，因工事大进攻之不下，围则我们自己无粮，因此只有以群众力量把他紧紧的包围，而红军主力向外发展，从去年八月决定到襄北发展以来，事实已经证明，扩大新的苏区，对于原有苏区有极大的帮助。比如你们将皖西与黄麻光罗打成一片，固然是重要的任务，但是我们以为同湘鄂西打通还要重要。如能同湘鄂西将应山、德安、孝感造成苏区并向信阳发展，则北可以击蒋介石南下之敌，南可以威胁武汉，对于巩固鄂豫皖与湘鄂西原有苏区是有极大的帮助。因此，我们向你们提议迅即以主力到京汉西德安、云孝一带行动，并且以向西发展为基本发展方向，群众工作亦以此为重心。我们以襄北发展为主要方向，决定以二分之一的力量发展新苏区，派一千个干部去，现已派了六百人，红三军主力经常在襄北京山、应城、云孝一带，希望在最短期间实现。

灾民问题，依据我们的经验，无须部队掩护，灾民成群结队的可到白区去，至于到了鄂豫皖苏区，你们的责任不在救济而在有组织的领导到附近白区斗争。来函说你们粮食困难，我们去年可说颗粒无收，主要的办法是在附近白区没收，红军在附近白区行动，才得到相当解决。

准备对日宣战的口号，我们觉得不妥，因为现在与国民党就是与帝国主义战，就是民族革命战争。现在帝国主义者还是一方面采取隐藏的武装干涉，接济军阀，中央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就是要揭破这一掩盖。

还有一点，你们四人分散，重要问题须函件商榷，我们想这是不妥的，必须在中央局所在地有集体领导，以期集中和敏捷，你们以为如何？

交通问题，由交通站另函相告，电<台>天天在向你们呼叫，并由中央区转上两电。

湘鄂西中央分局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八日

鄂豫边临时省委关于襄枣宜钟苏区红五月工作计划大纲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八日)

(一) 红五月的意义与目前政治形势。红五月一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总示威的一天。五·五是世界共产主义的始祖马克思的生日。五·七、五·卅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历史上有非常严重的意义。今年的红五月正值全国国民经济总崩溃，工业急剧的破产，工人生活更加恶化；更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上海，国民党公开的投降帝国主义而激起全国伟大的民族反帝运动的浪潮，同时是全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日益扩大和开展与伟大的民族运动汇合着向前开展，反动统治更加动摇和崩溃。国民党军阀为要维持他最后的生存，更动员一切反动力量来向苏维埃区域进行第四次“围剿”。在这次敌人“围剿”中间，襄枣宜钟苏区党受相当的挫折，但是全苏区工农苏动群众依然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英勇的同敌人斗争，工农红军的战斗情绪更加增高，这就是给了我们的红五月工作的良好条件。

(二) 今年的红五月是我们工作大转的时期，襄枣宜钟苏区过去在长期的机会主义统治之下，使苏区受了相当的挫折。在今年的红五月，正是我们接受中央分局路线也就是国际路线来坚决的作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来彻底执行国际路线，很迅速的来转变襄枣宜钟党的工作，为巩固的发展苏区而斗争，为扩大和坚强红军而奋斗。

(三) 红五月工作的布置。现在我们要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对鄂北北苏区工作的决议，和二次省[执]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来布置今年红五月的工作。

1. 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要在实际工作当中去彻底肃清“左”右倾机会主义，要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的纠正过去的错误，坚决的执行中央分局路线和完全实现省委二次扩大会议的决议。

2. 我们为要纪念我们共产主义始祖马克思生日必须要加紧改造党。改造苏维埃的工作。要坚决的洗刷阶级异己分子和消极腐化怠工分子，在红五月中，一定要作到指导机关中工农成份占大半数，应依照省委关于改造党和苏维埃和决议做去。

3. 在红五月中，我们为要加紧反帝运动，必须要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所以我们在红五月中，要完成检阅平分土地的任务，依照省委关于土地问题的通告执行。

4. 此在敌人围剿中间，为要使群众进行春耕，必得先要动员广大武装群众配合红军、游击队胜利的进攻敌人，来巩固发展苏区，使群众能够春耕。苏维埃要替雇农贫农解决耕牛耕具种子问题。

5. 为纪念五一劳动节，必须要规定工人斗争纲领，由省苏提出发动各种工人斗争在红五月中一定要将工会有系统的组织起来。

6. 红军游击队的行动要积极化，坚决争取胜利的进攻，彻底肃清军事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坚决执行军委训令，来巩固发展苏区。在红五月中，红军应发展超过原有枪支二分之一以上，山南、山北游击队应各发展百支以上，这责成军事负责同志坚决执行。

7. 要动员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在红五月中要经常不断的作拥护慰劳红军的工作，大批的做鞋子、送菜食给红军，帮助和代替红军耕田，更且要动员积极勇敢的雇农、贫农份子参加红军，决定襄枣宜钟苏区在红五月中应征调五百人入伍战士，具体的分配宜一、二区，钟北区，南三区各二十五名，襄南

二区一百名，襄一、三区及四区共百五十八，枣阳百五十名，在五·一以前各送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

8.在五二[一]、五七、五卅几个纪念节要加紧扩大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工作，尤其要注意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上海与各国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直接镇压中国革命与武装进攻苏联的企图。在红五月中，各地必须将反帝大同盟组织起来。

9.各县委、区要使每个支部组织宣传队，普遍的扩大对群众宣传红五月每个革命纪念节的意义与拥护鄂豫边省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宣传，特别要当着群众承认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宣传大纲，由省委宣传部起草），尽可能的召集群众大会动员群众起来坚决作<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完成红五月几种主<要>任务。

10.各级党部接到此工作计划大纲后，应立即召集会议，根据当地情形讨论，<订>出更具体的工作计划，切实去布置红五月的工作。号召各级党部与同级党部订立工作竞赛合同，我们的口号<是>“为完成红五月工作计划而奋斗”。11.各级党部将红五月工作计划决议后即报告省委，在红五月毕，必须向省委作很详细的报告，以便省委对红五月工作做一总的检阅。

鄂豫边省临时省委秘书处

四月十八日印发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开展荆门、当阳、钟祥三县苏维埃运动议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九日)

(一) 荆南苏区的发展，当阳农民斗争开展到游击战争，钟祥西部有党的组织，鄂西北独立团的成立，这些条件说明现在开展荆门苏维埃运动×准备打成一片，发动钟祥××游击战争，造成襄河北岸一大块苏区，以与襄北农民战争相呼应，已是当前争取的具体任务。

(二) 开展荆门、当阳、钟祥的农民战争，对于巩固湘鄂西原有苏区和发展襄北苏区有极大的作用。现在反革命南京政府正调集川军从鄂西来进攻湘鄂西赤区，最近已有一师到沙市。我们必须开展荆门、当阳的农民斗争，造成包围宜沙，牵制和打击川军的局面。同时包围沙洋(在顺利条件之下占领之)，威胁钟祥，造成更有利于我们夺取襄河的形势。

(三) 为了执行这个任务，首先成立荆门中心县委，帮助当阳、钟祥的工作。省委在“五卅”以前再调一百个干部去发展这三县的工作。

(四) 扩大荆门苏区，把荆门的土地革命×××新的区域，组成雇农工会、农民委员会来发动土地革命，这是今天第一等任务。首先须开展当地的饥民斗争与分粮的斗争，走到没收地主土地，夺取地主武装的斗争。

(五) 鄂西北独立团与荆门中心县委取得密切的联络，独立团应担负起创造新苏区的作用。

(六) 过去红军在荆门办给养的时候，许多苏区灾民在那里乱斗，使得当地群众对于红军、苏维埃有不好的影响。现在荆门县委和党须坚决阻止灾民在赤区斗争，同时领导他们到白区斗争，须以当地工农为主。对于过去灾民在那里所做的错误，应该进行忍耐的解释工作，揭露这种错误是改组派从中捣乱，不是苏维埃的政策。应该在已建立的荆门赤区坚决执行正确的土地、经济、劳动保护法，只有这种具体的行动，才可扩大苏维埃的影响。

(七) 在最近须召集一次荆门、当阳、钟祥党的联合代表大会，独立团代表参加，在省委代表和中心县委领导之下，进行讨论执行此决议之更具体的方法。

中共湘鄂西省委为加紧××堤工总动员致各级党部信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各级党部：现在春收快到，春耕加紧，江襄之水又涨起来了，而堤工完成者不到三分之一，关系群众经济，关系军事给养，关系苏区的巩固，这是全党一分钟也不能忽视的最严重的问题。堤工的现在呢？在赤白两种区域，过去我们根据这种环境，定出办外交的策略，是非常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在苏区内不加紧在政治上去动员，只×苏维埃拿钱出来雇佣群众修堤，常在困难之际，一天没有钱一天就不能做，这种国民党的官僚方式尤其是错误。最近提出了动员群众自动修堤的口号，一般负责人只命令群众自备伙食，而不知怎样去动员，不去以身作则的领导群众，不将组织群众的中心放到堤工上去，更是大错特错，至于那些放弃堤工不管，那就无异客观上帮助反革命。敌人却利用修堤做他们欺骗群众进攻苏区的中心策略，而相反的我们却放弃这个中心任务，以致敌来苏区内部[错误]，特委要召集天潜较大会议来实际转变并教育全党同志，为要加紧天潜、京山的工作……香委与襄北各县委可以发展直接关系，调动人员必须经过特委。

省委

四月十五日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杨邨人、覃安愉、彭冰山
给中央宣传部转中央文委的信
——关于湘鄂西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情形及文化教育工作等*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央宣传部转文委：

我们四月十九日到此，杨在省苏文化部社会教育科，覃在省苏文化部编审科，彭在省总工会编辑机关报《湘鄂西工人》，一切工作都在开始进行。

湘鄂西在去年水灾后，国民经济已破产到了极点，民众吃树皮的甚至没有，大部份群众出外逃荒，剩下小部份人在春耕，虽然春收有一点可靠，

因为动员修堤工作没有完全胜利以及敌人的准备夺取春收都尚在激烈的斗争中，党目前以努力春耕保证春收成为中心任务之一部份。党在湘鄂西的发展，实在很快，但是下层工作太不健全，乱斗的形势还没有克服过来。党在目前对于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加紧，苏维埃运动和其他群众团体——工会等都还是不健全，特别是巩固中农联盟和平分土地口号没有做得好。苏维埃和工会的口号，中心在改造苏维埃和工会。唯有军事方面特别发展得很迅速，现在已有三万多枪，差不多有枪无人背的形势。新苏区的发展不惟没有如敌人宣传那样缩小，而且更迅速的扩大。文化教育有列宁小学和列宁干部学校。俱乐部、新闻与画部，各机关至少<有>两种。日刊只有《红旗》和《工农日报》，其他都是三日或五日周刊，总计在省的方面将近二十种，其他各县、各区都有。总计在各方面看来，干部人材缺乏，无论在文化方面、工会方面都是一样。政府财政尤其困难，但这是必然的形势。总之，无论如何，党和苏维埃及各方面的战斗员，一点不向困难投降，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

最后请求文委的，我们来的介绍信不明，党籍还没有弄好，请即刻要中央来信证明。特别是覃净子，中央还没有提起他的党籍，这里要特别说明，他在文研党团已经通过，又经省委批准，在南北西民反支部工作，中央这样忽视，请即刻要中央到省委去调查。并望文委给我们时常来信，指导我们和鼓励，报告我们以上海的消息。再者，演剧、画画、音乐人才和书籍，此地十分缺乏，最近应即派数人来，带一点书来。又，交通相当便利，请剧联调查电影机器及影片的价目报告前来，以便筹款购买，藉资宣传文化为要。

注释 原文如此。

鄂豫边军委会文件*——地方武装与红军配合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1) 红军与地方武装配合是军事上基本胜利条件之一。鄂北苏区的地方武装与红军，以往在右倾机会主义统治之下，发生了许多的错误。如红军不相信地方武装的力量，更进一步的怕地方武装影响军事上的失败，更不知道研究与运用地方武装；地方武装也认不清自己力量，对于红军，完全站在普通群众的地位上，更不知道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帮助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因此使地方武装不能配合红军，削弱了军事上种种胜利。

(2) 地方武装与红军的优点和缺点。地方武装除了极少数的高级指挥员外，其余一概参加生产，因此对于军事与政治上的训练比较落后，发生以下的各种缺点：第一，地方观念深，第二，保守性强，第三，组织松懈，第四，集合与行动缓慢，第五，纪律差迟，第六，不了解与不能用绝对命令，第七，不了解用军中的威力，最易发生无意识的动摇，第八，缺乏战斗经验，不能相机进退，第九，军事技术薄弱，这是最大最显的缺点。地方武装的优点：第一，是巩固地方的坚决性强大，善于白刃战，第二，是熟悉地形与敌情，第三，数量多，并可以随地增加，第四，是消息灵通，第五，是与群众能自然的密切联系，第六，是能自动的代表群众的要求，使军事行动得到正确的方针，第七，是运输灵活，减少交通上一切阻碍，第八，动摇敌人后防与破坏敌人联系，第九，最易断绝敌人运输交通与一切消息，第十，是肃反戒严性强大，第十一，最[易]取得军事上各种便利，第十二，最易壮大军事上的声势，第十三，乘胜击敌削弱敌人的威力与锐气。地方武装最少有以上的各种优点。同时地方武装的优点，就是红军的缺点，地方武装的缺点就是红军的优点，地方武装与红军配合及运用，应从这许多事实中找出来。

(3) 地方武装与红军配合及运用，第一组织上要与红军一致，第二地方武装要与红军建立经常的密切关系，第三红军要经常的供给地方武装以一切教育训练材料，第四在指挥上凡红军行军所到的地方，该地的地方武装听红军指挥，同时红军在取得苏府同意条件之下并可调动各处地方武装，可以临时变为红军的一部，但军事毕立即遣回原地，第五在军事行动上要以地方武装担任运输交通侦探响导，以及联络后防等工作，第六在作战方面中以地方武装扰乱敌人后防截断敌人交通与联络，并利用地方武装设在相当的地方以壮军威，保护红军后防，增加红军战斗力，更利用地方武装在必胜的条件之下消灭敌人的一部，第七利用地方武装挺进队配合红军，摧毁敌人的锋锐，第八搜索敌人，第九单纯作战，第十疑兵。

四月廿五日印发鄂豫边临时省委关于沈宗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中央：

兹为<将>沈宗源同志在鄂豫边区工作所领导的特委至临时省委经过具体事实报告中央，祈中央根据他的事实予以深刻的纠正，并祈按照实际情形予以处罚，以教育鄂豫边的党。二月十六日谭忠余、周惠莲带往中央去的报告是临时省委陈雪怀、李政、郝久亭、谭忠余、周惠莲五个人的意见，报告了一点事实是不够的。刻经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与四月八日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讨论，认为有再将一切事实报告中央的必要。鄂豫边临时省委接受大会建议决定<作>以下的报告：

沈宗源同志在鄂豫边区所领导的特委至临时省委的工作，共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至一九三二年二月初共二个多月）是在屋子里面积极创造决议案的时期，实际工作中并未得着，仍无转变，仍然继续以前的错误向前发展。其事实是沈同志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二到了南阳，至十二月十八到鄂北，他在南阳共四十多天作了以下的二件工作：第一是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会上讨论和接受中央指示信，决定给襄枣宜钟苏区与均房苏区的指示信，并决定了召集鄂豫边全区党代表大会与议程，改组了鄂豫边特委为临时省委。自紧急会议后鄂豫边特委就完全在沈宗源同志领导之下了。第二是召集了南中县书联席会，并给了南中各县指示信，改组了南中县委。至十二月十八日沈同志到了鄂北，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在这会上取消了鄂北分特，决定了全区党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延长了代表大会的日期（在南阳决定的是一月十日，改为一月廿一日，实际是一月廿五日才开会）。除了紧急会议外，又决定办训练班，成立政治保卫局，布置代表会的工作。这是沈同志第一时期的工作。南中各县旧干部除了洗刷外，多派到两苏区工作，新的工农干部未提拔出来，各县负责同志都是新的不能独工作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县苏联席会是分头开的，消耗了一个月的时间。各县工作在这个时间就停滞了。联合会马上要县书回到各县选积极工农分子到鄂北苏区参加代表会，县苏联席会的精神与指示信就没有工夫传达。南阳各县代表与参加人已到鄂北又改了会期，因出入赤区不易，也不能回去，等到一月计五代代表会的第一天就被敌人冲散。直到二月紧急会议后，南阳工作人才回去，南阳工作就这样塌的台。均房各县曾在南阳紧急会给了一个指示信，但是未送到，以后就未设法去传达，直到现在尚未发生关系，更说不上指示转变。襄中各县因在鄂北紧急会议上把襄中负责人也留在苏区工作，因此襄中各县工作也塌了台，在襄枣宜钟苏区方面只见到了二三个决议与一部分中央文件（如指示信等），如改造党；改造苏维埃，彻底平均分钟土地，反富农斗争，肃反以及群众工作，红军、游击队、赤卫队的改造与健强更未着手去作，差不多与以前是一样，苏区工运都未建立，到如今尚无工会的组织，省委、省苏虽已改组，不只是指定的，同时所有增加的工农干部完全是挂名不到会的虚数。

第二<时>期（是一九三二年一[二]月初至二月中旬），在这个时期是布置全部逃跑主义的时期。鄂北苏区自一九三一年八月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初是相当稳定时期。特委移到鄂北之际，在稳定的后期，故用全力布置代表会，意在经过代表会，将鄂豫边区党得到一个大的转变。所以在代表会前未注意

实际工作，这点沈同志应特别负责（因当时有同志对沈同志建议只给原作[则]上的指示信而不实际去帮助督促下级不能执行，沈同志不接受这个建议）。至一月中旬五十师的两团，三十四旅的一团向鄂北苏区开始进攻之际，沈同志特别提出以下经常说的几句话，鄂北苏区有屁股大，党不起作用，群众组织是空架子，红军缺乏战斗力，赤区周围的剿共队都成立起来，若与白军会合一天就可以把赤区翻过来。在工作方面第一遣散训练班，第二解散了代表会，第三缩小了边革特委的组织，将工作人员分配到红军与原地工作，第四成立了独立军委（如改组挂名主席，沈同志担任副主席，实际是沈同志一人主持），第五划独立军区，第六实行总动员（五万人），第七每日集合鄂北赤卫军、游击队把守要路，第八军委代替红军司令部，每日将甘六师分配在大山东西防止敌人进攻新街（因新街为省苏省委所在地），因此白军可以任意骚扰苏区，至二月初白军自由的进到屠桥沟、耿集（均在山北与新街隔着大山相距在三十里以上）这时是敌人初步到苏区中心试验[探]苏区情形，尚未敢向山南进攻（宜东枣南三区钟北襄南二区称山南）。军委下命令（李政未在）将苏区的赤卫军游击队都集合起来配合红廿六师与耿集敌人死拚，以决定苏区的存亡。并在命令上指明如战不胜即退在山边作二步计划（即指逃跑说的）。结果两战皆败（二月十七日），苏区武装集中退到山边。于是特委领导边革与各地工作主要干部（不主要的，特委通告着其在当地秘密工作，此时山南各区连一个匪军都没有，各种工作人员正在照常工作）与各种红色部队，实行逃跑，逃到枣阳的马岗又被三十四旅迎头打回。兹再将逃跑的事实和经过详述如下：沈同志作事非常秘密，又喜个人独裁，当逃跑的前十余日，单找吴首青同志（边革主席）讨论向鄂豫皖与湘鄂西的路线，二次又找程克纯同志（特委执委）讨论了一次，当时程吴二同志还不知讨论是什么意思，同时派交通到这两路去探，到逃跑前一星期，又单找吴首青一人，到特委后边山上，由沈同志提出六个条件：第一是党不起作用；第二是群众组织是空架子，不可靠（当时仅地方武装组织一项即赤卫军已有一万五千人），第三是红军没有战斗力，第四是经济没办法，第五是粮食未集中，第六是子弹缺乏。在这种实际情形之下，绝对不能同白军支持。同时沈同志又提出中央指示，说中央曾对他说，到必要时须保存红军实力，以备将来恢复苏区，就是暂时拖到其他苏区保存实力，将鄂北苏区暂时放弃。吴首青又在中央指示保存红军实力条件之下，想出一条一百多伤兵没法安置，也须安置到其他的苏区去，故同意了脱离苏区。经过这次后，由沈同志先将吴同志找到特委后山上，然后将郝久亭同志也找到后山上，沈同志同样将以上条件提出，并将中央指示提出，郝同志当时反对出苏区，但在最后动摇了，重新提一个到苏区边界开展枣北、唐南、泌西、桐西的新苏区，以保存旧苏区，沈吴二同志不同意，郝同志提出找程克纯、王子良二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的意见，程、王二同志到后，又由沈同志将以上各条理由，重述一遍，程、王二同志也未提出主张，就根据保存红军实力，以备恢复赤区的条件之下发言，到这时就专门讨论到鄂豫皖去的行动办法了。经过这次讨论与大致决定之后，单独向陈雪怀同志（特委常委）说了一遍，陈同志也未加可否。又经一日，由沈同志召集一个会议，到会的人有程、陈、王、郝、吴、周惠莲（省执委），杨士元（省执委）共八人，由沈同志将上述各条与理由报告以后，郝同志又提出始终反对脱离苏区，沈同志说你的个人意见，不是多数意见，就压倒。经过这次会议，算把逃跑确定了，至耿集屠桥沟战战败，消息传到后，

由特委下命令，将各地重要工作人集合到新街，并通知了边<革>解散了各工厂，裁汰工作人<员>，不被裁的都跟特委到计六师司令部，在石家河大山中。到廿六后又将军事主要负责人召集到一处，由沈同志将各条件与理由报告了一下（到会的有军委李政及廿六师的政委与特委、边革、廿六师师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当时只有谭忠余同志提出反对的意见，但是也被多数压倒了，于是才全部逃跑了。这就是第一次逃跑的事实与经过。

第三<时>期（是由二月十七至三月十八日），这个时期是沈宗源同志领导特委布置特委单独逃跑的时期。因第一次逃跑被白军打回，逃不出去同时白军又未到山南来，并且开到苏区边界去了，所以特委又领导各部与红军及各游击队转回新街。因为这一逃引起群众与各级工作人员的恐慌与极大的不满意（有许多下级干部逃出赤区，群众组织也随着塌台，如各级党与苏府也有部分的停止工作），所以又由特委召集了一个二月紧急会议。沈在会议上怕特委、边革的负责人发言，引起下级充分的批评，便禁止特委、边革人员首先发言，叫各县、区下级工作人员批评，同时沈同志又再三严重申明，这次不是逃跑，是政治上估量不足，在客观上形成退却，如有人说是逃跑虽杀了他的头也不承认，就是到中央去解决，也不能认为是逃跑。这样一来完全把逃跑的错误掩盖住了。会议当然没有好结果，只把以前的决议案重述了一遍，又把特委改为临时省委。主要的理由有三：（1）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2）特委失掉了信仰，（3）不能召集代表大会。故改特委为临时省委。同时将边革改为临时省苏维埃，并指定全部执委与主席。除了这次会议外，沈同志又领导省委作了以下的工作：第一是组织省委代表团以备省委移到白区时代表省委指导苏区一切工作。第二是秘密调（只有沈一人指派，其他人概不知道）苏区干部到白区建立省委机关与布置省委到白区的路线。第三秘密调吴首青等六同志去布置到湘鄂西、鄂豫皖的路线工作。第四将各县游击队集合起来，编为游击第三路，将廿六师改为游击第一路，在分散游击之下（因避免敌人打击）进行保存红军实力的工作。第五是确定两路集合路线与集合点，并一切暗号，这是怕集合不起来，逃不出苏区去，第六又特别解散了省委、省苏的工作人员（在苏家洞沈同志临时提议，现在只有军事，其他工作如土地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都用不着，这就是解散的主要理由），故其他工作自然停止了，这就是沈同志第三<时>期领导省委的实际情形。但沈同志去中央，省委的人与其他工作人员完全不知道，所知的仅是他老<想>把省委移到白区，但是不知道那时候移。他临走的情形如下，当他走的前一点钟，他召集了一个省执委员会，讨论恢复几个同志的党籍问题，开到半点钟的时候，他说他到第三路去，叫大家继续讨论（这是三月十八晚上），他一去未回，至十九日午后由宜城二区送来一信，是沈同志（写）的，是叫郝久亭同陈雪怀与周惠莲等十九日晚十点钟到河西去，他在那里等着？因此知道他已到河西，当时由郝久亭、陈雪怀二同志回他的信，叫他回来，并申明郝、陈不去河西，未见回信。二十日又有郝、陈给他去信仍叫他回到，未见回信，廿二日又由郝、陈、程、李四人去信，叫他回来，仍未见回信。直到第八天才接到他的回信，信中说他已去中央了，并令郝久亭也到中央，同时并指定代表团书记，并雇[催]陈雪怀同志×××（一大段不明——原文上注）白区同志也不知道，他由宜城走，与一个人都未见，走的时候，他仅留了一封信（就是给陈、郝与指定书记的信），大家都知他已去中央，才由省委经济股发现出他秘密拿走了二百一十元，谁也不知道，一切都未交代，这就是他走

的事实。

以上是沈同志领导鄂豫边党的事实和工作经过。其次还有沈同志个人的错误。第一家长制度。沈同志以代表中央指导鄂豫<边>党的资格，无论对什么人，什么事，完全以个人意志去支配，同时无论对什么样的同志，也不相信，完全以怀疑态度对付。他本身担任政治保卫局，军委，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又是省委书记。他作的事，常委多不知道，只见他找这个人秘密分付一下，找那个人秘密分付一下，稍有一点不满意，马上大发脾气，张口骂人，一切同志只有听他分付[咐]而已。第二是恐怖纪律，惩办主义。无论怎样忠实的同志，有什么样工作历史的同志，在他主观的观点上，主观认为不对时，马上以反革命阴谋破坏，交保卫局杀头等等不堪残酷处置。对于他的意见，或说话稍不了解，立刻加以木头、猪、狗等名目。因为如此，一切同志，凡他发言，再也无人敢说提出其他意见，同他在一块工作，每日连一点钟活发脾气都没有了。这点也证明一般党员政治水平低。第三是使南中、襄中工作的塌台。把南中、襄中中心指导干部留在苏区工作，使襄南各县工作塌台。第四分裂集体领导。特委至省委仅三个常委，一个在均房完全挂名，因为挂名又使陈同志暂代，一个自十二月派往鄂豫皖（担任组织）至今未回。所以特委也好，改为省委也好，只有一个沈同志，其他各执委，虽然说是提拔了工农干部，实际都是挂名不到职。第五是取消巡视制度。当沈同志未到以前，尚有不健全的巡视员，按期巡视，沈到后完全取消了，这也是国际路线不能传达，实际工作不能转变的原因之一。第六是将健强苏区工作任务的放弃。欲将省委移到白区，并且在苏区专注意军事，忽略其他主要工作（苏区工运都未建立），第七是只知工作决议案，不知检阅与督促帮助工作。第八是不合实际的指导。不问工作能力而给以笼统原则的决议案的指示，结果不会执行等于一张废纸。

以上的事实是鄂豫边党在沈同志领导之下所犯的 error 与沈同志个人个别的错误，请中央按照事实予以纠正与处罚。

此致布礼！

鄂豫边省临时省委会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中共湘鄂西省委妇运工作报告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央转中央妇委：

湘鄂西的妇女工作，从来不曾向中央作过报告，这是因为过去党对这一工作忽视，不曾将这一工作完全建立成为党的经常的工作之一。现在在四代会前收到的一些不完整的不充分的×××××，一般的××简单的××你们。1.女党员与妇委的组织状况

X 妇女工作，虽× 代表会议的召集及广大群众的××××进行×××，部分婚姻问题上的错误等，但从省委至各支部及一切群众××仍然是忽视与取消妇女工作。各级常委会与支部及各党团没有根详细的经常的讨论与检阅× 上级××妇女工作决议与通告是很少讨论与执行的。

2.各级虽形成成立了一个妇委会 经常的把妇委书记作为党的巡视员(各级都是这样的)，使妇委书记整天在忙的巡视工作，不能来建立妇委的经常的工作与参加一切常委会议及看党的重要文件，使她们不能了解目前工作，中心与妇委工作的任务，同时因为一般的妇委书记工作能力比较薄弱与不识字，就不耐心的来培养这些妇女来工作而把她送去机关去乱跑一顿的巡视工作，同时对这一巡视员的工作是不加检查与帮助的。

3.各级群众组织的党团、苏维埃、工会是不讨论与进行妇女工作的，认为妇女工作是单纯的党妇委的工作，工会女工部与政府的劳动妇女改善生活委员会过去完全没有，现在还只是上级的空洞的没有具体工作的机关，一般的同志也认为只有女同志才能进行妇女工作，将动员妇女来参加一切斗争与工作，看成是与完成党整个的任务是对立(如说现在我们很忙，将来再来进行妇女工作)。

以上是常对妇女工作的观念。

妇委本身的状况

省妇委，正式成立省委时，吸收了一个当地女同志参加省委，当妇委书记(实际上只是挂名的)，一个女同志帮助她的工作与培养她(但妇女部长学习的精神也没有)，但那时还有相当工作，对下的指示信与巡视与农妇代表会议的召集，但省妇委的本身还是没有经常的工作计划与会议的，在刚发生水灾的时候，省妇委召集一次全省的各县区的妇委联席会议，到会的多半是各县区内妇委书记，讨论了妇委工作的中心任务与许多的具体工作(农妇代表会，拥红工作，水灾中妇女要做的工作，婚姻法令草案等等)，很少运用到下层中去，而同样的被大水淹没跑了。此后省妇委书记就去外逃荒去了，帮助工作的一个女同志也另调了工作。有三个多月(八至十)的时间，省妇委的工作完全取消了，没有任何的工作。在四代会前两月恢复了省妇委的组织，并有一专人负责工作，在这时期中是有工作计划与经常的会议，与整顿及各县区的妇委的工作与农妇代表会议与拥红工作等，及准备四代会的报告的材料与决议，建立了与各级妇委的连系，并召集了一次全省妇委积极分子会议，到会的人数与成分如下：

	成分	地方	贫农	贫民	工人
中农	商人	总计			
		监利	4	1	1
				1	7

心任务是抓不紧的，他们时常感到妇委没有工作了（如监利妇委说：省委现在通告也不发来了，我们现在开会没有讨论呵）。同时在监利，沔阳、江陵等县区都召集过妇委积极分子会议，这种会议工作的方式，确是能帮助许多妇委的积极分子解决一些工作上的困难，今后应更普遍来召集。有一些地方（江陵、沔阳、汉阳等县）区妇委连形式都没有建立起来的，对女同志特别的教育与训练，及进行有系统的来培养妇女干部，这一工作妇委差不多没有做，妇委出版一些更通俗更适于妇女的宣传文字品，除江陵妇委有妇女问答的小册子以外，从省妇委至各县区都没有的。

各支妇女组织员每支部有一女同志担任组织员（不脱离生产），但现在还有很多支部没成立有妇女组织员的，同时有了妇女组织员的，很积极的很勇敢的能在妇女群众中起核心作用的只是极少数，在支部中来进行特别的教育与训练女同志也是很少的，同时区妇委与支部对这些组织员也没有特别的提拔与教育。

		地方		数量		成分	
				工人	贫农		
富农		监利	110	261	112		
	沔阳	209	70	90	50	20	
	11						汉川
			江陵	40	70	70	
	不明			不详（有潜江几个）			
		汉阳	无				天
门	无						
			白区	不明			
							共计
1051	30	175	56	543			

（抄者注：这一个文件内所附各表数目都不符合，我们只能照原件抄出，原件必有大误错处）

女党员的状况，上边说到妇委本身的问题，已经使你们知道了女党员的数量与成分上一个大概了，从下面这个不详细的表中，使你们可看出女同志的数量只占到一般党员百分之几点，同时比水灾前女同志的数量是减少了些，因为江、石的大受摧残了，同时老苏区中有许多同志出外去逃荒去了，与党失去了联系，另一方面在新苏区党员的发展中女同志是很少的，差不多没有（如汉阳、天门）。在成分上，富农与商人还占着不少的数量。同时在党内同志中女同志的吸收也只有她是某某爱人来吸收入党的观念，至今还没有大的把斗争中最积极与勇敢的劳动妇女吸收入党，这个成分上与质量上转变，还差得远，政治的水平线与工作能力与积极性，还是比较一般的落后的。

各种妇女群众的组织状况：

农妇代表会议：我们曾经发下召集农妇代表会议的通知，农妇代表会议工作的进行，虽然有六七个月的期间，但总是没有经费[常]的很广泛的很普遍的××与鼓动，动员组织妇女群众的会议，代表的数量与成分只有监利与汉川有一个不详细的统计，其余各处如江陵、潜江是有许多地方在进行，在天门有几区也成立了农妇代表会议，并在非苏区还是非常的慢在进行。

工人 贫农 贫民 商人

监利 80 余 350

40 余 18 11

汉川 7/10 2/10 3/10 1/10

农妇代表会议有许多错误和缺点：

1.对农妇代表会议的宣传工作很不够，还没有使每个劳动妇女群众了解农妇代表会议是个什么东西，并且还有些农妇代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来干什么的（如在沔阳），还有些下级区委工作与支部的同志不知农妇代表怎样召集与做些什么事的（如江陵），并有许多代表并不去动员群众由群众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是苏维埃与我们组织用命令主义的办法来指定的（如沔阳）。

2.讨论的问题还不合于应用与抓住妇女切身的要求，来发动妇女的积极与×发言，使这些代表了解党与苏维埃目前的中心任务，当时这些会议发出了许多的空洞的原则的原题（如在水灾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妇女要出去逃荒，为生活困难的条件之一，有部分的同志在农妇代表会议中提出了要替红军作战、洗衣、送鱼、送菜等等，而有些代表说明她们目前生活的困难不能做到，我们的同志不管这些，一定是这样命令就完了事，完全×逃荒与解决如此生活的困难的当中来联系到要拥护红军，以至于有把党的通知在农妇代表会议读了一遍，来作讨论的问题，关于妇女特殊的要求×动员妇女群众参加各种斗争以及参加苏维埃工会、贫农团、少先队、合作社的工作是很少讨论的，不能提高劳动妇女群众的代表发言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有时将农妇代表会议的工作变成为单纯的拥红工作。

3.有些代替政府的现象，主要的表现在解决婚姻问题，有部分的地方如在监利、沔阳，离婚结婚完全由农妇代表的主席团来解决，实际上是因为各级苏维埃认为婚姻问题的解决与妇女工作是单纯的妇女与农妇代表会议的工作，各乡苏维埃怕麻烦，交给农妇代表会议解决好了。

4.对农妇代表会议的代表，代表会议闭幕后没有具体的分工与检阅工作去吸收积极妇女入党，以及参加苏维埃的工作，还（没）有把这代表会成为教育广大的劳动妇女的学校。

苏维埃工会青年团，过去在各级苏维埃党团×对妇女工作没有讨论过。好象这个妇女工作是与苏维埃没有关系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曾经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生活改善还不了解得很清楚（尤其是组织的系统与××的关系），现在省政府对这个委员会还没有十分具体工作的内容，下级建立的很少，关于实现婚姻×令，虽然（颁）布了一个时期，但还是纸上空文，并且有许多在苏维埃中负主要责任的同志（主席等等），违背了这

个法令的执行，保护女工与农妇特殊要求，还没有用一切力量来实现与检查执行的程度，同时苏维埃公开的在妇女群众的会议席上，报告自己工作，还没有执行吸收劳动妇女参加各级苏维埃的工作，在各级（省至乡）苏维埃中一、二个委员而是挂名的不参加实际工作的，同时苏维埃没有培养这些妇女委员来进行实际工作。

工会的女工工作，我们过去完全忽视了，各级工会都没有女工部的工作，现在省总虽然成立了女工部，但实际内容还没有充实起来。

青年团的青妇工作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党妇委对团的指示与帮助是很少的（从省至支部），以致发生了党与团分工不发生密切的关系，农妇代表会议是党妇委的事，实际上农妇代表会议中有一多半的青妇。

拥红工作与白区工作。广大的妇女群众对于拥护红军的工作是很热烈的，虽然在水灾条件下，还是动员了不少的妇女群众（如监利，尤其在新沟区，沔阳、潜江、汉川等县）来替红军作鞋、洗衣、送柴、送菜，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抬伤兵慰劳等。但命令主义的办法还仍存在，还不是广泛的来动员群众，有些地方对拥红工作还没有普遍的建立（如在江陵与新苏区）。

白区的工作，在江陵、监利、沔阳、汉川，有些赤白交界的地方，有些个别的女同志去进行侦探与瓦解白军的工作，在实际上影响了部分的白军士兵拖枪来参加红军，但我们还没有抓住这一工作，去进行广大的瓦解白军的工作，另一方面，白区的党如宜昌道委的妇女工作，省妇委没有去指示与过问，同时选一些得力的妇女干部派往白区去工作。

我们妇女群众的工作与群众组织状况是不好的，但在苏区内与新苏区内赤白交界的地方广大妇女群众斗争的积极性是很大的，而我们主观力量组织落后于这些群众的积极性了。

婚姻问题，在湘鄂西过去，在省未成立以前，这个问题为解放妇女的中心，公布婚姻法令草案以后已有些纠正。现在在老苏区表现是比以前好一些，真正的劳动妇女并没有一天到晚就专门闹婚姻问题的事情，只有少数的一些同志（尤其负责同志），与一些脱离了生产的妇女，就发生一些乱交的现象。尤其对红军家属（有些被主席夺去了的），以致发生对红军家属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不能离婚，政府一定要替红军保存老婆的观念。在新苏区表现了另一个极端，抑压了妇女婚姻自主的原则（如汉川将离婚的妇女来坐牢与打手心）。我们对红军家属也是根据省委的原则来解决，并且向红军家属作特别教育与训练的解释工作，与动员群众帮助红军家属解决许多困难问题（担水、耕田等），同时严厉只[反]对我们同志去找红军家属。在水灾后发生了的几个问题：1. 在水灾中因一般生活的困难，同时组织解散了一个时期，放[发]生了几个严重现象，表现于加重对于妇女许多的压迫与娼妓的发展，许多被迫逃出来的妇女（如江南的）与一些生活没有办法解决的妇女，她们就停留在各机关附近的市镇上，得到很少的钱与人来睡一夜（去吃一碗包面就可同人家睡一晚），主要的找这些妇女是红色战士，而他们有梅毒，对于红军战士梅毒更普遍起来。2. 童养媳在水灾中增加了，但我们婚姻法令上已经写着禁止童养媳，我们要实行这一条，在水灾条件下，经济上很少有办法，我们解决的办法是只准友谊的带养这个小孩，绝对禁止打骂等行为，同时这女小孩有权利将来不一定同这男小孩结婚，但实际上还有打骂小媳妇的事情的，同时赤区交界的地方因生活的不能解决，有将女孩在白区卖了。3. 放足还没有作一广大的运动，小女孩都在包脚，并有曾经将放了脚的女小孩都重新包

起来了。最后关于识字运动，虽然有许多地方建立读书班、读报组等，但识字运动还没有成为群众的识字运动。文化的水平，当地比过去要高些了，但一般的妇女还落后于男子的文化水平线。我们的两个要求：1.上海工人斗争的情形与苏联劳动妇女状况的材料，请尽量寄些来。2.劳动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状况，请尽量告诉我们。

湘鄂西省委

四月二十八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均缺字十五个字以上。

原件“总共”项中数字有误，编者作了订正。

此系原件抄者所注，表中数字有误。

原文约缺十个字。

鄂豫边省委关于马三光同志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 因为鄂豫边的党经过了长期的机会主义的统治，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的观念，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念极其深刻。这已经使苏区受到部分的挫折，红军的发展不迅速，非苏区党的组织将完全塌台。现在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开始了，但在这一过程中一定要发现两面派出来了。这两面派的表现，就是表面上承认决议的正确，而实际工作中依然不执行决议；表面上承认国际路线的正确，而在实际工作中，依然不积极执行国际路线，并且做出与国际路线相反的事情。因之两面派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最危险的敌对，是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的主要障碍，必须丝毫不放松的予以严重打击，才能使两条战线斗争更加深入，才能够真正的彻底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

(二) 省委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机会主义主要的基础，同样的也是两面派的基础。因为小资产阶级很不容易去正确的估量革命形势，不愿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同时在表面上不得不承认国际路线的正确，而在实际中的表现是消极怠工，违背了国际路线的决议。同时省委认为鄂豫边党的小资产阶级占主要地位，又经过了长期的机会主义的统治，在加紧两条战线斗争的当中，对于一般同志必须不惮麻烦的以教育方式作国际路线的解释工作，但对于两面派亦须号召同志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将两面派的错误事实公布于每个同志的面前，因为必须如此才能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使国际路线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三) 马三光同志是红九军的政治委员，他的任务是代表党和苏维埃在红九军中监督正确路线的执行。可是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成分，成为他的一切错误发生的主要基础。在过去已经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到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决议到达省委以后，中央分局代表和省委、军委四次召集他参加会议和多次的个别谈话，都是专门指出和讨论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与今后红九军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三光同志都是当面的承认与接受了，没有加以丝毫的否认，可是在他的实际工作中没有一点转变，仍然坚持他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悲观失望，消极怠工，延迟了红九军的国际路线的转变，客观上做出了革命上的罪恶。

(四) 三光同志的两面派，其具体表现是，他表面上承认和接受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与中央分局决议及省委指示、军委训令正确以后，然而在他的实际工作中，第一没有积极的传达中央分局、省委、军委的意见，第二同意了相反的说出自己做不出结论的困难问题来经红九军脱离苏区的提议，(原句如此，未抄错一抄者注)第三认为军事紧张，对于工作始终没有着进行，连党的会议也停止了三个月之久，第四进攻峪山、东津湾、耿集等的军事犹豫……这些都是事实。

(五) 省委对于三光同志两面派的错误，为了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加强党对红九军的领导，决定撤销他的政治委员，调他任军政治部主任，并要他在战斗员中和襄阳、枣阳临边的县委会议上承认错误，向省委做报告，要求他在加紧实际工作中来彻底了解自己的错误。

(六) 省委认为两条战线上斗争是开始了，而且日益深入，一切工作也因之在很快的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但在其中一定是隐藏不少的两面派，要求全体同志来热烈的讨论这一决议，运用这一决议揭发那些隐藏的两面派，

为执行国际路线而奋斗！
鄂豫边临时省委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鄂豫边省委的信——关于发展苏区的基本方向及
对省委扩大会决议案的几点指正*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鄂豫边省委：

四月十一日来函及扩大会议决议收到，兹答复于下：

1、扩大会决议及新选临时省委名单批准，决议案的个别错误，另行指出。
2、来讯太简单，在这次“围剿”中，苏区是否缩小，敌人兵力及企图如何，我们的战略部队是否都集中了，你们现在何处，你们没有给一详细的报告。现在责成你们来两个报告：是苏区及红军情形；是豫南十三县情形；是党的组织状况。

3、我们以为你们的中心任务在巩固原有苏区条件之下，一方面向南发展，造成钟祥北部苏区；一方面要极力发展襄阳南北两岸的游击战争，把襄樊包围起来，使五十一师不致深入赤区。只有这样，枣阳、宜城的赤区得以巩固，红九军可以专门对付罗启疆及五十一师出动之部队。在你们的工作布置，必须依据此基本方针，要发展苏维埃运动，唯一的就是要发动农民的饥民斗争，分粮以至于夺取武装发动游击战争，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必须大胆地到附近白区去发动农民斗争，这是击破“围剿”，巩固苏区之基本办法。

4、钟祥县委划归湘鄂西省委管理，并归荆门中心县委及襄北特委帮助。但你们对钟祥北部之工作，仍须极力注意。襄阳特委，我们认为无设立之必要。宜城的白区工作，应归苏区宜城县委管，襄阳××样，南漳、随县省委均须直接管，随县工作亦可交枣委注意，南漳工作亦可交宜委注意，襄阳特委无须设立，且襄阳特委管理随县，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划分。

5、关于交通问题，你们要经常派交通来，至少有固定交通六人，专门与中央分局之交通。要划定一笔固定的交通费，来往交通费均须由你们负责。

6、沈家桂问题，你们须单独有一报告，将他到后之工作及错误等详细报告，以便审查并报告中央。

7、军事、工会、少共工作人才当陆续派来。

8、现在关于你们的决议有几个问题：

你们决议上对平分土地以后的剩余土地要按照平分土地的原则分给受反革命威胁或欺骗而逃跑的贫雇中农，这是错误的。土地法草案第四条对于贫农、中农非自觉的被勾引，如反对苏维埃，经该地苏维埃认可者，尚且不没收其财产与土地，至于受反革命威胁或欺骗而逃跑之贫雇中农，则不但不没收其土地，而且应该照没有受欺骗没有逃跑之贫雇中农一样分得土地，并号召他们回来。当他们未回时，土地可以交人代耕，代耕人自然得有相当代价，但土地所有权仍应归分得者所有。

你们决议上向隐藏的富农斗争，富农土地被隐瞒而未没收者，自然要彻底没收，这个富农还是一般的富农，不要有什么隐藏的富农、公开的富农之分。

群众武装，你们说相当的志愿，是否还须相当的强迫呢？应该绝对的志愿，应该加紧政治教育，使每个群众都愿受军事训练，都愿参加红军。

红军中党员发展到半数，我们认为不必数量上有这样多，主要的应该加紧红军的政治工作，征收党员还须严格。

要以会议方式研究每次作战的经验，这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军事讲评，以及指挥员须作报告，报告后讨论，没有一定结论，绝对不要酿成民主化，而要巩固红军中的领导。

9、红三军接连在襄北有三次大的胜利，士均同志走后，三军获一大胜利，活捉四十八师一百四十四旅（旅）长韩昌竣，消灭一旅。四月五日前后，三军又与敌人激战七天七晚，击落敌飞机一架，将敌人四十四、四十八、四十一 完全击退。现在京山、天汉、天潜成为巩固的新苏区，钟祥南部的群众斗争亦开展起来了。下洋港、永隆河都成为苏区了。

湘鄂西中央分局

四月二十九日

注释

原文无年月，此系编者判定。

原文如此。

鄂像边省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第二号）——整顿与改造红军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关于红军游击队缺点与错误，整理过去红军、游击队在右倾机会主义的长期统治之下，一般军事负责同志受着失败情绪的笼罩，对于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统统都放弃了，而发生许多的怪现象出来，直到现在，一般军事负责同志，依还[然]不积极的根据军委训令研究部队的缺点，切实加以整理，这是我军不能胜利的进攻敌人的主要原因。军委将红军、游击队的主要缺点特述于下：

1. 在政治工作是完全停止了，共产党的生活的停止，已有三月之久，除了政治工作，只有使一般战士不能了解为什么作战，没能大量的牺牲精神，而变成奴隶性的服从，这是减少战斗力的主要原因。

2. 军事训令[练]不仅是没有加紧，而且是完全放弃了，因之军纪的非常松懈，行动的非常迟顿[钝]，接受命令的程度很差，甚至不听命令，同时部队的编制乱杂真象一般群众老百姓。

3. 在指挥上不统一，不会利用胜利的客观条件，不能正确的估量敌人弱点，不善于配置自己的力量，不准备作最后冲锋，消灭敌人的力量，临时事犹豫，在应付敌人形势之下，排开大阵与敌相持，这样自然会失败。

4. 极端民主化，很厉害的一个命令要经一部分指挥员的讨论，这是我军中所最不容允许的。

5. 不相信群众力量，不相信旧式武装的效力，因之也就不是[去]运用群众的力量，不配置旧式武装。

6. 自己没有健全的侦探工作，完全依靠地方的消息，凭着自己的估量，以至[致]发生客观上形成轻举妄动的行动。

7. 因为政治工作的放弃，不但一般战斗员不能做民间工作成为群众的组织者宣传者，而且时常与苏维埃发生倒[纠]葛，在战场上杀死缴械的白军士兵。

8. 无论在平时或作战时都不能利用事实来鼓动一般战斗员的作战决心——又只 q——心与勇气，提高其革命竞赛的精神，相反的，对一般战士的姑息，更助长萎靡不振。

9. 在自己的给养和军队的补充差不多完全依靠苏维埃的供给，没有有计划的从胜利的进攻中来解决。

10. 部队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很多，而没有从斗争中提拔忠勇的工农分子和洗刷那些坏分子，同时对于肃反工作也没有建立，这是极大的缺点。

11. 军委认为这些缺点绝对不能再延长下去，要（求）红军、游击队的每个指挥员切切实实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将各级的政治的组织立即健全起来，根据军委第一号训令（红军与地方武装配合）以及其他文件在加紧实际工作中加大[力]的整理。同时提出以下几点，必须按照执行：

（一）立即根据军委的各种文件和以上的缺点起草红五月的军事训练大纲和政治工作计划大纲等，一面执行，一面报告，并实行工作的检阅。

（二）在政治上特别注意到随时随地都要进行政治工作，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和建立其领导作用，提高一般战士的政治工作的能力，能够进行民间工作，要在各地举行工农兵联欢大会，要在各种会中能够热烈讨论与相当

了解省委、军委文件，纠正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尤其是改造红军游击队的阶级基础。在军事上特别注意到军纪的森严，行动要迅速，适当的配置旧式武装与运用群众力量，建立统一的指挥，建立参谋处，尤其是侦探工作，战时要适当的配合，以冲锋作战的主要方式，而争取大小的不断胜利。

（三）在红军、游击队中必须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与自我批评，尤其是要集中火力打击目前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每次作战以后，尽可能的召集会议，指出作战的经验，这样来实行实际的教育训练和提拔工农干部。

（四）军事决议在红五月中红九军发展枪支达千数以上，山南、山北游击队各发展枪支达一百支以此作为测验红军游击队的转变的参考。

鄂豫边军委

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九日印发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边特区及独立团工作决议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日)

1. 鹤峰、五峰、长阳、石门、桑植，已经存在着几年的苏区和红军，而且苏区曾经扩大到五县以上。当敌人进攻的时候，群众自动的反抗(如长阳)，这证明着工农群众的斗争，早已走上为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阶段，认为湘鄂边苏区是从山峻岭，群众落后，不能巩固和扩大苏区，或是在敌人进攻之下，认为苏区有立即消灭的危险，这是极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在敌人进攻之下，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帮助反革命的思想。

2. 无疑义的在去年敌人进攻鹤峰的当中，苏区受着严重的挫折，一部分群众离开我们，以前长阳苏区就受着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原因是三军以前在该地征发农民粮食，后来独立团还继承这个办法，使农民怨恨，以为我们同团匪一样。第二个原因是改组派分子捣乱(如长阳游击队)。第三是当着敌人进攻时，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抛开群众自己逃跑。第四是该区域还没有建设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特别是苏维埃就是一个军事的征发机关，其中还有阶级异己分子把持。这些严重的现象，是由于党的立三路线所致，邓中夏就是一个立三主义的领导。自从去年五月中央分局代表去传达国际路线以后，特委在小康同志领导之下，已开始执行国际路线，党的工作有相当的转变。然而因为转变的异常不够，与及中央分局和省委以前对那里工作的忽视，所以还没有造成湘鄂边特区工作急剧的转变。

3. 鹤峰、桑植、长阳、五峰的苏区，那里经济上的特点，大部分是自然经济，在反动统治之下，受着极残酷的封建剥削，甚至是农奴式的剥削，群众过着极苦的生活，甚至不吃油盐。在这里党和苏维埃的任务，是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行土地革命、发展农民商品经济、使农民的生活，比革命前得着大的改革，站在这个观点上，那么，红军和苏维埃，对于农民的一点侵犯，征发粮食，徭役式的强迫守卡，都是帮助反革命的，只有立三主义邓中夏，才会实行征发，造成农民反对苏维埃，这是帮蒋介石做事。特委提出的减轻军事徭役，也是极糊涂的见解。难道苏维埃还继承农奴的徭役吗，因此，现在党的工作，是要使农民群众真正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而且要将红军的给养，从外面去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中解决，不要加在苏区和非苏区贫农中农群众的负担上。现时湘鄂边苏区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单是平分土地就算完了(漆林也应分配)，而且要使贫农中农能积极扩大生产，救济灾荒，帮助种子耕牛，设立犁牛站，举行低利借贷，改良水利，预防干旱，这些工作，是目前党和苏维埃的主要任务。

4. 巩固鹤桑石五苏区的根据地，不使一寸土为敌人蹂躏，这是党和红军的主要任务，一定要估计反动统治将要一次、二次、三次的来疯狂似的进犯苏区，来占据鹤桑我们根据地。近来川军与陈渠珍电商“会剿”独立团(施南川军还有无线电)不要在几次胜利后便轻视敌人的“围剿”，认为丛山峻岭，给养无着，群众赤化，敌人便再也不敢来了。这是“左”倾的空谈，将要减弱我们的警戒心和实现战斗任务的积极性，同时的，不能夸张敌人的力量，而预存恐慌退缩。恰恰相反，要不等待的先择敌人弱点进攻，给以各个击破，要加紧政治、军事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要发动广大群众为击破敌人“围剿”、扩大苏区而斗争，要进行瓦解敌人军队的士兵运动，同时要发展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和武装苏区的广大群众，提倡群众自卫。只有在

积极执行这些任务的条件之下，苏区才可得到巩固的发展。

5. 这个苏区必须极力的向东南发展，主要发展方向是石门、桑植、五峰、长阳，造成长江以南，澧水以北的整片苏区。一方面造成威胁津澧的局势，一方面与松滋打通，以便与公安、南华的苏维埃运动联成一片，不能机械的了解，以为打通松滋宜就不必向桑石慈发展，向石门澧县发展与松滋联成一片，也是向东南发展的一部分。但同样不能放弃五峰、长阳工作。认为五峰、长阳群众不好，是右倾的见解。认为向桑石慈发展会要遇着强大的敌人，为了避免敌人就不能向桑石慈发展，这也是右倾的见解。因为施南是川军的中心，应该把巴东、建始、施南、宣恩各县，也要去发动农民的游击战争。

用什么方法发展苏区呢？中心工作是发动附近白区之农民斗争，对于石门、五峰、桑植、慈利白区农民斗争之开展，应加以最大限度之注意，现时特委对于白区白军工作之忽视，是工作最大的弱点和错误，白区工作恰恰是一切工作中最主要的一个。

6. 在那些失败区域以及在苏区和白区，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扩大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解释苏维埃和红军的过去错误，揭破改组派的欺骗，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如在白区之反民团、反苛捐、不纳租等斗争及苏区消灭地主，反富农斗争），这是目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只有这个工作做得有成功，湘鄂西苏区才能巩固和扩大。

7. 巩固和扩大红军是第一等任务，我们认为现在独立团中颇反映了失败情绪，这种情绪，虽然因最近军事上的胜利而消除了一些，但还是没有完全肃清。这种情绪之造成，是由于：（1）党没有做群众工作，因此红军没有能够有广大群众的斗争相配合，以及动员许多群众参加红军。（2）是没有向外发展，使战士的给养困难，减低斗争情绪。（3）是军事上的等待犹豫，有时曲解巩固苏区为保守，没有能在主动地位去进攻敌人。（4）游击主义的倾向，不知道建立巩固的军事根据地和坚强红军，增加战斗力，而还保存有拖来拖去的拖队残余的观念。（5）还有军阀制度残余的表现，如（一）有些指挥员和战士，没有了解到红军行动应该与广大的工农群众斗争相联系，只认为打仗是自己的责任，以为打得两炮就是尽了红军的责任。（二）一部分战士没有分得土地。（三）红军还缺乏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团结与教育，甚至忽视和取消政治工作（如取消政治处），这是不可容许的政治错误。不去加强党在红军和游击队的领导作用，甚至相反的还有一种旧式带兵的方法，感情联络，或随自己喜怒来赏罚，这是国民党军队团结的方式。（四）不去随着国内战争的剧烈程度，加强军事政治的训练。（五）有的负责同志过着特殊生活，有的清谈喝酒，甚至指挥员家属还带从兵马夫。（六）部队中纪律废弛，据传闻赌博盛行，现在必须执行彻底的转变。独立团应在八一前扩充成为充实的一个独立师。独立团应经常集中，有计划的在桑、慈、石、鹤、五一带行动，选择敌人弱点，不要等待的站在主动地位去进攻敌人。在此要反对游击主义的倾向，避免敌人，没有目的的拖来拖去。同时必须反对军阀制度残余和封建思想部落观念（可根据省军委改造红三军训令在独立团中执行）。独立团要在特委指导之下，担负起发动群众斗争创造新苏区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的任务，因此，必须改善同住民的关系，坚决执行红军的纪律。

关于独立团的给养问题，不仅应该在外面解决日常的给养，而且要储蓄给养三个月以上在苏区，使得在敌人进攻苏区，红军要在内部作战时，不致发生给养上的困难，也不致临时去征发农民的粮食，因此要极力纠正红军中

的浪费和私自没收的行为。

8. 苏维埃应使变成真正工人、农民所选举的，彻底执行一切法令（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工农监察委员会等条例），不要变成是一个筹办给养的机关，过去联县政府特派员办事处应该取消，各县区苏维埃可归鹤峰县苏指挥，桑植的县苏准备会应取消（准备会的方式根本要不得）。如果有了三县苏维埃，可成立一特区苏维埃。至于军医院等等，可设立一独立团办事处，独立团之行动暂由特委指挥。

9. 工会、青年团、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群众组织，须普遍建立。特别是组织工会、青年团、要认（为）是党的主要工作部门。认为湘鄂边苏区工人太少，不单独组织工会，这是取消职工运动的极端机会主义错误。同时特委取消青年团特委，这是重复立三路线的错误。

10. 特委要负一个责任，就是要去建立常德、津市、澧州的职工运动和士兵运动，这是对白区工作最重要的。

11. 党的组织问题，特委以小康、钱瑛、徐彬、杨英、叶平、丙南、木及当地选举两人与省委再派两人十一人组织之，以小康、钱瑛、徐彬、杨英、五人作为常委，须保证有三人的集体领导，以小康任书记兼管军事，以徐彬指导苏维埃党团（此人待决定），钱瑛任组织、徐彬任宣传，钱瑛兼管职工运动。特委之下有三个至五个巡视员，要出版一个周报，要健全下层组织，加强教育工作，对于纪律要很严格，特别是军事工作之党员，不许有一个党员违犯党的纪律和军纪及苏维埃法律。同时必须提拔下层的积极忠实之工农干部，去代替那些党内的消沉腐化分子。

12. 要按照中央关于同反革命团体作斗争的决议改变肃反的工作方式，立刻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与开展群众中的肃反运动，要纠正过去秘密处决改组派的错误，要号召改组派群众自首，不能因为坚决肃反，取消了党的教育工作，党的机关绝对不能杀人刑讯。

13. 在目前湘鄂边特区党内的现象，右倾仍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在敌人进攻之下，悲观失望，或者消极怠工，要求请假不干，拥护地主富农利益，党对于这种右倾情绪；要作坚决的斗争，同时必须毫不容气的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特别是轻视敌人的“围剿”，认为敌人在丛山峻岭，群众赤化的湘鄂边，必然会要失败。事实上群众并未完全团结在党的影响之下，认为右倾是残余的残余，这是非常错误的见解。一切对于巩固和发展苏区、扩大革命战争、坚强红军的任务的忽视、消极，同认为苏区有立即消灭之危险的取消观念，没有两样，而且隐藏的右倾观念，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更其危险，要坚决的在理论上、在实际上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在实际工作上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这是战胜党内机会主义和党外敌人的先决条件。14. 特委须负责在常德、津市、宜昌建立与省委的交通站，每月派两次交通，每次派两人，并每月供给省委交通费四百元，以保障交通经常往来。15. 省委决定派五个（军二，苏、工、宣）中级干部，十个游击干部，二十个下层干部，到该区帮助工作。16. 关于其他决议上的错误，另写指示讯。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党内教育训练概要 (一九三二年五月四日)

目录 (一) 教育训练的重要 (二) 什么是教育训练 (三) 两条战线斗争与教育训练 (四) 自我批评的教育训练 (五) 入党时的教育训练 (六) 支部的教育训练 (七) 集体与个人的教训训练 (八) 训练班与党校 (九) 开会的方式 (十) 转变过去不适于教育同志的方式 (一) 教育训练的重要：在已迫到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阶级斗争日益开展的面前，必须有一当十，十当百的政治坚定勇敢的坚强干部，积极领导千百万的工农群众负起阶级战争中的重任，来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加倍的来教（育）训练党的干部是党的头等任务。

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最近组织任务决议案上说：为要使党能够真正有准备的去进行快到来的战争，即说无论如何必须尽最大限度的精力去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使每个党员能自动的懂得党的政治路线和现时党的行动政策，这些的党的教育训练，在革命发展的中（间），党里更为重要迫切，革命的盛败全关于党员教育训练之能否猛烈之提高，在今天更证明了这一决议的正确，因为党员和群众不同的各一××，他比群众更积极的干，而且他知道应该的干，他了解革命的政（治）路线及斗争纲领和党的策略，把他执行到群众中来起领导作用。不然的话，党员和群众没有不同，党也就没有作用了，所以须要教育训练。

(二) 什么是教育训练：

教育训练受教时间或×间性的一天两天的流动训练班，一个月或二十天的短期训练班，或三个月或半年的党校只是教育训练之一种，党员无时无地不去为党工作，即无时无地不给以教育训练。

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是活的，不是机械的，是实际的。不是书本子的，每个党员天天在工作，即天天在学习，离开实际工作去讲教育训练不是我们的教育训练。

教育训练不是只为政治水平低的党员设的，政治水平高的党员一样要受教育训练的。×大错误的，××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党对于应[任]何党员都要不客气的给以教育训练，任何人都应该虚心接受。

(三) 两条战线斗争与党内教育训练：

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加紧党内教育训练的唯一有力主要条件，某一问题上和工作上，同时发现有不正确的倾向和意见时，应马上拿来作教育全党同志的材料，作热烈的讨论和批评，如遭水灾而对苏区失望的逃跑主义，不去发展苏区的保守观念，不相信群众力量，只见有钱有粮的军阀残余思想，以及不见新的革命形势而教条式的主张波浪式的推进，消灭富农侵犯中农利益，以为敌人“围剿”已经冲破，认为苏区内无反帝必要等机会主义的观念。必须将这些机会主义的错误，加紧来开展（反）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将全体党员的政治认识提高和减少这些错误之重新发生。

(四) 自我批评与党内教育训练：

自我批评为对列宁党锻炼的唯一武器，没有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充分自我批评，党是不会健全的，谁不肯无情的批评人或不虚心接受批评，谁就不是革命的忠实者。

自我批评是站在党的工作立场上来批评工作，批评不正确的观念，谁畏缩不言，批评××，是不是的坚持己见，不接受批评是不对，不辨是非，乱去批评也是不对，特别是表面上虚伪接受批评，甚至接受批评，比批评者对他的批评还要彻底，但实际上自行其事的官僚政客式的虚伪行为更是不对。

我们反对下级不批评上级，及上级不肯接受下级的批评的官僚主义，同时也反对立三时代不许辩护，只许××，至本人及同志的不能彻底了解他的错误所在的惩办主义。

自我批评不是专门那些小的，如嗜好、态度、言语等，而是批评工作的缺点，思想是否正确，绝对打击当面不批评背后互相攻击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对某同志的错误必须无情当面正式提出，或提到会议上公开的批评，并借以教育全党同志。

上级接受下级的批评，即有批评不到或不够，亦须以解释及接受其对的部分，绝对不可以有自足态度去抑制下级批评的情绪。

不站在党的工作立场的批评，如近来有些支部会中，不是闹事务问题，就是闹同志间的纠纷，以致支部来×××，这是缺乏教育所致，应该严厉的批评。尤其要预防借自我批评的招牌来×××斗争，无原则的纠纷。

（五）入党时的教育训练：

在群众斗争中，发现了积极分子，打算吸收他入党，就先考查他的成分出身和对革命认识等，和介绍各种浅鲜[显]的文件（非秘密文件）和书籍给他看，不识字者可念给他听和用口头解释，并要注意他了解程度。

经过几次谈话和谈[读]过党（的）文件及详细观查后，即可向自己所属支部介绍入党，并要由公开转入秘密，由秘密转入公开的灵活应用，有可不必经过支部大会通过，但必须经过支部负责同志的谈话，在新发展的苏区，尤其是要注意保障来入党同志的灰色，应另编一小组以便在秘密环境下进行工作。

（六）支部的教育训练：

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党员的生活在此，没有支部即没有党，支部不好党决对不好，任何党员必编入支部，如未有者，党员借口工作忙，不到支部会，甚至不编入支部，这是很大错误，应纠正（临时有事，另外请假是可以的。）

支部的任务是：

（1）是教育××党的理论和策略，以及所有决议都须支部讨论明白，使每个同志都了解。

（2）是实现主张，党员须了解党的主张，就须把他实现起来，于是支部就在所属地（街道和乡村支部）及所属团体中（工厂学校等支部）起核心领导作用。

为贯彻上项之任务，支部每个同志必须能充分的发表意见，充分的揭发错误，充分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执行自我批评。

一个支部同志不可多，多则须分为若干组，每组人数至多以十人为限，便于开会时每个同志都有发言机会。

支书联席会议，或分为若干组的支部干事会，于每支小组开会前须开会审查讨论的材料，便于出席支组会时的指导，同时须检查上次各支组会议的结果，予以指示，每支要有计划的召集组长联席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以便他们起核心作用，来推动全盘工作。

支部会和小组会的议事日程上应该是：

(1) 报告(关于本支部及其他事务)；(2) 政治报告(一周内外苏区等政治情形)；(3) 开小组会议(上级的文件等××材料)；(4) 工作讨论(特殊的及经常的工作)；(5) 批评工作。其他议事日程，不是呆板的，这并不说每次都须把上列问题讨论到，不过说明大概是这些内容。

应制发讨论大纲，如讨论某文件即从文件中指出若干问题，叫各人发言，互相辩论，使识字及不识字的都能深刻确切的了解，比如说：什么是富农？不识字的同志就说富农是粮食、耕具有余的，识字的稍为看过文件的同志，一定说富农是有剥削行为的，但我们一讨论，说有剩余的，完全出自己劳动的是不是应向他斗争(这是富裕中农不是富农)？又如无劳动力的老弱，或劳力不够的贫雇中农分得土地，不能不雇工或出佃，这是不是剥削行为，是不是应该反对？自然会得出如决议案上所定的结论。富农是有剥削行为，而又牧[雇]人除自用外有剩余的，这只是一个例。我们对某问题要认识了解，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讨论。

每次支组会议，组长要报告到支干会，支干会审查给以指示外应写报告到区委，区委须与以答复。

我们的经验不只是得之个人，而且是得之全党，所以每次工作的经验，不只是拿来训练担任该工作个人，而是要用来教育全党。

每工作开始时，应该讨论使每个同志了解，不是非常紧急时，不可省去讨论只用命令执行，工作终结后，应该检查某项估量计划是对的，某项是不对的，某项虽然成功是出于偶然，某项未完成，未完成的原因，很详细谨慎的去分析，务必使大家得到了解，正确的继续使之发展，错误再不至于重复。

每一党员如果他发现有弱点和错误，无论是极细微之点，只要他是关系工作，或正在发展有至某种危险的可能，我们就绝不可放松的要提出来讨论，作为教育训练的资料。

有些事实应给全区全县来讨论，甚至给全党长久的来讨论，如立三主义的失败，我们不仅知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不同，知道立三路线以“左”的空谈，掩盖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就够了，而是要了解立三主义的实质及来源，立三主义在各种工作中表现的现象是什么？又如邓中夏同志领导三军的错误，不能仅仅说他是立三主义者，上山逃跑者就够了，而应该把三军经过的事实，详细的研究他错误的来源及其结果，使这个教育普及全党，使今后领导的同志，不再重复邓中夏同志的错误。

(七) 集体与个人的教育训练：

党员大会，要经常的按期的开，如大的支部的党员大会，某区某市党团员大会，报告政治情形和党的策略，各种重大的事件，如日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瓜分中国，征调参加红军战士，保障红军给养等，须临时由区召集党员大会，报告全党同志们的情绪，这些大会中的报告，上级机关先讨论，作成报告大纲，提出中心任务，不可临时拉夫的随便报告一下就完事。

最广泛的进行个人教育工作也特别重要，发现某人的缺点和错误，即须和他特别谈话，或调换工作，使他从经验中去纠正和用其所长使他特别发展，此外平时也要有计划的与调来同志谈话，不收犯有错误的同志。

(八) 训练班和党校：

党为急于造就干部，来适应目前阶级战争日益剧烈的环境，并争取这一战争中最后的胜利，须经常开办各种短期和流动训练班，征调正在工作人员

来学习一星期或两三星期。在办训练班期间，一定要有专人负责，在上课时，要去听学生发言的情形和教育的教授方式，在课后要经常出席他们的小组会，从小组会中来考查学生对课程了解的程度和纠正他们不正确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对每个学生得到正确的批评和适当分配工作，在每一期训练班结束后，必须开总结会议，在会议上检查每个学生学习的成绩的批评。征求学生的同意和使学生提出对本期报告方面、管理方面的各种意见，以便改善。

在征调学生时，必须保障学生政治水平之不平悬殊，不然教授时就大感困难，如有××和不识字者，在讨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课程的适合，好使稍识字的帮助弱者和不识字的。

训练的方式，要采用启发式，教育不是呆讲些书本子空理论，而是要把实际工作经验拿来配合和讨论，使听讲者在短期训练后能更有×××××保障教授法之适当，事前必须×来教育会议，使教授方式统一，尤其要保障教员之按时上课和有充分准备，决[绝]对反对临时拉夫式的、不关痛痒的教授办法。

在教材方面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使学生一到训练班，就可按照讲课大纲在课前准备和上课时踊跃发言。

流动训练班的教授内容，除找到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外，必须配合当地实际情形，尤其要解答同志们在当时工作中不能解答的问题，因此当县的巡视员到某区、某市与办训练班时，必须要××千篇一律不换内容的讲演办法。

在办党校和训练班，对学生的派送，一定要打击地方党部不肯选好的有工作经验的工农干部来受训练的保守观念。

此外对来往调动的工作干部，白区来苏区的同志，必须利用这个机会马上给以训练。必须立一工作研究室，内边陈列各种重要文件的地方。使来往干部和视查员可以经常到里边看书看报，不致来鄂西时没有看文件的地方。在省委、县委、区委停了很久，一点训练也没有得到，同时除安置他们看文件谈话外，必须尽可能给他们以短期训练。

（九）开会的方式：

会议是教育训练同志必须的一种方式（小组会、党员大会、委员会等）。因此开会方式的转变亦关系于教育训练工作，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同志）讨厌开会，一天到晚的开会忙，甚至一个会一开一天，半天而毫无结果，这都是开会方式不对所致。

各种会议的期间（如常委、宣传、组织、少共、妇女以及其他的各种群众组织会议，必须适当的分配使其不发生冲突）。

开会必须早为通知，并在通知上将议程写好，以便出席会议者早为准备意见，到会上迅速提出。

主持会者，会前必须自己指定出席会议者，预先准备意见开会时提出，使到会人根据报告者的意见发言，反对或补充。

会议未开前，必须规定此会于几点钟内完结，发言人须规定时间，如报告者三十分（钟），或发言十分（钟）；第二次发言者五分（钟），如意见已重复，主席可停止其发言，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会议之迅速结束和得到圆满结果。

（十）转变过去不适于教育同志的工作方式

天天在喊干部恐慌，不够分配而不知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来培养和训练同志，这是绝不容许的错误，但注意培养教育训练了，而教育训练的方

式不正确，也是这一工作之绝大障碍，如家长制度、命令主义，××主义……这些都是妨碍同志的意志能力的由自发展。中国党历史虽浅，但斗争事实却非常丰富，然而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到现在仍是十分不够，固然有许多原因，而工作方式不良实为重要原因的一种，我们虽然已对这些不良方式开火，然而一看我们工作忙的忙得死，闲的闲得死，仿佛某种工作只有某人做得，结果忙得照顾不及而碍工作，别人又得不到学习的机会。工作人员今天一讲[调]明天一讲[调]，结果工作做了很多，但一件也摸不着头脑：不了解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弱点，分配不适当，分配与干部不站在从工作培养干部的立场上，随便的调；有的干部死也不讲[调]不给他学习新的工作经验的机会。这些现象仍到处都是，所以大大的阻碍了干部进步的速度，从工作中教育训练同志，既是主要的教育训练方式，当然我们的工作方式须要一个彻底的转变。

中共湘鄂西省委宣传部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给中央的信——关于国际国内时事问题认识的
请示*
(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

中央：

我们在此地讨论时事问题时，对于反动营垒常有些模糊不清，有下列问题请详细答复，并望中央宣传部多供给材料，以及在《红旗》周刊上予以详细的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我们认为英美在全世界帝国主义相互间是主要的冲突，在欧洲和太平洋均是如此。认为英美于远东问题合作对日是不对的。因为英国的态度在上海事件中很显然的袒助日本，但英国在国联会议上又有拉拢美国倾向。当然英日之间也有冲突，英是否藉口与美合作以对日呢？这种作用也是有的。美国表面上也表示满意国联决议，是否亦有拉拢英国的倾向？同时英美在进攻苏联和进攻中国革命上当然是一致的；同时美国在某种程度也赞助日本，英美合作在进攻苏联的问题上当然是可以合作的。

第二个问题，帝国主义现在是要进行瓜分中国，日本一方面霸据满洲，同时伸张势力至扬子江；英国呢，积极的藉解中日问题活动，这是显明事实。所谓康藏问题，我们没有很多具体材料，其他的具体步骤，我们也没有很多具体材料。上海自由港是否帝国主义已具体提出呢？美国呢，他因南京有关，也积极要参加上海问题的解决，但是他的具体目的怎样，我们也不明白，我们认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是他们策略的中心，但是知道材料很少。

第三个问题是各反动派别与帝国主义之关系。美国助蒋，英国与广东有密切关系，这是事实。冯、阎及韩复榘等是否与日本有密切关系，没有什么材料。同时广东派孙科、陈友仁在南京时，陈、孙又高唱宣战，而且主张英美联合对日，最后还说如英不反对日本，则主张美国单独对日，这又表示广东派亲美的倾向。

第四个问题是反动营垒的派别及其阶级性。广东与南京显然是冲突的两个主要派别，改组派从前在广东，现在与帝合作，因此引起两个问题：改组派的阶级性是否有变更，还是如国际一九二九年所分析，或是有变更（比如现在上海的资产阶级对汪深表不满，资产阶级的口号是打倒一党专政、立宪）；南京政府是否是蒋派与汪派的联合政府，比如改组派现在极力去占领各地省政府，夏斗寅之长鄂，安徽省主席换了×××，邓宝珊之赴甘；冯、阎现在与南京蒋、汪关系怎样，韩复榘提出冯为洛阳绥靖主任，似乎是在与刘峙争地盘。

第五是在野的反革命派别的分析及其政治主张产生背景。如国家主义派、新月派、人权派、社会与教育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罗章龙派、取消派等等，除了看了两篇关于取消派的论文外，其余的反革命派别，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材料，因此很具体的揭破很费气力。再则政学系、研究系、江苏耆老派与国家主义派似有一种结合，以促进宪政为名打倒一党专政。这是否可分析为代表资产阶级（是那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活动，虞洽卿是参加这一活动，同时这种活动又与广东似有关系。

第六，南京政府迁洛阳之意义，我们认为：是蒋介石经营西北，想以

京汉、津浦为一整片势力（开展西北是否美帝国主义有此计划）； 是进攻鄂豫皖苏区； 是避免与帝国主义冲突。有同志认为： 畏惧苏维埃运动发展，假使苏区再发展，再逃避长安； 帝国主义担任（从）长江进攻苏区，国民党担任从陆路进攻。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但中央对此问题，没有看到有论文解释（因为《红旗》以前的没有收到）。

以上六个问题请答复，并多介绍材料给我们。

夏曦

五月六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反改组派宣传大纲 (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

一、改组派的历史及其政纲：1. 国民党改组后的左派改组派的前身：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改组，内部分左、中、右三派，左派以汪精卫为代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自动起来没收地主的土地，上海、武汉的工人武装起来组织纠察队，革命形势剧烈的向前发展，整个国民党看见革命形势这样发展就非常的害怕。（宣纲一）2. 武汉政府时代（1927年）国民党左派（一说改组派的长[前]身）开始反革命，因为农民自动的起来没收土地，地主阶级就要失掉土地，工人斗争剧烈开展，资产阶级陷于不利地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及中及右派更不用说早就背叛革命）就开始反革命，所以一方面武断宣传说：农民运动太过火，工人斗争太剧烈；另一方面竭力布置向工人及农民政[权]进攻。3. 国民党左派（改组派前身）在湖北、湖南之屠杀工农，汪精卫整个计划着在湖北指挥唐生智、夏斗寅的军队，在武汉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杀死无数工人及共产党员；在湖南指挥许克祥军队大屠杀农民群众，所谓“马日事变”即是改组派前身大杀湖南农民的一天。4. 改组派对工农的政纲：

改组派的政纲对农民是“二五”减租，土地归地主，对工人[是]劳资合作，不准罢工。（宣纲二）。

5. 广州公社时代，改组派屠杀工农士兵的成绩：

1927年冬，广州爆发暴动，广州的工人、贫民、一般劳苦群众及士兵推翻广州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广州公社，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极端残酷的流血战争。那时改组派就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拼命扑灭广州的苏维埃，攻打广州苏维埃的反革命军队就是改组派的基本部队，而改组派的领袖汪精卫、陈公博则坐在香港帝国主义怀里，照帝国主义的计划，指挥张发奎军队大屠杀广州的工农劳苦群众。

6. 改组派名称的来历及其用意：

改组派因为得不到广东的地盘，在湖北、湖南、广东等位子屠杀工农劳苦群众的滔天罪恶，全国工农群众都深深记住，永不会忘掉，但是改组派很想把这种屠杀工农群众罪恶以[从]工农群众的记忆中忘掉，所以（在1925年或1927年）大唱改组国民党，自称为改组派。改组派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内部一派。（宣纲三）

7. 改组派勾结帝国主义攻打广西龙州苏维埃。

改组派的基本军队张发奎部队，在1930年勾结法帝国主义拼命进攻广西龙州苏维埃，将龙州城内的工农劳苦群众杀死十分之七，差不多满城都是工农群众的鲜血。

二、改组派上台后，进攻苏区及红军的策略：

1. 借帝国主义的款项，聘请帝国主义军事顾问：

以高利贷的形式，向帝国主义借款来供给反革命的军队，聘请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计划进攻苏区及红军的军事计划，购买帝国主义的最新式军火来围攻苏区及红军。（宣纲四）

2. 动员全国的反革命军队来围攻各苏区及红军：

以广东、广西、湖南、福建及江西的反革命军队来围攻中央苏区及闽西苏区；以湖北、河南及安徽反革命军队来围攻鄂豫皖苏区；以湖北、四川的

军队来围攻湘鄂西苏区等。

3. 动员全国地主及资产阶级来进攻苏区：

在洛阳开的国难会议，便是企图团结地主及资产阶级以种种方法来围攻苏区。国难会议第一项议事日程便是“剿共”问题，改组派军阀夏斗寅组织湖北清乡团，要湖北地主、资产阶级拿出钱来进行大规模的围攻湘鄂西苏区。（宣纲五）

4. 组织苏区内部的地主、富农的反革命分子。

苏区内部的地主、富农分子是改组派在苏区内部的阶级基础，苏区内一切地主及富农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改组派是主要的组织者。

5. 钻入各革命团体来破坏及侦探工作：

富农、地主分子拼命钻入党、红军部队、少共、苏维埃政府、工会、反帝、互济会等革命团体里去，破坏革命工作，阻止革命发展，阻碍平分土地，假借革命团体名义来压迫工人贫农及中农，破坏党、少共、红军、苏维埃政府、工会等团体在群众中的信仰，专门做侵犯基本群众利益破坏工作。另一方面探听革命军事消息。6. 在群众中专门做破坏工作：买东西不给钱，吃饭不（给）钱，夜间出来扰乱革命的秩序，故意打入灾民中去，向工人、雇贫中农捣乱，没收他们的东西，吊打富农等等。7. 制造谣言：（宣纲六）故意制造种种不合事实的谣言，如分土地收成是苏维埃的，苏维埃只准喂两只鸡子，一只公，一母，喂多的苏维埃要没收等等，来障碍平分土地及破坏苏维埃在群众中的信仰等。8. 组织各种封建的迷信团体：用封建迷信的方法来团结富农、地主分子，来欺骗群众，组织正义会、联庄会、常练队等，把他们武装起来进攻苏区。9. 派人到苏区来活动：派人到苏区钻入各革命团体里来进行反革命工作的阴谋。10. 张贴反动标语口号来欺骗群众。三、怎样来与改组派作斗争：（一）把改组派逐出革命团体以外要把党、红军部队、少共、苏维埃、工会、反帝、互济会等革命团体中的一切地主、富农分子以及营私舞弊的分子驱逐出去。（二）赶快彻底平分土地：（宣纲七）改组派苏区内的阶级基础是地主和富农，土地如果不彻底平分，地主阶级的封建势力就不能彻底铲除，那么改组派就有更广大的活动基础。如果将土地彻底平分了，使工人雇贫农得到利益，不侵犯中农，那么就会发动极广大的阶级力量，更容易消灭改组派反革命活动的阴谋。（三）揭破改组派欺骗群众的阴谋：（宣纲八）改组派在群众中的一切欺骗宣传及造谣，我们应该经常的在广大群众中把他揭穿。假如改组派造谣说：“土地分了，收成是苏维埃的”。我们应该宣传并鼓动群众赶快平分土地，大家春收天好下种，分给谁的土地，就是谁的，收成也是谁的等。（四）把改组派破坏革命的事实，向群众宣布：在群众会议上宣布改组派破坏革命的事实，破坏工人、雇贫中农的利益的罪状，使反改组派运动成为群众运动。（五）在一切工作中开展两条战线斗争：要在每个革命团体的一切工作中，开展两条战线斗争，要严厉的打击一切怠工、空谈，不执行决议的官僚腐化分子。（六）与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倾向和思想及国民党残余思想作无情斗争：党内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倾向和思想及国民党的残余思想，客观上完全是帮了改组派的发育滋长，应该经常的在各种会议上、党报上以及个人谈话上与之作无情的斗争。（宣纲九）（七）加紧十大政纲的宣传，同时对改组派对比宣传：共产党主张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改组派则投降帝国主义，保护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共产党主张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银行，改组派则保护外国资本家在华的企业和银

行。共产党主张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而改组派则维持割据地盘的军阀制度，压迫回、藏、蒙等弱小民族。共产党主张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而改组派则拥护军阀争夺地盘。共产党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权，改组派则准备维持军阀、地主、资本家的统治，进攻苏区及红军。共产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救济失业的社会保险法等。改组派劳资合作不准罢工，帮助资本家增加工时，减少工资，失业工人及灾民非但死活不管，而且不许他们有居住的自由。共产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及富农（坏的土地分给富农）的土地，分配工人及贫雇中农使用。改组派“二五”减租（也没勇气实现）土地归地主。（宣纲十）共产党：改良士兵待遇，分配退伍士兵以土地和工作。改组派：赞助军阀克发粮饷，退伍士兵非但死活不管，而且不许（他）们有居住自由；共产党：取消一切军阀政府的地方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改组派：增加军阀政府的中央及地方的苛捐杂税，如盐每担增加五、六元等等。共产党：联合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苏联。改组派做帝国主义的走狗，进攻苏联。（宣纲十一）（八）宣传被改组派欺骗的群众自首：

除领袖分子外，凡工人、雇农、贫农分子被改组派欺骗的，应该宣传并鼓动他们自首，自首后，来分配土地。

中共湘鄂西省委宣传部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信——关于组织、无线电、军事训练材料
等问题*
(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

中央：

有以下几个问题请解释答复为盼。

1、有几个同志的党籍问题：方福生他是从俄国回来的，他回来时在旅馆里住，与中央发生了关系。据他在旅馆内谈话时有人听，就没有谈，说等三天再有人找他，但是等了好几天以后没有人去会他，他等得没有办法了，他本是襄阳人，他回襄早[枣]宜赤区去，路过湘鄂西他就到这里来了，没有介绍信，他的党籍没有办法解决。还有李沛泽、李修义、胡光华三同志是去年从国际回来，没有经过中央到苏区来的，没有介绍信，据他们的说(法)是去年六、七月间回来时国际同他们说国际与中央的关系不十分好，同时上海也有破坏，你们可直到苏区以后再打电(报)通知中央。以前国际是不是有这回事？他们的党籍究竟怎样？和在俄国清党的结论如何，请告诉我们。

2、以前三军派到中央去的交通欧阳杰，此人是不是中央派回的。同时他带来了一个罗章龙派王竞(新武)，他在沪的情形怎样，到底这个罗章龙派是怎样同他来的？假若中央知道，请详细的告诉我们，好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他们也没有介绍信来。

3、锡根和杨林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派来，他是不是有政治上的问题，请告诉我们，他假若是不能来，请中央另派别人来好了。杨林一定要派来，因为我们这里军事干部还是很弱，假若杨林不能来，也请另想办法。许光达同志假若病好了，请快点派回来为盼。4、做政治保卫局工作的干部，中央要派一个来才好，以前也向中央说我们这里缺乏做政保局工作的干部，同时我们的这一工作也是很少研究。关于组织系统和同省苏司法部的关系，我们不大了解(比如保卫局判决了案件是不是要司法部执行或者自己执行)。同时，假(若)有懂司法工作的同志也请派一个来。这些问题请中央答复。5、关于无线电的问题，请中央设法帮我们解决。我们这里只有一架收发机，时常发毛病，现在已经坏了几天不能收发报了，这对工作上真有很大的妨害，特别同鄂豫皖的关系和军事上的问题，请中央再设法帮助我们买一架新的来。同时我们这里无线电的干部也成问题，技术上不很好，请中央再派得力的干部来湘鄂西做工作。同时密码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你们怎样才弄，盘铭和小关带来的码字均发过，但是你总是收不到，我们也没有收到你们的报，这的确对工作是很大的妨害，因此特派克昌同志前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无论如何要把以上这些问题解决清楚交他带来(关于无线电台所需要的零件及详细情形另有信)。6、其次关于军事方面的书籍和材料文件请要中央军委详细清一点设法带来：(1)政治工作基本条例(彭字译)；(2)红军军制草案报告大纲，(中央军委发的)；(3)红军编制法草案(中央军委发)；(4)苏联红军步兵操典野外勤务(是刘伯承、李特、李人一等译校的，无论好坏请寄来做军校的参考材料)；(5)赤英同志写的一本论中国军队的小册子；(6)红军军纪条例；(7)社会主义书籍；(8)共产国际纲领；(9)六次大会决议；(10)华冈著的党史；(11)包包夫著的转变问题。以上这些材料请无论如何设法寄来为盼。此致布礼！

湘鄂西中央分局

五月八日注意：关于士兵运动，以前中央来信说川军中有线索、请中央把这个线索交给我们，并请中央派人到川军中做兵运工作为盼。此点应写在第五段，特补在此。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临时通知——关于举行庆祝鄂豫皖红四方面军胜利的群众会议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日)

各县委区委支部：

红军各级党部：

接到此通知当即召集当地群众的庆祝会议，根据传单的内容(传单附后)向群众作一报告，进行即时的鼓动工作，此会议时间只限于二三十分钟，并将此传单尽量翻印发给群众，须接此通知即举行之，以后并采用这种方法作成临时的群众运动。

省委

传单庆祝鄂豫皖第四方面军大胜利！大家武装起来开会庆祝！冲破“围剿”获得比鄂豫皖更大的胜利！顷接鄂豫皖急电：鄂豫皖第四方面军的四军及十五军在安徽六安及霍山等×子把陈调元军阀的军队两师全部缴械，获步枪九千多枝、机关枪一百五十多架、迫击炮三十多门、钢炮四门、无线电两架、子弹无算，活捉师长一人，打死团长二人，现在向前进击敌人，安徽敌人手足无措。工人们！农民们！鄂豫皖这次胜利，是鄂豫皖苏区全体工人和农民及第四方面军的赤色战士英勇血战的结果，这不仅是鄂豫皖的胜利，也是我们湘鄂西以至全国整个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的胜利，因此我们马上应该在各县各区各乡各村各业业里开群众大会(二三十分钟都好)来庆祝这一胜利。工人们！农民们！鄂豫皖这次胜利，是给敌人的“围剿”一个严重打击，同时削弱了敌人的围攻，但第四次“围剿”还未冲破，敌人的进攻将更要严重，我们应该趁鄂豫皖这次胜利的优越形势，大家赶快武装起来击破敌人的围攻，获得比鄂豫皖更大的胜利，来配合鄂豫皖的胜利，继续冲破第四次“围剿”来保障春收，与鄂豫皖打成一片。

我们高喊：庆祝鄂豫皖大胜利！大家武装起来冲破敌人的“围剿”！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冲破“围剿”来配合鄂豫皖的胜利！与鄂豫皖打成一片！鄂豫皖的胜利也是湘鄂西以至全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胜利！获得比鄂豫皖更大的胜利！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

中共湘鄂西省委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鄂豫皖又获一伟大胜利告工农士兵书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

大家起来肃清改组派与反革命派别！

冲破敌人的“围剿”来配合鄂豫皖两次伟大胜利！

今晚电：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配合群众的力量又缴敌人步枪六千余枝，山炮三门，机关枪四十八架，军用无线电机两架，其他军用品无算，活捉旅长两名，团长六名，安徽军阀陈调元被围，六安县城屈日可下。

鄂豫皖这两次伟大胜利，是肃清立三路线实现国际路线的结果，在肃清立三路线中，把暗藏在鄂豫皖的改组派、爱皮[AB]团、托陈取消派、第三党、罗章龙派与反革命派别全部消灭在肃清反革命派运动中，更提高了工人、贫雇中农及四方面军的全体红色战士和指挥员的积极性，所以群众配合红四方面军英勇作战，获得两次大胜利。

工人们、农民们、士兵们！鄂豫皖的胜利，当然也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更要趁鄂豫皖屡次胜利的时候，根据鄂豫皖的经验，肃清苏区内的改组派等等的一切反革命组织，把红军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洗刷出去，改变社会成分，扩大工人贫农的数量，提高战士政治情绪，勇敢作战，消灭除[徐]源泉、肖之楚、张振汉、范石生、郭勋等“围剿”湘鄂西的部队来配合鄂豫皖的胜利，与鄂豫皖打成一片。

我们高呼：

1. 鄂豫皖的胜利是我们整个的胜利！2. 湘鄂西的群众同红三军的力量配合起来冲破“围剿”！3. 争取比鄂豫皖更大的胜利！4. 消灭徐源泉、郭勋、张振汉、范石生等等“围剿”湘鄂西的部队！5. 与鄂豫皖胜利配合起来冲破第四次“围剿”！6. 与鄂豫皖打成一片，实现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7. 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8. 打倒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与罗章龙派等一切反革命派！9. 肃清苏区内部暗藏的改组派及一切反革命组织！10. 武装保护苏联！11. 武装保护中央苏区！12. 拥护苏维埃和红军！13. 拥护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14. 拥护共产国际！15. 拥护中国共产党！16. 工农兵胜利万岁！

中共湘鄂西省委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信——关于中央分局与军委的集体领导和
负责人问题及七月省委扩大会的准备问题*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二日)

中央：

今日分局会议讨论两个问题，报告如下：

\

一、分局与军委集体领导问题：中央分局四个人，关、贺在前方（本来照一月间中央决定关、贺均在后方，关以军委主席兼三军政委，但因革命战争发展，三军全部常在襄北，又因三军政委不易找人代替，因此小关经常在前方军部）。分局只有夏、宋两人做事，夏又兼代军委主席，因此分局的工作力量就很薄弱，夏既要帮省委，又要帮省苏，又要主持军事，还要指导党报，忙得不开交，这种现象是不能继续的。

与此连带的就是军委领导问题，本来中央指军委主席团是关、夏、贺，但当中央决定之时，湘鄂西省苏已指定是贺、夏、段、万涛、崔填五人为主席团，小关来后分局决定仍以五人组织，即关、贺、夏、段、万五人。军部到前方后，五人中就有三人到前方了，而且军委主席小关也在前方，因此就发生了军委决定问题是否须得前方主席团同志同意的问题。在中央分局讨论此问题[时]就决定了军委会可由后方军委同志及分局、省委决定问题，虽然如此，但按照军委主席团组织来讲，就不集体了。因此在工作过程中前后方负责同志不一致时，也会发生问题，同时军委仅万涛在办事，他还兼省委工作，有时省委把万涛派出外县了，军委主席团又只夏西一人负责。再者参谋长唐赤英同志非常弱，军委各科亦不健全，作战科长由唐兼，科员都没有一个，段德昌同志前来信就提出了军委领导不集体的问题。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认为这两种现象不能继续下去，解决的办法有下列五个：1、分局必须增一人，锡根如不能来，请中央另派一个，如增一人，分局力量比较大点。2、小关回后方专任军委主席，请中央另派三军政委一人。3、请中央派杨宁来任军委参谋长（或将孙德清调军委，杨任军部参谋长），赤英是必须更动的。4、如中央不能派政委来，则派两人来加强分局工作，夏西仍代军委主席，小关仍在前方，但参谋长必须换一得力的。5、盘铭提出以陈培荫同志任军政委，但夏西以为培荫能力还弱了一点，特别在三军现状之下还拿不下。在以上办法没有办到时，以后万涛勿要派出去，军委各科要加强，不紧急的事征求前方同意。这个问题，请中央迅予指示。

二、我们七月一日举行省委扩大会议，讨论下列十三个问题：1、省委五个月工作总结；2、土地问题总结；3、经济政策及合作社问题；4、经济斗争及劳动保护法实施问题；5、支部工作问题；6、清洗党员问题；7、反官僚主义问题；8、白区工作问题；9、白军工作问题；10、反帝工作问题；11、改造红军问题；12、长江上游工作问题；13、襄北工作问题。现正分项起草报告决议，搜集材料。

中央在湘鄂西四次代表大会后，尚没有来过对此间具体工作之指示信，请在扩大会议前对此间工作来一指示，我们准备派一人前来报告工作（大约十天后），各种报告亦陆续寄来。

三、关于党员清洗问题：我们感觉到湘鄂西有部分的党员党龄久，在党中或苏维埃中负责，官僚腐化，拟举行个别清洗。清洗个别党员或个别支部，

在党员大会或在群众大会，是否可这样做？

四、在省委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富农反革命了，被杀或逃跑，其家属没有反革命行动，是否可分给坏土地给其家属，或者是否可没收其家属已分得之坏土地。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本人反革命没收本人的，家属的不应没收；一种意见家属必有连带，因中国封建气习很深，应没收家属的土地。此问题请中央解释。

湘鄂西中央分局

五月十二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紧急通知——关于“五卅”进行赤色清乡之改正及具体
准备问题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

各级党部各党团

关于省委红五月决议上及“五卅”总示威通告上之进行赤色清乡的问题，在第十二次省委会议讨论的结果认为：

一、赤色清乡不是肃反的根本办法，亦不是主要条件，而是当时只提出空洞的口号，而没有实际内容，因为一般的反革命的清乡（当然是清共产党）他是站在豪坤地主的立场上，自然是不惜扰乱群众。他们清乡的办法是挨户搜查，这完全是反革命穷凶极恶的表现。我们所为的赤色清乡，当然是清反革命，是不是也进行挨户搜查呢？这种办法当然是不妥当的，如果这样去办就完全忽视了整个群众力量，就会得出不相信基本群众的错误倾向，这是国民党式的、封建式的，不是苏维埃政权下所需要的方法，而且在执行中一定会发生许多毛病和错误，因此省委会议讨论的结果，认为赤色清乡的决定根本取消。

二、在这一天仍然要进行驱逐反动家属出境的运动。这种运动只是肃反工作的最少部分，但这种特别要提出的这一工作绝不是“五卅”一天命令执行的，主要是在事先有广泛的群众运动，使每一个群众都能了解这一意义，在广大群众的动员的力量之下来进行，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成效与结果，这一工作的办法应该是：

(二) 先是支部大会专门为这个问题讨论一次，本乡有好多豪坤、地主、反动家属，那一个与反动者还有来往，有那些事令人怀疑，应该实行驱逐出境，那一家他的×人虽然反动，但事后这个家属与该反动毫无关系，在苏区内没有什么表现使人怀疑的地方，留在苏区没有什么危险，可以在广大群众担保之下准许留在苏区，要同志们具体发言，把全乡的反动家属一个个提出具体讨论，作初步的解决。

(二) 继而进行青年团支部会议，工会支部会议，贫农团会议，乡苏召集村民会议，讨论征取群众的意见，如果党支部的决议，在群众中通不过者，不要固执，须再审定自己的决议，这样一方面是实行了党的领导作用，一方面不是党命令包办（一切工作都要运用这种方式），经过了这些会议的讨论，每个群众的了解，拿这一讨论的最后总结，成为大会的决议，闭会后照决议执行。

三、在各种刊物上要努力宣传驱逐反动家属之意义。

四、进行这一工作应同时执行的几件事情：

(一) 被驱逐之反动家属的全部土地财产应没收，没收后由群众会议管理之。

(二) 在群众担保之下可留在苏区之反动家属，应同时发给居留证（此证由省苏政治保卫局发给，由乡苏维埃到区苏维埃领取）照证书上的条件，由群众监督填写清楚，这一工作，在大会闭幕之第二天就要按可留苏区之名单开始进行，以后由群众的力量经常监视行动。

五、在各种会议上要解释的几个问题：

(一) 豪坤地主的家属为之反动家属，这种家属在执行平分土地时，就根本不能得到一分土地，除了在有群众担保者之外，要一律驱逐出赤境。

(二) 富农的家属，如果该富农并未反动，不得算为反动家属；如果该富农反动了，就称之为反动家属。但在没有反动，而只是逃跑了的，不得认作反动家属处理。

(三) 中贫农、工人有反动者，要注意其原因，或因系党苏维埃过去所执行立三路线之不正确的政策，妨碍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不满意或系由反动压迫欺骗而反水者，根本就不能认为是反动或反水，这只有争取这些离开苏维埃的群众回到苏维埃底下来分得土地，苏维埃要向他们公开的承认过去策略的错误，但中贫农、工人中有最少数之真正反动中×做反动的首领者，仍然为之反动（但如果他觉悟回到苏维埃底下来，可以允许，但只给予简单处罚，如取消一个时期公民权等），这种反动之家中仍[任]何人不得为之反动家属，因为他的阶级是革命的，他的反革命只是一个人的行动，不可丝毫联系他家属，如系个人他真正反动了，家庭中的人没有问题，我们只认[为]是苏维埃的公民，不能认为是该反动的家属，对于这种人家不得丝毫去扰动他，因为他根本无所为“反动家属”。

(四) 凡反动者本人逃跑了，不管他是任何阶级，不得以家属代罪（如处决死刑及收押等）。这种代罪是封建制度不是苏维埃的法令。

(五) 党不是政权机关，不得杀人或审讯，以后党内杀人的现象，要绝对禁止，如不遵守者，要执行党内组织的裁判。

(六) 苏维埃除离省苏维埃很远之县苏维埃在不能押送犯人的条件之下，报告省苏得省苏的批准，可以执行杀人外，其余县苏均无杀人的权限（此项省苏将有具体的指示）。

(七) 驱逐反动家属，不是肃反的主要条件，主要的工作是消灭苏区内部一切暗藏的反革命活动（特别是改组派、AB团等）这需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来消灭之主要的方法，并不是凡有之改组派等执行杀尽，而是要根据省苏所颁布之自首条例，作广大宣传，号召误入者自首，自首者概免杀罪。

(八) 反动家属是指该反动者之父母妻子儿女等。已参加革命者或脱离了家庭者（如出嫁分家）不在此例。

(九) 要注意豪绅地主及富农等在平分土地后自己搬家者，要防止这一事件，在某一村都要注意，由别处迁居来的居民考查他的历史，要他报告，并要到他先前居住之所在地去调查他的成分历史。

以上这些均须在各种会议中作详细之解释工作。

各级党部及党团，你们接到了省委这个通知应马上讨论，自己有个具体了解即时传达到支部乡级去而到群众中间去，配合整个红五月决议进行这一工作。

中共湘鄂西省委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湘鄂西省委通告(第四号)*——关于召集扩大的第二次省全会问题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

地方各级党部转全体同志：红军

自湘鄂西省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闭幕以来，已经有三个多月了，全党在几个月的执行大会的精神的斗争中，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在第十二次省委会议讨论决定于七月一号举行扩大的二省全会，已经中央分局批准。

一、大会的任务：(1) 总结四代会后五个月的工作，具体研究五个月中的各种斗争经验，纠正各种问题中的错误。(2) 检查全部(包括各种群众组织)的组织力量。(3) 根据四代会的精神，配合新的形势，定出以后的具体任务及工作方针。

二、大会的准备工作：

(一) 各级党部要在大会前，完成省委红五月的工作决议的全体，完成春耕、平分土地及修堤的两个指示信。三军完成中央分局改造红三军决议之大部分。

(二) 根据省委关于实行检查工作，建立具体领导的决议的方式，将每个支部要经过一次改选并健全起来(改造支部的办法，由省委组织部发给)，完成每区至少要有有一个模范支部的任务。

(三) 各县委本身要把组织部的工作切实健全起来，完成各县委至少要有五个得力的巡视员，各区至少要有三个得力的巡视员，建立县委的经常有计划的有内容的切实的巡视制度。

(四) 至扩大会时要完成各支部吸收三个至五个积极分子参加支部工作(不脱离生产)，支部本身要有一个得力干部供给区委，各区有有二个得力的区委干部供给县委，各县委要有二个得力的县委干部供给省委。这一任务到扩大会时要完全实现。

(五) 在扩大会以前，至少要将各县苏维埃之土地、劳工、工农监查、工部人员及工作健全起来。

(六) 各县要根据省委所发之各种报告大纲，具体写成单独的报告，各县委要督促将各种报告于六月二十号完全交到省委，各县委要负责督促各党团具体填写报告并要负审查各种报告之实际与否之责。

(七) 省委为要充实扩大会的实际材料及加紧完成目前几个主要任务起见，特规定六月份(除照常执行一般工作外)为检查工作发起竞赛月，根据党四代会的决议，省苏一执全会的决议、省总三次全会的决议、少共三代会决议、反帝决议、互济决议、肃反决议、省委修堤、平分土地，春耕两个指示信，中央分局致各级党部的信，用报告大纲来具体一个个检查每一个决议的执行程度。同时要针对我们工作中主要的弱点如白区工作、白军工作、工会工作及党内职工运动、肃反工作、反帝工作、地方武装工作、支部工作、合作社工作等及一般工作的不够，检查后要以革命竞赛方法，各级各部互相订立竞赛合约，加紧在大会前完成之。并根据各种报告大纲之每一项执行具体检查各级党部，要检查自己所领导之各党团的工作，党团苏维埃各种群众团体，自己要检查自己各部门工作。并由上而下省检查县，县至区，区至乡，每一部或每一级检查完毕后，马上订立竞赛合约，加紧完成之。将这一检查的结果作为报告的具体材料，报告省委，每一区将乡级检查完毕，作一总结，

每县将区级检查完毕作一总结，每级要具体规定检查完毕之日期，达到六月二十日，将全部报告交到省委的实现，省委决定在六月十号派出一批交通到各县坐催报告（报告大纲另发）。

（八）扩大会的议事日程：（1）省委五个月工作总结。（2）土地农民问题。（3）合作社及苏区经济政策问题。（4）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及劳动法的问题。（5）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问题，（6）支部工作问题。（7）反帝工作问题。（8）个别清洗党员的问题。（9）襄北工作问题。（10）长江上游工作问题。（11）政治报告。（12）白区工作。（13）白军工作。（14）青年团工作。（15）扩大及坚强红三军问题。这些问题每个有一短的决议，每一个决议有一小委员会，这些草案决定在六月二十号以前完全送到各县委、各县委接到每一个决议草案，马上要有详细讨论提出具体意见，并随时将草案传达各区委，各区委在接到每一个决议草案时，亦马上有一详细讨论，提出具体意见，并马上传达到各支部，（各支部）接到每一个决议草案，即召集支部大会讨论之，具体提出意见，各级讨论后之具体意见随时报告上级，各级将所属之下级提出之意见接收完毕后作一总结，以致到县委作最后总结，交出席扩大会之代表作为全县之意见。此外还须对扩大会有一个至三个具体而中心的提议（决议草案数量不够各县委要随时翻印，要保障每个支部至少得到一份）。

三、代表的人数：（一）省委全体委员除自己工作万分不能离开外应一律到会（红军中之省委委员应按照军事情况）。（二）监利、沔阳、川阳、天汉、云孝、应城、钟祥、京山、荆门、当阳、远安、松滋、公安、江陵、江南、潜江、天潜，每县委一人，襄北宜昌诸特委各一人，洞庭特区委一人，宜昌沙市两市委各一人，武汉一人，峰口、朱河、新沟咀、潜城、四街通[道]支部各一人，府坊[场]，新<沟>咀、分盐、老新口、总口、县市附近区委各一人，红三军七、八、九三师政治部一人，军部政治部一人，鄂西北独立团政治处一人，军校支部一人，省委全体监查委员会，警卫团政治处一人，鄂北三人，军委政治部一人，省委党团主要负责同志，省总党团反帝互济党团书记，省政治保卫局一人。各代表于六月二十九号完全达到会议地址省委所在地：

各级党部接此通告完全执行，以后不再补发通知。

湘鄂西省委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关于击破敌人“围剿”扩大革命战争决议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六日)

一、全国革命形势的开展

“反苏战争的准备与瓜分中国，直接的、公开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策略的中心”。近来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中央这一估计的正确。日本在苏联边境积极挑衅，宣传“日俄关系恶化”。上海最近（五月五日）沪战签字协定承认日本在租界外驻兵，并组织国际警察管理日兵撤退区域。国际调查团的初步报告，是日本的军事报告，这完全证明国民党一再出卖民众的利益，各帝国主义英、美、日、法、意一致的进行瓜分中国的勾当。

国民党一再出卖民众，投降帝国主义，却还藉口援沪来掩盖进攻苏区的军事计划。张发奎援沪，实行已在进攻湘鄂赣、湘赣苏区。刘湘的援沪总预备司令官，调遣五师川军就是进攻我湘鄂西苏区。所以国民党的中心策略是进攻苏联和苏维埃中国，陈济棠公开说：进攻共匪，就是间接给赤俄以打击。

国民党的另一派别，如孙科、胡汉民等，则高唱拒绝签字，联合美、俄对日宣战等。这不过是为了攻击南京的当权者，实际上陈济棠已调遣部队进攻闽赣苏区。

事变的发展，证明苏维埃政权的日益开展和国民党政权的宣告破产。中央区红军占领漳州，鄂豫皖的围攻六安，湘鄂西红军在襄北第三次伟大的胜利。这些证明红军、苏维埃的发展日益接近各个苏区联成一片，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形势。白区工人、农民、士兵斗争的开展，给了苏区和红军以有力的帮助。

正因为红军、苏维埃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中国革命的时候，开展了革命战争急剧的阶段。如果认为敌人没有力量进攻苏区，或者国民党只是偏师，这毫无疑问的是左倾空谈，掩盖着一切扩大革命战争的消极怠工；如果认为现在敌人力量增强，而认为没有争取胜利的前途，这完全是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有用布尔塞维克的速度开展对于敌人的进攻，扩大群众的革命战争，吸收更广大的从前没有参加斗争的群众到革命战线上来，这才是争取胜利的先决条件。

二、湘鄂西苏区的扩大与敌人“围剿”的加紧

湘鄂西红三军在四月初（五月×日）与敌人激战七昼夜的结果，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这一胜利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巩固了襄河北岸的新的根据地，将襄北、襄南苏区打成一片。而且红军的壮大，威胁了湖北的统治阶级，他们甚至认“鄂匪”甚于“赣匪”，这就是说造成了争取与鄂豫皖打成一片的顺利形势。

正因为我们的胜利，所以湖北统治阶级疯狂似的准备进攻湘鄂西苏区。首先是川军与鄂军的配合，新从四川开来之第四师范绍增部，已有接防郝穴消息。反革命为了解决财政的困难，要筹剿匪经费三百万元，并且增加盐税。第二，反革命不仅从军事上，他们想从动员反动阶级的社会力量来向我们进攻，首先是改组派的活动，从各方面打入苏区和红军以及党内、苏维埃内进行破坏的阴谋。第三是经济封锁，如现在封锁新堤、白螺。第四，现在各方面敌人四出骚扰抢夺春收。最近监利之敌亦十分活跃，最近占领毛家口，另

外集中主力准备进攻三军。所以第四次“围剿”，仍然是目前主要危险。

三、目前党的斗争任务

什么是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呢？只有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参加斗争，扩大苏维埃运动到新的区域，襄河北岸、天汉、天潜、京山、钟祥、应城、云梦、孝感、德安造成整片的苏区，与鄂豫皖、鄂北打成一片，是目前主要任务。特别要加强云孝、应城、德安的工作。同时，长江上游两岸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是击破敌军之主要条件。发展荆门、当阳、远安、宜昌、宜都、松滋、枝江、公安的游击运动，现在已经具备了客观的条件。因此，现在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应该是造成襄河沿岸与长江上游七县的新苏区。只有新的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是最主要的力量。建立武汉工作，扩大宜昌、沙市、京汉路、武长路、长江、襄河的工人运动，扩大苏区周围的白军运动，这是与扩大苏区红军不可分离的任务。因此目前工作的重心，是发动白区、白军工作，来扩大新苏区、扩大红军。

苏区周围的市镇（如新堤、岳口、仙桃、监城、普济观、郝穴、沙洋等处），现在均成为敌人军事上的根据地，为争取这些市镇，应该放在党的工作议事日程上来了。加紧这些市镇内、市镇外之群众工作与在该处驻扎之士兵中工作，传播苏区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这是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扩大红军是扩大和巩固苏区的主要任务。最近中央指示，要在加紧反帝国主义，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扩大红军一倍。我们要加紧完成中央这个指示，提出一杆枪在[再]发展一杆枪的口号，巩固苏维埃、巩固红军与扩大苏维埃运动，是不可分离的任务。完成修堤、春耕、平分土地、保障春收的任务，完成改造红三军的任务，完成肃反的任务，征收土地税、营业税，保障红军给养，这些都是不可丝毫放松的工作。

四、目前最紧急的具体工作

（一）在六月二十五以前，动员三千人补充红军，应分期动员、组织参加红军的突击队，由组织部和少共规定此次动员方法。

（二）在六月十五以前，将各县红军公田粮食集中省军委。

（三）在七月一日以前，将春季土地税办理完毕。对于省苏财政部工作的检查，要在“五卅”以前做出总结。

（四）在保护春收的口号之下，在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的口号之下，动员群众组织工农赤卫军、少先队，并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省军委在“五卅”以前，派出一百个干部去训练地方武装。

（五）在后方加强拥红运动，慰劳医院伤兵，帮助红军家属耕田、种子。在红军作战区域，广大的动员群众送饭、抬伤兵，组织妇女看护队。现在要准备八万盐蛋，二万双草鞋到前线慰劳红军，由互济会发动这个工作。省互济会党团在二十号以前须作出具体计划，军委政治部派人帮助。

（六）在红军作战区域，组织群众参加作战，组织战场宣传，由青年团发动这个工作，在二十号以前须作出具体计划。

（七）加紧肃反工作。省委在三天内检查保卫局的一般工作状况，各县委书记与政治保卫局局长，由省政治保卫局特派员（最近分途派出）检查各县工作。（现在应做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一面揭破改组派之反革命活动，一面宣传××条例。省委宣传部要在三天内检查关于与改组派斗争问题之宣传工作。

（八）立刻纠正白军工作的取消主义，委员会做出兵运工作的总结，由

组织部、青年团、军委政治部、参谋部立刻组织兵运委员会，重新布置工作。由军委政治部负责管理这个工作。

(九)中央分局、省委要立刻检查关于改造红军决议之执行程度，特别是政治工作，红三军的行动与积极化，坚决开展对于敌人胜利的进攻。(十)省委动员省苏的同志、工农监查委员会审查春耕、修堤、平分土地、保障春收之工作的成绩。审查土地部工作的委员会，要在“五卅”做出总结。(十一)省委要对于支部工作的建立，征收新党员的运动，干部的培养，要分别做出一定的指示，并检查各县的执行程度，同时要加紧对于少共及各党团群众工作的领导。(十二)省委立刻要将工会党团的工作做一总结。检查白区工作小<的>委员会，在二十五<日>以前做出总结。(十三)对于应城、去梦、孝感、德安的工作和长江上游的工作，省委须加派干部去，加强当阳、松滋的中心县委及公安县委的领导。(十四)省委要立刻检查江南的工作一次，加紧在长江以南失败区域之群众工作。(十五)军委要派人去加强长江上游游击队的领导。(十六)分配没有分得土地的战士以土地，要在六月完成。省土地部、军委政治部在二十五号以前，决定基本办法。(十七)省委宣传部对于反对敌人“围剿”，扩大革命战争的宣传鼓动，对于党内教育工作，对于党报工作，在“五卅”以前做出总结。(十八)用尽一切力量保障春收，同时应号召群众储藏粮食，以免敌人抢去。(十九)在被敌人蹂躏的地方，党应随着环境转入秘密方式，建立秘密支部和群众的秘密组织，抓紧敌人的每一压迫作反抗的斗争。(二十)根据中央关于反帝指示，加紧反帝运动，并加紧关于反帝代表会的准备工作。宣传部要对反帝运动作出一工作总结，提交常委讨论，对反帝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予以最大的注意。(二十一)省苏党团立刻做出执行工作的总结，审查关于灾民决议之执行程度。(二十二)省委组织部应立刻检查仙桃、新堤、沙洋、岳口、普济观、郝穴、监城的白区群众工作，很具体的去组织这些市镇的工人、贫民、近郊农民的斗争，走到配合红军夺取这些市镇的阶段。

五、严格与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作斗争

现在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一)忽视敌人“围剿”，对于敌人的进攻以及反革命在苏区内之活动，缺乏警戒心。

(二)依靠红军，不去发动群众用旧式武器的广泛游击战争去组织工农赤卫军。

(三)空喊、空叫，不做实际工作，不去发动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四)不去扩大春耕、保障春收、加紧修堤、平分土地，而向贫农、中农乱斗。这些严重现象，是立三路线的残余还没有肃清，在左倾空谈之下，掩盖着一切机会主义的消极和官僚主义的敷衍。

只有自下而上发展自我批评，提高党内民主化，积极提拔新的工人干部、贫农干部，严格打击官僚腐化分子，才是争取胜利的先决条件。

中共湘鄂西省委通知（总字第二十四号组字第十九号）——关于动员参加红军问题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各级党部：

动员参加红军是目前最主要的工作之一，省委再三通知和决议引起全党的注意，直到现在检查起来，还是做得十分不够。自县至区一般的是下通告、通知的官僚方式，没有深入群众中去切实动员，党团员不能以身作则的自告奋勇的报告，写志愿书，去领导群众参加红军。对于举行各种会议，采取竞赛方式，组织突击队来分别动员，这决议还是纸上的空谈，有的把突击队组织起来，不动员去参加红军，而等待来调（如监利白螺），甚至有些支部是一个空洞的，因为同志与群众部分的出外逃荒，简直连会议召集不成。虽然在四五两月中参加红军的约四千多人，但这都是群众的积极性（或有小部分是动员的），而我们的动员力量真是微乎其微。同时在这四千多人中工人成份占少数，党团员仅占十分之一，关于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基础，使党团员成为红军中的骨干，更加谈不上。这一现象非常严重，再也不能一刻延长下去，省委组织部为要纠正过去一切缺点与错误，充分执行中央扩大红军一倍的决议，对于省委规定在六月十五号以前动员三千人补充三军的具体计划，有一个详细讨论与布置。

一、加紧拥红工作，是动员参加红军的先决条件，在这一运动中各地必须经常举行红军家属会议，尽量帮助红军家属解决耕牛、种子的困难，组织代耕队，实行帮助红军家属种的和耕种红军公田，动员拥红队实际拥护红军，组织广大群众配合红军作战。

二、纠正过去官僚主义的方式，县委、区委必须深入支部，深入群众，分别举行支部大会、工会、贫农团、人民会议及各种群众组织会议，在会议中报告红军胜利，详细解释参加红军的重要，党团员必须以身作则的首先报名写志愿书来切实领导群众，做群众的模范。

三、采取革命竞赛的新工作方式，党与党竞赛，团与团竞赛，工会与工会竞赛，个人与个人竞赛，尽量做到超过规定的额数。

四、动员参加红军去的同志和群众，要是体力强壮，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绝对纠正过去无论老少一概送来的现象，同时必须严格注意坏的分子混入到红军中来。

五、动员的对象，主要的是工会、贫农团，在总的数目中，工人占十分之四，贫农占十分之一。

六、要绝对纠正过去中途打转的现象，在这次动员中，县区纵队部要负检查的责任，派员送来。（一）江陵、潜江、荆门、石北方面，直送潜江第二补充团。（二）沔阳、监利、川阳、大× 区送军委会所在地第一补充团。

（三）襄北各县直送第三补充团（地址在天汉北×一带）。（四）游击区和白

区可在工作便利条件之下，直接送红三军或补充团、军委会，但必须取得收条到军委会以便切实检查。

七、动员参加红军，不仅限于苏区的动员，而且要动员白区的工人和灾民。主要的中心是放在新苏区：（一）天汉、天潜、潜江、京山、荆门、去在各县，每支要动员五名。（二）老苏区如监利、江陵、川阳、江南、沔阳

各县，每支要动员二人。（三）游击区规定公安、松、枝、宜、当阳、远安、钟祥、应城，每支至少动员一人。（四）应注意到动员宜昌、应城盐矿等处的工人来参加红军，数目暂不规定。（五）日期襄南各县要在六月十号完成这一计划，襄北各县在六月十五号以前完成，游击区和白区可分六月二十五至三十号两期送来，但游击区必须于二十五号以前送来。

各级党部接此通知后，希马上具体讨论并切实的动员。

湘鄂西省委附：为动员参加红军事致宜昌特支信宜昌特支：扩大与改造红三军，是湘鄂西党的三大任务之一，在执行这一任务中，党当然要动员她的最好的党员和最积极的革命群众，去参加红军，坚强红军。白区的党同样的要动员失业工人与党团员参加红军，但在这一动员中，应注意选择[同]阶级成份最好及政治认识最坚定的分子来参加红军，你们恰恰相反，如沙市市委送来两人参加红军，而是反动团长派来到红军中的组织者，秦吉鲁是商人成分，又系非同志，派来往[住]军校，这是多么严重啊！以后送来参加红军的，希你们特别注意审查来历与成分，这次动员三千员参加红军，希你们加紧动员至要！

湘鄂西省委组织部

五月二十七日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此处缺字。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破获改组派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中央：

最近湘鄂西苏区已破获大批重要改组派，此案尚未结束，兹将大概情形及我们的布置报告于下：

(一) 红军中已破获改逆最高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以胡慎己负总责(系红八师参谋长)，以九人组织，其余委员系邓希禹(系八师二十四团参谋长)、朱寿谦(系红八师特务长)、傅光夏(红八师政治部主任)、谢锡章(红八师二十四团第一营营长)、刘树植(红七师二十团团团长)、黄正金(红九师参谋)、李孝侯(红九师二十七团参谋长)、樵继汉(红八师二十四团政委)，此外有刘革非(红七师十九团政委)、朱璧容(红九师副官长)、熊管理员(红九师的，名字未详)、罗汉(红军第三团补充团长)，以上名单已逮捕。

(二) 红军第四医院夏正、张伟、汪波洋，系改逆省委，该[改]逆省委机关即设第四医院，以汪彼洋接洽地方之改逆联系，这几人已逮捕。

(三) 军校

(四) 列宁学校

(五) 地方：由红军中供出地方之改逆，鄂西特委张左×(江南，系石、华两县合并县委常委)，此人已在逮捕中，捕后即可找出地方很多线索。余为天汉(川北、天东合并)县军事部部长系国民党派内有改组派多人，白色××××××可送赤白之×局长骆×××××县委，另有第三党混合组织第二次革命等。××破获改逆五个县委组织，少共县委机关即改逆县委机关，××游击队长，××××队长，游击队即清乡团之常练队，江陵县书有改逆嫌疑。

(六) 该反动活动一般形势[式]：破坏土地革命，破坏生产，乱闹斗争，故意侵犯中农、贫农利益，在新苏区欺骗群众说：“你们不要分土地，分了，苏维埃要×××的粮食，苏维埃要没收”，普遍则“你们不要用马推磨，应用手推，否则即是富农”、“苏维埃只许喂两只鸡，一公一母，多了就要没收”、“不要喂蚕，喂了苏维埃要分一半”。更是混入到苏维埃及[各]种群众团体、党的领导机关，故意官僚腐化，对群众态度凶恶，与群众的关系恶化，破坏党与苏维埃的影响。此外则组织许多奇怪之附属组织名称，如荷花会、正义会、掉膀委员会、暗杀党、野猫会、弟兄团，×

(七) 他们的行为，×群众大会上公开喊：“打倒红军”，夜晚杀人、放火、抢劫，×区，沔阳之峰口区都次第发生，在群众大会中捣乱，故意跑兵，改我们的标语为反动标语，没收巡视员的××(××一带暗杀巡视员)。

(八) 这些都是×动，在天汉准备暴动配合敌人之进攻，这完全是敌人第四次“围剿”中之军事、政治在苏区内外之配合进攻苏区的具体行动。

(九) 他们的派别线索来路不只一种，有清乡团、国民党、第三党、改组派，在改组派中又有几条线索与来路(如监利则破获改逆五个县委组织)，他们的组织已经普遍在地方每县都有，医院、兵工厂、军校等都有严重问题，甚至许多领导机关内都有问题(如省互济会机关内就有两个改逆嫌疑，委员长也是一人)。

(十) 最近在监利、天汉有大的破获，潜江亦有相当破获，川阳已开始

破获，沔阳、江陵仍无头绪，此两县据我们估计与事实的表现，在地方上为反革命之重要地方，尤以江陵为最。

（十一）红军中破获之起源，则由红七师二十一团之一排在新沟咀鸣枪罢岗（全排不放哨，系排长领导）及中央分局所发之改造红三军决议在部队中发表，发动反军阀制度的残余的斗争，引起群众的积极性，按破获案件之供词与部分的自动报名自首而扩大，我们估计中级干部亦不少，现只破获领导机关，正在继续进行破获中。

（十二）过去党对肃反工作非常忽视，得富田事变、鄂豫皖破获改派的严重教训，部分引起注意，对肃反的观点上有了转变。在当时只做了部分的宣传工作，还谈不上普遍深入下层，现在许多下层工作仍成问题，充满了官僚主义的方式，支部空得很，党的决议不能保障大部分实行。到现在来说，虽经中央分局发出过与反革命作斗争的决议及省委发出一些肃反文件与材料后，还有许多县委对这一严重工作都还未引起十分注意（如江陵、沔阳还未开始破获过，实际上这两县很严重）。自然，这里要批评省委本身对这一工作的领导非常不够，严格的说来是帮助敌人进攻的政治错误。

（十三）我们现在对这一工作的布置是：

1. 把这一工作作为今天工作中的重要中心，决定把省委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起草收集材料等，因要牵制很多人不能动），把省委扩大会议改期（原定七月一号）至八一，省委本身派一批人到各县去，实际检查这一工作，并帮助保卫局及动员全党来加紧肃反工作（自然紧紧的与完成平分土地、修堤、春耕联系，与反帝反国民党武装，保护苏联，击破敌人“围剿”，扩大革命战争，武装群众，改造党和苏维埃，反官僚主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联系，见击破敌人“围剿”扩大革命战争的决议，与完成平分土地、加紧春耕继续领导灾民斗争及完成修堤给各级党部的两封信，省委关于执行检查工作实行具体领导的决议，中央分局给各级党部的一封信），江陵一人，沔阳一人，川阳一人。

2. 检查各级领导机关的人员的工作历史与来源，不妥者掉换工作（自然不是委员会的负责人），对委员会的工作亦有具体考查，个人亦进行考查。

3. 进行党的部分的个别的清洗，加紧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及两条战线的斗争。

4. 广泛的进行宣传工作，揭发反革命的××××，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的积极性，造成群众的肃反运动。

5. 加紧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大量准备忠实可靠的工人、贫农积极分子来作政治保卫局工作，此种人都当经过慎重审查。

6. 红军中组织一军事最高法庭来审判改逆等领袖，以夏曦、盘铭、鲁易、贺龙、向应、培英等负责。向应重病到后方休息，夏曦已到前方。三军政委暂由盘铭代理，盘铭到前方。

7. 省保卫局由光华、鲁易、赤英，××加强保卫局领导，但并不是只作肃反工作而停顿其他工作的执行，但正因加紧肃反，更加紧执行目前几个主要任务，春耕、修堤、平分土地、扩大红军、改造党、改造苏维埃、武装群众、准备干部、提拔新干部、加紧白区白军工作，这些工作联系到反机会主义、反官僚主义，以这些工作与肃反紧相联系，以整个的这些工作的发动群众积极性，以击破敌人的“围剿”（具体者见各种文件）。

俟此工作结束后，再具体报告经过及总结。

湘鄂西省委（光华）

五月二十六日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缺字五个字以上。

均

中共湘鄂西省委军事报告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央并转中央军委：

关于湘鄂西军事上问题，我们分作三部分来报告，但我们必须申明的，以现有材料，第一，只能报告几个中心问题：第二，是没有数目字，只有就一般的来说，当然这是我们军事工作中的一个大缺点。

一、湘鄂西军事发展中的中心问题

(一) 向北发展的形势与现时军事计划

1. 湘鄂西红军，自第二军团在中夏领导之下过着逃跑生活，逃到房县后，我们在中央分局的领导下，即改变了在四中全会时所规定向长江南岸和湘西、湘中发展的计划，坚决向襄河北岸发展与红三军取得联系，自从红三军独立团（德昌所领导的系按照红军编制草案，从新改编过的）及后来的第九师（亦系德昌领导共只两团领[零]一营）先后占领了新沟咀、老新口、沙洋、潜江、张截港以后，向北发展的形势愈益开展，同时在这些战斗的胜利中，夺取了敌人的武装，武装了自己，从一独立团扩大到两团另一营（按新编制）。

2. 红军第九师的主力（一团另一营）一九三一年九月底与红三军会合传达了国际路线，红三军到达湘鄂西苏区后，湘鄂西全部红军按新编制共改编为五团，以一团过江，恢复江右政权，军部直属四团，巩固襄河交通，并积极向北发展。

3. 在红三军回来未打下岳口后，没有马上进取天门发动襄北群众分配土地，建造北岸苏区，来巩固旧苏区，所以后来中央指出我们当时没有发展的方向，这完全是正确的。当然[时]经过是：我们还没有一定方向的行动时，敌之新二旅、新三旅、四十一师张振汉部节节进逼，张截港、潜江先后失守。

4. 潜城失守后，军委决以军部直率三团打击川军后，即在襄北行动。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广大的游击区域，造成为必要的军事根据地，使巩固的进行发展。这一军事计划执行的结果，红三军主力先后解决了后港十回桥川匪各一营，郭勋所部的川匪立即从苏区内部撤退至沙市，我红三军即折师襄北，消灭了驻皂市之曹振武部及武汉保安团一部，这时不但川军停止了大的进攻，并牵制了襄北敌人向苏区内部的进攻，这时红三军战斗情绪异常增高，子弹枪支得到相当补充，后来红三军主力因在襄北已达四十天左右，与后方交通不便，伤病战士困难，安插补充困难，于十二月中旬，故回师打击川军，同时盘铭同志从中央回到苏区，解决了许多争论问题，故在打击川军后即编成两师（九师两团一营、七师两团）一独立团。以九师过襄北行动，七师到襄南之汉川方面行动，独立团及地方武装巩固苏区内部。

5. 在这一军事计划之下，第九师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初在应城附近消灭第四师之张旅全部，从伙夫至旅长均被俘虏（红九师即补充为三团），七师先后打下黄陵矶、侏儒山，这时震动湖北反动统治阶级，何成浚急电令三十四师从中部，川军从西部立即开始向苏区内部进攻，郭勋亲率四团及一特务营先后占领李家市、熊口、龙湾一直到老新口，新二旅由潜江进攻东荆河一线，三十四师进攻孙家场、杨林关、豫备堤，军委即飞调第七师迅速西上迎敌，并令第九师沿汉宜路西进抄袭新二旅之右侧背，打击张截港至多宝湾一带之敌，以牵制和打击襄北敌人之配合行动。此次计划执行的结果，第七师到达峰口时，老新口之川敌撤退，竟于熊口、龙湾激战并先后恢复，第九师到达

张港，消灭敌人一营，张港、潜城之敌仓皇撤退，此时襄北敌人出击，虽然潜城未失，但张截港后入于敌手，第九师退北岸以牵制敌人不敢深入苏区内部进攻，当时军委即决以军部率第七师过襄河北岸，协同九师坚决打击和消灭襄北之敌，发动襄北群众，在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争取襄北不断的胜利。此次七、九两师过襄北于二月初在皂市附近之钱家场消灭韩昌竣旅之三分[之]二以上，俘虏旅长韩昌竣，并击溃四十一师之一部，这一胜利局势之下，张截港、多宝湾、北黑流渡一线之敌仓皇退走，我潜城之八师（原独立团及由房县来之二十五师编成）即与襄北主力取得联系，当时军委总的军事计划是以主力在襄北争取继续不断的胜利，给敌人以严重打击，或在军事上告一结束时，而苏区内部给养有相当的集宿[积蓄]，即[及]回师消灭苏区内部白点，同时长江南岸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有可能恢复江右政权的条件下，即行抽调一部兵力过长江南岸行动。这时我们在执行这一总的军事计划时，军委审查了钱家场之役，认为第三军军部的领导的同志对敌情有错误的估计，以为消灭了四十八师之韩旅，襄北敌人再继续进攻的条件须有川军的配合，因此就即行以七师过襄南打击川军，肃清苏区内部白点（本来在钱家场之役胜利时，军委即函军部须乘胜争取不断的胜利）。结果对川军尚未开始战斗，敌四十一师、四十四师、四十八师均向皂市、天门、杨家场、张家场、花台、柳河、钱家场一带共十四团兵力，当时我七师（此系驻汉川之湘鄂西独立第一团编入第七师共三团）第八师（两团）、第九师（二团）均迅速集中襄北，以第七师之一团巩固襄北交通（张截港），以七团之兵力集中灰埠头之宜汉路一带，于三月三十一日尚未先全集中时，敌人已节节迫近，遂于瓦庙集以西遭遇，同时殷家岭方面我们亦开始攻击，此战役一直激战至四月六日敌方全部撤退，结果消灭敌一营，击落敌飞机一架，敌无给养，杀牛宰马充饥，敌势不支，遂全部撤退至京山、皂市、天门、应城一带。我军伤亡在千以上，我九师逼至应城时，敌重兵即移驻应城龙王集、京山一带。

6. 目前敌张振汉为第二纵队司令，率一师由汉川西进，实行沿襄河进攻天汉苏区与天门一线打通，第一纵队肖之楚为纵队司令，约率两师左右，由皂市以南向张家场、花台、柳河方面进攻。十三师夏斗寅之一部在应城，川军据反动报纸载，出兵五师“进剿”湘鄂西，现刻我们已悉，范绍增部已达宜昌、沙市，其余在继续出动中，三十四师仍驻污城、仙桃、通海口、彭场一带，新五旅潘善斋仍驻新堤，新七旅分驻公安、石首、华容，现刻进攻湘鄂西的主要的敌人是鄂军和川军，我们现刻是集中力量与红四方面军配合消灭四十一、四十四、四十八师及夏斗寅之一部，现在红三军主力已在张家场、花台、柳河、横堤市一带开始了战斗，坚决争取这一配合的胜利。鄂豫皖来电红四方面军先以一师过京汉西与我们配合行动。其余四师以上兵力，在五月二十九日集中商城，六月十日左右可到京汉西，昨又来电，主力四师须先消灭长轩岭（距孝感九十里）之三十师（六团）后即到铁路西行动，对于川军则以我独立团（枪约一营）配合地方武装于荆门活动，打击川军出击之部队，主要的加紧发动沿长江上游七县的游击战争，特别是荆门、当阳、远安正高涨着的广大的分配土地的斗争，更进一步的成为游击战争，威胁宜昌、沙市，减少川军进攻苏区内部的积极性，在襄北的战争告一结束时，即抽一部（约一师）恢复江南政权，根本给川军以严重打击。总之，湘鄂西苏区的发展，有一个显明的总的形势。自从占领潜江城、张截港以来，我们为了向北发展要争取襄河的交通——向北发展的门户；敌人要根本消灭“红匪”和

苏区，必须占据襄河封锁我们在襄南，实行步步为营以达到其“剿灭赤匪”的目的，故在潜江张截港一带大小战役几十余次，现时敌人仍继续正企图争取襄河交通，但湘鄂西苏区已发展到襄北，在广大群众基础上，在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日益巩固起来，同时红四方面军即与我们配合，在军事上为襄河之争，将马上转变到以云、孝、应、安陆、应山为中心的京汉路之争，当然这里我们不是要去截断京汉路，而是要在京汉线一带活动自如，使湘鄂西苏区能迅速的向北扩大和发展。

（二）发展中的困难

1. 湘鄂西苏区自水灾后，给养万分困难，我们的军事行动常常受到限制，这里表现在：不能集中主力在苏区内部（洪湖的老苏区）作战（如监利、江陵的川军及三十四师向苏区内部行动）。困难作持久战，如消灭苏区内部的白点，每因无给养而撤退。此次，襄北七日七夜的战争亦是受到给养上的限制，后方各机关除医院外都是吃稀饭，但军事机关每天一顿稀饭一顿干饭。

2. 湘鄂西红军技术品的薄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技术品薄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山炮和步兵炮等。我们对于比较坚固的工事都困难攻下，一般指挥员和战士一见了工事就减了几分锐气，所以我们只常常诱敌出击或到野外作战，但这样每次都是胜利的。敌人亦知道我们的弱点，他们（敌人）亦只靠工事来作战，如韩昌竣旅他从皂市到钱家场只三十里，他们走了三天，他们的行军亦依赖工事。行进时，其先头的一团，走了几里就开始筑工事，其跟进的一团就准备迫敌（红军），待先头的一团将全团的工事筑好后，其跟进的一团上前，到了几里路的地域，又开始筑工事，待完毕后，后面的一团又上前去筑工事，他们是这样的梯次前进。其次是我们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大多数不能使用，一般指挥员也不愿用，都把他堆起来休息，这是子弹缺乏的关系，虽然我们有兵工厂，但子弹出的很坏，不能用来打机关枪（因常有炸坏枪的事），同时亦很少，只能供给地方武装一部分（兵工厂现正在改良和扩大，其成绩容后再告）。

二、工农红军的本身问题

（一）政治领导与红三军的转变

1. 红三军自从到洪湖接受了国际路线，日渐的有了转变，但因为一回到洪湖时，没有开展和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没有把反中夏路线的斗争作为一个中心，深入到全体指挥员和战士中去，使红三军的改造还不能得到及时的大转变，自湘鄂西党的四次代表大会以来，克复[服]了反红三军军部的斗争和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最近反军阀制度残余和反游击主义的斗争的开展，使红三军在政治上日渐坚定起来，和一般指挥员及战士的积极性的提高，所以有了红第九师在应城的胜利（消灭第四师张旅全部），特别是红七、九师在钱家场的行动时，第七师师长王一鸣、政委陈培英同志接到军部的命令，知道了第七师的任务，但因晚间交通的关系命令迟到了。一鸣、培英即令全师紧急集合，第二十一团的政治委员陈少梅同志表示奇怪的来问紧急集合的理由，七师政委培英同志就与二十一团政委少梅几耳光，说：“你服从命令好了，赶快集合出发”结果，第七师完全按命令的时间到达了目的地，与第九师取得了行动的一致。获得钱家场消灭韩旅击溃四十一师之一部的大胜利，这种部队的积极性，是红三军初回洪湖在潜江几次的大战争所未有的事，所以有七天七夜持久的剧烈的战斗，是在中夏

路线领导下的二军团所绝没有的事。

2. 在一切斗争的开展和深入遂暴露了反革命在红三军中的活动和阴谋，有了正在开始大胜利的肃反工作（详省委的报告），这些是执行国际路线中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红三军大转变的成功。

3. 一般的说来，红军战士是分给了土地，但非苏区的红色战士还没有实现，但目前苏维埃政府对这一部的红色战士应马上分给以土地，现在苏区内每乡都有三十亩左右红军公田，每年收入交百分之五十与红色战士本人寄回家，百分之三十作为红军给养，百分之十存银行作为退伍时的耕耘金，全部交与红色战士处理。

（二）红军的编制与红军的教育及其政治工作

1. 红三军的编制系完全按照“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编成的，其不同的只有两点：第一是每排只有三班步兵，本来按编制草案无轻机关枪时，每排是应编四班以便在平时施行轻机关枪的教育。但因排长能力薄弱，不能增多了人和枪，连长也是一个样，能够带一百支枪的连长都很少。第二是各部处的人员因无技术品的关系有相当的增减。其原则上是一致的，同时因为苏区在水灾后，苏区群众百分之七十都逃荒去了，参加红军的较少，各团的补充营，各师的补充营没有成立、只是军委直属了三个补充团（实际上只有一营）。

2. 我们现刻还没有得着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的小册子，我们只是根据赤英同志口头的传达来编成的。这一编制在实际工作中在战斗中证明是适合于现时环境和作战的对象，特别是能增加相当的技术品（轻重机关枪和炮）时更为有利，更是增大了他的效力。

3. 现刻红三军中准备在军校的学生毕业后，各师警卫营，完全按红军编制草案武装起来，实行步兵班十名，每排三班步兵，两班轻机关枪班，（每班五人）共五班一排，每连三排（另一管理排，现时各部队已实行管理排，属军需、司书、交通、号兵、红旗兵等，特务长即管理排长）每营三连步兵，一连重机关枪，此种编制如以现时的轻机关枪计算是有多，重机关枪各师警卫营各编入六挺外，还不会妨碍现时各团机关连的存在。

4. 关于红军部队的教育问题，有下列几点：第一，每休息到了半天，就开始一般的军事政治教育，还是旧的注意形式的教育，还没有转变到以野实施和射击的学习为中心的现代教育方式；第二，是每次战斗后，收集其经验作为战斗讲评，但这一工作还是做得不充分，甚至有些部分还没有执行；第三，红军中一般的现象是不注意教育工作，以为只要勇敢冲锋就够了，中下级指挥员都不大讲求隐蔽，总是表现自己的勇敢。在北岸有次作战时，营长叫一个连长带的一排人要隐蔽，一般战士认为是怕死。挺身前进，还没有到达阵地，这排人已打死了过半数；第四，排连长指挥能力薄弱，每受到命令或出击时，不从战术上指挥部队，多半是叫一声跟我来，就带上去冲去了。虽然在几次战争血的教训中有点转变，但非常不够。

5. 关于红三军中的政治工作，在过去一个时期的政治工作，还没有抓住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和党的工作重心，完全是放在地方苏维埃工作，甚至代替了地方的工作，和军队中经济没收工作等，现在虽然转变了，但是对支部工作的领导还是不够，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已在部队充分的执行。个别的反政治工作和反政治工作机关的现象，还有他方面个别的政治工作人员还是继续国民党式的政治工作方式。如第八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所领导的政治工作是

这样。

6. 红三军枪枝约一万四千，鄂西北独立团、警卫团枪一千，地方武装和军校共三千枝。

7. 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参谋长孙德清；第七师师长王一鸣、政委彭之玉、参谋长赵艾；第八师师长段玉林、政委陈培英、参谋长吴舟人；第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孙子侑参谋长胡梯。

（三）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学校第二分校

1. 军校系六个月毕业，共有第一、二、三步兵连，第四连为特科连（炮兵、骑兵、工兵）；政治连，系办的短期训练班，共二月毕业。再有军事干部速成班系十个星期毕业，共学生六百名。

2. 军校除军事干部速成班外，其余均按红军编制草案的编制实施教育，教育计划系按中央军委一九三一年所通过之草案（此草案系赤英同志的传达）施行。

3. 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学校第二分校的组织，系按中央军委一九三一年所通过之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学校的组织条例所组成，军校实行校长制，校长下属总队长，指挥和办理全校学术科之下属军事总教员政治总教员（同时在政治部领导之下）帮助总队长办理实施全校军事政治学本抖，其次是政治部，设总务处、经理处、军医处等。

4. 军校校长唐赤英，政治部主任鲁易、副主任郑予明，总队长汤慕禹，军事总教员李人一，政治总教员周治福，校务主任龚杰。

（四）湘鄂西工农红军军事最高领导机关

1. 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的建立，主要的建立参谋部工作，自一九三一年三月到现在参谋部工作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赤英同志在三月底离开洪湖，参谋部就渐次缩小一直到取消，后来又只找一二人工作。赤英同志在同年九月回湘鄂西苏区，又开始建立参谋部工作，不到一月赤英又离开参谋部到襄北，一直到今年三月才回参谋部工作，同时参谋部本身各种工作又没有人工作，今天说来参谋部工作非常不健全，最主要的第一科（作战教育科）没有人负责，赤英同志常忙干事务的应付工作，而放松了许多主要的工作。目前军委建立参谋部工作是主要问题，但这一主要问题还没有引起军委的重视。

2. 军委的组织问题，我们有这样的意见，现在是以五人所组成的主席团制，我们在工作中总是不便利，发生许多的问题，如德昌几次提出没有集体的领导，因为五个主席只有夏西、万涛同志在后方，其余均在前方，并且总主席关向应同志又在前方，赤英同志有这样的提议，只要一主席两个副主席，一个副主席是政治部主任，一个是前方最高军事负责同志，这样使工作更加便利，赤英这个提议还未成为整个的意见，你们以为如何？请复。

3. 红四方面军与红三军配合后，并且得到了相当的巩固，这时湘鄂西的红军是否马上就统一在一个军事委员会领导之下工作，如是必需的则湘鄂西的地方武装问题，是否可由省苏维埃政府下组成一省军事部来领导湘鄂西全省的地方武装。

4. 军委的委员系关向应、贺龙、夏西、崔琪、段德昌、万涛、唐赤英、周容光、段玉麟、孙德清、周美童，主席团系向应、贺龙、夏西、段德昌、万涛，军委参谋长赤英，军委政治部主任鲁易，现准调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军委政治部主任，由夏西同志担任。

（五）五鹤峰的工农红军

1. 五鹤峰的红军——独立团自从赤英同志到五鹤传达了国际路线后，独立团即开始执行国际路线，但五峰的下级党部县委对土地革命怀疑，不去发动群众起来，为土地利益而奋斗，因此在执行国际路线还没有开始即遭受到打击，遂退到桑植、鹤峰边境，枪枝一部分的损失，后来经过了一个斗争，开始了国际路线的执行，击破了敌人的一方，恢复了鹤峰政权，缴敌械一营，迫击炮二门、重机关枪二架，步枪增至一千二百支左右。

2. 现时独立团的发展方面，是向东南发展（石门、长阳、桑植一带），他们已经积极的在活动。

3. 独立团在军事政治上的领导都非常薄弱，省军委亦准备派人去加强。

（六）鄂北工农红军

鄂北工农红军，我们没有得着他具体的材料，但他目前得到一胜利，缴得敌械一营，鄂北苏区是能渐次巩固起来，方复生同志（从上海来失掉了连[联]系，他单独来的），准备派往鄂北加强他们的工作。

三、地方武装问题

（一）全湘鄂西共分五个军区，中部军区系监利、酒阳，南部军区是江南，东部军区是天汉、川阳，北部军区暂不设，西部军区为荆门、江陵、潜江，现刻各县有一警卫营和各区游击队，并准备各军区另组织一团（主要的军区）作为活动的力量以突击敌人。

（二）水灾之后，游击队虽然有相当发展，而广大群众的地方赤卫队的组织和训练，却是完全停顿和取消了，同时过去一般的是用“编”的强迫办法，这样只是通知上名册上的工作，不去从群众切身利益上经过党团、工会、苏维埃、贫农团、妇代会以及各革命组织作政治上的总动员，号召广大的劳动群众起来，为了保障春耕春收、平分土地和堤工等切身利益得着实际保障起见，而志愿的加入赤卫队和少先队的组织。自然建立地方武装时，我们应严防反苏维埃政权（富农、富商等）反动动摇分子的混入，作详尽的审查，并作成分上的统计，编成后应于相当时间作一检查。

（三）凡未加入赤卫队和少先队的，就号召他们加入警卫队，担任守卡、放哨的工作，警卫队队长之职是由赤卫队支[部]队长兼任。（四）在赤卫军和少先队中选择自愿参加红军准脱离生产的，系组织在红军补充军内训练，使随时可调动补充红军，这种组织现时各县还没有，参加红军的只是临时征集和号召。（五）赤卫队的组织以支队（一乡）为单位的每十天训练一次（时间两点钟到一天）；各分队（一排）不限时间，在工作后随时可集中训练；至于每区在每三个月会操一次。各县军事部长须尽量参加领导。（六）一般老头、妇女号召加入警卫队专任守卡放哨之责，但重要关口是组织游击队担任。（七）各县苏维埃政府设军事部管理和指挥全县地方武装，和区属纵队部，各纵队属若干支队，连系以乡为单位，每支队二至四分队，每分队二至四班。

湘鄂西省委五

月二十八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夏西即夏曦，下同。

中央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反对敌人“进剿”给各军的任务
(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

各中央局：

敌人对于进攻苏区的计划已经有了亲的布置，蒋介石自任鄂皖豫“剿匪”总指挥李济深为副，胡宗南第一师已调安庆出合肥，徐庭瑶第四师坐镇蚌埠防止红四军进占安庆，并保持津浦路交通，目前利用全力向湘鄂西苏区进攻，预备击破这一方后转向红四军后防进攻，调往汉口得力军队为八十八，四十七，五十四以及川军三十六团，对于中央苏区，蒋系仍在吉安、吉水、万安、泰和、遂川、安福一带，共有七个师，保持赣江流域，抚州、南丰一线有四个师，这两线军队一方面相互呼应向兴国、庆昌、宁都苏区进攻，另方面同湘军、粤军联合包围湘赣苏区与三军团，闽赣剿匪总指挥何应钦近指定刘建绪为湘军总指挥，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陈诚为赣军总指挥，预备完成这一任务，入赣粤军有两军两师仍在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南雄一线，入闽粤军有三个师以上，仍在上杭武平、永定三城，福建方面已指定十九路军蒋光鼐为总指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认为：

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安，同时应以一部分兵力牵制临[川]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红十二军应向闽北发展与赣东北苏区打通，并留一军力量于闽南，防粤军深入，赣东北苏区应首先与闽北苏区联系一片，并向南发展与经十二军配合行动，在皖南应该发展最广大的游击运动，湘赣苏区除与三军团配合行动击破入赣粤敌巩固与发展赣南苏区外，一八两师应积极在永新、莲花、宁岗、遂川、萍乡、宜春、安福、万安、吉安、泰和一带积极活动，牵制中央军以援粤部队。

湘鄂赣十六军主力应加紧在鄂东南，尤其应该在崇阳、蒲圻、咸宁一带活动响应红三军与红四军，破坏武长路线的交通，并阻止汉口援赣部队的移动。

湘鄂西红三军除以一部分兵力巩固洪湖根据地外，主力应积极在襄北发展，配合红四军消灭徐源泉，肖之楚主力，造成鄂中一片苏区，与鄂豫边苏区打成一片。

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苏区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苏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京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京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苏区，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吓[胁]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

此电望各中局与军委讨论电复。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解散江陵县委及开除侯蔚文党籍决议案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二日)

一、省委认为江陵县委，完全是违反省委屡次决议和指示，执行机会主义的路线。主要的表现：（一）迟延平分土地；（二）熊口、汪家桥、徐李家场、龙湾均有公开的反革命派别活动，但县委没有号召群众与之斗争，破获其组织；（三）最近县委公然提出是否允许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回家问题，与省委驱逐反动家属出苏区决议完全违背；（四）在敌人这次进攻的时候，没有抵抗就放弃张金河，接连放弃徐李家场，完全是十足的逃跑主义。二、省委认为江陵县委这些政治的错误，是帮助反革命进攻苏区的行为，而且经过省委屡次书面及派人去纠正，迄今未改。在此情况之下，一分钟也不能迟延的解散江陵县委，常委的徐云久，陈俊，肖子如三同志即调来省委谈话，不许留在江陵。三、省委特指走李家芬、丁涛、王国祥三同志组织江陵组织委员会，代替县委一切工作。四、侯蔚文是江陵县委过去的主要负责者，这次经省委派去江陵指导工作，并要注意肃反，但他领导县委却提出是否允许豪绅回家的问题，而且对肃反毫无成绩。在敌人进攻苏区，又领导县委逃跑，放弃苏区，完全是阶级异己分子的行动，应立即开除侯蔚文的党籍。五、省委委托组织委员会召集各种会议，号召真正的共产党员起来揭露江陵党中一切工作中的错误，在两条战线斗争基础上与“左”、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六、省委公开指出：江陵党内必有反革命分子暗藏在内，我们一定要号召党员和一般工人，农民，红军与游击队坚决起来，为彻底肃清苏区反革命分子而斗争，首先给那些回苏区的豪绅地主以群众的赤色恐怖，镇压他们破坏苏维埃政权的企图，这是击破敌人“围剿”之先决条件。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同湘鄂西反革命团体斗争和纠正肃反中错误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

一、湘鄂西苏区在过去立三路线的时候，党实际上执行十足的富农的机会主义路线，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完全没有这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就掩盖了反革命的活动，如当时的洪湖军校就是改组派及第三党活动的大本营，胡慎己、刘鸣先、戴君实等反革命首领就在军校建立了他们反动的基地，江南之石首县委张阶吉、张鉴之，江左之江陵县委侯蔚文、陈俊，这些国民党改组派、托洛斯基派先后混入苏区，进行反革命活动。

二、自从四中全会以后，国际路线传达到了湘鄂西，苏区开展了阶级斗争，发动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地主与富农分子看到自己地位的根本动摇，便团结他们的力量，破（坏）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企图推倒苏维埃的政权，恢复旧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特别在水灾以后，以及国民党的一、二、三、四次“围剿”中，更其加紧他们的活动，最明显的是在去年省委扩大会议，反革命派别与党内个别的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万涛同志向国际路线的中央分局进攻，以及在红军当中离间挑拨，破坏军事计划，设法使红军脱离根据地，反对军委、军部的领导，最后并企图在红军中举行反革命的暴动。在苏维埃中破坏苏维埃的土地经济政策，特别是破坏灾民斗争，其目的就是破坏中农、贫农的利益。

三、省委认为在苏维埃红军力量 XX 发展的时候，加 X 了苏区内和全国 X X 的阶级斗争，反革命阴谋的扩大是丝毫不足为怪的。有一小部分的老党员老干部变成了反革命派别的中坚，一部分留在党内立三路线者罗章龙派，加入了改组派的联合，这也是阶级斗争剧烈化反映到党内的结果。我们现在在地方党的组织中在红军中所捕获的改组派，首领百分之九十是地主、富农分子，这就证明反革命派别是地主、富农企图复辟组织而成的。工人、贫农、中农分子之加入不过是被欺骗被压迫而加入的。

四、因此、反革命之破获洗刷，不是削弱了党，不是削弱了干部，而是洗刷出不执行决议故意捣乱之分子，这是 X X X 苏维埃运动 X X 之一绝大胜利，如果认为肃反是削弱了党，这是对肃反不坚决的机会主义的观

五、X 认为肃反是一种阶级斗争的任务，不要 X X 以党与苏维埃的一种军事的、刑事的、法律的、组织的方法，完全消灭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就能破获其全部组织。因此今天的肃反，绝对要反对立三路线的审判，秘密的逮捕 X X X 以后就杀了，使群众也不知道反革命是什么，形成一种恐怖状态。今天的肃反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同苏区的反革命团体作斗争的决议，造成群众的肃反运动。在这里，省委要指出，在此次肃反过程中，有时候放松了执行党的正确的原则，表现了立三路线的残余，如对于成份的分别及号召群众肃反、号召被欺骗被压迫的分子自首做得不够。X 于 X X X X X 说法，是以为 X — X 人均非用非刑不可。现在必须坚决的纠正肃反的立三路线的残余和反对对于肃反的右倾机会主义，才能 X X 肃反的群众运动，应该 X 定党深入群众的 X X ，即是肃反斗争开展的过程。

六、肃反的 X X 原则，便是很明确的阶级路线，对于工人、贫农、中农分子，必须用教育的方式，不许施以拷打和杀戮（反革命首领是除外），这样才可以在群众面前表示出党与苏维埃和反革命派别的阶级本质，才可以动员广大工人，农民群众与反革命派别作斗争。

七、肃反的第二个原则，应该发动极广大的工人、贫农、中农、红军、游击队员大家起来肃反，进行广大的宣传鼓动，唤起大家的注意，激发阶级的仇恨，在各种××上各种会议中揭露反革命活动的阴谋的事实以及各地肃反消息，关于这个工作我们做得非常不够。第一是宣传的材料不具体，各地且仅仅是××的披露，还没有能将反革命团体（改组派、第三党、AB团、托洛斯基派）的政纲与共产党政纲×各别的强加宣传、造成群众的掩护共产党、反对改组派、第三党的×确认识，还没有能将每一个反革命份子在党、苏维埃、红军、工会中所做的罪恶详细揭露。第二，《红旗日报》、《工农日报》对于肃反的鼓动工作还做得不够，肃反的消息、群众的消息很少披露，还没有形成一种尖锐的阶级仇恨……，因此现在仅仅是自上而下一批一批的逮捕，还很少自下而上一批一批的举[揭]发和自首，这是目前肃反工作最大的弱点。

八、在肃反的过程中，须大大的动员群众进行肃反的斗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及大×提拔新的工人、贫农及最××的中农干部，把肃反工作成为一切工作的推动×，为了修堤、春耕、平分土地而斗争，为了参加红军保障红军给养而斗争，为了彻底×川军鄂×的“围剿”部队而斗争，特别要拥护红三军这一次消灭川军的胜利证明肃反的胜利，特别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这一总任务，在党、苏维埃、红军中、工会、青年团、济总，根据省委肃反第二次报告大会，召集各种会议，在这一切会议中，不是空谈式的报告，而是要检查每一机关、每一支部、每一运动工作，检查每一个人的成份，坚决的把一切阶级异己分子从党内苏维埃内红军内洗刷出去。检查每一机关、每一支部的实际工作，×××的自我批评，开展反××××的斗争，加紧工作的计划，只有这样，才能使肃反××转变为广大群众的××肃清反革命，×肃清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涌现出新的积极的干部代替××××反革命分子和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干部。

九、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处置，要从阶级的立场去处置，号召工人，贫农××分子为首，次则把其主要者与被动者分开，坚决的××阶级异己分子的首要，如反革命团体的领袖和反革命中最积极最狠毒的分子。××按照苏维埃法令×命活动，去帮助苏维埃肃反工作，可准予自首。对于工人、贫农、中农分子则完全××教育方法为原则，组织训练队、生产队，使他们了解自己的错误。

十、再重复的说：决不是每一个犯错误的就是反革命派别，因为不能以逮捕代替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党内、工会内、青年团内的阶级教育工作。

十一、省委责成政治保卫局和革命军事法庭，纠正在肃反中的个别错误，并从速筹备举行公开审判。省委号召全党组织，要把肃反运动转变为极广大的群众运动，要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在红军当中要利用这次肃反与战胜川军的两大胜利，把群众的积极性提到最高限度，以准备在××××××川军的完全胜利。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开除潘家洵党籍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

省委讨论了潘家洵的反党行动及其最后的申明书以后，一致通过了下列之决议；

一、潘家洵是一个十足半托洛斯基主义的立三主义者

他自从到湘鄂西以后，常常企图以半托洛斯基主义的立三路线来反对国际、中央、中央分局所执行的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有下列具体的事实：

(一) 在平分土地问题上，潘家洵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到湘鄂西苏区，×主张由上命令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不必发动广大的××群众，得到其愿意和拥护，不必顾及中农的利益，以为不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就是机会主义，以为没收地主及大私有者的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农、中农和没收与分配富农的土地，就是机会主义的阶段论，而且主张没收富农全部土地、财产（见潘家洵起草的监利四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后来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时，他认为平分土地已经完成，应该进一步提倡小的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场，这种主张，实际是掩护当时阻滞不平分土地的富农路线，富农路线正是当时的主要危险。一直到今年，省苏土地部联席会议，他主张组织劳动组合及集中私人的牛与犁牛站。去年他又发明所谓租田政策，来代替苏维埃贫农、中农的解决灾荒的任务，向富农投降。

(二) 在经济政策上，在中央分局扩大会，在省苏经济联席会议（去年），他主张限制物价，集中供给，垄断贸易。一直到今年，他和栩栩所领导的省苏经济联席会议，还是主张垄断贸易。

(三) 在苏区巩固的发展的问题上，在去年六月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时，他认为军阀混战已经爆发，主张红军极力向外发展，反对当时中央分局肃清内部白点、巩固苏区之主张。后来在水灾以后，在红三军主力向襄北发展的时候，他主张三军只留一个中心部队，其余分散游击，在沔阳要栩栩向省委提议将红三军分散游击，在省委主张派人去监视军部的领导。一直到今年省四代表大会时，他主张所谓波浪式的推进，主张红军分散到各地，帮助各地的工作，来反对中央提出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这更暴露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四) 在革命发展的条件的的问题上，他把革命的动力、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农民的革命作用、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的力量、党的领导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都看成为一钱不值，而发表有钱、有粮、有人的市侩主义的纲领。

综合以上的事实，潘家洵的政治立场，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工农联合的观点、巩固向前发展的观点，党的领导作用的观点，在托洛斯基主义之下，掩盖着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正是立三主义的继续。

二、潘家洵公开的表现改组派的政纲

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潘家洵起草的省苏维埃劳工部的任务的通令，他这样说：劳工部的任务是解决劳资纠纷的。又说：劳工部是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使工人有参加社会活动之可能。这完全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政纲，企图把工农联合的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性，变成为资产阶级政权，这一件事，虽然在劳工委员会被通过，但在省苏一执全会时，受到严重的打击。

三、潘家洵是一贯的进行反对国际路线的中央领导的斗争的主动者之一。正因为潘家洵是阶级异己分子，是立三主义者，是瞿秋白派，所以自到湘鄂[西]来以后，继续不断的进行反中央、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在莫斯科对反立三路线动摇，回国后到湘鄂西苏区他就鼓动同志反对中央，说中央是周××、陈××两同志包办，说右派罗章龙派之形成是由于中央反立三路线的结果，说党内斗争帮助了白色恐怖，说中央排挤老干部，引用毫无经验之新干部。他同情于鄂豫皖苏区内立三主义者曾中生，而认为中央派遣四军政治委员不当，这一件事经过省委的严重批评并给以警告，派往洞庭区工作。他自洞庭区回来以后，继续进行反中央分局的斗争，与万涛同志领导省委扩大会议反对中央分局和省委，说中央分局是执行机会主义的路线，说省委的领导是调和派，这种反党的斗争，一直继承到党的四次代表大会，公开发展他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这些事实，证明潘家洵不仅继承立三路线而且继承立三派反国际、反中央的斗争，这种斗争是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的斗争，不是个人成见，也不是无原则的斗争，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四、潘家洵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团结了一切反革命分子

潘家洵在反中央分局的斗争中，利用了团结了苏区内一切反革命分子，现在事实完全证明，如刘革非、李良耀、戴君实、刘鸣先及其他改逆重要分子（暂隐其名）均团结在反中央分局的队伍中。在省扩大会时，在四次代表大会时，进行反中央分局、分军委、军部的斗争（这些材料现在还没有到完全公布的时候）。

五、潘家洵完全表现阶级异己分子的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当去年潘家洵公开表示反党时，省委给以劝告，希望他了解自己的错误，但他丝毫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当他要到×××去的时候，他声言不顾党的允许与否，便×行。庄东晓同志的××××，在四次代表大会时，他在被揭发他的整个错误以后，故意装在发急症向大会示威。在大会以×，完全××怠工。在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经过省苏党团屡次与之斗争，经过各县扩大会议要求他承认错误，最后经过省委组织部给以劝告，始终不承认错误。

六、在肃反以后，潘家洵的承认错误是虚伪的

潘家洵在肃反报告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承认错误，完全是圆滑的态度，说：“谁知湘鄂西有这样复杂”，“我过去不满意夏曦，不应该斗争，只应私人谈话”，“今后大家一致肃反，再不要斗争了”。这完全是企图解释他过去，因反对国际路线，而反对夏曦的领导，为是对个人的不满，同时企图在一致肃反口号之下，取消党内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不是承认错误而是向党进攻。一直到最后的申明书还是不彻底的揭露自己的错误，如对于租佃政策，认为是别些同志的情绪，对于他是立三主义者、秋白派则完全否认，然而这还不是主要的。他对崔琪同志说：“现在在肃反当中，我什么错误都可以承认”。表现他在肃反当中的恐惧失措来承认错误，而不是彻底揭露和了解自己的错误。

七、潘家洵已经是不可教育的阶级异己分子

潘家洵是一个受过无产阶级教育的学生，是地主的儿子，在党内一年以上的大的转变中，他固执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路线，继续在反对中央的斗争，至一年之久，经过党的大会的批评及湘鄂西各县扩大会议的批评，也不承认错误，应该开除他的党籍。

八、省委在此要揭露万涛同志对于潘家洵问题的错误

在去年省委讨论潘家洵问题时，万涛同志一言不发，完全不表示态度。在省委一致决议以后，万涛才在第二次会议上表示态度，软弱的批评潘家洵的错误，在省四代大会时，万涛同志开始也不批评潘家洵的错误，后来只说潘家洵是无原则的派别成见，是有一些反中央分局的斗争。万涛同志这种两面派的态度，正因为万涛与潘家洵同是反中央分局的领导者，省委要求万涛同志对于本决议表示书面的态度（因为万涛同志此时不在省委）。

九、省委最后指出在去年潘家洵由洞庭区回来的时候，旧省委并没有考查他是否改正错误，即派他担任许多重要工作（如起草省苏三代会各种决议），这是严重的错误。省苏劳工委员会通过了潘家洵的改组派的纲领，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四代会以后，省委没有要求潘家洵书面承认错误，对于潘家洵错误组织上结论的迟延，亦是错误的。但是省苏党团在一次执委以及省委组织部与省委的机关报对潘家洵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的，省委×在反对潘家洵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要在每一个机关、每一个支部的实际工作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样才能争取彻底战胜内外反革命的进攻，才能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此处约缺十个字。

中共宜昌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军事形势与反“围剿”斗争情况、交通问题”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

中央：

现把川军对湘鄂西苏区“围剿”及我们最近工作，概略的报告如下：

一、川匪这次配合鄂匪向湘鄂西红军苏区作第四次的“围剿”，共计出川兵力有三十团左右——王方舟师、范绍增师、二十一军独立一旅、独立十一旅，佟杨二独立团，川鄂边防军等。这次出发前线，向红三军进攻者约十二团人，共分四路：佟杨二独立团由监利向洪湖进攻；郝穴、普济观两团向江陵、监利交界之余家埠进攻。这两路是牵制天门、潜江一带红军的。范绍增亲自率三团一机关营，由江陵之张金河、浩子口向潜江推进；郭勋、张华封约五团人由石灰桥、后港、沙洋一带向潜江猛攻。

最近红三军的积极行动，在应城、天门、潜江一带，给敌人张振汉、肖之楚以严重打击后（张振汉、王金镛旅受一团以上的损失），即掉转来给川匪以迎头痛击（在监利、普济观一带作战的详细情形我们不知）。九师在潜江、蚌湖与郭勋、张华封部激战两昼夜，消灭其部队二团人，缴获步枪千余支。七师在潜江浩子口与范绍增部作战，消灭一营人，夺得机关枪七挺，范绍增肩上与臂部伤两枪。现红军已占领荆门城。郭勋部已败退守丫角塘，张华封退后港，范绍增回沙市。连日川匪在沙市收容残兵败将，伤兵运回沙市者千余人。红三军这次新的胜利，对川匪给了一个空前的打击。

二、我们最近工作与布置情形：在敌人四次“围剿”苏区时，江北之当阳工作，因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不相信群众，不积极的引导群众，实行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阶段遭受川匪民团千五百的武装的严重压迫，县委即行逃跑。现已检阅出当阳工作的错误，重新讨论，以河溶为中心，去恢复陈家场、孙家场、草铺、马山等处工作。荆当（荆门西区与当阳东南区合组而成）县工作，在敌人开始进攻苏区红军时，已建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有四个区革委会），对平分土地的工作尚未充分的了解与执行，准备六月三十日举行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县苏维埃政府。荆当工作以周家集为中心，向石灰桥、后港推进，与荆南苏区取联系。省委在川匪进攻潜江苏区时，已将红三军独立团派来荆当工作，他们最近配合荆当第一游击大队和荆当群众力量，已经攻下涪溪河、脚东港、蒋家集等处。特别是前天进攻当阳河溶，震动了荆沙反动统治（川匪马上准备开一团人到河溶）。枝宜（枝江与宜都合组而成）县工作，目前较有发展，已开拓了横直五十里的赤区，他们的工作以横溪河、陈家院子为中心，向董市、鸦雀岭（宜昌）、涪溪河（当阳）推进，特别是独立团攻下河溶后，动员枝宜的游击支队与枝宜的广大群众向当阳之草铺、孙家场等处积极行动，向独立团取得联系，并帮助当县恢复草铺、孙家场等处工作。江南的松枝县委（松滋与枝江合组而成）的工作，以沙米区为中心（沙道观、米积台）向澧市、宜都城推进，并尽量向渔洋关发展与湘鄂边苏区取联系。动员第二大队配合群众积极行动，扰乱与袭击江陵捕河与澧市等处敌人，来牵制进攻苏区的川匪。公安工作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一直没有转变，现已派同志去根本改造公安党，加紧发动群众分粮斗争，并配合公安游击队，到斗湖堤与郝穴对岸等处尽量扰乱，来牵制郝穴的川匪。宜昌工作从三月二十五日特委机关破获与四月二十九日宜昌县委被捕后，宜昌城市

工作即行停顿，乡村工作还是存在。现已派同志去整理与恢复宜昌工作。特委机关经这次破获，已暂迁移沙市。从特委来沙后，沙市工作已有相当发展（由三个同志发展到二十五个同志），纺纱厂、车夫、木匠等部门已建立了党的基础。

总结宜昌党的工作，还陷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还不相信与坚决发动群众斗争，来武装群众平分土地建立政权，在政治上个别上还深刻的表现着各种自由主义与调和态度，同时“左”的军事冒险、盲动情绪与关门主义，在党内还有部分的存在与发展着，但是主要危机仍然是右倾危险。

三、目前我们工作的开展，在干部的分配上的确感觉得万分缺乏，尤其各县游击运动的发展，军事干部特别需要。我们向中央请求，是否能调二、三个军事干部来帮助我们的工作。

四、交通中站的工作：蔡士材同志已于六月十二日在松滋米积台被捕（他是建立省委关系去的），现已解公安，他没有旁的口供（只说是卖土的），现正设法营救，是否能够出来，尚不能预料。对于中央交通中站的工作，如果是蔡士材不能出来时，我们准备了一个同志，已经马上去调，下月中旬即可建立完善。

目前我们对省委的交通线，因川匪由张金河，郝穴等处进兵，已经断绝。现川匪退回沙市，我们已派交通到张金河去了，马上即可转来。中央派来到省委四个同志，我们当设法送去。

我们到中央的交通，目前只能供给一个，其余两个，我们在尽量物色。

宜昌特委

六月二十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失败之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在进攻中得到了空前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全中国革命运动急速发展的基础之上获得的，这一胜利更给了全中国革命运动以有力的推动，使全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加尖锐化。

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即是中国工农民众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胜利，即是中国民众对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最有力的回答。这一胜利，使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形崩溃动摇。这一胜利的继续发展，无疑的将根本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使中国数万万劳苦民众继续遭受压迫、剥削与屠杀，为了要使中国完全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中国民众变为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奴隶与顺民，为了要造成全中国更大的经济浩劫与水旱灾荒，以至为了要造成进攻苏联的巩固的后方，自然不能不更疯狂般地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行新的“围剿”。

二，国民党的四次“围剿”的正式开始，依照全盘“围剿”计划，而开始积极行动，是在它出卖了东三省，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国际联盟调查团“详细调查了”南京、汉口、平汉与津浦路之后。在这一“围剿”开始之前，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中间曾经有过不少的协商与谈判。这一“围剿”的组织者无疑的是世界帝国主义者。

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发展前面表示了绝大的恐怖。它们认为如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现在对于如火如荼的“赤祸”在目前不加以打击，“那一年之后，共产党的中国将变为实际的可能”。所以它们主张“必须以有效的方法去抵制它们，必须不顾一切的代价去应付它们”（见六月十五日《大美晚报》评论）。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它们以大批的军事顾问，大批的军械去供给“剿赤军”，它们愿意国民党以停付一年外债的二万万元，去做“剿赤”的费用。它们利用一切它们政治的、财政的、军事的力量，动员国民党军阀去一致的进攻苏区与红军。没有帝国主义这些作用，国民党的四次“围剿”是不可能的。

为了要更进一步表示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与它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作用，为了要取得帝国主义对于它的欢心与信任，国民党必然要更积极的更凶恶的向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攻。只有继续积极的无耻的出卖中国，向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攻，国民党才能得到帝国主义的拥护，维持它自己的统治。

三、为了要用一切力量去进攻苏区与红军，为了要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做决死的斗争，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现在又决定蒋介石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向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进攻了。蒋介石的中心部队，现在都向汉口与蚌埠输送。胡宗南的第一师，已经开到安庆、合肥，徐廷瑶的第四师则在蚌埠与正阳关一带，蒋鼎文的第九师则正在从浙江调往皖西。开于汉口的已有俞济时的八十一师，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郝梦龄的五十四师，卫立煌的第十师，蒋伏生的八十三师。同时川军除已有三十六团外，还正在不断的向湘鄂西开拔。总计现在云集在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周围的军队有三

十师以上。

在长江以南，在闽粤赣湘四省内，南京政府用尽种种方法与粤方妥协，集中兵力，向闽赣、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进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南京政府曾任何应钦为“闽粤赣围剿总司令”，陈济棠为副司令。在湘粤赣三省边，何应钦已指定刘建绪为湘军总指挥，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陈诚为赣军总指挥，协力向湘赣苏区进攻。十九路军各师已经开到闽西，协同入闽粤军向闽西苏区进攻。第八军的赵观涛已被任为“赣东北剿赤总指挥”，向赣东北苏区进攻。总计目前敌人方面进攻闽粤湘赣的部队已在二十五师以上。

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了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做决死的斗争，已经动员了它所有的中心部队向着各个苏区进行它的四次“围剿”。

四，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四次“围剿”，显然同三次“围剿”有着很大的不同，帝国主义在这一“围剿”中的作用是大大地增加了，这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庐山会议与北平会议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更进一步的出卖中国，更能得到帝国主义者的助力，去进攻苏区与红军。参加作战的军队，比过去三次“围剿”增加了一倍以上。粤军、湘军以至西北军（如刘镇华，商震等军队），都被动员，参加战争。“围剿”的范围也愈是扩大，战线从广东一直到河南，从福建安徽一直到湖北四川。国民党是更其拼命的，残暴的，凶狠的向着苏区与红军进攻了。

但是，最主要的是在三次“围剿”与四次“围剿”的中间，存在着全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大风暴，扩大到十八省的水灾饥荒，空前的国民经济的浩劫，工农兵以及灾民难民的斗争的伟大发展，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一切这些不能不使这一次的“围剿”比较第三次也更为困难了。

四次“围剿”的最大困难，是在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大大削弱与工农民众革命力量的大大增加。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首先表现在它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武断宣传范围的缩小，自“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真面目，与它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的作用，是更为全国民众所了解了。国民会议，国难会议，以及国民救国会议等把戏，已经完全宣告破产。对于救济灾民，振兴实业，开发水利等等的欺骗，完全为铁的事实所粉碎。因此虽是国民党现在正在利用一切方法散布“发展匪区农业”，“建设匪区道路”，“改善农村经济”，“抚绥流亡”等的欺骗宣传，而且主张“大部分要在政治上解决共匪问题”。然而这一切，很少能够在政治上动员群众去进攻苏区与红军了。因为民众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出卖中国，造成全中国国民经济的浩劫为水旱灾荒的，完全不是“共匪”，而是国民党的统治！

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许多反革命派别如象第三党、“社会与教育派”，等对于这一次的“围剿”表示怀疑与悲观，他们认为“不发展匪区经济”，“不安定匪区民生”，“匪”不但是“剿”不完，而且将愈“剿”愈多，甚至有人主张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建立“民众武装，民众政权，以发展农村经济”，以根本消灭“共匪”（见第三党《民众导报》十五期），更有人认为在目前“对外重于对内”，故主张“如共党肯放弃暴动政策，一致对外，则共党可以合法存在，红军可以改编为国军（《新创造》第一期）。这类武断宣传，现在差不多在很多报章杂志上，都经常的发表出

来。他们一致的目的，是在用更聪明的方法，在政治上准备进攻苏区与红军，用更狡猾的方法来欺骗民众，说破坏民生，破坏经济，帮助帝国主义者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好这样来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这些武断宣传也很少能引起民众的同情，因为事实证明，只有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我们才谈得到经济上建设，真正能同帝国主义实行民族的革命战争。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其次表现在他的财政的深刻的破产。即以南京政府每月军政的经常费而论，即有一千二百余万元的不足。在“围剿”时期，这种费用的大大增加，是毫无疑问的。即如收买十九路军军官，把十九路军兵士运往福建，就须用去五千万。那这一费用的浩大，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收入的来源，当然除了借债之外，非拼命剥削民众不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无奇不有的苛捐杂税，正在一天天增加。一切教育费，堤工费，赈灾费等，现在都一齐搜刮来作为“围剿”之用，甚至为了“围剿”更进行对鸦片公卖。

然而全中国的经济的浩劫，与普及全中国的灾荒，以及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残酷的剥削，使全中国的民众大批失业破产，流离死亡。在这种形势之下，不论国民党如何敲诈剥削，然而收入的日益减少，已成为经常的现象。而且全中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三千万人口的东三省已为国民党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那里海关一项的收入，每年有四千万元。国民党财政的毫无出路，已是再明显没有的事了。国民党一切“开源节流”的方法，只会增加广大民众的新的担负，和它们对于国民党的愤恨与反抗。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第三，表现在国民党武装力量的崩溃动摇。因为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影响，因为它们本身生活的痛苦，在国民党军队中经常发生士兵反抗官长，要关恼，要清算伙食帐，要改良待遇的斗争，大批的哗变投入红军的事，已经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尤其在邻近苏区的白区中。工农红军在国民党士兵中有着绝大的影响，他们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是正在增长着。更大规模的兵变潮流还在前面。在国民党调动的七十万士兵中间，真能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肯拚性命同红军作战的，当然是少数。

最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还表现在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涣散与冲突。虽是苏维埃与红军的发展，使地主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一致的团结起来，向苏维埃与红军进攻，使它们内部不能发生大规模的军阀战争，而且常常在加紧进攻苏区与红军中来解决它们内部的矛盾，然而，它们内部的冲突与矛盾还是存在着。在苏维埃革命怒潮前面，它们表示了张皇失措。它们自己也不相信，它们能够战胜工农红军与消灭苏维埃运动。孙连仲、李鸣钟、陈调元部队的覆灭，已经给了一切“剿赤军阀”以最大的教训。它们在“剿匪”中都想牺牲别人，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它们内部的指挥，是不统一的，这次蒋介石的出动武汉，并没有引起各方的拥护，而且粤宁的冲突，正在新的方式中开展起来。

五，然而这次“围剿”的最大困难是在于工农民众革命力量的大大增加，首先是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

自从三次“围剿”之后，闽赣苏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巩固。赣南的上犹、崇义、南康、信丰，福建的宁化、清流、上杭、武平、龙岩都加入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红军在作战中间，扩大了一倍的数量，补充了一、三军团，创造了新的五军团。在漳州的占领中间，击溃了张贞的六团与陈国辉的三团，在军火上给养上都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鄂豫皖的红四军对于敌人在“九一八”之后所布置的“围剿”采取了积极进攻的策略，在鄂东方面，占领了黄安城，消灭了六十九师赵冠英全部，击溃了李鸣钟、萧之楚、夏斗寅各师。在豫南方面，占领了商城、固始、潢川等县，消灭了白军第二师，击溃敌人五六师之众。六安、霍山、霍邱、正阳关的占领中，把陈调元、岳盛宣、王均等主力，完全消灭。最近在豫南方面又消灭了部子举的新二十师与张钊的全部。第四军已扩大为四方面军，人数亦有一倍以上的增加，鄂豫皖苏区已完全打成一片，得到了绝大的扩大与巩固。

其他在湘鄂西，在湘赣，在赣东北等苏维埃与红军都有很大的发展与巩固。红二军在鄂中天门、京山、应城一带，曾经消灭了徐源泉一旅萧之楚的一部，缴得了敌人机关枪二十余架，步枪千余枝。在六月初，在潜江一带更击溃了川军张邦本郭勋两旅，范绍增师全部，夺获步枪二千五百，机关枪三十八，迫击炮十五门。

英勇的工农红军在与敌人长期的作战中间，在击破帝国主义国民党三次“围剿”之后，已经得到了丰富的战斗的经验，走上了铁军的道路。在各苏区内，一般的都正确的解决了土地问题，肃清了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的反革命，转变了苏维埃与红军中的工作，加强了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与红军中的领导。党在群众中的权威与信仰是大大的提高了。群众对于自己的力量信念，是更其坚决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更给了各该区以总的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

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作战的红军，已经不只是江西的一部分，而是所有的红军，还有成千成万的赤卫队，少先队与童子团，都加入了战争。战争的区域，已经不单是江西，而是福建、广东、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省。作战的区域，已经不在苏区旧的根据地，而在新的苏区了。红军的行动，比较以前更有集中的领导，更能互相呼应地向敌人进攻！

在全中国的民众中间，苏维埃与拥护的权威，民众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信仰与拥护是大大的提高了。党所领导的拥护红军胜利的运动，在群众中尤其是工人群众中已经得到热烈的反响。大批的工人，要求到苏区去，参加革命战争。千千万万的工农劳苦群众很快的了解到苏维埃与红军是全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苏维埃政权是他们从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铁蹄之下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

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四次“围剿”中的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同三次“围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力量已经有了百倍的增加。

六，在非苏区内，反日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达到了更高的阶段。这一斗争，现在已经不再是向国民党政府的请愿，不再是以学生为中坚的罢课与示威，而已经是工人的罢工与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进行了。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正在东三省很大的开展起来，这一反日战争当然同时也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与反国民党的战争。

工人阶级的罢工怠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与反对中外资本家的斗争，正在全中国开展着，斗争从轻工业一直扩大到市政、兵工厂、轮船、铁路与矿山，从一厂的扩大到几厂的以至一业的全同盟罢工。工人阶级的觉悟

程度是大大的提高了。农民灾民的斗争，从抗租抗税，分粮抢粮，一直到同国民党军警与国民党的武装冲突。兵士的斗争与哗变的潮流，正在加速度的开始。这些斗争正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之下，发展到游击战争与新的苏区的创造。陕甘边苏区与红军二十六军的创造，燃烧起了北方苏维埃的火把！

革命危机在全中国是存在着。在这一革命危机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是大大的增加了。苏区的扩大与巩固是在中国共产党唯一领导之下而成功的。苏维埃区域内将近一万万的工农群众，相信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热烈的拥护着中国共产党。即是在非苏区内，广大的群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正确，而同情共产党，拥护共产党，要求共产党的领导。

为全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斗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虽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的白色恐怖之下，进行着坚苦工作，虽是为着反革命派别所造谣污蔑，然而它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在执行共产国际正确的路线之下，已经大大的扩大与提高了。这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得到胜利的唯一保障。

全中国汹涌着革命的怒涛，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冲击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的最后的堡垒。这一怒涛，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发展，互相呼应着，从这一怒涛中正在涌现出新的苏维埃区域！

七，清楚的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之后，我们可以断定我们不但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而且将从新的胜利中取得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我们必须最严厉的打击那些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这一“围剿”前面，表示张皇失措，对此无疑地是对于革命力量没有信心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动摇。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与忽视这一“围剿”的特殊意义，以为不过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照例的进攻，以为苏维埃与红军照例可以得到胜利，而不去动员一切力量，去反对这一“围剿”的“左”的机会主义做斗争。

我们必须最明确的看见，同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冲突的阶段是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的前面放着最伟大的历史任务，打倒帝国主义的任务。

国民党这一次的失败，必然会使帝国主义者不再相信国民党有征服“赤祸”的能力，必然会亲自出马，动员它所有的一切海陆军同苏维埃与红军作战。帝国主义者在目前已经调了大批的军舰与陆战队在中国沿海与沿长江各口岸，准备着直接的武装干涉，这种干涉在东三省是早已开始，而其他的区域是同样会来的。回想到红军占领漳州时，帝国主义军舰集中于厦门海口的就有三十多艘，那就可知道帝国主义这些大炮机枪是向着谁瞄准的了。

当然对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的力量，我们也不能有过分的估计。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现在正在普遍的经济恐慌中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极大的发展。在西班牙、在智利，已经存在着革命的危机。在德国、波兰等国家内，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正在成熟着。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成功，与之对于反帝国主义的组织与领导作用的加强，将不能不使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遇到极大的困难。而且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还是丝毫找不到解决与出路。

我们坚决的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军械虽不及帝国主义，然而我们有的是广大的千千万万的民众，这些民众将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的领导之下，为了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进行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在长期的艰苦的反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将是胜利者。

但是，无疑的，世界帝国主义是我们更有力的，更凶暴的敌人。要战胜这一敌人，我们必须要有最大限度的努力与牺牲的决心，而且只有战胜这一敌人，我们才能创造出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的中国！

八，为了要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为了准备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的冲突与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央认为在苏区与非苏区的党必须执行下列的战斗任务：

(1) 苏区的党必须立刻动员广大的群众，召集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解释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的意义，提出“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一寸苏区的土地不被国民党军队蹂躏”，“保卫苏维埃根据地”，“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争取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打倒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干涉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去”等口号，号召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加入红军、赤卫队、运输队、交通队、担架队等，参加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动员一切力量来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2) 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各苏区的红军必须更有计划的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坚决执行中央最近军事计划，以造成占领南昌包围武汉的形势，但绝不能以进攻策略解释为军事的冒险，或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

(3) 尽量扩大与巩固红军，中央区除完成预定计划外，扩大三分之一。鄂豫皖二分之一，湘鄂西三分之一。湘鄂第十六军，赣东北第十军，必须编足两师。湘赣二十一军编足三师。闽西十二军与赣南二十二军，必须充实起来。尽量吸收雇农与工人加入红军，加强红军中工人阶级的骨干，并提高红军士兵的政治水平。红军优待条例，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与射击飞机的演习。必须最大限度的发展地方武装，有计划的进行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以保护苏区根据地，扰乱敌人后方，扩大苏区。

(4) 坚决的转变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吸收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具体的切实的帮助当地民众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举行秋耕与秋收运动，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同官僚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建立苏维埃各委员会的工作，必须征收土地累进税与营业税，统一苏维埃的财政。坚决实现劳动法，改善工人生活。用一切方法保证苏维埃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各苏区应互派代表交换苏维埃建设的经验。

(5) 更坚决的广泛的动员群众进行反日反帝拥护苏联的工作。必须清楚的了解到苏维埃政权不但是土地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现在立刻应该准备“八一”工作，更响亮的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武装保卫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必须清楚的告诉群众，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的接近与到来。反帝同盟与苏联之友的组织，必须更广泛的深入群众。在“八一”应该举行盛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拥护苏联的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举行各苏区的反帝同盟与“苏联之友”等的代表大会。

苏维埃不但是苏区工农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而且也是非苏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因此，各苏区的党必须有计划的选派党员团员到环绕苏区毗近的白色区域，首先就是武汉、南昌、九江、宜昌、沙市、平汉路、

南浔路、武长路、株萍路等工人灾民与士兵中去建立工作，加紧白色区域工作干部的训练与加紧对于已有组织的领导，在苏区根据地的周围，必须创造许多游击的区域，并加强对于已有游击队的领导。对于白军士兵的工作，应该更有计划的来进行。

(6) 非苏区的党，必须立刻开始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宣传国民党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作用，更具体的宣传苏维埃与红军是唯一反帝国主义的政权与武装力量。号召群众的罢工，关车，飞行集会，车间会议，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反对四次“围剿”。利用苏维埃与红军在群众中的深刻影响，组织群众对于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积极性。更广泛的扩大“红军之友”。吸收积极的工人分子进去工作。募捐征调等工作，必须变为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政治运动，应该抓住国民党借债，取消教育经费，水利赈灾费，加捐加税，鸦片公卖等具体事实，组织工人、失业工人、学生、灾民难民、城市贫民与乡村农民反国民党的斗争，把这些斗争同反对四次“围剿”密切的联系起来。

(7) 发动组织与领导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准备与组织一业的同盟罢工。转变赤色工会的工作。建立几个真正有群众基础的产业工会，首先是纱总、海总、铁总、矿总、市总、五金总。在邮务工会、报界工会，出版业工会中建立革命反对派。真正开始失业工人的工作。特别注意铁路，轮船与兵工厂的工作，尤其是在平汉、津浦、沪杭、沪宁与运兵轮船上的工作。全总、海总党团应该更具体的布置这些工作，应该有计划的那些地方进行破坏。

(8) 更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来进行白军士兵中的工作，尤其是蒋介石、陈济棠的中心部队与十九路军。领导士兵为关饷，要求改良待遇的日常斗争，准备有计划的革命兵变。发展与领导各省的难民、灾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配合哗变兵士，彻底执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苏维埃区域，来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与分散敌人进攻中心苏区的力量。陕甘省委与江苏省委，应特别加紧在陕甘游击队与徐海蚌游击队中的工作，采取建立新苏区的路线。

(9) 更应千百倍地加紧反日反帝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的工作。更具体的依照中央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去布置工作。各地党，尤其是河北与满洲的党，应该动员大批的干部到东北义勇军中去，争取反日战争的领导，把这一战争同土地革命汇合起来。

(10) 应该特别加紧揭破反革命派别的欺骗宣传，指出一切它们的“和平建设消灭共匪”的理论，以及“非战运动”实际上都是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又一办法；指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之后，才能和平建设，才没有战争，只有革命的战争才能消灭反革命的战争。一切这些反革命派别都是国民党的后备队与国民党统治的拥护者。

要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就必须有坚固的、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党。必须明显的看到党的组织力量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党的一切工作还远落在革命发展之后。各地的党必须更广大的做征收党员运动，提出“成千成万的工人群众加入共产党，回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为增加一倍党员而斗争”等口号。必须更彻底的转变支部工作，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提拔新的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中来，加紧对于新党员的教育。帮助团的工作的建立与转变，与它的冲锋季工作计划的完成。更无情的打击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与“北方落后论”，对于革命没有信心，以及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的空谈，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

入到支部中去。必须重复的说，坚固的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党，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唯一保障。

注释

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解散沔阳县委、开除栩栩党籍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省委具体审查了沔阳县委的工作，认为沔阳县委用两面派的手腕，口头上接受省委的决议，实际上不接受省委的决议，主要表现在于：

1、在平分土地中，一直到现在还有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没有平分，而县委没有坚决去领导。

2、在春耕的运动上，还空着百分之七十的荒田，没有根据省委的决议和指示去领导解决，连生产会议县委都没有讨论过。

3、在修堤工作上，还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溃口没有完成，没有根据省委动员群众的指示去执行，而相反的用强迫群众的国民党式的抽丁摊派的办法。

4、在敌人进攻江岸政权，扰乱沙湖、杨树峰等地，屠杀群众抢夺春收，而县委没有执行省委武装群众保护春收的决议。

5、以上这些，已经省委屡次的指示和派人巡视督促，但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转变，特别严重的是反革命派在沔阳的公开活动（如一部分商人、富农反对苏维埃，峰口的黑夜放火，张沟的杀人，傅湾区的富农引诱群众买良民证等），而县委没有领导全党作坚决的肃反工作，最严重的是布满沔阳各机关的反革命派没有得到很大的破获，这一原因自然是党内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而暗藏在党内、青年团内等等反革命的阴谋，是最大原因。

6、省委认为沔阳县委在这一切工作表现中，在经过省委屡次指示和斗争中，仍然没有改变错误，不执行省委的决议，和违反省委的决议，不能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这个县委组织不能继续下去而决<定>解散，并调冯××等到省委谈话，不许聚在沔阳。以魏士筠、毕国丙、蒋训仁三同志成立组织委员会，代替县委的工作，改造下级党部，吸收肃反中积极干部，在组织委员会领导之下，百分之百的执行省委的决议。

7、栩栩是过去沔阳党的中心领导，他不决心提拔真正的积极工农干部的，压制积极的工农分子，而专门以感情式的提拔，许久不执行党的决议，的[对]豪绅地主、残余富农、商人、流氓等阶级异己分子 的决议，是一贯的不执行。这次省委派他到沔阳帮助并领导沔阳党武装群众，反抗敌人的进攻及肃反工作，而在沔阳二十余天毫无成绩，特别是肃反工作没有丝毫注意，用两面派的手腕欺骗省委。根据各方调查及栩栩亲自口供的结果，才知道他是改组派的首领，因此开除党籍交革命法庭审判。

8、省委在这里要号召沔阳的真正共产党员起来积极肃反与加紧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使省委这个决议每个支部的同志详细讨论，只有依靠真正的共产党、真正的工农积极干部到各级的领导机关，洗刷党内阶级异己分子，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特别是肃清暗藏在党、团、苏维埃、军事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才能百分之百的执行省委的决议，代表工农的利益，动员群众的积极性，争取革命继续不断的胜利。

中共宜昌特委关于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议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一、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是日益迫近着几省胜利的目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对红军苏区四次的“围剿”，也表现着特别的积极发挥他们最后挣扎的努力（最近蒋介石召集的庐山会议，湘、鄂、赣、豫、皖五省军队的调动……）。宜昌区党在这一革命战争急剧发展的形势下，荆当、当阳、枝宜、松滋、公安等县游击战争的开展（一大队攻下河溶，二大队攻下弥陀寺、浣寺等），群众斗争勇气的高涨（当阳在工作失败后犹有六七百群众自动打马山），党的影响的扩大与鄂西反动统治调动川匪军团到荆门、当阳、松滋厉行极端白色恐怖（荆、当、江、宜、枝五县联防，川匪一团人到当阳清乡，杀人放火，牵牛拉马，无所不用其极），镇压长江上游的革命运动，来进行他们的后方工作等，更加重了宜昌区党应百倍努力的执行开展长江上游苏维埃运动的任务，来冲破川匪、鄂匪对湘鄂西红军苏区的“围剿”，完成目前的伟大任务。

二、宜昌区党在敌人第四次“围剿”湘鄂西红军苏区中，还表现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不知道集中武装配合群众来积极的打击敌人，反把武装分散埋藏来减低群众的[斗争]（当阳、枝宜同样），一般的忽视与不了解无产阶级领导作用，对组织雇农工会的消极怠工，藉口农村中没有帝国主义，根本忽视群众的反帝斗争，不相信群众，过分估计敌人，发生小资产阶级的动摇逃跑（当阳负责同志在敌人清乡严厉时候的逃跑）。同时在右倾的胎胚之下，反映出“左”的盲动情绪与空的叫喊，不发动群众去打击民团，单凭游击队的冒险攻坚（二大队几次失败），不在群众斗争中来平分土地，成立革命政权，而只把平分土地建立政权的工作堂皇的写在纸上。这些脱离群众，不相信群众，没有耐心，不坚苦去发动群众打击“左”右倾机会主义，尤其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宜昌区党的主要危险。

三、我们加紧来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冲破四次“围剿”的紧急关头，各级党内还表现出各种的腐朽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这些自由主义、调和主义减弱了党集中火力反机会主义的战斗力量，掩盖与发育着党右倾机会主义，这种脱离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发展，是党内反革命的应声虫，是把 AB 团、改组派、托陈取消派等反革命组织引进党来的基础。我们在反倾向斗争中，对腐朽的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要给以铁的无情的打击。

四、我们对两条战线斗争的开展还不急剧不深刻，还只限于纸上空谈，没有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只有上层负责同志在机关中坐谈立议，而没有广泛的传达到支部同志。在目前的紧急关头，对反机会主义的斗争，需要我们一百倍的努力，动员宜昌全党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积极性来与之作长期的残酷的不调和的[斗争]。我们斗争的具体办法是：

1. 从特委到支部每个同志需<进>行严格的检查，对党的路线、工作方式以及个别的问题，以布尔什维克态度的检查，把检查出“左”、右倾机会主义，提到各种会中报告讨论（尤其是要在支部中讨论），教育与动员全党同志开展两条战线斗争。

2. 从特委到支部，对路线上与个别上的“左”右倾危险，应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上加强政治领导。在×各种会议中，进行艰苦的解释工作来教育同志。使之从政治上去分析与了解“左”右倾机会主义，来与之作残苦斗争。

3.发动全党的自我批评，无情的打击自由主义、调和态度，把对路线怀疑、怠工与政治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赶出去。

4.对每个同志言论行动与党的刊物，施行严格的检查。对沉落在机会主义下的各种自由主义、调和态度给以铁的打击。五、各级党应该把这一决议详细讨论，检阅你们路线上、工作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尤其是要在支部中讨论检查，来开展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并把讨论的决议报告特委。

特委附：讨论问题一、右倾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你们工作中有哪些是右倾机会主义？二、“左”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你们工作中有些什么是“左”倾的表现？为什么右倾是主要危险？三、怎样叫做自由主义、调和态度？你们工作中有那些是的？四、怎样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你们对两条战线斗争的具体工作做了些什么？各级党部应该把这决议后面的几个问题，在县委、区委、支部中提出讨论。并限定半月内县委负责把区委、支部讨论结果，作一总结，报告特委。

特委又及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郑文关于鄂豫边党和红军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

中央：

我于今年二月十一日由南京军人监狱出来，十五日到上海，十七日即参加互济会和民反工作。四月十九日由中央调我到鄂北苏区去，介绍我们的军事工作，五月五日到达鄂北苏区（襄枣宜）。当时省委（鄂豫边临时省委）常委会即将我的工作问题讨论了一下，以我初到苏区，对于敌情、地形，以及苏区中的一切工作情形，均不明晰，须留在省委工作一个月时间，然后分配上阳同时我自己也感觉到我对于军事工作，委实没有好多经验，不如暂时留在省委担任党的工作，比较还有把握些。于是遂决定了我在省委宣传部担任干事，办训练班，和党报委员会编辑，同时并参加省委常委，代表省委指导苏文化教育工作及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此时反帝互济，都没有组织，省苏文教会也只是一个空洞的招牌），不到半月，复调任省委宣传部部长×代表省委指导全省少共工作（此时少共工作都没有建立起来，经省委十九次常委会决定组织少共工作委员会，并指定三人负责组织之，即团员二人，省委参加一人即决定我负责）。五月终，省委看到一天天的严重，红九军的失利，一次厉害一次，这时苏区的工作，特别是军事方面非下十二万分的关心与努力，争取一次或数次大小的胜利，实不能挽救当前的巨大危机。于是省委就在小余月冲山下（因跑兵跑到这里来的）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并讨论了一些紧要的问题，同时又指出了红九军总指挥部本身的不健全，于是就组织了一个前敌委员会，加强红九军的领导。其权限是代表省委、省军委决定和指导红军中及红军所到之地方的党的一切工作计划与前方的军事行动。前敌委员会共五人组织之，省委参加三人，即何[郝]久廷，李政及我，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吴寿[首]青，参谋长张木千（本来总指挥部参谋长是魏克铎，省军委参谋长是张木千，最近因魏克铎在工作上表示消极，所以就把他俩的职务对调了），同时并决定我担任红军中的肃反工作。是日下午五时许，我负着省委所给予我的使命向襄阳西北方去找红军（此处系白区地界，离赤区七八里许），到达目的地时，闻红军于下午三时已向东方开去了。我因此处白区，且多土匪，不能居留，遂深夜折回省委。翌日下午三时，我复由渡家坡（即省委昨天“跑兵”跑到的地方）起程向东边杨家山行走，中途听到群众说红军和山北游击队已由杨家山开到白石头附近。我于夜晚急忙又赶到白石头，谁知只找到山北游击队，而红军于下午六时又向西北方开去了。我只好停留于山北游击队，暂时帮助并督促山北游击队工作，到了第二日下午，得着群众的报告，说红军先晚向西北行动，中途遇着敌人，又被打散了！不一会，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杜远良同志来了，他说他昨天被击散，今天由省委来的，他把昨天红军被击散的情形简单的报告了之后，即将省委所写给我的两个纸条交给我看了，我知道省委还有一封比较长的信托他带交我的，现在他也没交给我，同时也知道省委为了工作的需要，由公开的转到秘密的，把省委从苏区移到白区去了，于是我邀他到没有人的地方，低声问他：“省委还有一封长信托带给我的吧？”他很着急的答道：“是的，我今天因为在中途遇到了敌人，由马上跌下来失掉了，不过信的内容，我是完全知道的，同时还有二位和我同来的在省委管理发行和油印的同志也知道，因为我们都看过的呢。”我更低声地问他：“省委仍在渡家坡吗？”他慎重地告诉我：

“省委将工作人员缩小，把文件已收束好，准备今晚就搬走了。”我恐怕他发生误会，所以想恳切地向他解释，告诉他“省委只是天天“跑兵”，这固然对群众有点好的影响，可是把一切工作都放弃了，这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因此为了适应目前环境，顾全整个工作起见，不能不把工作方式转变一下的。”于是我继续问他关于省委写给我的那封信的内容，他就告诉我：（1）省委问我红军在何处？前敌委员会的工作须继续进行。（2）要我把被击散的红军收集起来，与山北山南游击队及挺进队集中合编为鄂北赤色游击军。（3）省委决定我担任游击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赵英（即山北游击队总指挥）担任游击队[军]总指挥，杜远良为政治部宣传科长，阮荣汉（以前曾担任过红九军廿六师师长及参谋长，颇有游击经验，后因负伤，工作表示消极，调回省委训练了一个时期，再调到山南游击队，代表省军委指导和整理工作），段可强（曾经担任过师长及参谋长，也因工作表现不好，调往训练，再派往山北游击队工作的），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嘱我斟酌分配工作。但这时各地党和苏维埃的组织已完全瓦解，各方面消息都完全断绝，所以红军的大队（据被击散的战士后报告，红军大队内有枪百七八十枝左右），究竟拖向何处去了，我也不知道，敌前委工作，无从去进行。山南游击队和挺进队现驻何处，也须向省委探问，同时赤色游击军的编制和整理，工作人员的分配，敌方的情形，我们今后的工作计划和军事行动，以及其他许多重要问题均须与省委作一比较详细的讨论，方可着手进行。因此我为了慎重起见，急忙写了封信请杜远良同志火速再到渡家坡，去送给省委，或者还可以赶得上的（因省委迁移现在深夜）。谁知他把这封信带去，交到山北总指挥赵英同志手里，自己就在黑夜逃走了，我只得把几个主要的负责人（省军委负责人仅仅只有经理部陈[程]祖吾[武]了，省苏只有一秘书长），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议：1、报告敌情；2、报告红军近状；3、检阅工作（红军、游击队以及苏区整个工作）；4、军队的编制及整理；5、工作人员的分配；6、今后工作计划及军事行动；7、其他。在这次会议上，只有总指挥赵英，参谋长阮荣汉（决定阮同志为游击军参谋长）表现的还好，其他几个同志大半都发生了动摇，尤其是段可强同志及×××同志等对国际路线根本怀疑起来，在言行方面，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如在工作上表示消极怠工，右倾，在会议上故意说出违反事实的话，说拖枪跑走是工农分子，富农豪绅地主残余占绝对少数，工农不能领导革命，反对洗刷阶级异己分子，说党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太过火了，执行国际路线太过火了等），我当下就和他们作了一次无情的斗争，给一切不正确的离开党的总路线的倾向以极大的打击，同时讨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然后着手把队伍编制好，把工作人员分配好（正式成立鄂北赤色游击军编作四大队，每队枪枝三十支，另成立一手枪队（盒子十余支，手提一支[无子弹]），一特务队（长枪十余支），加紧训练，加紧政治教育工作，才使一般同志和战士的意志稍为稳定一点，比较的坚定了他们对于巩固苏区的信念。谁知正在加紧工作和积极行动的时候，手枪队队长又叛变，终于使我们不能完成中央所给予我们的巩固并扩大鄂北苏区的任务。这是多么痛憾的事呀！写到这里，须将过去鄂豫边党的领导的错误，和中央派我去时鄂北苏区的情形与工作的转变，以及最近所暴发的机会主义所结成的总的恶果的经过，大概的报告如下：

鄂豫边党长期的在机会主义的统治下，始终没有走上正确的路线。一九二七年，即独秀时代，鄂豫边党完全在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土地没有分配，反富农斗争被取消（不承认鄂北有地主富农的存在），放弃工会及各种

群众组织，忽视红军的建立，……一切工作，都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后来经过了几次的斗争，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接受立三路线，实行盲动主义，使组织上及军事上都遭到了极大的损害。经过了这次失败之后，右倾机会主义又大大的抬起头来，特别在沈钟[宗]玉[源]的领导之下，用封建感情结合党员，压抑工农干部，容纳富农，流氓，甚至豪绅地主残余盘踞在党、苏维埃及红军、游击队中，而且多是占着领导地位。政治教育工作的忽视，肃反工作的不建立，受处罚的不好的分子，都送到红军去，土地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有许多贫雇农没有分得很好的土地，甚至有不少的没有分得土地，富农的土地有些没有被分配，中农的土地有些反而被分配了。白军士兵工作完全放弃，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一点也不健强。这时一切工作方式，都是十足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没有经过群众路线，同时更没有领导全党同志很艰苦的去作群众工作，建立各种群众组织与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在六个月以前即敌人开始对苏区举行第四次“围剿”时，党不能抓住敌人各种弱点，采取积极进攻敌人的策略，很实际的去布置和进行一切工作，反而下一个总退却的命令领导两次“不抵抗”的逃跑主义，结果逃跑不遂，中途被敌人迎头痛击，使苏区遭到极大的摧残与悲惨的失败，从此种下了失败情绪的种子，大多数的同志群众和战士，只是消极的抱着一种等待主义：“希望红三军打过去”，而改组派取消派，以及一切反动派别更在苏区特别活动。组织上的叛变，红军中的拖枪逃走，更是继续不断的发生，虽然在二个月以前，中央分局的代表到了苏区，省委召集了两三次扩大会议，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及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可是两条战线的斗争始终都没有深入到下层去，工作的转变又非常的迟钝，而且只限于上层，即省委本身。在这里，我们须拿出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来，找出省委本身在转变工作的当中，所犯的严重的不能容忍的错误，即对国际路线，在认识方面，没有深刻的了解，在实际工作中还表示犹豫，怀疑，没有坚决到在艰苦奋斗中去执行。同样，对于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严格的说起来，还只是口头形式的叫喊，并没有真正的有理论上与实际上给机会主义以重大的打击，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至于军事方面，又犯着“左”倾的错误，很机械的很庸俗的去了解“不脱离苏区”的原则，每天把军队由山南山北拖来拖去，加重士兵的疲劳，只是盲目的无计划的攻“寨子”，事前不作一点准备工作，完全放弃游击战争，只是死死的硬干，没有加紧组织地方武装，去帮助和配合红军作战，更没有动员群众去做拥护红军参加红军的工作。这些严重错误，一直到最近，即危险到了极度的时候才注意到。但是此时虽下了十二万分的决心与努力，企图纠正这些错误，挽救这一危机，但终于不能收得极大的效果，很快的将工作转变过来，而这一长期的机会主义所症结的恶毒，现在却总的暴发出来了！这真令人痛心啊！

我到鄂豫边的时候、鄂北苏区已经严重到了万分，从组织上讲，枣阳已完全塌了台，一切工作人员都逃光了，有些逃到山南山北来，跟着大队天天“跑兵”，无论如何不敢回去秘密工作，临近县的下层组织，也同样瓦解了，县委和县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虽然还跟着山南游击队在山上“跑兵”，但实际上一切工作都停顿了。而且县委和县苏维埃主席及山南游击队的负责人，大都有反革命组织的关系（改组派，下面还须特别报告），所以相反的，更起了许多的反动作用，做了许多的破坏工作。襄阳县委因为成份较好，所以在工作上表现得比较好，但是这时因为环境恶劣的原故，群众大半“逃难”

去了，工作人员跑的也跑了，县委和县苏维埃也因为天天要“跑兵”，事实上不能很好的去工作，所以实际上也形成了一个空架子。在党的方面，找不出一个比较完善的支部，在苏维埃方面，也找不出一个比较完全的乡苏维埃政府。其他各种群众组织，严格的说起来，一点基础也没有！而反帝及拥护苏联的工作更没有做。在军事方面，红军枪支，有四百余支，山北游南队约七十支，山南游击队约四十支，还有各地挺进队，合计约四十支左右，子弹很感到缺乏，平均一支至多四颗，而生活更是痛苦到了极点，每天两顿稀饭都很难找到，甚至一两天弄不到一点饭吃。政治教育工作，做的非常不够，甚至红军，游击队到最近连成份表都没有造出来，省委所发下的文件，军委的训令，曾[都]没有拿到下层去讨论过，更谈不到国际路线的执行，两条战线斗争的开展和深入，一般同志及战士的失败情绪，异常严重，政治上军事上的主要负责人，终日惶惶昏迷，拿不出具体的计划与坚决的主张。盘据在党，苏维埃及红军、游击队的阶级异己分子，本来在斗争上就没有积极性，在政治上更没有坚定性，因此到了此时，通通都动摇起来，一班[般]反动派，更是特别活跃，甚至在前线上都公开的造谣恐吓挑拨煽动，大起其反动作用，主要的如打骂群众，损害群众利益，故意离间群众对红军的感情，行动时造谣恐吓逃跑后退，企图动摇军心及扰乱阵线，一有机会特别在战士们感到疲劳与痛苦时，即向战士宣传：当土匪，团防和匪军（群众称白军为匪军），生活是如何的好，企图欺骗和煽惑红色战士。这时，叛变的，拖枪逃走的，简直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但这些叛变和拖枪逃走的大多是那些成份不好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有些根本是有反动的政治背景，有些因感到革命对于他们没有什么利益，同时又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坚强性和顽强性，不能刻苦耐劳的去于这种艰苦的革命工作。这是一种必然的阶级的分化，尤其是斗争到了最尖锐的时候，不过鄂北苏区的阶级分化，是表现得格外的明现[显]啊！至于敌人方面、范石生、罗启疆，一共有六团兵力及两个辎重营开到苏区，而且却集中苏区的中心，布置在各个大小市镇，寨子及要塞地，天天五六处出发会师杀人放火，骚扰掳掠，极其摧残破坏之能事。枣阳早已成为白区，山南几乎没有人烟，山北的群众，受匪军残酷的烧杀劫掠，痛苦之情，亦令人惨不忍睹！此时省委、军委、省苏天天也忙于“跑兵”简直无工作可能。以前已没有建立较好的基础和巩固的根据地，到了敌人开始“围剿”时，又领导逃跑，遭受极大的挫折与摧残，现在敌人正在积极向我们进攻，苏区缩小得只有四五十里，而且布满了“白点”，事实上很难实际的去布置和进行一切工作。同时又因省委本身及各县区组织的不幢全，没有坚决的在艰难困苦中去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这么一来，苏区怎能巩固，红军怎能走上胜利进攻敌人的前途呢？！我到省委的第三天，看到了这种严重的危机，同时听到红军又打了一次大败仗，参谋处长张永年拖枪叛变，是晚我代表省委参加红军党团会时复听到又有两个大队长带队逃跑了（后来又回来几位战士，因为成分很好一时被欺骗走的），翌日，我回到省委参加常委会，作了一个政治报告，特别指出了鄂豫皖肃反工作的伟大胜利，一次提拔了两千多新的工农干部所得的惊人的收获，并且在会议上提出共同讨论两条战线斗争，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实不能挽救当前的危机，完成巩固并扩大苏区的任务。但在会议上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郝>久廷同志，对于国际路线的执行表示犹豫与不坚决，并且公开的说：“地主富农大多是革命的，工农大多反而不革命。”这种怀疑工农，姑息异己分子的态度，真是十

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也就是地主富农意识的完全暴露何[郝]同志系地主成分，曾在军阀军队里做过官，假若谈起鄂豫边官僚主义来，他实是鄂豫边官僚主义的典型！)。当时我和魏世筠[尉士均]同志在会议上向他作了一次残酷的斗争，并且很具体的举出许多成分不好的在最近叛变和拖枪逃走的事实来给他这一错误的倾向以无情的打击，一直到他自己有了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公开承认错误，同时并揭发出产生这一错误的因子。从这次大叛变和红军大失败以及经过几次最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后，才提醒省委的注意，才开始下十二万分的决心与努力，集中火力向机会主义射击。这时我们举行了一次清党运动，无情的洗刷一切动摇的阶级异己分子，大胆的提拔了一些新的工农干部，开办训练班，进行创设干部大队同时动员全党同志和群众，实行改造党，改造苏维埃改造红军游击队。加紧政治教育工作，组织读书班、阅报班、识字班、苏联之友社……等。督促同志讨论文件抓住一切不正确的离开党的总路线的倾向和错误，作教育群众和同志的中心资料。同时并要求被洗刷的同志，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公开的向同志和群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尽量揭发出自己错误的根源。建立政治保卫局，加紧肃反工作。发动群众反富农斗争，彻底检阅平分一切土地。成立兵运委员会，开始进行白军士兵运动。组织少共工作委员会，建立少共工作。抓住目前最中心的政治任务，配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中心口号，去发动群众斗争，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及地方武装。在武装保证土地利益，武装保证春收春耕的运动中，特别进行了拥红及参加红军的工作。同时红军及游击队中，省委又派了负责同志去指导，对于白区如南阳、襄樊、宜城、枣阳等处的组织，均改了选，又派了同志去帮助并督促其工作，加强其领导。而在宜城和襄樊，又准备布置游击。在红五月，省委宣传部并号召全党同志举行革命竞赛及红五月的工作总检阅，借以克服一般同志和群众的失败情绪，提高每个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说起来，此时省委实在下了十二万分的决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企图转变鄂北工作，但终于不能很迅速的把工作转变过来，眼见着敌人的“围剿”一天天的加紧，苏区一天天的塌台，红军的实力一天天的削弱，而整个工作的转变，又这么迟钝，这真要活活的把人急死了！尤其是红军，在这两个多月以来，打了二十几次仗，没有打过胜仗，而最近几次战争×得更糟，这并不是敌人厉害，恰恰相反，敌人的弱点多得要命，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处处地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中没有援救出来呀！在这个生死关头，谁知又暴发了两次大叛变，这更促成了鄂北苏区的危机了。

一、临边县的大叛变：临边县的工作做得非常糟糕，县委，县苏维埃主席以及山南游击队的总指挥、参谋长都是地主富农流氓等成分，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平日工作表现非常不好，他们和“案子”恋爱，带爱人在队上玩弄，经济不公开，生活非常浪漫，对群众和战士的影响非常的坏而山南游击队自成立以来，也没有积极行动过，并且在阵上还影响了其他的部队，同时临边县以前已发现过改组派的组织，因此，省委从各方面证明：他们确是有改组派的组织关系。于是，单独对于临边县的问题，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很详细的研究了一番，对于他们这些反动派，有过极紧要的决议，同时派定省委常委陶议[汉]三同志前往与政治保卫局负责人王君贤共同去执行，此时山南游击队参谋长来到了省委，我在秘密会议上提议将他立即逮捕起来，但他们都说恐怕其他反动派知道了发生恐慌，难免不有逃遁和异动，为了顾全整个肃反工作起见，暂将留在军委，并派兵运委员长秘密地将他监视起来，我当时

以为这也有相当的理由，就没坚持我的主张。谁知在进行这次肃反工作中，就有两位同志犯出严重的可怕的使人万不能容忍的错误，一个就是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何入[郝久]廷同志，一个就是负政治保卫局责任的王君贤同志，何[郝]久廷同志代表省委于次日参加军委会，讨论缩小军委人员及建立兵站。军委会经理部长陈祖吉[程祖武]同志，将留在军委会没有工作的人，开了一个名单，在会议上报告，并决定把这些人分配到各乡去建立兵站，何[郝]同志看了名单不把山南游击队参谋长特别提出，散会后陈[程]祖吾[武]同志，亲自又来问了何[郝]同志，何[郝]同志仍是昏昏沉沉的摆起官僚架子来，随随便便的回答他说：“把他们都分配去建立兵站好了”，于是陈[程]祖吾[武]把他也分配到宜枣去建立兵站，哪知他在下午回去，晚上就暴动起来。其次就是王君贤同志，王君贤听到陶议[汉]三同志告知他关于省委的决议，他就怒气腾腾的大声地叫道：“省委对于×××同志等的这种严重的处罚，我死都不赞成的，就是开除他们的党籍，我都要反对”。同时他又说：“省委这次对×××同志等的决议，完全是邓明钦（即临边县委书记）向省委告状的，我无论如何是要反对到底的”！此时陶议[汉]三同志即将他拉走，很低声的向他解释说：“你不赞成这一决议，您应依着组织路线向省委提出意见，但决不能在队上向被处罚的公开宣布公开反对！现在我们只好将他们送到省委去再说”。可是他仍旧不改变他的态度，终于在这晚上就演成了惨变！！这次反动派本来想把这五个主要的同志都杀掉的，即邓明钦（边县委书记），阮荣汉（省委派去指导山南工作的），陶议[汉]三（省委常委），毕长茂（省委巡视员），王君贤（政治保卫局）。在将要暴动时山南游击队参谋长出来邀请这五个同志开什么秘密会议，刚走近时，他就发了声命令：“现在到齐了，还不动手呀！”幸而天色很黑，这五个同志一看到风势不好，便一方拿出枪抵抗，一方各自逃窜，（临）边县委书记邓明钦同志现场终被惨杀。另一个县委被砍了一刀，负伤逃脱了，而他们四个人也很侥幸的冲出了重围。但我们的红色战士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枪支却被反动派拖走了（约四十支），临边县委书记牺牲了，在敌人极端摧残之下的奄奄待毙的群众又要遭受这些反动派的蹂躏与虐杀！这给我们以何等重大的损失与不好的影响呀！！我于痛恨之余，在常委会上提出处罚问题，但终于没有通过（他们以他俩只是一时的仿惶与感情用事，并没什么政治作用，是可原谅的）。这种现象，我始终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是万不能容忍的。

二、手枪队队长胡万山的大叛变，胡万山在鄂北苏区是很有历史的，他以前担任过红九军廿六师师长，后改编为总指挥部时，他又担任第一纵队长，这人颇有游击经验，同时在队伍里亦有相当信仰，他是本地人，对于敌情、地势及各地实际情况，是很清楚的，过去鄂北苏区几次的塌台，他几次都在艰苦奋斗中去恢复工作。此次他从前方被击散回来，一般负责同志，如总指挥赵英，参谋长阮荣汉，军委会负责人陈祖吾[程祖武]省委秘书长惠浩如……等都很热忱的介绍他到游击军工作。本来这次成立游击军时，对工作人员的分配，我是十分慎重的，我因到苏区不久，以前又在省委工作，对于队上的工作人员，更不明晰，所以在分配每个同志工作时，我都很详细的加以调查和考虑，同时更征求了主要的负责同志的意见，才决定的。谁料他公然叛变，带三匹马，拖七十支长枪，九支盒子，一支手提，送到黄泥塘匪军的大本营去了。本晚一个随着总指挥赵英在苏区工作六七年的传令兵也拖两支枪到胡万山那里去了。这个消息一传到游击军，一般负责同志和战士，大

家都恐慌起来，动摇起来。当时省委早就搬走了（省委搬走时只有一个常委，一个代理宣传部部长，一个秘书长，一个技术书记）。各地党、苏维埃组织（襄阳亦同样的瓦解）也完全瓦解了。一切工作人员统统都跑了。整整的一个多星期，得不到一点消息。敌人把主要的山口都占据了，天天在山上搜山会师，在乡下杀人放火，割麦子。红军大队还在百七八十支枪，究竟不知道拖到哪里去了，十天以来都没有消息（据他们说，因红军吴寿[首]青、张木千的主张，已拖到马凤[武]山去了，而且是十分确凿的。我当时向他们解释，以马凤[武]山离苏区几百里，反动势力很大，土匪很多，我们没有什么基础，去了不能存在，而且事实上根本不能牵制或威迫这方面的敌人，对于鄂北苏区，丝毫没有帮助，所以我相信红军决不会盲目地拖到马凤[武]山去的，依我的估量，红军是在枣阳或钟乡[祥]。但他们都说红军是绝对拖到马凤[武]山去了。可是我始终都不相信在红军中负责的同志吴寿[首]青、曹明允、张木千、何[郝]久廷、魏克铎等会糊涂到如此地步！）。我只得于夜深在游击队总指挥部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并决定目前的紧急任务。但到会的负责同志，大家只是垂头痛哭，长声[吁]短叹，不发一句言，我满含着眼泪，忍着痛苦，向他们说明胡万山等叛变的必然性，同时更详细的报告目前客观的形势，敌人的弱点和我们自己的顺利条件，来鼓励一般同志斗争的勇气，克服这种浓重的失败情绪，但他们仍旧只是悲伤痛哭，不讲一句话，我只得个别的征求意见。总指挥赵英同志很痛心他说：“我现在实在动摇了，失望了，我怀疑一切的同志和战士，我不相信任何人了。胡万山和这个传令兵，他们与我同艰苦共患难有七八年了，而今竟离开了我们，背叛了革命，这我还相信哪个会靠得住呢？此刻我们差不多还有一百支枪，假如再拖下去，明天或后天一定会没有了。所以我现在完全没有一点把握了，没有一点勇气和决心了，我主张暂时隐藏起来。”参谋长阮荣汉同样的悲观失望，为浓重的失败情绪笼罩着不肯继续干下去。其他几个负责的同志，更是灰心丧志毫无战斗勇气。我当时很严厉的批评这种非布尔什维克的懦弱的振[根]性，同时更详细的把目前的政治概况及各方面的实际情形予以明确的分析，给他们一番热烈的鼓励与稳固的信念，更沉痛的说明鄂北苏区多存在一天，即对于湘鄂西、鄂豫皖苏区多一天的帮助。但他们始终只是垂头痛哭，坚持他们的主张，于是我就提议到河西去发动游击，他们以许多客观的原因，与主观的弱点为不可能；我又提议到钟乡[祥]去，一方牵制鄂北的敌人，一方威迫襄樊，骚扰敌人后方，要与红三军取得联系，他们也以为不可能；最后我主张拖到湘鄂西去，他们更表示着反对与绝望（这个军事行动的步骤是省委决定的，在此我须特别申明）。结果我们决定抽五十支枪（因为成分比较好）付托两个忠实努力的大队长和指导员带到钟乡[祥]去（他们都是钟乡[祥]人），同时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钟乡[祥]县委，并嘱他们相机而行，尽可能的发动游击，不得已时须隐藏起来。余下还有五十支枪左右，大半都是山北游击队的战士，多系本地人，成分比较复杂，又不愿意远离，因此我只好听参谋长和总指挥设法去隐藏（因他俩亦是本处人），但这×因交通堵塞，到钟乡[祥]去的没有×是×隐藏在杨家山，余下的藏在两脚山。这时我感到异常的沉痛，非团结一致，坚持的继续干下去不可，因此到了清晨，我又在白石头召集了一个会议，但在会议上，他们仍旧坚决的主张，暂时只有隐藏一下，再努力去恢复工作。当会议还没有结束。左前方山上，忽发<现>了敌人，我们向右边山坡下走去，迎面复碰着了敌人的尖兵，接着又来了几十匹马队，

把我们追击了好几个山，幸而白军士兵大半都很好的，所以没有加紧的追击了。黄昏时，我们在原处集合，总指挥没有到，不知道他的下落。这时他们无论如何都主张秘密起来，而留在苏区负责的又只有游击军这几个同志了，但他们大多是苏区的人，可以设法秘密工作，所以他们都要我离开此地，再一方面赶快把这些情形报告组织，最后我竭诚地嘱托他们把这些留下的极少数的干部紧紧团结起来，把这点武力好好地保存着，作为恢复苏区的基础，每个在苏区的同志都要担负起这个重大的责任，努力恢复苏区的工作，尽可能的不要离开了这里。临行时，我留了一个通讯处在参谋长阮荣汉同志手里，要他们写信到上海来，假如省委的关系找不到的话。临时，我寻不着地方组织，寻不着省委只好吞声饮泣地尝着极大的艰苦冒着极大的危险回到中央来！！

写到这里，我深刻的了解到鄂北苏区的塌台，红军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个别的错误，而实实在在是鄂豫边党长期的在整个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下的错误。现在我更具体的把这些主要的错误归纳出来报告中央：

一、成分不好：鄂豫（边）党的组织，完全是和平发展，用封建感情结合党员，用极端的自由主义发展同志，而各个领导机关，大都为富农流氓甚至豪绅地主残余占据着，党的文件和军委的训令，都被他们封锁了，没有传达到下层去。有些两面派，虽然口头上接受了国际路线的正确，实际仍是执拗[行]他的机会主义，坚决阻碍着国际路线的执行。到了形势严重的时候，他们通通都动摇起来，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坚强性和顽抗性，刻苦耐劳的去干这种艰苦的工作，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尽量容纳那些坏的成分不好的分子，而一时受欺骗而转回队来的都是真正的工人贫雇农，对工农根本怀疑，不肯大胆的去培养和提拔来加强这一无产阶级的领导。所以这许多叛变和拖枪逃走的，都是那些成分不好的分子，因此鄂北苏区的塌台，红军的失败，成分不好是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二、肃反工作没有建立：党既然采取了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同时更经过几次太混乱大变动的时期，如独秀时代，立三路线时代，到沈钟玉[宗源]领导的逃跑主义时代，党的纪律特别废弛组织特别松懈，这更给予反动派以极好的活动机会，而一般同志又不注意肃反工作，虽然有个时期，鄂北实行了一次大屠杀政策，故有王、吴、何三大屠户之称（王君贤、吴寿[首]青、何[郝]久廷。但这错误的肃反方式，反而造成了群众对党的恐怖和与[予]反动派以攻击的口实。接着又走到相反的错误，完全放弃这种重要的肃反工作。去年襄阳特委书记汪陆一同志，曾向中央分局报告，鄂豫边没有反革命活动，只有五个改组派（因为这五个已发觉了的原故），这是何等令人诧异的话呵！！尤其是那些不好的、在工作上表现得很坏的同志和群众，反而都送到红军游击队去，作为一种处罚（后来不愿参加红军的，这也是一个原因），这个错误的严重性是如何的重大呵！！直到最近，反动派公开活动，领导暴动叛变拖枪逃走……才提起党的注意。

三、政治教育工作的不够：党，苏维埃，红军，游击队中，都是阶级异己分子盘据着，而且大多占据了领导的地位，党的文件，军委的训令，都被他们收藏在口袋里，没有传达下去，更没有拿到支部小组去讨论，以提高一般同志的理论水准。对于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更作得非常的不够。因此在转变工作的时候，异常的迟钝，两条战线的斗争始终没有深入到下层去，一般同志对于国际路线的认识一点也不深刻，甚至有些党团员连自己是一个同

志都不知道，更谈不上一般基本的任务和理论的了解。我在五月五日到苏区，开始和苏维埃负责人谈话，我问他们“五一”的工作情形，他们连“五一”是什么日子都不晓得，这就可以明了鄂豫边党的教育工作，做得是如何的糟糕了。

四、生活的痛苦和失败情绪的严重：鄂北苏区没有执行过其他的什么经济政策，以前的经济来源，就完全建筑在“打豪”<上>。当敌人没有“围剿”时，生活过得很舒服，但对于往后就完全一点也没有准备和顾及，单靠着群众来供给。直到最近，虽然实行了几天的关税，但不久即被敌人夺去了。因此在敌人的“围剿”加紧时，群众遭受了极残酷的骚扰和摧残，痛苦达于极点，因而一般同志和战士甚至于一两天都得不到一点东西吃，时常饿着肚皮和敌人挣扎周旋，特别在敌人开始“围剿”的时候，党即下一总退却的命令。领导两次的逃跑，使苏区和红军遭受极大的损害，从此便积下失败情绪的种子。接着红军又打了几十次仗，都没有打过胜仗，没有走上胜利进攻敌人的前途，这使一般同志群众和战士的失败情绪愈发加重。红军一看到敌人就跑，跑得一塌糊涂，简直没有一点战斗的勇气。此时消极怠工，悲观失望，简直成了极普遍的现象，始终都克服不了。这么一来，成分这样复杂，政治教育工作这样坏，生活这样苦，失败情绪这样严重，而一切反动派又特别乘机活动，于是叛变的叛变，拖枪逃跑的拖枪逃跑，一旦暴发起来，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了。单就红军、游击队说吧：红军、游击队在每次战线上，并没有受过敌人重大的打击，匪军在战线上，并没有打死我们多少战士，夺去我们多少枪支，完完全全是因为自己领导的错误，零零碎碎的，大批小批的拖枪走了，使我们反而成了国民党的运输队，这真是最痛心不过的事咧！！

五、忽视群众工作：上面说过的，鄂豫边的党是长期在机会主义的统治下，他们根本不相信群众力量，不艰苦的去作群众工作，各种群众团体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去争取和组织各种群众，更谈不上健全了。所以鄂北苏区的群众工作，实在没有一点基础。而一切工作方式，都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即如土地的分配，大多是苏维埃的命令，没有发动群众斗争，经过群众路线的，而且有许多违背了“平分土地的原则”。我常常去和那些得着土地利益的群众谈话，问他们的土地利益是怎样来的，他们大都千篇一律的回答我说：“这是先生们给我的”，有些贫雇农说：“政府里的先生还没有把土地分给我呢！”这不是官僚主义的证明吗！这不是违背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吗！再举一个事实来，最近红军剩下有四十多支枪没有人背，省委在改造红军和保证春收、春耕的运动之下，积极进行拥红和征调红军的工作。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枣阳没有一个，<临>边县也没有一个，仅仅只有襄阳征调了十几个人，可是成分还不很好，有些并且还是出于勉强，不是很自愿的，只得又让他们回去，这就可以看到党和苏维埃动员群众的力量削弱到了如何的程度，更可以知道鄂豫边党平日对于群众工作是怎样的忽视了。

六、白军士兵工作完全放弃：范石生、罗启疆所统率的部队，非常的动摇，一年来没有发过饱，就是连伙食费都被长官克扣去了。尤其是范石生的队伍，一般的说起来，对我们都有相当的认识，如果我们的兵运工作做得好，红九军的影响一扩大，他们马上都要倒到我们这边来的。譬如在前线上打仗，红军一跑，白军的长官即下令追击，相隔的距离非常的近，而白军士兵常对我们的战士说：“老乡，慢点跑，不要紧呀，我们都是穷人，我们决不开枪打你们的”。在此我更举一个事实来（象这类事实很多）：省委一个技术书

记黄同志害病甚至不能“跑兵”隐藏在襄阳四乡，一日匪军来了，他来不及藏匿，只得躺在山坡下，不一会，敌人的尖兵来，他被一个白军士兵发觉了，这位士兵走近问他：“同志，我们的大队就在后面来了，你躺在这儿，这多么危险呀！”接着又很恳切的问道：“你是个真共产党吗？假如你是个真共产党，我是很钦佩你，决不杀害你的。同志！请告诉我吧！我看你的装束和态度，一定是真共产党，而且是负责人！是吧！黄同志没有办法只好战栗的说：“我是个共产党”。这位士兵对他很敬爱地说道：“同志你不要害怕吧，我们士兵，谁不愿意共产呢？！谁不愿意把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地主、资本家打倒，分得几亩田地，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把自己的痛苦和压迫完全解除呢？！不过你们红九军太不行了，一看到我们就跑，有许多反而把枪支拖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的枪支不愿意拖给红九军，而愿意拖给贺龙呢！好吧，你们好好的干吧！只要干的好，我们还是来的。不过，同志，你现在穿着这样整齐的衣服，躺在这里是很危险的，你一定要躲到那边森林去才对呵！”于是这位士兵很快的跑到一个群众家里拿了一件破衣服把[给]他穿上，轻轻的将他背到森林里去。最后，他低声的问道：“你有钱吗？我解些子弹<给>你”。黄同志说：“亲爱的弟兄，你们这么痛苦，我是应该接济的，但我现在实在没有呀！今后我希望你们拖枪过来，我们在一块来干！”这位士兵终于解了两排子弹给他，黄同志终于脱出了危险！这就可以看到白军士兵是怎样的好子，但我们以前还枪杀在前线被俘虏过来的白军士兵呢！有许多白军士兵拖枪来找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找不到手，几次的被自己的战士和群众吓跑了。所以他们有许多都怕我们，这又是多么的错误呵！据俘虏或自动拖枪过来的士兵说：范石生、罗启疆的队伍都是很动摇的，有许多远远的拖枪去找红三军，有许多我寻不着出路，一批一批的去当土匪去了。可是我们在白军中没有一个线索，也没有想办法打进去，就是纸头上的宣传鼓励工作，也同样做得非常的不够，对于土匪群众的运动，更是完全没有注意到了。

七、不加紧白区工作：鄂豫边农村经济的崩溃，特别剧烈，而一般工农劳苦群众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也更加厉害，可是过去鄂豫边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完全放松，没有建立密切的联系，没有经常的予以正确的指示。工会没有建立，农运完全放弃，广大的失业工人（如南阳等处）不去组织，普遍的自发的灾民斗争不去领导（如南阳、枣阳、宜城、襄樊、宜城）。眼看着敌人把兵力集中苏区，从容不迫的布置“围剿”，而白区的党，都没有领导过群众将敌人的后方骚扰过一下，也没有把敌人的交通破坏过一次。至于发动游击，领导暴动，以打击敌人和牵制敌人，那更谈不上了。因此襄樊、宜城等处有几个月完全空虚，仅仅只有极少数的民团，有几支枪在守卫，可是因为我们的白区工作，作得太可怜了，终于把它没有办法，这又是一个如何大的损失！！

至于军事方面，在转变工作的时期中，又犯着“左倾”的盲动主义的错误，这在前面已报告过了。总之，鄂北苏区的塌台，红军的失败，完全是一贯的机会主义所症结的恶果。所以鄂豫边党的领导不是正确的国际路线，恰恰相反的，而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路线富农路线呵！

在此，我们须提出一个问题，就是：“鄂北苏区究竟有不有恢复的可能呢？”我的答案是绝对有可能的！因为：第一，整个客观形势的日益发展；第二，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伟大胜利（中央区有其他苏区固然同样的获得

了伟大的胜利，但鄂豫皖和湘鄂西对鄂北苏区有更直接的关系，故特别指出）；第三，鄂豫边经济的总崩溃；第四，敌人内部的矛盾（即如范石生与罗启疆、刘镇华的冲突）；第五，白军士兵的动摇；第六，广大劳苦群众的革命化（鄂北的工农群众完全是我们的，虽然有一部分领了符号，但并不反动）；第七，我们自己还保存着部分的基础。所有这些，就是拿阶级力量来对比，在我们也是有利的。这就是恢复苏区的顺利条件，同时也就是敌人的弱点，谁也不能够否认的！只有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客观形势估计的不足，对于敌人估计的过大同时又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艰苦的去作群众工作。这样那就只有走向悲观失望的死亡的道路了。但在组织方面，我还要特别提出几点的：就是要彻底把成分改造一下，铁面无情的把一切阶级异己分子洗刷出去，尽量吸收贫苦工农分子，大胆的培养和提拔新的工农干部，来健全党的组织，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即省委及红九军总指挥部亦须改组一下，如何[郝]久廷（官僚右倾）、吴寿[首]青（红军政治委员，领导逃跑主义的首领，沈钟玉[宗源]的一个最好的崇拜者和拥护者）曹明久（总指挥，终日彷徨，昏迷，而且是一个盲动主义者）马三光（红军政治主任，两面派）等实不能领导的同志）。第二，就是要很快的把工作路线转变过来，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特别是集中火力，给右倾机会主义者以无情的打击，才能保证国际路线胜利地执行和鄂北苏区很快的恢复。第三，就是要中央尽可能的加紧鄂豫边党的领导，经常给他们以正确的指示，尽量供给他们一些干部人才（主要的是军事的，政治的及少共的）。第四，就是要加紧政治教育工作，提高一般同志的理论水准，使他们深刻的了解国际路线的正确，坚决为执行国际路线而奋斗。第五，就是要建立经常的肃反工作，把一切阴谋破坏苏区破坏革命的反动派彻底地肃清；同时在宣传教育方面，更要尽情的揭露一切反动派别的罪恶，来教育全党同志和群众。这样，我俩的一切胜利，才会有保障。

至于中央这次派我到鄂北去，虽然在短促的时期，经过许多极大的危险和艰苦，但我不能将鄂北工作很快的转变过来，同时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又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坚强性和顽抗性，去战胜和解决一切困难。如省委讨论临边问题时，我在会议上不能坚持我的主张，将山南游击队参谋长逮捕起来（我虽然不是省委常委，但我不坚持我的意见去战胜他们也是一个缺憾）。当胡万山叛变以后，我不能克服一般同志和战士的失败情绪，坚决的领导他们战斗到底，这点我应该拿出自我批评的精神来，承认自己的错误。我很热诚的请求中央给我以正确的指示（如指示出鄂豫边过去党的领导的错误，省委在转变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当胡万山叛变以后究竟应该怎样应付和解决游击军的一切问题和困难）和批评，同时更愿在实际工作中来表现。

虽然我这次经过许多极大的危险和失败，但我丝毫也没有灰心，相反的，这只有愈加锻炼了我的身心，坚强了我的意志，这点，我敢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向中央报告的。

最后，我要向中央请求：就是我在实际工作中，深深的感到自己的经验和理论之贫困，不足以应付和解决一种非常的事变（如最后游击军的事变，就是一个明证）我极恳切地要求中央给我一个时期的训练。希望中央站在培养和教育同志的立场上，允许我这迫切的要求！！此致布礼！！

左洪涛（郑文）上

七月一日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关于肃反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七月八日)

中央：

现在我只能将两个主要问题报告你们。

(一) 肃反经过与党的组织问题

自省四次代表大会后，我们对于肃反已有相当注意，五月间开始在天汉县（汉川之襄北天门之东的区域）破获，继在三军八师破获，以至破获三军中全部反革命组织，又因此线索破获全苏区整个反革命组织。现在可以说，反革命的全部组织已经破获，惟有个别重要嫌疑分子尚待证实。反革命组织之来源、系统及其阴谋，尚未全部弄清，但已知其大概。

红军中之反革命派是以第三党为主干。八师参谋长胡慎己（原九师参谋长）是一九三一年中央派到湘鄂西工作，他当时就是第三党的分子，他到湘鄂西同时是邓演达派来的。当时第三党分派到鄂豫皖的是许继慎，到湘鄂西的是胡慎己，还有中央区一人，广东一人（姓名他未供出）。

胡慎己到湘鄂西苏区后，即在洪湖军校担任教育长。

这个军校第一届校长是孙德清同志，孙到二军团去后，改派分子赵奇代理校长。赵奇是由湖北省委以同情者资格介绍到苏区的，这人是从前湖南唐生智所办之第三分校的学生，他说在长沙时是共产党员。

当时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傅光夏，此人是一九三一年中央派来，他在山东白军中做过工作，来时就是第三党分子。

后来刘鸣先担任校长，这人是苏联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学生，原系大学生，他的加入第三党是在回国以前，回国以后尚难断定。

周荣光是一九二九年中央派来，黄埔学生，此人去年曾任过军委参谋长及警卫团团团长，是从前军校的大队长。还有军校政治教员曾大庆，是李云龙部队过来的，在白军时是党员。陈庶全、刘庶值是黄埔学生，失掉党的关系，自己跑到苏区来的。王进前是苏联步兵学校学生。张向初是俘虏过来的冯玉祥部下的军官学生。杨岸是在安徽加入改组派。这些人都是洪湖军校的干部。当时的军校即是改组派、第三党的大本营，这个军校直到一九三一年四月才停办。这些干部就陆续分配在红军中工作，是为反革命派别之基础。后来他们组织有鄂西北军事委员会，胡慎己是军委主席。曾大庆和马健山这两人是陕西人，一九三一年在沙市运动李云龙部下兵变，做了有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以致失败，就带来一批干部。后来在监利与我们二军团作战的也是李云龙部，有一部分俘虏。这两部分是陕西人多，在红三军中占干部之主要部分。这些人在参加红军之先后是改组派，曾大庆、马健山是组织者，他们是在国民党要人刘守中指导之下的。胡慎己本人是四川人，与郭汝栋有亲戚，武汉时代充当郭汝栋代表。他到洪湖后就带来一部分他的学生和二十七团参谋长李孝候、十九团参谋长何俊杰、军校教官曾庆华、二十团团团长蔡祝封、前政委陈少枚、二十五团参谋长张杰，也是以同乡及师生关系加入的。陕西人、四川人这两部队红军干部是改组派、第三党基础。胡慎己说：三军中如果陕西人、四川人联合，三军就没有办法了。我现在把红军中重要反革命分子列表于下：

是反革命在反革命中红军职务姓名

哪一派任何职务七师参谋长赵奇改组派军委参谋处长朱元戎改组派师委

军委兼省委（赵参谋长周荣光第三党奇后派去的）
胡慎己（原八师参谋长第三党军委长兼省委名胡陈杰）军部参谋处长马健山改组派军委兼省委九师参谋长张应南改组派军委参谋处长董士秀
戴君实（即八师政治部主任第三党军委兼省委傅光夏）
周子服（莫师委（戴君实被八师政治部主任第三党中大学生）捕后派去的）九师政治部主任刘鸣先第三党军委兼省委又政治部主任吴凤卿改组派师委七师十九团政委刘革非国民党军委兼省委又前团长陈华山改组派师委又参谋长向北辰第三党师委二十团政委陈庶全第三党军委二十团团团长刘庶值第三党军委兼省委又参谋长张向初第三党师委廿一团前政委陈少枚第三党师委又政委李一成第三党师委（阵亡无口供）又团长蔡祝封第三党师委又参谋长张星三改组派师委八师廿四团政委苏继汉改组派军委又参谋长邓希禹改组派军委九师廿五团参谋长张杰第三党师委廿六团参谋长李平桃改组派师委（阵亡无口供）又参谋黄金谷第三党师委廿七团团团长杨家瑞改组派军委又参谋长李孝候第三党师委以上共计重要军事干部十九人：师参谋长四人，（周容光是赵奇被捕以后派去的），军部参谋一人，师参谋处长二人，团参谋长七人，团部参谋一人，团长四人（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四）。共计政治干部九人：师政治部主任四人，团政委五人（十九、二十、二十一两人、二十四）。又营长十六人以上：十九团一人——瞿海容：二十团三人（？）——李守三；二十一团一人——金耀良；七师警卫营营长——颜泽柱；二十四团三人——黄国州、谢锡章、龙惊廷；二十五团二人——史召德、刘可人；二十六团二人——黄竹清、田子俊；二十七团三人——欧正春、李文著、李树凡。再还有一严重的事实，就是七师特务队长、八师特务队长、连排长及指导员以下百余人。以上为二军破获状况。再说军委会直属机关：军委警卫团团团长周容光，参谋长萧×甫，参谋陈中奇，补充团团团长罗汉。军委第二科谍报科长陈新发，第四科人事动员科长李良耀，第七科管理科长朱振华，第六科交通科长邵西元，特务队副赵连迢。军委政治部宣传科<科>员一人。军委经理部二十余人。医院：院长二人，总务科长一人，医务科长二人，医生十人；军校：第二大队长一人，第三大队长一人，政治部宣传科长一人，政治教官二人，支队长一人。以上军事干部十三人（经理部在外），政治干部四人，医生六人。我上面已经说过，川籍以胡慎己为首的一派（第三党），陕籍以曾大庆、马健山为首的一派（改组派），是红军中改派的两大来源。此外，加入反革命的分子还有这几部分的来源：一、以前汉川游击队、汉川独立师一直到最后的汉川独立团。这个中间的一部分干部是老改派，如二十一团第一营长李守山，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回汉川，直到汉川独立团，他均在队伍中，他是一个老改。二、是张应南在宝塔州暴动时来的，以后编成二军团独立团。三、是拖枪过来，如王高×、陈诚部下、江防队等等。四、是监利保卫团。五、是贺龙同志从前的部下，如向北辰（十九团参谋长）、瞿海容、谷××，这些人是当二军团上山后，他们留在洪湖时悲观失望，在当时军校影响之下加入的。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在以上五十三个政治军事干部中，有四个大概是农民出身（如陈华山当兵出身，樵继汉富农，陈新发贫农，柳西元这个还不清楚），十个营长的社会成

分我不清楚。可以肯定的说，这里九十是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过去的来源，也可大概列出：俘虏来的五人：马光鲁、张星三、张向初 拖枪来的：陈华山；武汉时代是党员十九人，内有黄埔生八人；中央派来的三人：刘鸣先、周子服、朱元戎；监利保卫团一人：黄竹清；营长一级的不算在内，有些人来历不明。从以上的统计，我们就可以看出几个主要之点：第一，是加入反革命组织之分子，是地主，不是农民、工人。第二，这些干部不是苏区土地革命中产生的，不是本地的，而是从各种关系混入苏区和红军的。第三，这些干部是武汉时代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学生，混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的。第四，在这里也就暴露了一个严重问题，红三军干部的社会成份和政治成份之坏，在当地工农群众中没有培养出红军的干部，干部是以拖枪、俘虏来的为主，对于兵变兵暴来的觉悟的白军士兵也没有积极培养他们。以上的这些主要分子没有口供，没有审讯的只有下列数人：朱元戎、周子服、陈华山、刘庶值、秦祝封、周荣光（主要分子，团长以上）六人。附：营长一级还有数人未审。现在我们再把地方组织上的破获结果综合于下：省委委员杨成林（以前监利县委书记）、冯纯（沔阳县委书记）、黄秋松（汉阳县委书记）、刘腊喜（江南县委委员）、蓝育才（江南县委委员）。省监委：刘革非、侯蔚文。省组织部：部长杨成林，干事朱可亭、刘书谟、胡治国。发行部：部长陈克昌、干事李芳。省苏主席团：冯中×、周正（兵工厂厂长）；土地部：副部长陈祖培；红军中反革命分子的来源：经济部：部长栩栩；司法部：部长朱子贞；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侯蔚文；反帝大同盟：庄东旭；互济会：孙名观、袁少枚等；

党报：毛简青；

党校：校长侯蔚文，教务主任熊经斌，大队长王汝明；还有学生四十余人，占全体学生之半数。

以上重要分子二十三人，事务技术人员还有四、五十人。

江陵、沔阳、川阳三县的党的常务委员会，全是改组派包办。江南除一书记外也全是改派。监利、荆门、潜江、天潜、天汉、云孝县的组织内均有部分的改派，只有监利县委会尚能保证是共产党的纯粹组织。

地方上改组派的来源则很复杂，大约可找到如下：

沔阳：沔阳的党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员均自首了，后来这般自首分子又回到党内来，实为改派基础。沔阳县委领导分子栩栩是沔城一个官吏子弟，在游击战争时被游击队捉出来参加革命的，这个改派组织至今保存，因此县委常委均是改派。

江南：江南石首、华容两县，如张吉阶（过去石首县委书记）、张达之（石首县委宣传）、王子英这些分子，是当地豪绅混入共产党。李良耀、刘革非均是一九二七年以知识分子办农协之人物。过去华容县委书记冯世华亦是一九二七年学生。张吉阶自认是纯粹国民党，他是一重要领袖。此派人并非改组派，大约是蒋介石派或西山派。

天门：过去改派在天门有活动，当二军团在一九三一年打开岳口时，这班人混入苏区红军，如吴凤卿（九师政治部主任）是其一例。

江陵：过去江陵县委书记侯蔚文，在一九三一年时从上海回来，他是改组派的中央委员，这人是江陵以前的国民党常务委员，江陵的改组派是他建立起来的。

汉川：这地方也是改组派的老巢，在一九二七年失败以后，就有两个

共产党县委，有一个就是改组派的。

以上五具正是川阳、天潜、天汉、江南、江陵、潜江、沔阳现在改派的来源。除以上的来源外，还有几个人的来源值得注意：

毛筒青：此人从前是湖南的党员，在湖南当省议员，去年从上海来的。

张秋夜：此人是改派巡视员，他在中央和江苏省委住过房子，是一个西医。

尹锡福：本来是洪湖人，到上海九年，在中央特科做过工作。

除开改组派外，又发现托洛茨基派潘家洵、庄东旭在此的活动。

潘家洵到湘鄂西苏区后，一贯的继承立三路线的错误，一贯的进行反中央及中央分局的斗争。然而我们以为他不过是党内的一个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他是列宁学院学生，清党时没有受过处分，对他丝毫没有怀疑。此次发现反革命组织后，各重要首领均供潘为改派省委委员，有几人的口供完全一致，而且在潘家洵、万涛反中央分局的斗争中，团结的反中央分局斗争的分子，如刘革非、李良耀、戴君实、栩栩等均为改派重要分子，因此将潘、庄逮捕。经审讯结果，他承认是高衔[衡]介绍加入托派，并非改派（并未用刑审他）。昨天审改派省委书记曾大庆，据他说潘家洵是在苏联时加入，是某人介绍，这人忘记名字，是因同过顾孟余通讯而被开除党籍的。此事有几个由苏联回国同志知道，即是朱务善，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现还在苏联。

庄东旭虽未公开供认，她有书面声明书讲出自己与改组分子来往及工作反中央分局的斗争。

在以上这些组织，在地方上干部约三百人左右，至于下层群众，据供江陵他们下层组织比较健全，其余各县群众很少加入。

改派省委的名单尚未完全，省委书记亦未确定，因为他们多避免是主要负责者，根据各种材料，省委书记从前为罗汉（黄埔生），后为汪波洋或曾大庆，组织部长杨成林（即共产党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潘家洵，省委委员栩栩、马建山、刘鸣先、张吉阶、冯纯、黄秋松、罗汉、朱可亭、戴君实、胡慎己、刘革非、李良耀、侯蔚文。

改组派对青年的工作，是组织有青年工作指导委员会，少共省委组织部长董昌中、秘书长朱和山均是委员会人物。江陵、沔阳、江南、川阳少共县委均是改派包办，详情另见宋盘铭报告。

在地方组织上破获之改组派，在各县委负责的则有一部分雇农和贫农、中农的干部，如川阳、沔阳、江陵县委之书记及省委组织部长，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些人均是老的改组派，因为湘鄂西过去党的干部多半是地主、富农分子，如栩栩、侯蔚文、张吉阶、刘革非等。中央分局成立后，在工作过程中，撤销了几个成分不好的县委书记，如张吉阶（石首）、冯世华（华容）、吴沧然（汉川）、侯蔚文（江陵）、陈新镐（天门）而代替以工农分子。可是提拔工农干部只是形式上成分上的提拔，而没有考查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态度，还是提的老的干部（实际是老改），没有吸引在斗争中在生产的群众中的新的干部，如冯纯、萧子和、许永久、杨成林等均是老的改组派分子。而且过去对肃反不注意，如许永久本来在两年前有人供过他，但此事实省委有人知道，没有人出来报告，如省委组织部长杨成林，他在监利在省委工作均是很积极的，在党内很有点信仰，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他一点，就是在省委扩大会议时，反中央分局斗争中他采取的是圆滑态度，在四代会时他亦没有积极出来反对机会主义分子，四代会被选省委任组

织部长，才表面上反对潘家洵、庄东旭的错误，这是他的两面派的手段。他曾经这样对栩栩说，“你现在应该出来反对潘家洵，因为湘鄂西党员通通起来反对潘家洵，你不反对是立脚不住的。”

反革命组织的发展，大概有几个时期：

第一，是第一次“围剿”湘鄂西苏区受着严重失败之时，他们在党中。群众中说，现在应该找出路。什么出路呢？就是加入改组派，“脚踏两边船”是他们的口号，许多在失败中悲观失望的分子就动摇了。

第二，在第三次“围剿”，江南政权失败之后。

第三，在湘鄂西苏区被水灾以后，在这一年间灾荒斗争的困难中，他们玩玩[了]很多阴谋，最主要的是混入灾民组织向贫农、中农乱斗，利用灾荒的困难鼓动人脱离苏维埃革命队伍，认为在水灾之下苏区必然失败。

第四，是在三军回到苏区以后，在三军中的老改与在洪湖中的第三党就开始大联合。

第五，是在中央分局提出改造红三军，提出反军阀制度、反游击主义倾向以后，红军中阶级异己分子更加动摇。

第六，在第四次“围剿”开始以后，他们积极帮助害怕敌人的“围剿”。

我们根据各种材料，湘鄂西改组派、第三党之形成；是由于党内苏维埃内红军中混入有地主、富农分子（改组派重要分子大半是地主）。在阶级斗争剧烈化，国内战争日益扩大的条件之下，他们企图乘机作复辟的企图。

在党内两条战线斗争加剧和红军中反军阀制度残余、游击主义加剧条件之下，更使他们在积极活动来反抗共产党和苏维埃，更暴露他们的阴谋。在地方上，是在平分土地、反富农斗争中，地主残余富农的反抗（如监利少共县委××即一明显的例子，他曾经公开反对平分土地）。这一改组派之形成与破获之过程，正是阶级斗争进展之过程，也即是共产党内列宁主义与机会主义斗争之过程，肃反正是表示党走向健全化，苏维埃、红军日益巩固，特别是红三军在肃反当中同时作了八天八晚的战争（同时在火线上肃反），击溃了敌人四十四师、四十八师、四十一师的进攻，巩固了襄北根据地，继续又取得消灭白军第四师十二旅全旅之空前未有的胜利。这些事实就回答了党内因××在肃反而引起干部恐慌条件之下，以为肃反削弱了党的干部的见解是极不正确的右倾情绪，也回答了认为肃反是党内逮捕来报复反党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些机会主义的情绪，正与反革命分子所述相呼应。曾大庆（改派省委书记）对我们说：“你们的干部怎样办呢？”我们回答“提拔下层工农干部。”他又说：“下层工农干部怎样知道办事呢？”这正是地主、资产阶级向我们示威的论调，我们只有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学习精神来解决我们的困难。

胡慎己在监狱中还宣传：“这次肃反是派别斗争，凡反对中央分局的分子均已逮捕，几个师长一定会向中央报告。”我们看反革命的首领在监狱里还在继续他的阴谋，企图红军分裂，企图红军下级指挥员反对上级指挥员，然而党内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克服了机会主义，取得政治上的一致，将反革命的阴谋打得粉碎了。

（二）反革命派在苏区活动的阴谋

这些反革命分子在湘鄂西苏区所作的阴谋，真不容易数尽，举其大者：

第一，是帮助蒋介石进攻苏区。胡慎己同范石生、刘培×、张振汉、郭勋这些“围剿”苏区之军队，均有密切关系，信使往还。地方上的改派同沙

市、监利、新堤各处反动豪绅有关，如有一个女子李启明，藉口做白区工作，来往岳州、长沙及赤区，实际是侦探和改派交通，省委已经决定监视，可是被组织部秘书朱可亭（改派）放走了。江南政权之失败，敌人最近进攻天汉苏区、川阳苏区、江陵苏区，以及此次川军四路大举进攻苏区，均有改组派内应。在川军进攻之时，侯蔚文就去布置，组织有一行动委员会，就是准备反革命暴动的组织。川军进攻时，改派就领导地方武装无条件的退却，一直退到宋家埠头，他们等到川军到老新口，就准备放弃余家埠头，将枪从白鹭湖地出去投降川军。可是这个最后的企图，被我们用果决的手段将县委、县军事部长、游击队队长通通逮捕了。那时川军正占驻老新口积极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认为内部肃反是消灭敌人“围剿”的先决条件，所以决然把反革命把持的游击队改编。过了两天，这个游击队与红军配合，缴得了敌人枪械百余支，取得大的胜利，这是值得叙述的一件事。相反的，沔阳警卫营只逮捕了一个营长，一个营政委，连、排长没有换，在川阳与敌人作战中，有一连人在火线上举行了反革命的暴动，使我警卫团受了相当的损失。在三军每次与敌人作战的时候，反革命分子（特别是胡慎己）用种种方法来破坏我们的军事计划，如在去年攻林河，胡慎己、周荣光未得命令即放弃攻击任务擅自退下；如去年九师占领沙洋胜利后，胡慎己极力主张把队伍拖到房县去（九师远离苏区错误之形成，胡慎己在此玩了一个阴谋）；如三军回来巩固潜江之一役，胡慎己一开始就主张退出潜城；如七天七晚激烈战争时，胡慎己、戴君实说军部计划不对，反对军部向七师师长提议要在火线上开会讨论；如八天八晚张家场之战，赵奇不执行命令，放弃李家场，以致被我们围困张家场一星期之敌军卒被突围而逃，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军事上的阴谋是很多的。

第二，反革命分子不仅是在作战上给反革命军通消息，放走敌人，还有一个很大的阴谋，就是破坏红军的团结。他们时常公开反对军部、军委的领导。刘鸣先在长寿庵参加改组派的会议说：“军委命令对于我们有利的是要执行，对于我们不利的不要执行，军委会派九师监视我们，我们最好拖到襄河南岸，好接近汉阳”，好准备拖到武汉去。特别是胡慎己在红军中散布的谣言，他对军部管理科长张杰说：“三军中段德昌是一派，段玉林是一派、军委会相信玉林，不相信德昌，所以叫八师在后方，九师派到襄河北岸”。这就是他挑拨离间的手段。

第三，就是他们在医院中的阴谋。如第一医院总务科长私藏洋盆千余个，不发给各诊疗所，使伤兵不满。医生故意在治疗上陷害干部，延长他们的时间，浪费药品。

第四，在兵工厂的改组派将炸药装在子弹内，使我们自己造的子弹时常炸坏枪支。

第五，他们在地方警卫团、警卫营，游击队中发展反革命组织。如天汉、川阳、沔阳、江陵最为严重，川阳的游击队实际的秘密的准备改编保安团。

第六，私藏枪支、子弹、银钱。江陵改派私藏现金五千元、枪支六十支，汉川独立团藏连枪、子弹及现洋。

第七，他们在苏维埃中就是曲解或不执行苏维埃的政策，首先就是阻碍土地革命的运动。如江陵、沔阳是老的苏区，土地还未分完，在土地平分中隐瞒富农土地，损害中农土地。潘家洵却高唱集体农场、劳动组合的高调，在经济政策上破坏合作社。在栩栩，潘家洵领导的经济部却高唱扩大苏维埃

企业的口号。在修堤问题上，沔阳、江陵之改派完全怠工不做；在潘家洵的堤工外交政策之下，领导群众希望敌人修堤，购买良民证；在财政问题上，故意滥发水利债券以及侵吞公款等等，最后则说到改派、托派在党内的活动。

改派、托派对党的策略，开始是想用种种方法来握取党的领导权，首先就是企图推翻中央分局的领导。潘家洵反中央分局的斗争是从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至省委扩大会议时，利用江南失败和三军退出潜城就开始反对中央分局和军部的斗争。这些反中央分局的积极分子是刘革非、李良耀、潘家洵、栩栩等。他们当时准备推翻中央分局的领导，推翻省委的领导，以杨成林为省委书记。在扩大会议中，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得到初步的成功（因中央分局两个同志，一个夏曦到军部领导三军到襄河北岸去了，盘铭同志到上海去了），他们就说夏曦在湘鄂西不能立足了，我们可以出头了（曾大庆对马健山说）。改派当时满以为在脊代表大会中就可以改组省委，取得党的领导。及至四次代表大会在中央指示之下克服了反中央分局的机会主义的分子，严厉的打击了潘家洵、万涛反党的企图，改派计划不成，他们乃转变计划组织暴动，因此有五月十八日天汉暴动之计划。

天汉暴动是怎样一回事呢？就是八天八晚战争以前、徐源泉以四十八、四十四、四十二师向我们进攻。分两个支队，一攻天汉苏区，沿襄河而上至天门；一攻皂市、沿汉宜汽车路前进。反革命派八十二师容景芳部即以其营长张西侯进到苏区与天汉军事部长杨国民密谋在红军中在游击队中的暴动，这件事是被我们破获了。张西侯、杨国民捕获，破坏了这一计划，所以五月九日至五月三十日经过二十一天的激战，特别是八天八晚的战争，将徐源泉这次进攻打退了。他们两个支队并没有取得联系，四十四师之五旅被我们围困了一星期，被我们击伤×旅长一名、团长一名，因此四十四师仓惶逃回皂市、应城了。反革命的进攻和暴动、结果变而为红军，苏维埃的胜利，这就是开始肃反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要值得特别指出的就是反革命的活动，是在党内机会主义掩盖帮助下，特别是万涛、尉士钩、戴补天、彭国才这些同志与反革命分子潘家洵、栩栩、李良耀、刘革非作了亲密的联合，莫斯科中大李剑如派与托派的联合，鄂豫皖曾××帮助了许继慎等的活动，在湘鄂西也不是例外的事，特别是潘家洵做了反革命组织中理论上的领导，同时也是万涛同志的军师孔明先生。

就上面说漏了的再补充的就是改组派、第三党他们已经联合组织一新共产党，这是潘家洵领导之下组织的。他们用新共产党的名义的用<意>是：1、改组派名声太坏，2、他们总联合是新共产党，但仍保存各自的独立组织。

我们怎样同反革命团体作斗争。在今年四月，我们就特别注意肃反问题，当时中央分局讨论了怎样同反革命团体斗争问题（有一决议，已写交中央），主要原则是利用鄂豫皖经验，将肃反造成群众运动，以后个别发现反革命分子就举行公开审判，肃反宣传大大加紧了。同时定出有自首条例，发表传单，号召被欺骗压迫加入反革命派之分子自首。

当红军中开始破获以后，我们就坚决从将肃反造成群众运动出发，在火线上就在各连报告，揭发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以及破获的情形，大大的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火线结束以后，在红军中各种大会（连战士大会、党员大会、积极分子会议）号召群众肃反，检举嫌疑人，号召自首，在各种会议自首是很多的。在地方上各机关也是如此做，现在已经不是一批一批的逮捕，而已

开始一批一批的自首（江陵、沔阳、红军、省各机关），这次大的破获没有形成恐怖心理，而且大大的提高群众积极性，这是我们工作的结果，也即是执行中央肃反路线的结果。

在肃反当中我们已经表现明显的阶级路线，分别出工农阶级与地主、富农阶级，分别出主动的与被动者，下层工农分子现已有三百人恢复自由，组织生产队、训练队加以特殊训练。对于这些反革命首领，现在各种群众团体及红色战士快邮代电如雪片飞来，要求处决反革命首领胡慎己、侯蔚文、戴君实、栩栩、潘家洵等等，表现出阶级的仇恨。

在肃反以后，群众运动也大大的开展，省苏所在地之赤工三大会公开审判反革命的张西侯、韩昌竣，并有改组派分子报告改派的罪恶，群众到者二千余人，当场报告参加红军的六十三人，这是湘鄂西从来没有的事，同时在群众大会中也有十余人自首。在沔阳峰口召集的群众大会报告改派罪恶，群众非常高兴，群众当场把有嫌疑者监视起来，主席台一数到某人的名字，群众说这人正在这里，就把他捉起来了。报告改派破坏春收修堤运动，农民说：“早知如此，我们的田都要多种些。”

在肃反中个别错误是有的，这一方面表现在因干部恐慌而引起的失望情绪，另一方面却仍是乱打、偏于刑审，不开展群众运动的立三路线残余，中央分局、省委曾经及时的纠正这些错误。

我们现在还在肃反的进展过程中，群众运动的开展还是非常不够，正因为没有深入群众，下层干部还没有充分涌现出来，我们正在积极加紧这一工作。现在筹备从七月二十九日至“八一”举行公开审判（襄北一带预计六百个代表参加，襄南一处预计四百代表，每×一处预计每处三百代表），在公开审判中预计吸引四千人到五千人，从乡村、从红军游击队来的代表参加审判。在“八一”节再举行群众审判，须吸引九、十万群众参加审判，然后将首要分子在群众面前处决。

反革命分子虽然大部分肃清，但是党内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亦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并不能以肃反代替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应以肃反为工作的推动×，积极发展自我批评，检查各种工作，加紧实际工作。目前党提出来的实际工作就是：1、动员五千人到一万人参加红军；2、抢堤保障秋收，将荒的田种下，将土地分完；3、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4、加紧拥红；5、彻底执行劳动保护法。

我们在肃反当中反机会主义斗争中，感觉得苏区有清党清洗机关的必要，我们拟开始部分的清洗，如军校、党校、军医院、红军、省苏各机关、地方党的组织及江陵、沔阳、川阳反革命基础较深之区域，详细办法正在提议中，中央以为可否？

肃反以后干部自然减少了，这是当前一个困难，只有工作深入下层、只有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只有提拔下层工农干部，才可解决。现在实际状况如下：

政治工作干部：

军委政治部仅有一个主任，缺组织、宣传两科干部；

三军政治部仅有一个主任，缺组织、宣传两科干部；

八师政治部仅有一个组织科长，缺主任及宣传科长；

九师政治部缺主任及组<织>科长，仅有一宣传科长；

团政委：缺三个团政委。

党校、党报人才：一个党校、一个党报没有人办。党报是李沛泽编，可是她在清党时受严重处罚，现又没有党籍，已决定调开，尚无人可以接替。

军事干部：缺三个团长，其余各团团长均是很弱的，缺师参谋长二人（七、八师）；军校缺政治军事教官；军委缺各科科长，仅有唐赤英同志一个孤君寡人的参谋长支持门面。

缺乏医生。

缺各县中心干部。

在苏维埃、党的组织的干部<中>，大胆的提拔下层干部，但是政治工作人才、党报党校人才、军事人才、医生，这些人才都不是两三天培养得出，而是一年两年造就出来的。便是营长健全还可提升，但是营长被淘汰的已有十六个，就难于提升了，但是已提升了五个营长当团长去了，你们就可明瞭现在的干部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状况之下。请中央能够补充我们几个能为党的路线斗争的知识分子和红色军官！！！！

至于各县干部问题，江陵、沔阳、汉川这些地方，省委将各县委解散，即指定一组织委员会临时负责，即在肃反中提拔下层干部建立新的领导机关。游击队教[派]干部去改编，现在江陵、沔阳均已建立起领导机关了。

肃反的结果，我们是得了很大的教训。我认为中央分局成立后，对于改造党的任务是放松了，对于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发展自我批评是异党不够的，还有其他个别的错误，特别是对于肃反的忽视。因此，就使反革命的组织破获得太迟，这是我们的错误。可是一年以来，湘鄂西苏区不仅没被改组派破坏，而且巩固和扩大了苏区，相当的恢复水灾中的困难，这正是国际路线执行的结果。有的同志认为在肃反以前红三军是改组派的军队，肃反后才是共产党的军队；有些人认为是党的领导掩盖了反革命的活动；有些人认为破获改组派是偶然的或是那一个人包办出来；有些人认为只是四次代表大会以来才开始两条战线的斗争；有些人要问国际路线之下为什么还有这多改组派？我在上面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次肃反胜利，完全是四中全会湘鄂西成立中央分局一年以来与立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胜利的结果，四次代表大会是总结和深入这一个斗争的关键，正因为一年来团结了提拔了一部分工农干部在省委、省苏、县委及红军中间。因此，省委、省苏、军委会、军部均是团结在中央分局领导之下，可以使肃反更加顺利的进行××在肃反中动员广大的群众与机会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中央分局和全体会议曾经讨论过这问题，一致的给这些不正确观点以打击。我们完全相信，在彻底肃反中，在无情的与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中，改造党的组织，将使湘鄂西党巩固起来，取得更伟大的胜利。我们希望中央给我们以更具体的指示来帮助我们前进！

我因为事情很忙，交通要走，匆忙写了这个报告。候肃反告一总段，我将作更有系统的报告。

夏曦

七月八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宜昌特委关于秋收斗争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全国经济总崩溃的前面，工人的普遍失业，农村经济完全破产，致广泛的工农劳苦群众，是日益走向饥饿、寒冷、疾病、瘟疫、死亡的道路。同时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为了保存其特殊利益，为了四次“围剿”苏区红军，更加紧的实行鸦片公卖，发现无奇不有的捐税重利。这样使工农群众更濒于绝境，为了自己的生活，坚决的向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作斗争。

二、在四次“围剿”中，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利用各种残酷的剥削的方式，来掠夺秋收、破坏农村的经济。在宜昌区的荆当、当阳、枝宜、松滋、公安等县，豪绅地主阶级残暴的烧杀、清乡、劫夺谷米。农村寥落，田园荒芜。更利用生谷息与各种高利贷等，来破坏与掠夺劳苦群众的收成。因此对保障群众的秋收，确实成了宜昌党的目前中心任务。

三、在秋收斗争任务下，当阳党要提出“反对十五串钱还一石谷”，“反对高利贷”，荆当党还提出“反对清乡来掠夺秋收”，“回家去收谷子”。枝宜党要提出“反对生谷息”“反对斗麦还五斗”；在松滋、公安党同样的要针对着当地实况，决定党的斗争口号。要在秋收斗争的口号下，动员极广泛的群众，来为平分土地的胜利而斗争。

四、我们秋收斗争的具体办法：

1.广泛的宣传豪绅地主阶级利用民团清乡与各种剥削方式来破坏秋收的事实，动员群众来为着秋收而斗争到底。

2.利用游击队、赤卫队的武装，配合群众力量，来反对清乡、袭击与消灭民团，来保障群众的秋收。

3.把逃出外面的群众，组织秋收斗争团武装他们，动员他们回家去割谷。

4.组织反对生谷息委员会、反对捐税委员会等，来保障群众秋收的实际利益。

5.普遍的发动抢黄粮、分粮等斗争，来响应各地的秋收与保障秋收。

6.在秋收斗争中，主要的是发动群众向豪绅地主富农斗争，但对无阶级性的乱斗，造成赤白对立的现象，我们要严格的注意与防止。五、在秋收运动的任务中，我们要把秋收斗争的总的目标，放在平分土地、建立政权的上面。要使秋收斗争的胜利，要坚决打击忽视武装群众、平分土地、建立政权的右倾观念，同时要防止忽视秋收运动，而只在喊平分土地、建立政权的“左”的空叫，使秋收的斗争的胜利，燃烧起长江上游苏维埃运动的烽火，来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完成一省与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任务。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原文缺序号“一”。

中共宜昌特委给枝宜县委的指示信——支部工作、对编练队的策略、游击队工作、反富农斗争等问题*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枝宜县委：

特委讨论了你们报告及扩大会决议，认为一般的是正确的，但是看不出你们目前工作重心在什么地方。在决议上有许多地方是点酌[缀]，如“改造支部工作”没有说到用什么方法改造，如“围绕平分土地任务上面发动各种斗争”，究竟发动些什么斗争，怎样去发动，都是非常空洞，这样决议，对于工作是少有帮助。根据这些缺点，有<以>下的具体指示：

一、改造支部建立支部工作，是目前工作中心的中心。现在支部没有工作，在群众中领导作用不大，党的决议不能传达到群众中去，尤其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既不能开展到支部，彻底转变工作方式，是少有效力，要加紧发动全党同志，作改造支部工作运动。对于发展党员、加强党的领导工作，更做得不够（只有二百多同志），你们必须讨论特委对支部的工作决议，具体规定支部工作，要在最短期间收到效力。

二、由分粮掀驼子斗争发动了广大群众参加，七八百人打鸦、横的敌人，证明群众斗争已经走上直接行动，今天的问题是“平分土地建立政权”的阶段，绝不是一定要有好多武装，才敢执行平分土地，是说要怎样发动群众来实现平分土地运动，如肃反、骚动敌人、反清乡、夺取敌人武装等斗争，都是紧迫，在平分土地上面，是发动群众的方式，要坚决反对借环境不好或怕昙花一现的胡说，或以困难来掩饰平分土地的消极。

三、周围豪绅地主压迫和欺骗群众，组织编练队来向赤区进攻，当然是很危险。但是绝不要认为编练队群众都是不要革命的，他是受反动派的利用，他们的日常生活必然更加恶化，我们只有以党的政治影响，组织力量去打碎反动派的组织，目前要扩大平分土地口号，把群众从敌人手[中]夺取过来。就是我们的群众被敌人利诱加入编练队，也不要认为他是反水，我们的群众是不会反水的，是受了敌人欺骗和领导，必须坚苦耐劳深入群众，揭破敌人欺骗，使群众回到革命战线上来。因此我们的工作方式，一定要随着环境转变，由公开而秘密，由秘密而公开，以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领导群众进攻敌人。若不认识群众，只看着敌人，一遇到困难就会逃跑。

四、你们对游击队运动，还没有学会。现在行动区域很狭小，不能开展到无组织地方发动群众建立组织。至于游击队开支，每月二百元，这样开支是把游击队养成雇佣观念，阻碍游击运动的发展。现在红三军战士，每月一文钱都不开支。游击一大队已经转变，都是由战士自动去打给养，不但没有什么困难，而行动更加积极。你们要马上去说服游击队战士，发动他们向雇佣观念作斗争。就是被迫群众，也采取这样方式，组织被迫团或游击队，到处去参加发动群众分粮，到斗争中过生活。

五、反富农斗争问题，在报告上、决议上没有提及，你们过去对富农是两不侵犯，等于保护富农，这就是富农路线。我们在斗争中，应给富农各种打击，才能动员农村基本群众积极性，更能巩固与中农联盟。各乡贫农小组马上组织，加紧反富农斗争。

六、审查你们预算和决算，特别费每月都是好几十元，不知究竟作何种开支。生活费也应该减少，并且要不开支。你们对经济开支是有些浪漫[费]，

每次交通来买很漂亮的東西，这次团的交通被捕，完全是因胶鞋及各种怀疑物品。以后要特别精确，才能转变党的经济观念。要钱才有工作，绝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是阻碍群众工作的开展；要纠正同志雇佣观念，须从你们县委起，由上而下的不开支生活费，作反雇佣观念斗争。

宜昌特委

七月二十一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宜昌特委给当阳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信——党的组织工作与群众工作

*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当阳工作委员会：

据宗礼同志报告你们最近工作情形，特委有[以]下的具体指示：

一、你们的工作开始建立，各处都没有什么头绪，要积极的、有计划的把三、四区工作恢复，一、二区工作才有帮助。五、六、七区现在没有线索，由特务队去打反动哨线，杀反动派，散发宣传品，或由各方面设法找着线索。

二、对于发展党员工作，做得非常不够。三区有群众二百多，同志只有八人。要大胆的吸收雇、贫农入党。以前的同志必须详细考查，凡自首的同志，决不能恢复党籍。

三、党的秘密技术，你们要特别注意。因为恢复工作时候，敌人侦探令人不易察觉，尤其是敌人压迫最厉害，被捕一个同志，可以动摇全体。因此，支部与支部，甚至小组与小组，同志与同志间，都不要发生横的关系。工作方式及行动上都要注意到技术。

四、目前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发动群众分粮，抢黄粮是动员群众的行动口号，你们要艺术的、普遍的发动起来。反生谷息，也是当阳最中心斗争口号。至于恢复失败区域工作，不是机械的拿着这几个斗争口号，一定按着群众情绪，如反捐税，不替敌人放哨，不受敌人监视，特别是批评以前的错误，艰苦耐烦作解释工作，汇合各种各样斗争，回复群众失败情绪。

五、反过水的地方，你们绝不要认为群众都是反水，我们的群众不会反水，只有机会主义者才会不相信群众。因为被反动豪绅地主、富农领导，我们要设法夺取回来。若一味的不管，说没有办法，是十足的机会主义。把群众奉送到敌人，逃跑的也就是由这样出发。

六、你们要切实学习过去失败教训，讨论特委指示信，决定你们工作计划，并要详细报告特委。与荆当县委要取密切联系。

宜昌特委

七月二十一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宜昌特委关于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巩固党的领导决议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在坚决的执行国际和中央路线，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暴露了一切机会主义的实质，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如当阳），一切悲观失望消极怠工的右倾腐化的自由主义及立三路线的盲动（事见特委《冲破敌人四次“围剿”加紧两条战线斗争的决议》），先后遭受了党的无情的打击。可是有些机会主义的分子，在受了打击当中便企图用两面派的手段，来从另方面向党的领导进攻。主要的是：

第一，表现于不相信党的领导。例如公安县委借口划归省委指挥，不愿与特委发生组织关系，不愿意受特委指示。枝宜县委在供给特委的经济关系上，总是吱唔推倭，没有正当的任务看待。又如雨三、×亮同志认为特委人员太多，没有事做无聊，只会扯烂污。

第二，表现在自由主义的谩骂。如雨三，×亮同志认为特委对当阳工作的一切指示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帮助县委执行到下层去，是官僚主义。依他们看来，特委没有派巡视员到那里，便是官僚主义。又说特委再不派人来荆当，我怕荆当工作一失败，你们连饭都没吃的。

特委很严重的讨论了这些事实，并决定如下：

一、特委认为雨三同志等的这一类发言，完全不合事实。正因特委坚决的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配合各县实际情形，才能有正确指示，难道这就是雨三同志所谓“官僚主义”吗？特委因客观的困难，至今没有建立巡视制度，这是个别的缺点。雨三同志企图利用个别缺点向党的领导进攻，企图把党的正确领导与官僚主义对立，特委认为这不是利于工作的自我批评，而是自由主义的谩骂。

二、特委认为一切不相信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企图，一切自由主义的谩骂，都是机会主义自由主义者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受了严重打击，不得不有组织的，或个别的从旁面向党作报复主义的反攻，这都是深入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障碍，这都是“左”右倾机会主义有力的助手。

三、特委认为在以革命的进攻，具体的说，就是在以扩大长江上游游击运动与宜沙职工运动来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战斗任务的执行中，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一切自由主义的谩骂，一切调和派、两面派都是党的路线的执行的敌人。集中党的大力，打击主要危险的右倾，同时打击“左”倾、调和主义、自由主义和两面派等，这是巩固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的先决条件。因此，特委号召各级党部将这一决议配合特委《关于冲破敌人“围剿”，加紧两条战线斗争的决议》提到××会议讨论，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到广大群众中去，到实际工作中去，是执行党的战斗任务的中心工作。

四、最后，特委认为在执行党的战斗任务中，必须与实际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奋斗。特委号召各级党部，发展真正无产阶级正确的自我批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来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一切错误与缺点，改造党的全盘工作。但同时特委必须严重的指出自由主义的谩骂，绝不是自我批评，自由主义的谩骂是绝不允许的。特委号召各级党部坚决的加紧反倾向斗争，巩固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而斗争。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宜昌特委对荆当工作决议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特委听了宗理同志报告后，有[以]下的决议：

一、荆当群众由分粮斗争，已发动了一万以上，目前走到直接平分土[地]建立政权的更高阶段，尤其是红独立团这次来荆当，更把群众斗争情绪提高，已经坚定了为土地为政权而斗争的决心（平分土地继续在执行）。但机会主义者不是这样说法，以为红独立团来把祸惹大了，完全是闭着眼睛，看不见群众力量，只把游击队的枪杆子来同敌人对比。现在被敌人压迫最严厉地方是一、二区，三区一部份，只有极少数的受到敌人欺骗，大部份是在同敌人肉搏，顽强性的抵抗，就是被迫群众，还是经常作骚动工作，并没有丝毫的退却。这些事实证明群众斗争，没有被敌人镇压，相反的是正在开展。肯定的说，在荆当群众的今天，是平分土地建立自己的政权问题。

二、敌人欺骗，是发良民证，但良民证捐四串钱又是群众心窝里最痛恨的事情，敌人因群众不能受到欺骗，仍然伸出血淋淋的最残酷手段，在周家集以机枪扫射群众，到处屠杀群众。群众更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只有干，才是出路（群众说不领良民证是死，领良民证也是死，只有干）。因此敌人力量是削弱的，没有办法解决群众斗争问题，绝不要说他会杀人，只看着x的枪杆子。

三、在敌人“围剿”中主要危险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区委都跑来县委，县委也准备向东走（老苏区），一贯的是不相信群众，把敌人力量估计过分的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不简单是胆怯。要把跑的同志啐[喊]转来，只有拿着群众斗争经验，怎样去争取和坚决的领导群众，怎样去发动农村基本群众，巩固阶级战斗力量，怎样把群众工作方式随着环境转变，由秘密而公开，由公开而秘密。学会布尔什维克群众工作，巩固党的顽强性的战斗策略。这样才能[在]政治上、实际工作中肃清逃跑机会主义。

四、党在群众中领导作用非常小。一万以上的群众，只有二百余党员。四区党的成份很坏（杨维臣是保董还是党的工作人员），完全是关门主义，忽视了党的领导问题，任群众自动发展。各乡群众斗争多半是区农委长及乡农委长领导，少有党支部作用。特别是团的工作更弱，团县委不但没有工作，对各区连情形都不知道一点，下级基础更谈不上什么，证明党对团的领导是完全忽视了。

五、对于赤区周围的乡团，不是专门去打，演成赤白对立现象，要打入乡团里面，分它的阶级，夺取下层群众。至于分粮斗争，要发动当地贫雇农参加，绝不要无阶级性的乱斗。

根据以上的错误，决定以后具体工作：

1. 恢复失败区的工作，一定由公开而转入秘密，工作方式更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就是群众领良民证，要以各种事实揭破敌人欺骗，打消群众对良民证的幻想，抓紧“不替敌人放哨”、“不出良民证捐”、“民团捐”、“民团是豪绅地主压迫群众的武器”等斗争口号，发动群众经常骚动工作，肃反（在跑反、被迫，都能肃反），打敌人哨线，特别是保障秋收运动，定能动员广大群众。这些斗争与平分土地、建立政权是丝毫不能分离，并且是最积极的在这中心任务上面发展。在三、四区，要马上完成平分土地，不要藉环

境不好来掩饰着消极怠工。别区以乡为单位，尽可能的切实执行，谁个对这任务执行的迟缓或动摇，就是荆当群众的罪人。

2. 游击一大队经这次逃跑后，失败情绪非常浓厚，县委要加强政治领导，在这一斗争中转变下级成份，目前行动，坚决执行县委第一次常会所决定路线，打陈家场、雷家港子，威胁河溶，扰乱敌人后防，配合各区赤卫队，选择敌弱点积极行动。不要因子弹缺乏，战斗力不强，来变更行动策略（据冠白同志说又拖跑了，是否事实？）。

3. 荆当工作中心任务，在今天是党的领导问题。必须由下而上建立起来，打破以前关门主义，大胆吸收雇贫农积极分子入党。把这一问题提到支部讨论，作发展党员运动，特别是成份问题，严防豪绅地主富农分子混入党内。过去当阳失败是我们最宝贵的教训。改变过去手工业的工作方式，肃清事务主义，把工作重心放到支部上面，这样才能健强在群众中的领导，才能彻底作两条路线上的斗争。

4. 对于群众组织非常松懈。有些地方，豪绅地主统治没有根本推翻，保甲都存在，在群众中还有相当作用。这次二区一部分反水，完全是党的机会主义领导结果。各级革命委员会在群众中还没有多大威信，经常发现乡农民委员会长贪污、命令和压迫群众的事实。必须由下而上的改选，才能巩固群众自己领导机关，特别要加强党团作用，把党的政治很快的传达到群众中去。5. 争取反水群众，必须把反革命的一切罪恶，由群众日常斗争中揭破。过去工作错误，如一律焚烧契约，要耐烦的向群众解释，以自我批评精神指出以前那些不好，以后应该怎样干，使群众从斗争中兴奋起来。无情的打击以为群众要受敌人欺骗，接良民证就是反水，不相信群众[的]右倾观念。6. 团的工作不建立好，是党的工作一部分损失，党必须经常检阅团的工作，在政治上、实际工作中作具体领导，不要说是他们的事，有意无意的不管闲事，成了取消态度。要在最近帮助把县委成立，万一没有干部，党也要分配一、二个干部到团负担工作。7. 拥红、拥苏、反帝工作没有建立过，这是不了解党在目前的紧迫任务，对于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还没有深刻的相信。发动群众工作是消极的。8. 由四区、二区恢复五区工作，一区工作暂以临时区为基础，向烟墩集、黄家集发展。三区要发展与当阳五区取联系；四区向东发展，以老苏区打成一片。9. 反动乡团组织，必须动员群众组织力量去消灭，绝不是单纯军事力量可以征服。民团及驻防白军中的工作，在冲破敌人四次“围剿”中非常迫切的任务，必须有计划的建立工作。

10. 执行以上工作任务，坚决肃清一切机会主义，主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必须集中火力，向它作长期的残酷的斗争。

宜昌特委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共宜昌特委对公安县委的指示信——对群运、游击队工作，组织领导等问题的批评*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日)

公安县委：

特委听到寿全同志报告后，对你处工作的讨论，觉得从立三路线转变到国际路线的当中，你们是深深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主要的表现在：

一、完全忽视了群众工作，不了解国际路线就是群众路线，对群众斗争的领导与发动是消极的，尤其是对争取捕东等区反水群众，采取自由放任主义。

二、把游击队看成军事工作，用游击队代替了群众工作，步步退守（由捕东退捕西七、九、十等区）凭游击队去东打西闯，闹得身无立足之地，就放弃了九、七区一部分群众，完全逃跑到苏区，不知转变我们的队伍来深入群众，争取群众。

三、不信任指导机关，借口要受省委领导，来掩盖工作的消极。

四、县委没有建立起集体领导，区委没有工作，尤其是支部工作成了一贯的忽视，在群众中没有丝毫的核心作用。

总结公安党在转变中，仍然在脱离群众，脱离党的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下过生活，同时还表现有少许的“左”的盲动情绪。这样，工作的结果，只有走上逃跑唯一的道路。因此特委针对着这些，有下面的具体指示：

1. 坚决派有关系的积极工农干部，到七、九、十区去找线索来恢复组织，注意党员职业化，深入群众，提出群众心窝里要求的口号来发动斗争，争取被豪绅地主欺骗的群众，回到革命战线上来。

2. 把长短枪枝编成两个中队（长枪一中队、连枪一中队），长枪一中队在沙南沙中游击，牵制郝穴、观音寺的敌人。连枪中队由大队长与政委代[带]到公安游击，扰乱郝穴与沙市敌人。同时发动游击队群众工作，来宣传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斗争与影响各区有组织的群众，在群众斗争中来解决游击队的生活。游击队生活费以后绝对不开支，由他们自己去解决。

3. 县委暂不改组，仍然由旧县委来执行这一工作，县委机关暂留两个常委在沙南办公，经常指挥游击队与讨论恢复工作的具体办法。4. 要详细讨论特委各种决议。尤其是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决议，深入到群众中去，来打击腐朽的自由主义调和态度，把腐化、地方观念、经济观念等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赶出党去。5. 目前公安党的主要任务是：面向支部，面向群众来发动群众迫切的日常斗争，正确的发展游击战争，争取反水群众，引导群众到平分土地建立政权的更高阶段，要无情的与脱离群众、脱离党的领导，不要支部的右倾机会主义与专凭游击队打天下的“左”的盲动作残酷斗争，尤其是要打击逃跑主义，来完成这一任务。

致布礼

宜昌特委

七月三十日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中央为肃反问题给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的信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

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

读了你们关于肃反的一些报告与决议，及与×××同志的谈话之后，我们认为湘鄂西党在这次肃反工作中所执行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而且正因为湘鄂西的党能够坚决执行国际与中央的指示，能够依靠在湘鄂西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热烈的拥护上，所以他在肃反工作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毫无疑问的，湘鄂西反革命派别活动的积极化与他们的破获，是由于全国革命危机的增长，是由于苏维埃红军的发展与胜利，与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动摇，是由于党真能把国际与中央的正确路线深入到群众中去的结果。这次肃反的胜利，是湘鄂西苏区地一步发展与巩固的最有利的保障，并且给湘鄂西党造成了更顺利的深入国际与中央的路线到广大群众中去的顺利条件。

然而看到这次肃反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不能不同时指出这一次的肃反工作完全暴露出了湘鄂西党过去工作的主要弱点，与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在领导中所犯的主要错误。这些弱点与错误的指出，将更加警醒你们，使你们能够在克服与消灭这些弱点与错误中去彻底执行国际与中央的政治路线。

这次肃反的经过，告诉我们，湘鄂西的党过去工作的最大缺点与错误，是在于没有能够把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传达到下层群众中去，没有能够把两条战线的斗争深入到党的下层组织与支部中去。许多党的决定，虽是一般的正确，然而只能传达到县委，能够传达到区委的已经比较少，至于传达到支部那更是说不上。中央分局与省委对于自己的决定在群众中的如何执行，执行到如何程度，缺乏经常的检阅。这就使地主富农的反革命分子与机会主义者能够利用两面派的态度与一些空头的报告，来蒙蔽领导机关，抵制这些决定的执行。以致在有些苏维埃区域，平均分配的土地一直到现在还不到百分之四十。党对于这些分子的两条战线的斗争，非常不够，许多斗争不过停留在机关里，得不到具体的解决的结论，而且没有能够在斗争中加紧肃反工作的进行。甚至对于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敷衍了事。

这种情形，当然使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与一些机会主义者能够一方面敷衍上级党部的指示，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指示的执行怠工，以致执行完全相反的路线，以造成群众对于党，对于苏维埃的不满意，然后再用这种不满意来反对党与苏维埃，来进行反党的与反苏维埃的斗争。这种情形，也使得这些反革命的与一些机会主义的分子能够提拔他们认为是好的干部，来巩固他们在党内与苏维埃内的地位，来进行反对党与反对苏维埃的工作。

因为国际与中央路线的传达与两条战线的斗争的不深入。因为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深切的了解党的一切决定在群众中执行的程度与监督这些决定的执行，因为党与群众中间还没有分离不开的密切的关系，同时更因为反革命分子的捣乱与阴谋，所以党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充分的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的积极性，还没有能够从革命斗争中把一切反革命分子与消极怠工的机会主义分子赶出去，提拔积极勇敢的工农分子来代替他们担任党与苏维埃的领导工作，来保障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

关于工农干部的培养与提拔问题，中央曾经一再促起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的注意，然而你们对于这问题始终采取了维持原状的态度。这一次肃反

的经过，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过去为湘鄂西主要干部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大多数是经过各种关系混入苏区的地主富农分子，甚至红三军的干部也大都以拖枪俘虏来的为主，而不是从当地土地革命与革命战争中所提拔起来的积极分子……。

一切这些告诉湘鄂西的党，要克服我们过去工作的主要弱点与错误的唯一方法，就是更坚决的来执行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使这一路线不在纸头上而在实际行动中，为了这一路线的执行，更坚决的开展与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彻底转变党过去的一切领导方式，建立党与群众中间最密切的关系，尽量发展下层群众的积极性与提拔在斗争中积极勇敢的工农干部并且有系统的去培养他们。

这次肃反的胜利无疑的给湘鄂西党这一彻底转变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湘鄂西的党应该利用这一肃反工作，来执行我们上述的中心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你们还没有能够使这一肃反工作，充分变为广大群众的政治运动，还没有能够在肃反中间充分发展群众拥护党，苏维埃与红军的积极性，使肃反工作变为大批工农分子加入党与红军的运动，而且在有些地方还犯了严重的错误，如象把肃反工作简单看着是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以为肃反工作就是对于犯人的审问，而且还有单靠犯人的口供，不搜集其他证据来逮捕与定罪等的倾向。

在目前肃反工作中，湘鄂西的党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到群众中去，向广大的群众宣布反革命分子的一切罪恶，把党与苏维埃的基本策略解释给群众听，使群众了解反革命派别与共产党的基本不同，自动的帮助党与苏维埃来进行肃反工作。党必须就在这一时期内坚决的迅速的把没有分配的土地立刻分配，没有执行的红军优待条例立刻执行，彻底改造党，苏维埃与红军的一切工作，进行新的党与苏维埃的改造与改选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大胆的提拔新的工农积极分子来担任领导工作，立刻把着委与省苏的领导建立起来。这样来根本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别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党的领导作用。

中央认为你们对于工农新干部的提拔，还是不坚决的，你们在这一方面还表示迟疑与恐惧，因为恐怕提拔起来的又是反革命分子，以致想依靠中央来解决你们的“干部恐慌”问题。甚至有人因为干部的恐慌，而发生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提拔干部，不是随便去拉一人来充充数目，而是真正提拔那些在斗争中，尤其目前在肃反中，表示积极坚决的分子，这种分子决不会是反革命的分子，而且即是有人供他，党也不应该立即相信，而应该看他在工作中的表现，在百万人口的湘鄂西苏区找不出干部，或甚至说没有干部，这自然是对于群众力量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自然会走到悲观消极的道路上去！

中央认为湘鄂西苏区现在所处的环境是十分困难：一方面是川鄂军的包围，一方面是内部的肃反。然而这一困难的出路，只有在发动群众的斗争与群众的积极性上。只有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央认为中央分局与省委在这种困难情形下，应该以铁的手腕，同小资产阶级的无气节的动摇失败的情绪做斗争，坚决反对以为只有红三军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或中央的大批干部的派送，才能解决他们的困难。中央在可能的条件之下，当然可以派送一两个干部给你们，然而这只是一两个，而不是大批的。大批的干部需要你们自己去提拔。

关于三军与四方面军的会师的观点，在目前显然是错误的。这不但不能

巩固与扩大苏区，而且在目前蒋介石的四次“围剿”之下，这种会师，会使四方面军有抛弃根据地的危险。必须清楚的了解红军行动的互相呼应，是在行动方向的配合与行动的积极化，而不在集合。所以中央认为四方面军移师麻城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在目前白军猛烈进攻皖西北苏区的形式之下，四方面军再从皖西北行动，也是可能的事。

湘鄂西的红三军应该在这一肃反工作中，在敌人包围的情形之下，进行最广泛的动员工农群众到红军中去，坚决实现“动员一万人到红军中去”的口号，而且在这一万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党员。尽量提拔下级干部担任团长、师长的职务，给他们以特别的政治军事的教育。这些干部是最可靠的能够保障红军为工农军，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的。当然在最初，这些干部的军事知识是不充分的，政治水平是不高的，然而不用一切力量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就不能有任何干部。必须最坚决的打击那些以为过去的红军是改组派的军队，肃反后才是共产党的军队的胡说，指出正因为红军执行了党的基本任务，所以反革命派别，用尽一切力量来破坏红军。然而党必须用更多的力量来改造与扩大红军，使红军走向铁军的道路上去。

关于其他许多问题，中央过去的指示，还是适用。至于更详细的指示，将在得到你们的详细报告之后。

此致布礼

中央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

中共宜昌特委给枝宜县委的指示信——游击队的任务和对反动武装编练队的策略
(一九三二年八月六日)

冠伯同志转枝宜县委：

特委听到了国元同志报告后，认为枝宜工作，在机会主义的路线下，表现出：

一、不知道随着环境来跟着党的政治路线，转变我们的队伍，变更我们的工作方式。豪绅地主组织编练队，我们不知道领导群众加入编练队，来作破坏编练队，争取编练队群众的工作。

二、把编练队的群众认为完全是反革命，用屠杀、割耳朵、割鼻子的方法去杀，这种办法是目前反革命都不做的，是更加予反革命以欺骗群众、组织编练队的事实。

三、把游击队当作县委的附属品，一点一滴的事情，都要县委亲自分配。这完全抹煞了游击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群众的任务。

这些，都是枝宜党过去在脱离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下的具体表现。在目前紧急关头，特委具体指示是：

1.对罗家河、江口后乡等没有编练队的区域，党的策略是：反对组织编练队，加入编练队去争取下层群众。在事先党要加紧反编练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告诉群众豪绅地主为了保存其利益，利用我们组织编练队去替他们守夜放哨等事实。加入编练队后，秘密的做骚动工作，发动“天热不放哨”，“放哨要救急水、灵宝丹”，我们放哨就要到地主豪绅家里去“吃饭”，“守夜要消夜”等斗争，来揭破豪绅地主组织编练队的欺骗，争取编练队下层群众。同时，党在这时一定要转变我们的队伍，要马上把集中在罗家河等处红的党员群众，分配到灰色区域去自动发展工作，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和农协组织，在编练队中起核心领导作用。

2.对恢复赤色区域的工作，你们一定要有计划的技术的继续派同志进去打听消息，找线索派游击队到赤区周围去打反动、打哨，发动边境的群众斗争，在斗争中来解决游击队的生活问题。主要是：党在这时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作抢黄粮，分谷子等日常斗争，在这日常斗争中来夺取编练队群众，来引导编练队群众走到杀编练队领袖、豪绅、地主、富农，平分土地，建立政权的更高斗争阶段。要与“把编练队群众完全看为反革命”的机会主义观点作残酷斗争。

3.游击队无论如何不能取消（于可能时并要把长枪拖出），派遣忠实工农分子的县委委员，担任队长，到赤区边境，与当阳草埠等一带去做肃反，领导群众，帮助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种种工作，使游击队成为真正枝宜群众的武装，坚决与把游击队看成护卫队的倾向作斗争！

4.这三个任务，是你们目前的紧急任务，你们要与过去脱离群众，不运用党的政治路线去夺取群众，把游击队看成护卫队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作坚忍的长期的残酷斗争，来完成这一工作。动员与夺取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来为着平分土地建立政权而斗争！树立起枝宜县苏维埃的红旗！

致布礼

宜昌特委

八月六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毕昌茂关于鄂豫边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八月九日)

鄂豫边苏区对中央报告分为三个时期：

- (一) 由 1931 年 10 月起至 1932 年正月止，
- (二) 由 1932 年 2 月起至 1932 年 3 月底止，
- (三) 由 1932 年 4 月初至 1932 年 6 月初止。

一、自从中央 1931 年 10 月派沈冲益[宗源]同志到鄂豫边苏区工作是准备转变工作，反立三路线。(沈)到苏区后，筹备代表大会，与建立学校在十月革命节那一天开代表会，同时学校学生参加这代表会。十一月×号开始报告，第二日报告，午后敌军 51 师开了军队来了，将代表冲散。后代表会不开了，学校学生解散了，后来布置军情：

黄龙岗：301 团

王胜子岗：1 团

耿家集：302 团

下王家集：303 团

当时，我军情按照三三制，我九军二十六师有四纵 P，每纵枪支八十四有警卫 P 枪 40 支，有手枪 P4 架，手提 2 架，冲锋盒子 8 支，每纵有 4 支盒子，共计人数七百余。我师情形：

我游击 P 有三个游击队，第一纵 P 游在枣阳，第二纵 P 游击在枣阳，第三 P 游击在宜东枣南，每纵 P 有枪支 84 支，4 盒子，外苏政府枪支共计区政府有十二个，每区方园有四——五十里，区府枪五支，特殊情形在外。十一月十号，在耿家集，九龙门连打火，我败，当时红军游击 P 及赤卫军配合，我军打败，敌不敢追，连进攻打火三次败，就逃跑了，将红军游击 P 一切武装沈冲益[宗源]下命令区委各人秘密，区政府枪支集中，规定九点钟到，领导逃跑，在正月二十九日逃跑的事实，写信给我叫我接信时到边特来有要事商量，二十九夜三十日晨将一律 P 伍拉出苏区，到枣阳西，走到王胜子岗被罗启疆 34 旅三四百人打败，我军回来，我不知道他领导逃跑，我在枣西一区苏区吃饭，P 伍打败回来，我就对其他同志说逃跑不正确的，反对领导逃跑，那时在枣南书民沈冲益[宗源]下命令叫我在参谋部参谋，我说南区群众在地方作斗争与土匪乱打，我到三区领导工作，1932 年正月底止，第一个阶段。

二、由 1932 年 2 月初至 3 月底止。在 2 月 2 号召集紧急会议，当时我在会议上提出逃跑主义是不正确，批评逃跑，号召其他同志反对，当时沈冲益[宗源]同志制止我发言，如有再发言你出去，不要你参加这一会议，我反对他没有错误，没有不正确观点，没有开除我站在自我批评，逃跑是实有错误的，其他同志都反对沈领导不正确。在 2 月 2 号晚七时开会，当时到夜下二点钟，逼到没有办法，承认政治估量不足，客观上形成逃跑，(原因)共计有六条：

1. 党内没有几组。 2. 群众不能配合红军作战。 3. 现在没有钱。 4. 没有粮。 5. 红军不强。 6. 没有子弹。

在这次紧急会议成立临时省委会，选举代表团在赤区内，临时省委移到白区，当时沈不过几日就到白区带了二百一十元跑到此处，后代表团解散，就是无头绪，每日准备跑××时，将(红)二十六师编制第一路游击 P，把三个游击[纵]P 编制第三路游击队，只有区府枪支没有动，其余集中枪支再三再四逃跑，我在外工作还有不知道。三月底止。

樊城：51 团

枣阳：34 旅

黄龙岗：敌 301 团

王胜子岗：敌 1 团

耿家集：敌 302 团

下王家集：敌 303 团

我军在二月到三月军事布置逃跑，隐匿敌人要人们在山南沙北山脚底，没有决心作战，这是第二阶段。

三、由 1932 年 3 月底湘鄂西分局派魏世筠[尉士均]同志代表分局到鄂豫边苏区襄枣宜钟一带工作，在四月八号，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报告湘鄂西分局给鄂豫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师工作的信，当时讨论与批评，反对机会主义，当时对沈冲益[宗源]讨论带款钱潜逃手屎[续]不交，全体大会决议。要求中央开除沈冲益[宗源]同志党籍，二次扩大会议决议，开会时每天跑兵开的，后要坚决执行，当时选举临时省委会，王君恩书记，当时我省委巡视工作，传达省委决议发展斗争，省委特派员传达决议，大部分县委、区委传达到，一般同志打消逃跑观点，县委、区委没有传达只工作，使工作不执行——甚至于县委、区委还是逃跑，群众不跑党员跑。后来×例党纪，才有一、二区执行。

在钟祥高米集（地名）以前区书后省委会常委蒋，名字忘掉带领游击队叛变，后钟北一区失败反动头领敌人。

后引红军有枪没有人背，在一、三两路游击 P 不动，后来编制地方枪支 15 山南山北游击 P 大概组织增加土枪。同时我参加省委常委组织部干事清党会主席，到五卅日那一天，我山南总指挥部，当日午后这整理游击队。组织部部长要负责将邱文明、赵清连、蒋顺丁在常委会内讨论，当时有邱参加，他们成分富农，决定开除邱、刘山南总指挥部，赵蒋区书开除党籍，将他们一律削职。但邱，省委组织部部长没有信到军委派他人回去，这是二十九日三十日午后，我到了山南游击队总 P 部晚上临边县委会开会叫我参加。

游击 P 出发打击敌人，那知道起心叛变，当时临边县委开会被他叫出来就动手，将捉毕昌茂省委的临边书记邓明清，军委代表王君现[贤]，总指挥部阮荣汉，南三区书记赵清连，当时洗×临边县委书记邓。

主要的这叛变教训与事实。

1. 组织部手属不清。2. 军委会无论何人得到手就派出，历史成分不考查。3. 王君贤军委代表平口说出处罚死刑，自己混乱，不论说得或说不得，只人不×的。

五卅前红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张干连[永年]是地主他叛变，将一纵 P 人带去投降敌人。五卅后游击 P 第三路司令胡阿三[万山]富农，他家住黄龙岗街上，带步枪二十余支，盒子一架投降敌人，后来破坏。

六月初以前红军 26 师师长，后编制 1、3 两路游击队，3 路 P 负责参谋长段克祥，后因政治发生问题，将他××纠正政治错误，后调军委参谋。

段克祥山西省人氏，在太原负责军校教员，因山西失败，才到鄂豫边工作。

左洪涛同志是上海派去，到鄂豫边区襄枣宜钟苏区，省委决定他的工作将山南山北游击队编制为鄂北游击 P 的政委并兼政治处长职，同赵大章前为山北游击 P 政治委员，他成分雇农。

这次左洪涛领导段克祥、赵大章共计五名，我知道三位同志逃走，当时

将自己盒枪五支放在山顶，他说我到中央去作报告，还说中央欺骗人，他们逃跑，左洪涛要负一切责任。

段克祥役倾，产|共P将段拿住，谁都知道段送至51师旅部，投诚叛变，最痛心做计划给敌建议书，叫敌人四面“围剿”，留一团人带二天的军粮跟踪追击，利用自首分子将拖到来反革命方面，后来我们什么样知道的？因为我们捉住敌人送信的，将信一洗完全是段同志意见书和计划，将两个白军士兵秘密解后，到明日果然实现了，只有信被我们拿来，这一团没有来，意见书内容说红军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行军。

红军的部分失败困难极点，将红军拉到马五[武]山去得了胜利枪100支，后来回到赤区后将队伍住田集东宋集西北朝阳寺(地名)休息，饭吃了，P伍集合了，说话时不放步哨，敌人来了一百多人，将他们打败，被敌围住打，正个二十六师被敌人大部分缴械，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参谋长 Bukgop，阵亡，李政委受伤，湘鄂西派来政治主任失踪，根据组织部部长报告，说魏世筠[尉士均]同志在樊城被捕，我所得消息，樊城通信和接头处两处破坏是实，县委机关没有破坏，当时出赤区时我还在通信处住的，参加省委组织同志叛变，县区委地方同志有的叛变，有常委一十五名，候补二名，共十七名，我到南阳没有七名。

第一路游击P司令王光明成分士兵

第三路游击P司令胡万山成分富农

由二月二日到三月都是这样的，另外有总指挥部

当时参加省常委负总指挥之职P伍到马武山张木干就拿一架盒子回家不干，这都是事实。

关于我到赤区到南阳府本没有相认的，后来偶遇到南阳特委巡视员，后来报告省委组织部，休息三日，省委组织部，同我谈话派我同沈宗源二人到鄂豫皖去，指定我作报告赤区情形，省委没有交路费由沈负责，当时替我买一双鞋子和雨伞，由阳历五月二十日动身，到二十七日晚到许乡[昌]，二十八日早等车，说南车断决回到郑州。南下车有，随即到信阳，走不过，后找豫南特委通信址，信阳女子师范附属高小学校李情名，学校住有军P，我们问去，军队盘问。后来身无钱有病到郑州到开封陇海路无票不能行、后来到直隶大名府，沈将介绍信带走，我要饭回来的。止[至]七月十号江顺来上海。

毕昌茂

注释

“P”似为“队”字代号，下同。

原文如此。

中共宜昌特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政治军事形势、各县情形及目前工作的布置*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四日)

中央：

现将我们的工作分项报告如下：

一、在敌人“围剿”中宜昌区政治形势：

1. 敌人四次“围剿”湘鄂西苏区红军，在鄂西的部队约为川军二十一军刘湘部五六七六师（郭勋、张邦本两旅），范绍增师（曾带伤×代），独立×，×杨两独立团，鄂北游击司令张连三部（现改为宜沙游击司令），新七旅李宗×部（二团人），共计二十团左右，××××代理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指挥××××。

2. 目前川军布置的情形：从第一次进攻苏区遭到严重打击后，七月十五日起又开始二次进攻。川军边防军两团十七旅两团，由吴锦堂指挥为第四纵队，接×监利，佟杨二团调回沙×部××驻沙洋为第一纵队，向蚌湖等处进攻；张连生为第三纵队，驻荆门一带；罗君彤为第二纵队，向丫角庙等处进攻。宜昌系张邦本一团人左右，留守沙市有二团及几个师部留守处，宜沙戒备均比较松懈。

3. 川军二次进攻湘鄂西苏区红军的时候，因为荆门、当阳、枝宜（在长沙[江]北岸与松枝、公安等县），游击战争的发动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促起了××进攻苏区××加紧进攻后方的革命势力。目前在荆门、当阳的有张连中[生]二团驻团林铺、地××、昌土铺一带。张邦本一团驻宜都安鹤×、鸦雀岭、黑土坡等处。川鄂边防军一团多驻宜都城×。公安有郭勋部二营，一驻斗湖堤，一驻××市。这些驻军配合了豪绅地主组织的团防（即常×队有武装的），清乡烧杀、牵牛拉马，抢米、抢鸡，藉发良民证的名誉[义]，用机关枪扫射民众（川军在荆门驻防时，曾以机关枪扫射七十几个民众）。

4. 川军在进攻荆门、当阳等县革命势力的时候，各县豪绅地主都积极在江北组织江陵、宜昌、宜都、当阳、枝江五县联团，在江南组织长阳、松滋、枝江、宜都、公安五县联团，集中他们的一切反动武装，加紧向荆当、枝宜、松枝、公安等县的劳苦群众进攻。

5. 川军同豪绅地主的反动力量向革命力量进攻的手段：一方面在清乡时装着渔人挑粪，砍草、割谷与冒充游击队和投诚士兵种种样子，是清乡时烧杀、牵牛、拉马、抢钱、抢谷、抢鸡子、捉人赎取等残酷方法；另一方面欺骗群众组织编练队、“剿匪”义勇队。民团（没有武装的）与举动大家徘徊发良民证，来守夜放哨捉人。同时召集群众会议，发传单、宣言，说共产党红军如何杀人放火、共产公妻，与日本占领满洲炮轰上海完全是共产党造成的等等武断宣传。最厉害的是捉着同志后把队长他当，欺骗他们反水。到处引起捉人并设秘密自首箱，只要党员群众写自首条子，劝导革命群众的家属，叫儿子回来自首等等方法。当阳、松滋即完全遭受这样的损失了。

6. 在川军民团积极的残酷的进攻后防革命势力的当中，各县的群众斗争情绪仍然是非常高涨。荆当群众在敌人极端压迫之下，当领良民证的时候，还是说：“我们以后还要干的，这不过是暂时应付环境”。枝、宜、松滋等县群众说：“我们暂时秘密，以后再干”。各县群众因为在分粮、分米、抢粮、分土地等斗争中，已经得着了实际利益，已经深刻了解到，只有平分土

地建立政权，才是他们的出路。荆门群众在打团林铺团局时，自动在山上扯起红旗，要分配土地。因此，在敌人进攻后，群众的斗争情绪并未低落。荆当在工作失败后，还能自动集合五百群众去打民团。

二、在敌人四次“围剿”中各县工作的损失：

1.从红五月到川军第一次进攻湘鄂西苏区时，我们各县的工作：在荆当（一个县委），荆门，当阳（两县合成）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有三个区苏维埃政府），正领导三万多革命群众在平分土地。当阳、枝宜两县都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松枝、公安两县正在扩大游击运动，开始土地革命的工作，并正式成立了两个游击队，江北游击大队有步枪八十余支，连枪十八支，队员百五十人，江南游击二大队，有步枪百二十支，连枪三十支，队员百八十人（每大队下分三中队，大队长外设大队部政委，中队设政治指导员）。各县工作正在蓬勃的向着平分土地、建立政权的更高斗争阶段狂进着。

2.敌人进攻时，当阳工作首先遭受失败，多数富农分子的党员叛变，整个组织动摇坍台，负责同志逃跑来待委。接着川军两团配合荆门团防进攻荆当苏维埃政权，群众受到敌人压迫欺骗，领良民证起编练队。党不能改变自己工作方式来抓群众，认为群众反水，遂大部分跑到苏区（荆当县委与湘鄂西苏区之荆南县委相联近），少部份同志跑来特委。接二连三的公安、松枝、枝宜各县党同样的以敌人残酷的包围、清乡和组织编练队相继逃跑。在这各县失败的工作当中，江北游击大队完全跑到苏区里去了，枝宜游击队被损失，江南游（击）二大队损失了步枪五十余支，其余步枪都埋了，仅一部分连枪存在，与我们也失掉联系，公安游击队跑到苏区。

3.在敌人进攻各县，环境十分险恶的时候，党的负责同志与红的党员群众，均四分五裂的跑了，而牺牲更大，松滋县委只剩一人。各县牺牲同志和群众共计五、六百人以上。因此各县工作遂呈停顿现象。

三、在敌人四次“围剿”中，宜昌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

1.在争取一省与几省革命首先胜利任务下，在湘鄂西苏区红军迅速发展与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无疑的宜昌党的任务是：动员游击战争，开展长江上游苏维埃运动。

2.在川军二次进攻湘鄂西苏区的时候，宜昌各县工作均受到损失，于是党内发生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动摇，不相信长江上游能开展苏维埃运动，不敢把发动群众斗争、武装群众、平分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提在群众前面，不相信脱离了老苏区能创造新苏维埃区域。各县党把平分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当着昙花一现的东西，认为反动力量可以重重叠叠的包围，遂不去坚[艰]苦的发动广大群众工作、平分土地、建立政权的残酷斗争。认为群众力量不可靠，群众还没有到建立政权的时候，只有我们用游击队去冒险攻坚，来代替群众。相信以为被敌人欺骗所组织了了的群众，都是反革命，不设法深入群众，把群众夺回来。

3.党内这些机会主义的动摇，在各具工作失败损失的时候，发生了消极悲观、失望逃跑等倾向。不深究党的工作方式错误与不善于运用夺取群众的策略。因此，遂怀疑目前争取一省与几省革命胜利的政治路线。这完全是脱离群众不相信群众，过分估计敌人的右倾机会主义。

四、目前工作的布置：

1.对宜沙职工运动，我们是大部分力量来建立宜昌工作，从四月份破获后，现已正式成立县委。城市木匠、锯匠、车夫等，码头各部门都建立起组

织，农村已完全恢复。目前工作的中心在工人经济斗争基础上面，发动城市各部门斗争与秋收斗争，开展党的工作。从特委机关迁到沙市后，沙市工作已经得到相当发展，车夫、木匠、皮匠等部门都建立党的工作，特别是在纺纱厂中建立了党的领导，发动工人日常斗争，目前正在酝酿，反对工头打骂，要求增加工资斗争。发展了二十几个姊妹（现在没有赤色工会）党团没支部。目前已改造了市委，组织了纱厂委员会。坚决派得力女同志继续打进纱厂去，在纱厂中来迅速开展党的工作。

2. 当阳成立工作委员会，由雷家港子三区去恢复二区（陈家场、黄家店子）、四区（孙家场、黄家场）、七区（×山、万城）等区工作。把连枪三支组织特务队，去肃反、打哨与发动群众抢粮等斗争。荆当成立临时县委，领导四区（五里铺）群众，发动四区反编练队反清乡等斗争。坚决派人到一区（周家集）、二区（杨家集）、三区（团林铺）去领导群众，夺取群众来恢复工作。公安成立县委，坚决派有关系的同志到×东区西七区（闸口）去恢复工作同时把连枪成立游击中队，去到边境发动群众打反动队工作。把长枪成立一个中队，到郝穴与观音寺等处去扰乱敌人。枝宜抓紧潭子溪、江口后乡等群众，适应环境加入编练队来反对编练队，同时派人到横溪河等处去恢复工作。松枝整理沙道观区委的工作，去恢复金鸡山等处工作。

3. 对各县的工作的恢复，主要的是随着环境来转变党的队伍。在编练队、义勇队、民团中去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发动编练队下层群众日常斗争，走到抢谷粮、反高利贷、反斗麦还五斗谷等斗争，来夺取群众。运用游击队到失败区域的边境去打反动打哨，尽量骚动与发动抢谷、抢米、抢豆粮，反捐税，反生谷息等斗争，来提高群众斗争情绪，引导群众走上平分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现送来我们的决议及对各县指示信，希望你们配合这一报告讨论后，给我们以指示，因为省委在这肃反期间，有两个月没有给我们的指示了。

宜昌特委

八月十四日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均缺字十个字左右。

中共宜昌特委关于红三军围攻沙市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六日)

中央：

红三军七、八两师于八月十四[日]拂晓进攻沙市时，沙市敌人仅川军陈焕团两营人。沙市反动统治飞调驻荆州佟团来沙抵抗，石灰桥来沙增援，并电调驻丫角庙、浩子口之范绍增全部回沙，由岑河口向红三军包抄。红三军十四日在太师州、青龙观（都是沙市的街名）与川军激战，击毙川军营长三人，士兵二百人，伤兵三百余人。同时，红三军两团骑兵进攻草市，夺获佟团机关枪两挺，钢炮二门，步枪三百余枝，子弹数箱。在十四日激战中，王方舟已上兵船，各反动的机关人员、物件，通同上船准备逃走。目前沙市尚在红三军包围中，反动统治恐慌万分。郝穴、普济观、岑河口、观音寺、马家赛等处川军通被红三军解决，在这几天的激战，消灭川军约三团人左右。

宜昌特委

八月十六日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宜昌党、团特委紧急通知——关于红军进攻沙市中沙市全体党团员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七日)

沙市全体党团员：

在国民党中央军配合川军四次“围剿”湘鄂西苏区与红三军的当中，红三军已得着了新的胜利。川军这次进攻时，在丫角庙、李家市、曾家集、郝穴、岑河口、普济观等处，已经遭红三军的严重打击。现三军已乘着新的胜利在大举进攻沙市了。

全体党团同志们！红三军进攻沙市是冲破四次“围剿”的初步胜利，我们当然不能过分的估量以为红三军能很容易的占领沙市，但占领沙市的前途，的确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在>红三军进攻沙市的枪声中，应具体的做下面几件工作：

(一) 把特委为红军进攻沙市告群众的各种宣传品，实行的散发到士兵中、纱厂中、贫民中去，来发动欢迎红军的各种群众斗争，特别是加紧口头的宣传鼓动工作，解释群众对红军的疑惧，告诉红军未来时，我们怎样来抢米、抢油盐、抢钱；红军来了，我们怎样来团结自己，杀豪绅地主、贪官污吏，建立沙市苏维埃政权。

(二) 在红军进攻的当儿，我们在纱厂中要发动增加工资，减少时间，藉乘凉来召集欢迎红军的群众会议；在车夫中发动反对拉夫，拉夫不出班钱等斗争；在贫民中发动抢米、抢油盐、抢钱等斗争。使这些斗争的汇合，成为拥护红军响应红军欢迎红军的实际行动。

(三) 加紧各种各样的骚动工作。在夜晚上放火，在川军留守处放鞭炮，在群众恐慌时发妖风，在军队救火与集合时掷石子等，来骚扰敌人，响应红军。

(四) 发动反对拉夫的斗争，告诉被拉的夫子与车子，把军队的军用品、伤兵掀覆，或拖到红军中去。

(五) 加紧对川军的宣传鼓动工作，很技术的发传单，告诉川军伤兵，完全是豪绅地主反动长官利用的，要求得解放，只有欢迎红军来沙市，拖枪到红三军中去。沙市党、团部对这通知，要非常迅速的拿到支部小组中去讨论，决定很具体的办法，动员每个党员群众积极的为这一工作而努力，并每日对这一工作的执行要有一详细的检查，报告党团特委，来欢迎红军，响应红军，实现苏维埃的沙市！

中共宜昌党团特委

八月十七日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原文戳记上填写的。 原文如此。

鄂豫边省一年来（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工作的经验教训*
（一九三二年九月）

鄂豫边工作分襄枣宜钟苏区，均房苏区与鄂豫边白区三部分。甲、襄枣宜钟苏区一、襄枣宜钟苏区工作经过（共分五个阶段）1.一九三一年三月至七月。襄枣宜钟苏区在立三路线影响之下，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以前工作全部受到严重打击，各地组织几乎完全踏台，仅剩了一部分是（零）星枪枝在苏区外行动，至一九三一年二月，接到国际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示，在南阳召集待委扩大会议，接受国际与中央路线，转变鄂豫边全部工作，决定恢复襄枣宜钟苏区策略，特派特委常执委四人到襄枣宜钟苏区，执行恢复与转变工作的任务，经过四个月的时间，旧的苏区似以完全恢复，红军已扩大到五百余人枪三百余枝，但在实际上，党，苏维埃，红军，未能彻底改造，在各种指导机关中，阶级成分太复杂，对于新提拔的工农分子又无适宜的培养方法，一切组织仍操在少数阶级异己分子手中，在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形势中，阶级异己分子根本动摇，专门发动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妨碍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连土地都不能分配，苏区恢复仅仅将著名的豪绅赶走，建立了十二个有名无实的区苏维埃，一部分红军，三个游击队而已，在这个阶段，是党内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也是阶级异己分子用全力破坏工作时期，因此各种工作均未得到相当转变。

2.自八月至十二月。至七月底经过党内长期斗争的结果，各种群众对于阶级异己分子，破坏革命的罪恶，已有相当的认识，加以红三军九师到襄枣宜钟的政治影响，又重新决定改造党，改造苏维埃，改造红军与群众工作，大批的驱逐了阶级异己分子（共开除了百余人），各种工作才得开始的转变。

A、党的改造。各级指导机关工农分子大致占五分之四，支部至小组几乎完全成了工农分子，区委的阶级异己分子不是[足]五分之一，县委以上五分之一强，在组织系统上成立了一个分特，一个枣县委（其下六个区委），六个独立区委（襄宜钟），一百个支部，党员一万零八名（七月底党员三千余名），县委以下的组织，自七月至十二月，经过三次至五次的改造，因在命令与委派方式之下，虽经数次改造仍不彻底，仍有不良分子隐在各级组织中，并且对洗刷被驱逐的分子，没有妥当的处置与监视，又未公开宣布其罪恶，使此种不良分子，在各地仍时时影响党内工作，发生相当的反动作用，又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太落后，普通的党员政治水平低落，只知听命令，无创造性，在苏维埃，在红军，在群众组织与一切工作中，都不能起领导作用，也不知道起领导作用，只知单纯的和平发展组织、至于巡视制度之集体指导的运用，培养工农干部的方法，肃反工作，发展自我批评，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等工作均未实现。

B、改造苏维埃。自八月至十二月也是经过三五次，乡苏维埃在成分中已无阶级异己分子，区苏维埃有很少的阶级异己分子，但只担任秘书与技术工作，县苏维埃在边区革命委员会中，有很少的阶级异己分子担任主要工作，建立了一个边区革命委员会指导襄枣两个县苏维埃，三个独立区苏维埃（安东、钟北、枣南），共九十七个乡苏维埃，每乡八百至一千五百万，但改造苏维埃仍然是命令方式，县各级县苏维埃均缺乏生产人参加，又完全是党员包办，因此虽经过数次改造仍然是不彻底，有许多冒充中贫农的分子参加，

经常工作没有建立起来，领导力薄弱，偏于军事上的应付，几乎成了军事附属机关，但对于护拥与扩大红军工作反作的不够。各级苏维埃的工作人缺乏创造性，只知在命令之下，执行工作，一般的政治水平低落，演成秘书专政的现象，在各种实际工作中，更发生许多毛病。

C、红军的改造。在八月初即大批的洗刷了不良分子，彻底取消富农武装，又由红三军与中央派来专门指导工作人员，由八月至十二月，始终未出苏区，也无战事，在长期安静状况之下，人数扩大到一千五百余名，枪五百余支，中下级干部与战士在名册上考查已无富农成分，上级指挥员也完全是新提拔的干部，在表现上似有大的进步，因在和平发展训练之下，执行的改造工作，且忽略了肃反，而指导工作人员又专注意讲堂与当面服从，不注意实际考查，红军中隐藏的反动分子与反动派别格外多（一切新提拔的干部在“围剿”中完全叛变了），因此对红军的政治与军事训练等于未作，等于未改造，红军的一切任务不能执行，同时对群众对苏维埃更形成对立的形势，除红军二十六师外，又发展了五个游击纵队，在书面上政治与军事训练不如红军，成分上也比红军复杂，但在保护苏区与积极行动上超过红军，这五个游击纵队也直属军委，平均每队有枪六七十支至八九十支，人数都在百人以下。

D、各种工作进行的情形。

第一是土地分配，自七月底至十二月，襄枣宜钟苏区的土地，除枣阳四、六区因特殊情形未能彻底分配，其余一概都平均分配了，但非群众路线，在苏维埃命令之下执行，故发生许多错误，有富农冒充中贫农，得到好土地的，或连坏的土地都未得到，有地主冒充中农、富农而得到坏的土地，有雇贫农得不到好土地的，枣阳各苏区此种错误最多，有动摇中农利益的，中农、富农、地主土地一概没收，由工人、雇贫农选择，下余不好的土地再分配给中富农，如襄南二区与钟北一区，又有同一的雇贫农、工人，不按土地性质收获量混合分配，有多得好土地与少得好土地的，如宜东枣南等区，自八月至十二月虽经过三五次分配，始终未能完全彻底，常常发生土地问题的纠纷。

第二是反富农斗争，既无党的领导，又无明确的规定，专派群众或某种组织中调查报告，由苏维埃委派贫<雇>农工会或贫农团的机关人员工作，而不号召群众，因此有许多富农隐藏在贫雇农的阶层中，未受反富农的打击，如宜东、襄南、枣西，又有许多富农被消灭，将富农的经济物质完全没收，襄枣宜钟各苏区都有这种错误，同时更有以中农为富农同样受打击，枣阳这种错误最多，更严重的是反富农斗争，工人、良贫农得不到利益，没收的东西被雇农工会、贫农团或苏维埃机关中人得去，造成一种贪污行为。

第三是经济政策，仅仅执行了土地税，至于营业税、关税、所得税等等均未执行，关于生产与调剂方面，如各种合作社与交通运输，更未建立，币制也未统一，预算也未作到。

第四、文化教育工作，一切文化教育工作完全未作，仅仅决定一乡设立一个列宁小学，一区设立一个讲演所，这个决议执行了十分之二三。

第五、群众工作，有雇农工会，贫农团，少年先锋队，童子团，劳动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赤卫军等组织，共五万四千余人（七月只有六千余人），但这些组织未经任何斗争，未经党的领导，是在苏维埃命令之下[以]登门上册的方式，发展起来的，经常工作未建立，政治水平未提高，同时更有许多不良分子（如地痞流氓）阶级敌人（如富农、小地主冒充雇贫农），参加到群众组织的指导机关中，如宜东、钟北、枣西、襄南各区，或武装组织的指

挥员中，襄南、宜东最多，破坏群众工作，因此各种群众组织不能自动工作，更变成苏维埃的支应机关，在命令之下的工作中，更发生种种严重错误，如妨害中贫农与贪污等，更不能动员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斗争，更不可允许的错误是没有建立工会指导机关与坚强的工会组织。

第六、关于工人方面，仅由苏维埃命令苏区工人一概增加工资一倍，并部分的执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其他劳动法案概未执行。

第七、肃反与<互>济会工作未建立起来，工运、兵运完全放弃，反日、反帝、反国民党进攻苏联、进攻中国苏维埃工农红军及拥护苏联，护拥中国苏维埃工农红军与扩大红军的经常工作，根本忽略。以上七月至十二月的工作情形。

3.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二年二月。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初，敌人第四次“围剿”苏区第一步计划正在开始进行（敌人初步计划是在苏区四周建立进攻苏区的根据地，扩大反动武装与组织，并每日积极骚扰苏区边界，以保障反动工作的进行），在这时期，特委已移到苏区，在这个时期，未注意敌人的骚扰，专预备转变苏区工作，一方面将红军、游击队、赤卫军集中到苏区中心的大山南北，以防敌人的侵扰，一方面召集紧急会议，取消分特、创办党报，筹备训练班，召集鄂豫边党代表大会，划军区，并对各种工作都有一个原则的决定，对于“围剿”的应付只是提出几个口号，未能实际动员冲突“围剿”。直到一月二十以前，差不多完全作了些代表会及训练班的准备工作，和星散的应付工作，到一月二十日代表大会的第一天上午，正值敌人一团以上的兵力到苏区中心（耿集）来试探，由会场边经过，会议未开完，结果解散代表会与训练班，同时一方面计划逃跑，一方面集中苏区一切武装与敌人相拼，两拼两败，于是逃跑，中途又被敌人打回转，又到新街召集紧急会议，以特委失掉信仰，改特委为临时省委，改边区革命委员会为临时省苏维埃，对于各种工作又重复了以前的一次决议案。紧急会议毕，又召集组织省代表团的会议，并秘密的派省委派省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分头布置到湘鄂西，鄂豫皖的路线，调红军与地方工作人员到白区布置省委机关，又因红军与游击队的名义不统一，不易集合与指挥，改红二十六师为第一路游击军，集合五个游击纵队编为第三路游击军，当第三路游击军未成立之际，沈宗源同志又秘密自动的逃掉了（二月廿八

日），在这个阶段，特委本身，前半段作了些决议，后半段专门计划逃跑，对于党，对于苏维埃，对于红军以及一切工作，尤其是冲破“围剿”的斗争，不但没有进行与转变，更形成自动踏台，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决议太原则，不是深刻的切中工作错误，下级不了解，不能执行（如改造党只提口号，应当怎样改造并不指出来，一切决议都是如此），又未建立巡视制度，去帮助与检阅下级工作，因此下级仍按照旧方法去执行，当然不能转变；第二，沈宗源同志，抛弃群众路线，采取特别的家长专制手段，任何[用]少数不良分子（如汪于等），撤换工作人员，因此连原有的工作状况都不能维持；第三，在军事上，当敌人开始“围剿”之际，不只放弃巩固与开展苏区的积极行动的中心任务，就是防止敌人到苏区骚扰的计划都没有，待敌人骚扰，苏区逐渐缩小；第四，是逃跑的影响，几次逃跑，不只把苏区一切群众失败情绪提高，原有的各种组织大部分便着逃跑瓦解，各级工作人员除了直接往白

区外，其余的工作人员都想关门继续走到上级来，恐怕上级死逃，他们

没办法，因此更不能动员群众与顺利的进行工作了，同时与反<动>派别与一切反动分子，在各种组织中大起反动作用，并组织白色暴动，在第一次逃跑后，沈宗源同志未离苏区前，宜东一区反动分子打了六个乡苏维埃；第五，临时省委未将逃跑的错误，在各种组织中与群众中宣布出来，纠正全苏区的严重失败情绪，使这种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向前滋长，使各种

工作不能推动。总之，在这个阶段、全苏区的失败情绪提高，各种工作未到

得到一定转变，原有的组织与工作大部分塌台，反动派别很明显的活动起来。

4. 自二月底至四月。沈宗源同志携款逃跑后，省委只有二人，召集了两次省委紧急会议，又重新决定了各种工作的转变与改造各种组织与恢复工作的限度。在这个阶段，才开始建立了区苏维埃以上的政治保卫局工作，并成立了政治保卫局的训练班，在枣南、宜东、襄南大批的破获了反动派别（共二百余人）。成立了襄阳县委，开展了襄阳区苏维埃，钟北发展了三个乡苏维埃，建立了扩大红军的经常工作，部分的执行了营业税与关税，建立了运输组织与经济调剂的办法，并保护春耕、春收的政策，在军事上第四路在襄东战胜了敌人一次，又与第一路的一部分共同在枣西与襄南阳家山咀子两次战胜敌人，襄阳、钟北虽有相当的发展，各种工作虽有相当的转变，但在形式[势]上格外严重了，主要的原因：第一、仍未将特委省委逃跑的错误指出，未能提高党员与群众巩固苏区的信念，各种工作人员多半是应付态度，使工作不能迅速的推动。第二、各级指导机关的不健全，特别是省委只有二人，完全是逃跑的结果，虽经过两次紧急会议，补充与改造各级组织，但新补充的人员因各级工作需人的关系，完全不能到省委工作，集体指导与巡视制度根本建立不起来，一切工作更不能按照决议推动起来。第三、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仍未开展，群众路线也未执行彻底，因此肃反工作不能得到大的成绩，各种组织仍隐藏着许多不良的异己分子与反动派别，这更是各种工作不能胜利进行的主要原因。第四、是红军放弃了巩固苏区与发展苏区的任务，特别是第一路，他们虽然在三月初十以前打了三次胜仗，是因为三月初十以前敌人（罗启江、范石生）两部主力正与张衡金冲突，苏区只剩了一团兵力，经省委、军委继续不断的派人监视与督促他们才打了三次仗，三月初十以后，敌人主力又移到苏区，第一路马上退到钟北，曾两次向省委、军委建议逃跑，虽经两次会上的遏止，但仍不接受军委集中力量给敌人一部打击的命令，反向军委提出抗议和质问，坚决自动分散，实行他们使敌人在苏区驻扎，稳定后由苏区中心出发时再按照敌人的行动给敌人以打击的主张，这样一来，敌人得以从从容容把苏区中心各镇市完全占领，同时把苏区各种组织骚扰与破坏的不能立足，国民党军队的各种防御工事与反动武装及组织，在苏区中心各镇市完全建立起来了，直待湘鄂西中央分局<代表>到鄂北后，才将红军集中起来，开始行动，这更是各种工作不容易进行的苏区形势格外严重的主要原因。第五、工运、兵运<互>济会工作，仍然是空洞决议案。第六、白区工作一样的未推动起来。第七，各种经常工作如反帝、反国民党、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也未建立起来，至其余工[各]种工作，虽有小的纠正，但仍不彻底，故不能动员全体群众与敌人作残酷斗争，形成格外严重的形势。

5. 自四月至六月。由二月底至四月初，敌人已将苏区中心镇市完全占领，各镇相距不过一二十里，并将一切防御工事布置完备，因此即开始每日“会

剿”每日会哨的计划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代表正在这个时候来到鄂北苏区，开了三次省委扩大会、一次军委扩大会、对于各种工作又重新决定了一次，在这个时候的工作，第一、建立了省委的集体指导与巡视制度，第二、开展了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的斗争，第三、彻底揭穿以往特委、省委的逃跑的罪恶，提高了全苏区巩固苏区的信念，第四、集中了红军全部力量，在苏区内积极行动起来，第五、建立了临边县委，第六、扩大了红军及春耕、春收的运动，第七、建立了清党工作，对于其他工作虽有详细决定，因<敌>每日在“会剿”未能彻底执行，至六月三日苏区各种组织已继续完全踏台，工作人员除牺牲叛变外，其余的都自动离开苏区，苏区内的反动组织已普遍的建立起来，只剩下了省委、省苏及一百七十余名红军（一三两路共剩的数目），至六月五日红军又被敌人围攻，迫离苏区，省委将苏区散枪编了两个游击队，分交程、石领导，决定暂到钟北，如不能存在，过河西到南漳或直到湘鄂西，并将省苏工作人员分配到两个游击队内，省委离开苏区（当省委离开苏区之际仅剩了四五人），被迫离开苏区之百余名红军脱离苏区共有七天，经过枣北、唐南、新东、襄北转回苏区，共消灭了六个民团局，得长短枪百枝，子弹经济均得到相当的发展，六月十三转回苏区，因无组织可依，自动集合苏区逃难群众一百三十余人参加红军，因此红军又扩大<到>三百余人，枪二百余枝，至六月十五拟到钟北恢复苏区，行至枣南造饭休息，被敌人四面包围击散，散了的枪枝大部自动埋藏了。少数集合到程、石两游击队中，因此每个游击队又增加到八十支枪，但石又叛变了，只剩程一部分游击队也被迫离开苏区，现在尚未找着下落。这就是四月至六月省苏离开苏区的情形，在这个阶段，各种工作均比较有点转变，但对第四次“围剿”仍未冲破，而苏区反得到塌台的结果。主要的原因，是敌人自四月初起每日早二三点由苏区内各中心镇市与苏区边界，（民团、~~民~~共队与“剿匪队”）最少分十路以上出发将苏区全部“会剿”一过，至晚四五点才能回来找饭吃，有时尚未及吃，逃反时间又到了，前后两个月天天如此。对于一切工作的执行。发生大的困难。第二、各种工作人员每日都有相当的牺牲，失踪，叛变，连恢复与重新建立组织的工作都来不及，因此一切组织日渐缩小，直到今全部塌台。第三、军事上领导的错误，当湘鄂西中央分局代表到鄂北之际，一、三两路合计尚有一千三百余人，枪八百余支，此外尚有襄枣宜钟各县区的游击队，合计也有三百余人，枪二百余支，当时集中成立山南北二个游击队，足抵敌人一团的兵力，不准向外游击一步，专在苏区内与敌人死拼，前后共五十余日，作了三十余次战，每次都在敌人围攻之下失败，其中只有四次未被包围，就在这种行动之下消灭了一部分（每次伤亡十余人，共伤亡四百余人，陆续补充仅二百余人），因不向外游击，不能扰乱敌人后方，使敌人毫无后虑[顾]之忧，专力消灭苏区与红军。第四、解散赤卫军的错误，几乎从三月初全部苏区群众每日都在逃反中，至四月格外严重起来，因此一切群众都了解不将敌人赶出苏区与消灭敌人，绝对不能生活，所以枣南、钟北、宜东、襄阳二四区的赤卫军，每日都在集合。且是自动的愿意集合，保护群众，山南的各区组织与群众，凭着这种掩护力量尚能在逃荒中存在，中央分局代表坚决主张解散，回家工作，遇战再召集（忽略<敌>每日都在“会剿”，每日都要集合，不集合也作不了工作），因为这一解散，再也集合不起来了，第一、大部分逃到白区，第二、在逃反时被敌包围，马上领了反动符号，第三、时间的关系，召集不扰，因此群众与各种组织得不到赤卫军的掩护，虽

然很少的敌人与很少的反动分子，也能摧毁群众与组织，红军也得不到群众武装的帮助，虽交通侦探也都发生了困难。第五、肃反工作仍然太差，党与苏维埃及各种群众组织中仍有许多的叛变分子，省常执委中最后都有四个叛变分子，特别是红军中更多，红军在作战上虽伤亡了四百余人，但枪支未被敌人夺去一支，且有相当的补充，一千多人，八百多支枪，最后只剩一百余人一百多支枪的原因，都是被叛变分子拖去了，各种叛变分子在敌人的营垒中，组织反共团、反共敢死队、袭击队，担任敌人的响导与侦察与搜索的响导，并担任苏白区域的调查员，夜间到各处捕获与屠杀工作人员，并冒充共产党名义，实行劫路、绑票，因此工作人员不能在群众中掩护发生在群众工作中的大困难，因[但]苏区群众虽在威迫之下，领了反动符号，但不反动，第六，忽略领反动符号的工作，敌每到一处即用兵力将逃不了的群众包围，除了屠杀，即令群众领反动符号，群众即领了符号，虽然绝对不反动，一方面怕敌人摧毁，一方面怕党对他们怀疑。第二、又没有具体计划派人打入领符号的群众中去秘密工作，因此某处领符号某处工作完全塌台，每日都在“会剿”，每日都有领反动符号，每日都有塌台的地方。第七、因为建立集体指导在工作紧张之际，抽重要工作区调了一部分中心工作人员，新的工作人员负不起责任，也是受打击的原因之一。第八，组织不严密不灵活，党的组织完全公开，无秘密组织的准备，反动势力所到的地方，工作人员即不能存在更不能工作了。第九、一切指示，在每日逃反中与不良分子截留中，传达到下级与群众中的很少，这也是动员不起群众的主要原因。

总计以上各阶段中的事实，襄枣宜钟苏区不能巩固的发展与冲破第四次“围剿”，完全是未能彻底执行国际与中央路线的转变所形成全部工作的塌台。

二、敌人“围剿”襄枣宜钟苏区的策略与计划及苏区群众在“围剿”中与“围剿”后的表现。

1.策略：第一、是利用各种反动派别，如改组派，第三党等打入苏区各处各种组织中，以不良的阶级异己分子为基础，发展反动组织，破坏各种工作，第二、是扩大封建豪绅武装，如扩大民团，组织义勇军 产| 共队等，使这种武装组织化系统化，第三、是对苏区实行残酷的封锁，如原[召]集白区各县民团沿苏区，边界驻防，建立白色武装岗棚，昼夜巡哨，防止苏区一切人的往来与经济的调剂，去白区的群众每人每日应用的油盐都规定出数目来，防止其偷入苏区，第四，是用异常残酷的野蛮的奸淫烧杀抢掠的方法，消灭苏区经济与各种组织，第五、经过了长期摧毁之后，再建立国民党的欺骗政治，使群众在威迫之下不能不受他的欺骗，第六、利用叛变分子担任肃清革命分子的工作，第七、在白区实行保甲连坐与经常清查户口的的方法，以防止革命人员的联系的工作。

2.“围剿”步骤：第一步在苏区边界用比较小的军事力量（开始仅用二团另一营）建立反动武装的根据地，如金泉、峪山、土桥沟等处修寨筑路作防御工事，同时建立巩固与扩大各种反动武装与反动组织，更为掩护这种计划实现起见，每日向根据地的周围积极的残酷的奸淫烧杀抢掠，将根据地四周的经济与各种组织及群众几乎完全扫空，自十二月至一月第一步计划已经完成，第二步用六团另二营的兵力与各种封建武装民团、产| 共队、义勇军等进占苏区中心各镇市，建立苏区中心镇市总“围剿”的根据地，如耿集、

黄龙坞、璩家湾、蔡阳铺、板桥店、田集、王集、官庄，修寨筑路，作防御工事与建立各种武装及组织，也是每日积极的向中心镇市的四周三二十里肆行奸杀抢掠，并严格限定白军与一切反动武装每日每人都要抢得相当物品，如抢不到，受处罚，最低限度是不给饭吃，自二月至四月将苏区中心镇市的根据地已经完成，同时全苏区的经济与各种组织也破坏的很利[厉]害了，才实行第三步计划，是每日由中心镇市及苏区边界各反动根据地，分路出发，进行全苏区的“会剿”，且每日会哨，在会哨时间规定次日出<动>“会剿”的路线与会哨地点，每日都各将全苏搜剿一过，每日二三点出发，午后一二点会哨，晚五六点回原防，自四月至六月每天是这样，苏区一切组织就在敌人这样行动之下塌台。

3. 苏区群众在“围剿”中的表现：襄枣宜钟苏区群众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初第四次“围剿”开始起至一九三二年六月（也可以说到现在即九月）止，每日都在反动势力××屠杀的环境中，但是始终没有反动行为，始终是热烈的拥护革命，这是襄枣宜钟苏区群众在第四次“围剿”中的特点，正是迅速恢复苏区的铁的的证据，当“围剿”开始之际，苏区群众一致的呼声是会同红军将敌人打跑，并在各地自动的消灭反动派别与叛变分子，襄枣二县这样的事实最多，因此反动派别与叛变分子及封建豪绅不敢在群众中存在，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除非是带着武装才敢到乡村中来，故在初步“围剿”之际，一切反动组织在群众中建立不起来，即[继]而经过长期的摧毁，红军始终未帮助群众将敌人打跑，并且公开逃跑与绝对避免敌人，群众在事实上了解红军不可靠，当时又有一个一致的口号，说老子们再费上两个月逃反的工夫，苏区白军不能长驻苏区，这是个苏区群众受到第一、二、三次“围剿”经验的口号（因为三次“围剿”是一二个月就完）但是直到四月白军不但未走，反动势力格外严重起来，群众的经济与食粮完全被敌人消灭完了，自二月起，群众即以树叶野菜为生活，且每日都在逃反中，又无力向苏区以外逃跑，至四月后在每次被敌人包围之下领了反动符号（敌人在四月前纯用屠杀政策），但领了反动符号仍自动的用种种方法保护革命，如暗中报告敌人的消息，遇到少数红色战士或受伤的红色战士或工作人员，不但马上掩藏起来，并将自己费尽力气找到的食品供给战士与工作人员，如遇到敌人或叛变分子来搜索，马上集合群众拿起反动旗帜将战士与工作人员掩藏起来，使敌人不来搜索，同时对于少数的反动分子仍自动地秘密的扑杀，这是襄枣宜钟苏区群众领了反动符号以后的表现，比较一九三一年二月的“围剿”有天渊的分别，在一九三一年一月，敌人以一团的兵力，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将襄枣宜钟苏区全部打击塌台，群众并未受到大的摧毁与长期的痛苦，而枣南、宜东、襄南的群众，普遍的反动起来，屠杀了大批工作人员与红色战士，这次“围剿”经过七八个月的时间，受到特别严重的摧残，牺牲的群众在一万以上，经济上的损失更大，连一切农具全毁完了，到现在尚不反动，只是失败情绪加深了一点，在叛变分子特殊的反动形势之下，不敢自动的公开的发动了。主要的原因是自一九三一年三月后部分的执行一点国际路线的结果。

三、襄、枣、宜、钟苏区目前的政治形势

襄枣宜钟苏区目前正在反动统治最残酷的最后的挣扎，迅速的制造更高度更彻底的革命洪流的局势，主要的事实是襄枣宜钟苏区经过反动势力长期的残酷的摧毁经济，破坏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又值畸形的旱灾与长期的摧毁之下的大瘟疫，因此襄枣宜钟苏区将近百万的广大群众完全陷入没有希望的

悲惨的饥饿状况，国民党豪绅对于这将近百万无法生活的广大群众是用以下的办法解决：第一、是继续更深刻细密惨酷的摧毁，如利用叛变分子经常不分昼夜的在城市与乡村中，在田地工作中在行路中，在替反动阶级修寨筑路修堤运输的各种工作中，在民团军队中，任意调查，任意处罚，任意屠杀，第二、是利用白军、民团与各种反动组织，在各种行动中，无论在乡村城市，随意强取群众的物品，第三、经常不断的，不论时间的任意奴役群众，替反动势力作各种工作，不但不给工资，并且勒令自带吃食，第四、是猛烈的扩大反动组织，与武装，继续增加更残酷的剥削，苏区每个群众自领符号至现在，除了罚款，每人平均纳捐税已达五元，最近每人派×谷四斗，以上的事实就是反动统治最后挣扎中处罚苏区将近百万无法生活的广大群众的办法，苏区群众是怎样呢？在反动武装组织上，五十一师^华变了一营，各处民团继续不断的部分的全部的^华变×匪，在普通的群众中的表现，已经公开投降了的分子胡丕善，在九月八日振习[臂]呼，一夜之间集合了百余人，公开的行动起来，同时普遍的苏区群众经常的自行哄动，继续不断秘密的消灭反动分子，这就是更高的更彻底的革命洪流将要爆发的十足表现。

四、恢复襄枣宜钟苏区工作的主要任务计划

1. 任务

将以往特委临时省委一切错误的领导，在党内各级组织中，详细的深刻的揭示出来，使内外部群众切实讨论，使每一个同志与群众都要切实了解此次苏区的[受]打击，不是敌人力量大，不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够，完全是工作路线错误的结果，但须注意防止与反对不良分子及反动派别假借作为破坏革命的言论行为，同时要把全国及鄂<豫>边省委及襄枣宜钟苏区革命的胜利条件，详细指示出来，使每个同志与群众都深刻的了解如能彻底执行国际与中央路线的转变，襄枣宜钟苏区有迅速恢复的必然性，以提高全苏区的革命情绪。

<(1)>组织与发动及领导苏区斗争，在苏区组织各种斗争委员会，用各种方式的宣传方法与斗争的方式，由反对本乡本村的少数的个别的豪绅与反动分子、叛变分子及比较小的民团反共团体，极小的极端非理的压迫骚扰剥削，如无故打骂，任意私行处罚拘押，擅取粮食物品等等，灵活的迅速的转变到反对大的骚扰压迫，如反对各种反动团体，不分昼夜的出入群众住室，任意勒派群众工作等，与要求减捐税，直进到反对一切压迫剥削，公开抢粮、抢谷至夺回分得的土地，房屋与生产工具，推翻反动统治，重新建立苏维埃政权，恢复群众的自由，在组织与领导斗争的开始，无论斗争大小都要特别注意武装组织，防止敌人的打击，因此在组织斗争时，即将参加斗争的群众，按照军事系统组织起来，使每一个积极勇敢能领导群众的分子，遇到武装冲突时，都变成军事指挥员，每一个群众都变成战士，参加斗争的群众家属都变成军事后方，更要选择特别忠实勇敢分子，组织秘密的特务队，担任肃反工作，同时要注意侦探交通工作。<(2)>彻底建立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党，要在组织与领导各种斗争中，特别大胆大开门的吸收积极工农分子入党，特别是工人入党，立刻令其参加指导机关，要彻底执行民主集中制，培养工农干部，切实的将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起来，同时要严格洗刷不良的阶级异己分子出党，要自下而上彻头彻尾将真正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

要发展布尔什维克的创造性与积极性，每个同志都能自动的建立与运用

能秘密能公开的灵活组织，如在环境严重，组织分散，自己应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掩蔽在群众中，加紧工作，即使长期得不到组织上联系与上级指示，更要严格努力扩大工作，如组织破坏一部分，当时不能与上级发生联系，马上将组织自动的起来与恢复起来，不论在原组织上负责任不负责任，并且立刻设法与旁处发生关系，或因打击流动旁处失掉组织关系，马上在当地自动组织领导群众斗争，建立组织，如在流动中遇到三二位同志，审查清楚，立即自动将支部建立起来开展工作，如在反动势力摧残不能抵抗逃反时，应在逃反中间立即建立行动支部，（不论逃反的时间长短）把群众在逃反的行程中组织起来，如逃反时原来组织分散，即变原组织为行动组织，在群众中工作，每个同志必须要有这样的创造性与顽抗性，运用这样的组织方式，才能将襄枣宜钟苏区在最短的时间恢复起来。<(3)>在恢复工作的开始，即将肃反工作建立起来，特别要把这种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要经常的将各种反动派别特别是这次苏区中的反动派别在“围剿”中间种种破坏革命的事实与方法及其主要策略，经常的在各种组织中，与群众中暴露出来，使一切群众自动的研究讨论，并深入的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与自我批评，使一切反动派别与反动派别的后备军（即不良的阶级异己分子）在内外部组织与群众中得不到立足的机会，同时更要时时刻刻注意被驱逐的不良分子，并用种种方法监视他们的一切行动，要用慎密敏捷的方法，妥当的处置他们。

(4) 加紧展开工运，襄枣宜钟苏区除了雇农工会，再没有其他的工会组织，党内特别缺乏工人成分，各种组织缺乏工人领导，这是党缺乏创造性、积极性不能艰苦耐烦组织××领导群众××残酷斗争，不能冲破四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自恢复苏区开始，即应将工运放在第一个任务上，应使每个同志都了解工运的重要，要在极短的时间，将工人斗争领导起来，红色工会建立起来，继续努力扩大起来，以健强各种工作中的领导。

(5) 建立经常秘密的扩大红色武装组织工作，红色武装是发展与巩固苏区的主要力量，襄枣宜钟苏区以往根本忽略这种主要任务，采取了一种临时招募式的办法，自“围剿”开始，红色武装就逐渐缩小，直至不能掩护一切工作，这是就[最]严重的错误与损失，应自恢复工作，就以支部为单位，都要武装，至足够的力量时，在斗争中马上集合公开行动起来，更注意经常的拥护红色武装战士的工作，使群众了解红色武装战士的重要与光荣，自愿参加红色武装。

(6) 建立经常的瓦解白军工作，襄枣宜钟白军民团，经常不发饷，生活极端恶化，继续不断的开小差与整连整营的^哗变，襄枣宜钟根本忽略瓦解群众[敌军]工作，在四次“围剿”中格外显明忽略这种工作的损失，应在恢复工作开始，即将兵运工作建立起来，以支部为单位，按期派人艰苦的打入白军民团，领导他们的斗争，建立与扩大士兵组织，组织革命的兵变，杀反动官长，拖枪到群众中与红军中，以配合苏区斗争。

(7) 建立城市工作，襄枣宜钟苏区城市工作等于放弃，敌人借城市经常打击苏区，是工作中最大的损失，应动员组织力量，由各方面选拔各种分子，艰苦的打入城市，领导城市市民斗争，建立与扩大市民组织。

(8) 严格划分党、团，加紧推动团的工作，襄枣宜钟苏区，因党未划清，团的独立工作差他，广大的青年劳苦群众不能团结在团的周围，减削[弱]大部分革命力量，在四次“围剿”中，各种青年都特别表示热烈勇敢，在打击中更无动摇与失败情绪的表现，应自恢复工作开始，即按照党、团年龄与工

作关系，将党、团从根本划清，特别注意领导与扩大团的工作，以健强革命力量。

(9) 加紧妇运工作，在四次“围剿”中，广大劳动妇女，在各种工作中都表示了他们的力量，在打击中更少有动摇与叛变的表现，到现在尚能掩护工作，且有特殊活动的性能，以往不注意妇女工作是最大的错误，在恢复工作中，要特别加紧妇运，要大开门的吸收劳动妇女入党，并令其参加指导机关，培养大批劳动妇女干部，以备格外扩大妇女工作。

(10) 加紧扩大济互会工作，襄枣宜钟苏区，因互济会工作落后，受伤的战士与各种被难的工作人员，及战士与工作人员的家属，多半得不到革命的安慰，减削一般的革命热情，特别在目前的局势中，互济会工作更是重要，应以支部为单位，建立互经会组织，并注意领导其经常工作，扩大其工作范围。

(11) 建立经常的反帝、反国民党、拥护苏联、拥护中华苏维埃、红军的工作。在恢复工作开始，即在各级组织中，指定专人负责，经常的利用各种宣传方法与各种集会方式，及各种罢工游行示威，扩大反帝、拥苏的影响与组织，以兴奋苏区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

(12) 彻底改造群众组织，要在各种斗争中，把各种群众组织恢复与建立起来，要彻底执行群众路线，严格防止与反对命令主义与委派制度，将各种群众组织中一切不良分子，如冒充分子与阶级异己分子一概洗刷出去，以健强各种群众组织，同时更要防止与反对使群众组织反[成]为附属的支应机关，要艰苦的把群众组织的经常工作建立起来，要把各种群众组织彻底的自根本改建起来。

(13) 注意推动白区工作，应在恢复工作开始，即把白区工作列到每天会议的议程中，经常讨论苏区周围的白区工作，并用各种方法派人打入白区，领导白区的斗争，扩大白区党与群众组织，发动白区的游击战，经常的扰乱敌人的后方，开展新苏区，巩固旧苏区。

(14) 建立交通网、通讯网、发行网，以支部为单位，都要指定专人负责，以灵通消息，扩大政治影响，加强群众的组织力量。(15) 健全与严格党的组织，切实执行集体指导与巡视制度，加紧检查工作，加紧教育宣传工作，要格外注意秘密技术，同时要严格反对感情的结合宗派观念，地方观念及个人的浪漫的无组织的行为与指导，并反对一切不正确倾向，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16) 为实现如上各种任务起见，要彻底发展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的斗争，以健强党的领导。2. 恢复苏区计划：

(1) 省委常执委派人到苏区组织省委代表团，同时建立襄枣与宜钟枣边三个临时县委，以宜一区，襄一、四区，枣一、五区为工作中心，推动襄枣宜钟苏区全部工作。

(2) 在襄南、宜边、枣襄、新边、×随、唐桐×建立一个工作委员会，发动与领导这三个白区工作，很快的发动游击战，掩护旧苏区，开展新苏区。

(3) 搜索零碎枪支，集合现存的游击队，现在已×苏区编为红九军第三路游击队，帮助苏白区的群众斗争，并择弱点消灭苏区敌人的武装与反动组织，恢复苏维埃工作。

(4) 由省委代表团及三个临时县委，选择积极工农分子担任特派员，分配到苏区各地，以乡为单位，建立支部，每个支部五人至七人为支委，在支

部之下，建立工农兵青妇每个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以支委担任，工作委员会以三人组织即妥，由工作委员会领导各种群众斗争，建立斗争委员会，扩大群众组织，斗争委员会的组织三人至五人即妥，内中只派一二个同志参加，其余概用积极工农分子，同时将斗争委员会的经常工作建立起来，领导各种群众斗争，扩大群众组织，使群众斗争与组织扩大到相当程度（至一乡即妥，因旧苏区的乡面积都在十里上下，户数都是八百以上至一千六百，人口平均三千以上），由各种斗争委员会招集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统一指导各种群众的革命工作（支部以上的工作仿此），同时由支部选定各×人担任〈互〉济会、反日、反帝、反国民党，拥护苏联，拥护中国苏维埃、工农红军与扩大红军的工作，更要特别选定积极勇敢有军事经验的工农分子担任军事工作，并用全力[部]的力量推动他在各种群众组织中扩大秘密的红色武装组织，特别加紧武装组织的政治军事训练（参加秘密武装组织的群众一不×作工作），在初步秘密武装数量以能超过本乡反动武装三倍为标准，大致的数目是一百至五十人，名目上叫作纵队，以备与本乡反动武装冲突时，在前后方都能从容应付，不受意外打击，超过初步数量仍继续发展，成立第一期补充队（数量与纵队同），以后继续不止。如有两个支部以上的秘密武装组织纵队，就能集合游击，必如此才能继续不断的大批增加红军，且能保存足够掩护后方的力量。对于肃反工作，要在开始建立支部时即由支常委之一担任起来，并在各种组织中，秘密指定专人负责建立群众的肃反工作，同时建立秘密特务队，执行肃反任务。对于城市白区工作，要在每次支部会中讨论建立与推动。交通网、通讯网、发行网要由支委组织人员负责执行。每个特派员要按照以上的任务决定自己的工作计划，去到各地建立支部，必将以上各种任务在新建立的支部中完全实现出来，就是特派员的初步工作任务的结束时间。

（5）在一县有三个健全支部（指各种任务都作到，特别是秘密武装组织）即选举代表成立正式区委，成立正式区、乡革命委员会，发动游击战；至九个支部以上即成立正式县委，县革命委员会，改游击队为正式红军，成立区、乡苏维埃；至三个县委以上即改组正式省委与省苏维埃。

乙、均房苏区附谷城

一、均县苏区工作经过

均房与光谷鄖×竹保八县，统在鄂北临时特委指导之下，一九三零年六月，鄂北临时特委付良知叛变，八县县委同时破坏，临时特委除付良知外又全数牺牲，八县工作完全塌台，一切组织完全失掉关系，一九三零年九月才由边特指定三人，建立河口中心县委的组织，恢复八县工作，至一九三零年十一月，但将光、谷、均、鄖阳竹溪五县工作线索找到，河口组织又被破坏，各县工作线索又被割断，至十二月又派边特常委到光、谷、均三县找线索，至一九三一年一月才将三县线索找到十余人，在河口召集一次会议建立河口组织，又因工作关系，中委工作人员分散三县工作，河口仅有一人负责，这是一九三一年三月特委扩大会以前的情形。

三月特委扩大会，对于均、光、谷三县决定成立三个临时县委，指导三县工作。当均县县委成立之际，正值均县西南两方群众自发的抗烟苗捐的斗争发动起来，特委派二张金侯李五同志到均县帮助工作，同时建立一个游击队，枪二十余支，人四十余名。当时的组织区域完全在均县的东北部，党员共恢复了二十余名，大半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参加了西南群众抗烟苗捐的斗争，赶走了派款的民团，因此西南两方群众，自动脱离反动政治的束缚，

自动派人到县委接洽，普遍的建立苏维埃政府，主要的目的是不缴纳一切捐派。东北部群众在这种影响之下，也继续接洽，建立了许多苏维埃机关，但斗争的发动与建立苏维埃统是地主、富农领导起来，县委的成分更是大少数富农、地主，一切政权完全操在地主富农手中，除了抗捐税以外，对于分配土地，反富农斗争，肃反以及一切的工作完全谈不到，更因督促他们执行分配土地的任务全部发生动摇，立即走入自动塌台的现象。至四月红三军攻下均县，特委又派特委书记一人、特派员一人，在三军的政治影响之下，才开始改组了县委，改组了苏维埃，成立短期训练<班>，因在命令之下的改组，党与苏维埃仍未改组彻底，政权仍操在阶级异己分子手中，对于工作的转变，仍不能彻底执行。红三军又在开始转变工作之际，离开均县，因此阶级异己分子，一方面利用感情与地方观念，提出分裂组织与排外的口号。以欺骗幼稚同志与群众，一方面实现其两面派的方法，不执行一切工作，并将反动豪绅掩蔽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同时以极端反动威吓的宣传，使群众不敢分配土地，在七月，东西两方面的苏维埃全部自动塌台，只剩均县南方与均县毗连的一小部分存在。到这时期均县党新发展五六十余人，都集合到边界之上。到八月，由郧县分特将均县各种工作人员及新提拔的工农分子与均县游击队，都集合到房县，共计训练了二十余日，将县委及县苏维埃彻底的改组了一次，至八月底才由界牌垭开始恢复工作，彻底执行平均分配土地，至十月仅一个多月，由界牌垭恢复到武当山顶，南北长有百里，东西宽有六十余里，得到土地分配的有十五万人，成立五个苏维埃，一个县苏维埃，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劳动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在这个时期都建立起来，且扩大到三千多人，党员发展到一百六十余人，群众的斗争情绪已渐渐的提高了。至十一月，敌人开始向均县进攻，仅仅是将近三百的土匪队及民团，行动还不积极，均县苏区的群众虽无长期斗争的历史，但在敌人进攻之中，能坚持与敌人斗争，保护苏维埃政权。至十一月红廿五师，自动脱离均房苏区，分特与均县工作人员又走，加以反动派别的压迫与摧毁，均县苏区才完全塌台。

二、房县苏区

房县自一九三零年十一月河中破坏，至一九三一年三月特委扩大会后，尚未找到工作线索。红三军四月初占领房县，并以房县为后方，以前委会开展与领导，房县工作开始以城市为中心向四周推动，以市民、工人、知识分子十余人为基础开展党的组织，又成立短期训练班，至五月才将县委建立起来。当时在中央同志领导之下，对于分配土地，采取了标分办法，对于建立苏维埃采取了接洽办法，对于群众组织在命令之下号召起来的，又抛弃了阶级路线，忽略了肃反工作与反富农斗争，因此富农、地主统参加了苏维埃政权机关。在群众方面所得到的革命利益，第一免了苛捐杂税的剥削，第二、分得点粮食，第三、解除了豪绅的压迫，第四、得到了部分的政权，虽引起群众对于革命的同情，斗争情绪并未提高。党的组织形成小资产阶级集团，每日空谈，不实际工作，实行其恋爱主义，直到七月，党员才发展到四十余人。至八月红三军得到中央的指示，离开房县转回湘鄂西，房县工作由后方委员会指导，开始国际路线的转变。同时特委又派执委一人，工作人员五人，到均房帮助工作，召集了一个四县联席会，将后方委员会改为郧属分特，并决定彻底改造各种组织与转变各种工作，坚决执行分配土地。至十一月开展了，十三个区苏维埃，扩大了各种群众组织与群众武装组织，建立了肃反工

作，发动了反富农斗争，创立了巩固苏区的军区工作，部分的执行了经济政策、劳动法、土地法，建立了文化教育的基础，在军事上消灭了敌人一团的兵力，建立了红军二十五师与均房两县游击队，千里房县只剩西南西北两小部分，在反动统治之下，分得土地的群众有三十万人，群众斗争情绪已提高起来，自动的参加红军作战。自开始工作至十一月，党与苏维埃及群众组织共改造过五次，土地分配过三次。至十二月，敌人以一团兵力直入苏区中心，红军什五师实行不抵抗主义，退出房县苏区，房县只剩了一个游击队，不能保障广大苏区，房县群众缺乏长期斗争的经验，一切工作统是在武装掩护之下建立的，二十五师一跑，群众失败情绪立刻提高起来，加以反动分子的破坏，各苏维埃虽未受到打击，也继续组织了反对旗帜，鄖属分特及均房两县工作员及两县游击队，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也退出苏区，致房县的工作完全塌台。

三、谷城

谷城自一九三一年找到线索后，至四月，和平的恢复了三十九个同志，并未领导过斗争，更无群众组织。至五月红三军由房县攻保康，转攻谷城，在这种影响之下，才秘密的传了二百多人，集合了七十支枪，以×由为后防[方]，至六月就秘密游击起来，游击区域，东西五十余里，南北八十余里，除了打豪劣绅外，不做任何工作，在行动中常常扰及中贫农，拒绝党的领导，完全是土匪的行动，激起了一切群众反对，更因为他们行动妨碍了党的工作。至八月红二十五师到谷，将这个游击队的指挥员加以死刑的处罚，由分特派工作人员到谷，转变谷城，特别是游击队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正在开始，白军五十一师携同光、谷、襄三县民团到谷“围剿”，谷城游击队退住房县，而新到的工作人员与谷城原有稍带彩色的同志，多被群众屠杀，工作完全塌台。

均房苏区受到严重打击的原因，第一、是枪杆主义之下建立了各组织与工作虽经数次转变，始终是在命令支配，故不能彻底，广大群众得到的解放与土地分配的利益，但认为是党与苏维埃的恩赐，甚至认为是某个人的恩赐，不了解苏维埃是自己的政权，无拥护的决心，不能为苏维埃作坚决的斗争，专仰红军保护苏维埃，并保护群众自己，红军一走许多乡、区苏维埃与群众组织，未受到分毫打击，即自动解散；第二、是阶级异己分子把持领导机关，妨害国际路线的执行，均属的党虽经四五次改造，各级指导机关主要负责人仍在阶级异己分子手中，在名义上参加了大半数工农分子，更形成少数异己分子的包办，因此党不能艰苦的组织群众，更不能顽强的领导群众与敌人作艰苦的斗争，环境稍较严重，各级指导机关先逃，必候环境稳定后才回来，不但不能领导群众，实际是群众的尾巴；第三、肃反工作只空洞的口号，均房苏区各种组织中，都存在着许多地主、富农分子，经常发现反革命的谣言与威吓群众的事实，始终未破获一个反动分子与一个反动组织，二十五师走后，立即大起反动作用，使群众自动取消苏维埃与解散组织；第四、是反富农斗争更是做得不彻底，普遍的富农与地主，与雇贫农、工人和平共处，混淆了阶级意识，不能暴露斗争的决心；第五、更放弃许多主要工作，如反日、反帝、反国民党，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中国工农红军，因此更不能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第六、军事与党的逃跑，敌人进攻均房苏区仅五十一师的一团与新收张连三一部分土匪，张连三又完全持观望态度，将匪队分驻均县城与石花街，只在城市派款收税，不到乡村一步，二零四团不过千人均房两县

民团不过七八百人，尚未与白军共同进攻，均房两县苏区，纵横都有二三百里，得到土地利益的群众有四十五万人，群众武装组织又近万人，红二十五师与均房游击队又足够应付三零四团，而苏区各种组织正在发展之际，敌人用孤军深入的冒险政策，直入苏区中心，红二十五师不加分毫抵抗，迅速自动退出苏区，提高群众恐怖情绪，鄙属分特应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发动反对逃跑主义的斗争，来动员群众，冲破敌的围攻，巩固与开展均属的苏区，不这样去作，当时仅以消极的死守苏区的态度处之，不积极动员群众，专在苏区内避免敌人，更提高了群众失败情绪，分特过一处组织塌台一处，结果不能不离开苏区，使全部组织塌台；第七、忽略秘密灵活的组织的准备，在均房苏区，曾发现逃跑（因环境关系），一切工作停止的事实，这事实的教训，一方面告诉我们均房尚无布尔什维克的党，一方面告诉我们应付准备由公开转入秘密的灵活组织，特别是二十五师逃跑后，更应该把这种组织建立起来，以备在环境严重时期的活动，分特未作这种工作，又把一切人员带走，因此使均房在恢复工作上却发生了大的困难，均房的肃反工作与反富农斗争统作的太差，阶级斗争不尖锐，普通的同志都能存在，灵活秘密的组织最易存在，工作可以继续前进，不建立这种工作，反将工作人员一齐带走，是最大损失；第八，未执行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的斗争，使各种各级组织中蔽藏着许多阶级敌人与反动派别，妨害工作的彻底执行，对于最无耻的逃跑，尚认为是甘五师负责人与分特负责人的个人冲突；第九、谷城工作，可以说完全集合了一部分土匪，再也说不出有旁的工作，无多说的必要。

四、均房谷目前的形势

均房谷三县的劳苦工农群众，经过相当的解放时期，且得到部分的土地革命利益与政权，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苏区塌台后，第一经过一月以上的残酷摧毁（三零四团与当地国民党自十二月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到各地剿捕骚扰）时增加许多反动组织与武装，格外加重各种压迫与剥削，第二、自一九三二年一月至六月，又经过二万以上土匪奸淫烧杀与抢虏，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在经济上不只是破产，且十之八九失掉了生产工具，第三，是春夏两季的旱灾，麦秋、中秋减收到十分之一，大秋更是绝望，第四、是各种摧毁之后的压力，刘镇华以一师兵力到均房，每月派款最低在三四次（平均每县每月四万元）经常的号夫、号车，建立各种反动机关与帮助转动，因此荒芜了大批田地，广大的工农失业，变为灾民土匪，流动在均房周围，能在家中生产的群众，其生活正在迅速走入不能维持的形势，这种不堪的形势正在猛烈的向前发展，三县的劳苦工农群众在这种事实中，格外认清了反动统治的罪恶，迫切的要求苏维埃政权的恢复，在城市与乡村中，继续不断的发生与民团、驻军冲突的事实，如秘密捣毁反动政权机关等等，均房群众斗争情绪已极尖锐，革命危机已接近成熟。

五、均房谷目前的紧急任务

均谷房目前各种主要任务，通用襄枣宜钟苏区的决议，不另指出，紧急任务如下：

（1）加紧组织与领导群众斗争。均房苏区群众，自发斗争的情绪已达高度的尖锐，又在高度白色镇压之下，每一种斗争都有暴发大的革命浪潮与遭受大的屠杀的可能。广大群众毫无组织与武装，又无正确的领导这是不能暴发革命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工作最主要的危险，应按照群众斗争情绪，特别艰苦的将群众的斗争组织起来，联系起来，就是将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联系

起来，使群众组织得到开展适合群众尖锐的斗争情绪，并且在组织斗争中，将布尔什维克的党的领导建立起来，站在尖锐的群众斗争的情绪上面，运用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领导广大群众斗争实现革命浪潮。

(2) 加紧组织与领导灾民斗争，这更是均房目前紧急工作任务之一。均房广大失业灾民，都经过长期苏维埃政治的洗礼，在逃亡流散的绝境中，更认清反动统治罪恶的残酷，苏维埃政权恢复的要求更迫切，应立即派人打入广大灾民群众中，艰苦的把广大灾民组织起来，并加紧建立与扩大灾民武装组织，直接领导他们抢粮，肃反，游击战，推翻反动统治重新建立苏维埃政权。

(3) 加紧群众武装组织。在各种群众中，在灾民中，要在组织斗争开始，即特别集中注意力，扩大群众的武装组织，要使群众的武装组织与群众组织平衡，足够保障××尖锐斗争，并且单独发动游击战为标准。

(4) 建立真正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在组织与领导斗争中，特别大胆、大开门的征收工农分子入党，扩大党的组织，并立即吸收工农分子参加各级指导机关，彻底执行民主集中制与各种训练方法，在短期培养大批工农干部，在各种组织中，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建立起来。

丙、鄂豫边白区工作

一、鄂豫边白区工作自一九三一年五月特委扩大会议后，不但没有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更走入极端左倾机会主义不动的状态之下，南乡新钟×襄唐宜南各县党的工作，完全变成秘密清谈，群众组织变成一种行会的形式，内部组织除了虚应故事的例会外，再也找不出工作行迹来。其中虽经过南中、襄中扩大会议，县书联合会代表会的纠正，但都是会毕即了，一切文件与指示都不能向下级传达。因此所有下级同志与群众都感觉着没办法没出路，一致的消沉下去。至十月临时特委紧急会议中，与十月县书联席会议中，虽然指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决定了转变工作的策略，但党的组织未改造，各种决议与指示仍未执行，同时又将南中、襄中中心工作人员集中到襄枣宜钟苏区，各县党的组织，仍操在阶级异己分子手中，又减少了健强指导工作人员，更形成全部工作停止的现象，原有不动的组织已全部无形的瓦解，以清谈为工作的党员也减少到一半以上（在十月紧急会议时白区党员尚有千余人，到现在不足四百人），鄂北白区受最近的破坏连很少散漫的同志都找不到了，这就是鄂豫边白区工作一年来的情形。

鄂豫边白区工作，虽经过多次纠正，反走入消沉的原因，是不良的异己分子把持各级领导机关，妨碍国际路线的执行。具体的事实，第一、每个阶级异己分子利用其社会地位与感情方法，结合一部分同志与群众在其个人意识之下，进行机会主义的工作，党与群众完全把持在个人手中，这种阶级异己分子一遇到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或工作紧张或个人感情不得意，即发生动摇消沉，形成一部分工作停止，桐西、唐南、襄北、南阳东南西北两方面的工作是最明显的例证；第二、是放弃工作而自由行动，如光、谷、邓、新各县工作人员因各人的事故自由脱离工作地至四五个月之久使全部工作涣散；第三、放弃斗争的领导，任意逃跑这种极可耻的革命罪恶几乎成了鄂豫边白区工作的惯例。无论那种斗争与斗争的大小，阶级异己分子根据他的阶级意识，感觉着危险，马上不顾一切的自动逃跑，必俟时局稳定，然后回来，甚至一处发生很小的事故，其他各处普遍的逃跑，工作完全停止；第四、是会友式的指导工作，下级同志到上级来或上级同志到下级组织中去，见面并未讨论

工作，更谈不到审查工作，专门说些东长西短，把讨论工作时间延误下去，更有许多抛弃组织路线单找个人感情融洽的同志谈一谈就算完了，不必说集体指导，连个人指导都说不上，完全是会朋友，那[哪]里推动工作；第五、是不相信工农分子，不提拨与培养工农干部，一切组织把持在阶级异己分子手中，另一方面许多积极分子皆因阶级异己分子的抑制感觉没出路，走入消沉状态；第六、不能深入群众中去，不能艰苦的组织群众，阶级异己分子不能无产阶级化，即借口不能公开的接近群众，专与富农、地主、小资产阶级分子周旋甚至与工农同志到乡间巡视工作，将下级同志威吓跑，这真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中的奇耻大辱，不只于脱离群众，更脱离下级组织；第七、截留上级文件，三月扩大会与以后各次会议的文件，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普遍的下级同志都未见着，也未听到口传，工作怎样能推动能转变？第八、自动取消组织关系，任意发生个人横的关系，自三月扩大会到现在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始终未得到白区各级的正式工作报告（联席会、代表会除外），虽严格督促也不执行，使上级无从指导，但是鄂北、豫南的同志在私人感情方面可以自动的往来，更可以自动的到豫南特委去，影响一地方全部组织的涣散；第九、个人独裁，因不相信工农分子，在各级指导机关中，号称参加多次工农分子，不过是充数，形成少数阶级异己分子的包办与独裁，参加各级的工农分子概都发生一种没兴趣的感觉，有许多工农分子因参加指导机关转到消沉，更恳切的要求脱离指导机关；第十、对于一切指导与批评，实行两面派的办法。阶级异己分子与上级接洽工作，或在会议中，对于工作指示与错误的批评，当面表示到十二万分诚恳的接受，但到实际工作中，把一切指示与批评抛到九霄云外，仍执行其最不可允许的错误路线，甚至用不正确的理论在下级反对批评与指示以欺骗幼稚同志、使一切工作不能进行；第十一、阶级异己分子转移革命工作变为无原则的斗争以掩盖其断送工作的一切罪恶。最明显的事实，鄂豫边白区工作已全部走入塌台现象，未闻各县有任何工作计划与加紧推动工作的决议，但在各级组织中普遍不断发生私人冲突，不是这个负责人那样长，就是那个负责人那样短，对于工作一点不谈，这些长短都不是本人亲自听到的，追根到底都是由阶级异己分子口中造出来，一般幼稚同志被其蒙蔽，因此转移每个同志的工作力，变为不落实的无原则的斗争。以上各点是阶级异己分子在鄂豫边白区妨害工作的具体事实，因此鄂豫边白区的党不能不走到塌台的现象。

二、鄂豫边政治形势

鄂豫边省的经济在全国经济总危机之下及国民党对[的]封锁，豪绅地主继续开展长期残酷剥削，与一九三一年的大水灾，本年的旱灾，已达到深入的崩溃状态，如中心城市与中心工业区的失业工人达到全数的三分之一，如襄中、河口、南阳各种手工工人，甚至达到三分之二，如镇平的组网工人、襄河两岸的码头工人与水手不失业的工人也正在向失业的路上走；破产的农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荒芜区域占鄂豫边省全面积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在荒芜区内的土地，因大多数农民丧失了足够的结果，正在扩大荒芜性，且大量的减少生产量；兵士欠响至十月以上，在严冬之中没有冬衣，没有鞋袜，生活恶化已达极点；小商业倒闭十分之二三；物价与农产品形成畸形的涨落（是指物价太不平衡且涨落的限度大速），利率高到百分之百，甚至高到百分之二百以上（如表麦账、糶税账），乡村城市充满纸币，致经济系统极端破裂，缩小流通范围，更加深了经济恐慌；均××内镇五县灾民已超过百万

以上，土匪如雨后春笋的生长，军队、土匪、民团分割的形势日渐显明（因这样割据形势早已形成了）。在这种深入的经济崩溃之下，加以全国革命胜利与高涨的浪潮，与鄂北苏区政治影响的扩大，鄂豫边省的反动统治动摇已入崩溃的形势。反动统治为维持其不可挽救的危机，动员一切反动力量，用最高度的白色镇压。如经常清查牌户，严格实行牌户连座法，以镇压各种群众；疯狂般的扩大反动武装与健强各种反动组织，各县民团扩大到比原有的数目十五倍至二十倍；普遍的富农地主几乎完全吸收到各种各级反动机关中，继续不断的开办各种反动训练班（如民团训练班、警户训练班、清丈人员训练班、村镇市区乡长训练班、农村师范等等），训练各种反动人材，建立各种反动机关，以期彻底维持反动统治。同时更施行欺骗政策，以欺骗群众（如对于各县最著名的大豪绅抄家消门，宣言为群众除害）。反动统治这种最后的拼命的挣扎，在表面好象把革命高涨的形势镇压了一点，事实上正是用极猛烈的力量造更高度的崩溃最主要的特征，第一、是在迅速增加着的将近二百万广大灾民无办法，第二、是鄂北豫南土匪特别发展，各地新杆继起，毕广南在南阳不足十日集合了土匪千余人，襄樊城内绑票，南阳东关劫汽车，第三、是士兵经常整排、整连、整营的哗变，自动派人找土匪，第四、是最近的经济大恐慌，大铜元不能流通，纸币充斥，银价物价一日之间超越一二倍，小商人市民骤然间增加大批失业，第五、是新旧豪绅争夺剥削地盘的经常合并的范围愈趋愈大，第六、是群众与军警、民团冲突继续不断的暴发，新野反食派三二日的时间东西区群众完全参加，陌坡组织抢粮吃大户的斗争，五天的工夫扩大到二十余村，宜南的群众在一个月中自动发动了五次抢粮，对于反动统治各种压榨，给以怠工的办法回答，以上各种特点，证明鄂豫边省反动统治正在加紧制造更高度的革命形势。

三、鄂豫边目前工作紧急中心任务

（1）加紧组织与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特别是自发斗争与大规模的抗捐税斗争。组织斗争委员会，正确的运用斗争策略（参看中央指示信与以往的特委的斗争发动法）把各种广大群众大规模的斗争推动起来，联系起来，并很敏捷的转变到武装冲突游击战。

（2）加紧组织与领导灾民斗争。鄂豫边区将近二百万灾民，在全国革命胜利与苏维埃运动高涨的革命浪潮之下，走到生命的绝路，有直接转入土地革命的可能，应用布尔什维克吃苦耐劳的精神打入广大灾民群众中，扩大灾民组织，特别是武装的领导他们吃大户、抢粮、游击战、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3）加紧建立与扩大群众组织。鄂豫边省广大劳苦群众斗争情绪已达尖锐顶点，缺乏健强组织，使斗争情绪不能实现，应在组织与领导斗争中，把各种群众组织，建立起来，迅速地扩大起来，以备动员千百万广大群众，推动更展开的斗争，粉碎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

（4）加紧建立与扩大真正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在组织与领导斗争中严格洗刷不良的阶级异己分子出党，要大胆、大开门的吸收工农分子入党，积极扩大党的组织与领导力量，经常不断的吸收工农分子参加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继续不断的在实际工作中动用群众路线，改造党，改造各级组织，并以各种训练方法，特别是民主集中制训练大批工农干部，以备加紧各种组织中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

（5）注意反反动派别的斗争工作。鄂豫边省各县反动派别——改组派、

第三党、托陈派、AB团等，已有长期历史，最近更特别活动，在我们各地组织都已发现反动分子，应当经常的将反动派别的武断宣传与欺骗及反革命的各种实际事实，在党内与群众中暴露出来，引起群众反反动派别的斗争精神与情绪，更应深入两条战线斗争，使反动分子无立足地点。

（6）鄂豫边省白区各种主要工作任务，适用襄枣宜钟苏区工作任务的指示，不另指出。

注释

原文无时间，此系编者判定。

鄂豫边临时省委关于领导群众斗争与开展游击运动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九月八日)

在群众革命情绪日益高涨的现在，鄂豫边党领导群众斗争与开展游击运动的决议：

1. 由于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中国的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空前的破产，使整千整万的劳苦群众陷于贫困和饥饿，地主资产阶级对于这广大的饥寒交迫的奴隶，还正在加紧他们对于劳苦群众经济的政治的进攻，法西斯蒂化。鄂豫边的群众在这样的残酷的饥寒的和死亡的教训之下，尤效了几千年封建统治所给予他们的黑暗的阴沉的锁链，认识了地主资产阶级，认清了他们自己真正的出路，猛烈的向斗争道路前进，特别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的开展和苏维埃政权下群众脱离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剥削压迫，脱离了饥寒交迫的奴隶生活，掌握了政权，分得了土地，改善了生活，以及红军壮大的胜利，尤其这次红四方军和红三方面军伟大胜利的政治影响，鼓动了他们的活跃的革命热情。

争买的表现的泌阳在××群众要求与国民党武装冲突，要求赤色游击队的帮助而自愿担任前敌，在鄂豫边各县普遍继续不断的暴发动的群众斗争，斗争的形势已经由自卫而走入进攻，推翻村长、区长，打区公所，乡公所，打死区长，杀反动的豪绅的事件，在鄂豫边每月发现在十六(件)以上，这种斗争是直接反法西斯蒂政治，接近直接革命形势，并且这种斗争，摆脱了已往被豪绅地主利用和封建迷信的团体(大刀会、红枪会)之下的发动，在襄枣宜完全为争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条件之下暴露了群众杀××区长，襄阳几次杀豪绅的事件，在他各区群众在这种情形之下，找共产党来领导他们，要求赤色游击队来帮助他们，这一点证明广大群众都倾向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所领导的工农民主革命道路，而实际行动起来，走上土地革命的前途，特别这次红军西征的政治影响之下，广大的劳苦群众到处找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党员底领导，随地可以得到群众的掩护。这次号召群众参加红军，按期的都超过了预定的数目，同去年召集不来的形势完全成为反比例。其次在鄂豫边的士兵群众中间亦表现着伟大的革命情绪，热烈的倾向到红军方面来，××的一部分士兵××××收国民党枪支。新野的政治紊乱要求新野党发动当地群众与他们汇合发动游击战争。泌阳公安局警察拒绝作国民党的统治工具，结果使县知事军人独×的逮捕布尔什维克党员，尤其镇压士兵群众，在彭阳同推翻法西斯蒂的压迫之下，在他们穷困饥寒的奴役之下，经过红军西征的影响，他们普遍的要求发给红军的符号，将来红军来到时投入红军，失悔以前错过机会。如果镇平党加强对于士兵的领导，扩大士兵中的赤色组织，在不久有成为伟大行动的可能，泌阳民团士兵，团长令他们截袭击红军他们掉转枪头要打死团长，投入红军，他们这样热烈的情绪，不仅是红军伟大胜利的影响，而且是他们自己的迫切要求，必然的走上土地革命的道路。总结上面的事实，证明了群众革命情绪猛烈的高涨，而且是都沿[走]上苏维埃政治的前途，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证明了阶级对比条件的转变，完全是有利于工农，而鄂豫边不能很快的开展苏维埃运动，完全是党不能活动和领导群众斗争，来发动和开展斗争，甚至于泌阳党拒绝领导群众的武装冲突，新野不敢发动群众去汇合武装，襄枣放弃政治宣传工作，至[致]群众后悔认为土匪等事件，不相信群众，倒拖群众情绪，客观上帮助了反动统治造成革命的

耻辱，在泌阳党的领导，还没有把机会主义的错误，洗刷干净，还带着很深厚的机会主义的实质，不过工作在走向群众，在一月内，就发行[动]了三千以上群众的分粮斗争。这完全证明了国际路线与中央路线的完全正确，特别是泌阳群众，在抢粮中要求武装冲突，这更证明了国际所指示的中国革命前途在土地革命条件之下不可避免的向前开展，虽然我们的泌阳党还躺在机会主义的烟雾露内，但是群众却把我们的任务提到我们面前了。

2. 且详细的检阅和分析鄂豫边各县党的群众工作，在四次扩大会议后，依然没有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去克服机会主义的污秽，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更暴露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正因为鄂豫边党还不能摆脱机会主义的泥坑，所以在这群众革命情绪日益高涨的条件之下，对于这迫在眉睫的紧急任务——领导群众斗争，发动与扩大游击战争，开展苏维埃运动，始终不能与群众情绪配合起来，与发展起来，党落在群众的后面，更谈不上[起]领导作用。在这里特详细指示，半年来关于领导群众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与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的危险，号召鄂豫边全党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A. 襄枣宜钟这次发动游击战争的失败，是他们重复了过去脱离群众单独武装观念的机会主义的发动游击战争，在他们发动之前，襄阳的群众杀反动分子的事件，已经发动了几次，并且耿集区的群众，已经打了区长，襄枣宜钟党不善指挥这些群众斗争的浪潮，发动游击工作，而把工作中心转移到运动枪杆上面。当枪支由×××里拖出来的时候，不去马上扩大政治工作，号召群众配合这一行动，而是秘密隐藏在反动村长所在地村庄，又不马上肃反，以致这一反动村长向白军告密遭受包围，而受着大的损失。在失败后，群众知道是红军，后悔不向红军报告，而使自己的军队失败，当时襄枣宜党所以没有抓紧群众斗争的领导而脱离群众去运动枪杆，就因为襄枣宜钟的领导同志，有“没有枪杆不敢干”的机会主义观念，事实上群众已跑到前面去了，因为这样的机会主义观念，所以就引[造]成了这一次的失败，以致牺牲了和逮捕了党的中心干部，增加了群众失败情绪，损失了这一部分游击队。

B. 泌阳的党，虽然已经在开始走向群众，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党仍十足的落在群众后面。首先我们可以看见泌阳党感觉游击队有应接不暇的形势，可是群众不在游击队的帮助之下，仍然继续不断的发生许多自发的抢粮和杀豪绅的斗争，他们不去运用同组织的力量领导群众斗争，扩大游击运动，而以枪杆为推动群众斗争的唯一工具，这样的机会主义，就推翻了游击运动开展的高度，削弱了群众斗争范围扩大的前途，缓和了阶级斗争的深入。新野党在领导灾民斗争中，首先号召群众借粮斗争，准备由借粮转到分粮抢米吃大户的斗争，结果地主不借，群众转回来了，新野党就认为借粮办不到，吃大户，分粮抢粮，群众更不敢了。他不去在群众中更清楚的暴露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使群众在斗争中经验与组织，扩大宣传煽动工作，鼓动群众情绪，转变到抢粮分粮，吃大户的斗争，他们说是群众胆怯，没有办法，事实上新野群众反马鸣武的斗争，爬马鸣武的房子，已经形成了动摇的形势。正因为他有了机会主义观念，所以在占全县人口十分之六七，且日益扩大的行将饿死冻死的灾民，到现在还不能发动灾民斗争，反而使这种机会主义的工作，反映到党内，使党员和群众更深入右倾观念。镇平党在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工作中，以为这一任务是和平的事务的任务，而没有看成是镇平党当前的斗争任务，所以没有在群众参加热烈情绪背景，失业灾民饥饿与不安于彭锡同法西斯蒂政治残酷的压榨的条件之下，在号召中因为群众情绪而转变为

当前群众斗争，号召群众发动游击战争，创造新红军。这些错误，通统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笼罩着，不敢提高群众情绪，扩大斗争范围，转变斗争性质，深入阶级矛盾，而至于使斗争不能开展，停止在某一阶段，并且得不着胜利，这种机会主义，是实际工作向前开展的最大障碍。

C. 最不能使人忍耐的错误，是泌阳群众要求武装冲突，要求党领导他们武装冲突的时候，他们却压制群众这种尖锐斗争的情绪，推脱群众的要求，他们以为群众起来，白色镇压来了，无处安置，好象是从缓和群众斗争情绪之下来推动革命。泌阳党发生这样右倾机会主义，不仅造成了革命的耻辱，并且正因为群众没有武装的准备，以至白色镇压到来，逮捕了好几个革命积极的工农分子，不但葬送了斗争，而且葬送了群众，造成革命的罪恶，同时对于党的威信，对于工作的前途发生很大的障碍。新野党在白色国民的士兵要求号召他们汇合把枪拖出来，发动游击战争，而新野的领导机关以没有准备四个字对士兵的要求轻轻推开，把自己的任务轻轻放过。这和泌阳党同样的错误。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是实际工作极大的危险。泌阳党更严重的错误，是当这次白色压来，泌阳党不去在工作中冲破这一镇压而逃跑，以致组织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恢复，使工作上受绝大的损失。这一逃跑，是泌阳党不相信所领导的群众有伟大的力量的机会主义的根源所产生的。

D. 最令人不满意的，是鄂豫边党在群众普遍的发动、斗争继续不断的暴发中，没有一个地方的党的组织，去积极的参加，去抓紧自发斗争，去在斗争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为一般同志，在机会主义的观念中，完全忽视了群众自发斗争，完全放弃自发斗争的领导。这一点清楚的证明了，党员落在群众后面，因此放过了斗争，影响了革命前途。最可耻的是许多同志掩盖了群众斗争的事实，反而说群众斗争不易发动，来掩盖自己右倾怯懦的实质这种观念，这些分子简直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

E. 镇平党在推动工人反××改良委员会的斗争中，他们不敢用党的组织和党的政治主张去领导，而利用流氓富农做群众的领袖，结果因为一个人的叛变，而使斗争不能发动起来。这一事实不敢争取公开的领导，正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这一斗争正是断送在右倾机会主义之下，其次北山抗渡捐的斗争，在斗争发动起来之后，群众热烈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斗争，民团已经不敢继续维持，已经有了胜利的前途，但是镇平的同志以为斗争已经胜利，不去扩大斗争范围，深入斗争的性质，向敌人积极进攻，并且斗争并没有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使富农分子占居地位，结果民团把其他地方的渡捐收了，而对于三潭社的群众一个压迫，一方面因为没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民团得以从容的造成三潭社的孤立地位，所以一点打击就使斗争失败；另一方面因为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富农领导，所以斗争不能坚持，而且在斗争中表现不愤狂进攻的怠惰性，在敌人一打到来，他马上驯服反动统治之下，叛变了斗争纲领。因为镇平党在机会主义之下，没有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和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使可以得到胜利的斗争，而招致失败，并且使党的组织受到打击，至今×不能完全恢复起来。一般同志正因为他自己右倾观念的浓厚，所以稍微遭受一点打击，马上动摇起来，他们不去在失败的教训中间去研究在斗争中的错误，去认识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的危险，只表示出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一点更证明机会主义的和平发展是有害于群众工作和斗争的领导前途。

F. 在现在鄂豫边各地的党，所以不能在群众情绪日益高涨的现在很快的开展群众斗争，还在于鄂豫边一般同志小资产阶级的侥幸观念不肯深入

群众做艰苦的宣传工作，不敢去公开的宣传，在广大宣传煽动中，团结群众，形成群众斗争的意识。不了解宣传煽动工作是组织群众，推动斗争的武器，只在一次二次很深刻的宣传中，就应普遍得到很大的革命收获，如果群众因为政治水平线的关系，还不能完全接受我们的同志的对于斗争的推动，感觉着失望，这种表现恰恰证明了党内还有很浓厚的机会主义的侥幸观念，没有勇气去克服在实际工作中困难。这样的侥幸心理，一方面使工作与党的政治主张，不能深入群众，一方面使工作很容易走上立三路线。

3.再三的研究和检阅各地党的群众工作的落后，还在于党的内部的机会主义，削弱了党的领导力量和放弃了斗争的力量与领导群众斗争发动游击战争不坚决和不积极，以致在群众工作中，发动游击战争中，重复了已经发现了许多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中间，第一、是各县党部没有利用组织去推动斗争，没有把党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领导群众。各县只有负责人东跑西跑的工作。所以发生这样现象，根本是领导各县工作的同志，对于工农同志和新同志不相信的右倾观念，不敢去动员全党工作，不愿和不在困难艰苦的工作中去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性创造性——自然不是说放弃上级指挥，任着下级去干——这样就形成一般的政治水平低落，工作能力薄弱，甚至养成了党员群众的旁观态度和侠义主义，就基本上削弱了党的力量，削弱了群众工作，不能使群众斗争广大的内容起来，更不能领导广大群众斗争；第二、是鄂豫边党在提拔工农干部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没有实际的转变到大胆的提拔工农干部的路线。党内无产阶级基础与领导的薄弱是群众工作与一般工作不能摆脱机会主义最主要的唯一的原因，也就是一切机会主义发生的来源；第三、是在群众工作中领导斗争中没有和不正确的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没有去打破机会主义的罪恶，致使发生各种倾向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有在两条战线斗争中，使党员群众不了解机会主义的实质危险，所以在每次斗争胜利之后，都反映到党内加深了党内右倾观念失败情绪，不能马上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更深入到群众中去，领导群众斗争，甚致[至]在恐怕[怖]的情绪之下，连组织也不能恢复。

4.在目前群众斗争情绪日益高涨的前面，布尔什维克的党必须按照群众情绪到来，领导群众斗争，领导群众走向游击道路，走上苏维埃运动的道路。这是鄂豫边党工作可能与紧急的任务。更具体的说，党在现在必须抓紧灾民的斗争和反法西斯蒂的政治及工农斗争的领导，以争取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这样一定可以迅速的开展鄂豫边的苏维埃运动。

为了达到这任务，鄂豫边党必须根据已往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坚决的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去粉碎已往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党的工作与游击运动转变到国际与中央路线，很迅速的发展日益高涨的群众斗争情绪，开展工作的前途，所以今后群众工作和游击运动：

第一、正确的估计力量的对比，特别要认清目前对比的转变，是有利于工农的。必须在群众斗争情绪日益高涨的条件之下，去规定群众斗争的程度，反对任何方式的压迫群众事件，反对任何借口，放弃对于群众的领导。不过在另一方面，对于群众落后的意识——如合法等——党在发动工作中，不可绝对拒绝这一意识，党必须在群众中尽量解释这一意识，领导群众在斗争中认识这种错误，使群众走上斗争的正轨。

第二、发动斗争与领导斗争，必须积极的提高群众情绪，扩大斗争宣传，号召广大的群众参加斗争，扩大斗争范围，在斗争中时时注意口号的转变，

领导群众走向和深入。在口号的转变中，要注意不脱离群众，同时要适合群众要求的口号。在这中间积极向敌人进攻，反对缩小范围，而避免大的斗争的机会主义，反对不敢转变斗争性质企图停止在第一阶段的右倾观念。

第三、在领导群众斗争与发动斗争中间，必须特别注意树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如果某一斗争发动时，是富农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党必须在斗争中以最大的努力，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小资产阶级参加这一斗争，也必须他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反对单靠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放弃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更反对象镇平反对改良委员会，利用各[个]人机会主义的方式，尤其反对如抗渡捐的斗争让富农去领导的机会主义的方式，树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扩大与深入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开展党与工会的组织，以培养无产阶级的领袖，使无产阶级的成份在领导机关中占大多数。

第四、是特别在现在每一斗争的发动，都有很快的走入武装斗争的可能，群众现在的武装观念也是非常浓厚，所以在斗争中必须注意建立群众武装的组织（赤卫队、纠察队、自卫队等），首先宣传群众了解不应单靠军事，要自己建立武装，并向群众解释；日式武装的效力和群众武装力量的伟大，使群众对斗争有胜利的決心。

第五、必须活动[灵活]的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在领导小的斗争的时候，要能够灵活的转变到大的斗争，和深入斗争的性质。因此在大的斗争中间也必须在各方面领导小的斗争，汇合这一行动，反对在领导大的斗争，忽视领导部分的小的斗争的要求，并且斗争不一定是由小的转变到大的（这是一般的规律）。在现在阶级斗争深入到顶点的时候，也可以首先发动大的带有很浓厚的政治斗争，所以在发动与领导斗争中，必须很活动[灵活]的进行工作，反对机械式的发动与领导。

第六、在群众工作中，必须参加到公开的群众团体中去，利用公开活动迅速的来开展群众工作。可是必须认清楚，参加某一群众团体，是为了争取群众，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而不是为某一团体工作。同时党在斗争中必须争取无产阶级的公开领导，使广大群众都团结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反对在斗争中避免对于斗争的领导，可耻的右倾观念。

第七、必须在难[艰]苦的宣传工作中，形成群众斗争的意识。在难[艰]苦的宣传工作中，使党的主张深入到群众中去，在[作]难[艰]苦的宣传工作时，使群众认识反动统治的罪恶，在难[艰]苦的宣传工作中，集中群众斗争的火力，反对小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的侥幸心理，忽视不由难[艰]苦工作中得到革命的收获，更反对不能侥幸的发动斗争而马上失望的右倾观念。

第八、必须在领导群众斗争中，建立群众组织，特别是发展工会的组织和在群众中建立支部，扩大支部的组织。

第九、必须尽量的参加群众自发的斗争，在这中间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将群众由封建迷信和豪绅反动的利用之下拯救出来。达到这一任务，必须时时刻刻揭破反动派和豪绅的欺骗作用，在斗争中，同时还要发动黄色领袖和豪绅利用的斗争。党时时刻刻站在群众的利益上，和群众面前，领导群众认识布尔什维克党是唯一的领导他们为群众利益而斗争的党，在这中间争取群众在党的周围。同时在参加群众斗争中，在党所领导的斗争中，特别要注意同反动派别的破坏斗争。所以在斗争中，反反动派别的阴谋破坏斗争的斗争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

第十、必须抓紧群众斗争的领导在扩大与转变斗争中，发动游击战争，坚决的反对××群众运动的游击战争，反对单独的去发动游击战争的机会主义。

第十一、为了使群众工作迅速的开展，为了扩大游击运动，党必须加强宣传组织深入到群众中去推动与领导斗争。反对个人而不运用组织的推动与领导斗争，使斗争不能迅速开展，不能广大的发动起来，更反对以为下级幼稚，不敢运用组织推动工作的机会主义观念压制了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弄成一般党员的旁观态度，侠义主义，削弱了群众工作。

第十二、为了根本刑除机会主义的来源，更应大胆的提拔工农干部。大开门在群众斗争中吸收积极勇敢斗争的工农份子入党，加强无产阶级基础，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洗刷在斗争中消极动摇的异己分子，从这中间去粉碎机会主义的恶毒，来转变鄂豫边工作，走向国际和中央路线，从目前的群众斗争的革命情绪，迅速走上苏维埃运动的道路。

鄂豫边临时省委

一九三二年九月八日

注释

原文如此。

阿森关于湘鄂西苏区一般情形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湘鄂西苏区自去年大水灾以后，群众生活痛苦万分，他们没有钱买盐、买油、打鱼、摸蚌壳田螺度日。工人则多数被解雇失业，找不到工做。失业后向雇主要求津贴的斗争而获得胜利的，各县都有发生，但这一失业斗争不很普遍。为土地革命真正落在雇、贫、中农身上（各县有部分土地没有分配，富农土地被隐瞒的也不少），党反对潘家辰的堤工外交和租佃政策而动员群众修堤春耕，确是得到了不少成绩。

堤工除江陵之麻布拐、监利之东荆河等大工程尚未完成外，其他较小的工程都有很大的完成。这种堤工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堤工比较起来要好得许多，前者比后者要高而且宽，谁都不能否认，这是湘鄂西苏区广大群众的力量。上一千人以上在一处堤上修堤，这是常有的事情。有些群众甚至夜里摸田螺当食料，日里去修堤。在多处堤工上，国民党的军队经常向修堤群众放枪，群众被枪打死的是常有的事情，有时亦有成群的修堤群众与国民党军队对抗。虽然国民党军队经常破坏修堤；或把已修好的堤毁坏，但堤工确是得到可观的成绩。

群众生活这样痛苦，苏区又缺少种子，缺少耕牛，虽然在这种种困难条件之下，但是春耕也得到相当成绩。

在动员及领导群众修堤，支部很少起领导作用。国民党军队对修堤群众放枪，党员绝少领导群众与白军对抗。在赤白交界区的堤工上，特别在监利，有多次发动向国民党堤工局斗争，逼迫着他们拿出面粉来（每工二、三斤）而获得胜利的。但是对这些修堤群众（有些是白区群众，有些是赤区群众）绝少有强有力的支部组织及人数很多的群众组织。在某处堤工上，国民党组织了类似反共的组织（具体组织名称记不起）。有一次，有非党群众一人说：“我们也来组织赤色的某组织”，他只说一句，当时就有百多个群众响应他。又在某一堤工上，有些修堤群众向国民党堤工局论工领到面粉，而当地支部同志和乡苏维埃还不知道他们从何处领，怎样领来。这表明，支部十足的脱离了群众。在许多县分里，成群的群众去修堤，不是靠支部的动员和领导，而是近于摊派式的，有些地方简直露骨的摊派。改组派首领之一万涛在江陵所做的把戏，便是限定每天每工做几多土，这样把年老的、年少的以及妇女都很难动员到堤上去了。

春耕之获得成绩，主要还是由于群众的自动。省苏和几县县苏的确帮助了贫雇农一些种子，但是为数有限得很。耕牛站得到了相当成绩。至于文件上所规定的生产会议、生产模范队、生产突击队、生产竞赛，最好的给以某种奖旗等等，简直只是文件上有这几个名词而已。记得省委讨论过两三次，但是事后既未见到怎样具体组织方法的文件，更没有提到群众会议去讨论，也没召集巡视员会议详细讨论怎样组织生产会议、生产突击队、生产竞赛等等的具体方法，使他们可以到下级能指示这些工作。

关于巡视员制度，原先是有巡视员及视察员两种，所不同的是巡视员能指导下级，视察员只是看看，把下级材料带回省委。我去时，很想知道下级情形，要求出席巡视员巡视后回省委的检阅会议。原来从没这样检阅会议，他们出去既不给人以具体任务，回来又不检阅，今天从这一区回来，明天马上叫他到另一区去。他们往往到区里、支部里睡了几天（指白天）就回来（这

种现象直到后来组织部无人做工，由我管理才发党的)。我去不久的时候，即在某一种会议上决定取消视察员，设一强有力的巡视制度，规定在未出去巡视之前给以具体任务，巡视回来要开会严格的检阅所给予之具体任务是否执行。可是会议决定是一件事，实际也是一件事，巡视制度仍旧没改变丝毫，直至组织部长逃跑以后，才有相当转变。

关于检阅工作，五月份有“检阅工作及建立具体领导”的一些文件，并定五月为检阅工作月。但是省×机关也只是部分的做到，至于县、区、支部和乡苏维埃简直没有这回事。

关于集体领导问题，在肃反以前，省委常委是开会讨论各县问题。肃反以后，分局之盘铭早到八师，老夏亦在前线，省委书记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偶然回省委所在地则多做肃反工作，所以在这时期很少开会来讨论问题。这一时期弄得省苏只一人负责，保卫局只一人负责（有时二人），省委只我一人唱独脚戏。除省苏党团书记不成问题经常负责外，各群众团体的党团全部解体，没有重新建立。

省委领导各县的方式，除决议、通告、通知、派巡视员、调各县来人谈话外，便是写指示信。但是在肃反未开始之前，省委对各县、区、支部究竟执行省委或中央分局的文件到如何程度，巡视员在下级怎样解决问题，所解决的是否正确，调来谈话后以及指示信去是否照着执行，省委实在不深切了解。记得当六月初旬敌人退出府场时，府场着于分配土地，沔阳县委派巡视员去指示，第一个巡视员是这样指示，第二个又相反指示，第三个又与第二个相反，弄得区委没有办法。这一点可以说明各县也没有集体领导。

县委或区委把省委或分局的文件藏在箱子里，不发到支部去讨论。传单、标语等宣传品，大部分被丢入水中或焚毁不发等等。反革命的阴谋还在肃反开始以后才详细发觉。这样，许多支部甚至区委没有接到上级文件，就是得多[到]的，多数支部甚至有许多区委看不懂上级文件。这里要着重重说一次，除文件外，省委没有具体办法怎样使自己的决议有保证的实现到群众中去，这是湘鄂西省委领导方式最大缺点之一。

正在加紧肃反中，省委组织部是无人负责了。但此时在省委各机关选择了比较好点的党员大批到下级去执行某几个具体任务，定期回来。在出发之前，开会详细解释他们所负的任务。但是他们一到县里、区里支部中、村民会议中不能完全执行他们的任务，不能把省委直至县委、区委、支部、村民会议（最下层的群众会议）好好联系起来。

关于省委领导方式，除上述外，就在《红旗报》（分局及省委机关报）上登载一些近于指导或批评性质的社论。但是支部不是完全得到报纸，在支部中起了反应的，乃是绝对例外的一件事。

照上面所述看来，湘鄂西党还没有好好的与群众联系起来，党没有深入群众，加之反革命派之长期破坏党与群众间的联系，所以有许多事实表现出群众不敢说话，削弱群众拥护党及苏维埃的积极性及对阶级敌人斗争的积极性。如沔阳某区有群众一人把逃到新堤专捉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的一个反革命分子捉住交给某乡苏维埃，而乡苏维埃把那个反革命分子释放了。因此，那个群众说：“我们捉来，苏维埃放了，还不如不捉好，弄得我以后不能到新堤去”。又如有几个群众把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化装侦探来苏区的排长捉住交给苏维埃，而苏维埃给那个侦探一些钱放了，因此那个排长马上领了一些士兵大杀群众，并且说：“苏维埃对我很好，你们（指群众）倒来捕我，

我把你们个个杀死”。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毫无疑问的，这些都是反革命的阴谋。由于党和苏维埃之不深入群众，这些反革命阴谋更起了破坏党与群众间联系的作用。

至于支部情形，除前简单报告稍稍述及外，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支部很少讨论上级的文件，不讨论支部本身的工作，不讨论怎样在群众中工作，即讨论上级的材料亦是非常好笑，一个人读一读，读后问有没有意见，许多人回答没有，这样就过去了。讨论支部怎样执行这个文件的具体方法。可以说是没有的一件事，所以讨论是一件事，实际工作又是一件事，差不多为讨论而讨论。能够开会的支部还是算好支部，有许多支部几个月不开会。党员不肯为党工作，不到群众中做工，有很多愿意脱离党，有许多吃鸦片烟、偷东西过日子。小组会议、支部会议每次所讨论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几个近原则性的大问题。这样，不但不能提高支部党员的积极性，恰恰相反，多开一次会，积极性减低一次，如果有人问他这次会议讨论那些问题，他的回答的公式，一定是“还不是上次那些问题”。

说到模范支部，中心支部，各县的我不知道，在省委组织部直接建立之下是组织部长（改组派首领之一），从这个支部调一个改组派分子到那个支部去建立模范支部。我曾经口头批评过，没有建立模范支部的具体方法，模范支部没有标准，只是从两个同样支部中之一，派出一个人一星期去一次去建立第二个支部成为模范支部，那是乌托邦。

支部干事会也没有标准，几月改选一次，最坏的是，支部书记从别处调去，是上级委派的，这样的支部恐怕要占着多数，特别是襄北各县。这样，不但不能提高支部党员的积极性，选出他所信仰的支部书记，拥护他们所选举的支部书记，而且有利于反革命派的活动，往往这样的支部书记不知道党员的群众的情形。由于党没有好好的与群众的联系，没有具体方法使自己的决议实现到下级去，而支部又不能实现上级的决议，因此有很多事实表现出下级所做的与上级文件上所决定的是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这里当然不能总是改组派等反革命派的破坏作用。

群众对于红军的认识，尚没有达到是他们自己的军队。在支部会议中讨论到参加红军，党员就大家不说话，这是支部的普遍现象。在襄北作战时，成群的群众送饭、送菜给红军吃，但是老苏区的襄南各县的群众，拥护红军是比不上襄北。襄北、襄南对九师是特别欢迎。襄南群众有这样心理，白军来粮食要被抢去，不如拿去拥护红军了好些。我这次跟了七师一部分跑了几天，经过的地方，拥护红军送饭给红军士兵吃是近于摊派，很多地方群众不肯借碗、借筷子给红军士兵，甚至一见红军士兵，到家赶快把碗筷藏好。而士兵时常把群众碗筷借而不还，这或许是因为打败后的结果罢。

在肃反运动中，群众的积极性的确有相当的提高。譬如监利之大津区，从前改组派的阴谋说群众不要土地，有些改派分子逮捕后，在分配土地中，群众就争土地。在揭穿反革命派的阴谋以后，有些地方的群众说：“原来是改组派×阴谋，我知道共产党和苏维埃是不会这样的”。在解释反革命派破坏生产以后，有些群众说：“这样，我实在还可多种几亩田”。

关于改造党的问题，各县县委都有很大的改造，区委就没有很好的改造，有很多区委还是改组派在那里改造的，如江陵、沔阳、监利有相当的改造，但是没有改造好。至于支部，虽然有些已经改选，说不上改造。关于党员情形，除上述外，还有代编练队当队长到国民党那边去接头反水（这种党员大

概是改组派分子），党员有这样行动更动摇群众。江陵有几区有“群众两面派”的名词，这就是说共产党、苏维埃也可以发生些联系，国民党也要敷衍敷衍。

关于省苏维埃对各级苏维埃的领导方式，我找不出与省委的领导方式有什么不同。法令不能全部实现，许多事实与法令是相反的。说到土地法，土地没有全部分配，许多富农的土地被隐藏着而未被没收；许多中农的利益被侵犯。劳动法很少实现。营业税都未实行征收，连封建的鱼行（即等于××××的称中人，但是读书的称中有利于工人，而鱼行则是剥削渔民的寄生虫）都未设法取消而使之有利于大众渔民。乡苏维埃没有召集代表会议及村民会议详细解释省苏维埃的每个法令，使广大工农群众深切了解苏维埃的法令，使他们更实际懂得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政权。乡苏维埃从不召集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报告乡苏维埃的工作，引起一乡或一村的工农群众来批评，不能这样做，所以群众不敢说话。有时有些群众批评乡苏维埃的工作或对乡苏维埃不满意，乡苏维埃即说他反对苏维埃，而改组派即利用这些来破坏群众与苏维埃的联系。乡苏维埃经常有两人做工，一个主席，一个秘书，秘书大概类似知识分子，主席如果差一点即形成秘书专政。如果这个秘书是反革命派，这一乡的工作便一塌糊涂。这种秘书很多是坏蛋，譬如省委所在地的一乡，第一个秘书是坏蛋，换一个又是坏蛋，再换一个又是坏蛋。遇到这样坏蛋秘书，主席如果督促和检阅不严，他就要做坏事，弄得苏维埃脱离群众。

上面拉杂说得很多，接下去是关于肃反以及反革命活动的一切。

各反革命派组织的名称：

湘鄂西苏区的反革命组织有改组派、第三党、AB团、罗章龙派、托陈取消派、“新共产党派”等组织，就中以改组派最普遍最活动，破坏苏维埃、共产党和群众利益的力量和阴谋也比其他各派更毒辣。

远在国共合作时代，一般党员大概兼国民党。国共分家后，没有大大的开展理论、思想的斗争。旋经过霍秋白的盲动时代，长期的立三路线时代，这都是有利于反革命派活动的机会。

各反革命派的外面侵入苏区以及其在苏区的阶级基础：

改组派周逸群用共产党的招牌卖着改组派的狗肉。他所领导的特委时代，完全是实行改组派的把戏，湘鄂西之发生各种反革命派的组织，从苏区外面派去的是多方面多线索的。改组派、第三党、罗章龙派、托陈取消派等等都有人派去。在苏区内部便是地主豪绅的残余和富农分子。地主豪绅残余和富农，便是一切反革命派在苏区里的阶级基础。

各反革命（派）的组织形式：

各反革命派的组织与共产党一样，在军队里有军委、师委等；在地方有省委、县委、区委、支部。各反革命派在湘鄂西苏区一共有七个省委的组织，他们主要是用口头指挥下级。此外，还有许多灰色的群众组织。

反革命派的灰色组织：

反革命派的灰色组织很多，什么野猫会、丁丁会等会，好吃委员会、机关贫农团等等（起码有几十个名称）。

反革命派分子的阶级成分：

反革命分子的阶级成分，大部分是地主豪绅的子弟、富农分子、知识分子，真正工人和农民是很少很少的，有之亦是和他们欺骗或压迫而加入的。

各反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亲自签名的口供：

改组派的代表人物是周逸群、万涛等；第三党的代表人物是胡慎己等；罗章龙派的代表人物则为王进（兼改组派）；而托陈取消派的代表人物则为潘家辰（兼改组派）。周逸群代表地主、资产阶级钻入共产党组织里，是湘鄂西改组派的最高领袖之一。当国民党军队“围剿”洞庭湖时，他把湘鄂西改组派的领导工作交给万涛、彭之玉等，假说被国民党军队打死，而实际则跑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现充当徐源泉部下参谋（或谘议）。此次“围剿”湘鄂西的军事计划，大部分是他决定的。据第三党的领袖胡慎己供，他是由于邓演达亲自派去。邓演达在数年前（的确日期记不起）在法界家中召集胡慎己和派往鄂豫皖去的许继盛等开会，会议决定到苏区建立第三党的根据地，这次一共派出四人，胡慎己到湘鄂西，许继盛到鄂豫皖，一人到中央苏区，一人到广东苏区，胡本人是反革命军委委员之一。派到湘鄂西去的罗章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王进，他同时又负着改组派到苏区进行反革命工作的任务。罗章龙派企图在苏区建立根据地，据王供，罗派认为湘鄂西苏区是他最好建立根据地的对象，先抓住一部分军队，想把整个军队慢慢受他指挥。罗派对共产党的策略，据王供是采取“内外夹攻”，即一方面派人钻入共产党，有些被党开除了的，罗派进行恢复党籍，在党内进攻党；另一方面在党外破坏党，攻击党。在他到湘鄂西之前，上海改组派也有任务给他。托陈取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潘家辰。据他供，他在上海高衡介绍他加入取消派，派他到湘鄂西发展取消派的组织。建立取消派的根据地，同时他又组织所谓“新共产党”。他供他一时期代表共产党（一年前）省委到沔阳、川阳、江陵等县去巡视工作，实际是去建立并巡视改组派的组织。问他既有改组派的组织，为什么又组织“新共产党”？他供“新共产党”的名义能够多抓住一些人，新共产党的名义比改组派的名义容易活动些。他们自己所签名的口供，内容很多，这里只提到一些而已。

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派的联合组织、联合战线与其最毒辣的策略：

改组派、第三党、新共产党、托陈取消派 AB 团等反革命派，除各自保存着独立组织的原则外，他们有一个统一的最高组织。在这一最高统一组织之下进行着推翻共产党、推翻苏维埃、准备暴动来响应国民党外面的军事进攻，所以这一最高组织是反革命派实现统一战线的指挥机关。他们的联合组织与联合战线，大概是发端于今年一月间湘鄂西共产党四次代表大会开会的前后。湘鄂西党过去长期在立三路线统治之下，有利于各反革命派的活动。自中央分局成立后，执行国际路线，严厉打击立三路线，很显然的，国际路线对于各反革命派的活动大大不利，所以在四代大会之前，当执行国际路线之夏西及盘铭一时离开省委所在地时，就在改组派的领袖万涛领导之下召集省委扩大会议。扩大会议对于立三路线一字不提，对于立三路线积极执行者的邓中夏错误问题一字不提。扩大会议的中心是在反对夏西的旗帜之下来反对国际路线，反对执行国际路线的中央分局，把省委与中央分局形成对立的状态。在扩大会议时，各反革命派已经采取联合战线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这一联合战线，在四代大会时更加显明。在四次大会中，他们一致反对中央分局，反对国际路线，说中央分局所执行的路线是退却路线，要中央撤夏西分局职，并准备推改组派领袖之一的杨成林为省委书记等等。他们这一策略，是想首先把共产党的领导变为改组派等反革命的组织，把真正共产党员一批批开除出党（潘家辰口供），再把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和平变为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即和平复辟。这一恶毒计划，虽然遭受国际路线的严厉打击

没有成功，可是共产党的省委、县委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中，混进了不少改组派等反革命分子。

反革命暴动的阴谋：

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等反革命派和平（这里所谓“和平”而指与流血相对待）转变共产党为他们反革命的组织失败后，和平转变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为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失败后，即积极布置反革命的暴动来响应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想一举来消灭共产党和苏维埃，并定暴动日期为六月十五日。这一反革命的暴动计划为党和苏维埃所发觉。没有成功。这一总的反革命暴动失败以后，他们布置局部的暴动。改组派的领袖之一而且是改组派的中央委员之一的侯蔚文，以共产党的名义到江陵指挥工作，把国民党的军队引到张金河以后，自己即到省委所在地布置暴动。这一计划为省政治保卫局所发觉而加以逮捕。直至八月上旬四医院的反革命，九月中旬江陵某区的反革命还组织反革命的暴动。这些暴动计划，都在未爆发前为党和苏维埃所破获。

反革命派发展组织的方法：

反革命在苏区的基础是地主豪绅的残余和富农。他们的构成分子是到苏区来历不明的人，地主豪绅子弟、商人和富农，至于工农分子亦有一些被他们和压迫而加入的。他们发展组织的方法亦有种种，有错误受过共产党或苏维埃处分的分子，或对共产党、苏维埃不满意的分子，是他们最注意发展的对象。遇到这样的分子，反革命就向地包围活动，先问他：“怎样，党对你的处分？”过些时间问他：“这样，出路怎么办呢？没有出路了啊！”又过些时间他：“出路有呢，脚踏两边船岂不是更好吗？”或者钻入党内、苏维埃内故意对某些党员加以打击，加以处罚，另外又派人去向他煽动，说他的问题严重得很，要另找出路才好，或者故意时时调动某些党员的工作，故意批评他，使他在工作中感到没有兴趣，再派人去煽动他。在反革命派的包围、拉拢、打击、煽动种种方法之下，碰到阶级认识不清楚、政治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往往受他们的欺骗落入他们的陷阱。有时某人去吃东西，吃后对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已加入我们的组织？”那人问：“加入什么组织？”答：改组派、第三党或托陈取消派。再着重对他说：“你莫泄漏秘密，泄漏了，当心你的脑壳。”政治不坚定而受反革命用这种强奸方法欺骗进去的也有。

反革命破坏红军、共产党、苏维埃、群众利益以及共产党和苏维埃与群众的联系种种：

反革命破坏红军、苏维埃、共产党、群众利益以及共产党和苏维埃与群众的联系，的确是说不胜说，这里略述其大概而已。

a、破坏红军的：当冲锋可以击败敌人时，他不冲锋；不当冲锋时，他把精锐部队调去冲锋，送去牺牲。往往把敌人包围起来不久就要解决，反革命在红军队伍中就故意撤退让出路来，让国民党军队逃走。

阴谋把红军部队拖给白军去缴械（这种阴谋是没有得到成功的）；有时局部的军事计划是受敌人包围的计划（如沔阳峰口之役，沔阳警卫团的军事计划是送给敌人去缴械的计划）。

对红军中共产主义的政治工作阻碍进行，虐待士兵，打骂士兵。

医院中对伤兵，当早开刀的故意延迟开刀，让他生蛆，不代他好好换药，延迟伤兵出医院的时间，不好好看护伤病兵，引起他们不满意，使伤病兵多受痛苦。另外再派人去煽动他们，说当红军没有出路，或者故意对某一伤病

兵特别好，对某些伤病兵特别不好，以便引起他们的不满意。不应当用刀的故意开刀，使（他们）多受些痛苦，或使之成为局部残废，或者竟用毒药毒死得力的军官（从改组派医生的口供中发现这一阴谋，有一团长被毒死）。

到群众中说红军中怎样苦，削弱群众参加红军的决心。b、破坏苏维埃的：钻入苏维埃机关里来破坏群众利益，吃馆子不给钱，买东西不给钱，并且说他是某级苏维埃的秘书或负责人。拿苏维埃名义去敲诈群众，去逮捕、监禁、吊打群众。故意官僚腐化，穿好、吃好，使群众对苏维埃失了信仰心。今天把这块土地分给甲，明天又调给乙，后天又换给丙（如江陵），使群众不满意苏维埃。在群众中造谣说，苏维埃只许养两只鸡一公一母，多就要没收。说苏维埃不许养蚕，养蚕就是富农。因此，襄北有很多群众把好好的蚕在二眠三眠时丢入茅厕里去。说苏维埃八月十五要没收土地，要没收多余的粮食，因此群众不敢多种土地。对于分配土地，他们造谣说，分配了，土地还是苏维埃的，苏维埃随时要还，就随时要还给苏维埃。因此，有些群众对于分配土地发生怀疑。有些乡苏维埃帮助雇农买种子，反革命造谣说，苏维埃发的种子将来收成是苏维埃的，弄得有些群众不敢要种子。

c、破坏群众利益、破坏共产党和苏维埃与群众的联系：在反富农的口号之下，时常吊打富农，甚至吊打中农，要他们出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更制造种种名词，什么经济富农（有几个钱的）、土地富农、破坏富农（指已破产的）、死人富农（原来家中的土地是中农，他家死了一人或二人，照平均计算起来他家土地超过平均标准以上，称他为死人富农）、准备富农（家境稍好的中农）等等。

把苏维埃和共产党的文件藏在箱子里，不但不把苏维埃和党的正确的政策解释给群众听，恰恰相反，把苏维埃和共产党所决定的修改一下来破坏群众。苏维埃和共产党的宣传品、标语等，他们拿去丢入河或者烧了；已经张贴的或者涂改，或者扯破。钻入苏维埃、共产党里贪污揩油。袒护富农，隐瞒富农的土地。向合作社拿钱拿商品，使合作社倒闭，群众受到损失，凡是能够破坏群众的利益，使群众能够对苏维埃、共产党失了信仰心的方法，反革命派无不尽力去做。

d、破坏军火：把枪支丢掉，把枪支的零件丢掉，使枪支不能用。在军械厂里，把炸药装在子弹里，使放枪时炸了枪筒。

e、向白军接头，进行把红军成批的或个别的拖给白军。时常利用红军名义以办理给养不力为理由，捆绑了区苏维埃负责人。而另一方面，在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的工作中，指定某个不愿参加红军的群众去参加红军，因他不愿去就把他捆送苏维埃（在沔阳某区）。

f、在肃反运动中，反革命的阴谋除布置暴动外，是保存组织。他们钻入肃反的机关中，把主要的反革命分子隐藏起来，逮捕一些反革命的消极分子，如江陵监禁了不少的这样的他们所谓消极（不肯积极做反革命工作）分子；在沔阳逮捕了许多个八、九岁的小孩子，表示他们对于肃反的“积极”。

g、有计划的建立反革命的交通网，与白区通消息。以共产党的名义和经费派人到苏区附近之白区，如宜沙、武汉、新堤、岳口、仙桃、沔城、监城、襄北、五[峰]、鹤峰等地去建立反革命的组织。

h、反革命的军委、师委、省委、县委等领导机关破获后，又成立新省委、师委、县委，又为政治保卫局所破获。

关于反革命的政纲和理论，除潘家辰公开提出国民党的政纲——解决劳

资纠纷、租佃政策、堤工外交、分散游击等等以外，便是中国工业落后、农业落后，不适宜于共产主义革命，中国没有无产阶级，苏维埃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权（潘家辰在襄北改组派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关于肃反的路线问题，中央早已知道，而且已经同意。关于肃反情形和号召自首运动，这里没有很好的开展，区委还没有很好的改造，这里还隐藏着不少反革命分子，支部更没有很好的改造，下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部分的提高，但是不够得很。

反革命在监牢里阴谋陷害真正共产党员，企图几个联合起来共同咬共产党的负责人。这一阴谋为监牢里的侦探制度所发觉。

最后，我要说苏区主要商品的价格。

湘鄂西苏区的工业品大概比沙市贵一倍半到二倍以上。洋价有些地方用六串多，有些地方用七串以上。愈近沙市则洋价愈高。愈近汉口则愈低。

米四百左右一升，盐一串六、七百一斤，鱼二百到三百钱一斤，里[鲤]鱼则在二百以下，油约二串左右一斤。

关于公开审反革命领袖，本定八月一日举行，因筹备来不及，改为九月七日。但是一到八月下旬，军事更吃紧，事实上不可能举行公开审判。在“八一”群众大会上，只提出几个反革命分子来说话。

关于群众团体，工会比较反帝及互济会要好些。反帝及互济会简直没有下级群众基础，有些地方只是一个空机关。改组派往往利用反帝及互济会向群众收捐，等于苛捐杂税。工会会员号称二万以上，究竟确数多少，实在不得而知。雇农工会未单独成立。有贫农团的组织，吊打富农大概是贫农团所做的。贫农团甚至抢红军公田的秋收。贫农团是非真正贫农很多。工会非工人分子也很多。省工会委员长和党团书记都是改组派。

最坏的现象是，上级要设立什么组织，建立什么工作，如识字班、读报组、俱乐部等等，下级马上可以回答你建立起来，而实际则没有工作，只是一个空名词而已。

我的报告就在这里停止，请参看前一报告。

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苏区概况

1. 县份：在四代会以前，苏区有沔阳（占全县三分之二）、监利（占全县六分之五）、汉川（占全县四分之一）、潜江（占全县三分之二）、江陵（占全县十分之一），江南之华容与石首之南部原系苏区，在三次“围剿”时失败，潜江县则为水灾时期发展之新苏区。此时苏区之面[积]，直则由江陵到汉川不过二百余里，横则由监利到潜江不过百余里。在四代会以后，新发展苏区则有江陵之西部（抵沙市附近，占全县十分之九），沔阳之东南北部（占全县十分之九点五），监利之西北部（占全县十分之九点五），汉川之西北东部（占全县十分之九），潜江之北部（占全县），汉阳（占全县十分之七），天门（占全县十分之八），应城的南部（占全县四分之一），云梦的南部（占全县四分之一），孝感的西南部（占全县二十分之一）——（鄂豫皖之苏区不算），京山之南部（占全县四分之一），钟祥之南部（占全县十五分之一），荆门的南部（占全县九分之二）当（阳）县的东北部（占全县十分之一），石首仍系原状。此时面积，直则由当阳到汉阳不下五百里，横则由监利到钟祥不下二百余里，以前苏区由监利到潜江计算皆是最宽点，除此，如沔阳、汉川等，以横计算不过二十里到三十里。以后之发展区域，除监利到钟祥之横度外，其余如由沔阳江边到京山、应城，由汉阳江边到云梦等处之横度，都不下二百里。自党四代会以后，发展之新苏区，超过原苏区一倍以上，此系党的正确路线战胜机会主义之结果。

2. 地势：原有苏区之监、沔、江、汉等县多河流、湖泊、全部地势系垸田，只有垸堤上可以通行，这一带不便于大军作战，但交通非常便利，上则有沙市，中则有新堤、岳州，下则有武汉，中间各湖、各河均可交通，由沙市之水路可经江陵、沔阳、汉阳直达武汉。由内地之东荆河，上经潜江通襄河，下出长江通武汉。以后发展之沔、当、钟、天、应、京、云，惟云梦有湖水，其余均系平原小山，便于大军作战，交通惟云、应间为最便利，但在军事上，京山甚为重要，该地居钟祥、德安、云梦、应城、天门之中心，敌人运兵多靠京汉路。由应城或占皂市或由襄河依岳口，或由沙市经荆门依沙洋，以京山为中心，随时可以占领应城或截击襄河。荆当亦系良好之军事根据地，这两处均多产米，应城产盐，足供军事物资之需要。在四代会后，苏区发展之接近形势，由襄之孝感横过铁路到鄂豫皖苏区，只隔六十余里，仅大半天路程。由沔阳之长江边到鄂南苏区，只过一道河，江南之嘉鱼赤壁山即鄂南苏区，沿长江北仅由汉口上游六十里，即是苏区，只隔新堤、监利、郝穴几个白点，沿岸到沙市附近三十余里之观音寺，尽是苏区（附湘鄂西苏区形势图）。

3. 土地情形：沔阳、江陵、汉阳、汉川等县，湖水要占五分之三，水田占三十分之十七，旱田占三十分之十三。潜江、天门系平原，多旱田，旱田占五分之四，水田占五分之一。监利湖水占五分之一，水田占五分之三，旱田占五分之二。荆门、当阳、京山、钟祥（以苏区计算）水田占五分之三，旱田占五分之一。应城有盐矿、可容七千余工人，此处土地情形不大详细，但苏区之附近憬汉湖者，以水田为多。云梦、孝感土地情形不详。石首（以苏区计）水田占五分之三（以上系大概情形，并无具体之比例数字）。

4. 出产：监、沔、江、汉以渔业为最多，但此项并无全盘统计，仅以洪湖计算，每年可得鱼利二百万元左右，次则为稻，再次则为麦，余为菽、粟、豆、芝麻、菜子、棉。此地多水灾，以春季之寂麦为比较可靠，稻、豆、棉等类，多受水灾之危险（土人有歌谣“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即言水灾之意）。荆门以稻麦为最，天门以麦、粟、棉为最，京山以稻为最，钟祥、应城之粮食出产则不详细。但应城所出之盐，可供湘鄂西苏区之需，天、沔、汉等县之养蚕，只按仙桃丝庄计，每年以百万元以上，但出产粮食之总比例，大概稻为百分之三十，麦为百分之三十五，粟为百分之五，菽为百分之七，棉花百分之十，豆百分之八，其他如：高粱、芝麻、菜籽等百分之五，出境者以棉、麦、稻为最多。稻在荆、当、京一带，有出境者，在监、沔、江、汉一带，可供境内之需，沔、汉则次之（出产每年之具体数目无统计）。

5. 人口及社会成分的比例：沔阳六十万，监利四十万，江陵五十五万，汉阳二十三万，汉川三十万，天门四十万，潜江三十万，京山十万，钟祥五万，荆门二十万，当阳一万，石首一万五千，云梦一万，孝感五千，共计三百余万（上列各数系按其大概言之，具体零数都记不清楚了，故多未写）。在去年水灾时期，监、沔、江、汉等县出外逃荒的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水过后，除陆续回家者外，尚未归来者还在百分之十以上。社会成分则以贫农为最，中农次之，据不确实之统计：工人百分之八，贫农百分之五十，中农百分之三十三，富农百分之七，商人百分之零点三，其他（贫民、小贩、家庭（手）工业、自由职业等）百分之一点七。工人中则以雇工为最，手工次之，苦力再次之，集体产业工人最少，大概雇工占百分之七十五，手工业工人百分之二十，苦力百分之一点五，店员百分之零点五，产业百分之三（雇工以天门为最多，该县有一村名伏岭者，有雇工三千余）。

6. 划分区域：为组织发展及指挥便利起见，特将旧县界重新划分，以汉川之南部（即襄河南岸）与汉阳合并为川阳县委；以汉川之北部（即襄河北岸）与天门之东部（即从天门县城以东，因县城系白区，实有阻隔）合并为天汉县委；以天门之西部与潜江之北部（即襄河以北）合并为天潜县委；沔阳范围太大，划西区归潜江县，当阳东北与荆门城西发展一块苏区，即以此合并力荆当县委；荆门县委在县东南部，当阳县委则在南部，江陵之西（系白区，曾发展游击战争与当阳交界）划归当阳县委指挥；松滋、枝江两县很小，旧县界多有颠倒曲错，故将两县合并为松滋县委，可参看划分区域图。

二、组织方面

1. 党员人数及成分

据四代会时的统计，有两万左右（但这是据各县的报告，不能作为确实数目。因在水灾时期，有许多出外逃荒的与脱党的以及被开除和死亡的都无具体统计）。在四代会后，有襄北和长江上游之猛烈发展，因组织部没有专门系统的统计工作，故对党员数量一项没有确实统计。各县报告多系敷衍。至关于成分一项之比例，贫农仍占最大多数（在四次代表会议时之确实统计），贫农占百分之四十五，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几，工人占百分之十一二，富农在党内仍占百分之八以上的成分。在四代会后，虽然提出向工人开门的口号，但发展仍少（各县仍有对工人入党要三个月候补期之对工人关门之组织方法）。但在提出向工人、贫农开门的口号之下，有许多隐瞒欺骗的，富农称中农，中农称贫农，贫农称工人。特别是反革命捣鬼，有把富农称中农，反把工人认作贫农、中农甚至富农者（江南有一县委——系改组派之一，到

乡村巡视工作，遇一工人曾作十余年雇工，加入革命后，才脱离生产，是支部中之积极干部，因该婢娘系富农，无子，土地已被没收，而该具委说，该工人如来革命，即有承继该婢娘财产之可能，系把他认作“准备”富农，以此而取消该工人同志的支部工作，如此类者甚多)。在反对富农斗争中，许多党内机会主义者与潜伏捣乱的反革命专门闹成份问题，并有造出“死人富农”、“准备富农”、“受气富农”、“经济富农”、“土地富农”等名称，以颠倒错乱而造成党内党外干部与群众间的恐怖。

附：新造名称的解释——“死人富农”，其家本系贫农或工人，因他家死了几个人，计算起来，便变成富农，此谓之“死少、富农”。某人本系工人或贫农，因他家伯叔系富农，或其岳父系富农而无子考，就说该工人或贫农有承继财产之可能，此之谓“准备富农”。某人本系富农，因革命后破产，该成分仍系富农，系言其为革命破产还脱不了个富农成分，此之谓“受气富农”。某乡村小商，有几百元之资本者，其人并有土地，要把这种认作富农，此之谓“经济富农”。某富农田多，不管人口多少(或真富农，或系中农者)，因他田较多，就说“土地富农”。如此甚多。时常有这类干部被开除工作者。家庭土地亦被没收，群众中同样有遭此创造名称而土地被没收者。

2. 各业[级]委员会组织系统

(1) 省委本身。常委：工人三，贫农一，地主一；执委：工人四，贫农三，富农一，地主三，小商一，贺龙成份不详，共十九人。候补四人，成分不详。委员会中青年团员参加四人，内一人参加常委即团书记。监察委员七人，工人二、贫农二、地主三。常委分工：书记、省府主席、少共书记、组织部长、军委主席团委员。省委机关：组织部分部长、统计科、分配科、介绍所(即往来党员转介绍信的)，共四人工作。组织部有十二个支部巡视员，但巡视县委工作之巡视员是没有的，往往要常委本身出发到某县巡视或解决问题，余则观各县报告。宣传部分部长、宣传科、鼓动科，共三人工作。发行部部长、干事共二人工作。秘书处秘书长，管理文书科二人，印刷科八人，交通科四人(内部交通)，事务科(厨房及杂务人员)五人，经济科一人。对白区交通站另设，各交通关系由站长管理。以上各部除发行部外，均组织有五人之委员会，系苏维埃、工会、青年团等负责人参加。省委与中央分局共同直接管理党报，有《红旗日报》与红旗副刊——《布尔什维克周刊》，组织有党报委员会。省委执委中，除妇女部长、工会委员长、苏维埃劳工部长外，红军中有两个，有两个是特委书记，其余系各县委书记，有一个系县委常委，负县苏维埃主席责。省委直接管辖之下有一党校，名为列宁学校，有学生百余人。党员、团员及工会、苏维埃工作干部，区级占十分之五，支部系十分之四，县级占十分之一。

(2) 省委管辖下有三个特委：湘鄂边特委、襄北特委，这两个系苏区，宜昌特委系白区。湘鄂边特委所管辖有桑植、鹤峰、五峰、当阳[长]等县。襄北特委所管辖有天潜、天汉、京山、钟祥、应云孝、应城(应城为区委，其余为县委)。宜昌特委所管辖有公安、松枝、宜昌、荆当、荆阳、远安各县委及宜昌、沙市两市委。荆当远，松枝宜，公安则以当阳、公安为中心县委，以帮助特委指导这几个县委的游击战争。省委管辖有一洞庭区委，以洞庭湖为中心，发展边湖九县组织，该区委下有益阳支部、常德支部、汉寿支部、岳阳支部、南安县委(即南县安乡合并)。直[省]委直辖县委有监利、沔阳、江陵、潜江、川阳、荆门、江南(即石首、华容合并)，荆当、公安

两县委，省委亦直接指挥。特委只有五人的委员会，不分常委、执委、此系省委与县委间的组织，以帮助省委指挥之不及。

(3) 县委委员会有十五人至十七人不等，常委仍系五人，书记和组织科长系当然常委，其余常委委员或系宣传科长，或政府委员不等，但团书记仍照例为党常委之一。县委机关分组织科——科长、技术书记、管介绍者共三人工作；宣传科——科长、干事共二人工作；发行科长。秘书处内亦[有]印刷、交通、事务、文书各部分。妇委各科亦同样有委员会组织。

(4) 区委：七人至九人不等，常委则三人。机关中有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妇委书记、秘书或有一组织干事兼发行员。有些区委有印刷工作。区委中亦有中心区委，帮助县委指挥临近区的工作。

(5) 支部：三人或五人组织，支部委员会与干事会，按支部大小与工作组织之。五人者为委员会，三人者为干事（会），支部亦有直支（系县委直属的，如县级各机关工作人员）、中心支部。区委工作人员则编入附近各支部。湘鄂西共有中心县委十四个，中心区委，中心支部无统计，模范支部并未开始建立。每一个支部系以乡为单位，除应城盐矿外，还有一数百人之窑工。除此而外，并无其他产业支部及农村专门工人支部（天门之伏岭曾组织有几个人支部，亦非单独工人的），其[有]贫农及其他成分参加。

3. 苏维埃的组织情形

(1) 省苏本身：主席团。以下有土地部；正副部长、秘书、统计科，堤工委员会；财政部：部长、秘书、管理科；经济部：部长、秘书、合作社长；文化部：部长、秘书、干事；交通部：部长、邮务局长、干事；司法部：部长、秘书、调查科、看守所、登记科；内务部：部长、秘书、卫生科、户籍科；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正副部长、秘书；劳动部：正副部长、秘书、统计科、社会保险局、职业介绍所；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秘书、调查员；政治保卫局：局长、统计科、侦察科、裁判科、行动科、政治保卫大队（原只一排人，以后在肃反期间扩大到一连人，在敌人进攻时扩大到一营人。以上各部均有单独的视察员）；秘书处：秘书长、文书科、交通科、庶务科（此秘书处直属主席团）。印刷组织、有印刷局，以营业性质，由经济部管理。经济部直接组织有苏维埃商店，合作社有工业合作社、芦席工厂、贩卖合作社、织工厂、有合作社转运所（专门负责运出商品到白区，转运群众需要品要[到]苏区，为合作社与白区贸易之中间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五人，参谋部以下分七科，即：作战科、谍报科、交通科（有一电话队）、人事动员科、地方武装科。机要科、管理科。此外有经理部，经理以下有一军服厂，一兵工厂，还有一军医部，以下有四个医院，以第一医院之组织与建设最为完备。

(2) 县苏维埃：在襄北各县，有一省苏代表团，系由省苏委员派遣组织的。襄南各县苏维埃，则由省苏直接管理。计湘鄂西苏区共有十一个县苏维埃，组织与省苏同，但无工农监察委员会组织，各部工作人员亦较少；经济、财政系合并为一个委员会；军事方面，只有一军事部，正副部长、参谋、侦察科、机要科等组织（省军事有政治部，专门管理红军中党的工作，县军事部则无政治部组织）。(3) 区苏维埃主席，土委，文委，妇委，赤卫军×队长等组织。

(4) 乡苏维埃为代表会，每村选举一代表组织而成，在代表会中公推一主席负经常责任。乡苏维埃机关中经常工作者：主席、秘书（村代表在代表

会后仍有代表资格存在，负责一村工作）。在平分土地中，每乡组织平分土地代表会；修堤时，以每段组织堤工代表会（但这些组织同时[是]临时性质，但亦不完全，大部分不能起作用）。省苏办有一《工农日报》。4.工会：省总本身有委员长、组织部、宣传部、青工部、女工部。以下有十一个县工会，百多个区工会，千余个工支部。支部中集体者以盐矿、窑业、榨业、军事企业（兵工厂、被服厂等）。在各机关中服务者，有职员工会，除委员会外，其余工作人员即加入此组织。职业比例无从记忆，工人数量之统计亦不详。据以前一月份统计，会员三万余，以后调查结果，有很多独立劳动者、贫农、中农，甚至有富农混入者。在湘鄂西工会组织，只有笼统的省、县、区、支，没有一个职业系统为单位的工会组织。5.贫农团：以乡为单位，每一乡有一贫农干事会，五人组织，雇工亦加入贫农团，但有单独的雇工小组。贫农团组织在平分土地与反富农斗争中，表现最有力量，但亦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在群众运动中再行具体写明，此处不多说）。此项无统计。

6.反帝：反帝大同盟，在湘鄂西是最薄弱的组织，多半系团体会员，个人会员却是风毛麟角，会员人数亦无统计。在每一事变及各种反帝运动中，并未表现反帝的组织力量。

7.互济：这个组织更是一塌糊涂。上层机关已经是脱离群众的空架子，也[是]官僚机关（反帝亦同）。下层组织多半是登门造册收捐强迫加入，反白色恐怖与互济工作，在群众中亦未表现丝毫力量。

补充第五[四]项工会的一段。工会在组织上有三个最巧妙的方法：（1）登门造册；（2）册上造册；（3）册也不造。一般做工人运动的官僚老爷，不愿意做艰苦的组织工作，即拿起册子登记，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或由某区派一人到某乡，组织某乡的工人支部，他到那一乡，即将苏维埃的册子拿着，将工人成分撮下来造成名册，即通知这些人来开会，就算组织了工人支部。这个册上造册的方法，已再简便也没有了，却不知官僚主义中“强中更有强中手”，他却用册也不造的方法（即来某乡开群众大会到闭幕时，这位做工人运动的官僚主义妙手，即登台高呼：“是工人的站到这边来”，也有些工人不知究竟是什么事，不敢站出来的，也有站出来的。有些贫农、中农甚至富农懂得工人有权利，或系发动什么有利益的斗争，也站出的不少。站好后，他即宣布成立工人大会，指定负责人，限期做会员登记，他即回去报告已组织多少工会），工会下层组织确实有些是这样组织而成的，工会成分之复杂可想而知（补此一段于组织报告中，便于看组织报告时，知道工会的组织现象）。

8.青年团：在组织报告中，此段不必多写。团省委有专门报告，团的各级委员会与党同。但团员数量则远远落在党的后面，据少共三代会对全省团员的统计，还只一千八百以下。由此可见，团的工作之不青年化，不群众化（关于具体的工作及党对团的领导后面另写）。

9.赤卫军与少先队：赤卫军名称曾经叫做过“农军”、“教导军”、“赤卫队”等名称，在去年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成立省委组织时，正式定名为赤卫军。以四十岁以下至二十岁的为赤卫军，以二十岁以下至十四岁的为少先队。其中十八岁与二十岁之间的，则按其身体、个性，酌量加入赤卫军。赤卫军组织，每县一纵队，每乡一支队；每支队以下三分队，每分队三班，每班八人。小队亦同。此项数目无具体统计，按不确实统计（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时），将近二十万，少先队约十万余。以后水灾时期，此组织已瓦解，至四代会后，

才渐次恢复，无统计，但很少军事、政治训练。至四次“围剿”开始时，终对这一工作比较紧张，各乡亦时常看到赤卫队操练，有时举行全区会操，举行竞赛，夺取锦标“战争飞机”旗帜。少队亦开始有模范队之名称及其组织，但模范队实际上等于普通少队，一般少队当更谈不上，但少队与赤卫军比较，少队要积极些。

10. 党团：在苏维埃与工会中，委员会的党团员要占最大多数，有些甚至于全部是党团员。省苏就有主席团会议与党团会议分不开的现象。这种党包办苏维埃及工会与群众团体的现象，一直到现在尚无很大转变。

11. 干部：干部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后，成分上确有一很大转变。在于部中成分的比例，工人、贫农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许多旧干部中的富农分子，多系做技术工作，但有些在成分问题上看得很呆板的，以为凡是富农成分就不好，不管他工作历史怎样。有些在群众组织中，尤其是苏维埃中，确有轻视中农的观念。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党和苏维埃的干部成分，虽有大的转变，但往往工作中心，还是有落在少数富农分子手里的现象。这个现象在区级比较严重了，因为富农成分的干部多系做秘书及文字类的工作，以及工作的熟练等而造成秘书专政，有些干部以为不识字和工作经验缺乏就无法工作，非依赖能识字和能作文说话的秘书等人不可的观念。同时新干部的教育、训练，简直缺乏到了零度。但有一部分积极而自习精神好的，确有猛烈的进步。但另一部分，因缺乏对干部培养而感觉工作没有出路的，就表现许多消极，对工作没有兴趣，这都是由于缺乏教育训练。没有培植下层基础，提拔干部许多是处于偶然和形式的结果。

三、宣传教育方面

1. 报纸：在省级方面，党有《红旗日报》和《布尔什维克周刊》，苏维埃有《工农日报》，反帝有《反帝 刊》，团有《列宁青年》，少队有《红色青年》，（儿）童团有《儿童 刊》，军委政治部有《红星》，三军军政治部有《红色军人》，医院有医院小报，其余各县都有机关报，有少数区委亦出有小报（如《东山》、《红湖》、《潮湖》等类），系按地名而命名。但报的名称虽多，内容不充足。主要的：（1）很少抓住某一时期的中心，取得强有力的领导；（2）很少反映群众的实际生活与斗争的中心问题；（3）很常[少]发动日常工作中的自我批评，机会主义的观点与国民党的思想，时常反映到我们的报纸上来，这是最严重的问题；（4）缺乏通讯员的建立；（5）发行工作最糟——（大部分是发行到上层机关，很少到下层群众中间去，一般的是到区级了事，支部、乡苏都很少得到报纸），报纸虽多，是费冤枉力。但各报比较好的是《工农日报》，通讯员的工作比较健全，群众实际消息较多，内容比较实际，文字可供下层工农干部。《红旗》除中央分局和省委少数负责同志在某时做两[篇]重要文章外，时常在社论上发生很大的政治错误，特别是党内生活反映得很少，支部通讯员的工作简直没有建立，多半是做些空文章占篇幅。文字可供支部，布报的、反帝的，均系解决许多主要问题。此类报纸虽不曾发生多少错误，但主要缺点，只限于几个少数同志做文章，有时不能按期出版，文字只能供给县委和区委中进步的工农干部，其余报纸当更谈不上（此外有些机关支部经常出壁报）。

2. 党校：省委开办一个三月满期之高级学校（定名为列宁学校），学生百余人，党团、工会、苏维埃各有一部分，区级占最大多数，支部、乡级次之，县级最少（统计记不清楚）。成分：工人、贫农各占百分之四十五，中

农及其他占百分之十，无富农，这系大概的统计。教授方法：先由总的课目，然后分专门工作练习，往往因教授人缺乏，亦发多[生]许多困难，同时因水平线悬殊，在讲课上亦发生困难，这项困难系以上课后的自习与发问补救，因有这许多原因（反革命捣乱是最大原因），成绩不大好。各县委都办有半月之短期训练班，但多半出于形式，收效很少。

3. 新党员训练班：这个工作很少得到实际报告，虽然每一支部都需办新党员训练班，区委应以很大力量帮助支部这一教育工作，但在各县报告上，只看到有短期训练班的说法，但究竟有几个支部进行这一工作，收效怎样，就成问题了。

4. 列宁小组：这个工作除省级机关支部有些进行外，其他支部也没有看到这一工作。但是根据一般支部的情形，小组会议尚不能按期举行，甚至有些几个月不开会的，自然列宁小组的工作更是谈不上来了。有一时期，各处对政治会的讨论很热烈的进行，在开会的时候也有提出许多不同的意见，也有激烈的斗争与争论，但据肃反的结果，这个组织差不多完全被反革命利用，作为理论上活动的中心。

5. 俱乐部：这个工作在湘鄂西一般是变成了机关工作人员的乐园，没有利用俱乐部组织群众作社会教育的组织，差不多各县都有俱乐部，但里面并没有阅报室、图书馆、通俗讲演所，也没有反迷信宗教及社会上一切不良习惯的教育组织，多半是演新剧，这种用技术的方法表演革命的意义、反革命的罪恶，是最好的宣传教育方法。但新剧并不是有计划的，更不能按照某一时期的斗争中心表演，而是出于演员的随心所欲。多半演些戏院子演过的无意识的套头，有时还演些有深刻革命意义的剧。但青年团与文化部很少负责领导这些工作，但唯演剧最能吸引群众，此外则有些道情、歌、花鼓等群众所喜爱的东西出版。

四、苏维埃方面

1. 平分土地工作：一般的说，凡是苏区的地方都已开始分配了。但实际上在平分土地中没有那一乡没有错误，也就是没有那一样百分之百的正确分配好了。主要是机会官僚主义的作祟，特别是反革命的捣鬼。本来照平分土地决议案是：（1）以乡为单位，总合人口、劳动力计算，每人应得多少，能劳动者得所分得之全分，不能劳动者得半或三分之一，据一般分得的结果，能劳动的可得三亩。（2）劳动者与不劳动者的分别，是十四岁到五十岁为标准（因农民一般由十四岁至五十岁均能劳动，五十岁以上能劳动者，按其情形，不一定照呆板的标准）。（3）中农、雇农本人原来的土地不动，按其应得之数补给，（4）有些较富裕的中农，在原则上是仍不动其土地，但如果某乡这一类富裕中农太多，而该乡土地实不够分配，一般贫、雇农要求将富裕中农的土地拿一部分来分配时，在宣传该富裕中农愿意条件之下，仍可拿一部分出来分配（宣传主要是说明苏维埃统一累进税与国民党苛捐杂税之比较，虽然富裕中农拿出少数土地，仍可免除一切苛刻剥削，每年计划仍不妨碍其原来收获之利益）（5）富农以上的土地全部没收，但富农可按其劳动力另给与劳动份地。（6）湖水归苏维埃管理，一切水产利益（如鱼、藕、莲子等），群众可自由弄取；柴林（可开田）首先按当地群众之需要分配，剩余则群众可自由砍伐。（7）地主之房屋、耕牛、耕具全部没收，分配贫农、雇农居住使用，富农之房屋分贫、雇农共居，耕牛、耕具多余者没收，分别给贫、雇农。（9） 阶层的标准，是每年雇一个长工，或等于一个长工之散工，

而收获除消费外有剩余者，放高利贷者，利用剩余土地出租而剥削佃农者，均谓之富农；但土地过多，因劳动力强，该多余之土地亦不出租，亦不雇工，而每年收获除消费外有很多剩余者，亦谓之富农；每年收获仅够消费，而不进行剥削者为中农；或因自己劳动力过少，每年雇一个长工，或等于一个长工之散工，而收获除消费外并无剩余者，亦谓之中农；一般按每年收获，将够需用，或因年成好而收获中稍有剩余者，只能算作富裕中农；每年靠自己土地劳动、耕种所获，不够需用，需要替人帮工或作其他劳动事业者为贫农。（10）因有上、中、下三等，各有收获量不同，好田产量多而用工少，歹田产量少而费工多，因此在分田中，是以中等田计算，其余上田、下田均按中田之收获作数兼搭分配之。（11）如某贫、雇农自己原来（之）土地过坏，本人要求掉动其土地时仍可掉动。（12）土地分配后，一般是不禁止买卖或租借，但富农所分得之劳动份地，当禁止其出租。（13）某乡在平分土地时，按其全乡土地之多少，经群众会议的讨论，酌量留下若干红军公田，以备分给白军中兵士拖枪来参加红军的或外籍人参加红军的之用。（14）豪绅、地主、富农田中的粮食随田分配，如果中、贫、雇农的土地在自己要求条件之下要求掉动时，其粮食仍归本人收获，如粮食尚未成熟，还需经求[过]很久时间及工夫时，可由得田人补其人工、种子。

在平分土地实际工作中，确犯了不少的错误和许多不好的结果。主要的：（1）隐瞒富农的土地，有些甚至连豪绅地主的家属均分得土地，或是富农拿出部分坏的土地来，这些现象是由于家族观念和亲戚朋友互相袒护。（2）负责人自己得好的土地，分多的土地。（3）许多红军和其家属分得坏的土地，甚至有没有分得土地的。（4）由白军兵士拖枪来参加红军的或外籍人参加红军的，并未开始分配土地，（5）许多地方侵犯到中农的土地。（6）已经分好了的田时常掉动（富农所分得的坏田或系太高，或系太低，同时因富农的劳力较强，或因水淹而高地得以丰收，或因天干而低田得以丰收，而贫农团又要去掉他这块田，企图收得丰富粮食，年成一平衡，又要掉还自己所分得的好田），造成许多怠工现象；有一部分，专以掉田获利，一般人则发生恐怖动摇，因不知此时所分得的田何时还是不是自己的。对于耕种，亦怀疑动摇。（7）许多贫雇农分得土地后，因没有耕具、种子（由没收地主、富农的分配不够），无法耕种以至土地荒芜，而贫雇农本身生活难于解决，虽用犁牛站许多办法，仍还不够，但犁牛站工作也不好。以后决定由苏维埃设法帮助一部分，但主要是发动白区反豪绅、地主、富农的斗争，苏区群众武装到附近白区，联合当地贫雇农，没收地主及富农多余粮食及工具共同分配。在这一斗争发动后，补救了种子不少，同时也相当推广了苏区。但另一方面，却因乱斗的现象造成赤白对立，有些到另一地方，甚至连贫农、苦工一文钱、一合米、一件衣都拿干净，有些斗争的粮食，负责人分两股，有些省苏发下来分配给贫农作种子的粮食，被区苏或乡苏负责人吃掉。虽经这些补救，但还是有些贫农、工人因未得到这些利益，而仍非常困难（特别是因乱斗影响到苏区内部，许多把中农、小商当做富农斗争，在成份上故意颠倒，造成很大恐怖）。

结论：（1）在平分土地中，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因经济利益的关系，从斗争中相当打破了群众的宗族观念与和平共居的现象。（2）苏维埃党团内洗刷了一大部富农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相当提拔了新的工农干部。（3）在

平分土地与反富农斗争中，表现了贫农团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乡苏维埃很少起得作用，而贫农团往往超过乡苏维埃行使一切。（4）因党内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存在，帮助了反革命的作祟，以致发生许多错误和不好的现象。

（5）许多工人、贫农只得到坏的土地，并且缺乏种子、耕具，仍不能解决痛苦。（6）有些地方还未分配，已经分配了的，每乡都有不正确的行动与结果。

（7）白军士兵拖枪来参加红军的以及外籍人来参加红军的，尚未分得土地（在红三军中要占十分之四）。（8）因乱斗而侵犯中农与造成赤白的对立。（9）许多地方分了又掉，群众对所分得的土地怀疑动摇，以致消极荒芜（自然与缺乏种子与水灾有很大关系），而一部分苏维埃或党负责的人（内部未肃清的阶级异己分子）包办、袒护、隐瞒、而有些富农和豪绅地主的家属分得土地。

2. 经济工作：（1）合作社：在数量上固然不少，但实际的内容不能使广大的群众得到信仰：合作社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广泛的宣传工作，多半是由几个负责人发起，但群众的加入难保没有一部分勉强（或因沿户收费，或因买不到盐，作些希望）；但每一个合作社开办以后对群众的需要品确有相当的调解作用，比一般商店价较为低廉（但有时又较贵），但不到一季，就本干利空而塌台。主要原因，就是合作社开设于某处是成了那个地方党与苏维埃负责人的赊拿所，每次货来了，一般的现象是党和苏维埃负责人先得到东西，有些加入了合作社的群众买不到东西，甚至丢却工夫连跑几天仍买不到东西，但党、苏老爷们，除了有先得之特权外，有的还能赊，而且能够拿，差不多附近的党、苏、工、团各机关就长期的赊，没有零钱开支了，并且可以去借，赊的借的是没有还的，加之合作社的负责人还要自己拿，或做点人情，可怜一个贫农苦工的小小营业，经这些官僚一弄就塌台了，群众都不敢讲话，这就是合作社一般的现象，也就是一般的结果。（2）转运所：这个办法是对交际上起过相当作用，能够把群众的东西运到白区去卖，在白区带群众需要的东西到白[苏]区来，多半是由各合作社收的粮食交转运所，转运所运进来的必需品分给各合作社，但有时商人因这样一来，对收粮食等比较困难，故出高价（这是商人在竞争上的固有技能），而合作社确用一种强迫群众要将粮食拿来合作社，不许卖给商人的对[干涉]群众卖粮食的自由的行为，以致群众不满，有时因转运所遭受破坏（被叛徒或富农等告密），货物被没收，合作社没有货物就要关门，但为得要不开门的英雄主义，就必然要找商人买货，从商人手里买来的东西与商人竟卖，当然是比商人贵，不贵就要折本；有时，一般上层机会主义者不知道纠正和补救这些现象的正确办法，而提出平价的错误观念；还有一般机会主义者的观念，以为现在开办合作社就可压制商人，并空想许多压制商人的行不通办法（如提出规定粮食的最高价格等），往往被商人从投机中得到利益，结果苏区许多必需品，盐、糖、纸、布、用具甚至粮食，而合作社确未表现一点能力，更不能得到广大的群众信仰，自然更谈不上由实际利益中教育农民的集体思想。（3）每个集场上还有些人专门替农民卖柴、菜等类，即每串钱要扣一百钱的经济钱（有些人名为搓剥经济，即老封建社会之习惯，干这事的人多半是地方的大姓者或强者），农民中凡弄柴、卖菜、卖瓜，卖鱼等贫苦人，弄这些东西去卖了钱，买点油盐以补助自己收获之不足，但到街上去卖的时候，必须经过搓剥经济剥削所卖得钱十分之一去，这种封建剥削到现在还未取消。（4）斗、秤、尺各县均有不同，甚至有一县之中各区又不同，商人则从中投机取利，有出

产过多的地方，过于低廉，缺乏的地方，过于昂贵，商人转手即可赚很多的钱，出产与缺产两地的农民均要吃亏，商人并可利用大秤、斗收买，小秤、斗出卖；在湘鄂西苏区范围内，秤有由十六两到三十二两（甚至商人有用十四两秤卖货者），斗有由七角 到一斗五等之悬殊，统一度量衡至今尚未实行。

3. 财政工作：湘鄂西除了海关及营业税而外，再无其他正确的财政收入，全部财政收入的主要成分还是以没收和绑票；在开支方面也没有系统，完全是各自为政的现象，上下级的财政关系多有不正确的办法（有时采取政客式的手段）。兹将收入和支出的大概情形分述于下：

（1）收入：在苏区最发展时期，共有十余处海关，每月可收万余元，以汉川之府河（云孝境内）、沔阳之新滩口、监利之白螺收入为最；次则为营业税，此项每月可收入三千余元，其余均系到白区绑票、打船；不够则向各县摊派，过去在特委时代则靠出纸币，以至出到一百三十万之多，以后因纸币超过市面之需要，无现款兑出，富农、商人在苏区内将现金隐藏，使纸币阻留于市面，信仰减低，而同时价格大减至每元只值现金一角。在这时，在经济上则受很大困难，以后决定只许粮食出境，不许现金出境或没收埋藏现金之不正确办法（以为这样可以解决问题，有一时期并将现洋上印苏维埃三字，观念并不是在宣传，而是在阻止现金出境），纸币在这一情况之下完全倒塌。以后由合作、社苏维埃商<店>（打船所得的货物）、营业税、海关税及各机关公款和党团负责人私人之纸币，无代价缴销，据省苏党团报告，收入了八十万左右，苏维埃银行也就此取消了。在财政不敷的时代，系召集各县负责人会议摊派，要某县分摊多少。各县召集各区会议，照例摊派，甚至备区对各乡亦如此。下期因要按期缴款，就大家[搞]绑票，用各种不正确的办法找富农、商人罚款，司法部就变成了绑票室，把许多富农、商人关在里面，一区甚至有几十个的，款项有起码五十元者。在这一非常错误的行动中，侵占了不少的中农<利益>。有一部分坏的分子，就从中借党苏名义私自绑票者，或得多报少者，时常发现。土地税并未开始征收，此后因军事战争紧急，粮食缺乏，除没收地主、富农粮食不够外，提出拥红，收到一部分粮食，在这当中，固然有一部分农民是自愿出的，但沿户征收或强迫者仍不少，其收多缴少者亦不少。此后又重复提出向农民借粮一次，预计是三千石，实际收获很少，但拥红收入者为多。全部两次共收入粮食约五千石。此外各机关因困难向商人赊借，差不多没有一个机关不欠商人的钱（沔阳县苏维埃欠一百多（家）商店的米钱，屡讨无还，该百余商人将县苏主席逼在俱乐部内全体跪下求还米钱。有一次，省级机关准备由瞿家湾迁新沟咀，因欠商人七百余元无钱还，恐有迁动消息，商人要帐，不便搬迁）。有时省苏财政部一钱无存。

（2）支出：仅以省级计算，除红三军外，后方党、团、苏、工、互、反、各机关以及军校、党校、警卫团、医院、各军事企业有一万人左右吃饭，一般规定红军每人每天食米八合（医院照红军），机关工作人员六合，每天共需大米七十余石（值现洋约八百元），每月共需洋二万四千元；油、盐、菜每人每月一元五角到两元，每月需洋一万八千元；各机关办公费（交通、印刷、杂用一切）每月需洋三千元左右；医院药费每月至少需二万元；兵工厂、被服厂的原料不能确定月计；其他临时特别费，如伟大的堤工津贴、白军士兵参加红军的偿犒、津贴贫雇农的种子，都不能预定月计，合共每月则

起码需八万元以至十万以上不等。但每月除万余元的正确收入而外，其余均由摊派、绑票、打船等来源，海关营业两税由省苏直接收入。各县更没有收入来源了。但各县的开支，仅县级每月亦在万元以上（包括游击队），区、乡更无统计。

在财政上一般现象是：（1）正确来源少，而主要成份靠打船、绑票，一方面阻碍了商人的贸易，而使苏区营业减低，而在经济调剂上发生困难。（2）没有直的财政系统，以至各级财政混乱，成为各自为政的现象。（3）没有专门的财政计划，一方面没有开辟财政的正确来源，另一方面没有设法正确节省以至浪费开支（某处有一个乡苏维埃有四桌人吃饭），（加之非群众化之赤色邮政，每人每月十元生活费，全湘鄂西邮政人员在五百人以上，每月需生活费在五千元以上）；如污阳之私购子弹每月不知多少，如此不能计算之浪费不知多少。（4）没有上下级的正确关系，没有每月预决算报告书，下级对上级的隐瞒，上级对下级的用手段（决定邮政局之各县分局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由各县苏担负；各机关送信要贴邮花，但邮花费收入归省苏财政部，这是省苏财政部对各县苏揩油式的财政政策，每月一个机关要用二百元以上的邮花，而许多文件不能按时送到，有由交通送只需一天，而邮局送需三天甚至一星期者，群众并没有找邮局送信者；关于邮政工作专门另写，此处略说办邮政、系财政部长为得要收入之不正确观念）。（5）最使财政部感觉困难的，就是吃饭问题，差不多就是吃早愁晚的现象，财政部主要时间是应付每天吃饭的问题，因此，实际上就变成了省级各机关的会计；至于对财政工作的计划和整理的工作是放弃的，财政部长只就在家里熟读马克思的经济论和编经济政治训练班的讲义，准备造一批经济财政的“学者”；特别是在军事紧急时期，红军主力需要在内部作战时之军事给养发生时，财政部因平时无积蓄，而往往表现忙盲无策。（6）是湘鄂西因水灾的浩大、敌人的摧残以及自己许多不正确的自杀行动，的确造成财政上的很困难；谁否认这一困难，谁就是不根据事实的空谈，也可以说是官僚主义，但并非绝无办法，主要负财政责任的，不去积极想办法（如在统一财政上节省开支，发展商业上、水中之鱼利、莲利，鼓励生产，发展各种经济事业，如养蚕、畜牧等等），有些只有一个空洞的口号，顶多贴张标语、画报（经济部对这种工作并无专门计划和进行办法，去积极、去实地考查和领导这些工作），对于实际办法，并无专门研究和执行。（7）党、团对财政部的工作缺乏领导和督促，党对财政工作，亦很少根本上的正确领导，时常到快要断炊的时候，财政部无办法，而党才来讨论柴米油盐问题。

4.文化工作：关于俱乐部一项，在组织方面已经写过，不必重述，具体则编入[写]两个小学读本（上面亦有许多错误）、画几张关于苏联一隅的画报、作了些歌谣而外，并无其他工作成绩，群众中对于歌谣等类收效较大，对于通俗演讲及各种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组织与研究会。但一般歌谣、戏剧以及对儿童教育识字运动、社会教育等，均不能按时代的需要而定出具体计划，一般工作，都是随便敷衍。

5.司法工作：司法部除如合作社工作中所说外，只就省司法部写一个民事条例，据司法部的负责同志说，要一个月起草，但他们并不根据省苏一般法令及各种决议配合群众间实际问题去研究，却拿着国民党的法律第几百几十几条去作唯一参考书，群众中许多问题也得不到正确解决。监狱却监禁些所谓“经济犯”，有时各县、区司法部将政治犯不经过保卫局杀掉了的，因

此，许多司法部又代替了保卫局的职权。总之，司法部并没有开始正确的工作，而做些代替和混乱的事情。

6. 内务行政等工作：除做了两次卫生运动和一些杂务事情而外，并无工作可言。

7. 交通工作：开办了一个湘鄂西赤色邮政，各县有分局，各区有一支局，每支局三人，分局五人至七人，总局十一人，每人生活费十元，邮差每月津贴草鞋钱五角。每天上午八点钟才收信，下午四点钟就不收了。邮件要以重量计算（不拘文件和物均一样），每邮差每天只走一站路（六十里），如果由省苏到新沟咀（只有六十五里，交通一天可到），如果要下午四点钟动身，夜晚可到，第二天下午就可带东西转来）如果由邮政送，他的规则是上午八时出差，七时就打包；如果文件在七时以后送去，当日就要停一天。再，朱河分栈到新沟咀支栈有一百一十里，路上得两天，到支栈当晚不能送文件，要第二天才能送文件出来，总共计算要三天，收件地方才收得到文件。有时雨天不走，雪天不走，风大不过湖，一连要耽误几天。实际上赤色邮局自开办以来，除送机关文件和机关人员私信以外，并未看到一个群众到邮局送信，所谓邮局的进款不过是“女儿巴结娘”，自家赚自家的。交通工作上，并没有设法开辟群众的社会交际而使邮政群众化，此处则修了几处的桥梁，其他并无工作。

8. 保卫局：在党四代会以前，从省保卫局至各县，均系反革命把持，前任的省保卫局长彭国材，就是改组派首领之一。他们除了刺探保卫局工作方法、与组织和在表面的肃反工作中敷衍，甚至陷害党的忠实干部和很好的群众而外，更谈不上什么工作（关于保卫局的工作整理和具体情形，必须在肃反一段中详述）。

9. 工农监察委员会工作：湘鄂西过去群众对苏维埃还有一种政府和小百姓的观念，不管苏维埃干了什么违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如乱发纸币、发水利公债等，以及苏维埃使群众不满的事情或苏维埃负责人有使群众不满的行动，群众都不敢说话。自工农监察委员会工作建立以后，设立人民意见箱，宣布人民对苏维埃有说话之权等。但在意见箱中，并未收到何种效果。但派去一批检查员检查平分土地，发现侵犯中农事情，因此，富农成分的研究成为中心问题。同时许多中农知道能说话，过去被斗争了的、土地被强迫作为富农没收了的，或在不愿意条件之下拿去一部分的就纷纷告发，而富农也乘机来反攻，监察委员会竟由这些地方变成了富农的拥护者，对真正平分土地的工作，并未正确的实际的检查，对财政经济的工作，也没有实际的检查和弹劾，群众对苏维埃的自我批评仍未发动，讨论后所规定的计划多半成为空谈。

10. 劳动部工作：在湘鄂西除土地问题外，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劳动保护法并未实行。劳工部过去是空洞机关，并无任何工作，经四代会后提出严重讨论，才建立劳工部实际工作，将工会委员长李家芬同志经群众组织路线调到省苏负劳工部长责，开始劳工部工作，在实际工作上，除军事企业实行了劳动保护法外，其余一般地方工人仍未实行。劳工部讨论劳动法令时（在未开始肃反以前），由托陈潘家询所起草的劳动法会上，提出劳工部是“解决劳资纠纷”的“调解机关”和条文中之“工人如有意破坏雇主×具，应负赔偿责任”等，显然是国民党的劳资仲裁和压迫工人的观点，而却在省苏会议中通过了。经中央分局负责同志看见（草案），才严重指出这一错误。劳工部

的工作，也仅仅如此。对于湘鄂西苏区工人的一般工资与失业工人及工人所得雇主待遇等，并未开始调查工作。

11. 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工作：一般的我不知道做了什么（因我没有专门检查过他们的工作，这当然是有忽视妇女工作的观念），但据社会一般所得：（1）妇女并没有识字运动和夜校等。（2）虐待童养媳的封建习惯仍然存在（此项在青年团亦在[有]责任，但妇女反抗力强确是事实）。（3）父母强迫女孩缠足（此项在青年团文化部均应负责）。（4）过甚的闹婚姻（即三大结婚五天离婚者）到处发现。（5）乱交现象仍未消灭（妨碍卫生，影响工作极大），甚至有因生活压迫而出于卖淫者，各大小市镇都有。（6）妇女在拥红工作中，确表现了特别的积极性（如做鞋、洗衣、送拥红品、慰劳等工作），这又只出于最少数的一部分，大多还是摊派命令。（7）在各乡也开始了劳妇代表会议。我只晓得摊派拥红品与闹婚姻问题而外，其余就不知讨论些什么，也未见执行了些什么（其余未写到的，在群众运动一段中补充）。

12. 苏维埃一般现象：（1）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可以说一般是脱离群众的，苏维埃负责人大部分对群众是官僚态度，群众见了苏维埃的负责人，视为“官府绅士”；特别是区、乡苏维埃的负责人，对群众压迫、敲榨、浪漫（同农民的老婆恋爱等）等行动，群众敢怒不敢言（据夏×同志与我亲自从新沟咀一家贫农所得情形，该地苏维埃每月向农民要三百钱的拥红费，一百钱的互济费，一百钱的反帝大同盟会费，一百钱的“村民”费以及临时苛刻等——如修堤派工，如不出入就要出一个人的工钱等等）。据说这是一般的收法，并亲眼看到这些负责人凶恶的态度。要农民出这种等于国民党苛刻群众的变相的苛捐杂税，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忍痛甚至拿粮食去变卖，每月都要出这些钱，而不敢丝毫说话。这是在报告上从未看到过，在巡视员尤其是所谓支部巡视员口中从未听到过的骚扰民众的行为，这般党老爷却有钱去上馆子养爱人了，这是多么使群众不满意的行动啊！？（2）在水灾后修堤的时候，苏维埃发出三十万水利公债券，发到各县、区、乡去销售，而一般区、乡负责人竟拿着这些债券，一方面强迫群众买，另一方面想出许多办法来贪污舞弊。如一个负责人拿一张债券找农民推销，农民把钱出了，债券并不给与农民，而又拿去要另一农民推销，如是拿一张债券可重复得几个人的钱，农民因不知要债券可以对苏维埃缴纳土地税等，同时也不相信债券还能<兑>债钱（同[因]纸币倒塌的失信仰），也就不追问债券，只要自己出了难免的钱就算了；另有一种人却将债券卖给农民又去讨回再卖与其他农民，有时因工会负责人已经卖了债券给工会会员了，而苏维埃的负责人又要来推销，该农民说，我在工会买了，苏维埃负责人说，那不算数，那是你的工会系统，不与苏维埃相干，又要强迫农民再买，如有农民加入了反帝、互济或团或党或工会的，往往要重复买几次，而农民也不敢说话，尤其是加入党或团的工农，更不加[敢]说话。（3）苏维埃与党的关系，除了如组织方面写明一部分关于党包办苏维埃现象而外，再苏维埃党团许多是脱离党的领导的行为。如省苏召集各土委联席会议，讨论土地堤工问题，党团并不报告党，党也不知道。在这一广大的会议中，并无党团组织，不能首先经党讨论策略，经党团去运用，同时也不能经党团在党的领导之下讨论正确的意见到大会上发表，自然对工作的错误与对省苏的批评就没有了，更谈不上发展群众中的自我批评与正确的反机会主义、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到会议闭幕的那天，党才知道，才召集党团会议，指出省苏党团的错误。除此而外，除省委对省苏不

按期的检查两次工作而外，其余县、区更谈不上党团对党作经常的报告，并未开辟这个工作中的常例。这里，一方面表现党团脱离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表现党对党团的领导的忽视与放弃，这种不可容许的错误现象，在湘鄂西，特别是下层是一般的表现着。

五、工会方面

过去湘鄂西在陷于立三主义的泥坑中，一般是取消工会，直到中央分局成立后，才派几个上层做工会工作的干部到各县去，由上而下的建立工会工作，到去年八月才召集湘鄂西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多半仍属于委派），成立湘鄂西省总工会，但在省总成立以后，许多下层支部尚未建立（下层组织，已见组织方面一段，关于工会组织情形）。但省总成立之后，就是严重的水灾时期，在水灾后，工人的失业成了最严重的问题，差不多失业工人要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固然一部（分）工人已经分得土地，但有些分配土地以后仍无办法（见土地工作一段）。还有一部分工人没有分到土地，那时候大批群众出外逃荒，工会只派些干部领导工人出外逃荒，在反富农斗争中与到附近白区武装没收地主、富农粮食等，工人解决了一部分生活与种子问题，同时发动要退职金的斗争也非常激烈，工人也得到相当利益，但复工斗争仍未发动，富农乘机大批辞退工人，但工人斗争非常积极，而有些不仅是个别的斗争积极，尤其表现于青工方面（对青工领导多系青年团直接，青工部大部失掉作用）。苏区内工人工资，有些地方比过去白区时候的工资要减少（如裁缝在白区时是一串钱一天，苏区后减到八百，这是在立三主义时代取消工会，而农民特别是富农说，裁缝并不吃亏，工资应减少，给与工人的恩惠。）在工会成立后，一般雇农的工资是加高了二分之一，但还有许多手工业工人的工资仍未增加，尤其是工会对工人的实际生活不能具体实际的了解，至今年党四代会后，才召集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工人的工资问题与劳动合同、集体合同问题，组织方面的按职别[业]的直接系统的问题，动员工人参加红军，以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基础问题，白区中心城市工作问题，结果决定了动员多少人参加红军，各县应征调多少人。召集单独的雇农代表会议，建立直接组织系统，派多少人去建立那几个城市和一般白区工作，调查工人生活与失业统计，而一直到八月份，才经党的冲锋营的工作发动而动员了几百人到红军中去了，定期召集全湘鄂西雇工代表会，预定一百人，结果到期来了十余人。经我与代表们谈话的结果，多系县、区委派来的几个人，有的还不知道来开什么会。他们问当地工会，当地工会答复“你去省总自然晓得的”。这种非常严重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会工作，由这个代表会的召集结果，就可以知道一斑。以后找省总党团开会指出这一严重错误，并将代表会提出延期，将所来的代表开一联席会，讨论些下层的实际工作（有的来的代表并不懂得劳动法与集体合同、劳动合同是什么），并受一短期训练，派回原地工作。工会中的家长制度非常深，省总以张昆弟为家长，没有昆弟，几乎连工作都要停顿。由这一家长制度传统下去，各级工会也是多半如此。一般的只看到做空洞的漂亮决议，在实际工作中，并未看到多少成绩。每次省委检查党团工作，总是指出许多家长制度、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党团也承认错误，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工会工作始终脱离不了这个泥坑。关于干部方面，工会确实提拔了一部分工人干部，也供给了党的一部分工人干部，但从省总直到支部，仍然以富农为秘书和几个做职工运动的知识分子成为领导上的中心（沔阳县工会的秘书，就有许多信不给委员长看，自由答复）。党对工会

的领导表现得异常薄弱，省委本身对省总的领导和工作的检查就处于非经常性的，各县尤其下层更是没有这回事了，几个中心城市（如武汉、沙市、新堤、岳州等处）工会并未设法单独去建立工会工作，有党的组织地方才发展几个工人组织，一般的是国共合作时代的和平发展，对任何工人自发的斗争都不知道去领导，而且许多轰轰烈烈的群众自发斗争还得不到音信，除宜昌、沙市据党特委报告上有几个工会组织，有几个车夫、码头、锯业工会而外，其他地方尤其是武汉并未开始工人的组织。总之，工会中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家长制度、命令主义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充满了（据肃反的结果，同样有大部分的反革命派把持了工会）。同时党对工会领导的忽视，也是机会主义一部分的表现。

六、青年团方法[面]

此项，园省委对团中央有具体的报告，现只能摘主要的写一部分：

湘鄂西团的工作，经立三主义取消后，到中央分局成立，才开始恢复独立组织。后经团中央代表宋 同志同时在党中央分局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的确有了很大的转变。如对青工斗争的领导，对儿童工作的领导，能开始了共产主义的儿童教育与出版儿童画报与小报等，对少队的组织与训练，采集了竞赛了[的]方法，相当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在团的组织上，也有相当的发展和成分的改造以及新干部的提拔，都表现了相当的成绩。但另一部，×于工作不青年化、不群众化的现象及先锋主义的残余仍未肃清。团员入党的组织工作也做得异常不够（有许多十八岁以上甚至二十岁以上的团员还未加（入）党者，这不是凡十八岁以上的团员都要加入党，但的确团还有要团员入党的现象）。只就组织上说，团员数量还是远远落在党的后面，这已经证明团在组织上不青年化、不群众化，不会利用各种斗争及群众运动中广泛的发展团的组织，这不能说不是关门主义的表现。在提出团员超过党（员）的数量以后，团并不会用宣传组织的方法，使广大青年工农群众从阶级觉悟甲米踊跃的加入团，向往往在广大的群众运动中挂一个“征求团员”的招牌，一本登记本，一个人在那里，有人来报名就登记的办法，代替其他组织工作。在反富农斗争，青年团固然表现相当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仍有脱离党的领导的先锋主义的行动。但在平分土地中，确仍未表现团的积极性，特别是对反军阀主义工作，可以说没有成绩。经中央指示的冲锋季的工作，并未开始。团内的命令主义仍表现得非常厉害。自我批评尤其是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更未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也只停留在上层机关。党对团的工作的了解与领导，在四代会后，虽然有了相当的转变，但仍不充分，这种转变也只限于上级，到下层就更薄弱，甚至没有了。

七、一般群众团体工作情形

1. 反帝：反帝同盟，严重说来只有空洞上层机关，没有下层的群众组织与工作，特别在几次大的事变中，如“一·二八”和“九·一八”事变，反帝同盟并不能抓紧这一事变，揭露帝国主义的一切罪恶，来提高群众的反帝情绪，更不能从组织和训练中锻炼群众，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斗争的强固基础，也不会把反帝和反国民党联系起来，提高群众反国民党的积极性与更深一层的认识。同时，党团、工会、苏维埃等有些负责同志以为，反帝只是反帝大同盟的专门工作，特别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公布对日宣战通电时，许多同志以为这仅是一种宣传作用，不了解反帝与苏区一切实际行动的紧密联系，以为苏区没有帝国主义，忽视或轻视反帝工作的倾向仍然存在。关于反

帝和拥护苏联的实际宣传教育及行动，除了在事变中或革命纪念节中照例的召集群众大会，几个负责人演讲和（贴）几张标语、画报、传单，至多演几曲新剧而外，并没有经常的或在某一广大群众行动的事前有群众会议的详细的讨论，使群众具体的细微的了解这一行动的意义和经常的斗争任务。同时有些同志以为反帝只是一种宣传和临时的（节气式的群众大会）群众运动，不了解反帝是苏区一切斗争的中心。以简单模糊的标语、画报、传单和几句话的演讲，代替了经常的群众讨论的教育工作，自然不能使群众深刻了解反帝、反国民党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以及与本身实际生活的利益是不能分开的，而积极为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和为建立苏维埃的中国而斗争的决心。在这一工作中，在湘鄂西确存在着不容许的机会主义（反帝的组织见组织方面一段不再写）。

2. 互济：互济会同样是空洞的上层机关，也好像是税收机关，没有实际的反白色恐怖的宣传工作，提高群众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仇恨，对于实际的、被敌人摧残的地方的调查工作完全没有。所谓援救部的援救工作，是没有援救一个被难的革命群众，由强迫而征收来的互济捐，只是饱了互济会机关负责人的口腹。在接得中央电示后，举行援助上海“一·二八”事变工人罢工的募捐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他们不了解抓紧这一工作提高苏区群众与白区群众的亲密联系，和在农民中宣传在严重白色恐怖之下的无产阶级伟大的斗争精神和力量，使农民从事实上了解到“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不会从宣传鼓动的工作中，使苏区群众愤激同情而热烈起来，从经济上、行动上援助上海工人的斗争，配合上海工人的斗争，只是在群众大会中弄几个男子穿着女人的红裤子，或打些花脸，或反穿皮袍，或扎一个帝国主义，用一个农民或工人牵到或用些妇女手拿竹筒喊叫：“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来，来丢几个钱！”经过这一次会后，在每次群众大会都照例这样干，互济会并将捐筒布在街上，上面贴张“募捐援助上海工人罢工”的条子，除了在大会时有几个负责人照例演讲外，很少宣传鼓动的实际工作，群众并不能深刻了解为什么要捐钱，或怀疑所捐的钱是不是能到上海去？如上面所说的办法，就把大会场变成了“把戏场”，下面却采取了国民党的办法，这是多么可耻的（××？）主义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尤其是每次群众大会照例是这样干，好象是又开辟了一个大会收捐的要钱手段，群众更是怀疑，后经（过）严重提出才停止。但这样弄来的钱，互济的、省工的负责同志，并未有寄到上海来援助罢工工人，却援救了他们自己的口腹，将募的捐款吃得干干净净，经党在检查互济会工作中检查出来，做一决议给省互党团全体严重警告，才决定该款一月内寄沪。互济会在群众中可以说只有坏的影响，没有好的影响。

3. 贫农团：组织情形见组织方面，在土地工作一项内可见贫农团斗争情形。由开始组织以来，对于贫农、雇农中很有效力，因在平分土地与反富农斗争中特别表现了它的力量。一般贫农、雇工许多问题多找贫农团，多有乡苏维埃是另外的“官府”，而贫农团是他们的“家庭”之势（这也是因为乡苏维埃<不>大起作用的缘故），因此，另方面造成贫农团有第二苏维埃的倾向，有时因反富农斗争与当地苏维埃有不同意见，该贫农团即说苏维埃袒护富农等（这种事实也是有的）。苏维埃即说贫农团侵占中农（这种事实也有）。一个多[要]斗，一个不要斗，在发生斗[冲]突时，多系苏维埃负责人被贫农团捆打，这样看出贫农团显然是有群众的，苏维埃好象是空的了，除了机关

中几个负责人而外，就没有人了（这是表现了群众对贫农团的信仰，比对乡苏维埃的信仰深刻多了）。但两方面所以时常发生冲突者，系均有少数异己分子，如贫农团中之企图侵犯中农者，苏维埃中之袒护富农者，但经群众详细会议解决，而群众的意见却非常正确，这完全表示了群众的进步与群众基本观念的正确。动员群众尤以贫农团最能动员，即以开会而论，贫农团的会议之能吸引群众，与党支部会议之吸引群众比较，而贫农团之吸引力要超过党支部以上。一般说来，贫农团成为湘鄂西推动斗争之最有力的组织。在实际行动中，固然”（因少数异己分子，特别是反革命的捣乱）发生了不少的错误，然而贫农团的组织能够吸引群众，推动群众斗争，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已经是各种组织所不及的事实。

八、军事方面

关于军事组织可阅组织方面一段。此段系写党四代会后发展最高时期：

1. 红军的实力与编制：（1）红军有三个师（即七、八、九），各师有一警卫营，军部有一警卫营，七师三团，八师两团，九师三团；每团三营，又一骑兵连及一机炮连；每营四连，警卫营则每营五连（即步兵三连，骑兵一连，机炮一连）；每连三排，每排四班，每班八人，另正、副班长二人（炊士[事]、挑夫、书记及其他闲杂人员不在此列）。全军共一百三十二连，合计指挥员（包括军×、政委、指导员、参谋长，以实际参加指挥作战者），战斗兵共一万五千八百八十六人。缺额：九师三团缺八百余人，八师两团缺七百余人，七师三团缺千余人，实际指挥员与战斗兵一万一千几百人，其余政治部、经理部、炊事排及各种杂人，要占全军四分之一（大略三千人之谱），总共全军不下一万五千人，内以九师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四，七师十分之三点五，八师十分之二点五。枪枝：共一万一千多，战斗兵与指挥员每人都持有枪枝（关于它的实数与号码，向无确实统计）。内××计者，缴得张连华旅之法国新轻机关枪二十八架，水机关枪十余挺（实际我记不清楚），花机关枪最多（在百支以上，但子弹缺乏，失掉作用），以连长以上以至各部传令兵、从兵均持重枪。战斗力以九师最强（一团可打敌人两团），七师次之，八师最次（每团与敌人一团支持）。（2）警卫师：属军委直接指挥，两团，编制与三军同，但缺额亦在数百之多，系由原军委警卫团一团，再合编县（系集中之警卫营性质）之游击队及前方剩余之枪枝补充编为一团，干部多系各县游击队长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湘鄂西）第二分校学生，战斗力较八师又弱。警卫师实际只有五营人，战斗兵与枪枝不过一千五百之谱。（3）地方武装（按枪枝计算）：沔四百五十枝，监四百枝，川阳二百四十枝，天汉五百枝，天潜二百余枝，京山一百余枝，钟祥三十枝，云孝五十枝，应城（由天汉分队游击）、荆门两百余枝，潜江二百余枝，江陵四百余枝，江南一百余枝，荆当六十余枝。各县按枪枝实数、情形编一警卫营或警卫连而外，其余枪枝多分成十余枝、三十到五十枝的小游击队分布各区活动，统计地方全数将在二千八百余。此外，后方军委经理部则存有由红三军送来之空枪将近两千，统计全部枪枝将有一万八千以上。

2. 社会成分：原九师的基础多系洪湖苏区的群众，七、八两师，则在七师中有一部分是原来洪湖中的群众（多游击战争时代出身的），其次则是五、鹤、桑、石、巴、均、房等县从苏维埃运动中出来的群众，其余则系白军士兵以及团防等出身。在这个比例上，大概为由苏维埃运动之地方工农出身的占百分之七十五，由白军及团防和其他出身者占百分之二十五，但干部（从

排长以上)则白军士兵者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社会成分无详细统计,但大概贫农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工人占百分之十以上,富农只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白军士兵团防出身者不在此比例内)。干部成份无法比例(但在肃反转变后,七、八、九及新成立之独立师,四个师的政治委员都是工人)。

3. 四代会的发展:第一次七、九两师的同时胜利。当四代会党的正确路线战胜了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一正确路线之下,决定了正确的军事策略。恰当大会闭幕,九师在应城消灭张连华一旅,七师在黄陵矶消灭敌人一营。在x一役又零碎缴获敌三个营,逼退占据潜城之敌,活捉旅长张连华。第二次在天汉消灭韩昌俊一旅,活捉韩昌俊。第三次在新沟咀消灭范绍增两团,范本人受伤逃脱。在这一连接的伟大胜利中,给川、鄂两军的严重打击,红军自己扩大了一倍的势力,各县游击队在积极发动游击战争,发展苏区与打击敌人小的部队的行动之下,配合了红军主力的胜利,而扩大了一倍以上至两倍者,其中有天潜境内之八日八夜持久战,是役击落敌人飞机一架,还有许多小的胜利不能计者。

4. 政治工作:红三军过去在立三主义统治之下,尤其是在立三主义的具体代表——邓中夏机会主义领导之下,可以说没有红军政治工作,造成“私人”、“私枪”、“私钱”、“私物”以及对兵士打骂等军阀制度的残余,红军同群众以及同地方苏维埃的关系非常恶化(如二十五团不经过省委,直接逮捕江陵县委,以至闹地方党部与红三军的纠纷。红军到一个地方把苏维埃当他的办事员等等,许多苏维埃的负责人对红军表现害怕与不满的现象)。在红三军回洪湖后,揭露立三主义与中夏机会主义的错误,开始发动反军阀制度残余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相当提高了战士的积极性,但一般斗争仍未广泛深入群众,政治工作也只在开始(如士兵在战场上能对白军士兵做宣传,各级政治部工作的整理,三个师都有报纸,相当能够反映士兵的生活,及开展实际工作中的两条战线斗争,各连之列宁室的建立与墙报的开始,识字运动之开始等),但这些工作做得仍不充分,政治部一般的还是不健全,士兵的日常生活还反映得很少,政治部很少吸收下层群众来参加工作,对反军阀制度残余的斗争做得非常不够,对反帝与拥护苏联的宣传鼓动在红军中是一般的忽视了。所谓政治部的大部分工作也只偏于列宁室了,因此,军阀制度的残余仍然不断的表现(如师政治委员拿枪当街打死贫农群众——李剑如——是托派,及私枪私物与地方苏维埃党部不好的现象时常发现着)。红军中党的工作也做得非常不够,一般党员在战争与日常行动中很少起得领导作用,党的组织在红军中也没有采取积极的活动与发展,不会利用战争及各种实际行动去找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党,更不会从日常工作及每个行动中,提拔和培养下层政治人才,使不断的有新的干部的涌现(一般的红军缺乏政治干部,是靠从地方征调),从红军中征调干部到地方工作的对调的办法是没有从组织上进行过,有时有一、二个干部调到地方,都是犯错误的,或是做了假的参加地方工作者有些,但从某种群众的选举苏维埃的当中,没有从红军士兵中或干部中直接吸收参加苏维埃工作的。红军所到的地方,军民联欢会是已经开始了,但红军帮助群众生产的工作只是提出,尚未开始进行。但有一项值得注意的是红军帮助群众分土地的工作,在襄北是表现了积极性与相当的力量,但同时这种工作又只限于上层的政治部,很少发动下层群众参加这一工作。

5. 医院：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医院的伤兵有时聚集到八千以上，共分成四个医院，轻伤、重伤、病兵、出院。除此而外，有一干部休养所，即要出院时之伤病兵，内中一部分干部还需几天休养者，即分配到干部休养所，此为便利训练工作与临时征调起见。医院工作是相当改善，如卫生的设备，植树，专门去污的烧窑，煮晒绷布的厂，卫生的检查，传染病的分开等等。但医药方面，在受敌人的经济封锁之下，感到极大的困难，因此对节省方面亦有相当成绩（如用中国土棉、自制碘酒、烟土制救急水以及采用许多中药补助及材料节省等，如绑带煮晒后又可以用）。政治工作在医院则有伤兵委员会、工会（医生及看护等），经常举行会议，在这里相当的吸收了一些下层群众参加政治工作，如宣传队（在每次群众运动中演讲或化装宣传、表演新戏等等，都表示非常积极）。还有一残废休养所，许多残废战士对每次群众运动都是全部参加，表现很积极。医院创办有医院小报及墙报等工作，组织工作因条件的关系，比前方要健全，支部会议都能经常举行。但党的领导作用仍没有充分的表现。在另一方面，则军阀制度的残余反映到医院中，亦时常发现，同时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在医院中则表现得非常厉害，有时因物资的困难及负责人对群众的不好，引起群众的反感，或的[者]因私人的问题时常发生纠纷，甚至打架行动，但这些行动多经指导员说话及会议就解决了。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医院亦有相当的发展。但有时党、军医部、工会在某些问题上形成三角式的领导，时常在意见上发生冲突（如医院八小时的问题，生活的问题，星期假的问题），伤兵临时多少之数目的悬殊——有时超过八千以上，有时仅二千余，而需用看护，服务人员等之多少不定（因给养困难所发生的），增加和裁减的问题，在以上八小时及星期假是用换班的轮流办法实行了，但增减问题，则因给养困难有时仍裁减很多（有的被裁减退出的无法生活，在土地上虽然能够解决，但仍有许多困难，苏维埃的微弱的津贴多有不能满足的）。而有时在一次战争中，增上千余继续到几千的时候，又要急需增加服务人员，这种增加往往发生很大困难，许多因被裁减不愿来者，这里却没有设法来解决这一困难。有些军事负责人反对军医院中组织工会，他的理由是医院非企业，系一纯粹军事系统的组织，这一问题军事负责同志与工会负责同志有争执（但非企业之军医院是否应组织工会？），我觉得是可以组织的，但这种工会并不是领导工人来罢工或怠工等斗争来妨碍军事工作（如对伤病的医治影响），而是领导工人对伤病兵的服务如何积极和工作的改良，对医务改良的努力，与督促院长和领导机关的负责人的官僚主义的行动，固然伤兵委员会是直接有力的反对者，但服务员亦能进行这一工作，特别是对医生的督促，看护是有很大作用的（如医生对医务的怠工，这在伤兵委员会与院部是没有象看护等更细微的看得到的。工会应在这工会来领导工人。这样医院内组织工会，对军事上只有帮助的，没有妨碍的。但工人对生活上许多问题是可以提出要求的，但这些问题在院长不许可时，可以提到上级机关解决，但不能用怠工或罢工来妨碍伤兵。但医院中是否应组织工会的问题未作解决，曾要中央指示。注意：但服务员中有许多原来不是工人，而是贫农、中农、甚至富农者。

6. 军校：军委开办有中央军事学校第二分校，学生有五百人之谱，系由各县游击队中及红军中派来，成分由士兵到排长者，进行了六个月的训练（课程我不能详记），大概在军事上是作战的基本动作，作战常识能适用于排、连长之指挥者；政治上是中国的革命与任务，土地革命、政治工作等，在收获

上有相当成绩。即现于陈陀子口与川军一战（一、二大队较强，三大队是新来的），以学生三大队力量（一营人之谱）与川军一团人作十余天的持久战，敌人用非常的火力日常[夜]抢渡，结果死伤几百而不成。那时三军主力在襄北，内部空虚，一直支持到九师到新沟咀与七、八师从荆门方面夹击消灭范绍增进攻之部队，军校学生守陈陀子口的长久支持，对这一伟大胜利有绝对帮助的作用（可参看若干万分之一湖北军用图新沟咀一张）。这些学生在肃反后被调到红军中任连、排长及指导工作（军校中肃反情形在肃反一段中详述，此段不写）。

7. 游击队：各县游击队还是处于很腐败的泥坑中，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工作，乱没收的现象是一般的存在着，浪漫、贪污还是异常厉害，特别是同女人不正确的关系，以致引起农民的不满，虽然在红军主力几次的胜利中同时表现了游击队的发展，但在平常以游击队的积极活动，以帮助红军主力开展胜利的表现是没有什么。特别在敌人以游击战术扰乱苏区内部时，游击队以游击运动的方法给敌人的严重打击。在许多地方游击队当敌人进攻中表现无力，特别是游击队一切行动的迟慢，不群众化，至于游击队进行组织群众、帮助群众的工作，更是谈不上了。

地方党部对游击队领导的工作也表现非常薄弱，除了些参谋（决定怎样打仗）的工作而外，对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差不多是忘记了。许多地方还是如过去把游击队当作县委的保卫队的现象时常发现，更有许多把地方武装只看到游击队，根本忽视了广泛赤卫军的群众武装的组织与作用更不会运动广泛群众的游击战争，往往游击队成为单独的孤立的行动，因脱离群众而失掉游击队的作用。固无活动的运动群众力量的游击战术，在游击队的孤立的行动中、不能战胜敌人而造成游击队中的消极与失败情绪（有些游击队见了敌人就跑，群众只是痛骂“不中用”——如汉川）。游击队一般的是很少在群众中有信仰，差不多群众认红军与游击队是两样倾向——“红军是好的，游击队是坏的”。各地方党部关于物质首先要顾及游击队而不愿首先顾及红军的观念仍然存在（一般的游击队比红军要穿得整齐）。游击队一般的是忽视侦探工作，也因为有些变成机关队的保卫队的作用，平常大部分是驻防放哨，时常敌人进攻到面前来了，来不及就开跑，机关也就随着跑兵，这种现象在各县都时常发生（如江陵县级各机关一连三次把印和文件都丢掉）。特别在敌人进攻洪湖的时候，游击队差不多完全失掉作用（如沔阳警卫营在敌人进攻东荆河占领峰口时，不回枪的乱跑；潜江警卫营在敌人进攻时，一直不歇腿的跑到新沟咀（省军委所在的[地]））。这些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的弱点与坏的现象，到现在还是很少转变。

九、群众工作

专门写群众运动中的现象。

湘鄂西的群众运动，从立三路线的泥坑中跳出来，一直到四代会后，才有转变的成绩，主要是表现在于：

1. 堤工的动员：过去在机会主义深坑之下，往往是企图苏维埃拿钱出来和卖水利公债来完成堤工。另一方面，在敌人修堤的地方只是说：“敌人修堤是欺骗”，并提出“反对敌人修堤”的错误口号。在这里面，不但对堤工发生了很大的阻碍，而同时在实际上引起群众的不满，不了解动员群众的力量。在纠正这一错误后群众运动，的确表现了群众的伟大力量。如泗港堤工每天能动员一万以上到两万的群众自备伙食修堤，组织了群众的堤工委员

会，在以群众意见为基础的行动之下，一个月内完成几十万方土的伟大工程，而且比老堤要宽四分之一，做得非常坚固，群众都是表现了以竞赛的努力。比如在收工的时候，有人提出“我们今天每人多挑一担土，就要多加一万多担土到堤上去”，群众都全体赞成这种意见，很兴奋的超过多挑一担以上至两担三担的。其他各地方都相当的动员了群众的力量。在敌人修堤的地方，都组织了群众一致的向反动堤工局斗争，主要的方法是：“反对堤工局剥削和打骂土夫”，“要求这个堤工限期完成”，“要求增加工资、减少时间”与“要增加土夫多少联系起来”，“反对裁减土夫、拖延堤工”，“反对对堤工敷衍，修堤的标准要依群众的意见”，“下雨不能担堤，工资照给”，“要组织堤工俱乐部、识字班”，“群众代表要参加堤工局主持修堤的意见”，“组织群工的堤工监察委员会”等等，发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在斗争中揭破了国民党堤工局的欺骗。在许多地方这一斗争发动后，马上就转成了群众包围堤工局，把堤工局的委员逮捕作抵押。“要求堤工局将多少堤工经费完全交给群众”，“撤销反动堤工局，组织群众的堤工代表会主持堤工”，这些斗争都得到了伟大的胜利。一方面发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增加了堤工的速度，一方面揭破了国民党的欺骗，打消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

2. 拥护红军：（1）天潜群众参加作战，当红军主力同鄂军作长久战争支持的时候，钟祥的毛匪率几个武装向天潜苏区进攻，帮助国民党扰乱我军的后方。群众在“保护土地”、“保护春收”、“保护苏维埃”、“帮助红军主力开展胜利”的口号之下，成千成万的男女老幼拿起梭标、镰刀、锄头，赶跑了几百枪枝的毛匪。而在这一行动之下，却骇跑了党苏内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却逃跑一空，并说出“群众赶走毛匪这样勇敢，倘若反起水来，我们还跑得出来吗？”的可耻到了极点的话。（2）襄北群众在“保护土地、春收”口号之下，当红军与敌人持久战的时候，广大群众送饭到火线上给红军吃。在送饭、送菜的时候，路上是成千成万的饭担子，群众送的饭，红军主力还吃不完，并且群众把自己的油盐、瓜菜不吃，都弄去送给红军吃。他们在竞赛之下，要表现“我的好吃，先吃我的”。红军吃不完的，他们自己都不吃，用晒罩摊起来，准备作第二次的供给。（3）救护工作：他们在作战时，到火线上抢救伤兵，制很多担架，将伤兵运到后方。几百上千的伤兵在广大的群众力量拥护之下，无一个停留在战场上的，并沿路有慰劳队及代表慰劳、送鸡蛋、送开水等。（4）增送给养：在红军给养困难准备到内部作战的时候，提出“送鱼、送菜、送粮食给红军吃”、“保护苏区，反对敌人的进攻”口号之下，群众自动送粮食（如苏维埃方面之财政工作一段所说之多）。虽然有一部分是有强迫，但大多数群众则在保护土地、秋收利益之下，自愿送的也不少。但据实际知道的并有群众自动竞赛者，甲送五斗，乙送一担的（这却是一个中农与一个小商），贫农也有送一斗到两斗的。此外，在准备红四军一部分过京汉路而西的时候，提出“欢迎和慰劳红军”的口号，就收获了鄂豫皖所希罕之鲜鱼数百担（因天气炎热，鱼多是用盐腌了的）、草鞋几万双。后红四军未过铁路西，草鞋送给红三军和警卫师，鱼送给了医院。（5）代耕队：代耕红军公田与帮助红军家属耕种。在少先队中，这一工作表现得更积极。这里面固然有一部分是处于命令之下，但自愿的方面也表现了群众的积极性。他们在这里面同样举行竞赛工作，大部分是在下午自己工作完毕后进行这些工作，在插秧时也有的一天进行这一工作的（系将自己的推前几天插完，余出一天的时间进行代耕工作）。红军家属的确得到很大帮助。（6）

妇女做鞋、洗衣：红军到的地方，当地有拥红会，发动妇女替红军洗衣，平常替红军做鞋。每月拥红的鞋子、袜底，每区要收获几十到几百（这种鞋子，因便利的关系，游击队穿得最多）。（7）在敌人进攻苏区内部时，洪湖的重要口子——沙口，派警卫营防守，给养非常困难，群众则用抬盒（乡下做喜事用的，能装几桌菜）担菜，蒸南瓜、蒸鱼等，甚至有弄肉者，用担挑饭，打锣鼓、吹喇叭，打起拥红旗成群结队的送给红军，其余各地送生南瓜、盐菜给红军吃的，也举目皆是。这一时期，红军（指内部的）的菜饭，大部分依靠群众的拥护而解决了。这在群众极端困难之下，能够送粮送菜送饭给红军吃，的确表现了为土地、秋收的利益而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决心。

3. 反富农斗争：自平分土地开始以来，显然形成了农村中的富农与中、贫、雇农的敌对阶级，这一敌对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明显。如区、乡苏维埃对某一中农与富农弄不清楚时，经群众的会议在广大群众一致意见之下，确分得清清楚楚。在水灾时期，因贫、雇农生活趋于极端困难，连走动的船只都感困难，那时党提出更进一步的反富农斗争，富农多余的粮食、船只与埋藏的现金一律没收，这样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每天每处都有群众集会，都有反富农斗争的群众行动。在这些行动中，没收了富农的船只、粮食，相当的确决了贫、雇农的困难。特别是大批的发现了富农埋藏的现金，最有力量的是群众创造了自动性，如调查、侦探等工作（到富农的屋前、屋后侦查是否有松的土迹，有意无意的侦探富农的口气，夜晚到富农屋后去听等等）。由这些工作中，大批发现富农埋藏现金，每到发现一处时，即报告贫农团动员全体贫、雇农到这富农家里去，首先是包围富农的房屋，再则开始挖窖。发现一处的现金，即将该富农捆起来，要别处的窖，如罚款等，因此由一个窖发现到几个窖的。群众没收了这些钱，即开大会，即提十分之几供给红军给养，十分之几公共。有些富农把现金放到亲朋家门之贫、雇农家里收存的，被贫、雇农发觉了，除将钱没收了，并大家提出该贫、雇农出卖阶级，袒护富农利益等，要开除贫农团籍，除此项现金不与公分外，还不许他参加其他没收现金的斗争，但至少是要受到大众的严重打击。此外，有隔壁左右及亲朋知道某富农有钱，而又不曾发现窖的地方时，贫农团即将该富农弄出捆绑而供出窖的地方。吊打富农的现象，从监利开始就波及其他县分，如华容的贫农团因有些群众在监利看到了这样行动，就回去效尤。有人说：“我们反对富农不能吊打”，由监利回去的（人）说：“是这样干的，一点都不错，洪湖（江南群众指江左为洪湖）都是这样子的”。在水退时的修堤，要富农出双工。但反富农斗争中，因领导上许多错误（机会主义与反革命的捣乱）而侵犯了些中农、小商的利益，有些给富农肉体打击等不正确行动。但另一方面，确表现了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但在整个反富农斗争中，大部分是偏于经济的行动，对于反对富农参加苏维埃与选举时，防止富农的混入，在群众中比较忽视，这一主要主[原]因，完全是领导上的问题。

4. 参加红军：参加红军还未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有些群众参加红军多半出于自动（因生活困难也有一部分）或强迫的（如监利八区用梯子把群众绑在上面抬到区苏维埃要他去参加红军）。有时在省委、省苏提出动员多少人参加红军的口号限期完成时，许多支部和乡苏维埃及工会支部，采取一种选举办法（如在会议上提出选举某人参加红军，大众表决通过）。这一方法，一方面被选举的人进退两难，去么？家庭里面一切问题是无法解决，不去么？是大会选举的，恐怕违反大会决议，有许多不是在自愿条件之下，而是处于

不得已，不是在了解兴奋之下，而是在被动的勉强之下，对参加红军的意义莫明其妙，形成半路逃跑和不积极等现象。但另一方面，有些群众怕被选，自己首先就提出选举支部书记或苏维埃主席，以致这些支部书记和苏维埃主席难于应付，这自然是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结果。这些现象在纠正才感觉矛盾之下而取消了。只是在肃反开始后，的确有一伟大转变，如“八一”群众大会时，省苏所在地之会场上有六十多名自动报名参加红军，其他许多地方也有当会场自动报名者，这无论如何，可以保障是自觉的。在提出“组织冲锋营”的口号之下，各地做了一个广大动员，各县和省级各机关在相互竞赛之下，大部分是完成五百人一营的数量（同时据考查的结果，这样冲锋营的动员大部分是自愿的），没有完成数量的只是很少。特别在群众欢迎与欢送会的互相演说，冲锋营所经过的地方，都是红旗遍地欢迎。在这一热烈情绪之下，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内中有一部分也有被这些热烈情绪所推动而参加红军者。在这一短时间的收获，八、九两师和警卫师却得了很大的迫切的补充。

5. 妇女运动：湘鄂西的妇女运动特别薄弱，在过去吸收的一部分所谓革命的先进分子，多半是富农成分。发展的来源，也就不外恋爱。工作的重心，没有落在劳动妇女的身上，所谓一般老的先进的革命妇女，都是脱离生产，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学习着“恋爱乱交”。在工作转变的当中，一大部分是完全脱离了工作，做小生意，对于造成妇女中的干部和领袖，在湘鄂西是一般的找不出。省委、省苏、省总虽有了劳动妇女的参加，但多半是不起作用的形式上的事情。第一届团省委的青妇书记，被选三天日夜哭着要回去（因丢不（开）她的爱人），结果开除省委职，免省委第一届妇女书记，每天吃了饭只是坐在交通处和印刷科与同志开顽（玩）笑，水灾时请假回家就永不来了。其余各县妇委书记，多半是县委负责人的爱人，她的工作的提拔，也就是建筑在这些关系上，并不是从工作中、从群众的信仰中提拔起来的。闹恋爱与无政府状态的乱交，也就是这些分子，这无疑是在阻碍了真正的下层劳动妇女运动。在党四代会后，开始了乡的农妇代表会的组织，但一般是没有表现什么成绩，各级党部、团部、苏维埃等领导机关，只是照例的有了妇女参加委员会，但很少从实际工作中去培养妇女干部，对于领导工作，更是谈不上。除此而外，在支部中、乡苏维埃中，并没有吸收妇女参加实际的日常工作。在平分土地中、反富农斗争中，劳动妇女一般的是失掉了作用。在四代会后的农妇代表会、红军家属会议等，都仅仅只是开始，一般的是还没有表现什么成绩。在党、团中，女党员团员还在百分之十以下很远（具备[体]比例不详），女党员的支部书记是没有。劳动妇女生活方面的改善，也只是一部[分]行动的自由（如集会、结社不受干涉等）。在经济上的改善，还没有看到。识字运动只听说在开始，也只是一小部分的开始。党对于妇女工作，一般的还是有轻视的倾向，女工运动是没有，缠足的封建残余还是普遍的存在着。

6. 各纪念节与临时事变：在每次纪念节与临时事变中，缺乏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虽然有照例的筹备委员会，但这种组织只是各机关包办，没有吸收群众来参加这一工作，事先没有宣传鼓动到各乡村、田野、街市做宣传鼓动，解释事变或纪念的意义，没有群众会议的讨论（如党、团支部大会、工会支部大会、贫农团、反帝等自己组织单位之群众讨论的讨论），大部分是在群众举行大会时党苏负责人登台演讲，这完全采取了国民党式的群众运动

方法。在一般大会中，是没有群众上台讲话，除做肃反报告外，其余的群众大会一般的是看不到群众对大会参加的积极性。同时，讲演人的方法也不群众化，总是长篇阔论的“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危机”等等，对于实际问题的解答很少，而且是不会联系，每每会议的时间延长到大半天，群众都感不到兴趣，因此也不能吸引广大群众。

7.其他：如青年、儿童运动，见青年工作一段。

十、党的方面

此段在组织宣传方面已经写过了一部分，兹摘几个主要问题如下：

1.党在某一时期的中心与策略：（1）在中央分局成立时，当时的中心是反富农斗争与平分土分（在平分土地与群众运动中已说过）。这时候作全党的动员，相当的发动了党内的积极性，及至水灾发生，此工作就停顿了。（2）在水灾发生时，各级党部发生动摇与取消的倾向，以为水灾一来就没有什么工作可作了，并有些以为苏区也完结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是反映到了全党。这时候，中央分局和省委提出，现在的工作应以水灾为中心，目前的工作是领导群众逃荒与发动群众到白区去反地主、富农斗争。这些灾民的组织的行动，是党当前中心任务，一切悲观失望是自杀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因群众行动的困难（外出无船、无行动之粮），乃提出更进一步的反富农斗争，提出“没收富农的多余的粮食与船只”的口号，许多机会主义者则提出，在这一严重时期，主张将富农的东西应该全部没收，侵犯中农也没有大问题（如沔阳县委并做出“如果在贫、雇农困难之下，除将富农的粮食、船只全部没收外，富农的房屋亦可同群众自由拆毁、变卖或作柴薪”的决议，并开始这种实际行动）。这种“左”倾的表现，经过严重的斗争，才有部分的纠正。关于组织灾民方面，首先是估计能够容纳灾民的地方，指出顺利的路线，在几条灾民出镜的路上组织灾民接洽处，成立灾民团，内成立党的支部。苏区附近之襄北、荆当、鄂南，则以大批的组织进行公开的斗争。在武汉、湖南、宜沙方面，则分成小组，十个、八个有组织的出去，在外面保持可以随时集合小组成为一个广大的灾民团的组织，有时仍可以化成许多小组，在不同环境中之灵活集散的机能，并决定在灾民中成立流通[动]支部，随时随地有发展党与群众组织和建立支部的任务。在水灾才发生的时候，却发生几个问题与对当时估计的错误（如以为苏区灾民不能到白区去逃荒，国民党二定严重制止灾民出境，苏区灾民到白区去是不可能的事，富农应该禁止到白区去逃荒，如果放他们出去，他们一定结合反动陷害灾民，并有许多党部因恐群众出外逃荒，苏区就没有群众了，而禁止灾民出境），结果使组织灾民的工作提出的迟缓，而很多群众却自动的无组织的出去了。但事实告诉我们，全国的大水灾，灾民普遍各地，国民党也无法制止，而我们却失掉了组织灾民向国民党要饭吃、要衣穿（如中央对灾民工作决议）等等斗争的准备工作与实际领导，结果到以后才提出派干部打入白区的灾民中活动与找苏区逃荒到白区的灾民来进行这些工作。以后有组织的灾民出白区却是小部分，他们确实表现了帮助鄂南苏区发展嘉鱼苏区和在岳州附近建立组织的成绩。但以后经国民党严重封锁与摧残，许多继续出白区的灾民，受到敌人的屠杀和阻止，仍然回到苏区的也不少。苏区内部停留着许多灾民，吃着许多树皮和草根；同时在苏区附近受着敌人压迫，和有些地方因乱斗而造成赤白对立，却累积很多灾民在苏区，成千成万的是尾着红军主力行动。在这里一部分限制未出赤区的富农也混入捣乱，乱没收，而同时有些富农在禁止之下，仍然是出了白

区（事实上是禁止不了），以后这部分未出白区的灾民，因尾随红军解决了日常生活（在反革命阴谋破坏之下，造成见物就没收），都不愿意出苏区。一直到今年春收的时候，这种现象才渐渐消灭。（3）在水退时候，党即提出以修堤及恢复生产为中心，在这里面却发生了耕具、种子及修堤经费问题。这时候恰当第一届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夏西同志到前方去了，盘铭同志到中央来了，扩大会议完全失掉了中央分局的领导，而在扩大会议通过了水灾后以“租佃为中心”和“堤工外交”等机会主义的政策。这一机会主义政策的提出，完全抛弃了党和苏维埃发动群众、帮助群众修堤和恢复生产的任务。在堤工外交政策上，只是企图写公函到国民党水利局要求他们来修堤，想完全依靠国民党来解决堤工问题。在租佃政策上是企图这些贫苦农民无法耕种者，完全以出租解决问题。结果使堤工迟延，土地荒芜，而广大群众失望，而反动堤工局却乘机到处欺骗群众，一直到四代会才指出这些主张的错误，纠正了机会主义的策略。苏维埃、党正确的领导群众加紧修堤和恢复生产（水利公债也是三次扩大会议通过的）主要的办法，是以群众斗争的力量，获得耕具、种子，并在灾民中将“带种子回苏区”的口号提得很高，苏维埃也帮助一部分，主要是供给红军家属和最贫苦的贫、雇农。告诉群众，苏维埃要禁止高利贷的剥削，但群众互相左借的低利借贷仍然许可，这样群众的生产才渐渐恢复。对堤工的办法是：凡在苏区境内的堤工，发动群众自备伙食去修，这要求党，特别是下层党支部努力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在这一工作中，党员要做群众的领导与模范，经过支部会议再举行各种群众会议，党员在群众会议中首先报名自愿带伙食修几天堤。这一工作的结果，发动了广大的群众（如涵港堤工的完成），苏维埃同样是帮助一部分。在反动堤工局修堤的地方（赤白交界），同样要组织群众去修，但在堤工中进行日常斗争（如堤工一段所写的），从斗争中揭露堤工局的欺骗与剥削。在这一斗争发动后，有些地方把反动堤工局推翻了，群众自己组织了堤工委员会，并扣押反动堤工局的首领，要他将修堤粮食、经费交给群众自己管理修筑（如监利之观音洲，系从反动堤工局拿出来之麦由群众主持所筑者）；再在敌人修堤之赤区附近的白区，要“良民证”，我们就发动群众要修堤，不买“良民证”，并反对修堤要“良民证”。反动堤工局减少土夫、延长时间、低廉工资，我们要减少时间、增加工人、增加工资，并大批组织群众自动去参加。在这一正确群众力量斗争的策略之下，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揭破了国民党的欺骗，增加了堤工的速度，反动堤工局完全失去了欺骗和剥削压迫的能力，而群众却得着节节不断的胜利。但在发动堤工斗争口号指出之后，有些地方党部只是认为反动堤工局只有欺骗的空谈，至于真正修堤是不可能的事。在提出“夺取在反动堤工局欺骗影响之下的群众回到苏维埃领导之下来”，“反对反动堤工局与国民党的欺骗剥削。”而他们不知道拿上面所说的斗争方法去夺取群众，却简单的告诉群众“反动堤工局是欺骗的，你们不要幻想，还是靠自己自备伙食，在苏维埃领导之下修堤，不要受敌人的欺骗，并且你们要反对国民党堤工局”。这种不懂得斗争方法，忽视并否认国民党的欺骗作用，同样（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并到处写些“打倒反动堤工局”的简单口号，群众简直莫名其妙。并有些群众因生活困难，见反动堤工局有麦而瞒着苏维埃私自跑到反动堤工局之下去维持生活，并且为修堤秘密卖良民证的，一直卖到苏区内部数十里。这些事实的确告诉了我们，机会主义的结果就是这样，而同时忽视国民党欺骗作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也就是这样。

在白区的溃口堤工，而反动的堤工局还在大的城市上，堤还未开工的地方，我们要发动苏维埃成千成万的群众去白区群众中做宣传鼓动，把白区的群众一起组织起来要修堤，反动堤工局不答复时，即发动上街示威，包围堤工局，要拿出×麦交给群众修堤。这一斗争策略结果，在沔阳县委机会主义观点怀疑之下，而新堤下方附近的堤工还未开工；而在潜江县委坚决信任之下，却发动了岳口附近成千成万的白区群众，而我们党的负责人还不能公开的到广大白区群众中讲话，白区群众并表示愿意接受苏维埃的领导。在广大群众行动之下，岳口街上的工人，并且有一部分士兵都走[趋]于同情，结果这堤在坚决的执行正确的斗争策略之下而开工了。并且在这些地方发展了几乡的新苏区，特别是打破了过去这一地方非常厉害的赤白对立。（4）在敌人开始第四次“围剿”时，党即提出：动员一切力量反对第四次“围剿”，在这里主要工作是：[1]加紧平分土地、完成堤工、恢复生产的苏区内三件群众的大事；[2]扩大与巩固襄北与长江上游的新苏区；[3]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给养，在一切实际行动中来提高群众的积极性，武装群众保护秋收；[4]加紧组织白区群众与白军士兵的斗争，这些斗争都以反抗第四次“围剿”为中心，要在这些实际任务中，来回答敌人的进攻。但实际上在这些工作中的收获，还是十分迟钝与薄弱。在这一工作中，都没有达到必需达到的要求。

2.对群众团体和党团的领导：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是一般的薄弱，许多在群众团体中负责的同志，每次接着党的决议不会运用适合于自己部分的任务，更具体的计划来实行党的决议，一般是照例抄写一份，换一个招牌和斟几句词调。党很少严格检查党团工作，就在省委方面，也是寒热症的不能保证经常性，特别在某一群众团体召集重要大会（省苏土委联席会、工会扩大会议、省反代表会等等），只是在会议时党派人去参加，而没有在事先检查和帮助党团的准备工作，而且只是在临时指出缺点和错误。但每次党的一般会议（除军事问题外），都召集各党团负责人参加（这只在省委中进行），至于各党团经常对党作工作报告，则是没有的事情。

3.对下级党部的领导：多半是靠报告和书面指示，在省委中（按熟于[悉]各县情形者），分有管理某县工作的分工；巡视员的工作，只有支部巡视员，至多最好的能巡视区委工作，对县委的工作的巡视员就没有检查的力量。省委中除几个常委在机关工作外，其余执委大部分是各县中负责者，有时县委中发生问题，或感觉某县工作需要去巡视，都是常委负责同志亲自出[去]跑。除此则还有极少数能够帮助省委做这一工作的，否则是靠文字的指示。

4.党内民主化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一般的是不发展，区支负责人委派或完全由上级决定者仍占多数；下级对上级工作的批评是没有的，家长制度和和平倾向在地方党部仍表现得非常浓厚。

5.党内斗争的开始与反中央分局的经过：问题的中心是由于发展襄北苏区的问题。水灾时，九师行动的问题，三军领导的问题与主力行动的问题（这些，见接着中央对湘鄂西中央分局指示后之中央分局和省委联席会议的结论），内容是：夏西同志在前方提出“依靠天汉苏区以皂市为军事中心。”德昌同志提出“以鄂北为后方”。赤英与德昌、夏西等互相谈到“政府是否搬家的问题”，夏西即提出“目前应仍以天汉皂市为中心，发展京山新苏区根据地，但现在红军主力究竟过江南？还是到襄北？”要求征求省委的意见，并旅赤英到省委来传达前方意见，而赤英却代表前方完全传达了到襄北的意见，以天汉为根据和发展京山新苏区却完全未讲，再就谈到政府搬家等问题，

省委即提出严重反对，并认为是退却路线。这一问题却给与机会主义者（现在证明的反革命）万涛、潘家洵等作为反中央分局的途径，如“退却路线”完全要夏西负主要责任，在省委第三次扩大会上，放弃中夏的问题不讨论，而讨论“中央分局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省委及我个人有严重错误（见四代会政治报告的结论）。在这一结论上同意了中央分局、省委联席会议对退却路线问题的结论。该结论：（1）这一问题的提出并没有得到全体同意，而更不有结论，又不是正式的会议，因此，首先就不能认为是中央分局执行“退却路线”。（2）到鄂北与搬家问题，是德昌提出（赤英也参加有意见）这一意见，无疑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如果照这种主张去执行，就是退却路线）。这种右倾的观点，德昌应该负责。（3）赤英到后方完全传达这一退却路线的主张，忘却了依靠天汉、发展京山新苏区的主张，这是赤英同意了退却路线的观点，是赤英应该负责的错误。（4）夏西只是不同意到鄂北，虽然提出了以天汉为根据发展京山新苏区的主张，而在领导责任上没有当面给这种右倾以严重打击，更没有如省委明显指出这种主张是退却路线而教育同志，更没有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严重的指出，打击部队中特别是部队中悲观失望的情绪，这是夏西的主要错误，也就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错误是要夏西负责的。（5）如果照赤英的传达，省委认为是退却路线，提出坚决反对是正确的。但潘家洵、万涛等认为这一结论是调和的。在四代会上，一定要把“不成其为的退却路线”加之于夏西身上，要夏西负主要责任，作为进攻中央分局的中心，经关向应同志到后，才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大会中指出了万涛、潘家洵等机会主义的实质，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也从此就开始，一部分干部也才开始了解两条战线斗争的实质，但这此斗争仅仅是停留在上层，而且不能在每一个问题上，去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最近是有些进步，但是非常迟缓和狭小的，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机会主义在党内仍然是继续不断的新的发现。

6. 党内一般现象：（1）党员不愿参加红军。（2）上级发下一种决议，下级是照例的成立一个接受决议的决议。对于决议上他自己应该积极去执行的却很少想办法去执行。（3）党员干部浪漫、贪污还表现得非常厉害。（4）没有秘密工作的基础，一般党员和干部不愿意和怕到白区去做工作。（5）官僚主义表现得特别厉害，如机关的铺张、服装的特殊，在机关中的各部事情接洽用书面的写信，对问题解决的迟慢，以及许多不可胜记的无所不到的官僚主义与国民党工作方式。（6）对白区、白军工作的忽视，白军士兵运动差不多在苏区周围的敌人部队中完全没有组织，只是有的不经常性、不按某一部队士兵具体要求的传单、歌谣类的宣传品，但这些宣传品真正到敌人部队中的是很少，组织上只是每月组织计划上照例的派多少党员到白区去、怎样利用群众、怎样接近士兵的决议，但实际的收获却未看到（结果几个专门做士兵运动（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对白区的宣传组织与对白军的工作大同小异。在苏区周围，仅仅在新堤、岳州有非常薄弱的和平组织（几个不能经常开会、不能领导群众斗争的同志）。就在宜昌特委领导之下的沙市，也只有几个非常薄弱的支部，而且是同样的不能领导群众的斗争，并且在纱厂、打 厂两三个同志破坏后，就不得其门而入了。武汉更是没有组织，经省委直接派去几个干部，有两个打转外，其他音信全无。

十一、肃反情形

1. 反革命在湘鄂西的起源：在一九二九年胡陶清乡时代，沔阳南部组织

塌台，县委中一部分逃到天门、潜江南区的干部党员（除极少数逃去外）全体向国民党自首，内中有县委、区委几个负责人同十八军的团长（系改组派）很接近，这些人都是地主、富农和小资产阶级的分子，由于就加入了改组派（这些分子在恢复工作后，曾经重复参加工作。周逸群，当时的鄂西特委书记，主张将这些分子完全恢复党籍。那时中央指出这是错误的决定，仍将这些分子开除党籍，但准许他们参加群众工作），因此，他们虽然不是党员，也就站住了，很多领导机关、红军中也调进去了一大部分，如是他们就利用“自首分子”团结开始作改组派组织的活动。在沔阳曾经破坏过两次，红军中破坏过一次，捕杀了一部分首领，他们这个活动就消沉了一个时期。后周逸群到上海来，就与改派中央邓西禹接洽，恢复苏区改派工作，同时经中央组织路线和未经中央组织路线的运输了一批改组派活动分子打入红军和地方，周逸群将特委负责人大部分介绍加入改派，主要是以阶级背景（因那时党提出提拔工人干部）和中国革命前途“不可靠”来影响的，在这时候，一方面将特委领导机关完全拿到手里，一方面结合清理自首分子中的改派分子开始进行向下发展的工作，他们的组织是由上而下一步一步的拿到领导机关，并准备开始就将各县委书记掉换，或介绍为一色的改派，如是在盲动主义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长期过程中，掩盖了这一反革命顺利的发展。

各派的联络：由邓演达所派遣的第三党首领胡慎己（任红三军师参谋长）到湘鄂西活动，同时由组织部（名字记不清楚了）兵变未成而打入到苏区红军中来一部分干部，即开始了第三党的活动（主要是在红军与医院中），托陈派即由潘家洵、张昆弟等开始，AB团（在医院及襄较多）统治的国民党派在红军下层及各军事部较多，但这些比较在下层来源较复杂，除破案之张锡候而外，其余记不清楚了。

2. 各派的联络：在破坏反革命省委方面，曾经破坏过三起省委，但分子中均有参杂而又有过多数者，在他们各派中有一期的联合省委，同时各派自己也有省委，但最明显的是联合省委与改派省委，他们在组织上各有各的单独的组织，在破坏工作上确是一致的行动，开始破坏时都说是罗汉（在四医院）的书记（罗汉是第三党），这是第三党的书记，无疑以后继（续）破坏中又发现曾大^{<庆>}（第三党）是书记，以后又发现万涛（改组派）是书记，又有继续万涛的彭子玉（改派）书记，最后又发现张昆弟（托陈派）是书记。但联合省委书记究竟是谁，还未有十分弄确（最后又发现他们有中央办事处系以万涛、柳克明、潘家洵等组织而成，书记系柳克明）。但据一般主要分子的口供，可以看出万涛为联合省委书记，改派书记即移交彭之玉，这一联合省委系由潘家洵从洞庭逃到上海转湘鄂西后组织而成（是经过托陈派中央的指示），据供主要是为反党斗争的一致结合。

3. 组织的系统：他们在红军中有军委（胡慎己为军委长）、师委、团委、支部；在地方上有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一般是与我们的组织同，而且多半他们的某级委员会就是我们某级的委员会，这是采取不容易发党的办法。

4. 各派的力量：改组派组织最老，比较普遍，而且大部分支部有他的组织。第三党在红军中较多，地方较少，下层没有接近到群众。托陈派大部分占指导机关，他们很少下层组织。但他们的阴谋主张在机会主义掩盖之下，使党和群众中受到相当的影响（如潘家洵在党内所提出的“租佃政策”在省苏起草的“劳工部是解决劳资纠纷”等），实际上就是公开宣布他们的主张。

统治的国民党派多同地主、富农勾结游击队中的干部与县军事部、区纵队部等。AB团还不大明显，在医院中和襄北曾发现这种组织。

5. 发展组织的方法：（1）对象：富农分子、消极怠工和对党不满意的分子，受过党的严重处罚的分子等等。（2）谈话的方法：利用对党不满意的情绪，宣传“四次‘围剿’的危险”，“加入他们的组织可以保障生命”，“现在党的工作不好，要改造加入新共产党”（这是对下层工农分子的欺骗办法）等等。（3）一般的欺骗和强迫的办法：拿手枪威逼[说]：现在省委、县委都是 派，你如果不加入就打死你，你告密也告不进，上下都是我们的人。见谁有钱就向他斗争，参加吃了的要加入斗争委员会，不加入就不准吃，加入了第三次就宣布你现在加入了我们的组织，上下都有我们的人，你们不接受或告密都是要死。（4）附属组织：如那些人的老婆好打皮伴（即同外人性交）即组织忘[王]八委员会，好找爱人的就组织恋爱研究会，好吃东西的即组织斗争委员会或灾民团（这种组织最普遍，因愿意参加吃东西者为多）。此外如荷花会、野猫会等等，利用各种各样的环境与玩笑有趣的事情，就弄出一种玩笑组织，但又没有明显的组织，完全采取开玩笑似的，而利用这些东西作公开的活动，对政治水平线较高的分子则作为活动的方法，对政治水平低落的工农分子，在开玩笑式的参加了某种组织时，在不久即用强迫的方法说“你参加的某种组织就是我们的（反革命）组织，你现在已经加入了，应该保守秘密，否则有生命危险。”他们组织的发展，特别在水灾时期利用党内悲观失望的情绪，多半是以“保持生命”、“找出路”的欺骗方法。

6. 阴谋：（1）对平分土地的破坏。在平分土地中，一般的故意迟延，故意侵犯中农利益，故意颠倒成分。在平分后唆使贫农掉田，在襄北及新苏区地方欺骗群众说，你们不要平分土地，分了以后种的粮食，苏维埃要没收给红军等等。（2）对经济财政的破坏。破坏合作社，乱借乱赊，使合作社塌台。在转运所中拐款，故意把持农民出品，使农民不满意。故意乱没收小行商的财物，使苏区小行商减少，在经济调济的困难加深（主要是国民党的封锁，但内部反革命捣乱亦系原因之一）。特别是牛贩（出苏境当然应该禁止）、盐贩，使农民的需要日常品困难维持。对于度量的统一不执行，使农民受到敌人无形的剥削，以及助长小行户经济的制度剥削。在财政方面故意浪费、吞款、埋款，反革命分子有组织性和无组织性的秘密分钱用，乱打船，曾经完了海关税的又去没收财物而破坏海关（长江海关有垄断收入的可能，其数不计算，用一切木船上下要经过因几天苏区的路程，国民党要商人相帮走，国民党派兵保护，但一次需保护费很多，而且等候帮船时间一有困难及国民党之种种苛刻、麻烦，往往保护费超过苏维埃海关费很多，因此许多商人不愿求国民党军队之保护，而愿意完苏维埃的海关。曾经有多次商人接洽的事实）。此外，则混乱财政的系统，使预决算无法正确了解，更是在紧急需要款时，在款答应无款，或将主要急需的款项故意先付给可以迟缓而不主要的方面去。特别在战争需要上，时常受到这样的打击，并且经常寄大批钱给反革命的中央。（3）对党和苏维埃的破坏，在群众中故意表现官僚、腐化、浪漫，使群众不满意。特别对群众用许多国民党式的压迫态度。在组织上压制积极忠实干部，提拔坏分子，特别是找寻积极干部的某一件小的错误，把它夸大起来给以严重打击，而企图把积极干部想[搞]得由不满而至于消极。对积极干部的苛刻，在出发时借经济困难不给吃饭钱；对下级和外来干部“经济困难”不给与饭吃，并且错“无被”而不给与睡的地方，造成一般干部对

党不满而消极。在机关中故意消极怠工、官僚腐化、浪漫贪污。对上级的文件和重要决议的封锁在 在 箱子里或糊壁、开[揩]屁股，使下级得<不>到上级的文件而隔离，从中来进行他们与党决议相反的种种破坏工作。他们所干的一切令人不满意的勾当，加之入党不同时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在宣传工作上乱写口号，故意错误，而使口号与党的主张成为相反。（4）对红军的破坏。在红军中故意打骂士兵，自己故意采用军阀制度的习惯对于下级和一般士兵，而同时从另一方面宣传说红军不平等。故意对群众压迫、打骂，甚至有个别当街枪杀群众（即李剑如在潜江县城（用）手枪打死一个割麦做马草卖的贫农），而企图离间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故意在红军与苏维埃中间闹纠纷，使红军与苏维埃的关系恶化。在医院中将几天可以好的伤兵、干部故意锯膀腿，使很好的积极红色干部成为残废，许多伤兵战士发生溃烂而整天不给洗，口渴不给水吃，并有整天不管者。另一方面对个别的军官（坏的分子和他们组织中的分子）则故意殷请[勤]，另一方面又来宣传“红军不平等”。对药料的故意浪费，对伤兵故意苛刻（在肃反中查出埋藏的一千多<床>席子、几百口木盆、几百床被絮，而故意将这些东西秘藏，使伤兵战士睡门板，冷天挨冻而不拿出来给伤兵用），企图促使伤兵的不满；而另一方面又来破坏宣传、欺骗、引诱等无耻的工作。在兵工厂中，把子弹里面装炸药，企图炸坏红军的枪枝。在整枪的时候，故意把些好枪的零件掉换到别的枪上等等破坏军械。特别是勾结白军，把红军的军事计划告诉白军在战场上的破坏。在襄北七天七晚战斗当中，曾围敌人一旅于三里范围之小村内，在敌人动摇快要解决的时候，而继绝皂市援兵的部队不执行任务，而结果破坏了红军伟大胜利。在包围京山县城快要攻下时，而向沙洋警戒的部队两次紧急向军部报告沙洋来援（因沙洋来援正处我军后方），即使我围京山之部队以大部分力量来解决，援军确并没有半个援兵，至回头再回京山县城时，而应城已出援，我处围京山县城之小部分被敌压迫已徐徐退，这样又破坏了我们的攻破京山县城的胜利。此外，则在一般战争中故意在敌人机关炮猛烈时，督令冲锋，在停放时又命令停止，而使红军战士和干部（特别是下层干部）遭受很大伤亡，及许多在左翼[翼]胜利或严重支持中而右翼[翼]故意撤退等等破坏。曾经由房县苏区塌台时最后下来之部队编成的独立团，那时给他在荆内部游击的任务时，而他们超越命令而拖到当阳去，在肃反时清出了这一团的大部线索，而积极将反动首领逮捕。据供：他们到当阳去有拖到川军中去的企图，到荆门时，曾经有川军的代表接洽过。（5）对群众工作的破坏。在灾民中鼓动乱没收，把许多中、贫农的钱、物、粮食拿得一空，乱动群众，乱割红军公田及群众的粮食，并把麦子割得当马草卖。在妇女中进行婚姻的捣乱，造成今天结婚明天又离，甚至于乱交的现象，使劳动妇女不满这些现象而脱离革命。在群众大会上故意打架，扰乱秩序或造谣跑兵。在反帝及各群众团体中进行苛刻的收捐，一方面帮助国民党欺骗和强迫群众，秘密卖“良民证”。（6）假肃反陷害忠实干部与群众。过去在立三主义掩盖之下，进行乱捕乱杀的办法，因反革命部分被下层群众识破无法掩盖时，就逮捕一、二个下层反革命分子，乱供咬许多忠实干部和群众，完全根据一个人的口供实行乱捕乱杀，而且是采用秘杀的办法，这样一方面陷害不少党和群众中忠实干部与群众，另一方面造成绝大的恐怖。及至这次大肃反的开始，许多地方仍采用以上的方法，特别是沔阳县委与县保卫局，将七岁至十三岁之小孩逮捕八个关在黑暗森严的牢狱内，用最苛刻的待遇（每天只给一碗清粥）最残

酷的打骂而当做很大的反革命分子来欺骗上级，表示“他们已开始肃反”。此外，则由反革命分子把持保卫局，利用保卫局的秘密侦查网而作为他们发展组织的方法；另一方面侦探保卫局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作为对肃反的巩固防御，而以保卫局的保障释放重要反革命分子（秘密杀的方法就有释放的机会）和陷害忠实干部（过去的保卫局在反革命彭国材把持之下，省保卫局放走红军中重要反革命首领而继续他供词的证据，由这个反革命分子中团结联（络）逮捕反革命领袖困难解决，经万涛从带领九师脱离苏区回洪湖时加以严重反对，说中央分局、省委“无证据的乱捕忠实干部”而释放，这样阻止了肃反的继续开展。这次肃反完全证明了以前的事实）。（7）过去二军团脱离洪湖，反革命有很大阴谋，在红军初离苏区时，进行造谣说：“洪湖完全塌台”，“敌人包围如何严重”，使代表立三路线的邓中夏同志在动摇不定之中，而实现了他们抛弃苏区的阴谋。在房县时，同样是鼓动红湖群众的战士要回红湖，这又是反过来抛弃房县苏区的阴谋。这一结果在最后的柳克明（重要反革命首领——党的特派员）实行了。（8）在敌人开始四次“围剿”时，他们在党内公开主张把红军分散游击及在反对过襄北的主张中同时（在不利条件之下）提过江南，企图使红军送给敌人各个消灭或脱离苏区。（9）对生产破坏，在群众中欺骗造谣说：“喂蚕苏维埃要没收丝”，说“田种好了就要成富农”，“喂鸡只许喂一对，多则苏维埃没收”等，使农民将许多担蚕子泼到粪坑里，粮食种下去不敢稿[薅]草，苏维埃供给群众的种子不发给群众，自己分得吃掉，特别是公开宣传“租佃政策”，使贫、雇（农）重复受到富农剥削和因依赖“租佃政策”而荒芜土地。（10）两面派的方法。一方面阻止省委、中央分局的决议、计划不能深入下层，使上下隔离，另一方面进行与党相反的破坏工作，而又对上极做很漂亮的报告，省委指出某一地方的错和[误]指示信，则马上就来一个“接受省委指示的决议”，有时一方面造成下级的许多错误，而有时在报告上又对上级提些下级的错误，但是不但不去改正，而[更]加促使错误的生长。在党内上层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他们一方面也来反对机会主义，一方面又想许多新的方法向党进攻，如反革命首领杨成林，党省委的组织部长（同时是反革命组织部长）则在表面上完全反对万涛、潘家洵等许多两面派的方法，欺骗党，欺骗上级而遮掩他们反革命的行动。（11）在反党斗争的活动。主要的是企图把机会主义加之于中央分局的领导者，说省委当时的代理书记是对机会主义调和，说贺龙不能领导三军，到处在地方、红军中（特别是在四代会上）宣传鼓动，企图取消中央分局，改变省委和军委、军部的领导，这样来实现他们完全把持党和红军，更无阻碍消灭湘鄂西苏区和红军的阴谋。（12）与白军、白区的勾结。与川军徐源泉部队均有直接的关系，与反革命中央有经常关系（反党的策略即反革命中央所指示），经过做兵运工作之曾大庆（反革命省委之一）等运输反革命派到红军中，及运输白军中反动分子到红军中进行破坏红军和组织拖枪阴谋，利用我们到上海的交通（反革命）等作为他们的交通，并建立许多半公开和秘密的交通机关与武汉的何成濬及各反革命派发生经常关系，并经常运输反革命活动分子到苏区，经过我们党的路线和交通，也运输了一批（如反帝的黄振东，报馆的毛简青等），这是值得我们组织上严重注意的。（13）“五·一八”的暴动计划与动摇的开始。在四代会党的正确路线战胜了机会主义，这些反革命暗藏在机会主义之下的阴谋完全失败了，即开始暴动的策略。在监利之分盐，夜晚杀人，夜晚放火，泻阳峰口之放火，江陵、龙湾、熊口之暗

杀巡视员，红军在新沟咀时之一班人鸣枪罢岗，和开始发现十余人有组织性的拖枪，在襄北由国民党军队中派代表来接洽，准备“五·一八”举行暴动。

7. 破坏反革命组织的经过：经鄂豫皖肃反和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警觉，经湘鄂西一般实际工作的表现和反革命扰动的事实，经过四代会后的两条战线斗争的开展及中央分局改造红三军的决议的发表与讨论，在这些基础上都[多]处揭露暗藏机会主义之下的反革命阴谋的疑点，及至令人特别注意的新沟咀的鸣枪罢岗和少数人的拖枪，注意着机关中的检查，而特别在襄北之军事部机关之表现复杂，而表现着国民党军队中当营长（天汉人）之张锡侯的大小老婆苏区内部并与军事部及党苏机关中有些关系的动行（11），而当时三军主力在襄北军部认识女人有侦探嫌疑，即逮捕审判，×供出张锡侯勾结等事，并供出张锡侯接头之机关。军部当即派人守候，结果逮捕了张锡侯，而供出天汉县军事部及党苏各机关、游击队中之勾结情形与具体人员，并供出“五·一八”的暴动阴谋，由省苏军事部中之反动派供出了四医院（在襄北）中的罗汉，更牵动到红三军中之胡慎己，由此而牵动到监利、沔阳（发展新苏区时由监、沔等县调到襄北去的）的反革命首领与组织，同时牵动到省苏机关中之反革命分子，由红军中牵动到军校，由省级机关与各县牵动到列宁学校，而牵动到江陵、江南以至普遍各县。这一破坏的结果，到一月之久才由江陵改组派领袖当时列宁学校的校长——侯蔚文露出老的特委中的关系，而引出万涛、彭之玉等，由老特委中牵动到五鹤峰，由三军中牵动到房县，由魏是筠[尉士均]而联系到鄂北以至全部。在侯蔚文供老特委线索时，说出周逸群的发起和假死的阴谋。在中央分局成立时传达四中全会的路线，当时周逸群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根本妨碍他们的活动，而又认为本人的个性强，在根本意见上与中央代表不能相容恰[融洽]，容易发生冲突，而由他个人问题影响到他们组织中其他干部，而对他们组织有很大妨碍与危险，坚决将反革命之领导责任交给万涛，而本人以假死为名，脱离苏区到白军中，帮助“围剿”苏区和红军；另一方面勾结内部反革命与国民党反动机关的关系，这一问题在万涛、彭之玉等审判后才证实，特别是彭之玉与万涛对质时说出周逸群出白区后，有三次主要的通讯，第一次则为“余已同李觉（何健部下的师长）面语，当求他作为保证，伊已允许，当不许即可活动（12），你们在内部要耐心，主要是设法赶走夏曦，假如不可能时，我们另有办法”。第二则为“我会过蒋校长，具体事情不久可就”。第三次则为“已随徐源泉部队，我们一切更有办法”等语。

8. 红军中组织上所占的反革命分子：省委常委中有两个（万涛、杨成林），还有一个嫌疑；执委中除夏曦、贺龙及一个实际负江南县委书记之工人方国生，江陵县委书记之工人李家芬（曾经做过省总委员长）及系嫌疑外，其余都是反革命分子。省委机关中从组织部长杨成林一直到干事是清一色，宣传部过去几个部长都是的，发行部清一色，交通站除刘敬系嫌疑外，其余都是的，秘书处最近两届秘书长、印刷处及做事务工作的除一个百事不管，只晓得弄饭的河南老乡及另一个同志外，其余至少是受了影响的。团省委除书记（周美童）和此次来中央之田道文两个工人外，其余大部分是的。机关中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秘书长都是，其余干部等与党机关相同。省总除李家芬而外，最后两届委员长都是的。宣传部、组织部干部（知识分子）都是，红旗报馆编辑——毛简青及大部分<出>版印刷都是的。省苏主席团之嫌疑。除贺龙外，其余都是的。机关各部门除几个少数事务员而外，其余

都是的。部长中除劳工部长李家芬、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马武而外，其余都是的。“省反”党团书记及宣传部、组织部均是。“省互”党团书记、宣传部、组织部、援救部都是的。各县：沔阳县委全部，江陵县委全部，川阳县委全部，江南县委只书记不是，潜江县委书记有嫌疑，其余都是，天汉县委全部，天潜县委全部，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都是（县委中记不清楚），监利县委除书记外，其余大部分是的。宜昌特委全部。襄北特委，襄北特委除一个团的是嫌疑外，其余都是的。区委书记大部分是的。支部中，以江陵、沔阳、川阳为最严重，差不多每个支部都有了反革命的组织。各县保卫局都是的，其余除一部分队士不是的外，其余队长和各科都是的。省保卫局过去的保卫局长及各科都是的，四代会后，以马武同志做保卫局长，以前各科人都调动了工作，新的各科都没有建立，肃反开始后，系由红军中调出几个参加肃反的干部帮助工作。红军中一个师长，三个师政治委员，一个军参谋长，另 嫌疑，三个师参谋长，三个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宣传科全部，政治、社会两科记不清楚，但主要负责人大部分都是。团长、政委、参谋长大部分是的（因我对红军团干部向前[来]没有注意，有些名不清楚，故经肃反后，几个实数记不清楚）。但警卫团两届团长、一个参谋长都是，营长也占大多数，连长以下比较少些了，士兵中也有少部分受了影响的，这些人多半系白军中或团防中来的。省军委参谋部七个科长都是的，政治部 嫌疑，经理部前届部长，粮 科长 嫌疑。军区医院三个院长、三个政治委员，医生占过半数，看护、伤兵有少数受影响。兵工厂厂长、政治委员、各县军事部长、游击队长大部分是的。

9.破坏后的新活动：我们在肃反过程中，解决了一个县委，他们又从[重]新组织一个县委，解决了一个区委，他们又从[重]新成立一个区委。也有在一个县里破坏几个县委组织（此为多线式的方式）。从肃反开始后，反革命分子也参加肃反，他们的办法是不断的新分子来代替被捕的，保持他们组织的最后存在，因此在这次肃反的过程当中，反革命的主要和次要首领，除组织部长杨成林和云孝县委书记（曾任省总委员长，现参加襄北特委）许少卿而外，其余都没有漏网。在自首运动中，他们曾决定假自首而保持组织的办法，结果这些反革命的新组织被我们继续不断的破坏了。在这（些）组织继续不断的破坏中，由沔阳反革命新县委中证明，张昆弟是最后的反革命省委书记。

10.与其他苏区的关系：由魏是筠到鄂北联通了鄂北反革命的关系，经鄂南、沔阳联系了湘鄂赣的关系（由湘鄂西派往湘鄂赣工作之 ，此名字可面谈，现在湘鄂赣任 工作。关于破坏那边反革命的组织，可从此人身上着手）。

11.党对肃反的策略：系根据中央关于同苏区反革命作斗争的决议及许多指示，以及根据鄂豫皖及富由事变的经验教训，无疑意这一斗争是湘鄂西当时的紧迫的中心任务：（1）把肃反造成群众运动，这一运动不仅是逮捕几个人和求得以群众力量更彻底的消灭反革命组织，而且要在平分土地及各种实际斗争中，彻底消灭反革命残余的影响和工作方式，这样来根本消灭反革命在苏区的活动基础。（2）从宣传教育中来引起被欺骗、强迫而加入的工农分子来自首，并经过各种会议，做报告上、会议上举发，特别是自首分子的举发，把这一工作造成肃反时期中的日常斗争任务。（3）各处召集群众开庆祝肃反胜利的群众会议，在会议上公开宣布苏维埃的自首条例和党对肃反的

策略，并指定自首分子当群众报告他加入反革命的经过和做的工作及反革命中具体的罪恶，以及自首后苏维埃对他的待遇。（4）除反革命的组织者、重要首领及做过很毒辣工作者以外，其余被欺骗强迫加入的工农分子一律允许自首，富农加入反革命而没有负担重要工作的亦允许自首，在反革命中未负重要工作而在党、苏区、红军中负主要责任者不允许自首（如实际负省委、特委、县委工作及区委书记、红军中营长以上），这系党内决定，在当时环境只中央分局、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省政治保卫局长、红军军政委知道而外，并未公布（逮捕重要分子系由中央分局负责同志与省委常委中少数负责人和省保卫局长共同决定）。

12. 自首运动的开始：列宁学校一百学生大会上做了肃反报告以后，有四十多个被欺骗强迫加入的和受影响的学生起来当大会自首，并且有少数积极举发很多人的。省保卫局牢监中经过自首条例和肃反胜利的宣传后，有八百多下层分子要求自首（从各地方红军中集中来的），各支部中的自首只在某些地方开始，特别是红军下层干部和少数被欺骗加入的工农分子很积极的来自首。这一自首特别是在地方下面，还开展得非常迟慢与薄弱，主要是反革命残余的把持，许多地方多半经过几次会和举发后才自首，及当地指出了姓名才自首者。

13. 政治保卫局工作的整理：省政治保卫局在肃反过程中，因干部缺乏，许多工作困难执行，经常三个人专门做统计工作，还不敷应付。对于监狱中的工作自然困难执行，因物质条例[件]的困难，多半牢监中互相讲无法隔离，以后从保卫队队士中提拔了一批稍能识字和讲话的积极分子，每天给他们一次训练，利用这些力量到各牢监中去讲话、读报和解释自首条例，另一方面在牢监内除布置侦探工作外，许多反革命在牢监里的阴谋多半系监牢中一些觉悟的工农分子都给他们举发了。除一般牢监外，另设有优待室，有诚恳表示自首将反革命组织具体讲出者，就转到优待室内，室内布置公开关于红军胜利消息，各种革命斗争消息及许多关于反帝及群众运动兴奋的消息和文章给他们看，给铺盖他们睡，除自由外，待遇（与）机关工作人员平等。专门设有小医院，专门医生每天检查监牢的卫生和犯人的病症及医治刑伤等。在保卫队中，每天进行一次政治和工作任务的讲话。在工作人员中，每天有一次集会和揭发日常工作中的错误（如国民党牢监许多习惯等等）。各县政治保卫局的改造，曾经有几县派的新局长，以后又发现他的问题者，这只是换了些负责人，工作内容有些比较实际收到效果，但整个工作中的改造则还不够得很。

14. 群众的了解与情绪：经过各种群众会议，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懂得了过去许多坏的事情是反革命干的，群众恨反革命派的仇恨心的惭有显明的表现，在解决沔阳县委中反革命派时，召集附近区域群众大会，在会议上宣布了这些反革命派的罪恶后，群众恨声一震，当即在提名中群众自（己）动手的在会场上逮捕两个反革命首领，及闭会后，全体出发逮捕了曾经撤职住在乡村中没有负担党苏工作的两个反革命首领。在省保卫局周围发起了群众的赤色戒严，没有省保卫局的通行证，任何党苏负责人在群众哨上通不过，并且由川阳逃脱之反革命主要首领几天逃不出苏区，无法，又自己跑到省保卫局来，在附近哨上就捕，以后又由[从]省保卫局夜晚逃跑一次，（翻墙经后面到湖边找着一只无人的烂船撑到湖当中，被一弄鱼之女团员碰着查认识是李铁青，即报告附近鱼船围捕送省保卫局）。此外则在许多地方，群众严

密哨上捕获敌人很多侦探，这一总的表示是提高群众拥护苏维埃的决心。

15. 对反革命分子的处决：各县及红军中的主要反革命首领都集中到保卫局了，各县则没有处决的权。在肃反得出总结的时候，就发出举行公开审判的通告，决定各方由群众会议选派代表参加，但因敌人进攻紧急环境上的关系，没有举行成功。敌人进攻新沟咀时，很快的将犯人全部遭到洪湖当中，后敌人攻破柳关占领瞿家湾时，我同七师到江陵，夏西同志留洪湖同马武同志解决反革命，除将主要首领与做过毒辣工作的处决了（照决定的原则），其余自首的及受欺骗的下层分子都释放了。这在召集各乡为单位选举出席公开审判代表的群众会议上报告和讨论反革命阴谋破坏中，使普遍群众能够了解反革命的罪恶而提高群众的阶级仇恨（自然不能保障完全每乡都进行了），但对公开审判未成功，确是肃反中对群众工作的很大损失。而另一方面，在湘鄂西工农群众中，在这一肃反过程中，认识了反革命的真面目，这是我们在群众工作中的很大胜利。

16. 肃反过程中的错误和缺点：（1）在观点上曾有宋盘铭同志向夏西同志说“对党的干部有很大损失”。这只是对夏西同志面问，经夏西同志解释了当没有什么问题，这里我主要不是说这个事实，而是说明这一观点，不仅在一个同志中可以发生，而同志（时）可以在许多同志中发生，不过我们没有听见罢了，无疑意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在省保卫局因几次审判反革命的时候、在公开谈话中指出事实还不肯承认，而至用刑才承认，这样就引起了参加保卫局工作的同志发生“非用刑不可”的观念（在马武同志自己也发生过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在做保卫局工作的同志不管是省里或县里，大部分有这样的观念，因此许多不能坚苦耐劳的忍耐性去说服，使得反革命分子在事实不能辩白之下，自己承认，因此多半是靠用刑，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这在省保卫局以后是相当改正了，而各县还没有决心来改正。最主要的是党在肃反中多半放弃了党的日常工作，许多地方党部在肃反中对于反对敌人“围剿”的群众工作差不多是放弃了，虽然在文章上、在会议上都讲到肃反与反抗敌人“围剿”的紧密联席[系]，但是在实际工作上确没有这样。这是在肃反过程中最主要的错误。其他如对肃反发生怀疑或恐惧的机会主义的观点，在党内也有不少的发生。

17. 结论：（1）反革命在湘鄂西组织上的是由上而下发展的，严重的就 [是] 党团、苏维埃的各机关，而愈严重愈在上层机关。生产的农民中，除少数富农而外，确很少反革命组织。在红军中除少数白军和团防中出身的受了反革命的影响而外，也很少反革命组织。一般党团员除支部负责人比较多数受了反革命影响外，党团群众中很少加入反革命组织，这说明愈到下层愈巩固。（2）在三个多月的肃反过程，彻底揭穿了反革命的根源，破坏了反革命从开始几年来在立三主义盲动主义掩盖之下的阴谋与历史的各组织，给反革命的组织从根本上摧毁了，但反革命的残余在湘鄂西还没有肃清。一方面是下层还未彻底破获，这完全要靠党斗争的加紧是不难在艰苦耐劳的群众工作中以群众的力量肃清的。而同时在上层也没有彻底肃清，还有些嫌疑的及极少数还没有发觉的，值得湘鄂西党严重注意。这里说明，湘鄂西肃反虽然从根源上揭破了反革命的组织，但在今天还不能认为已告成功，这些反革命的残余还有继续恢复组织和破坏党、苏维埃、红军的可能。

十二、第四次“围剿”与苏区失败的情形

1. 关于军事方面：

(1) 襄北时期：在襄北苏区猛烈发展与红军不断的胜利中，国民党不但动员五师以上的鄂军，而且动员川军联合向我们进攻。敌人的办法是以鄂军进攻襄北苏区，以川军直接从荆门、江陵向苏区闪部（洪湖）进攻，以扰乱我后方，使我首尾不能相顾。当川军范绍增师乘红军主力在襄北而内部空虚时，直由江陵占领到离新沟咀二十里路之老新口，当恰逢九师从襄北由潜江到新沟咀及七、八师由荆门回内部两下夹攻，将范之进攻部队全部消灭，范本人仅以带伤身免。这时鄂军乘我军到内部时，积极摧残襄北苏区。我军在这一胜利后，又到襄北，敌多以占住的地方依靠工事，我军引诱敌不出，许多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困难恢复，这时候一方面鄂军集中力量向我军压迫，一方面川军从荆门方面出，有在我后方打击我，及直接由荆门进攻内部的危险，我军在这一条件之下，×决定首先对付川军，×至荆门与川军在大元山一战（因反革命作用未能肃清，未曾得结果）。此时川军同时从沙泽出，潜城亦被敌占领，我军系退到浩子口、周家矶一线，敌急逼直接与我接触，担任周家<矶>指挥之警师长唐赤英忽将警师撤退（没有命令），而周家矶被敌人占领，有抄袭浩子口后方的危险，我军队退至莲花寺与熊<口>一线准备出击作有力的反攻，但敌与我军相持并不出击。

(2) 熊口的支持与袭击荆沙的计划：我们在粮食困难的条件之下，与敌支持不利，系以九师和警卫师但[担]任熊口、莲花寺的防线，七、八两师由江陵暗出袭击荆沙，八师占领了草市，七师攻进了沙市的街口，因八师无准备敌人从荆州来援，八师退出草市，七师同时退出沙市，而同时回到熊口。但在这一策略中，并未牵动进攻的敌人，又成为支[相]持状态，我军曾向敌夜击一次，敌仍未动，而四十八师确经潜江，将全师运到东荆河北岸与三十四师取得联系，从东荆河向南岸进攻，首先从两阳之白庙进攻荆河南结[接]连占领峰口，同时在通海口、施家港一带向甫岸积极进攻，这时候以沔、监两县的警卫营和军部警卫营抽出来在东荆河北一线抵抗和固守小沙口，防止峰口之敌向翟家湾进攻。当由前方决定八、九师从敌当中夜晚偷出到敌人后背去牵动敌人，以七师固守东荆河南，坚决给渡河敌人以严重打击，此行动决定和七师调动时，敌人以由施家港北口相继抢渡过河，占领府场预备堤，七师则由固守新沟咀，准备在新沟咀给与敌人进攻部队之打击（七师调动后曾进攻预备堤再去进攻府场之敌，因敌已敏捷做好工事，均未成，系作以巩固新沟咀打击敌进攻部队之计划）。

(3) 新沟咀的失守与七师的损失：八、九师出去对进攻熊口之敌的确已牵动，但四十一师很快占领老新日建筑工事，仍按兵不动，七师曾以一团去夜击，以两团守新沟咀（一团向老新口警戒，一团向预备堤警戒），袭击未成，以至拂晓在我袭击之一团撤退时，敌人出击向新沟咀猛攻，首先从大堤上进攻，当时我方系以袭未成之一团布置大堤警戒，结果被敌人猛烈火力在短时间攻破（补充：决定三军以八、九师及警卫师一团出去，以七师及警卫师一团巩固内部，此警师名义取消，在新沟咀建筑有强固的工事，当时的布置是以七师一团由政委鲁易同志指挥向预备堤杨林警戒，以一团守大堤，以一团守院子，以夜击大堤上是一鸣同志自己指挥）。结联[接连]院子里敌人也向我猛攻，由大堤上撤退院子里不知道。系无秩序的退下，这里团政委瞿登高（曾出席全苏代会被选为中苏委员的）同志被敌人骑兵砍死，七师两团和警卫团向周老咀撤退。这时候由鲁易同志指挥向杨林关警戒之一团被敌包围（后由个别逃出来的战士说，鲁易同志被捕，这一团人除一部分散于农村

逃出外，大部分被敌人解决），退至周老咀时仅失去警戒杨林关之一团，准备集中三团在周老咀与敌决战，但敌人当天下午由新沟咀向周老咀猛攻，由于部队中的失败情绪，没有抵抗力量，系败退，在这个时<候>退下来更是混乱，敌人用骑兵进击，沿路损失不少，到傍晚时退至分盐收容部队，一晚尚只收齐一团多人，而且又不是单纯两团

人的建制。这时候敌人有从袭刘场同周老咀双方进攻的危险（三官殿、戴家场、渡口均被敌占领），系决定撤至柳关固守小襄河一线，同时将警卫团与军委警卫营等合并七师之原来建制共同编成三团（即十九、二十、二十一），以二十团守柳关，以污阳警卫营守小沙口，派一连守瞿家湾；十九、二

十一两团由一鸣同志直接指挥守福田寺、太平桥，防监城敌人进攻朱河和

抄袭我军后方。二十团系由曾参加省保卫局肃反工作从新调任七师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之朱勉之同志帮助指挥。在撤退分盐之第二天下午，敌人

占领分盐，第三天上午用船支架机关枪（枪）向柳关抢渡，守河口之第三营

营长不得命令不抵抗撤退，敌人渡河街上右翼还不知道，这里一团人损失

所剩仅一营多。当天师部找夏西同志，团省委书记周美童同志到太平桥，七师部队系撤退到福田寺、太平桥一线向柳关与毛家口监城警戒，以巩朱

河。

（4）洪湖失守与七师过江陵：敌人占领柳关后，就完全占领了柳关到小沙口沿湖一线，我们当晚在太平桥商议，认为到朱河活动范围大小，前面左面是曲形的长江，右面是洪湖，后面及右江岸是敌人，系决定七师从监城与毛家口敌人之间偷过江陵向机港、老新口后面活动，来牵动进攻洪湖的敌人，以监污警卫团、地方武装来从内部与敌支持（在敌人进攻府场时，就提出以后方存余的枪支发给地方，由县的警卫营在紧急动员之下扩充到警卫团，同时发给洪湖附近三、五十不等的枪枝，成立各区游击队，准备广泛发动游击战争与敌人在内部支持）。此时集合只十九团与二十一团（不足），二十团还未收容到，系决定这两团由师部领导连夜出江陵，当因无政委，系决定我代表军委同七师到江陵随军行动。夏西同志在洪湖与省委其他同志解决反革命分子与游击战争问题。当七师出发时间已迟，同时小路多淹水不好走，行军的迟慢，恰到监城与观音寺、毛家口三面敌人之间已天亮，监城敌人已出击，观音寺敌人响应。我们部队在失败情绪之下，听枪响就乱跑，师部骑兵连、警卫营、二十一团一部被隔断退回太平桥。我们到江陵时，江陵敌人比较薄弱，苏区尚无问题，系接得军部由荆门第一次来信为“出荆门后在么口与敌战，消灭敌张连三一团”。我们当时住龙湾，实力不到两营，徐李家场即被老新口之敌占领，我们去夜击一次未获，敌反攻，我们即退出龙湾到张金河，准备与未出来之七师大部取联系（一到江陵就派几次交通写信去说明江陵情形，要他们连急到江陵来活动）。到达张金河系得着夏西同志率领七师大部来江陵。七师少部分到江陵后，退转去之大部分及由夏西同志收容之十九团一部分在敌人进攻朱河之后由车湾附近三里，军委会全部经监

城、毛家口、观音寺之间到江陵，途中同时遇敌，从车湾敌人出击一直到监城出击的过程中，战士特别是指挥员不抵抗的乱跑，这次沿途丢枪、去弹的，渡河无船淹死的损失不小，到江陵全部集合则仅剩（一）团多人的力量，枪枝不够一千。

（5）七师的外出：由夏西同志带领七师大部到江陵时，洪湖之敌系抽出向江陵进攻徐李家场、龙湾相继被敌人占领。当时我们认为在敌人回头进攻江陵条件之下，七师在江陵不便活动（部队无战斗力），有被敌人围困的危险，仍决定七师全部由浩子口与长湖之间出荆门，以便与三军团取得联系（夏西同志到江陵时，接到军部第二次来信为“么口战后川军以八团尾追”，在这条件下过襄北不可能，现在主要是在荆当范围活动，向[相]机绕到尾追川军之背后给以严重打击。在这一企图实现后，可过襄北。我们以前曾写信给他们，主张到襄北：第一，可以帮助鄂豫皖的胜利；第二，牵制进攻苏区内部之敌出苏区的作用较大，他们第二次信是答复我们那次的信）。七师出后，江陵留江陵之警卫营、军委警卫连两连，共五连人之谱在江陵内部活动，各区成立游击队。七师出去的政治领导是以中央那时派去之工人同志（在鄂豫边苏区失败回上海找着中央派到湘鄂西的，姓名忘记了）为政治委员，我同意夏西同志均留江陵。七师出外对包围江陵之敌牵动了一部分因此当时江陵尚能活动。

（6）五鹤桑苏区失败与独立团的北渡：桑鹤失败经过及原因另写。独立团北渡到江陵苏区后，川军对于岭河口、资福寺一带增兵占领，当时四十一师由洪湖全部出来于分盐到老新口一线，监城敌人出堤头包围向江陵进攻，黄穴口、余家埠头又相继被敌占领，当时荆门警卫营（若一连人）、潜江警卫营（若一营人）都拖到江陵来了，当时以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一面，将江陵警卫营与酒阳警卫营合并编成一团为第二团，原独立团为第一团，以两团及独立团之游击队共编成一独立师，以独立团长——王炳南同志为师长，以原七师二十团团团长（七师出去时留下的）为政委。在进攻郝穴一次未成，在汪家桥一带打击余家埠头出击部队一次，仅将打回余家埠头。在这过程中，张金河曾被敌占领，即有被敌包围于汪家桥之小范围内的危险。当时企图出荆门，但因张金河被敌占领无路可通，仍决定过江。过江有两条路，一由交子渊过公安，活动范围较大，可由长江下游随时择地渡江左，但渡河点较困难。一是由小河口过东山，活动范围较小，而渡江很容易，且对江敌人很薄弱，同时可以恢复江南政权，×决定过东山。当时已准备船支出发时，得知熊口、龙湾一带无敌，只须偷过张金河就可出荆门，须改变行动（同时当晚忽然大风大雨，如果不变更动行，在江中要遭受不可估计的危险）。行军迟漫，到沙岗就已经天亮了，未能偷过。后张金河之川军撤退，我们又占领张金河。此时据各方消息，四十一师×移动，但四十八师又退出洪湖徐李家场，龙湾又被敌人占领，浩之敌向洪家场出，龙湾之敌又占领陈陀河，独立师在张金河有三面受敌之危险，龙湾之敌又抢渡过了河，当晚、次晨即有三面夹攻张金河之势。独立师系决定由夏西同志率领全部出荆门，当晚照七师出去之小路出动，以各区游击队并留军委警卫连、一手枪连在江陵内部活动，潜江、荆门两警卫营由独立团带出江潜，设法派回本县，在独立团出去当晚，决定备机关退出张金河。次日张金河被敌人占领，黄穴口之敌向内部进攻，决定回本县之沔阳游击队（若一连），原监北（即黄穴区）有一警卫连，江陵之一、三、四路游击队（若一连多）被敌威胁，由崔奇同志编成一独立营过东

山去了，军委警卫连派往沙南活动的，他们自动拖到公安去了，江陵仅剩不满一百枪的游击队，此时敌人开始加紧向江陵压迫。

2. 关于地方组织方面

(1) 在襄北方面，据军部来信已组织一独立团派到襄北活动，并派盘铭同志主持党的工作，但在襄北失败后，交通完全断绝。

(2) 荆门县委带领游击队脱离苏区，抛弃党的工作，把许多伤兵丢了不管，因此决定撤职，另组织了一新的县委，由独立师带去江陵，是否回本县开始工作尚不能知道。

(3) 潜江县委也同游击队来江陵，因被敌人隔断不能深入潜江内部，也由独立师带出去，现是否深入潜江内部也难断定。

(4) 沔阳县委书记带领警卫营到江陵时，县委中还有一部分在内部，游击队有一半在内部。所隔断在内部之县委很难关心领导工作，我们找了沔阳工作及一个战士，另一人组织沔南工作委员会，带一游击队去恢复工作，但被黄穴口之敌进攻，不过沔河由崔奇同志将游击队和工作人员带过江去了。

(5) 监利从七师出江陵后，县委跑散，游击队长反水，军事部长带了几十条短枪过临湘去了，以后在监北组织了一工作委员会，有一连人的警卫连（洪湖内部完全被敌人摧毁，美童、马武都无知去向，是崔奇同志由洪湖逃来江陵说的，我们当时派崔奇同志帮助监北工作），均由崔奇同志带过东山（后据报上消息，美童、马武两同志被捕），现在各县的下层组织还有，但没有领导。所为[谓]秘密小组，实际上究竟有多少没有把握。但一般说，现在能由下层秘密小组自能成立秘密支部领导进行工作的，那就很少很少了。在敌人进攻中特别是党苏负责人反水最积极（这多半是些未发觉或已自首的改组派及其他加入反革命组织的分子），群众中只是富农反水为坚决，群众只是处于这些分子强迫之下编队放哨而已。反水的开始就乱杀工人，杀担任过工作的贫农，压迫中农，这很显明的是地主、富农的复仇。群众的阶级观念与阶级仇恨无疑义在这一失败中更加加深，这种群众基础仍然是党、苏维埃的巩固基础。至于敌人的分田欺骗，在群众中是可以发生些影响，不仅仅宣传的欺骗不兑现，或者至于真正实行他们的欺骗在分田中的许多欺骗、剥削、压迫矛盾，这在湘鄂西经过几年土地革命斗争的群众的经验下，不难揭破国民党的阴谋。附：桑鹤失败的情形

(1) 据考查的结果，周小康在桑鹤领导的党，并未真正开始平分土地的工作，红军完全靠“打给养”的办法来维持，自然是无阶级性的乱没收。五峰的群众就是因这样被地主、富农利用来反对红军及至贺炳兰反水，桑植苏区就完全塌台（桑植土地并未经过真正群众的分配，只是把原来的地主赶跑了罢了，而实际上贺炳兰等家里代替原来的地主向群众收租），鹤峰被敌人进攻，他们就放弃了那块地方而拖到江右来，当地组织一无所存。

(2) 独立团到江陵后，我们即决定将周小康秘密逮捕审判，系供出原任政委之陈汁[协]平、参谋长董朗及由洪湖苏区派去的几个知识分子，这些供同与万涛、之玉等对照大略相同，系[遂]将这些分子逮捕，在独立团中召集大会于土地口，宣布周小康等反革命罪恶（未及讨论即发现龙湾敌人出去，就散了会布置军事）。但群众中确有些兴奋（但据几个反革命口供中说：“桑鹤群众知识落后，一个共产党都弄不清楚，而且向来只知一个共产党，至于改组派什么，在群众中很难活动，因此在那边除了几个上层分子外，并无什么有系统了不得的反革命组织。”）。在独立团中也只说了两个营长和几个

做政治工作的知识分子，而说下层士兵中及最下层干部中很少加入（这些已逮捕的反革命在军事紧急时期已处决了）。

我的报告就写到这里止了，有什么问题的時候，中央再提出来问我。但在湘鄂西问题上，有几个问题要提出解决的，是在恢复苏区中的紧要问题：

（1）省委本身的人员问题。

（2）中央分局领导方式的问题，联系到军委行使职权的问题（此项夏西同志对中央已有意见，可向我面谈）。

（3）各县是否要设单独的保卫局问题。

（4）湘鄂西的军事重心与根据地问题，附领导机关所在地问题。

（5）恢复组织时各县级干部困难的问题。

（6）要求一强健军事人才帮助的问题。

（7）与中央巩固交通关系的问题。说明：

（1）此报告是没有经过中央分局的讨论或已一致同意的，这完全是由我个人完全负责写的，有什么估计错误的地方再来研究。（2）在报告上关于总结批评（对省委本身或对中央分局）都没有写，此项可在谈话中来解答。（3）还有些嫌疑分子不便写在报告上，可面谈或共同研究。（4）以上所提问题系择紧急解决的，至于工作中许多问题想起来再口头提出。（6）报告中大部分是写现象，事实记得的就写了，记不得的就没有写。虽然有这多字，也是不能把湘鄂西的现象彻底从事实上写出来，还有许多未写到的，记忆起来再补充。注释 原件地图模糊不清，故略。 此处所计算之比例似有誤。 原件地图模糊不清，故略。 原文缺序碼(8)。 原文如此。 “互”即经互会。 “反”即反帝大同盟。 原文如此。 “省反”即省反帝大同盟。下同。[11][12]原文如此。

杨光华对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给中央写的《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的申明
(一九六二年)

申明共分五[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报告申明的总引叙；

第二部分、对报告总精神和“四大”的否定；

第三部分、对报告中十二个大问题的分别说明；

第四部分、对“肃反”问题的反证

第一部分、对报告申明的总引叙

我是一九三五年在东北抗日战线上，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调到苏联去的，一九五六年由苏回国。我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开始参加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工作过程中，从历史资料中发现了这份×去了名字的（在中央档案馆被作为史料保存的、三十年前的）报告，是我写的。

由于历史的检查和证明，通过历史的教训，本人在回国后的近几年来，很不成熟地学习了一些毛选，特别是学习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使自己的认识水平逐渐有所提高。再加上在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两年来工作过程中，不断参加了一些有关历史资料的讨论、研究，在首长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之下，又得到一些启发。基于这样的（还很成熟的）新的认识水平，再去审阅三十年前自己写的这份报告，才深深地感觉到问题不少，错误重大，最突出的是它严重的犯了第三次“左”倾的错误观点。

为了纠正史料中的错误观点，分清是非，特作此申明：

1.问题的说明：

（一）这份报告是在一九三二年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失败后，我到中央去写的。报告的精神，是向中央检讨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所以在报告中是谈错误和缺点为主。虽然也写了一些成绩，但是尽量避免夸张这方面的东西。这与当时下级向上级写报告，多讲缺点、少谈成绩的三次“左”倾时期的作风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在一个失败区的情况来说，这种精神就更为突出。因此，这种缺点多、成绩少的报告，是否合乎当时的历史情况？值得研究。

（二）这份报告写得很长，没有总结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没有着重于战略、路线、政策、方针的问题，只是很零碎的说了一些东西，水平很低。

（三）报告中一共分了十二个大问题，都是采取了叙述事实经过，谈现象情况，但其中也包括有观点。这十二个问题总的说来是忠实反映了当时的情况，由于认识的错误，也部分的违反了真象。即没有分清现象中的真象、假象，在主要问题上，肯定了假象、埋没了真象，它在客观上也就歪曲了历史。

（四）该报告只限于“四大”前后，不包括湘鄂西全部历史。

2.本申明的任务：

（一）对报告中错误部分，加以反证，以否定报告中曾经肯定的错误的东西。

（二）对有些不属于观点性质的叙述事实，或有观点，但观点对头的部分，加以说明可作史料参考。

(三)对那些不属于重大错误又不能肯定是对的部分,都作为有问题的东西看待,在申明中加以说明。

3.本申明的布局:

第一,把“四大”和“肃反”这两个主要错误部分,作为两个专题,加以反证和否定。

第二,其余一般次要部分,按十二个大问题,顺次一个一个问题加以分别说明,为了使用资料者便于查对,这些次要部分不作综合处理。

第二部分、对报告的总精神和对“四大”的否定

报告的总精神,是把湘鄂西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四大”)说成是什么一次“成功”的大会。它把“四大”以前一切都说成是“坏”的,把“四大”后所有的都说成是“好”的。它把一切工作成绩,特别是军事胜利和苏区发展,都归功于“四大”。这就集中表现了第三次“左”倾的错误观点。

为什么呢?因为“四大”在两个主要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第一,在政治上:它全部接受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使之得以在这个地区全面贯彻,以致到后来的极端发展。

第二,在组织上:它肯定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坚决推行者——中央代表——夏曦同志领导的所谓“正确”性,使之得以发展到后来的个人专断。

按第三次“左”倾观点的看法,这就是它的所谓“成功”。正由于它的“成功”,才招致了这个根据地(“四大”不久以后)的严重失败。

所以肯定“四大”是没有根据的,报告的总精神因之也就是错误的,故尔申明否定。那么,否定的根据又何在呢?下面说明几个主要问题,以作反证的根据:

第一,在“四大”上是有过尖锐的党内斗争的。这是由于夏曦同志在领导上,利用了他的领导地位,在“四大”以前就做了一系列错误作法和不得人心的事情,引起了红军中和地方上许多同志的不满和反对。基于这种情形,中央在几次得到反映之后,应当把夏调离工作、撤换领导,但由于第三次“左”倾时期的中央没有这样处理,反之给与夏的支持,随之,几个少数(包括我在内的)地方干部也支持了夏曦同志。在“四大”上,对反对夏的领导的同志,特别是万涛等同志,采取了第三次“左”倾式的“残酷斗争”,把反对夏的领导的斗争,指责为以万涛同志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的派别行动”,给与了宗派式的“无情打击”,在大会上,过分的指责了万涛、斗争了潘家询,从而就大大的压制了民主。

第二,随之这个反万、潘的气势,接着就通过了由夏起草的以“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的,极端“左”倾的政治决议草案。(见湘鄂西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我们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草案。)

第三,在军事路线上(特别在“四大”以后),企图单用一个“进攻”就“可以”去打败强敌及粉碎其第四次“围剿”。在军事发展方向上,是以争夺京汉铁路为中心而布[部]署 开辟 襄北(即汉水以北天门、京山一带以至云、孝)新根据地和一切军事工作。

第四,在土地政策上,过早和过分打击富农,进而侵犯中农,破坏了对中农的联盟。

第五,在经济政策上,无界限地打击了商人,影响了苏区贸易,削弱了市场,堵塞了经济活跃的渠道,以致在敌人经济封锁中遭受极端的困难。

最后，更严重的是：再加上在干部政策上，宗派主义和唯成分论穿插起来，大大的排挤了知识分子和压制了民主生活，影响了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在组织上，在肯定了夏的“正确”领导，在党内进行了压制、打击性的不正确斗争，从而使夏得以在家长主义的发展上，竟然走到后来的个人专断，它的后果，给湘鄂西及其临近区的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夏曦同志，是一九三一年三月，第三次“左”倾时期的中央代表，在湘鄂西建立了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分局，夏为中央分局书记。在是年夏季由中央分局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继而成立了省苏维埃和省军委。夏又为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地区的贯彻，是以[从]平分一切土地和反富农斗争开始的。夏曦同志一到湘鄂西就集中指责了“立三路线的两个右倾实质”说红军（是指红三军）是“逃跑主义”，说根据地（指洪湖苏区）是“富农路线”，对湘鄂西地区的已有工作，是否定一切。这些问题，虽然在当初尚未发生什么争论，但在许多地方干部中，是埋下了不能令人满意地影响的。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根据地的贯彻，和全国各地一样，也是披着“国际路线”的理论外衣出现的，所以一开始就能以吓倒了一部分缺乏理论基础的经验主义者和工农干部。而同时他又是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帜出现的，所以也能迷惑一些吃了立三路线苦头的干部。虽然如此，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党是有过丰富的斗争经验的，在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老特委的正确领导之下，曾经摸索了一整套斗争经验，学习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游击战术，并在斗争中克服了一、二次“左”倾路线。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也起了一定程度的阻止和推迟作用。因此，夏曦同志到湘鄂西根据地之后，虽然以平分一切土地开始贯彻了三次“左”倾路线，但这条“左”倾路线的全面贯彻，并不是一下子就通行了的，它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的。

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不但要把其“左”倾路线贯彻于地方，他们知道更重要的是要贯彻于红军。当夏曦同志到洪湖时及其以后几个月时期，红三军主力不在老根据地，对相隔遥远（从湘鄂边经兴归巴转入到房县，建立了鄂西北根据地）的红三军说来，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贯彻，正是鞭长莫及。

所以在一九三一年秋，当老根据地发生水灾，红九师因给养困难，在内部不能活动时，军委曾经讨论过是否到江南活动？因认为到江南背水作战无把握，才改变计划并经夏曦亲自命令九师出击沙洋，发展襄北，相机联系并迎接红三军主力回洪湖老根据地，并经夏曦同志亲自委派万涛同志领导这一军事行动（万系省委常委、省军委主席团委员），在与红三军主力联系后，红三军政委邓中夏同志调回中央，以万涛同志接代邓的职务。当万涛同志领导九师胜利攻克了沙洋，消灭了敌新三旅大部力量，并完成了迎接红三军主力回来的任务时，夏曦同志在领导上不但没有极力鼓励这些军事胜利的成绩，不注意省级负责同志动员广大群众与红三军指战员联欢、慰劳等运动的请示，不去布[部]署对付敌人形将到来的进攻，而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发出命令，说什么万涛同志“违反”军委命令，带领九师远离苏区，在江南危急时无法援救，以致江南失守，并擅自用军委主席团名义命令撤消万涛同志红三军政委职，给九师师长段德昌同志及九师政委陈倍[培]英[荫]同志以警告处分。并不惜放弃中央分局的领导而亲自跑到前方去自任政委。省委否决了对万涛同志等的处分，并对夏曦同志放弃中央分局领导而到前方当红三军政

委表示不同意。接着<夏>又擅自用省军委名义发出改造红三军的训令，取消各师师部，把红三军改为五大团，直属军部指挥。而他将军长贺龙同志长期留在后方（实际上等于撤消了军部），而五大团是直属军委（实际上就是夏曦自己）指挥。这个五大团的作法又被中央接到反映后所否认了。夏曦同志在前方对，省委曾召开一扩大会议，布[部]署水灾工作。夏由前方回来后，严厉指责了省委扩大会议脱离了中央分局领导，说一切“都搞错了”（自然扩大会议也有它错误的地方），并把省委扩大会议的领导同志骂得狗血淋头。

所有以上这一系列打击军事、地方干部，对待红三军和地方的不正确态度。这些错误地[的]作法，引起了红军中和地方上大多数干部的不满和反对。夏曦同志以这种迫不及待抓军权和企图压服一切的办法，不但不能如愿的实现其主观意图，反而制造了党内纠纷[纷]，这种很不得人心的作法，迫使广大干部对其领导日益发生不满和怀疑。这就是为什么在“四大”上，一开始就引起了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对夏曦同志的反对。这场党内斗争，在大会上延续了三天，后经中央派出代表宣布了中央的命令和几个少数地方干部的支持，才压制了这场党内斗争，肯定了夏领导的“正确”，这就是“四大”的真象。报告作者在第三次“左”倾观点的影响下，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报告中反映这种真象。因此，报告的总精神是错误的，应予以否定。自然，这并不是说第三次“左”倾领导和“四大”一切都是错误的，但它的总路线是错误的，其它从属部份不能起到决定作用。报告也是如此，虽然它不是一切都错了，但其总精神是错误的。故尔对“四大”的估价，对报告的总精神，应该否定。

第三部分、对报告中十二个大问题的分别说明

第一个问题（即甲）、苏区情况：

这部分分六个小问题。1.是县分包括苏区面积的变化情况、县分的发展变化是事实，但发展的原因，在观点上是不对的。如报告中说“四大”以前，苏区面积直则由江陵到汉川不过二百余里，横则由监利到潜江，不过百余里，即不到五千平方公里。“四大”后则发展为直从当阳到汉川不下五百里，横则从监利到钟祥不下二百里，即等于二万五千平方公里。即在苏区发展上等于原来的不是一倍，而是五倍。这个情形，应当说明两点：（一）旧苏区只[之]所以窄小，它是受了二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影响，使红军主力脱离了苏区时遭受了敌人的三次围攻，使苏区大大缩小了，前面所举的若五千平方公里的苏区面积，是在冲破敌人“围剿”后恢复起来的领域[域]。（二）以后扩大到二万五千平方公里，这主要是红三军主力回来后的军事活动的胜利所打开的新局面。报告的精神把它归功于“四大”，说此系“党的正确路线战胜机会主义之结果。”是错误的。

其余2.地势；3.土地情形；4.生产（应改为出产）；5.人口及社会成分比例，写得很不清楚，那些数字既不精确，也不可靠，因为当时是凭记忆大会时的统计数字写的，所以应当是有问题的。6.新划分区域，都是按当时的情况写的，不包括观点问题，可以作为参考。

第二个问题（即乙）、组织方面：

这部分分十一个小问题，1.党员人数及成分，报告中已说明了两万党员左右的数字的来源，及成分比例，是可以作为参考根据的。但其中又反映了一些混淆成分，乱安名同。如“死人富农，准备富农”，等当时也有这些事实；例举江南县委巡视工作时所作的错误也是事实，但把该巡视员说成是“改

组派”以及把这些现象都归咎于“反革命捣鬼”，是根据“肃反”总结精神写的，是不能作为根据的，报告中这种说法应当否定。2. 各业（应当是“各级”）委员会组织系统。3. 苏维埃的组织形势。4. 工会。5. 贫农团。6. 反帝大同盟。7. 互济会。8. 青年团（即少共）。9. 赤卫队与少先队。10. 党团。11. 干部。后面这十个小问题，都是反映着当时的事实现象，关于组织系统方面的叙述，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其中所批评的互济会的确当时没有起到好作用，但补充的工会一段中说“登门造册”、“册上造册”和“册也不造”的三种方法是反映了当时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当不能看作是所有工会都是这样组织起来的，而且当时对工会工作的一般的是缺乏经验也是事实。在第十一个小问题中，报告中说“但有在成分问题上，看得很呆板，以为凡是富农成分都不好，不管他工作历史怎样？”在这点上，今天看起来还是对的，是反“唯成分论”的观点。最后反映提拔工农干部的形式主义及事实上是知识分子专政（应是当家），这是很自然的，这些都应看作好的有用的东西（尽管当时的观点是不赞成这种现象的，问题不大）。但这种事实是值得推敲的。

第三个问题（即丙）、宣传教育方面：

1. 报纸，这段说明了报纸的情况，并反映了工农日报办得最好，这都是事实，今天看起来，应归功于谢老觉哉同志，工农日报是他主编的，成绩突出。其余的报纸也有它一定成绩，也有一些错误和缺点。

2. 是说党校，在叙述了一些困难之后，把“反革命捣鬼”当作成绩不好的“最大原因”是不对的，括弧中“反革命捣鬼是最大原因”这句话应当否定，其余的可作参考。

3. 新党员训练班，这段写得过于简单，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党员迅速增加，新党员训练是一个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对此项工作作得很差。

4. 列宁小组，这一段反映了优、缺点之后，同样牵扯到“肃反”，说“据肃反的结果，这个组织差不多完全被反革命利用作为理论上活动的中心”。这是不对的，应当否定。

5. 俱乐部，除说明一般情况外，说“俱乐部一般是变成了机关工作人员的乐园”，这句话一方面说它没有组织群众作社会教育是对的，但也表现了把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生活看成是不应当的错误观念。

第四个问题（即丁）、苏维埃方面：

1. 是平分土地工作，在这段中一开始就说凡苏区都已开始分配了，但没有一乡没有错误，说这“主要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作祟”，“特别是反革命捣鬼”这句话应否定。下面接着是说没有按平分土地决议执行，并叙述了该决议中大意上主要的原则十三点，完全反映了第三次“左”倾路线时在土地改革政策中错误的具体表现。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指导思想上允许了侵犯中农，并对农村阶级标准划分的错误。所以在下面接着的一段中就反映出在实际进行中出现一些必然的现象，如侵犯中农利益，过分打击富农，一分再分使生产不能稳定，甚至造成部分对生产总工的严重现象。当然苏维埃在这里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由于总路线的错误，这些有益的工作也没有能解救其总的危害。最后在报告的这段中做了一个小结。这段小结（一）说：“在平分土地中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因经济利益的关系，从斗争中相当打破了群众的宗族观念（即传统的封建观念）与和平共居的现象。”这些分析都是对的。（二）说：“苏维埃党内洗刷了一大部富农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

反映了当时的事实，也暴露了这种错误观点。（三）说：“表现了贫农团的力量，乡苏很少起作用，而贫农团超过了乡苏行使一切”，这也是当时的事实，但在报告的观点上可以看出是不赞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四）说：“因党内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存在，帮助了反革命的作祟，以致发生许多错误和不好的现象”，这是不对的，这句话应当否定。（五）说：“许多工人贫农只得到坏的土地，并且缺乏种子耕具，仍不能解决痛苦”，这句话有问题。（六）、（七）、（八）及（九）的前半截都正确的反映了当时的事实。但在（九）的后半截就是错误的反映了事实。

2.是经济工作，（一）合作社，当时合作社工作确是没有做好。（二）转运所的情况，这两段报告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賒、拿贪污之风，的确普遍存在，而且很严重。这段历史资料是可以作为借镜的。这里包括有报告人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因此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三）反映了苏区还存在着封建剥削。（四）是说度量衡的不统一，带来了劳动人民的被剥削的现象尚未得到解决。当时统一度量衡是不可能的，在报告中也表现了这种过早的要求，但在苏区范围内规定用单一的十六两秤，取消一切不合十六两规则的大秤是可以做到的，但在洪湖苏区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3.财政工作，这段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批评缺点多，谈成绩少，但也反映了一方面的经验，可作为历史资料参考。

4.文化工作，说得不多，也没有什么问题。

5.司法工作这段也说得不多，反映了一些现象。

6.内务行政等工作，只说了一句“除做了两次卫生运动和一些杂务工作而外，并无工作可言”。没有具体分析它怎样做卫生运动和杂务工作。过分的否定了它的工作，是不适当的。

7.交通工作，只反映了一个邮政工作，当时邮政的确办得很不好，特别关于送信和送文件的周折迟慢，是可作参考的，但对整个交通工作则完全未提，当时的交通工作是作得很好的。

8.保卫局这段说得很不好，把“四大”前的保卫局都说成是反革命把持的，把前保卫局长彭国才说成是“改组派首领之一”，这是错误的，根据“肃反”总结写的，这段应全部否定。

9.工农监察委员会工作，这段反映了两个事实：（一）群众对苏维埃政府及其负责人不敢讲话。（二）检查平分土地发现侵犯中农利益，分中农的土地不是自愿的，而是强迫的，说富农也出来告发。但说检查委员作了袒护富农的事这是有问题的。

10.劳工部，这段只着重说了潘家询起草的“劳动法令”是说“劳工部解决劳资纠纷的调解机关”，这是有问题的；并说潘是“托派”这句话应否定。

11.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工作一段，反映了当时的事实，值得研究，特别是男女关系很乱。但拥红的确很积极。

12.苏维埃一般现象，说苏维埃负责人脱离群众、官僚态度，乡苏负责人被群众视作乡绅不敢说话。说各种会费层次加重群众负担（达数百文之多）。说发水利公债时，基层负责人借以贪污舞弊和勒索群众，按不同单位的推销买好几回者（如工会、互济会、反帝等）。说党包办苏维埃，苏维埃党团脱离党的领导（这些现象也是有的），举例了一个土委联席会议，没有党团组织 and 活动，闭幕时省委才知道，再召集党团开会。这是说当时不懂党团作用的情况。

第五个问题（即戊）、工会方面：

一开始是说明立三路线时取消工会后长期没有恢复，直到一九三一年中央分局成立后，中央派来（张昆弟）做工会工作的，省委派出几个做上层工作的到各县，由上而下的建立工会组织，到八月才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湘鄂西省总。这时下层支部尚未成立。省总成立后即遇水灾，工人严重失业，占90%以上，一部分分得土地的工人有困难，一部分尚未分得土地。发动过要退职金的斗争，复工斗争仍未发动，工会派了几个干部领导逃荒到白区斗争得到一些口粮种子。说富农乘机辞退工人，工人斗争积极，尤其是青工。说有些地方比过去白区时工资有所减少（由一串减至八百文），说这是立三路线取消工会造成的后果。说工会成立后一般雇农工资提高了二分之一，手工业仍未增加。工会对工人的实际生活不了解。说“四大”后对工会工作的安排召集了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了工资问题，劳动合同问题，集体合同问题，各业的直接组织系统问题。动员工人参加红军，白区中心城市工作问题。调查工人生活与失业统计。说预期召开雇农代表会，原定一百人到期只来了十几个人，是由各县区派来的几个人，有的还不知来开什么会，后将这些人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并将[使]他们受训后派回原地工作。这是说情况，没有什么问题。说张昆弟造成工会家长制度、官僚主义，决议空洞，实际工作未作多少成绩。说省总党团承认错误，但一而再再而三，始终脱不了这个泥坑（这种情形也是有的）。说工会确实提拔了一部工人干部，也供给了党的一部分工人干部，但从省总直到支部，仍然以富农为秘书和几个做职工运动的知识分子成为领导上的中心（这里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作用，而在观点上是不赞成这种现象）。指出城市工作薄弱，批评省委对这一工作领导的不够，说充满了官僚主义、家长制度、命令主义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这是向上级检讨自己工作的错误和缺点）。是有些过分的。但这段也写了一句在包括中说“据肃反的结果，同样有大部分反革命派把持了工会”。这句应否定，其余可作参考。

第六个问题（即己）、青年团（即指少共）方面：

说立三路线取消了团的独立工作，直到中央派宋盘铭来，才恢复团的独立工作，有了很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缺点。报告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与团领导人宋在认识上是一致的（此项团省委对团中央有报告），故未多叙。

第七个问题（即庚）、一般的群众团体工作情形：

1.反帝、2.互济会。说这两个组织处于上层机构，只做了节气性的大会演讲募捐，没有做到真正深入群众的日常工作；没有使群众了解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直接危害我国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例[列]举国民党的残暴行为的事实去教育群众，而激起群众的愤怒与同情来自愿的捐献救济阶级兄弟。反映了募捐援助上海“一二八”事变罢工工人时互总将募捐款不寄到上海，而擅自动用，经检查出来给该党团警告后才寄去这笔捐款，但说把捐款吃得干干净净是有问题的，既然吃干净了，后来那有钱寄往上海呢？

3.是说贫农团。说贫农团起了很积极作用，但有把苏维埃看成是官府，贫农团看成是自己的家庭之势。贫农团代替苏维埃行使职权，有第二苏维埃倾向。这是反映了贫农团和苏维埃存在的矛盾表现（如贫农团斗争厉害时过分打击富农，侵犯了中农利益时，苏维埃出面制止，贫农团则说苏维埃“袒护富农”，苏维埃负责人说贫农团“侵犯中农”等等）。说一召集群众大会解决纠纷时，群众意见非常正确。说贫农团最好动员，贫农团会议的积极性

超过党支部。说虽然也发生了一些错误，然而贫农团最能吸收群众推动群众的斗争，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等，是各组织所不及。这里表示报告人很称赞贫农团这种方式。但在这段里把错误方面又说成是“反革命捣鬼”，这是不对的，这句话应该否定。第八个问题（即辛）、军事方面：1.是说实力、编制。2.是说社会成分。这两点，都是按实际数字表达的，虽然不算怎样精确，但基本上是可靠的，很可作资料使用。3.是说军事胜利，这一小段在观点上有错误，从小题上就写成是“四代”会的发展，（一）把它归功于“四大”之所谓“正确路线”。（二）把襄北八昼夜的消耗战说成是胜利。除这两点应纠正外，但消灭张连华之胜利，消灭韩昌俊之胜利，消灭范绍增两团的胜利都是事实。4.政治工作，这一小段有几个问题：（一）说“在邓中夏机会主义领导下，可以说没有政治工作。造成了私人、私枪、私钱、私物。打骂士兵的军阀残余，红军同地方苏维埃、群众关系非常恶化”。说“红军把地方苏维埃当他的办事员，许多苏维埃负责人表现害怕与不满的现象”（这是夸大别人的错误和缺点）。说“红三军回洪湖后，揭露立三主义与中夏机会主义的错误，开始发动反军阀制度残余的斗争，提高了战士的积极性（这里又表扬自己的成绩）。士兵在战场上能对白军士兵做宣传”。三个师都有报纸，各连列宁室建立和墙报的开始，识字运动的开始，但做得很不充分。政治部尚不很健全，对反帝、拥苏的宣传鼓动一般的被忽视。在说明军阀制度残余的存在时，举例了师政委李剑如拿枪打死贫农的事，但把他说成是“托派”这是肃反的材料，是不对的，应否定这种说法。后面说了一些一般的成绩和缺点，是反映了一些事实的，可作为史料参考。也暴露了第三次“左”倾夸耀自己指责别人的观念，是不能当作事实的。5.医院（实际是军医院）这一段写得很好，可全部作为史料使用。6.军校，这一段因没有写错误的肃反，所写的内容是反映实际情况，全部可作史料使用。7.游击队这一段主要是批评了游击队的缺点。湘鄂西的游击运动是很有经验的和光荣传统的，在二次“左”倾红军主力新开辟根据地后，反敌人第一、二次、“围剿”中游击队和全民武装起了决定性作用。报告中所说在游击队所表现的这些也是事实，但他没有说明这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党对游击战的领导削弱了所产生的现象，他失掉了过去一些好的传统精神，保留了一些坏的游击作风。这个报告只限于后期，关于游击队的发展，不是从有史以来写的，所以关于游击队发展时期的许多好的东西没有反映，而只反映了后期所发生的一些坏的方面。因此在这段报告中只看到缺点看不到成绩。因此，研究湘鄂西游击战争不能以这段报告为主要根据，应以周逸群同志领导[主持]特委时的游击运动为主，这段材料只可作为发展时期的游击运动作对照的参考。

第九个问题（即壬）、群众工作——洪湖群众基础好，群众工作好，是传统性的，并不是“四大”后开始的。“四大”后的确也有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只能说是传统精神的继续。但在报告中这一段则说：群众运动从立三路线的泥坑中跑出来，直到“四大”后才有转变的成绩。这是不正确的三次“左”倾的观点。这段分几点叙述了群众工作，都是事实。

1.堤工，这种动员工作的确是在“四大”前后，因这时正是水灾以后，它不可能出现在别的时候。这小段中反映了具体事实，可作史料用。

2.拥红工作，所反映者也是“四大”时的事实，但这种工作远在特委时就开始了。这小段也反映了许多事实，可作史料用。

3.反富农斗争，这里反映了贫农团突出的作用，这个运动正是三次“左”

倾路线的特点。它反映了群众积极的一面，也反映了过分打击富农、侵犯中农的消极的一面，但它在这两方面都反映了事实。但在口气上带有三次“左”倾的倾向。可作为对照的史料做参考研究。但把侵犯中农利益说成是“反革命捣鬼”是不正确的，这句话应否定。

4. 参加红军这一小段中也反映了积极主动的一面，也反映了消极的强迫的一面，如选举人当红军这个事实，很有趣的反映群众是怎样采取消极抵抗来对付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作为史料是很值得推搞[敲]的，怎样吸取这些历史教训。

5. 妇女运动，怎样正确估计湘鄂西妇女运动？报告中只反映了消极的一面（所反映也是一方面的事实），但积极方面（如妇女做拥红慰红工作，担任守卡放哨，做侦探工作，掩护和帮助革命活动等等）都没有反映。当然在提拔妇女干部方面是有缺点，但也不应该否认这方面的成绩。这小段反映的一面，也可作参考。

6. 各纪念节——也只反映了缺点和不够的一面，没有反映成绩和群众的积极的一面。

7. 青年、儿童工作没有谈，因有团的专门报告。应参看团的档案资料。

第十个问题（即癸）、党的方面：

这个部分有两段是属于群众工作的，即灾民工作和堤工。在这两小段中都反映了当时的具体事实。也反映了党的具体领导。灾民工作中也有过分打击富农和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也有一些好的经验。堤工，是分两个部分：（一）是苏区内部，它反映了群众的伟大力量和积极性。（二）是外围区，在这里反映了斗争策略问题。这两部分都很好，可作史料使用。

这部分[本]应多写些党的建设，但是报告中，属于党的建设方面写得很少。

关于第一届省委（应当是临时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一段，说：“在失掉了中央分局的领导的情况下，扩大会议通过了水灾后以租佃为中心和堤工外交等机会主义政策（见报告第47页）。报告的观点，是同意了夏曦在“四大”所作的政治报告的结论中，指责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精神的。这要结合当时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具体研究。但以我个人现在的看法，仍然觉得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所提出的租佃问题和企图写信要国民党修堤的策略是不妥当的。但对扩大会议否定一切，和夏的态度也是错误的。后来所做的，动员灾民、组织灾民到白区作“逃荒”斗争，动员群众修堤和逼迫国民党堤工局按群众意图修堤和加紧水退后的春耕生产是正确的。尽管三次“左”倾在总路线上是错误了，不能因此就把它在这些个别问题上做得对的也认为是错误了。故尔我以为报告的这一段有保留和作为研究参考的价值。这段最后说到反四次“围剿”的动员工作及对其估价都可作参考史料使用。

2. 党对群众工作及对党团的领导，报告中写得不多，也可作参考。

3. 对下级党部的领导，这段写得不多，也是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可作参考。

4. 说党内民主生活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不够，这是事实，但三次“左”倾压制了民主生活和自我批评，报告中没有指出。在当时也不可能这样指出。但党内斗争在下面有所反映的。

5. 党内斗争的一段，应分几点：（一）报告真实的反映了斗争经过。（二）报告错误的接受了“四大”政治报告总结的精神。（三）中央分局省委联席

会议的结论，在报告中看起来好像是很“公道”的，报告人也自以为是

很“公道”的。但那个结论以我现在的认识看起来是错误的。因为它把德昌的正确主张说成是“退却路线”。只是把“退却路线”的政治责任要夏负，但对夏提出的另一个主张以皂市方向（即向京汉路发展的方向）为中心的冒险主张，没有应有的批判，这样就无意的掩饰并助长了夏的冒险主张的进一步发展。但报告人认为不存在什么“退却路线”的认识，今天看起来还是对的。但说“万涛、潘家询等在“四大”上把所谓“退却路线”作为进攻中央分局的中心，”这是受了三次“左”倾的影响而写的，是不正确的。

这段最后写了“党内一般现象”分六个问题，除在第六个问题中说到白军运动时，在括弧[弧]中写了一句：几个专门做士兵运动[的]“都是反革命分子”，这句话是受肃反总结影响，是不对的，应否定外，这六个问题“也反映了当时实际现象。

第十一个问题（即“子”）、肃反情形：

这段全部错误，应全部否定，但须说明者是：

1. 这段是根据肃反总结写的，但把一九三二年的肃反和一九三三年的酒阳自首分子的处理联在一起了，这是不正确的。

2. 这段根据肃反总结，叙述了肃反经过及其进行的情形，忠实的反映给中央了。

3. 自己在观点上，虽然不同意依靠政治保卫局几个少数人的审判特别是利用刑法的手段，自己倾向于群众运动，在处决上自己也不同意用消灭肉体的手段，而倾向于教育改造，但在总的肃反上是相信了这次错误的“肃反”扩大化为“正确”的“肃反”运动。关于这段专门写了一个反证材料，此地不多谈。

第十二个问题（即丑）、第四次“围剿”与苏区失败的情形：

这段写敌人进攻和苏区失败的详细经过，可作史料参考。

再，附有桑植失败的情形，有问题。报告中写桑植并未进行平分土地，红军主要靠打给养，五、鹤峰群众在地富利用之下反对红军。这里的土地改革情形看起来还是在第二次左倾时期的情况。第三次“左”倾在这里还未全面贯彻。

报告中说，该独立团在湘鄂边失败后，转入洪湖根据地之江陵，马上就遭受“肃反”的危害，湘鄂边在三次“左”倾影响下也进行了错误的肃反，而周小康、陈协平等同志又被洪湖的“肃反”所害。

第四部分、对“肃反”问题的反证

关于“肃反”问题，报告中“肃反”一段，是根据肃反总结、它的总精神叙述了肃反的全部经过，是完全错误的，应予以彻底反证和全部否定。

自然，只要有阶级敌人存在，肃反总是必要的。但一九三二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肃反”，是大大超越了正常范围的一次极端错误的“肃反”扩大化。它是在第三次“左”倾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肃反的主持者，又教条主义的机械的硬搬了别人的错误经验，加上主观主义的无限制的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处理了，再加上极端家长主义的个人独断和自以为是。这三者扭在一起领导和主持了“肃反”，从而诬害了许多党内忠实同志和优秀干部，使湘鄂西党遭受无可补救的损失！对革命的危害起了敌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下面根据报告的内容，分别反证其错误实质。

(一) 湘鄂西大规模的错误肃反，是一九三二年夏季开始的，而我在报告中却把一九二九——一九三 年的肃反也联到一起了，这是不正确的。现应申明，这里要反证的只限于一九三二年夏季开始的大规模的错误肃反的范围，不涉及一九三二年以前任何时期的肃反问题。

(二) 关于报告中“肃反”一段，应分几个方面来反证。

1. 凡报告中“肃反”一段所涉及的人，(如：万涛、潘家询、彭子[之]玉、柳克明、张昆弟、侯蔚文、魏士筠[尉士均]、罗汉、彭国材[才]、胡慎己、李剑如、杨成林、毛简清、曾大庆、张锡侯、许少卿、李铁清等及其他红军中地方上未记名的)除杨成林、许少卿被吓跑了，受害者(除张锡侯现在据说是个纪律犯而外)，都是忠实同志，他们并不是什么“反革命”。这些同志，都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造者(如万涛、彭子玉、彭国材、柳克明、侯蔚文、魏士筠、李铁清等)，或后来的参加者(如中央派来的李剑如、毛简清、张昆弟、及来自地方和各地的杨成林、胡慎己、曾大庆、许少卿等)。由于“肃反”的主持者采取了逼、供、信的办法，这些同志在难以忍受的严刑折磨之下，被迫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们的口供，完全是在指名问供或示意逼供下被迫编造的。因此，报告中根据“肃反”总结所反映的材料，是不能作为事实证据的。这些被害同志应予以昭雪。

最显著的一件事实，足以反证这次“肃反”，说明它荒[荒]谬到了什么程度？鄂西革命根据地及其红军的首创者，湘鄂西党和人民的地方领袖——周逸群同志，已经在创建洞庭湖滨湖九县工作时，于一九三一年在他亲自巡视了洞庭湖工作归途中，在华容县属之贾家凉亭不幸遇敌壮烈牺

牲了，并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致哀悼念，并由大会决定把湘鄂西红色书店改名为“逸群书局”以作悼念。但在“肃反”中确[却]被诬为“假死”，并被诬为湘鄂西“反革命派的组织者和最高领袖”。

2. 由此可见，报告中所反映的材料中，“侯蔚文供出，老特委之改组派组织”。说什么“周逸群到上海，与改组派中央邓西禹接洽恢复苏区改派工作，同时经中央(指我党中央)组织路线和未经中央组织运输了一批改组派活动分子打入红军和地方，周逸群将特委负责人大部分介绍加入改派，将特委领导机关完全拿到手里，他们的组织是由上而下、一步一步的拿到领导机关，并将各县委书记调换，或介绍为一色的改派等等”。现在看起来，侯所供的，正是一九二八年周到上海中央回鄂西后恢复我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显然，侯在严刑逼迫之下，不得已把我党周逸群同志重新组织特委恢复和统一鄂西党的工作，都说成是“改组派活动”。由侯的口供，牵涉到老特委所有成员和各县主要负责同志。为了“证明”这种说法，而故意编造了一套假供词，说什么周是“假死”，并在外与苏区内部有联系等等。(杨按：侯蔚文供周逸群的用意何在呢？现在看来，侯的意图可能是要借此证明和暗示他所说的供词都是假的，以便引起“肃反”主持者的警惕。)而彭子玉和万涛对质时，更加编了什么“三封信”。可惜这些毫无根据的假供词和难以置信的瞎说，都没有能够引起“肃反”主持者和参与者应有的警惕性，而公然都被信以为“真”了。这说明被极端“左”倾思想所陶醉的头脑，是何等蠢笨与荒谬呵！

3. 由此可见，报告中所反映的所谓“反革命组织系统”(如他们的省委即我们的省委，我们的县委即他们的县委等等)，看起来，显然供词说的实际上都是我们党的组织。可见用严刑逼出的供词，也说的都是党的组织。因

为这些无辜受害的同志，除了忠实于党的组织之外，并没有什么“反革命组织”。

4. 报告中所反映的所谓“反革命阴谋”，看起来也无非是些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由于三次“左”倾的领导，当时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有所抬头的，少数的个人主义和个别的贪污腐化及生活上的浪漫行为也有所滋长，但所有这些东西，当时没有、也不会用整风的方法去克服它。而在“肃反”过程中，受不了严刑折磨的同志，被迫把这些东西都供认为“反革命阴谋捣鬼”。由此可见，这些被诬害的同志，除被迫供出这些东西作为“反革命行动”而外，他们并没有进行过什么真正的反革命活动。

5. 湘鄂西“肃反”所涉及的范围是骇人听闻的（如报告中肃反一段之第8项所反映的），党省委常委就占了一半以上，执委中除夏曦、贺龙、方国生、李家芬四人不是，还有一个嫌疑而外，“其余都是”反革命”。宣传部、组织部（除中央新派来的宣传部长林电岩而外）是“清一色”。秘书处（包括工务人员），除二个炊事员而外，“其余都是”。省苏主席团除贺龙不是，另一个有嫌疑而外，“其余都是”。省苏各部，除监委主席马武、劳工部长李家芬而外，“其余都是”。而团省委，除书记周美童和田道文（现名宋一平任武汉市书记）二人而外，“其余都是”。而宜昌特委“是清一色”。襄北特委除一个团的是“嫌疑”而外，“全部都是”。各县县委除监利、江南两个书记不是和个别“嫌疑”而外，“都是”。区委书记“大部分都是”。而且支部在沔阳、川阳、江陵等县也“最为严重”。而且肃反机关政治保卫局“各县都是”，省保卫局，除马武一届的“以前都是”。这样一来，党和它领导的军、政、群都被否认了，而当时作为党的依靠的唯一肃反机关政治保卫局（除马武所领导的几个人而外），也全部被否认了。中央分局自然是沒有反革命了，但后来据说（在报告中没有的）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团中央代表宋盘铭同志也当作“反革命”处决了。这样一来，革命根据地岂不变成了“反革命世界吗？那么，你几个少数领导人怎么还能左右一切呢？这种难以致信的东西，竟被“肃反”主持者相信了！

这就是第三次“左”倾时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肃反方法上采用逼、供、信的实质。这还不够，在这个地区除逼供信而外，还加上不留余地的大量的杀！本来，这个地区的“肃反”是在接到当时中央关于“坚决同苏区内部反革命作斗争”的指示，从前方逮捕张锡侯开始的。由于逼、供、信就已经造成了肃反扩大化，波及到全部党政军群组织，损伤了革命的元气到了极严重的程度。再加上不许自首的大量杀害，这就给后来发觉和纠正错误时，已经造成了不可补救的损失。

（三）关于肃反问题，当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疑问，也不是没有意见分歧的。如一贯反对依靠保卫局几个少数人肃反，特别是反对用刑，主张依靠群众，把肃反造成广大群众运动。肃反，是要肃清反革命的组织和影响，而不是消灭肉体，应当争取广大受欺骗者自首，进行教育为主（这些都是中央指示信上已有的精神）。在某些同志力争之下，在省委领导之下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由于肃反主持者。怀疑一切，只相信政治保卫局少数人和坚决采用逼供信的办法，而这些工作都没有起到决定作用。特别是在号召受欺骗的反革命自首这个问题上，触怒了肃反主持者，他认为这种主张是对“反革命的仁慈主义”是“反革命的庇护人”。如是他就起草了一个“除反革命首领而外，受欺骗的群众允许自首”的决议。但什么是反革命首领？他在决

议中规定了“在反革命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者，在反革命组织中虽没有担任重要责任，而在我党担任重要责任者都是“反革命首领”，并且规定地方上从区书以上、红军中从营长以上都是负重要责任者不许自首。在一次扩大的中央分局会议上，利用了与会的保卫局工作人员，以占优势的票数强迫通过这个决议，并警告与会人员，严守秘密，否则以泄秘处分。事后有同志提出“有损干部”疑问，结果遭受指责而进行检讨（后来这位同志在根据地失败后，在红军征途中也被作为“反革命”杀害了）。也有人提出过这样的疑问：“这些人既是反革命，为什么还建设苏维埃政权呢？”得到的答复是：“他们正因为要破坏苏维埃政权，所以才建立苏维埃政权”。不久后提问者也得保卫局长通知说，有人要咬他。另有人也提过这样一种疑问：“既然有这么多反革命，奇怪的是肃反进行了这样久，为什么没有一个跑掉而都甘愿就捕？”这个疑问没有得到回答，而是得到“你是否对肃反发生怀疑？”的反问。提问者也不敢表示怀疑。不久也从保卫局传出有人要咬他的消息。如此凡提问题的人都成了“嫌疑分子”。在这种个人专断和怀疑一切，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任何人的极端反常的恐怖情形之下，就没有人再敢说话了。因为说了话将会砍去说话的本钱，被诬为“反革命”而无从申辩。（后来我在苏联被作为“反革命”流放二十一年的罪状之第一条就是说“我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只[之]所以能够混入党的领导机关，并不是从斗争中提拔起来的，而是周逸群用私人关系提拔起来的，周是改组派领袖”。当然，我就是湘鄂西肃反中“漏网的反革命分子”了。）在洪湖根据地失败后，仅剩下一支武装力量——红二军团，在不断战斗的征途中，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还继续进行了第二次、三次、四次“肃反”，不顾贺龙同志的一再劝阻，把红军的骨干损失殆尽。而且干脆取消了党、团，解散了苏维埃，取消了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因为，他认为这些都是“反革命利用的依据”。这种狂妄的个人专断，已经发展到不能自下而上或自觉的改正错误了。如果没有中央命令停止“肃反”及撤消其最高职权，他将会继续进行第五次、六次以至无止境的“肃反”和专断，而一直到毁灭。

“肃反”的积极分子也被“肃”掉，如魏士筠同志被任命为湘鄂西中央分局全权代表，去接受鄂豫边省委，他在夏曦同志指导下，在鄂豫边也积极进行了与湘鄂西一样错误的肃反工作，后来他本人也被当作反革命“肃”掉了。再如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同志，他在湘鄂边也受了洪湖根据地“肃反”的指导影响，在湘鄂边也积极进行过错误“肃反”，但波及的范围不大，但他来到洪湖苏区后，也被当作“反革命”“肃”掉了。其它在“肃反”过程中，也有许多“肃反”积极分子，后来自己又被“肃”掉者。

这就是湘鄂西“肃反”的真象。报告中所包括的“肃反”一段，仅仅是第一次“肃反”，它就已经给湘鄂西根据地失败，造成了重要的主观原因之一，也就是后来几次继续“肃反”的主要根源。

我是这个报告的作者，对这段应当负责提出以上反证，以全部否定报告中关于这段错误的说法。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共党员青年团员清洗
条例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一、因为反革命派别暗藏在党内活动有几年的历史，并且在肃反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干部加入了反革命派别，因此决定将地方上、红三军中、游击队中、各级党的委员会、支部干事会一律解散，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二、什么人可以留在党内重新登记，要完全具备以下的条件：(1) 产业工人、雇工、手工业工人、苦力、贫农的成分。中农要是最可靠最积极的分子。(2) 工作非常积极。(3) 没有加入改组派、第三党、托罗斯基派、新共产党、AB 团、陈独秀派、罗章龙派。(4) 在红军、游击队中没有破坏过阶级纪律，能坚决执行命令。(5) 对共产党的目的、政治主张、组织系统有基本的了解。(6) 在任何困难条件之下，愿意遵守党的决议，服从纪律，为党工作。三、什么人要清洗出党，只要有以下的一条，就要清洗出党。(1) 自己是地主、富农者。(2) 家庭是地主、富农与家庭尚有关系者。(3) 工作消极者。(4) 加入了各种反共产党反苏维埃的派别团体者。(5) 破坏阶级纪律者。(6) 红军、游击队中不执行命令者。(7) 贪污腐化者。(8) 自己愿意退出党者。(9) 不能遵守党的纪律者。(10) 政治的盲目者。四、清洗的手续：(1) 规定党员登记表，将每个党员登记起来。

(2) 组织清党委员会，由清党委员会的委员直接与每个党员谈话，收集材料，特别要注意成分，派人介绍入党，本人工作履历和工作环境及其社会关系。

(3) 在红军中以连为单位的召集战士大会，要求对每个党员的公开批评，收集材料，地方上按照情况举行非党群众大会，征求对党员的公开批评。

(4) 收集材料以后，由清党委员会作出结论，决定应受处罚之党员和应清洗出党之党员的结论公布之，并报告中央分局最后审查。

(5) 清洗期间红军中以一个月为限。

五、清洗出党之党员，按照状况分为暂时开除、开除党籍、永远开除党籍三种。

六、留在党内之党员，如有政治上的错误，应受党之处罚。处罚分为劝告、警告、严重警告、最后严重警告四种。

七、对于加入了改组派及其他反革命团体之党员的要求及处置办法：

(1) 要求他们公开向党自首，如不自首，企图隐瞒自己参加改组派等团体的经过者，以后查出，无条件地开除党籍。

(2) 加入了改组派及其他反革命团体之党员，只要是工人、贫农成份，自己出来报告，并且没有做过反革命的工作者，可以不开除党籍，给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罚。

(3) 如果是看过改组派文件，或是听过反革命的报告，或是参加过反革命分子召集之公开的会议，讨论了反革命的问题者，不能算为改组派分子，可以不开除党籍，给以警告或严重警告之处罚。

(4) 如果是参加反革命组织年限较久，影响较深或是在党中红军中担任了职务，或是做过反革命的活动，情节较轻者，开除党籍或暂时开除党籍六个月或一年，以后在政治上工作上表现很好，仍旧可以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

(5) 只有成分不好，工作不好，对党又不忠实之分子，才永远开除党籍。

(6) 知道他人参加反革命活动不报告者，应受党之处罚。

八、对于现在各级委员会及支部干事会之负责的党员，须对于其自己所担负之工作与他们加入党的历史、以前的工作履历特别考查，并且对于他们的各种要求要严格些。九、党员对于清党委员会决议不服从时，可到上级清党委员会及中央分局提诉，请求重新审查。十、红军中的青年团员，由清党委员会按照清党办法同样办理。但是对于每个青年团员：(1) 对于青年团的任务有一粗浅的了解。(2) 对于青年团员的政治认识，不要有对于党员那样严格的要求。十一、中央分局决定以关向应、贺龙、卢冬生三同志为红三军清党委员会委员；七、九两师及教导团，由军政治委员指定。注释 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事件告工农兵士群众
(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

工友们！农友们！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在占据我东三省之后，又占据我热河省了。这是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的步骤，为的是要长期剥削我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和直接压迫中国运动，同时在东方造成进攻苏联的根据地。日本这一行动，是英国法国所同意的。国际联盟的调查调停，国民党希望国联主持公道。不过是欺骗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苦群众的把戏。现在日本退出国联，这个西洋镜已经戳穿了！就是美帝国主义虽然同日本的冲突一天天紧张，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一天天迫近，但是压迫中国革命和进攻苏联，美国也是一致的。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只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蒋介石、张学良把东三省和热河献给日本，反把军队开来进攻脱离了帝国主义直接压迫的苏区。一切反革命派别，改组派、第三党、民权派、托洛斯基派，都一致在救国的空谈之下，要求代表中国民众利益的苏维埃和红军去投降国民党，他们的实际目的不过是巩固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统治。我们无产阶级和劳苦群众的出路在那里呢？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任何形式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内部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战争。我们只有实行阶级的国内战争和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才是我们的出路。谁也明白，我们不推翻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我们那能去抵抗日本呢？只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反帝国主义的旗帜。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已决心对日本宣战了！中国工农红军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武装，只有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扩大，只有政权归民众，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才是中国解放的道路！工友们！农友们！不要迟疑了！自动武装起来，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去执行以下的任务：1. 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组织反日义勇军；2. 组织反日工农兵代表会议；3. 推翻卖国的国民党政府，政权归民众；4. 士兵团结起来，推翻卖国的军阀；5. [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和财产；6. 拥护苏维埃和红军；7. 拥护苏联；8. 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信——关于湘鄂西苏区失败的原因及今后的策略路线*
(一九三三年六月)

中央：

湘鄂西苏区之失败，是因为党、苏、红军大部分的干部是改派及与中央分局反机会主义斗争之不彻底和军事上战略战术的个别的左倾错误。中央分局在去年十月枣阳王店会议估计到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自己的损失，即决定红三军移师五峰、鹤峰，至今年一月才达到。现时巴东、建始、施南、宣恩、鹤峰、桑植、长阳从清江以南均恢复了部分苏区，大约有二十二个区苏维埃，包括近十万人。目前我们的工作路线是巩固和发展湘鄂边苏区，加紧红三军政治军事训练，以准备恢复湘鄂西全部苏区。肃反至最近才告一结束，王一鸣、段德昌、王炳南均逮捕处决。段是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加入改组派，有书面口供，因为过去湘鄂西地方上的党是在改派影响之下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团体，已宣布解散，举行清洗，重新登记，并征求新党员。因为省苏维埃政府是改派包办，已宣布过去省苏维埃政府之罪恶，另行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来重新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夏西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三军除七、九两师外，另编一教导团训练干部，向应兼教导团政委。最近决定出版党报《无产者》，以加紧思想斗争。对日本占领热河问题已发出一宣言，并扩大宣传鼓动工作，联系到发展苏区的实际任务。襄北留有一独立团，荆当留一游击队，又失联络，洪湖亦失联络，我们无法派人去。从湘鄂西肃反，可以指出党内隐藏的第三党、改派之危险，如段德昌、唐赤英、李剑如、刘鸣先之流（下略）。

附：

中央局：

请接到此件后即来电告知，以便将此信的下段用电告知你们。

中央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信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央分局和全体同志们：

因为交通断绝，在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无法了解你们的情形，不能和你们交换意见给你们指示，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损失。自从你们的代表 黄得标 同志来此以后，我们才有可能来研究与检查你们的工作。但是你们没有给我们充分材料，使我们详细而具体的了解你们的情形。××同志只给了我们一个极一般的口头报告，而且有许多重要问题，他也完全不明白。虽然如此。我们认为有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你们的必要。

我们这封信是根据本年七月七日和××同志的谈话，以及去年十二月光华同志的书面报告写成的。因为材料不充分，有许多问题以及关于军事计划，我们还不能作具体的建议，在这一封信里我们打算把国际和国内情形，给一个简单的介绍，把你们在四次“围剿”中的错误与弱点加以自我批评，最后，依照你们现在的情形，指出几个迫切任务来，希望你们接到这封信以后立即召集扩大会议来详细讨论，按照具体环境规定你们的具体工作和任务，同时把你们最近的情形尤其是敌我力量的对比，你们的军事计划，对敌人的策略，以及肃反经过等等，给我们一个详细的报告，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具体的帮助你们的工作。你们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保证与我们的交通关系和无线电的关系，使我们能够迅速的解决我们所应当解决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任务的出发来检查湘鄂西党在最近一年来的工作，那么，我们不能不指出，湘鄂西党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中我们在湘鄂西的战线是被敌人冲破了，湘鄂西苏区旧有的根据地——洪湖苏区，已经敌人占据了，我们的红军被压而退出了原有的根据地，在这里，我们的力量都比以前大大的削弱了——总而言之，在四次“围剿”中我们在湘鄂西的确是失败了。关于这次失败的原因问题，我们不能

同意你们的意见，在五月五日的信中你们以为“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是因为“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大多数干部是改组派”。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夸

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少数，不过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政治工作和党的警惕性，使这少数反革命分子能在危急的时候影响我们队伍中的动摇，恐惧等分子，取得他们的声援，而支配广大的部分。当然改组派占据了重要的职位，起了莫大的破坏作用，但是他们所以能够占据重要职位，正因为我们反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斗争不充分。如果我们能够有系统作反改组派的斗争，在群众中彻底揭破他们的阴谋与罪恶，及时肃清这些分子出领导机关，开除动摇分子的要职，说服被反革命分子与动摇分子所欺骗的群众，使他们相信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那末改组派显然不能给我们这样大的害处，如湘鄂西已经遭受了的一样。

照你们那样的估计，不但在党的路线上和对于群众方面，要发生严重的错误（后面还要提到），而且使人不能正确的了解我们这次失败的原因，同时会把我们在四次“围剿”中所犯的各种错误掩盖起来。我们认为湘鄂西苏区失败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敌人力量占绝大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关于敌人力量在进攻湘鄂西时所占的优势，你们知道很清楚，无须

证明。现在我们把湘鄂西党在四次“围剿”中所犯的几个重大的错误指出来，这些错误就是：

（一）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四次“围剿”中的任务，首先没有动员一切力量去冲破敌人对湘鄂西苏区的进攻。无论群众如何热烈的拥护红军（如送饭，送肉，送鱼，送草鞋等），但是我们没有尽量吸引群众去参加红军，参加红军的有许多不是自愿的（如经过大会选举）以致有许多逃跑的现象，甚至党员群众也不愿参加红军，使红军没有扩大与加强，没有好好的发动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去帮助红军作战，游击队在许多情形之下，由于平日没有政治工作与脱离群众，在敌人进攻中（如在洪湖）完全失了作用。没有发动与领导一切群众斗争去配合红军的行动，有些地方（如天潜苏区）当群众勇敢与敌人作战，赶走毛匪时，而党内无耻的机会主义者便逃之夭夭，他们说：“群众如此积极，若他们反水起来我们还能跑得出来吗？”。至于白军中的工作，在白区中心城市的工作，几乎是忽视的，象武汉、沙市、新堤、岳州这些中心城市中没有进行工作不去领导自发的群众斗争，来反对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战胜数量上远胜我们的敌人，自然是不可能的。

（二）我们没有集中红军的主力去打击敌人，往往把我们的力量分散，使敌人更容易压迫我们。虽然在作战时对于牵制敌人，扰乱敌人后方，或打击敌人的援兵，是应该而且是必要的，但是这些任务，可由游击队，地方武装去执行，而不应由红军主力分散去做。然而，正因为我们的游击队的薄弱和不起作用，使得红军孤军作战，有时甚至被敌人的游击战术所牵制与骚扰。

（三）只知依靠红四军，没有独立的行动，不在准备与发动自己一切力量冲破敌人的“围剿”的基础上去与红四军取得联络和一致行动，而是事事依红四军为转移，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出洪湖，跟着红四军乱跑，转战千里；退出洪湖之后，企图渡过襄北，没有成功，又向东北，然后往西北，又不成功，则到河南，复至陕西，再到湖北，由湖北又到四川，最后又回襄河，只在本年正月才开始建立了现在的根据地。在这个长途行军中弄得战士精疲力竭，丧失斗志与战斗力，有的遇敌人不抵抗乱跑，沿途抛弃枪械子弹，有的因为渡河无船，淹死水中，有的因为路途不熟被敌人截击（如在河南失了八百余枪枝），诸如此类等等。自此以后，我们的红军主力受了莫大的损失，这个损失与其说是被人解决，不如说我们“自取其咎”。

（四）过分估计敌人的力量，首先把苏区内反革命派，看作是“了不起”的力量，结果在肃反中犯了许多错误，有许多地方党部因肃反而放弃了日常党的工作，放弃了反对“围剿”的群众工作。这样脱离群众，放弃反对“围剿”的任务而孤独进行的肃反，自然不能得到很好的结果。

由于上述的原因，使湘鄂西苏区在四次“围剿”中遭了失败。对于这个教训是湘鄂西每个同志所应当深切了解的。但是，据我们所有的材料，你们还是继续着上述的错误，因此造成你们现在许多极严重的现象。自从退出洪湖以后，在几乎一年的过程中，除了长途行军以及今年春天与敌人在鹤峰一带作战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积极行动，没有利用一切可能去准备我们的力量，去打击敌人，扩大我们的地域与力量。红军没有扩大，地方武装异常薄弱，虽然当地群众大半是贫农热烈拥护红军。苏维埃的负责人不是选举而是指定的。对于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执行，对于发展生产，巩固苏维埃的财政与经济

基础等等工作，我们无从看见。对于地主豪绅的武装，采取自由主义，不去解除他们，让他们畏缩的逃到山中。对于群众的组织，异常忽视，首先是没有工会和雇农工会，甚至由于不相信群众，把许多群众组织都解散了。尤其是无理由的怀疑一切党员群众，把党和团，完全解散，重新整理，定出了关门主义的党章（过去一人介绍的不要，要重新登记，须有二三个好的干部的介绍，才能成为党员），这是莫大的错误，这不但不能保证党的改造，而且破坏我们党的威信，使现在陷于无党的状态。由于过分估计反革命派的力量，由于失败情绪的反映，认为“要宣布省苏维埃政府的罪恶”，这样你们不是反对钻入苏维埃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而是攻击与污辱苏维埃制度，破坏苏维埃的威信，这是何等错误的，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上与思想上的斗争，代替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对于党员和群众的教育和训练，非常缺乏，借口党校过去办得不好就不办了。党报和群众报也没有出版，不敢大胆的提拔新的积极的工农干部，规定不正确的提拔干部的手续（经过保卫局），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现象，如不坚决纠正和克服这种现象，那么对于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有莫大的威吓[胁]。

我们指出这些现象，不是把湘鄂西情形看作没有希望，使我们消极，悲观，绝对不是的。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消极不悲观，甚至在任何困难之下都相信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劳动群众会终究[究]得到胜利，都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以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性，坚决性，稳定性，胜利的信心，动员群众，来克服一切困难与障碍，打击一切失败情绪悲观失望的情绪，何况现在湘鄂西又有顺利的条件，有许多可能去争取我们的胜利。虽然你们的根据地现在处于偏僻之地，我们的力量比以前大大的削弱了，但是中国革命形势之存在，各地苏区与红军的胜利与强大，首先是邻近你们的红四军的伟大胜利，钟荆游击队的活动，洪湖还有我们不少的力量，在你们内部的敌人力量之薄弱，你们占有数县的区域，保持了二军团一大部分的主力，得有十万群众直接的拥护与依靠，土地革命的胜利，肃反告一段落等等，给你们有种种为往前发展与争取更大的胜利的顺利条件，你们是有可为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条件，坚决的采取与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与策略，动员最广大的群众为革命事业而斗争。现在的是你们扩大领土与增强力量的最好时机。

从对你们的现状之正确的估计中，我们认为你们必须执行如下的迫切任务：

（一）动员一切力量为巩固现在的根据地而斗争，立即纠正过去一切错误，抛弃旧的路线而采取努力准备以增加我们的力量和扩大我们的领土的政策。我们不能把红军主力放在苏区不动或只是起了游击队的作用。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集中主力，去向敌人进攻。应当加强地方武装与游击队来巩固现在的苏区。我们提醒你们，目前回洪湖的企图，是过早的。长江附近的敌人在目前比你们强大多了，而且洪湖今年完全可能遭受极大的水灾。你们决定要向湖南发展，也是不适宜的，这里比现在的根据地更贫瘠，而且更难与其他苏区取得联络。我们应当向有利的方向扩大我们的领土。现在我们认为你们向川南发展比较有利。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在四川除了北部有苏区外，南方还有游击运动与巨大的农民运动。我们不想对[要]你们用全付力量向这方面进军，但是，我们认为可向这方面扩大我们的领土。同时你们应当派人到旧苏区去恢复工作，去领导现在的力量及其斗争。

(二) 尽量地扩大红军，加强红军的战斗力。红二军团不但没有象其他红军那样扩大，而且数量上减少三四倍，这是事实。我们以为这不仅由于军事的因素，而大部分是由于我们政治的弱点。主要的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去参加红军，没有把武装队伍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没广泛的武装农民，使成为游击队，地方武装，以及有的比较原始的武装起来，而是依靠枪枝。如果红二军团要成为影响革命发展的真正的因素，那末，必须大大的加强自己的力量，在坚决的解除豪绅地主武装，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中去获得武装，以广泛的宣传，实行红军的优待条例等等的方法，号召与动员群众加入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加强红军中与一切武装组织中的政治工作与党的领导。我们必须保存红军英勇的革命传统，粉碎反革命分子，为保护与扩大苏维埃领土，保护工农劳动群众的利益。

(三) 巩固苏维埃政权，实行苏维埃的选举，肃清苏维埃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吸引群众来做苏维埃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在群众帮助参加之下改造苏维埃政府。我们绝对不允许那种减弱苏维埃政权的威信的“宣布苏维埃的罪恶”。苏维埃的威信必须提高，必须在吸引群众做苏维埃工作和引导他们来反对阶级异己分子的斗争中去提高起来。苏维埃应当坚决的执行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公布的各种法令，首先是土地法，劳动法。采取一切办法去提高与扩大苏区内的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不能因为反革命派拿食大米做欺骗，就忽视这一问题。这里必须注意到能使农民群众减低生产兴趣的办法，如多次分配土地。据你们的报告，你们的土地分配了四五次，这种办法应当尽量避免。保证与白区的贸易，供给苏区民众日用必需品，现在敌人还没有封锁，但是你们必须注意这种可能的危险，设法打破对外贸易上的困难。实行累进税与土地税，加强苏维埃的财政工作。用一切方法准备红军给养，“到一处吃一处”的办法，是不经[正]常的。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开始，这对于巩固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和训练工农群众的干部，有莫大的意义。

(四) 加紧群众工作，领导一切群众斗争，建立一切群众的组织。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你们没有给我们报告，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你们只有贫农团，但是它的活动情形，我们不晓得。至于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工会，雇农工会，都是没有。其他的群众组织，如反帝团体，互济会，合作社，文化团体，是否建立起来，也不知道。我们认为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应当立即开始转变，坚决的去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政治与经济斗争，立即把上述的群众组织建立起来和积极活动起来，以此来巩固苏区和扩大我们的力量，来反对我们的敌人，只有依靠广大的群众，只有用群众的力量，才能打破我们的一切困难，才能战胜我们的阶级敌人，才能解决摆在你们目前的迫切任务。

(五) 经常注意肃反工作，把这个工作，看着[作]是反对我们的阶级敌人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你们虽然做了许多的工作，但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必然会加强，他们将仍旧企图用种种方法钻入我们的队伍中来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和阴谋。因此肃反工作仍然不能忽视。在这个工作，首先要消灭过去对反革命派过分估计的错误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应当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和采取分化策略。第二，把肃清我们机关和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与肃清地主豪绅的斗争联系起来，不要孤立的去做这一工作。第三，组织政治保卫队，在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中去进行工作，同时建立司法系统。第四，进行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思想斗争，在思想上解除他们的武装，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六) 建立与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任务。你们不但不注意如何去扩大我们党的组织，反而把整个党都解散了，甚至否认一切过去的党员，不分皂白，须重新入党，且须经过干部的介绍，这是莫大的错误。同时对于干部的提拔也须经过保卫局的审查，这又是不正确的。你们以为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改造党和肃清一切异己分子，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这只是关门主义和过分估计敌人力量的错误表现。我们认为改造党的工作是必要的，但不是象你们所采取的那种方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党的方法，就在于开展反对一切<错误>倾向和机会主义，首先是反对悲观，失望，与害怕群众等等的错误作斗争，为执行正确的党的路线而斗争，启发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大胆的对先进的工人，雇农和贫农开门，勇敢的提拔在革命战斗中考察过的新干部，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坚决改善党的成分，肃清阶级异己分子，加强对于党员群众的教育，加强我们党和群众的联系与领导，在宣传鼓动中必须细心的注意到民众的社会成分。当然，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是应该用最大的努力来巩固工人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盟。这一路线又必须在党报的名称与内容中反映出来，因此，我们认为你们的党报的名称，与其用“无产者”（在工业区这是非常好），不如用“鉴[斧]头镰刀”或“工农报”，这样的名称能耸动工人与农民。我们的报纸同时要处理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的利益。你们必须把党报立即出版。各种的党的教育网，如党校，训练班，列宁小组等等，要用一切方法建立起来。

(七) 立即开始关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运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已经决定于本年十二月十一日广暴纪念节在中央苏区举行第二次苏大会。你们应当现在就开始这个选举运动，选出你们的出席代表，保证代表在十月间到上海转送中央。你们必须把这个运动看作是广大的政治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发动群众参加选举，参加苏维埃的工作，讨论与检查苏维埃的过去的工作，使这个运动成为改造苏维埃的运动。我们应当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向群众解释二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成功与经验，告诉他们中国革命的内容与进行状况，唤起他们来执行我们的任务，为苏维埃的中国而斗争。

中央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巩固发展湘鄂边新苏区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通过于烧巴岩)

一、目前形势的估计

(一) 一九三三年的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占领热河，回民的暴动，丝业纱业的衰落，川战的继续，特别是蒋介石三、四月间在江西遭受的失败，中央苏区在敌人的四次“围剿”中得到最伟大的胜利与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发展，所有这些事变，指明革命危机的日益深入与开展。虽然湘鄂西与鄂豫皖在去年遭受部分的失败，反革命的国民党完全无力阻止苏维埃运动的发展，证明以为“湘鄂西、鄂豫皖受着部分的失败，革命便没有出路了”这种改组派、取消派预言的破产。

(二) 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事变，指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进攻中国苏维埃的企图日益急进了。虽然同时加紧了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日本进攻热河与蒋介石进攻江西，在进攻苏联与进攻中国革命这个主要的意义上，是帝国主义总的计划之下的同一步骤。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形势，也就愈益接近了。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正由长期的国内阶级战争表演着。这个战争胜利的保证，只有苏维埃运动的开展，更多更多的吸引千百万工农群众来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斗争。

(三) 自红三军到湘鄂边以后，群众运动的开展是很快的。特别是揭露了改组派过去在苏维埃运动中的阴谋以后，增进了党与群众的联系，这就完全证明了中央分局恢复湘鄂边苏区，准备恢复湘鄂西苏区路线之完全正确。宋盘铭、段德昌等反对开展湘鄂边苏区之反革命作用，也就完全揭露出来了。

(四) 因为湘鄂边苏区的恢复与开展，而且发展到新的地域给敌人以大的威胁，以及帝国主义、国民党疯狂似的来进攻革命，所以敌人对于湘鄂边苏区与红三军的“围剿”，也已经加紧的进行了。现在新三旅与保安团已从建始和宣恩两方面的进攻，与各方敌人还有相互配合的形势，因之利用敌情薄弱，和平发展地方工作的客观形势已经过去，武装的大规模的国内战争的状态已经开始了。

(五) 在这次敌人的进攻中，建始、恩施、鹤峰、桑植、宣恩的群众组织游击队与自卫队，单独的与敌人作了残酷的斗争，所以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上，就是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集中力量击破敌人一点，完全是可能的。

可是改组派的段德昌、宋盘铭等在红三军中三次、四次的恢复组织，破坏了我们整理部队和储藏给养的原定计划，破坏了地方工作的阶级路线。第四次肃反又恰在敌人进攻之时，因之红三军还没有在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再加以给养的绝大困难，因之在敌人的这次进攻中，我们没有取得决定的胜利的形势。

二、怎样可以取得胜利

(六) 事实上已经指明：必须争取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消灭敌人的“围剿”，才能保证湘鄂边苏区的巩固的发展，因之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巩固湘鄂边苏区，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胜利的保障。只有在加紧的组织群众的斗争，政治上巩固红军和解决给养的困难，这个任务的解决，在目前条件之下，只有继续的开展新的苏区，争取更广大的群众，才有可能。然而必须尽力的组织与领导现有苏区的群众武装，才能保障红军的向前发展和阻止敌人的积

极进攻，因之就决定了目前我们主要的三个任务。

（七）目前的第一等任务是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没有这个基本的条件，我们的胜利是没有保障的。

红三军目前必须加紧广大的政治教育工作，与失败情绪、恐怖情绪作斗争，与改良主义的欺骗作斗争和彻底的组织上的改造，完全洗刷地主、富农的成分与暗藏的改组派分子，在继续清党斗争中大批的、大胆的吸引新的党员，建设党的组织和各级政治机关，在战士群众中提拔新的干部。同时必须用教育的方式去教育被改组派欺骗之下层群众与中下级干部，只要他们能够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实际改正，从各方面去瓦解改组派分子重复团结的企图。所有这些任务的完成，只有在依靠广大的战士群众条件之下，提高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才有可能。

（八）目前第二个主要任务是开展新的苏区。认为“苏区发展太快了”，是取消派的理论，是文逸之的反革命的阴谋。目前必须开创新的苏区，主要的是要“赤化”宣恩全县，组织来凤、龙山、桑植、咸丰一带的农民游击战争。只有这个任务的完成，才可征服给养上的困难和相当的巩固现有苏区。

（九）目前第三个主要任务是彻底的转变现有苏区的群众工作，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开创新的苏区，并不是放弃恩施、建始、鹤峰、巴东的现有苏区。在主要的意义上，正是为了巩固这几县的苏区。必须领导现有苏区的群众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号召群众参加武装斗争，武装保护收获，武装保护土地革命的利益。这个任务，只有增进贫农、中农的觉悟与组织才可达到。

目前苏区工作的主要弱点，是部分的改组派分子在地方工作上实行了地主、富农路线与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乡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未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一切只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没有自下而上的方式。必须肃清苏维埃运动中地主、富农的路线，大大的建立工会、贫农团和发展苏维埃中的民主的精神。组织群众的反对苏维埃中官僚保甲制度的斗争，完全正确的实现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

为了适应战争的环境，苏区的组织必须有适当的改变，必须保持由公开转入秘密，由秘密转入公开的活动机能。这个任务，只有在巩固雇农、贫农、中农在共产党影响之下和选择提拔在斗争中的干部才有可能。

（十）从几年来教训的总结：湘鄂西没有共产党的群众组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之从思想上、组织上来建立党的组织和巩固党在群众中的领导，是一切问题的中心。出版党报，建立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创造党的组织，组织群众与改组派的斗争，反对党内的右倾与左倾，这是胜利的先决条件。

庄东晓关于湘鄂西苏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中央：

在开始下面这个报告前，有两点要说明：第一，主要是事实叙述；第二，距今已一年多，许多已回想不起。

一、初到湘鄂西

我到湘鄂西苏区时，正值“五一”，敌情紧急非常，瞿家湾已不能居留，地方的报告一日数起，但都是报告“环境”的。中央分局实际只夏西一人，万涛的组织有名无实，仅仅写写生活条子（即党的介绍信），天天忙于应付环境，土地只在发动春耕，平分土地尚是宣传其口号。财政紊乱，苏维埃纸币已用不通。群众组织如工会、反帝、互济都未建立。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刚在开始。中央分局所在地的乡苏主席、支部书记谓立三路线是主要路线。军事长官（九师师长段德昌等）对夏西不满，××代表中央分局到九师参加“五卅”大会时，段很气愤的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了个邓中夏来，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了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西，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妇女工作完全停顿。关于段对夏不满的话，我回中央分局即报告夏西，当时我们认为完全是段的地方观念，形成了对夏的不满，当时湘鄂西的工作是在开始转变，但也只是开始。

二、中央分局扩大会

在扩大会前（我到后），中央分局的工作就紧张起来了，两天两夜的中央分局会议，决定平分土地，不是宣传的口号，而是要马上实行，在进行平分土地的工作中，来建立贫农团、雇农工会，改进苏维埃的工作。同时，指出绝对反对代替群众和命令群众的方式，要群众自动的来要求，亲自动手的来平分土地。原则上是这样决定了，遂昼夜加工的分头起草各种简章与通知，由钱英、张（记不得名字）起草雇农工会、贫农团简章，夏西起草关于平分土地的通知，潘家辰写何为平分土地的文章在《红旗》发表，我起草宣传工作及各种报告调查大纲，三天内写好后，一齐分头到各县巡视。一方[面]调查当地的实际情形，是否能马上进行平分土地，同时召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专门作平分土地的报告，和引起党员对此问题的热烈讨论，并召集苏维埃及各种群众会议来热烈讨论这一问题。线时只我一人留在宣传部工作，未能出发往外，其余的所有中央那时派去的同志都出发了。在这一大的动员中，以监利为中心，贫农团、雇农工会都开始组织起来，并在监利的中心区和沔阳有些地方开始了平分土地的工作。此时，中央分局的《红旗》，每期都以平分土地为中心，并此时由我负责起开办了三期训练班，前后百余人，对土地与农民问题，都有详细的解释与讨论；对经济财政，除了工作人员不发薪，厉行节俭外，并没有好的办法；对于军事行动是否去江右，亦未决定。在此时已成立了妇委，办了一期妇女训练班，分配到各县、区建立妇女工作，并纠正男女乱交行为。在扩大会开幕的前一礼拜，各巡视员相继回中央分局，组织各种委员会，分头起草各种决议，政治由夏西，组织由万涛，土地由潘家辰，苏维埃由彭子玉，工会由张昆弟、钱瑛，宣传、妇女由我负责。

扩大会的中心而且最引起代表热烈讨论的仍是土地、农民问题，其次是经济财政，军事在会议上未讨论。这次会议据许多代表说，是湘鄂西有党以来第一次有价值的会议。它开展了反立三路线及一切反“左”、右倾机会主

义的斗争，它抓紧了农民的迫切要求——平分土地，并对过去工作给以无情的检查。会后，省委正式成立。省委组织的分工是：夏西书记，万涛组织，我任宣传。省委日常工作已有严格的计划与检查，并派大批同志到各县各区传达扩大会议的精神，推动各地以革命竞赛的方式，在平分土地的基础上来加紧一切工作，直到水灾期前，无论省委或地方的工作，确是一大的进步。国际路线在湘鄂西的转变，可说是一极盛时代，工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都相继建立起来，大批的富农、官僚、腐化地主豪绅残余的分子被逐出党和苏维埃以及各种群众组织。很多新的工农干部被吸收到指导机关，沔阳、监利、汉川、石华等县委书记，皆系雇工和贫农。省委书记夏西不兼后，亦系一手工业工人（杨光华）。

三、水灾时期

正在全党上下积极进行平分土地和主张在进行平分土地工作中来改造党、改造苏维埃和健全及建立一切群众工作的时候，国民党制造水灾，将快到嘴头上的苏区秋收完全淹没，同时用洋面政策去欺骗苏区群众。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领导群众抢险修堤，并揭破敌人的欺骗实质以及规定水灾中一切具体办法。此时有些地方的贫农团发生乱斗的现象及动摇中农利益的许多事实，如见了有粮食的就认为是富农，并有的认为在水灾前富农是已被斗争过，水灾期间，只有中农是斗争的对象，如提出查仓平分等办法。同时江右失守，秋收亦被敌人抢去，给养（红军的）及民食大成问题。在这一困难

面前开辟了新的苏区，九师攻下潜江，进逼岳口，我被派省委代表团到潜江，成立县委与县苏，并帮助潜江工作。省委宣传部暂由省苏主席彭子玉兼。未及贺龙回，除一部进去攻岳口与九师会师于潜江，当时九师中的悲观失望情绪为之一振。未几，川军大举进攻，我军乃前进攻沙市。夏西离中央分局，当军政委随贺龙出发，洪湖只留段德昌一部，我此时又被调回省委，仍任宣传工作。省委书记杨光华系新提拔的同志，经验很少，组织部万涛一向马马虎虎，且又兼军委与省苏，很多工作差不多都堆在我身上。我当时又编《红旗》又编《布》报，又负责整个宣传及起草决议以及地方工作，还要参加妇委及省苏文委，省苏差不多每个委员会都有潘家辰的参加。我在此时在工作上感觉极大的困难，上不得中央分局的领导（夏西随贺出发，徐锡根因病来上海，宋盘民[铭]不久亦来中央），同时又得不到省委同志许多帮助，省委经常仅剩我一人，而我又不是省委委员，很难负责。这时万涛、杨光华、省苏主席彭子玉等一天跑到前方开军事会议，但内情究竟如何，我一向不知，因为我除了在省委外，军事会议、省苏主席团会议一次未参加过。在一天省委常委的会议上，万涛由前方回来报告夏西要抛弃洪湖根据地，说省苏留了戴麻子（戴补天省苏主席团之一，经委主席）作招牌，所有能作政治工作的同志都调到前方去。当时到会的同志听了这个报告，都反对夏西的意见。认为这是抛弃洪湖根据地悲观失望右倾机会主义。段德昌当场发言，谓夏西到湘鄂西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潘家辰并举出夏西在湖南马日事变时动摇的事实作补充。我与昆弟及省委书记是反对认为夏西到湘鄂西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意见的，而同意于自水灾后夏西在许多问题上表示犹豫、动摇、悲观失望，同时在当时的会议上决定派万涛赶到前方向夏西提出抗议，并要夏西马上回后方指导省委。当时谭国辅（夏西的爱人）表示反对，并说假使认为夏西是犹豫动摇机会主义，就是认为中央分局未执行中央和国际路线，同时省委常委会上没有权利提出中央分局路线的问题，何况夏

西不在。但我当时的意见是：夏西不仅是中央分局书记，同时是省委之一，省委常委会当然有权利提出他的问题，当时批评夏西个人与中央分局路线是两回事。结果我对潘家辰、段德昌的意见反对是反对了，但批评夏西我是赞同的。

四、省委第一次扩大会

省委第一次扩大会是夏西未到军队中去前决定召集的，开幕时因夏已随贺出发（宋盘民[铭]在否，记不清楚）未出席。省委扩大会的中心任务本是检阅水灾期内的工作，特别是经济财政及红军伤兵给养的办法，及代表大会召集的准备（关于此《红旗》登有我的一篇文章）。但在会前关于夏西要抛弃洪湖根据地的意见，已传到各地党部，因此在扩大会未开幕前，很多代表要求将军事问题列入讨论。在会议上，除了关于经济问题每县负担多少上发生争论外，讨论最热烈的问题还是军事问题。第一个是夏西想抛弃洪湖根据地，第二个是右江失守的问题。关于夏西我仍然保持在常委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同时我又补充说：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打击悲观失望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应反对庸俗的保守观念，因根据地并非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必要死守的。在会议上很多地方同志是含有这种观念的成份，结果一致的认为夏西在水灾前在湘鄂西的工作中有很大成绩，一般的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但在水灾期内，确表现了悲观动摇，特别表现在抛弃洪湖根据地的企图。段德昌、潘家辰、魏士筠（后被派来中央）的意见，未得通过。扩大会并一致同意调夏西离开军队，决定魏士筠来中央报告一切，并请示省代表大会的问题（当时中央分局无一人）。

扩大会后，各地充满了对夏西的不满，同时中央分局的威信大大降低。省代会前和他由部队中回后方后这一时间中，夏西的信仰差不多扫地，召集了几次省委和中央分局的联席会议，夏声明他并无放弃洪湖的意见，是由唐赤英传达错了，而唐赤英坚定否认假传圣旨的事，关（于）此（事）直保留到代表大会未决。

五、第一次代表大会

等派来中央魏士筠[尉士均]不返，宋盘民[铭]已回，代表大会还是如期开幕。由夏西作政治报告后，继续讨论了三天（大概是三天，记不清），这三天的空气紧张到极点，大部分是对军事问题对夏西的不满。会议的第三天上，关向应与魏士筠[尉士均]赶到，当时暂停代表发言，小关作政治报告，并在报告中指出潘家辰有派别观念（还是成见？记不清），当时潘家辰昏倒地上，会场秩序一乱，但不久仍恢复原状，继又由魏士筠[尉士均]报告。报告后，大会暂停半天。第二天早，又继续开。第四天会场上的空气就大不相同了，反夏西的目标已转到潘家辰的身上。由夏西历举潘家辰在土地问题上主张查仓平分，命令平分土地；在工会问题上主张劳资仲裁；在军事问题上主张分散游击，化整为零；以及经济政策租佃问题上的错误，并指明这是机会主义反国际反中央路线的潘家辰路线。批评万涛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将报复主义，对潘家辰一贯调和，而指我是两面派，对潘家辰的调和主义，要潘家辰、万涛和我在大会上公开承认错误。当时我认为我对潘家辰的思想，我一向未附和过，并对夏西的批评和对中央分局路线的估计，与潘家辰根本不同，根据我的发言，我的文章和我所起草的决议来指出我的错误好了，为什么把我与潘家辰拉在一起，难道认为他有的错误，我就非有不行。因此，我在大会上的发言，除了关系一般的和声明了我认为中央分局的路线一般的是

正确的和执行了中央和国际的路线外，并未承认调和主义的错误。大会后，我仍留在省委负党内教育训练、《红旗》编委及代理列校校长等工作，并参加妇委及省苏文委，潘家辰仍在省苏，万涛调军委。省代会的精神传达到各地后，各地党部热烈要求潘、万同我承认错误，但开始我只在闷头工作，最后在省委积极分子会议上，我开始承认了自己调和主义的错误，并严格批评潘家辰及万涛的调和和报复主义（团中央分局撤他的政委，调后方工作，他表示不满）。我发言后，大多数到会同志鼓掌，对我承认错误的程度表示满意，潘家辰在这个会议上也开始承认错误，但省委认为不满，万涛一言未发。

六、肃反开始

魏士筠[尉士均]回湘鄂西后，谓除与思美谈话外，专看了鄂豫皖肃反的文件，要我们湘鄂西亦要特别注意肃反工作。不久，鄂豫皖肃反材料都到，于是由我起草报告与讨论大纲，开始在党员及群众会议上报告和热烈讨论这一问题，并在俱乐部开了三次晚会，作了“反改组派”、“什么是三民主义”、“列宁主义与马克思”（最末一个报告是我作的）的报告。未隔几天，听说前方部队中反革命大行活动，九师参谋长胡成己、政委戴君实、政治处组织科长李一飞都捉起来了，并说还多得很呢！各县各区以及省委和省的各群众机关都充满了，等省的清党恐怕就没人作工了（这是谭国甫对我说的）。果然，接着监利的朱可廷、沔阳的徐工、江陵的侯文蔚（他们都是县委主干）都被捕。大批在军队中捕起来的都一齐押到瞿家湾（省委、中央分局所在地），省的机关都空出以押犯人。同时，在大批犯人押到瞿家湾前两礼拜，关向应在《红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边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以两面派的庄东晓负教育训练，难道希望她再训练一批两面派的干部吗？”我看了这篇文章后，当即到中央分局找小关。我说，我自己已承认了错误，但不管承认不承认，我自己还需要受党的训练呢，并当即要求调我作下层工作。回省委我又有再三要求（事实上我已不能再负原有工作），将我原有工作，我荐林电岩担负，经省委同意，派我到反帝大同盟任宣传。是时，潘家辰由外县回省（到外县征发粮食），仍在省委。不几天，省各机关的肃反也开始了，各机关内集体办公室内坐着办公的与吃饭的人数与日减少，省苏的秘书长、土地部长、文书科，省委的组织部长、文书科、发行科、互济会、反帝大同盟、工会的工作人员皆相继不见。大家见面时，谈话的内容不外是：“你看谁又不见了，大概是……”。此时确有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景象，但都闷在心里不肯明说：“六·二三”的前两天的夜间，我与潘家辰同时被捕。当晚，我即要求见夏西，被拒。从被捕之夜起，我与潘家辰完全隔绝。我气闷之下，七天七夜一点东西吃不下，遂病，乃送我到洪湖医院养病。临去时，我去政治保卫局见到鲁易、朱勉之、马武（他们系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革命法庭），我向他们提出严重诘问与抗议，“有何事实，使我在苏维埃政权下与反革命受同等待遇。”鲁易紧握我的手并对我说，“并无任何人说你是反革命，不过现在整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当时我又申明，我并没病，拒绝到医院，要求马上问我，但还是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在去医院的船上，我写了一封给中央分局，一封托中央分局转中央转国际的信，交随我去的人带回。信的主要意思是说明我的冤枉，并提出对肃反的几点意思。到医院后，我看到《红旗》上关于潘家辰的供词。供词的主要内容，我还记得是：“我到上海遇到高衡（过去中大的学生），到高衡家里去，他叫我到湘鄂西好好工作。”同时看到他人牵连到潘家辰的供词，说他要组织第四国际，同时在《红旗》上说：

“开始潘家辰狡诈，坚不承认，后才供出”（很明显是用刑后），并关于此案的结论是：潘家辰是陈独秀取消派的首领，是罗章龙派等。关于我，则只字毫无。我马上写了一封血书到中央分局及革命法庭，并写了一封托中央分局转潘家辰。前一封的内容是：潘家辰从上海回湘鄂西，当我问他经过时，他说，中央的人谁也没见到，因为洞庭区是派他回湘鄂西的。等了几天，中央不去人，他就随湘鄂西交通走了。曾会过他的弟弟，他弟弟还到过他所住的旅馆去过，交通也看见过他。关于见到高衡的话，始终未提及。同时我讲到以潘家辰的骄傲（他为人是目空一切的，关于此后面详细说），那肯信服区区一小高衡，恐是由于一时之受刑不过，信口乱供。我要求我亲审潘家辰，假使他真是反革命，一向欺骗于我，我非亲自去枪毙他不可（因为我当时恨极了）。在给潘家辰的信上，主要内容是：“假使你并没有那回事，因受刑不过而胡供，那你不是一个男子汉。假使有那回事而不肯据实供出，那我从此宣布与你永远脱离关系。尽管据实说，我以性命作担保”，最后并骗他说：“如果你毫不隐藏，就是你作了反革命的事情，只要你悔过了，我还与你保持我们原有的关系。”当时我写这信的动机是为了帮助这一问题的解决的真实和容易。医院我不愿久留，遂又回瞿家湾，住在病犯人的前面一间房子里，我天天催着问我[他]，但始终置之不理，直到跑兵落队，竟未问过我一句，我直到现在还在

闷葫芦里。

我虽住在病犯人的前面，但大家的谈话行动都是很随便的。我在那里听到与看到了许多，为不失我的忠实，我必须说出（直到现在对任何人一字未提过）：在那里，同时养病的有主要犯人戴君实（九师政委）、郑大庆

（军委会组织），还有许许多多，姓名记不清，不下四十余人，并且病犯人是流动的，好了的就走，病的再来，因此我看到的人是很多的。开始我看到他们仇恨极了，恨不能每个给他几脚。不断的听到哭声与叹气声，并听到他

们相互的谈话声。有一天戴君实跑到我那里（他浑身是伤）说：“庄同志，你是没要紧的，希望你能照列宁主义的道路来发展中国的党。我是摧残党的，当打得我受不住的时候，指着每县来问我的时候，我那时昏了，就将每县所知道的，江陵的侯蔚文，沔阳的徐工，监利的朱可廷供了”，并且说他还供了谁谁谁，我当时说：“这更证明你的反革命，你不要来对我说，你可到法庭说。”但他说：“我已承认了，说也无用，但愿早死。”后来又听到郑大庆说：“朱勉之怎样给他暗示，叫他供刘鸣先、潘家辰，”并说潘家辰左手已

被打断（郑大庆一只手确是断了），并听到某人是如何供的，某人是如何供

的，又是怎样谁供我，我就供谁的说话，并且供了反正没有活命，何苦受那

多苦刑等等。并听说潘家辰在牢内乱喊乱叫，要刀子把心割出来给法庭看，说话的声音很大，大半是可以听得到的。我当时对这些话总是抱怀疑

的态度，认为是他们的反宣传，同时，我根据这些情形，写了一封信给夏

西、鲁易、朱勉之等，并要他们多采取些苏联对付反革命的方式，如单

靠拷打，对我们肃反工作是有害的。据说当时被捕犯人将及两千，确否不得而知。

知。

七、对中央分局

对中央分局，我认为它是一般的执行了中央与国际路线，直到肃反。

如土地的平分，苏区的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改造，群众工作的建立，特[将]给湘鄂西工作以很大的转变，只有机会主义者及瞎子才会否认这些事实。举例来说，当我、钱瑛、张（？） 、潘家辰初到湘鄂西时，看到以发动春耕运动为中心，到对于分土地的延缓执行。关于此，曾开会专门讨论，夏西总觉得农民已下了种，等秋收后，开始平分才可能。关于此，他们四个人是一致反对夏的意见的。第一天会议上他同意了马上进行，但第二天写决议时又变了，又引起一天的争论。还有军事问题，他们的会议（我不参加）一开总是一天两天，会后还经常发动。水灾期为了解决水灾困难，每次会一晚总开不完，因此有些同志都怕开会。有的说：“夏西又要念经了。”的确，夏的顾忌很周到，但正因为太顾前顾后顾左右了，所以每每遇事不决，或决而重变，但绝不得而且不能拿这些事实来怀疑到中央分局的路线。同时，这一反中央分局斗争之酿成，因一方面是潘家辰的反党企图，万涛的报复主义，而同时是夏西离开中央分局，使湘鄂西整个工作离开中央领导所致。

八、关于潘家辰

我与潘家辰的认识，远在一九二五年于莫斯科。当时因我的一切都幼稚，只觉他还活泼好玩，遂于一九二七年初发生关系。后他随米夫回国，我仍留莫，直到武汉叛变后我才回到汉口。从此时起，我即感到很多地方与潘合不来，时常争吵（当时一起工作的同志都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在一九三年第二次到莫，在列宁学院读书时，潘与我同班，我开始感到他思想的不正确，差不多每个问题无论在课堂讨论或个人讨论时总发生争论，有时力争论问题而真闹起来。同时从一九二七年我回国后，我时时都想与他分开工作，但当时的中央是很会体谅人的，所以始终使我们在一起。在这里我必须说明的，我一向反对“乱爱”主义，我不能朝秦暮楚一种不正确的道德观念支配着我，所以无论我精神上如何痛苦，我总不愿从我方面先提出与他脱离关系，我幻想我能说服他战胜他一切的错误。但人的根性难移，思路难改，有很多问题上，他不是左便是右，我为他不知费了多大力，但我绝不会想到他会走到反革命。开始他对党是不满的，特别是看到中央给他到湘鄂西的介绍信后，每当他发表这种言论时，我总是骂他。当中央分局关于此对他下了决议后，他已闭口不言，至少他再没向我提起。关于他在土地问题上查仓平分等主张，在会议上我是反对的。“租佃政策”对我同样是一个新的问题，无甚把握，因农民出租的要求既是摆在那里，所以我也同意规定。在工会问题上，“劳资仲裁”这简直是潘家辰的胡说，失掉阶级立场的，是国民党的办法。军事问题上，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办法，我是反对的，但他的声明是战略而非真正化零，并且还跟着一句“集中打击”。在经济问题上，或者还有其他问题，我已记不清楚。总之，我批评是批评了他的错误，但我很明白，尤其是现在，我对他的错误是犯了调和及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作用，我当时对他的估计是有走上“单独革命”陈独秀、罗章龙派前途的可能，但绝未想到他会反革命。因关于他反革命的行动，我实在丝毫不知。同时，我申明关于潘家辰，我绝对服从中央和国际的路

线。

这里，我还要补说一点的就是到湘鄂西后，我的工作很少与他发生直接关系，我除了短期的到潜江和到汉川出过一次席的会议外，始终未离省委，而他是经常在各县跑的，有时回省也多半参加省苏的会议。至于他在洞庭的那个期间，我们音信不通，至洞庭失守，我还以为他已经牺牲，谁知道其绕道从上海转回湘鄂西。因此，关于他的错误或者多得多，但我无从而知，除非是经同志提出后，这同时说明，我们的关系当时是不密切的。

九、我个人本身

我从一九二四年参加工作以来，未受过党的任何处罚，年来所犯的错误，主要还是对他人（比如跟爱人）的调和。对这一错误，我自信已受到很深而且很苦的教训，使我再不敢尝试。这里我要郑重声明，我参加革命，投入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客观环境的促使，是主观的自觉，既不是混饭吃，也不是讲恋爱，凡是于我的动机目的有碍的，我决以绝大的力量铲除与避免。我相信特别在我这一年多的流离饥寒的过程中，已多少锻炼和证明了我自己，我始终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拥护中央和国际的路线，与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及一切反革命作坚决生死的斗争。

最后，对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省苏无故对我施行逮捕，并捕后置之不理，一言不问，使我在苏维埃政权下遭受反革命的待遇，这是我政治生命上的绝大污点。固然，在革命过程中，冤枉几个同志，是不可避免的事，但能避免的还是要弄清楚，希望中央给我以最后而圆满的解决。

此致布礼！

庄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再：1.在这个报告中，还有很多遗漏与忘记，如有问题，认为还不够或需要更清楚，可提出，由我口头答复或补写。2.关于湘鄂西党内斗争，特别是肃反，我对任何同志（除来上海后同小黎同志说了些）都未提过，因为反革命正在利用这些来污蔑我们，同时在党员群众中也会发生不良影响。3.希望将这一报告转达国际。注释 夏西即夏曦，下同。

原文如此。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肃区总结与清党的决议的报告大纲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

一、湘鄂西反革命的整个系统及其阶级基础

(一) 反革命的大联合——改组派造成了清一色的系统

1. 改组派——周逸群、万涛为首领
2. 第三党——胡慎己、唐赤英为首领
3. 托派——刘鸣先、潘家辰为首领均加入改组派、并且又用新共
4. 陈独秀派——侯蔚文为首领共产党的名义活动
5. 秋白主义者——李剑如
6. 罗章龙派——张昆弟、王进之
7. A、B团分子——零星的发现

(二) 改组派占据了党、苏维埃、青年团、工会以及红军的政治军事机关，最大多数的干部是改组派。

(三) 反革命分子的阶级成分，最大多数是地主富农，隐藏在苏维埃运动内部来使苏维埃运动失败。所以改组派与苏维埃的斗争，实际是地主富农与工人、贫农、中农的阶级斗争。

二、改组派与共产党斗争的过程

1. 企图推翻共产党的正确领导，1929、1930年反总指挥的斗争，1931、1932年反中央分局反军部的斗争。

2. 斗争的过程中，表示出两个政治路线的对立，一个是巩固发展苏维埃运动的共产党的路线；一个是破坏和断送湘鄂西苏区的改组派路线。

3. 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常常成为反革命有力的助手，而且个别的领导者，有时被改组派利用，来离开、分裂党的领导，例如邓中夏执行立三路线的结果，大大的掩护了反革命派别的活动，并且还和贺龙同志作斗争。

4. 因为中央分局正确的国际路线的领导与工农群众的力量，使代表地主富农的改组派终于失败。

三、改组派的主要阴谋与肃反的主要任务

1. 改组派第一个主要阴谋，是破坏共产党的组织，企图把共产党组织腐化为国民党，因之湘鄂西苏区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旧的基础之上，改造队伍是无用的，因此，中央分局决议必须解散湘鄂西及红三军中党的组织，党团员重新登记，为重新建设布尔什维克党而斗争，大大的征求新党员，被欺骗被压迫加入改组派之分子，只要公开自首，也可以不开除党籍。

2. 改组派第二个主要阴谋，是企图变苏维埃政权为国民党官僚政权，因之中央分局宣布过去改组派把持的苏维埃政府，不是真正的苏维埃政权，应该建立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为重新建设苏维埃政权实现苏维埃一切法令而斗争。

3. 改组派的第三个主要阴谋，是企图把红军变成国民党军阀式的军队，虽然经过军部的斗争，可是军阀制度残余的和国民党工作方式残余还没有肃清，因之红三军在政治上还没有完全巩固，国民党式的政治工作方式残余，是军阀制度残余的有力的助手，因此要在红三军中为巩固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而斗争，肃清军阀制度残余与国民党政治工作方式残余建立起新的政治系统和共产党的组织，是具体的任务。

4.改组派的第四个主要阴谋，是使红军苏维埃运动脱离根据地丧失根据地，周逸群、万涛、唐赤英、王一鸣之断送洪湖襄北，尉士均之断送鄂北，段德昌、覃苏之荆门失败，韩振鹏之断送荆当，周小康、王炳南之断送湘鄂边，助成贺炳南、贺沛卿之公开叛变，最后则段德昌提出“立刻回洪湖去”的口号来反对中央分局恢复湘鄂边苏区准备恢复洪湖的正确路线。实际上是破坏恢复，洪湖苏区的准备工作，我们应该加紧为创造湘鄂边苏区而斗争造成恢复洪湖苏区的基础。

5.改组派第五个主要阴谋，是私通敌军，玩弄军事失败的阴谋，企图组织反革命的暴动，例如周逸群去与何应钦、蒋介石勾结。万涛在苏区是反革命高等的坐探。王一鸣、唐赤英之后方失败。段德昌在万里镇谎报敌情，覃苏暗降川军。改组派准备在三二年八月间实行反革命的暴动。天汉准备5月间暴动。王一鸣、唐赤英准备在襄北叛变。段德昌准备把九师带走，脱离军部，准备叛变，最后在刘家司准备暴动。

四、肃反的正确与个别严重错误

中央分局与改组派坚决斗争的路线是正确的。可是不能掩盖曾经发生的以下几个错误。这些错误，主要的是对于反革命的警觉性的不够，群众教育工作的不充分和对于“左”倾的错误，没有坚决纠正。例如：

1.粉碎改组派的上层组织，还表现了个别的迟缓，如对王一鸣、段德昌、唐赤英、覃苏。同时，却很少用教育的方法去夺取改组派下层群众来孤立反革命的领袖，反而在逮捕刑事方面，有许多“左”倾幼稚的错误（如个别的发生下列现象，没有详细从工作上考查而逮捕，滥用刑罚，一部分处决没有宣布或是过当的），助长了恐怖情绪。客观上可以帮助了反革命的活动和团结。

2.在政治上揭露改组派整个反革命阴谋不够，对于判决之改组派没有书面宣布其罪状，因此有拿刑事的法律的方法代替同反革命派别思想斗争的倾向。

3.肃反没有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甚至干部也不敢发表意见，因之有命令代替了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与群众运动方式的倾向。

4.在肃反过程中，没有在群众中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和少用说服的方法去作耐烦的解释工作，教育工作来向一般政治的军事的错误斗争，因之，相反的发生把一切错误都认为是改组派阴谋的情绪，因之有肃反代替一切反机会主义斗争与一切军纪、风纪的倾向。

五、目前肃反工作的方针

中央分局指出过去肃反中的政治错误，并且要在坚决纠正这些错误之中加紧向改组派的进攻。目前的方针如下：

1.动员一切力量为创造湘鄂边苏区而斗争，为改造红军而斗争，在工作的过程中，加紧与一切改组派的传统习惯作斗争，反对国民党思想的残余，反对苏维埃中的官僚主义，反对红军中军阀制度残余和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方式，反对做坏阶级纪律，反对故意不顾及伤病兵，故意虐待战士，反对军事上玩弄失败的阴谋（如谎报敌情发妖风。不上火线，破坏军器，勾结敌人等）。

2.清洗党员、团员、苏维埃工作人员。清洗红军成分，彻底揭露反革命下层的组织。

3.用阶级的教育方法，夺取受欺骗被压迫加入改组派之分子，回到革命方面来。

4.组织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关于逮捕审讯判决处决，按照阶级的惩罚原则和苏维埃法律处理，并且经过法定的负责宣布。

5.吸收广大群众参加一切工作及与改组派一切斗争的活动，教育群众，使群众团结在党的路线的周围。

6.在实际工作中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充分的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发动群众的政治的社会的活动，尽量用教育的方法纠正错误，并且严格的把普通的错误与反革命的活动分开。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

夏曦、贺龙、关向应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

中央。

一、在 1933 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恢复和发展了湘鄂边（包括鹤峰、宣恩、建始、施南、桑植五县之一部分）苏区，可是因为第三次、第四次红军的肃反，使得在敌人进攻时不能固守苏区遭受破坏，又以主力游击剑川、咸丰、来凤、黔江、大大扩大了政治影响。吸收了千余人参加红军。可是还不能从组织上巩固起来，才开始组织农民游击战争。

二、我们依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与红三军的力量与政治影响，坚决执行组织群众、创造湘鄂黔苏区的路线，因为主观力量一时不能击破“围剿”，采取游击战术，相机打击敌人，游击范围是川边西、秀黔彭、鄂西施、鹤之东。湘西永、庸、龙、桑、慈、石等县附近。

三、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经过四次肃反，前后逮捕三千多人，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因是决定解散党和青年团的下级组织，举行清党清团重新重记。现在只有红军只有党和团的组织。

四、湘鄂西改组派主要来源为改组派、第三党、国民党、托派四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留苏回国学生来此之最大部分暴露出参加改派、托派，尤以步兵学校学生几无例外。举例如刘鸣先、唐赤英、李剑如、潘家辰等，最可恨者是宋盘铭、陈培英[荫]两人，宋因犯种种政治上严重错误，以及确实证据，决定逮捕，他有亲笔供与在群众审叛中自述，他在水灾以后动摇而加入改派，在上海复与两托派接头（注一），当一九三二年代表湘鄂西到中央时他已入改组派，在第四次肃反中他是改派军委书记，因为他是党的领导者之一，又是红军师政委，而领导反革命活动，所以判处死刑，已经枪毙。陈培英[荫]据宋供他历来是改派，他在过去政治斗争中，他完全与改派一致，后来，他在鹤峰竟跑到敌军中去了。

五、肃反中得到过去湖南省委之田子厚口供，现在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在湖南省委时为改派，言之确凿。段德昌供，听说旷[邝]继勋是改派，旷在湘鄂西时政治上是与改派一致的。唐赤英供刘伯承政治上不坚定，但未确指其与改派有关。唐赤英又供他是在上海时由中央和运处一个王文清介绍人改派，又湘鄂赣省委宣传部长龙秀寅是改派，又据人说，孔荷宠处有一个人经常来往长沙形踪可疑，听说孔部肃反亦多，故提出，请注意。

六、湘鄂西肃反最严重的教训，完全指示出苏维埃运动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严重性和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团体之危险，尤其是留苏回国学生一部之叛变，值得注意，请中央特别提高党中对反革命团体之警觉心，尤其是中央苏区之广大而繁杂的环境。

七、据传闻柳克明潘家辰现逃上海，请中央查有无其事。

八、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二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九、现在我们三人仍以中央分局领导一切工作，分工如前，同住军部，

又组织一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为此游击区域之苏维埃领导机关,以西[曦]为革委会主席。十、要求中央派一代表来审查和指示此间工作,因为一时不能作书面详细报告,我们又不能抽人来中央讨论。

此致布礼

夏西[曦]贺龙关向应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附注:

宋盘铭在上海找周志华、朱宝山,朱宝山在沪东与改组派有关,周志华与改组派有关是朱宝山说的。周志华通讯处:蚌北明显纱厂交魏鹏生收,这是宋与周约的,周、朱二人入与沪东党内一个麻子及一个女子(莫斯科回来的)相好。

此报告并请转少共中央。

湘鄂西少共省委负责人完全是改派,如温荣清、周美童、张学良等。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

(一) 因为红三军根据党的发动群众、创造新苏区的路线，几次游击鄂川边区几县(如宣恩、利川、咸丰、黔江一带)，使得这个地域的农民群众在共产党土地革命口号之下，积极的参加红军。现在又组织了鄂川边独立团，开展了游击战争。斗争发展形式的过程已经由神兵斗争的形式走到参加红军的形式；由参加红军，企图依赖外来红军力量得到解放，过渡到自己组织红军来作武装斗争，已经表现群众的革命化，开始走到苏维埃运动的道路。证明党的发动新的区域的群众，创造新苏区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二) 可是这一斗争，在目前就包含着严重的弱点，这种弱点：

1. 首先就表现在成分的复杂，包括着地主、富农的成分和影响，因此就使运动的本身缺乏明显的无产阶级的路线与领导作用，缺乏明显的土地革命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治纲领。

2. 就是运动本身还缺乏充分动员群众的力量。现在的独立团，并不是经过广大群众的抗税、抗租、分粮、反地主阶级、反国民党政府的群众斗争生长出来的，而是由于红军号召把所有倾向革命的群众都组织在红军里面，企图用扩大红军和取得军事胜利的方法来创造苏区，不是依据发动群众斗争来组织暴动的路线，而是带着军事投机的倾向。

3. 军队的本身还缺乏严密的组织，没有自下而上选举出来的代表会议和革命委员会来建立领导机关，来巩固领导与群众的联系。因此，运动的本身，仅仅表现在几个领袖分子组织了一个独立团来作武装斗争，缺乏明显的阶级路线与政治纲领，缺乏充分的群众的动员，缺乏严密的组织。这些弱点就掩盖着一个主要的危险，就是运动的内部包括着中小地主、富农改良主义的影响。这些影响，就是反革命派别第三党、社会民主党在苏维埃内部的基础，党如果不能使农民运动脱离地主、富农的影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工农联合，其结果必使革命化的农民运动为改良主义所涣散，引导运动走向妥协和失败的道路。这就是历来神兵失败的根源，也即是洪湖失败的教训。

(三) 因此，党的任务就在于以党的发动群众斗争来组织农民暴动、扩大游击战争的路线来代替单拖[纯]游击队的军事投机倾向的路线。首先就在肃清地主、富农的影响，提高农民群众的这一斗争到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政权的农民暴动，并且要扩大到鄂川边区几县利川、石柱[碚]、黔江、咸丰、宣恩的周围。因此，就要提要[出]极其明确的政治的斗争纲领，例如：取消租课，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平均分配给雇、贫、中农和兵士。反抗一切苛捐杂税。没收地主、富豪粮食分配给没有饭吃的穷人。取消一切高利借贷。增加工人工资。取消保卫团，夺取地主武装，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和红军。逮捕和杀戮土豪劣绅。优待红军家属和保卫伤病战士。推翻国民党政党[府]，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反抗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党要将这些基本的政治纲领提到工农贫民群众中去讨论，讨论出实行的方法来组织群众的斗争。党不仅仅是要依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去组织群众的斗争，按照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与具体的政治军事条件来规定斗争的实际策略。党的责任，就在于将部分的斗争与土地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联系着，提高群众的觉悟，加紧群众的组织，提高斗争到最高的限度。在斗争开展的区域，就要立刻组织没收地主

土地、夺取政权斗争的农民暴动；在斗争还未开展的区域，就要立刻组织反抗鸦片捐和分粮吃大户的春荒斗争，以开展到土地革命。

（四）为了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和使运动有统一的指挥，要由党发起组织利、咸、宣、黔、石几县的一个临时工农兵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规定出当前的任务和斗争的行动纲领。规定出武装斗争的任务。

选举出革命委员会来做领导机关。规定出农民委员会和赤卫队、游击队的组织方法。规定出一优待红军家属和保护伤病战士的办法。在这个会议中，要分析过去神兵斗争的教训，给以正确的批评，特别要揭露地主、富农在农民斗争中改良主义的影响。

在这一代表大会中，要规定工作发展的新区域和组织干部到新区域工作。

（五）党应该把组织群众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中心任务的一个，把革命的雇工、苦力、贫农、中农组织在雇农工会和农民代表会议与农民委员会之中，同时组织各种斗争委员会，如反抗鸦片税委员会、分粮委员会等。这种斗争委员会在斗争发展的过程中，应该转变为革命委员会或农民委员会，特别要在斗争之中组织共产党的支部，成为群众斗争的核心。

（六）在组织农民斗争之中，应该有极其明确的阶级路线，组织乡村的无产阶级（雇农、苦力），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形成极巩固的工农联合。提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对立的口号，同时反对富农，指出富农是乡村中的剥削者，同地主阶级站在一方面的。对于地主、富农是不容许他们混入到农民委员会和工农里边的，绝对不应该企图依附或拉拢一部分地主、豪绅，把他们地拉提高，或是依靠他们去组织群众。

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初期，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企图混入革命运动，夺取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地主、富农阶级的利益，限制运动的发展，一到斗争深入的时候，这种分子必然走到背叛群众，与统治阶级妥协。所以这种分子就是改良主义、反革命派别在苏维埃运动中的基础，这是农民革命当前的主要危险。根据洪湖失败的教训，党应该更警党的肃清这些成分和加紧与地主、富农的影响作斗争。

可是也有个别的出身于地主、富农阶级的分子，过去和现在曾经参加过农民斗争，对群众有很好的影响，他们愿意来参加苏维埃运动，接受苏维埃政纲，我们亦不应当拒绝与之合作。但是，这种合作是为了吸引他们影响下之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因此，首先就要使群众脱离他们的影响，所以这种合作是有条件的。不能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和限制群众运动的发展，我们应该加紧在他下层群众中扩大土地革命的影响，使这种合作转变为下层的阶级的统一战线。我们站在群众的利益上面，站在革命斗争发展的利益上面，对于他们的妥协倾向，采取独立的批评的态度，因而最主要的要将共产党的主张、苏维埃的宪法与一切改良主义的口号的不同，与一切旧的农民斗争的组织（如联英神坛）的根本错误尖锐的对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脱离地主、资产阶级的影响。应该注意在斗争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分子的动摇，号召群众反对他们的动摇。党只有坚持这种阶级的策略路线，才可以保障对于农民运动无产阶级的领导。

（七）省对于农民斗争中的领导：应该随时注意到巩固工农的联合。一方面提高农民的觉悟，主要的是团结农民在土地革命口号的周围，另一方面要顾及农民种种落后守旧的心理，绝不是威力可以压制的，而是用教育的方

法。并且不应该妨碍贫农、中农的经济利益，对于他们的迷信神权，我们不应该提倡，但亦不应采取非难轻蔑的态度。

只要有农民群众的地方，都应当去设法打进工作，去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即令这种组织带着守旧的反动的色彩，如联英会、八德会、八仙会、神兵等。我们工作的原则是使群众的革命化和开展他们的实际斗争，在斗争之中去促进他们内部阶级的分化，将那些妥协的地主、富农领袖驱逐出去。可是这种工作的结果，只有充分的群众的工作方式才可得到，决不是命令主义可以达到的。

但是党决不应该赞助他们去扩大农民的这些旧的组织，而应该以革命的农民委员会去代替这些旧的组织。

在农村里，还有流氓无产阶级，形成土匪、××的主要成分。他们每每在一部分地主、富农领导之下，我们对于流氓无产阶级的态度，就在以土地革命的口号去使他们革命化，吸引他们参加苏维埃运动。但是，首先要使他们脱离地主、富农的影响；第二，我们应该明了流氓的阶级的不固定性，决不能依靠这种成分作为革命的主力；第三，应该用教育和革命的纪律去克服他们“抢掠”的习惯。

（八）斗争的发展已经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并且敌人的“围剿”，地主豪绅对农民斗争的压迫，将因斗争的深入而剧烈起来。因此，党要加紧的组织武装斗争，并且要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武装斗争。

组织群众武装斗争的主要方式不是将群众通通都组织在独立团里边，而是要普遍的组织赤卫队、游击队。

党绝对不应该轻视地主阶级在乡村里面的力量（如团防、家丁），这是农民斗争直接的敌人，首先就要设法解除地主阶级的武装，武装工农自

对于杂色的队伍，他们大都压迫农民群众和勒派苛捐杂税，而且随时有与统治（阶级）勾结进攻农民斗争之可能，红军和游击队应该以解除他们的武装为原则。如果这种队伍尚在坚决的与统治阶级的军队对抗，而且他能吸引一部分群众，以及因为军事上的某种条件和群众斗争的没有深入的条件之下，我们亦可以与他们订立临时的军事合作。要使这种合作有利于革命的斗争，这只有推动这种队伍的下层群众的革命化，才是唯一的保证。

（九）鄂川边区红军独立团，应该使他能成为帮助发动群众斗争的力量。应该号召他里面的战士去做当地组织群众的工作，担当发动群众斗争的任务，经过相当训练，派遣他们回去或利用他们请假回去工作。再则游击所到的地方，应使战士派代表去参加农民的会议，使他们与工农群众的斗争发生密切的联系。

要达到这种任务，首先就在以共产党革命的政治纲领使联英会、八仙会、神兵的群众充分革命化，并且建立共产党的支部。同时，要在斗争之中去改善自己的成分，特别是干部的成分，只有群众的革命化和组织[上]政治上巩固的红色干部，才可保证独立团政治上的巩固。

独立团的任务，今天还不是依仗他去消灭强大的敌人，而是在帮助赤卫队去解除地主的武装和领导发展附近的小的游击队与赤卫队。

（十）中央分局决定组织一鄂川边区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一决议应用到实际上去，使它成为革命的实际行动。

边区最主要工作中最主要一个就是要在农民委员会、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中去组织共产党的支部，吸引斗争中最坚决激进的分子入党，使党的

组织成为斗争中的骨干，形成运动中的骨干。同时，在农民委员会中、游击队中、独立团中，要注意干部的选择和培植。

边区要按照斗争的发展，组织几个中心区的工作，如小河、狮子坝、长屋间、牛滚垱、活龙坪等地。

边区在组织上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要建立秘密的交通网。

组织和工作方式要善于运用公开的与“秘密”的联系，工作委员会本身亦要秘密（名义要公开），只有革命委员会和独立团公开的号召。

边委要注意宣传和煽动的工作，如短的传单、标语，群众大会召集等方式。

在党的组织和农民委员会组织要运用民主集中的制度，一切问题要经过群众详细的讨论，使他们自动的自觉的去干。

注释

此年代为编者判定。

谷佑箴给中央的报告——关于湘鄂西苏区党务工作与肃反问题以及红军
游击情形*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关于贺兄之行动前已略言，兹再作较详细的报告如下：

一、关于党务：肃清改组派，改组派是主张二五收租的反革命派，他们的组织很严厉，虽经几次清党，就是把他们破获了，用什么酷刑来拷问，他们总是不认，就是认，也不便他们的领袖和稍具有政治思想的同志说出来，过了几时，继续的又组织起来，不断的作破坏的反革命工作，是那样呢，他们烧杀淫护[掠]，比土匪帮[绑]肉票的更甚。有时更作故意的反抗。所以，加兄、门兄、日兄三人，不得已，只好不客气的查获一个杀一个。现在还有数十人在考察中，未查出者尚多。因上述的关系，党的组织当然是不健全的，但是加兄等三人对于此事，随时注意，可是现在和将来没有以前的那样大的危险性吧。

二、最近游击和敌方的情形。最近游击区是：湖南是桑植、大庸、慈利、永顺、龙山；湖北是鹤峰、恩施、来凤、宣恩、咸丰；四川是利川、潜江至万县界。遇大敌避、小敌战，遇大敌避是作战必有伤亡，伤亡者无安稳地处置和医治他们的关系。敌方的情形是这样：敌军能作战的除湖南周曼卿旅、湖北张刚保安司令而外，其他如龚仁杰旅、朱疤儿教团、思新吾保安团及上述各县保安团，多不中用（约五千人）。但是周旅现亦避加兄之锋，并有与加兄妥协之传言，张刚已力加兄挫锐，虽云进剿和追击，都是敷衍上令，其实不有这样一会事，龚旅……与加兄屡战屡败，每战一次，发出电文，反败为胜，效贾思道的故技，真是可笑煞人啊！

现在参加者，惟大庸最多，当我来的前十日，参加者将千人，是以抗捐名义号召的，以后参加的更多，因为各县人民都是苦干纳捐，因纳捐以至于破产的多。

谷佑箴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远 关于湘鄂西苏区一般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我这回由湖南返申，你们就不要我作报告，我也应该把里面的情形告诉你们，因为技术上的关系，现在才开始作这一工作，真是迟缓极了。关于里面的，除了贺兄们写来的报告外，谷兄又写了一个，我只有补充一点。

贺兄的游击区，有湖南、湖北、四川，虽然不是整个的，可是他的力量是很可以达到。为了政治工作上的缺乏，组织不完善、不普遍，因而党在里面隔绝起来，这是很大的缺点。我走过的游击区约有千余里，沿途壁上的标语、传单是粘写满了，因为一般劳苦大众他们识字的大少（可说是一点常识没有），这样的宣传还是不够，我们要用很多的方法去宣传和组织，使这一地段的劳苦大众都齐到我们党的领导下来，我们的敌人才能很快的消灭，我们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才能得到解放。现在贺兄是不停的在游动，他只有设法去击破小的敌人，避免大的敌人，想稍缓建立苏区，每天开拔时，除了沿途写些标语而外，余外的政治工作就没有人和时间去作了。贺兄处的劳苦大众，人数有一万以内（八、九千，有枪多人少之患）。他们英勇的能力，真是较<白>军队百倍。他们经常每天要行百余里（特别时还要增加）。白军每天最长只能行六、七十里，因为里面的路长故也（红军退却一日，白军要追三天才到）。由此可见，在游击区内，是没有保甲、团防、县知事、富人，因红军过去所到的地方，保甲捉来问罪，团防首领枪杀，县知事治理，富人则当时没收其财产，过后还要家里办钱来取，我们的敌人可说已十去八、九。在湖南、湖北的白军，他们虽取联合进攻，可是力量有限（全数只有红军三分之二），经常只有一、二千人同红军追击（津市以下的白军未计），只有敷衍式的在红军后面追追而已。在一般老百姓有歌云：“白军是条牛、认[任]凭红军牵起游”，可见白军真是无多大能力也。据我知道他们双方（在三个月以内）的作战胜负，处处都是红军胜利，白军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的广大劳苦大众之中，我们的党若能够加紧去执行领导的任务，不独是当地的群众得到光明的途径，即全世界的劳苦大众亦得有很大的帮助。

还有，就是白军所到的地方，对于老百姓（要拉夫）他们真是坏极了，不管是吃得的，穿得的，值得一、二角钱的东西，他们都拿起去了。甚或奸淫、掳抢、杀害的事时有所闻（我亲自见到的亦有），长官亦毫不理会。他们的旅长以上，只有想抽捐收税，向着劳苦大众剥削，弄得一般老百姓都在叫骂。红军所过的地方，对于劳苦大众真好（不拉夫），住了百姓的房子，走了都要打扫干净，吃了老百姓的东西，照价给钱（甚有多把些钱的）。打土豪的东西有余时，还送给一般劳苦大众，所以一般群众无一不说红军好。他们对红军是不怕，他只怕红军走了，白军来时又要打抢他们。这是我们红军的一种好处，亦可说是资产阶级倒台，无产阶级起来的一种现象。

远上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注释

似为黄振远。

远 关于湘鄂西苏区敌军和我军情况及红军中政治工作缺点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敌人的力量及驻防何处：由万县到利川仅三百二十里，四川与湖北交界处（系正心场与磨刀溪之间，仅离利川一百里少），在这一地带内，一个川军没有，利川城内只驻兵一团（三营人为一团），经红军（前次）提枪追走后（提了二百多支枪），现在仅有二营人了。我过去到利川时，所晓得他的，部队——分住南坪两连，汪家营不知多少，利川城内两连，红厂勾一连（尚不足），余外驻有团队三十余人，由红厂勾起（利川到红厂勾六十里）到毛坝（由红到毛六十里）一带都是我们的游击区，没有军队、团防、保甲存在。毛坝住有游击队五十余人（尽是老同志，原来作战时带伤与害病的，现在已好起来了），民间尚有小组织（约数十人），都是过去新参加过红军（仅一、二月，吃大烟的，不能耐劳苦的），他们大多由红军中逃跑出来。他们告诉我，红军每天要走一、二百里路，我们实在拖不得，我问他们，你当过红军，你知道红军的主义与你们本身的关系如何？他们都一点也不晓得，他们重要的是为生活无法，才去当红军，可是到了红军里面，又未得着机会来训练他们，所以他们以吃大烟、不能耐劳，竟多数跑起回来了。这是我们党在群众中失掉领导他们的好机会。毛坝横过去四十里石圆坝，有一欧参谋长（过去参加红军）有枪十余支。毛坝至黑洞仅三十里，有度老先生处，人枪虽有数十，均未执行游击任务。由黑洞至荷南坪一百八十里路的地方，有一游击独立团，并有两个很坚固的石洞（前回川军来围了几日，打死了他几人，他就开起跑了），每一洞内有人枪十余。贺兄前放存伤病的老同志共有六、七十人，现均大部分好起来了，有些都去参加独立团工作，独立团现有人数一百余人，都是现在新成立起来的，他们勇往迈进的精神还不错。每天都到附近去打土豪劣绅，势力只有日渐增大的。由荷至咸丰一百八十里（至黔江亦只有一百五十里），咸丰城里，县知事都不敢来，找了一个科长代理，仅有团防三、四十人。咸丰至来凤一百余里，有保安团一团人长住，听说李家河有保安团一团人住着。来凤过去，即是湖南的地界了。湖南的白军，谷兄已说得很详，不再重说。贺兄现在正在这些地面进行游击任务。

远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注释

似为黄振远。

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信
(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

中央分局诸同志：

由于交通的断绝，使我们在这一长时期内，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无从了解你们的情形，不能给你们以具体的及时的指示，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无疑的是一极大的损失。去年六月间虽有你们的代表王得标来，但你们并无详细的书面报告，而他的口头报告又是极一般的，而且许多重要问题他完全不清楚，当时我们曾写了一指示信交他带回，但这信似乎你们并未收到。此后我们用很大的力量，多方设法去找你们，直到今天使我们才有这可能来写这一指示。但你们这次仍没有给我们详细的报告和充分材料，依然只是一个极简单的而且专门关于肃反的短信，使我们仍然不能详细的具体的了解你们的情形，因此关于许多问题及军事的发展方向和计划等，我们还不能给你们以具体指示和建议。现在我们将不久才开过的国际十三次全会，党五中全会，苏二大会的重要文件送给你们。这便是你们目前工作的指南，望开展详细的讨论，按照你们具体的环境规定你们的具体工作和任务，以这些宝贵的决议和文件作基础来彻底的坚决的转变你们二切工作。在这封信里，我们只打算关于肃反问题给你们以批评和指示：

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反革命无疑的要用一切力量进行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的苏区和红军，因此对真正反革命的镇压是极端需要的。但是你们在肃反中犯了不可容许的严重的错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代替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这主要的表现在：

(一)除了你们自己少数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解散了所有的地方党部与团部，而将反革命的力量反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至使你们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中生活着，这种恐怖遂造成了你们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实际上你们是作了反革命挑拨离间的俘虏，取消了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这是极大的罪恶！而且你们这样的肃反如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走到你们自己少数人也相互怀疑，猜忌与不信任的结果。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极少数；不过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政治工作和党的警惕性，使这少数反革命分子能在紧急和困难的时候影响我们队伍中的动摇和恐惧分子，取得他们的声援而支配广大的部分。但这正因为我们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不充分，如果我们能够有系统的作反改组派的斗争，在群众中彻底揭露他们的阴谋和罪恶，及时肃清这些分子出领导机关，开除动摇分子的要职，说服被反革命分子与动摇分子所欺骗的群众，使他们相信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么改组派便不会有这样大的影响，给我们这样大的危害。照你们那样的估计，不但在党的路线上和对群众方面要发生严重的错误，而且使人不能正确的了解湘鄂西失败的原因，同时会把在这个期间所犯的各种最主要的错误掩盖起来。

(二)由于你们不相信群众，所以你们取消了一切群众团体，取消了发动广大群众组织与武装他们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工作，正因为这样，所以你们也就不能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参加红军，及不能将已吸收来的“从组织上巩固起来”，而形成枪多于人的怪现象。你们因专门肃反而放弃了日常党的群众工作，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冲破敌人“围剿”的工作，你们是

脱离群众的！这也就说明了你们为什么不能击破敌人的“围剿”及固守新创造的苏区的主要原因！而最不能容恕的是“要宣布省苏维埃政府的罪恶”（你们去年的来信），这样你们不是反对钻入苏维埃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而简直是攻击与污辱苏维埃制度，破坏苏维埃的威信！这是何等的错误与罪恶啊！这完全由于你们过分估计反革命派的力量，由于失败情绪的反映！

（三）由于你们不正确的估计（认党苏干部十分之九是改组派），竟武断的解散了一切党和团的组织，无理由的怀疑与不信任一切党员和团员群众，举行重新登记，而且定出极端关门主义的入党条例：“过去的统统不要，要重新登记，并须有二、三个好的干部介绍才能成为党员”及不正确的提拔干部的手续“经过保卫局”（去年王得标的报告）。这实际上你们拒绝了到处建立我们党的基础与繁殖我们党的工作，而陷入目前无党的状态，这不但不能保证党的改造，而且是破坏我们党的威信，使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成为不可能！这正使反革命派别达到了他们破坏党的目的，这是莫大的错误！

（四）正是由于你们不相信群众，不相信自己的同志，在反革命活动前面表示狼狈，恐怖，而陷于盲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不能自拔，因此造成你们现在没有任何决心与信心，来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而到处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过着游击的生活，虽是你们目前有着极端顺利的环境，特别是川东和湘西！所有这些都是一分钟不能再继续容忍的现象，如再不坚决纠正和克服这种现象，那么对于苏维埃的发展和巩固有莫大的威吓！

我们严厉的指斥这些现象，并不是把湘鄂川边的情形看作没有希望，而使我们消极悲观，绝对不是的！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消极不悲观，在任何困难情形下都相信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劳苦群众会得到胜利，都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以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性，坚决性和胜利的信心来克服一切的困难和障碍，无情的打击一切失败的悲观失望情绪。你们在这几年的血战中，曾给了敌人不少的打击，获得了不少的胜利，燃烧起川湘黔鄂四省边地的革命烽火，呼应着红四军在川陕苏区的伟大胜利，使西北边陲的反动统治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你们在这转战千里的环境中仍然能够保持红军的骨干部队，和与反革命进行了斗争。你们的全部战绩及从战绩中所得到的宝贵的经验，红军战士的英勇与获得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以及党的领导与同志们的坚苦工作，这一切都是你们取得进一步伟大胜利的主观条件，何况现在湘鄂川边又有着顺利的形势，有一切可能来争取我们的胜利。虽然你们现在的游击区是处在偏僻之地，我们的力量亦比从前削弱了，但是“世界革命危机已成熟到紧紧逼近到革命与战争的新周期，中国苏维埃革命已成了世界革命最重要的因素”（国际十三次全会），各地红军的英勇战斗已经取得了冲破五次“围剿”第一步的胜利！以及你们占有数十县的广大游击区，并不算少的武装力量，广大群众的拥护与依靠，所在区域敌人力量的薄弱，尤其是邻近你们的红四军的胜利，川北苏区的发展，和四川省委正在恢复和开展川东的工作，这对于你们向川东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有这些都是给你们向前发展与争取更大胜利的顺利条件，你们是大有可为的，党和全国广大的劳苦群众及国际无产阶级都在关怀着你们的发展和胜利！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客观的顺利条件，坚决的采取与实行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路线与策略，动员最广大的群众为革命事业而斗争，现在正是你们扩大与加强你们的力量，坚决创造湘鄂川苏维埃根据地最好的时机。

根据上面的情形，我们认为你们必须立即执行如下的迫切任务！

(一) 坚决纠正你们错误的肃反路线，立刻恢复党内的经常状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的和团的组织，吸收广大的劳苦群众的积极分子，特别是雇农贫农和手艺人到党内和团内来，立即抛弃你们那种关门主义的入党条例。坚决的最无情的打击一切不相信自己的党员，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拒绝建立党的基础，繁殖党的工作的一切倾向与任何企图。要坚决的执行面向群众，党要大胆的坚决的向群众开门，密切并加强党和群众的连系与领导，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启发和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消灭由于你们那种错误的肃反而造成的党员群众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开展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党内自我批评，要用一切力量和方法建立经常的党的生活，开办党的训练班和党校，训练出成批真正能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为党的正确路线而坚决斗争到底的干部，以他们为骨干来开展和巩固党的工作。大胆的勇敢的提拔先进的积极的工人，雇农和贫农分子，在革命斗争过程中考查过的新干部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坚决改善党的成分，肃清阶级异己分子，加强对党员群众的教育，提高党员群众的政治理论水平。建立党的组织和工作，是开展一切工作（当然肃反在内）的基本前提，没有党的组织则一切工作的进行将成为不可能！而解散了所有党和团的组织，直等于解除自己的武装，使群众失去了领导，正给了反革命的活动以更大的可能与顺利的条件，这也就说明了你们所以接连的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不断的大肃反的原因！为了适应你们目前游击的环境，关于党的组织，我们建议必须有列四种不同的形

式：

1. 在游击区四周的白区，这里党的组织必须是完全秘密的，在你们中央分局下必须成立白区工作部或指定专人负责指导白区党的组织和工作，这对于扩大游击区域，开展游击运动，是必要的前提。

2. 在比较不巩固的游击区内，这里党的组织可采取半公开的形式存在，但基本的领导干部则必须秘密起来，并尽可能的帮助他们发展地方武装，以便在我们游击队离开该区域后，不致受到敌人的摧残，仍可继续进行领导工作。

3. 在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内，党的组织可采取公开形式的存在，但必须准备着能马上转入完全秘密状态。

4. 在红军中的党的组织，当然可完全公开的存在，但必须百倍的加强和巩固红军中党的组织和工作，使党的组织在红军中成为领导的骨干，保证党的路线的执行，红军中的党必须与当地的地方党部取得密切联系。

(二) 深入的开展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决的反对以肃反来代替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取消了党内的教育，将党内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而且可以争取与挽救过来的同志，也只简单的用上层的军事行政手段将他肃掉，造成党内恐怖与党员群众人人自危的现象，实际上这样并不能将真正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暴露出来，而正达到了反革命破坏党的目的。只有在残酷的坚决进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才能培养出党的骨干，团结党员群众坚定的站在党的战线之下反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与粉碎反革命破坏党的一切阴谋与企图，只有这样才能将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暴露出来，使他无法在党内存在。这里特别需要你们在党内普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这是杜绝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思想侵入到党内来的唯一武器！

(三) 真正的肃反是要发动广大的群众，经过群众的路线，与群众的日

常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只有依据在广大群众的基础上，发动群众的阶级斗争，在群众自己阶级利益上开展群众的肃反，以群众的压力来镇压一切反革命的活动，使一切反革命分子无法混在群众中立足，绝不是你们那种脱离群众与不相信群众的孤立的错误肃反路线，那只是上层军事的行政手段，完全斩断了自己的耳目，这对于肃反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四）在剧烈的同阶级敌人决战的关头，加强我们苏维埃政权的权力的机关去对付苏区内部的反革命是完全必要的。你们首先必须建立和加强保卫局，使它成为同内部反革命斗争最锐利的武器。同时使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能多注意党，政治的和军事的工作。

必须使每一个同志了解我们的保卫局是同反革命作斗争的最有权力的机关，他不是其他机关的附属机关，他不是咨议的或建议的机关，他是有独立的组织系统的权力的机关，他可以逮捕，拘留，审讯以至处决反革命分子。

正因为保卫局是这样一个同反革命斗争的权力机关，所以党与苏维埃政府对于保卫局的工作，应该特别的注意，当地党部应该经常听保卫局负责同志的报告，检查当地保卫局的工作，并给它以具体的指示。在处理当地重要反革命案件时，保卫局应当[同]党委员会与苏维埃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取得意见的完全一致，保卫局虽是在组织上有它垂直的独立的系统，但他应该受当地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的指示与帮助。党必须把最忠实可靠的干部去担任保卫局的工作，任何的马虎与自由主义，会发生极大的悲惨的结果，而一切反革命分子会企图一切方法取得这一权力机关在他们的手里，进行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不久以前，湘赣省反革命分子居然取得省保卫局的领导地位，应该是我们血的教训。

为得要使保卫局能够正确的运用他的权力机关，他必须很好的建立起他们的侦察工作与他们的工作网，使我们能够依据最确实可靠的材料，去对付每一个反革命分子。这里，必须使我们保卫局的人员深入到群众中去，完全同群众在一起，以锐利的阶级警觉性去倾听每一个群众的意见，观察四周围阶级敌人各种方式的活动。对于形迹可疑的分子，必须丝毫不放松的追究到底，对于确有反革命证据的人，必须不失一分钟的时间，立刻加以拘捕与审讯。在这里任何的怠慢与迟缓，会给我们以不可挽救的损失。为得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在保卫局的系统内进行严厉的思想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教育来培养我们的工作人员。

对于保卫局下面保卫队的创立，扩大，教育与训练，应该成为你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没有这一个坚强的铁的拳头，我们与反革命的坚决斗争是不可能的。

（五）你们应该立即恢复和加强苏维埃政权机关，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苏维埃的司法系统。无情的严厉的同破坏苏维埃法律与秩序的反革命分子做斗争是苏维埃司法机关的最中心任务，必须以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教育我们每一个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司法机关中阶级的路线与可靠的领导干部，将保卫局和司法机关的工作很亲密联系与配合起来。

同时在坚决纠正你们错误的肃反路线中必须注意到两种不正确倾向的发展：因为过去肃反的错误，而认为肃反的本身是错了，而根本反对肃反。我们并不反对肃反，在进行残酷的国内战争的现在，对真正反革命的镇压是极端须要的，现在须要，将来也仍然须要。我们只是反对你们那种脱离群众的，代替反对反革命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代替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肃反，一切

企图利用这封信来作根本反对肃反的根据，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另一方面必须坚决反对过分估计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活动面前表示狼狈和恐怖，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作了反革命挑拨离间的俘虏，这是最主要的危险！

、尽量的扩大红军，加强红军的战斗力，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与军事技术。红二军团离开洪湖苏区以来，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较以前是减少和削弱了，虽然最近有些发展和扩大，但还是极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现在竟还是枪多于人的现象。我们认为这绝不仅是由于军事的因素，而大部分是由于我们政治上的错误和弱点，主要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群众，没有充分动员群众来参加红军，没有把武装队伍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没有广泛的武装农民，使成为游击队，地方武装，以已有的比较原始的武器武装起来，而是依靠枪支。如果红二军团要成为影响革命发展的真正的因素，那末必须大大的加强自己的力量，在坚决的解除豪绅地主武装，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中去获得武装，以广泛的宣传，实行红军的优待条例等等的方法，号召与动员群众加入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加强红军中与一切武装组织中的政治工作与党的领导。我们必须保存红军英勇的革命传统，粉碎反革命分子，为保护与扩大苏维埃领土，保护工农劳动群众的利益，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

、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实行苏维埃的选举，吸引群众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在群众积极帮助与参加之下，来改造苏维埃政府，使他真正成为群众的，有权威的政府。必须在吸收群众做苏维埃工作和引导他们来反对阶级异己分子的斗争中去提高苏维埃的威信，那种减弱苏维埃政权威信的“宣布苏维埃的罪恶”是绝对不允许的不可容恕的罪恶！苏维埃应当坚决的执行中央政府所公布的各种法令，首先是土地法劳动法，用一切方法来准备和充实红军给养，到一处吃一处的办法是不经常的。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开始，这对巩固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和训练工农群众的干部有莫大的意义。、坚决开展反对不相信群众力量的无情斗争。立即发动广大群众为夺取土地与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并加强党在这一斗争中的领导，建立一切群众的组织，首先是有第一等意义的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等，并使他们积极活动起来，坚决实行土地革命，没收一切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与中农，使土地革命的果实真正完全落在他们的手中。号召和组织农民抗捐抗税的斗争一直发展到土地革命，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团结广大的群众紧密的在党和苏维埃的周围，才能使苏区巩固起来并大批的涌入红军中去，加强和扩大我们的力量。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用群众的力量才能打破我们的一切困难，冲破“围剿”，战胜我们一切阶级敌人，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目前摆在你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必须立即将游击主力转变为创造新的湘鄂川边苏维埃根据地的基本力量，立即停止那种无目的无前途到处流浪的游击生活，继续和发挥红二军团过去英勇的传统，坚决为争取湘鄂川边苏维埃首先胜利的光荣伟大任务而斗争。、必须用一切力量，在任何困难条件之下，设法建立和保持与中央的经常的密切的交通关系。你们必须深深的体会到这一苦的教训：由于长期的完全失了与中央的连系，得不到中央丝毫的领导和指示，不能及时的给你们[们]以纠正，致你们犯了这样大的错误，造成目前严重的现象，这对整个党的工作，对中国苏维埃革命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你们必须设法夺取敌人的无线电，建立与中央无线电的连系。使我们能迅速的及时的给你们以指

示和解决一切应当解决的问题。

、最后你们必须写详细的书面报告及各种充分的材料来，派交通即刻出来，以便我们能详细的具体的了解你们一切实际的情形和困难，而给你们更详细的具体的指示。此外还有国际十三次全会、党五中全会、苏二大会及其他各种宝贵的材料，准备下次再带给你们，这次只是捡最重要的给你们！写详细的书面报告来！派交通来！此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中央

注释

原文如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
县神坛诸同志书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

亲爱的神兵同志们：

你们受不了苛捐杂税的剥削，起来反抗万恶的军阀和区长豪绅，我们对于你们这种斗争的勇气和决心表示万分的敬意！

我们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有百万以上的工农红军，为了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工农红军第三军，现在正在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交界数十县游击，企图发动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推翻军阀豪绅的统治，争取工人农民自己利益和权利，因此，我们与你们正站在一个共同的战线上，我们很愿意与你们作革命的联合。

可是我们看见过许多神兵英勇的斗争，总是觉得神兵失败的可惜，因为神兵在历史上还没有成功过，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第一、神兵只是以反抗派款子为目的，没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的计划，但是反动政府不推翻，苛捐杂税是不能取消的，神兵既没有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的计划，所以常常遭受到国民党军阀军队严重的压迫；第二、神兵只是组织神坛，没有自己组织的政府，没有训练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怎能与反动政府的军队抵抗？第三、神兵没有代表工农劳苦贫民一致的政治纲领，来作为斗争的日标，来巩固自己的联合，常常混入投机取巧的豪绅与反动政府妥协，跑去受招安，使神兵的事业中途停止和失败；第四、神兵没有象苏维埃一样有全中国的联合，各地神兵没有联络。

因为有了这些弱点和缺点，所以神兵牺牲了很大的力量，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出现了新的斗争方法，这就是苏维埃革命。

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和方法是什么呢？第一、苏维埃革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第二、苏维埃革命，是彻底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维护工人农民自己的利益，最重要的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和士兵；第三、苏维埃同大家举出代表成立自己的政府，并且组织工人农民的军队——就是红军；第四、苏维埃是工农贫民士兵的政权，也就是工农坚固的联合团体，最为坚固，并且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苏维埃联合。同志们：你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出神兵斗争的方法与苏维埃革命的方法区别，这就是神兵容易失败，我红军猛烈发展的原因吧！因此神兵当中的先进分子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四川黔江、彭水的联英会，湖北黑岗[洞]的神兵，现在参加我们红三军的已经有一千多人了。他们并且自己起来组织红军游击队，保护自己的地方。印江、务川、德江、沿河一带的神坛同志们！我们非常愿意帮助你们得到伟大的胜利。所以我们很诚意的希望你们来参加苏维埃革命！我们以为你们要得到胜利，只有立即做到下列各事：（一）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委员会，来争取自己的利益神坛应该赞助雇农工会、农民委员会的一切行动，完全拥护工人农民的利益。（二）组织红军游击队和自卫队，铲除豪绅军阀，保护身家。（三）组织革命委员会为统一领导机关。（四）彻底反对豪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不招安，不妥协。（五）信教自由，保护神坛和不信神者的自由。我们相信神坛内的同志，必能接受我们的意见。因为大多数都是农民，

即有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分子，只要愿意赞助工农群众斗争的发展，亦必可与我们合作。因此，我们希望各地神坛随时派代表来同我们接洽，商榷一切，我们誓以诚意与你们建立亲密的革命的联合。此致革命敬礼

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

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同启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经过和代表成份统计

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七月召集了黔东特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会的沿河、印江、德江三县的选举代表约百多人。红三军的代表约三十余人，于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在铅厂坝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大会选举孙秀亮、秦育清等组织主席团，首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夏曦致词，继由红三军代表钟子延[廷]致词。继续讨论土地、武装等重要问题。各代表听了鼓掌欢呼，非常踊跃，对于每一问题均积极发言，实贵州从来未有之盛会。兹将讨论问题列后：(1)土地条例。(2)武装问题决议。(3)优待红军家属条例。(4)农村工人保护条例。(5)肃反决议。(6)关于苗族自治问题决议。以上各问题讨论完后，即选举宁国学、冉云、夏国安、刘本玉、孙秀亮、邓吉星、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李佛加、朱少田、钟炳然等八十人为委员。以罗亨举、孙秀亮、符功高、秦育清、张均望、胡昌进、黎光富、汤福林……三十二人为常务委员。附常务委员分工如次：孙秀亮为主席，秦育清、陈正国为副主席，田兴才、王顺帮为土地部长，汤福林、张均望为军事部长，孙永臣为劳工部长，李芝兰为经济部长，罗亨举、黎光富为政治部保卫局长。选举毕，各委员宣布就职，当时会场空气异常紧张，掌声如雷，高呼口号而散。

附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成分统计：雇工及手艺人五十五，贫农二十五，中农八，兵士四，其它不明七，小商四，红军三十二。

从这个统计表可以看出，苏维埃政权是真正的民众政权，将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完全推翻了！

二、中国共产党湘鄂西分局代表夏曦同志致词

同志们：

今天有沿河、德江、印江的工人农民游击队和红军的代表来举行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这在贵州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是我们工人农民出头的日子了！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你们致热烈的革命敬礼！

今天我们来开会，就是要推翻旧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成立工人农民自己的政府，我们自己的政府就是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就是苏维埃政府。

全世界上，苏维埃革命完全胜利就是苏联，即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苏维埃革命成功，现在不过十七年之久，他们工人农民生活，在全世界上算是头一等了！在苏联，已经没有地主资本家和富农了；农民组织在集体农庄之内，工人每天只做七小时的工作。他们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苏维埃革命，现在还不过七年。在开始的时候，不过几百人的农民游击队，到现在全国有了将近百万铁的红军，有了六分之一的中国的领土。在江西、福建、四川、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陕西、甘肃、贵州十二省内，都有了苏维埃领土。最大的苏区是中央苏区，有福建、江西、粤赣、闽浙赣四省。还有川陕苏区、鄂豫皖苏区、湘赣、湘鄂西等苏区。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一日，就举行过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华苏维埃领土之内，农民已经分得了土

地，工人已经增加了工资，改良待迂，苛捐杂税也取消了，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农生活，完全有天堂地狱之别。

苏维埃革命是什么人提倡的呢？不是菩萨神仙，也不是皇帝，是共产党所提倡的。共产党在俄国发生，有三十四年，在中国成立已有十五年了！共产党是什么人的党呢？就是无产阶级的党，它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党。就是一些做工的人所组织的。原为是做工的人，受了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所以才组织共产党，来反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自从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九月提出实行苏维埃革命以来，全中国的工农群众，都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创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认为只有苏维埃才是工农民众唯一的解放的道路。

我们贵州的老百姓，比任何地方的人，还要穷还要苦。因为受着法国帝国主义压迫，和军阀王家烈、犹国才、毛光翔的压迫剥削，已经水深火热了！我们老百姓天天都在那里想一个出头的日子！你们一定想出一个皇帝一个真命天子来救你们。同志们！这就想错了！我们中国原先不是有一个宣统皇帝吗？现在他还是在做皇帝，但是他把我们中国东北四省，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引导日本帝国主义来灭亡我们中华民族。所以现在的皇帝是靠不庄了！并且我们要坚决反对这个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宣统皇帝！

你们看见没有皇帝来救你们，七想八想就想靠菩萨靠神来救你们。你们就学神兵，立神坛，有神兵神将，口称打不进杀不进。大家开起神坛来反抗苛捐杂税，本来这就是农民反抗地主豪绅统治的革命斗争的一种原始形式，这一个革命斗争后来被反革命国民党军队就将神兵打毁了！打也打得进，连房子也烧去了许多。反革命军队的进攻，实际上就是豪绅地主对我们农民抗税斗争的进攻和摧残。在这个斗争中神坛内的人，就分成两部分了：一部分人他本身是地主豪绅，他就去投靠反革命，他就去招安，他与敌人妥协一致的来压迫我们工农群众；另一部分人，则是工农群众和代表工农的领袖。他们一方面受着军阀的压迫，另外一面，又受着这一部分神坛内反叛出去的地主豪绅的叛卖。所以他们的出路，只有继续着这一反地主豪绅反军阀的斗争，才有出路！现在来参加我们红军的，主要是这一部分群众和代表工农群众利益的神兵领袖。这是农民斗争由神兵的形式进步到苏维埃运动的具体过程。在尖锐的阶级对立的形式之下，工农群众是完全团聚在苏维埃革命的战线上了。

但是我们要问，神兵是为什么失败的呢？有的说，因为没要[有]枪。这是一个经验，知道要使用新式武器了！但是还没有找到失败的真正原因。神兵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因为领导斗争的有一部分地主豪绅，幻想地主阶级的改良与地主豪绅妥协、出卖群众的利益，这是斗争真正失败的主要原因。没有坚固的组织，没有近代的军事训练，还是失败的次要原因。

至于菩萨，原不过是人的幻想，那里有菩萨呢？如果有菩萨，为什么还是打得进杀得进呢？为什么连房子都保不住呢？并且反革命军队来了连菩萨也吓跑了！可见如果真正有菩萨他是胆小如鼠的纸老虎呢！神兵还有一点应批评的，就是对于不信神的人歧视，如果这个人没有参加神坛，就是他是穷人也要歧视，这就破坏了我们的阶级团结，逼着一部分人没有加入神坛的工农团集在区长乡长土豪劣绅势力之下去了，这也是神兵斗争失败的原因之一。

你们神坛内有很多菩萨附相，托人说话。但是从来也没有菩萨讲过，要分田给穷人，要增加工人工资。可见真有菩萨，也不一定是为穷人谋利益呵！

俗话说：“有钱可以通神”，菩萨也可以被有钱的收买。可见菩萨也是靠不住的了，还是要靠自己救自己！

现在你们找着一条光明的大路了，就是组织工人农民的苏维埃政府，成立工人农民的红军。我们有了政府，有了红军，我们就有了权利打倒压迫我们的一切敌人，这就是自己救自己。现在你们目前要立刻进行三件大事：

（一）实行土地革命：要把地主豪绅的土地拿来彻底由贫农中农平均分配。

（二）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和苏维埃代表会议，坚决同地主富农作斗争。并要同一切破坏苏维埃革命之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三）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织三万人的自卫队，一万人的游击队，三千人参加红军。这样我们就有了革命的武力，可以压倒一切！我们大胆地照着苏维埃革命的道路上前进，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我们一定可以争取黔东苏维埃的首先胜利！

我们高呼：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黔东特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万岁！

三、红三军代表钟子廷同志致词

同志们：

我代表红军第三军全体指挥员、战士，向大会致革命的敬礼！

今天我们举行黔东特区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是最光荣的一天！这是苏维埃运动在贵州胜利的开端。我们工农红军，是苏维埃中国的保卫者，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我们要用我们最后的一滴血，来保卫你们的利益，保护你们已经分得的土地，希望你们多动员群众参加红三军，很快的完成党所提出的动员三千人参加红三军的任务！我们的口号就是到前线去消灭王家烈军阀，争取黔东苏维埃的首先胜利！我们高呼：中国工农红军万岁！黔东特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四、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根据中华苏维埃的土地法，规定一个没收和分配土地的统一办法，并且要交工农群众公议执行。

第一条：本已有土地（即有方）本已不办或是专请长年办，或是租给别人办，这种人叫地主。这种地主的土地，完全没收，不给他留田。

第二条：区长、乡长、镇长的土地，完全没收，不给他本人留田。

第三条：本已有土地（有的是租来的）本已做活路，还要请一两个长年，这种人叫做富农。本已有土地，本已办一半，租给人家办一半，这种人也叫富农。富农的土地，亦须没收再以分配，不过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土地，但须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

第四条：没收一切反革命组织及白军武装队伍的组织者，及积极参加者（比如民丁大队长这些人）的财产与土地，但贫农中农非自觉的被勾引而反对苏维埃，经苏维埃认可者可作例外。

第五条：寺庙的常熟田，除留一部分作敬神香火之用，其余大部分亦须没收。清明祭祖田不没收。

第六条：公田、学田、属于国家或社会的亦须没收。

第六条：在没收和分配土地中，不应动摇中农及富裕中农的土地，中等农民或贫农自己私有的土地，并不没收，并且少了要分配土地给他。

第八条：所有被没收的土地，经过乡工农代表会议（即苏维埃）立即由

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雇农苦力劳动者，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得土地权。流氓盗窃之人，经过他自己声明，以后务农为业，不盗不抢，亦须分给以土地。在白军（军阀军队）里当兵士的亦须分给以土地，并且要他回家种田。经营贸易的商人或小作坊的老板，无权分得土地。

第九条：红军是为工农群众利益，与国民党帝国主义作决死斗争的先进战士，无论当地人或外籍人，均须分给以好的土地。雇农苦力应该分给他们以好田，但须向贫农中农解释得到大众同意。

第十条：红三军是创造巩固发展黔东苏区的柱石。在分配土地中，每乡给红军（黔东苏区以外的地方的人）战士，分给十个人的土地。

第十一条：每乡须酌留红军公田十挑至二十挑，为将来外籍人参加红军时分配之用。

第十二条：乡苏维埃须酌留十挑谷子的公田，以其收入为苏维埃办事之用。

第十三条：工农阶级中之衰老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又没有家属可靠的人，应分得土地，可委托人耕种出租。

第十四条：将被没收的土地，交给贫农中农平均分配。（1）有劳动能力者分一股。（2）老少无劳动能力者二个分一股。（3）贫农中农本已有点私有土地的少分。（4）雇农或贫农中农自己完全没有土地者多分。（5）如雇贫农中孤老或有老年与小孩过多者经乡代表会同意可以三个当两个计算。

第十五条：计算土地时，应该计算他的收获量、位置和收获品种类的价格，将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以中等为标准，计算收获品以包谷及大谷、为标准，大约可得干包谷一斗二升之地，相当于大谷一挑之地（附：论挑，均以百碗的斗为标准）。

第十六条：分土地的每一分或一股的标准，是由计算人口和土地得来的。（一）人口计算：1.少地无地的贫农中农人口有多少。2.被没收土地的富农人口有多少。3.计算人口时，注意有劳动力者若干，无劳动力若干。（土地计算：1.被没收的田地有多少）（贫农中贫[农]从地主那里佃来的土地，仍作为被没收的土地）。2.贫农中农的私产若干。（三）以土地数目除[以]人口，即得出每一劳动力可分若干田，就是劳动分地。（四）那些自己有土地够吃够甲的中农，他的人口与土地就不列入分配的数目之内。

第十七条：分配的范围，以一乡为范围（一乡管一乡）地主之土地在那乡归那乡人分，贫农中贫[农]不问他人何在何乡，他的土地不能没收或强迫交换。

第十八条：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及土地，同时必须消灭口头的及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村这些财产与土地的义务或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债务无效。严禁农民部分的退还地主豪绅的土地或偿还一部分的债务，不准秘密还租。凡贫农中农之土地抵当与贫农中农者，或由原主无条件收回，当主另分土地，或原主另分土地，由乡代表会议处理。

第十九条：分配土地时，不必更动农民住处，但是富农占有的好的土地，应该没收分给贫农雇农。强迫富农换庄。土地分配完结后，应将界址分插标记，并由区苏维埃发给土地登记证，以便营业，登记证不取丝毫手续费。

第二十条：没收一切封建地主军阀豪绅的动产与不动产，如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富农在分得土地后，多余农具牲畜亦须没收。房屋分配<给>没有住所的贫农中农居住，或分给工农群众之机关使用，牲畜农具可由贫农中农

按户分配或设犁牛站公管公用。

第二十一条：没收与分配土地的具体步骤：1. 各乡分村召集农民大会，报告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2. 乡代表会议分组到本乡调查地主富农的土地人口，并动员雇农小组、贫农团、党与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农妇代表会积极参加，成为群众的查田运动。3. 在调查地主富农土地以后，为了土地能够平均分配，再将贫农中农的土地和人口登记。4. 代表会议定期计算分地标准。5. 根据分地标准与各家人口去实际分割[配]土地。6. 分村开群众大会报告分土地的结果。注意审查地主富农的土地是否完全没收了，是否雇农贫农得到实际的利益。第二十二条：没收与分配土地的斗争，在没收与分配的当中，地主富农必然隐瞒土地，企图避免没收。乡苏维埃应依靠雇农工会与贫农团的力量，坚定的同地主富农作斗争。因此必须保证雇农工会与贫农团的一切组织行动的自由，认为这些组织是苏维埃土地革命的基本柱石。苏维埃除动员雇农工会、贫农团查田外，必须以村寨为单位经常召集群众大会，去发动群众的查田分田运动。苏维埃必须同自己组织内袒护地主富农的倾向作斗争，甚至有地主富农暗藏在苏维埃里，必须无情的洗刷出去。第二十三条：如果贫农中农对于自己的私产以多报少，企图多分土地者，应该处罚不分土地给他。第二十四条：在土地没收分配以前，已经栽种了庄稼（是贫农中农的）如果以后分给别人，应由分得的人出价赔补。第二十五条：如果苏维埃工作人员在分配土地中保留地主的土地或保留富农的好土地，或将好土地分给自己，须由群众公议处罚。第二十六条：如果地主富农抢夺已经没收之土地之收获品或地主富农向贫农中农索租索债，苏维埃应以最严重的法律制裁之。

五、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第一章工作时间（1）所有工钱劳动者通常的工作时间，依照本条例规定。不得超过八小时，苦力工人之工作时间，应特别规定，较法定工作时间为少。（2）在农忙时，雇农得作额外时间之工作，但须得额外工资。（3）十六岁至十八岁之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十四至十六岁之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小时。（4）在规定每日工作时间，经常包括每日半小时至一小时休息为吃饭时间。（5）农村工人，每个月须有四天的休息，每年须有半个月的休假。第二章工资（6）农村工人之工资，不得少于由劳动委员会规定之绝对最低工资额（较革命前须增加百分之二十），苦力工人之工资额，须较普通工人高三分之一。（7）农村工人之实际工资，由雇农工会和雇主用集体合同规定之。月工工资，须高过于长年工人的每月工资的平均额百分之五十：零工较月工的平均工资要高百分之三十。（8）女工青年与成年男工做同样工作，得同样工钱。（9）所有工资须用现金支付。每半月交付一次，直接交给工人本人（青年工人也是一样的）。（10）农忙时额外工作，须得双薪。（11）各种罚款须严格禁止，赔偿损失，亦须禁止。（12）雇用工人时和雇用后，任何时期内征收工人保证金或储金制度，一律严格禁止。（13）工人因必要的假期，如在选举时参加职工大会和会议，出席苏维埃大会等，不得克扣工资。第三章女工青工（14）禁止女工举重或作危险的工作。（15）女工产前产后休息两个月，工资照发。女工打胎或小产，休息两星期，工资照发。（16）十八岁以下之女工，怀孕的、哺乳小孩的女工，严格禁止做险工。（17）哺乳的时候，在工作时间内，每二小时可休息半小时来哺小孩，不扣工资。（18）在工会与雇主所定之集体合同，应规定特殊条文，由厂方供给设立工厂学校或商铺学校，以提高十四岁至十八岁青年工人的训练程度，并给他们普通教育。至于富农商人雇用之

雇工牧童，则须津贴其纸笔书籍之费用。（19）十四岁以下儿童，严格禁止雇用，禁止十八岁（以）下之男女作苦力工作。（20）严格禁止一切青工工作夜工。（21）严禁旧有的学徒制和养成工制。凡与本条例不符的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都宣告无效。（22）手工艺工人之学徒，必须缩短学徒期间，禁止学徒替师傅作家庭杂役。其详细办法另行规定。第四章雇工方法（23）雇用工人，须经过工会或工作介绍所，应根据集体合同。（24）所有工作介绍，须由劳工委员会组织，严格禁止私人介绍。（25）所有关于工作条件（工资、工时、青工与女工的保护，卫生与安全）的集体合同，由雇主或企业管理人员与职工会签定之。（26）劳动合同有效期间，不得超过一年，工会在合同满期前，有权要求取消合同，雇主中途无故辞退雇工，须发三个月的辞退金。（27）严格禁止包工制和包工头等。（28）严格禁止要工人出钱买工作，或从工资中扣钱作为<买>工作报酬。第五章待遇（安全与卫生）（29）雇工所得疾病，应由雇主出资治疗，病假中，不得克扣工资。（30）雇主每年应发给雇工棉衣一套，夹衣一套，单衣两套，袜子两双，鞋子两双，手中、帽子、斗笠等。月工做三个月者，发夹衣一套、单衣两套。（31）雇工伙食应与雇主同样。（32）苦力应由劳工委员会规定一定的负荷重量与每日一定的路程，与安全卫生的保护方法。第六章社会保险（33）社会保险的目的，是从特别贮备的基金中，拿出一部分付给工人。这笔钱不是从工人工资中拿出来的。优恤种类如下：（甲）普通病。（乙）失业。（丙）残废。（丁）母亲与婴儿。（戊）死葬。（己）医药。（庚）房屋。社会保护基金，由雇主支付。不论他是国家合作社或私人合作社，无论如何，不由工人支付。社会保护所有责任，与执行社会保护法，由劳动委员会经过他的社会保险局来进行。由职工会提出关于社会保险机关管理人员名单，监督与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的收集和用途。所有被雇用工人，都可以得到社会保险优恤。其详细办法，另行规定公布。（34）工会与雇主间订立的集体合同，须有特别条文：规定由雇主应付工资之外，支付全部工资额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特别基金，作为各种社会保险之用。第七章雇主与土地（35）革命前的雇工均须分给好的土地，并分给以耕牛耕具。

（36）雇工没有房子住的，须分给以好的房子。

（37）因为革命以后，地主豪绅逃走，雇工失业的，苏维埃政府除分给土地外，并须设法救济他的粮食。

（38）在革命的期间，不许地主富农无故辞退雇工，如果辞退雇工，须支付包括三个月工资伙食之辞退金。

（39）苏维埃法律保证职工会的行动自由，宣布并领导罢工权，交涉并检定合同权等，并津贴雇农工会相当的经费，拨给雇农工会好的房屋。

（40）职工会的主要作用，是个别集体的代表。并保护一切雇佣工人的利益，努力改善一切工人经济的文化的条件，用各种方法积极的帮助加强发展保护苏维埃运动与苏维埃政府。

（41）关于一切争执纠纷及雇用工人与开除工人等问题，职工会得保护工人一切利益。如社会保险、安全、卫生、司法保障等问题亦然。

第九章劳动保护法令的执行

（42）劳动法令的执行与否，是劳工委员会的职务，特别是他的劳工保护机关。

（43）本条例经特区革命委员会公布后执行。

(44) 凡违犯本条例者，须受到苏维埃法律之制裁。

六、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

我们工人农民为了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为了保卫和发展苏维埃区域，必须把每个青年成年男子妇女都武装起来，发展革命战争，与军阀、国民党政权作决死的战斗，才能保障我们已得到的胜利和得到彻底的胜利与解放，因此黔东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决议：

(一) 印德沿三县动员三千人参加红三军，因为红三军是创造巩固发展黔东苏区的柱石，也即是我们黔东人民自己的武力，扩大红三军，拿起武器到前线去，是我们每一个工人农民的责任。

(二) 印德沿三县组织一万人的游击队，在苏区周围，在敌人后方和侧面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这是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条件之一。所以组织一万人的游击队，来扩大游击战争。同时从游击队发展，培植出红军独立营、独立团、师，以增厚地方武装的力量。为了动员一万人，每乡要组织三十至五十人以上参加游击队。

(三) 印德沿三县组织三万人的自卫队。工农红色自卫队是后方的守卫部队，他负巩固苏区的最大责任。必须把苏区的青年成年男子妇女，从十六岁的起到四十五岁上，每个人都拿着武器，每个人都组织在自卫队之内，学习必须的军事知识，担任一定的警戒任务（放哨守卡），并且在一声号召之下，都能动员到前线去，这是苏区的铜墙铁壁，是保卫苏区最坚固的堡垒。

(四) 夺取地主国民党的武装武装工农自己。我们的武器要从敌人手中夺取过来。首先是特地主区长乡长的武器没收，武装游击队自卫队。还要去夺取廖怀忠、付衡中、王家烈的枪支（机关枪·解除反动军队的武装，来武装工人农民，这是我们当前主要的战斗任务。

(五) 只有工人农民，才有武装自己的权利，只有工人农民，才可参加红军和游击队、自卫队。地主豪绅官僚本人及其儿子都没有参加的权利。因为我们不能把武装送给我们的敌人手里去。

(六) 破坏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和地主的武装。

我们苏区内有人在外当兵的当军官的，我们号召他们回来参加苏维埃革命，尚未回家的我们现在就分配他们以好田好地。

即是别县、别省的人，他在国民党军队当兵，也要号召他们来参加苏维埃革命，也要给他分配田地，因为这才是工农兵士的唯一出路。

七、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

工农红军是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作决死斗争的先进战士，是创造巩固发展苏维埃中国的柱石。苏维埃政府和每一个苏维埃公民，对于红军及其家属，在精神上物质上均应给以大的帮助。这是巩固红军作战的决心及勇气的必需的与重要的步骤。黔东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决议颁布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的条例，作为进行这一工作的基础，并且要与不遵守优待红军法令者作斗争。

第一条：分给红军战士好的田地。凡红军战士、指挥员，无论本地是否建立了苏维埃，或为反动统治的区域，均须分得上等的好田，每乡必须留红军公田，作为以后参加红军的白军士兵，或其他地方人参加红军之用。

第二条：组织代耕队和收割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收割。解决红军家属的耕田收割问题，是优待红军工作的中心的一个，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收割，以解决红军家属缺乏劳动力的困难。特别是苏维埃工作人员，

要帮助红军家属做活。

第三条：消费合作社实行廉价，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对红军家属买油盐布匹，实行廉价百分之五。

第四条：对红军家属免税，苏维埃的土地税营业税，对红军家属一律免除。

第五条：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耕牛、耕具，优先给红军家属分配。

第六条：红军的儿子，应该尽先给以教育，有进列宁小学的优先权利。

第七条：对于红军伤病战士均需随时帮助。组织担架队运输伤病兵，组织伤病员休息处，准备茶水饮食，一直使伤病兵从前方到后方都得到群众的帮助。并组织群众的疗养所，帮助伤病兵及红军家属找医生找药品，并号召群众为了红军家属的疾病困难募捐救济。

第八条：对于阵亡的红军的家属，必须永远替他代耕，必须募捐救济。对于他的儿子完全受到免费的教育。

第九条：在红军驻扎区域，特别是作战区域，必须发起慰劳运动：送给红军草鞋，小菜，帮助红军洗衣。

第十条：苏区邮政局对于红军家讯（由前方寄回家的，由家庭寄到前方去的）一律免费。

八、关于肃反问题决议

（一）中国目前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是工人阶级领导联合广大的农民群众，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是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是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这是一个残酷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是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两个政权的斗争，现在已经到了最尖锐的最激烈的国内战争的形势。

（二）反革命的国民党在帝国主义帮助之下，动员他全部的社会力量，来向苏区进攻。为了挽救他的垂死的没落的统治，他除了动员反革命的武装力量，来进攻苏区外，他还利用苏区以内以及与苏区有关系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力量来在苏维埃区域内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进行各种反革命的活动，破坏苏维埃的法令和秩序，造谣暗杀，混入苏维埃和红军，破坏各种革命的工作，甚至组织反革命的暴动。这种在苏区内部的破坏工作是反革命进攻苏区，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三）在苏维埃建设的初期，一部分地主富农，常常企图混入到苏维埃和红军里来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地主富农的利益，破坏苏维埃的工作和法令，特别在土地的分配当中混入到苏维埃里面的地主富农分子，隐瞒地主富农的土地，压抑贫农中农反地主富农的斗争。在反动军队进攻苏区的时候，他们暗中勾结来响应敌人的进攻，来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我们必须将这种苏维埃运动当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洗刷出去，与他作坚决斗争。

（四）我们不要以为地主豪绅的政权被推翻了，土地没收了，他就没有力量了。被推翻的反革命阶级，他们时时刻刻想恢复他们的统治，恢复剥削、奴役工农群众的旧制度。所以我们苏维埃政权，是工农阶级的专政。我们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富农完全剥夺他们政治上的一切权利与自由，这是非常必要的。

（五）因此苏维埃政权对于一切企图以推翻政权为目的的一切反革命活动，采用极严肃、极坚决的手段来镇压，以保障群众的利益。黔东特区第一

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采取下列的办法：（甲）对反革命政权系统军阀官僚豪绅及反革命武装之组织者，必须逮捕。（乙）对于一切以推翻苏维埃政权帮助国民党帝国主义为目的之反革命活动（例如散布谣言，帮助反革命军队侦察消息，隐藏反革命分子，以武装抗拒苏维埃和红军）必须严厉镇压。（丙）苏区内之地主富农及雇有工人、店员的作坊老板，必须剥夺其一切政治上的自由与权利。他们没有参加苏维埃政权的任何权利，但是他们必须遵守苏维埃的法律和秩序。（丁）苏维埃之下，设立政治保卫局的组织系统。政治保卫局是同反革命斗争之专门的权力机关。他们有权侦察、逮捕、审判以至处决一切反革命分子。（戊）苏维埃政府，必须建立自己的司法机关系统。司法机关要同一切破坏苏维埃秩序之分子作斗争。（己）实行赤色戒严。对于来往苏区的人，必须检查考察，对于行迹可疑之人，必须追究到底。

（六）苏维埃政权同反革命的斗争，这是保护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保护土地革命的利益，必须得到广大工农群众之参加与拥护，对于被反革命所影响之下层工农群众，苏维埃政府必须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以阶级的利益和团结，使他们从地主豪绅影响之下解放出来。因此苏维埃政府反对工农分子的仇杀与报复和赤白对立的现象。

（七）黔东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委托特区革命委员会制定详细具体的肃反法令颁布执行。

九、关于苗族问题决议

黔东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完全接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关于少数民族的态度，特别反对国民党军阀白崇禧、王家烈、陈渠珍等对于苗族的屠杀。因此对居住在贵州、湖南、四川境内之苗族，决定以全力帮助他们得到解放与自由。代表会议宣布执行以下的政治纲领：（一）联合苗族及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之土司等的压迫；（二）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承认他们有同中国脱离，建立自己的苏维埃国家的权利，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苏维埃联邦[邦]；（三）帮助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四）帮助苗族的农民完全得到土地，没收一切地主豪绅的土地和国家的土地（如屯田）由贫农中农平均分配；（五）用苗族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苗族文化；（六）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七）苗族与汉族的工农群众，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八）住居在苏区的苗家工农群众，完全享有苏维埃公民的一切权利。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 (一九三四年八月四日)

一、过去的错误和初步的转变

中央分局在郑重的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信和五中全会决议以后，认为应该毫无保留的接受中央的一切指示和国际十三次全会、党五中全会的决议，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基本路线；应该依据国际和中央的路线，按照我们具体的环境，规定我们的具体工作和任务，彻底的坚决的转变我们一切实际工作；应该在中央指示基础之下，开展我们的自我批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毫无疑问的，只有执行中央和国际的路线，与一切曲解和违犯党的路线的现象作斗争，才能争取湘鄂川黔边苏维埃的首先胜利。

中央分局认为五月六日的指示信，首先是对于我们的错误与罪恶严厉的指斥，是我们转变工作的主要枢纽，只有找寻错误发生的原因，研究出改正错误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党的错误，特别是与盲动的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才能造成我们工作转变的前提。

湘鄂西苏区的失败，自然是受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的“围剿”，与暗藏在内部的反革命派别（改组派、第三党、托洛斯基派）的破坏，然而这种反革命的进攻，并不是不可以战胜的。我们没有能够战胜敌人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我们党的工作之弱点与错误所致。决不能拿反革命的破坏，将自己所犯的各种最主要的错误掩盖起来。

一九三二年一月，毛坝中央分局扩大会议，虽然指出党主观方面所犯的 error 与弱点，最主要的是反机会主义斗争之不彻底，没有在思想的斗争、实际工作的斗争中团结最好的分子，锻炼出坚强的党的队伍；对反革命派别之党的警惕性异常不够；战略上个别的错误；最后则在不利的形势之下，不善于布尔什维克的退守，准备新的进攻，以致陷于狼狈的退却。但是因为沒有深刻了解自己的错误，特别因为没有与错误作坚决的斗争，所以不仅没有造成坚决的转变，并且在某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方面，反而使错误加深起来。

自从湘鄂西苏区受到暂时的失败，中央分局枣阳王店会议采取了恢复湘鄂边苏区，准备恢复洪湖苏区的路线。但是到了鹤峰以后，首先是犯了过早的进攻桑植的错误，以后走马坪会议及时改正了这个错误，决定了发展鹤峰周围的苏区和使红军主力得到休息整理。虽然当时坚决执行恢复湘鄂边苏区的路线，打击改组派首领段德昌提出“立刻回洪湖去”的口号，企图训练成批的红军干部（编制教导团）和发展游击战争，建立鹤峰、建始、恩施[施]、宣恩县区乡的革委和苏维埃，实行了土地革命，但是一九三三年三月金果坪中共分局会议，犯了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首先便是解散红军中、地方上党和团的组织，举行重新登记，取消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要“宣布过去被反革命分子把持的省苏的罪恶”，这便是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武装。以后清党又被反革命分子宋盘铭、盛廉均暗中利用破坏。他们利用清党来团结改组派的组织，提拔改组派的干部。这便证明了中央指示的解散党的团的组织并不能保证党的改造。解散党和团的组织，反而达到了反革命破坏党的目的。以后这一错误，更因为四次肃反以后清党的迟缓而加深了。其次是金果坪会议以后，以及麻水时期，对于五次“围剿”之没有警觉，对于粮食问题之没有适当的解决，因而没有巩固和扩大苏区更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党的解散与

战略上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方向，这便造成了湘鄂边苏区失败的主要原因。虽然烧巴岩会议企图巩固和扩大苏维埃运动到龙山、来凤、成丰、利川一带，企图扩大我们的力量，因为以前的错误与以后游击中某一方面的错误（夏希领导七师单独游击时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尊重烧巴岩会议及银石坪会议的决定；没有及时集中军事力量；企图分开游击；对于鹤峰苏区失败以后，没有建立秘密组织和发展游击战争；没有在七师开展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破坏纪律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和加紧建立党的工作；以肃反代替了一切工作；以及战术上的冒险），终于没有把湘鄂边苏区巩固起来。及至七、九两师会合，大材中央分局会议，虽然决定了企图占领西、秀、黔、彭作为新的根据地的策略路线，虽然反对了在西、秀、黔、彭不能占领的情形之下，向中央苏区或四方面军靠拢的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当时仅仅只有一个军事上的计划，并没有整个的党的红军的群众的工作布置，并没有实际上的转变。并且在黔江退出以后，党对于巩固红军和发展的企图，就没有明确的方向了，以致陷于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着，陷于盲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不能自拔，一直继续到江垭作战，因为党自己的工作陷于麻痹和消极的状态，所以更助长了部队中失败情绪与自由主义的发展，改派残余亦正利用失败情绪来实行挑拨离间，企图破坏党和军事领导的集体的团结的力量。但这时清党已经完成一半，依靠了党的组织的力量，与党的领导的坚决斗争，才克服了改派残余的阴谋破坏。以后从江垭到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字路会议，确定了创造鄂川边游击中心区域的路线，决心创造鄂川边区来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才开始党的路线的初步转变。

中央分局总结了过去主要的错误，认为自金果坪会议以后，至十字路会议这一时期，党的工作就渐渐的走到不正确的道路。虽然当时中央分局提出了创造湘鄂边苏区以至发展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任务，但是实际工作陷于盲动的右倾机会主义，没有坚决执行自己提出的任务。特别是从黔江退出至江垭作战这一时期，完全陷于盲目麻痹的状态。这个错误的主要原因，正如中央所指示的：

（一）肃反路线的错误。我们与反革命的改组派作了斗争，这是正确的。因为对真正反革命的镇压是极端需要的，现在需要，将来也仍需要。虽然进行了肃反斗争，进行过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和对被欺骗的下层群众采用说服的方法，但是肃反还是犯了主要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金果坪会议，虽然指出了肃反的这个主要错误，指出了有拿刑事的法律的方法代替了同反革命派别思想斗争的倾向，有命令代替了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与群众运动方式的倾向，有肃反代替一切反机会主义斗争与一切军纪风纪的倾向，并且相当的纠正了“左”倾的手段，相当克服了党内和红军内的恐怖，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错误，反而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解散了所有的地方党部和团部，而将反革命的力量反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造成了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实际上是作了反革命挑拨离间的俘虏，取消了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这是极大的罪恶。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肃反，这正是说明我们没有充分的政治工作和党的警惕性，反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不充分，没有能够有系统的作反革命的斗争。

（二）解散党和团组织的错误，由于我们不正确的估计，党、苏干部十分之九是改派，竟武断的解散了一切党和团的组织。这一错误因为清党的迟

缓而加深了，以致在实际上没有建立我们党的基础与繁殖我们党的工作，以致在某一时期红军中大部分陷于无党的状态，客观上破坏了我们党的威信，使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成为不可能，帮助了反革命派别达到了他们破坏党的目的。

（三）由于不相信自己同志与群众，所以就削弱了甚至取消了发动广大群众组织与武装他们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工作，甚至因为肃反的错误客观上破坏了苏维埃政府的威信，所以也就不能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参加红军及不能将已吸收来的从组织上巩固起来，而形成枪多于人的怪现象。因专门肃反而放弃了日常党的群众工作、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冲破敌人“围剿”的工作，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不能击破敌人的“围剿”及固守新创造的苏区最主要原因。

（四）因为解散了党和团的组织，不相信自己的同志和群众，就感觉干部没有办法，就不能动员参加已经斗争的群众的力量去发展我们的工作，去夺取新的群众，以及在困难形势之下的动摇，所以就没有决心与信心来创造来固守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实际工作陷于麻痹消极的状态，特别是黔江退出至江垭作战这一时期，陷于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着，这真是一分钟都不能容忍的现象。

中央分局完全同意中央对我们错误的严重指斥，要坚决的同这种错误作斗争，要在实际工作中改正过来。中央分局完全同意中央的估计，湘鄂西和红三军的巩固发展，决不是没有希望的。红三军几年来英勇血战的胜利，湘鄂西和湘鄂川黔边数十县游击区域广大劳苦群众的围绕与拥护、党的领导与同志们的艰苦工作，保持了红军骨干部队和与反革命进行了斗争。红四军与川北苏区的伟大发展，川东党的工作之恢复，国际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开展，各地红军的英勇战斗，已经取得了冲破五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这正是我们取得第一步伟大胜利的主观条件。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字路会议，中央分局估计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开展与湘鄂川边的群众斗争之开展，所以决定了发展鄂川边区的任务，以鄂川边为游击的中心区来创造新的根据地，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中央分局路线转变的开始。在这个时期，红军中清党的任务也完成了，党的工作已经开始，党在红军中的威信也渐渐提高起来，直到枫香溪会议，确定了发展黔东苏区的任务，更开始了群众工作和苏维埃运动积极的转变。但是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开展党的组织的群众的实际工作，培植和团结最好的干部，巩固党的队伍，这个伟大的基本任务，还只是刚刚开始，所以这一个转变，是非常不够的。

中央分局认为，为了彻底了解我们自己的错误，为了综合我们的经验，准备召集一次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在中央帮助之下，仔细的科学的总结四年来湘鄂西苏维埃运动的教训和我们工作的政治××及宝贵的英勇的军事上的教训，这将是最近党的重要工作之一。

二、黔东新苏区的创立和工作中的弱点与错误

由于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之转变，由于红三军的巩固与英勇胜利，由于黔东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苏维埃革命的积极性，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削弱，已使我们创造了黔东苏区。这个苏区已经有了十万以上的人口，有了二、三千人参加红军，已经实现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由贫农、中农平均分配的土地革命，已经进行了抑制富农的政策和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苏区的工人部分的已经增加了工资，由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百建立起了将近一百

乡的代表会议制度的乡苏维埃，并且在斗争之中，部分的实行了改造，已经建立起四个独立团和十多个游击队，黔东沿河县的两（个）独立团，已经取得四次英勇的胜利。在先进的区域自卫队已经守卡放哨，群众自动的捉拿乡长、团长和处决反动分子。一部分区域已经建立雇农工会、贫农团，已经有了党和团的组织，已经建立了少年先锋队和农妇代表会议，已经开办了训练当地工农干部的训练班。所有这些工作的成绩，已经建立了黔东（印江、德江、沿河、松桃和川边西、秀附近）的苏区，已经举行了黔东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已经以明显的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将这个区域的原始的神兵斗争转变到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革命方面来。所有这全部革命斗争的成绩和红三军在这时期政治上军事上长足的进步（政治机关的全部恢复，党的威信大大的提高，党团员增加了百数人，军事技术的提高）与英勇的胜利，已经使我们解决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巩固的基础。这一黔东根据地的创造，可以使黔东、黔北、川东、川南、湘西、鄂川边几十个县游击区域迅速的发展苏维埃运动。可以使鄂川边的游击战争，配合着更快的发展，可以创造成为一个湘鄂川黔边大的苏区，造成推动恢复湘鄂边和湘鄂西全部苏区的基础。

黔东苏区的建立和红三军的英勇胜利，已经使周围军阀的统治恐慌，加速他们的崩溃。但是五次“围剿”对于我们并没有完结，贵州的地主资产阶级与军阀正在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威胁之下，为了挽救自己将要塌台的统治，为了挽救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农民的封建制度，为了要替帝国主义尽清道夫的作用，企图集其全力来消灭黔东苏区，这个法国帝国主义走狗王家烈，正在动员准备自己的力量，正在准备向红三军和黔东的工农群众举行绝望的“围剿”。其余周围的军阀如陈渠珍、川军田钟毅、达凤岗等亦必作贵州军阀的应援和堵截，阻止红军向湘鄂川边的发展。因此，红军与贵州军阀的统治阶级决战是紧紧的逼在我们的面前。这一个战争，是击破五次“围剿”的革命战争之一部分，是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争斗，是两条道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因此，消灭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革命战争，即是工农群众与他们残酷的剥削者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决战，即是为了土地和秋收为农民而战，为了取消苛捐杂税而战，为了不让贵州被法国瓜分去了而战。组织动员千百万工农群众以与红军主力相配合，为了保卫黔东苏区，为了粉碎贵州军阀统治而战争，争取黔东苏区首先胜利，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这是党的中心的紧急的战斗任务。

估计到敌我阶级力量的对比，我们正处在革命形势更进的尖锐时期。目前的世界已经迫切的走到革命与战争的新周期，不仅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而且中国苏维埃革命已经成了世界革命伟大的因素。各地红军已经取得击破五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我们有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领导；有了红三军的宝贵的战斗经验与英勇的传统；黔东、黔北、川东一带工农群众对于苏维埃、红军的拥护以及红四方面军在川北伟大的胜利，我们有了争取胜利的基本条件。但是，正如共产国际所指示的：

“绝对不是说革命的发展，是自流的毫无阻碍的上升起来，而不遇到相反力量的抵抗。无产阶级推翻破产地主资本主义的统治或快或慢，这要看工人阶级大多数斗争准备如何。”

我们要准备组织领导千百（万）的广大群众来参加革命战争，要执行这个伟大的任务，首先就在检阅我们自己的力量，检查我们工作中的困苦、弱

点、错误，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性坚决性和胜利的信心，来克服一切的困难和障碍。

我们的困难是常有的，但是我们的困难是发展当中的困难，“困难的本身，就包含着战胜这些困难的因素”（斯大林说的）。例如，因为红军的扩大，粮食、衣服物质上的准备，军事技术的提高，以及因为工作的开展，经常感觉干部的困难，然而只有地方群众工作的开展，红军的扩大，才是战胜我们一切困难的基础。

我们要战胜困难，只有更加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扩大我们群众工作的范围，更加彻底的实施苏维埃一切政策和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要这样去推动我们的工作，首先就在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和错误，特别要严厉的打击消灭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倾向。机会主义倾向在于害怕群众与不相信群众，在于没有决心与信心来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在于不去组织向地主豪绅统治进攻的保守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狼狈恐怖退却逃跑，这种失败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就在一切困难之下投降。

很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工作的主要阻碍。因为反机会主义斗争之不彻底与干部的幼稚，所以工作的转变，还是令人不满的，还存在许多严重的弱点与错误。

第一，党的工作落后于革命形势。党的组织的宣传的日常工作，党在工人、农民、兵士、红军中群众的工作，党内教育的工作，对于干部训练的准备，还是极端的薄弱。这是工作中最主要的一环，而又是最薄弱的一环，特别是黔东苏区和地方武装中的党的组织发展之迟缓，这里党的机关常常以军事的和政府的工作代替了党的本身工作和党的群众工作之全部，这是一个主要的错误。

第二，阶级斗争没有充分发展和群众工作之极不充分。现时苏区的群众工作仅仅是红军占领以后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他们仅仅依靠红军、依靠政府、依靠上层工作人员解决问题，充分表现出不相信群众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不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在一部分区域，没有发动群众的肃反斗争，没有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没有发动群众自动手的没收地主粮食、财产斗争，没有发动群众自动手的平民式的土地革命。他们依靠红军的占领，依赖政府的命令，以分粮食给他们、分土地给他们的官僚方式，代替了群众自动的各种斗争。没有在斗争中组织党和团的支部，雇农工会、贫农团与没收土地的斗争不相关连。自卫队常常是册子上的，游击队是麻木的，即苏维埃的组织还没有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还不能保证工农阶级的专政而没有地主、富农混入，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组织系统。这种现象之形成，主要是由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其次则是一部分干部不善于组织群众和缺乏斗争的经验。

第三，地方武装还极薄弱。一般的说自卫队的工作，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最严重的就是游击队的非阶级没收的路线，以及麻木的保守主义，在内部缺乏教育工作，管理上的军阀制度的残余，这便不能把已吸收到游击队的群众巩固起来。地方各红军独立团，虽然取得了几次英勇的胜利，但是还没有充分运用游击战术，还没有加强新战士的军事训练，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战略上的领导，最主要的是内部政治工作之极端薄弱，党的发展组织之迟缓，所以不能克服开小差的现象和吸收新的群众的参加（一部分新部队），战士的数量反而减少了。

第四，扩大红军的任务还是极端薄弱，地方上甚至没有开始。红三军在政治上、在军事上都有极大的进步和转变，但是自由主义的倾向，军阀制度残余的倾向还部分的表现着，失败情绪也没有完全消灭。军事技术和纪律的提高（特别是新的成份），政治水平的提高，创造黔东苏区和组织消灭王家烈的革命战争的任务的政治上的动员与积极性的提高，特别是思想上反机会主义斗争之开展，是目前政治军事工作中的中心任务。这样的困难还需要从扩大苏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中更有计划的解决。

第五，政治保卫局还没有建立，特别是地方上没有把肃反造成群众运动。

第六，党的苏维埃的领导机关还不健全，领导方式和突击工作还存在有许多缺点。

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彻底的转变，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之不彻底，以及干部的没有及时准备，所以削弱了我们的能力，增加了我们的困难，阻碍了工作之发展。有许多条件顺利的区域，还没有开展工作，或是开展得太迟了。我们这两个多月的时期，虽然有了进一步的转变，但是我们工作之开展还是不能满意的。只有提高我们一般同志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不断的有计划的提拔新的干部，改善我们工作的质量，加紧我们的工作速度，发展广大群众的自我批评，实行党和苏维埃的民主集中的民主制度，提高工作的劳动热忱和劳动纪律，发展革命的各个战线上的革命竞赛与突击运动，造成模范的苏区，模范的师、团、连，模范的区委和支部，实行工农检查制度，发展轻骑队的工作，这样从各方面来与弱点和错误作斗争，来推动一切工作，才能争取黔东苏维埃伟大的首先胜利。

三、湘鄂川黔边区党的主要的战斗任务

中央分局完全同意中央五中全会关于党的任务的决定。五中全会指出：“尖锐的革命形势之存在，要求党千百万倍的加强自己的群众工作，用一切力量经过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之运用去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发展他们经济和政治的日常斗争中，提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领导他们为着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的革命出路而斗争，为着苏维埃的中国而斗争。这个斗争之胜利，紧密的联结于完全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因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他将中国殖民地化中最具体与最凶恶的步骤，而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动员全部力量为着完全粉碎五次‘围剿’而斗争，这是党当前最战斗的紧急任务。”

在全党领导全苏区及全中国为工农群众进行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任务当中，五中全会指出：“更加需要红军各部在一个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进行战斗的任务，更加需要将川陕苏区与鄂豫皖苏区及红三军团部队的政治上军事上的任务与中央苏区的伟大任务配合起来”。中央分局完全同意五中全会的决议，要坚决的创造湘鄂川黔边苏区，首先是争取苏维埃的首先胜利，以与红四方面军相呼应，亦即是与中央苏区相配合。

毫无疑问的，争取黔东苏维埃的首先胜利，争取消灭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首先胜利，这要看我们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如何而定，看我们党的全部群众工作能否实现“一切牺牲给与革命战争”的列宁的口号而定，因此，党必须加紧的执行下列的战斗任务。

（一）为了扩大红军而斗争，就是第一等重要任务。

在全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当中，必须将红三军恢复成为二军

团。要组织一万工农参加红三军来扩大我们的力量，首先要立刻完成黔东苏维埃代表大会动员三千人参加红军的任务。只有红军猛烈的扩大和加紧的训练，才可造成战胜敌人的巩固的基础。

现时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的工作，在地方上还没有开始。这主要的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群众，没有充分的动员群众来参加红军，没有广泛的宣传来消灭“怕红军离开贵州”的心理，没有广泛的宣传保护黔东苏区与加紧组织消灭王家烈军阀革命战争的紧急任务，没有发展优待红军家属运动，没有把红军提到最光荣的社会地位，没有建立各区各乡的动员机关。只有消灭这几个弱点和缺点，才能开展广泛的动员工作，用教育和提高纪律的方法，反对开小差的现象。同时组织请假回家的红色战士去开展地方工作，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扩大红三军以外，加紧地方上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的编制，加强地方武装的政治军事训练，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地方上防御工程与实行全部公民中的军事教育（各机关各组织的军事化），这是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工作。

加强红军中、地方武装中的政治工作，保证党的绝对的领导，这是党的最王要工作之一。

解决政治军事干部的大批培养，是组织革命战争的重要工作之一。为了使后方工作与前线相适应，群众的全部动员参加革命战争，组织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为了建立军事上战略上的统一，必须健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

（二）开展群众的阶级斗争，彻底的实行苏维埃政策，布尔什维克的自下而上的组织群众，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二。

首先是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联合中农，实行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的土地革命。并且发展雇农、苦力、手艺工人的经济斗争，在发动工农群众反地主、富农的斗争的基础之上来彻底实施土地法和劳动法，以改善工农的生活。

经济建设是苏维埃工作最重要的一班〔项〕。为了执行改善工农生活和保证革命战争物质需要的任务〔务〕，动员广大群众为经济建设而斗争，首先是生产力的提高，合作社的普遍建立，对外贸易的流通，特别是粮食的调剂、储蓄与收集，与金融的活泼。

粮食的收集、储藏，是争取革命战争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在现时情形之下，必须收集和储藏一定数额的粮食，来保证红军战时的给养，才能使红军主力在战略上不受粮食的牵制。如果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扩大苏区这个任务是可以达到的。党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方法，为了“发展收集粮食的群众运动而斗争”。

开展群众的肃反，以群众的压力来镇压一切反革命的活动，这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发动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提高他们阶级的警惕心，提高他们政治水平，加紧反法西斯蒂及改良主义的的政治的思想的斗争，这是造成群众的肃反的先决条件。

在剧烈的同阶级敌人决战的关头，加强我们苏维埃政权的权力的机关，去对付苏区内部的反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首先必须建立和加强保卫局，使他成为同内部反革命斗争最锐利的武器，并且要加强党对于保卫局的领导，把最忠实可靠的干部去担任保卫局的工作，任何的马虎与自由主义，都也〔必〕须极端反对。保卫局的人员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去完全同群众在一起，以

锐利的阶级警觉性，去倾听每一个群众的意见，观察周围阶级敌人各种方式的活动。对于形迹可疑的分子，必须丝毫不放松的追究到底；对于确有反革命证据的人，必须不失一分钟的时间立刻加以拘捕与审讯。在这里，任何的怠慢与迟缓，会给予我们以不可挽救的损失。为得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在保卫局的系统内进行严厉的思想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教育来培养我们的工作人员。对于保卫局下面的保卫队的建立，扩大教育与训练，应该立刻执行。没有这一个坚强铁的拳头，我们同反革命的坚决斗争是不可能的。

“应该建立苏维埃的司法系统，无情的严厉的同破坏苏维埃法律与秩序的反革命分子做斗争。必须以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教育我们每一个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司法机关中阶级的路线与可靠的领导干部，将保卫局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亲密联系与配合起来”。

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开始，这对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和训练工农群众的干部有莫大的意义。

苏维埃机关的群众化和干部的大批培养，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要立刻的建立乡苏、区苏、县苏与建立黔东特区苏维埃，并在发动广大群众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基础之上来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用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方式，把苏区的工农群众组织到工会、贫农团、共产党、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农妇代表会议、反帝大同盟、拥护同盟、互济会这些组织以内，来进行广大的政治教育工作和有组织的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到底。

（三）开展白军、白区工作，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三。

在敌人的后方、侧方开展群众的革命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军队中开展革命斗争，是争取革命战争的主要条件。

第一，是建立白区的雇农工会、农民委员会，发动他们分粮、秋收斗争、抗税斗争，以至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

第二，是开展白军中士兵运动，组织士兵斗争到兵变兵暴方面来。对于参加红军的士兵与苏区内过去当过士兵的，以及现在还在外当兵的，必须立刻分给以好的土地，巩固和号召他们为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到底。

第三，是组织城市中工人的阶级斗争与红军的胜利相配合。主要的是乌江的船夫与思南、印江、松桃、铜仁、江口、沿河、酉、秀、龚滩、彭水、涪州各城市。

第四，一切工作中要加紧反帝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并具体指出法帝国主义正在伸手到广西、云南、贵州、进行瓜分中国的计划。要把反帝的斗争与苏维埃、红军的发展联系起来，指出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并广大宣传苏维埃中央政府反日作战协定的号召。

（四）开展苗族中的工作。

在黔东苏区周围的少数民族，即如苗族就有几十万人，这就要求党用最力量去建立苗族中的工作，为了民族的解放与自主（包括分立权）而斗争，发展他们中间的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土司贵族与高利贷者，密切的将苗族解放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组织苗族红军与苗族苏维埃共和国。“指出只有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取得解放与建立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与各个民族间真正的和平与自由”。

（五）开展川东苏区以与鄂川边打成一片。用最大力量去发展川东西阳、黔江的游击战争，以与鄂川边区游击战争打成一片，以开展鄂川边区和川东

苏区的建立。

(六) 准备一批干部去建立恢复湘鄂边, 恢复洪湖的工作。

以上这六个任务之完成, 将是建立湘鄂川黔苏区的保障和消灭贵州全省反动统治的基础。依据这个基础, 可以争取苏维埃革命在贵州的首先胜利, 将使中国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落后的西南部奠定坚固的基础。

在执行这些任务当中, 目前最紧急的是党和工会、贫农团之建立, 苏区阶级斗争(土地的、经济的、肃反的、武装的)之彻底发动, 革命战争在群众中普遍的动员(巩固[固]苏区与组织消灭王家烈战争之群众的彻底了解), 赤卫军和少先队之真正建立, 红军中政治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之加强加多, 各游击队各独立团政治和地方工作干部之加强加多, 动员参加红军和优待红军家属运动之广泛的发展, 粮食的收集与储蓄, 这是目前最紧急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使主力红军不受地方工作和粮食的牵制, 而能加强训练与活动自如的进行革命战争胜利的进攻, 才能造成巩固的后方和适应着国内战争环境的任何变化。

四、党在组织革命战争中本身的组织任务

要能顺利的完成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 完全依靠于党的组织力量之加强与发展, 五中全会指出: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 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 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 依靠党的行动上的思想上的政治上的一致, 依靠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纪律, 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只有坚决的奋斗, 反对一切离开和曲解国际和中央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党才能胜利的领导争取苏维埃中国的斗争。”

中央分局在深刻了解和改正过去的错误中, 应该着重指出: 党的组织力量之削弱与关门主义之错误, 使得党的组织, 远远落于革命客观形势发展之后, 远远的赶不上我们所担负着的巨大的任务。在党的组织与革命形势之间, 存在着一个剪刀式的裂痕, 中央分局首先应该改正那种关门主义的错误。为了消灭这个裂痕而斗争, 为了造成在贵州的地方上群众的党的组织和红三军党的群众化而斗争, 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这就首先必须执行中央的指示: “坚决的最无情的打击不相信自己的党员, 害怕群众, 不相信群众, 拒绝建立党的基础, 繁殖党的工作的一切倾向与任何企图, 要坚决的执行面向群众, 党要大胆的坚决的向群众开门, 严密并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与领导, 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启发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消灭由于那种错误的肃反而造成的党员群众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 开展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 要用一切的力量建立经常的党的生活。这样, 必须完成以下的任务。

(1) 在动员红军、游击组织革命战争的基础之上, 准备庆祝十月革命的意义, 以十月为征求运动月, 举行公开征求党员运动(要使红军党团员达到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以上), 并增加党内的工人、雇工的成分。

(2) 举行红三军党员代表大会。

(3) 加强黔东党的委员会的工作。苏区内, 在一个月中(九月到十月半), 每个乡要建立一个党的支部、青年团支部, 建立起区委, 并且十月中举行黔东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4) 改善党内的成份, 增加党内的工人成份, 肃清阶级异己分子和失了阶级性的腐化分子。

(5) 建立党报，组织党报编辑部。

(6) 建立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建立教育小组工作，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

(7) 创立党的各种训练班和党校，大批的培养干部，培养出能够为党的路线坚决斗争到底的干部。大胆的勇敢的提拔先进的积极的工人、雇农和贫农分子，在革命斗争过程中考查过的新干部，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

(8) 建立白区工作委员会，以开展白区党和群众的工作。

(9) 加强各独立团的政治处、游击队政治机关之建立。

(10) 红三军各师的政治处准备改成政治部，各团在红军的扩大中，准备建立政治处。

(11) 加强党在群众中的工作，首先是阶级工会的组织与组织工人的斗争，在十月内须举行苏区农村工人代表大会。

(12) 猛烈的发展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的教育。

(13) 加强党在劳动妇女群众中的工作，号召妇女参加生产的竞赛突击，参加文化革命，参加苏维埃的管理，参加红军的后方勤务，参加赤卫队。

(14) 加强党对苏维埃的领导。健全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黔东苏维埃的全部系统，建立各级苏维埃的党团，加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中的成分，依靠贫农，联合中农，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战争的领导。

(15) 保证同中央的交通的灵活，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首先要求广泛的民主的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和无情的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先决条件。现在右倾的表现在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在于没有信心与决心创造苏区，而不加强实际工作；在于不实行向豪绅地主统治进攻的斗争的保守主义与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慌失措，退却逃跑，不坚决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以及对机会主义调和主义斗争，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左倾的乐观的宿命论，也是实际工作右倾机会主义的掩盖，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必须坚决反对以肃反来代替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取消了党内的教育，将党内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而且可以争取与挽救过来的同志，也只用简单的上层的军事行政手段将他肃掉，造成党内恐怖与党员群众人人自危的现象。实际上这样并不能将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暴露

出来，反而达到反革命破坏党的目的。只有在坚决的残酷的进行党内两条战争[线]斗争中才能培养出党的骨干，团结党员群众坚定的站在党的路线之下，反对一切不正确倾向与粉碎反革命破坏党的一切阴谋与企图。只有这样才能将隐藏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暴露出来，使他无法在党内存在。这里，特别需要在党内普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这是杜绝一切反

革命派别的思想侵入到党内来的唯一武器。

中央分局应该加强自己的实际工作，建立集体的领导与实行严密的分工，个人负责制。经常检查决议案的执行，特别是关于党的自身工作与群众工作决议案的执行。为了工作的质量改善与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而斗争，号召同志和革命群众在中央和国际路线基础之上，在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为了执行胜利的任务而斗争到底，这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彻底保证。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红军中党团员党籍、团籍问题的决定
(一九三四年九月)

最近中央来信严厉批评我们解散党和团的错误，中央分局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中央来信及分局的决议随后发出），首先对于红军中党团员党籍团籍问题，做以下的决定：（一）红军中的党与团现已恢复，在清党的过程中，尚有个别自己未登记的党团员应即恢复。（二）在过去清党中被开除的个别分子，责成军党务委员会做重新的考查。（三）在尚未登记的党团员中，因为脱离党的生活太久（有的是从后方失败失掉党籍的），特别是在肃反中政治上思想上动摇的个别分子，军党务委员会仍须继续做个别的考查和清洗。（四）在肃反过程中有被改组派供过的党团员，而只仅仅是供过，没有事实证明，而这个党团员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好的，仍可恢复党籍和团籍。注释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加入过改组派的自首分子重新入党问题的决议
(一九三四年九月七日)

(一) 过去因为反革命派别(改组派、第三党、托洛斯基派)进行破坏党、破坏革命的活动,所以在党内红军内影响了我们队伍中的动摇和恐惧分子,被他们的欺骗压迫加入了反革命的派别。

(二) 但是这些人的大部分并不是阶级异己分子,而是出身于雇工及贫农,在革命的斗争(中)有过劳绩,只是因为政治的盲目和在紧急和困难的时候的动摇,受了反革命的欺骗。

(三) 这样的现象正因为我们党没有充分的政治工作和党的警惕性,所以党对于这一部分曾经被反革命影响的红色军人或党、团员应该加强在他们中间的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治教育工作,以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使他们能明了我们的政策行动,脱离反革命派别的影响,把他们争取与挽救过来,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这正是我党的责任,对于他们的歧视以及无事实的怀疑都是不容许的。

(四) 如果这些人在实际的斗争中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表现了自己的忠实与勇敢,他们愿意始终为无产阶级为苏维埃革命而斗争到底,一直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他们要求入党或青年团,那我们是不应该拒绝他们的。

(五) 根据中央分局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清党条例的决定第七条:

“(2) 加入了改组派及其他反革命团体之党员,只要是工人、贫农成份,自己出来报告并没有做过反革命的工作者,可以不开除党籍,给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罚。

“(3) 如果看过改组派的文件或是听过反革命的报告,或是参加过反革命分子召集之公开的会议,讨论了反革命的问题者,不能算为反革命分子,可以不开除党籍,给以警告或严重警告之处罚。

“(4) 如果是参加反革命组织年限较久,影响较深,或是在党中红军中担任了职务,或是做过反革命的活动,情节较轻的,开除党籍或暂时开除党籍六个月或一年,以后在政治上工作上表现很好,仍复可以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

“(5) 只有成份不好,工作不好,对党又不忠实之分子才永远开除党籍。”
责成军党务委员会对于加入过改组派之党员与团员作个别的清洗和审查。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关于恢复湘鄂边苏区、肃反、湘鄂川边游击经过、黔东苏区的创立、红军现状及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中央：

七月二十一日，中央交通到达贵州沿河苏区，我们才接到了中央的指示信和一切重要文件。八月一日与四日两次中央分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信，完全接受，并在中央指示的基础之上，规定了我们工作的具体任务（见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附件一）。本来我们想而且应当将从湘鄂西失败到今天三年来的经过详细报告中央，但是到现在还来不及做这一工作，所以这次报告比较着重在一九三三年到现在状况的叙述和目前的工作方针。这个报告分成下列各段：一、湘鄂边；二、肃反；三、游击经过；四、黔东苏区现状；五、红三军现状；六、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七、其他。

一、湘鄂边时期

从我们到湘鄂边起（一九三三年一月），我们的企图是恢复和开展湘鄂边苏区。我们到鹤峰、施鹤一带，川军已退走，我们在毛坝休息了一星期，就决定进攻桑植，消灭桑植之敌。当时这一决定，是有意以鹤峰为后方向湘西发展，与中央苏区击破敌人四次“围剿”的任务相配合。同时，觉得施鹤的粮食人口都不如湘西，对于湘西的敌情，则觉得周旅、朱团、罗团，都容易对付。这过早进攻桑植的错误，是由于忽视了自己的弱点（从洪湖失败出来，经过一、二次肃反，部队没有整理），和轻视了敌人的力量。到了桑植，桑植是占领了，发动了群众分粮的斗争，建立了县、区、乡的革委，但是被敌人周燮卿打败出来。在作战中，七、九两师师长、政委是改派分子，阴谋破坏，特别是段德昌。但是当时我们估计了主要的失败原因，是部队没有整理休息，所以退到走马坪，决定了以鹤峰为中心发展周围的苏区。到鹤峰以后，约近一月，就暴发了三次肃反。三次肃反，主要是从逮捕段德昌开始，同时肃清从荆当运转回五（峰）、鹤峰之独立师。这个独立师之干部基础，是王炳南独立团的，这个独立团团团长王炳南、政委陈叶平，均是改派。以前单独在湘鄂边，经过改派几年的活动（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三），全部干部差不多都加入改派，到这时才开始全部的肃反。在三次肃反以后，当时主要感觉到，下层党部（甚至有战士）加入改派之多，特别是党员、团员多，与部队中恐怖情绪之重，一般战士觉得政治工作干部、党的干部、党员团员多是改派，对于党的信仰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当时金果坪中央分局会议，一面纠正肃反中左倾的错误，另外一面，感觉得必须解散党及团的组织，重新登记（附记二、三）。本来因为一、二次肃反，暴露出改组派把持了党和团的组织，所以在二次肃反以后，就有清党的提议，到了毛坝，就决定红军中举行清党。到了三次肃反以后，感觉到党在没有清洗以前，党的活动，供了改派的利用，当时觉得改造党已经不能依靠旧的干部，因此决定解散，重新登记（见关于肃反和清党决议报告大纲与清洗条例，见附件二、三）。当时七师清党负责的是政委沈廉均，九师清党负责的是政委宋盘铭，这两个都是改派。沈廉均当时就利用清党来提拔改派分子，来打击真正的党员。宋盘铭则对清党消极与形式的执行，他把改组派组织又恢复起来，对于宋盘铭、陈培荫的错误，我们曾经严重指出他们是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方式，帮助了改派反

革命，可是没有在群众中公开斗争和撤消他的要职，所以当时改派残余又团结起来成立军委，以宋盘铭为书记。到了四次肃反，才暴露出来，政治部的政务科长（当时负责肃反工作）也是改派军委之一。在四次肃反中，第一次清党已经流产了，所以当时政治机关也没有了，党的组织也停止了活动，当时就以肃反为中心，清党也迟缓了，直到从黔江退出在西库休息时期，才加紧清党的工作（由中央局委员分途去清）。因为肃反路线的错误，没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而解散党及团的组织，没有党的警惕心，及时的撤销动摇分子有嫌疑的分子的要职，所以就造成在湘鄂边还继续三次、四次的肃反，造成了湘鄂边失败原因之一。如果在洪湖及时取消了段德昌、王炳南的领导，那么三次肃反是可以免掉的，同样如果“开展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及时撤换了动摇分子的要职”，那么四次肃反的主要人物（宋盘铭、叶光吉）就可以早暴露出来了。同时在湘鄂边这一时期，还有别的错误。当时在湘鄂边苏区是发展了，建立了鹤峰、宣恩、恩施、建始大约二十几区，包括一百几十乡的苏区，创造了各县的游击队七、八百人，自卫队能够作战，阻止敌人的进攻，土地在苏区已经平均分配，苏维埃运动影响扩大了（才到鹤峰时，群众见了红军就跑），克服了被过去王炳南独立团所破坏了的影响。可是当时苏区的粮食是很困难的，人口也少，参加红军也比较难得动员，所以当时因为粮食的困难，部队分散，部队也不能整理（成天到几十百数里以外去搬给养）。这种困难只有苏区更进一步的发展，才能解决。如果当时以主力来开展宣恩、来凤、龙山一带的苏区，给养与补充问题比较容易了。所以当时在金果坪以后到麻水的这一时期，就应该有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同时，这个时候，徐源泉来进攻湘鄂边苏区的准备，也一天紧迫一天，可是我们对于战争的准备，只是机械的集中给养整理部队。但是当时的客观条件，固守鹤峰一带苏区，给养是不能解决的，所以当时对于五次“围剿”之缺乏警觉，与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方向，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敌人进攻鹤峰时，我们还没有明全部的敌情，当时就决定以主力开展新苏区，留七师来巩固后方（夏希[曦]留后方）。敌人动员了十四团以上的兵力来进攻苏区，我们正在四次肃反，又没有给养，在这种条件之下，烧巴岩中央分局才决定了主力退出湘鄂边的策略（见中央分局烧巴岩会议决议——附件四）。当时军部带九师及教导团到宣恩、利川、来凤一带游击，吸引了将近千人参加红军，组织了当地的游击队，扩大了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分化了神兵的组织。军部各部处及九师各部处，大部分已经清党完毕，可是因为当时没有集中，军部为找七师回到鹤峰三次，以致于没有能够争取胜利。在敌人主力进攻之下，七师击败了从慈利来的朱团，但七师在力量上自然不能巩固苏区，当时只能傍着苏区游击牵制敌人，以便军部及九师在上面发动群众。七师对于牵制敌人的任务，开始是达到了，但是军事上，以后犯着冒险的错误（游击得不远而且在西斋攻坚），以及在牵制的任务不能达到了的时候，以及敌人向上面转动的时候，应该及时的集中自己的力量。但是以后七师就逗留在湘鄂边苏区，没有去集中。因为当时夏希[曦]觉得集中也不能击破敌人，就有分开游击的企图，夏希[曦]当时对于鹤峰失败以后的布置，没有组织秘密组织与游击战争；当时把游击队以及工作人员一齐编到七师，主要的是觉得没有可靠的干部，怕把游击队不巩固，枪枝反武装了团防，这便是由于不相信同志、不相信群众的错误。夏希[曦]当时在七师也没有清党和帮助七师的政治工作，仅仅想加强特务队的政治训练来培养干部。这些错误，是没有遵照烧巴岩、银石坪会议

决定，一直到七、九两师会合，中央分局会议才了解和揭露了自己的错误。

二、二、三、四次肃反报告

一次肃反是在敌人四次“围剿”的时候，常常是在前方作战，同时在后方便逮捕反革命分子。在一次肃反当中，改派在红军中的组织系统（军委、师委、团委、支部）差不多粉碎了，还剩了一部分上层改组派的领袖如段德昌、王一鸣等。在一次肃反过程中，改派主要的阴谋，是秘密的发展组织，用恐吓的手段干涉自首，在行动上加紧破坏阶级路线，在作战上破坏战争的胜利（如勾结敌人，绘图送给敌人，破坏战略战术）。关于一次肃反，当时曾给中央报告过，同时一次肃反材料，完全在洪湖没有带出来。

1、二次肃反开始于六房咀，是一九三二年八月。此次正是我们失败之后，差不多每天有敌人追击，每天战争和行军，部队的建制也是破坏了，完全失却统率的机能，完全不能听从指挥，枪一响建制即完全紊乱。所以每天部队中丢枪、抛弃军用品以及少数的拖枪投向敌人都随时发生，军旗都在此时被改组派分子抛给敌人。尤其严重的是阶级路线的破坏，在农村中，破坏了阶级利益，到小的街道上，所有的东西完全没收一空。

二次肃反，亦是这时开始，本来一次肃反已经粉碎了改组派的组织体系，但是从军校毕业的学生中补充军事政治负责人，特别是李人一、唐赤英、李强、齐素卿等补充到红军中，在军事系统内政治制度政治机关内和党的组织里，增加了这一部分人改组派的分子，这些人又把粉碎了的改组派组织领导恢复起来。在此时，最严重的是破坏阶级路线，以及涣散军事组织，是改派当时的主要阴谋。

在改组派最狠毒的计划，是王一鸣与宋盘铭计划将七师拖走。这一个计划是王一鸣与宋盘铭共同商议的，改组派这一个计划的未实现，是因为与八、九两师和军部会师才没有实现。二次肃反，一直继续到长途行军的终结。我们的长途行军，是在苏区失败之后，部队的政治情绪失败主义的非常厉害，改派利用这一个条件更大的来破坏我们。所以他们组织有放火队，专意来烧穷人的房子，阶级路线在长途行军中完全破坏了，敌人跟踪追击，每到接火的时候，部队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即在内部打枪，以致枪杀我们自己的战士，所以每次接火部队就破坏到不成建制，甚至跑到宿营地，才能将建制归还。

二次肃反共逮捕二百四十一人。这二百四十一人中，有一个师长王一鸣，一个军参谋长唐赤英，其次即是团长、营长以及一次肃反中所残余的政治机关人员，连长这一级是很少数的。

2、三次肃反是退出桑植后，在恢复与发展巴东、建始、施南的苏区过程当中，当时改组派的口号：“立即回洪湖去”，山上不能创造苏区，包谷饭不好吃，山路不好扒[爬]。在桑植两次作战，完全被段德昌、宋盘铭等改组派分子破坏的，那时二十七团团团长周海成领导一部分反革命分子把枪送与敌人。

从桑植退出后，在走马坪与独立师会师，独立师主要的是湘鄂边独立团编制成的，湘鄂边（五[峰]、鹤峰）党的机关、苏维埃机关、部队中的主要的地位完全力改组派把持。这些改派的领袖如周小康、陈叶平、杨英等在湘鄂边的改派差不多是公开活动，如像在支部会的讨论“红军好呢？还是白军好呢？”如果说白军好就可以介绍入党，以及讨论联合团防与换旗子的问题。在湘鄂边改派活动最积极的时期，是唐赤英到湘鄂边巡视之后，湘鄂边的阶级利益简直是破坏完了，甚至一斗包谷，几升黄豆就可以取一个经济案子以

至于夜里强奸的事件。

所以三次肃反的开始，从破坏独立师的改组派的组织，一直到段德昌。在逮捕段德昌前夜的时候，段德昌在刘家寺企图将九师拖走，可是这一个阴谋计划未有实现。

三次肃反共逮捕了二百三十六人，主要的是段德昌与军参谋处长和湘鄂边独立团的改派分子。

在三次肃反中还发现了两个人。一个是常德国民党市党部派进来的，一个是湘鄂赣改派来的。国民党常德市党部派来的戴世杰一进来，在二、六军时戴就与柳克明发生了关系。

3、在三次肃反以后，党的组织解散了，因之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是完全停顿的。四次肃反，一共逮捕一百七十二人，主要的是宋盘铭以及七师师长叶光吉同师政治委员盛联均和军政治部政务科长以及军管理科科长江器也。

这一次肃反的开始是起于九师二十七团以及师部各部处联合着反对师长拥护宋盘铭。这一个事件的里面，是二十七团团团长联合二十五团团团长等主要的反革命分子，企图举行一个军事叛变。他们已经派了人与施南保安团接头拖过去，这个派人接头的事情，宋盘铭是参与的。这个时候，在九师里面指出一个口号来在下面讨论：“改良主义好呢？是烧杀主义好？”事后又发觉在金果坪时，改组派已经派人到宜都与国民党发生关系。

4、一次肃反的材料，失败时没有带出来，逮捕的约计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这些分子，最大部是一九三一年以前加入的。

二、三、四次肃反逮捕的总数，共六百四十九人：二次二百四十一人；三次二百三十六人，四次一百七十二人。

这一些数目中加入改组派的时期：一九三一年以前的八人；一九三一年的二十九人；一九三二年上半年的二百二十九人；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的二百零九人，一九三三年上半年的七十人，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的一人，时期不明的一百另三人。

一九三一年以前的改组派主要负责人中，如王一鸣、唐赤英、刘昌运、汪洋、段德昌、李人一等。段德昌是一九三一年第一次全国军事会议时在上海由周逸群介绍的；王一鸣在未来红军前就是改组派，他负改组派使命来的。

审判的结果：二次十四人（不确）处死刑；三次处死刑的五十六人；四次处死刑的四十一人。因病死的共二十八人；其余大部分自首释放；有四十余人开除红军军籍送出苏区。二、三、四次未书明如何判决的：二次一百九十八人，三次六十九人，四次二十六人。未书明如何判决中，在二次里有一部分是处死刑的或逃跑，三、四次则系立即开释的或开释未书明的。

在肃反当中，三次肃反举行大的公开审判两次（段德昌、吴玉堂、沈子祥），四次肃反举行公开审判一次（宋盘铭）。

对于下层的干部，一、二、三次从连长以下大部分准其自首，战士完全不逮捕，至第四次，团长有几个准其自首，恐怖情绪也减弱了。

关于改派加入时期的材料；是凭他口供，实际是不完全确实的，因为改派分子都隐瞒加入时间，来企图减轻对于他的处罚。

三、游击湘鄂川边的时期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七、九两师会合于鹤峰之石灰窑，当时中央分局谈话，向应提出了两个办法：一个进西、秀、黔、彭，创造新根据地，同时要看看湖北敌人是否跟我们追击；一个是向两个大苏区靠拢，以保存革命的力量。

过几日到了宣恩大村，开会讨论湘鄂边失败的教训与当前的任务，决定向西、秀、黔、彭发展，创造新根据地的策略，并指出向两个苏区靠拢是错误的，向应自己也取消了这个提议。从大村有了这个决定，于是我们由恢复湘鄂边的口号就改成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中心口号。当时决定在军事上占领黔江，以后取得了占领黔江的胜利。黔江有神兵联英会的组织，他们是与当地驻军作过武装斗争，我们在黔江驻了一个礼拜，吸收了几百人参加红军，以后还有几百人没有赶上。可是我们当时没有积极的发动群众斗争的工作布置，因为当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企图在军事上巩固的占领以后，才进行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如果当时加紧的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斗争，就可以创造成为一个游击战争的区域。当时只是在退出时留了几个人在那里做秘密工作，以后这几个人就成为鄂川边独立团的基础。在黔江退出以后，当时企图游击川边，消灭小的敌人，及到利川之小河就受到川军压迫，于是当时只是企图摆脱鄂川两方敌人的“围剿”，于是回到湘边，才在龙山境内休息了半月。这个时候，正是湘边军阀陈渠珍去参加黔战的时候，所以我们得在湘边休息。在这个时候，即进行清党的工作。九师清党，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可是我们没有能够利用这个时机来发动群众的斗争，去组织群众，所以在这个时期游击永顺、龙山、桑植、大庸、慈利五县境内，有两个多月陷于无目的的流浪。以后湘军抽调部队来“围剿”，经过几次作战，我们就受了损失。在这一时期内，部队内的失败情绪增长了，老战士开小差的几十人，改派残余又复活动，造出谣言来离间破坏党的领导。在这个时期，党的支部能反映出—部分情形。中央分局一致的将改派残余破坏党的阴谋粉碎了，逮捕改派残余十多人。

最后在江垭作战以后，中央分局才决定重复回到西、秀，并企图创造鄂川边成为一游击中心区域。主力部队以后要围绕游击的中心区域游击，所以又由湘西游击到西、秀、咸丰、利川，与鄂川边独立团会合。在四月举行十字路中央分局会议，十字路中央分局会议的主要意义在于：（一）企图创造游击中心区域成为新根据地；（二）要用大的力量做群众工作；（三）要有目的的游击。在这个会议以后，由鄂川边独立团会合，才决定发展鄂川边苏维埃运动的任务（见中央分局关于发展鄂川边苏维埃运动的决议——附件五），但是主力部队还不能在鄂川边屯住，所以又从利川游击到酉阳，稍得休息，继续完成了七师清党的任务。在酉阳又受到川军的进逼，所以才突出彭水，从彭水渡河进贵州。到贵州先到后坪、婆川等地，敌情薄弱，但是人烟稀少，给养困难之极，于是又由沿河渡到乌江东岸，在沿河、酉阳边境游击。这次在内部的工作，办了第一期干部大队，军政治部、军党务委员会和两师党的工作，才逐渐的建立起来。

四、黔东苏区的创立与现状

自从六月十五日到了印江、沿河交界之沙子坡，我们与当地的神兵斗争取得了联系。到了枫香溪以后，我们估计到：（一）群众的斗争与情绪；（二）敌情的薄弱。就决定了在印江、沿河发展苏维埃运动，就决定调集一批干部把军委会的机关建立起来，即刻成立军委会的宣传队。印江、德江、沿河、婺川一带，去年有神兵的组织。他们的发动是为反对派苛捐杂税而起，他们到处设有神坛，神坛设有佛祖，练有神兵，俨若政府。神兵与当地驻军战争失败，于是就渐形瓦解，但是组织还没有破坏。

我们认为神兵是一种农民斗争的原始形式，但是被地主豪绅领导出卖群

众的斗争。我们的策略，首先在接近他们，在接近了他们以后，主要的是以土地革命口号和土地革命的斗争，来夺取下层的群众。同时，我们在群众中还直接的单独的组织农民的团体。当时采取了这个工作路线，我们当时组织群众的方式是两种：（一）是组织游击队，同着红军行动；（二）是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斗争纲领是抗租、抗税、抗债与反对国民党政权，发动土地革命。会员是雇农、贫农、中农，这是苏维埃政权没有建立之前，白区组织农民群众的一个方式）、雇农工会。在这一个地方，群众斗争发动了以后，就组织革命委员会和建立苏维埃，以后在建立两个区的革委以后，已经有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农民协会的形式就不用了，到了一地，就直接组织农民小组，这种小组部举有代表，以后就转变成为苏维埃。在红军占领的区域，我们才去的时候，群众还跑兵，经过宣传以后群众才回家，我们就去组织农民小组。组织以后，就开群众大会成立乡苏维埃。乡苏维埃成立以后，就开始没收土地，分配土地，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大约快的七、八天，迟缓的两星期，我们就可以将驻地范围建立乡苏维埃，分配土地，成立游击队，这个快慢，主要的是依据于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数量与质量。有的区域，是成了游击队，以后才派人去组织群众，或者因为神兵关系，群众已来参加红军，该地还没有实行土地革命，主要的是干部以前准备不充分。在开展地方工作，红军成为发动地方工作的骨干。现在军政治部有地方工作部，有地方工作训练班，各师有宣传队，连有流动宣传队。从红军中调去参加了苏维埃工作的约一百人，参加独立团的、游击队的约近三百人。

现在我们把黔东苏区的现状叙述一下：现在的黔东苏区，包括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地界，建立了十七个区革委，约百多乡苏，约有将近十万人口，纵横约二百里。在这个区域，土地都已经没收或分配了。没收和分配的原则，是依据全国苏维埃土地法，将豪绅地主完全没收；富农土地亦予以没收，分配以坏的土地；中农的土地没有动摇，少地的中农还分得土地；红军家属及雇工均分得上等地，较普通的劳动力要加三分之一；红三军的老战士每乡分配十个得到土地。除此以外，每乡还有红军公田（约十挑至二十挑）及苏维埃公田（约十挑至二十挑）。

一般的说，地主、富农的土地转移到贫农、中农手里来了，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消灭了地主经济。但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当中，地主、富农的土地，有遗漏的隐瞒的，经了〔过〕第二次查田，又增加了每个劳动力的劳动分地。例如沿河五区白石乡，第一次每个劳动力分得五挑零五升，经二次查田，每个劳动力分得六挑了。土地问题之没有彻底解决，主要的原因，是雇农工会与贫农团没有起积极的作用，而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现在已极力纠正这个错误，发动广大的群众查田运动。

劳动法的执行，还没有系统的进行。不过在有些区域，工资已经增加。例如淇滩市镇的挑水工人，每挑水由五十文至百文。刀坝的手艺工人，他们自己提出增加，由八百增加到一千二百文。零工由三百文到六百文，增加百分之百。

苏维埃的组织，现在仅成立乡的一级，十个公民举代表一人，每乡有三个总代表。现在照中央苏区办法改造，并进行建立各区的苏维埃，现在是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

肃反的斗争，在群众中还是不充分，在部分的苏区群众，自动的捉拿乡长、区长。现在乡长、区长一部分被红军捉了杀了，一部分还在苏区边境积

极组织反动武装向苏区进攻。

黔东第一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是七月二十一日举行，到会代表共一百三十余人，贫农三十一，工人五十四，中农八，士兵四，小商三，其他不明七，红军二十余人。在大会上讨论了下列的决议：（一）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二）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三）红军及地方武装问题决议；（四）优待红军家属条例；（五）肃反条例；（六）苗族问题决议。当选举八十人的执行委员，三十二人的常务委员，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在大会以后，苏区发展了二分之一，地方武装也加强了。

苏区的地方武装分为三种：（一）红军独立团；（二）游击队；（三）赤卫队与少先队，红军独立团已经组织，有吸收新参加的战士约一千余人，独立团曾经取得几次小的胜利，最大的一次是击溃王家烈敌军一营。除了独立团外，还有独立的游击队约十个，吸收的新战士约四百人。至于自卫队，则大部分乡苏均已建立，能够放哨守卡，但是还没有进行军事训练，人数不详。少先队还只在几个中心乡开始，没有成绩。

在苏区内党的组织，还只发展新党员二十八人，已经建立特区党工作委员会、青年团工作委员会。群众组织，各乡大部分建立，有雇农工会、贫农团、少年先锋队。农妇代表会议的工作亦已开始。

五、红军中略情与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问题

1. 全军人数约 余人，此中包括着新的成分增加。在咸、来、利游击的过程当中，吸收新参加红军约千余人，结果只保得四、五百人。在黔东增加新的成分约千余人，可是这千余人还是不巩固的。老战士的削弱，主要因为没有巩固后方，每次作战的伤兵不能归队，部队内里政治情绪，还部分的有失败情绪与自由主义和军阀制度残余的倾向，以及肃反的恐怖情绪。老战士开小差的事件在现在才没有了。在老战士中现在还有时发现有阶级异己的分子，如地主、富农甚至还发现地主官僚（县知事）的儿子，父亲同娘都被组织上杀了的，土地亦被没收了的，还隐藏在红军中。

2. 政治系统在一次肃反中就破坏了的，如政治部和政治处在一次肃反后，只剩少数的次要的工作人员。在六房咀的时候，政治工作人员虽然增加了些，但是很少的。在二次肃反中，政治系统完全破坏了，到桑植后才开始补充指导员，以及到鹤峰苏区的时候，在清党的过程当中，准备了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可是在党的解散后，这个工作又停顿了，一直到现在才全部恢复了政治制度与政治机关的工作，但还是不健全的。

3. 党的解散是在一九三三年三月，重新登记又经过多少延缓，这中间经过第四次的肃反，登记党又被改组派宋盘铭、盛联均利用来提拔改组派分子。在一九三三年八月间军部各部处的党，才初步的登记完毕。九师从一九三三年九、十月间开始登记，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间在西库时，才初步的登记完毕，七师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在腴地才初步的登记完毕。

4. 干部的补充：第一期的干部大队业已毕业（三个月）；第二期正在开始。同时军政治部有短期流动训练班与地方工作部、地方工作人员训练班。

5. 红军报纸，以前是《战士的话》，出小册子，现在改为单张，名《红星》。

6. 目前在部队当中最感困难的是给养问题。给养的搬运，完全由战士负担，由每连派差事出去搬给养，甚至出去搬给养由部队掩护差事达一百多里远的地方去搬。

7.清党以后的党团员总数及成分如下（清党开除的共计党员三十人，团员十三人，内一部分是临时开除的，没有总结）：

[1]全军党团员总计四百六十三人（党员二百六十七、团员一百九十六，内新加入的约数十人）。[2]贫农二百五十五人，雇工一百一十二人，中农一十六人，手工业者三十六人，苦力工人四人，小商八人，牧童二十四人，学徒八人。

8.红军在创造黔东苏区的过程中，战斗情绪与军事技术也相当提高了，最近几次与敌人接触，已经取得几次的胜利；

八月十五日第一次与沿河傅恒中旅战，俘获八十余人，获枪七十枝，敌溺死河中无数。

八月二十四日[1]，第二次与黔军廖师黎团战，俘获敌八、九十人，得枪一百五十枝，毙敌七、八十人。

八月三十日，第三次与秀山杨卓之保安团战，俘获敌人四十多人，得枪三十余枝。

六、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关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已见中央分局八月四日决议，这里只补充几个实际问题。周围的敌情：印江原来是廖怀忠的防地，廖又是反王家烈的，我们在印江活动，与及王家烈部队的前进，廖部移防松桃，现在部队涣散，只有数百人了。沿河是蒋培绪之傅旅及杨旅，战斗力亦弱，我们曾击溃其一团，现在进攻苏区的主力，是王家烈派来的李成章旅，约计步兵三团，时常配合团匪来进扰苏区。再则铜仁驻有柏辉章约四团。酉、秀驻有田旅约二团，战斗力较强。黔、彭驻达旅约三团。

我们现时的困难，是粮食，苏区小了，又遭天旱，收成只有一半。这种困难，主要从扩大苏区解决，所以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在猛烈的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争取更广大的群众加入斗争。关于粮食，我们现在正在发动群众，夺取附近白区的地主秋收。

为了加强苏区内的工作，夏希决定留在苏区指导党、苏以及军事工作。重要问题则到前方召集中央分局会议解决。

关于白区工作，已指定一个同志专门负责，还须建立专门的委员会。

关于干部的培养，军委会办了一政治训练班，学生百五十人，尽是苏区本地的，已训练了一个多月，可派出四十人工作。

七、其他

我们有向中央请求各项：

1.请加强中央分局的领导力量。现在分局只有三人，两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既不集中又不能应付后方，甚难工作，请中央至少派二人加入中央分局。

2.请少共中央派一代表来。

3.中央分局与军委会的领导工作要分开。本来从洪湖出来至黔东，革命军事委员会没有机关，仅仅有一个委员会，以后委员只有四个，也没有开会。现在苏区开展，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建立起来。现在由我们三人组织主席团，后方军事工作，现在还是由夏希兼负。由夏希兼负其责，是照顾不来的，反致妨碍党的工作，但是在前方一时又抽不出人来，请中央对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问题，给以解决。

4.请中央加派理论的、军事的干部来。特别是军事的干部，有专门技能

和知识的军事干部，以及参谋人才，需要得非常迫切。

5. 请中央通知四川省委设法与我们取联系，并加强西、秀、黔、彭、涪州一带工作。

6. 对于洪湖，请中央设法去建立秘密组织和游击战争，我们在可能的[时候]，亦当准备一批干部派回。

7. 关于保卫局工作，特别是红军中建立政治保卫的工作，请中央详细的指示。

有向中央声明的两点：即黄德标所说，提拔干部要经过保卫局，介绍党员要经干部二、三人介绍，旧党员统统不要，并没有这回事，当时的清洗条例，可以看见。最近关于党籍和团籍问题的决定和自首分子的决定，均寄上一份（即附件六、七、八）。

关于交通关系，已在设法建立，由李同志面谈，我们过去对这一工作的疏忽，是非常错误的。

关于鄂川边独立团方面的情形，因为交通断绝，没有报告，正在与他们建立交通关系。

湘鄂西中央分局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参考资料

贺龙关于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

整理记录的几点说明

一、为了详尽，并保持贺总谈话原样，所以力求仔细，没有调动先后次序。

二、有些人名、地名可能不十分准确。凡不确切处均注名“待查”字样。

三、记录稿未经贺总审阅，有错误处由整理人负责。

到上海时根本不知湘鄂西的党组织及工作情况。只知道贺锦斋已在广州失败后入党，并要求党派他至长江搞游击战争。后即带一批在广东失败后留下来的同志到武汉弄了几条枪，就搞起来了。贺锦斋当时思想上不是马克思主义，是旧军阀主义，对过去失败不服气，以为总会搞起来的。我的情况更是如此。沿长江至湘西一带，车湾、藕池、新堤、调关驻军全是我的部属。四十三军第五师除师长外，其他旅团长都有我熟悉的人。同时，长江两岸土匪多得很，而贺锦斋部则另一样，他们不抢人，却劫轮船搞商人的钱，但当时我只知贺锦斋到了长江，搞得怎么样？两湖党还有多大力量？都不清楚。

广东暴动后，我从香港到上海。党决定我和刘伯承、林老一起去苏联。决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走，坐货仓走。但十六日机关破坏，敌人说我到了上海，结果他们先走了。十几天后，我走不成，就想搞红军吧！我与周逸群把想法谈了，要他向总理谈。我说在上海，党负责，上了船，我负责，一到汉口我就能活动了。谈了四五次后，中央批准了，我们就准备走了。走前，准备搞两打驳壳枪也没有搞成。到汉口的接头关系，恩来同志交待给周逸群，我在一旁看见，记住了是“谢弄北里十七号（待查）我们带了张海涛、史庶元等由上海坐船去汉口。在轮船上出了一件事：一个国民党特务叫王国祯的带了一个婊子与史庶元搞熟了，即请我们吃饭、打牌。我只带了三十元，给三个人分头带上，就打起牌来了。那特务想赢我们的钱，打下来，我却赢了他七八十元。他又要互相交换地址，我就随便讲了一个地址给他。到汉口后，去东方旅馆，我们接头关系两个都被破获了。我就记起“谢弄北里十七号”，也没有介绍信，就硬闯去了。会到郭亮的老婆。他们以为我是侦探，由刘鸣先（叶挺的副官长）来与我接头，其他人就往下跑走了。接好头，我又去东方旅馆找来张海涛。

当时，组织上叫我搞根据地、苏维埃、游击战争，但是，怎么搞？没有指示。怎么搞红军，发动群众，发动起来后又怎样组织？都不清楚。只知搞农民协会：搞军队的方法是北伐军式的。到了汉口，与郭亮接了头，准备走，又没有钱。第二天程潜的一个侄子及一个外甥（姓钟的）来了。他们都是党员。侄子管军械，从汉阳兵工厂搞来了枪、子弹和重机关枪。外甥管军需，把五万法币带到党里来。同时，武汉三镇又要组织暴动，我的一个团长蔡申熙（陆陵人）在招兵，组织三个军，武昌、汉口、汉阳各一个军。要我当总指挥，我就准备参加暴动。省委开了会，有郭亮、周逸群和我，研究并接受了广东暴动的经验，成功则好，若失败则快走，去沔阳会师，湖南的拉入湘东，我主要搞鄂西。到汉口，省委开会，郭亮书记。讨论过如何发展游击队、发展党。当时省委的经费是由游击队供应的。不巧，阴历腊月廿三的前夕，敌人破获了一个印刷机关，搞到我们全部暴动计划。而我们所住的郭亮家又是印刷所的铺保，我们只好转移。这时满城大乱，敌人沿家喊着准备美孚没

灯、水等，叫嚷“共产党要暴动了”！二十四日晚，贺锦斋派一个姓黄的及我的两个侄子贺学定、贺桂生来找省委送金子，原来贺锦斋已在藕池，发展了百余人枪，他要四十三军五师的团长谭浩然等三个团起义，团长们不愿搞，说要等我来。贺锦斋就单独干起来，抄了一家银号，搞到千多两金子，送到汉口。贺锦斋给湖北省委送了三次薪，正是省委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包了一条船，搞了两支枪一些子弹。一支打得响的我带上，一支打不响的别人带上了，当时码头上的敌人检查很严。我穿着皮大衣，围围巾，戴黑眼镜，走到敌人面前打开大衣让敌人搜，敌人看我象资本家，就放我上了船，一上船，我的两个侄子就认出我来了，我没有作声。船上有“袍哥”组织，管船的账房也认出了我，我即交给他一套话，准备应付敌人。开船的时候没有拉桅，船到鹦鹉州敌人的汽划子来检查了，船夫装作修桅，我藏船的后仓里，账房送了点礼给敌人，就混过去了。二十四日走的，越是大摇大摆的越没有问题，二十六日船到新堤，新堤驻军是李觉部，周围也驻满了敌军。打听出观音州有团防，只有十条枪。我问周逸群：把枪搞来如何？周有些不愿意，说手里无枪杀不得人。（当时我们二十多人，有十几个工人，还有给鲍罗亭当过警卫员的）。我说“去拜客！”就找到团防队长。我抓住团防队长的手，就说“我是贺龙来借枪”！一个团防要动手，被芦冬生一枪打倒，就搞了十多条枪，二百多发子弹，给他们打了收条。船又走了一天一夜，二十七日下午到反咀，看见沿江有一家茅棚子，站着一些人喊船，我说“迎上去！”结果是贺锦斋他们，就会合了。他已有一百七八十人，百多条枪了，在反咀会合过阴历年。周逸群调查地主，有四家土豪，晚上去给他们“拜年”，将土豪杀光了，房也烧了。此时取名叫四十九路红军，口号也打出来了，到了下车湾，前委开会决定找当地党组织，在这里搞个基础，开展游击战争。这天下毛毛雨，我在门口看来了一支船，船上只一个人，带博士帽子，下船就奔向我来，一鞠躬，叫我总指挥。原来这人是党员，下车湾人。他说他们有十几个党员组织了一下，与石首中心县委取联系，但中心县委不承认，我叫他去找中心县委。这时，中心县委书记是李兆龙，组织部长刘革非，宣传部长李良耀。第二天，李兆龙来了，他说各县党组织皆已破坏，只有七个县组织了这个中心县委，找到组织就好办了，准备搞秋收暴动的尾巴了。准备在江陵、石首、华容、监利、安乡五县暴动，杀三万地主。但交通没有把决议完全传达到各县，有些交通还被敌人捉去了。当时党还有两支秘密武装，一是吴仙洲，石首人，三十枪，六十人，另一支是肖人谷河南人，他由武汉到洪湖只带四支枪，就组织了一个军三个师，军部一支枪，每师一支枪，共十九个人。会合时已发展成一百多人，一百多枪了。暴动后有一夜打了七八个团防。消灭了一部份土豪劣绅，撤到砖桥后，又搞掉土匪文大哥部百余人。暴动时的暗号是“镰刀”“斧头”。江陵陈香波（贺彪的舅舅），石首的屈阳春也都是暴动时搞起武装来的。后来再到反咀，下车湾，部队已有三百余人了。此时沿江土匪很多，专打农民协会。前委便在车湾开会吸收中心县委参加，决定首先消灭土匪，因为他们比团防及国民党军厉害。车湾会议决定已经在群众中暴露的党员要隐蔽下来。中心县委指挥部队还比较顺利。当时队伍中没有党组织和支部，只有个别党员如史庶元（黄埔生、老党员是叶挺的团长）肖人谷（大革命老党员）。那时政治工作叫精神讲话，内容是摘反革命报刊中与我有利的材料讲。行动有参加秋暴（年关暴动）。消灭土匪。几个星期就把土匪消灭光，搞一百多支连枪，打监利后分兵，中心县委后来也搞得不错，

只是隐蔽下来了。会议上还批评了贺锦斋，他来长江一带后，不搞党，却化名斋公，以斋公名义搞了一个党，因他刚入党不久，什么原则都不懂，也没有宣传过党的政策。会上有同志说：“你应当写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他说：“共产党万岁还知道，打倒土豪劣绅不知道啊！”七天以后，肖人谷带百余人来会合。合并后，共有五百人、三百枪决定第一整土匪；第二整恶霸；第三整土豪。二月份内消灭了土匪，得驳壳枪百余支。在车湾找来最大一股土匪头子张烟灰，他有七八十支枪，百余人，过去与贺锦斋有联系。我和周逸群、芦冬生接恰他，请他吸鸦片烟，他带连枪二支，警备性满高，我向他说了些四川有名的军阀（因他是四川人），并说我是贺龙，不要把我认错了。他就立刻尊敬起我来，我要过他的枪，芦冬生把他打倒，后来枪毙了，投入河中，收了他那批土匪的枪。不久，在下车湾时，从沙市来了一个姓黄的骑兵团长找我。我也提了他的枪五六十支。部队即发展到五六百人，以滕树云为第一大队长（滕系南昌暴动时一师警卫营长），第二大队长史庶元，第三大队长肖人谷。听说监利城没有多少敌人，即打监利城。结果打响之后，却有敌门炳岳师的部队，一开始就打伤了我两个大队长，撤下来到调关后边一镇子，在焦山河开了两天会，把队伍交石首中心县委，我们带二十人进湘西。焦山河会议中，关于上山（去湘鄂边）下湖（在鄂西）的行动方针有过争论。但由于我们考虑到原来在上海时，中央提出在鄂西建碉堡，搞寨子的办法行不通，不如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会上大多数同志如中心县委李兆龙、刘革非等全同意我们的意见，才决定去湘西。前委开会时，周逸群是领导。中央决定时就是湘鄂边前委，其他决定不知道，也没有执行。前委书记是周逸群。打监利是情况不明，肖人谷胆子很小。第一，他怕苦，洪湖兵习惯坐船，很少走路，我们却晚上走路，一走几十里百多里，还要杀土豪，他们害怕；第二，是怕打仗。我们是带着南昌暴动的老兵，能打仗，而肖部都是农民，打起仗就有些害怕；第三，是对肖人谷部处理上有些不安。我们提土匪枪百余支，给了吴仙洲部几支，一支也没给肖人谷，大部给了贺锦斋部。肖不满意。那时分配枪也不容易。贺锦斋他们提的枪，要从他们手上要枪比要命还难，周逸群也明白这个情况，做了一些工作，没有作通，也就算了。后来，肖人谷回了洪湖，他不愿受石首中心县委的领导。这个人也不太好。在未与中心县委会合前，我们打下过朱河，那是个大镇子，有电灯、轮船、妓院等等。我们打土豪的方法也简单，看那家屋子阔气，就搞那家的经济。我们搞了极多的银元、铜元、绸缎，分给群众，群众不要，我们到城外沿途撒东西，群众才要。成千上万的人来领了。我们还沿途贴标语，老百姓很奇怪，说我们也是穿便衣的，和土匪一个打扮，可是不要钱，贴标语……，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们在朱河与车湾之间还劫过鲁涤平的军火船，搞到几万发子弹。那时的政策是盲动主义的，作群众工作，找农民谈话，组织农民协会就受批评，杀土豪烧他们的房子就受表扬。我们那时很听党的话，为什么？受大革命的教育。反革命那样杀，我们也有报复性，我们没有悲观失望，相信革命一定成功。不然，革命活动就展开不了，队伍也拖不动。

在焦山河会议上决定肖人谷率部回洪湖，其他武装统一由中心县委领导。中心县委的任务是领导游击战争，恢复地方党组织，相机消灭沔阳的叛徒。决定在六月于公安、松滋会师。贺锦斋由我带走。后来段玉林的部队就是在吴仙洲和贺锦斋两支游击队的基础上搞起来的。

我们过连云溪、毛笔街、张家湾、关山等地，那里都住满了军队。到石

门后，住到张海涛家，本来准备会合石门党，此时才知道石门党已经分裂，石门军事部长罗效之带了武装成为叛徒，少部武装由曾庆轩带领在南乡坚持斗争。我们由石门过东洋关，到江坯。我与芦冬生住在徐小桐家，其余同志住在苏子山家。次日到竹叶坪，我住在钟慎吾家，钟劝我回桑植时不要过空壳树，因为陈策勋住在那里，并且派了队伍准备拦截。我们便绕路经麦里坪回到洪家关。一路上有不少队伍想跟我走，我答应以后再寻找他们，这时却不能带，因为没有钱，没有粮，养不了兵，周逸群也劝我不要带他们。在我到洪家关之前，我家里的亲戚朋友们正在打仗，自相火拼。我距洪家关三十里时，就有人去给他们送信，双方立刻停火，等着我来。我来后，召集了这些亲朋，他们还彼此不信任，实弹持枪。我说“退下子弹，再不许打，都跟我干革命！”周逸群也宣传了一翻，当夜（阴历二月初九）成立县委，以李良耀为书记。第三天进了桑植城。此后，我与周逸群去仓官峪，又去我丈人家，回来三四天，龙裕仁带队伍来攻，就打仗，队伍太乱，没打好，失败了。周逸群同志不得已去湖北，后来就在那里工作了。此时，王文轩来信要我去走马坪会朱华生，搞了几千元钱和粮食。等我回来，队伍已经散了。我们剩十个人，到红土坪谷大姐处，联络贺锦斋等二十余人，杨云阶找到贺炳南（有百支枪，二百人），刘玉阶（几十枪，百余人），集合了队伍，在小埠头和龙裕仁打了一仗，缴了子弹、鸦片，十余支枪，打死敌秘书长，尔后找到文南甫、贺桂如，便回洪家关，会合李云卿。这时，陈策勋约了好多团防来攻，李云卿被流弹打死，部队伤亡很小。桑植失败前是有方针的。成立县委，发展组织；第二步改编队伍。这两项都抓得很紧。我一走，贺锦斋改编队伍时就松了劲。他在家，他父母以为他有功，而他在海陆丰时就我的队伍交了枪，我叫他当时打不胜就拖到玉华打游击，他却交出枪。这时他又没有抓紧。周逸群的走又是没有计划走的，我们连面都没有会。就剩下我合芦冬生合心，锦斋是我堂弟，又有娇气，又受家庭的一条线拉扯住。我说，他干就干，不干就反革命，我们就打仗，就是这种混乱情况，仍然与敌人打了三仗。第一仗在梨树垭；第二仗在三；第三仗在龙潭坪。头一仗打了一天，第二仗打了半天，第三仗我不在。几十股武装拉在一起，这样一打，就不简单。桑植第一次失败，封建占主要作用。个人号召，家属亲戚，旧部下，没有党组织，不是明白党的方针政策，后自愿组成的，而是我来了，跟我一起搞，认为还可以升官发财，所以说封建占主导。若有了教育，有了觉悟就打不垮了。这些部队，枪是他们的，又没发钱，只是打土豪，而打土豪一方面与他们有联系，一方面简单化。我虽个人，也有党员成分，也代表了党，但没有党的骨干，没有党的教育，经不起风波。第二次，我从走马坪回来会到锦斋，张一鸣、李良耀到了，组织了部队，在小埠头打了一仗，得了胜利就到了洪家关。陈策勋又打我们一阵，没有什么接触就败了，退到罗峪。这时部队有几百人枪。汪毅夫、关亮如到，我派他们去鄂阳关做陈宗瑜父子的工作去了。先是，张一鸣来后，部队改编，以贺锦斋为师长，王炳南为第一大队长，腾久云为第二大队长。贺炳南、刘玉阶、贺佩卿、王湘泉都是支队长。部队都是自归自的原班人马，枪支也没有调整。共有一千五六百人。此时，临澧县委书记汪毅夫、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和石首中心县委李良耀都来了（李是来为鄂西特委送信，要我去恩施参加谢斌司令部的扩大会议，他被敌俘，我写信去鹤峰将他保释后，来的。）前委开会，决定打土豪、分田地，贺锦斋不同意，撕标语。其实，贺锦斋不敢反对，他只是想迟一点打土豪，或到别

处打，不要搞了他自己的家。我说那里有就那里打，这是党的方针。经过批评，还给了他处分。此后，就南出石门，到王家厂，那时比较顺利，部队有发展。从溧阳一天到王家厂，搞了一些税收员，回来时受敌袭击，打散了一批，只剩下千把人。我带手枪队住曾庆轩家，敌人偷袭，我光身跑掉了，到贺锦斋那里。打了一个埋伏，抢了几个骡子。后住在泥沙，敌人几路包围，一个夜袭，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敌人很多，是吴尚、李云杰、罗效之等部，泥沙一仗，梨树垭贺锦斋牺牲，部队大乱，还有人打我的黑枪。我将部队分散，告诉王炳南处决了几个人，部队在南北墩集合，只剩下张一鸣、李良耀等人共九十一人，七十二支枪。石门驻兵熊少卿和慈利一股派人来，说要我下去，只要我去，他们就暴动，搞敌县政府，配合我。熊当时有一个团千多人，慈利也是千多人。我们就去江垭，结果，这两县增了兵，李抱冰、吴尚两师去了，他们就根本不能再暴动，我们就又去石门北乡，这时是罗效之单独打我们。我们也有千多人，只有几百枪，子弹很少。而谷志龙、贺佩卿都没去。两仗一打就垮了。只剩下几十支枪，又从刘子维团防那里拿了二十支步枪，二千发子弹，又收散兵共有三千余人。这次出去是为了配合两县暴动未成，在石门被敌打垮，此后在内半县又搞了千把人，鄂西特委来了信，叫我们与鄂西武装会合，另外是为了支援湘南，就坚决执行了。当时我是前委书记（从一九二八年三月开始任），廖卓然、雷效卿都来了，这次在部队中建了党，连队有支部、总支，有党员、团员，但不强。当时打土豪有点“懵劲”，只打大的、恶的，打一次吃好久。不是普遍打，同时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打多了也不行。打一个就宣布，烧契，向群众宣传，因此小地主不大怕我们，当时树敌少，打了土豪，分东西给农民，他们都不敢要。问题在于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搞政权，是游击性质的，我刚来桑时的部队自己都有钱。这次是自己搞，连怎样搞都不会，怎样打游击也不清楚，但是以自己为主，搞兵、粮、钱、穿，作战都凭自己。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后来又搞了千把人，此后才真正建立队伍，脑子也清醒些，骄傲个人英雄劲也减少了。我姐姐的话，过去根本不听，现在也听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三个月，共九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廖卓然当排长，王炳南当大队长，也有了团员。

到石门，执行湘省委指示的任务是支援湘东，另外与鄂西一纵队会师，关系是由一个兵痞带来的，他与湘西特委也接了头，要我们支援湘南、湘东。失败后，较虚心了，较实际了，在思想上有了明显的变化，打仗不硬碰硬，用奔袭。打土豪要调查。这些，井冈山经验启示很重要。此时，湘西特委宣传部长陈协平（任秘书长）到，徐才广（任经理处长）也来了，便整理部队三个月，与施鹤部杨维藩取得联系。杨是来风人，部委书记，他当了黑洞神兵王锡九的官，二十多岁的人，当了神兵第一师师长，已经满口皇帝腔了。当时，利川有十几万神兵，我找杨，他不来。我已经有了本钱，即有汪毅夫、陈协平这些老党员，也知道打土豪需要调查，而不是看房子好就打了，懂得了政策。此次与汪毅夫、李良耀、陈协平研究神兵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工作。一方面加深杨维藩与另股神兵头子铁拐李之间的矛盾，使杨找我们要求解决李部神兵。我们即将铁拐李杀了。同时，在神兵中进行阶级教育，做深入宣传，如房子什么人修……等等，于是，神兵靠拢了我们，杨的神兵瓦解了，杨本人就不得不跟我们走了。此次，扩大神兵二三百人（包括铁拐李、

李大菩萨及杨维藩部)。搞黑洞神兵也是有计划的。不分化神兵，就不好活动。许多军阀武装整军整师就是被神兵搞垮的。神兵头子金侠公(即王锡九)是袍哥，又是地主，我以袍哥办法分化他，后来神兵窝子成了我们的根据地。分化神兵还分头做中小头子和神兵士兵的工作。而后，一天一夜奔袭建始，杀其县长，收百余枪，住两日，分东西，做宣传工作。此前，我曾派汪毅夫等，去邹阳关进行神兵陈宗瑜部的工作，又做伐木工人的工作。攻克建始后，我们即去邹阳关与陈宗瑜会合。陈是党员，陈父是秀才，我与其父谈形势所趋，陈协平以同宗关系，与其父谈革命理论，即改编了他们的全部神兵。共二三百人，便打鹤峰，收枪百余支，这时，各种工作大发展了，连队建立了支部，有党、团组织，有连指导员，搞群众运动，搞苏维埃。不久，万涛由鄂西周逸群处来，部队扩编，打败王文轩，去桑植打刘子维。

进鹤峰后，整理了部队，搞起苏维埃，红军中有党代表、政治部。团、营都有了。政委借了恽代英的名字，其实他没来，因为他在知识分子中有威望，就打着他当政委的旗子。再打桑植，打了三仗，第一仗打团防，打跑了陈策勋，搞苏维埃，有了两个县。都是奔袭的战术。部队在桑植整顿了一下，有两千人。向子云来攻，他有四五千人，过去是我的旅长，驻永顺。我曾写信给他，叫他不必要来攻，来则送枪而已，他偏要来。第二仗就是打他，他先派了两个半营。由周宣之团长率领，我在南岔渡口把船放到西岸，让他过河，我隔了六七里路将队伍埋伏好，等敌来后一个伏击，全歼了他的一个团，至少歼灭了其两个营千多人，我们就壮大了，有二千多人，覃辅臣也来了，编了两个指挥(各等于一个师)连队有了支部。第三仗仍打向子云。他的先头部队打他败了后又要来，我又写信劝他，他不听，我派谷志龙守住桑植城南大山三百瞪，准备捉人，把船拉到赤溪河，向自己率三千多人，倾巢来犯，我也有三千人，两千枪，我把桑植城城墙拆了，城门烧了，只留下南门城墙不拆。等敌过河，我们撤上梅家山，怎样埋伏，怎样攻城，都布置好了，等他进了城，就一齐猛冲，一直打到赤溪河，全部干掉。缴了千多枪。向子云的尸体沿河下去流到津市时，脖子上还挂着驳壳枪。只是向子云的兄弟带着百余人从谷志龙守的地方跑掉了。谷志龙胆子太小，敌未来就先撤了，才没有捉住敌人，这一仗打过，在桑植整理了两个月，搞了政权，两县比较巩固，就去大庸打熊家地主熊相熙、打轿子垭，是帮覃辅臣打的，我还调了何键一个团(团长吴玉霖，是我旧部)，他派六个连帮我围寨子，打了一星期，打开寨子，地主跑了。此时敌情已急，我们退回桑植。我们已有四千人三千枪，想打一下，我们两路出兵打他们，结果敌吴尚师攻事好，没有打胜，有些伤亡，就走了，拉到沿河，进樟耳坪，因为五琴普他有几百人枪。不料他叛变，因此等他误了时机，敌人赶上了，一接触，伤亡好几百人，两个团长(贺桂如、陈宗瑜)牺牲了。这两仗损失了千多人，就撤到鹤峰整顿，过年。在五里坪，我摔坏了腿，住了两个星期。后来打孙竣峰，他是几十年的团防头子，在五峰杀人无数，有火枪万支，土炮千门，晚上，我们一个袭击，占其老巢湾潭，杀其祖孙三代，建立了苏区，搞到很多粮食，鹤峰就更巩固了。后到西斋、申金渡，知道了六军消息。六军打入公安，隔三十里路，在公安与六军会师，走前把桑鹤工作交给汪毅夫代理前委(桑鹤两县、五峰、长阳一部)后来周小康也由鄂西特派来。当时与鄂西关系多，与湘西则少，鹤峰由我姐姐负责，桑植由贺文渊管。鹤峰有中心县委总管桑、鹤、五、长、宣恩。

与六军会师后到普济观，开前委会，成立二、六军，编成二军团总指挥

部住府场。有个决定：鄂西中间白点太多，以三个月为期，二军将荆、钟、潜、京、天的白点拔除，六军将江、石、监、沔白点消灭，而后会师潜江，就搞荆、当、远。再后搞南漳、谷城，与襄北九军打成一片，搞一个战略后方，长江发展兴、归、巴，与湘鄂边联成一片。再后去汉阳，与鄂豫皖打通，共一年工夫。若做到后，襄河、长江都可机动，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讨论过根据地问题，这一带人口多粮食多，威胁宜沙（宜昌、沙市），兴归巴搞起牵制宜昌，湘鄂边也威胁宜沙。若武汉来攻，我有苏区，九军可牵制襄樊兵力，互相起作用。这次还大力讨论了建党、建团、政治工作、反极端民主化、反游击习气，一共开了一个星期会，研究得很仔细。后来，邓中夏来了，就把我们从刚刚行动中赶回新沟咀传达国际路线、中央路线，这一来，就把我们的计划打烂了。

国际路线是建立根据地、建立后方，中央路线是配合一、三军团打长沙，就必须打监利、津市、澧州、常德，开始打得不错，打下了监利。此时段德昌当六军军长，邝继勋调走，到石首，王尚荣参军。此后六军打下华容，二军打下南县，就打安乡，我说安乡不能打，要渡五道河，和邓中夏争论了一阵，伤了他的自尊心。后来，打开津市，围攻澧州一星期未下，继又打了石门，临澧。在临澧邮局查报纸，知道一、三军团撤出长沙了，我找王一鸣、王鹤讨论，我们决定把队伍撤到合口，但政委、参谋长不在。我到石门，把报给邓中夏看，给段德昌看。我说常德、桃源不能打了，再过沅水不行，邓不满意。我说要打再派部队去打，这个争论我有两票，段德昌、许光达支持我，邓只自己一票，更不愿意，就要再打津市、澧州。我则说进公安，由藕池回苏区。就因此在合口开前委会，邓仍孤立，其他军、师长、政委都同意我的意见，但邓一定要打，当时有一条原则，即政委有最后决定权。邓说六军打津市，二军打澧州。结果都没打好，退至杨林寺。邓名义上要段德昌去后方搞赤卫队，实际上是撤他的职。段就和我说：“胡子，实际上是撤我的职啊！我有什么错误？”第二天看阵地。第三天，邓中夏说要创造第二个中央苏区。我反对他这个说法，我说，打了公安进苏区就有了门，要扫除障碍。他同意了。我命二军打下了公安。而六军两个师，十六师在杨林寺，十七师许光达师离这里几十里，在街河市。李觉派十八个团来攻。我和中夏说这个仗不能打，要打得集中兵力。这时汤慕禹刚当军长，他是刚从苏联回来，不了解部队，没有经验。就争论。我说第一，我反对打这个仗；第二，反对离开根据地；第三反对搞第二个中央苏区。搞苏区可以，中央二字除去，创造、发展苏区，我坚决干，却不能在提中央二字与中央苏区对立。邓中夏是有些英雄主义的，当时全党，他谁都骂，就是没有骂毛主席。他不听，后来，杨林寺一仗，失败了。许光达、王一鸣所部各一部分都去了石首，我急调二军来刘家场，命芦冬生的手枪队顶住。我再问邓，他不做声了。我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瞎打。李抱冰三个旅，陈玉奎（即渠珍）三个旅打许光达一个师，怎么没顶住？后来，二军团进鹤峰走马坪，接我姐姐来信，说甘占元部来此。我们即在五里坪包围他们，解决了甘占元部队，稍稍补充了一下。此后，还东出打过石门，在瓜子峪受阻，又撤返苏区。邓中夏叫我整理后方六军打渔洋关，二军打长阳，我带少数人去邬阳关，资邱一带，在都镇湾碰上二军。邓中夏又来信叫我带二军再攻渔阳关，渔阳关在六军打时只有川军，一郭汝，东部一个营，据险扼守六军上未打下，部队艰苦，情绪很坏。此时敌已增至两个团，更打不下了。第二天，我到六军军部找邓中夏，一见面，

他就大骂我不打渔阳关，说因为二军是我的。我说二军是党的。你问士兵吃饭了没有，我说先去走马坪、枝柘坪搞粮食，整顿部队。结果邓给了我一个班，叫我筹款搞粮，我答应了。就在这个时间我碰到了叶光吉，他赶三百匹骡子，有大批布、棉、线、鞋袜。叶来找我当红军，问要他不要。我说要！他决心戒掉大烟，送上骡子货物，跟我当红军。我又搞了一些东西，才回枝柘坪。我先一个人进去，有人问：“搞到没有？”我说：政委只给我一个班嘛！邓又不高兴。我这才将几千斤棉、布等物拿出来。住了两天，川军杨铭一师从恩施来犯。邓中夏要我带一个团打杨铭一个师。我问多给一些不行”他说不行。我说打好就打，打不好不打。过了三天，打了一个伏击，打胜了，邓没话说了。有一次邓中夏念诗给我听，我说我不懂，就谈起他执行的路线。此时鄂西特委来指示严厉批评邓为上山主义，夏曦也到了洪湖。邓说：国际路线、中央路线，我都执行了，我是摇摆的路线。我说：你是机会主义路线！他伤了心，拍桌子问：那个讲的？我说：是我讲的！后来，还搞了一些决议，总之邓不愿回洪湖，后又将王炳南部改为教一师，兴、归、巴为教二师，此时，邓中夏就能听意见了，听些话了。我说打野三关、巴东，居高临下，在巴东过河，走兴山，一个师打秭归。他全听了，打开巴东，秭归与黄大鹏接了头。打开兴山又打远安。王一鸣打开荆门，许光达打当阳。我告诉孙德清不要打当阳城，主要是打川军，打垮川军再打城。他不听，先打城，敌人来了，没打好，跑南漳、谷城、均州。邓中夏还是不愿进洪湖，总想自己闯天下。

这时，洪湖地区周逸群，段德昌在石首组织了新六军。夏曦从朱河入洪湖，后来洪湖又有水灾，当时只有府场、周老咀、新沟咀是我们的。段德昌拼命打下老新口，与夏曦吵起来，结了冤。原因是段在前边打胜仗，夏在后边遣散伤兵。段找夏论理说：“这是什么政策，你还是后补中央委员……。”夏曦受不住，就记下恨了。后来段率新六军执行两个任务，一是找三军以万涛代邓中夏为政委，刘鸣先为主任。二是开展襄北苏区，这是走前夏曦当面谈的。不久又有一个决议：是开展襄北苏区，找红三军，决议与谈话是颠倒了任务的。出发后，段歼敌一个旅，又打下沙洋、潜江，苏区开展了。我们在青峰镇听说新六军北上，我即召集人开会说接新六军，中夏不同意。当时打下保康，包围了南漳，本可以消灭敌人一个旅。但中夏却要开会提出若新六军接不到，房县苏区失败了怎么办？我说还是要接新六军，就去接了。第二天发现标语：“长胡子要上山，短胡子要下湖”。部队到了报信坡，邓又变了。我叫派骑兵到刘候集去找，找到了六军伤兵，我立即去刘候集。不久，段德昌、万涛、陈培英也都来了。段见我就问：“胡子，你怎么样？”我说：“什么怎么样？”段说：“这家伙是路线问题（指邓）”这时，夏曦有封信给我，全部内容是自我介绍，他是中央候补委员，过去就对我很有感情云云，只是不提党。我就感到味到不对。段又问我与谁一致，我说与逸群一致。段提议整一整王一鸣、许光达、孙德清。我说，他们也不是跟中夏走的，算了吧。后来，会师后就撤了邓中夏的职，召开前委会，确定万涛为政委，研究军事行动，打了钟祥、岳口、沙洋、潜江。但是，夏曦这时以江南苏区失败是段率领新六军出去的结果为名，打击段、万，给段一个警告处分，并且另组织了三军前委，以夏为书记，我（未到）唐赤英为委员，实际是彭之玉来（他是代委员）。彭来后，我们大家都不同意，他也就不赶在组织前委了。五天后，夏曦来到，就争论这些问题，不进行有利时机下的军事行动，结果

潜江又丢了。夏曦说我们（彭之玉带的材料）甫下是一贯错误，这是没根据的。我们当时主要是肃清立三路线，到苏区才个把月，打了胜仗，什么“一贯错误”？但他们却只批评，夏曦这个人品质不好，他指使省委决定把整个部队编为五个大团取消军部，所有干部一律降级。我即与夏争论，我说：省委无权决定，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付主席。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你们凭什么决定？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的，我又说：请召开个党员大会，大家投票，如果赞成你，我回中央去。夏曦只好承认不对，他说：你找万涛去！我说“找万涛为什么？省委书记是杨光华。你有什么阴谋？什么鬼？”其实，我知道内幕，是夏曦搞的鬼。他要省委整军队，整军队干部，挑拨省委与军队和我的关系。我就去省委问万涛，我说这是阴谋，要省委与军队对立。万涛说这个不谈不谈，先成立军部。万涛一句话，我们就又成立了军部。

贺龙关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的若干问题的谈话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二十日)

(一)

二、六军会师后的一些情况

1. 二、六军会师后，二军住府场，六军住峰口。我和周逸群同志去六军，想解决会师后的一系列问题，在我们往峰口去的路上，见六军做有工事，面向二军派出警戒，我想其中必定有人挑拨，就叫周逸群同志下来看。周当时是特委书记又是政治委员。

我们到峰口后，段德昌同志待逸群同志一下马，就把他拉进去，德昌把原委告诉了逸群，说是二军要提六军的枪。这时逸群就拉德昌出来和我一齐谈了。周是不发脾气的人，这次却大发脾气，问有人证、物证没有？当然找不出什么根据来，逸群同志就火了。当时就在德昌司令部里开了个会，未解决问题。会后，我即回府场，约定第二天开联席会议，二军、六军一起开。次日，二军负责同志全到了，地委以上地方干部也到了，六军只派了一个代表来，那次是许光达同志当六军代表。可找许光达同志谈谈。后来听说是邝继勋同志想当二军团总指挥，这次会议后，邝即调回中央。

部队会师后即打监利，第一次打监利没有打下，部队就在普济观开会，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当时确定要把苏区的白点打掉，扩大和发展苏区。苏区怎么扩大？白点怎么搞掉呢？第一步决定以六军肃清长江南北之白点，因六军在洪湖生长的，不愿离开洪湖。二军是从山上下来的就搞襄河北岸，先开辟天门、钟祥、京山等三县与红九军打通，襄南打潜江，然后进入荆、当、远与兴、归、巴苏区黄大鹏部打成一片。第二步集中全力搞南漳、保康、谷城、房县、均州等五城。苏区就互有了依靠，发展也成了个局面。兴、归、巴还可以与湘鄂边打通。

部队正将过襄河，邓中夏同志赶到黄家场，在黄家场开会，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决议。国际的指示是叫建立根据地建立后方，中央决议是援助中央红军攻打长沙。并以邓中夏同志任特委书记兼任二军团政委，周逸群同志代理特委书记留任后方。当时逸群同志是坚决不同意的，争论很激烈，最后决定打监利后，再行过江。

2. 部队南征时与邓中夏同志的争论。

第二次打下监利后，部队就渡江南征，六军打下华容，二军攻克南县。此时邓中夏同志要求二军渡五条大河去攻打安乡，然后再过两条大江打澧州。把部队放在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后来我提议把部队放到北面向澧州进攻。打下了公安、津市，消灭了川军张英、马坤山等部围起了澧州，这是与邓中夏同志的第一次争论。

后来又打下了石门，邓中夏、段德昌同志留在石门，由我带队伍打下临澧。部队克临澧后，孙德清、王一鸣从邮局得到国民党的报纸，知道一、三军团已退出长沙，形势对我不利，我就临时处理，命二军与十六师过河到合口准备回苏区。邓中夏见了我大发脾气，说没有我的命令你就把队伍撤走？他要重新打津市澧州，使用了他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这是与邓中夏同志发生的第二次争论，段德昌同志当时是同意我的意见的。结果仗没有打好，六军在石灰港打，六军参谋长在打石灰港时淹死了。

打澧州后，部队退到了杨林寺，引起了第三次的争论。邓中夏同志提出要建立第二个中央苏区。扩大苏区创造苏区我同意，但不同意搞第二中央苏区。当时我还不懂许多大道理，只是知道已经有了一个中央苏区，怎么能再搞一个中央苏区。再是，关于找阵地与敌决战，我和邓也是有分歧的。找阵地找什么阵地？仅因为有山而队伍没有吃的也是不行的。我说打好也是你的，打坏也是你的，我不同意打。同时我又不得不赶紧抽调二军回来，此时二军正打下公安。敌人解围澧州后，李觉带了十八个团来进攻我们，陈渠珍带三个旅走西斋、街河市向我进攻，那仗我军因队伍分散打了个稀巴烂。十六师打烂了，十七师被敌割断了，后来还是总指挥部手枪大队挡了一下，才撤出来的，芦冬生同志任手枪队大队长。

3. 在枝柘坪会议中的分歧。

部队在枝柘坪时，特委派人送信来了，信我没有看到是后来在打洋坪时，邓中夏同志对我说：中央路线我执行了（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国际路线我也执行了（建立后方搞赤卫队），但我是在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之间摇摆着的。这才知道的。

在枝柘坪会议上争论很凶。一是“上山路线”“退却逃跑”大帽子都给邓戴上了。二是红二军团改变为红三军，对这个改变大家很不满意，认为邓中夏犯了错误都要我们受处分，三是大家要回洪湖苏区，回洪湖首先把立三路线搞清，再是把邓中夏同志领导的这一段做出结论，王一鸣同志提出打官司，怪上头领导不好，不是我们的事。

在会议中邓中夏同志作了决议，他坚决不同意回洪湖，决议中说“从井救人，救者必死”。坚主开辟荆、当、远苏区以救洪湖苏区。部队听说向洪湖方向发展情绪很高，一天就打下了野三关，歼戴天明部一部，跟着追过江。占巴东，过江第二天，七师占兴山，第八师占秭归。接着部队向荆、当、远方向进发。打荆门，远安后，我叫王一鸣插条腿到沙洋去，使部队从潜江回到洪湖。邓中夏同志却不同意，硬要二军打当阳，要在鄂北找“井冈山”。部队刚围当阳，宜昌、沙市敌人援兵已经到来，打了一天部队伤亡很大，邓中夏同志没有经过商量，从荆门把王一鸣同志调来，又马上要许光达增援。跟着在马良坪又被迫打了一仗。

石花街神兵是有地方党领导的，武当山神兵归老道统治受了党的影响，也起了些作用。

4. 在房县的争论。

在房县时，邓中夏同志是没有什么转变的，当时在地方上肃反斗争也错杀了一些人，地方工作有很大的削弱。打土豪及搞粮食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搞白木耳连贫农的利益也侵犯了。“千里房县一条线”几十万人口要养几万人，群众发动不起来。

在军事上也是有争论的，到房县不久，敌人分两路进攻房县，敌张连三一路走郟阳西面绕道到房县，一路是范石生部从石花街正面过来，我主张集中全力消灭张连三，而后从武当山背绕过去打范石生。但邓中夏同志不同意，要部队二面作战，对张连三防守，大队伍去打范石生，那时，天正下大雨，房县只留有贾鸣钟一个团，其余部队都出发了，还有芦冬生的警卫营。敌张连三部突然接近了房县，那是一个背水战，部队拼命的打，如果守不住房县，部队也就收不拢了。打了七天，后来又调一个团打张连三。如果当时不分兵，是可以全部消灭张连三的。

打张连三时，李成蹊当时在二十一团当营长，他打得很好，坚决守住了，也是背水战，水势很大，打了张连三，再从侧翼打范石生，从左边绕过去（可能在青峰镇背后）打的。此时就从商人口中听说新六军沿襄河而上，已到达刘后集。六军又从刘候集到襄枣宜苏区，帮助九军攻打了不少据点，范石生部就被迫撤退。

房县土改表面上改了，实际上没有改。

在青峰镇全体一致要回洪湖，只有邓中夏同志一人不愿意，但他只占一票。部队就出发打南漳，本来可以消灭守敌一个补充旅的，但邓中夏同志在途中仍犹豫不决。邓提出：新六军接不到，房县苏区失败了怎么办？此时，部队已经离开了他的“井冈山”了，到达南漳，会议上师长、师政委都不发言，当时我就表示了态度，我说坚决接六军，刘候集找不到去沙洋，再找不到去潜江，六军真的找不到，再回来恢复房县苏区。次日墙上粉笔标语就出了，说“长胡子要上山，短胡子要下湖”。部队进到离刘候集不远的的一个很整齐的小镇子叫报信坡，邓又不走了，他召集了一些政治干部开会，没有一个军事干部参加。我就对邓说，老夏，我已派李士奇一个骑兵连去刘候集了，两个小时后即可知晓，你今天开的什么会，一个军事干部也没有参加，看到底是你犯错误，还是我犯错误。此时联络人员回来了，说六军在那里，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部队就进发刘候集。那次会议上21团政委陈其枚不同意再回房县，还受了处分。

在青峰镇时留教导团编二十五师，并留汤慕禹、朱勉之、柳克明等同志布置后方。

得知六军讯息后，我即写信叫李士奇去接段德昌，信上并请邓中夏同志签了字。李士奇同志是苏联回来的。出身是工人，湖北人。第二天德昌就来了，并给我一封信。信是夏曦写的，信的内容主要是说：“在上海与我分手后，就到苏联去了，后来当选了候补中央委员。回来后中央派他到湘鄂西中央分局任书记，我是委员”等。德昌说你们来得正好，得把拥护邓中夏的那些人惩一下。我说不怪他们，邓中夏当时是孤立的。在刘候集开了整整一天会，传达了中央和中央分局的指示，对邓中夏同志的错误做出结论，根据指示撤了邓中夏同志的职，政治委员是万涛，主任是刘鸣先。政治报告是万涛作的，段德昌同志憋了一肚子气，对邓中夏同志数了几十条罪状。会议中决定了部队的行动，南下打钟祥、岳口，许光达那个师进到沙洋筹粮食。

在刘候集时，邓中夏对我说，我错了，你没有错吗？你是旧军人出身，打张截港后，邓又对我说此话，我说，你这是挑拨。

5. 三军回来后发生的争论。

争论的起因是很早的，根子是九师出去的一个谈话和一个决议。

夏曦刚进洪湖，九师在朱河成立了。江南失败前，段德昌率九师打周老咀和老新口两个据点，准备把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联成一片。正当九师节节胜利向前发展之际，夏曦在周老咀把伤病兵遣散了，段对夏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意，批评夏曦同志是退却逃跑和悲观失望，并说这种情绪会把苏区搞失败的。水灾发生后，周老咀的堤防垮了，周围一片汪洋，只剩几根堤了，夏曦犯了严重错误。把地方工作人员散了伙，伤病员送回了家，后来部队没有饭吃了，夏曦才开分局会议，讨论出路问题。于是就决定九师出击。先是夏曦给九师负责同志谈，说九师任务第一是接主力回洪湖，第二是发展襄北，并决定由万涛接任邓中夏为三军政委。以汪洋守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

德昌打了周家矶又坐船打沙洋（当时周围皆是洪水），进至刘候集。又接到分局决议，决议内容和谈话不一样了，改变为：九师任务第一是开展襄北工作，第二才是接三军回洪湖。照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个任务九师是完成了的。接回了红三军，与襄枣宜九师打通了还拔除了几个据点。但这时敌人对江南苏区大举进攻。敌人进攻江南苏时，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自己怕负责就要找一个人开刀。江南苏区失败最后就归罪于段德昌和陈培英同志。从周老咀到刘候集共是三百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刘候集又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的吗！这是第二颗炸弹。

三军回来后，在竹根滩、潜江，连到四次代表大会引起了三次争论。说九师只完成了接回红三军的任务。潜江会议上大家集中火力批评夏曦，争论没有结果。九师出去时只有一个多团，回来时又扩大了一个团，这些功绩夏曦一概抹杀，并令省委作出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挑起他们反对段德昌。（省委当时有杨光华、彭之玉、崔琪、马武等人）。主要争论是关于江南失守，也联系了立三路线和退却逃跑。段德昌不同意这个决议，他责问夏曦说江南苏区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你谈话在先，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怎么怪我们？况且当时平地皆是水，在襄河两岸怎么开展游击战争？夏曦同志无言以对。

再是与我的争论，说红三军南下回洪湖是一贯的错误。三军回来打钟祥、岳口并派一个师搞粮食，有什么错误？实际上他是与整个新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刘鸣先、孙德清、段德昌、陈培英[荫]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六天仗，就争论六天部队无人指挥。会上党的同志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他只是把眼睛闭起，一闭可以闭半天，可是一睁眼就要杀人，我说他和关羽一样了。大家批评他，他回来后就给大家处罚，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军部、师部，三军编五个大团，干部降级使用。大团有七千人，小团也有五千人。这样一来更加引起了干部的不满。许光达是打龙王集负的伤，这颗子弹打得好，不然早就叫夏曦杀了。回到周老咀后，问题更加复杂了，并没有撤我军长的职，可是连房子也找不到一间住了。那天晚上我就住在李剑如的家，同住的有李剑如、艾逸之（外名叫马克司）。三个人睡了一晚上。（李剑如是鲍罗廷的卫士长，是工人出身，原叫去当独立师师长的，后来留在九师当政委。李在苏联时，就与这甘八半作斗争的）。次日我与夏曦同志谈了一天，他还是抓住前头那几个问题不放，斥三军南下是一贯错误，斥九师丢了主要任务，他老婆还在一旁替他帮腔，在第六天又闹了一台，我就把问题一件一件的数给他听。我说我是军分会主席、三军军长，可是省委却可以随意作出决议取消军部、师部，你说是执行不执行？你谈话和决议是两个东西是不是阴谋？江南失守是谁之过？处分了段德昌又不去通知他对吗？三军南下错在那里？我说你来洪湖才几天，地形不熟，与红军关系不深，与群众不熟，组织三军前委不要万涛同志参加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给所有干部以处罚，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你办的几件事，那一件是有党性的对得起党的。我当军长连房子都没有住的，最后夏曦才不得不点头，给我找了房子，才又恢复了军部。其实夏曦在当时是十分孤立的，在刘候集会师时万涛曾侧面告诉过我说“出将入相”，当时还不清楚是什么意思，过后才明白是夏曦的阴谋。

（二）

1.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前，下面对夏曦同志领导的不满情绪很严重。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兼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均是到上海，到中央告夏曦的状的。中央听了尉士均的汇报之后，派关向应同志来湘鄂西。尉关二人同路来洪湖，关在船上说服了尉士均。关为什么说服尉士均呢？因为关是带着中央的观点来的，他尚未与地方干部见面，实际情况不大了解。

四大开会的第一天下午和第二天，到会代表几乎一致批评夏曦，有七十多个人向夏曦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大问题，如土改侵犯中农利益，地主杀全家，富农送出苏区，发展苏区、江南失败、军队改编、处分整个红军、打老新口时遣散伤员及地方干部等等，把夏曦同志整的没有办法。下面拍桌子，夏在上面象死人一样。

我那时也进了主席团，因为我还是个分局委员，夏曦不得不让我为主席团一员摆个样子。

在这次大会上搬书本的有两对夫妇，一是夏曦夫妇，一是潘家辰夫妇，他们根据书本辩论很激烈。我们那时不大懂这个问题，我同下面的一些干部只是因为先是邓中夏同志来，使红军受了很大损失，现在夏曦又来整红军，有一种不相信偶像的思想。

大会的第二天下午休会，关尉到了，同一些人谈话，后来休会一天再开会时尉士均首先发言。他说向中央报告夏的问题是错误的，江南失败是段德昌的过错，九师北上是错误的，三军南下是一贯错误。尔后关代表中央讲话，于是就把整个代表反对夏曦的意见压下去了。杨光华同志在关讲话后有个发言，很不好。他讲了之后就再没有多少人发言了。潘家辰夫妇有个反驳，争论激烈。潘代表着地方干部的正确意见。他们发言的内容要问问杨光华同志。

尉士均在这次大会上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把正确的东西否定，帮夏打击地方干部，与地方干部形成一条大鸿沟。

关向应同志在这次大会上帮了教条、宗派主义的忙，他代表中央的一篇讲话有力量，压下了地方干部及潘家辰的意见。为什么关要起这么个作用呢？他是在反立三路线时受打击的。在立三路线时期，关是管军委的，代表国际路线的那些人曾想把他从立三那边分化出来，他一直坚持。夏曦一直抓住关的这个辫子，一直抓到二六军团会合。关对此最伤心。

关来洪湖，中央给他的职务有三个，一是三军政委，二是分局委员，三是军委分会主席。但夏曦实际上只叫他当了三军政委。四大以后三军军部出发叫他当政委，但不配政治机关，是光杆政委。而且就是任三军政委也还是讲了条件——以孙德清当军参谋长，才叫当的。当时孙德清已经站在夏曦那边，他当参谋长是来监视我同关的。对于不配政治机关的问题，各师（那时已成立了三个师）议论纷纷。段德昌同志在新沟咀就说：没有政治机关，我们的政委怎么工作呀！军长，你和政委以后不大好工作。我说，为什么？段说：一个是立三路线，一个是旧军人……。关听了此话，很不好过。

四大开的很不好。地方工作在下面有些地方好，有的地方不大好。为什么能够坚持那么久呢？地方干部好是一个原因。

杨光华同志对一些错误是有责任的。他是省委书记，为什么省委要作决定取消红三军军部，改编红三军为五大团？为什么江南失败省委要作决定处分段德昌与陈培英呢？在建党、土改方面犯的错误杨也有责任。在“肃反”问题上，杨的观点很坏。他是肃反三人小组的一员（另二人是夏曦和××）。他应该写一点材料。这些要与杨光华同志谈清楚。

2. 龙王集战斗是有计划出去打的。夏曦本不准出去，是经过争论之后才许去的。

四大前，部队情绪很坏，意见颇多，不设法打好仗，提高部队情绪更不利，所以与夏争，争取让部队出去打仗。

打这一仗的部队，实有三个团（含汉川独立团）九千人。段德昌虽然名义上是个团长。

打瓦庙集、台李庙之前，夏也是不许红军出去，也是争出去的。我们主张到白区去打。因为苏区没饭吃。而到襄北则是在陆地上，并且有饭吃，能集中兵力，还可发动群众，有利条件多。

文家墩这仗是没有按分局意见打的，然而打了胜仗还受批评，说我们打仗时两面有敌人，是冒险，是侥幸胜利，关还为此是作了检讨。

瓦庙集打了一个礼拜未打下，分局还给了指责。张家场战斗是段德昌带部队从应城被敌人赶回来时打的。这个战斗也不该打。

反四次“围剿”期间，我带五个团在荆当远消灭了王太、崔二旦部，尔后回洪湖打新沟咀。打新沟咀时 26 团 27 团参加，把敌人赶到老新口，我们在这边一堵，消灭了范绍增部，当新沟咀战斗正紧张时，王一鸣跑来问我怎么办？我说坚决打。打胜了。

在敌四次“围剿”第二阶级，我们提议把主力转到外线去，逼近应城，威胁武汉，敌人一定会撤。这样不仅可以开展襄北的斗争，也可巩固老区。这时贺炳炎、宋盘铭已经在襄北组织了独立团，但夏曦不同意，他要寸土必争，要在洪湖内部打，要段德昌做碉堡。段一面做，一面笑，为此事，段还受了处分。夏同某些地方干部，坚主在洪湖打，是一派；军队干部则坚决主张出去打。争论了四五天，结果是分兵。

当时我估计一定要失败，为什么？

（1）分兵不对头，指挥不统一。实际上大部兵力留在苏区内部，除七师、警卫师一部分、军委警卫营外，留苏区的还有各县警卫团、警卫营，都是很能打的队伍。

（2）大搞“肃反”人人诚惶诚恐。

（3）真正的反革命——地富分子又进入苏区了。因为这些人有船，就坐船以群众面目渗进来了。

因为有这种估计，所以我在出去时就告诉谷志标同志把地图都带上。可惜地图后来丢了。如果地图在，后来我就不会在伏牛山中走一个礼拜了。

分兵后留洪湖内部的部队受了很大损失，十多个警卫团、警卫营都丢了。新沟咀战斗中，七师政委鲁易阵亡。我们到襄北后在洪山打圈子。在一次战斗中，仓促遇上 51 师，因为我带少数部队坚决抵住，收容了队伍，未受多大损失。这使参谋长唐赤英同志对我有了新的看法，从这以后他才开始与我合作的。他说：我过去看错了你，今天如果不是你，我们的部队就完了。

在襄北打圈子时没有地图，洪湖内部消息也不知道。是在与 51 师打了上面那一仗以后，又转到襄河边接了七师，后来又会合了夏曦他们，才知道洪湖失败的。

关于部队的行动，与夏很有几次争论。第一次是九师出去打龙王集，是夏曦孤立了才出去的。第二次是打文家墩。第三次是带一部分队伍出来打了石灰桥，消灭了川军一个团。后两次没有关向应同志的支持都不行。

3. 红三军的“肃反”是军部住在吴堰岭时开始的。红八师的特务队长犯纪律——杀鸡、杀牛吃，关向应同志把他捉来一整，他承认了是“改组派”，第二天就捉了胡慎已。这时后方的“肃反”已经大规模展开了。“肃反”是后方先开始的。不久，军部回到洪湖，芦冬生同志的特务队就被调去周老咀专门看“改组派”犯人去了。

夏曦之不相信党，早有表现。在文家墩战斗后，他就下令促了孙德清，孙是在与我一同到七师师部时被捉的。同时被捉的还有七师的政治部主任孙之涛，孙是四大文豪之一。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一个条子，关即按照夏的指示捉。条子根本不给我看。

文家墩战斗之后，在红三军中大肆捉人。被捉的人都知道下场不妙，走时武器、皮包等等都作交待，并且走两天白区没有人跑。如果他们是反革命会这样吗？

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给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夏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三军回洪湖后的一些问题的争论是四大会上的争论和“肃反”杀人的根子。

4. 红三军在大洪山以北地区发现红四方面军布告，知他们已经离开了鄂豫皖苏区到大洪山地区。这时部队就酝酿到何处去的问题。在枣阳王店，开分局扩大会议，夏、关、宋盘铭和我四个人参加，在会上讨论行动方向问题。绝大多数同志主张坚持洪湖，把王炳南独立团改组一下，换一批干部，组织湘鄂西党委，回湘鄂边坚持斗争。少数人主张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两个意见，在会上争论不休。到晚上仓促决定由豫南西进，经陕南回湘鄂边坚持。夏曦同志的理由是：红四方面军能离开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我们到湘鄂边还不是离开苏区，从那里可以再收复洪湖。夏、关、宋就商量如何转法，他们没有胆子转不过去。这时部队草木皆兵，内部肃反，弄得人心惶惶，战斗力已空前削弱。其实部队那有那么多反革命，如果有，难道还不打夏、关和我么？这时我就说：你们决定，部队我带走。就这样，我就带着部队翻过桐柏山，由伏牛山西行。

这时，我们没有地图，只有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小地图，只有几个大地名。如果我要有一分五万分之一地图（地图在洪湖出来时就丢了）我也不走伏牛山绕一个大圈子了。这条路我只是在大革命时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武说过，他是陕南人。在豫西伏牛山，马鸿逵的部队，一连追了我们七天，到西峡口附近，我叫贺炳炎来说：非设法打个胜仗不可。叫他的一个团埋伏在觉春附近一两千公尺远的山口子，打敌人的伏击，结果消灭了一部分敌人，终止了敌人的追击。

部队过了荆紫关，进入陕南。这时武关有刘镇华的一个旅，附近还有陕军两个旅，我们知道四方面军在漫川关吃了亏，还收容到一部分掉队人员。我们决定打武关，我对唐赤英、王炳南说：这是一个考验，一定要打胜，不打胜仗，我们没法走。头一天动员，第二天很顺利，只两小时就打下了。

过了武关，经过竹林关，从洵阳、安康之间渡过汉水，沿鄂川边南下，到巴东过江，在巴东城休息了一天，就到野三关。

这个行军路线是有计划这样走的，这时因为部队没有战斗力了，要避免与敌作战，从陕南过汉水，从巴东过长江，皆比较容易。

在行军过程中，部队是很苦的，没有东西吃，吃柿子、核桃、高粱杆子，但夏曦同志还不断杀人。对段德昌、王炳南等皆不相信，开会不找他们，并且两次企图下我的手。

一次在王店，夏曦同志企图加害于我，要我写申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了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我说：你有人证物证没有？他没有。我说：你给我写申明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分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十万块钱。我请你吃饭开了旅馆，还给你五万块钱。这虽然没有收条，但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闹的下不了台。关出来调停，说他是共产党员。

另一次是在竹林关。他把我和关的警卫员枪皆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我把身上带的一支白朗林手枪，也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他了。那时枪皆上了顶门火了，时刻准备着，一是打自己，一是打人。以后我两人一直不说话。过了几天，走大巴山时，夏才叫我：胡子，不要使气嘛！我说：使什么气，你不该这样搞嘛！以后到巴东，我对他说：我们到巴东去住一天，休息一下，睡一夜好觉再走！

在行军过程中，部队减员很大，损失有三分之一左右，部队从大洪山出发时有一万四五千，到鹤峰时还剩九千人了。

在大洪山时，是收容到红二十六师一部分人，是贺炳炎同志的襄北独立团收到的。后来走的时候，还有一部分没来得及收，就留下了。

芦冬生的独立师，是夏曦同志从洪湖撤出时丢掉的，他们在荆当远坚持一个时期，到鹤峰走马坪来与主力会师，还带了几万块白洋和布疋，部队的情绪也很旺盛，对我们帮助很大。

到鹤峰后，我写信叫贺沛卿、王相泉回来，夏、关皆没提出什么问题，只是决定杀。他们并不是真正反共，讲真理，是被错误政策逼的。不然，他们为什么还同敌人打仗？还能叫回来？以后王玉林还带人去把他们的一百几十条枪挖回来了。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在军事路线与方针政策方面的争论。

毛坝会议讨论三个问题：一、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军两个小议题。二、打一个县城整理部队休息。三、停止肃反。

也可说是分局会议，实际只夏、关和我三个人，其他人他都不相信，宋盘铭也没参加；其实对关和我也不相信。事情是我两先商量由小关提出的，第一个小议提恢复湘鄂边苏区没争论；第二条就有争论了。他说这个部队怎么整顿呀？！不相信党和红军，他想重搞，觉得现在的红军不好指挥。不听话。争了很久，我说找个地方休息好吧？他这才同意，第二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他怕打仗，我说没有仗打，周围都有团防，我们不打，没有人打我们，有人打我们可写个信叫他让开。第三个问题谈到肃反，争论的不得了。本来是我不同意的，小关同意我的意见，他批评小关右倾。

第二天到桑植又提到整理红军和停止肃反，小关不做声，我说肃反停一

个时期，有了反革命再说么！他不同意。这时我第一次向小关提出“你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么！选他是选谁。”小关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批评的很严厉。

占桑植后，覃辅臣派人送信来要我们不要打周燮卿，说陈渠珍要让桑植、大庸几个县的地方给我们。我把信给夏曦看，他脸变了。说覃不可靠，是玩的手段。我说我们拿到桑植一县也好么。（覃过去是我当营长时的朋友、是我的二路指挥，我救过他的一家）我们两票，他不听，以后把宋盘铭、段德昌找来，都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只一票做结论，第二天打周矮子，当时怎么打仗么？！部队疲劳已极，澡都没洗一个，发都没理一次，没有子弹，草鞋都没有穿的。

退出桑植开第二次毛坝会议，夏提出解散党，创造新红军。大家都不同意；我讲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段接着也补充发言，段不满意，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你是革命的功成[臣]还是罪人？！小关不断的插话，想叫我们不讲，宋盘铭也讲了，他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以后就到了走马坪，又开会，还是这个会，加一个行动问题，夏提出打石门出澧州。我说这样一个队伍不能出去打仗。主张休息。

以后到金果坪就解散党了。他提出莫斯科支部局的例子，而莫斯科支部局提出的是停止党的活动，清党。

到麻水，九师是在什么地方？（谷插言：沙道沟。）段德昌、宋盘铭写信来建议回洪湖。夏就说段德昌要带九师跑，我说他不会跑，要跑他还写信回来。”结果还是调回来，在邹阳关调回来，在金果坪杀了，以后王炳南、宋盘铭都捆了。在马水我同王炳南谈过一次话，隔了几米就是臭的，身上伤得没一点好地方，我说王炳南没问题，应该放，夏非杀他不可，他把人整成这个样子非杀不行，怕结仇；宋盘铭是七九两师分开时放的，当时夏曦不在。我说看看他身上是不是还有好的，好的就放，看看还好就放了，以后夏曦不答应，在黔江还是杀了，宋盘铭是个很好的同志。

夏还说“严重打击”段德昌同志是“分裂红军”，在金果坪杀他以前提出的，头天批评，第二天杀的。

七、九两师分开前对一些方针政策问题争了三天。（1）是建立游击根据地的点还是建立苏区，夏曦强调建立面，我们主张由点到面。（2）打土豪，对团防，有争论，小关提出打罪大恶极的，他不同意。那时打土豪分东西给群众，公开都不要，夜晚送，我们就打个旧社会的比喻，问他是要千家怨还是一家怨，是得罪一千家好还是一家好？最后他才同意了。那时候我们对什么是中农，什么是富农也不大懂，夏曦也说不清。从前潘家辰两口子说夏“穿了缝裆裤讲开裆裤，还应当再‘讲习’（学习）一下”，夏很伤心，真的是万涛他们一些人在洪湖时常常下去摸还懂一些。

对团防他打我，我坚决消灭他，你不打我我也讲策略，暂时不打你。

七、九两师分开，我带九师，他（夏曦）带七师主要是要搞五峰、长阳、巴东这块地区。结果他跑到磨盘州、西斋搞了一下，在西斋芦冬生和他闹？为什么他带七师呢？是他要带的，芦冬生是湘潭人，他是益阳人。我说你们在一块不一定搞的好，他说可以。但结果还是未搞好的。

大村会议还是谈肃反，也谈了发展方向问题，主要是在枫香溪行军的时

候，我向小关提出：你又不搞，那么就一定靠一个方面军。后来夏正面批评小关右倾机会主义，没批评我。这是问题在大村也提了，我说是我先提的。

银石坪会议没斗，那时候他两是悲观失望，特别是夏曦，我鼓励夏曦，并说再肃反不行了，才放了谷志标。到银石坪我也提了要小关搞。

6. 关于创造黔东苏区。

红三军入黔的原因：

原来打算先把彭水打下来，给反动派一个下马威，回头来再占领西阳，在西、秀、黔、彭建立根据地，因为这个地区是四川交界处，反动势力统治薄弱，封建主、地主比较集中，贫、雇农多，物资也较丰富，我的老关系多，山大，有利条件很多。打下彭水后，我非常高兴，准备回头再打西阳，但夏曦一个人不同意这样作，他认为彭水前面是江，后面是山，地势不好，敌人来了不得了，决定过乌江入贵州。

枫香溪会议：

到了枫香溪以后，我说再也不能这样走了。我先与小关交换了如何创造黔东根据地；怎样争取神兵的问题，在会上提出后夏曦不同意争取神兵的工作，同意建立黔东根据地，晚上召开了干部会议，我去请的夏曦。小关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内容：登记党、团员，恢复党的组织，派一批干部去作地方工作，小关主要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讲的。夏一句话未说。

夏曦在黔东时期，一直是消极的，行军到宿营地就是吃饭、睡觉。没有作什么工作。

对黔东时期工作的估价：

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红三军的一个很大的转变，肃反停止了，提拔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党，恢复了政治机关，在各县建立了游击队和独立团，扩大了红军，建立了根据地，这些都是转变。

建立黔东根据地的意义：

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六军团被敌人切成了三股。会师会连作饭吃的家具都没有了，马子也都丢光了，很狼狈。我给他们营以上干部配了马，发了七八挺轻机枪。

二军团十年来斗争之历史概略 (关向应日记摘录)

洪湖——苏维埃运动数大巨流之一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反帝反封建势力的大革命运动，因为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势力而失败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反帝反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斗争中，继承并展开了这一个大革命的传统。

洪湖在十年斗争中，即是继承大革命传统的数大巨流之一。

洪湖正处在武汉与宜昌、沙市之间，并且踞长江与汉水流域，湖泊河流港湾极多，水陆交通异常便利。首先是武汉的工人运动与革命势力的发展，对于洪湖是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武汉的无产阶级与这一个地区的联系是极其密切的。在大革命时代与大革命失败之后，有许多的工人曾经回到乡村中，这对于以后洪湖土地革命斗争的发展是具有极重大的意义的。

在大革命时代，共产党的组织，在这里已建立了巩固的基础，这是以后领导洪湖苏维埃运动的基本原因。

大革命时代的学生运动深入到农村中，这对于初期的农民运动，起了极大的组织与推动的作用，在洪湖也是一样的，一直到土地革命与苏维埃的阶段上，他们中的一部分都是积极领导者与组织者。当然这些分子都是共产党员。

在洪湖，农民反地主阶级反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就这样展开了！它也象其他苏维埃区域一样光荣地继承并展开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传统。

共产党在洪湖的农民运动与红军发展的初期

一九二七年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剥夺工农劳苦群众在大革命中得到的权利与利益，造成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交错纷乱与矛盾极为尖锐与不平衡的状态，特别是在农村中腐朽的地主阶级统治力量的薄弱，这些客观形势给了革命发展的一些有利条件，一九二八年春蒋唐战争，在湖北造成极混乱的局面。这对于洪湖游击战争的开展亦是有利的条件。

洪湖这一地区开始包括着湖北的江陵、监利、沔阳、潜江、石首、公安、松滋以及湖南的华容、南县等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这些地方的党转入秘密党以后，仍保持他的力量。

在一九二七年底与一九二八年，农民运动更加深入了！并且发展到更高的阶段，特别是石首、华容、公安、南县、监利、沔阳、潜江江陵等县，普遍的发展了农民暴动。这些斗争与农民暴动在党的领导之下，已开始创造了游击战争的经验与初期游击队的形式。

一九二七年十月间贺龙同志在上海党指示之下，先遣贺锦斋、朱炳章、贺桂如、滕树云等二十余人，携带三支枪（一支连枪，二支左轮）到荆河之车湾藕池一带活动，发动打土豪，在斗争中发展到二十余人，二十余支枪。

贺龙同志即于斯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与周逸群、芦冬生等由上海动身到荆河之咀与贺锦斋等会合。这时，首先与车湾地方党的一个支部发生了关系，后又与石首县委发生关系，并因之亦参加了地方党所组织之“秋收暴动”。

零碎散乱的一些斗争的支流逐渐会合了。

在一九二八年大概是二月间吧，与石首之农民自卫军（吴仙舟同志率领的有二十余支枪，三十余人）会合。同时又于三月间在监利之朱河与洪湖肖人谷同志率领之农民自卫军（五十余人，二十余支枪）会合。

会合后，即编为三个大队，人枪在二百左右。

这时游击战争与农民群众斗争和农民暴动密切的配合起来了！在广大的群众拥护之下，将石首城攻克，旋又打下调关（即调弦口）。在这时我们取得的城市是不能巩固的，退出后又攻监利县城未克，这已竟是一九二八年四月间的事了。这时，党决定将枪交石首县委指挥，贺龙同志同周逸群同志带十一支枪回桑植、鹤峰。

这即是今天二军团发展过程的初期概况。他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及广大的农民暴动的土地革命过程中诞生的！并且开始了游击区域。

二军（现在的四师）在鹤桑与六军（现在的六师）之在洪湖

（1）一九二八年上半年贺龙同志与周逸群同志回到湘西之桑植后，集合在桑植之旧日国民革命军部属的五千余人，约三千余支枪，并将桑植县城占领。

斗争的力量威胁着敌人了！这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者血洗广州公社以后，统治阶级以其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以及在乡村中，屠杀共产党，屠杀工农群众，血腥的手又伸张出来了！黔军龙猷仁的一个旅与陈渠珍六个团由向子云率领向桑植进攻，经过两次战斗后，则退出桑植，因为部队刚组织成立，没有健强的党的力量与成分的复杂，故在失利的战斗后，只余人枪百余了！而周逸群同志并于这时回洪湖去了！

旋因黔军回黔，我们又占领桑植城，这时部队又发展到五六百人，继又被敌人进攻则退到罗峪，在这时根据党的指令成立红军第四军。在这时，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间的事吧！第一次开始较大规模的游击战争，经桑植、石门、慈利到澧州之王家场，后又回到鹤峰之堰垭，继续向宣恩、利川，并转建始，将建始城攻克，又转鹤峰，将鹤峰县占领。

这时，湖南之独立旅王文轩来攻，将其部队击溃，并将旅长王文轩击毙，跟即又占领桑植城。我们的游击区域发展到桑植、鹤峰、五峰、石门、永顺、大庸、慈利等七个县。

因为胜利的开展，威胁与震撼了统治阶级，敌人更组织了较大兵力来进攻：湘军之吴尚四个旅，陈渠珍部之向子云一个旅，杨明戴天明之川军两个师，分三路围攻，首先将向子云的一个旅完全消灭，并将旅长向子云击毙，吴尚来时，又退出桑植城。

这是一九三〇年二月间，又决出鄂西之五峰、长阳、巴东、宜都、松滋、枝江及湘之澧州、石门游击，旋折转鹤峰。

回鹤峰后，因为得到鄂西特委的指令，则开到公安县与洪湖之第一纵队在公安城会师。

（2）在洪湖方面，党的鄂西特委于一九二八年召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更有计划的提出来，并决定了组织游击队与发展游击战争。

代表大会以后，在监利、沔阳、潜江、江陵等县游击战争与游击队更加大规模的发动起来。

这时湖北正经过蒋唐战争以后，政治局势亦极混乱，这给了我们发动游击战争以有利的条件。所以在一九二八年向我们进攻只谭道源一个师。到一

九二九年则不同了。陕军之李云龙部两个师已开来宜沙，川军之向成杰一个师，与郭汝栋部均开至宜都一带；徐源泉部首先是张振汉亦向我们石首公安等游击区域进攻。

这中间经过许多次的战争，首先将向成杰击溃退守藕池，以少数的游击队配合广大群众力量在石首组织张振汉前进，相持三个月之久。

这不断的胜利战争中的发展，将零散的游击队逐渐集中起来，编成正式红军了，根据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正式红军的决定。

在一九二九年一月间，以监利、沔阳、潜江、江陵四县的游击队集合成立第一纵队。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以石首、公安、华容、南县的游击队集中成立第二纵队。

一九三一年一月间，则成立六军，以邝继勋为军长，周逸群为政委，段德昌、王一鸣分任第一第二纵队长。这时的游击区域，已包括着石首全县与华容、公安、江陵、监利、沔阳、荆门等地区。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洪湖之六军一部占领公安与桑植、鹤峰之四军在公安县城会师，会师后，四军改为二军，编四、五两师，六军编十六、十七两师，两个军以贺龙同志为总指挥，总政委周逸群。

二、六两军会师以后，由于两军之经验的交换，在军事上、政治上与红军中党的建设上都收到新的进步，这时的红军已由游击队的形式踏上了正式红军的阶段了！

二、六两军会师以后在洪湖

两个军会师以后，即由公安过江开郝宋，决定攻监利未克，则根据党的决定，以六军在江陵、潜江、监利、沔阳；二军在荆门、钟祥京山、天门、三个月的期间肃清地方上的地主武装，三个月任务完成后，两个军在潜江会合。

这一任务尚未实施，则改变了计划，以两军攻下沙洋，复转攻沙市未克，由沙市回来后，又遵照以前特委所决定之计划实施。经过了消灭反动的北极会的斗争与肃清地方武装的斗争，已建立了政权，但尚未分配土地，这是一九三一年七月间。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邓中夏同志来任特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并决定过江响影三军团打长沙，顺便将监利县城攻下，攻克监利后，闻三军团已退出长沙，这时红军的党的代表即在监利出席湘鄂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又转一折攻克仙桃镇。

这时为影响三军团第二次攻长沙，又过江占领了石首、华容、南县等县城继又攻下津市、澧州、石门、临澧等城市。在几次胜利的战役中，共消灭敌之公秉藩、李云龙、向成杰、郭汝栋、马英等部队，缴获长短枪在三千支左右。

这时敌人又增加李觉之十八个团的兵力与陈渠珍之两个旅来攻津市、澧州，我们即退出集结到杨林市，预计在杨林市与敌决战，因我们部队未完全集中，未经决战即向五鹤峰转移。只派段德昌回洪湖指挥地方游击战争，先是打下监利后，邝继勋调走，以段德昌任六军军长，此时段德昌回洪湖，以汤慕禹任六军军长。

二、六两军向五鹤前进中，正是川军甘占元部进占鹤峰，后经鹤峰之五里坪向我们前进，我们即在五里坪将甘占元全部消灭，俘虏七千余人，缴获

长短枪二千九百余支。

从五、鹤峰转移到房县与创造房县苏区

这次战役胜利红军集中于枝柘坪休整一个月，并将二、六两军改编为红三军（七、八两师）后，决定转移至荆门当阳远安三县创造根据地，并配合洪湖粉碎敌人之围剿（敌二次围剿洪湖）。

先占领巴东县过江县过江后，并继续占领兴山秭归等县，在这次战役中，将川军戴天明一个师大部歼灭。

继续向荆门当阳远安转移，并占领荆门远安县城，包围当阳。后放弃创造荆当远苏区的计划，则转移鄂北，到鄂北后，前后继续占领房县、均州、保康、谷城等县以及石华街等主要市镇。

占领房县后，即在房县创造苏区，这个苏区的版图主要的是房县、保康整个两个县包括郧阳、均州、谷城部分土地，在这里建了政权，并初步的分配了土地。

此时进攻房县苏区的敌人主力是五一师及张连山（约万余人）刘正曾等，我们曾经将张连山部四个团完全消灭，并消灭刘正曾旅，并将刘俘虏。

在这里即成立第九军（二十五——二十六两师）后即改编为二十五师。一九三一年七月间，红三军主力回洪湖与洪湖段德昌之第九师会师，房县即留二十五师在那里。

这时邓中夏调回，夏曦同志来湘鄂西负责，这时的洪湖已遭受大水灾的灾害了！整个洪湖苏区都浸没在水中了，房屋被冲毁，基本群众大部分逃亡，只剩下独堤与在堤上的残留的街市与房屋——但亦是残缺不整个的了。

一、二、三、四次“围剿”与红三军的突围长征

先是在一九三一年第一次敌之“围剿”中，因为红军主力脱离洪湖根据地，江左苏区石首、华容、公安、南县等地区被敌占领。

第二次“围剿”，正是洪湖大水灾的时候。

第三次“围剿”，敌为徐源泉两个师，张万信一个师，李觉一个师，向成杰一个旅，刘培绪之三十八旅、潘善斋旅、新三旅、川军之童杨两团、郭勋旅、张邦本旅。

在三次“围剿”中，首先在后港、石灰桥消灭川军三个团，并在沙洋消灭新三旅，将其旅长打死，又在应城消灭何成濬之一个特务团，即将三次“围剿”打破，缴获长短枪约三千余支。

四次“围剿”是在一九三二年春季，敌除在三次“围剿”中未被我消灭之兵力外，又新增加的兵力——在东方以应城为战略中心有徐源泉之四十八、四十一两师，肖之楚之四十四师，夏斗寅之十三师，以及徐庭瑶一个师。在西方以沙市、宜昌为中心的配备有王陵基一个师、范绍增一个师。另外李觉在长江南岸，张万信师在仙桃镇。

开始我们在东方战线上消灭徐庭瑶之张连华旅，并将张连华俘虏。继又消灭四十八师一个旅，并将旅长韩昌峻俘虏。侯后在东方战线上与徐源泉等继续两次激烈战斗，一次七天，一次八天，均将敌击溃，并消灭蒋作均一个团。

后在西方战线上，将范绍增师完全消灭，并将范绍增击伤。

计在四次“围剿”中，缴获敌六千余支枪。但因主观与客观条件我们突围了！经鄂北、河南之桐柏山、伏牛山而入陕西南部，在河南觉春击溃刘镇华之追击部队，即停止敌之追击。

入陕南后，过白河（即汉水）入鄂北，横断巫山入川，折转鄂西从巴东过长江进入桑植鹤峰，在鹤峰恢复了原来的苏区，并发展了巴东施南宣恩等新的区域，依据此苏区出施鹤七属（施南、宣恩、来凤咸丰、利川）游击。东出长阳、五峰、慈利、石门、松滋游击，这时的敌人是徐源泉之四十八师、四十一师，张刚之保安师与前三旅、周燮卿旅以及川军等。在我们占领利川、黔江、彭水等县城，击溃并消灭前三旅与川军之一部，后入黔东，并在黔东之沿河、施南、印江与四川秀山创造新的苏区，在这里与由湘赣远征之六军团胜利的会合了。

会合后，二六军以贺龙同志、肖克同志、任弼时同志负责指挥。为着配合中央红军西征而出湘西，在龙家寨战争胜利后（消灭周燮卿一旅、龚仁杰旅、杨其昌车鸣翼两个师），开展了新的形势，占领大庸、永顺、桑植、并将占桃源、溇常德、占慈利。这样引起敌之新的“围剿”，在粉碎敌之“围剿”中，消灭陈耀汉一个师、张振汉（四一）一个师，并将张俘虏，又消灭谢彬师，并将谢彬击毙，将“围剿”冲破了！则继以胜利的东进，占领石门、临澧、澧州、津市等城市。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长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间在西北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结束了长征。

红军的建设

红军的建设方面，在一九二九年湘西特委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提出了建设正式红军的决定。这时候已将许多零散游击队组织成了正式的红军了！

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党员的成分最多时达到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五。红军中的政治制度在一九三一年以前是党代表，到一九三二年改为政治委员制度，在此时政治制度与政治机关一般的健全化了！司令部与供给卫生制度一般的也建立了！

为的培养干部与提高军事政治的素养，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办第一期红校，学员一千余人，到一九三二年已办了三期！

我们的“卫星”——几个小的支流

桑植、鹤峰游击区域（以后亦建立政权，并分配了土地），这里是一个独立团。

巴东、兴山、秭归游击区域之教导第二师，以后到房县与二十五师之会合。

房县苏区的二十五师与鄂北襄枣宜之二十七师，这一些小的支流都在四次“围剿”的前后与主力红军三军会合了的。

（摘自关向应同志日记）

红六军历史材料 (一九四五年七月)

许光达

红六军产生的环境

(一)大革命失败后洪湖一带的环境

1.大革命时在鄂西、监利、沔阳、石首、江陵一带农民运动相当发展，各地组织了农民协会，后来虽然受到夏斗寅叛变的摧毁，但由于二十四师的讨伐这些组织的骨干还是存在的。

2.湖南马日事变后，农民运动被镇压到处逮捕屠杀农民，洞庭湖沿岸南华安一带的农民党员，农协的负责人，和积极的农民，不能安身，大批逃往湖北边境石首、公安、监利一带种地为生，这批人在建立洪湖根据地时，是起了极大作用的。

3.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得到了统治，但在湖鄂边境两省交界地区，统治较为薄弱，它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肃清革命势力，这里还保存了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他们在继续地进行着活动，一九二八年初，农民运动颇为高涨，走上了武装起义，石首、华容、公安、南县、监利、沔阳、潜江、江陵一带，到处都有武装起义，在斗争中夺取豪绅地主武装，创造了许多小的游击队，一九二八年五月，段德昌即是组织公安农民起义的领导者。

(二)鄂西的党——为加强鄂西农民运动的领导，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沙市成立鄂西特委书记曹庄夫，参加特委的有段德昌、万涛、周小康等同

当时党的组织，沙市、宜昌成立市委，江陵、监利有区委，石首有县委，施鹤有部委，松滋、公安均有区委的组织，一九二八年(春)秋于宜昌召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定组织红色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三)红二军团产生之前——中央为加强鄂西武装之发动与领导，派贺龙、周逸群等同志来湘鄂西，贺于一九二八年春枢监利，即于监利之下车湾成立五十三路游击指挥部，前贺于一九二七年秋即已派贺锦斋、朱炳章、贺桂如、滕树云等二十余人，到荆河、车湾、藕池一带发展游击战争，并在当地红帮中进行工作，当时仅带枪三支，在残酷的斗争中至一九二八年春，即已发展到人枪二十余。

贺到监利后，即与石首之农民自卫军吴仙舟部会合(该部人三十余，枪二十余支)，又与监利朱河之农民自卫军肖人谷会合(该部五十人，枪二十余支)，会合后改编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石×之(以后叛变)五、六十人，枪四十余，第二大队滕树云(人枪同上)第三大队吴仙舟，七、八十人，枪五、六十支(即与肖人谷合编而成者)。

此时游击战争与农民起义，密切相结合，相继攻克石首县城，调关、高庙等处，湖南何键，以川西一个团增援石首，第二次攻打未克，故集中于石首小河口，旋攻监利未克，且受相当损失。

当时环境日趋严重，后决定贺龙同志带枪十一支回桑、鹤发动游击战争，后来即在该地创造了红四军(后改为红二军)留下之部队，交监利县委，此即后来红六军发展之基础。

红六军之产生及发展

(一)艰难缔造洪湖根据地——自攻监利失败后，剩下人枪仅二十余矣(除贺龙同志带走的外)此留部队交刘人静(监利县委书记)率领，继续发

动武装斗争，开始创造根据地，将武装分散在监、沔一带活动，洪湖以王尚武为领导，沔阳以彭国材为领导，刘人静同志亲自参加，开始创立了监利之芦口，沔阳之瞿家湾一带根据地（均在洪湖边上）一九二八年，刘人静同志牺牲，继由陈甫云同志领导，不久陈亦牺牲，继由刘落霞同志领导，刘为监利县委组织部长，当时根据地和游击队均有迅速之发展，震撼了反革命的统治，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国民党十八师，张辉赞部即在洪湖清乡豪绅，地主组织，共团革命受到极大摧残，沔阳的县委差不多全部自首反水，将游击队的武装交给反革命，仅彭国材一人身逃洪湖，监利方面则有部分反水，当时环境恶劣已极，鄂西特委派来柳霞风同志，命将武装埋藏，暂时停止武装活动，而刘落霞同志，没有完全执行特委指示，仅将步枪埋藏，而拿短枪继续活动，于十二月秘密的组织特务大队，以彭国材为大队长，刘落霞为党代表，王尚武、熊大海等为分队长，战士三十余，短枪十余支，在洪湖边缘继续活动，夜间到岸上工作，白天则隐藏于洪湖的芦草之中，长时的在船上过生活，经过极艰苦的工作，逐渐恢复了沿岸的地方组织，终于坚持了洪湖根据地，这是在监利方面的情形。

一九二八年春，在公安、石首、江陵一带到处发生了农民起义，已于前述，但这些起义都失败了，领导起义的一些负责同志，他们携带了武装，逃到江陵，白鹭湖畔隐藏起来，后来逐渐的聚集了一些同志，于是在江陵沙湾一带又开始进行了武装活动，以陈先博同志为领导（江陵县委书记）开始创造游击区逐渐向南发展，后来成为江陵、石首苏区的策源地。这是江陵、石首方面的情形。洪湖苏区，最初就是从这两个策源地——洪湖之芦口，瞿家湾与白湖畔之沙岗，组织起来的。（二）洪湖游击队之发展与壮大——一九二九年春（三月）监、沔、江、石的游击队，已有迅速的发展，游击区日益扩大，鄂西特委为加强其工作和领导，派来周逸群、段德昌、万涛等同志，并统一江陵、监利之两处之军事指挥，将游击队改编，周逸群兼任大队长，以江陵石首之游击队编为第一中队，中队长段书甲（玉林）监、沔游击队编为第二中队，以段德昌为中队长，彭国材付之，自部队改编后，有迅速的发展，第二中队于马国子湾将李生灿部全数歼灭，就空前胜利，往后相继攻克芦口、下车湾、毛家口等处，消灭团防，缴获甚大，在此胜利影响之下，同时进行恢复沔阳的地方组织，对自守分子，予以利用，并分别吸收他们工作，这个政策是对的，后来事实证明，这些自守分子，仍然是忠实于革命的。沔阳的地方工作，不久即行恢复了，并成立了第三中队，洪湖的游击区和赤色武装，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并打下了比较巩固的基础。江右是第一中队，在长江北岸，江面之间活动，以红家砣子为根据地，消灭了许多豪绅地主的武装，地方团队，也曾有很多次的失败，其中一次最有决定意义的是小河口之战，石首全县团防集中，约五百余人，乘轮渡长江，由小河口上岸，企图进攻红家砣子，歼灭我第一中队，毁灭红家砣子，当时，第一中队仅二百余人，由段玉林指挥，因敌我力量相比，相差太大，原拟分散隐藏避战，但群众坚决要求抵抗，并愿参战游击队一块共存亡，因为游击队离开，群众必遭屠杀，房屋被毁，群众无处可逃，也由于群众的愤怒与斗争的情绪，乃决心抵抗，当即动员群众千余人，配合游击队，事先埋伏于小河口之沿岸，待敌轮靠岸，快下船时，即行进攻，恰如所愿，将敌全部歼灭，敌轮被土炮轰击，搁浅，所有的东西全部缴获，由于这些的胜利，江、石苏区和游击队是迅速的扩大和发展了。与此同时，派了许多同志，到长江南岸，洞庭湖北、南华

安一带开展地方工作，在北岸游击队胜利的影响之下，南岸的地方工作，也有迅速的发展。党中央为加强洪湖的军事工作，相继的派来王鹤、周容光、王一鸣、孙德清、许光达、邝继勋等同志，他们在帮助红六军之建立与发展上是起了作用的。

一九二九年六月，湖北江防队，以陈光明为首，人枪六十余反正，拖入洪湖，参加游击队，这对洪湖游击队的发展有很大意义，一方面是扩大了游击队的影响，动摇了白军，另一方面是大大地补充了游击队的下级干部，提高了军事技术，增强了战斗力。

由于当时游击区的扩大与游击队的猛烈发展，一九二九年夏，一、二、三中队大会师于江陵之严李家场，当时又改编为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为参谋长，下属监利大队，大队长王尚武，沔阳大队，大队长雷血，江陵大队，大队长段玉林。各大队属三个中队，人枪红三百余，共约人枪千余，其声势之浩大，震动了洪湖白鹤湖，长江与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

当地的豪绅地主武装已经没有力量维持自己的统治了，一九二九年秋，国民党派三十四师岳维峻部对洪湖举行大的清乡，在反革命强大武装的镇压之下，沔阳群众被迫反水，监利亦有部分反水，此时洪湖根据地只剩下芦口、一区四个乡、三十四一个旅从螺山向洪湖进攻，遍地被烧杀，形势甚为严重。

当时留周逸群同志领导江陵工作，由段德昌带领总队长率监、沔大队仍回洪湖活动，由于白军的进攻，战斗频繁，损耗颇大，尤以弹药缺乏，地方组织被摧毁，群众被烧杀，情绪低落，是受到了极大困难的，后来经过了极艰苦的工作，派了少数部队去敌后，沔阳活动，恢复地方组织，在监利方面，集中全力，恢复二区，聂家岭战斗，扬州三十四师一个团击退，才停止了白军的进攻，地方组织随又逐渐恢复，此为一九二九年冬之时也。

（三）红六军之正式成立——（一九三一年正月间，在上海开会以后）党中央指示，将洪湖游击队正式编为中国红军第六军，监、沔、江各大队，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江陵之汪家桥会师，正式成立红六军，党中央派来邝继勋同志为军长，周逸群同志为政委，孙德清同志为参谋长，将监、沔大队编为第一纵队，人枪八百余，纵队长段德昌、政委王鹤，王一鸣为参谋长，江、石首编为第二纵队人枪六百余，段玉林为纵队长，许光达为政委，×××为参谋长，此后两个纵队，集中行动，很少分散活动，会师后，北上相继攻克龙湾寺、老新口，新沟咀潜江城，又南下，攻克郝穴、藕池、石首县城。调关，旋又北上攻克沔阳城，仙桃镇，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即发展到人枪四千余，打通了监、沔、江、潜根据地，成为一片，并拥有三个完整的县城，潜江、石首与沔阳、由于石首、藕池、调关之攻克，大大地推动了长江南岸，公安、石首、华容一带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前地方政权，称为革命委员会，区乡仍称农民机会，到一九二九年冬，才开始登记土地人口，至一九三一年春，才开始没收地主土地进行分配，至二月正式成立了各县苏维埃政府。

立三路线下的红六军

（一）向汉阳挺进——自攻克沔阳、仙桃镇之后，红六军已有很大的发展，创造了汉水南及长江两岸间的大块根据地，旋奉党中央命令，指定红六军向汉阳发展，配合鄂豫皖的红军攻打武汉，于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红六军乃向汉阳方向挺进，相继攻克系马口、汉川，到达蔡甸，在进攻的胜利中，发展到人枪六千余，的确是震动了武汉，我们的侦察队已经进到了汉口市上。

又奉中央命令，指定红六军到鄂西，迎接红二军，以便集中湘鄂西的红军力量，进攻武汉，于是乃由汉阳转回而向西进。

（二）红二、六军在公安会师——六军于一九三二年夏初，自汉阳撤回经监利县境尺八口渡江南下，攻克华容、南县、公安、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与红二军会师于公安，当时红六军已成长为算是比较坚强的一支队伍了，尤为战士之纯洁可爱，差不多完全是参加上地革命斗争中的农民，部队与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战士没有逃亡的，因为这支队伍都是当地的农民，纯粹由土地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三）进攻大城市——二、六军会师后，即渡长江，进注郝穴，决定进攻监利、未克，退普济观，整理部队，正式成立红二军团。贺龙同志为总指挥，周逸群同志任政委，孙德清同志任参谋长，柳克明系中央派来代表，巡视洪湖工作，后即留此工作，为政治部主任，下属二、六两军，二军军长由贺龙，下属四师，师长王炳南，五师师长×××，警卫团六军军长邝继勋，下属十六师、十七师，整编后，前委讨论军事行动的方针，贺周等，主张肃清监利、江陵等县的地主武装，即当地的团防，以巩固根据地，开展汉水北岸荆、钟、京、天等县的游击区域，而柳克明，以中央代表资格，坚主攻打沙市、宜昌、武汉，为执行中央之指示，乃决定进攻沙洋，攻克沙洋后，即向沙市进攻，沙市守军为李虎臣一个师，善于防守，并筑有坚固的攻事，建有铁丝网，而我军系刚集合起来的游击队，从来没有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正规战的训练。二、六军又刚会合，彼此情形不了解，动作欠配合，在一个阵线上，这里冲锋，那里撤退，有的进攻去了，有的撤退出来了。总之情形非常紊乱，攻打了一天一夜，终不能克，结果伤亡达千余人，部队情绪低落只好不欢而撤。二、六军会师后，不仅声威未震，相反而是遭受了极大损失。

（四）群众反水，与赤白区严重对立——一九三二年党中央提出：鄂西党任务，扩大红军三十万，当时鄂西党根据具体情况，用一切力量最多能扩大三万人。但中央批评，湘鄂西的党是机会主义，在此种精神之下，湘鄂西党决定扩大红军五万。当时的扩兵方法，是召集群众大会，会场扎彩门两张，一张写着革命的门，一张写着反革命的门，宣布愿革命者，走革命之门，愿反革命者，即走反革命之门，群众都背着梭标由革命之门而出，这样既走革命之门，即一律编队参加红军。如此群众怨声载道，以及各种左倾的政策，和强迫命令的办法，结果，造成根据地的群众反水，反对苏维埃，以沔阳为最。监利之黄穴口群众反水暴动，杀干部八十余人，监沔群众在豪绅地主利用之下，到处成立白极会（即大刀会之类的）共团、自卫队等，坚决反对红军，苏维埃，见了我们的干部即遭惨杀，在组织上学了我们一套办法来反对我们，并向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游击烧杀，抢掠，而我们根据地内的群众即起来报复，也向白区去进行烧杀抢掠，结果创造了严重的赤白对立，与外界断绝来往了。经济被封锁了，特别是盐油、布正，遭受了极大的困难，长期吃不到盐，不是国民党封锁了我们，而是周围的群众封锁了我们，在沔阳造成了一线无人区，根据地日益缩小了，群众斗争情绪下降了。

（五）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争论——攻沙市失败后，特委召集会议讨论行动方针，贺周仍主张红六军在江、监、沔、潜一带，以三个月的时间，肃清内地之地主武装，巩固根据地，红二军载至汉水北岸，荆、钟、京、天一带游击，扩大影响，开辟汉水北岸的根据地，而柳克明以中央代表之资格反对，坚主以六军之十七师到沔阳镇压反水群众，而二军全部及六军之十六

师，攻打岳口、汉水北岸的工作，终未建立起来。岳口被打下了，部队住在街上，曾遭受群众之袭击，邝继勋同志险遭不测，旋即退出，反回沔阳之府场，峰口一带休整，当时，二、六军的关系，有些猜疑，不很团结。

此时十七师奉命镇压沔阳之白极会，未成功，当时群众反水之潮流日益增长，白极会与豪绅武装地方团队配合行动，异常猖獗，因此决定以二、六军全部力量，镇压反水群众肃清白极会，二军任江、潜六军任沔、监，完全在武力镇压之下，反水潮流，稍事平息，扩军运动事实上被停止了，根据地暂时的维持了稳定。

离开洪湖根据地的红二军团

（一）与红三军团配合行动，进攻津澧——一九三一年秋，中央派邓中夏同志来洪湖，为中央代表，兼湘鄂西特委书记，传达中央指示，红二军团过江响应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任务，于是部队即向南出动，收复监利县城，此时得悉三军团已退出长沙，又决定北上攻打仙桃镇。

在攻下监利城后，部队进行整编，邓中夏同志为二军团政委，周逸群同志调地方工作领导江南（石、华、南一带）工作，二军军长为孙德清，四师师长王炳南，下属十、十一、十二团。段德昌为六军军长，邝继勋同志调回上海，下属十六师、十七师。十六师师长王一鸣，政委王鹤，下属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团，十七师师长许光达，政委李剑如，下属四十九、五十、五十一团。攻克仙桃镇后，郭汝栋部增援，向我进攻后即撤回峰口休整，此时长江局指示，中央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饰二军团过江响应。过江后，攻克华容、南县、安乡、公安、继又攻克津市、石门、临澧、并向常德方向前进，后因中央红军攻长沙未克，乃停止前进，撤回石门休整，旋又再攻克津市，围困澧州，达十一日之久。

中央红军攻长沙失败后，何键得以全部力量，应付湘西，李觉以八个团之兵力，来援、与陈渠珍两个旅，还有一些收编湘西的土匪部队向我进攻，我军乃退出津澧经王家厂到达杨林市。

此时为红二军团之极盛时期，全军达三万余人，枪约万余支，游击区扩大，北抵汉水，南至洞庭湖边，东到汉川，西至公安、石门，占领城市有监利、沔阳、潜江、石首、华容、南县、公安、安乡、临澧、石门、津市十一县市之多。

（二）国民党大规模“围剿”、开始与军事行动方针的分歧——由于红军苏维埃胜利的发展，国民党已开始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向我进行“围剿”，徐源泉、肖之楚部相继占领仙桃、岳口，刘湘部之王芳舟进驻沙市郝穴，何键部之李觉进驻澧州，各方配合，有开始围攻之势，情势十分严重。

当时我军驻杨林寺一带，前委会议讨论军事行动方针，发生了原则的分歧，贺段主张，不脱离洪湖，因为洪湖是老根据地，有广大群众的基础，依靠群众能够打破敌人的围攻，应该坚持洪湖的根据地，邓则坚主离开洪湖，另找阵地与敌决战，他认为洪湖水大多，不宜于大部队活动，旋回不开，主力要依靠山地，才能作战，争论未决，段德昌坚持回洪湖，前委即决定派段德昌只身回洪湖，所谓坚持洪湖的游击战争，实际上是撤消段德昌六军军长之职，而以汤慕禹为红六军军长。

（三）杨林寺之失败，开始逃跑主义——上山与回洪湖之争而不决，上山则群众情绪不满，下山又怕水，结果将部队分散，六军置于杨林寺，二军置于公安一线，徘徊犹豫，不上不下，所谓待机，当时周围的敌人，已开始

向我逼近，又不积极准备，集中力量，主动地进攻敌人，致使李觉部得以从容布置，分三路向杨林寺进袭，战斗整日，将我各个击破，遭受严重失败，此次伤亡，被俘与溃散的约达二千人。往后在刘家场集合，收容，而敌人跟踪追击，此时不暇他顾，即向鹤峰狼狈而逃，从此主力脱离了洪湖根据地达一年之久。

（四）在五鹤峰一带之流动游击生活——杨林寺失败后，退鹤峰之走马坪，经休整后，一九三一年即开始了流动的游击，进攻鹤峰、桑植、慈利、磨岗隘、五峰、长阳、渔洋关、宜都、枝江等地，来回游击，进攻，曾有过许多胜利，但大多数的战斗是失败的，部队情绪低落，战士想回洪湖，常有逃亡（六军战士完全是洪湖的，二军战士大部分也是在洪湖补充的）物质困难，当时正是冬天，没有棉衣，也没有毯子，生活艰苦，没有粮食，部队伤亡，没有补充，负伤后没有医药没有休息的地方，寄在老百姓家里，常被豪绅地主谋杀，以至在战斗中，官兵不敢应战，怕负伤不能医治，怕战士伤亡，没有补充，因此战斗力相当低落。

由于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深刻观念，而只是单纯的军事观点，依靠红军打天下，所以没有采取任何的具体步骤，发动群众，建立地方组织，开始土地革命，进行建立根据地工作，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土豪是打了，但群众并没有得到东西，不仅是土豪，只要是有点东西的群众，都在被打之列，至于田地则根本没有分，因此我们没有根据地，部队没有后方，群众不拥护我们，相反许多地方的群众，在豪绅地主利用之下，起来反对我们，驱逐我们，袭击我们，红军不仅要对付敌人，而且还要对付群众，我们完全是孤军作战的，部队日益干涸了，处在极端困难削弱的境地中。

（五）段德昌在洪湖根据地之坚持与创造新六军——段德昌由杨林寺只身回洪湖，收集洪湖遗留下很少数的枪支重新组织游击队，当时洪湖的地方武装在立三路线下，差不多都集中编到主力去了，在二军团渡江南下的时候，也是没有留部队的。

杨林寺战斗失败后，被敌人击散的一部分人枪约五百余，逃回洪湖段德昌收容了他们，与洪湖游击队会合，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在监利编成独立团，即洪湖群众所称之新六军。

红军主力走后，敌人集中力量向洪湖进攻，由于洪湖内部，没有足够的武装能够抵抗，敌后又没有任何的牵制与援助，因此敌人能够比较容易的前进，深入苏区内部，但是洪湖有着久经锻炼的群众，是坚持到了最后的。为应付当时局面，将各县所有的零星武装集合，与独立团，编为江左军与江右军，江右军由段德昌指挥，江左军由段玉林指挥，分属长江两岸，终因敌众我寡，地区太大，沔阳、监利相继失守。公安、藕池、石首、华容、南县全被敌占。江右军退回左岸，坚持监、酒的游击战争，江左军则坚持江、石地区。一九三一年夏，监利朱河一战击溃敌人一个团，即转变了监利的形势。接着江、监间一战，歼灭川军一个团之众，于是停止了敌进攻，江南的苏区虽然失败了，但江北岸，除县城被敌占领外，乡村大块根据地，仍然是保持了，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新六军即有迅速的发展，达二千余人，旋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段德昌为师长，陈培英任政委，监、沔、潜、江石老苏区，逐渐恢复。

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洪湖成立湘鄂西省委，夏曦为书记，此时党中央以派夏曦来洪湖，并成立中央分局，夏为分局书记。

（六）二军团主力的改编与企图创造荆当远根据地的失败——在五鹤峰一带流动游击，经过许多失败后，部队人员大减，与上山此时约减去过半，战斗情绪低落，部队疲劳已极，前委决定在五鹤峰之枝柘坪休整一个月，并将部队缩编，改为红军第三军以原二军编为第七师，原六军编为第八师。

由于当时处境的困难，（人员补充，物质给养等）与部队要求回洪湖的情绪，同时湘鄂西省委有指示，调主力回洪湖，前委乃决定渡长江沿北岸向下游发展，以解洪湖苏区之围，留独立师由王炳南、周小康指挥坚持五鹤峰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夏初，主力向巴东出动连克巴东、秭归，消灭川军戴天明部，继占兴山远安。荆门，攻当阳未克。

按当时情况，完全可以前进与洪湖会师的，但邓中夏坚主创造荆当远的根据地，认为洪湖水多不能容藏主力，欲解洪湖之围，必须从井上救人，而不能将自己跳到井里去，这样部队就在远安、保康一带停留下来，不久，宜昌当阳之敌，郭汝栋与保康之敌赵观涛部，南北配合，向我夹击。马良坪一战又受严重失败，二十二团全部与二十三团一部，被敌包围，几乎全军复没，经激烈战斗突围，逃出一部。与主力失联络。（该部独立团游击数月之久，后在房县归队）往后主力，即向北逃，创造荆当远根据地的企图，已成泡影。

（七）在房县建立根据地——马良坪失败后，向北退进占石花街，均州，攻郧阳未克，又企图创造武当山的根据地，敌人进攻，我又失败，即退占房县，此乃一九三一年夏时也。

房县周围敌人统治较弱，并接连消灭张连三，马大脚、刘正增等部均获大胜，地区亦较富足，使部队得以从容休整并略为补充。

快一年的流动游击生活，深深地体验了没有根据地的痛苦吧，在房县是决心建立根据地了，从部队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和战士，去帮助地方工作，组织了工会农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建立了地方党和群众组织，但由于当时政策的错误没有正确的群众观点，是不能真正发动群众的，许多地方政权建立不久，群众即行反水，拿起武器反对我们，所谓根据地是毫不巩固的，后来主力红军离开不久随即垮台了。

（八）刘候集会师——住在房县的时候，中央分局曾来指示，命红三军立即回洪湖，并派段德昌、万涛率九师来接，一九三一年秋末，红三军之七、八两师，乃从房县出动向洪湖根据地前进，在房县曾留有教导师，并将该地游击队编为第九军二十二师，由汤慕禹指挥，坚持房县根据地（主力走后，旋即失败，亦退回洪湖）主力经保康、南漳至刘候集与九师会合，此时七、八师，共约七、八千人，九师约二千余人，旋即渡汉水，克钟祥回师潜江。

中央分局，认为邓中夏是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予以撤职送回上海，红三军的政治委员则由夏曦继任，此一九三一年冬事也。

红二军团历史片断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廖汉生

(一) 组织和发展时期(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

南昌暴动失败后，一九二八年一月(阴历二月)贺龙同志率十二人返回其原籍——湖南桑植。该十二人中有周逸群(当时党的负责人)，李甫、李云清、贺锦斋等多为贺龙之旧部下。

南昌暴动失败后，桑植谣传贺已牺牲，当其突然返籍之后，当地人心振奋，昔日依贺龙同志之关系而升了官者，及发了财者，相继奔来投往，桑植之旧团队及桑植县长陈呈欣(为该县大绅)多为贺龙旧部，贺龙同志旧日之声威，复扬播四方。

在桑植先已有贺龙同志之姐贺敏英(当地人称贺英又名为贺香姑其夫谷虎为什么司令，当谷虎为仇者刺死后，贺敏英即继掌兵权)，由于贺在南昌暴动失败后，不堪反动派压抑而举戈自卫之武装六七十人(有短枪三十支，长枪三十余支)已辗转在桑植境内，与敌人搏战，贺龙同志归后，反动派由于贺龙同志声威所慑，即不敢再向贺敏英部进攻，后其姐即将武装交与贺龙同志，贺龙同志以其姐部为骨干，并收容李云清部(贺龙同志之营长)贺佩钦部(贺龙同志之旧马弁)还有谷志龙部共有三四百人之众。

贺龙同志到桑植后，休养生息，秣马厉兵，人心归向，反动派恐惧异常，首先宣传：“贺龙为红脑壳”，“杀人放火”，“抢劫”等等，继之有土著军阀龙旅长(失名)之进攻，贺龙同志即退到桑植内半县(当时桑植四个乡在大山之内叫内半县，四个乡在大山之外叫外半县)之罗峪住了二个月。在五月分(阴历四月)又收容了刘子威部即又出兵到外半县，与反动派激战于洪家关，伤亡惨重，李云清牺牲，又败退大山中，吃包谷度日，这时基本队伍剩二三百人。后又到石门境又战又败，贺锦斋战死，贺龙同志之侄贺学传为敌俘虏，由于两战皆北，当时情势已不能在湘西站脚，故率部到鄂境之五峰、鹤峰，有王炳南亦开来合而为一。在鹤峰之乌鸦关利用当时之迷信团体组织神兵团：(该神兵团烧香念咒吃符可以避枪弹)尽为红缨长矛枪，只有团长带一支驳壳枪，神兵团为第一团，另外组织了第四团及一个警卫营，二、三团已加委了团长并已着手组织，因情况紧张未组成，合有一千人至二千人之谱。后回师桑植，攻克县城，后有在湘西之上著陈渠珍部攻桑植，革命势力即在桑植摆下空城计：神兵团埋伏于东门外，步枪团埋伏于西门外梅家山，当陈部攻入东门后，神兵团持矛飞杀入城，陈部猝不及防，并慑于神兵团玄秘之神威，敌人即乱奔逃窜，甫至西门步兵团(四团)又突出掩杀赤溪河畔，尸盈遍野，团长溺河而死，全部敌兵不死者悉数就擒。打垮陈部之后，红军之威名大振，复将部队编为二路，第一路指挥为王炳南，第二路指挥为覃甫臣，约四千之众，复挥戈南下向大庸发展。在桑植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九二九年夏，在桑植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农民协会。

反革命势力对这初生的革命力量是最不惜其残酷的摧残的，当向大庸发展时，湘省军阀即又派兵攻桑植，桑植城弃守，即又退内半县在内半县之张几坪打了一个大仗，二个团长皆阵亡，折兵将半，仅余约二千人。

在桑植失利后，为反动势力所逼，乃北上湖北，占领鹤峰县城，击败了当地团队，并在鹤峰成立五路军，即原神兵团长之父(失名，要为子复仇，

而组织者)并在鹤峰成立了政权,实力遂又稍得补充,时一九三二年春。

同年,把各部编为第四军,贺任军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未到任)后恽代英率第六军(不是现三五九旅之六军团)活动于湘鄂西贺即率第四军向湘鄂西进发,以便与六军会合,出师之前贺龙第一次直接署名告示人民,内中有云:“与我六军会合,直下武汉三镇。……等语”,在鹤峰留下一个独立团,贺炳炎为团长,坚持当地战斗。

第四军到洪湖之后,又改名为第二军团,孙德清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军长下辖之师未详)当时的口号是:有阵地的向前发展,(义未详)在鄂境杨林寺一战又挫败,贺龙同志险被俘,将所驮之银洋抛撒满路,诱使白军拾取而滞止追击,而得脱逃。后六军返回湘鄂西,贺又率部返鹤峰,在鹤峰之走马坪遇四川匪军秦百春[卿]部三千余人,与之战,俘获甚众,得到很大补充。

当时鹤峰独立团,编为独立师,王炳南任师长,陈协平任政委,苏维埃主席余华生,湘鄂边特委(失名外号叫龙姑子)书记为周小康。贺龙同志返回后,将鹤峰略事整顿,贺又到房县一带活动去了,后又转去洪湖,当时以邓中夏为“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夏曦代邓职到洪湖后,又改为红三军,夏曦为政委,下辖三个师,七师师长许光达,八师师长王一鸣,九师师长段德昌(段在肃反时当作改组派被杀了)时正肃反,贺龙同志为夏所疑,而被免军长职,并逼令贺龙同志写声明书,时一九三一年夏。

(二)一段弯曲而沉痛的路(一九三一年夏——一九三五年)

夏曦同志到后,在肃反工作错误上,引起了部队数目及情绪的急剧下降。

鹤峰独立师和桑植贺佩钦之游击大队,有阅墙之斗,先是游击大队为敌攻时求援于独立师,独立师因故未去,相互间产生了意见,后独立师为鄂敌攻击,独立师转到桑植向游击大队借粮、借子弹,游击大队念念旧日不救援之恨,拒不给当时特委决定缴游击队的械,谓有改组派捣鬼,械未缴成互相自打,兄弟于阅墙之内,湘鄂敌会剿(过去湘鄂各守本上无会剿)之下,互不策应两相煎迫,结果都站不住脚,独立师退走洪湖,鹤峰遂复陷敌手。由于特委决定说桑植游击大队是改组派,非全杀之而后快,故该大队对党已失去尊重,但对贺龙同志之服从犹如以往,后游击大队转入山中。

贺龙同志已得发展并壮大,乃将其姐之原枪人马归还其姐,贺敏英率数十人在大深山中艰苦持续的斗争,以包谷充饥,搭帐篷而避风寒一年有余,时在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冬,由于洪湖又失败,贺龙同志率部转鄂豫边回鄂南又恢复鹤峰城,贺敏英部亦来会合,桑植游击大队亦相继来归。由于肃反,很多主要干部被杀,回鹤峰后肃反仍未停,部队恐怖逃跑之现象甚严重,敌又跟踪进击,部队极度疲劳,鹤峰又失守。

多数党员在肃反中被杀,以为当时党员都是改组派,及至发展到解散全党,取消一切政治机关及连队支部,当时全军只剩下四个党员(贺龙、关向应、夏曦、芦冬生——芦为与中央联络之交通),司令部之组织亦无形取消,由于没有参谋人员与政治机关,打仗则依靠几个警卫员去传达贺之口述命令。

过去当过团长者除贺炳炎一个人外(贺炳炎也押了二十九天)再无别人,人皆不愿当干部不愿当党员,人皆不愿扩兵,因扩兵及介绍了熟人来,出了问题怕受连累,在毛房二人相遇一说话即有嫌疑,一块买些花生吃,即以“好

吃会”之名杀掉，在队列前号召自首，如不自首即指名拉出杀之，鹤峰郊外每日皆有被杀之尸体十数具不等。在此种情况下部队天天缩减，也天天在走路，由于部队数目下降，故又缩编为两个师，每师各辖三个团，每团辖三连，每团内有一个“自首连”，都是过去所谓自首后未杀之改组派排连营干部，但打仗专靠自首连打，缴到武器弹药后得送给其余两个连。

虽然当时部队恐怖逃跑很严重，捆杀了很多人，取消了政治机关与党的组织之保证，部队未全垮而能保存下来，固然赖于在土地革命斗争中之觉悟所鼓舞，然而端赖贺龙同志个人威望所维系，却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与中央无线电台联系，故错误持续很久未能改正。

一九三三年三月贺敏英战死，该部即由廖汉生带，编为游击大队。

一九三三年秋，为保存实力，贺龙带九师，夏曦带七师，即分开行动，然分开不久两个师又会合，内部关于恢复党的组织及政治机关有争论，虽通过了恢复，但对过去取消是否错误未能讨论，后接到中央五中全会指示，夏曦错误才逐渐被人认识，在关向应同志之主持下来恢复党的组织，关自认支书，介绍了一些党员入党，由于在肃反中杀的多为党员，故多数人不敢入党，过去之老党员亦不敢承认自己为党员而重新登记，有的人要他入党，即以双腕绳捆之疤痕出示，如杨秀山（现晋绥独四旅政委）重新登记后因畏惧被杀而逃跑，至三里之遥，后念及在敌人统治下何处可逃，故又返回，又如原大青山骑兵团长蔡九，可以英勇战斗不畏牺牲，但决不入党，直到1938年由贺龙、关向应介绍解释方入党。

总之，对共产党员在一般人心目中大有谈虎变色，畏惧不前之情也大大妨害了恢复党组织之速度，但军队中的政治机关和党的支部已在逐渐恢复了，三三年秋已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

由于在肃反中执行夏之肃反者即为政治机关，虽然以后恢复了政治机关，而且强调了服从政治机关，但以后对政治机关的信任很差，虽然他口头可以服从，但内心中是有着不信任成分的，以后很久这情绪才被克服了。

总之这段历史是沉痛的，它几乎招致部队之复灭，它严重的损失了党的威信与力量，今昔二军团干部每回忆及此，无不喋喋兴叹，寒禁疾首。

夏曦同志之领导，（一九三四年春）在贵州沿河印江之间之南腰界开会检讨，夏承认自己错误，但有人质问他是怎样错误时，夏大发脾气又与贺龙同志争吵起来，未果而散。

由于无电台，在敌人的报纸报道上知道了六军团要来，无形中作了两军会师之响导，先在印江县境与李达同志之部分会合，更洞悉肖克与王震部分之企图，后即派兵相接应，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与肖克王震部会合。

会合后，贺龙同志部红三军改为红二军团，下辖七师改为四师（师长芦冬生），九师改为六师（师长×炳然（非党），政委廖汉生）。

一九三五年春在大庸之丁家×在任弼时同志主持下，开检讨会，清算了夏曦同志之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夏曦被撤职，除贺龙及关向应同志外，其余二军团干部犹有余怖，仍皆未敢发言。

在与六军团会合之前，夏曦之错误领导已在逐渐被克服着，如政治机关与党的支部已逐渐恢复了，部队情绪已见好转了。与六军团会合后，由于有了任弼时同志之多方帮助整顿，政治领导更形加强。

六军团到后人数很少，疲劳不堪，由二军团掩护其休整，两个军团相比，六军团政治领导很好，但纪律很差；二军团由于肃反后，政治领导差，但能

拖，纪律好，相互影响对二军团有很大帮助。

两个军会合后，即合为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关向应同志为付政委，干部与武器互相调整之后，即两部相会力量增多，能敢倍益，声威大振于湘鄂川黔边，相继克慈利、大庸、桑植、常德、桃源、永顺、石门、澧州等地，成立了湘鄂川黔苏区，打了不少胜仗，活捉了敌师长张振汉，消灭了第五十八师、第四十八师、第八十五师，打死师长谢斌，打开了一个空前未有的新局面。在配合中央苏区突围上给了有力配合，时一九三五年春。

（三）一九三五年秋突围长征，在突围中未遇什么困难和损失，反而到贵州后，又得到了很大发展，六军团成立了十六师。

长征中在云南渡过大渡河之泸江，战争很残酷，干部伤亡很大。

突围时共有二万余人，直到进草地未减员，在草地走了三个月，部队很大减员，即以六师说，出草地时只有二千一百人（原有四千）。

到甘肃之康县，派了一些干部四出扩兵，由于张国涛把四方面军引向西，未与二方面军联络，敌人突然袭来受了很大的损失，只第六师即掉了一个整团。

第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时，整个二方面军不上一万人，在西安事变时六师只有九百人了。

由于人数的减少，五师在草地与三十二军会编，归二方面军统辖，六师在环县亦缩编。

西安事变后开往咸阳、三原、泾河、云阳镇一带扩兵，部队又形扩大，取得国内和平之后，部队驻于陕西富平县之庄里镇，一方面负有扩兵之任务，同时并加紧整训，以准备走上抗日的阵地。

卢沟桥炮声响后，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宣布改名国民革命第八路军一二师。以原二军团编为三五八旅（四师编为七一五团，六师编为七一六团）。以原六军团编为三五九旅（原六军编为七一七团，三十二军编为七一八团）。

誓师东下奔赴民族抗战的前线，雄据晋绥，驰骋于晋察冀高山平原之间，成为抗战敌后战场上—支不可战胜的铁军。

湘鄂西红军游击纪略。猎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湘西地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造成洪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贵州沿河县，合编为红军第二方面军，战斗在湘鄂川黔四省边境，牵制敌军近三十万人。

一、创立湘鄂西区革命根据地建立湘鄂西红军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至广东失败，贺龙、周逸群同志由香港到上海。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共中央派贺龙、周逸群等同志到湘鄂西区，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周逸群同志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军政委，贺龙任红军军长。与贺龙、周逸群同志同行者有张海涛，芦冬生等二十二人，多为师、团、营等级干部，搞短枪若干支，在长潭轮上几为检查发觉，贺龙同志以机智得脱，到沔阳樊坝登岸、至洪湖朱家湖与石首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夺取一区匪枪若干支，发动群众，杀其巨匪，开展斗争，为洪湖革命根据地奠下基础。

贺龙同志在鹤峰同我谈：南昌起义失败，他由香港到上海，中共中央本要派他到苏联学习。他说：“中国文字识得不多，到苏联学俄文是难得搞的；我在湘西很熟悉，能派我到那方面去作游击工作，会搞得好些。”党中央同意了她的意见，所以派他到湘鄂西做军事工作。同时又谈到南昌起义，他说：“南昌起义有某部不稳，我主张先解决后来作战果然叛变。”又说：“我不主张到广东，我觉得湖南边境农民运动做得好，有群众基础，不至千里行军，感到疲劳，同时兵员又容易补充。”到现在看来，觉得有见。

三月二十二日，贺龙同志到石门南乡，在张海涛家隐蔽三日[天]，派闫于锡同志送信到石门县委。这时石门县情形非常紧张，贵州匪军在新街

口搭浮桥，县委迁至乡下，没有取得联系，会到宋仁杰同志，宋说：“拜上谢老板（贺龙同志当时化名为谢国忠），这里生意不好做。”二十四日，由陈大偕同志带路，送贺龙同志走扁担址上慈利，由江亚到桑植。张海涛留石门作地下工作。

三月二十四日，伪第四十三军团长李×率队包围石门县立中学和石门第一高级小学，大捕共产党员。三十日，枪毙苏清锡、邢业炳、宋仁杰、伍经怒、熊彦明、云清渠、龙声灵、廖宏保、邱本泉、文玉珊、伍索沉、李逸如（女）十二位同志于观音巷河州。

这里我们不妨追述一下石门的情况，中共石门县委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领导石门人民进行革命工作，组织工会、农会，发动农民，打击封建势力，曾形成革命高潮，马日事变后，党和工会、农民受到严重摧残。革命组织被瓦解了。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共湖南省委派伍经怒（白显）到石门，成立中共石门县委（书记伍经怒）。石门中学当时已停办，县委决议复学，苏清锡为教务主任，邢业炳为教员。在石门中学设党支部、介绍教员、学生三十余人入党。掌握教育界，对抗反动县政府。十二月，石门年关暴动、曾庆宣、龙在前、盛联雄、陈奇漠分别在谍阳、新关、磨市指导农民游击队百余人，击杀豪绅地主，并烧毁伪县警察所长屋。反动集团大为震惧，勾结驻军造成三十日大惨案（石中、一高两校教员被杀害）。十二烈士同日就义，皆大呼共产党万岁！至今犹为可痛。

石门南乡大暴动，成立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一九二七年七月，袁任

远同志（原名明廉，此时改名思质，为县委委员）到夏字巷小学建立党支部，成立区委，发展花薮、福田、白洋、蒙全五个支部，党员百余人，同时组织了农民游击队，少年先锋队。三月三十日，陈海抄带警察到南乡捉暴徒。一日（阴历一月十六日）县警察到花薮捉人袁任远、曾庆宣、余泽同志等二十余人。持单刀、梭标，一晚杀八个警察，夺枪支、发动农民游击，夺取团防军武装，组织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二百余人，枪一百多支，农民游击队一千余人。以太浮山为中心东余氏桥（临澧）西界溪河（桃源）南盘龙桥（常德）北会亚山（石门）纵横二三百里，实行武装割据。

打退陈嘉佑伪军与临澧、石门、慈利、桃源四县团防的四次“围剿”，相持半年之久，农民死七百多人，房屋烧去三百余栋。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湘西首举义旗，向反革命进攻的第一战。党员牺牲了三分之一，存者多参加红二军及鹤峰苏区工作。

石门第二次革命斗争中，前后牺牲共产党员干部一百余人，农民死者一千五百余人，参加红军战死者万人。湖南省老革命根据地委员<会>调查时，我曾写“石门革命斗争战略”。一九五一年中央派人到湖南来访问老革命根据地，一时调查不及，未到石门，我曾与袁任远同志写过一信，兹就记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事，摘两段如下：

“……马日事变后，湘西各县的革命斗争。石门发动的最早而且也最为有力，贺龙同志建立红二军及湘鄂边苏区的造成，实靠石门党的基础。一九二七年秋，中共石门县委恢复发展到党员二百余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石门中学、第一高小，十七名教职员被捕，十二名共产党员遭受惨杀，四月南乡大暴动，你领导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枪百余支，农民数千人，打退陈家佑伪军，石门、临澧、慈利、桃源团防近万人的四次“围剿”，党员牺牲四十多人，农民死者近千，房屋被烧三百多家，这次英勇牺牲与壮烈斗争，革命历史上是值得记载的。南乡暴动失败，石门革命根据地失掉了。在北乡如澧阳、磨市、泥沙等地，或秘密、或公开仍然经常与红二军联系。一九三一年秋，邓中夏同志领导红军二、六两军，进攻津、澧，仍以石门为根据地。石门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协助红军打击敌人。

……二十年来，最痛心者，是当在苏区红军工作同志，大多数都牺牲了，现在革命成功，竟无有能举其名者，我军为提倡革命教育，将慰孤遗，负有其责，感旧伤情，不能自止。

四月，贺龙同志到桑植，回到家乡召集旧部，组织红军，编为指挥。支队、大队一时集聚者近千人。后成立湘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指挥部，公开打出共产党红旗子，人皆纷纷散去，唯王炳南、贺锦斋数人追随左右，以贺香姑长枪二十余支，又收集团防枪共50多支，短枪23支，七月编成红二军。干部如下：

军长贺龙
参谋长黄鳌
秘书长陈协平
副官长贺桂如
军需处长陈石清（陈毕模）
粮食委员会委员长梁富
第一师师长贺锦斋

师党代表张一民
第一大队大队长王炳南
第一中队中队长罗统一
第二中队中队长贺佩钦
特务连连长朱丙章
宣传队队长谭毅夫

这时参加红军的共产党员干部，石门有覃甦、唐占益、陈奇谟、盛联雄、唐占丰、吴协中、龙在前、刘勋树；慈利有温炼元、蹇先任、黎夏卿；桃源有郭天明。后多为红军高级干部及苏维埃政府工作干部。

共长枪五十余支，短枪二十三支，一百三十七人。甦七月一日，贺龙同志在堰亚出发，向石门游击，贺龙同志化名为赵胡子，红军向人话，皆呼赵胡子。四日驻磨市（磨岗隘）与石门地方党开联席会，计划游击工作，又开群众大会，农民斗争情绪很高，游击工作从此开始。八月一日游击到澧县王穴厂，缴得团防枪十一支。十日到石门仙阳，军部驻曾庆宣同志家，第一师师部驻新开寺，相距七、八里，十一日拂晓，石门团防一大队约百枪，神兵一队红八十支枪，四百余人，来攻军部。作战两小时，伤亡二十余人，参谋长黄鳌战死，即向所市方面撤退。十二日到水南后，九月七日到泥沙，十五日夜晚石门团队罗效之二百余人枪二百支向我进攻，我退丝茅岭，在丝茅岭战斗四小时，贺锦斋在泥儿垭中弹牺牲，是日退驻南北墩，十八日回驻堰垭，二十日桑植团队龙子龙三百多人来攻，战斗竟日，敌败退。此次在石门游击八十天，开了三十多次群众会议，枪毙恶霸二十多人，曾打破了石门白色恐怖，政治影响很好，红军发展到四百六十八人。

这时人人皆知贺龙同志领导的红军，桑植、鹤峰、石门团队，不断联合进攻，桑植鹤峰边界，群众岌岌，稻田稀少，农民多种玉米，薯类为生，红军常苦无食，遂利用复杂地形，时常化整为零，灵活游击，红军大队曾一度减少到二百五十七人。

是时周逸群同志领导段德昌（红六军第一路指挥），段玉林（红六军第二路指挥）等同志分别在华容、洪湖、发展游击，建立洪湖区苏维埃政府，曾一度占领石首、监利县城。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四日，红二军向鄂西游击，由堰垭到鹤峰、宣恩、咸丰、恩施，在王家营消灭惯匪李摆子，到建始。八月七日，由建始返回，十三日抵鹤峰境。十五日进驻乌鸦关，陈宗瑜率领神兵二百余人来投诚，枪十三支，编为红军第二大队。派覃甦为政委兼付大队长。同时收编建浦黄始谋同志所率鄂西游击队。枪三十三支，百余人为红二军第三大队。二十三日，攻鹤峰县城，消灭鹤峰团队，杀死伪县长二人（新旧县长正逢交卸），击毙伪旅长王文宣，建立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分配土地，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湘鄂西特委在宜昌，贺龙同志到建始时与周逸群同志取得联系。

红二军整编，大队改为团，以王炳南任第一路指挥：辖第一、第四两团。覃虎臣第二路指挥，下编第十一、十二两团。

三月二十五日，收编谷子龙为红二军第二旅，派陈石青为参谋长，兵百余人，枪六十九支，此时，红二军有八百多人，枪三百七十多支。

五月，贺龙同志留少数红军警卫鹤峰，于十日率红二军进攻桑植，消灭伪保安团陈策勋一部，占领县城，建立桑植县苏维埃政府。

七月，伪独立十九师陈渠珍派永防司令向子云进攻桑植，向子云派付团

长周寒之，营长向捷先，率五百余人，三百多支枪，至桑植县城西南岔渡澧水，红军乘其半渡突然袭击，歼灭过半。周寒之、向捷先及伪桑植县长罗文杰，狼狈逃奔永顺，向子云率部二千余人来攻，红军佯为撤退，埋伏于南岔及县城附近，西舟西岸，敌渡河入城。贺龙同志登山观敌，日将落，贺龙同志说：“搞得好，开枪！”一时伏兵四起，枪声、杀声震天，敌大乱，不及抵抗，首歼南岔敌三百，又歼赤溪河，朱台子敌一部，乘胜分东、西、北三面围城。贺龙同志从北门冲入，消灭城内敌人，敌在西郊厂坪，背水稍抵，我猛攻，敌以急不得渡，多落水中，向子云坠水而死，全部消灭。获得枪近千支，桑植城收复，向永顺游击，在塔卧建立万民岗苏维埃政府。

八月，湖南省伪主席何健，派第四师吴尚进驻湘西，“堵剿”红军，以闫仲儒旅三千人为主力，以保安团陈策勋为向导，攻桑植，红二军撤出桑植城，桑植县苏维埃政府迁内丰县。

闫仲儒旅尾随红军堵圈子，搞了一个月，在獐耳坪遭遇，战一昼夜，陈宗瑜、贺桂如阵亡。红二军枪支未损失，回鹤峰休整。

一九二八年八月，贺龙同志率红军在石门游击。

红二军在鹤峰不久，向五峰县进攻，消灭孙竞峰团队，竞峰系大地主，在五峰以团练著称，数十年有名的孙团，至此全归消灭，孙竞峰亦死。伪五峰县长逃渔洋关，五峰县苏维埃政权从此建立。

石门县苏维埃政府建贺家台，向下发展。

贺龙同志率红二军在石门仙阳，土地垭消灭罗效之保安团，缴获枪三百多支。效之被俘获，伪为伙夫得脱。红二军到松滋游击，与长阳党取得联系，攻占长阳县城，消灭保安团队，成立长阳游击队及苏维埃政府。此时，红二军有枪二千余支，五千人。一九三一年春，中共中央指示：编贺龙同志红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贺龙同志为军长。第四师师长王炳南，政委陈协平；第七师第二路指挥存在，共七团。第四团团团长罗统一，政委汪毅夫，第十一团团团长覃甦，政委吴佩卿，另有一警卫团，团长贺沛卿，桑鹤地区游击队整编为独立师，编后东下洪湖。党中央指示，编洪湖红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段德昌，政委柳克明（柳直荀）。第十七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李剑如；第十九师师长段玉林。在编制以前，洪湖红军曾由邝继勋任六军军长，勇敢善战，占领石首、潜江、沔阳、监利等县。继勋是从鄂豫皖调来的，此时中央调去受训。湘鄂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在沔阳丰台，北至潜江，南至郝穴，数百里地皆苏区，经两年多斗争，已建成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二、红军会师于洪湖，成立了红军第二军团。扩大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夏，党中央指示红军二、六两军到洪湖集结。邓中夏同志为中央湘鄂西特委书记。贺龙同志率红二军由渔洋关、松滋、西斋、磨盘州至公安斗湖堤在马家咀渡江，红六军派兵一部在丰口来迎，与红六军会师洪湖。改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第六军为第二军团，贺龙同志为总指指，邓中夏同志为第二军团政治委员，孙德清为二军军长，朱勉之为政治委员。红二军团进攻监利，消灭李云部二团，红二军营长廖卓然阵亡。红二军团进攻仙桃镇，在张家沟子消灭郭汝栋兵一团，得迫击炮三门。红二军团在钟祥石碑，消灭团防千人。红二军团进攻沙市，敌军一师依靠坚固的工事死守，未下。张一鸣团长阵亡，退潜江休整。是时，因红二、六两军编为第二军团，兵力集中，连战皆捷，缴获俘敌甚多，有枪一万二千支，机关枪、迫击炮皆备，约二万人。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向澧县、常德进攻，留一师在洪湖。

是时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七月已占长沙。

九月，红二军团二、六两军全部渡江，进占华容、南县。

红二、六两军，进占津市、澧县城，均约七日移至澧县大王家厂。

红二、六军进占石门县城。

石门县苏维埃在县城成立，主席汪毅夫、委员覃甦、唐占益，吴协仲、陈奇。石门县赤卫大队长陈昆山，石门县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杨汝南。石门县磨市区苏维埃政府设广福寺，主席陈志于，书记陈掌属，委员高帮文，陈亚卿、张玉甫、向其贤，在官庄坪进行土改。泥市区苏维埃政府（设白竹亚），主席陈湘翔，政委杨三级，秘书向祯容，陈海村在新宫（？）渡，潘家坪、南镇、古罗寺进行土改。澧阳区苏维埃政府（设江西会馆），主席盛忠和，付主席胡育才，政委贾国湘，委员曾虎臣、张德才、陈昌书，代表张和松等四人。子良、太平、苏市、沿市南折等区与苏维埃联成一片，支援红军作战，极为活跃。

红二军、六军进攻夹山（石门）余氏桥李觉部、李国均旅被击溃退，进占临澧城。

红二军进攻澧县，陈斗南（伪十九师第一团）有枪千余支。据城死守。

红六军进攻津市，红十九师由澧县至津市大道出发，在仁和铺遇敌（罗效之等）小部，浮桥断红军牺牲百余人，但十七师沿澧岸进攻，击溃马昆山旅（马有三千枪）。石门、临澧、澧县团队亦退，昆山狼狈逃安乡，遂占领津市。

红二军围澧县城，七日未下，敌机在头空扫射，城上兵夜晚宣呼不绝，红军准备用楼梯爬城，大刀砍杀，城一举可下。但闻李觉、李国均等已至临澧，马昆山残部尚在安乡，遂撤退。

段德昌军长回洪湖游击，调汤慕禹为红六军军长，段德昌闻令即行，并带供中央不少红军，红二军进驻公安县城。

敌机轰炸公安县城，死居民十三人。

红六军在杨林寺集结，李觉、李国均以大军疯狂进攻，红六军与敌作阵地战，损失颇重。退时将重兵器遗水中。红六军作战最勇敢，常能冲破敌人，但有时冒进，人多认为农民意识，以为少军事训练，其实农民革命，忠诚勇敢，固为本性，在于指挥者之善用，此时红军与敌对比，尚不宜于阵地战。敌兵一部迫金鸡山（驻红第二指挥部）贺龙、中夏同志以二百人击退。

红二军由公安赴援杨林寺，在狮子口遇敌机投弹，炸死唐占益营红军士兵十九人。

这日晚上，红二军与红六军相遇，此时贺龙、中夏同志未至，孙德清军长开军事会议，计划撤退驻地。当晚衔枚疾走，两军至刘家厂。

越日，贺龙、中夏同志至，决定由石门子良、太平、泥沙进驻鹤峰整训。

十二月四日，甘占元有匪兵一旅，枪三千支，四千多人，犯鹤峰西北境，贺龙同志派其姊香姑与占元接头，阳为招编，阴以红六军从五峰绕鹤峰包围，红二军在走马坪堵截。甘占元驻走马坪附近，其另一部（秦伯卿）驻五里坪。伯卿自称共产党军（实非共产党），某日，贺龙同志在走马坪红二军团指挥部，请甘占元喝酒，酒后孙德清军长王一鸣师长共缚甘占元，与甘搏斗时，一鸣勤务兵在旁击甘，打一枪反伤一鸣左臂。德清函（？）第四师云“甘占元已拘捕，夜断绝交通明早解散甘占元部”。是夜敌交通断绝，不知道有甘占元拘捕事。将晓，王炳南、陈协平率第四师围甘占元部，全部缴枪。越日，

秦伯卿部在五里坪为红军全部缴械，遂枪毙甘占元，秦伯卿及其他匪首三十人，此次缴枪近三千支，子弹充足，红军得到很大补充。

一九三一年一月，红二军进剿石门磨市，红六军进驻至所（？）市，在磨市集会。贺龙同志率两军由沿市至日沙渡，与顾家齐（独十九师第二团），罗效之（保安团）在间子溪、白沙渡对河，激战半日石门赤卫大队长陈昆山阵亡，是夜顾家齐偷渡河。第二日，以迫击炮击敌，并派张海涛从皂市渡河，带兵一团侧击罗效之，敌败退瓜子谷。

红军进驻石门城，红六军向瓜子谷追敌。李觉、李国均、周燮卿与顾家齐、罗效之会瓜子谷。红二军由石门前进，与红六军击敌，大战一日，红二、六两军向磨市撤退。李、周、顾等匪倾全部来攻，以罗效之部为先锋。红军反攻，在芭蕉峪商溪激战，敌以飞机助战。大炮、机关枪之声震动山谷，弹如雨下，陈协平在九里坡，望见敌人在包家渡渡河，旗帜以数百，知敌势甚盛，红军始退苏市，敌至重峰亚亦退。

红二军、六军至鹤峰、五峰整训。

红二军向长阳游击，到资丘，驻枝拓坪，红六军包围渔洋关川军二团，消灭敌一部。

二月，党在枝拓坪开会，决定二、六两军回洪湖，成立湘鄂边区编红二军独立团，及县赤卫队，巩固鹤峰、五峰、桑植、石门苏维埃政权，此次红军二军团，从洪湖南渡，进占津澧，配合第三军团进攻长沙，时立三路线，认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邓中夏同志到红军渡江后，看到南、华、安湖泊多，不利红军作战，遂又占石门。中夏同志常在红星周报说：“要有革命根据地，巩固地向前发展”。“不能如太平天国，攻城略地，旋得旋弃”。造成武陵山脉以巴东、建始、松滋、公安、宜都、支江、以鹤峰为根据地。直达石首与洪湖相接。南龙山、永顺、大庸、慈利，以桑植、石门为根据地。直到临澧、澧县、南县、华容、安乡这一大根据地。并说：“这不仅是国内战争的一个好根据地，就是国际战争发生，也是一个好支撑点。所以再进津澧，及石门瓜子谷战役，都是要打通洪湖路线。不过，这一计划不是短期能完成的。因此时只有鹤峰全县苏区最巩固、桑植、石门、五峰只有一部分与鹤峰联成一片，公安、松滋都没有很好的党和群众基础。在杨林寺作战就不如鹤峰、石门好。此时红军在二万人之多，鹤、五山区的给养远不如洪湖。第三个“左”倾路线取得领导，把中夏同志调往中央，红军转战数月，仍回洪湖。留下一团在湘鄂边区鹤峰县等。中夏同志领导时，训练红军（在黄山头办过红军军官训练班），作战与贺龙同志临阵指挥，撤退时总在最后，并主编“红星周报”，著有“中国共产党简史”惜今写存者。

三、红军二军团回洪湖，进逼武汉，红独立团在湘鄂边游击

一九三一年三月，在鹤峰成立中共湘鄂边区特委书记周小康，委员陈协平、王炳南、伍伯显、董朗。

红二军独立团团团长王炳南，政委陈协平，参谋董朗。下编三营、枪七百支，一千多人。

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伍伯显，五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易德荣；石门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陈奇谟，桑植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红二军独立团击溃罗效之在走马坪兵一营。石门县苏维埃政府驻南北墩。赤卫队杨万柳往剩头游击，打击效之团防队。

四月，邓中夏同志、贺龙同志率红军第二军团在巴东渡江，回洪湖。

党中央派夏曦同志为湘鄂西特委书记，关向应为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关向应同志任第二军团政治委员在邓中夏同志后，调邓中夏同志回上海。

邓中夏同志调上海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组织抗日战争，遭反动派毒手，南京遇害，在监狱内写信给党：“同志们！我快到雨花台去了（南京伪国民政府杀害革命者的刑场。作者）！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于是属于我们的。”（中国共产党烈士传。大生）

五月，红独立团到南北墩向石门游击。六月，党中央派唐赤英同志到鹤峰，传达六届四中全会文件（用药水写在布上，洗出不够明）。当时，是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大要认为“全国性革命高潮到来”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两条路线斗争”，“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湘鄂边区的党，素来尊重党的组织纪律，在山区工作很久，见闻闭塞。对国内战争政治情况不明，看不出这一路线的错误，当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是同志们在湘鄂边区艰苦奋斗共事很久，倒很困结，又多凭实际工作经验，工作上没有多大左右倾偏向。

七月，盛联雄率石门赤卫大队来鹤峰，编入红独立团，是将罗效之攻陷石门苏区到南北墩。

长阳县游击大队来鹤峰，湘鄂边区特委会编为湘鄂边区游击第二支队。

十一月，伪湖南保安团罗效之，扩充部队两团（有警备团）。枪千余支，李觉更为机关枪一连二千余人，以付团长陈绍南率部来攻，红独立团二、三营在走马坪与战不利，调湘鄂边区红军第一游击支队（队长贺沛卿枪七十余支）。驻鹤峰城、调红独立团第一团（将去鹤峰游击）绕至石门抄敌后方所市。红二、三营退守大岩关、在三合口激战，二营营长盛联雄愤甚，手持驳壳枪击敌。负伤退守。撤二、三营退据鹤峰城对面高山。绍南在攻，战不利，遂退毛坝、四门岩，三营唐占益断后，四门岩高山，贺香姑所据。敌进至四门岩，始退鹤峰不久去。一九三二年，红二军团在洪湖。

蒋匪开来大批川军和独立十四师夏斗寅、徐瑶廷等匪部，约一百个团的兵力，向红二军团进攻。红二军团首先集中了五个师在闻家屯一带，经过一星期战斗，歼灭了韩昌俊旅，击溃了敌人由北向南的进攻。接着红军在洪湖地区分两路向敌迂回包抄，前后历四个星期，把川军三十九团几乎全都歼灭于潜江地区，敌人进攻失败后，又增调部队，并调来河南匪军六、七万人，分路向我进攻。红二军团为集中力量歼灭一路，派出骑兵一部，牵制北路土匪武装。主力则突过皂市，接近应城，于汉川路上击溃了徐瑶廷部，活捉了一个旅长，缴获了很多美造轻机枪，旋即回军打击北路敌人。首先消灭隐蔽在土匪后面的敌正规军，红军又回师消灭进扰的土匪。红二军团获得几次重大胜利前锋逼近武汉，距汉阳仅十里，与东北的红四方面军相呼应，严重的威胁武汉。

长阳县团防大队伍伯云（桑植人）有枪二百支，将投罗效之，王炳南以同乡关系，招编为红军，没有意图，一日，炳南招伯云计子，手缚伯云，陈协平书生，亦手夺伯云弟手枪。遂杀伯云及其弟，解散大队，缴获其枪支子弹，回鹤峰。

二月，红独立团在桑植仓官谷，消灭周燮卿兵一营，并夺获迫击炮、机关枪等武器。

独立团由长阳回鹤峰后，休息一日，即向桑植游击。王炳南、陈协平深

知周燮卿驻兵一团，附迫击炮，机关枪连，迟回不敢进攻，写信请示周小康，小康回信云：“红军是打仗的，不是在赤区吃饭的。”炳南遂进攻，前后包围，击溃敌，缴获一营步枪，并迫击炮四门，机关枪两挺，回鹤峰城。

红独立团向石门游击，进攻罗效之部，王炳南带一营，三营在九岭头遇敌，地狭与战不利退。陈协平带二营，绕道攻南北墩，夺敌辎重马匹甚多，一、三营久不会遂退。

在独立团出发鹤峰时，正同士兵讲话，周燮卿全部已犯康家岭，听得炮声，鹤峰县苏维埃政府迁刘驾司，周燮卿于泄仓官谷失败之愤，并进至燕子坪，不三日，即返桑植。

在鹤峰肃反，某晚周小康同志约我审讯改组派，董连三同志笔记，五个国民党军官，面目狰狞，身材高大，我们进行秘密审问并未动刑，有四个人直认不讳，供出：“首领是汪精卫，陈公博，打人红军，吃酒结盟，拖红军的枪。有[杀鸡队]、[打鸭队]、破坏红军纪律。”又供：“长阳游击队长田韵涛是改组派。”遂处决这五名改组派，又杀田韵涛数人，当时听说洪湖区域改组派很多是事实。肃反工作一不谨慎，易被改组派陷害，我想洪湖肃反错误，多是这样弄出来。

红独立团王炳南、陈协平带一、三营向石门、慈利游击。董朗带第二营到宣恩、建始游击，烧了川军一个粮米站二千担，得枪七十支。

湘鄂边红军第一游击支队贺沛卿欲叛变，周小康得知，拟即解散支队，沛卿先反，打死谷有年，小康几不免，爬山遁逃鹤峰。

八月，川军二团，步枪二千支，迫击炮及机关枪连各一，三千人来攻鹤峰。先上平山，平山三面壁峭，顶平地不耕，元明为蓉美司所据，有农民九十二家，尽为川军焚烧，红独立团往攻，在刘驾市战不胜，退守鹤峰城。

川军攻鹤峰城，红独立团退康家岭。三面设伏。川军至，我正面佯攻部队覃连长战死，战亦不利，红独立团退五峰。

鹤峰县苏维埃政府迁山甫，距城三十里，一星期，川军来攻，县赤卫队仅三十支枪被冲散，蹇先为同志遇害，鹤峰遂陷。

八月，红二军独立团在长阳西华山与敌作战，周小康同志负伤，以担架抬行，每晚仍计划游击行军，工作不废。曾一度据其白山，后此山亦为川军所据，不得上。

红二军独立团在百龄关，消灭川军一营，至渔洋关。

红二军独立团在马家咀渡江。

红独立团至渔洋关渡江后，绕石门大金洲，在南平河与殷超匪部打了一仗，到松滋磨盘州、公安集合至马家咀，是时天已昏黑，敌军口南岸驻斗湖堤，北岸驻观音寺（沙市下）。我团人枪千余，只找到两支大民船，枪兵先渡，马不遗弃，整夜偷渡。夜半，政治处尚有五十多个同志不得渡，又在附近找得一只大划子，天明始渡，敌江轮在江中开炮射击未中，始渡江。

红二军独立团到达沙洋，苏维埃政府派人来抬伤病员，分散到居民家吃饭，每家一桌或两桌，不要红军自炊缝。妇女洗衣队抢收衣服洗，说革命事，娓娓不绝，亲如一家，始之[知]洪湖已失陷，红二军不知开到何处，此间夏曦同志领导芦冬生一个师（有枪千余）游击。

红二军团在洪湖获得几次胜利后，蒋匪调九十个师，五十万兵，发动第四次“围剿”。主要是进攻鄂豫皖苏边区的红四方面军，和洪湖的红二军团。四方面军在张国涛机会主义领导下，虽取得几次重大胜利。但主力于十月西

入川陕。红二军团在潜江、酒阳屡战不利，和随四方面军西征，退出洪湖。红二军此时应在随县、枣阳。

春夏间，有人至洪湖来鹤峰，说红二军团能打硬仗，善作阵地战得到很多美式枪，又说：“要打武汉”。据推测就这样在“左”倾路线领导下与蒋匪拼垮了。

红军独立团到沙岗，编入芦冬生指挥，夏曦同志又对全团官兵讲话，夸大的称赞了一番。这时，大江南北，布满了敌人，实行“碉堡政策”，我们每晚进攻，看到敌人探照灯时向我们发光。夏曦同志骑一匹大马，忙过不休，与湘鄂边领导同志很少联系。芦冬生同志批评湘鄂边党“右”倾，没有积极提拔干部，其实并不如此，我们随芦冬生师作战一月，有时，敌人攻事太坚，不能盲目进攻。不能大量消灭敌人，反削弱了自己。十一月，夏曦同志率芦冬生师渡江至鹤峰游击。周小康、陈协平、陈奇谟、董朗、郭天明等同志，肃反被诬，死于江北。

我时病住沙岗苏维埃政府，朱国风（女）同志见到我，说周小康、陈奇谟等同志死了，他说：“我看到江南来的同志，遭到这样的惨，心里极难过。”说了几至流泪（国风，江北人，李星若同志爱人，在鹤峰苏区工作很久，此次回江北）。后又听到龚子曾同志及陈协平、董朗被捕，说他们是“改组派”，我在沙岗看到郭天明同志被用绳子捆起，但不知送回何处。

是年，洪湖大水。

四、红二军团退出洪湖，与六军团会师，配合中央红军长征

一九三三年二月，贺龙、关向应同志，率红二军团渡江。与夏曦同志所率芦冬生红军会于鹤峰。

此次红二军团退出洪湖，来到鹤峰总共不过四千人，三千枪，段德昌、王炳南后又在鹤峰被诬遇害。地方干部更少存在。正如贺龙同志后来在“回忆八一南昌起义”一文说：“左倾路线与肃反错误，伤害与削弱了自己，是十分沉痛的。”鹤峰、桑植、石门老根据地，没有熟悉情形的老干部，去联系群众。苏区不能恢复，只能在湘鄂川黔边境，长期游击，尚有贺龙同志声威，红军战士苦斗，运用“游击战”与很多敌人打了两年。

段德昌、王炳南、易德琛、王爱群同志，肃反被诬，在鹤峰死。

红二军团在鹤峰、桑植，来凤等县游击。

八月，红二军团在龙山茨岩塘、永顺、桃子溪、大庸、中湖与周燮卿（新编第四师第三旅）旅作战，击溃之。二十六日进至澧县。二十九日回占石门、慈利。

红二军团游击印江、恩施。

十二月下旬，红二军团分三路进川，进抵黔江，直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湖南桑植、永顺、大庸、龙山、湖北鹤峰、宣恩、恩施、四川西阳、黔川、秀山、彭水；贵州沿河、印江、^沅川与敌人作战。因没有电台与中央取联系，又没有巩固根据地，部队不便休整补充，处境是很艰难的。

一九三四年阴历十月二十二日（有的说是十月三十日）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于黔东南腰界。

先是一九三三年十月，蒋匪集中百万大军，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为了突破包围，争取新的胜利，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由中央令任弼时同志及肖克、王震同志率领红六军团（红八军十六军组成）退出湘赣根据地，开始突围，作为主力红军，进行侦察，作探路先遣部队。十月遂在沿河会师。

任弼时同志到后，开了党的大会，纠正夏曦同志“左”倾路线与“肃反”错误，红二军团同志才敢于大胆发言。不久撤消夏曦同志工作。

夏曦同志对湖南有革命功绩的，特别是北伐战争前夕。后来他溺死黔江，亦算是为革命牺牲。我不敢意存菲薄有所诽谤。但他执行王明、博古路线，招致革命损失，尤其是肃反错误，陷入宗派主义，洪湖情况我不甚详，我对湘鄂边区同志被诬受害的这一悲剧，实很痛心，不能不在此为之昭雪。

任弼时同志来后，一切与前大不同了，不仅纠正了“左”倾路线，“肃反错误”，而且善于调查研究，正确解决问题，领导二、六两军团，打击敌人如摧枯拉朽，牵制敌人三十万，配合中央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的辉煌革命事迹，不能不令我致以崇高的敬意！

沿河会师后，二、六两军团兵力集中，士气增高，出击贵州敌人消灭杨其昌、皮德培两个师，打了一个带关键性的胜仗。

十一月三日，红二、六军团占领永顺城，陈渠珍派龚仁杰（伪新三四师旅长）为“剿匪”指挥，周燮卿为付指挥来攻。红军佯为撤退，伏兵于龙家寨，杉木河，敌扬长而入，会日暮，红军出兵包围猛攻，又出奇兵截其归路，歼敌三千人，缴获枪二千支。仁杰等匪狼狈败逃，仅以身免。

二十日，占大庸。

十二月十七日，红二、六两军团至永顺上村进击沉陵洞庭溪。

十七日占领桃源，击溃敌新三十四旅罗启疆部。

二十六日，占领慈利。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为中央领导。

红二军团、红六军团，此时掩护中央红军长征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司令员，任弼时同志兼政治委员，全军共二万人。

任弼时同志任湘鄂川黔党中央分局书记。

创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农民分了土地。建立农会、工会、妇女会、成立省、县苏维埃政府。

蒋匪帮大为震恐，调动三十个师，南北“围剿”。以湖北徐源泉为湘鄂西剿匪总司令，湖南何键部，四川潘文华部全体出动，徐源泉驻澧县、津市、李觉、王东源（伪十五师）进攻大庸，章亮基（伪十六师）进驻永顺王村，陶广（伪六二师）驻塔卧，陈耀汉（伪五十八师）进驻桑植陈家河，张连山旅

进驻官坝，刘文华团驻龙山里那，谢彬（伪八十五师）驻宣恩、蒋作均（伪新三旅）及其他匪部进驻鄂西。四川部队，进驻山东。湘鄂西各保安团均加入战斗，统计不下三十万人。四月十三日，陈耀汉部一旅向桑植西北进犯，在陈家河被我包围。歼其大部，旅长被击毙。农民歌云：“白军到了陈家河，一个都走不脱。”红二方面军在大庸，与敌十九师，十五师激战于鸡公坡。李觉急电张亮基求援，红军急向石堤西前进，消灭章亮基先遣支队一团，进逼王村。五月六日，红二方面军在塔卧攻钟光任部，一八四旅三六八团，补充第五团，歼灭全部。六月十八日，红二方面军围攻龙山四十一日，刘文华团急请陶广周燮卿往援，红军夹击于招头寨，毙敌甚多。八月三日，红二方面军在宣恩板栗园击溃敌八十五师，毙师长谢彬。在咸丰钟堡，歼灭张振汉（张系纵队司令员）师，振汉被俘。十六日，红二方面军东下，向外

线转移，进占石门，澧县、临澧、津市，在石门扩军，得到很大的兵员补充。十月，红二方面军集中桑植大庸休整。十一月十九日，中央指示，由桑植、大庸一线出发。开始长征。二十一日，红二方面军，在慈、庸潭口，摧毁敌十九师三十六旅澧水沿岸工事。强渡澧水，歼敌一部。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全部渡澧水，向沅水挺进。二十三日夜，红二方面军由大堰溪、洞庭溪渡沅水。二十五日，主力军渡毕，向沅常路前进，占领官庄、茶菴铺、界亭驿一线。二十七日，红二方面军占领辰溪。二十八日，红二方面军占领淑浦、新化。十二月下旬，红二方面军由芒江、会同进至黔东，继中央红军长征。

注释 “猎人”应为这段革命斗争的参加者，真实姓名不详。此材料是一九六一年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翻印的。

红二军团发展史略

大革命失败后，在鄂西党的组织有沙市市委、宜昌市委、江陵沙岗区委、监利区委、石首县委、施鹤部委，松滋、公安均有区的组织，湘西之石门，慈利亦有党的组织散在乡村活动——只知黑夜打土豪杀劣绅，但不知如何组织自己的武装，发动游击战争。

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沙市成立鄂西特委，书记是曹庄夫同志，同年九月间在宜昌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决定组织游击队。

先是贺龙同志自南昌起义后到广东战争失利，由党决定脱离部队乘海船去上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从上海出来，同行者有周逸群、徐特立、芦冬生等同志，目的就是回到桑、鹤地区搞武装。

在贺龙同志未离上海前的月余时间，曾先遣贺锦斋、朱炳章、贺桂如、滕树云等二十余人到武汉以西长江南北两岸，即监利之车湾、石首之藕池一带活动，携带了三支枪（是湖北省委给的），这一行人到达目的地后即发动打土豪，在斗争中不久即扩大成二十余人，有二十余支枪。

贺龙同志由上海经武汉到荆河反咀与贺锦斋等会合。会合后即成立五十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时在一九二八年一月间于监利之下车湾。

这时与监利车湾党的支部发生关系，后与石首县委也发生关系，并参加地方党组织之“秋收暴动”。

当时的环境是：

一、两湖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代即有些基础，农民协会到处成立，在“打倒土劣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口号之下，有些以国民党党部名义出现，实际为我控制的组织，如石首的农民斗争是我党的屈阳春、吴仙舟、廖学如、肯成宣等同志领导，在藕池设有国民党党部，桑植农民协会领导把一个县内的恶霸省议会（赵恒惕的）议员朱愚农捉到，由数千农民用石头当场打死（是谁领导不知），这说明当时农民要求革命斗争是尖锐的积极的（这类的例子各县都有，不能详述）。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运动遭受摧残，一时曾不能大肆活动而潜伏乡村，或者因政治通缉逃集异处，仍坚持革命斗争。如段玉林、吴仙舟、朱祖光等同志即依据洞庭湖华容东山一带，夺取华容、石首、监利等县的民团武装（共四十五支枪），彭国材同志在沔阳夺取民团武装和军队单个出外人员或交通人员的武装。

二、军阀混战、土匪四起、四川军阀杨森由鄂败走入川，到处拉×，土劣以迷信组织大刀会，红枪会并公布参加神兵不纳税，死一人抚恤五百串。于是，鄂西一带神兵组织相当普遍，起而与军阀作战，在兴山、保康曾歼灭军阀的整团整旅。

神兵受农协反苛杂的影响，有的与我党组织接近，共产党员开始在迷信团体（神兵大刀会、红枪会）内有秘密活动，如黄大鹏同志在巴东就是工作着，后来发展成红军第二十六师。

贺龙同志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找得贺锦斋后，又与石首农民自卫军吴仙舟会合（有三十余人，二十余支枪），不久又在监利与朱河之农民自卫军肖人谷同志（农民自卫军军长，五十余人，二十余支枪）会合，会合后即改编为三个大队。

第一大队长史庶元（以后叛变），五十余人四十余支枪；

第二大队长滕久荣（人枪同上）；

第三大队长吴仙舟（战斗牺牲），七十余人，五十余支枪（与肖人谷编）。

此时各地农民暴动极剧烈，石首、华容、南县、公安等县则有段玉林、吴仙舟、朱祖光、屈阳春等同志依据华容东山夺取民团武装（四十五支枪），开始游击战争，沔阳、监利、法陵、洪湖地区则有彭国材、崔琪、刘仁敬（沔阳人，特委兼监利县委书记）等同志，秘密发展农协及党的组织及夺取民团地主武装。

这时武装斗争与农民的暴动有密切的配合，曾将石首县城攻开，旋又相继攻克调关、高基庙。石首因退出后被团防占领，因湖南何健部又增正规军两个团，故回攻未克。部队集中于石首之小河口略事休整，二月又配合群众进攻监利县城，亦未克，即决定将枪交石首县委。贺龙同志率十余人枪回桑（植）鹤（峰）地区活动。

这是二方面军二军团诞生的前奏。此后即分为两个地区：洪湖地区（包括石首、华容地区）与桑鹤地区活动，亦即六军与二军（开始为四军）发展的基地。

在回桑鹤途中经石门南乡与石门县委发生关系，后顺利的回到桑植。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尾的时候。

到桑植后收集桑植旧属约二千余人千余支枪（除陈策勋、张东轩两股因他们在南昌暴动后就参加反共反贺集团未归外），有贺民英、贺炳南、谷志龙、李云青、刘子维等部统归建制，内部派别关系及其复杂。加以整理后改编为两个团（第一团贺桂如）及三个司令两个支队。

占桑植县城未及一月，国民党即派黔军四十三军的一个旅（龙仁部）与湘西驻防军陈渠珍部五六个团由向子云率领来桑植进攻，经过两次战斗即退出桑植城到苦竹坪。

此时留贺锦斋、周逸群在苦竹坪指挥部队，贺龙同志带芦冬生等十余人去鹤峰之走马坪与黔军（驻鹤城的）接洽。到走马坪后，因石门县组织被破坏，农民自卫军百余人枪亦被迫到走马坪，返至堰垭闻苦竹坪部队被击散。

当时周逸群同志去鹤峰跟着又转回宜昌石首。贺龙同志因部队失败即停止在堰垭附近，有当地民团谷大姐（后被周小康下令提枪将谷大姐本人枪毙）掩护（同情并接济我军），这是一九二八年六月间的事情。

在堰垭又集合贺佩钦、滕久云、贺炳南等共人枪百余。得息黔军准备开回贵州，于是在桑植之小阜头伏击龙仁部，结果取得部分胜利——缴到一些枪支、银洋、鸦片烟等。战后又会合到被敌击散之第一团团团长贺桂如等，旋即回到洪家关。部队又发展到五六百人，三百余支枪，此时湘西党的特委派陈协平来，又因敌追攻退至罗峪，就根据湖南省委决议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同志为军长，恽代英同志为党代表（只向外公布，恽实未到），第一师师长贺锦斋。

一九二八年九月间，前敌委员会决定东下，配合第二军独立师打澧州。由鹤峰经石门、慈利县境到澧州之王家厂，敌以两个旅来进攻，返退至石门仙阳坪，遭敌袭击部队又被击散。只集合到百余人到泥沙，解决泥沙民团并与当地党建立关系。泥沙战斗贺锦斋牺牲，又退回堰垭，已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了，旋又决定西进扩大游击区域和政治影响，于是进到宣恩之小关、利川之汪家营。此役并与施鹤部委书记杨洪藩发生关系到汪家营时仅人枪百余，进攻建始县城，将建始团队解决并将县长击毙。由建始回到鹤峰之鄂阳

关与当地党的组织发生关系，后决定打鹤峰城，未克，后又开回堰垭整理部队，这时施鹤部委书记杨洪藩率百余人叛变。

堰垭休整月余，部队发展到九百余人（均属鹤、桑两县农民）。鄂阳关之陈宗瑜同志（党派去做神兵工作）此时亦率部到，从此部队神兵组织在某些战斗中亦起了些作用。

一九二九年二月又去攻鹤峰，这次攻克，将县长打死，团队消灭杀死土豪劣绅数十，从此成立农民协会并向鹤峰、桑植发展。

三月，湖南之独立旅王文轩率部来进攻鹤峰，我军于城东九里桥一击而消灭之，并将王文轩击毙。缴获枪数十支。不久即又占领桑植并将团队消灭（是四月了），扩大游击区到石门、永顺、大庸、慈利、五峰等县，连桑植、鹤峰计达七县。

桑植的团队被消灭后，接着便计划消灭大庸、慈利的地主武装，攻克大庸属之山寨（反动地主武装盘据）十余座（这时大庸之覃辅臣率部归，因其宿仇熊家据桑植对抗覃家。我为其调解无效而援秦打熊。秦与贺龙同志有旧交，此时也同情革命而来归，有人数二百余枪百余支）；继即追攻慈利之江垭、九溪一带。

因我军声势日大，敌人组成三路来配合向我军围攻一路师长吴尚、四个旅；二路陈渠珍部向子荣一个旅；三路川军杨明、戴天明两个旅（后未到）。

我军由慈利回桑植，在西城之赤溪河将来攻之第二路向子云部全部消灭，向旅长亦被击毙，溺死者甚多，只十余人逃脱。第一路吴尚因第二路遭惨败第三路又未到，孤军不敢深入，其先遣部队到达瑞塔铺未停即闻风向慈利方面退去，以后又重新组织进攻，才进桑植。

我军这时在桑植已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汪毅夫为主席，有六个区的农民协会，县农协主席是陈昌厚。农民已发动起来参加打土豪，特别是秋收斗争给了贫苦农民以具体实际的利益（在此以前均属军事行动为主要，没能政权组织，领导农民斗争），并办了一个军政训练班（后改学生队），收集了百余青年（由军队抽送和农协选送）进行训练。

我们的力量这时发展到了九百九十七人，约有一千七百余支枪。分三路一个旅、一个独立团。计：

第一路，指挥王炳南（一、四团）约二千人；

第二路，指挥覃辅臣（两个营四个连）；

第三路，指挥陈海生（留鹤峰）；

桑植独立团团团长文南蒲（二百余人百把枪支）。

在桑植城占领三个月余，敌人第二次进攻，又组成以吴尚师为主力并指挥迫使湘西土著各股军队协同围攻。于九月间经两次较大战斗，不利退出桑植。双溪桥战斗曾给敌以大的杀伤（吴尚部死伤近千），但未能阻止敌之进攻，撤至五道水，敌跟到仓官豁，我军回转伏击敌人未果，又撤至樟几坪休整，敌跟进至樟几坪，我军迎战，激战终日，敌我伤亡均重。我牺牲团长陈宗瑜、贺桂如二人，适鹤峰县城亦被敌占，我即退至鹤峰之麻水。

一九二九年十月再一次向东游击，于是经鄂西之五峰、长阳、巴东、宜都、松滋、枝江及湘西之澧州、石门等县境游击，仍回鹤峰占领县城并恢复五峰，桑植某些地区的工作。

这次行动不但我军政治影响日益扩大，而且部队实力亦日有增加——每天均有人枪物资涌进到部队里来。因此，部队发展到五千余人回鹤峰时已到

一九三二年二月了。

鄂西特委派组织部长万涛（化名为王德）同志来，即决定与洪湖之六军会师。于是留一部武装掩护并发展原来桑、鹤、五地区的工作，主力又复在湘鄂边境地区游击，首先在五峰之湾潭歼灭盘据该地恶霸孙敬峰的武装，孙本人当场击毙。这给当时造成开展鹤、五地区的工作以有利的形势，扫除横在向五峰地区发展的障碍。继又在石门之土地垭、仙阳坪一战，给了石门反动武装罗效之以有力的打击（罗是从东面进攻鹤峰苏区的武装力量之一，罗是叛徒，镇压摧残石门革命运动最厉）。旋又在澧州之大堰垱、陈官垱附近消灭进攻我军的部队一个营。这次在五峰、长阳、松滋、公安、石门、澧州等县境游击，除进行几次较大的胜利战斗外，部队人枪有大量的激增，旋在公安县城与洪湖之六军会师。这以前均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会师后到洪湖苏区编为二军团之二军。原洪湖苏区之红军编为第六军。贺龙同志为二军团总指挥兼二军军长，周逸群同志为二军团政治委员，这是一九三二年六、七月间的事情。

以上是二军发展前一阶段的概况，在这一阶段——是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中值得检讨的经验教训，我个人初步提出意见如下：

一、当时的环境：

1. 处于南昌暴动后不久，国民党宣传“赤祸有如洪水猛兽”。人民不识共产党所为，有概[谈]虎色变之概，特别是贺龙同志参加南昌起义后还未回来组织红军之前，家庭亲族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及本县土劣恶棍如陈策勋、张东轩之流给以极残酷杀害摧残（如向楚生之母系贺龙同志的胞姊，被张东轩等捕获凌迟处死（剥皮），其亲族不能归家流落他乡者不少，房屋被拆毁，田地被充公，勒令逼卖者达数次）。迫至组织红军之际，更变本加厉，这样影响人民视共产党和红军为畏途而不敢走。甚至不敢接近。不只是贺龙同志的家属，而且连凡参加红军与红军有关甚至与红军不接近无什么关系者，亦被波及。动辄加以“赤匪”，“共匪穴巢无良民”“窝藏共匪”之罪名，肆行抢劫捕杀之能事（这是国民党进剿军军纪的败坏，也促成人民与之对立）人民需要革命。

当时国民党派来的多系杂牌军队，剿并不十分积极，只图借剿共来发洋财，如士兵进村先放几枪，使人民逃入山内，即进行搜箱倒柜复去山沟把人赶走，又将一部居民能携走的贵重物品抢走，士兵把妇女的衣服穿藏在军装里面，然后在另一地（十里二十里不等）把这类东西贱价出售。

2. 在桑鹤基本地区没有党的组织，军队到后发展些党员大部随军走了，不走的也很少做党的工作，形成军队驻在时有党，军队走后就完了。某些游击区曾有党的组织，也曾发生过关系，而工作上的配合是没有的。军队中的党在很长一个时期力量很薄弱，有些军事首长还不是共产党员。

3. 在湘鄂两省边境又是多山的地区，交通不便，驻军不多，指挥极不统一，有些城镇全靠团队防守。

二、贺龙同志在这地区有很多社会关系，有号召力，是其发展快的基本原因之一。如贺龙同志从上海一回到家，很多过去互相火并的小股部队，均把旧仇消散，率领全队人枪来归统一在其指挥下效命疆场。也有本人及其部队未直接参加作战而愿保持一定关系，帮助送情报，代运子弹，医治伤病人员的。这是党统一战线所得到的成绩（可惜当时党没有很好掌握这一政策，反诬人为不彻底革命，是一种妥协政策，于是不敢大胆运用，后经过早的采

用军事压力以武装去消灭人家没有发动群众，如对谷大姐的政策和处置)。这样更影响了一些杂牌部队和某些地方小实力派中间派，本欲同我们有些来往，保持一定关系，只要不把他弄得显红了的人，因而不敢接近我们，并说：“同共产党没有接交的好处”，反迫使这类人更加坚决的参加反动集团来反对我们。

三、在这阶段部队的发展，主要是游击到某一地区即吸收些该地的农民参加斗争。而旧军队的退伍军人或拖滩的不得志的一些小股部队也占有极重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大部分人是好的。有的是干部忠心为革命事业流最后一滴血。但当时党的对旧军人政策上，不是细心耐烦的争取逐渐进步，而是采取不信任监视的态度。如对覃辅臣、沈鲲、贺炳南……等。

由于部队生长活动地区在当时种大烟、贩大烟均不为禁，所以有大烟瘾的战士、杂务人员不少，甚至个别军官也有（后来到洪湖苏区才坚决戒掉。）又由于社会条件产生迷信的组织，部队内有神兵的组织，借封建与神兵的关系发展自己，待到部队逐渐加以教育改造，这是成功的。在桑植赤溪河歼灭向子云全旅及在五峰湾潭歼灭孙敬峰团队等战斗，而神兵以英勇姿态出现，是起了作用的。

四、在敌我力量对比处于我劣敌优的条件下，军事行动在省和县的边境地区与山地活动是有利的。游击战是最好的方式，创造根据地是可能的。我们在湘鄂边境这一阶段的行动是符合这些原则的，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顺利的发展，没有遭受很大的损失——虽然也有两次挫折，终于不久就恢复并发展成相当可观可靠的一支人民自己的武装力量。

1. 退出洪湖苏区的检讨。
2. 经鄂豫陕川到鄂湘边的长征。
3. 重建湘鄂川黔边与继续肃反。
4. 由扩大游击区（湘鄂川黔边）到创建黔东根据地。
5. 与湘赣红军会合编成二方面军。

退出洪湖苏区的检讨（洪湖苏区的末期）

一、三一年大水灾秋收没有，基本群众逃荒于外，基本苏区无粮养不活军队机关，且兵员补充难，部队到游击区运粮送后方机关和医院。

二、大肃反——由四次党代表大会党内反复斗争到肃反大屠杀，党政军干部，一层一层的剥，一层一层的提，随剥随提，随提随剥。

三、只注意向大城市——武汉发展，为的与鄂豫皖和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没有注意基本苏区的内部的建设工作和苏区外围（荆当远襄枣宜等区）工作的加强，尤其内和外均无准备无计划，在被迫脱离苏区的工作，因而失败得惨和无留根。

四、军事上，在反贺取消军部实际执行之际，虽有几次较大胜利消灭了徐廷瑶的十二旅，徐源泉四十八师之韩昌俊旅，及川军范绍增师新三旅新三十七旅的大部或全部。也不能挽救上述政治上所造成的恶果，终于被迫放弃洪湖苏区。

五、几个卫星（湘鄂边、鄂西边、鄂北）的失败，均相继脱离根据地而找主力会合，这样不能收互相呼应互相牵制之效。

六、反富农斗争侵犯了中农利益，在发动与组织灾民到白区抢粮斗争，实际变成不分穷富，合均所必斗，弄得鸡犬不留，特别在赤白交界地区如荆门京山天门某些地区，几十里地无人烟，田野一片荒芜，实不忍见。

在兵源枯竭条件（水灾影响）下，俘虏不争取实行全部给资放回（如新三旅缴枪放回，放回又缴枪有连续数次者），甚至连小股拖枪哗变过来的亦不置信（肃反影响），硬要经过斗争的分得土地的才有资格参加武装部队，这样就在前方连续作战大批伤亡需要大批补充下，动员地方武装参军，而地方武装削弱了，苏区亦随之缩小，于是兵源更加枯竭。

红三军经鄂豫陕川返回湘鄂边的长征

一九三二年秋，部队先后离开原有苏区到荆当远、钟京一带游击区游击。当时已同中央失联络，夏曦同志未得中央指示，不敢擅离苏区，又无法将游击区变成根据地，后见红四方面军已离开鄂豫皖苏区西进，于是想赶到四方面军借电台与中央联络，但四方面军之后又尾随优势之敌不能冲破与之会合。在随枣地区之田二河一战不利，被迫越洞柏山而进入河南南部。当时部队实力虽受肃反和脱离苏区的影响，各地红军会合起来还有×万×千人，进入河南地区后，因村庄尽是土围内有相当武力保卫，且敌马鸿逵部随后追，河南地方地主武装（各村土围之内的武装）亦联合截击尾追，因之部队给养困难，日夜不停地走，拖得疲惫已极，掉队落伍的多，尤其苗店赊其镇之战，部队损失较大。此后连续行军并进行些小的战斗，且继续不断地进行肃反，经陕川鄂边渡过汉水和长江直到鹤峰始得休整，这次长征是无准备的逃跑。时间达四个月之久，部队除作战伤亡，掉队落伍，肃反杀掉和因而恐怖逃亡的无确实统计外，返回湘鄂边苏区的只×千人，部队实力削弱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重达湘鄂边苏区与继续肃反

一九三三年一月部队到达湘鄂边即占领鹤峰、桑植两县城，进行重新恢复建立苏区和继续肃反的工作。

先是红军主力于一九三一年春北进到房县去时，曾留有教导一师在湘鄂边之桑植、鹤峰、五峰、石门、长阳、巴东等地区活动，巩固与发展这一苏区。初期还得到相当发展，后因政策上犯了错误，如干部政策反贺和宗派不信任本地干部而迫使贺佩钦、贺炳南、王湘泉离开党的领导，与特委对立，对于覃辅臣无栖身之地，连饭都得不到一饱，使之离开我军而投奔陈渠珍（按覃辅臣系大庸县地主士绅之一，且握武装数百，一九二九年全部率领归顺我军，至此不理睬他了，投奔陈渠珍实非所愿）。谷大姐的枪被提本人被杀（谷大姐有人枪数十，是一个地方团队，在我军开始生长壮大时即掩护帮助我军，后归我军指挥，并无反动证据，只因他成分不纯认为不可靠），对谷忻乔的统一战线（当时不是叫统战，只是利用）的工作，不但不加强反而实行武装消灭（按谷忻乔是慈利、桑植交界区的一个团防，系日本留学生办团防有年，当时深得当地人民信仰。在我军初生长壮大时，一直均保持与我暗中通好（避通共之疑），为我军送情报，运子弹医药，保护我军家属，医治我军寄托之伤病人员，对我军帮助极大，至此时亦被消灭。

这些政治影响，极大多数中间势力派不敢接近我军，认为我军不可与交，以至变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当时自己党内以为打天下，谁敢与敌，党内只说革命彻底不彻底，谁要说这些中间势力可争取之类的话，就认为谁革命不彻底，妥协政策等的大帽子谁也戴不起，戴了就要把你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湘鄂西红军的难苦战斗 (一九六 年六月)

许和钧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的血腥屠杀，扩展到湘西重镇的常德时，已是五月二十四日，故常德当时称为“敬日事变”，因为当时在常德革命同志牺牲太大，我当另写专文述其经过，湘江其余各县，反动派也跟着长沙和常德之后发动残酷的屠杀。就我们当时所听到的：安乡县总工会委员长陶李玉同志率领工人纠察队与反动川军杨森匪部作战，被匪击毙于江中，同时殉难同志也不少，临澧县长李道宗同志于马变后伪装国民党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借口“清共”而杀了四个极反动的国民党分子陈炳勋等，正整理武装以图大举，只以众寡不敌，李同志亦旋被反动部队杀害。桃源除重要负责同志周维城、李灿、李庆兰等数十位均被惨杀外，尤以敬仲良同志被钉在门板上，活活剥皮抽筋而死为最惨。澧县除总工会委员长杨鉴堂首先被杀外，随后又杀害了张权、张运载、李光升、蔡鹏举等同志数十人，旋又将中共常德地委组织部长张盛荣同志（当时调兼澧县县委书记）及常德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张峻同志（调主澧县农运）等先后杀害，杨岸、周荣森等同志已至鄂西，亦被追杀。新洲杀了鲁启黎同志，渡口市杀了刘鼎新同志，此外各县因交通阻隔，无法联系，以致未能知道被杀姓名的更不计其数。凡是匪军兽蹄所到之处，房舍财物辄被焚毁抢劫，家人亦被毆杀奸淫，或全家诛戮。甚至有些同志的亲族朋友，也被无辜株连至倾家荡产，流离转徙，无家可归。反动匪帮逞着这样滔天的罪行还觉不够，更要把我们的革命力量根本消灭，革命同志一网打尽，才得心满意足。于是军统、中统的特务匪徒布满和深入任何城乡的每个角落，继续迫害我们爱国的同志和参加过工会、农会的穷苦善良的人民，但同志们并没有被反动派吓倒却揩干了自己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仍旧和反动派不断的拼命到底。有的采取种种不同方式隐蔽本地，从事地下工作，有的去到武汉、上海等地参加城市暴动；有的刑满出狱找着组织继续再干；有的更挺而走险直接了当的发动群众夺取反动派的武装来武装自己，建立并发展或大或小的游击武装，艰险备尝，聚散无定，忍饥耐寒，流血牺牲，始逐渐联系和形成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根据地，演出了下列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周：

一、武装斗争的发轫

关于湘西各县革命同志在“马变”后的游击工作，记得虽曾由中共常德地委首先发动，但仍屡起屡扑的遭到了失败。特别是一九二八年冬，毛主席秋收起义的号召辗转传到常德时，已近冬季，当时常德地委书记刘泽远同志即曾召集所属各县委书记开过“发展革命武装，扩大革命根据地”的会议，决定要把“秋收起义”的运动造成更广泛的高潮。为了避免反动特务的侦察，这个会议是驾着一条船在常德大西门外丹州附近的大河里秘密举行的。会后，刘津远同志便在常德的同市、窑顶等处发动农民武装起义，不料又遭失败，刘同志竟以身殉（职），因而各县和地委多失联系，加以武装力量不够得很，致一般只是扩大政治影响，没有取得多大军事胜利。重心就此逐渐转移到了石门，当时石门地下党组织是由伍伯显同志出席地委会议的，伍同志回石门后，地委旋又派张仲平同志赴石门协助工作，不久担任石门县委书记。还有常德的周小康、陈昌厚等同志，桃源的陈协平、葛天民等同志。临澧的

黄鳌同志，慈利的袁任远、蹇先×、温练之等同志，先后均因或由上级所派，或在本县不能立足，而到石门去了。一九二八年一月即一九二七年农历年底，在石门有计划的实行除夕暴动（当时也有人叫作年关暴动），狠狠地打击了当地的反动派，反动派便勾结道经石门撤退的贵州反动部队伪国民革命军四十三军李×（或误为李鑫）部的第四十三师雷世光部于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屠杀了我们革命同志伍经恕、伍崇嗣、苏清搞、邢业炳、廖宏宝、廖仲元、龙声灵、邱本全、熊彦明、文玉珊、李逸如、宋仁杰、云清渠等十七位烈士，内有十四人是石门县立中学的教员。这一役，反动派不但没有把我们的革命力量摧毁，相反地，反动派的摧残兽性和我们诸先烈为革命不惜英勇壮烈的牺牲更加激起了未死同志们和广大被压迫蹂躏的劳苦群众无比的愤慨和革命斗争的热情，使我们武装革命的斗争，愈益开展。

二、石门的南乡暴动

接着，石门的反动派更是到处捉人罚款，妄称“清乡”又叫做征收“暴徒捐”。我们的同志们便坚决地和反动派作生死的斗争，到处组织宣传和反抗，农历三月十六日（约当公历五月上旬）有伪警备队兵八人到寺亚铺捉人罚款。我们的同志们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组织了八个敢死的同志于当夜将该八个警兵砍死。第二天夜里又组织了二十多人带着刀矛，摸入夏

家巷团防局，杀死了团总、税捐委员、团兵警兵等约十余人缴获了步枪四支，这便是当时以袁任远同志为首的石门南乡暴动。又继续在花数区缴获步枪八支，福田、蒙泉等地同志也缴获了步枪六支，并尾追黔军敌后收缴了落伍士兵步枪二十余支，收买桃源民间散枪十余支，而且收编了有枪五十余支的盘石区伪团防局侯宗汉的队伍，于是声势就愈来愈大了，竟扩大到石门北乡，并进而开展到慈利、临澧、桃源等县边区，从此便成了一支百多个党员和近百支枪的游击队，名为“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北乡也由伍伯显同志等同时建立了数量几乎相等的武装力量，时常和反动部队作战。其闻曾打败反动的陈家佑部一营、解决其他反动小队队伍更多，于是夺取政权，扩展区域，为时不及一年，便使自石门十九峰以南直至常德同市全受控制。各伪县政府等不敢越雷池一步。反动匪帮大为震动，即调派反动正规军队五千人，并派石、慈、桃、临、常等县地主的反动团队共约万人，大举围攻，加上前所收编的投机分子侯宗汉叛变，将掌握武装的冯钧（当时同志们均呼他为老冯，按实名冯钧）同志杀害，与反动军队勾结投降。这样，石门的武装革命斗争，便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还有最毒辣的：反动团防匪首舒集伍先后杀了革命同志和群众三百余人，烧毁房屋三百余栋。总计石门历被各匪部所杀害的革命同志和群众，据湖南政协会刊所载石门甲悦庵先生的统计实有千人之众。如最勇敢的党员曾庆轩（即琴轩）、易恒兴、陈光昭、张良臣、张洁斋、杨名达、杨绪铭诸同志，都陆续慷慨就义。接着，反动匪帮更长期的搜杀，竟使参加革命的同志和同情革命的人士除愤起还击外，就将无法幸免。

三、红二军的建立与桑鹤间的苦斗

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海中共中央派贺龙将军为红二军军长、周逸群同志为政委，率领师、团、营级干部和警卫员芦冬生同志等共二十二人，化装客商，经汉口向鄂西进发，至沔阳县属的樊咀，即改走陆路，与沿途敌人接战，三月底始抵湘西目的地——桑植“内半县”，建立红二军根据地，并组织中共湘鄂西特委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指挥部。从此湘西的革命武装斗争和党务的发展，才有统一的领导。特委初建，即曾分派同志向石门、慈利、

桃源、临澧、常德等县从事联系同志，了解情况的工作，记得贺将军亦一度化名谢国（故当时有人称他谢老板）向石门桑植等县联系，并立即以贺将军旧日的威信，号召一般旧部属成立一支数百人的杂色队伍，特别是与贺将军有骨肉关系的贺锦斋、王炳南同志等始终支持贺将军这一正义的事业。起初共计约有杂枪百支，群众三百人，在内半县游击了数月，始由桑植堰堰经湖北鹤峰走马坪向石门北乡磨岗隘出动，并游击到澧县王家厂等处，回师到石门溁阳，与石门反动团防罗效之及伪驻军一营接触战斗约三小时，参谋长黄鳌同志阵亡，战斗员亦伤亡二十余人。退至石门北乡泥市附近的熊矛镇，准备以地形优势予敌人以反击，不料最英勇的第一路指挥贺锦斋同志在该地牺牲了。就又退到桑植内半县，从事消灭反动团防力量，来加强自己的武装实力，同时发动群众，实行耕者有其田。不到四个月，发展武器三百余支，群众七八百人，续向鹤峰发展。一九二九年四月，将鹤峰团防主力消灭，夺取鹤峰县城，杀死新旧交替的两个伪县长。就在鹤峰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大约半年，更进一步将鹤峰全县反动武装根本消灭。分配土地，成立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同时决定将桑植反动武装消灭，以期巩固和发展湘鄂西边区的游击根据地。当时少数部队警卫鹤峰苏区，全部兵力均向桑植出发，驻防桑植县城反动军队向团全部被我消灭。六月成立桑植县苏维埃政府由陈昌厚同志担任主席以后反动军队闫重儒旅又大举向我围攻周旋月余，我们的政府和部队才均撤退至内半县，闫旅又迫至内半县的獐耳坪，和我们红军战斗了一日夜，我方兵力虽没有多大损失，但不幸将强而有力的红一团团长贺桂如和红四团团团长陈宗瑜（即贺将军认为湘西的所谓神兵，也是被压迫的农民，因而收编了这支头包红巾的神兵团为第四团）两同志阵亡，警卫营长贺沛卿同志受伤，伤亡共达四、五十人，以致桑植苏区沦陷，仍旧退回鹤峰。

四、扩展苏区壮大武装

在鹤峰稍事整理后，即决定向五鹤发展，经过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结果，将五峰九十年的老团防从没被反动政府及其匪军侵犯过的孙竟峰股完全消灭，伪县府即迁避到渔洋关。我们同志们就成立五峰县苏维埃政府，并发动群众成立赤卫队。同时以鹤峰为根据地，南向石门北乡发展，同样组织群众，成立赤卫队，将石门县苏维埃政府设在泥市贺家台，并继续成立了不少的区苏维埃政府，在进攻常渣时实以此为根据地。土地虽未分定，但已插分田标牌，全县几无一乡村没贴红军标语。几在石门南乡暴动后未死的同志们，除袁任远同志等数人已去上海奉派赴广西参加红七军工作外，其余先后都仍参加红二军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例如，覃甦曾任红军师长，吴协仲、向鲁卿等两同志曾任红军团长。覃正革、盛联雄、杨万柳、陈奇谟、唐占益同五同志曾分任红军营长或游击队长，易发生同志曾任五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葛天民、伍伯显两同志先后曾任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均为当时较重要的干部。随又北向恩施边区发展，东北向长阳、资圪发展，桑植内半县的人民政权也还是继续保持和发展着。在这样苏区巩固情况之下，红二军并常派部分向石门、慈利、大庸、临澧、松滋、公安、石首等县边区游击，指战员生活都困苦万状！时常行军至全无人烟的地方，不但露宿，而且连生菜、生果、生包谷都不易得到，如果幸而得到一些，不待煮熟，便大家平分生食，或竟吃嫩竹和树叶，聊以果腹，衣服更不够得很，但大家革命情绪仍很高涨，忍饥耐寒，餐风宿露，奋斗仍不稍懈。特别是和劳苦群众联系得很好。群众到处欢迎红军，在出击作战中，得到群众不少的帮助和便利。因此，这时红二

军的武器已发展和壮大到二千枪支以上了。

五、红二军团的扩并及其发展

一九三一年夏季为了以湖北沔阳属的洪湖为中心的红六军发展很快，建立了沔阳、监利、潜江、汉川等县苏区。也属中共湘鄂西特委会的领导。因接中央指示二、六两军要到洪湖集结，故红二军就将以鹤峰为中心的苏区和后方工作配备妥当后，即经渔洋关由松滋所属的西斋磨州到公安所属的斗湖堤上面马家赛渡江，得与红六军在洪湖会师。这个红六军原系由段德昌、彭国材等同志领导的监沔游击队和由段玉林、彭子玉等同志领导的江右游击队，于一九二九年九月经中共中央派孙一中同志去洪湖在监利的汪家桥开会宣布全并改编为红六军的。此次红二、红六两军会师后，又进一步合编为红二军团，以贺龙将军为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孙德清同志任红六军军长，军团政委周逸群同志调上海中央受训，改派邓中夏同志接充。至于湘鄂西的苏维埃政府则建立在沔阳县境内的丰口，于是北至潜江，南至郝穴，数百里区域都是“苏区”。红军曾用运动战术向周围反动军队作歼灭战，前后在监利消灭敌军李云龙兵力两团（红二军营长廖卓然不幸于此役阵亡）。在仙桃镇消灭敌军郭汝栋部兵力一团，在石牌消灭反动团防队约千名，其他零星反动武装被红军解决的也不少，因而红二、红六两军这时就共有枪一万三千多支了，当时沙市驻有反动兵力一师，红军决定要将该师消灭，却以工事坚固，未能攻下，反使红二军牺牲勇敢的团长张一鸣同志及连排长等多名，深堪痛惜。

六、出击各地重返洪湖

一九三一年秋季又根据上级指示，红二、红六两军除以王一鸣师留守洪湖外，余均渡江而南。由华容、南县、公安向津市、澧县进击占领津、澧约一周，为避免大股敌军的围攻，退至大堰垭王家厂等处，并闻邓中夏政委一度曾有在王家厂建立湘鄂西苏区的中心根据地之意。旋经石门夹山战役与临澧余市桥战役，复向津澧采取攻势。以后改变计划至澧、松边区杨林寺集结，另派红二军进据公安，与敌军李觉师和周燮卿、顾家齐、李国均等旅在杨林寺一带作阵地战，其他红军已被隔断，不能策应，众寡不敌，撤退至松滋、刘家厂等处。再向石门北乡子良坪、太平街、泥市前进。以备回到鹤峰根据地整训，刚到泥市，忽接情报有川军甘占元等部人枪三四千窜扰鹤峰，红军就兼程进至走马坪、五里坪等处，将甘部等敌彻底消灭，得使红军有所补充。又派兵力两团由五峰、长阳、松滋向公安等县游击，借以打通到洪湖的交通要道。经过这样二、三个月的整理，部队已渐补充完备，同时五峰、鹤峰及石门北乡、桑植内半县的苏区，也相当的巩固，上级特派王炳南同志率领独立团担负指挥维持苏区和留守后方的任务。第二军团即由恩施等地渡江，直至河南边区，再返洪湖。

七、洪湖肃反和转移地区

一九三一年，因留守鹤峰石门一带的红二军独立团（团长王炳南同志，政委周小康同志）又被大股敌军围攻，与红二军军部久失联系，同志们不觉作了错误的决定，由王周等同志率领全团指战员过江，拟与红二军会合，不意兵抵江陵，即闻红二军已赴襄樊，始悔不应放弃鹤峰、石门等县老根据地，深感进退两难，当时又适中共中央改派夏曦同志前来接任政委，曾经进行肃反运动，闻说颇有误杀事情。例如苦斗多年的段德昌、段玉林、王炳南、董朗、周小康、陈协平、陈昌厚、陈奇谟、葛天明、刘勋树等领导工作同志均

先后毙命。其余团、营、连级干部和县、区各级干部，亦死不少。贺龙将军在他所发表的“回忆八一南昌起义”文内对这一事件也曾说过：“错误的进行肃反而伤害与削弱了自己，这样给予革命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从失败的教训中逐步体验了毛主席的思想，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又才得到发展”等语。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在部分同志中，似难免不感到惶惑疑虑，而我们力量强大的敌人，又更幸灾乐祸乘机肆其离间与围攻，遂使这一个为我多少同志抛头颅流血所换来的以洪湖为中心的苏区主力，就被迫不得不转移到湘鄂川黔的边区去了。

关于湘鄂西边区的阶的红军苦斗情况，就暂忆写到以上各点为止。以后直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贺龙、关向应等同志所率领的红二军团与任弼时、肖克、王震、袁任远等同志所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于贵州沿河县，始全并建立红二方面军，闻曾批判过前红二军团夏曦政府领导的错误。于是，红军继由西阳入龙山、永顺，下桑植、大庸，于一九三五年复进到慈利、石门、桃源、澧县、常德等地，又重新以龙山、永顺、桑植、鹤峰、大庸为基础，建立湘鄂川黔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及革命委员会（主席贺龙将军）发动群众，清剿土匪，进行土改并与蒋匪帮三十个师的大军相持将近一年的残酷斗争。至一九三六年，掩护毛主席、朱总司令所率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红二方面军完成牵制任务后，才继续北上长征。于是湘鄂西边区的大规模武装革命战斗，也才暂时转入地下，迄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胜利进军。使湘鄂西边区人民回到中共温暖的怀抱，摆脱一切被压迫剥削的枷锁，得到光荣幸福的解放，永远生活在自由的天地了。回想当日虽然为了党和红军还年青，革命经验还缺乏，个别同志的领导艺术还不可能很正确，以致斗争屡受顿挫，使同志和群众受到不少苦难。但胜败乃兵家之常，失败为成功之母，今天的成功，自是昨天艰苦创造的经验与条件所得的成果。因此，我党在伟大的湘鄂西苏区漫长艰巨的对敌斗争里，是由无数革命先烈、同志和群众们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和作了惊天动地的光荣贡献的。那末，我写的这篇回忆录，岂不是先烈、同志、群众们用血洒成的一段斗争史吗？

（红二方面战史编辑委员会湖南地区资料汇集组 1960年6月翻印）

访问钱瑛同志的记录（节录）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七日）

我只了解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十月，这一段湘鄂西根据地的情况。在抗日时期，湖北地区全省情况，我只了解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年的情况；一九三九年以后，我只了解鄂西地区那一部分情况，一九四一年以后我就到重庆去了。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是一九三一年二、三月到湘鄂西的。当时，邓中夏、贺老总在鄂西北房县即武当山一带。我到洪湖时，苏区很小，仅有监利、沔阳、石首、江陵等五个县委存在，但几个县都仅有几个乡的苏区。不久，万涛同志从沙洋把贺老总红三军主力接回来以后，就连续打了许多胜仗，红军与苏区大大发展了，红三军有三个师，洪湖苏区也很大，当时的鄂豫边也是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的。这时，我作为巡视员曾到苏区各地了解情况，红军打开潜江后，我到潜江工作去了，以后整个苏区情况我就知道了。

一九三一年三月，我和夏曦同志一起到湘鄂西苏区，当时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是周逸群同志，红军都是土生土长，从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经过几次“围剿”，苏区都坚持下来了，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土地路线方面，当时先没收庙田、祠田。第二步没收土豪劣绅土地，然后又进一步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中农土地不动。苏区的土改，搞了好几次。最后是彻底分配一切土地。这时就发生了问题，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分远田，因为是打乱平分，所以中农的土地也拿出来平分了，侵犯了中农利益。土地分配方法是按劳动力分配，没有劳动力就不分或少分。这是夏曦“左”倾路线的表现，但苏区群众还是很满意，总之，土改在后期是“左”了，在经济政策上，没收了资产阶级的财产，这是“左”的，因此，许多资本家都跑了，苏区只剩些小商小贩，又加上敌人经济封锁和大水灾（一九三一年夏），因此，苏区经济很枯竭。

但这时，由于群众基础好，还逐次打胜仗，苏区还是逐渐的发展壮大，第三次“围剿”打破后，苏区大发展，新发展了十几个县的苏区。红军也大发展，除主力红军外，各县都建立了一个团的地方武装，其他群众组织，如少先队、民兵，更为普遍。苏区战胜了“围剿”，战胜了洪水，成绩很大。

“左”倾开始时表现在土地政策、经济政策方面，后来又发展到军事上的冒险。一九三二年春，湘鄂西党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夏曦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这个会议上，党内争论很大，主要是万涛、段德昌、段玉林等人不同意夏的政策，（在军事上、地方上的政策）各县委书记也不同意夏的政策，如当时被称为湘鄂西四大文豪的江陵县委书记侯蔚文、监利县委书记孙之楚[孙子俦]、沔阳县委书记栩栩、石首县委书记许斌[徐彬]，都是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地方干部，很能干。万涛、段德昌、段玉林以及这四大文豪，当时和毛主席不在一起，但现在想起来，他们符合毛泽东思想，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由于他们反对夏军事上冒险路线，会上，夏没有办法，很孤立，于是派魏士均[尉士均]到党中央去请示。当时上海的党中央是“左”的，因而支持夏派关向应同志来了。关服从中央指示支持夏，这样会议情况就变了，“左”倾占了优势，选出了新的省委。万被撤职了，不作红三军政委，政委由夏兼任，万调任省委组织[宣传]部长。但夏并不信任他，实际上只是作个巡视员工作。会议之后段德昌、段玉林都有意见，看到这样下去苏区很危险，

但夏却到处宣传“四大”文件，“四大”文件是很“左”的。后来首先说万、段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反党集团，说他们搞小组织活动。后来在湘鄂西苏区又开始肃反，开始是有反革命，但后来就逼供信，一直发展成大的“肃反”，又加之和鄂豫皖苏区相隔很近，张国焘的错误文件不断传到湘鄂西，夏曦赞赏张国焘，大的“肃反”逮捕了许多负责干部，因此，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很快。因为红军中没有了老干部领导，都是新提拔起来的干部，没有斗争经验。

一九三二年十月以后，我就知道了，夏叫我在潜江一带搞一个小游击队去恢复沔阳、潜江苏区，但根本没有搞成功。这时期情况，可访问李培之同志，她当时是湘鄂西苏区“红旗报”的总编辑；谢老[觉哉]，当时是省苏维埃报纸编辑；宋一平同志，当时搞青年工作<的>；贺老总也了解。

我从洪湖出来后就坐牢了。

夏来到苏区后，周逸群向地汇报工作，他批评周右倾。周后来牺牲了。洪湖人民纪念他，有许多书店命名为“逸群书店”；后来，夏又说他是反革命。夏的错误是很明显的，夏当时叫我搞肃反工作，我和夏很熟，在莫斯科是同学，我对他说：“这些负责干部都是长期考验出来的，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夏说：“他们建立根据地就是为了消灭根据地。建立红军就是为了消灭红军。”当时湘鄂西的负责干部，只有鲁易是敌人打死的，其余都是夏杀的。

湘鄂西红军真是能打仗，并且有群众支持，大人、小孩都参加战斗，地方上的反革命组织，如白极会等，群众的力量都能消灭他们。有一件事，很动人，当时一支少先队在潜江作了许多假人，就把敌人一个营都打败了。洪湖的英勇斗争<事迹>是很多的，原来党组织很有基础，如果没有路线错误，便不会失败。

湘鄂西党的“四大”前后 (一千九百八十一年)

杨光华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四大”)距今已四十九个年头了。出席或者旁听过这次大会的同志至今还健在的,我记得可能还有郑绍文、宋一平同志和湖北监利的李春田同志等人。

“四大”原定于一九三二年元月召开,因为省苏维埃秘书长蔚士钧[尉士均]同志去中央报告工作未回,中央新的指示未见,延迟到二月初[一月下旬]才开幕。代表大会的议题有: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苏维埃建设、军事问题、财政经济政策问题、教育问题等。另外,代表大会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选举产生正式的湘鄂西省委。在此之前,湘鄂西的党只有临时省委,没有正式省委,经过半年多的工作,需要建立正式省委。

“四大”主席团成员有夏曦、贺龙、杨光华、崔琪、杨成林、张孝桂(女)等人(还有的同志记不清楚了)。我做执行主席,宣布大会正式开幕,夏曦作了政治报告,就在报告之后发生了纠缠不休的万(万涛)、夏(夏曦)之间的激烈争论。这一争论的基本内容是万涛同志在大会上提出要清算夏曦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最后遭到中央否决,万涛被斥为反党错误。对于这一争论的历史情况。目前有关单位编写的一些史料,均有所反映和涉及,但都与当时的真实情况有很大出入。我作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有责任实事求是地提供我所知道的事实。

“四大”前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军事形势

湘鄂西党的“四大”会上所发生过的纠缠不休、相持不下的激烈争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争论者双方的一时冲动,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的,也是和当时湘鄂西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密切联系的。不了解这些,就很难了解“四大”前后这一争论的内在联系,并对它作出评价。

“四大”前一年多,湘鄂西根据地遭受过一次严重的挫败,这就是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立三路线)错误地要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配合进攻长沙,结果使红军在半途遭受挫折,根据地也因此失掉红军的支持,损失很大,因此根据地的军民,一提起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无不义愤填膺,无比愤慨,在湘鄂西党的广大干部中,也强烈要求批判这种错误。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掌握在王明手中,王明路线则一直强调批右而不批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左”,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广大干部对路线认识也不清楚,并没有认为攻打长沙是“左”倾错误,而认为是“右”倾逃跑主义(离开根据地)的错误,因而要求清算执行这一路线的邓中夏同志。

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工作的夏曦同志,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先是由立三路线提出的、继之又由王明坚决贯彻的“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总路线,在批判邓中夏同志“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仍然是“左”的向京汉路方向发展,切断京汉路把红军主力拉向鄂豫皖边、与鄂豫皖连成一片,造成对武汉的包围势态的意见。这是要把红军主力拉到敌强我弱的地区去,而不是在敌弱我强的地区寻求发展。

“四大”是在敌人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之后,第四次围剿尚未开始时召开的。“四大”前夕,我们已知敌人集中了四十万大军要进行第四次“围

剿”，主要是进攻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主攻方面在鄂豫皖），夏的这个意见就是在讨论如何对付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时提出来的，因而，这个意见就带有战略上的性质，它不是一般的战役上的具体行动方案，而是一次战略上的进攻，这自然要引起苏区党的领导层的严重关注，并由此而产生意见分歧，当夏曦在前方自任红军政委时，段德昌同志就提出了向鄂豫边区（河南南阳、湖北枣阳北部一带）转移的意见。

以上就是“四大”前夕的基本历史背景和总的政治、军事形势。“四大”会议上的万、夏之争，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一背景展开的，当然，在引起争论和争论逐渐发展起来的具体原因方面，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这就需要将争论的经过摆开，才能知其究竟。

万、夏之争的起因和经过

事情的渊源还是要从打长沙说起，红二军团为了配合打长沙，脱离了根据地，在兵力的配置上，又由于种种原因，把红二军团的六军摆在杨林寺（位于湖北公安和湖南澧州交界处），把二军摆在公安，首尾不能相顾，杨林寺是敌人合围的主攻方向，结果六军被包围，队伍被打败了，损失很大，之后邓中夏同志向中央的报告说：“六军损失武装力量三分之二，失掉了战斗力”，但这个所谓损失的三分之二，大部分都突围跑回了洪湖苏区。被派回根据地的段德昌同志把这些武装和留下来的军校学员集中起来（共数百余人枪），逐个消灭敌人据点，扩大自己的武装，恢复了被敌人占领的苏区根据地，又成立了新六军。红二军团改成为红三军时，新六军改为红三军第九师。又形成了一支三千余武装的红军主力，在反敌人第一、二次“围剿”中，壮大到五千余人枪，成为有名的“江左军”、“江右军”（当地群众对这支队伍的尊称）。第三次“围剿”中，敌人挖断了车湾江堤（属监利县），江水淹没了江北苏区，当年的农业收成严重欠缺，大部队的给养靠根据地的收成不能保证起码的供应，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需要向外发展、寻求给养的军事行动问题。

于是，（在）由夏曦主持，有万涛、段德昌同志参加的军委主席团会议上，夏曦提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九师去江南活动的方案。他估计湖南敌人必将夺江南苏区特别是东山的秋收，建议九师到江南去保卫秋收。这个方案既有政治意义又有军事意义，因为当时江北苏区遭受严重水灾而江南苏区丰收在望。

但是，要实现这个方案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九师过江就得把调关（属石首县）、焦山河两个据点拿下来，并能守住，以作敌人大举进攻时的退路。否则，就不能在情况需要时退回江北，在强大于我的敌人围攻时，难免被迫走红二军团脱离根据地的老路。但过江部队要拿下江南这两个设有坚固工事的据点，伤亡必然很大，是否真能拿下，是没有把握的，因为我们没有攻坚重炮。这是段德昌同志根据军事学的理论提出来的。结果，他们三人都认为这个方案虽然是正确的，但不能必操胜算，难以执行。

段德昌同志提出了第二套方案，就是攻打沙洋，驻敌是老三旅，没有坚固的工事设防，也不可能想到我们会去打他。这既可以消灭敌人，又可以解决粮食物资的困难。军委主席团通过了这个行动方案，决定后，又讨论了要是得知红三军主力的消息，是否应接回洪湖，决定是要接回洪湖。而当时的红三军仍归邓中夏同志领导，把他们接应回洪湖后，自然就涉及到要不要清算邓中夏“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问题，夏曦说：“邓中夏要彻底批判，三

军政委一职派万涛同志代理”。于是就由军委主席团作了九师行动的决议：派万涛同志随同九师，找到红三军主力，撤消邓中夏的政委职务，由万涛同志代理。

九师留二十五团为后防，顺利地占领了潜江县城。二十六团和骑兵营三千多武装为主力，一举拿下了沙洋，消灭了敌新三旅，得到了丰富的给养和物资（特别是医药），支援了后防，还迎接了红三军主力回洪湖，途中建立了荆、当、远游击区，并帮助鄂豫边区的游击队整顿扩大，圆圆满满地完成了军委主席团的命令。

我们没去江南，敌人却进攻了东山，抢走了秋收果实。国民党的报纸对此大肆吹嘘。党中央见报后不知分晓，遂电问夏曦，夏怕承担东山失守的责任，没有向中央反映九师行动的决议和军委主席团的命令，反而向中央汇报说：东山失守，乃因九师远离根据地，远水不能救近火。就这样把东山失守的责任，完全推到九师头上（这样就不是一般性的反映情况不实，而是属于品质问题了）。

九师和红三军主力胜利会师后，在京山永隆河向军委主席团夏曦写了报告。并请夏责成地方组织（当然是省委）动员组成运输队向后防搬运物资。

省委得知红三军主力回洪湖的喜信，我（当时任临时省委代理书记）找来团中央代表宋盘铭同志和省苏维埃主席崔琪同志商量，由军委和省委共同主持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军民联欢大会，让部队的同志诉说红军脱离根据地之苦；让地方的同志讲讲根据地失掉红军主力之苦，从遭受损失的教训中批判立三路线的危害。联欢会后，由九师帮助七、八两师打几个胜仗，恢复其士气。我们三人商量妥当后，满怀喜悦地去请示中央分局的夏曦，令人扫兴的是一去了就碰上夏曦大发雷霆。我们问其原因，夏把万涛的报告向我一板说：“你看，把中央分局、军委主席团、省委都当成他的后勤部，岂有此理！”我们看到了万涛的报告，认为报告中要求夏责成省委组织运输物资这是应该的。怎么是“当成他的后勤部”呢？夏不正面回答。恼羞成怒地说：“他违反军委主席团的命令！”我们向夏说明来意，夏置之不理，继续说道：“不把领导看在眼里，这还了得！”我们对夏曦的举动有些莫名其妙，只好败兴而归。

次日听说夏曦到前方去了。第三日万涛同志从前方回来，持中央分局兼军委主席夏曦的命令和派遣信来到省委，说夏曦派他回来做省委宣传部长工作，代理三军政委被撤职。省委立即召开了常委会议，一方面表示欢迎万涛同志回省委工作，同时听取万涛同志关于九师行动的报告。万涛同志除了向省委汇报了军委主席团的决定及九师出征以后的重大成果之外，还汇报了他们在荆门南部，当阳、远安交界处，找到了地方组织，发给了他们枪枝，派了游击指挥人员，成立了游击队，建立了荆、当、远游击区，又帮助了豫鄂边特委领导的游击队打了几个胜仗，扩大了武装，整顿了军纪和加强了政治工作，完成了迎接三军主力回洪湖的任务等情况，并说：九师和三军会师后，立即同军部会合，召开了团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了中央分局代表中央的命令，撤了邓中夏的军政委职务，由我代理。夏曦硬说我违反了军委主席团的命令，自己跑到前方去撤消了我代理政委的职务，派回省委做宣传部长工作，三军政委一职，由他自己担任。并把邓中夏同志送到省委，要省委组织批判会，批判后送中央处理（省委没有组织批判，以后就将邓中夏同志送到中央了）。

省委常委会议听取了万涛同志上述报告之后，都作了义愤的发言。最后通过了如下决定：（1）万涛同志派回省委任宣传部长，加强了省委的工作，省委表示欢迎；（2）省委坚决不同意万涛同志作为处分而派回省委，因为万涛同志不仅没有违反军委主席团的命令，而且完满地完成了军委主席团的命令；（3）省委坚决不同意夏曦同志放弃中央分局工作自任三军政委，请求夏曦同志立刻回到中央分局，三军政委一职，报请中央派人担任。

省委上述决议报请中央分局后，没有得到夏曦什么好的反映，他并没有放弃三军政委职务回中央分局工作，夏的爱人谭国甫同志却透露了中央由于东山失守的真象不明而问夏曦的电文，以及夏曦对中央复电的电文（谭国甫管电台，翻译电码）。这样，省委常委和万涛同志才知道这个底细，由此就对夏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服。特别是万涛同志更是由此和夏曦产生了矛盾，在省委《关于水灾工作的决议》（主要是修复车湾江堤，东荆河堤以及所有垸堤，恢复生产）报请中央分局后，夏曦却从前方回来了。而我却到沔阳、监利、石首去参加这三个县的党代会，传达省委“水灾决议”去了。我回到省委时，听到夏曦指责万涛说，省委水灾决议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意思是单纯讲了救灾，没有和他所推行的政治路线联系起来），要万涛负责。万涛不承认有政治错误，并认为即使有错误也不应当由他负责，因为他当时不是省委主要负责人，由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辩，在纠缠不休的情况下，夏又回前方去了。这件事没有拿到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解决，也就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问题。

在敌人第四次“围剿”即将到来，酝酿如何进行反“围剿”的问题上（省委尚未讨论这个问题），夏曦派唐赤英（军委参谋长）到省委来传达前方的意见，省委才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唐的传达，唐出人意外他说出了中央分局、军委关于反第四次“围剿”的决定，要把红军主力拉到鄂豫边区去，洪湖只留游击队和敌周旋，还说省委是否搬家的问题，特来征求省委的意见。我们听了这个决定感到惊奇，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时，万涛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就骂：“娘的，邓中夏把红军主力带走，搞逃跑主义，害得我们好苦啊！夏曦又要搞逃跑主义，把红军主力带走，让我们再吃立三路线时的苦头！难道中央代表都是这样帮倒忙的吗？”

邓中夏逃跑主义之害同志们是记忆尤[犹]新，这次夏曦又要逃跑，个个义愤填膺，省委表示坚决反对。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派我和彭之玉同志到军部去质问夏曦，制止逃跑主义行动。我们当即去前方军部找夏曦反映意见，夏曦向我们解释说：“把红军主力转移去鄂豫边不是他的意见，是段德昌同志的建议”，夏曦接着就向我们转达了段德昌同志的意见，他说，段德昌同志认为：鄂豫边敌人统治较弱而地方又很富裕，第四次“围剿”，敌人不可能从洪湖到鄂豫边向我进攻，那样长的战线得多少兵力，敌人做不到。敌人如果重点进攻洪湖，而我主力在鄂豫边，敌人如果把围攻重点转到鄂豫边，则我主力又可转到洪湖，敌人其奈我何？而且鄂豫边到洪湖中间迂回[回旋]余地很大，随时可以伺机打击敌人小股。夏曦同志说他接受了段德昌同志的这个建议，暂时放弃了他自己本来要向京汉路发展，同鄂豫皖打成一片的根本措施，因此派唐赤英同志去征求省委意见，同时他说，现在征求意见就说明还未作出最后决定。

我们说这不对，唐赤英传达的是征求省委意见考虑搬家的问题，而不是红军主力是否去鄂豫边的问题。夏说：那是唐赤英传达的错误，这应由唐负责。我问夏曦：“省委认为这是一条逃跑主义路线，你作为中央分局书记，

军委主席团主席认识到这点没有，这样批评过德昌同志没有，尽管是德昌同志建议的，你接受了，你在政治上应不应该负决定逃跑主义路线的主要责任？”夏回答说：我没有预料省委认为这是一条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我接受了这个建议，政治上我应负主要责任。即[既]然省委坚决反对，我接受错误，放弃这条逃跑主义的决定。到此，我和彭之玉同志认为问题解决了，逃跑主义制止了，夏也承认了错误，就回省委向常委会议汇报了这个结果。万涛听后不同意，说我们受了夏的骗，要清算夏曦右倾逃跑主义路线，并且在许多干部中散布他的这个意见。一时间，要清算夏曦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问题，被万涛闹得满城风雨。湘鄂西的领导干部，听到夏曦要重复邓中夏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一直闹到召开中央分局省委联席会议，在联席会议上，万、夏发生了激烈争论，与会同志都发了言。我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作了如下结论：

(1) 把红军主力拉到鄂豫边去，脱离苏区，这是一条逃跑主义路线。

(2) 尽管这是段德昌的建议，没有决定权的建议者，不负任何政治责任。但夏曦同志作为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团主席，没有批判段德昌同志，帮助他提高政治路线上的认识，反而接受了这个建议而决定行动，夏应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

(3) 夏曦同志经省委指出后，承认了错误。由于省委的反对，取消了这一决定，使逃跑主义未能形成事实，因此逃跑主义路线也就不存在了。

这个结论得到了联席会议绝大多数人的赞成，连夏曦都认为是公道的，就通过了。但万涛坚决反对这个结论，说它是调和主义的结论，所以问题仍然没有真正解决，尔后就一直闹到诉之于中央，两次派人到中央打“官司”。第一次，中央分局和省委共同指派宋盘铭同志去中央，万涛控诉夏曦的罪状是：(一) 夏曦不执行并违反中央的路线，自己搞一条右倾逃跑主义路线；(二) 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问题，欺骗中央，事后又对九师及万涛同志的错误处理问题，省委对他进行了批评；(三) 中央分局、省委联席会议决定，不同意夏当三军政委，应回分局主持全部工作，要求中央派人来，担任三军政委等问题。

宋盘铭带回中央指示信说，湘鄂西地方领导对夏曦同志的批评，中央表示赞赏，还鼓励大家今后对中央代表多作同志式的批评。但中央认为，夏曦同志自到湘鄂西建立中央分局以来，执行的是中央的国际路线；省委要求夏曦回中央分局是正确的，夏应立即回中央分局。三军政委一职，中央正在物色适当的同志来担任。听取了中央指示后，仍然议论纷纷，万涛说，宋盘铭是中央分局成员，没有把他(指万)的意见完整地反映到中央，中央也就不了解实情，对夏曦进行袒护。又要求派“中间人”去，结果中央分局和省委第二次又派了省苏维埃秘书长蔚士钧同志去了中央。这时，正是湘鄂西苏区党筹备召开“四大”的前夕，等到会议召开以后，在讨论夏曦的政治报告时，万涛指责夏曦搞逃跑主义路线，潘家询对报告中的政治形势分析提出了异议，与会各地代表因吃过邓中夏逃跑主义之苦，都愤怒遣责夏曦，并质问他为什么要搞右倾逃跑？夏曦在回答问题中进行辩护，由此产生了相持不下的激烈争论。

在第二天的继续大会中，有人提议要我做夏曦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结论，我把中央分局和省委联席会议的结论向代表们作了解释，申明不能做这样的结论。会场上就争吵得更厉害了。

第三天，由于中央派关向应带蔚士钧赶来，宣布休会一天，关代表中央召开了主席团会议，指明万涛派蔚士钧去中央暗地吩咐他控告夏曦的做法是一种反党小宗派行动，因此就留蔚在中央受训，使蔚有了认识后随关回湘鄂西，并告诉大会主席团，第四天（原定时间）的大会先由蔚士钧向代表们汇报他去中央的经过，然后再由关向应宣布中央命令。

在第四天的大会上，蔚士钧同志报告了去中央的经过。蔚士钧说：派我去中央是万涛挑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对我私下吩咐，去控告夏曦，务必得到中央处理夏曦的决定。我把万的要求向中央讲明以后，中央认为万涛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为此留我在中央受训，使我提高了认识，明辨了是非，明白了万涛反对夏曦就是反对党中央。中央派我回来揭露万涛的反党阴谋，我向大会表示，我受了万涛的影响，经中央教育后，坚决与万涛的反党行为划清界限，争取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以上是蔚讲话的大概）蔚的讲话绝大多数代表报以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中央代表关向应宣读中央命令，关说：中央认为以万涛、潘家辰为首的小宗派反党活动，是反中央的，反国际路线的阴谋活动，中央命令立即制止这种反党行为，不许用任何理由加以辩护，以免混淆是非，从而维护党的统一领导，这是我党更加布尔什维克的崇高纪律。中央号召湘鄂西党在中央分局统一领导下，对反党分子进行严肃批判，给予无情打击。这个命令一宣布，会场气氛大变，从反夏曦一变而为反万涛、潘家辰。杨成林在主席台上更是把万涛、潘家辰骂得狗血淋头。贺龙同志在主席台上没有发言。（大会开了几天已记不清楚了）最后，通过了夏曦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政治报告和《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决议，大会进行了选举。在新省委会议上进行了常委入选的分工。在旧常委保持原状的基础上补选了杨成林任组织部长。万涛调回军委工作。宣传部长一职，中央派林电岩同志补任。大会还选举了以李家芬为首的监察委员会。

大会闭幕后，省直各机关都进行对万、潘的反党行为的批判，批判潘较之批万声势更大，次数更多。

湘鄂西“四大”上的这场斗争和当时的中央对于这场斗争的指示，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相反地，否定了段德昌同志的正确主张。段德昌同志当时在前方打仗，没有来参加会议，因而大会是使夏曦承担了逃跑主义的政治责任，放弃了向鄂豫边发展，这样一来，就更加发展了他要向京汉路发展与鄂豫皖打成一片而争取武汉首先胜利的本来思想。—— 707 ——

当时正好碰上段德昌同志率领九师在应城、皂市一战，接连歼敌两个精锐[旅]，夏曦也把这一特大胜利和他的基本思想联系起来，用来证明他的基本思想的正确性，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而夏曦因此而更加自我膨胀，骄傲自满起来。

反对夏曦的右倾因而助长了夏的“左”倾，这是“四大”的前因和后果。这种消极因素，把夏曦推到了一错再错的深渊，使湘鄂西党的事业受到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回顾湘鄂西“四大”前后这一段历史，我深深体会到，在实际工作中，凡是实行了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路线和策略，我们就一定胜利，反之，必然失败。“四大”前后，主持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同志，完全推行了一条“左”倾路线。他领导下的湘鄂西苏区那一段的历史，则是一部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在实践中处处碰壁的失败的历史。他的错误不仅表现在重大的路线、

方针、政策上，而且在具体工作中对下级的批评指责上也是毫无原则的（例如对万涛同志、对省委），这两者在他身上竟象一对孪生兄弟那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而在那一段日子里，在“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下，还能接二连三地打胜仗，甚至包括应城、皂市之战这样大的胜仗，并在战斗中发展壮大红军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执行这些军事任务的段德昌同志的革命实践基本上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实际。他在反第四次“围剿”前夕提出的将红军主力拉向鄂豫边区（洪湖只留少数游击队与敌周旋），并利用湘鄂西与鄂豫边的广大地区与敌人打游击的战略思想，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可惜他的这个正确主张，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用“右倾逃跑主义”的罪名反掉了。当时，反对这一正确主张的万涛同志和省委的同志，都是错误的（包括我在中央分局、省委联席会议上的结论），夏曦同志接受省委的所谓批评，否定段德昌同志的建议，也是错误的。这说明王明只批判立三路线的所谓“右”倾实质，而不批判立三路线的“左”倾，所造成的流毒是多么深远，其危害革命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以上我所提供的历史事实和我个人对上述历史事实的认识，是否有参考价值还需要请做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审评。

注释

原文无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罪恶肃反的起源及其实际经过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杨光华

一、罪恶肃反的总根源

大家都知道：王明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使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他是靠结派营私，排斥异己而上台的。所以，它在对待革命干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是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手段，实在是凶狠毒辣，惨不忍闻了！

有人说王明路线的特点，是“左”倾机会主义，这并不尽然。实际上他是“左”得出奇，右得可耻！他不顾中国革命面临的强大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后来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不顾中国的这种国情，硬搬苏联的经验，没有任何独立自主的创造才能，把教条主义假冒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窃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而孤注一掷地断送中国革命！这就是湘鄂西罪恶肃反的总根源。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根据中国国情，走了自己国共合作，对内打倒封建主义，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由此而发展起来的。1925年到1927年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有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南方各省已成为通红的革命火炉。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反共和血腥的大屠杀，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使革命大遭挫败！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这是在周恩来同志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革命武装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接之而来的中央扩大会议（八七会议），找到了中国革命正确出路，在农村出现了此伏彼起的秋收起义，创立起游击武装和根据地建设。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创造者，就是这些坚持革命到底的党的健儿，响应八七会议号召，投入农村干起来的。他们在对敌斗争中，从血的战斗中夺取敌人的武装而武装了自己；从游击队发展到正式红军，是在千百次战斗中付出血的代价！多少革命志士付出了宝贵生命而博得的革命果实——红军和红色区域。

他们于一九二八年在周逸群统率下统一了鄂中、鄂西。于1930年统一了鄂西和湘西。以周逸群、贺龙、段德昌为首的湘鄂西根据地，拥有数十县红色根据地和两万多红军武装。

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对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制定了十大政纲和土地政纲。在周逸群同志统一领导下，纠正了在革命中发生过的许多错误，使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这就是在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鄂西特委正确领导下，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坚决走群众路线而深入贯彻“六大”精神，赢得了1930年一遍[片]大好的革命形势。周逸群同志也自然成了为全区领导干部所爱戴的地方领袖。就是这许多革命的种子和健儿，在王明路线的罪恶肃反中，在王明路线的中央全权代表夏曦的屠刀下做了牺牲品！夏曦两手沾满了革命干部的鲜血！而王明路线是借夏之手毁灭了我无数革命精华，使湘鄂的革命在敌人第四次“围剿”中遭受惨败！

二、罪恶肃反的起点和实际经过情形

1、王明路线的中央关于全面肃反的部署和通知

一九三二年在湘鄂西全省党的“四大”（前）后，我红三军在襄（汉水）

北取得军事上的特大胜利，正在发展襄北新苏区之际，于四月初旬。王明路线的中央（在博古即秦邦宪主持下），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打来密电。其大意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说革命形势大发展，敌人进攻革命也更加疯狂，他不但外部用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而且从内部打入反革命，从中捣乱，破坏革命。例如：中央苏区已发生富田事变，有AB团反革命组织；鄂豫皖也正在肃反，你湘鄂西也不能例外，应当提高革命警惕性，极力破获和肃清苏区内部的反革命活动，彻底消灭其反革命组织、并须将肃反情况随时报告中央。

夏曦即将密电通知省委并命令省委通知全省各地党委。省委召开了有省苏主席崔琪，土地部长彭之玉，组织部长杨成林，省军委代表万涛，省委宣传部长林电岩，团省委书记周美童和我本人参加的省委常委会议。还有团中央驻团省委代表宋盘铭也参加了这次常委会议。议定并通过了省委关于肃反问题对各地领导的通知。省委发出通知，得到的反映是各县发现反革命活动的报告纷纷而来。许多县报告他们发现了逃亡地主又秘密潜回。江陵县委报告他们县巡视员走到熊口被反革命暗杀。沔阳县委报告：敌人要在峰口举行反革命暴乱，他们已逮捕了许多反革命暴乱份子，正在关押审讯中等等。这些迹象不能不使人触目惊心！

2、肃反在襄北军事部门开始

据息：襄北在天门、汉川县委所在地捕获了一个敌军营长名张锡侯，经过审讯，他供出天汉县委军事部长杨国茂是他们（的）同伙，张又供出八师参谋长胡慎已。夏曦以军委主席团主席身份，命令在前方组织军事法庭，并任命朱勉之为军事法庭庭长。我闻此信，即去中央分局找夏曦说：“朱勉之立三路线的“左”倾思想没有清算，如担此重任，恐其以积极姿态出现误事。”夏置之不理，仍以朱勉之为肃反中坚？果然肃反迅速扩大起来，涉及到很多军事干部，并涉及到八师政委李剑如，九师政委陈培荫，以至三军政治部主任柳克明（即柳直荀）。由前方扩大到后方，又由军事部门迁[牵]涉到地方组织。

夏曦立即成立了一个警卫团，以罗统一为团长，直属军委主席夏曦指挥，逮捕了省政治保卫局局长彭国才，从前方调朱勉之带领在押“犯人”到后方，调监利县委书记马武为政治保卫局局长，朱勉之为政治保卫局审判长，组织了新的政治保卫局机构而开始向省委进攻，逮捕了省委常委万涛。（这以上是从五月起到六月的时间）

我对夏曦纵容朱勉之逮捕省委常委而不向省委报告的做法很不以为然，率同杨成林同志一道去中央分局质问夏曦。我说：“夏胡子（当时留有小胡子，我们都称他夏胡子），有一个问题不明白，特来请示你。”夏曦很不高兴地对我说：“有话尽管明说，请什么示呢？”我说，“我问的是省政治保卫局同省委的关系问题。”夏说：“你说呢？”我说：“我认为省政治保卫局是省苏维埃政府属下的一个机关；它是镇压反革命保卫革命政权的机关。而党是领导一切的，自然保卫局也是属于党领导的，它怎么抓起省委的人来了？”我又退一步说：“我当然不敢担保省委里一个反革命也没有，即乎（使）省委里谁是反革命被保卫局查觉，应该报告省委，经省委常委会议（来不及开全体会议的情况下）作出决议，撤销其省委职务，开除其党籍，保卫局再抓他，是抓的反革命，而不是党的省委了，这才是正式的组织原则，不然的话，你怎么解释保卫局这种反动行为呢？”夏曦的答复正是不以我所说的为然。

他反问我：“依你之见，保卫局查觉你省委里谁是反革命还要事先通告你省（委），经过省委作出决定，才能逮捕；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省委里谁是反革命？有多少反革命？”我说：“我当然不知道。”夏说：“既然你不知道你省委有多少反革命，谁是反革命，那向你省委报告谁是反革命要逮捕他，那岂不等于向其他反革命告密了吗？”说到这里，夏严肃地对我同杨成林说：“老实告诉你，苏联“革别乌”（即肃反委员会），发现苏共中央谁是反革命，只报告列宁，只要列宁点头，苏共中央任何人都可以逮捕，是捕后通知苏共中央，而不是事先报告。”我们听了夏的答复，只好面面相觑而退。他这明明是在告诉我们：湘鄂西省政治保卫局、发现我们省委中谁是反革命，只报告他夏曦。只要他夏曦点了头，省委中（包括我们在内）都可以逮捕，是捕后通知省委，而不是事先报告。我把上述这次交涉问了宋盘铭，在苏联是否如此？宋也表示惊奇地摇头说：“不知道。”后来我同谢觉哉同志谈起来，谢老说：“我问他这些人创造苏维埃政权，怎么又会来破坏苏维埃政权呢？夏的答复更奇怪，他说：“这些人正是为了破坏苏维埃政权才创造苏维埃政权呢？”此后，宋盘铭见捕人太多，跑去对夏曦说：“你这样干恐怕损失太大了吧？”夏怒斥道：“损失太大，损失了反革命你心痛是不是？你的立场站到那里去了？”宋也只好愕然而退！

我第二次又去问夏曦说：“夏胡子，我总是想不通这个道理；我们党在白区的组织，只要被捕了一个人，其他人立即转移以避免连续破坏。怎么反革命在苏区的组织随我们怎样抓，一个也没有转移的，难道敌人就这样愚笨吗？”夏对我训斥道：“你是对肃反表示怀疑，不相信中央的指示吗？这是同宋盘铭的立场一样是很危险的。”我说：“我不明白，请示你给我解释。”夏把手一挥不耐烦地说：“你好好想想你自己的思想吧！不要请示请示的拐弯抹角。”我也只好愕然而退。心想：夏曦这个人怎么变得这样不讲道理起来了。

六月一个月过去了，时间进入了七月。省直机关人也被捕得差不多了。弄得人人自危！省委以至各县工作近于瘫痪状态，前方除在新沟咀九师全歼范绍增旅的胜利之后，军事上日益处于不利的局势！我多次为如何工作去找夏曦请示，而夏曦则一心肃反，对如何工作完全置之不理，一找他，他就很不不耐烦地说：“怎样工作你都来问我，要你这个省委书记干什么？”我只落得自讨无趣！但政治保卫局在朱勉之操纵下好像反而生气勃勃，严刑逼供的风声越来越紧，我硬着头皮去找夏曦提出抗议。我说：“苏联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列宁宣布取消肉刑；我听说刺杀列宁的那个女孩子都没有判刑，怎么我们还用刑审呢？难道我们掌握真理（的）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还需要用刑吗？不能让他们在真理面前服罪吗？”夏不答复这个问题。我知道他没有说服我的理由，我就专用这个取消刑罚的理由逼他答复。在无事可做的场合，我就跑到中央分局去找夏曦提这个问题。到了七月中旬，夏曦不知怎样动了“灵机”，派警卫员来叫我同杨成林去分局，命令说：中央分局宣布成立一个肃反委员会，地方以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主持地方肃反，军队以军长政委参加，主持军内肃反，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负总责领导这个肃反委员会、进行肃反事宜。我又问：“关于取消肉刑的问题，肃反委员会可以决定吧？是不是把贺龙同志和关向应同志找到一起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夏说：“不用找他们了，我已通知他们了，军事紧急不用一起开会了，你们不相信保卫局可以去监审。据保卫局汇报，这些反革命狡猾得很，不用刑他们

是不招供的。”我说好，我们就派杨成林同志去监审。夏点头说：“可以。”我们派杨成林同志去监审。所反映的情况更是可恶已极，不但严刑逼供，还指名问供，各种毒刑无所不用。我们又去找夏曦说：“为什么要用苦打成招和指名问供的办法？你说不打不招，我们可不可以用自首的办法让他们说实话呢？这不就取消了肉刑吗？”夏说：“让我想一想，过两天再商议。”结果夏曦写了一个允许反革命自首的命令，并严格规定地方区以上、军内营以上不许自首，来对付我们提出的“自首”建议。

监审第三天，杨成林就告诉我说：“不得了，他们要供到我们头上了。”谁知他留了一个条子给夏曦就跑了。夏曦又派警卫员把我找去，怒气冲冲地把条子往我一扔说：“你看，你只相信你省委，不相信政治保卫局？他（指杨成林）说他不是反革命，不是反革命为什么要跑呢？”我一看条子，上面写道：“夏胡子，我杨成林决不是反革命，也决[绝]对不作反革命，永别了！”夏曦怒问我说：“你知不知道他跑了？”我说“不知道。”夏摇摇头表示不相信，忽然又问我说：“你是不是也要跑呀？”我说：“跑什么？我处心无愧！”夏说：“好，这样照你说来，他是处心有愧的哟！”立即命令我说：“马上用省委的名义发出缉拿反革命杨成林畏罪潜逃的通缉令，并逼迫我现在就起草写出来给他看。我只好照写了一个草稿说：“兹有省委组织部长杨成林，因是一个反革命而畏罪潜逃，特此通缉，缉拿归案。”此通缉令发出后夏又故意表示相信我起来了。对我说：“你是肃反委员会成员，可以来中央分局听政治保卫局的肃反汇报。”有一次，我去找宋盘铭找不着，很紧张地跑到中央分局去，还未进门就听到宋盘铭在那里哭诉说：“夏胡子，我家是三代铁路工人，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又受了党的培养，我怎么会当反革命来反共呢？……我听到耳里，恨在心头，跑进去一看：见夏曦坐在上边，朱勉之坐在左边，望着宋盘铭低头诉苦。我不由得火冒三丈，瞄了朱勉之一眼，大声喊叫道：“宋盘铭，你是什么人？对谁诉苦？你是团中央代表，为什么这样不讲身份？我看谁敢污蔑你！我代表省委支持你！我们一道到中央去告他！”我又说：“夏胡子我找他有事，这里不方便（说着我用眼随向夏示意是朱勉之在场不便说），我们到团省委去，行吗？”夏苦笑着把手一挥说：“你们去罢。”我拉着宋盘铭出了中央分局，朱勉之面红耳赤地还呆坐在那里，大概是等我们走了他好同夏曦说什么？我不管他这些就同宋盘铭一起到团省委去了。我对宋盘铭说：“朱勉之是个什么东西？你当他的面诉苦实在太不像话了。我有一个问题问你，驻鄂豫皖的团中央代表陈昌浩同志，听说张国涛已提升他做了四军团政委。夏曦怎么不提升你呢？他说你不中用，这是恨铁不成钢呢还是瞧不起你？我找你，就是为了谈这个问题，听听你说，对夏的看法。”宋盘铭说：“夏曦是一个有名的老机会主义，谁不知道。”我说：“马日事变正是他做湖南省委书记的时候，真可耻！”宋又说：“他说我的立场不稳，这难道是恨铁不成钢吗？我看他是瞧不起我。”我说：“他夏曦谁也瞧不起，不相信，就相信一个朱勉之，我们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立场不稳，不中用。杨成林跑了也训斥我！请示工作他也发脾气，说工作怎么做也问他，要我这个省委书记干什么？”我又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你应当向团中央反映夏曦这些情况，我看他是鬼迷心窍，不识好人，不听良言，独断专横，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了，哪里还有一点马列主义气味！”（我同宋盘铭真是如同亲兄（弟）一样亲热的同志，无事不谈。以前还有一个杨成林可以亲切地交谈，商量工作，杨成林跑了后，我失掉了一个有共同语言

的亲密战友，更觉孤单，能如此倾谈肺腑的只有宋盘铭一人了。所以感到更加亲密。)

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洪湖苏区的丧失和肃反总结

敌人对红色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已经开始，八月军事上更加紧急！夏曦感到实力不够（没有意识到自己损失干部过多而极力电告向张国涛求援，要求哪怕红四军团只派一个师到路西来支援洪湖苏区也是好的。据说张国涛已电允派一个师过来。我主持省委的工作，当务之急是迎接红四军并作拥红慰问总动员。省委发动了一切欢迎和慰劳红四军团的宣传机器，动员已有组织的妇女洗衣队，补鞋队（做鞋队做了三千双布鞋）慰劳兄弟红军，结果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根本没有什么红四军团到洪湖苏区来。在这种紧急关头，夏曦却召我去分局听政治保卫局肃反总结汇报。局长马武和审判长朱勉之都到了中央分局向夏曦汇报。我听取了哪县是全部，哪县是大多数，哪县比较好些的汇报外[后]，最使我注意的是：

湘鄂西苏区的反革命组织有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AD团，等等。他们各派的组织系统和我们党的组织一样，有省委，特委，县委，区委以至支部，他们的省委都设在我们省委里面，各级组织都设在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内，据说是“以免暴露”。各派之间又有一个联合组织，同样设在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内，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是周逸群。我听到这里不由得大吃一惊，又不敢相信，忍不住问朱勉之说：“他（指周逸群同志）不是早已牺牲了吗？怎么还有他呢？”朱勉之神气十足地说：“哼，他真的牺牲了吗？老实告诉你，那是假死，他还活着正在当徐源泉“围剿”我们的高参呢。”这话令我毛骨悚然，满头大汗！夏曦见我如此模样，就说：“你怕什么？你不是处心无愧吗！”这个“处心无愧”的一句，惊醒了在昏迷中的我，我奋力振作起来，见夏曦和朱勉之面面相觑地在讥笑我。“你都听清楚了吧！这就是你们这个地方的假共产党真反革命的真凭实据。”夏又用阴险的笑脸对我这样说。我抑制满腔怒火，强忍心痛，坚持听完了肃反总结汇报。我时常这样苦思：这难道都是真的吗？我一起工作的和一向相识的老战友都是假共产党，真反革命吗？连我们爱戴的周逸群同志竟成了反革命首领，而我呢？我究竟算是什么人呢？在夏曦，朱勉之他们眼里看来，还不同样也是一个假共产党，真反革命吗？天啦！这是从何说起哟？！！真令人不寒而栗，我不能不想，但想起来确是太寒心了。

敌人已进攻洪湖苏区内部了，从沔阳方面已失去了峰口。沔阳游击队退至小沙口，我正在小沙口布置工作，直接看到群众抬盒送菜、饭，求救的场面。我说：“同志们！父老兄弟姊妹们！感谢你们的慰劳！我们有责任同敌人打到底，不消灭敌人，不取得革命的胜利决不罢休。”小沙口挖的战壕，沔阳游击队改的警卫营在这里堵截敌人。

夏曦把七师留在后方，守新沟咀堵截从江陵来的川军，把各县游击队都改成县警卫营，企图这样来抵制入侵之敌。可是我当着群众说的那些话，结果在当时成了空话。小沙口既堵截不住，七师在新沟咀也挫败了下来。七师向分盐退却时，敌人的骑兵追击，七师政委鲁易同志被俘。我正在小沙口时，忽然被调回崔家湾。夏曦命令我去七师，因为政委鲁易被俘，七师没有政委，命令我跟七师退去江陵之张金河小镇等他（并没有任命我代理政委）。就这样去七师，我赶到分盐，七师正在分盐退败下来。我跟着七师退到柳关，敌人的骑兵在后面拼命追击，生龙活虎般的红军这时却变成不堪一击的残兵败

将！我只好带病同七师退到江陵之张金河去待命。敌人攻占了柳关，把我们追击到太平桥。[我们]从太平桥向张金河方向退却的时候被敌切成两股。我同王一鸣师长带着一股冲出[开]敌人的堵截，向张金河奔去。

夏曦带着政治保卫局押着“犯人”，在崔家湾失守时退入洪湖。他亲自处决了所有“反革命”后才同七师另一股到达张金河。省委机关的非武装人员，在没有计划退却的情况下，向洪湖逃去。有的被俘。（谢觉哉同志也被俘。据他亲眼看见夏曦杀人，来不及就用麻袋装着往湖里沉，真是惨不忍闻。）郑绍文说：“朱勉之在路过观音寺时，被敌人打死了。而夏曦说潘克鲁逃跑了，却没有提朱勉之之事，我不敢相信，也不想再问了。

到江陵以来，我遵照夏曦命令，同七师到张金河待命，我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夏曦对我无可责难。我们到江陵以来，就得亏了省监委书记（夏曦比较相信的，监利人）李家芬。在江陵县委大部领导人被捕后，他指名要省委委任李家芬任江陵县委书记。我们从敌情和经济物质援助，[到]红七师给养，全靠他帮助解决。夏曦到后，我向他反映了李家芬帮助得力的情况，夏也沾沾自喜地认为他任人唯贤的眼力不错，对我也无所非议了。从军事情况来说，敌人的主攻方向是洪湖，可[所]以集中兵力进攻洪湖，江陵之白鹭湖敌情尚且空虚，所以我们能在张金河暂住，当夏曦带领洪湖剩下的武装退到张金河时，敌人却尾追来侵犯张金河。浩子口已被敌把守，封锁了去襄北的通道，只有沙岗可以渡过江南湘属之华容，以作冲出敌人包围的出路。夏遂命令部队立即退出张金河开赴沙岗，准备晚上渡江，谁知连夜狂风暴雨，不能过江。又据报张金河敌人已退，七师又返回张金河。情报说明了浩子口之敌住在两侧，中间有一条窄路可以突出浩子口，只能黑夜行军偷过。夏曦遂令七师黑夜偷过浩子口，他本人原想与七师同去，但不知为何忽然不去了。七师偷过了浩子口，与在襄北活动之我军主力会合去了。我们从张金河小镇退入三湖，不知怎么忽然周小康同志带领湘鄂边独立团来到江陵之三湖？这是夏故意安排呢？还是巧合呢？我不明白。但夏曦叫周小康去汇报湘鄂边肃反情况和军情时，就此将周小康同志处决了！这才带着独立团按原七师过的小道从浩子口偷出去和红三军主力会师去了，把我和郑绍文等同志丢在敌人包围圈里不管。夏曦万万没有想到我和宋一平（即田道文）、用他去团中央的地址，一同去上海找到了党中央，而没有落入敌人之手。

夏曦带走了湘鄂边独立团之后，敌人又占领了张金河，我们从三湖转到四湖。我由于带病，劳累过度，在湖里的小船上静下来就暴发了大伤寒，茶水不进地躺在船上。得亏了李家芬同志，经组织找了一位中医，到船上给我治病吃药，病情有了好转，没有病死在湖里。四湖上的许多小船都住着伤病员，我经李家芬同志提了款后，分发给伤病员们，劝他们各找亲朋好友离开这敌人将要来搜索的白鹭湖。安排完毕我就同田道文扮成两弟兄，经长湖到沙市乘轮船去上海了。临走时还是李家芬给我一件皮袍子穿的，还给了我一百光洋做旅费。多好的同志和群众啊！我决定请示中央再去继续在及[极]其恶劣环境中进行工作，我就派我的妻子兰松青同省委的炊事班长兼支部书记刘×，装成假夫妇去沙市找刘的亲戚，在沙市住下来等我。那知中央看了我在那里写的《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之后，不让我回洪湖而留在上海工作了。住沙市等我的妻子没有等到我——交通总站失掉了我交给他们的地址，至此失掉了联系。

我给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肃反总结汇报的内容。中央看出了夏曦搞的

肃反是错误的。（中央在一九三三年迁于[入]中央苏区。）在路线上说，秦邦宪（即博古）主持的中央是犯了王明路线的错误。但他没有如王明、康生那种害人之心。经过遵义会议，他服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后来在敌人第五次“围剿”退出中央苏区时，中央派任弼时同志领导六军团找二军团会师，成立红二方面军。进行长征前，任弼时代表党中央，撤销了夏曦的职务，禁止了肃反。我没有想到，我对中央的报告竟起了如此作用，更没有想到夏曦在丧失了洪湖根据地后，在行军路上搞了二、三、四次肃反（如此看来，在洪湖作的“肃反总结”叫第一次肃反总结），杀害了得力将领段德昌同志和团中央代表宋盘铭同志，杀害了许多将领，还解散了党和苏维埃。夏曦鬼迷心窍到如此不可救药的地步！要不是中央派任弼时同志领导六军团去找二军团会合，制止了夏曦这种自杀行为，挽救了危局，那剩下的红二军团和贺龙同志，都很可能被夏曦完全毁灭！这就是罪恶肃反的真正历史，也是一部血泪史！也是我个人苦难一生的血泪史。我于一九三四年从上海派往东北任满州省委代理书记时，被王明，康生用欺骗的手段，搞到苏联去整了二十一年，主要还是认为我是湘鄂西反革命漏网份子。王明认为夏曦没有杀掉我，只好他亲自动手了。王明给我[定]的罪状是：“杨光华本来是一个阶级异己份子（这当然是指我在湘鄂西就是一个假共产党，真反革命）。之所以能够爬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这是指我任过湘鄂西省委书记，中央组织局，上海中央组织局组织部的领导成员，江苏省委秘书长，满洲省委代理书记等职），不是从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是故意抹煞我在党内真正战斗的历史），而是周逸群用私人关系提拔起来的，周逸群是一个改组派首领。这和夏曦的口气是何等地一致啊！不过夏曦还没向我公开吐露，而王明这个太上皇就不得不公开下旨定罪了。这显然我的历史帐的总根还是从洪湖算起，这就是这部血泪史的根源。苏联北冰洋地区零下七十度的集中营里，我是怎样活出来的哟！文化大革命康生亲自点名又整了我十年。我让活着，这个生命力从哪来的！这就是相信我们的党，是不会冤屈好人的，有党就有我，党就是我的生命。死难的老战友，先烈们，你们含冤而死去。我是你们中的幸存者，苦难地活了一生，谁挽救了我？还是党，我才有今天。老战友！先烈们！你们如真有在天之灵，也应含笑于“九泉”！我和你们一起欢呼：有党才有我们的今天。

四、我对肃反总结汇报的看法

最后说说我对肃反总结汇报的看法：无论肃反者朱勉之如何混淆是非，夏曦如何昏庸，问题是很清楚的，用苦打成招逼出来的供词，都是不能信以为真的假口供；而且已在供词中暗示你审判者和决策人，他们的反革命组织和我们党一样，有各级组织。而且都设在我党各级组织内。他们明明说：“他们的省委就是我们的省委；他们的县委就是我们的县委以至各级组织。”很明显的，是在告诉你审判者说：“他们除了党的组织外，别无其它什么组织。说周逸群是他们的首领，这说明他们是在周逸群领导下干革命的。什么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等等。都是严刑逼供逼得他们编造出来的，看你信不信？这个鬼迷心窍的夏曦就是领会不了这种意思和被苦打成招人的心情和暗示，而信以为真。这是其一。其二、夏曦相信的人，也被肃反吓昏了头脑、相信的人也不相信了，而且受到他的杀害。例如：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蔚士均[蔚士钧]同志，在万、夏之争中，被作为中间人派去中央，他受了中央的

影响，回来揭露了万涛，而万才被打成“反党”，蔚却变成了夏曦最相信的人，由此派他去成立鄂豫边省委。尉士钧作为中央分局全权代表，由他去物色省委人选报经夏批准就成立了鄂豫边省委领导班子。而肃反中又派蔚士钧去鄂豫边肃反，蔚却把他物色的人又作为反革命肃掉。而蔚士钧呢？回来后又又被夏曦肃掉了！再如：周小康在湘鄂边特委书记，在肃反中他接受命令，把湘鄂边领导人都肃掉了，只留了他，在失败中亲领独立团入白鹭湖，而他又被夏曦亲手肃掉了。这怎么解释呢这种自相矛盾，简直荒唐到如此不可救药[药]的地步？其三、在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顶点时，谁的良言都听不进去，把创造苏维埃政权的人说成是：因为他们要破坏苏维埃政权，才建立苏维埃政权；把共产党的组织说成是反革命的组织，把党的精华都当成敌人杀害了；把党和苏维埃都解散了。他谁都不相信只相信他自己，朱勉之在肃反中助了夏的一臂之力，成为他最得力的、最可靠的助手，而退出洪湖前同他一道处决了所有在押的“反革命”，他这才放心离开洪湖。而离开洪湖后的朱勉之和马武呢？为什么都不见了。朱勉之在观音寺被敌人打死了，这只是郑绍文同志一个人的说法，没有确实根据。马武后来投敌叛变了，做了敌人的特务。这个情况我们都知其下落，而朱勉之呢！成了一个不可解释的谜，可能只有两个：一个跑了（象杨成林跑后，消声灭迹）！一个是被夏曦杀了，故意说是被敌人打死，这个可能性在当时的夏曦说来是完全做得出来的。其四、所谓肃反委员会，只不过是有人有名无实的一块空招牌，而且是在把人都抓完了之后（七月）宣布成立的。既没有开过一次肃反委员会，捕人和杀人连允许自首都没有经过肃反委员会决定，都是他夏曦一个人说了算。这“肃反”委员会实际上是夏曦（在应付我和杨成林同他争执中）耍的一个花招而已。因此我认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其五、有人说王明路线在组织上的特点是“唯成份论”。这也同他的“左”倾特点一样不尽然。实际上，夏曦在用人时讲“唯成份论”，但杀起工人来就不讲“唯成份论”了。陈培荫、李剑如和后来杀害的宋盘铭不都是工人成份吗？被他抛在白鹭湖敌人包围圈里的我，这个工人成份也不例外。其六、最后，有人问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失败的原因何在？答曰：“敌强我弱”。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夏在肃反中把地方领导干部都杀光了，从而就搞垮了党，在敌人大举进攻中，革命群众失去了党的领导，在强敌面前无所作为这是失败的最大原因和最根本的原因。这就是我的看法。

廖汉生谈贺英（节录）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根据记录整理）

关于贺英（又名贺民英）对革命做出过哪些贡献，我们怎么去评价她。贺民英一生分两段。第一段，就是她结婚以后，反抗恶势力。你们都知道，贺民英是贺龙的大姐，贺龙的母亲姓王。她出生以后，能够参加家务劳动的时候就参加了劳动。她的丈夫谷吉廷，是她姑母的儿子，姑母的第四个儿子。过去，桑植县是“有枪则王”。有几杆枪，就可以霸占一块地盘。谷吉廷是龙头大哥。青红帮、哥老会开始的时候也是反对满清的，以后有些变化。谷吉廷是龙头大哥，贺民英嘛，是凤头大姐，协助她的丈夫进行武装斗争。后来，她的丈夫被他的把兄弟——陈渠珍派去的一个余连长请去吃饭，把他杀掉了。余连长当时带了一连人住在洪家关。丈夫被杀掉之后，在这样的情况下，贺英不得不自己起来。兄弟们也推戴她。一九二七年那个时候，在桑植县传说很多。桑植县有一伙人，是贺龙的对头。以后贺龙当了大官，这些人又屈服了他，当然没有心服。南昌起义之后，传到桑植县的谣言是什么？一个是贺龙被打死了，一个是贺龙被蒋介石捉去杀掉了，一个是不晓得他到哪儿去了，死了，总而言之是这么一些。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贺民英还有几杆枪，还有几十个人。大家都想把她消灭之后，好得人、得枪、得地盘。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贺龙回来了。贺龙同志从起义以后到洪湖，一九二八年的二、三月，回到洪家关。这个时候，桑植那些人，团防老爷，统统地都收敛了，都归附了贺龙。贺民英也把自己的部队交给了贺龙。贺龙回来的时候就是七个人，三杆枪嘛。放哨的，都是钟慎吾的人。贺

民英看到了这个情况，还有一个，自己也感到疲劳了。一个女人，当司令，带

队伍，进行武装斗争，流言蜚语很多。自己也恍惚感到“龙胜于英”，贺龙比她强，就把队伍交给了他。交了大概不到一个月，湖南省军阀龙毓仁旅来进攻贺龙。在这样的情况下，贺龙对她说，你这一摊子我可管不了，什么姐姐呀，妹妹呀，外甥呀，一大摊子家属，过去都是她管的。贺龙回来后，她把人和枪都交给他，也想过下安闲生活。敌人一来，贺龙说，这一摊子还是归

你管，结果又退了几根枪、几个人给她。那么，她又重新来搞罗。以后嘛，一直是在搞游击战争，到桑植、鹤峰，到桑植、鹤峰交界的地方进行斗争。一九二八年，贺龙在石门，就是贺锦斋牺牲之后，剩下来百把个人。有些人走了。“两头小，中间大”，跟到贺龙的是一小部分，跟到国民党的也是一小部分，中间大部分是中立的，就是旁观，不参加这边，也不参加那边。到了一九二八年冬，贺龙同志在石门失败之后，回到桑植、鹤峰交界地区。那时很困难，已经下了雪，没有钱、没有衣服、没有棉花，在这种情况下，贺英把她自己的积蓄送了一些给他。以后红军发展了，三年去跟六军会合，贺英还在桑鹤边界坚持斗争。到三二年，整个红军受“三次围剿”、“四次围剿”的时候，在桑植、鹤峰，敌人进攻，苏区失败了。这个时候，鹤峰独立团走了，和湘鄂边特委一起去找主力去了。桑植县游击大队被打垮了。在这个情况下，她的部队还继续在这里，掩护老老小小。在四门岩山区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三年春。红军回来后，才从那大山区里出来，到了鹤峰的走马坪、洞柘湾。这个时候，她曾两次要求入党。一次要求入党，关向应同志说，你

还是留在外面，活动比较方便些。第二次嘛，又是这个答复。她还是继续搞武装斗争，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四月被敌人袭击牺牲。她的贺五妹，就是贺龙的第二个姐姐，也是个寡妇，一直跟到贺民英的。两姐妹都牺牲了。她的么妹没有打到，跑掉了。那么，她的这一生怎么说法。在红军时代起码有这么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贺龙一回来，她就连人带枪把部队交给了贺龙。你不管她是姐妹情也好，如果她对革命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她也不可能这样做。第二件事，就是一九二八年（贺龙）从石门回来最困难的时候，带部队困难，生活上也困难。她不是说吗，你这个部队，过去人家跟着你是想发财升官，现在跟着你干什么，你总得要讲个道理。贺民英大革命时期到过汉口。贺龙从师长到军长那段时期，她到过那里。她说，不是有什么 CP、Cy 吗，你们应该把这些组织起来。她还说，队伍要武，土话嘛，就是说队伍要活动。她也是认为她带兵几十年，跟贺龙商量这么一些。第三件事嘛，就是在红军时代，也就是我们在割耳台的时候，在湖北、湖南交界的那个山区，招待和掩护伤病员。很多人都在贺英那个地方住过。再就是最后坚持。当鹤峰独立团走了，特委走了，湖南桑植县的游击大队被消灭之后，她仍然坚持，一直坚持到红军主力回来。最后嘛，是英勇牺牲了。所以她这一生，应该说是革命的。她对于红军，对于革命，对于共产党，是同情的。虽然她自己没有加入共产党，没有能够加入共产党，但不是她自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是当时组织上认为，她有她自己的名气，留在外面，不加入共产党，活动更方便。这是我的简单看法，至于你们怎么评价，那当然要根据事实，根据你们得来的材料。上半辈子，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的，同时，虽然没有正式的游击队番号，那个时候都是叫贺大姐部队。我们那个部队就是贺大姐的部队。她牺牲之后，以她这个部队的底子组成了鹤峰游击第四大队，以后编入了红三军七师。大队长当七师十九团的副团长，在茨岩塘战斗中牺牲了。我那时是大队的副大队长，调到军部去了。这是贺民英的情况，简单提一下子。

关于贺英同志若干历史问题的考证 边云

在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上曾经涌现过许多女英烈，她们当中有不少是著名的共产党人，但也有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入党而对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贺龙同志的大姐贺英，就是一个这样的历史人物。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依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评价她们，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课题之一。为此，本文拟对贺英烈士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逐次予以考证。

一、贺英的身世和早期活动

贺英，原名贺民英，乳名香姑，人称香大姐，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农家里。由于家境贫寒，弟妹众多，自幼即担负起操劳家务、教养弟妹的繁重劳动。又由于贺姓族人，不分男女老少，素有习武的传统，贺英也稍懂几套武功。一九〇六年与表兄谷绩廷结婚，民国初年协助丈夫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一九二三年，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唆使喽罗诱杀了她的丈夫。从此以后，贺英便自带武装，自称“司令”，活跃在湖南桑植一带，基本队伍有三十几个人，二十多条枪。

怎样看待贺英和她所掌握的这支队伍？有人说是“打富济贫”的，有人说是“保富刮民”的或从“打富济贫”转化成了“保富刮民”。事实究竟如何呢？从调查中看，贺英和她所掌握的队伍，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三年间，是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不过，不是向“保富刮民”方向变，而是逐步接受党和革命的影响，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然，把她和她所掌握的队伍一开始就说得很好，也是不客观的，但是，不能不承认大革命时期贺英的思想有进步，她和他们的队伍确实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更为可贵的是，一九二八年在党派贺龙、周逸群等同志回湘西重建革命武装时，贺英率领这支队伍参加了革命行列。就一九二四年以前来看，这支队伍基本上属于“打富济贫”的性质。这样讲是有根据的：一九一六年，贺英和她的丈夫积极支持贺龙同志杀掉桑植县“四大鳌鱼”之一，大劣绅朱海珊。一九一六年，在反对地方军阀统治的斗争中，贺英和她的丈夫支持贺龙同志赶走了桑植知县陈慕功，推举慈利会党首领卓晓初当了十几天县长。贺英队伍的基本成员无一不是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其中，有本地的戴文清、戴文臣、谷安同、黄月之、龚莲香（女）、熊月姑（女）；有她在湖北鹤峰的亲属徐焕然、徐武生、王华奋、王相生、王华正；有贺、谷两家的族人贺勋臣、贺文渊、贺文礼、谷伏玉；还有从湖北、贵州逃难来的王玉林、张月园（女）等。贺英在家屋被烧后，利用当地历代土家族抗拒外族入侵的山头——鱼鳞寨，加固工事，作为屯垦御敌的营地。她的部下平日生产种地，有事集中作战，其供养来源，除责令大户筹措外，自己也从事一些生产，并非拦路抢劫。贺英的山寨上，经常有因为受到土匪抢劫或富人压迫，而跑来躲难的穷人。例如早年的孤儿熊月姑回忆说：“我十二岁父母双亡，香姑养我长大，为我成家，结婚办陪嫁，还送我二十斤茶油和几担谷子独立门户。”曾为贺英当过军需后来参加红军的钟典三同志的母亲回忆说：“旧社会土匪杀了我家人，抢了我东西，赶我们出来讨米。没有办法，我逃到香大姐寨上躲难，香大姐送我一床棉絮，还送我一些钱。没有香大姐，我们早就命归西天了。”

有人说贺英参加过哥老会，是凤头大姐，应当属于封建代表。贺英确曾在宣统年间，参加过“反清”、“排满”的哥老会，但是，湘鄂川黔的哥老

会，虽然带有封建色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从阶级本质上看，却属于游民无产者政治和经济斗争的秘密互助团体。到清朝末年，哥老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后，已经变成推翻清王朝的一种革命力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从广州起义失败，到武昌首义成功，各地会党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湖南从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到一九一一年长沙光复，无不是同盟会依靠会党努力的结果。桑植会党，早在咸丰四年（即一八五五年），秀才李晖、廪生谷启虞和贺英的曾祖父贺廷璧，就响应太平军的号召，利用会党率领农民攻占县城，杀死县令，劫富济贫。到民国初年，在以“开国将士”著称的同盟会员谷状猷的影响下，桑植的哥老会以洪家关谷绩廷、贺民英和樵子湾邓仁山、谷大姐两对夫妇为代表，收集民间散枪，组织民团武装，进行反对地方封建势力的斗争。所以，对哥老会和它的成员不作政治的阶级的分析，只从形式上看问题，是不恰当的。

另外，在洪门会党中凤头大姐这个称号，也有一番来历。相传郑成功的侄媳郭玉英和侄女郑玉兰，在少林寺刺死混入会党中的叛徒，为会党建立了功勋。为纪念她们二人，在外八堂的顺序上空留四、七两个排位。第四排称金凤四姊，第七排称银凤七妹。桑植会党中的凤头大姐不只贺英一人，在湘鄂边斗争初期曾经支援红军、受人称道的樵子湾谷大姐，也是一位凤头大姐。所以，单凭会党中某一称号断定为封建代表，也是缺乏根据的。

有人说贺英“勾结他的丈夫谷绩廷”，为了“削弱贺龙势力”，曾“把父亲给了结了”。这种说法更是谣言。一九二〇年五月，贺英的父亲贺士道为了支持贺龙扩大武装，带着幼子贺文掌去澧州购买枪弹，途中被谷膏如勾结土匪拦路凶杀。这本来是一件使贺英、贺龙姐弟极为痛心的事，可是，却有人在十年内乱中，以讹传讹，诬陷贺龙姐弟，说什么：“贺龙过去有意投靠军阀王子彬，王对他不信任，就把他父亲和弟弟送去当人质。……贺英和他的丈夫谷绩廷知道此事，就商量好，派出二三百人借机削弱贺龙势力，……就把父亲给了结了。”事实早已查明，拦路抢劫杀害贺士道父子的策划者是谷膏如，凶手是白文忠，与贺英夫妇无关。当年与贺士道同行的商人金慕儒一九八〇年十二月证明：“贺士道被杀的那次，我同他一路，凶手是白文忠，也叫白家厚，他是谷家的外甥。贺士道在三人潭河坝边被砍死，贺文掌被抓去蒸死，还有个贺志卿被赶得吐了血。凶手中谷家外甥白文忠。香姑以后才知道这件事。”贺龙同志自己曾经说过：“一九一九年我当团长，这个谷膏如本来是同我一块到慈利搞枪的，因为他被捕了，失掉了联系，被放出来以后，又没有担任部队什么职务，对我怀恨在心，指使神兵烧了我家的房子，并把我父亲和弟弟杀了。”由此可见，所谓“贺英勾结丈夫把父亲给了结了”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还有人说，贺英“接替”丈夫“充任”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的“右翼支队司令”。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据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八月九日湖南《大公报》明确记载：“湘西军队，……兵力共二十余营，分左右两翼。左翼司令原属赵镇南，后改任田镇藩，右翼司令刘叙彝，后改任张云龙。”另外，陈渠珍的参谋长王尚质（解放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证实：贺英的丈夫谷绩廷当过“澧州第二游击支队司令”，从来没有当过陈渠珍的右翼支队司令。当地民众所周知，谷绩廷就是被陈渠珍的右翼司令张云龙指使一个姓满的连长刺杀的。所以，贺英根本不存在“接替”这个职务的问题。

二、贺英在大革命时期的表现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英受党和农民运动的影响，思想上倾向革命。她曾三次往返于贺龙同志的部队，学习经验，购置枪弹。在北伐军进军两湖的鼓舞下，她带领民军同地方反动势力不断进行斗争。

有人认为，这时的贺英凭借着贺龙同志“任九澧镇守使”，“在湘西北的特殊地位”，已经“转化为旧社会的统治者”，成了“清乡司令”，即由除暴安良变成鱼肉百姓了。是不是真的如此呢？从大量事实来看，不是这样。

首先要指出，贺龙同志当澧州镇守使与众不同，他上任以后除害灭暴，赈济饥民、恢复贫民工厂、声援“五卅”惨案受难同胞，半年之内为当地群众办了很多好事，被人民称颂为“九澧的父母官”，贺英从贺龙这种“特殊地位”中受到的影响是进步的思想影响。贺龙一九二五年四月任澧州镇守使，十月即被赵恒惕撤职，并受到湘军几个师兵力的围攻。湘军叶开鑫部占领桑植，四处搜剿，企图捣毁“贺龙的巢穴”。贺龙同志率部转移黔东，贺英及贺龙部下的团长贺连元退居桑植内半县，以“后方留守司令”的名义，同湘军坚持艰苦的斗争，一直处于被优势敌人追击、围剿的地位。一九二六年夏，贺龙同志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由贵州铜仁开始北伐，分左右两翼进军湖南。左翼由贺龙和贺敦武指挥，经沅水直逼常德，右翼由王操如和贺锦斋指挥，经澧水直捣澧州。这时，贺英的处境有了变化，她扩充到两营人枪。这年春、夏之交，联络本县民军文南甫、李云清、刘玉阶（后均参加我军，任营长、团长等职）等部进占桑植城，赶跑了伪县长马策，驱逐了驻军团长肖善堂，接着桑植城门大开，欢迎“贺司令官”进城。贺英进城后，发动百姓公推县长，一度控制了桑植半个县；严格约束部队，纪律比较严明。解放前曾任桑植县参议长的老中医钟古轩回忆说：“香姑进城，维持社会秩序很好，百姓欢迎。她的部下一个姓艾的营长喜欢到女子学校跑，香姑制止说：‘不准去，再去杀你的头！’”由于军纪严明，桑植各界人士送给贺英“万名伞”，每个丝绸飘带上都写满了人名。

关于贺英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后在汉口是否有过“国民党左派靠不住”的见解，这是近一个时期有争论的问题。据我们了解，这件事是贺龙同志亲口回忆的。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贺龙同志在东交民巷家中，接见廖汉生、向黑樱、向轩、刘伍等同志，向他们讲述贺英的历史事迹时说：“在汉口，她就告诉我：‘你靠那些国民党左派靠不住！’所以她就买枪，还向我大姑娘要私房钱去买。”接着又说“当时我看她搞武装很危险，很吃力，是我写信叫她到武汉的。”又说：“贺英思想的变化，是从农民运动中受到启发的。以后，她受了我的影响，有革命的英雄主义思想。”当年跟随贺英往返武汉的向黑樱同志一九八一年回忆说：“在汉口，有次贺老总打牌赢了钱，大姨妈（指贺英）叫我也去拿钱，放在箱子里好买枪。”向黑樱还说：“一九二七年贺老总过生日，大姨妈给他敬酒。参加生日的军官们也逗我喝酒，我年小不懂事，醉了，贺老总叫人把我放在水缸里。以后，武汉形势紧张，大姨妈带着几皮箱枪支走了。”1928年，向黑樱经桑植去上海。他回忆说：“在上海我听贺金莲讲，贺老总从香港到上海后，她曾转告大姨妈的口信说：‘大姑带信，要你还搞武装！’”当年跟随贺英往返武汉的前贺部副官贺志卿之妻金敬姑一九六二年回忆说：“我与大姐同去汉口，头年秋到，在汉口住半年时间，第二年古历三月回来，路上大姐带有几皮箱枪支。去时在长沙住过几天，回时在常德停过。”向黑樱和金敬姑的回忆，为贺龙

同志的回忆作了旁证和补充。

不是共产党员的贺英当时有这种政治见解是不是一件不好理解的怪事呢？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加以考查，就会明白是合乎情理的。贺英有多年掌握武装的实践经验，她懂得枪杆子的重要。贺家祖辈受官府欺压，历来对上层统治阶级有一种不信任的情绪。贺英的堂曾祖父贺廷璧是清代的武举，太平天国年间发动桑植农民起义，后来身负重伤，被俘问斩。他作战时用过的大刀和宝剑解放后还保存在贺族后代手中。贺英的祖父贺良仕，精通武艺，也是反抗满清的生员。贺英的父亲贺士道，同样是一个仇恨官府、不肯屈服的人。一九一六年湖南水灾，民不聊生，贺士道带着年刚十岁的贺龙进城赈灾，反动官府派出堂勇任意抽打赈灾的农民，贺士道站出来讲公道话，堂勇不但不听，反而用鞭子向他抽来，打在贺龙身上，贺士道夺过鞭子打得堂勇喊爹叫娘，为此事贺士道被关进牢房。贺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自幼仇恨和鄙视官府，对汪精卫等代表资产阶级的官僚政客不肯轻易相信，又有什么好奇怪呢！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后，虽然武汉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内的革命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先后发表声明，撤销蒋介石在党内的领导职务，开除党籍，并下令通缉他，可是，在蒋介石伙同各地军阀对武汉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隐藏在武汉政府内部的反动分子也在加紧策划反革命叛变，革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仅发生在贺龙姐弟身边，使他们有所察觉的，就有以下事件：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派他的秘书长李仲公去四川、贵州布置反共联蒋，策动西南对武汉出兵，二月十五日李仲公到达汉口，在日租界刘湘办事处大摆宴席，专请川、黔系部队在汉将领，到会人员众多，席间还有汉口名票清唱，好不热闹。贺龙同志亦被邀前往，当时就感到气氛不对，知道李是“有任务来作活动的”。在这件事前不久，即发现武汉有人散发蒋介石反共、反汉演说的小册子。四月中旬，贺龙同志部队中的反动分子蠢蠢欲动，参谋长陈图南（国民党员）以策动士兵闹饷的方式，企图加害于贺龙，混乱中有人向贺开枪未中，事后陈图南被贺龙处决等等。从这些事件中，贺龙和贺英察觉到“武汉形势紧张”，予感到国民党左派可能靠不住，是完全在情理之中、很好理解的。难道非得等到五月汪精卫集团发出公开拥护厂主、商人利益和反对工人、店员的宣言，发出庇护地主，诬蔑农民协会的通告，把湖北黄冈和黄陂两个最大的县农民协会解散，才允许人们有所反映吗？说杰出的共产党员蔡和森同志六月二十五日才看出国民党左派动摇，这不是事实。五月份，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就发来了“紧急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改变国民党领导机关的成分；立即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蔡和森同志给中央写来的信，是建议中央和军委“检查自己的势力，作一军事计划”，以枪杆子对付即将发生的事变，而不是刚刚看出国民党左派靠不住。

一九二七年古历三月，贺英带着在武汉买的枪支返乡，途经长沙时，从经济上援助了共产党员朱孔华；路过常德市，又根据该地农协主席陈昌厚的要求，送给了他们一些枪支。这两件事都是确凿的。后一件，当年常德农协负责人之一许和钧和后来与陈昌厚一起工作的谷志标同志能够证实。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许和钧（解放后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在一九六一年写的《记湘西女英雄贺英》一文中说：“……后来贺将军在北伐时期……驻防

武汉、鄂城一带，香大姐又去贺将军处要钱购买一批枪支，虽然经过常德时被常德农协陈昌厚同志要去了部分枪支，以加强农民自卫军的武力，但也还剩余大部分，……。”谷志标同志（现为四川省人大副主任）一九八一年回忆说：“一九二九年夏，陈昌厚同志任桑植县农民协会主席，我在洪家关区农协工作，他曾对我说：他原在常德县当农协主席，一九二七年贺英从武汉回桑植路过常德，经农民自卫军检查，发现带有一批短枪。当时他不认识贺英，接触后才知道是贺龙同志的姐姐，他提出想要几支短枪，贺英就给了他。这是陈昌厚亲口对我讲的。”朱孔华原名朱茨棠，桑植县朱家坪人，共产党员，常德师范生，一九二六年曾领导学生运动，后去长沙做宣传工作。朱、贺两家有远房亲戚关系，贺英、贺龙与朱孔华早就相识。从经济上援助朱孔华一事，是贺英亲口对廖汉生同志说的。“马日事变”后，朱去武汉参加贺龙同志的部队，南昌起义后回常德途中被捕，英勇就义。一九二八年贺龙同志回桑植后，曾对朱孔华的父亲朱仁甫说：“你养了个好儿，他的血没有白流。”

三、一九二八年党派贺龙、周逸群等同志回湘西后，贺英同志做了些什么？

一九二八年春节过后，贺龙、周逸群等同志回湘鄂西发展革命武装，贺英同志满腔热忱地献出了自己掌握的人枪，帮助党的湘西北特委迅速拉起了队伍，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从一九二八年春到一九三三年夏，在贺龙等同志转战湘鄂川黔几经挫折的艰苦岁月里，贺英同志一直在湘鄂边党的领导下，带领武装，依靠群众，坚守后方，掩护伤员，并从物资上和精神上给部队以很大的支援，直至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前红三军政委（后为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同志在延安时说过：“（贺龙）他的姐姐贺英是个指挥员，亲自率领战士作战，我是认识她的。一九三三年，她在湖北鹤峰县作战时牺牲。”

贺英同志所做的工作主要有：

（一）热情支持并率部参加工农革命军

贺龙在回乡途中，族人提前送信给贺英，贺英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初八深夜在泉峪贺五姑家中接到来信。次日清晨，即带四名警卫（戴文清、戴文成、黄月之、谷伏玉）从泉峪赶回洪家关，等候贺龙和周逸群同志到来（以上是谷伏玉一九六二年口述，本人现住鹤峰县城）。在迎接贺、周等同志到来时，“贺英等贺氏姐妹预先就在新屋前的永安桥凝目迎接。中午时分，远远看见体格魁梧的贺龙同志等十余人，穿着便衣，飘然而至。大姐带着我们迎上去，互相交谈着，一直走进新屋。”（以上是贺敦武的爱人翁淑馨的回忆，见《鳞爪漫记——回忆周逸群同志》）。贺族封建势力反对贺龙“戴红帽子”，贺龙同志“把周逸群叫来跟他们讲道理”，“贺英支持贺龙唱红。”（以上是肖银银、朱津生一九六二年口述）当贺龙同志动员亲戚朋友“都跟我干革命”时，在场的翁淑馨回忆说：“贺龙同志的话音一落，大姐贺英当即表示：‘我贺英支持你的人枪，祝你革命成功！’”（见《鳞爪漫记——回忆周逸群同志》）根据军委指示组成的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经过两年调查，“蒐了党的有关文件，访问了有关的老同志，进行了实地调查，并查阅了敌伪资料，经过反复的研究和修改”编写而成的《红二方面军战史》（初稿）中，明确记载：“到了三月下旬，湘西北特委由贺龙同志出面在桑植联络土著武装已有王炳南、刘玉阶、李云清、钟慎吾、谷志龙等十数支，及贺英同志领导

的武装，总数达三千余人，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红二军团史略》中记载，贺龙同志利用亲属关系召集的一千余人中，“有贺民英、贺炳南、谷志龙、李云清、刘子维等统归建制，内部派别关系极其复杂。加以整理后改编为两个团（第一团贺桂如）及三个司令两个支队。”一九六一年贺龙同志在《湘鄂西初期革命斗争》一文中也说：“三月底，湘鄂边前委组织起来的武装已有三千人。这支队伍的来源可分为：一利用亲属关系召集的，其中有贺英等部一千余人；二利用旧的隶属关系召集的，其中有王炳南等部也是一千余人。”

贺英同志参加工农革命军以后，多次要求加入我党。一九二八年，贺英同志见到贺龙、周逸群同志时，就提出了入党的请求。一九六二年，贺龙同志回忆那次谈话的情景时说：“我一回来就告诉大姐：‘现在我可是共产党员了’，她说：‘你是共产党就共产党嘛，我也要算是共产党吧？’我说：‘那不行，还得通过组织讨论，上级批准。’”贺龙同志还回忆说：“贺英入党问题，周逸群、关向应等同志都给她谈过，说：‘你现在不入党，比入党好做工作。’”一九三三年元月，红三军转移到湘鄂边时，贺龙和关向应同志专程到鹤峰毛坝李家湾看望贺英；不久，我军退出桑植，重返鹤峰时，贺英同志又在毛坝与贺龙、关向应同志相会。在这两次接触中，贺英都提出了入党的请求。

由此可见，贺英同志参加了革命行列，是工农革命军的成员，思想比较进步；说她“没有参加革命行列”，不是革命队伍上的人，是违背历史，不能服人的。

（二）坚守后方，掩护眷属、伤员

一九二八年四月上旬，国民党四十三军乘我工农革命军立足未稳之机，派龙毓仁旅进攻桑植县城和洪家关，反共头目陈策勋在桑植就任“桑植、鹤峰联防剿匪总指挥”，扬言“克日即率两县团防大举围剿贺龙……期绝匪根。”我军由于刚刚组建，战斗力不强，洪家关和苦竹坪两次战斗未能将敌人击退，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住在洪家关的我军眷属东逃西散，四处躲藏。这时，贺英率部退据长坪贺月姑家中，掩护眷属子女。当敌人围剿长坪时，她又带着眷属子女向覃湾转移，使眷属子女未遭杀害。（以上是洪家关贺士竹、贺崇姑、戴桂香一九七八年集体回忆）。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央指示湘西特委分散组织游击队，以发动群众。七月初，湘西特委陈协平、汪毅夫、张一鸣等同志来到桑植，工农革命军在罗峪编为第四军，贺龙同志奉命东下石门作战。这时，敌军陈渠珍的姜、余两团分三路追剿我军。贺英的队伍游击在覃湾一带，在敌人的围剿下，她和胞妹满姑隔绝冲散，满姑被捕。贺龙同志出征前曾托王华正给贺英捎信：“四老表，你跟大姐讲，我们这次可能过江，要她好好等着，一定有个天亮之日。”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贺满姑在县城被余团长杀害。同一天，刘子维（叛徒）勾结陈策勋等匪军数百人，连续两天三次围剿贺英。她在敌众我寡，随身警卫龚莲香战死，自己遍体鳞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同敌人喊话打仗。后因身负枪伤，经过艰苦跋涉，才转移到鹤峰堰垭一带游击（以上是王华正徐和尚等一九六二年集体回忆）。一九二八年十月，贺英在堰垭地区听到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失败的消息，四出游击，寻找我军行踪。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和十一月五日《湖南大公报》载：“贺香姑身穿男衫，女扮男装”，“约计二、三百人，连枪居多，逃入梅坪。”一九二九年夏，红四军从鹤峰打回桑植，把湘鄂边根据地连成一片，

这时贺英仍在积极工作。一九二九年七月七日《湖南大公报》载：“贺龙于本月元日由鹤峰窜据桑植，其党羽有……伪妇女指挥贺香姑……。”以后，贺英在四门岩宝宝洞收养过我军伤员几十名，为伤员请医找药，积极护理。现任沈阳军区顾问的吴子杰同志，当年就在贺英的洞里养过伤。一九六二年四门岩车溪湖刘光达回忆说：“一次香大姐叫我背伤兵送去宝宝洞，我进洞一看，有几十个人。香大姐把杨云阶请来给伤兵取子弹。”四门岩王家村朱寿斋回忆：“香大姐在宝宝洞为伤员操心，我的女人姓谷，主动给大姐送点米吃。我说，‘大姐，我们宁肯不吃都要给你送点粮食。’大姐讲：‘我不是偷懒的人，粮食种了好多，大米送给伤兵吃。’”一九三一年贺英在四门岩割耳台开荒种地，掩护特委机关。前鹤峰苏维埃主席伍伯显回忆说：“一九三一年冬，红军再下洪湖后，留独立团王炳南守后方，我当苏维埃主席，敌罗效之经常骚扰。我们在鹤峰站不住脚，香大姐骑骡子引我们特委机关上四门岩。她的队伍在那里种地，香大姐还引着看她们种的包谷。”割耳台王炳姐回忆：“香大姐在这里开荒种地，做了两届阳春，收的包谷尺把长，粮食把仓都压垮了。”

一九三二年秋，我湘鄂边苏区反围剿失利，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向洪湖苏区转移。留在苏区的少数地方干部和党员，分散地进行了一些零星斗争，但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都先后失败了。最后，只剩下贺英同志率领的一支二十余人的武装，依靠群众的支持，继续坚持了将近半年的艰险斗争，直至一九三三年元月和贺龙率领的红三军胜利会师。

以上材料清楚地表明，贺英同志参加革命行列以后，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她的事迹在人民群众中流传。而说她只是“把自己的枪分给贺龙同志一部分”，尔后说“长期叭壕”，“隐居桑植内半县”，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建议整顿队伍，雪里送炭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革命军主力奔袭澧县大堰垭、王家厂一带的反动团防和税务机关后，遭敌第十四军李云杰部袭击，黄鳌同志牺牲。我军退到泥沙，又被李云杰部和叛徒罗效之部袭击，贺锦斋同志牺牲。革命军大部溃散，全军仅剩二百余人，由贺龙同志率领西撤，九月底转至鹤峰堰垭一带。这时，桑植一带已被反动团防占领，革命军没有后方，在人员补充和物资供应方面发生了极大困难。时近冬初，部队在高山地区还穿着单衣，缺乏粮食，没有医药，于是又有一部分不坚定分子逃走，部队再减至百余人。在我军处境十分艰难的时候，贺英同志送来了一批棉花、布匹、弹药和银元，及时支援了革命军，鼓舞了士气。她向前委提出了以党、团员为核心建立基本部队的建议，前委根据几次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采纳了贺英同志的建议，彻底整顿部队；遣散老弱和动机不纯分子，发展党、团组织，加强基层领导骨干和严格管理教育。经过整顿，全军虽然只剩九十一人，七十二支枪，但这些人觉悟较高，立场坚定，部队的质量反而提高了，为此后红四军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有人说历史上没有贺英建议整顿队伍这件事，并认为，如承认这段历史无异于把贺英吹捧得高出我党前委一筹。经考证，这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

贺英建议整顿队伍一事，有着多方面的根据。首先是贺龙同志本人有不止一次的回忆文章和谈话。一九六二年，贺龙同志在《湘鄂西初期革命斗争》一文中回忆说，“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们只剩一百多人了。这是湘鄂西初期革命斗争的第三次挫折。正当工农革命军处境端不利的时候，贺英同志忽然

来了。她原是封建武装，但在大革命时，曾受到党的影响，思想有了转变。在我们离开桑植洪家关以后，她就一直在湘鄂边地区依靠群众坚持斗争。虽然我长时间没有和她联系，但是她却在时时关怀着我们，很了解我们的情况。在她知道工农革命军陷入困境的时候，就带着一批洋布、子弹、银元，向我们伸出了援助的手。这真是雪里送炭。战士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她的帮助。……临走，贺英同志又嘱咐我们说：“部队里有党员，又有团员，应该好好整顿一下，有个中心。能组织一个班就组织一个班，能组织一个连就是一个连。队伍就要伍，不伍不行。”（《星火燎原》第一卷第一集第610页）。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贺龙同志在关于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三一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中又说：“石门垮后，比较苦，……脑子也清醒些，骄傲、个人英雄劲减少了。我姐姐的话，过去根本不听，现在也听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姐姐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三个月。共编九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廖卓然当排长，王炳南当大队长，也有了团员。”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贺龙同志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队伍从石门失败回来，大姐问：‘你们有好多CP，好多CY？’还说：‘队伍就要伍，要整理，要多流动，才能强大’。她送来的棉衣解决大问题。”其次，红二方面军战史中明确记载了这段历史。第三，苏区人民提供了有力的旁证。当年随贺英从桑植覃湾转移到鹤峰堰垭的王华正一九六二年回忆说：“我随香大姐古历九月中到堰垭。她打仗衣服破了，临时在庙里找了一件和尚衣穿着。一次在王二老家，听说，贺军长从石门垮台转来了，我去看，真的，认到贺子林。我调头去喊香大姐，和她一起见军长，在王二老家的包谷堆上坐下，香大姐哭，军长讲，人在就好办，我对军长讲了一遍情由，他们姐弟连讲不停。香大姐问军长西比、西外（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问队伍有多少？一阵阵，军长喊了一堆人来商量。我认得有廖卓然，他们讲起队伍上的好多事。”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认为，贺英建议整顿队伍是可靠的。当时，党的前委书记贺龙同志处在战斗失利和同周逸群同志失去联系的逆境之中，正在考虑如何重振旗鼓、坚持斗争的问题，贺英的建议启发了贺龙等同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并不贬低或否定党的前委的领导作用，前委采纳了贺英的建议，表明它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善于从群众中吸取营养，是有水平的。那种把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对立起来，认为肯定群众的智慧就等于把群众吹捧得高出党委的意见，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错误意见。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曾经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难道有谁认为这是把李鼎铭先生吹捧得高出党中央吗？抗日战争中冀中平原神出鬼没打击敌人的地道战，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广泛采用的坑道战，都是基层干部、战士在战争实践中发明创造的，并不是党的领导机关首先提出的，承认这些历史事实，无损于我们党的威望。党委领导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它能够把群众的聪明才智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而不是抹煞群众的作用显示自己高明。

四、为收编甘占元等部积极奔走，确有一定功劳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被四川军阀王陵基逼迫出川的政治土匪甘占元、覃伯卿、袁海卿、张轩等部共三千余人，两千余支枪，进入鹤峰地区。湘鄂边党曾及时地将这个情况报告红二军团。红二军团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

五里坪将其全部缴械，并从中抽选千余人补充部队，使我军于杨林市失利后稍获补充。在收编甘占元等部之前，贺英根据红二军团和湘鄂边党的安排，做了大量工作。据当年与贺英共同执行收编任务的谷伏玉、张月园、覃兰亭、徐立德等一九六二年回忆和在鹤峰实地调查，贺英主要做了八件事：派副官魏振清和能说会道的李占奎先去沙道沟与甘部接头，对甘部说：“不要扰百姓，鹤峰会餐、五里坪领饷。”叫廖汉生同志连夜给贺老总写信报告甘部情况，当时谷伏玉、向连生在桌边打油柴亮。在魏振清与甘部接头后，又派魏骑马到走马坪向贺龙军团长报信。安排区乡干部说：“要稳住它，不能惊动，来了杀猪，到城里买点好菜，以礼相待。”贺英亲自出面，带双枪警卫数人，在毛坝奇峰关，迎接甘占元。贺英给甘送烟土，叫李占奎陪甘抽大烟。贺英给甘部训话，大意是：“弟兄们辛苦了，贺军长在走马坪招你们的安，是喜事。你们的官职不动，粮饱照发，不要惊扰百姓，要改成好军队。路上的事不要操心，由我们安排。”诱敌入伏。贺英在随从保护下，陪同匪首甘占元等走了三天，第一天住鹤峰，第二天住南渡口，第三天到五里坪附近的南村。贺英驻碾房，待红二军团安排停当，才暗中离开。当年在贺龙同志身边工作的伍伯显同志认为，“一九三一年解决川军甘元等部队，贺英的作用很大。”伍伯显一九六二年回忆说：“收编甘占元是香大姐一大贡献。当时，我在四师当秘书，二军团在杨林寺败得惨，退到走马坪，又听说川军甘占元来了，以为是敌人夹攻，我军真危险啊！幸亏香大姐早已安抚了甘、覃队伍，以后一天晚上红二军团请他们吃酒，把甘、覃头目扣起。第二天一早，王炳南与陈协平带队伍去解决，把头子杀了十几个。人枪才得到补充。我记得二军团开会时，周小康还提醒贺老总：“香大姐还在那边？”原在张轩部下当兵的何以祥同志（现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在《走马坪收编》一文中，也证实了谷伏玉等人的回忆。他说：“一天，村外的大路上尘土飞扬，……马上骑的人，大都是女扮男装，斜挎盒子枪，个个精神抖擞，甚是威风。尤其中间那个，身着长衫，腰插两支盒子枪，看来格外威武。有人说，她就是湘西红军领袖贺龙同志总指挥的姐姐贺香姑。”看来，贺英同志深入虎穴执行收编任务是可信的。

研究和编写革命先烈的历史，是一项十分严肃的任务，必须严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而要尊重历史，不仅应当抱有好的主观愿望，还必须掌握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观点和方法。离开科学的观点、方法，尊重历史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纵观贺英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历史，我们认为，对这个人物是应当给予肯定的。一九六一年贺龙同志说过，“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证明王炳南、贺英、贺桂如以及后来的陈宗瑜等人，都是忠于革命事业的。在他们接受党的领导，站稳了革命立场之后，很快改变成为可以信赖的革命武装。”虽然贺英同志沾染了吸大烟的不良嗜好，但是，这同她对党和人民作出的积极贡献相比，不占主要地位。我们研究和书写贺英同志的历史，既要注意不能全盘肯定，拔高溢美；也要注意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夸大缺陷，抹杀功绩。从对贺英若干历史问题的考证中，我们体会到，一个人没有听到和见到的事，不等于是“不存在”的；主观推理、判断得出的结论，也不能代替严密的历史考证。就是某一位当时在场的人亲眼所见的事，有的也未必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红二军团收编政治土匪甘占元等部，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事例。有的同志看到的是收编工作的后一段的情况，有的同志回忆的是收编工作的前一段的情况，我们如果以为后

一段是某人亲眼所见而否定前一段，或者以为前一段是多数人的回忆而否定后一段，那就很容易以偏概全，歪曲历史真象。

最后，让我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名言来结束这篇考证：“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考证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批评指正。

贺龙同志谈贺英“她从小受穷，受压迫，出身是劳苦农民。“她比我大九岁多，比五姑（指贺龙同志的二姐——编者注）大一岁多点。“写贺英，要写出她农村妇女、劳动妇女的本质来。”（贺龙同志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同廖汉生等同志谈话记录）“贺英的思想变化，是从农民运动中受到启发的。以后，她受了我的影响，有革命的英雄主义思想。”（贺龙同志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同廖汉生等同志谈话记录）“当时（指一九二六年秋——编者注）我看她搞武装很吃力，很危险，是我写信叫她到武汉去的。“在汉口（一九二七年春——编者注），她就告诉我：‘你靠那些国民党左派靠不住！’她就买枪，向我大姑娘（指贺金莲——编者注）要钱去买。”（贺龙同志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同廖汉生等同志谈话记录）“她（指贺英——编者注）原是封建武装，但在大革命时，曾受到党的影响，思想有了转变。在我离开了桑植洪家关以后，她就一直在湘鄂交界地区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证明王炳南、贺英、贺贵[桂]如以及后来的陈宗瑜等人，都是忠于革命事业的。在他们接受了党的领导，站稳了革命立场之后，很快改变成为可以信赖的革命武装。”（贺龙《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载《星火燎原》第一卷第一集下册 610 页）“三月底，湘鄂边前委组织起来的武装已有三千人。这支武装的来源，可分为：一利用亲族关系召集的，其中有贺英等部共一千余人；二利用隶属关系召集的，其中有王炳南等部也是一千余人。”（贺龙《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载《星火燎原》第一卷第一集下册第 610 页）“我一九二八年回来，收了几多队伍，只有大姐、刘玉阶两股靠得住。”“我一回来，就告诉大姐：‘现在我可是共产党员了。’她说：你参加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嘛，我也算是共产党吧？’我说：‘那不行，还得通过组织讨论，上级批准。’“贺英的入党问题，周逸群、关向应等都给她谈过。说：‘你现在不入党，比入党工作好办些。’”（贺龙同志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同廖汉生等同志谈话记录）

“一九二八年底，我们只剩下一百多人了。这是湘鄂西初期革命斗争的第三次挫折。

“正当工农革命军处境极端不利的时候，贺英同志忽然来了。……虽然我长时间没有与她联系，但是她却在时时关怀着我们，很了解我们的情况。在她知道工农革命军陷入困难地时候，就带着一批洋布、棉花、子弹和银元，向我们伸出了援助的手。这真是雪里送炭。战士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她的帮助。”

“因为当时环境不好，我们穿上棉衣以后，就打算离开本地。临走，贺英同志又嘱咐我们说：‘部队里有党员，又有团员，应该好好整顿一下，有个中心。能组织一个班就一个班，能组织一个连就一个连。队伍就是要伍，不伍不行。’”

“我把队伍整顿了一下，把老弱残废疏散了一些。全军只剩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条枪。人数虽然较过去散失很多，但剩下的都是精华。……”

（贺龙《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载《星火燎原》第一卷第一集下册

第 610 页)

“（一九二八年秋）石门垮后比较苦，……脑子也清醒些，骄傲个人英雄劲也减少了。我姐姐的话，过去根本不听，现在也听了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一块找姐姐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三个月，共九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廖卓然当排长，王炳南当大队长，也有了团员。”

（贺龙同志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关于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三一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与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的谈话记录稿》）

“我们队伍从石门失败回来，大姐问：“你们有好多 CP，好多 CY？”还说：“队伍就是要伍，要整顿，要多流动，才能强大。”她给队伍送来棉衣，解决大问题。”

（贺龙同志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同廖汉生等同志谈话记录）

“一九三一年三月，红四军根据中央指示和鄂西特委的决议，东下与红六军会师。留下部分主力骨干和一部分游击队，坚持湘鄂边的斗争。”

（贺龙《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载《星火燎原》第一卷第一集下册第 610 页）

“走前把桑鹤工作交给汪毅夫代理前委，后来周小康也由鄂西特委派来。当时与鄂西关系多，与湘西关系少。鹤峰由我姐姐负责，桑植由贺文渊管。鹤峰有中心县委总管桑（植）、鹤（峰）、长（阳）、五（峰）、宣恩。”

（贺龙同志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关于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三一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与红二方面军战中编委会的谈话记录稿》）

“后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编者），二军团进入鹤峰走马坪，接我姐姐来信，说甘占元来此。我们即在五里坪包围他们，解决了甘占元部队，稍稍补充了一下。”

（贺龙同志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关于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三一年湘鄂西武装斗争与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的谈话记录稿》）附件二

内务部优抚局关于贺香姑、段德昌

两烈士的职级问题的复函

（62）内优局字第 36 号湖北省鹤峰县人民委员会：

来电悉。关于贺香姑、段德昌两烈士生前的职级问题，经向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和贺龙副总理办公室了解：贺香姑名叫贺民英，那时曾担任一个游击地区的游击队的司令，不是正规部队，职级可大可小，大体上可以说相当于师级职务；段德昌则是红六军的副军长，是军级职务。并经查 1958 年洪湖县委编写的洪湖革命史一书第六十七页所载有关段德昌的情况，也与此相符。以上情况，特告供参考。如果你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有关段、贺两烈士的详细事迹时，可径与有关方面联系为荷。

此复

内务部优抚局（印）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宋良由、高如松谈鄂北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二年革命斗争情况*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六月六日)

一、学生运动：

高如松谈：襄阳第二师学生看《新青年》、《响导》、《中国青年》(党团杂志)及《前锋》的人很多，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少数同志研究了中國革命的问题。肖楚女二次来二师当教员，宣传了社会主义、苏联是个什么样性质的国家。肖还起草了“二师宣言”拥护苏联取消在华特权以及民族民主革命问题(这是一九二四年)，详细内容记不清了。以前在学生中认为我们是个落后的民族，经宣传受到了教育，再不象以前那样糊涂了。后(未见本人)据方复生给我讲：学生对自个前途，学生运动有较明确的认识，以及什么是国际共产主义、民族民主革命、大革命即将来临等问题。肖楚女在二师学生宣传工作有很大影响(地主出身的学生因受到教育一部分也投靠革命这一边)，但在当时组织工作未跟上，批评还不能展开，部分学生的高傲思想仍纠于身，如想当领袖，也不愿急于参加党团组织，不愿在本地作艰苦工作。愿在外面工作，对鄂北学生有影响，以后情况我离开了，不清楚了。

宋良由谈：“五四”运动后肖楚女在二师作了积极的宣传工作，孙孝承等掀起了第二师范学生运动。当时反对校长单赤霞贪污学费(单是封建地主、湖北的政客、省议员)，学生提出“校务公开”、“经济公开”(二师学潮是接受了肖楚女的宣传搞起来的)，思想进步的学生接受肖的宣传，二四年春肖楚女组织学生散发传单，主张外蒙古独立。地方反动势力说肖是危险分子，把他赶走了。后来领导学潮的是方复生、孙孝承、殷乾山、李抱一、刘子固、姚昭德，要求撤换单赤霞，没有多久，单赤霞开除了一批学生，引起了学生的不满，被开除的组织离校团，与在校学生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学潮闹到三五年。

二四年陆逢九，才从北大毕业，十中学生们认为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比原来老拔贡昏庸老朽的刘元承校长进步得多，而且陆也答应“组织校委会”提出“校务公开、经济公开”(这个组织没有组织起来，但有事情可以商量)。因此在第十中学掀起了打倒刘元承欢迎陆逢九的学潮，结果胜利了。由于二师的学潮不宜于再闹下去，把二师闹学潮的学生转到十中。我们在《中国青年》看到恽代英写的“为什么要反对基督教”的文章。鸿文中学学生掀起了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他们捣毁了学校，这批学生的领袖董兴国、李金铭、方纪刚也转入了第十中学。这一期间襄阳学生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传统并配合全国学潮起了呼应作用。

“五卅”惨案消息传来时，在襄樊学生中就很快传开了，很快的发动了一次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学联合会决定，作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屠杀工人的宣传工作，抵制仇货，与帝国主义暂行经济绝交，募捐支援上海广州工人罢工，组织“五卅”运动后援会，学生冒着炎热沿街宣传，有的声泪俱下，对市民群众影响很深，募捐成绩很好，汇上海总工会数千余元，在查封仇货上，学生们不怕炎热，不怕风、雨，一有消息就主动去查，能在数十里外把货船拖到襄阳，封存起来，基本把从汉口运往襄樊、老河口，安康，汉中的货物都封存在襄阳老龙堤上，货物有洋油十万多箱，烟、糖等大批仇货，给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买办资本以严重打击。在暑假期间为了扩大“五卅”运动的影响，学生又组织了文工团到光化太平店仙人渡一带演出，收到很好的效

果。正当以学生为主体的“五卅”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樊城商会主席杨凌堂等和一部分改良主义的中学教师认为学生们闹的有些过火，起来组织稳进救国会，并创办了刊物名叫《稳进》，宣传他们的改良主义，反对学生“过激”行动，学联会就办了一个名叫《醒众》的刊物与他们针锋相对，结果把《稳进》打垮了。

查封的货物半年之久无人看管，亦无人偷窃，这说明群众爱国的思想很高，影响很大。到十二月湖北省学联召开会议，我同燕日章（燕明轩）同志去开会，到武昌看见李子芬（青年团负责人）、黄敬、包泽英（湖北学联主席），接了头，汇报了襄樊学生运动查封货物的情况。（湖北地委讲襄阳募捐最多），这批钱一部分支援了上海工人罢工，一部分作为学联活动费。会后，黄、包同我一起到襄阳询问学联总务贾光鼎，据贾光鼎说币制变动，官钱局倒闭，故商人所缴之罚款落了空，第三天开学联会，传达省学联代表大会会议精神，研究仇货罚款的处理问题，主席包泽英当场被捕，引起学生的愤怒，于是学生们联合起来打到县政府，打伤了县长。并对总务主任贾光鼎十分仇恨。在这以前，我们所搞到的一批罚款，十中校长想用此款办图书馆，我们不同意，我们主张用一部分办农民夜校，另一部分支援工人运动。因此就掀起了反陆反贾的第二次学潮。

十中第二次学潮是反对贾光鼎（系大地主）撤换陆逵九。二六年春十八名学生被开除后，二、三月没有走。后应届毕业生毕业了、放暑假时学生都回家了。因此学潮未得胜利的结果。对襄阳学运有消极作用。于是对学潮进行了一次总结，认为光闹反对校长的学潮，绝非好办法，而没有发展组织，广泛发动群众，争取中间分子，造成了基础不强，运动后劲不大。同时还有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对不同意见闹学潮者进行挖苦讽刺，影响团结多数、孤立反动分子的政策，表年团亦有关门倾向。当学潮产生了“左”的偏向时，我们与谢远定研究，打进二中，强迫陈正谟收回被开除的学生，再不继续闹下去。应将力量打进二师和十中去以便进行组织教育群众的工作。但陈正谟不接受，虽然打进二师，陈离开二师，学生会伙食，所以退出转入第十中学（学联同意）。此时，方复生到黄埔军校学习去了，二师学潮告一结束。

二四年十中拥护陆云龙当校长时，鄂北留宁同乡会，拥护谢远定到襄阳，那时因为陆的校长职务已经公布，所以没有欢迎谢来。事后得知谢系共产党员，始向陆提聘谢到校任教，谢同意了。谢远定于二五年暑假到了十中。同年秋开学，在十中讲社会科学是比较公开的（内容记不清了），在第二师范也兼讲了课。在九、十月间谢远定介绍方复生、高如松、宋良由同时入团，继发展董兴国、李金铭、傅良驹、崔大权、孙孝承、张明汉、熊玉珩、朱启林、宋正德、张国威等，冬成立党团特支，谢远定为党团特支书记。在襄阳的党员：董兴国、李金铭、方复生、宋良由、高如松，建党严格故在教师中未发展党员。

国民党发展比较快，大部分学生、教员有董子佩、潘建伯、潘惠庵等。当时国民党员约五百余。有二师、十中、鸿文、鄂北、农业等中学，那时襄阳军阀张联升对学生运动采取不干涉态度，他以收鸦片税为主，与地方豪绅勾结，他控制着甘一县，地方豪绅给他送钱，他有兵两个旅，张很软弱，只能向强者进贡而不敢打仗。

二、农民运动

一九二五年冬，程克纯在枣阳隆兴寺组织联庄会，提出：抗捐，反对苛

捐杂税，反对民团，反土匪等口号，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得到小绅士拥护，所以枣阳成为根据地是有根据的，二三十个村镇联合起来得到群众的拥护。程留法学生是在本地有相当威信，在他所召集的第一次联庄代表会，主要是农民学生，也有三个小绅士，保董参加，比如一个姓勾的保董是党员，勾伯昆的亲属在以前曾反对过隆兴寺团防的地亩捐，把团丁赶走了，这一带的大地主邱、沈二家独霸区政权，也为小地主绅士所不满，以一家族相结合的农村小绅士与农民们有同姓亲属关系，除维持其本身利益运用封建特权外，也不是每个小绅士都横行乡里，逼得农民不能生活下去。而他们与大地主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地位上存在着一定矛盾，程之揭起反团绅、反杂税的旗子，自然能取得他们的赞助和中立，农民参加农会，响应程之号召，大地主们对程也就不敢用民团力量来打击程，打击农会的活动，因而程获得了农民的信仰与拥护和小地主、富农们的同情与支持，打下了一定的社会活动基础。在一九二六年春，旧参议会选举时，程号召了几千上万农民占领了票箱，直接选举了程克纯和另一党员当选为县参议员，这是以农民群众为基础的取得小地主们支持反对大团绅的一个胜利。

程之当选为县参议员震动了全县大地主，告程为共产党，但还不敢对程采取武力行动，大地主曾有捉拿农民的个别现象，程以合法斗争为之申辩。二六年春，枣阳借[籍]在襄阳十中被开除的学生黄火青、黄民钦、黄显佑等回到枣阳，程克纯分配当小学教员，作农民运动；二十六年暑假在襄阳的枣阳籍学生傅良庄、王振三、张木千、惠浩如、惠亚东、王明昭、王若怀、王恩平等回到枣阳，参加了枣阳的工作；另外枣阳有一所白水中学，有二十余所小学，小知识分子很多，大部分相继参加了革命。枣阳程克纯在二五年即在隆兴寺、蔡阳铺及其周围群众中打下了革命工作的基础，又有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作]开展工作的骨干，在鄂北来说，枣阳革命的主观力量，在大革命前夜是最好的一县。

一九二六年，李子芬到襄阳组织青年团鄂北地委，高如松为书记，宋良由、姚建德、朱启林、左家德为委员（宋二五年去武昌，党还是支部，属上海中央），二六年四月间谢远定走了，特支书记李抱一去武昌开会未回，二七年春，姚建德为襄阳团委书记，二六年冬湖北省委改为区委，张太雷为书记，程[陈]潭秋为组织部长（？），襄阳特支改为县委，书记马适庵，枣阳县委书记程克纯，襄阳、竹筱铺、张家湾、薛家集、王家集当时均为支部，那时参加党的学生多，农民少，还有手工业工人、店员。襄阳那时的党员不超过百余人，团员二七年春发展不到二百人。

二六年夏，党团员有的去大学、去黄埔，有的去教学。宋良由回均县，左觉龙回光化，竹山、谷城、房县都有青年团，有郧阳毛邦诰、燕若痴、詹伦承、毛邦漠、燕同章等，均县有李龙、向光溢、李炳秦、叶明德、陈士钧、罗万鹏。二七年四月有党支部，齐蓝田、习白羽（二七年牺牲），宋奎卿（是宋之兄）、罗万鹏、郭文焕、白光禄，青年团有徐达（住农民讲习所，三一年均县独立营长，改为独立团为团长），陈士钧、孙联辉、孙联甲，店员李文久、张文浩、王锡君和上述向光溢等。

襄阳：

农民协会在二六年秋采取秘密方式，当时的省临时农协特派员潘剑自在竹筱铺一带活动，孙孝承在襄阳北乡薛家集当小学教员，办农民夜校，农会也有所发展，惟数量不大。二六年冬未二七年春间大规模的公开发展，以省

农协特派员王省、储玉珩、张明汉三人先后到襄后才开始的，当时号召减租减息打倒土豪劣绅，县农协曾召开过全县两次代表大会，作反土豪劣绅、打倒军阀并对国民革命军之宣传，而农民代表曾以身受地主之压迫剥削登台诉苦者很多，但仅于宣传未订出反对地主之实际活动办法与步骤，襄阳之樊镇附近群众以董兴国所领导之邓城地区农民展开了对地主李聘如之斗争，农民们想打死李聘如，这一带农民曾组织起来吃大户，这一斗争也未很好领导，张明汉在襄阳北乡吕堰驿活动与基督教工作人员陆天安组织农会，有所发展，曾以数千农民缴了大团绅张华堂民团数十支枪，张华堂被捆送县农协，农民们本想打死张华堂的（张华堂打土匪有名，曾作过靖国联军黎天才的连长），襄阳东乡之王家集王全芳兄弟们搞农会活动，数量不大，但地处襄阳、宜城边界，在当时王全芳兄弟们还敢于，以后王文景、王全成等叔侄们都参加襄枣宜苏运活动而牺牲了，襄阳东乡（接枣阳西乡）黄龙岗、赵玻兄弟们在那里搞农会活动，当时与襄阳党无直接联系。

总之，当时北伐军的影响以及农会的活动，农民都敢于起来，惟当时领导人员都高在城内，又受陈独秀之机会主义影响，不敢深入农民运动与斗争，未有接触过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当时湖北省党区委会曾明令，不要接受民团枪支，当时襄阳曾以合法派人接收薛集民团枪支，团总杨老么把枪拖走了，公开活动不久到三日廿八日住军张联升改换五色国旗，背叛武汉政府，领导人员都跑往武汉，农会就无形垮了。

大革命失败后，襄阳曾有竹筱铺之暴动准备，数次未能举行，该地在襄阳汽车道边，在汉水沿岸距襄阳仅卅里，土地分散，手工业相当发达，农民当时还无暴动要求，仅是主观地想在那里搞暴动，结果所在的秘密农会活动也受了影响。

襄阳北乡薛家集接近河南新野地区边陲，民性强悍，也有小股、大股土匪，这里农民中有些基础，薛斌（党员黄埔五期学生）他家能指挥民间枪支数十支，都是农民和小地主的，当时襄阳县委要把枪支集中到枣阳，数次无结果，只是与薛斌断绝了关系，另有党员李自修主梁信之（土匪）处当教练，但他还不能掌握住梁的武装，所以也未拖枪集中枣阳。原来在大革命前夜想在这里搞农运工作也就此中断了。

襄阳西南乡尹家集，靠南漳县境，有党员曾孟陶（知识分子，地主），在南漳城茨河暴动失败后，于一九二八年夏搞农民暴动，有数万农民杀了王家岗的大地主王家及犹家，犹家儿子作过张联升军阀的参军，也被杀了，犹家是曾的岳家，缴了民团数十支枪，后被周围地主率领团练（基本是农民，由保甲组织的，这一带防太平天国时，有这一类组织，有匪时随时招集农民，平日无经常之组织）打垮了，曾孟陶与其父亲作过襄阳六区团总，曾孟陶失败后流亡他乡。这一带是平原小土岗，无险可守，又距襄阳城四五十里，并在南漳县、谷城之间，在当时农民暴动起来搞革命割据，是颇有困难的，这一带民性强悍，有些民族大姓，犹家是当盗匪起家，南漳方面的大地主在这里的土地农民种了，些[一]向是完租很少，百余亩地仅几石粮食，这里在当时可作游击队革命活动是有很好的条件。

襄阳东乡黄龙岗，紧连枣阳西乡，在二八年夏，以党员赵英和朱育文（小学生，大地主）领导农民数百人。于日间缴了团总朱仲九的枪数十支，并当场把朱团总打死。当日正逢市集，街上照常营业。这样打击大团绅逐渐形成在抗粮、抗租、抗捐税基础上革命割据局面，是年秋冬间曾成立襄阳县苏维

埃政府。

均县：

一九二七年二月间就有了党支部。

一九二六年秋，均县成立青年团支部，宋良由同志为书记（陈士钧参加了省团的代表会以后，陈士钧为书记）。当时的活动：在城内搞了一个国民党区党部，在东乡小店搞了第二区党部（李龙负责）。此时由北京回来一批学生，有孟宪章、贾中元、许玉阶等，与当地小绅士结合组织了一个“均县促进会”，这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与土豪劣绅作了一些斗争，管押了王子勤。那时码头工人最感痛苦的是给县衙门、官绅无代价的抬轿、支公差，后工人组织起来反差役，开大会游行，反掉了公差陋规，组织了店员会，取消了杂务，增加了工资。二七年二月，国民党县党部成立后，在礻川开上万人的大会，农民提出不收烟税（农民情绪很高），在会上作了不交烟税的决定。后来又东乡组织农民协会时，当地的地主阻止，我们支持农民，将吴道彰押送城内，押入监狱，农协组织起来，提出减租减息。

北伐到武昌，均县已由国民党掌握了，均县那时滥发行纸币，币值贬低，物价膨胀，买空卖空，贪污风气盛行，农民一挑柴买不到半斤盐，农民、城市贫民都很痛苦，我们采取措施，禁绝了纸币，在群众中提高了威信。

湖北派到均县的司法委员刘谔，到职后大肆贪污，民愤很大。群众状纸很多，我们组织了一次万人群众大会，斗争了县司法委员，当场钉镣下监，此后群众的情绪更加高涨。我们的武装搞的较晚，为了搞到枪支，计划先在有群众基础的礻川乡搞黑明志枪，正这个时候张联升叛变，枪未闹到手。

一九二七年春，均县成立了党支部，书记宋良由，有党员九人。

高谈：二六年七、八月间，湖北省委派马俊山来均县，思意统一鄂北党组织，把枣阳划到一起，因我、李宝定要离开，结果未搞成。当时鄂北各县皆有党的组织活动（是七上八下），无很好统一组织：是很大损失。大革命失败后，鄂北的党团员都跑到武昌去了，也无统一组织领导。

谷城县：

高如松谈：大革命时，张茂修为国民党特派员，徐永丞、徐子斌等为委员。李晓阁、曾性田、王卓斌、姜步瀛等分别在盛家坑太平店、庙滩活动，区党部，薤山的一个大地主刀会老师刘克明在石花街搞区党部活动，二六年六月间正式成立县党部，由于曾在襄阳参加了国民党员（学生）的意见，高如松也被提名选为县党部委员，张茂修当时是否共产党员尚不清楚，这儿国民党是左倾的，基本上代表中富农小地主们利益的。

当时他们权绅民团总刘赤生，盛家坑、刘家地主，在太平店反对大地主曾朝栋、宋家，宋家是这一代的老绅士与盛家坑刘家有封建关系，在庙滩反对大地主陈家，但陈家是数千户大姓，陈姓佃中富农小自耕农占多数。姜步流的姜姓不到两百户，势甚孤，对陈家大地主影响不大，李晓阁在盛家坑搞农会有部分贫农和佃农的积极分子，回转藤山的李林、师正国刀会老师都支持他，比较有力量。他们当时反对刘家大地主，反对团总陈巨川，李晓阁当特派取二三十支枪，并兼团总。县党部委员徐子斌当县政府警备队长，为当襄阳张联升挂五色国旗叛变时，他们在谷城曾收缴刘赤生枪对打起来，刘把枪拖走投于学忠去了。

农会在太平店、庙滩、谷城附近都有所组织性，但仅仅作了反对土豪劣绅的宣传，实际行动上很少。

在茨河镇曾组织商民协会，以小商人和贫民为主，把保长大绅一类的商家都排出协会之外，以药铺江西人李永宏当主席，茨河区旧政权为大地主宋家（太平店区宋家的进门）所把持，或者为太平店区胡姓、刘仁昌（绅士）、罗佩绅（大姓数千户）在茨河开行的胡家把持，在武汉打下后，太平店胡中文介绍茨河胡家刘任昌（绅士）罗佩绅等大绅士组织国民党分部想继续把持村政权。为反对他们，我由襄阳到茨河支持商民协会。提出商民协会是商人的协会，不是绅士的协会的口号，以反对胡刘罗等。

姜步瀛、王卓斌、李晓阁在大革命失败后加入共产党。

农运成立后暴动相继开始：

由廖华平、谢远定、李明堂、余士颂组织特委，以张兆丰为依靠组织方振武的兵变，张学武组织枣阳暴动。将组织起来开始集中后被发觉，匪军下乡杀人放火，即开会检讨，张企图自杀未成即走，程克纯通过一些绅士买了五六支枪，廖华平即组织暴动。

鄂北特委于十二月在襄阳召开特委扩大会，研究了暴动和人员分工等问题（对如何搞暴动的具体办法没有布置）。会后第二天就各去各的了。襄阳又恢复“农民协会”，张贴标语，又有了“红枪会”组织，要求组织暴动，但枪集中枣阳有矛盾，未搞成。

枣阳暴动失败后，一部有枪的地方组织起来打仗，反对苛捐杂税。

程克纯有一、二十条枪，组织游击队（脱产，本人不敢回家），在隆兴寺、蔡阳铺、壕家湾一带搞大土豪（小土豪绅不敢动），形成割据，打团防，口号是：防匪、反苛捐杂税、打坏蛋当权派。枣阳就这样搞法。

蕲山有李庚尧及李庚尧的叔父李陶安（自耕农）很坚决，私塾教师李鼎臣是“哥老会”里的大爷，人还善良（人称面糊大爷），在“哥老会”中有群众基础，与刀会首领李林均是一家，大革命时搞过农会，当时蕲山大刀会唱戏还愿，大地主们说李林要搞农会不准唱戏，引起李林大刀会的不满。当时到蕲山与李林、师正国（大刀会首领小地主）协商动员大刀会起来杀刘家（刘荷生）、任家（任兴三）大权绅（刘家是谷城大权绅，封建大地主，任家是盛家坑大姓）。一九二七年三月某日晚，正集合群众，一则迂着大雨，再则其他小土绅首领反对，李林之兄也是个保长，从中拦阻，小土绅陈伯衡从中破坏，说不要受外人唆使，搞起来我们身家难保，这样群众已起来一部分又散了，李率大刀会首领再不与我们见面了，从此大刀会首领（即小地主）与大地主权绅之矛盾，本来已形成一紧张局面也因此消失了。象茨河暴动一样，缓和了农民与金牛寺庙上和尚之矛盾。王天和秀才所搞的一股土匪活动也因茨河暴动失败而被消灭了，王天和逃亡他乡，其子王连清（党员）被捕枪杀。“左”倾盲动主义不但使革命遭受损失，而且客观上帮助了敌人，维持封建统治秩序。自此后，在蕲山在九里岗再未作暴动打算了。

襄、谷、漳暴动都没有成功，主要是特委盲动主义而招致失败，以后均县、光化、谷城反对苛捐杂税被地主领导去了。这时岳维峻部住这一带，引起民愤、群众要求打谷城、打军队（当时打谷城有矛盾）。我找“农协党员”和“大刀会”，当时李金铭、李林、孙孝承、孟宪之也参加了。参加打的人员有小地主、绅士、大刀会都参加了。少数大刀会有几支枪外，均系梭标、刀矛之类，打石花街（一九二八年秋），当时动员群众数万人，声势很大，与军队作战，打进街内，又被逐出，到晚间敌人跑了些人，（当时因人多无法吃饭，农民即回家了，）运动解散了。这样搞下去也不行，而必须发展武

装脱离生产作基础进行斗争。在打石花街以后，不久由于谷城附近人民受匪骚扰很严重，要求大刀会援助，于是又进行了打谷城的斗争。当时有个党员丁德忠佃农，带二、三百人被打垮了。傅伯绩领导的大刀会打伤了人，也垮了。后农协即转为搞“大刀会”，主要反对苛捐杂税，我们到石花街盛家坑一带，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积极分子有些消极了，不愿搞了，只说而不行动了，对入党也认为人不入都可。依据敌情及客观情况变化，均主张搞农民运动是出路，由谷城县委组织，但没有开过会。

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盛家坑镇，薤山大刀会头领柳克明是小地主，与清乡军勾结清乡。李继才来后，认为“大刀会”、“农协”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活动困难，后便离开了（回襄阳汇报工作）。

宋谈均县情况：一九二七年九月到襄阳，特委指示到均、光、谷巡视工作，到谷城见李金铭。（我在茨河街知其在此负责）。到光华，见到丁陶安县委书记（麻城人），袁树堂、左党农、杜仲安在家坚持工作，陈家山（党员）、陈旭东（县大地主、有粮两千担）、常家营（党员）、常寿鼎（大地主）、南乡傅家营、王家营党员王北海（县大地主）、王海峰、王北海也是大地主，这些人在二八年都消沉下去不革命了。有几个店员宋大贞、万岭柏和一个姓郑的（卖油条的）还很好，掩护同志工作。南乡傅家营、傅德方（贫民）和几个农民还很积极。

我回到均县时，党团员回来的很多。有王伯伦、朱勉之（大学生）、孙联甲、刘鼎三、袁文林、李龙、吴生白（原名竹村、在北伐时搞宣传列车工作）都是武昌回来的。吴在东北入党，汪精卫叛变时，他无去向，和爱人陈爱贞回均县（本县人）。陈在横山是大户（除陈文朝外不是地主），那一带农民都是城内地主的佃户，陈爱贞的父亲是“胞哥”，我们见他（是大学生，搞了很长时间社会工作，有社会经验），在王伯伦家开了一次会，吴生白、王伯伦、朱勉之、孙连甲等十多人搞起特支，支部书记是吴生白。

十二月参加了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是在襄阳一家茶馆开的）。会议主要内容是：1.反对右倾机会主义；2.搞农民运动搞暴动；3.反对苛捐杂税（因时间关系未汇报工作），对如何开展工作无具体指示。宋良由会后即回均县去了。

宋回均县后，又将特支改为区委，宋担任书记，吴生白负组织工作，王伯伦搞宣传工作，以均县前山为工作重点，此地是自耕自给的经济，土地分散，大地主少。过去群众反匪斗争很勇敢。有个孙子固、有五、六十亩地，我们去了之后往孙连甲家（是中农，孙父是教私塾的老先生），纪大纲是孙家的外甥（纪是中农后为新富农），纪周围是佃农与当地群众关系较好，很能干，纪姓是当地大户。纪家与袁金奎（柳家河口的大地主），吴道章有矛盾（大革命时吴反对农协），纪在搞农协时，袁和吴出来反对，纪纠合民众把吴道章逮捕送县管押。大革命失败后，矛盾很尖锐。我们通过孙连甲到纪大纲处，纪家背靠横山，山地、地薄，这时我们利用纪、陈、孙三大户，周围三十多里土地，七、八百户人家。这里地形很好，干部在这里有骨干，在大革命时期组织过农协，对群众影响很好，所以作为工作的重点，此时介绍纪大纲、陈文朝、纪大林、纪大祥（中农）、刘家大道子、小道子（贫农）入党，在一九二八年春收鸦片捐时发展了一批党员，贫农出身的党员在斗争中表现很坚决。青山港靠谷城、红庙河、四方山、银洞山（谷城边境），这一带有几个党员。张自新、张家训、刘进村（后跑张治中部去了）、李龙、

叶明德（是大地主，党员），均县南乡有齐南田、赵世英，西乡有罗万鹏、向光溢、郭文焕、何光录等，城内有袁文林、朱勉之（朱、袁在家，不干了），以上这些知识分子的党员积极的有：张自新、李龙、孙连甲、吴生白等，区委成立后，决定宣传工作是反对苛捐杂税。一九二八年二月时，吴心田部通知要征收烟捐（银元），一亩要收十三元，农民因税太重，即掀起抗捐运动，组织大刀会（当时用的刀矛梭镖都是自己用土炉打的），情绪很高，正在准备时，陈修文（大地主）打草店民团，吴心田部队下乡杀人放火，又激起民愤。杨万善在武当山搞起了“红枪会”（开始组织时与我们无联系），运动起来了，部分是党领导的，大部分是自发的，几乎全县都行动起来了，和军阀队伍打了好多次仗。有一次在州府庵给敌人打击很大，在运动中还杀了两个通军队的劣绅，声势很大，使敌缩回城里去了，我们又组织群众用土枪土炮攻打县城，武装群众排到了十几里。我们用土炮打敌人团部，把团部房顶打垮了，派人和我们谈判，声明大烟税不收了，这时已到农忙时候，红枪会的人回家了，抗烟捐斗争就告结束。在这次轰轰烈烈的斗争中，齐兰田参加了三天和赵士英跑了，刘鼎三和城里的党员也不出来了，不干了，他们害怕了，前后共搞了三四支枪，计有二百余人。在这次斗争中，由于我们党内积极分子太少，很多党员都不敢于，而局势发展很快，少数党员穷于应付，所以虽然搞了一场很大的斗争，但很少发展党的组织，没有从组织上把全县运动领导起来。在运动中打下巩固的基础，虽然在政治上抗税斗争胜利了，而组织上的收获是很小的。仅纪大刚一带发展贫农党员二十多名，以后由吴生白负责搞基础，一直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以后红三军到均县，纪大刚、杨万善、向光溢编成一个团，三军给了他们了部分枪。一九三二年，我到纪处，他有枪二、三百枝，在抗烟时有三、四支枪。清乡军来后，其它不搞了，只搞红枪会，又在防匪名义下，富裕中农以上凑钱买了十几支土造步枪。二八年至二九年纪大刚劫船，附近群众听指挥，由于那里地形好，在一次对民团围攻的斗争中，纪大刚一人就打死了敌十余人（纪大刚、纪大林的枪法很好），在红三军去时，他不愿离开家，未跟红三军走，当时三军也没准备叫他走，企图叫他在本地搞根据地。均县地主武装力量较强的，是贾家寨、玉皇顶（靠河南），由于那里恶霸与县政府也有矛盾，过去他们通匪也通共，是黑红都通，没有冲突，斗争对象是袁金奎（柳河口），有枪三十支。这样，袁金奎等豪绅，告贾辑五通纪大刚，国民党责令贾辑五消灭纪大刚。纪大刚因红三军给他些枪，势力大了，自封团长与土匪勾结。贾辑五（贾家寨恶霸）便指使土匪王光德到纪处假投降，敌人里应外合，纪大刚三三年失败被杀后，悬头示众，不准收尸。纪的儿子乱拉女人，引起群众不满，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宋奎卿在郟阳一带，有燕若知（死于监狱）、赵麻子、郭文焕、高试三、北乡马树礼（被吸收入党）搞土匪，有百多枪，一九三二年燕、赵想把纪、马结合起来，在湖北、陕西边界打游击的意见被纪接受，就去一百多人，由纪洪恩、纪大祥带去（马树礼是党员），其部被马收缴了枪，扣了纪洪恩。我到均县，知道此事，又到马树礼处，放了纪洪恩等人，我在赵川与四方面军接上头，四方面军消灭了马部。

吴生白一九二九年冬就走了，跑到北京利用张学诗关系（是他的学生）在北京找到了工作，也接上了组织关系。

三军打下均县后，成立独立营，教导员金生，营长徐达，高泽普是苏维埃主席，张香山（当九军游击队长），郭潘为均县县委组织部长，张琪为县

委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高如松，副主席高泽普。草店敌人向小店进攻，独立营与红九军游击队，与敌人作战，红三军特务连到草店击败敌人一个营。不久，谷城、均县民团加大刀会，又向小店进攻，我们移在山上，打退敌人又下山发动群众搞贫民团、雇农工会，办训练班。这次办训练班根据谷城经验提出：“不是同阶级的人不能受训练”（对农民讲），为“鄂北干部训练班”，组织群众搜山，搞地主。板仓坪、蝦蟆口一带是根据地，群众很好。以后成立鄂北独立团，张香山调三军，金生当政委，徐达、侯季明当营长，派来团长贾××。

柳克明准备组织联县政府，涂美中在房县当县委书记，搞平分土地，群众有的不同意，在房县搞的过左，杀富农、捉住大刀会人员，也杀了些人，有些脱离群众（均房都如此）。

七师向保康方向发展，派便衣住薤山，龚春林懂得哥老会，在薤山组织了几个队，小地主参加了，筹了些款，有二百人，他当总队长，有十几支枪，我又组织了一个游击队（人员脱产），傅春轩领导，在盛家坑有廿余人，十一支枪。打庙滩民团，大地主张沉三是团总没有打死，搞到几条枪，群众说“红军下来了”，天明又转回盛家坑（不久廿五师来打石花街，乘胜追民团到谷城，住盛家坑）。到盛家坑以后，见到朱勉之，朱提出要在荏山成立苏维埃政府，要缴龚春林的枪，叫高如松为苏维埃主席，高因原在房县时，与柳克明商量过，先巩固均房苏区，房县向北分配土地，均县向南分配土地，这样打下均房苏区的坚实基础，然后向周围发展，薤山无基础，高不主张成立苏维埃政府，朱坚持在在在山成立苏维埃政府，争论结果，朱同意高不任主席，但政府一定要成立，即以赵新三、傅国栋为主席。翌日晨把龚的枪缴了，接着谷城敌人袭击，廿五师溃退在山，在在山以苏维埃名义出布告杀了龚春林。敌人说“外来红军与当地红军有分裂”。二十五师第二天回房县去了，高、傅国栋等下山组织群众，没有几天敌人由石花街、盛家坑向薤山进攻，因初组织，无战斗力，作战时间不久，即被打退，撤到房县。

三年三、四月间，在南阳搞反伪公安局运动。城南有个地方叫三十里屯，那里的公安局长派苛捐杂税，连养鸡、纺线车、织布机都要捐，群众很苦。那里有党员刘复僧、闰超明、闰嗣宗等，即领导群众发起了抗捐税斗争，群众数千人进城示威，喊冤诉苦。当时南阳住军是杨虎城部，杨对斗争采取支持态度，把公安局长押起来，免了捐税撤了公安局。杨虎城部队中情况很复杂。有共产党，有第三党——陈芝坚，有托洛茨基分子一米暂沉谢保贞，共产党员有王琴声（王常德）、王明、曹明九、赵兴仁等。当时杨虎城受国民党蒋介石之令打开陕西省，蒋封杨为秦省主席。在南阳反公安斗争胜利后，接着在杨部组织兵变，李立三中央派姓白的组织指挥，当时联络的可以变出二十七个连，计划兵变后，成立二十七师，成立红九军。后泄密，杨扣上述共产党人，原计划可变二十七个连，结果变出一个特务连，后突围未成被消灭。一九三三年四月贾布根代表河南省委来南阳，我们正在反公安局长，反捐税，在取得胜利（后）继续斗争，并要求继续搞分粮食、但打开仓库后农民不敢要。

邓县，张木千、王子良先后负责，宋于四月接受南阳中心县委和贾布根指示叫两个月搞起暴动，计划当时邓县有几万地方武装暴动，搞起来了，可以支援枣阳的斗争，首先整顿了区委，就进行动员布置后，未到两个月就搞起来了。组织五个赤卫队，组织个军前委贾为书记宋良由仍负责县委的工作，

革命委员会吴寿清〔首青〕为主席。到七月发动暴动，第一次是七月十七日，邓县有几条河——七里河、赵河、湍河等，因大雨水涨改为十九日，又因雨改为二十一日，船已搞好了（我在耀店），原定在古寨集合，我领人渡七里河无动静，结果未搞起来，原计〔划〕若暴动成功，准备与二十六师会师。一九三一年成立红九军，桐柏暴动、邓县暴动，杨虎城部兵变失败了，对枣阳斗争有很大影响。

打“唐县”胜利后，对反动势力影响震动很大，从此南阳军阀和反动政府便开始大肆逮捕，南阳很多同志被捕，组织被破坏，地下工作受到严重的损失。到三一年初，襄、枣、宜苏区和红二六师被打垮（原因不知道），李忠贤带一部去宜城，三一年余益庵返苏区特委派宋良由负责恢复，我（指高如松）到襄阳老河口，中心县委书记孙联甲已牺牲，襄阳县委书记王振三。宋良由、张木干、程克纯、段克强、吴首清（青），先后到苏区，宋路走峪山，听说耿家集已被打下等，黄龙挡民团已逃回峪山的消息，即截道到黄龙档，赵英等也在耿家集，这次最初只有十七支枪，程克纯、余益庵、李治邦等带上去的。我们到的那一天晚，李忠贤把部队带过来有枪百支（当代司令）我们准备给他廿六师长职务，但他提出口号当红军不如当土匪（但当时李之团、连长及战士都不愿当土匪）打下耿家集我们有枪卅余支，李有百余支枪”此时余益庵下去探情况，李与民团有关系，仅是个传说，情报还不属实，此时红三军已经上去了，决定派李到老河口当代表与三军联系，于是集合部队讲话，从李手中把武器接收过来，余益庵担任了红廿六师师长，张木干为政委，次日李到张家集投降了民团被地主杀了。

刚解决李忠贤的问题，蔡阳铺土匪杨文杰来打我们，敌认为我们才组织起来，想缴我们的枪，但当时士气旺盛，即猛烈突击敌人，一气打下蔡阳铺，得枪百余支，于是声势扩大，何成琼派他的绥靖主任特务团到壕家湾，敌有枪四百余支，我们有枪仅二百支，敌我力量悬殊。但我们即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守壕家湾对岸，主力转到敌后方，埋伏在土桥铺，另派数人去枣阳城放空枪烧敌汽车站，枣阳敌告警，说红军来打枣阳，敌速往城跑，敌中伏击得枪几支，我们有枪二百支，这时红军计六师士气更加旺盛起来，也逐渐壮大起来，边区革命委员会，也在傅家湖建立起来。接着（开〕襄枣宜支部书记以上会议，传达了四中全会决议的土地法和整顿襄枣两县委（枣阳县委书记陈国忠、襄阳王振三），会议开了五天（是空前的一次重要会议，指时间说），参加会的有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共三十余人，传达时因为一个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就是地主土地完全没收了不分给土地，这即涉及到很多参加工作同志的利益，意见有分歧（当时襄阳枣阳党员干部中有不少是小地主）。以后确定坚决执行中央土地法政策，但尽量照顾给予解决同志家属生活的实际问题。可搞小商小贩作以维生。（当时枣阳搞起来的联庄会，有小地主参加。襄阳回去的学生小地主多些，从武昌回来的大地主多些，想办法说服他们。）在枣阳开了三昼夜会议，因陈国忠工作不积极，改由王君恩为枣阳县委书记，侯达夫为县苏维埃主席。以后又在傅家湖开了几天襄阳县委会议，宋良由病倒了，五月到九月不能骑马行动，名义是特委派员，而实际不能行动。考虑到苏区恢复起来，包括襄枣宜钟几县应有统一领导，所以在六月组织分特委，张木干当（县）书记，余益庵、吴寿清（首青）、王君恩等人为委员，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吴寿清（首青），我去主要是整顿组织，打了几个小仗，此时红三军到均县，敌五十一师要去对付红三军，九师也来了，力量大

了，故这里比较稳定，和贺老总会师，又给留下二三百支枪，这时二六师有一千多条枪（是在三一年九、十月间）此时贫农团、儿童团组织起来了。平分土地（打乱平分），地主不留地，经济政策还未建立起来。经济来源来自打土豪（我们建立了被服、军械厂。医院，都组织起来了。当时组织是苏维埃初（雏型），此地较安全。一九三一年十月间，宋病未痊愈，特委召开会议，宋到南阳，中央派沈宗源、谭忠余、毕长（昌）茂皆到南阳。又经提出鄂豫边特委改为省委，宋提出把省委移到苏区，陈雪怀同意，沈宗源也同意了，决定搬到苏区去。此时沈宗源批评郝久亭主观很强，沈带来国际路线（沈是红军大学学生），理论高，标榜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很宣扬王明。他们先到襄枣宜，我们后到苏区，沈宗源召开扩大会议，遭敌袭击一次，会被冲散，边界敌人搞白色恐怖，杀了一些人，沈就有惊慌失措，他说：这里苏区大小，活动不便，在此不适合，此时鄂豫皖分局有交通在襄枣苏区，沈宗源叫宋去鄂豫皖联系，三个苏区如何呼应行动，宋到鄂豫皖后，沈宗源组织了一次向鄂豫皖逃跑，跑到枣北被敌打回来，沈就提出他到中央汇报鄂豫边区工作情况。他的工作由宋良由代理，鄂豫皖分局同意宋接替沈的职务（代理）。宋于四月下旬回到襄枣宜苏区的时候，这时尉士均已到一月。尉告诉我，省委已改组，王恩为书记，王明和为苏维埃主席，因为要工农分子负主要责任，要我作省委宣传部长兼组织政治保卫工作（有湘鄂西和鄂豫皖的作法），局长王君恩。尉士均传达湘鄂西中央分局指示要巩固苏区，不许离开苏区一步，不打下一个据点不能振士气。王君恩、郝、吴研究打附近民团，没打下来。情绪不高（损失不大，在宜城东）。以后都是人家打我们，弄得连饭也吃不上，战士负伤生了蛆，医院无法治疗，掉了队和负伤的战士被敌捉杀。后来听郝说：沈宗源下令支部书记以上带眷眷逃跑，但群众反对，到枣阳北乡即被枣阳民团（有数千支枪）<阻击>，一接火就被打垮了。影响了苏区干部战士，情绪低落，给苏区造成很大的影响。宋回来，余益庵、张木千已被撤职、程克纯说：成天这样搞老挨打，是否能和尉说变个办法，但谁也不敢说，叫宋良由给尉士均说，这时他们到枣阳北乡，鄂豫边省委就剩宋、尉士均、左洪涛，此时，剿共团搜查很凶，工作已不能进行（五月份），尉已慌了（铲的只剩两家人）提出如何办，宋良由说：死守苏区，苏区已完了，应打出圈子，找敌弱处去打，打敌尾巴。后向湘鄂西靠，尉用口头交待了命令（宋写命令，宋为宣传部长），叫左洪涛送给二六师（是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间），宋即到南阳、光化收留残部另组织力量，尉士均回湘鄂西汇报工作。

二六师怎样被打垮的：宋到河口住了几天，后到南阳，遇到郝久亭说：红军突出敌人的包围。缴了几个乡民团的枪，部队得到一些补充，有了几发子弹，二三百条枪，部队得到喘息，回忆到不许离开赤区的指示，返回苏区。到新街往黄龙垱路上在朝阳寺休息哨兵睡觉，被敌包围，吴、李牺牲，郝骑匹马冲出来，红军已离开四、五天。王君恩、陈雪怀到南阳是一九三二年六月（据说赵英被敌逮捕），在唐县苏刘村开会，知李大全、阮荣汉叛变（李大全是黄龙垱区委书记），赵英被捕后在武昌牺牲，程在石门搞游击队。王君恩无经验，宋良由为书记，王为常委；恢复苏区，组织第二次回苏区被捕。

程在石门搞游击队，此时红军已改成一、三纵队，游击队反击团防，打数次胜仗，部队发展到三百余人。

关于襄枣宜苏区对敌斗争情况的回忆 (一九八一年)

余益庵

襄枣宜位于鄂豫边，在大革命前夜，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局面。河南是冯玉祥势力，湖北襄枣地区是吴佩孚势力。除军阀外，还有许多土匪武装和民团。在这个地区，有别廷芳、廖湘如、康彩武等土匪武装，他们受樊钟秀的建国军编；还有余少西、余藻卿等，既是土匪，又是民团，又是军阀的部队。这些大小军阀苛重的剥削和压榨人民：派枪、派人、抽捐税、抽麦包、欺压人民，无恶不为，人民生活极为痛苦，实是民不聊生。

这时的社会经济中，农村新兴的资产阶级是上升的，但封建地主的统治仍十分顽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互相夺权争利，斗争十分激烈。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爆发人民的革命并不是偶然的。起初，搞学生运动，以后又搞社团组织，进行反军阀混战，反苛杂的宣传。同时，还有农民自发组织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武装组织——如大刀会、红枪会等。当时，这些组织实际上是人民反抗斗争的组织，领导人民抗捐抗税，搞小的保安团、小土匪。这些组织成立之后，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各地的小保安团基本上搞光了，小土匪不敢来了，大土匪也不敢分散活动了。

这些社团组织起来之后，地主阶级见到可以抓住群众，就设法控制这些社团、组织这种社团，企图更方便于他们的统治。当时，群众由于觉悟不高，没有阶级斗争的经验，社团逐渐的为地主阶级掌握了。

北伐战争时期，襄枣宜地区，搞起了农民协会的运动，搞的轰轰烈烈，普遍的都组织了农协，在反苛捐杂税的口号下，农民运动很高涨，有些地方起来算地主土劣的账。二七年上半年，农协就组织自卫军、苗子队，每个农协下面都有。自卫队、苗子队是农民自己的武装，实行进一步的打土豪劣绅。

“四一二”以后，农协和自卫军还支持了一个时期，到二七年下半年（汪精卫“七·一五”叛变时），我们已经进一步组织了赤卫队，工农革命军。那时，我们知道了有共产党的领导了。组织起来的这些人民武装专门打土豪捉劣绅，工农革命军称为第×军（未成立），只编有一个总队，下设几个大队，共有三百多人，领导人是程克纯。在枣阳地区，赤卫队也发展到三、四百人。在襄阳、宜城地区，尚没有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的组织，只有自卫队，少先队等。

二七年下半年到二八年上半年，我们的区域相当大；开展着游击战争，当时我们把枣阳县的县长余素萼搞掉了，并且在多次的战斗中，消灭了不少的建国军和其他部队。我们的力量则越打越强。

二八年农历四月以后，建国军垮台了。桂系军阀来到了襄枣宜地区。胡宗锋、陶军〔钧〕派李季才为鄂北清乡司令。这时，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变成了李季才的部队了。

与建国军的斗争中，消灭了康彩武、余藻琴等土匪部队，还活捉了国民党第二军军长田维青，捉住田维青后，国民党来拉拢我们，说放了田维青，可受国民党收编。当时，有些人动摇了，想受国民党的编，国民党答应给他当团长。但是党不允许他这样做，将田维青看管了起来，后来处决了。

当时，为什么枣阳地区搞武装斗争搞得那么快，那么轰轰烈烈呢？这是因为搞农协运动时，我们已抓过武装，有了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

在我们顺利发展，不断打击敌人的情况下，程克纯思想上十分右倾他领导的主力部队工农革命军总队部，不积极的向外游击，进行发展。在打了几个胜仗之后，就认为太平无事了，当时，形势很好，到桐柏山、大洪山都是可以发展的。但是领导思想的保守，主力部队连区都不出。（还不如赤卫队活跃，当时我们搞的赤卫队还游击到随县的境内）到二八年农历八月，李季才大军压境，武装力量不集中，不能统一指挥，打击敌人，队伍撤出来到大洪山，还得到了机枪，回来后，李季才把队伍分散建立了据点，部队活动不便，在程克纯的主张下，部队被解散了，枪也都埋了起来。

主力解散，枪埋了起来，对襄枣宜地区的武装斗争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我们没有能够集中武装力量，发动和依靠群众来抵御敌人的进攻。不久，枣阳县赤卫队受到了损失，到十二月时，我们的武装都垮了。大革命斗争也就从此失败了。

这一段革命虽然是失败了。但是有着深远的革命影响：

一、因大革命反封建打土豪劣绅，反苛捐杂税，建立农协，代替旧政权，把封建势力压下去，广大群众得到了好处。

二、培养了革命的干部，因失败而散在四处的积极分子，后来都成了搞苏维埃运动的骨干；

三、革命运动虽只在枣阳高潮，但对宜、随、襄、钟等地区及河南的唐县、泌阳、桐柏等县都有很大影响，为以后开展苏维埃运动打下了基础。

随着武装斗争的失败，党的组织也受到了损失，二八年冬，枣阳县委遭到破坏，县委书记陈雪怀逃走了。鄂北特委也垮了台，特委当时有俞世松、廖化平、谢元定等，有的被捕牺牲了。有的逃到河南境内去了，有的自首叛变了。

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使党的组织先后垮台，我们与湖北省委的联系也断了；只有与中央联系，二九年初，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逐渐的建立了起来，团防也搞起来了，对人民仍然实行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但是军阀混战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当时，形成了新旧军阀的混战。地方保安团也互相争权夺利，社会秩序非常紊乱。

这个时期，散在四乡的革命同志仍然自发的坚持工作，发展着党的组织。到二九年冬，已经有了好几个县的组织，并且与鄂北特委取得了联系（当时，特委书记是聂洪钧同志）。群众虽然依旧受着压迫，但由于有了大革命时期斗争的锻炼，已经懂得了阶级斗争，十分仇恨敌人，他们说：“等先生（指党员）回来，还要找你们（指国民党反动派）算账的！”他们再不认为自己命不好而受苦了。

我当时住在枣阳西乡，那里敌人不了解我，我三次进入清乡区——枣西地区，组织群众，搞农运、匪运、团运工作。我一共进去三次：二九年一月、五月与秋收时。第三次是从钟祥去的，就没有再离开，由于群众生活在继续恶化，要求反抗斗争，党在当地的威信很高，工作开展得很快，群众对我们十分拥护，冒着敌人白色恐怖为我们掩护，帮助开展工作，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反捐税，反土匪”。到三零年初，就组织暴动，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第一次我们计划在正月初五从匪区开始暴动，搞土匪枪，再搞保卫团，可是国民党提早两天来“剿匪”，我们未搞成。二、三月间，又在钟祥下手，拖了几支枪，但因为没有配合好，未站住脚。第二次阴历四月十六，在襄枣交界之蔡阳铺，搞保卫团武装。这个团防有枪一百多支，我们在敌人里面抓了几

个班（原程克纯部下的战士在里面当班长）。侦知该保卫团团长了几个班出去剿土匪了，有几个班分散在商民中间，只有两个班在家。我们利用白天开饭时间，以少数枪支去袭击敌人，并且发动了很多群众持刀矛参加战斗，守住要路，搜缴散在商民中的保卫团枪支。这次行动比较顺利。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搞到了几十条枪，接着又向东，把距蔡阳铺七里的翟家古城的保卫团消灭，搞到十几条枪。又趁势赶跑了璩朱湾的保卫团，部队整顿，准备打黄龙挡。

四月十八日，我们又攻黄龙挡，我们与敌人激战，攻了几次攻不进去，群众见到我们行动，都自动的持刀矛援助战斗，战斗中群众愈来愈多，我们特委的军事负责人杨秀肝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我终于胜敌。打死了敌队长，缴获了不少枪支。后敌正规军来了几个连清乡，我们就散开了。这时我们已有枪二百多支了。

回头不久，敌人走了，又打琼家湾镇，保卫团长璩秀松被活捉，缴二三十条枪，占领该镇。

此后我们就向南发展，逐渐地发展到了襄阳东部，宜城东部，钟祥北部，打下洋样镇、占领长寿店。枣阳南乡新集有一个保卫团，团长刘德全是党员，这时也把部队拖了出来。这时，我们是叫九军第五总队，下有十三、十四、十五大队，另一特务队。暴动后，程克纯同志回来，傅良驹叛变，程代表去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三零年六、七月间，带回了中央指示，将我们改编为红九军二十六师。改编后，我是党代表，张香山同志任师长，师下设 76、77、78 三个团和一个特务团。自此，就成了正式的红军了，这时，各地赤卫队也都建立起来，区乡赤卫队也有枪几百，九军二十六师共有枪五、六百余。

在此时期，我们根据地有了相当的发展，苏区以黄龙挡、璩家湾、蔡阳铺、耿家集四个大镇为中心，北至枣阳城南王庄、罗庄、草市、隆兴寺一带；西至刘家冲以下直到垭口的襄河东岸地区；东至枣阳东部刘升店、榆树岗及吴家店、平林店、双河以西一线；南至钟祥北部丰乐河、长寿店等地区。并活动到南漳、宜城、随县边境。在三零年冬，还曾打开过唐河县，占领县城一周。

此时，成立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由程克纯任主席，下有襄东、宜东、枣南、枣阳四个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设在璩家湾。

当时，我们受鄂豫边特委领导，特委是设在南阳秘密的，书记是郝久亭（此人以后叛变）。

在三零年秋以后，就开始了土地革命。当时有两种做法：一是地主土地完全没收，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中农不动。没收的土地分给贫雇农，富农不准雇长工。另一做法是：以人计算，完全平均，一律分地，地主分以坏地，我们当时认为第二种方法不好，就都采取了前一种办法来分了。此时，在枣阳南部、西部，襄东、宜东等地区都分配了土地，分配土地时，基本力量靠雇、贫农组织的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土地委员会领导分地。

三零年腊月，敌人对我苏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围攻——第二次“围剿”。敌人主力系五十一师范石生部。范有两个旅，李柱中旅自老河口方向，王家本旅自钟祥方向，会同四十八师徐源泉一部（驻钟祥一带）和双沟的土匪武装张恒景、枣阳保卫团杜兴明等，向我根据地中心黄龙挡进攻。起初，二十六师在钟祥方面平林店打的不错，击溃了敌人，但右倾的程克纯把部队调了回来。我那时病了。三一年正月，党派我和张香山同志到均光谷地区去

领导暴动。（这时，鄂豫边特委仍在南阳，下设有南阳、河口、襄阳三个分特。）二十六师由付司令员谢耀武、王子良领导，但实际上在程克纯指挥下。后来王子良病死，谢耀武在枣阳官庄作战牺牲，由李宗贤（原二十六师一个团长，实系叛徒）领导部队。在敌围攻下部队打垮了，根据地的主要市镇均为敌占，部队仅剩人枪百余，被李宗贤拖到宜城的襄河以西地区。李企图叛变投敌，口号是：当土匪比当红军“好”，此时，程克纯又因失败逃走了，农历四月，特委又决定我回襄枣宜地区进行恢复工作，并成立襄枣宜分特，张木干〔阡〕为书记。

第二次“围剿”虽然敌人给我们以摧残，但人力损失不大，主要是领导右倾，把人搞散了。同时，红三军到了均房地区，五十一师不得不撤走去保卫襄樊、老河口，苏区上留下一些杂牌军，他们在苏区的烧杀政策，地主的反攻倒算，人民对他们非常仇恨。所以红军回去恢复工作很顺利。敌人动员了群众帮助他们守围子。我们把主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先打耿家集，爬上围子，群众见是红军，就不声张了。我们很快的攻下了碉堡，把敌人消灭。打壕家湾，敌人逃走了；打黄龙岗消灭了保卫团。于是又集中起来向东活动。局面很快就打开了。这时摆脱了程克纯的右倾领导，革命委员会移到宜东新街，医院、被服厂、军械厂皆设在附近。三一年下半年又开了苏维埃代表会议，成立了鄂豫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寿〔首〕青。

这时，红三军在均房叫我们到老河口会师，我们认为人少枪少，作用不大，就派李宗贤去当代表，另一方面把李调走也便于整理部队。（李企图叛变，这派遣作为一种处理方法。）三一年农历六、七月，红九师从洪湖来京钟地区，接红三军回洪湖，我们通过一个交通张旺午，同九师取上联系，以后九师就与我们会师，鲁易同志帮助我们建立了政治工作，并派马三光等政治干部帮助我们建立了政治机关。马三光为政治部主任。但是万涛等批评我们土改不彻底，因宜东是游击区，九师来会师，后方留在宜东，他们把区委书记杀了，在那里大搞反富农斗争，把一些工商业主也当成富农打，政治上受到了不少损失。三一年秋，红三军回洪湖，中央决定鄂豫边特委改为鄂豫边省委，开了一次党代大会，何〔郝〕久廷〔亭〕及特委机关，从南阳来苏区，中央派沈中源为省委书记、谭忠余为二十六师政委，省委成立不久，形势又较紧张，谭忠余又借口老婆怀孩子，经沈中源批准，离开了苏区，以后，沈中源亦开了小差。

三二年春，敌人四次“围剿”之前，我们已经打破了三一年冬的敌人进攻，地区除了枣西的壕家湾、黄龙档、钟北的长寿店，丰乐河等地之外，均已恢复，部队恢复到了七、八百人（其中党员占40—50%），地方武装千余人，但省委很空虚，这时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尉士均来巡视工作，他到后，即提拔了一个县委书记王君恩为省委书记，一个县苏主席王明和为边区苏维埃主席。还提一个政治保卫局长，王钧〔均〕贤。这些同志政治上很好，但领导经验很差，尉带来中央分局的指示，提出口号：“巩固苏区，坚决打击敌人”，“争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因根据地当地在小洪山，我们想依靠红三军，作为他的外围，主张向大洪山钟祥、京山以北地区发展。这样，就可同洪湖苏区连成一片。但尉士均说我是典型的邓中夏式的退却路线，逃跑主义。古历三月二十日，撤去了我的军权、政权、党权。二十六师师长由吴寿青接任，派我到军区去当参谋长。不久，政委张木干也被撤职，又叫他当军区参谋长，这样，我就未到职，叫我去搞白区的党的工作。这时我伤口发

了，请假到宜城西部养伤，四月底与钟祥地下县委书记谢威一起去洪湖。到洪湖过端午节。这时正是红三军新沟咀胜利以后。

四次“围剿”开始前，敌情有些变化：三一年冬，枣阳增加了敌人三十四旅罗启疆，很反动。不过当时他初到，情况不熟，不敢妄动。过去五十一师比较保守，他们不是嫡系，把我们搅垮了，襄樊他们也呆不住，这时他们主要方向还是湘鄂西，不是搅我们，但是尉士均指挥红二十六师去硬攻峪山，这时二十六师只有七、八百人，地方武装也只有千余人。峪山是敌人强固据点之一。我们每人只有三、四发子弹，打了几次，部队损失很大。

四次“围剿”开始，五十一师比过去坚决了，因为这时国民党全国行动，搞湘鄂西是整个计划，不得不加紧，其中王家本搞的较凶，杀人放火，人称王屠户。

这时部队中一些比较好的骨干皆被尉士均撤换了，一些“左”倾分子在打峪山时使部队受了很大损失，过去罗启疆部出来时最少一个团，我们在枣阳城外七、八里就有苏维埃，后来一个营也出来了，所以在宜东与王家本部队打了一仗后，吴寿青、马三光阵亡，部队就动摇，一部分逃散了。剩下一百多人、枪。听说以后编入襄北独立团了，这是三二年旧历四月间。程克纯听说也到襄北独立团了。

襄枣宜苏区失败，客观上是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主观上缺乏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特委长期住在南阳城内不下来，不好议事，何（郝）久廷〔亭〕等揽权，我们自己有自卑感，只知积极干，不懂集体领导，不自己提拔干部。外边派来的人。情况好就干，情况不好就溜，特别是尉士均到襄枣宜后，贯彻三次“左”倾路线，撤去主要骨干，“左”倾分子上台，打硬仗，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们当时不懂得发展主力，二十六师未能迅速扩大，把地方武装升为主力，让他们再发展，所以到后来二十六师不能有力的应付敌人的进攻。

关于鄂豫边襄枣宜钟苏区革命斗争失败经验教训参考意见

宋良由

（本文经高如松同志看过并补充部分意见，并附余益庵同志的补充意见）

襄枣宜钟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首先在枣阳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劣绅，建立工农革命军，建立苏维埃起，到一九三二年失败，前后共五年。

在五年中，党领导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反动土匪进行了轰轰烈烈，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在襄枣宜钟地区建立了红军二十六师，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摧毁了这些地区的反动统治，对“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敌人起了牵制的作用，对我国土地革命阶段，作出不小的贡献。这个局面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员前仆后继的英勇牺牲和劳动群众革命的积极要求，在程克纯、杨秀谦等同志适当的策略，在反动统治薄弱地区由抗粮抗税反大地主团绅斗争直到土地革命，形成革命创[割]据局面，这是鄂北革命运动的一个特点，值得研究。（二八年襄枣已形成割据局面，当时土地尚未分配。）特别是红三军进军均房，对鄂北反动统治震动很大。对鄂北劳动人民起了良好的深远的影响（是）对鄂北革命工作的有力的支持。

取得上述革命成绩，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反动统治下不能生活，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地方反动势力，借“铲共”“通共”之名，讹诈乡民，敲骨吸髓，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坚决反抗，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是他们唯一的救星，进一步提高了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威信。因而襄枣宜钟苏区，虽然经过数次失败，但那里的党和人民在遭到惨重牺牲之后，把牺牲化为仇恨，把仇恨化为力量，稍一喘息，又挺起身来，重新战斗，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襄枣宜钟苏区的革命斗争，是付出很高的代价，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我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对革命是有益处的。

检查失败的教训，由于我的水平很低，分析能力很差，而且对当时的情况，不是全面了解，只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作参考，应该重申，这只是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如果有偏差、出入、主观忆断，错误的地方，务请严格纠正。

在鄂北、鄂豫边区没有形成党的领导核心，而且没有抓紧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在红军中没有形成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的领导核心是失败的根源。

从当时的情况看，形势是好的。反动统治使人民到（了）不能生活的境地，而且社会情况很混乱，封建割据也很分散；劳动群众迫切的要求革命，对共产党给予极大的信任，虽然他们遭到很大牺牲，但对党还是热情拥护的；革命干部也并不是太少，英勇的斗争情绪很高；已经建立了红军武装和苏维埃政权；与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相距不远，能互相呼应；如果领导得好，襄枣宜钟苏区对中国革命是可以作出更大贡献的。但鄂北鄂豫边区党的领导，没有能够根据马列主义的真理把上级的指示与当地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缺少独立自主的精神，有小苏区依靠大苏区的依赖思想。因此，就对鄂豫边区没有一个从革命的长期出发的胜利如何进攻，失败如何退守的全面的战略计划和部署。——在鄂豫边的秦岭与巴山之间的均、郧、房、二竹一带地理形势

好，回旋余地较大，群众生活极艰苦，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是可以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根据地的，（纪大纲在一个很小的前山地区，以二百多武装还存在着五年）我们在那里虽作了一些工作，但没有集中力量，坚决的建立这一地区的根据地，却在接近反动统治中心的地区——太平店、蕘山、张集、尹家集、邓县……等搞没有群众基础的暴动，牺牲很大，得不偿失。更可惜的是，红三军在均房所建立起来的苏区和红二十五师，在红三军走后，没有坚持在均房的斗争，在汤慕禹将二十五师撤往洪湖，放弃了一个主要根据地。另一方面，由于保守思想作怪，在形势好的时候，红二六师没有积极进攻，向大洪山，桐柏山一带发展，扩大红军、苏区和游击根据地，使苏区在最大的时候，也只长 150—160，宽 70—80 里地弹丸之地，致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最多时到二十个团）围攻的时候，没有回旋余地。这样再加上右倾机会主义的插枪逃跑，就使襄枣宜钟苏区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失败，一九三二年春沈宗源的组织逃跑，严重地打击了革命的战斗情绪，接着尉世[士]筠[均]代表湘鄂西死守赤区，不许离赤区一步，使襄枣宜钟苏区遭到第二次失败。

上述一系列战略上的错误，使鄂豫边区革命遭到重大的牺牲和严重的失败，主要经验教训是党的核心领导未形成。第一，未把[对]武装斗争在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不知道武装斗争是发展与扩大革命力量，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与扩大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条件。

我们进一步追究战略上的错误从那里来的呢，那就是在鄂北——鄂豫边区没有形成党的领导核心为其最基本的原因。

当然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这一时期来说，全国革命总的情况，是在盲动主义，立三路线，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之下，使中国革命遭到了严重损失，但具体领导鄂北——鄂豫边区革命斗争的，是鄂北特委，鄂豫边区特委和临时省委。在那时，鄂豫边区和中央的联系极不密切的情况下，了解具体情况的是地方而不是中央，这样，就更需要在鄂豫边区有一个有马列主义水平的，能深入，有远见的党的领导核心。可是这样的党的领导机构，却没形成起来。

情况是这样：二七年秋湖北省派张学武为鄂北特委书记，在枣阳发动暴动，没有半年，张悲观失望，结果脱离了革命。以廖划平、谢远定、余士颂为中心的鄂北特委，建立一年，谢远定牺牲，廖划平逃跑，余士颂（不知下落）特委垮台。中央派聂洪钧为书记的鄂北特委，聂也仅作了几个月的工作，调别处去了。傅良驹负责鄂北工作，没有好久，叛变了。三一年冬组成的鄂豫边区特委，其常委郝久廷、陈雪怀在南阳、宋良由在苏区，没有形成集体的核心领导。三一年冬沈宗源、谭中玉[谭忠余]、毕长[昌]茂到鄂豫边区，沈为书记，把鄂豫边特委改组为临时省委，经不起苏区严重斗争的考经，在领导逃跑失败以后，作了革命队伍的逃兵。接着尉世[士]筠[均]于三二年春经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委派到襄枣宜钟苏区，又改组了临时省委，以王均恩（农民）为书记，在他坚决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结果，到五月，苏区全被敌人占领，尉跑回湘鄂西，王、宋跑到南阳，这一届省委又要重新改组。这样，鄂北，鄂豫边区党的领导核心，始终是处在走马换将，动荡不安的局面，所以始终未能一步一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深入研究，全面布[部]署，统一领导，在革命斗争中培养起党的领导核心。在红军中，干部的变动，也很大，党在红军中的核心组织——前委也没有很好建起来，因此，不仅在战略上，就是在红军中，在苏维埃政权中，在工农群众的群众工作中，政策、策

略方面都没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东西。在党内民主集中[制]，阶级教育，开展批评，加强团结等方面，也没有建立起经常性的工作。总之，没能形成党的领导核心，是失败的根源，也是主要的教训。

具体说来，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看得出来。

1. 党的组织路线和阶级教育方面，未能够把党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根深蒂固、扎扎实实地建成磐石般基础。从建党开始，党内的成分绝大部分（分）是青年学生，这是很自然的。但应在有了投降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工具以后，就应该坚决地，大胆放手的吸收工人和农村无产阶级和半产阶级的工农入党，以壮大党的组织，改变党的成分，并且从艰巨的工作中，逐渐改善党的领导机构的组织成分。并抓紧阶级教育工作，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以改造党内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实质，克服各种不良倾向，使党在组织上，思想上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鄂北——鄂豫边区党在这一方面作的工作，是很不够的。它表现在襄枣宜钟苏区革命斗争的失败，一方面固然由于党的领导在战略策略上的错误，但另一方面，当斗争到极残酷的时候，投降敌人，叛变革命的行为迭次发生，也不能不是苏区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2. 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工作，也是作得很差的。首先在鄂豫边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深入的宣传工作是不够的。在白区，广大农民还不知道苏维埃的政权性质，在农民中间传说着，“孙中山革命是“余自立”，共产党革命是“苏维埃”，他们说“苏维埃”比“余自立”还能干”，在苏区农民是普遍知道，苏维埃政府保护穷人利益，打土豪，分田地。但对苏维埃政权那个阶级领导，那些阶级联盟；自己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是了解不清楚的。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宣传不够以外，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工作，在改善人民生活工作上，在制订政策及深入群众，细致讨论等一系列工作上，作得不够。比如说：在襄枣宜钟苏区，较老的地方（王家湾等地），经过贫农团的选举组织乡政府，但也只是选举而已。在新发展的苏区，就是派人先把乡苏维埃组织起来，——在当时环境下，固然有客观上的困难，开始这样作是可以的，但经过一定的时候应进行一系列的工作，以巩固苏维埃政权。最突出的一件事，我们对各区乡人口成分比例的调查，就没有作系统的，具体的调查工作，因而也没有掌握各区雇工、贫农、中农、富家、地主各占百分比的材料，就可知道我们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工作上的幼稚，与粗枝大叶了。因而也就不能充分发挥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力量，以发展苏区，巩固苏区。

3. 红军二十六师，在作战上是经过一定的艰苦锻炼，勇敢作战的。它的失败，除了领导逃跑，严重地打击了士气；死守苏区，铸成了“左”倾的（实际是右倾）战略上的严重错误以外，在政治工作上没有如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明确教育，所以打下唐河县以后，纪律不好，虽然给敌人很大的震动，但政治影响不好。此外，我们没经常搞红军“拥政爱民”，群众搞“拥军优属”的工作，更没能提出鲜明的口号，定为制度。最后，我们在红军中，对于阶级路线是掌握不严的。这表现在提拔干部上，我的映[印]象是注意作战勇敢比阶级成分要重些。比如张永年担任二十六师特务连连长，这两人打仗是很勇敢的，但到敌人严重打击的时候，他们叛变了。

4. 在群众路线问题上，问题是很多的。上面提到了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苏维埃工作上群众路线，红军“拥政爱民”，群众的“拥军优属”等群众工作以外，还有不少问题。

(1) 首先，我们在当时对“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工作的基本路线是模糊的，因此，一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没有建立起来。

(2) 搞到恶霸土劣，就杀掉，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召开群众斗争大会，进行斗争。在襄枣宜钟杀的恶霸、土豪劣绅，虽然不少，但对把这个与对群众的阶级教育，吸引群众参加斗争，作的不够。

(3) 在白区历次搞的武装暴动，在“左”倾机会主义指导下，没有领导群众日常斗争，发展群众组织，教育群众，锻炼群众，逐步形成暴动，一提就是“暴动”。暴动失败的结果。反而脱离了群众。我们的干部也被暴露出来，遭到很大的牺牲。

5.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第一次土地改革的情况我不清楚；第二次土改，执行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土改法令，土改时，没有大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把它形成一个阶级斗争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形成苏维埃，贫农团给农民分土地的和平土改，没有在实际土改中采取革命手段举行诉苦会，控诉会，斗争大会处理地主，给农民深刻的阶级教育，并使农村中阶级斗争深刻化、尖锐化，从而巩固苏区与加强红军的战斗力。

6. 在统战工作上，最初搞学生运动的时候，与十中校去陆逵九及学生贾光鼎等，是作了统一战线的工作，也收到一些效果（如收容二师鸿文革命学生等），集聚了革命力量，但在后来，由于与陆、贾的意见冲突，对贾光鼎侵蚀罚款，又发动十中第二次学潮，学潮闹的结果，又没有获得胜利的结果，影响学生工作以后的发展，这是“左”倾方面的错误，在苏区建立以后，在工农联盟问题上，没有搞出明确的政策，那时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等政策，思想是模糊的。另外，在土匪工作上，一个最惨痛教训是纪大纲收编土匪王广德，后来王广德作地主豪绅的内应，不但纪大纲和他儿子遭到惨痛的牺牲，而且这一部分力量也被敌人消灭。这证明收编土匪而收编惯匪是引贼入室的。在“五卅”运动中，樊城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商人和一部分改良主义的教师组织稳进救国会，并出刊物“稳进”，宣传稳进救国的方针，对这一部分人，我们当时应该团结他们爱国的一面，以孤立经销亚细亚、美孚石油，大古糖及其他经销仇货的商人，使买办商人与经营土货的商人矛盾尖锐起来，而评（批）判他们改良主义的一面，使群众不致受改良主义的迷惑，这样能使运动收到更好的效果。可是我们对稳进救国会只进行了斗争，而没有团结，是一个错误。

余益庵同志关于失败教训的补充意见

同意因鄂北——鄂豫边区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二年期间，没有形成党的领导核心，从而在战略上，策略上发生一系列的或“左”或右的错误，是襄枣宜钟苏区和红军二十六师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他进一步指出：（1）特委培养运动中出现的积极分子不够，参加特委，凭资格，程克纯看不起新起的骨干，有些不积极的人，参加特委，老人不好，中央派人来，不了解情况，有的还不坚决，这样要形成坚强的核心领导，就受到限制。他还指出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的实例。如李仲贤从苏联回来，到枣阳未带党的介绍信，可是到上海找到程克纯，回来就当团长，当代理司令。（2）特委常住襄阳——高卧南阳，没有集中力量，深入苏区红军，具体领导苏区和红军的工作，这也是襄枣宜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3）在战略上没有抓住三年大好形势，指导红军二十六师积极的外发展。当傅良驹被捕、叛变，特委垮台之后，特

派员陈雪怀指示程克纯在二十六师向钟祥发展很顺利的时候，把红军调回到枣阳整训，几个月不动，坐失红军发展的良好时机，到十二月才打了唐县。这样就造成了敌人围攻时的被动局面，（4）苏区和红军失败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尉士均到襄枣宜钟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尉士均指挥红军几打峪山，这种打无把握的攻坚战，峪山未打下来，丧了自己的锐气，助长敌人的气焰，致使敌人敢于大胆进攻，问题也应该归给到党的领导上。

程克纯插枪，事在一九二八年八月，这时还不是红军二十六师的番号，是工农革命军九军鄂北总队，所以不能统称红军插枪，应分清界线。

土地改革，有“左”有右。总的说来，黄龙挡枣西一带，上改比较彻底，结合群众还不错，也出现了不少工农干部，这是老区，下层干部皆是这一带出来的。土地革命越彻底，红军越巩固，这是一条真理，但在初开展的地区，则应步步深入，达到彻底，而不是一下子就搞彻底。襄枣宜钟苏区土改工作有的错误，是三年暴动以后，环境顺利，群众要求分土地，程克纯只在黄龙挡搞试点，到三一年恢复后，才坚决提出分土地，起初搞的较好，到红九师来，搞反富农斗争又搞“左”了。事例是同红三军会师后，在土改中搞反富农斗争，在邵家山根斗一家开粉房的佃农，当时马三光坚持主张斗，与杜亚良有争论，而这家，实际是中农，党秘密时期，他们支持，公开时期也支持，不该斗，结果斗了，失去了朋友。

情况补充：

程克纯插枪，是一九二八年旧历八月，当时，有些同志不愿走，举几条枪，坚持斗争，付总队长王恕安被敌人烧死，我和徐化龙化装走东津湾到观音阁，离开赤区。杨秀谦领导的枣阳赤卫队，坚持斗争到十二月，总队长杨道武，参谋长杨栋伯皆负伤以后，被敌人打垮。

注释

原文无时间，似为全国解放后所作。

附记：

1) 因资料不全，表中所列团以上干部烈士定有很多遗漏，对许多烈士的简历也不够清楚，请读者提供材料，待以后补充订正。2) 此表第四栏内写“牺牲”二字者指死亡原因不明。3) 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湘鄂西地区的各县县委书记多兼军职，有的地方党委领导人系在根据地和红军创立时期直接发动游击战争的参与者，有许多且系直接率领武装部队作战阵亡的，所以将一些地方干部中的烈士也列入了红军烈士名录中。

一九三一年敌新七旅在鄂西与红军作战情况*

（一）新七旅在藕池口剿匪情形。

一九三一年九月四日，赤匪贺旷两部啸聚两万余人，由洪湖倾巢南渡陷石首县，意图袭取松滋、公安，进窥沙市宜昌，而藕池口实为松、公门户，与石首隔江相望。新七旅奉命戍守松、公，进驻藕池口，与该匪凭河对抗。时与驻防湘境官垱之新十一师尚未取得联络。

九月三十日贺龙率匪众四、五千人，纷乘木船抢渡官垱，驻官垱，新十一师马旅赖营力薄不支遂为贺匪占领，并乘胜向石首继进，距公安三十里之黄山头亦被占据。而公、藕又相距六十余里，两水相阻，此时我军已陷入四面包围之中，且北岸新厂一带尤为赤匪蟠踞区域，盖公安一失，则我归路断绝。是日夜新七旅旅长亲率一、二两团由藕池口向闸口背进，期与公安之第三团联成一线。三十一日到达闸口。十月一日第三团由原驻地杨家河向黄山头出击，闸口部队也分向雾溪咀、周家场两路进攻。时贺匪子分两路向公安挺进，公安于是日午后一时失守，闸口部队与匪鏖战一昼夜，距料该地乱民及不肖团队受共匪运动，乘势暴起，致我军背腹受敌，首尾莫应，向黄金口引退。

是役我军计伤官兵五百余人，损失步枪一百余支。

（二）公安之役。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窜津澧之贺匪卷土重来，意图据公安、石、藕，即令第一团进驻申津渡堵截，令第三团守公安，旅长李亲率二团由松滋之王家场出击，是日该匪分两路进攻，以一部佯攻申津渡，以一部袭取公安。申津渡苦战终日未分胜负，守公安三团分兵一营前往支援，匪乘三团增援一团之际袭占公安。部队引退米碛台、沙道观一带，李旅长率部推进至磨盘洲。于磨盘洲与该匪遭遇激战竟日，匪势不支，我亦以弹绝援远未予穷追。占据公安之匪经湘军大部威胁，于元日向长阳五峰方面逃窜。二十二日李旅长复率部协向二十一军之袁团于刘家场前后夹击，匪向长、五方面溃退。李旅追至赤溪河，该匪寅夜退过子良坪。复由驻石门之周燮卿旅派队追剿，是役我军共伤亡官兵两百余。

一九三一年敌徐源泉部与红军作战情况*

(一) 公安作战情况：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安县城被贺匪攻陷，原驻公安之川军因寡不敌众，退过松滋。

十五日总部电令徐源泉及何成濬调[第]十军两师赴鄂西协剿洪湖共匪。以主力由江陵出松滋、枝江分向石门、慈利协同湘西各部队，包剿贺龙股匪。鄂东防务由十三师张印湘部担任。

二十三日新十一师张英部段仲团协同驻鲢鱼须陈师朱营进剿马家院，击溃该处之匪。

二十九日张英师周、段两团进剿连[鲢]鱼须匪共，匪众万余，该匪入窜石首。

(二)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日到四月十六日徐源泉所部进剿监利、沔阳、公安、石首、汉川、江陵、宜都各匪事实。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日刘培绪旅以其部攻占监利县属柳家集，毁匪巢。十三日徐继武旅以其部攻占三官殿龚家场普安寺诸地，获枪百余枝。徐德佐旅攻占沔阳县属峰口，获枪三十余枝。张振汉旅芮团进占公安县属之李家口、黄金口、斛湖堤诸地之匪二千余，毙三百余人俘百余人，于是公安县至江陵县属沙市、郝穴之交通乃无阻。韩昌峻旅以其部击溃叶家集大小陆牌之匪。

十四日徐继武旅次第肃清沔阳县属通海口、总口铺、府场、新沟咀、代家场、龚家场乃分向柳家集、余家埠、李家场续剿。徐德佐旅进剿峰口，韩昌峻部策应。容景芳旅进至洪湖内搜剿，刘培绪部占领夏家门向柳家集进剿。

十五日沙分坡、李家口突至匪约二千余人，驻江陵一四二团往援，毙匪二百余人。

十七日一四三旅魏团游击曹家咀，毙匪百余，捕杀府场积匪刘天伟、刘心纯、刘松林、王道之四人，刘培绪、徐德佐旅会剿举办清乡。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徐继武旅进剿江陵县属姚家集、潭长头各地，击溃匪数千毙五百余毁匪兵工厂四所，匪散窜沙岗、易家湾、泥巴沱等地。湘鄂西政府设石首县属调弦口，匪枪枝颇匾，作战多用冲锋。徐源泉令徐继武部完全肃清江北，再渡江收复藕池口、石首县、华容县。十八日拂晓匪千余枪约八百猛袭官垱新十一师赵英。二十一日郭勋部克服宜都县属之渔洋关进剿长阳，击退贺龙股匪，俘二千余人。二十五日徐源泉部开始进剿石首县属藕池口及白露湖附近地区。二十七日徐继武部击溃白露湖西南之共匪，占领沙岗。二十八日韩昌峻旅攻占白露湖北岸龙湾之匪巢，匪窜湖中。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张振汉所部攻占藕池口，遂渡河进剿石首县。六日张旅黄团攻克石首。二十五日忽有匪甚众窜江陵县属之袁家咀、十家铺、马家砦、杨李湖各地，一百四十四韩昌峻旅进剿，毙匪二百，俘地方干部六十余人。一九三一年四月四日一四四旅军团围剿姚新场，匪正在开会，毙二十六人俘二百九十三人。十五日朱河、峰口一带匪复猖獗，三十四师遣一旅一团进剿，十六日追击于峰口克峰口，汪洋负重伤，刘培绪亲率二团向朱河进剿，午刻占朱河，匪三千人窜洪湖。张振汉旅目夫子冈、宋家铺向塔市驿及调弦口东南十余里古井口进剿，黄团占塔市驿，芮团占古井口。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三十四师薛团攻克沔阳县属之戴市乡。二十三日匪五百余窜三官殿，三十四师所部往剿，桥为匪毁未能穷追。二十四日晚匪千余人、枪四百余由贺家湾邓家

台来犯府场，二十八日匪复猛攻府场，薛团与李团夹击，匪不能支，夜乘大风雨之际向三官殿、戴家场而遁。一九三一年六月五日晨黄家台附近窜来匪千余人枪四百枝。十五日横河子有匪约四百人滋扰，驻杨树峰之三十四师一旅刘营往剿，毙匪约六十人。十六日晚匪四百余人向施家港三十四师一旅张营阵地猛扑，战三小时被击溃。二十二日沔阳县属挑湖内新口肖家湾有匪八百据扰，我军猛击，匪向天门县窜去。晚九时，匪二千余人枪七百余支突由谢仁口包围施家港，战四小时，匪溃窜。二十三日上午戴家场有匪彭国才股千余人，战四小时匪向瞿家湾窜。

关于一九三一年春夏敌“围剿”洪湖根据地的资料*

(一) 湘鄂川边区剿匪清乡经过记录：一、采取分区分期清剿：1. 分为第七、第八两区。第七区——公安、石首、监利、沔阳、洪湖、新堤、郝穴、松滋、枝江、宜都、华容、澧县、津市、临澧、常德等县属之。清剿部队为四十四师肖之楚部，新三十四师陈渠珍部，新二旅刘培绪部，湖北警备旅容景芳部。第八区——宜昌、巴东、长阳、利川、咸丰、龙山、来凤、恩施、鹤峰等属之。清剿部队为四十八师张振汉部、新三旅徐德佐部、暂编十九旅罗启疆部、二十一军之郭勋部。原驻津市澧县之十九师李觉部，安乡之新十一师张英部及松滋枝江新七旅李宗鉴部经何主任协同剿办。2. 原拟由东而西分期进剿，第一期围剿洪湖，第二期恢复长江交通，第三期消灭贺龙匪股。后因四四师在鄂东剿匪，不能抽调，未能依原定计划施行。二、进剿经过：(洪湖地区) 1. 新编二旅进占上车湾及监利。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刘培绪旅奉命由汉口西驶，十八日到新堤，二十日正午到下车湾。刘旅第二团上岸，午后占上、下车湾，二十一日向监利攻击前进，下午二时攻占监利。2. 洪湖四周之进剿。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刘培绪旅第一团进占新桥向观音寺进剿，共匪七百向鸡鸣铺溃退。同日二团占太平桥。一月二日一团续攻鸡鸣铺，敌向习家河退浩子口，又经徐继武旅进剿，占谢家场，珠矶市之线。新三旅徐德佐部一部推进至邵家河、朱家场以东地区。一月三日各部队继续向西进剿沔阳，午正十二时，徐德佐旅逐次将匪阵地击破进迫沔阳。余众向洪湖纷窜。溃聚习家河之赤匪，同经刘培绪旅之第一团驰剿，向太平桥、上车湾间窜扰之匪约千余名经该旅第二团击退向洪湖逃窜。容景芳旅亦进占李家寺、天然墩。

3. 三义河、于家庙之清剿。

蚁聚三义河之匪约五千余名，一月四日向曹特务团围犯，击退向峰口退窜。向南进剿之徐继武旅攻占于家庙。攻占习家河之刘培绪部本日继向毛家口前进。

连日雨雪，各部队均在其防地附近搜剿残匪。

一月八日容景芳旅北向周家湾、陈河港进剿。一月九日曹特务团奉命调汉口，新堤防务由容旅派兵一营接替。

一月十日徐旅张团及特务二营肃清新沟咀、渔洋镇后进占姚家咀。韩昌峻旅驻仙桃之王振昆团以一营兵力向沔阳张家沟之线推进，余在襄河、岳口、仙桃、分水、脉旺等处清剿。

一月十一日刘旅进占柳家集，捣毁匪巢。

一月十三日徐德佐主力在白庙附近渡河。

3、长江两岸之清剿。

(1) 收复公安——公安地居长江南岸，北与江陵接壤，东与郝穴昆连、久被号称万人，枪三千枝[的]段德昌部盘居。

二月六日张振汉旅之芮学勤团由沙市向该匪清剿，午后四时进至公安附近，激战竟夜，七日上午匪由南门向藕池方向退去。张旅二月十六日全部进驻公安，沙市防务由补充第一团接替。溃窜藕池之匪本拟早日进剿，因受江北沙市、监利间匪的牵制，延至二月二十六日始经张旅及补充二团第一营及山炮连开始进剿。

二月二十八日进至横堤市，同时午后芮团进至交河厂。三月一日向藕池

口前进，赤匪二千余名经黄、芮两团夹击，向南口、天心洲一带溃窜。

三月六日向石首进剿，二时三十分占石首，匪向华容、调弦口溃退。我收复藕、石等处，匪已失其根据地，匪首贺龙由西派队来援，江北残匪亦由沙市、郝穴间渡江南窜。

三月七日贺匪之妹率部千余名窜聚北湖、闸口，同日公安县城西之班竹垱亦窜到赤匪千余名，向城北之黄金口进犯。资福寺附近由三湖窜来之赤匪二千余名旋向曹家场退去。有向文村庙渡江之企图。

三月十三日，段匪数千，窜扰石首东之庄家铺，贺匪千余亦窜集拓口、吴达河图东犯石首西扰藕池。三月十六日段匪反攻石首，与张旅激战六小时，向庄家铺退去，同日贺匪千余进犯藕池，匪不得逞纷纷窜去。其余各小股经徐旅渡江堵击，咸被击退。窜聚调弦口、焦山市段德昌股十五日经张旅驻公安之各部队进剿，匪向桃花山退去。（2）会剿桃花山。我军收复调弦口、焦山市等处，赤匪大股即窜扰桃花山、佛冈、七家湾一带。三月三十日赤匪一股约三、四百名乘夜向调弦口进犯。四月四日张旅芮团二、三营由焦山市进至孟尝湖将匪千余名向东山古井口击退。同日，宋家铺之匪千余亦被黄团二、三营击溃，余匪向塔市驿窜。四月五日芮团进驻古井口，四月六日黄团进剿塔市驿，残匪向东山溃去。长江南岸上游各股匪经张旅各团进剿后，其大部赤卫队、先锋队、游击队等约四万余人，三千余枪均麇集湘省北之桃花山。为歼灭该匪计，特商同湘军会剿该匪。以张旅芮团由焦山市、夫子冈、古井口一带堵剿，黄团由塔市驿沿江进剿。四月十八日张旅击退企图突入塔市驿渡江北窜之匪约千余人，回窜桃花山。二十一日该匪向宋家铺第二营猛扑，经张旅夹击余匪向桃花山、何公湖分窜。二十二日各部队收复东山、桃花山，将伪政府、兵工厂分别捣毁。盘踞茅草岭之赤匪江右军三大队，每队枪五六百枝经张旅进剿后，向墨山铺退去。4、各绥靖区内之清剿。（1）月二十九日朱河市之役。赤匪七千余人，枪五千余枝由江南北窜朱河市，向刘旅孟团围犯。同日，汴河头、福田寺等处亦窜到赤匪数千，声言进犯车湾毛家口。犯朱河市之匪四月二日经刘旅长驰援，将孟团救出，午正十二时撤回上车湾补充，暂取守势。六日刘旅二团向朱河进剿，另以一部由老人昌夹击新六军，该匪纷向洪湖退窜。该旅收复上、下车湾。（2）老新口新沟咀之激战。四月八日赤匪千余名向徐德佐旅薛团老新口防地进窜，该团范营驶援，余向李家场方向退去。四月二十三日匪大股分三路向薛团之老新口、新沟咀阵地猛扑。该团阵亡第一第二两营营长及连排长二十余人造第一团驶援始收复新沟咀，匪向周刘咀、余家埠、杨林关退去。

四月二十九日盘据余家埠、李家场一带之匪约千余名复分两路向我老新口防线进扰。三日晨闫团迎击，在熊口附近接触后撤周家庙。五月四日将匪向白露湖方向击退，七日在沱子口、龙湾等处毙匪数十名，余向白露湖逃窜。

（3）白露湖清剿。

三月二十七日韩旅王团搜剿至白露湖附近，击退窜扰小河口、张家湾、易家口等处匪约八百余名。

四月七日董团向姚新场匪三百余名进剿。八日拂晓将匪围击。

四月二十一日王团进击由江南桃花山窜来小河口之匪二千余人。

四月二十六日王团击退分三路来犯汪家桥之匪二千余人。

（4）小港之遭遇战。

三月二十三日潘善斋旅接替容旅防务后，以该处从峰口逃来难民甚众，该旅派第二团护送。二十五日进至小港，匪千余名向该团截击，该团且战且进，至大和附近，时已薄暮，匪乘黑夜来袭，后将匪向吕挂咀、周家口一带击退。

（5）峰口之激战。

四月七日汪、彭两匪部共约六千余人、枪四千余枝，乘峰口兵力单薄接防部队未到，向容景芳旅管心源团进犯，战数小时，管团阵亡连长三员，因众寡不敌退出峰口。

四月十五日管团反攻，薛团亦向峰口协剿，毙匪甚众，午正十二时收复峰口，匪向洪湖方向退去。

五、追剿贺龙残部。

盘踞施鹤一带之贺龙匪股，于我军清剿长江两岸时，数次图窜均未得逞。

四月四日该匪离去老巢，率部窜出巴东，进扰秭归、兴山、远安、荆门、当阳等县。

四月十五日贺匪四千余名由远安南犯当阳，防军郭勋部艾营与匪激战。十八日郭旅长率袁、傅两团由远安驰援，李德惠补充团亦协剿该匪。李团进抵慈化寺附近，匪以背腹受敌，纷向远安东之观音寺及当阳西北之百宅砦一带退窜。惟是时，当阳之围虽解其东北之荆门又告失陷。二十一日我李团遂向荆门驰援，及该团驰援荆门，匪已远扬，将学生及外国教师多名据向观音寺退。经鄂北范石生部，川军郭勋部及四十八师李、依两补充团协剿，匪之实力消灭过半，余匪逃入南漳西境之武当山潜伏。（二）湘鄂赣川边区敌“剿匪”部队及担任区域的划分。第一区司令李觉，部队十九师，负责清剿莲花、永兴、宁冈、遂川、茶陵、攸县、酃县、桂东、汝城等处。第二区司令王金钰，四十七师，负责萍乡、莲花、万载、宜春、安福等处。第三区司令王金钰，四十三师，负责宜丰、上交[高]、新喻、文[高]安、铜鼓等处。第四区刘建绪，第十五、十六、三十二师，负责清剿例阳、平江、通城、通山、崇阳、小铜鼓、修水以西地区。第五区郝梦岭，五十四师，负责清剿武宁、修水、阳新、大冶等处。第六区刘夷，独立十四旅，驻扎奉新、安义、德安等处。以上六区统归湘赣边区剿匪督办王金钰指挥。第七区肖之楚，四十四师、新三十四师、独十[一]旅、新二旅、容景芳旅，负责清剿公安、石首、监利、沔阳、洪湖、新堤、郝穴、松滋、枝江、宜都、华容、澧县、津市、石门、临澧、常德等处。第八区徐源泉，四十八师、郭勋部、新三旅、暂十九旅，负责清剿宜昌、巴东、长阳、利川、咸丰、龙山、恩施、鹤峰、来凤等处。以上两区统归湘鄂川边区剿匪清乡督办徐源泉指挥。另五十二师孙旅集中樟树、新涂、清江一带。清剿起始大致皆在三一年一月初开始，根据总部十二月二十三日电令特派精干部队划区清剿。

关于一九三一年夏敌在荆当远和均房地区与红军作战的资料*

(一) 贺龙部荆当远地区作战经过概要：

1. 四月四日晚贺龙部袭陷巴东，戴旅退守北岸。

贺龙北渡后复陷兴、巴，据报有四、五千人，枪三、四千枝，子弹缺乏，企图窜扰襄樊。

灰(十日)电，红军贺龙(部)于支日(四日)陷巴东，复陷株归，窜踞兴山，职部(系徐继武旅)主力在渔阳关，调遣需时，该敌得以狼奔豕突。元(十三日)电，十三日午后张海云司令已收复秭归，决以袁团驰守当阳，防敌东窜。

寒(十四日)电，贺主力十三日窜踞远安，即向当阳承突，职率袁治团由宜昌向当阳堵剿，佟、傅两团同时由江家口向远、当追击。令张海云由秭归向兴山尾追，以期一鼓歼灭。

皓(十九日)电，袁团十八日向远安进攻，贺已窜荆门，将远安收复，十九日取捷径向观音寺进攻。南漳方面甚为空虚，电请范师长派队清剿。

2. 贺龙率部盘踞施鹤一带，恃险负隅。在未进剿前，曾令陈渠珍师在龙山、桑植、石门之线任南面之封锁，罗启疆旅在来风、咸丰、恩施之线任西面之封锁，北面巴东、宜昌一带江防由川军戴天民旅及郭勋任之，东面枝江及公安之堵剿，由新七旅李宗鉴部及四十八师之徐继武旅担任之。以期将该悍股围困于施鹤区内，尔后抽队进剿。四月四日贺率全部袭攻戴旅，遂得由巴东窜出。

(二)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到六月二十四日宜昌警备司令郭勋剿贺龙股匪于荆门、当阳、南漳、远安间事实：

1、一九三一年四月

(1) 贺龙股匪前由巴东县窜兴山、陷远安，十五日晨围当阳。郭勋部于十四日进至距当阳五十里之双莲寺，十五日令袁团向远安进击，以傅团及秦团之艾一心营为二路进击当阳，佟毅团位于双莲寺保持与后方之交通。上午十一时与匪接触于当阳城外，战至下午三时，袁团迂迳至匪侧，五时匪溃向远安、南漳县。是役毙匪数百人，俘数十人，俘匪称贺龙总指挥在远安之杨坪。

(2) 十七日晨，郭令袁治团进击远安，第三师师长遣张、包两部由兴山向远安进逼，郭勋率佟团及艾营驻当阳监视荆门。盖匪贺龙已于十六日分一股千余人窜陷荆门。

十七日未刻贺匪由荆门向石牌移动，图由石牌、马良等处渡河东犯以苟合黄安县、麻城县之许继慎股匪。武汉行营令郭勋由当阳星夜向荆门驰剿，五十一师范石生转令钟祥、沙洋及鄂北部队严堵。

(3) 十二日贺匪窜南漳东之东巩市，郭急令袁团跟踪前进。

二十四日徐源泉令郭抽袁团、傅团所部五个营由远安开拔，佟团由当阳经渝溪河向东巩市前进，定二十六日总攻击。且令五十一师所部相机出击会剿。

二十五日各部队到达赵家河驱逐匪之警戒部队，二十六日晨进至远安西北九十里之山夹口，与匪战至午时始占领山夹口，遂向东巩市追击。

二十八日袁团、傅团、佟团由东巩市出发向罗家攻击前进，将其地占领后即集中袁[远]安北六十里之双坪向贺匪主力攻击，留驻远安之唐营则攻击

洋坪之匪。

2、一九三一年五月

(1) 一日郭勋所部并力猛击峡口，盖以匪回窜也。匪踞峡口时胁大刀会加入得新机枪十八挺，子弹万余枚，匪窜各处尽得团练枪弹势且益张。

(2) 自当阳战役后，匪遁观音寺，追击观音寺，匪退峡口，进击峡口，匪窜东巩市，往击东巩市，匪则迂窜峡口及花果坪、狼牙山、散布八、九十里之地，深伏深山大林之中，属部转战于荆门、当阳、南漳、远安四县，击此，匪则窜彼，尾追，匪又逸去，疲于奔命，拟请李依两团进驻东巩，五十一师进驻萧家堰、保康县，王光中所部推进南漳附近，各扼要截堵，属部专任攻击，似此分工合作必能收效。

(3) 一日五十一师曹团、王团围剿果盒坪薛家坪贺龙股匪基干部队之伪教导团、伪二十九团 共三千余人。午刻匪溃向三景庄、保康属马良坪窜，俘获甚众。

三日五十一师曹团之追击部队至朱河向马良坪追剿，催王光中部向保康属歇马河截击。

五日王光中部克歇马河。

六日王光中搜剿至距马良坪二十里之界山，伪八师以全力凭险扼守，王光中部攻占界山，匪溃窜马良坪，追至马良坪匪毁桥，隔河相持。是役获枪五百余枝，我军阵亡连长一员、士兵二十一名，伤连附二员、士兵四十八名。

七日贺匪全部集中桃花寨、马良坪，屯粮数千担，组织农民协会。五十一师已到乾溪与郭勋部袁团、傅团、伶团取得联络，商定八日攻击。

八日郭勋部袁团由洋坪出发，夜宿南漳属通城，知马良坪之匪被友军击溃退至水田饭旦口各地，友军已占马良坪，（击溃马良坪之匪未见电文公牒无从叙述）

(4) 九日袁团往马良坪联络友军，抵重阳坪折回，报云马良坪驻军为匪反攻，马良坪复陷。于是俺团兼道前进，袁团经天宝砦前进，傅团位于西坪为预备队。下午二时，佟团抵距马良坪二里许之喻家垭遇匪四千人战四小时，匪扰顽抗，及袁团击退天宝砦之匪约一千人来马良坪协助俺团，匪始经官帽山退向竭子河。时已昏暮即就原地警戒，入夜大雨，溪暴涨丈余，匪遂得远遁。是役毙匪伪团长一人、营长一人、匪徒约三百余人。我军阵亡十三名伤百余名。

(5) 十一日自喻家垭溃退之贺匪大股已过歇马河、任家店有窜房县之势，小股仍据水田饭旦口。

十二日贺匪由歇马河欧家店西窜，似有扰乱房县企图。六十九师副师长王怕群率其部到达保康，向东寺坪蒋口截击。（以后电文未见，其事实无从叙述）

(6) 贺龙股匪二十三日窜陷均县，赵文启部张营向汉河北岸撤退。五十一师李柱中旅分途由均南东南之青山港、草店往剿。

(7) 三十一日伪七师、八师约五千余人向五十一师李柱中所部两团袭击，战六小时，匪溃向均属孙家湾。毙匪约六百人。

三四团王团克夏均县，贺龙股匪大部窜均县属南境武当山孙家湾各地。

3、一九三一年六月

八日，五十一师令一五一旅（旅长张浩）三 一团（团长谭天彝）进剿

武当山。三 一团由谷城县属石花街进驻小店，知伪七师八师教导团共万余人，枪约六千枝，主力在老雅山、武当地之线沿途构筑工事。均县属草店、丁家营之匪闻我军到达小店，即向武当山窜去。

九日，三 一团三 四团（团长王珩）及三 三团一部于午后先后到达草店，老雅山、孙家湾之匪已退武当山，磨针井有匪前哨警戒。

十日侦得匪在武当山至元和观、老君堂、太子坡、财神庙、紫霄宫据险构筑工事，在锯子齿、长身岭各以一团防我侧击，兼有相机抄袭我后方之企图。匪前进部队在磨针井、回龙观，匪前哨在玉皇顶，决定分三路围攻。

十一日拂晓以前我军分三路进剿，攻击部署如下：（一）三 三团一部由正面经元岳门、进山门、元和观向玉皇顶、回龙观、磨针井之匪进攻。（二）三 一团由左翼罗家坡经溜石坡向玉皇顶、回龙观、磨针井之匪进攻，但前卫须歼灭匪之前哨，并令第三营向锯子齿进攻。（三）四团由右翼白虎山向匪进攻，以一部绕攻长方岭。上午七时我军取围攻形势，炮兵向匪阵地轰击，战四小时我军占玉皇顶、好汉坡、回龙观、磨针井，匪之最前线之阵地即失，遂向太子坡溃退，下午四时我军占领太子坡，第三营亦进占锯子齿，匪向财神庙、紫霄宫溃退。

十二日匪在十八盘、财神庙凭天险藉工事顽抗。我军迫击，击走十八盘之匪，追至紫霄宫占领南岩，匪向太和山窜。

十三日进击太和山，匪向西南方散窜，我完全克服武当山、太和山，毙匪几及千人，俘二百，米五百石。

注释

原文如此，疑有误。

关于一九三一年敌向房、保根据地进攻的资料*

(一) 房保进剿“贺匪”情形：

赤匪第三军军长贺龙率所部第七、八两师及其它附属匪军，自湘西渡过大江北岸，窜抵荆门、当阳、远安后，经我鄂西驻军围剿转窜南漳~带，复经我军之一部会同友军合围疼剿，贺逆不支率残部乘虚北窜，窃踞房县、保康，组织伪苏维埃政府，组织红色补充军、游击军，聚众万余，到处肆扰，其企图在夺取鄂北腹地，以为活动中心点。拟造成郧、房、保为新赤色根据地，而期与洪湖之匪遥相呼应.....。

五十一师李柱中旅奉令进剿该匪，期复房、保，并指挥分驻均县、郧县、南漳、谷城之张、刘、赵、孙各部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由河口驻地出发，全部集中谷城。当时伪匪军实力有教导团、特务营、手枪营、大刀队，伪七师王一鸣部步兵三团，八师许光达部步兵三团，红色补充军、游击队各部，其兵力较厚，七师集中保康踞玛瑙观，八师集中房县，另以红色补充军、游击队出没于均、谷、房、保边境。国军所拟收复保康计划，由青峰镇以西地区，会合郧阳张、赵各友军直取房县，歼灭匪军。并防其乘虚袭扰襄樊，故以王、谭两团及曹团周营为进剿部队，于八月二日由谷城向石花街推进，经哑子口、柴金洞、玛瑙观向保康县攻击前进，以曹团（缺一营）为巩固后方部队，分驻郧、谷，督同团队巩固后方，并护送给养，维持交通。是日午刻到石花街时，郧阳张连三部已击溃大木厂一带之匪向房城挺进中。我赵文启所部亦按照计划进至张潮铺沙河店一带，拟续向青峰佯攻前进。适是日大降大雨，山洪暴涨，致沿途桥梁悉被冲毁，前进困难。三日，据探报匪之大部仍集踞房、保之线，玛瑙观、紫金洞均有小部分匪盘踞其间，希图扼守险隘，拒止我军。当即率领各团按照原定计划冒雨前进，拟先歼灭紫金洞当前之匪，扫除我前进路之障碍，詎知进抵巴茅店时，雨势愈大怒涛澎湃，溪涧重重，蛟腾岩谷，不克飞渡，遂在原地停止警戒。六日天色稍霁，水流亦缓，复续进到达千紫哑，七日到哑子口，我先头部队王团将紫金洞匪击溃并占领该处。是晚天复大雨，翌日雨仍不休，我军前后部队被水隔绝，成数十段，官兵系陷于急流中，武器弹药损失及淹毙者甚众。十日我后续部队逐渐集结紫金洞。匪之伪七师竟又间道袭犯谷城南之粟谷庙，企图扰我郧、谷后方。当时率部涉河挺进，我先头部队到达玛瑙观附近，匪以南河水大，袭进困难，拟回玛瑙观，已被我军截断，匪众被水淹死者亦多。十一日我军全部到达玛瑙观，接张连三电告，该部围攻房匪，激战数昼夜，嗣因弹尽粮绝，受挫颇巨，折退花果园一带。时赵文启部亦因雨大水深，阻于八道河一带，青峰、房县两方均无进展。当令王团昼夜前进，搜集材料，架桥向开丰峪挺进，十二日午占领该处，十二日进攻保康，激战终日，十四日我王团占领保康城，匪向青峰溃窜。当电刘正增部进驻保康填防。十五日我军全部取间道向青峰追进，十六日全部到达李家湾，庙坪河附近，沿途俘匪甚多。十七日先头部队谭团驱榔口之匪进攻青峰，王团右翼包围疼剿，激战五小时，匪溃窜房县，午克青峰。当饬赵文启部暂在八道河停止，维持石花街至青峰之线之交通。

十八日据探报匪以七师残部及教导团特务营部集结马栏，并构筑坚固工事，凭险顽守，八师集结于白窝房县之线，马栏前方之梅花山斛口一带，匪均布有相当兵力。斛口木桥已被破坏，徒涉困难。黄昏匪由谷道向我包围，黑战五小时，肉搏十余次。十九日我各团分途搜剿肃清阶口以东地区之匪。

是午探报匪军向我右翼有逐渐移动，企图迂回袭击之模样，当即变更原定计划，由张连三部向白窝房反攻前进，五十一师李旅则由右翼取间道猛进，二十一日克常家河、玉瓶河一带之匪，复折向猛攻马栏。午完全占领马栏，匪向房县溃退。二十三日晚，匪星夜倾巢北窜，于房城附近之高山树，立旗帜疑兵，诱我深入房县，希图乘虚袭犯郟谷。我军闻讯，遂决心放弃房成跟追匪踪。即电张连三兼程趋房填防，五十一师李柱中旅二十四日全力尾匪追剿前进。匪以我军锋利不敢抗战，大部由房城白窝之线经黄连树、观音堂北窜，一部经观音堂、栗子坪东窜向石花街袭进。我军取间道跟追，到观音堂与匪接触，匪乃向北溃窜。二十五日我军跟追到达盐池河，困匪于谷地，二十六日又跟追到达虾蟆口，二十七日追小店子，二十八日追抵孙家湾。匪以连犯喘息无定，逃亡甚众，复南窜分道观、乌龙庄，四散于深山穷谷中。我军冒雨进剿，二十九日克分道观，三十日克乌龙庄，乃天雨不休，溪河复涨，前后部队被水隔绝数十段，致进剿为难，且给养告善，复奉范师长电示，洪湖之匪北窜，节节逼犯漳宜、襄樊震动，九月三日又奉电集中光、谷策应漳、宜，四日遂遵命撤返原防。

关于一九三一年冬红三军回洪溯后敌与红军作故的资料*

(一) 鄂西赤匪贺龙段德昌股，自五月盘踞襄河北岸永隆河、灰埠头、张截港一带，经张振汉师，黄师、刘培绪、王药字各旅疼剿后，复窜据潜江，于十一月三日完全渡襄河进至杨林口、竹根滩之线，匪凭河顽抗，激战至四日未能得手，张师长遂于六日晨令各部全线向匪猛攻，已刻将匪徒击溃，并令全部跟踪猛追，至午刻我黄新、刘培绪两旅遂将潜江完全占领。计是役毙匪千余，余匪向潜江以南之新沟咀方向逃窜。

(二) 襄河南北两岸赤匪号称五师之众，在北岸者为贺龙股，盘踞渔新河、张截港一带，在南岸者为段德昌股，盘踞潜江、沙洋等处，汉口行营命令肃清该地匪徒。即派张振汉师长率该师黄旅及刘培绪旅，王药字旅前往清剿。预定计划，第一步肃清北岸之匪，第二步收复潜江，第三步收复沙洋。并以刘培绪旅附山炮二门为第一纵队，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向张截港之匪进剿，四十一师之二四六团及王药字旅为第二纵队，亦于二十六日夜向渔新河、永隆河匪进剿。二十七日第一纵队占领关吉口，申刻占领灰埠头，毙匪甚众。尔后两纵队向张截港会剿。二十八日激战，匪顽抗，屡向我反扑，肉搏数次，午后三时匪向潜江方向溃退，四时占领张截港。是役计毙匪千五、六百名俘虏数十名。

(三) 贺段二匪联合窜踞襄河中流天、钟、潜、山等县，猖獗异常，徐德佐旅长中弹阵亡，行营令张振汉率部兼程驰援。至随枣应山方面，豫匪崔二旦、王大辫子等股由桐柏及唐县方面窜入鄂境，会合当地共匪程克纯股洗劫随属之安居、均川等镇，应山县长亦被掳，更令萧师陈旅驰赴随县，另派一旅别往应山清剿。陷析水之匪一部窜踞李家集以北八里湾一带，我四十八师韩、徐二旅除留一部驻守黄陂李家集，余在八里湾、河口、新集、柳子港、长轩岭与匪相持中，萧师又在平汉南段，沿路部队不足三团，并时与匪击，其情形与赣省相同也。

敌第四十四师(肖之楚部)一九三二年在鄂中与红军作战故斗详报摘录*

(一)一九三一年底(十二·二十七)徐源泉拟定之部署:——四十八师工兵(蒋)营在叶家场防堵,尔后架设京——皂电线;——四十一、四十八师骑兵连二十七日到应城(由随县来);一四十四师徐团——皂市;——一四二旅经石家湾、王家场、永兴镇、京山向孙桥镇方向进剿红三军主力;——丁旅王团集结束山,俟京——钟间交通肃清后由该旅旅长率领赴钟祥接防;该丁旅集中钟祥后须于相当时期以一部进驻宜城;——黄旅芮团——在 天门待命;——四十一师沙洋,沙洋——张截港防务由兰旅担任;——沂汇、岳口、彭市河防务由新二旅担任;——新三旅各部集结天门;——蒋特务团一部任应城防务,主力集结县东南境防汧汉湖之“匪”窜去;——曹特务一团即集结京山担任城防。(二)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以后因四方面军在黄陂附近活动,四十四师徐团又奉命令经由皂市经孝感赶到三汉埠维护交通,防四方面军西进。当时十三师驻横店,第四师部队亦在鄂东或铁路线上,肖之楚要该团与之连络。同时四十四师还令其补一团亦开到孝感车站任守备,并令所在广水——花园——孝感二百四十四团部队一律加强工事。四十四师徐团走后皂市防务交四十八师工兵营担任。(三)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我袭占皂市,四十八师工兵营撤至应城待援,红军围陈家河,龙王集蒋特务团阵地并分兵包围应城。蒋作均称二十一日晨我红军分两路袭龙王集,并分围县城,请就近到孝之四师十二旅驰援,并盼派兵一团至杨家河相机支援。四十四师师部根据徐源泉令于二十五日令其陈旭团开往杨家河。一月二十七日,红军离应城(诱敌)。四十八师工兵营二十八日出城援陈家河,至城西南二十五里遭红军包围,蒋负伤失踪。

一月二十七日肖之楚说:据情报蒋特务团、四十八师工营、十二旅均损失过半,蒋营长阵亡,某团长失踪。

蒋作均俭感两电称二十四晚红军围应,二十五晚西撤,二十七晨张旅援龙王集——陈家河,午刻在毛家河、张家庙激战,被红军包围,张联华及二十四团团团长失踪,部队下落不明。

一月二十八日徐源泉令四十四师到杨家河,陈团向应城增援固防。

二月四日何成浚令四师集广水、花园、孝感兼顾应山城防,四十四师侦得四师接防后,移应城、长江埠、皂市、天门一带。二月二十五日交接完毕,四十四师开始移动。

(四)徐源泉是三月一日(不是如徐所说三月九日)即盼发鄂中区第一期剿匪计划,并限三月八日准备完毕。

当其下令时,何称红三军全部集结在龙泉镇、吴偃岭、白马庙、瓦庙集、永隆河、张截港、灰埠头、渔新河、花台、柳河、芦家口一带,三月六七八日围攻皂市部队(打了韩昌峻部)后红七师于十二日由蚌湖北南去余在花台——柳河一带,并有二百余围京山。

(五)奉徐令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率韩旅由皂市向柳河、天门进剿,徐、黄旅向观音湖进剿。四十四师为配合、支援,即以王旅由长江埠至皂市会合辛旅(在应城——亦去皂)并力进剿,长江埠防交蒋特团。

三月四日张振汉说红军在龙泉镇、瓦庙集、台李庙、灰埠头、渔新河一带,并在天、应问柳河市附近。五日他打算带韩旅向柳河市进剿,打通天、应交通并连系在襄河边之各部,以便再进。六日皂市辛旅据报×部在皂市外

十余里与红军接触，韩部在皂市西南之李家场布防，红军三个师及独立团散布在龙泉镇，主力在汉宜路两侧活动，有“扰我右后方袭皂市模样。”

三月六日韩旅在文家墩、张家场被围失利，华文选令辛旅杨团增援，并令应城之补一团及王旅徐团急至皂市。三月七日韩率一团困守文家墩，其宗、王两团被阻于李家场，辛旅杨团向李家场红军压迫，以掩护宗、王两团进解韩部之围，后杨部将韩部残余掩护回皂，韩失踪，宗阵亡，杨右腿亦负伤。

(六) 文家墩战后，十日敌称红军于当日晨向吴偃岭、钱家场、白马庙移动，似去打京、皂。三月二十二日红七师一部由张家场援胡家北湖，与四十四师辛旅接触。

四十四师补一团——陈旭，补二团——傅佩亮。

(七) 四四师瓦庙集、钱家场战斗情况。

“三月三十日午王旅进至瓦庙集附近，与红八师接触，战至午后四时数进数退，后续辛旅增调一部突击左翼袭匪侧翼匪乃退据该集西北各山头，张支队与红九师在何家场激战红七师亦由黑流渡增来。”

“四月一日徐令驻皂市之四十四师补一、二团迅至白马庙一带，以策应前方及掩护交通，皂市防由应城之一四四旅接。”

“四月二日”敌为打通两支队问连络“复令辛王两旅长各率一团”向红军出击，“同时张支队孟团亦向匪夹击”激战良久，红军退。

四月四日敌称“一、二支队间已取得连络，匪三日拂晓向灰埠头——吴偃岭撤退，惟附近各村尚有红军散伏。当日肖之楚率补一、二团由皂市出动，下午一时至钱家场忽接徐源泉送来急件探“匪深知我后方增兵，即以大部向东迂截，希即还旗回皂，以免意外。”当时肖之楚以为“师行在途转移不便倘匪于转进之时突施猛袭，势将无法应付，遂飞飭各团停止前进，炬不料转瞬间枪声四起，先头付团与匪接触，同时匪大部向钱家场四面包围，赤帜遍野”，自午战至西将红军击退。五日晨华率两旅及张振汉部来迎，红军向台李庙——花台分退。”。

肖之楚在其被围时华文选等应援不力大为不满说：“此次钱家场之役，华付师长文选，辛旅长明利屯兵瓦庙集，钱瓦相距匪遥（八里路）并经迭电飞调，乃延至翌午始率队来援，斯时匪已远退，若非陈傅两团官兵用命，几至全军复没，该等奉命不力，驰援无诚，应转请处分，以肃军纪，旋于五月二十日奉主任何指令，准于一并撤职。”

(八) 瓦庙集战后，红九师到应云孝活动，一部绕袭隔浦潭，断敌交通。四月十三日夜三时红二十七团一部七、八百袭入该市街至十四日晨七时向西南退去。（与四十四师工兵营第二连战斗。）

(九) 五月三日徐说红三军主力在龙泉镇、白马庙、钱家场一带；红七师一部、独立团，天、孝游击队等在刁汊湖、湖冢、柳河、花台一带。

此后期间敌人进攻刁汊湖至五月二十日敌吹“大敌已告肃清”。

五月二十日后，红三军全部及独立团在天、皂间之九真庙、柳河、花台、文家墩、张家场及瓦庙集、钱家场、白马庙之线。曾攻天门，陷北关，迫县城。五月二十三日敌四十四师王旅长率所部及补二团由皂市出援，行至张家场附近与红三军主力接战，红军占李家场、文家墩之线，并将桥梁破坏，阻击皂市增援，激战数日。五月二十六日徐源泉指示：1. 王旅确实占张家场、徐家沟，高垒坚守，极力支撑，以待调集大部合围聚歼；2. 四十四师驻杨家河之王团及京山三营均速调皂市；3. 赵团调龙王集，腾出四十四师全力至皂

增援王旅；4.张振汉所部经天门向张家场夹击，解王旅之围。四十四师接此令后，即令于旅隋山炮一连即日驰援，并给被围敌补上粮弹，补一团由龙王集至皂市归于指挥增援，王旅死守待援，肖之楚俟杨家河之补三团郝奇部到后亲率到皂市。王金铺向上报告说：红军“连日猛扑，探知我给养无多，倾其全力逼围张家场阵地，并截断张、皂交通，以阻我援军前进”。经战斗后，红军“略向后退，遥取包围，不复如前数日之逼近”。（宿二十六日报告）

五月二十九日于兆龙报：红七师占李家场——杨家场之线并将城隍港（庙）——鄢李冲桥梁破坏，断我王旅归路，截击增援队，本日我率两团沿公路向钱家冲攻，陈团向李家场攻，红军九师一部及七师向我猛冲，战数小时，将红军打退，我占李家场后向文家墩进攻，红军大部忽由郭家场增来，双方激战甚亟，我与炮营长均受重伤。

同日（五月二十九日）王金铺报：我率两团向文家墩之红军夹击，红军凭工事抵抗，经激战始将文家墩一带村庄先后占领，已与于旅取得联络。连日我旅死伤四百余。

（十）六月三日何成浚令四十四师驻随县之陈旅开赴应皂归建，遗防由曹特务团接辖，徐称：六月上旬八师、九师之二十五团在襄北天皂以西地区红七师及九师主力在襄南，后向北移动。七月三日称红军大部在瓦——永——一灰、溪一带，一部在柳河、花台汊湖，一部在京山附近。

（十一）敌第四次“围剿”开始时红八师围京山，红七、九师在金家店、观弯岩及永兴镇——源泉镇一带，并发现一部向京山东北移动。

敌为给京山解围，并于京城附近与红军决战，遂将原定计划（左路军第一期剿匪计划）略事变更，以主力迂向京山进剿，并以一部占汗宜路上要点堵我南去。

具体部署：

第一纵队——向景家墩集结，经藩家场向源泉镇进攻；

第二纵队——向皂市附近集结，经音泵场向永兴镇进攻；

第三纵队——向白马庙附近集结，经龙泉镇向义和镇进攻。红军如与一、二两纵在京山东南地区战斗，即由吴偃岭经看山铺向敌右侧夹击，如“敌”逃应跟进。

第四纵队——于七月十五日向黑流渡——张港——旧港推进，占领之。

七月十五日敌军开始行动，红军在京山附近部队均撤走——向吴偃岭、瓦庙集方向，敌改向下洋港、台李庙、灰埠头、张截港各方向进击。

七月十六日敌四四师两旅及两补团与红七、九师战于斋婆店，红军向瓦庙集——台李庙方向退。一八日红军又向渔新河退去。十九日红九师与四十四师在张家新场、杨家场战，我九师颇有损失，二十几团 损失最重。（因过河落水甚多）二十日红九师到花台柳河，红七、八师亦在该区域并攻皂市，当夜退走，二十日四十四师主力由张截港附近折回。二十一日至皂（增援）。

七月二十四日徐称红九师及八师一部已到汉水甫，红七师及八、九师各一部在吴偃岭、瓦庙集一带，敌遂集中一、二纵队向红七师进攻，红军向马良、永隆河及钟京间散退，后因敌跟追又从马良一带折向义和集，后来仍从马良渡过了河。

（十二）红军在范家集一带与战之敌为郭、张两纵队（川军），战后八月四日我从李家市向下蚌湖方向退走，到八月十日川军罗纵队在浩子口附近

担任对红军之堵截，四十一师主力由李市向下蚌湖追击中。

（十三）九月十一日四十四师的于旅及陈旅于显文团（共三个团）进到潜江以南之梅家咀、杨家场，准备协同川军“清剿”，十六日向荆门方面追击红军某部午刻在垢家接触，红军向麻城铺退去，敌称红军系红七师及八、九两师各一部，二十一日该旅又报红七师二十一日夜到石牌，二十二日寅他们由皮家集分三路进击，卯刻至半头堤——唐家滩，红军正过河，遂被敌阻，退向瓦碎滩又遇敌阻，颇有损失。九月二十四日敌称红七师已先后由钟祥以南渡河向京、钟交界东北深山移动。敌五十一师一五一旅（王甲本）称九月二十三日贺部在钟祥以北倒口渡河，后经丰乐河东去似与王一鸣部会合。九月二十七日红七师在官桥——东桥间与追敌四十四师王旅战，红军颇有损失，战后红七师向黄家集方向转移。十月一日敌称红三军全部七、八千人在六房咀附近。二日到土门——三里岗——洪山寺一带。三日到了余家湾、邵家台与王家本旅战后转向京随山区。敌云六日红军仍在大洪山一带，七日红军由东庄贩向当家店窜去，中途与罗启疆部战斗转向何家店、柳林店移动，后复沿王义贞店——石板河，京皂间之永兴镇向西转走，后又沿东桥向北面山区而去，在罗家镇——黄家集与四十四师陈于两旅、王甲本旅战后一股去大洪山，一部西去倒口，一部南去太和集——瓦庙集。十月十八日红军一部去曲山店。十月十九日四十四师于旅在袁家台附近与王炳南部遭遇，战后红军向东北转移。一九三二年十月间五十一师除王甲本旅外，还有一个陈旅，似乎李柱中已经被换了。注释 原文如此。

敌第四十一师张振汉部一九三二年在湖北与红军作战战斗详报摘*

(一) 李家市战斗

四十一师欲封锁红军于洪湖，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其一二三旅二四五团（芮团）由多宝湾出发，开驻李家市，下午三时与在李市之红二十五团一部（二、三百人）战斗后占李市，并筑工事。一月九日探息红二十八团全部集脉旺咀。十日红九师分三路围攻李市一部阻断沙洋、李市间交通，但未攻下，当夜退走东方。

(二) 皂市、龙王集、潜江、张截港战斗

一月十六日夜红九师经红庙、泗港过汉水经渔新河、永隆河、瓦庙集、白马庙、龙泉镇袭皂市，十九日克皂，守该处之四十八师工兵营退向应城，红军追击逼应，武汉震动。一月二十九日（一说二十七日）敌四师张旅为我歼灭，四十八师工兵营长阵亡。二月四日午后三时红九师（西返）陷张截港，张截港之新三旅徐营弃守张港，红军继围策口刘旅魏、李两营，攻潜江刘培绪部，二月五日克潜江，刘部退过岳口，徐敌遂令四十一师黄新旅（一二三旅）四十八师徐继武旅合力攻张截港，解救刘培绪，打通汉水交通。二月十一日敌黄新部探得我二十五师汤慕禹部（敌称汤志谟部）千余十日晨到高桥、李市、付高场一带。敌向张港进攻部队编成为一二三旅住多宝湾之二四六团（欠第二营），二四五团第一营，住沙洋之一二一旅二四二团，住白口之四十八师一四二旅二八五团住多宝湾之骑兵第四十八连及骑兵四十一连之一排，二月十二日出发，拟先解围策口后攻张港，并要求刘旅攻黑流渡以作牵制，敌行进路线为多宝湾、聂吕家场、泗港，十三日行进中改变决心先攻张港，晚到三台场、泗港、聂吕家场等地，派骑兵到策口对面连络不应，红军已歼余策敌并息，十二日红军与初二旅部队战于黑流渡，十四日十时四十分敌攻张港与我接触，其二四六团午后十时占张港，红军向灰埠头方向退去，敌死伤一百五十人。

二月十三日刘培绪称十二日早万团向张截港进击，至杨家湾被围，又围策口两营被围不得不于十二日夜抽出四营由刘团长率领救援黑流渡，十二时到黑流渡南岸，又因红军已将两岸包围，敌均撤回岳口，我追至岳口二里处，十四日午后仍在对峙，魏李两营无损失，但接应部队伤亡百余。

计划二月十七日刘培绪旅吕团接防张港，二四六团占聂吕家场，余还白口，多宝湾归建。但因刘部未能接防，故张港均由四十一师部队住。

附：二月一口四十八师徐旅已到钟祥集中准备与四十一师、四师会剿歼击十二旅之红九师，二月四日黄新率芮团及一二一旅二四二团集中白口、永隆河。

九日徐源泉令刘培绪收复张截港，固守策口，黄旅孟团协助刘旅收复张港后驻泗港，丁旅依团（二四二团）住沙洋固防，徐旅（四十八师）到永隆河，至于北岸清剿计划待肖师接防到皂市后再定。

(三) 文家墩战斗

张港战后，红七师似从马良渡河到襄北。

二月十八日何成浚定划区清剿。徐源泉执行此任务二计划《二方略》“恢复应城、岳口间交通后就应、岳大道划分两区抽十团以上兵力同时分剿限十五天剿毕，沿襄河住军专任防堵勿任北岸匪南窜，或南岸匪北来。”《进剿部署》（一）韩昌峻旅全部（三团）与黄新旅（两团）担任应岳大道以西之

清剿均归张振汉指挥；（二）徐继武旅两团驻于天门柳河市，旅部住天门为总预备队，新三旅住皂之一团由徐指挥；（三）四十四师三团以上兵力进剿沔汉湖，由肖之楚具体拟定办法。《部队调动》四十八师一四二旅调至天门；四十四师由黄安、孝感调来；四十八师之一四四旅由鄂东之李家集调赴皂市；四十一师黄旅由泗港等处调至天门，新三旅部队由天门调皂市。

三月二日四十八师之一四四旅到皂。三月四日四十四师辛明利旅接四十八师韩旅皂市防。

三月四日敌得息红七、八、九师在瓦庙集、白马庙、渔新河、灰埠头、永隆河一带。张振汉遂下令：（一）韩旅五日经天门向灰埠头进剿；（二）黄旅六日由泗港向观音湖，徐旅由张港向灰埠头进剿，两旅协同向渔新河、灰埠头一带进剿，并坚固天门、岳口之防；（三）刘培绪部接防张港；（四）新三旅薛团进至柳河与四十四师辛旅连络，维持天、皂交通；（五）韩部到天门，黄部到观音湖时如红军北去则韩部经子河市向瓦庙集，黄部向天门口、台李庙、瓦庙集推进。

三月五日韩昌峻报张振汉说该部出动因遇雨停于文家墩附近，赵团及旅部仍在皂市；如六日天晴即向天门前进。文家墩两侧有少数赤匪扰害，已派队驱逐之。

三月六日张振汉到文家墩侦察地形觉得该处不利，且思此次韩旅去天门原以避战之目的，期达与黄、徐两部连合，以期力大，而易于应付，今即停止于此，实与本意违背，如在此待匪，不若回皂市原阵地吸收匪而歼灭之，匪现侦知我，企图必扰害我前进，前为安全计，遂决心面令韩即刻撤回皂市，韩接令后决于六时后撤回。至正午十二时红军向其猛攻，三面包围冲击，并断其后路，至午后二时其二八七团阵地为红军占去一半（敌应战者只二八七、二八八两团），至午后四时，敌宗、王部向皂市撤退，而掩护撤退之两个营及韩昌峻本人又被围，时已至暮，张决定七日拂晓增援，午后六时决定：皂市留四十四师一部防守，以杨团沿汉宜路西进佯攻，以策应王、宗、赵三团之攻击；（王、宗两团是韩旅之部队）王团全部，宗、赵两团各一部由王团长指挥于七日拂晓向李家场前进解围。

三月七日上午六时敌各部出动，八时“解围”韩亦救出，惟红军紧追，韩因疲劳过度，又落后，为我所俘，敌宗团长阵亡，四十四师杨团长负伤。

敌后四十四师集中应城整理，其他各路敌人亦均在原地不敢再动，皂市由四十四师部队防守。

（四）瓦庙集战斗

敌称红军在文家墩战后仍在宜汉路两侧，并有一部进入沔汉湖。

三月十七日徐重修订鄂中区第一期剿匪计划（因前计划失败而另定部署矣）。

《部队抽调》：四十一师黄旅由泗港市、张截港于三月十日调至天门；四十八师徐旅由张截港、岳口三月十日调至天门，四十四师辛王两旅及该师补充团于三月二十一日调集皂市。

三月二十五日敌两支队拟分由皂市、天门出动在柳河会合，当日第一支队到柳，二支队因为给养未办妥未能出动，第一支队即在柳河、张家场、陈家河等处宿营，三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两支队始于柳河会合，午后五时同返皂市。但又听说红三军已去襄南，敌（张）拟先剿沔汉湖，预定二十九日开始动作，但二十八日又得悉红八、九两师回到灰埠头，继向皂市、柳河移动，

乃放弃攻汧汉湖之计划。二十九日敌一支队沿汉宜路，二支队沿汉宜路南侧向白马庙前进，一、二支队当日宿于白马庙、龙泉镇一带，并于当日探知我军仍在灰埠头方向，而石家河、瓦庙集均无匪踪，三十日敌经瓦庙集处向灰埠头接近，十一时，一支队（四十四师）在瓦庙集、杨家湾、黎家湾之线与红八师相遇，二支队行至梅家湾、雷（黎）家西湾与红九师相遇，敌一面应战，一面占领阵地，筑工事，激战竟日，我军在瓦庙集西北、西、西南及魏家关（街关）西北高地，四十四师辛旅在瓦庙集东南各邻庄，王旅在瓦集及东北附近各邻庄，占领阵地，四十八师徐旅在梅家小湾、雷家湾、观音寺，四十一师黄旅在魏家关、魏家场一带占领阵地，敌以守为攻打算消耗红军后出击，红军向其各部两侧迂回，配合正面部队猛攻。三月三十一日伪天门县长报告红七师于三月三十一日上午由张截港向灰埠头、梵进寺前进。当日敌一、二支队间交通被我切断，敌称红二十六团在其二支队正面，二十七团在其二支队左侧，二十五团在其二支队右侧（切断了敌一、二支队间交通）。三十一日午红七师到达灰埠头，午后四时红军增加兵力甚多，右方迂回部队占领戴家河市高地，将二支队包围，张振汉令住天门之新三旅薛团于四月一日到石河市与黄旅联络冲破我之包围，并且令四十四师抽两团向南攻，到相当距离，四十八、四十一师部队（二支队）亦抽两团夹击我，以恢复联络。四月一日午后一时新三旅薛团到雷家大湾（雷家西南以东、），同时敌判红七师已加入战斗。下午敌徐旅与薛团配合出击，将戴家河市以南红七师迫退至戴家河附近（敌说据捉我士兵供七师于三十一日酉刻加入战斗即运动于敌背后），同日敌并策划由三十七旅占张截港，四十一师驻沙洋一带部队亦到张港一带堵击，期将我堵在襄北，同时敌四十八师辛旅曾由瓦庙集向二支队方面攻，但不得手又缩回瓦集。本日敌机一架坠毁。四月二日敌徐已感困难。急欲结束战斗，张振汉向徐建议以四团之众向一二支队间我军出击，一部进至灰埠头向北攻，并由丁、刘部沿汉水截击解决战斗，并补充弹药，打通他们与皂市的联络，敌人并说此次战斗关系很大，我军似是与他们争最后生存。本日薛团（在攻击戴家河附近我军之后）守在梅家湾东南。敌说昨（一）日红七师三团攻其二支队背面，九师及赤卫队攻其正面，情形紧张，若非薛团赶到，四四师辛旅威胁红军左侧则严重万分矣。四月三日，当日红军在其二支队正面部队稍向后撤，敌新三旅薛团追击被红军打击，由黄新部接应退回，但黄新被我击伤。四月四日红军将主力从正面移至石河市、戴家河之线攻敌二支队后方，敌转移兵力以主力应付，防红军迂回，谁知红军是去到钱家场打援的，张振汉在午后四时接一支华文选通知才知道。华并要求张救肖，张随将阵地缩小抽兵向红军进攻、但至六时红军仍守石河市、戴家河之线，午后八时敌二支黄旅放弃原阵地同薛团全力攻石河市、戴家河，彻夜战斗。四月五日拂晓敌连攻，四十四师（一支）亦出击，战数小时，红军始退，敌进至钱家场解围，红军一般向白马庙、花台方向退去，一部向汉宜路以北京、钟山地退去，一部向瓦庙集以西退去，敌二支仍到瓦集、戴家河之线。敌云此役毙伤红军二千数百余人，获枪三百多支，他们也伤亡三百多名，如连一支队方面，红军伤亡共三千余，敌自己伤亡千余名，获枪四百多支。

四月八日敌一支及肖之楚援队东返，当日宿龙泉镇，二支人日到白马庙。

（五）瓦庙集战斗后敌军与红军行动

敌八日得悉红九师攻应皂间之龙王集与保卫团朱部及蒋特务团对战，徐命四十四师及张振汉支队（四十八师三个团，四十一师一个团）援龙行至皂

市闻红军围龙部队已于九日向京山以东退走，即停止东去。十一日敌又称红七、八两师到了龙泉镇一事[带]。

四月十三日红九师围京山，县长告急。

四月十四日敌称红八师已回潜江，红七师在屈家场附近，一部在灰埠头、张港（又称七师二十、二十一团在京山东南十里之富子山，十九团在张港）。

四月十五日四十四师（四）团，四十八师（二）[团]趋京山解围，当时京山东十五里之屈家场一带与我激战，华文选告急。四月十七日敌二八三团孟团赵团等部增援，红七、九师于当夜（十七日）即撤走，七师向瓦集转移，九师向花台柳河转移，敌十九日回皂。

四月二十日敌报红军六、七师由汴汉湖至应城境后，沿应——云大道到三合店，似持有乘虚犯云。四月二十一日敌报由石家桥、麻河渡（应东南）来红军甚多，并有K二百策应似持有绕攻应城犯云模样。四月二十一日午后四时黄新说我已进至应城东关，到三合店者为红二十七团在杨家河与蒋特务团战后退去。四月二十二日张振汉率（二）团增援应城，我向西北转移一往杨家河、两河口方向。四月二十三日敌察明到应城者为红九师全部，红九师自京山撤退后到柳河休息一天，遂到汴汉湖经石家桥绕道而来。梗日子刻向两河口、杨家河方向退去。又说据俘红军人员供：红三军拟以红九师扰应城，七师扰皂市、京山，八师在下洋港相机向宜城扰乱。四月二十三日夜九师向景家墩以西退走。四月二十四日在宋河一带，同时敌得悉红军一部（四、五千人）由永兴镇经×武街向景家墩前进，先头已到景家墩附近，敌判系红七或八师，之后又说其中一部逼近了龙王集、潘家集，有日子刻沿京山大道向西北退去（退向田店附近）。四月二十六日敌到田店侦察了解到我系八师，四月二十六日拂晓向石板河、观音岩退去。四月二十九日转往龙泉镇，当夜九师转往西南龙泉镇、瓦庙集方向。此间敌不断追随红军到处增援、“驱逐”，受红军牵制，但红军亦未能予敌有力打击，似未作真面目之战斗。

（六）敌人清剿汴汉湖、张家场战斗

朱保安团之番号为“鄂北保安司令部步兵第一团”。

五月二日张振汉支队由应城向汉川移动，四日到汉川。

五月五日刘培绪称红七、八师集中渔新河。

五月九日敌称红三军两团由净潭口往横堤，先头已到斗步头、小里潭，同日敌沙洋住军称红军师一个团在泗港，七师二十一团在永隆河。

五月十一日敌称红军一个师到横堤，后并说是八师由贺龙率。

五月十二日又称我军八师及独立团、游击队，九师一部在小里潭、横堤、斗步头一帮。

五月十三日应城敌人说汴汉湖北岸之麻河渡有小船千余支，乘船之红军均穿绿军服判系九师。

五月十五日敌占十里潭、横堤。五月十六日就地清剿，张振汉下令孟团将十屋台、黄氏祠一带大小岛屿以火焚之。

五月十八日徐源泉作如下决定：（一）汴汉湖已将肃清，“残匪据蒋家场、芦家口延至柳河一带，为彻底消灭该匪，并使收复匪区永殿安全，特定部署如次”。

1. 四十四师主力迅向柳河、张家场进击，找堵截东面退来之匪，尔后该部确实占领柳河、皂市线待命而进。

2. 张振汉部四团，蒋作均部二团，刘旅主力清剿汴汉湖；其部新三团亦

参加湖北岸之清剿。

3. 汉川、天门、应城三县经此次收复之区，由朱怀冰厅长责令各县组织民众速办善后，并于各重要村镇无驻军之处的派常备队以资镇慑。

又五月十八日肖之楚部称：删日红九师吴堰岭向柳河张家场方向东走，八师及独立团仍在净潭、蒋家场一带，七师在瓦庙集东西地区。为肃清汆汉湖后即将净潭、蒋家场、张家场、柳河之匪驱逐，使天皂交通恢复，并使该线以西完全成良民区特拟定部署如下：

1. 二支队将横堤附近及汆汉湖南部肃清后向净潭口、蒋家场方向推进，所遗后方防务，由刘旅担任；
2. 天门防，由刘旅吕团担任，新三旅薛团由张振汉指挥，协同向芦家口夹击；
3. 四十四师王旅及傅团向皂市以南推进，协同第二支队（张振汉的四个团）向柳河、吕家场方向进剿。

五月十八日敌说红八师两团本日反攻乾驿已攻入街内，被到该地之三十六旅刘团冲出。

五月十九日新三旅薛团说红军某部在九真庙、王氏渡一带；二十日另一部在天门城东之八字脑、夏达口、大小板港一带，还有一小部在天门城西熊家河口。还说有大股红军由汉宜路向永隆河退去之说。另一情报，斗步头附近之李家集二十日有红八师千余。

五月二十五日敌称红军二团由张家场增至向家湾与四十一师孟团战斗，其中一团并由向家湾向东运动。

敌称五月二十一日（马）夜蒋家场红军向斗步头及西南之李家集运动，人约二千多，五月二十二日敌进攻未得手，同时乾驿以西之便河口、灌溉场亦发现红军大部队，同时刘旅亦报天门被围，均请增援，五月二十三

日敌称围天门者为红七、九师各一部，二十二日向柳河渔新河退走。

又称七、九师养日由芦家口迄西之八字脑渡河向蒋家场一带增加。

五月二十四日敌新三旅薛团报八师在芦家口、八字脑、大小板港、龙坑一带（似可信），九师仍在汉宜路一带。

五月二十五日敌占斗步头，第振汉说与其作战者为红八、九师各一部（似不确）及独立团。

五月二十五日张振汉下令增援张家场解四十四师王（一三二旅）旅之围，逐渐向芦家口、天门线前进，部署如下：

- 一. 乾驿镇之三十七旅刘团限即日到芦家口，二. 孟团即日到乾驿，三. 张团一营即日到螺丝湾，四. 任团即日到田二河，五. 牛团暂控于斗步头，六. 张团在分水咀之一营候令随师部前进。

五月二十六日张又令牛团住横堤之营于二十六日进至斗步头，五月二十六日张团及牛团之一营由斗步头到张家场（不是皂市南之张场）尔后渡河攻击蒋家场，孟团主力在向家湾，一部向蒋家场进攻兼掩护张团，到手后极力向净潭口压迫，任团仍在原地。当日下午敌探报红军已由蒋家场、净潭河口向芦家口、龙坑寺逃窜，敌占净潭口、蒋场。

五月二十六日午后敌称四十四师王旅固守王家场，张振汉所部准备向天门行动，尔后增援四十四师。

五月二十七日敌称净潭口以西情况大变，净潭口、蒋家场间交通被切断二百八十五团王营一部及二四六团蒲营（在净潭口）被围，敌另两个营兵力

在蒋家场，徐继武打算待风雨稍停即赶往蒋家场。当晚十时敌又称，净蒋间红军已退，围净潭口部队有六、七百人亦已撤围，判断红军之用意似防敌从净潭口渡河。五月二十九日敌因从净至芦家口不便，仍折回，取道回二河、乾驿、大板港、天门在援张场，敌并收斗步头，净潭口、蒋家场悉数焚烧（徐继武旅干的）。五月二十九日午后一时新三旅薛团一营向芦家口进攻，行至八字脑遭红军打击战二小时，红军退往芦家口，后红军又往攻，四十一师张振汉急令孟团前往增援，红军退趋九真庙，敌说先是红军一营攻新三旅薛团，后红八师二十四团由八字脑西北向其迂回，午后四时张振汗带徐旅赶到战至午后六时三十分红军始退走，损失甚大（伤亡三百多），但仍在柳河大道以东。又说本日上旅反击大胜已抵文家墩与于旅取得联络。二十九日夜张振汉支队一部到天门。

敌云：五月三十日红七、九师仍在张家场、李家场之线与四十四师于、王两旅激战，敌死伤二千余（后又说敌自己死伤千余），五月三十一日敌张振汉支队四团由天门经九真庙往张家场方向增援，当日敌占九真庙、柳河，我向花台退走，与敌接触者为二十四、二十七团及游击队，后又称我又向灰埠头、瓦庙集退去。

（七）六月份敌我行动

自六月一日——敌人张振汉支队在天皂之线以西清乡。

据称六月一日起川军向潜江、老新口进攻。

六月一日徐源泉称红军大军又由焚进、灰埠头、渔新河、瓦庙集一带到了皂市西石蒸山、杨家场一带，并说明日川军要攻潜江。

六月三日敌称红八、九师大部退张港，九师在瓦庙集一带，又说京山被围，围攻者系红八师，同日又说我伤兵今日自张港又到灰埠头。渔新河、焚进寺，敌骑兵本日在石河市与红军接触，红军在石有千余，六月四日徐源泉说红军又到花台，一部围京山，肖师两旅前往解围，六月四日张振汉说川军与红军战于土池口，敌拟在解围部队返回后再向天皂以西进攻，六月六日称红军一部自京山开至石家河竹影寺、钱家场一带。六月五日敌报围京山者为红七师及八师一部，八师北退，七师南退。

六月七日徐源泉电：红七、九师在灰、渔、张港、瓦集一带有援潜江样，八师扰京山似牵制我军，本军亟应进剿以竟全功。同日张报称六日三十七旅报红七（九）师已渡河至杨林口，七日称红军又有五千余渡河去潜江、老新口，并运粮（可能为九师），另有红军二、三千向沙洋前进中（七师）。另出现在宋河杨家河方向活动者为红八师。

六月十二日张敌称十一日晚川军确占潜江，占者为郭勋部，在蚌湖与川军战之红军十一晚向李家市退去，红军伤亡二千以上，张受此鼓励，决于六月十三日向渔新河、张港推进，以配合川军消灭红军。出动之部队为一四二旅，四十八师全部（三）团，一四四旅二八八团，四十一师孟团，骑兵三个连，工兵一个连。”

同时徐敌又称五日川军郭部占丫角庙，张华封部占李家市，鄂军为断红军南北“交甯”之路并使川军进展容易，以第二支队（张振汉支队）克日西进，向渔、灰、张港进攻，同时以刘培绪旅以一个团由岳口向黑流渡进攻。

六月十三日张敌说红八师已由杨家河甯往宋河北之平坝一带。七、九师一部往洪湖，一部及游击队，赤卫队在黑流渡，张港、渔新河、台李庙、灰埠头等处红军较众。

四十四师两团在京山并向孙家桥以西地区清剿；四十四师陈旅二团及补一、二团于六月十三日集中皂市，尔后沿汉宜路进击红军主力。

六月十四日敌张支队及刘培绪旅出动，十一时占渔新河，敌说在渔者为九师二十五团战后退向张港、灰埠头退去，同日九时三十六旅吕团占黑流渡对岸。

六月十五日张报，红九师二十六、二十七团及七师由贺带在襄南与川军战，红二十五团二营及警营十四日午后四时由张港到灰增援，张港只余一营百余人，八师二十四团由台李庙来，昨晚十时到灰渡河在县河南与鄂军张支队作战，红二十二、二十三团十四夜一时亦由台李庙到灰以东、渔新河以西等处，同时转刘培绪电郭勋说其三路吃紧，郭要去增援要鄂军去潜接防。同时张并说我八师与其两团（在陈芦以西）激战，我进攻甚猛，后退向西北方。另红军约两营兵力在南岸攻其张团阵地，经其任张两团抵抗，红军退灰埠头。

六月十六日我北岸部队亦退灰埠头。同时称初守渔者为红二十五团三营，后第二营亦由张港来援（警卫营亦同时来）与八师同与敌作战。

同时徐源泉决心乘我主力在河南令其第一支队主力十六日由皂向白马庙瓦庙集进剿，京山之四十四师部队亦准备以一个团视情况出击，第二支队视情况向灰、张出击，并要黄新旅两团亦加入二支，视情况接防岳口，刘旅即接潜江防。六月十七日张报我八师六月十六日夜移至龚家台、高家新场、七里岭、姚家台、五方台之线（渔北以东以北），红二十五团渡河与敌南岸部队对峙。

六月十九日四十四师决定以（四）团古龙泉向瓦庙集进剿（后未动）。

彼日徐电十四日川军即弃潜江，川军一路退丫角庙，二路退后港，三路退资福寺、岑河口，四路退观音寺，红军一部到荆当，川军拟先清荆当再复东进。

六月十八日张部因川军六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失败，四十四师又终止出动，惧红军全力打他，故撤回天门，午后九时到达天门。并云二十三晨九师全部由河南至灰埠头。

敌区报刊摘录*

(一) 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一年之零星资料 1. 敌四十三军(李棠) × 师师长雷部套光(入桑植)、× 旅旅长龙裕仁(似属雷部)、× 师师长杨 × ×(慈利)、× 师师长张 ×(宜都)。(一九二八年四月) 2. 陈渠珍部 × 司令向, 下属向姜二团(住塔卧等处), × 司令彭达武下属二团(住龙山)。(一九二八年四月) 3. 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四十三军移住鄂西, 当时五峰、来凤一带之敌似为第五师刘和鼎部, 师部在宜昌。4. 一九二八年十月初李云杰部第二团(李团)与贺总所带队伍在王家厂(澧州属)作战, 战后贺部到泥沙与罗效之部作战。此时四十三军似负责鹤峰一带之“进剿”。李云杰师驻澧州一带, 其曹典江团在石门与罗效之部住在一块。5. 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向子云团攻桑, 全军覆没。6. 一九二九年八月, 吴尚奉命进攻石门、慈利、大庸地区的红军, 吴当时似为五十二师师长, 下属有闫仲儒旅。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吴尚被撤职, 二十日叶开鑫继任五十二师师长, 戴斗垣旅也属五十二师。7.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八日陈渠珍任新三十四师师长。8. 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日彭位仁师和戴斗垣旅、陈渠珍部、川军张英部又占南县。十一月二十九日李觉部由常德出发进攻贺部红军。十二月十三日陈诚部占华容。9.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 彭位仁率成铁侠旅二团由沅江登陆向南、华“进剿”, 张英率新——师一部进抵安乡, 双方夹击, “南华, 收复, 贺窜津澧”。复由张英、戴恢垣、陈运夔部追击, 彭师转岳阳开平江, 后红军去石门, 又从石门再攻津澧, 敌除张、戴部向红军进攻外, 周矮子部攻石门。敌十二月九日、十日“收复”津澧, 红军退王家厂, 在红军攻津澧, 张英部向津澧移动时, 洪湖红军占华容, 后经陈诚部由岳阳派一个团与张英部夹击, 十二月十三日敌又占华容, 再后红军又占华容。(二) 一九三一年九——十二月有关的资料 1. 九月十日中央社讯(一九三一年): 贺邝匪军七日晚二时反攻, 进犯岐家河南之资福寺, 经李云右派队迎击, 战三小时, 毙匪数百, 匪退郝穴、潜江。沙市防备益形严重, 市外周围掘有战壕, 并建有了望台, 哨兵梭巡不绝, 江岸附近布有电网, 以四团兵力守之。2. 十月三日讯: 扰监利共匪一日败窜荆门, 海军德胜号舰在此布防, 同时楚观舰由岳州移防城陵矶, 江贞舰亦由汉口赶岳州汪泊。3. 十月三十日讯(这个时间对): 共魁贺邝两股, 拥众数万, 在湘省之南华澧安, 与公石监利一带, 肆意捣乱已经数月, 曾一度攻陷南华, 两次占领公石。湘省南华一带并未驻有大军, 贺邝两匪因于二十一日由石首乘虚入湘, 分芮路进犯南华, 计邝匪, 由鲢鱼须进攻南县, 贺匪由调弦口进攻华容, 南华两县, 即于二十二日午刻同时失陷。4. 十一月二日讯: 南县十月三十日晨已由彭位仁部克服, 匪向监利石首逃窜。5. 十一月三日讯: 川湘军二日恢复梅田湖, 向华容进攻。彭位仁部一日由南县进攻华容, 匪窜梅田湖, 三日克华容, 匪分窜公、石、津、澧。已令川军追击, 戴恢垣、陈渠珍部由澧州堵剿; 6. 申报十一月七日讯: 湘省共匪以南华为最猖獗, 在南县为贺龙部, 在华容为邝继勋部。彭位仁师联合川军张英师进剿, 上月三十日克南县, 贺匪向鄂境逃窜, 各剿匪部队分三路猛攻华容, 第一路有川军张英师, 由梅田湖经鲢鱼须直攻华容城, 第二路为彭位仁师, 率刘修人、戴恢垣两旅由甄家咀、中和垵、赤松亭进攻正面, 第三路为南华各团队, 由乌咀长春垵攻侧面, 业于三日克华容, 次日各军即进驻县城。7. 申报十一月九日讯: 贺匪万余, 分逼津澧, 四路总部已令湘西剿匪指挥戴恢

垣，协同川军张英师，一纵队李国钧，及第一警备司令陈运夔、戴季韬各团，共谋夹击。五日陈团长由澧城电省，略称贺匪围攻澧城，迭次架梯猛攻，均经肉搏击退，匪伤亡甚众，刻仍相持激战中。8. 申报十一月十二日讯：贺邝等匪窜陷南华，克南华后初以为匪又窜回鄂境石公，不料贺匪声东击西，竟由鲢鱼须抄袭津市，该处仅有陈运夔、戴季韬两团，仓卒抵御，众寡不敌，不得已退守澧州城，津市遂于四日失陷。当夜匪又追抵澧州，围城猛攻。五日澧城又陷，陈、戴两团官兵退守合口。9. 申报十一月十五日讯：范石生该部曹团，九日在襄枣交界之黄龙垱附近攻破程克纯营一次，十一日令该部渡河向宜城追剿。军讯，贺匪窜津市，被赖心辉部马旅（十一师马昆山旅）击退，复窜澧北大堰垱、张家厂。10. 申报十一月二十一日讯：湘六、七、八、九、十等五个月共收 2726850 元，共付军费 2526446 元，外加临时费五百万。一一. 申报十一月二十四日讯：十一日收复津市，同时固守澧城之陈部出击城外，匪窜公安、松滋一带。12. 申报十二月五日讯：贺匪在南华、津、澧迭受重创，现复由石门率众南窜，漾（二十三日）日陷临澧，图犯常、桃，经戴恢垣、李国钧、向克权、何英等团扼守鳌山、长岭冈之线迎头痛剿，川军张英师一部由安乡侧击临澧，川军马昆山旅与陈渠珍部两个团并慈利之川军周燮卿旅夹击石门，断匪归路。贺匪因首尾不能相顾，宥（二十六日）日放弃临澧，仍返石门，并已加调李觉师由省赴常驰援，常桃可保无虞。13. 十二月八日申报讯：张师已兜剿华容共匪，李国钧部五日可达临澧，即向津、澧清剿。14. 十二月十三日申报讯（湘军二次围剿贺龙）：十二月二日贺匪又由石门新安合口二次进犯津澧，同时窜在鄂边之邝继勋匪一部亦二次犯南华，二日晚南县被匪占领。二日澧城突被贺匪包围，陈、田两团闭城而守。同日晚间，贺匪又有一部约五千人追至津市与马昆山旅激战一昼夜，达至三日早，马旅因众寡不敌，退往新州待援，津市二次被陷。同日起，滨湖之南县、安乡、沅江、汉寿各县均有电告急。何键得悉乃令李觉、陈渠珍、张英、戴恢垣四人，克日大举围攻津澧，以上各部统受李觉指挥。一面电请徐源泉所属驻湖北监利、公、石一带之刘培绪旅向华容推进，一面电请驻岳州之陈诚师抽调一部分，速由岳州沿湖迅援南华，并加调现在茶攸剿匪之陶柳旅，克日回省赴南华进剿。围攻部队分配如下：（1）川军张英与马昆山旅于五日集中于距津市十五里之新洲，六日早向津市进攻。（2）陈渠珍部张晋武、顾家齐两团与川军周燮卿旅定六日早攻石门，七日务克石门向澧州推进。（3）李觉本人四日从常德出发，五日抵临澧，六日率邓南骥旅与李国钧部、戴恢垣部两团进攻澧州，解澧城之围。（4）以上环围形势，前后，内外夹攻兵力计二十团以上，限定五日内收复津澧，先击破贺匪再南剿邝匪。于六、七日每日加派飞机侦炸贺匪。澧州附近之匪有一部已由县城东北之澧阳桥，经石灰港向顺利移动，×匪向鄂边溃退。15. 申报十二月十五日讯：十三日贺匪一部窜陷公安。16. 申报十二月十七日讯：容景芳部前奉令开赴监利一带，协助新编第三旅搜剿共匪。目前有扰湘匪共三千人由华容窜逃监利。徐德佐部自奉令开赴鄂西仙桃镇，担任附近一带剿匪工作后，即在该处从事搜剿。杨树峰地方有匪约二百人，特快枪者四五十人，于十一日拂晓向该防地袭击。第十六路总指挥徐源泉，对于肃清洪湖共匪，已拟有计划，只等候在鄂东剿匪之韩、张两旅开到岳口、潜江后即开始围剿。17. 申报十二月十八日讯：行营十七日令公安、石首、松滋、临利各地驻军，防堵贺龙窜鄂，并电令李觉、张英两师跟踪追剿。18. 申报十二月十九日讯：十八日长电华容全克。洪湖伪军长汪

洋，匪四千进犯各×河宋新场各处，经新三旅痛击，毙六百名。贺龙由公安窜陷松滋，李觉率各部向公、松进剿，并击毙匪首苟建章等。湘西方面，贺匪又窜宝城寺、官桥、郭家厂等处，鲢鱼须、梅田湖之匪被张师击散，由[向]桃花山窜去。19. 申报十二月二十日讯：李觉电告：十七日占鄂属西斋，十八日克公安，张英部驻镇南、华、安乡等县；徐源泉部十七日分路进剿松滋、公安贺匪。十九师长李觉十七日晨率邓甫骥旅出发张家厂指挥，马昆山、周燮卿两旅，戴恢垣部、顾家齐支队经鄂属公安、南乡之街河市，陈林市联络鄂西友军围剿公安残匪。惯匪贺画[炳]南奉贺龙令率众三四千，枪千枝，由鄂境鹤峰老巢出走，经堰垭向石、澧增援。我第一警备司令陈渠珍部分由大庸、桑植前往截击。十四日在堰垭附近鏖战。据敌人资料反映一九三二年我围京山次数和时间三月初，两千多人围京山；四月十五日，大部队围东南西三面攻之；四十四师（四）团、四十一师（二）团增援；六月一至五日，五千余人（八师及七师一部）；四十四师（四）团、四十八师（二）团增援。七月中旬，八师三千人多西南北三面围攻；十三师、四十四师（五）团增援，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各一部（三纵）相机策应。敌二十一军刊物称我七师系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四日晨在监利北约十里处经过时与川军相遇的，敌称将我截为两段。（三）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有关的资料 1. 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张英部马昆山旅又占华容，张部除马旅外还属杨铭旅。2.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九师李觉部五十六旅（邓南骥旅）开驻津澧段珩旅住岳阳。3. 一九三一年七月，大庸敌为向捷先团。4. 一九三一年七月，顾家齐旅第二团及一刘团曾由溪口向大庸境内之张海初部进攻。5. 一九三一年七月，陈运夔为陈渠珍部第一旅旅长，周矮子为第三旅旅长。刘运乾为常澧警备司令，马昆山为新十一师副师长兼旅长，罗树甲为十九师副师长。

6. 一九三一年七月，川匪司令苟载扬为李觉所杀。

7. 一九三一年十至十一月进攻华容东山之敌为第十九师、六十二师、五十九师（新十一师改名）和一些保安团。

唐伯寅似为十九师段旅的一个团长（段旅为五十五旅段珩部）。

8. 一九三二年一月段旅一 九团（刘建文团）住华容。

9.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张英师全部奉命移萍乡，所有南、华、澧、安防务均由十九师接替。一月二十九日息，十九师五十七旅（陶柳旅）住南县、华容。二月二十一日李国钧又奉命接南、华、安防。

10.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四日陈渠珍称朱扒子部十月二十九日击毙贺炳南。

11.

12.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红三军占桑植。

13.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陈渠珍称“红三军犯永顺”在泥糊塔战三昼夜，红军退桑植（又一说二十七日七、八、九师攻桃子溪、黄家台，不克向赤溪河退去）。

此时期石门保安团长为陈策动。

14.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我到桑植后，朱扒子团退至大庸中湖，县长退至永顺黄家台，周矮子旅派两团到大庸桥头，与朱团联络，永顺保安团住黄家台，桃子溪一带。四十三师田、瞿、谭三团十三日由凤凰出发，白团由沅陵取道永顺增援，白田两团似属龚旅。

15. 到一九三二年时湖南下属各县有保安团，岳阳、桃源、慈利、石门、

永顺、桑植、益阳；下列各县有保安大队：华容、临湘、南县、澧县、安乡、常德、临澧、沅江、湘阴、汉寿、龙山仍为挨户团。上列各县团队，亦均系挨户团、常备队编成。此外各县从一九三 年起均组织“剿共义勇队”其中有步枪的为常备义勇队。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摘录

1.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徐源泉任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刘镇华任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蒋闫冯战后，敌武汉行营主任（似为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各省部队。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后，敌设三绥署，何成濬任武汉绥署主任，刘峙为郑州绥署主任，朱绍良任江西绥署主任。2. 我一、三军团攻下长沙后，敌将公秉藩、罗霖两师调湘增援，公部为新编第五师，罗部为七十七师，公部一九三一年一月改称二十八师。3.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一日公秉藩、罗霖两师入湘进驻平江，岳阳。八月二十日红一、三军团再攻长沙与敌战于文家市，八月二十九日敌公、罗两师及钱大钧师抵长沙。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戴戟师到岳州，陈诚师亦奉命入湘。4. 潘善斋旅是一九三一年四月由鄂东调至新堤者。5. 一九三一年五月下旬刘湘令佟、杨两团全部开往沙市，暂由佟毅统一指挥。宜沙之间与其余各地则由郭勋部“扼要分屯，以资联络”。6.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段珩曾参与对华容红军的进攻。7. 一九三二年夏天沙市草市战斗时二十一军佟团在窑湾草市之间，杨勤安团在岑河口以西。8. 一九三二年三月间荆门驻敌为川军×部郭团。9. 一九三二年七月荆门驻敌为“均淳系剿匪军”。10. 一九三二年二月间焦山河驻敌为湘军独立一旅李国钧部。11. 一九三一年十月佟、杨两团（川军）驻监利至一九三二年七月调沙市、荆门。监利由川军边防副司令吴锦堂率领之步兵第四团（冉团）和新七旅一团（王子愚团）接防。12. 陆明卿为鹤峰保安队第一中队长。13.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当阳敌军郑团一部与当阳团队到水月湾进攻荆当独立团黄冠白等部。14. 湘北保安团第一团（王仲甫）、第二团（胡协南）、第三团（蔡劭）初归湖北保安处长范熙绩指挥到恩施一带进攻红三军，后由张刚（湖北全省保安处保安团临时指挥官）指挥。15. 一九三二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在省、县之间设行政督察专员一级组织。16. 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红七师于拂晓袭击进占老新口之敌第四纵队，战至中午十二时未成功，红军退回新沟咀，同时敌四十八师黄新旅占杨林关准备夹击新沟咀，三十一日新沟咀失。17. 一九三二年九月底到十月初，红七、八、九师已经会合在大洪山，襄北独立团也在六房咀等处。十月十七日王炳南部亦已在襄北出现。

关于川军到湖北与红军作战的资料

(一) 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二年外调赴鄂之川军一九三二年八月独一旅郭勋部二个团和独一团(杨勤安)、独二团(佟毅)出川,先均住宜昌、当阳一带。(一九三二年五月佟、杨二团调荆沙。)(一九三二年)同年又调出川的有第一师第二旅(兰文彬)杨焕、苏奎武二团亦调至宜昌。此二团先由傅渊希指挥,后由佟毅指挥。以上部队又统由郭勋指挥。(一说杨焕、苏奎武部后编入佟团——待证。)一九三二年春第一师第一旅(刘光珍)三个团,第三师第九旅(张邦本)三个团调宜昌。一九三二年四月间第四师(范绍增)第十一旅(贺森权)三个团调荆沙,同时第一路副司令吴锦堂部一个团(吴兼团长)和该路另一个团(冉良成——四团)亦调来,吴部先住宜都,冉部先住沙市,后吴部及冉团到监利。范士杰旅二个团,出川后不久即编入杨勤安团。另炮兵一营,机枪一营由行营直辖。一九三二年夏(范楠轩独立旅)三个团到荆沙,三师八旅(李圭如)三个团调宜昌。第三师第七旅赵鹤团住恩施,另二个团亦在施鹤七属利川一带由韩全瑛统一指挥。(二)川军二十一军到鄂西对红军作战的部队据已知材料,二十一军前后共调了五批军队出川:第一批为郭勋旅(教导师第三旅共七、八、九三个团)及杨勤安独立团(独一团),是一九三二年八月调出的,先到宜昌、长阳等处,一九三二年五月杨勤安部东调至沙市,接四十八师防,宜沙之间防务由郭勋部担任。第二批为佟毅团(独二团),一九三二年调至宜昌,一九三二年五月调沙市,不久杨焕、苏奎武两团(属第一师第二旅兰文彬部)亦来。第三批为张邦本旅(第三师第九旅)是一九三二年前调至宜昌后参加对洪湖区西部之进攻。第四批为范绍增师(第四师)主力(十、十一旅)、吴锦堂部(川鄂边防军副司令)×个团,刘光珍部(第一师一旅)似是一九三二年四、五月以前调至荆沙一带的。

第五批为范绍增师第十二旅(范楠轩部),是一九三二年九、十月间调到荆沙一带的。

此外,还有警备第一路(马云屏部)牛戴两团和炮工司令(兰四玉)下属的一个炮兵团,第三师第八旅的两个团(在利川、施鹤)不知何时调来。

以上总数约二十到三十个团,约三万五千人。

除此之外,在鄂西的川军还有新七旅李宗鉴部(三个团),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以后亦归二十一军系统的最高军事机构指挥。

对这些军队的统一指挥,起初(一九三二年)是在宜昌设第二十一军行营,刘湘派其参谋长袁彬代行。后蒋委刘为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即在宜昌设总指挥部,初仍由袁彬代行,一九三二年春何成濬组织划区清剿以袁为鄂西区剿匪司令官,指挥二十一军部队,一九三二年春初,刘湘以王陵基代行总指挥。到一九三二年川军为了向红军进攻,除一些归其直接指挥的部队外,将向苏区进攻的军队划为四路,派郭勋、张邦本、范绍增(后为罗君彤)佟毅为司令。

(三) 有关川军的一些回忆材料

1. 赖心辉部一九三二年九月编为十八师,张廷生任师长,马昆山部为三十二旅,戴天民部为三十三旅,杨铭部为清乡司令(张廷生可能就是张英,十八师也可能为十一师之误)——戴天民述。

2. 据罗君彤、吴纯瑕回忆,在下蚌湖浩子口被我截击的是张邦本旅,当

时该部自周家矶西退，郭勋部自潜江西退。

3. 在川军配合鄂军进行第四次“围剿”时，川军实际用于进攻的兵力编组如下：

——左纵队（郭勋）下属郭旅三团及张邦本旅两团；

——右纵队（罗君彤）下属廖开孝旅（欠两营），张邦本旅包衡团、范楠轩旅育正锬团、周执经团。

在红三军进攻么口之后，川军上述两纵队主力尾追红军至荆当一带四十余日，其中罗纵队担任追击的为廖敬安团、育正锬团、包衡团及晓正钧团的一个营，郭纵队追击部队不详（据我方材料两纵共八个团），罗纵队其余部队在浩子口一带担任封锁（计有叶成龙团、周执经团，由廖开孝指挥）。（据另一材料称当时川军共编为两个追击纵队，每纵队三团。）

4. 据伪二十一军刊称在曾家集与红三军作战之川军为郭勋旅全部及张邦本旅（九 B）之二十五、二十七团。同报称红三军主力约于八月二十四日由浩子口附近转至外线，转出后曾在太和场向么口之敌进攻与敌激战三昼夜。

5. 伪二十一军刊物称，红七师系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四日晨在监利北约十里处经过时与川军相遇的，敌称将我截为两段。

关于敌军主官和编制的资料摘录

1. 第十九师师长李觉、副师长罗林甲、参谋长黄素府、旅长段珩、邓南骇、陶柳，三旅六团制，另直属炮、工、特务营各一，骑兵一连（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三三年六月情况）。

2. 一九三一年的第三十四师师长为张万信并兼旅长（另一旅长为姜宏谟）一九三二年副师长为张乃葳，参谋长方济川，师为二旅六团制，另师直属炮、工、辎各一营。

3. 一九三二年七月之后第三十三师师长为冯兴贤代，副师长为冯兴贤，师为二旅四团制，另师直属炮、工、辎各一营，特务连、骑兵连各一。

4. 第十军系一九三一年六月由第四十八师扩编而成，扩为四十一、四十八两师，徐源泉仍兼四十八师师长，四十一师长由旅长张振汉升任。四十八师一九三二年为两旅六团制，师直属炮、工、辎各一营，特务连、骑兵连各一。

5. 一九三二年五十一师长范石生，副师长张浩，参谋长王梦熊。编制：步兵二旅四团，另师直属补充团一，特、工、辎各一营，骑、炮各一连。

6. 一九三二年六十四师师长为刘镇华，副师长涂鹏云，下属步兵三旅六团，另炮、工、辎各一营，特、骑各一连，旅长为武庭麟、邢清忠、杨天民。

7. 六十五师师长刘茂恩，副师长阮勋，下属步兵三旅六团，另炮、工、辎各一营，特、骑各一连，旅长刘惠心、姚北辰、马棋臻。

8. 一九三二年湖北警备旅与原八十二师、第三军团特务团、鄂北×属游击队合编为八十二师，警旅编为二百四十六旅，余编为二百四十四旅，师长容景芳，副师长徐承熙，参谋长王瀚民，旅长为陈德斌、王丞代理，师为二旅四团制，另下属特、骑、炮、工、辎各一连。

9. 陈渠珍部，一九二七年为第十九独立师（下属三旅）一九二九年改称湖南省第一警备，一九三一年改称新三十四师，李可达、顾家齐、周燮卿任旅长，师为三旅九团制，另直属特、工各一营，该部从一九二七年起即在湘西进攻红军，霸占湘西十县。

10. 罗启疆部一九三一年为二十二军赖心辉部（当时赖部共五师）第四师在施鹤一带进攻红军，一九三一年冬赖解职，全军改组，罗部编为暂十九旅，一九三一年春改称独三十四旅。下属步兵二团特务排一，副旅长罗锐军，参谋长欧百川。

11. 刘培绪部一九二九年称第三游击司令，后改编为新二旅，一九三二年一月改称独三十七旅，旅属步兵三团，另工兵连一，副旅长李祖荫。

12. 独立三十八旅系一九三一年由皖西民团改编而成，初称新五旅，一九三二年改称独三十八旅，旅长潘善斋，副旅长吕培烈，下属三团及一炮兵连。

13. 新七旅李宗鉴部原为一九三二年赖心辉部之第五师（师长向成杰），一九三一年五月出兵鄂西进攻红军，六月赖去职，该部编为新七旅辖三团，向成鉴为旅长，受武汉行营指挥，九月向在公安进攻红军时，覆舟丢命，副旅长李宗鉴升旅长，后因损失重大缩为两团。一九三二年五月之后又恢复三团制，并直属特、机、迫各一连，参谋长邬灿。

14. 一九三一年九月彭位仁任第十六师师长，四十七旅旅长成铁侠，四十八旅旅长刘济人，四十六旅旅长章亮基，师属三旅六团，另工兵营一，特、辎、骑各一连。其他参考资料（存目）

任弼时选集	人民出版社
贺龙年谱	中共中央党校
回忆与研究	李维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军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编著
鲜血殷红	杨秀山著北京出版社
湘鄂西革命粮根据地史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贺彪著华夏出版社
桑植革命史	桑植县党史办
鹤峰苏区商史	鹤峰县党史办
秭归县革命斗争史	秭归县委党史办
巴东革命史	巴东县委党史办
兴山人民革命史	兴山县委
洪湖革命史	洪湖县委党史办
湘鄂西风暴	监利县委党史办
公安县革命斗争发展概况	公安县委党史办
公安县党史资料选辑	公安县委党史办
石首县革命简史	石首县委党史办
石首人物传	石首市志编纂委员会
沔阳县党史初稿	沔阳县委党史办
江陵县革命斗争史大事记	江陵县党史办
长阳人民革命斗争史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华容党史资料选辑	华容县党史办
沮漳洪流	当阳县委党史办
沮漳忠魂	当阳县委党史办、县民政局
中共宜昌地区党史大事记	中共宜昌地区党史办
红军在黔东	中共铜仁地委党史资料征委办公室
红三军在沿河	中共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党史征研领导小组
湖北英烈传	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湖北省民政厅
贺龙传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卷
恽代英传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五卷
任弼时传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八卷
罗亦农传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八卷
周逸群传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八卷
段德昌传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二卷
贺炳炎传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二卷
柳直荀(克明)传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四卷
黄大鹏传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四卷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集	人民出版社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四川人民出版社
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	人民出版社
王明言论集	人民出版社

